

王凡西選集



卷一
托派與中國

朱正
編



CITYU HK
PRESS

王凡西選集

王凡西選集

卷一 托派與中國

朱正 編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編輯	陳明慧
實習編輯	關喜文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四年級)
封面設計	蕭慧敏
版面設計	劉偉進
排版	蘇少嫻



©2018 香港城市大學

本書版權受香港及國際知識版權法例保護。除獲香港城市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媒介或網絡，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數碼化或轉載、播送本書文字或圖表。

國際統一書號：978-962-937-343-6

出版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香港九龍達之路
香港城市大學
網址：www.cityu.edu.hk/upress
電郵：upress@cityu.edu.hk

©2018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elected Works of WANG Fanxi
Volume 1: Trotskyism and China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s)

ISBN: 978-962-937-343-6

Published by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Tat Chee Avenue
Kowloon, Hong Kong
Website: www.cityu.edu.hk/upress
E-mail: upress@cityu.edu.hk

Printed in Hong Kong

目 錄

卷一說明	vii
序一（岑建勳）	ix
序二（成令方）	xi
序三（萬毓澤）	xiii
編者序	xv
作者簡介	xix
編者簡介	xxi
王凡西部分著譯作品	xxiii

第一部分 雙山回憶錄

序	4
前言	8
一、五四與五卅	11
二、二年大學生活	23
三、從漢口到莫斯科	46
四、東方大學	55
五、莫斯科生活的第二年	78
六、回國工作——被逐出黨	113
七、由四派到統一	143
八、監獄進出	175
九、《鬥爭》創刊——第三次入獄	191
十、抗戰初期的陳獨秀	220
十一、太平洋戰爭與組織再分裂	246
十二、在戰爭與革命的日子裏	266
十三、在寂寞中思索	277
十四、從陳獨秀的最後思想談起	301
後記	319

附錄：	牛津版英譯本序	323
	法文譯本自序	325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版英譯普及本序	328
	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統一大會寫給國際書記處和托洛次基的信（第一號報告）	333
	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執行委員會寫給托洛次基的信	335
	各家書評摘引	337

第二部分 毛澤東思想與中蘇關係

序	350
一、走上了國際舞台	353
二、「分歧」發展中的五個關鍵問題	405
三、國際爭論中的毛澤東思想	435
四、兩個根本原因	473

卷一說明

本卷收入王凡西的《雙山回憶錄》和《毛澤東思想與中蘇關係》兩部著作。

收入本卷的《雙山回憶錄》據香港士林圖書服務社 1994 年 6 月出版的增訂本錄入。據作者在《思想問題·序》中說：「〈從陳獨秀的最後思想談起〉，原本是《回憶錄》〈在寂寞中思索〉一章的後半段。因嫌那一章字數太多，又因文中某些問題的看法必須藉另一些文字來補充，故將那半段截取下來，作為單獨一篇，收在此地。」本版即將〈從陳獨秀的最後思想談起〉一文從《思想問題》抽出，仍舊置於〈在寂寞中思索〉一章之後，以成完璧。

收入本卷的《毛澤東思想與中蘇關係》據香港信達出版社 1972 年版錄入。

原書中發現的錯字都作了校正。

朱正

序一

岑建勳

應該是由於他其中的一個筆名「連根」的緣故吧，我們年輕一輩都親切地稱呼王凡西為根叔。這大概與他平易近人的性格很有關係，彭述之我們當面稱呼他彭先生或彭老，背後叫老彭，但就算是吳仲賢吧，也是根叔、根叔的稱呼王凡西，不曾叫過老王。

第一次聽到王凡西的名字，是在1972年秋冬，那個時候我和吳仲賢及其他幾個《70年代》雙週刊的成員經常去彭述之、陳碧蘭夫婦巴黎的家裏，請教彭老關於1925-27國共從合作到分家的歷史，這就不可避免地談到當時共產國際以至蘇聯內部史達林和托洛次基之間對於中國革命的分歧，以至中國托派的產生和以後發展的歷史了。自五十年代開始，中國托派組織在香港殘餘下來的人數很少，直至1973年之前也基本上沒有什麼活動，所以當彭老急不及待地述說中國托派內部於1941年由於太平洋戰爭爆發引起的「中日戰爭性質變化」的辯論以至不同派系的產生，我們是完全聽不懂亦無從分辨誰對誰錯的，王凡西代表了與彭不同的意見——而這個分歧顯然三十年之後仍然影響着彭對王的看法，對彭來說，王代表的是一種失敗主義的意見，而彭認為，是這種意見，讓中國托派被魯迅，以至中共打成為漢奸的主要根據。

直至今今天，我也不同意根叔當年關於中日戰爭由於太平洋戰爭爆發而性質上產生了變化的意見，但是無論現在還是當時，我也不曾認同過根叔在托派內部提出的這個討論，是中國托派被誤解為（或刻意地被歪曲為）漢奸的主要根據，我認為是陳其昌魯莽地給魯迅發信，

引致魯迅情緒化的公開回信才是讓中共抓到機會打擊托派的一個缺口（現在中國大陸的抗戰史研究已不再提中國托派是漢奸的說法），彭述之的指摘，是不符合事實和對王凡西不公道的。

73年中我回到香港之後，有一年多的時間我常到澳門與根叔及另外一位被流放到那裏的老同志見面，有陪同來自世界各地的托派同志去拜訪的，也有和一些新加入的年輕同志去徵求意見的，次數頻密到我也數不清了。根叔給我的印象永遠是從容和親切的長者，如果說彭述之的姿態是帶有家長式訓示的話，那麼和根叔的交談就像平輩之間的討論；由於身體的狀態不容許他持續交談太久，我們每次探訪都會限制不超過三數小時。根叔並沒有因為人家說我是「彭述之關門弟子」而心存芥蒂，對當時香港五十出頭的一些「彭門弟子」對他的戒心，他是坦然和不放在心上的，也從來不提過去與彭的紛爭或批評香港同志的消極和不作為，是一個典型的君子學者。

由於英國里茲大學（University of Leeds）中文系一位同志 Gregor Benton 的努力，75年秋根叔終於來了英國。我早一年已經因為厭倦了香港組織內部的派系紛爭脫離了組織生活移居倫敦，但是我們之間的關係並沒有因此而生疏或見外了，根叔欣然答應替我出版的《復醒》月刊寫創刊詞，而十多個圍繞着《復醒》的香港留學小伙子也跟着我根叔、根叔起來，一直到2003年後他離世前，這些長大了的忘年小友（根叔語）還都會有事沒事的老遠開車去 Leeds 探望他，敬愛如故。

根叔一輩子是一個永遠忠於自己理想的革命家，儘管我們後來對世界的看法不一樣了，卻永遠不會影響我對他的敬重，在我們的眼中，他或許表面上是度過了一個孤寂的一生，但我深信，他是活得很充實的。

序二

成令方

台灣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教授

當我 1976 年在英國里茲留學時，得班國瑞（Gregor Benton）的引介，結識當年已經 70 歲的根叔（香港左派年輕人對王凡西的親暱稱呼）。根叔平易近人，讓年輕人一見面就可以沒大沒小天南地北地聊開了。從此，就每星期定期拜訪，成為忘年之交。

在里茲大學圖書館，我閱讀了很多當年台灣的左派禁書和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歷史，後來閱讀了由香港朋友油印出版的《雙山回憶錄》，才開始理解中國共產革命發展過程中曾經出現過的「托洛次基少數派」，也才對這段歷史開始有非官方版的認識。

1949 年中國共產革命成功後，根叔的托派同志們若留在中國，都先後被捕入獄，他因被組織派到香港去工作，就倖免牢獄之災。不久後又被香港政府驅逐出境，轉到澳門在嶺南中學謀一份教職。他在劉醫師的家中租一間房間，一住 20 多年直到 1975 年移居英國里茲。這段期間根叔與立場反共的劉醫師夫婦成為莫逆之交，他們經常聊文學、戲曲、詩詞、電影，還有世界歷史等。但劉醫師夫婦卻不知這位好友竟然是共產黨的托派，而這位王老師每天勤勤肯肯在房間讀書寫作，竟然寫的是革命回憶錄，評論毛澤東思想和文化大革命，檢討中國與蘇聯的關係，討論托派的歷史爭辯與在香港的組織工作。現在要出版的三大冊巨著的前二冊，都是在這段「隱藏身份」「暢談文藝」的情誼中產生的。這讓我們除了敬佩根叔不斷書寫其對革命信念的執着

外，還增添一分他豐富柔情的日常生活的想像。1975年葡萄牙軍隊撤離澳門，劉醫師夫婦移居德國。之後，根叔寄送一本《雙山回憶錄》，他們才恍然大悟，這位老友의 複雜身份。對我而言，他們的關係真是人間奇談。

終其一生，根叔一直在思考討論托派革命的種種議題。這在《晚年札記》一冊中可以看到他思考的軌跡。連1989–1998年的生活日記也都可以看到他持續對話的對象是托派同志和左派知識分子。1995年3月8日，他寫道：「得梁耀忠從香港打來電話，知子春已於今晨逝世。子春死了，我也不會再寫札記了。」子春就是與他多年共度患難定居香港的樓國華（老樓）。自從1949年以來，根叔的作品都由他負責籌錢印刷傳播。住在英國的這20年，老樓則是根叔中文世界的訊息來源。他在香港與《十月評論》的同志經常聯絡，也經常引介年輕的左派到英國拜訪根叔，而根叔則將書寫的作品陸續寄給老樓，由他負責出版。在此要向老樓致敬感謝，謝謝他印出根叔的手稿，為如今根叔中文著作的再現奠下重要的根基。

面對當今全球新自由資本主義的橫行，很多人認為馬克思、恩格斯當年對資本主義的批判還是目前最有力的武器。同樣的，雖然托派思想有其時代的限制，但是托派對史大林官僚主義的批判，多年來還深受歐洲左派的擁抱。雖然中國共產黨在習近平的領導下，看似將成為世界強國，但根叔等托派同志對共產黨的官僚主義與黨內不民主的批判，至今仍然擲地有聲。他們為懷抱左派理想的我們，畫出了民主的共產世界藍圖，讓我們看到共產政黨與民主的必然關連，而根叔的著作，為我們畫出多元多彩的中國共產革命，引領讀者往更寬闊的層面思考政治。

序三

萬毓澤

台灣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對我這一輩一部分受左翼思潮洗禮的人而言，王凡西有不可取代的意義。由於左翼思想在台灣長期缺席，因此，當年許多關心台灣民主前途與社會改革的台灣人，很自然地受到殷海光等人代表的自由主義的影響。我自己也是循着這樣的知識軌跡成長的。但年歲漸長，參與不少社會運動之後，反倒越來越受左翼的思路吸引，並試着理解馬克思主義在台灣、在中國的發展歷程。然而，中共或蘇聯的官方意識形態與歷史書寫始終沒能真的說服我。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因緣際會接觸、瞭解了王凡西等人投入的中國「托派」運動，頓時覺得耳目一新。對當時的我而言，王凡西（乃至國際的整個「托派」傳統）的著作雖然是長期受到壓抑的「小敘事」，卻彷彿開啟了一扇窗，讓我能夠在令人窒息的「國共內戰」的夾縫中重新探索中國現代史、國際共運史，並由此思索台灣與中國、東亞的關係。後來，我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還曾在港台再版了王凡西的《毛澤東思想論稿》，算是為傳播他的思想盡了棉薄之力。

國際「托派」幾乎無窮盡的內部爭論與分裂往往使人喪氣，我也認為，是否堅持「托派」這個標籤，今天也許不再那麼重要了。然而，他們留下的思想遺產仍有豐富的現實意涵。以我目前的學術與政治關懷為例，我最關切的，是如何突破我所謂的「冷戰格局下的鏡像構造」

（表面上水火不容，實際上雙方都需要對方來證成自我，且雙方都接受了某些核心前提，如「社會主義」等同於一黨專政、國家主義和集中式的計畫經濟），而完成真正的「去冷戰」知識工程。這樣的「鏡像構造」並沒有隨着冷戰的終結而消失，而是不斷支配、形塑着許多人的認知架構，從而封閉了政治想像。對我而言，「托派」（或至少一部分托派）代表或參與的社會主義傳統，恰恰是冷戰結構下受壓抑的「由下而上的社會主義」（借用 Hal Draper 的說法）。這樣的社會主義不會不加批判地擁抱深陷民族主義敘事的「大國崛起」，而是始終對國家（主義）戒慎恐懼；它的核心價值不是由少數菁英或政黨來包辦革命事業，而是不忘馬克思強調的「工人階級的解放應該由工人階級自己去爭取」；不會試圖以革命為名強化官僚體制的權力，而是要建立普遍的自治，實現馬克思筆下的「自由人聯合體」。我一直認為，這樣的社會主義傳統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源，讓我們有可能突破僵固的冷戰結構，尋找多重的解放路徑。

Karl Korsch 曾說「社會主義，不論是其目的或手段，都是一場實現自由的鬥爭」。王凡西一生的言行著述都生動體現了這種精神。如今，我們終於見到了《王凡西選集》的問世，讓他的思想得以世世代代流傳下去。我也希望，透過這套選集，中文世界年輕一輩的讀者能夠獨立地、批判地重估王凡西、中國托派、世界左翼運動的得失是非，並從中探索社會變革的動力。是為序。

編者序

這是王凡西著作的第一次結集出版。

王凡西（1907–2002），本名王文元。浙江海寧人。1925年在北京大學求學的時候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他奉黨組織的派遣去蘇聯留學。在這裏他接受了托洛次基的觀點，成為莫斯科中山大學托派秘密組織的一員。1929年8月奉調回國工作。不久即因為托派問題被共產黨開除。1931年5月1日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托派）開統一大會，他被選為統一組織的中央常委，分管黨報工作。不久之後他第一次被捕了。就因為他一直不放棄托派的活動，以後還被捕兩次，直到抗日戰爭爆發，南京失守前夕他才出獄。1949年5月移居香港，不久再遷澳門。1975年3月定居英國，直到去世。

他一生著譯甚勤，稿費是他的生活來源。他留下了大量檔次很高的著譯。像《雙山回憶錄》，就是一本關於中國現代史、中共黨史、中國托派史的重要史料，東方出版社將它收入現代稀見史料書系之中，足見承認了它的價值。他的其他一些作品也都受到學術界的重視。按說，這是一位有資格編印全集的著作家。只是他早年出版的書籍、晚年在海外報刊上發表的文章（更不必說外文作品）都不易收集齊全，至於要收集歷年所寫的大量書信，更不知如何着手。我看要為他編一部嚴格意義的完整的全集是不可能的了。只能就現有的材料給他編一部選集。

要編這一部選集，我應該貢獻一點微力。我想，我也許是國內收藏王先生著譯較多的一人。我所收藏的這些書是哪裏來的？這就說來

話長了。1980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借調我去擔任《魯迅全集》第六卷的工作。孫用先生介紹我認識了樓適夷先生。樓適夷先生又介紹我認識了上海的鄭超麟先生和他的堂弟、香港的樓國華（字子春，筆名一丁）先生。子春先生很熱心，送了许多書給我，其中包括王凡西先生在香港出版的全部譯著。我還記得，為了能夠順利得到這些書籍，是李普先生托新華社香港分社楊奇先生幫我帶過來的。此外樓子春先生還把王先生在香港刊物上發表的好些文章複印寄給我。我挑選了他翻譯的一些作品編為一本小冊子《書信、日記及其他》，於1988年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他對這本小冊子是滿意的。因此他也就有了願意讓我來編輯他的著作的想法。

今年我知道了魏時煜博士在做「北大三人行·中國知識分子三部曲」，其中一人就是王凡西。我就向她建議：趁此機會同時出版他本人的著作。經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社長同意，我就來着手進行編選了。

大家都知道：王先生一直到死，都是一個堅定的托派分子。他對托洛次基的尊崇和信仰，可以說就像宗教信徒那樣的虔誠。我尊敬他的為人和學術成就，卻無法同意他所堅持的托派觀點。我以為在今天已經可以看得很明白：托洛次基主義和史大林主義都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流派，都屬於已經過去的那個時代的了。當年共產國際即史大林對於中國革命的錯誤指揮導致中國大革命的失敗，托洛次基指出史大林的這些錯誤，是有道理的。這也就是吸引陳獨秀等許多人成為托派的原因。六十多年之後，世界已經有了極大的變化，依然認為托洛次基主義是一種指導革命的有用的理論，未免太不切實際。而王先生就正是這樣一種見解。1989年蘇聯和東歐發生巨變，他認為這不但是史大林主義的失敗，而且還是托洛次基主義的勝利！他在這一年

除夕寫的札說：「在此局勢中最使我苦悶的一個現象是：為此變革準備了半個世紀的第四國際，卻未能在此巨變中起任何顯著的作用！我們是應該起很大作用，必須起領導作用的！但願 1990 年開始，第四國際的作用能再大大發揮出來。」他在 1991 年 2 月 13 日寫的札中說：「在史大林主義徹底與普遍崩潰的今天，如果沒有以第四國際為代表的那個思想體系，即是說，如果沒有以真正國際主義和徹底大眾民主相結合的不斷革命理論的思想與實踐，那末，我們真的要看到資本主義不僅在事實上，而且在思想上也全部與徹底地奏凱了。可以說，今後人類仍能對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保持信心，並終於會見到它們的實現者，全靠有第四國際所代表的思想在！」這年 12 月 27 日，也就是蘇聯解體兩天之後，他寫的札說：「史大林主義的制度是根本無法改良的。要代替它，只有兩條路：或者代之以真正工人民主的、國際主義的革命政權——也就是恢復列寧—托洛次基時代的革命政權；或者，恢復資本主義的統治，最後地與徹底地推翻由十月革命所造成的最後殘餘。」到了這個時候，他還在幻想「恢復列寧—托洛次基時代的革命政權」哩。不知道本書的讀者中有沒有一個兩個同意這個意見，反正我是完全不能同意這個意見的。

我注意到了：作者在 1990 年 4 月寫的《雙山回憶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版英譯普及本序》中表示：

今後的世界，無論目前正陷於分崩離析、彷徨覓路的原有的「社會主義」國家，或者表面繁榮而實則充滿矛盾的資本主義國家，要想找到真正出路，是否只有依照托派已有文件中定下的具體方案呢？我不這樣想：人事太複雜，「歷史老人」太狡黠，任何個人或任何團體制訂的方案，總得隨事變的發展而發展。

可見他完全懂得對於未來預測之難。我很欣賞這個見解。

所以我在選編本書的時候，作者寫的那許多討論第四國際綱領的文章，那些托派組織的工作計劃、工作方案之類的文章，就都不收入了。一些關於時事的評論，儘管當時看來寫得很有分量，畢竟時過境遷，也就不收入了。現在收入的都是他最重要的作品，必將傳世的作品。

作者有一部逐日寫成的《晚年札記》，生前沒有發表過。2004年香港新苗出版社少量印製，編號發放，作為紀念。我得到的是第二號這一本，即據以編在卷三第二部分。它真實地記錄了作者最後十幾年的生存狀態和心情，彌足珍貴。

出版社領導體諒我年老力衰，無力擔負許多具體的工作，特地安排了陳明慧小姐同我合作。許多工作（特別是校對）都是她做的。

朱正

2017年12月6日

作者簡介

王凡西 (1907-2002)，本名王文元，浙江海寧縣人，筆名雙山，後輩多稱為「根叔」。中國托派領袖之一，曾任中國國際主義工人黨書記。王凡西 14 歲小學畢業，開始受到五四運動的新思潮影響，決心追求學問，做大事。中學時養成對文學的熱烈愛好，也顯出了演說的才能。1925 年參加響應五卅運動，擔任杭州學生會宣傳部長。1925 年進北京大學後，參加了校內的共產黨組織。1927 年 6 月奉派武漢工作，7 月下旬去蘇聯留學。在蘇聯東方勞動大學期間接受托派思想影響，並秘密加入托派組織。1928 年秋，成為莫斯科中山大學托派秘密組織的領導人之一。1929 年 8 月回國，到上海後任中央組織部幹事，1930 年初，因托派身份被發現被開除出共產黨。



王凡西回國後，起初參加托派「我們的話」組織，後來屬於「十月」派。在四個托派組織商談統一時，王凡西開始和陳獨秀密切合作，

終於促成 1931 年的統一。王凡西當選為統一的托派組織中央委員，並擔任機關報編輯。

中國托派統一不滿一個月，大多數中委就被捕，其中包括王凡西。1931 年，王凡西被國民政府逮捕下獄。1934 年出獄，1935 年底參加新成立的托派中央臨委，創辦《鬥爭》及《火花》。1937 年 5 月再次被國民政府特務機關逮捕押去南京。抗戰開始後出獄，1937 年 12 月中旬到武漢。1938 年 2 月經香港回到上海，繼續參加托派工作。後與鄭超麟創建托派政黨中國國際主義工人黨，任該黨書記。

此後幾年間，王凡西做了大量文字工作，如擔任《動向》月刊編輯，翻譯第四國際的《過渡綱領》和《俄國革命史》等，在上海創辦《新旗》半月刊。他還把所有已經譯成中文的托洛次基論中國革命問題的文章集中起來，經過校訂，編成一冊出版。1949 年 5 月，王凡西由上海遷移到香港，幾個月後被香港政府逮捕並驅逐到澳門。

王凡西在澳門住了 25 年，繼續思考和寫作，著有《雙山回憶錄》和《毛澤東思想論稿》，譯作有《帝王術》、《詩與自傳》、《文學與革命》。1975 年 3 月移居英國，2002 年 12 月 30 日在英國里茲去世，終年 95 歲。

編者簡介

朱正，1931年生於長沙。1949年9月考入李銳先生擔任社長的新湖南報社工作。1956年在樓適夷先生擔任社長的作家出版社出版第一本書《魯迅傳略》。1957年被劃為右派，受到開除公職、勞動教養的處分。1962年解除勞動教養後以體力勞動維持生計，其間在馮雪峰、孫用兩位先生指導下寫有《魯迅回憶錄正誤》，在葉聖陶指導下寫有《魯迅手稿管窺》。1979年平反，1980年借調人民文學出版社參加新版《魯迅全集》的編注工作。其間經樓適夷先生介紹，與上海的鄭超麟和他在香港的堂弟樓子春交往，並從樓子春處得到王凡西的許多著譯。後來回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一度擔任總編輯。其間編輯出版了鄭超麟的詩集《玉尹殘集》、王凡西的翻譯小品集《書信、日記及其他》。1993年寫成一本研究反右派鬥爭的專著，1998年以《1957年的夏季》的書名在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後來用不同的書名幾次在海外出版。每一次都有一些增補和修改，最近的一版是2013年以《反右派鬥爭全史》的書名在台北秀威公司分上下冊出版。此外重要一點的學術著作，有去年在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當代學人精品·朱正卷》，討論此前



出版的《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並涉及《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以及《蘇聯歷史檔案選編》。

在編輯工作方面，為人民文學出版社做的，有1981年版《魯迅全集》第六卷的編輯，2005年版《魯迅全集》編委、第六卷編輯。《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一卷編輯。此外編有聶紺弩的詩集《散宜生詩》，並作注；還替聶紺弩編了回憶文集《腳印》、《高山仰止》，還為李銳編輯了《廬山會議實錄》。期刊方面，現在是《新文學史料》的編委。

王凡西部分著譯作品

著作

書名	署名	出版者	出版年份
炮火中的世界動向	鳳崗	上海：華盛頓印刷出版公司發行館	1939
電影漫談	雙山	香港：世界出版社	1956
《過渡綱領》二十年	王凡西	—	1958
思想問題	三山	香港	1962
三齣小戲	雙山	香港：周記行	1968
我們的意見	雙山、一丁合著	香港	1970
七零年代往何處去？第一、四篇	耕莘	上海：春燕出版社	1972
毛澤東思想與中蘇關係	三原	香港：信達出版社	1972
論中國第三次革命中斯大林派勝利與托派失敗的原因——兼答彭述之夫婦	王凡西	—	1973
毛澤東思想論稿	雙山	香港：信達出版社	1973
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雙山	香港：信達出版社	1974
雙山回憶錄	王凡西	香港：周記行	1977
印支問題	雙山	香港：信達出版社	1979
謊言與真實	王凡西、鄭超麟、樓國華合著	香港：信達出版社	1984

譯作

書名	署名	出版者	出版年份
從唯心論到唯物論	王凡西譯 普列漢諾夫著	上海：亞東圖書館	1936
蘇聯黨獄之真相	張家駒編譯	上海：亞東圖書館	1937
恩格斯評傳	李書勳譯	上海：亞東圖書館	1940
兒子・戰士・朋友	李書勳譯 托洛茨基著	上海：亞東圖書館	1940
中國革命問題	克全編校 托洛次基著	上海：春燕出版社	1947
史大林與中國革命	雙山譯 托洛次基著	香港：國際出版社	1947
俄國革命史	王凡西、 鄭超麟合譯 托洛次基著	上海：春燕出版社	1964
帝王術	雙山譯 馬嘉維里著	香港：信達出版社	1969
詩與自傳	雙山譯 耶夫土欣可著	香港：信達出版社	1970
文學與革命	惠泉譯 托洛次基著	香港：信達出版社	1971
他們的道德與我們的道德	李書勳譯 托洛次基著	香港：信達出版社	1975
托洛次基致中國同志的信	雙山譯 托洛次基著	香港：信達出版社	1981
第四國際基本文獻新一輯 〈蘇維埃國家的階級性〉 及〈戰爭與第四國際 (綱領草案)〉	雙山編校 托洛次基著	十月書店	1983

卷一
托派與中國

王凡西著

雙山回憶錄



第一部分 雙山回憶錄

序

前言

- 一、五四與五卅
 - 二、二年大學生活
 - 三、從漢口到莫斯科
 - 四、東方大學
 - 五、莫斯科生活的第二年
 - 六、回國工作——被逐出黨
 - 七、由四派到統一
 - 八、監獄進出
 - 九、《鬥爭》創刊——第三次入獄
 - 十、抗戰初期的陳獨秀
 - 十一、太平洋戰爭與組織再分裂
 - 十二、在戰爭與革命的日子裏
 - 十三、在寂寞中思索
 - 十四、從陳獨秀的最後思想談起
- 後記

附錄：牛津版英譯本序

法文譯本自序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版英譯普及本序

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統一大會寫給國際書記處

和托洛次基的信（第一號報告）

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執行委員會寫給托洛次基
的信

各家書評摘引

序

這本《回憶錄》的作者是我的老朋友。他是我自從二十年代以來，為了一個共同理想而一起戰鬥、一起受難、直到現在尚在人間、並且依舊堅持鬥爭的二位老友之一——另外一位是鄭超麟。

長達七十年的友誼是彌足珍貴的，七十年共同工作的回憶更值得懷念。關於過去，他們二人都寫了回憶。他們的回憶錄都普遍受到有關方面的重視。他們的其他作品（創作和翻譯），也都曾發生不小影響。這個影響，近年來非但不曾減退，反而因為「社會主義陣營」的崩潰而愈加擴大、愈加增強了。

為什麼會如此呢？因為，我們數十年來為之鬥爭的那個共同理想——對一系列重大革命問題所闡明的馬克思主義立場——恰恰就是以史大林為代表的那種「社會主義」的對立面；恰恰就是對史大林主義所實行的一切叛變行為的一貫指責；而且自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期以來，它便早已指出了與預言了這種「社會主義」的必然崩潰。

當然，史大林主義崩潰證實了我們見解正確，這件事的本身並不能立即促使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替代破產的史大林主義。它不可能促使那被斷送了的國際革命運動立即發生轉機；它不可能使世界局勢立即

變得有利於真正社會主義運動的興起。事實正相反，由於史大林派以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名義在數十年中犯下了數不清的罪惡，它的最後破產非但不能促成社會主義復興，反而在未可預見的一個時期內，它將使一切與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有關的思想和運動，進入更低落階段。

因為，人們有意與無意地把史大林主義的破產當成社會主義的破產；他們不願或不能把史大林主義和真正的社會主義區別開來。而要廣大群眾認清楚二者之間的區別，是需要一個或長或短的過程的。

要想縮短這個過程，要想使新的社會主義革命的世界潮流早日到來，在主觀方面，最為重要的，是要讓人們懂得並看出史大林主義與真正馬克思主義之間的區別。要讓廣大勞動群眾知道：史大林主義的崩潰絕對不等於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破產。要做到這一點，最重要的一步，我以為除了在理論上不倦地闡明二者的是非異同之外，還必須（我甚至認為更為重要的）把過去史大林主義（部分也是毛澤東主義）和托洛次基主義二個體系之間的鬥爭歷史，扼要與形象地介紹給新一代的革命勞動大眾。只當他們憑自己的經驗印證了與體會了這二條路線的是非曲直之後，才能產生出一個群眾性的新的革命組織與運動；才能使那因罪惡的史大林主義及其體制崩潰而造成的一個世界性的可惡現象有所改變，才能使原本嚮往社會主義的人們，從幻滅、消沉、迷惘與悲觀中恢復過來；才能使國際形勢出現真正有利於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

要達到這個目的，我以為，王凡西的這本書，是多少可以起一點作用的。因為——

它詳細地記錄了蘇聯和中國的托派的產生和發展；

它詳細地記錄了史大林派和托洛次基派關於中國革命的不同立場；

它詳細地記錄了史大林派如何控制中國革命與中共；

它詳細地記錄了國民黨如何壓迫中國托派，以及中國托派如何在國共二黨的迫害之下堅持自己的主張和鬥爭。

從那些關於人和事的親切描述中，人們不難做出一些誰是誰非，誰真誰假的結論；而這些結論又會有助於人們在思想和理論方面得出正確的結論來。

* * *

《回憶錄》這部書的本身經歷，我覺得，多少也反映出它在這方面所能起的積極作用。正如美國的卡庚教授（Prof. Richard C. Kagan）所說：這本書的「起始發源是寂寞與寒愴的」（1981年英文《中國季刊》秋季號書評，請參閱本書附錄：書評摘譯）。著者當年被逼蟄居在偏僻的澳門。在生活異常緊迫，參考資料絕無僅有的條件下，寫成了這部回憶。在當時（1957年）的政治氣氛中，當然沒有任何一個出版家會接受這本書。是我請朋友將它繕寫在蠟紙上，油印了20部，傳觀於當時寥若晨星的一些香港朋友之間。這情景，確實是「寂寞與寒愴的」。二十年後，即1977年，這本油印書用鉛印出版了，更有趣的是：這個本子不久便被北京「現代史料編刊社」翻印，在中共內部流通傳觀。二年後（1979年），此書讓日本朋友看中了，譯成了日文，由東京拓植書房出版。1980年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英譯本。1983年出版了德文譯本（法蘭克福脫社會主義出版社出版）。1987年又多了法文譯本（巴黎 La Brèche 書店）。1991年，美國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英文版的普及本。

以上所述的小小成就：由「寂寞、寒愴」逐漸變得「熱鬧、堂皇」。當然還是不足道的。但一葉知秋，隻燕報春，作為一個象徵，我們確能從這件小事中，多少看出一點世界革命氣候的轉變，可以看出在洶湧澎湃的反社會主義、反托的逆流中，真正的、代表勞動大眾民主的社會主義的思想逐漸地在受到人們的重視和歡迎。

當此《雙山回憶錄》的第三個中文版本出版之時，作為作者老友與此書的最初出版人的我，欣喜之餘，寫了以上的一些話，作為序。

樓國華

1993年5月5日於香港

前 言

這部稿子寫成於二十年前。當時曾經由幾位好友代為抄繕，油印二十餘冊，流通於少數讀者間。因為寫作時的環境關係，那裏可資參考的文獻絕無僅有；幾乎一切都憑記憶，自不免有一些事實上或年份上的錯誤。多年來幸承不少讀者指出，得以在這「再版」時一一改正。

書的內容，並無改變或增添。無論記事與議論，都仍止於1957年，凡發生於那一年以後的中國內外大事，均未涉及。在理論方面，當時所作的某些推測，都不就後來發生的真實情況而加以改寫。所以如此者，一來為了難改，牽一髮將動全身；二來為了存真，也不願事後竄改，冒充先見。

本書大抵將和它的英譯本（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同時面世。英譯本由於出版的預算關係，限定字數，以致我不得不將最後一章（《在寂寞中思索》）割捨。其他各章，也有或多或少的刪節。二書間倘有若干出入處，當以中文本為準。

臨了，我願趁此機會，向二十年來關心本書，曾為它抄繕，油印，提出意見，以及目前出錢出力使它得以問世的幾位好友，表示深切的謝意。

* * *

上面這些話是在1977年11月間寫的，到現在已有十四年了。我不曾想到我還能活這麼多年；也不曾想到這本書還會在香港重印；更加不曾想到的是：我在書中實際上給他們寫了「悼詞」的國內朋友們，還有幾位能活着見到這本書，特別是我在書中一再提到的鄭超麟，不但能活着見到它，並且還能給它做了校勘。

讀者們將在這個新本子裏見到不少條「校者注」。這位校者便是鄭超麟。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1979年6月，鄭超麟於被囚二十七年之後終於活着出獄了。1980年，北京的「現代史料編刊社」翻印了《回憶錄》，供內部參考。也許因超麟被指派去「搶救黨史」的緣故吧，他居然也有資格看這本書。他邊讀邊校，結果在1981年11月給出版者編寫了一大張校勘表。這張表，我終於也輾轉獲得了一份。

超麟的記性特別好，加上他的細心，他的校勘指出了我書中不少有關年份與事實方面的錯誤。它讓我在這次重印此書時得以校正。許多明顯的小錯誤，乾脆在正文裏改正，不加說明。一些比較重要的出入，那就不改正文，而把校者的原注附在下面——藉以紀念上述那一段文字因緣。

除了校者注之外，這次增訂還添了幾項補注。那是十四年來，主要是我離開澳門來到歐洲之後，由於接觸到新的資料而增補的。

附錄原來只有一篇：〈牛津大學版英譯本自序〉。這次添了三篇：1、《回憶錄》的法文譯本自序；2、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的英譯紙面本序

文；3、各家書評摘譯。此外，還新加了當年中國托派統一大會寫給國際書記處與托洛次基的兩封舊信。它們是幾年前從哈佛大學圖書館的托洛次基檔案中找到的。

其餘內容，完全與 1977 年出版的本子無異。

1993 年 8 月 20 日作者記

一、五四與五卅

五四運動發生的那年，我正在本鄉小學裏讀書，12歲。但知道有這件事，乃至受這運動的影響，卻又在一二年之後了。

我的故鄉是這樣的一個市鎮，它是既開通而又閉塞，不偏僻卻是荒寂的。地處於滬杭之間，有鐵路線聯絡這兩大都市。它是浙西的兩個食米集散地之一；更有不小一個區域的農民的蠶絲，由這裏收購了送去上海。所以商業資本很早統治了這個地方，商人久已是它最有權勢的人物。讀書人，據說在清朝就是如此的，如果他不同時又是典當主人、錢莊老闆或大地主之類，一樣不為人重視。這裏的傳統是銅臭壓倒書香，文化氣息自來稀薄得可憐。

上海市場的消息，幾小時內就可以在鄉鎮的茶館裏引起風波；而北京學生們的「鬧事」，則連我們「最高學府」裏的老師也不曾注意。十餘歲的小孩子當然更是茫無所知。

在人口將近3萬的市鎮裏，只有兩所完全小學。我所就讀的那一所，因為由一位富有的孝廉公當校長，教員中的多數也是地方上有地位的紳士，所以被目為最高學府。孝廉公以他辦書院的方式來辦「洋學堂」。大堂上供着「大成至聖先師」的神位，受着孩子們晨進夕退的

兩次敬禮。功課中雖已有了格致、音樂，甚至高年級還教英文，但最注重的還是國文，尤其是《論語》和《孟子》。我只讀過《論語》，由一位儒醫兩通的老秀才給講解的，教得很認真，要求非常苛刻，甚至連朱夫子的注釋都得背。

關閉在這樣的門牆裏，外面世界發生的思想的激蕩，自然不會立即波及的。

然而，要來的終於要來的。大約在一二年後，它由上面和外面侵進來了。

縣裏的視學員，也是本鎮上一個秀才，想奪取這所最高學府。他靠了一個與孝廉公們敵對的大紳士撐腰，又借了點縣教育當局的勢力，推倒了老校長。這一來，頗不得大多數地方人士的同情，因此當他以新校長資格走馬到任時，非但舊教員無一留職，而且鎮上的所有讀書人都給了他抵制，不受他的延聘。結果他只好求才他鄉，請了一批杭州第一師範剛畢業的學生來做我們的先生。

杭州第一師範是浙江省裏的「北京大學」。在當時，它與長沙的第一師範，可說是北京大學新思想運動在外省的兩個最得力的傳播站。校長經亨頤，氣度與為人都跟蔡元培相似。於學派無成見，對人才能兼容。自己的思想是開明而民主的。他所延致的教師中有所謂「四大金剛」（陳望道、劉大白等），學生中出名的是施存統、楊賢江等輩。施存統（後來改名復亮）之出名因為寫了《非孝》那篇文章，而《非孝》又使第一師範大大出了名。

當時浙江省的統治者（督軍盧永祥，省長張載揚，警察廳長夏超）早把第一師範看成為眼中釘。久矣乎要給他一點打擊，苦於沒有藉

口。《非孝》（登載在第一師範學生自辦的一份刊物上的）一出，便有了題目，當局對學校進行了迫害。經亨頤為了保護他的教員和學生，以去就爭，終於辭職而去。後來學生們為了挽留校長，反對新校長，進行了罷課鬥爭。最後集體被軍警圍困在操場上，堅持了一次全國聞名的大抗爭。

我們新校長延聘來的新教員中，有一位就是那次鬥爭的領袖之一，其餘的當然也是新派人物。

其時我是畢業班的學生，我們一班的主任就是那位杭州學生運動的英雄。

不過當那一學期開始的時候，我們卻以慚愧的心情走進大門的。因為有不少「不事二主」的學生退了學。他們轉入舊時三年級主任（一位舉人）所辦的私塾去就學。留下來的學生大多比較貧寒，他們的家長與學校的舊主持人較少關係或全無關係。「最高學府」的令譽從此毀了，合鎮的上流人都鄙視它。就讀該校的學生也不再有什麼光彩了。

開學典禮時，不見了「至聖先師」，因此也不再隆重鞠躬。四五個新先生，年紀都只比我們大上十幾歲的，穿着布大褂，怪不神氣。孝廉公時代那種莊嚴肅穆的氣派是沒有了，我們這些不得已做了「貳臣」的孩子們心裏都感覺得有點難堪。

看看課程表，「經學」已經不見了；領來了新書，其中竟有用鋼筆板自印的白話文講義。新的校歌也貼出來了，過去校長引以自傲的那首「論文師軾轍，立品繼程朱」的歌詞，被宣佈作廢，改填的是些白話字句。孩子們沒有說什麼，但不少人想起了鎮上流行的批評，「這個學校給弄得不成樣子了」。

我們是用失望和疑慮心情來迎接這幾位五四運動的代表們的。不過事情改變得很快。不出一二個月，我們就非常崇拜我們的新先生了。首先，我們不必像孝廉公時代那樣害怕老師，師生之間成了朋友；其次，我們完全懂得他們所教的東西。陳獨秀胡適之關於文學革命的論文，周作人的小品，劉半農等人的白話詩，我們都貪婪地，懷着無上興趣地讀着。（順帶說一說，那時老師們始終沒有將魯迅的東西介紹給我們，甚至我們不曾聽過提他的名字。我個人知道魯迅與閱讀他的作品，那是在1925年以後的事。）尤其叫我們歡喜的，乃是聽他們講自己在杭州鬧風潮的故事，講他們的學生生活。不久，新方式的學生活動就在我們學校裏試辦起來；成立了自治會，創建圖書館，訂閱滬杭日報及雜誌，辦了手寫的黏貼在牆壁上的校刊，甚至還開了一爿學校商店。

不消一個學期，「最高學府」的面目和氣氛已改得完全不同了，它變成我們小鎮上的「北京大學」和「第一師範」。在本地衛道夫子們的心目中，我們都成了陳胡新黨的小嘍囉，事實上也正是如此。

14歲那年我在小學畢業。為了前途問題，我和那時候的許多孩子一樣，和父親發生了衝突。我的父親是一個讀書人，前清末年進了學的，所以他有資格與士大夫遊；但因他不是富家子，地位當然不高，雖在詩酒唱酬中，也不免常要受些閒氣。這就養成了他的兩重性格：一方面看不起那些似儒實商的紳士；另一方面卻決心要在商業上競勝致富。他時常用了憤世嫉俗的口吻（多半在他醉酒以後）對我和我的兄姊說：「讀書人最沒有出息，有了錢人家就會敬重你。」因此，當我讀完小學之後（當時照我們鄉間人的說法，這程度已等於前清的秀才），他堅決要我學生意，不讓升學了。他這樣決定，另一原因是家境

不好，實在也無法供給我上省城讀書的費用。所以在我畢業前半年，他老人家就已託人在上海一家洋行裏替我說好了練習生的位置。

可是我的想法和志願與父親的大不相同。我生來也許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小時候當然更不會看重實際。最歡喜讀《水滸》，也歡喜《三國志》，俠客和義士乃是我心靈裏最早的偶像。在家人中，我最崇拜我的叔祖，他是一個武秀才，綽號「大刀」，性情真直，雖老不失童心，平生不事生產，以致為家人所賤視。而我卻非常歡喜和他在一起，聽他講快人快事，常使我寢食俱廢。叔祖愛談他自己的父親（即我的曾祖），說他曾經幫「長毛」（太平軍）打仗，離家三年，轉戰皖省，一直到清軍攻陷南京後才偷偷回家的。家裏老輩誰都不願意提起這件事，而我也把他想像成了英雄，將他和《水滸》、《三國》中的人物聯結起來。

經過一年多五四精神的薰陶，我的興趣和思想都發生了不少變化。當然，一個十三四歲的孩子，談不上什麼固定興趣與系統思想。所謂變，也只是模糊的方向而已。在未接觸到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之前，我們這些孩子簡直沒有精神生活的，渾渾噩噩的。拿我個人來說吧，除了演義小說裏的人物引起我一些奇異的空想之外，更不會想到比飲食遊玩更多的事。而新影響卻在孩子們的心靈裏打開許多窗，讓我們由那裏看見許多未曾前見的境界，嘗到了許多前所未有的樂趣，以致引發了對遠大事物的憧憬和嚮往。孩子們的志向與天地擴展得如此之快，竟致遠遠地超過了父兄們所能了解的程度。我們的小眼再不注視在一家的門楣上，不以一鄉一鎮中的榮辱為懷。我們（決非我一人如此，同學中不少人都是一樣）居然「以天下為己任」，將古今中外的科學家、思想家、文藝家為做人的典範了。總之，五四精神使我們變成了染上時代狂疾的小志士，變成了好高騖遠的理想家。在我個

人，舊日的俠義偶像和新認識的崇高的心智活動家結合起來了，而後者又逐漸地代替着前者。

處在這樣的精神狀態中，我之無法接受父親給我安排好的前途，乃是十分自然的。父親方面呢，他根本不曾想到他的「小東西」自己竟已有了主意。他是我們家中的絕對君主，連他的父親即我的祖父在內，都對他非常畏懼的，我當然更加怕他。平時他不苟言笑，對家人從來不和顏悅色地談句天，只有當他喝醉了而又非泥醉的時候，才透露出一點人情的暖氣，卸下了他家長的嚴肅面具。此時的我，尤其是我的姊姊，才會沾着點父愛：聽些並非訓斥的牢騷，嘗嘗他帶回來的糕點。

我將到上海去學生意的決定，也就在這樣一個溫暖的晚上被通知的。那天晚上父親特別高興，記得還從一家宵夜館裏叫了炒麪回來，他相當莊重地通知了我這件事情，同時講述了他如何請託親友幫忙謀得了這個位置的經過，又說將來補讀英文的夜校也託人找好了，他要我好好去做，洋行出路是很大的。父親的通知原不需要我同意，他說過就算，接着就宣佈要吃炒麪了，而我此時卻不知從哪裏來的勇氣，竟敢當面對他說：「我不做生意，我要到杭州去讀書。」情勢當然急轉直下了，在座的母親和姊姊都嚇呆了，拿起了的筷子又悄悄地放下，她們以萬分惶恐的眼光望着我，我則把眼睛望着地板，不敢看父親的神情。父親的決定被人違拗，在這家裏大概還是第一次；而這一次竟出於他最小的兒子，一定使他感到十分意外的。所以他的憤怒竟不以慣常的方式發泄出來，沒有呵斥，沒有敲打，只是氣得連聲都出不得了。

父子間的關係僅持了兩個月，結果卻以折中的方式和解了：答允升學，但必須讀商科。因此我考進了杭州的省立甲種商業學校。

這個學校與第一師範相連，校舍都是前清的貢院。兩校間只有一牆之隔。我是身在牆東而心在牆西。商科的功課引不起我絲毫興趣，尤其叫我頭痛的是簿記、珠算與辨幣。這個學校的環境十分庸俗，學生活動全無，文化生活貧乏之極。它比孝廉公時代的我們的小學還要死氣沉沉。呼吸了一年多五四空氣的我，簡直要在這裏窒息了。那時我對學問的興趣是尚未固定的，擇業的問題並不困擾我，我所歡喜的只是一般的學問，一般的知識，特別是新的。所以凡是新書，不管是文學、哲學、科學，我一視同仁地拿來讀。無錢買書，星期天就跑到書店裏去翻，或到西湖圖書館去借閱。這些書多半是不易懂的，有的是真的艱深，有的則為了天書式的翻譯；可是我直着脖子吞下去，不管它們能否消化。在商業學校裏混了兩年，那枝簿記棍如何使用都不曾學會，而從杜威、羅素、柏格森到泰戈爾，乃至古代學者如蘇格拉底、柏拉圖等等的大名，卻已經知道了一大串，甚至有不少他們的中文譯作都被我翻過了。商業和我的興趣之間也就愈離愈遠，再耽下去簡直是苦刑了。

在第二年的第二個學期中，學校鬧了風潮，我被推為代表之一。結果風潮勝利，學生代表卻全被開除。我原是被開除者之一，只因校中的一位國文教員是我父親的朋友，為我力保，總算「顧全面子」，私下教我「自動轉學」。這次事情沒有使父親氣惱，很樂意地讓我轉入了一個私立的普通中學，從此我跟商業最後地作別了。

一年後父親逝世。再過一年，臨到中學畢業的這個學期，「五卅」運動爆發，那時我 18 歲。

「五卅」以前的二年中，我仍舊是漫無目標地亂讀書。不過由於創造社的影響，興趣卻漸漸轉趨於文學方面。和當時許多年輕人一樣，

我成了創造社諸作家的崇拜者，個人則尤其歡喜郁達夫，在有意無意中，深受了他浪漫的頹唐的影響。同時也因為父親故世，家道日窘的關係，更加以「沉淪」式的不幸青年自命了。同學中也有人歡喜寫作的，教員中也有一二個新人物。因此在五卅運動的半年前，我和另外三個同學一起，出版了一張報紙，報名竟莫名其妙地稱為《赤報》。其實當時我們的思想離「赤」尚遠。內容也根本不屬於此一色彩。記得此報的一篇主要文章，是我從一本英文哲學史（只記得是「家庭大學叢書」之一，著者為誰都已忘記了。）上譯出來的序言。我們這幾個人都沒有固定思想，基本的政治傾向只能說是民族主義。但是報名嚇壞了人，所以只出一期，就讓校長禁止了。

那時候的杭州，真正的赤色思想原已存在。《嚮導》報的公開通訊處是杭州法政專科學校。收信人安存真，即該校教員安體誠（1927年為蔣介石殺於龍華），是出名的共產黨員。我的幾個鄉前輩在杭州搞國民黨（實則共產黨）。SY也有了，第一師範裏有一點組織，我的自小朋友許志行就是那個組織的負責人。我和他們之間常有來往，但我沒有加入。原因是：那時我看不起幹政治活動的人。為學問而學問的觀念給我的影響很深；我覺得幹政治根本不是做學問，兩者是背道而馳的，而我則一心要研究學問。我們的中學裏也有一兩個入了「國民黨」，他們很活動，很自負，可是功課很糟糕，這件事又加強了我的成見。

其實我那種想法，本質上只是反映了當時新思想運動主流的分化。我是在「五四」之後一兩年才接觸到五四思想的，等到我追上它、接受它的時候，新思想的本身卻早已向前進展，發生變化了。《新青年》分了家，陳獨秀與胡適之各走各的：前者前進至馬克思主義；後者則仍舊停留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階段上。前者由思想而進入行

動，由文學革命而政治革命；後者則欲保持思想的「純潔」，反對文人玩弄「齷齪的政治」。由於行動的需要，陳獨秀與李大釗等組織了共產黨，與南方的孫中山結了同盟；此時胡適之等卻貫徹其「學者作風」，與梁任公的研究系合作，同時寄託希望於北洋軍閥的政府。

對於當時中國思想界的此種分合情形，我是茫然無知。杭州雖說是一個省會，北京新出的雜誌也多少能夠看到，但一般說總是落後得很。那裏的多數教員與學生，如果算得「新人物」的話，多半以新到接受「五四精神」為止。對於「德」、「賽」（民主與科學）二先生的向背，對於孔子的抨擊或崇拜，始終還是這個城裏新舊人物的分界線。因此在無形中，杭州被五四運動喚起了思想生活的青年們，就當時思想主流的分派說，都屬於胡適之方面，亦即屬於梁任公方面。他們對於當時為數不多的「國民黨分子」，雖然不是仇恨的，卻是輕視的，因為這些人「不忠實於學問」，卻去搞政客勾當。

在 1925 年春天以前，我也是這樣一個不自覺的「胡適之派」。五卅運動卻給了我一個激烈的與決定性的轉變。

上海爆發慘案的時候，我們正忙於畢業考試。在最初，我們簡直不甚留意這件事情的。後來看見它愈演愈烈，學生罷課，商店罷市，工人罷工，掀起了前所未見的大風潮，我們這才開始激動起來，覺得我們也必須有所表示，才能對得起上海同學。學校裏的空氣熱了起來，學生中沸沸揚揚着，校與校間開始了聯絡，人人都感覺到非幹點兒什麼不可了。大概是慘案之後的三四天吧，上海學生聯合會的代表團到了杭州，向各校學生報告慘案經過；杭州的學生立即行動，由每校推出代表二人，成立杭州中等以上學生聯合會。我因為平時曾參加演講比賽，而且在校際競賽會上得過獎，同學們就以為我具備代表資

格，推舉了我，另一代表便是我上面提過的那個「國民黨分子」。應該承認，我最初去當代表是不太願意的，原因是上述的成見作怪，這些是風頭主義者幹的玩意兒。在第一次的成立大會上，我意外地又被人推舉成宣傳部長，這使我惶恐起來，我心想：糟糕；畢業考試完了，大學也不必思考了。可是這種不願意與惶恐的心理出現得極其短暫。工作一開始，鬥爭隨着爆發而日趨緊張，我以全心身投進這個新的活動中心，畢業與升學等等都被置諸腦後了。

參加杭州學生會工作大約只有三個月，從6月初起，直到8月底離杭赴京去考大學為止。這一段工作對我的思想與生活卻發生了很大影響。簡單地說，它使我脫離了胡適之而走向了陳獨秀。這三個月間沒有讀什麼書，整天忙的是工作，然所得益，套句現成的話說，真是「勝讀十年書」。大時代中熾烈的大鬥爭，像隻巨大的熔爐一樣，把投入者身上一切不合適的思想和感情焚化於俄頃之間，同時將你含有的（如果有的話）某些較好的東西提煉出來。一個省會裏的學生運動，尤其是當那個時候，無論就深度與廣度說，都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但因被配置在大時代的背景上，作為全國性的反帝反軍閥鬥爭的一部分而出現，其意義亦自不同。對於像我初次跨入思想生活的年輕人，其意義竟是決定性的。我很快懂得了，所謂「為學問而學問」的說法是多麼地虛偽；真正學問應該和行動相結合，為行動服務的。我懂得了，做學問與「幹政治」決非對立的；而政治上處於被壓迫地位的人們，根本無法做純粹的學問，他們的學問應該集中於一門，就是如何為改變這個地位而鬥爭。這點道理一半是我在工作中悟出來，另一半則由於和那些平素為我所鄙視的「風頭主義者」的接觸和接近，我發現他們中多數不但比我能幹，而且比我有學問。我幾年來的自以為追求的「真正學問」——亂七八糟地閱讀杜威、羅素以至柏格森等輩的大作，

這時卻被證明出非常無知與混亂的。這時我初次接觸到馬克思主義，從那兩位「搞國民黨」的鄉前輩手裏看到一些淺近的社會科學書籍，覺得這是一種切實而有用的學問，與我先前所學的一些不同。

在杭州的短期工作中，我獲得了一個終生受用的認識，那就是：對外鬥爭與對內鬥爭不能分開，而且後者勝利乃是前者勝利的條件。記得在學生聯合會的第一次大會上，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是討論：杭州學生應否與上海同學一致行動，實行罷課？代表們的意見是分裂的。一部分認為這是對外鬥爭，是反對英帝國主義屠殺中國人，我們不應該罷課，因為罷課這種手段只能用以對內鬥爭，譬如反對學校當局的黑暗或政府當局的腐敗之類。杭州學生罷了課來反對上海租界上的英國人，據這班代表的意見，近乎「無的放矢」。「人家不會理你們的，荒廢學習是你們自己的事」，他們說，「為了真正能夠反對帝國主義，我們非但不應該罷課，而且應該加緊上課，加緊學業來武裝自己」，這些人說得頗有道理。另一方面，多半是有了若干政治背景的代表們，則堅決主張罷課。他們的理由很簡單：如果不罷課，什麼行動都談不上，一切所謂反對都是空談。我是主張罷課的。但心裏卻覺得前一理由充分；贊成罷課，只是為了行動罷了。結果以微小的多數通過罷課。

杭州學生就這樣行動起來了。全體學生組成了數百個小隊，到戲院、茶館、公園、以及馬路旁邊去作鼓動演講。動員很徹底，連杭州最保守的女校學生都出來了。我們原想讓那裏的商店都罷市，但沒有成功。杭州學運中空前規模的一次示威舉行了，參加的約有七八千人，包括小學生和若干市民在內。當時浙江的督軍是孫傳芳，一個非常狡猾的北洋軍閥。在全國熱烈的戰鬥空氣中，他不敢正面來壓迫我們，他表示「同情」。當遊行示威時，他派了一隊荷槍實彈的兵士來

「保護」我們。他還召見了學生代表，發表他「愛國不敢後人」的鬼話，要我們把外交重任信託給當政的人，安心讀書。

我們，至少像我那樣的十幾歲的孩子們，並非一下子就看穿了他的陰險。可是漸漸地，我們感受到他暗中活動的影響了。有一個學校，彷彿記得是體專，由於那校長與省當局的特殊關係之故，首先對聯合會採取了一些古怪的行動。後來，在我就讀的那個學校裏，一位最熱心贊成學生運動的教員被解了職，我這個代表也間接受到警告。不發給畢業證書的威嚇都聽到了……

在我工作的那三個月中，更露骨的鎮壓行動雖然不曾見做出來，但是種種的無理阻難，卻已足夠給了我一個清楚認識，對外鬥爭與對內鬥爭是分不開的，真正的反帝鬥爭只有通過對內的革命鬥爭。

當我交代了學生會工作，離杭赴京的時候，胡適之、梁任公思想已經從我的頭腦中徹底廓清，完全站穩了左派陳獨秀立場了，雖然在形式上我還不曾加入共產黨。

二、二年大學生活

中學畢業，和小學畢業時候的情形不同，沒有人為我規定前途了。父親已故世一年多，我是充分自由的；但經濟條件限制着我，家中境況更不如前。父親於久病之後逝世，比我僅長六歲的大哥挑起了一家重擔。大哥小時候不大愛讀書，很早就幫助父親經商。我家在父親病中及其死亡前後所遭遇到的種種經濟困難，都是這個二十餘歲的年輕人去應付了的。在我們那個銅臭熏天的小鎮裏，他為此自然受夠了屈辱，深深體會了人情和世態。他常懷不平，牢騷滿腹，立志要中興我們的家，要為抑鬱而死的父親吐一口氣。

我在中學畢業後，大哥贊成我去投考大學，他答應竭盡一切可能來幫助我，希望我能夠和他殊途同歸，從商學兩方面去光大門楣，為亡父爭氣。

大哥的態度並非絲毫不曾感動我。我雖然不像他一樣地直接挑着家庭擔子，也很少和他一樣地親自嘗到親友們冷酷的待遇；但我是間接受了一些的，當然分擔着他的感情。我仇視所有在我家苦難中不予援手反加踐踏的勢利人。特別使我氣憤的因而記得最清楚的有兩件事。其一，父親臥病那年，我們借住在孝廉公（即小學舊校長）的兄弟的一所房子裏。此人原本也是父親朋友，平時頗有來往，誰知父親

病危，他竟來借故迫遷。另一件也是我親眼見到的：父親剛故世，停柩在堂，從來替父親經營小工廠的那個本家，卻宣佈辭職，自己要去開一間同樣的工廠了。因為自來對外的一切關係都操在他手裏，他這「獨立」就無異宣佈我們完蛋。大哥氣得發抖，我母親於哀求無效後在靈前痛哭，而這位本家卻耀武揚威地走了，我恨不得將他一刀殺死。

這些事在我幼稚的心裏留下了深刻印象。兄弟倆抱着同仇敵愾是十分自然的。中學裏我讀書相當用功；而在用功的諸般動機之中，顯然有「報家仇」一項在內。

中學的畢業班中，連我在內，共有五人要到北京去。臨行前，大哥與母親想盡辦法，替我籌措了50塊現洋。那時從我鄉到北京的三等火車聯票就要將近20元，所以餘下來只有20元左右了。到北京後的生活怎麼辦，那時候我簡直根本不曾想到。四位同行者由杭州動身，我在中途的火車上會合他們。大哥送我出遠門，同坐了一段車。火車上自然不曾說什麼話，他只是向我的同伴們致意，要他們多多照拂。車到嘉興，他落了車，在車窗外囑咐些十分瑣碎的事情。車開了，他佇立在夕陽中，久久注視着探身窗外的我。他那種殷殷期待的眼光喚起了我一種悲壯情緒，彷彿我是以重振家聲的共同戰士開上前線去的。

然而，我這個做弟弟的絲毫不曾滿足了大哥的期望。時間流去，世事多變，兄弟倆的人生觀愈離愈遠。在多次失望之後，他對我的手足之情也變得非常冷淡了。

多年的想望終於實現，我考進了北京大學。心情的愉快激動，大概和一個虔誠的教徒走進了有名的聖堂差不多。北大那時已經不是五四當年的舊樣子了，蔡元培掛冠而去，陳獨秀早就離開北京，以全力從事共產黨工作，胡適之據說與校中的國民黨系教授（李石曾、顧

孟餘等)鬧意見,告了長假,在上海養病著書。可是校中還有不少我所崇拜的教授留着,又有那個藏書豐富的圖書館。號房裏出售的各式各樣期刊,也引起了莫大興趣。這裏不僅讓我看到了一個所謂學府的規模,它的壯麗的形相,而且也讓我呼吸到了學問的空氣,一種文化的氣息,它讓我們彷彿捉摸到了民族、時代,乃至世界進展的脈搏。此種崇敬與興奮的心情,在當時從全國各地遠道前來的年輕求知者中,一定是很普遍的。

北京當時的政治情勢頗不穩定,在不穩定中急劇地向左傾斜。一次奉直軍閥的混戰因馮玉祥的「倒戈」而結束;溥儀在紫禁城裏的傀儡朝廷給掃去了;因孫中山的死,在古城裏造成的政治生活還在激蕩;南方相繼發生的五卅慘案、沙基慘案,以及使世界震驚的省港大罷工,又使這種生活在廣大的知識分子中不斷地提高着,加緊着。段祺瑞的政權是依靠在幾個軍事勢力相持上的一座空架子,它自身全無力量,作惡作善都談不上,這使政治勢力和思想流派的分合更加自由和順暢。

以思想論,掌當時實權的各系北洋軍閥都是死的。其直屬政客們所草擬和發表的「反對赤化」大論,荒謬愚蠢,看了叫人會笑落大牙。他們在青年人中是沒有直接支援的。但是間接地,通過了梁任公的研究系和胡適之一班名流,卻能在青年中找到對他們的容忍和幻想。梁任公那種要改良不要革命,胡適之關於「好人政府」的胡說,在學生群中並非毫無影響。至於他們那種反對革命的消極的防阻性的戰略,所謂「為學問而學問」的口號,對學生的影響當然更大。另一方面是左的,當時是模糊地代表着國民黨(實則是共產黨)的思想。這個左派的影響比較廣大,(那是由於全國的鬥爭形勢正處於革命前夜之故),但立場反不及右邊明確,思想也沒有梁、胡他們的深刻。這現象

今天在事後回想，大概左方大將雲集南方是原因之一，而國共關係混淆不清，共產黨本身的理論尚未臻充實，也許是另一原因吧。

代表着上述兩種傾向的，在我剛到北京時候是《晨報》和《京報》，尤其是二報的副刊。此外還有胡適之、陳西滢們的《現代評論》與周作人和魯迅等人的《語絲》，也多少代表兩個對立的流派。

這些副刊和期刊都是偏重文藝的，很少討論到嚴重的思想問題或政治問題。有時候爭論點非常瑣碎，譬如進行於魯迅和陳西滢之間的筆戰，牽涉的竟往往是些「私事」。但它們在當時青年中所引起的關心卻不下於軍國大事。其影響也決不比堂堂正正的政治辯論所發生者為小。人們以無限興趣注意着圍繞於文藝與私事的冷戰，卻在這些上面分清着新和舊，前進和倒退，非正統和正統，革命和保守。在這方面，憑我的個人經驗說，周氏兄弟的作用極大，其功績不容忽視——雖然在政治思想上，在當時他們固然未曾走到，即使到後來也不曾走到共產主義。

《猛進》周刊，北大教授徐炳昶所編，政治性較濃，左的立場也較為鮮明，但影響不大，銷路遠不及《語絲》和《現代評論》。另外還有些純文藝的刊物，如《莽原》之類，不過流轉量及其思想的影響力都是差得遠了。

所有這些刊物，都強力地吸引住了我們這些新來北京的年輕人。我們焦急地等待着每一期刊物的出版。買到了新刊，總是細心地把其中的每一個字都讀進去，其用功程度，與讀校中功課的情形無法比擬。

我對文藝的愛好那時可說到了極點。不久之後，我居然從這些刊物的讀者變成為投稿者了（最初投《現代評論》，後來改投《語絲》）。看見自己的名字和從來敬佩的作家排在一起，開始自是非常歡喜的。

不過這種心情繼續得並不長久。為了生活艱難，我很早就不得不給其他的有稿酬的日報副刊（《語絲》與《現代評論》都不給稿費）經常寫些東西，因之很快就感覺到了賣文之苦。做文丐的卑屈感，毋須多少時候，就驅散了我做「作家」的虛榮。

不過沒有使我變成作家的更大原因，乃是進校不久便參加了共產黨的秘密組織。緊張的地下革命工作根本不讓我有時間去再「弄」文學；同時生活的巨大轉變，隨着也改變了興趣；等到 1926 年寒假之後，我非但極少再寫文藝性的東西，甚至連文學的書籍都不閱讀了。雖然我選讀的始終是大學裏的文科。

名義上我讀了兩年大學；但實際上課的鐘點，合計起來不到一整年。真正用功讀書的，那恐怕還只是最初的半年，即當我最熱衷於文學的那段時間。當時新交的朋友，大多也是愛好此道的。一同赴京的幾個老同學，因為並不考進同一大學，來往得反而少了。大學所在地的漢花園和馬神廟，大概與巴黎的蒙瑪區^[1]差不多吧。這裏不單住着北大的學生，而且住着各式各樣的青年文化人。他們多數是貧苦的，孜孜向學的，思想與生活卻有點放蕩不羈的。油頭粉面的西裝少年此地極少見，常見的是手裏捧着厚大的洋裝書，或握着新出版的期刊的人，他們多半蓬鬆頭髮，身上胡亂套一件藍布大褂，足下穿着老布鞋或破皮鞋。小公寓和小飯館裏，多的是這些操着南腔北調的、形形色色的小名士，小學者，藝術家，或者「亂黨」。多少受過創造社浪漫主義影響的我，原本嚮往於這種布希米亞生活的，一旦置身實有而近乎想像的環境中，自然非常高興了。我竭力想和他們接近，不久也結識了其中的一些。杭州第一師範裏曾經相當出名的「湖畔詩社」，那時有二位主將——馮雪峰與潘訓，住在這個「蒙瑪區」，我認識了他們，尤其和後來瘐死於天津獄中的潘訓（漢華）最合得來。文學團體此外還

有不少，有出刊物的，有純粹以研究為目的的，我對它們都懷有不同程度的興趣，可是始終不曾成為任何一個社團的成員。在我的同班同學中，有兩個人與我較為接近：王實味與張光人（後來的胡風）。巧得很，這兩個人後來都做了中共文藝政策下的犧牲者。在教授群裏，我和徐志摩有點私人關係，但無論在性格、思想或生活態度上，我都不能追隨這位鄉前輩之後。我喜歡讀他的詩文，也欣賞他那種天真得像孩子樣的心胸；可是他和研究系關係太深，如果不是自覺的，至少總是不自覺地在宣揚這個政派的思想。我討厭他這樣做。他「唯美派」的生活方式也叫我見了反胃，他在「新月社」裏粉紅色的寓所我只去過一次，他主編的《晨報》副刊沒有投過稿。《語絲》上有我的文字，但同周作人始終不曾會過面，魯迅也無緣相識，只和當時主編《世界日報》副刊的劉半農，有過一些文字以外的交往。

當時北京蓬蓬勃勃的文藝活動，彷彿是有點反常的。「五卅」與「省港罷工」發生之後，中國革命鬥爭早已由思想進入行動，並且在它的前列出現了工人。革命實踐甚至已越出了古典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圈子，開始提出社會主義性的革命內容。可是在這時候，曾經是新思想運動發源地的北京，思想鬥爭卻主要反映在或集中於文藝的小問題上。這些爭論，如果與前幾年由《新青年》挑起的論戰相比，會顯得毫無生氣，若放在當時全國總鬥爭的背景上看，那簡直是無聊得很。

我個人，以及漢花園裏不少小名士們在一個時期熱心於文學活動之後很快對它表示了厭倦，正是它在大時代中見得反常這一點促成的。那時候我們誰都不曾去探究那個「反常」的原因，我們只覺得再搞文學是無聊了。可是在事後回想起來，我卻認為那時候北京文學活動的蓬勃卻並不真正反常。或者應該說，那個反常是完全可以解釋的。一個思想運動的前哨戰和後衛戰，常常採取文學方式。當這個運

動達到政治鬥爭或軍事鬥爭的高潮時，文學的聲音便聽不見了；這運動如果不幸而遭受了挫折或失敗，形形色色的文學運動卻又會應運而生。如果革命成功，文學至少在一個時期內也會衰竭，因為有生氣的文學畢竟是「不平之鳴」與「苦悶的象徵」，而文學家總以自願或被迫的「悠閒」為其產生和存在的條件。1926年之前的北京文學活動，一部分仍舊代表着此後革命鬥爭的前哨戰，而在另一部分的意義，則又表示出北京那地方已由思想鬥爭的主戰場變成為次戰場，這裏是以斥候哨的零星接觸來代替主力搏鬥了。

使北京的學生和一般知識分子的文藝運動配合到全國革命的主力戰中去的，應該說是以1926年3月18日發生在執政府面前的慘案為契機。它用了47位男女青年的生命，以及數以百計的人所流的鮮血，給當時北京的情況以一種決定性的轉變。如果說，這慘案結束了北京知識青年的一個特有的時代，那是並不誇張的。自從五四以後，一直到三·一八以前，北京的學生運動，彷彿始終不曾越出思想革命與文學革命的範圍。雖然「五四運動」本身就是一種政治鬥爭，但五六年來北京學生的政治運動，卻遠落在上海和廣州之後，它在社會意義上未曾深化，在鬥爭的形式上也老守着天安門開會及向政府請願的一套。因孫中山入京及其死後所形成的京中政治空氣，雖然濃厚生動，卻並不嚴肅深刻。這個空氣裏帶有節日的歡樂意味，有大團圓的昇平景象。操軍權的馮玉祥系，操政權的安福系與政學系，以及主學政的國民黨、研究系和共產黨領袖之間，似乎彼此並不存在着不可調和的鬥爭。人事關係錯綜複雜，思想界限很不清楚。在少數的上層領袖，多數的下層群眾中，流行着普遍印象，彷彿革命問題可以解決於私人聯絡，能取勝於文字爭辯，能贏得於示威請願。這個「時代」，我們可以稱之為革命的浪漫的、文學的、蜜月式的階段。這個階段在歷史上經

常以熱的鉛和紅的血來結束，而三·一八慘案恰好就供給了這兩件必需的東西。在那個被魯迅稱為「民國以來最黑暗一天」的夜裏，北京青年人的悲憤是無法形容的，而在我們大學的宿舍裏，最容易聽到的感慨是「百無一用是書生」。魯迅在那幾天裏寫下不少篇精彩文章，道出了我們普遍的心聲：

「現在竟如何，不過多了幾篇詩文，多了若干談助。」

「筆寫的，有什麼相干？」

「但願這樣的請願，從此停止就好。」

「這回死者的遺給後來的功德，是……教給繼續戰鬥者以別種方法的戰鬥。」

「血債必須以同物償還。」

是的，必須繼續戰鬥，而且必須以別種方法來戰鬥，就這樣，三·一八慘案在北京青年中掀起了「投筆從戎」的洶湧暗潮：要以槍桿子來代替筆桿子。

三個月之後南方因北伐開始而引起的革命鬥爭，像野火般蔓延開來。整個南中國的天際被燒得通紅。我們從陰暗的北國遙望南天，愈發見得這景色迷人，壯麗無比，因此也就愈發鄙棄那瑣碎無力的文學爭論了。人們渴望行動，拼命追求與行動有關的思想和理論。北京，這個多年來成為中國文化和思想活動中心的古都，至少要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默默無聲了。

* * *

與一般人的猜度相反，1925至26年間北京大學裏的「亂黨」為數不多。最初我當然無從知道，等到我參加學校支部的領導之後，才

發現 1,300 名同學之中，我們的同志竟只有二三十人。據說原來還要多些，只因五卅之後，南方形勢開展，幹部需人，有不少人被指派或自動地南下了。不過那時候是毋須擔心人少的，由於時代的整個風尚所趨，有些年輕人正愁着不得其門而入呢。組織方面並不廣開大門，爭取對象相當謹慎，怕的是讓投機分子大量湧進來。因此在那時的少數同志中，值得懷念的人着實多。就我記憶所及，彷彿沒有一個人有幸運存活到今天因而當上顯要的，但英勇成仁的烈士可就不少。至今仍溫暖地活在我心頭的：有與高仁山教授同時被槍決的彭樹群同志（一個數學系的高材生），有被蔣介石殘殺的杜宏遠同志（也是學數學的），有在昆明被處死的張經辰同志，以及後來慘死於日帝憲兵隊裏的陳其昌同志。在我們的同志中，只有當時擔任支部書記的段某最不成器，一個「職業學生」型的風頭主義者，從不讀書，只會傳達命令，能用手段，卻缺乏勇氣。此人當時就不很為同志們所愛戴，只因他和上級關係好，維持了他的領導地位。革命一失敗，此公立即脫黨，在蔣介石統治之下，一度曾任山東某縣縣長，以後便不知下落了。

學校支部的工作最初僅限於一校之內，主要是經過學生會來發揮影響。那時與我們作對的是屬於西山會議派的國民黨右翼分子，其領袖為王鍾祺與傅啟學等。不過他們沒有群眾，所以無法與我們認真抗爭。學生會及所屬機構都落在我們的掌握中。在我參加工作時期，因為學校裏沒有風潮，大學的學生會始終不曾被應用來反對任何方面的武器，我們的主要工作毋寧是在教育與訓練方面，辦了很好的夜校，給校工及貧民讀書，同時又團聚了學校附近的一群水車夫。我們此時更重要的工作是教育自己，並在同學中選擇優秀對象，爭取他們入黨。這工作在較遠大的目光中看是極其重要的，因為種種關係，北大早已成為中共高級幹部的兩大供應站之一了（另一個是上海大學）。

李大釗主持的北方局很着重這個工作，支部中學習理論的會議開得非常勤。可是事情卻並非進行得很滿意。當時北京中共地委負責我們支部的教育工作的是陳為人，一個由法國回來的勤工儉學生。人相當可貴，吃苦耐勞，毫不浪漫，性格與漢花園裏我們這一群「布希米亞人」恰巧相反。他讓我們第一次看到了「職業革命家」的形象。關於所謂「鐵的紀律」、「絕對服從」等等，我們是從他那裏聽到的。最初他給我們以新鮮感，對他懷有應有的敬意，可是過不多久，他的弱點就完全暴露出來：他對於一般的知識和特殊的革命理論都掌握得太少，使我們感到失望。他時常來給我們做理論報告與政治報告，但顯然他只是一架慣打折扣的傳達機，根本不能完整地把聽來的東西傳給我們，甚至他自己都不甚了了，以至聽者如果不懂而向他發問時，他多半只好支吾以對，有時更壞的，還會擺點架子，怪你多問。地委中的劉伯莊比他高明，但不常來。李大釗則因當時環境關係，很早就住得隱秘，我始終不曾見過他的面。

我們初步踏進了行動，但我們連起碼的理論都不曾具備，這對於我們這些知識分子黨員是一大苦悶。北京當時很難買到社會科學的新書籍。在1926年年底以前，我記得我們曾經讀到的彷彿只有蔡和森編的《社會進化史》。北大圖書館裏原有一些馬克思主義的外文書籍；只因當時北伐軍進展，北洋政府加緊反對「赤化」，那些書也不得不收藏起來，不讓借閱。

理論學習上的苦悶，學生運動的單調（和南方的火熱鬥爭相比），再加我個人的生活瀕於絕境，使我不得不作離京打算。

在北京住了一年多，經常陷在經濟危機中。大哥履行他的諾言，盡可能地接濟我；但他那時的情形也很狼狽，不可能按月郵寄，寄來的

錢亦不定夠我使用。賣文章不無小補，但僅僅小補而已，那時的稿費低得可憐，同時報館也老是鬧窮，發稿費時即使兩三元都會搭上郵票或輔幣。四元多錢一月的包飯，我時常沒法應付。如此這般的生活拖到了1926年秋後，我連那件過冬禦寒的袍子都放在典當裏無法取出來，日子真是難於過下去了。於是我決心放棄大學生活，請求到廣東去。

1926年深秋時節，我從海道來到了廣州。那時北伐軍已經達到長江流域。武漢初陷，蔣介石的重兵集結於南昌，國民黨的中央委員會和國民政府都未正式北遷。名義上的革命首都仍舊是廣州，但是情形顯然已較冷落，這裏主要變成為革命的大後方，成為一個補給站了。政治上，這裏的實權已落在李濟深手裏，那時他和蔣介石接近，屬於國民黨的右派。不過左派勢力當然還很雄厚；省港總罷工尚在進行，總工會仍可與政府機關分庭抗禮。

這樣的廣州，與我在北方想像時的「革命聖地」有了不少距離；但仍能使我見了興奮，給我以情緒上的滿足。我一住定就去訪問書店，像隻土撥鼠跑進了陽光圈中一樣，只覺得五花八門，光彩奪目，看得頭昏目眩了。紅色的《新青年》我第一次見，《嚮導》和普通刊物一樣地公開陳列着，封面上用大字印着「共產主義」或「馬克思」字樣的書籍充斥櫃面，使我看了又驚又喜，因為在旬日之前，我們還是在緊閉的房門後面，放低了聲音才敢提起這些名詞的。我差不多盡我袋中所有的，同時不加選擇地買了一大批回去。

這幾期《新青年》（記得最近一期是「世界革命」專號）給了我極深印象。這是第一次我知道了關於革命原來有這麼多又這麼深的道理。從來我只有一些概念，正確些說，只有一些信念，只覺得這種日子不能再延續，這種黑暗的統治不能再讓它橫行，帝國主義的壓迫不能再忍

受，為此我們非革命不可，而且非徹底革命不可。我們參加共產黨，主要因為它是最徹底與最革命的，此外再不明白多少了。當時的地方某些領導者們甚至告訴我們說，根本也不需要再明白什麼，有了這樣的信念就夠，因為革命之道首先在乎行動，在乎幹，而多作研究會變成「學院派」，「學院派」就是只會說空話的。我們當時就不滿意此種態度，不滿意陳為人們的唯幹主義。心裏想，這多半是這位同志自己不學藉以解嘲的理論吧，可是再過些時我才知道，原來這不是北方一二幹部的偏見，竟是二次革命中流行於黨內的一個重要傾向。看了這次的《新青年》後，我彷彿被帶進了一個全新的思想領域，接觸了許多前所未有的問題。諸如有關乎革命性質，社會性質，革命領導，革命中階級關係以及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的關係等等，第一次闖進了我的頭腦，引起我的思索，並且構成了我此後思想生活的主要命題。

杭州的舊師友中，此時有不少正在廣州。有幾位竟已當上了黨（國民黨）政方面的中上級幹部，他們的生活相當好，因之我在這方面也就沒有問題。臨到幾天，受到友人們熱情的接待。廣東著名的飲食都有機會嘗試了。同時通過他們，我很快看見了當時革命機構的全貌。我發覺革命政府下面的革命幹部，和我們北方地下工作中的革命者很不同。憑我這雙帶點清教徒色彩的眼睛看，這兒的革命者不夠革命。他們沒有那份嚴肅氣，無警覺心，更沒有悲憤情懷。享福與貪歡心情很普遍，生活相當隨便。對我有似至寶的革命書報，這兒認真閱讀的人卻彷彿很少；年輕人聚在一起，女人問題談得比政治問題起勁得多；孫中山的那兩句有名口號，這兒已被普遍地改為「戀愛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革命及其理論問題永遠不會聽人提及。酒食徵逐與方城作戰成了幹部們假日和工餘的主要功課。惲代英的艱苦作風雖為人樂道，然從而效之者卻少而又少。這種情形，愈來愈令我痛苦，因為

它形成了強烈的對比，讓我想起北方同志們的清苦而嚴肅的工作。而最使我難過的則是此地對工作的看法已完全不同，人們將革命工作看成為官職，因之將革命的參加者看成簡單謀差使的人。

我那次南來，原因之一雖然是生活所迫；但解決生活畢竟不是我的主要動機。離開學校的第一原因是為的想更直接、更熱烈、更有效果地參加革命。可是一到廣州，人們（甚至連我的朋友在內）卻以求職的人來看待我。對我有感情的人尤其使我痛苦，因為他們設法要為我「弄一個比較好的工作」，也就是說，要謀一個地位較高的職位。我感到了屈辱。事實上，那時廣州是「人浮於事」的。革命重心業已北移，但真誠的和投機的青年（也有中年）卻繼續不斷地湧來。工作並非沒有，只是人們大多想做「比較好的」，而好的卻已為人捷足先得了。

來到廣州的最初半個月，新的知識吸住了我，暫時又不愁食和住，因之不想到「職位」問題。稍後，有三個工作讓我挑選：1、某軍政機關的出版工作；2、軍隊裏做黨代表；3、仍回北京。

那時候參加「外部」工作（即在國民黨的軍政機關中工作）的黨員，並非全部由「內部」決定調派。許多較不重要的工作，時常由黨員經人事關係謀得之後，再經組織核准。我上面所說的一二兩項工作，就是朋友們（當然他們都是黨員）給我介紹的。第一項工作我願接受，但因我的一個朋友也想幹，而他在這方面比我有較多經驗，就讓他去了。第二項工作是屬於當時正在廣州新建的、由嚴重做師長的獨立師，杭州時代我的一位老師當了這一師的秘書長，我的一個老朋友范錦標同志做了該師某團的黨代表。他們要我去當另一個團的團黨代表。我沒有受過任何軍事訓練，但做黨代表的同志們很多是完全不懂軍事的，他們勸我放心去幹，我自己也頗想嘗嘗新的生活。可是和

組織的負責人討論之後，我卻改變了意思。組織方面不反對我進軍隊，但是告訴我，就工作的意義和重要性說，我最好能回北京去，做敵後的地下革命活動。此時我的決定是毫不猶豫的：回北京去。

這次到廣州去住了一個多月，與我的某些朋友的想法相反，並非「白跑」。面對真實地看見革命，我開了眼界，增長了知識，破滅了一些幻想，因而加強了信念。南來以前，革命在我腦子裏雖已不是抽象的概念，但革命的具體形相，特別是它的內在關係，知道得很模糊。革命勢力內部有着怎樣的矛盾，我完全不知，甚至還很天真地以為是一個沒有矛盾的整體哩。當時中共北方局的主要工作，我們從上級的報告得知，彷彿只是爭取馮玉祥與反對西山會議派。因之我們有了一個印象：除了那一小撮以鄒魯、張繼為首的老人以外，國民黨都是革命的。對於蔣介石，在我南來前，至少在我們支部會議上，從來沒有聽見不滿和批評。可是一到廣州，才知道實際情形與我們的想像大不相同。這裏的國民黨很早就分成左右派的。右派力量很大，他們操着軍事實權。「西山會議派」決不是幾個頑固的老頭子，原來蔣介石也跟他們一路。當時在廣州很有勢力的「孫文主義學會」，以戴季陶作靈魂的，便是蔣介石在國民黨內的戰鬥組織。所謂國民黨左派，其實只是做「外部工作」的共產黨員與若干與蔣介石不睦的上層人物，具有獨立性的左派國民黨員根本沒有，有之也為數極少，不能構成力量。我初抵廣州時，在同志兼朋友的一群中，常常聽到他們表示着惶恐和憂慮，為的是蔣介石的「異心」愈來愈明顯。但是如何去防止與打擊這個跋扈的將軍，在我當時接觸到的人中，始終不曾聽到過什麼辦法。至於公開的言論和刊物上，那是連這種惶恐心情都不透露的。人們的希望似乎全部都建立在武漢革命政府的建立和鞏固上。當蔣介石「被迫同意」國民政府遷至漢口時，人們就鬆了一口氣，彷彿右派已經低頭就範了。

廣州的省港罷工委員會及其所屬機構，給了我最深印象與最新感覺。那時候，罷工委員會的力量已因北伐的微調而相當衰微了。但即使是賸餘的勢力還很煊赫動人的。我到廣州的次日就隔河眺望了沙面，只見那裏的洋樓門窗緊閉，人煙寥寂，空場上草深過膝，一片淒涼。罷工影響非常觸目。我沒有機會深入到這個運動的裏面去，僅僅看到一些表象：參觀了罷工委員會所設千百人同時進膳的公共食堂，參加了它生氣蓬勃的群眾大會。可是讓我至今還能新鮮地回憶起來的，乃是它分佈在各區的支部。在這裏，照例佈置着鋪上紅布的大桌子，牆上掛着鑲以紅布的革命領袖的相片。在桌了旁，有時圍坐了工友，熱烈地談着當前政治；或者調解着本區的某幾樁勞資糾紛，或者竟是審訊着搗亂分子。當其時，我只是驚奇於廣州工人們的知識和能力；到後來，讀到了聯共內關於此一時期的爭論文章，才知道這種情形的重要，它表示出罷工委員會事實上是一個與國民政府同存的政權，它甚至把司法權都掌握在自己手中了。所謂中國革命中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我是在那時才首次懂得的。

廣州又讓我看到了中俄革命的密切關係。而且比較深入地思考了這個關係。有關於蘇聯援助中國革命的等等問題，因為自來反動派的攻擊和革命黨派的辯護之故，早已縈繞在我腦中了。最初未入黨之前，雖有些民族主義的先入之見作怪，我卻並不贊成研究系和國家主義派的叫嚷。《時事新報》和《醒獅報》稱共產黨（當時包括國民黨）為「被盧布收買的人」，引起了我很大反感。這不僅由於我對十月革命的模糊景仰，更因為我當時認識的幾個公認的共產黨員（我的同鄉好友），他們的道德行為我非常相信，決不是用盧布可以收買靈魂的。但雖如此，或因為如此，我心裏希望事實上最好根本沒有此種援助，「以免貽人口實」。等我來到廣州的時候，對此問題的看法當已不那麼幼

稚；可是船入珠江，看見蘇聯的貨輪迎面而來；進泊長堤，又見數艘掛紅旗的巨輪寄碇江心；上了岸，不時遇到穿了國民革命軍制服的洋人從身邊經過；後來走近東山一帶，發現中間坐着顧問，兩面踏腳板上站着衛士的汽車急行，我心裏仍不免有異樣之感。覺得「民族的自尊」受了損害，中國人傳統的「廉價」的道德觀似乎有虧了。

打破這點民族主義的殘餘幸而不須多久，大約經過兩個星期，從學習和討論中認識到中國革命乃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只有作為這樣的一部分才能談得上它的勝利和前途這個真理之後，我就完全釋然了。至於此種援助是否進行得適當，應用得是否正確，那是另一問題。當時我根本沒有可能接觸到它。事後研究到它，那是1928年讀到聯共黨內鬥爭的文件以後的事。

在廣州，當然增加了關於俄國革命與蘇聯的知識。只因時間過短，材料與可資請教的人不多，這方面的所得非常有限。在有限的知識中而且又不甚正確。鮑羅庭的聲望超過了列寧，加倫將軍更是掩蓋了托洛次基。聯共內爭的消息那時根本沒有人提起，唯一的曲折反映是流行着一種對於托洛次基的評價。記得一位內部較高級的同志對我說：托洛次基太浪漫，不懂實際。……

就這樣，我向當時的革命聖地進了一次香，以一個較為成長的革命者資格回北京去。

歸途中經過上海，住了兩天候船北上，大哥聞訊趕來看我，不曾晤見。那時我們的情誼仍篤，大哥對我的期望非常殷切，只是我這邊的變化太多，家仇早已忘卻。縱使相見，怕也沒有共同言語可以深談了。

1926年冬天，穿着夾衣，在雨雪紛飛中我又回到北京大學。古城裏的政治空氣和天氣一樣地寒冷惡劣。竊據首都的奉系軍閥在發抖，恐懼病就要變成狂疾。南方革命的勢力發展得如此之快，顯然是出乎他們意料之外的。所以最初他們驚惶失措，不知如何是好。可是到了後來，得知南方的革命黨並非一致，掌軍權的一系而且是實際反共的，他們便自信了一些。等到江西戰役結束，蔣介石一方面準備進兵寧滬，另方面與北京暗通聲氣之後，奉系軍閥的反共態度便瘋狂地積極起來。這後面當然有日本帝國主義的支持。自從北伐軍的箭頭越過長江，由英國「勢力範圍」進入了「日本勢力範圍」，日帝便成了中國革命的最大敵人。在北京，日本的特務人員和張作霖的警探機構合作，以全力對付首都的「赤化分子」。北京大學既是出名的共黨根據地，鷹犬們首先就注意了它。便衣偵探埋伏在學校的每一個角落，沙灘一帶的飯館和小公寓，也經常有這批人的蹤跡。我們的工作是愈來愈困難了。離京兩月，回來時看見我們的工作方法有了不少改變。過去我們開會，大多利用學校教室，這時已不可能了。學校組織的幾個負責人，原本與其他同學的生活無異，而現在則有幾位已不敢再上課，不敢在宿舍裏睡。印東西的油印機以前就放在平民夜校裏，工作是半公開的，如今則搬到特別地方去了。正在街上步行，忽而後面追上一輛車來，秘密將人綁走的事情已不斷發生。人們的心情開始緊張，來往變得「鬼祟」，我是第一次嘗到了真正秘密工作的又驚恐又愉快的生活。

大概因為我去過一次革命聖地的緣故吧，我擔任了一時期大學支部工作後，組織命我在新設的部委會裏工作。工作是緊張而繁重的，從早到夜都要開會和接頭，我的學生生活事實上就此結束，此時我開始成為一個職業革命家——雖然我們都不是靠此吃飯的，我們都必須自

籌生活費用。由組織維持生活的大概只有地委的工作人員。那一時期我的生活再不能靠賣文章了。因為太忙，又因為當時的出版界正受着愈來愈大的壓力，曾經蓬勃一時的文藝活動是完全趨於衰落了。1927年春天幾個月的伙食費都是由一位杭州的老同學供給的，他在北京大學做旁聽生。

生活苦，工作忙，心情卻很愉快。創造社給我的浪漫頹廢的影響最後地消失了，一種全新的樂觀主義抓住了我，充滿了信心。中國的歷史在向前躍進，新舊的交替以戲劇性的速度在體現。一個新的、自由的、不再受帝國主義壓迫的、甚至是共產主義的中國，在當時我們的心目中彷彿是指日可待的。我們雖然還處在昏庸野蠻的軍閥統治之下，日夜受着反動派警憲偵探的迫害，然而這個統治的命運太清楚，誰都覺得出它會很快傾覆，以致它的作威作福，莫說收不到鎮懾之效，竟至有時會使我們覺得可笑。那時我們簡直是以輕快心情做革命的地下工作，以玩樂態度打發自己生活上的艱苦。革命正上升，蜜月未過去，處於敵後的革命者更有一腦子的幻想，他們滿眼所見，自然都是光明遠景了。

在反動派的加緊壓迫下，青年人卻以空前的熱忱湧進共產黨來。在七八個月以前，當我參加組織時，我們大學支部只有二三十人，可是到了1926的春末，人數已突增到了二百多。「蒙瑪區」的小名士們大多入了黨，從象牙之塔走向十字街頭了。此一湧向共產黨的人潮，即使在李大釗同志等被捕殺以後，也還是繼續的。

在當時的工作中，有一種辦法使我懷疑，有一個情形使我不滿。懷疑的是國共關係；不滿的是對理論太不重視。那時北京積極的地下工作者，簡直沒有一個是真正的國民黨黨員。除了極少數幾個右派政

客之外，那裏沒有任何國民黨組織。我們這些年輕學生，可說沒有一個人信仰國民黨的，甚至對孫中山本人，即使因他的逝世之機人們在此地做了不少宣傳，在他頭上拼命畫上了大量光圈，我們也沒有什麼敬意。讀到他的三民主義，常使我們啞然失笑的，但是我們悉數被「加入了國民黨」。在某些場合，我們受囑必須以國民黨黨員自命。最奇怪的是要製造國民黨的會議。記得我入黨不久，第一次受命去參加這樣的會議，對總理遺像鞠躬，恭聆遺囑，然後聽了一些關於南方情形的報告。可是後來我知道，在那次十幾二十人的會議上，只有一個是真正國民黨員，其他的都是自己同志。我非常不明白為什麼要這樣做。後來有幾次更滑稽，邀請參加的真國民黨員沒來，到會的成了清一色的共產黨員，可是還來那一套：鞠躬、讀遺囑，弄得有些人笑了出來。我曾經把我的疑惑請教過上級同志，他們的解釋當然是聯合戰線。「可是」，我說，「這裏根本沒有國民黨員讓我們聯合，我們在做滑稽戲。」那末回答便是：「南方情形不同，那邊國民黨是真實的力量。我們必須執行全國性的政策。」我並不釋然，對聯合的假戲仍覺可笑，只是自己想不出反對的理由。

在北京，至少在整個東城部委所屬的諸支部中，流通着閱讀的理論書，只有一本鄭超麟同志翻譯的《共產主義ABC》和李季翻譯的《通俗資本論》。前者尤為一般同志所歡迎，因為淺顯易懂。我們拿它來油印了好幾本。《通俗資本論》看起來太吃力，根本又沒有功夫讓我們研究，所以看了也還是不懂。我們是共產黨員，而且在黨的秘密組織中積極工作着，可是思想上沒有資格稱為共產主義者，我們並不了解自己為之鬥爭的那門東西。關於此種缺憾，當時在同志中是普遍感覺到的。我們希望多得點書讀，希望有人給我們講授，最好能開設短期的訓練班；可是這些願望，因為客觀環境的日益困難和上級主觀上的忽視而未有實現。

我到南方去跑了一趟，雖然因為時間匆促，沒有學到什麼，可至少提高了對理論的興趣，所以對於當時北京組織的教育工作，更加覺得不滿。因為自己是一個下級幹部，常常要向支部傳達理論和政治報告，這就更加自覺到這個缺憾。事後回憶起來，我們那時的「分析」或報告真正可憐。實際不過是時事綜述，偶爾加添一點內幕新聞而已。西北軍的動態構成了那時報告的中心，另外便是奉系軍閥內鬨的傳說。關於南方，直至李大釗同志死前不久，我們才接到這樣一個機密指示：蔣介石的態度不好，今後不要在群眾中捧他（但非攻擊他）。這其實是數月前我在廣州「內部朋友」談話中聽到的那種惶恐的回聲。此時我因為對國民黨派系之爭已略有認識，便覺得這個機密指示太消極，太不夠了。

不過我們那時想多知道點理論，並非由於我們真正懂得了理論對於行動的重要，也不是因為我們對「唯幹主義」有了根本懷疑。真知道理論重要，痛感到這種工作態度的害處，在我個人乃是到了莫斯科以後的事。

就這樣，我們讓一個不甚了了的思想所鼓舞，向着簡明的目標（反帝反軍閥），懷了近乎輕鬆的樂觀心情，在日益瘋狂的反動恐怖統治之下，幹着，幹着。（這工作幾乎唯一的是擴大組織。）直到4月間李大釗同志被捕與被殺，才使我們幹的情況，特別是幹的心情改變了。深刻的悲憤代替了從來的輕鬆。

作為一個下級幹部，我自無可能知道那次不幸事件發生前黨組織有了怎樣的準備。不過統治者要下毒手的情報，我們事先似乎是得知的。事前幾個星期，組織上就通知大家要格外小心。與李大釗同志同時被捕，且以第三名就義的譚祖堯同志，在事發前兩天曾經告訴我：

他要避居安全地方（東交民巷），要我晚上別在原地方睡。可是事情卻偏偏發生在最安全的地方：我們顯然不曾料到，日本帝國主義者竟會打通辛丑條約所有簽字國的關節，讓張作霖的武裝軍警進入使館界，而且公然侵犯俄國大使館的特權，把我們的同志從使館相連的東清鐵路的房子裏拘捕以去。

關於那個案件，記載已經很多。今後人們根據檔案，參以證物，一定還會有更詳實的關於李大釗同志等 20 人成仁的史傳寫出來。我是不必為我的零星回憶多費筆墨的。不過有一件事，當時在北京組織裏傳得很普遍，似乎應該一提。張作霖將這批共黨領袖捕獲以後，因為國內外的抗議和輿論壓迫，卻不知如何處置才好。同時奉系內部，尤其是張作霖的高級謀士趙欣伯，據說很替李大釗等說項，不主張加害。當時下了台仍寓北京的章士釗等，也力勸保存被捕者的生命；因之，據說張作霖一時很想將這批共黨解出關外，長期監禁。可是這時候，南方「革命軍的總司令」蔣介石卻透過他的秘密聯繫，力促殺害，張作霖之意遂決。這消息是從接近奉系的人傳出來的；可靠性很大。李大釗等在北京遇害，與蔣介石在上海大肆屠殺，相去只有幾天，二者間的關係當甚明顯。

革命開始大流血了。對於革命者，特別對於我們這些少年革命者是有很大影響的。革命證明出不是鬧着玩的事情，也不是讓年輕的浪漫主義者寄託其幻想或發泄其精力的玩藝，至於那些存有較多功利思想的分子，則要權衡一下利害了。階級鬥爭以其萬分無情的方式，向革命者顯現了殘酷的真相，並尖銳地提出了去從問題。這時候的革命者，按照了各自的出身地位、思想深淺、性格厚薄，不得不各自做出決定，決定他們對革命的態度。換句話說，革命者跟着革命的加深與分化就要發生分化了。

不過在當時的北京，地方組織並未因李大釗等的被捕而遭到破壞（這主要得歸功於那時軍閥特務尚非「科學化的」，技術還很幼稚），黨的整個工作照常進行。突如其來的血的鎮壓，至少在一時間絕未引起隊伍間的動搖，相反，人們的心情倒是分外嚴肅了，因害怕而動搖而脫黨的現象是完全沒有的，軍閥的臨終掙扎根本不可能產生這種影響。使北方的共產黨員更加震動，且因而感到不安和惶惑的，乃是南方傳來的「清黨」消息。我們太沒有思想上和感情上的準備了，竟致無法接受「革命軍領袖」屠殺工人的這個事實。吳稚暉的反共文章在北京的報紙上登出末，特別使年輕的革命者痛苦，因為我們向來都崇拜這個老頭子的。同志們奔走駭告，互相歎息，可終於無法弄清楚這是什麼回事。自然，就我所接觸的人說，沒有一個人同情蔣介石與吳稚暉的，但是「為親者所痛，仇者所快」那種淺薄感慨卻很普遍。我們要求了解這件事情和原因和今後對蔣介石們的辦法。可是在當時的北京領袖群中，始終沒法滿足同志們的此一要求。「蔣介石投降了帝國主義，投降了右派，他叛變了革命」，便是我從地委方面所能得到的全部解釋，我也就用這個解釋去回答支部同志們的詢問。不久，我們得到新的安慰了：「走了蔣介石不要緊，國民黨還有左派，還有汪精衛。他們是我們可靠的同盟者。革命的中心在武漢。」

惶惑了一時的心情平靜下來，我們又沉着而有信心地工作了，希望的眼睛注視着武漢。

此時武漢工作異常緊張，需要人，要求北京派一部分同志南下，組織上就派了一些平素較受注意的同志前去，我也是被派者之一。那次被派的共有十人，其中有女師大出名的學生領袖彭蓮清，以及北大擔任學生會主席的張經辰。

在 1927 年 6 月的一個清晨，悄悄地離開了北京，從此結束了我在國內的「大學生活」。

注釋

編按：《雙山回憶錄》注釋部分的「校者注」，校者指鄭超麟先生；另有注明年份的注釋，則為作者王凡西加注，詳細說明參見本書作者王凡西寫於 1993 年的「前言」。

1. 巴黎城內學生集中地是拉丁區，不是蒙瑪區。——校者注

三、從漢口到莫斯科

恐怖和戰爭的氣氛籠罩了上海。法租界和華界之間築起了碉堡，堆滿沙袋，攔着鐵絲網。中國地界，特別是老西門一帶，景象顯得淒清肅殺，讓你嗅到不久以前瀰漫過的血腥味。路旁牆上，看得見塗抹了的標語：「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蔣介石」，「反對白色恐怖」……

在海輪上我們就聽見這樣的傳說：從上海坐長江輪船到漢口去很危險，碼頭上時常有人被捕。但是沒有第二條路好走，我們還只得硬了頭皮去試。心情相當緊張，有人還「化了裝」，拼命想叫人看不出我們是學生。可是上到船上，並沒有像傳說之甚，很方便地通過了檢查。

船抵漢口江邊，一眼就讓我們看到跟上海完全不同的情景。這裏彷彿什麼都熱烘烘的。天氣熱，政治空氣似乎更熱。一個長長的行列，人們舞動着小旗子，高呼口號，正由幾個月前還是英租界的馬路上昂首過去。那氣概就叫我們的心裏沸騰起來。碼頭和馬路上熙來攘往，人人都顯得忙碌和興奮。為了正在召開的全國勞工代表大會，大幅紅布做成的標語橫掛在馬路中心，威嚴壯麗地在風中飄盪；我們給感動得幾乎要掉淚了。因為我們是剛從這樣一個地方出來的：那裏連放在房間裏的一本紅皮書都會讓你蒙上嫌疑的。在許多高大建築物的牆上，油漆着龐大字體的革命標語，以及俄國革命領袖（列寧、齊諾

維也夫等) 的警句名言, 這都使我深深感動。總之, 這個革命中心的外表一下子就吸引住了我們這群年輕人的心; 我們激動, 我們高興, 我們慶幸於自己終於能投身到革命的「實際工作」中了。

但是失望很快就跟着到來。報到之後, 我們並不能得到「轟轟烈烈」的工作。據說許多工作正在收縮中。很多應召而來或被蔣介石驅逐而來的革命者都在待命。我還算幸運, 沒有叫空等着, 被派在「四省黨部」工作。這是江蘇、浙江、安徽、江西四省因蔣氏「清黨」結果, 大批同志逃難來漢而成立的。這個「黨部」的原來目的是策劃該四省的秘密工作, 而實際則是招待流亡人員。這工作我不甚感到興趣, 因為無工可作。不過總算有了着落了, 同時在那些流亡幹部中也實在有優秀人物的, 與之同處, 能收切磋之益。最使我們失望的乃是知道了「革命中心」的內在關係竟不像外表那樣令人興奮, 而是充滿了危機的。那時候, 夏斗寅的叛變已早給武漢的學生軍和工人打敗了。湖南許克祥的「馬日事變」已經過去。武漢軍隊在河南擊潰了奉系軍閥, 報紙上正大吹勝利, 宣稱革命政權已進一步鞏固。但是暗中, 在組織內部, 憂慮增加着。「唐生智態度可疑」, 「汪精衛靠不住」, 「孫科向寧方暗送秋波」諸如此類的傳說到處可以聽到。「我們應該怎麼辦?」這個疑問, 幾乎浮出在每一個共產黨員的心頭上。一年前的情形似乎又在重複: 當時是眼巴巴地望着蔣介石, 只見他日益跋扈, 日益右傾, 卻不能動一指來防阻他的叛變。現在我們是同樣眼巴巴地望着汪精衛和唐生智。在表面上, 此時我們與「左派國民黨」的關係似較一年前對蔣介石為有利。汪精衛彷彿還在我們勢力的監護之下, 武漢政府對蘇聯援助和共產黨的支持彷彿仍是不可或缺的。可是情形愈來愈不對, 革命危機更表面化, 連作為下級幹部的我們, 都可以看出局勢的不妙了。

我當時聽說，在四五月間，即當蔣介石公開與武漢決裂之後，此地曾經發生了一次爭論：北伐張作霖呢還是東征蔣介石？結果，據說莫斯科主張繼續北伐，大軍遂由唐生智率領，沿京漢路進發。如此決定的理由，當時許多人是清楚的。一種普通的解釋，就是說為了與馮玉祥會師。這個馮玉祥，據說在莫斯科曾經受了教育，非常革命；所以會師之後，對付蔣介石就不成問題了。我對馮玉祥原沒有信任，但因數月前在北京看到過他「玉祥本工農子」的回國宣言，（我們曾替他秘密印發了的）又聽說當李大釗等被殺之後，他曾下令三軍掛孝，誓必復仇；故對他也不免存有若干幻想。我們到達漢口的後幾日，馮玉祥與武漢政府諸領袖舉行了鄭州會議。會議結果，並不充分公開。許多人以為馮玉祥一定會前來武漢，共商討蔣大計，可始終不曾實現。我們上邊的人毫不見得興奮，連國民黨中真正偏左的少數領袖都顯得很沮喪。據說馮玉祥要「調停寧漢衝突」。幾天後，我遇見了一個北京的老朋友，他原是一年前到馮玉祥軍隊去工作的；相談之下，才知馮軍中所有的政治工作人員，在該軍出了潼關以後，即被有禮貌地送上專車，運來了武漢。從他的敘述中，我才清楚我們的幻想是完全落空了，馮玉祥的革命姿態僅僅為了騙取蘇聯軍火，等到自己站穩了足，立刻露出他反動軍閥的真面目來了。

鄭州會議以後，武漢情勢激劇惡化，農政部長共產黨員譚平山稱病辭職，跟着勞工部長蘇兆徵也辭職了，汪精衛們更公開地斥責兩湖農民運動的過火，大膽地要求共產黨人約束武漢工人的革命行動。我們的黨顯然是在步步退讓的，從《嚮導》的論調中，我們只看見輕微的抱怨，婉轉的辯護。沒有反擊，甚至沒有防衛的意圖和組織。反革命的聲音日益響亮，其言語日益明確，而我們則不曉得怎麼辦，彷徨和憂慮抓緊了每一共產黨員的心。

黨的正常的組織生活似乎已經停止。除了個別的直屬上級和我不時接頭之外，我在武漢簡直不曾正式參加過支部會。因此無法知道黨對一切重大問題的真實態度，有了疑問也根本找不到負責人討論。同志兼朋友的人是很多的，我們也常常見面，但他們的情形和我完全一樣。大家都是迷迷糊糊的，因之是慌慌張張的。在此情形中，傳說代替了報告，猜測代替了分析。有些在國民黨高級機構中工作的同志，反而成為可靠消息的來源了。因此我們只知道敵人的動態，卻不知道自己的策略。

一天下午，我在漢口街上走，只見許多輛黃包車上裝着槍枝，後面跟了工會的糾察隊員。行人紛紛議論，據說是工會自動向警備司令部李品仙繳械。我看了非常詫異，就去找到我的上級來問問，究竟是怎麼回事。據他說，這舉動為的要避免引起誤會，使政府相信我們沒有異心。我聽了大不滿意，雖然我自己也想不出應該怎麼辦。我只是直覺地想：如此退讓，決非保衛革命之道。

我在杭州時候的老朋友許志行（共產黨員）此時還擔任着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機要工作，我的消息時常是仰給於他的。在一個星期一的早上，我去找他，正趕上開紀念周，他約我一起到大廳裏去坐坐。那天，恰好聽到了汪精衛那篇有名的〈在夾攻中奮鬥〉的講演。這是篇明目張膽的反共宣言。汪精衛演說時的倨傲神氣，大多數聽眾對他的熱烈反應，以及繼汪登台演說的幾個湖南地主黨棍的「索回血債」的叫囂，給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這裏比任何地方更使我嗅到了反革命火藥氣，更喚醒了我一直以來迷糊的幻想，因而更感覺到我黨一籌莫展的痛苦。許志行是整個兒地頹喪了。散場後，他和我二人去吃飯，他想到自己可能突然被殺，很天真地囑咐我，要我設法收殮他的屍骨。他很久想離開這個工作，可是據他說，組織上沒有批准。

關於革命的策略，我知道黨內早已有了爭論。可是我們一直不知道爭論的內容為何。從《嚮導》上看不出一點影子來。同志中傳說，爭論的雙方是瞿秋白與彭述之。但我始終看不到文件。瞿秋白那本《反對彭述之主義》的小冊子，我在那個時候方才弄到。和我一起的幾個同志，爭先恐後地讀了那本書，由於我們的理論認識太淺，對於基本的革命問題不能懂得很清楚，只是依照瞿秋白的排比論列，我們便認為：土地革命的徹底發展自是中國革命勝利的主要保證；兩段革命當然不及一次革命正確。不過他的書並不能完全解決我們的疑慮，首先是國共關係問題，工人武裝問題，利用軍閥問題等等，他並沒有具體的、與正式領導根本不同的態度，因此並未指出應走的方向，應做的方法。這些問題，要等一年以後，我們讀到了當時聯共內部關於中國問題的爭論，才在事後獲得清晰的解釋。

我用自己的耳朵聽到了汪精衛的演講，對這個「左派革命領袖」是大大地不敬了。可是在我們黨的公開言論中，卻從不曾讀到過對於此人的批評或攻擊。在基本態度上，我們還是要捧他出來「領導革命的」。此事我十分不解，時常和朋友們討論這個疑問。個人覺得我們必須還擊。那時候，我在暇時常給漢口一張日報譯寫點東西，於是我發生了幻想：最好能寫篇文章來罵罵汪精衛，可是同時知道得很清楚，這是不可能的。就在這樣的心情下，我半鄭重半玩笑地寫了一點東西，說到汪精衛的反革命。寫完後出門去，文字留在房裏，卻給同房住的一個「左派國民黨人」發現了，立刻拿去告密。

當天夜裏我被捕了，被拘禁在河街的公安總局裏。這是我一生中四次入獄的第一次。

這是個舊式的拘留所，木籠子、泥地，三面都是牆，不開窗眼。靠木柵欄一邊也不見天，所以這兒是沒有一點陽光的。一盞小火頭的

電燈高懸在柵欄外，籠子裏更顯得陰慘慘了。驟一進去，滿眼只見是赤膊蓬頭鬼影似的囚徒，一簇簇擁擠在裏面。一股強烈的奇味向你襲來，辨不清是汗酸、霉氣，還是糞便臭。只覺得頭昏心惡，反胃欲嘔。一移步，腳下滑而膩，定睛細看，卻原來是滿地氾濫着便溺。小時候聽人講過陰世地獄，中學裏讀過但丁的煉獄描寫，萬萬想不到真正的人間地獄是如此的可怕。我有生以來八分之一的歲月消磨在牢獄中，可是今日想來，全部遭遇中還要算那次經驗最為難堪。

不過精神上比感覺上應該是更加難受些。在當時共產黨人中大概我是第一個進了監獄的。共產黨進監獄在那地方尚未成為風氣，而掌管這監獄的政府當時還被公認為「革命的」。我雖然已經相信汪精衛是反革命，但畢竟只是個人的想法，黨沒有公開反對他，甚至共產國際都仍想「挽救」他。對於自己為之入獄的那件行為，無論思想或感情上我都沒有支持的。這就使我更加難堪了。本來，人對於痛苦的忍耐力並非絕對，個人的信念和社會的風尚具有決定的力量。在某種時候，階級鬥爭的某一特定的力量關係造成了社會風氣，它要求眾多的革命者以其自由和生命來為將到未到的某一確定思想的實現而開路時，人們不但以入獄為榮，甚至以就義為樂。反之，牢獄之災和殺身之禍，不但對於凡夫俗子，即使對於英雄豪傑，也會是難於忍受的。在當時的武漢，歷史正在對革命者提出犧牲的要求了；只因人為地拖延着這個形勢的展開，我竟以「未成熟的先驅者」資格踏進了汪精衛的監獄。

半天處下來，我立刻知道了拘留所裏人犯的成分：一部分是湖南押來的未決地主，另一部分是由漢口總工會寄押的工賊和小資本家。我卻是他們切齒痛恨的共產黨！我自自然不吐露我的身份，人家就本能地猜我是他們的同道。其實我心裏明白，像我這樣的囚徒不久就會來替代他們的地位了。

我的「難友」中每天有開釋的，而我卻毫無聲氣。提訊不曾舉行，外邊也無消息。直到入獄的第四天，我的朋友 S 才獲准進來探我，叫我安心，說四省黨部裏所有的同志，連真正左傾的國民黨員在內，都為我這件事打抱不平，不久就可自由的。

我真正獲得自由卻又在旬日之後。拖延的原因，朋友們事後對我作如此解釋：國共那時的關係已搞得十分惡劣，由黨的朋友直接出面來營救，會使事情更壞，於是他們託當時任國民政府商民部長的經亨頤出面，將我擔保出去。

時間大概是 7 月中了。武漢情勢與我入獄前又已大大不同。反革命日益露骨，同志中更顯出了狼狽。有些人已開始離開武漢。經濟情形每況愈下，國庫券每小時在跌價。人們拿了 10 元鈔票已吃不到一杯冰淇淋了。人們最大的關心是準備幾個銀元，以便隨時逃難。黨的領導已經紛亂，有些機關都結束了。號召東征的隊伍在遊行，擁護孫夫人宣言的標語到處張貼，但這一切都掩不住人們心裏的沮喪和悲憤。謠言滿天飛，關於國際代表印度人羅易的提議，關於陳獨秀的行蹤，關於蔣介石和唐生智們的行動。我所認識的年輕黨員中，不少人想隨賀龍軍隊東下，我也想去；可是和黨的負責人商量之後，他卻要我到莫斯科去，去學軍事。

因為革命在它的四周先遭失敗，革命者紛紛投奔到「中心」來。此時集中在武漢的各省共黨幹部，雖然不曾見過正式統計，但相信是要以萬計的。這些人來時大都和我一樣，滿腔熱血，萬丈雄心，原想在此地找到適當工作，參加革命，或聽一聽中央「面授機宜」，以便回到原崗位或其他地區去作秘密工作。可是很快他們就失望了。因為「革命中心」事實上正在變成反革命中心。工作非但不需要人，人反而愈

來愈多地被迫離開了工作。中央的領導此時彷彿已無力及此，對各省來的同志只好置之不顧。拿我們來說吧，自從報到以後，除了事務上的接頭之外，根本不曾有人和我們談過，或詢問過關於北京的情形。其實我們這十個人乃是李大釗同志遇難後首批來到中央的。後來形勢日益惡劣，這些流亡幹部的處境也愈過愈壞。他們的心情非常不安，因為其中大多數都是被本省通緝，欲歸不得。如今革命不成，勢將在「長安」求乞與被殺了。如何處置這革命戰爭潰敗後的大量游勇散兵，成為當時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

挑選一部分人去蘇聯學習，即是此一問題的解決辦法之一。據說這還是莫斯科的主意，目的在於短期內訓練出一批軍事幹部來，藉以進行武裝革命鬥爭。

那時被選中的共約七八百人，標準是以工農為主；但事實上，知識分子所佔成分很高，約在半數以上。我們從北京前來的十人中，就有五名被選在裏面了；幸而被選中的人是興奮的，人人都為那不久就將學會使用武器的遠景迷惑。在革命潰敗的悲憤空氣中，有一個感想流傳得最有力，那就是：武器是決定問題的最後力量。人們這時候不可能有另外的想法，沒有能力去研究革命失敗的更深原因。事情是擺得太清楚了：在短短不到半年的時期中，我們眼巴巴地望着一個軍人跟着另一個軍人，從「革命」領袖變成革命敵人。他們無恥地、倨傲地、野蠻而血腥地，先後欺騙了我們、叛變了我們。而我們卻像是被遺棄的癡心的「佳人」，是可憐而無可奈何的「秀才」。「若要革命成功，必須自己拿起武器」，這個結論當然非常自然，而且本質上亦是正確的。（順便在這裏說一句，中國托派的一個大錯誤，就是沒有充分理解得這個教訓。）

現在好了，我們有機會去自己學習如何掌握武器，將自己擁有軍隊，不必再專在現成的軍人中去尋找「對象」了。這在我所認識的那些被選派者中，可說是共通感想。

大約在7月20以後的某日，我坐船離開漢口。此時反革命局勢已成，當地的報紙上彷彿已開始出現某些共產黨員脫黨的啟事。在上海，我們潛伏在小旅館裏，聽到了南昌暴動的消息。改變中央領導的非常會議正在武漢舉行；不過那時我們都是不知道的。數日後，我們偷偷地上了一艘蘇聯貨船，前往海參崴。同伴六十餘，其中有宋慶齡和陳友仁一家。

船出吳淞口，我們從貨艙裏爬上甲板去，似乎是再生了。初秋的陽光令人神爽，大家不期然地歡呼跳躍，高唱起國際歌來。船漸漸遠去，祖國鬱鬱蔥蔥的海岸也逐漸淡去，海面如鏡，平靜恬適，沉思又代替了剛才的歡呼。人們倚欄遠眺，思潮起伏。各人的私生活將開始新的一章，中國革命彷彿也將有新的開始。在新的一章中，全部文字將以熱的鉛和紅的血來書寫的；而我們行將拿起來的武器，要在這裏面起多少作用。思念及此，多月來經受的失敗、恐怖與委曲，都好像一掃而空了。

在十月革命十周年（1927年）以前大約一個月，我們到達了莫斯科。

四、東方大學

在到達莫斯科之前，我們在海參崴停留了約莫半個月，後來在西伯利亞的火車上又過了13天。這一段時間，讓我們對於蘇聯這個國家，有了比較正確的初步認識。原先，我們雖然不曾天真地以為這兒業已實現了盡善盡美的人間天堂，但想像總是不很明確的，和真實情形有着很大距離。初到海參崴，在碼頭附近發現了幾個乞丐似的窮人，我還是很感驚奇的。大概是到後第三天吧，傍晚，我和兩個朋友在街上散步，經過國際海員俱樂部，沿電車路向市梢走去，忽然從後面追上了一個人來，將一隻爛番茄（或者是紅柿子，我記不清了）拋在K的後腦殼上，憤怒而含糊地罵着，飛快地逃進了橫街。此事讓我們知道了，這裏並非人人都歡迎我們的，有人恨共產黨，因而更恨外國的共產黨，這裏還存在着階級鬥爭，甚至是十分尖銳的階級鬥爭。這時我們開始更清楚地懂得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絕不等於社會主義社會的成功。一個理想的社會，決不是短期間能夠建立起來的。在過去，如果我算研究過一點理論的話，那總是關於如何革命以及如何勝利方面。至於勝利了如何建設，在工人當政的國家裏如何繼續階級鬥爭，我們卻從來不曾想到過。來到海參崴，面對了事實，這才第一次接觸到這些問題。此後我們不僅要為中國來研究革命理論，而且也要為蘇聯來研究它了。

在海參崴招待我們的是一個德國人，會說英語，他跟我發生聯繫。據他說，不久之前他還是海員，參加德國革命，現在是第三國際駐在海參崴的工作人員。另一個與我們發生關係的是中國人梁柏台，那時是蘇聯遠東省的一位高級負責者。這件事在當時我們看來亦頗新奇：在蘇聯「做官」的竟不一定是俄國人！狹隘的民族界限在這裏是真正打破了。我們不是在書上，而是在真實的政治中看見了國際主義。這給予我們的感動是非常大的。

在海參崴的短期停留中，我總算明白懂得了：蘇聯的可貴並不在於它今天已經實現的情況，而在於它前進的方向，在於保證這方向的政治的和經濟的制度。我們要研究這些史無前例的好制度，同時要了解至今還包含着許多矛盾和困難的現狀。這可說是我們到蘇聯來學習的第一課。

在橫貫西伯利亞的火車上，發生了一件小事，非常生動地留在我的記憶中，而且多少影響了我往後思想的，值得一記。火車上，中國學生包了兩節車廂。依照長途車上的規制，每一節車廂有一個固定的管車員（或乘務員）。他的任務是照料這節車裏的清潔、秩序、報告下一車站的情形（例如停多少分鐘、有無開水供應、能否進膳之類），同時他也留意一般乘客的行動，每逢大鐵橋將到的時候，他就大叫：「莫斯脫」（俄語的「橋」），拉上窗門，不准人探身出去。我猜想，這種管車員多半和公安部門有聯繫。我們那節車的管車員是一個非常老實的中年人，退伍紅軍，對乘客很和善，關心得十分親切。一開始，他和我們就交上了朋友，教我們認俄文字母。我們之間沒有共通言語，卻能夠談話，借助於手勢和少數幾個俄文單字（那是我們從海參崴旅館裏的女工學的），有一次，幾個人圍在一起，拿了紙頭和鉛筆在學寫俄

文，我們的教師站在旁邊抽煙，指指點點。這時有人把「史大林」這個名字用俄文字母寫出來，教師看看這個字，不做聲，眼光淡淡地移轉了，望着另一個人的面，那人便豎起了大拇指，興高采烈地對着俄國朋友說：「史大林！史大林！哈拉血（好）！」我們所有人的眼光都望着他，表情都是興高采烈的。可是對方的面色很難看，他鄙夷地掃了我們一眼，擲去了長長的煙頭，伸出了小拇指，吐口口水，口稱「哀朵，哀朵！」（俄語：「這個」。）我們一怔，他卻突然地激動起來，面色漲紅，改豎起大拇指，同時連聲說道：「托洛次基！托洛次基！哈拉血！」接着他氣憤憤地走開了，口裏嘖咕着一連串我們聽不懂的俄國話。

當時我們都覺得奇怪，不明白為什麼讚美史大林會如此地觸怒了他。對於聯共黨的內爭，我們知道得還是很少；非常少的一點知識是在漢口時期聽來的。根據那時的一般說法：列寧的繼承人是史大林，他是俄國乃至國際共產主義革命的領袖；至於托洛次基，據說「充滿個人野心、浪漫、而且彷彿是蔣介石型的軍人」。

發生那次事情的時候，火車行程大約走了三分之一。在以後的行程中，這位管車員依舊是那樣和善而親切的，照顧得我們無微不至；但根本的態度是變了，不再和我們作默劇式的談話，不再教書，甚至不再是朋友般的隨便了。這個改變的原因，只當我後來比較熟悉了蘇聯內情之後才能解釋，他在感情衝動後有點後悔，有點害怕，怕我們將此事告發，因為他知道我們全是黨員。

我們中間自然沒有人告他的密，因為我們都還站於聯共的黨爭之外，誰也不曾和任何一派聯繫起來。不過從這位退伍的紅軍口裏，我們是第一次聽到了，並且看到了，關於史托二人的、不同於已知看法的看法。

這是一次非常愉快的旅行。那時正當陰曆八月間，火車駛過貝加爾湖的那夜，記得又適逢中秋。皓月當空，映照出萬頃銀波，壯麗無比。火車一整夜就是繞着靠南的湖沿走，我們差不多一夜不曾入睡，大家憑着車窗賞月。次晨，火車到達了湖畔大站伊爾庫次克，我們吃到了世界有名的貝加爾湖魚的魚乾。

秋天的西伯利亞可能是一年中最美麗的。不冷，當然還不見雪，但一望無際的樹林已顯出蕭瑟之意，基本的色彩已自綠中轉黃了。空氣是無比的清新，即使在車廂裏也嗅得出原野和林木香味。有些小車站及其附近的景色最迷人，房子全用木做，不着油漆，牆壁多半是用整段圓粗的木材疊成的。車站和火車都隱沒在樹林裏。月台上，時常可以看見幾個穿俄國襯衫的青年，彈着「巴拉拉伊加」（近乎豎琴的俄國樂器），唱着，舞着。幾個俄國鄉下小姑娘和老婦人，向我們兜售些煮熟的雞蛋和鹽漬黃瓜之類的食品。這情景是既幽靜而又歡樂的。那時候離俄國的農業集體化「高潮」還有好幾年，中右派正要利用富裕農民來打擊工人及其政治代表——左派，布哈林的所謂「由富農走向社會主義」的意見正被史大林奉為主臬。可是當時我們並不知道，這些個可愛的村姑們能夠出賣她們多餘的食品，倒是托洛次基們給人打倒的原因之一哩。

我們大概在10月初旬到了莫斯科，被招待在史脫拉斯那雅廣場附近的一座樓房裏。幾天之後，陸續又來了幾批中國學生，大家住在一起，全數該有六七百人了。我們全都是準備進軍事速成班的。這個軍事班附設於東方大學，預定六個月畢業。大概因為中國革命失敗得太快，一切事超過了預計，學生到齊之後，學校卻尚未準備就緒。我們閒住着。正在此時，上面決定要從我們這群人中撥出數十人，進東大

當正式學生（二年期），我也被挑中了。不過我那時卻並未以被選中而高興的，因為我們的本意是來學軍事，不是來讀書的；對於理論在革命中的重要性尚未有深刻認識，武力決定一切的教訓又太過新鮮。同時，我那時竟還保持這樣一個可笑的想法：如果真讀書，我不如回北大去。因為直到那個時候，我還不自覺地將「純粹學問」與共產主義的理論對立着。幸而這個成見，或正確些說，此一成見的殘餘，當我鄭重而系統地接觸了馬克思主義以後，便立即消失於無形了。

東方勞動大學是一個專門培養革命幹部的政治大學。學生分屬於七十多個民族。其中包括了蘇聯內部的東方諸少數民族，亞非二洲的各被壓迫民族，以及日本人和美國的黑人。在孫中山大學沒有成立之前，中國派來的學生都就讀於此。我們住的脫威爾斯卡雅林蔭道 A 字 15 號那個宿舍，也就是瞿秋白他們留俄時候住過的。從 1924 年起，因為中國的革命形勢開展，有大批的中國留學生送到莫斯科來，於是特別開了一個大學，即孫中山大學，專收中國人。但雖如此，每年派來的學生中，仍有少數被撥入東大。原因是：孫大是國共合作的產物，學生中頗多非共產黨員，其中不少是國民黨要人的子女，另有一些是青年團員。所以黨齡較長的老黨員，多半仍被派入東大。

不過到了 1927 年，人們對於東大與孫大的看法，又加上另一個政治角度了。孫大校長是波蘭的老革命家拉狄克，他是出名的托洛次基派；而東方大學則是紀念史大林的，校長休面次基乃是最積極的史大林擁護者。站在聯共黨內派系鬥爭的立場上，他當然是要重東大而輕孫大了。雖然當我們到達莫斯科的時候，孫大內部的鬥爭亦已決定，拉狄克已被撤職，新校長是史大林派的人物米夫；該校中的托派學生，有的事實上已被開除出黨，命運待決，有的則已悔過投降（其中

有蔣經國)。但一般說來，依照史大林派標準看，東大的行政當局和學生，在成分上仍舊是較為純正的。

我們的正式學生生活一開始，立即被沒頭沒腦地捲入到蘇聯黨內鬥爭的漩渦中去。這個鬥爭將要在很大範圍內，決定聯共、蘇聯，乃至全世界人類的命運的。我們對俄國的革命史茫然無所知，對蘇聯和世界工人運動的知識也幾乎是完全沒有，一下子接觸到那些爭論問題，簡直叫我們無所適從。不過我們是有高度興趣的，特別因為當時爭論的一個主要問題是關於中國革命。這些爭論在理論上雖然生疏，但史實卻是非常熟悉，這些事多半是我們親自經歷過，而且引起過我們的疑慮，曾經用我們自己的方式思索過的。所以一俟我們在莫斯科安頓下來，開始學習和思想，就以全副精神注入於此一爭論了。我們積極閱讀文件，參加會議，如此地過了一個短短時期。等到十月革命十周年時候，對問題已經摸到了一個大概；再到12月聯共黨第十五次大會時，我已把握了爭論的本質，並且對爭論雙方已經有明確的向背態度了。

在最初，我們自然有先入之見的。黨的教育使我們無條件贊成多數，尊重中央委員會。我們無須閱讀文件，不需要明白爭論內容，就預早斷定了以史大林為首一面一定是正確的。進學校沒有幾天，我們就參加了一次全校的黨員大會。這次大會的主要事項是聽當時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耶洛斯拉夫斯基的報告。會場中，各民族的人分別坐在一起，由翻譯將演說詞逐句告訴我們。大意是說托洛茨基從來都屬於門雪維克，專跟列寧作對，他參加十月革命的原因是投機，而且他的參加是害多益少的……。這些話，我們聽了自然照單全收，我們根本不知道俄國社會民主黨的派別史。但在蘇聯同學（許多是高加索人與

亞美尼亞人)中，耶洛斯拉夫斯基的演說卻不斷引出憤怒的抗議。我們問翻譯，這些人叫喊些什麼。翻譯的回答是：「胡鬧，托派搗亂。」他不願意告訴我們。可是座中的中國老同學，已經學會了聽俄文的，卻有人低聲地告訴我們說：「他們喊：『無恥！說謊！』」居然這樣大膽！我們有點糊塗了。監察委員會主席演說過後，有一個俄國學生迅疾地跑上了講台，聽眾中就噓了起來。上了台的人不管一切，大聲而憤怒地講着話。下邊的人就轟他；上面的人繼續講，座中人立起來了，有人衝向台去，另一些人想阻止他們，結果會場就亂成一片。台上的人已經給主席團制止了，有人提了他的胳膊，此人憤怒地叫喊着、掙扎着，情形差一點就是混戰了。這時候，我們已經退出了會場。我聽不懂人家叫嚷些什麼，但是意義是很清楚的：群眾中有人擁護托派，大多數人反對托派，鬥爭非常尖銳。

會議的情形推動了我們，讓我們以加倍的努力和興趣去研究文件。不過我們愈有興趣，文件卻愈使我們感到不滿。這些文件都是摘要、片段，而且全數屬於中央派（即史大林派）一面之詞。沒有一篇反對派的文件發給我們。我們向黨部要求，想同時看點反對方面的意見，得到的回答是：反對派的意見在中央派的文件裏已經有了，在辯駁中有了引證。這說法當然不能滿人意。因為文件中被引證的反對派諸領袖的意見太可笑了，有時竟是太荒謬了，我們不相信這些十月革命的大人物們竟會荒謬和錯誤到如此地步。懷疑引起懷疑，結果使我們對原來無條件接受的中央文件，反覺得有了問題。支部的負責人顯然看出了這個惡兆，於是拿托洛次基在某次中央委員會會議席上的發言給我們看。這是紀錄稿的譯文，但是經過仔細刪節的。內中有一半是托氏的話，但因為經常被打斷，不連貫，簡直看不出什麼意思來。另一半是史大林、布哈林等人的插句，這些插句卻記得非常詳細的，

而且還記上當時會場情形，說人們如何以歡笑和鼓掌來贊成對演說人的嘲笑和打趣，又如何以怒罵來幫襯總書記的斥責。看了這個文件，立即讓我們想起了學校黨員大會的情景，滿心反感。

但雖如此，我們終於從這些文件中，或正確些說，從文件的字裏行間，從它的側面和背面，領會到了雙方的爭論點。關於當時爭論的三個主要問題：英俄委員會，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國革命的戰略和策略，我都還不能得到最後意見，因為到達雙方結論的理由我們不清楚，尤其是反對派方面的。要我們下判斷，首先得從頭學習許多東西，例如國際工人運動史、政治經濟學、俄國革命史、蘇聯經濟問題等等。我們（是我們，因為與我持同樣態度的並不少）這種態度，懷疑的、甚至是超然的中立態度，當不為黨的負責人所喜。依照他們的想法，我們的責任是無保留地擁護中央多數派的結論，閱讀文件不過要讓我們的擁護更自覺一點，更堅決一點。懷疑是絕不應該的。當時我們的「黨性」也告訴我們不應該，所以不敢公然表示懷疑；可是我們的「理性」卻不許我們沒有保留，結果，我們便只好在內心的保留下作不懷疑的擁護表示，而事實上，差不多最大多數的中國同志，在舉手贊成中央多數派的決議之後，卻更熱心地來研讀一切理論，特別是反對派的理論。

關於中國革命的爭論，我幾乎是直覺地同意了反對派。應不應該加入國民黨？是否應該替國民黨發展組織？蔣介石是否是中國革命中無產階級的忠實同盟者？省港罷工委員會是否就是一種蘇維埃？北伐勝利中是否不應該放手去組織農民？蔣介石叛變後是否還必須捧出另一個國民黨領袖來造成「新的革命中心」？四階級聯盟這個策略是否在中國已經證明失敗？這些個問題，我雖然完全不知道馬克思主義

經典著作中的說法如何，也不知道列寧關於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作用及其在資產階級革命中的策略如何，但僅憑我二年來浮游於中國革命潮流中的體驗，也可以做出初步的答案了。過去，我早就有了一些懷疑的，第一，是我們在北方（南方的情形我不甚清楚）硬替國民黨發展組織，我從來就覺得可笑；第二，為什麼我們始終把希望寄託在高級軍人和政客身上，受了一次騙又自願地為另一個騙子去效勞？第三，為什麼要把武漢工人的槍械繳給唐生智？為什麼要壓制湖南農民的「過火」行動？這些個懷疑，我最初只是茫然惶然；後來聽說這都是陳獨秀犯的錯誤，是違背了國際指令的。可是今天，在那些精心編輯過的討論文件中，我卻終於看到：無論鮑羅廷，無論陳獨秀或印度人羅易，都不過是政策的執行者，真正決策者乃是聯共的中央，是史大林。在中央派主張的所謂完全正確的政策，與我們在國內見到的所謂被執行錯了的政策之間，實在看不出有什麼原則上的不同。倒是隱隱約約透露出來的，斷章取義摘引來的反對派的表面上非常荒謬的論據，根本和國內所曾實行的政策不同。可是我們誰也不敢，內心裏也誰都不願意去贊成被宣佈為反革命的反對派。

小組會經常討論文件。同志們的發言非常謹慎，只當問題涉及中國革命的時候，我們可說的話比較多，時常會提出一些事實和經驗來，對文件中的某些意見表示疑惑，但一聽領導者搬出大堆權威者的言論之後，我們就啞口無言了。有時，我們企圖將自己的經歷作一番推廣，將它一般化一下，想以此印證或批評文件中某一個見解，但發現列席的領導者帶着優越的微笑，輕輕兒的向你指出：「同志，你這個意見恰好就是托洛次基（或拉狄克）所歡喜的。」發言人便立即覺得狼狽萬分，惶恐地將意見撤回了。中國的革命者並非懦怯成性的，其中大多數有精神勇氣，所以然者，只因「黨」、「中央」、「多數」這幾

個名字，當時聽起來實在太神聖，太不可侵犯，以致誰壟斷了這些個名字，誰就享有了無上權威。

十月革命十周年紀念來臨時，我正是這樣程度的一個「史大林主義者」。那一次的遊行是我生平第一次見識到的，場面大極了，我們的隊伍黎明時就到區蘇維埃門前去會合，一路遊行，中午穿越紅場，直到下午三四時才得回家。列寧墓前首次見到了史大林等等的要人，他們舉起了手，向經過的各個隊伍，從揚聲機裏呼喊着各種口號。大概中國革命還太新鮮，或者是史大林故意要表示中國革命並未失敗，正在進入更高階段吧，中國學生在紅場上似乎受到了分外熱烈的歡呼。我們的隊伍才繞過克里姆林宮的圍城轉角，剛剛踏進紅場入口，就聽到了響徹雲霄的巨聲口號：「中國革命萬歲！」「世界革命萬歲！」……接着就是震天動地的群眾響應，「嗚啦！」「嗚啦！」我們的隊伍愈行近檢閱台，氣氛就愈發熱烈，叫喊聲也愈發高昂。前前後後的紅旗揮動着，形成了火海。四周圍的人，列寧墓上的，墓房兩側貴賓台上的，面向宮牆，層層疊疊排列在遊行隊伍之另一邊的，上千上萬的人，揮舞着帽子或者旗幟，對我們歡呼出慶祝中國革命的口號。人們彷彿要奔向我們，要舉高我們，要緊緊地擁抱我們。處在這種情景中，任誰都要被感動得掉下淚來的。我們何幸而生為中國人？何幸而成為中國的革命者？更何幸而遭遇到已經勝利了十年的俄國的兄弟們呀？這種歡呼一直送我們走過了紅場。到達莫斯科河時，隊伍繞城轉出，我回過頭來望那古色古香莊嚴燦爛的革命檢閱場，對於今天主持這檢閱的、站立在列寧墓上的史大林，也不禁起了感激和從來未有的敬意了。

然而回到宿舍，在傍晚，我卻聽到了一個消息，說另有一些人，今天在紅場上遭到了和我們相反的待遇。那是在國內認識，現在孫大當翻譯的一個朋友告訴我的，他說今天早晨反對派舉行「反示威」，

拿了「要求實行列寧遺囑」的標語，參加在隊伍中，經過紅場時，被人撕去標語，雙方發生衝突，有人還向托洛次基的汽車開了槍。

那天晚上，我們在學校俱樂部裏看了關於十月革命的電影。當時我沒有注意，究竟那部片子是誰編導的。多半是普道符金的《聖彼得堡的末日》吧。因為現在我知道，蘇聯電影界為了紀念十月革命的十周年，曾經決定由愛森斯坦與普道符金各導一片，愛森斯坦導的名為《十月》，根據約翰·里特的《震動世界的十天》。二人如期完工，而結果則《十月》不能推出來應節，因為它忠實於歷史，將托洛次基與列寧並列，作為影片中的二大英雄。這和當時聯共黨內鬥爭的實際情況是不合適的，因為它有利於被打敗的托洛次基。普道符金的《末日》被通過了，在那個時候發行。如果此外不曾有其他關於十月革命的記錄片的話，那末我當時所看見的便是《聖彼得堡的末日》了。這雖然是由當局（即史大林派）認可的影片，但畢竟因為鬥爭尚在進行，史實又都在人們記憶之中，抑揚之間不能全無分寸，所以托洛次基和其他反對派諸領袖仍有出場的。這是一次很有趣味的測驗。每當電影上出現史大林或托洛次基時，群眾中必然有擁護與反對的兩種表示。贊成的大鼓其掌，反對者則頓足或狂吹口哨。因為場子是黑的，人們無異在進行一次安全的無記名投票。從敵對兩個聲音的決鬥中，我覺得雙方比例與那次監察委員會主席演說後所表演的力量關係不同。即使不是托派壓倒了斯派，至少也是勢均力敵。記得有一連串的特寫鏡頭，讓托洛次基繼列寧出現在銀幕上，此時引出了熱烈與持續的鼓掌和歡呼，史派的人想用頓足、口哨乃至叫罵來抵消歡呼，可是不成功。黑暗中的音響戰愈來愈激烈，終於主持人不得不開亮大廳裏的電燈，才使群眾靜默下去。

可以說，我和大多數中國同志，都是從那一張影片裏第一次知道了十月革命的大體史實。第一次大體上知道了史大林和托洛次基在這個偉大的歷史事件中起了些什麼作用。事隔三十年，現在我無法記清楚電影是怎樣安排這二人的，如何誇張史氏，如何暗貶托氏。不過整個印象留得極深，史氏和托氏，不管編導和剪接者多麼苦心地做了一番厚此薄彼的工夫，可是二人的形相呈現在我們這些未為派別成見所蒙蔽的人的眼中，仍充分地表現出灰暗與明朗，平庸與傑出的強烈對比。我個人，在感情上對托洛次基首次發生崇拜心理，倒是那回看了電影的結果呢。

十月革命十周年紀念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日子。它是史大林派反動勝利的官式慶祝，是蘇聯墮落史上一個顯明的里程碑。此時史大林派在黨內鬥爭中獲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同時該一小派所主持的政策（無論在蘇聯、英國或中國）卻被證明為徹底破產。官僚們為了要確保勝利，就得用盡一切方法來掩蓋破產。極其隆重地紀念十月革命的十周年，便是此種遮眼法之一，甚至是最惡毒的之一。中國工農的血，英國工人的痛苦，蘇聯工人先鋒隊的委屈，全都被節日大慶祝的鮮豔旗幟和歡樂聲音所掩蓋了。用鮮血和痛苦證明了正確的反對派，被置於狂歡的背景中，卻顯得是苦口苦臉的咒詛者與搗亂者了。

十周年紀念大慶祝的此一陰險意義，我自然在事後許久才逐漸領悟的。當其時，我也是陶醉在一般的歡樂氣氛中；不過反對派被毆辱的消息，十月革命的電影紀錄，特別是影戲場中的黑暗音響戰，也總使我從這歡樂的舞台面前窺探到後台的若干陰暗處了。

節日過後，黨內鬥爭更趨積極。一星期中差不多要開幾次小組會。會議事項也跟節前不同了。以前，我們討論的大多是發下來的文

件，談的是些「正確的」與「荒謬的」理論；此時，討論的內容卻一律是反對派的罪狀。組織「反示威」當然是最大罪名。其次是「破獲了」反對派的一個印刷機關，最初說是油印，後來又說是鉛印。最後又說有個名叫某某的人，是白黨匪徒，與反對派勾結。對於這些罪名，在我們是無從討論起的，所以一概是聽聽就算，聽完了照例由支部負責人提一個譴責的決議，無異議通過。可是心裏卻很懷疑，最令我不解的所謂破獲印刷機關問題。據我想，這些在過去，甚至直到那時還擔任着國家重要工作的人，擁有一架油印機，或即令是鉛印機，用以印刷自己或一些共同意見的人的文章，怎麼能算犯法呢？這個懷疑困擾着我，以致在有一次的小組會上，又提起這個罪名時，我就發問說：「我想知道，在蘇聯，印刷機與印刷機關的利用是怎麼規定的？」翻譯聽了我這問題之後一怔，譯給列席的俄國同志聽。俄國人聽了對我仔細望望，臉上現出一種神秘的微笑，然後他經過翻譯回答說：「原則上，問題很簡單，我們是由無產階級的政權獨享它的。反革命分子絕對不許利用。」「可是……」我聽了還想問，心裏的話還沒有說出來，那個由德國轉來的翻譯便俏皮地、得意洋洋地接了口：「可是怎麼？你以為反對派不是反革命，是不是？」翻譯的眼睛笑咪咪地望着我，同志們的眼光也望着我，我非常狼狽，立即回答道：「不是……」此時我覺得有人重重地拉我衣裳，要我坐下，於是我又說了句：「當然不是」。隨即坐下了。坐下後，我轉過頭去，輕輕地問我鄰座的人：「怎麼？」因為我知道是他拉衣裳的。那個人不回答，只管自己用支鉛筆，在張紙頭上亂畫亂寫。我注意他寫了又劃去的字，彷彿是：「慎言」或者「忍耐」，我已記不清了，但意思總是如此的。

幾天以後的一個傍晚，我和那位拉衣裳的人在脫威爾街道花園裏散步，作了一次深談。此時我才知道他的中國名字叫羅漢（平時，同

學之間是以俄文名字稱呼的，彼此不知真實的中國姓名)，早年留學法國，與陳延年、周恩來、李立三等同時，學的是製陶工業，在巴黎加入組織。回國後，在廣州擔任過黨內外的一些工作，最後做何應欽的黨代表^[1]。1926年3月20日「中山艦事件」後，蔣介石開始反共，他和另一些同志不能繼續工作，便被送來東大學習。依年齡和資歷說，他均屬於中國共產黨的第一輩，我在他的眼中是一個小弟弟。羅漢同志的天性特別厚道，沉默寡言，對人經常帶着父兄般的關懷。在我們那次談話中，他便以長兄似的態度，告訴我許多蘇聯黨內鬥爭的實況，告訴我反對派的主張並非像官方文件中所描寫的那樣荒謬。他認為我們還應多多研究，才能斷定誰是誰非；同時他又說目前學校支部負責的中國同志都是些趨炎附勢者，和他們不足以言真理，所以在會議上，他勸我還是不說話最好。我問他有否見過反對派的文件，他說偶爾見過一點；問他有否參加反對派，他說沒有。他這話並非假的，因為在事後我知道，當時在東大的中國學生中，確實沒有反對派的組織。與孫大的反對派有個人關係，偶爾看點文件者，就只有羅漢和另一個姓段的。

羅漢沒有將我變成反對派，但確定了我對反對派和托洛次基的同情，讓我認清了學校支部裏負責人的面目，明白了史大林派黨機關的壓制手段。我在這個鬥爭中不再是天真而糊塗的參加者，有了點定見，說話也有分寸而謹慎些。在以後的連串會議中，例如有關反對派諸領袖的被開除出黨等等，我們只是附和罷了。

打擊反對派的鬥爭在瘋狂進行。行政的警察手段，甚至特務的流氓手段，代替了以往的「理論」鬥爭。反對派分子紛紛被逐出黨，隨即被逐出於任何工作和職業。毆打反對派的消息時常有得聽見。在

孫大，一批出了名的反對派被開除黨籍了，屬於反對派的教員全被解職。東大的中國學生雖無一人蒙上這個嫌疑，但人心也是惶惶的，同學們的關係日益緊張，窺探的眼光到處可以發現，我們這些新來者特別成了窺伺的目標。12月初旬，聯共黨第十五次大會召開，反對派沒有一個當選為代表的，他們在事先就被肅清出去了。會議上是清一色的史大林派論調，通過的決議，完全是將一切業已執行的辦法，加以核准和認可罷了。大會決定開除一切反對派分子，交給秘密警察處置。孫大被開除的學生區芳、陳亦謀、宋逢春、史唐等十餘人被遣送回國。在東大，不少屬於蘇聯少數民族的學生被捕失蹤了，可是這並非目見，只是耳聞。因為我們平時和他們的關係不甚密切。中國學生沒有一個受到影響，其他的民族班中也不聽見發生什麼事情。唯一失了蹤，被流放到芬蘭邊境的有一位荷屬東印度同志。此人後來在共產國際六次大會時，經荷蘭及荷印的代表團要求放還而送回本國，我想，他可能就是二次大戰期間及戰後活躍於印尼的一支托派共產黨武裝力量的領袖——陳馬六甲。因為據資產階級的報紙說，他曾經在莫斯科留學。

關於整個反對派，尤其是那些著名的領袖被迫害的情形，我們知道得很快而且清楚。這是十分奇怪的，原因我始終不大明白。那時當局對付反對派，採取秘密措置，報紙上從不宣佈。但是任何事情，例如11月間，那位和孫中山發表過共同宣言的著名外交家越飛的自殺，我們幾乎在當天就聽說了。托洛次基的起解，晨間發生於火車站上的紛擾情形，不到中午，就沸沸揚揚地在學生中傳開了，空氣中像是有種神秘的傳導體，消息不脛而走。飯廳裏，走廊上，教室中，學生們三三兩兩地聚在一起，輕輕地交換着這些聽來的消息。人們的臉上很少能發現愉快的表情，普遍的臉色是憂鬱的、感傷的、憐惜與同情

的。兩三個月以來，人們每天都討論着史托二派的問題。每天被告訴着前者如何正確，後者如何錯誤。在討論中，我們都曾一一表決，贊成「中央」的斥責反對派，選舉過手同意將反對派開除出黨。但是到了最後，反對派真被開除，「中央」將這些人放進監獄，或押上火車，流放到邊遠去處的時候，人們卻憂鬱了，感傷了，甚至同情那些失敗者了。這現象是難於解釋的，心理過程比較複雜。不過簡單些說，我想總不外乎兩個原因吧：1、由於人類同情被壓迫者的本性；2、史派的勝利，實在不曾在思想上真正說服了我們。

全蘇聯的反應我無法說，若僅就莫斯科當時的中國學生說，情形便是這樣的：反對派在組織上的失敗，開始了思想上（或精神上）的勝利進軍。

大門爭結束後，一種莫名其妙的不滿情緒普遍地抓住了東大的中國學生（包括六百多名的軍事班）。人人都覺得有一股怨氣，鬱積於胸，無從發泄，可是怎麼樣的怨氣，為什麼抱怨，卻就誰都不清楚。其實論生活，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可以抱怨。住的是過去貴族的邸第，穿的洋服，吃的大餐，每月還有10個盧布的零用。除了極少數人，我們在國內從未享受過這樣安定和奢侈的生活。尤其當我們初到之時，躺在溫暖的牀墊上，蓋着輕軟的毛毯，撫摸那用錦緞鑲嵌的牆壁，欣賞着頭頂飾以精巧浮雕的天花板和那座水晶流蘇的大掛燈，簡直疑心自己變成神話故事裏的灰姑娘了。然而滿足於生活享受的時間不很長，很快就熟習了，興趣被吸引到別的方面去。中國革命失敗的深度愈來愈明確，幾個月學會了武藝回去扭轉乾坤的雄心逐漸幻滅；在蘇聯，黨內鬥爭所帶來的窒息空氣與專斷作風令人痛苦，心口愈來愈不能齊一，內心同情與黨紀的要求發生了矛盾。最後，六七百個剛從一

次革命中跳出來的年輕的「反叛者」，精力也太旺了，太安定的生活簡直要把這點精力悶死，他們要尋找發泄的對象。

對象終於找到了，那就是在東方大學裏領導了此次反托鬥爭的一小群中國同志們，那時被我們稱之為「旅莫支部殘餘」。這群人很久以來把持着學校黨部，與學校當局及共產國際的東方部很合得來，是十分忠實於史大林系統的幾個官僚。人們將所有的怨氣發泄在這幾個人的頭上了。此事在最大多數的群眾方面是直覺的，乃是一般的反官僚主義的特殊表現；可是在鬥爭中，卻為中國黨內的派別鬥爭利用了去，同時又牽涉到聯共黨內同屬於史大林派的兩個人的衝突，於此反映了人們為爭奪對中國革命的領導權的鬥爭。此事對中共以後的發展，特別對中國反對派的發展，都有了甚大的影響，我將要詳細地敘述它。

所謂「旅莫支部」，即旅居莫斯科的中國共產黨黨員的支部。與周恩來等所主持的「旅歐支部」屬於同樣性質。這樣的組織，嚴格說，與共產國際的組織原則不相容。因為共產國際是一個超民族界限的機構，每一個共產黨員，旅居在什麼地方，便應該參加（同時也有權利參加）該一地方的共產黨，過着該國共產黨的支部生活。這中間不應該有賓主關係，也沒有「土生」或「僑民」的分別。但因當時歐洲和莫斯科的中國共產主義者，其主要關心是中國革命的特殊任務，他們所需要的理論修養和組織上的準備，都專門是為了中國的，因此就發生了那兩個相當畸形的組織。

旅莫支部在名義上（或理論上）直屬於第三國際，而事實上卻作為聯共的一部分。這樣混淆不清的「法理」地位，在平時並未發覺什麼不便和弊病，但當後來莫斯科學生的內部鬥爭趨於激烈時，王明派

便利用這一點混淆而提出了所謂「轉黨」問題來打擊異己者。此事我們且待講到孫大時候再說。

我不知道旅莫支部最初成立於哪一年。早期的領導者是羅亦農和彭述之等，其後的重要分子是俞秀松；但等我們進東大的時候，負責人是武扶經了。此時這個支部大概已經存在了三四年，它形成了勢力和自己特有的作風。他們的勢力因為住得久，懂俄文，與黨部的俄國同志有了結託，取得了上面的信任。其特殊作風則由於他們要維持這個既得的地位，故主張後來的中國同志不應該學習俄文，據說學俄文時間太長；也不應該研究理論，理由是多讀理論會變成學院派。他們都是黨部的負責同志兼翻譯，壟斷了「對俄」關係，成了黨務上的買辦。每逢中國派來了學生，他們便以口譯或筆譯的幾點「黨員必須知識」教會了他們，住上一年半載，便送回國去「參加實際鬥爭」了。誰若用心讀俄文，或閱讀「必須」以外的理論書籍，即侵犯了他們的專門職業，那他一定要受到嚴厲批評，被視作不積極分子，且有被提早送回的可能。

在我們來到之前，旅莫支部已經被鬥爭過一次。那是與羅漢一起來的這批人幹的。這批人（其中有李俠公、朱丹吉、吳季嚴等）在國內做過一些工作，知識和經驗都遠勝於旅莫支部人物。所以他們無法守住「支部」加於他們身上的「紀律」，他們要求改善課程，增加自己研究的時間。結果，他們獲得了初步勝利：俄文鐘點增加了，精神虐待式的批評會減少了，理論研究的風氣開始形成了，不過「黨權」卻仍舊操在那少數幾個家長式的「買辦」手上。

我們遇到的乃至與之鬥爭的，便是這樣的一些「旅莫支部殘餘」。論人數，這集團不過十餘人，而我們卻有六七百之眾；論勢力，它終

不過是「殘餘」罷了。為什麼為了推翻他們，還會發生鬥爭，而且相當尖銳的呢？原因我在當時弄不清楚，後來才逐漸明白起來。「殘餘」們後面顯然站着東大當局，校長休面次基是個老布爾雪維克，史大林的親信。東大既是史大林的紀念學校，學校黨部的一切負責者自都屬於史派嫡系，大多數是官氣熏天的；東大附設的軍事班負責人名叫馬斯洛夫，一個最適於在宮廷舞會上周旋於貴婦們之間的軍人，絲毫沒有革命家氣息，對中國革命更是一竅不通，但架子卻是十足的，紀律要求很苛，對功課一味敷衍。課程大約為了要速成之故，定得非常簡陋粗淺，再經過翻譯們的七折八扣，以致學生們聽起來極其不滿意。學生中不少是學過軍事的，有的幹過軍隊工作，如今不遠萬里而來，卻聽些莫名其妙的ABC，於是氣憤，甚至感覺到侮辱。他們要求改良課程，第一個出來阻止的是那些翻譯。這些紅色翻譯，和當年上海以及今日香港的白色翻譯一樣，或多或少帶有官家氣的。他們最討厭「生事」，把一切自下發生的請他們轉言的要求目為「搗亂」。他們想自行解決，解決不了，便按照了他們的想法，將群眾的意見轉給負責的俄國同志。中俄二官方的看法當然是一致的，他們拒絕了學生們的要求，鬥爭便爆發了。軍事班的學生和政治班的學生聯合起來，反對「旅莫支部殘餘」（因為翻譯們十九屬於這一集團）與馬斯洛夫。事情鬧到了學校的最高當局，校長休面次基給了代表們一通官話。學生們氣極了，開了全體大會，推出代表去見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耶洛斯拉夫斯基，也是毫無結果。最後軍事班學生竟列隊遊行，到共產國際去請願。此種請願遊行辦法，在中國很流行，但在蘇聯，至少從史大林一系掌權以來，那是絕不允許的。這事情於是弄得相當嚴重了。威嚇的流言傳開來，說主謀者可能要受嚴厲處罰；不過終於並未見有任何人受罰，這是因為史大林官僚中另一個派系，正想來利用這次鬥爭，因之來「援助」它了。

那時候，中國黨由瞿秋白擔任總書記，廣州公社的暴動早已失敗，共產國際正要舉行第九次擴大的執委會會議，黨派了向忠發和李震瀛二人前來參加。這二人，尤其是向忠發，立即被牽涉到莫斯科學生的鬥爭中去了。向忠發是一個工人領袖，揚子江上的撐船工人出身，曾任武漢總工會委員長。在中國的工人運動史上，其地位與南方的蘇兆徵相等。他為人能幹，爽直，但頭腦稍嫌單純些。他那次被選為出席國際會議的首席代表，一個重要理由，乃因當時人們正把中國革命的失敗歸咎於中國黨的知識分子領導，所以特別抬他出來。向忠發和旅莫支部人物毫無淵源，在我們這群新來的學生中卻有許多熟人，所以一經接觸，他個人就完全同情了學生方面。不過單單代表團同情並不能決定我們勝利；鬥爭之所以迅速獲得解決，又因為有一個勢力給向忠發撐腰之故。

這個勢力便是孫大校長後來又兼共產國際東方部長米夫；而作為此人助手的中國人，則是後來大有名的王明（即陳紹禹）。米夫是聯共黨中新起一輩的官僚，以研究史大林的《列寧主義》出名，因此得邀聖眷，在孫大講授《列寧主義問題》；陳紹禹本是武漢的一個中學生，在莫斯科加入青年團，小聰敏，善於趨奉。當拉狄克作孫大校長時代，他早就看出米夫當紅的前途。他對其他科目不甚關心，就一味揣摩米夫所講的史大林的《列寧主義》，因此見知於後者。1927年春天，米夫曾一度奉派赴華，陳紹禹被選為翻譯兼隨員。在武漢，這位國際代表竟曾將自己的愛徒推薦給中共中央，希望能讓王明來主持宣傳。當時的中共書記陳獨秀當然不買他的賬，分派陳紹禹在宣傳部實習。陳不得意，乃於米夫起程回國時，又跟着屁股重去了莫斯科。在孫大的反對反對派鬥爭中，米王二人始終是合作無間的兩搭擋。後來米夫由教員而校長，由校長而部長，王明自然也如影隨形，步步高

升。他和自己周圍的一小群朋友，牢牢地控制了孫大的黨部，成為旅莫支部以外的旅莫支部。

當我們正在東大反對「旅莫支部殘餘」的時候，米夫與陳紹禹的一個新的野心被鼓舞起來了，那就是：統一中國同志的學習，作為統一領導中國革命的第一步。他們希望把東大的六七百個中國人從休面次基、馬斯洛夫以及「旅莫支部殘餘」的影響之下奪取過來。所以他們自始「同情」了我們的鬥爭。中國出席國際執委會的代表團一到，他們便找到了實現其「同情」的門路。透過代表團作為代表團自己的主張，提出解決東大風潮的辦法：1、「旅莫支部殘餘」全部遣送回國，讓他們到實際工作中去改正錯誤；2、東大學生全部歸併到孫大；3、軍事班結束（事實上業已超過了六個月的原定期限），其中多數回國，一部分進孫大，另一小部分派入蘇聯的正規軍事學校深造。這些辦法實現了，我們的鬥爭是「勝利」了；可是很快就發現，真正勝利的不是我們，而是米夫與陳紹禹這個集團。從此對中國革命者的訓練工作可由他們一手包辦了。他們的計劃是遠大的，從第一步的成功更走向第二步去。向忠發在開完第九次執委會後一直留在莫斯科，接受米夫對他的「訓練」。半年後，中國共產黨在蘇聯境內召集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他們便把瞿秋白打下來，將向忠發捧成總書記。如此，米夫和王明奪取中國共產黨整個領導的工作就奠定了基礎。

不過我現在不想談這些事，我要談的是那次反「旅莫支部」勝利前後，中國留俄學生中的分化和動態，尤其要談談我自己在那個時期思想上的變化。

在反「殘餘」鬥爭中，我不是中立的，但亦非積極。我不喜歡「殘餘」們的作風，他們閉塞，小家氣，上諂下驕，不注重研究，只叫人

背誦上級「文件」這些行徑，我都無法忍受。然因那時我逐漸看到了反對派的秘密文件，更清楚了真正有關中蘇革命命運的是哪些問題。所以對於同學們之集中力氣來打擊一小撮「殘餘」分子的不良作風，忽視了那些真正值得鬥爭的大問題，覺得有點無聊。有一次，我被推為三名代表之一，前去謁見監察委員會主席耶洛斯拉夫斯基，在談話中，一位代表竭力撇清我們和反對派的關係，為自己的反托事業表了一番功，以此來博取聯共最高當局對反「殘餘」鬥爭的同情，我聽了心裏大生反感。此後我就更不積極了，利用一切時間來學好俄文，拼命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並儘量閱讀蘇聯反對派的作品。這些作品是由我的老朋友范錦標供給的。他原是我在杭州學生會中舊相識，後來在廣州又遇見他。那時我想入軍隊而未果，他卻終於當了團黨代表，一直轉戰至浙江。師長嚴重被蔣介石免職後，他也離開了軍隊，回到他故鄉台州一帶去組織農民。他後我一個月來到莫斯科，被撥入孫大學習，卻先我而與該校秘密的反對派組織發生了關係。

我最早讀到的一個文件是齊諾維也夫的〈不得已的答覆〉，然後是托洛次基的《反史大林提綱》，以及反對派的《政綱》。這些個文件以其全部力量吸引了我，不但因為它那無堅不摧的邏輯的力，也因為它那鋒利精彩的文章的美；至於論斷和警告之一一為歷史事實所證明，特別關於中國革命部分，那是太顯然了，任誰看了都要驚歎和贊成的。齊諾維也夫的文章雖然沒有托洛次基的一貫而有力，但當時也深深地感動了我。看了這幾個文件，我心中雪亮了，二三年來悶積於胸的、關於中國黨領導中國革命的一些不可解的策略上的疑問，這時就全部清楚了：原來在根本上與重要的方針上它都受命於史大林一系的，決非陳獨秀個人的錯誤；這些錯誤原來並非沒有人見到，因而並非不可能預防的。聯共中的反對派，特別是托洛次基，差不多在所有

的問題上，都曾預早而及時地提出過警告，提出了不同主張。只因史大林——布哈林們固執了自己的錯誤，排拒、壓制並打擊了反對派的批評，所以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才會一個錯誤接着一個錯誤，終於完全斷送了它。

關於蘇聯和英國的情形，這時我已有了基本知識，所以讀了那些個文件後，我也完全同意了反對派在英俄委員會和蘇聯經濟建設上的立場。

從此我成為「布爾雪維克——列寧派」（當時反對派的名稱）了，最初在思想上，不久又在組織上。那時候，東方大學的第二學期將近結束，風潮業已解決，我們全體將被歸併到孫大去。

注釋

1. 據我所知，羅漢是北伐時第四軍的政治部主任，革命失敗後才去莫斯科。今說羅漢是何應欽的黨代表，待考。羅漢如果是里昂大學事件時遭送回國的，則他在法國未曾加入組織。——校者注

五、莫斯科生活的第二年

1928年夏季，校方決定我們進野營，受兩個月的軍事訓練；在檢查身體時，我卻被檢落了，認為心肺都不適於過「戰地」生活，於是被改送到一個休養所去。休養所離莫斯科約有一小時火車行程，位於瀕河的一列小丘上，風景非常優美。在這裏，我和俄國的工人群眾開始有了來往，對四周圍的農村也有了相當認識。在這裏，我最初接觸到了孫中山大學裏學生中的派系（亦即後來影響於中國黨的派系），這是現在所要談的。這時候的休養，並不分別東大和孫大，凡二校中不適於軍訓，或無需軍訓的人，都先到這裏來了。等到野營期滿，莫斯科的全體中國學生就都進了休養所（大部分住在我所住的「賴可夫休養所」，小部分住另一休養所，那名字我已忘記了。），這是一種無拘無束的生活，每天吃五餐，睡兩覺；晚上有時聽聽音樂，其餘的時間便是游水、划艇、打球、旅行，或者談情說愛。但這樣的生活僅僅是表面的，暗地裏，卻有一種非常緊張的政治活動在進行。這時候無論中國或蘇聯的共產主義運動，都處在緊要的變換關頭。是年2月間，共產國際召開了第九次全體執委會會議。7月間，中國共產黨的第六次大會舉行於莫斯科。當我們休養期間，共產國際正召開它的第六次世界大會。在這三次會議上，中國革命與聯共反對派問題都佔了重要地

位。因此中國的與國際的共產主義運動，此時正進行着大規模的分化。不過此時的分化，特別在中國人中，並非嚴格地按照了政治意見的；從個人和派系利益出發的鬥爭，在那時似乎還佔了上風。

我說過，米夫陳紹禹集團利用了東大的鬥爭，逐走了「旅莫支部殘餘」，把中國人的訓練工作集中在他們手中了。我又說過，這個集團看上了中共派來出席國際會議的代表向忠發。企圖以此來掌握整個中國黨的領導。為了準備這個鬥爭，陳紹禹們在孫大裏先就進行一次預演，發動了所謂反「江浙同鄉會」的鬥爭。本來在中國共產黨的早期幹部中，因為歷史人物淵源和活動地點關係，大抵以如下四個地域的人較多：江浙人，安徽人，湖南人，廣東人。共產主義者當然不講鄉誼，但無形中，同一地區出生，尤其是在同一地區共同工作過的人，生活上總接近得比較密切些。這情形我想不但當時有，今天也有；不但中國如此，外國共產黨中亦然。此種依地域分合情形自是落後，但若思想水平提高，在政治生活緊張的條件中，這種關係是不攻自破的；否則，為反對地方觀念而反對地方觀念，那不但不會收效，而且會加強此種落後關係。不幸發生於當時孫大中的所謂反「江浙同鄉會」的鬥爭，情形是屬於後者而非前者。在孫大初辦時，派來的學生中有不少上海大學的學生和職教員，他們大多是江浙人，再加上從上海和無錫等地派來的工人，江浙人在學生中就佔了相當大的比例。這些人中較為出名的，有董亦湘、顧毅宜等。他們在初期的學校黨部中，具有相當勢力。反對者為了方便和易於煽動起見，便給這班人一頂帽子，名之曰「江浙同鄉會」。其實，根本沒有，也不能有這種組織的。而事實上，被指為「江浙同鄉會」的不全是江浙人，而圍繞在陳紹禹周圍的反對者中，卻有不少江浙人，例如陳的大將秦邦憲（博古）是無錫人，他們手下的一些群眾也有不少是江蘇籍的工人，至於像張聞天，

沈澤民，沈志遠，吳黎平，竺廷璋等翻譯，被攻擊為江浙系（因為他們都是江浙人），卻與董、顧等所謂「同鄉會」頭子根本搞不到一起。

當我們被併入孫大的時候，「江浙同鄉會」早已被打倒了，此時執黨大權的是陳紹禹，王稼穡，陳源道等人的所謂「安徽系」。不過帶有迫害性的「江浙同鄉會」這個名字，仍舊像個鬼影似的被時常指責着，不時流傳於人們的口上，有時還可以聽到被引用來攻擊某一個特定的人。這情形我當初不大明白，人們為什麼要打這個並不存在的鬼；後來才逐漸弄清楚了；原來這是陳紹禹們的陰謀，目的在於打擊瞿秋白。他們企圖把瞿秋白描寫為「同鄉會」的最高領導者。

在休養所裏，我最初接觸到的孫大同學是那些受了打擊的所謂「江浙系」。這不是為了「同鄉」之故，而是因為他們是在野者；東大學生在當朝的陳紹禹們看來是異己者，被深深地猜忌着的，而在野者們對我們卻沒有任何顧慮。我和「江浙系」的頭子們有的是國內舊相識，有的是新交，比較最接近的是董亦湘。他做過上海大學教員，學問很好，人也易親近，和瞿秋白是老友。從他們那裏，我得知了孫大內部微妙的關係。對於囂張跋扈，趾高氣揚，實際上空無所有，在國內未曾一日參加革命，只以捧上了共產國際東方部官僚的大腿而雄踞黨權的陳紹禹和王稼穡們，我是不須「同鄉們」的蠱惑就起了無上反感的。不過此時我畢竟已不能憑感情來判斷政治問題了。我自己有了立場，因此在「江浙系」和「安徽系」的鬥爭中，我首先也要來查明政治思想上的歧見。可是一談到這上面，卻使我非常失望，原來「同鄉們」（可能是為了自衛之故吧）對於反對派的態度，如果並不比「安徽系」更敵視，至少也是同樣地不可調和，董亦湘們在私下的談話中，雖然承認中國革命失敗，史大林布哈林領導的共產國際路線要負若干責任，但他們卻擁護國際的基本立場。認為在主要的政策上，譬如加

入國民黨，造成武漢的「革命中心」等等，都是合乎「列寧主義的」。在中國社會的性質問題上，他們雖不完全同意史大林們的見解，傾向於承認「資本主義關係佔統治地位」說，但同時堅決反對「無產階級專政」，認為未來中國革命勝利後的唯一可能政權，乃是「工農民主專政」。對於當前中國革命局勢的估計，他們也是全心擁護第九次國際全會決議的，甚至比陳紹禹系擁護得更堅決。

說到這裏，我得把那時成為中國革命問題的爭論意見約略提一提。歸納起來，它們可以分為三類：（1）革命的失敗原因和教訓；（2）現階段的局勢與應取策略；（3）未來革命的性質問題。對這三個問題的史大林——布哈林意見，分別表現於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九次全會（1928年2月）的決議，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大會（1928年7月）的決議，以及共產國際第六次世界大會（1928年7月至9月）的決議中。九次全會召開於廣州暴動失敗之後，充滿了極左派的盲動精神，它根本不承認革命失敗，提出了有名的所謂「處於兩個浪潮之間」的公式，在行動上繼續了「八七會議」以來的暴動路線。中共六大會勉強承認了革命失敗，而革命失敗原因除了一切諉過於「機會主義的陳獨秀」之外，只特別提出了「帝國主義勢力的強大」（這無異說，帝國主義勢力沒有改變之前，革命是不可能的）。對於反對派所曾指出的真正原因（對殖民地資產階級性質的認識錯誤，不應加入國民黨，應和農民大眾及城市貧民聯盟來代替和「小資產階級」政客的同盟，錯誤地了解了和應用了蘇維埃等），大會完全不提，或根本加以歪曲或斥責。對當前局勢估計，六大在實質上仍舊沿襲了九次全會的公式，只是文字上把「浪潮」改成「高潮」罷了。所以它雖然斥責盲動主義，而自己定下的方針也還是武裝暴動路線。不錯，它制定了一個民主綱領，但它根本沒有一個總括民主要求的政治口號，因為它根本否定了國民會議的主張。關於革命的性質，它依照了布爾雪維克的舊程式，從革命的民主

性的任務，推定了未來政權的「工農民主專政」形式，將革命的社會主義性推移到渺茫的將來。

反對派對於上述諸問題的立場，關於過去的，已確定地寫明在自1925年至27年的各種文件中；當前和未來的，已表明在托洛次基和流放地諸同志（特別和潑雷奧勃來順斯基）的通信上，那時更確定地歸納在對共產國際綱領草案的批評上。那時除了國民會議這個總口號尚未提出（此口號是在1928年10月提出的，見托洛次基作的〈六大以後的中國革命問題〉）外，所有的立場已經確定了。用最簡單的話來歸納起來，其立場便是：中國革命從1927年夏秋之間開始就已經確定地失敗了，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史大林——布哈林們的機會主義政策；現在中國共產主義者必須認識這個新的局勢，研究過去，確定未來。這時候如果閉目不認失敗，將失敗形容為「革命向更高階段的發展」，那只是以冒險主義來補充機會主義，結果將徒然加深革命失敗的程度，浪費最寶貴的革命力量。托洛次基用如下的話來總括當時的處境與我們的任務，他說：「中國正處在一個退潮時期，因而我們是在黨底深研理論與自己批評與教育時期，在此時期中，我們要在工人運動底各方面建立並鞏固起支點，建立農村支部，領導並統一工人貧農各地底零碎的、起初防禦的、然後進攻的戰鬥。」（見《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關於未來革命的社會內容，他指出：「將被迫於一開始時就堅決地動搖與取消城市及鄉村中資產階級的財產」，「尚未解決的民主任務，將由無產階級專政來完成。」

在兩條路線中，「同鄉會」諸領袖的立場可說是居中偏右的。關於革命失敗的責任，他們認為史大林雖不能脫盡干係，而主要部分卻應由陳獨秀去負；關於當前局勢，他們也勉強承認革命已經失敗，但竭力附和着官方的所謂「反取消主義」鬥爭；關於未來，那他們更是堅

決地以「列寧主義者」自居，認為不經過工農民主專政，中國的無產階級專政就絕對談不上。

我那時在這三類問題上都已接受了反對派的意見，和「同鄉」們自然談不到一起；不過經過他們，卻接觸到了原在他們影響之下的一群上海工人。這些人，以曾在無錫紗廠裏做過工的安福為首，在未到休養所來之前，就已經是反對派或準反對派了，他們原很信從董亦湘們，因之被陳紹禹等視為「江浙同鄉會」的群眾。在校內鬥爭中，他們站在「同鄉會」方面，鬥爭失敗後，這群人非常消極。頭腦比較簡單的認為中國革命已經無望了，因為它被卑鄙無恥的陳紹禹們所操縱；另一些，比較深沉而能思想的，則經歷了一度苦悶彷徨之後，卻把爭持的問題提高了：從一校之內的，牽涉於小派系的鬥爭，移轉到正在蘇聯和整個國際中所進行的大鬥爭上去，即史大林與托洛次基之爭上去。這情形和我們在東大所經歷的完全一樣；稍稍不同的只是我們乃在「勝利」之後幻滅，他們則是失敗以後的追求罷了。

1927年冬天，區芳等十餘個出名的反對派被開除黨籍，遣送回國。只有兩個反對派：陳琪和聞岳，被開除後卻不准回國。他們留在學校裏，等待處分，孤立於一切人之外。沒有人敢和他們談天，他們也不和任何人來往。從早到晚，那二人只是危坐在圖書館裏，讀着厚厚的俄文書。「忠實分子」（即陳紹禹系的史大林主義者）從來不注意他們的存在，而大多數無所屬的同學們，則以稀奇的眼光看待他們，好像是博物館裏名為「托派」的二件古老標本。當我尚未與托派的秘密組織發生聯繫，偶爾到孫大去尋訪朋友，看到那二人時，也懷有這種感想的。總以為除了那兩個標本之外，再沒有什麼托派了。這些人已被徹底解決。其實，事情不是這樣，原來隱藏的托派並不太少。在那時的教員和學生中都還有的是。

安福等人便是受了隱藏托派的影響，在 1928 年暑假以前，就早已變成托派了，我的老朋友范錦標之走向托派，情形也是如此。

休養所生活的後半期，政治思想生活非常活躍。安福等人從野營裏出來。我和他們密切地生活在一起。反對派的主要文件，譯成中文的，用精細的字體抄寫在小小日記本上（其中有些我已經讀過，有的則未曾前見），謹慎而廣泛地在中國人中傳觀，產生了迅速的影響。那時的東大同學（政治班與軍事班合共尚有一兩百人，因為大批學軍事的已首途歸國，或派入正式的軍事學校了。）在反對派文件的攻勢之前，幾乎是毫無抗拒。這情形在今天看來似不可解，因那時離反對派的所謂「解決」已半年有餘，反對派分子悉數被逐出黨，且依刑法第五十八條受了處分，這些人或被流放，或被監禁，表面上看彷彿已根本消滅了。而且齊諾維也夫與加明尼夫業已悔過投降，《真理報》上每天登載着反對派分子自辱與悔過的聲明，表示了反對派的精神也解體了。可是莫斯科的中國共產主義者卻於此時整批整批地轉向反對派，以無比的熱忱來偷讀那些被宣佈為非法的文件！若把他們將近一年前剛來蘇聯時候的情形比較一下，那末事情會更顯得有趣的。我們都不是以史大林主義者的資格來到莫斯科的，但憑了微弱的一點先入之見，我們都擁史反托。在十五次黨大會的先期討論中，雖然曾經引起我們心中若干疑惑，但極少人曾想真正廓清這些疑惑，更不想站在反對派的論據（由官方文件中透露出來的）上，去弄清楚這些疑惑。因為在最大多數的中國同志心中，這樣做便將是對黨，因而是對革命的不忠；因為我們首先堅執了一個大前提：反對派是有害於黨和革命的，即使還不是反革命。我們在有意無意中，把反對派看成為有毒的、危險的、招惹不得的。在校內鬥爭時，雙方都不曾拿這頂帽子來互扣，但在言論和行動中，大家都小心地遠避着那個嫌疑，或者故意

在反托鬥爭上顯示一下加倍的積極。這樣做不是從策略的考慮出發，而是真誠地，想藉此表示出自己是好的革命者。在反對派問題的討論和表決上，東大的中國同志全體一致地投了史大林的票，主要並非由於壓力，卻是由於被欺蒙了的真心。

可是在 1928 年夏秋之間，休養所中中國同志對於那早被擊敗和「消滅了」的反對派，有了恰恰相反的態度。在思想上去接受它之前，人們先就有了感情上的接近。它不再像是有毒的或招惹不得，而是被視作一群受屈的聖者，不管怎麼都值得同情的，因而具有無上吸引力的了。這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最初我總是拿校內鬥爭後的幻滅來解釋，其實非常不夠。1928 年春天開始，莫斯科中國共產主義者成群地趨向於反對派，主要原因乃在於中國和蘇聯形勢，均以可驚的速度證實了反對派的主張。這些主張，人們雖然是從史大林派加以漫畫化的傳達（指責）中看到的，卻仍從事變的發展中反映其正確。在中國，所謂「革命非但不曾失敗，而且走上了更高階段」的說法，已被秋收暴動及廣州暴動證明為最悲慘的估計，最可痛的一個笑話了。在蘇聯，據說要「在農村裏發動內戰，藉以破壞工農聯盟」的反對派雖被肅清，而「工農聯盟」的情形卻日見其惡劣了：餐桌上出現了愈來愈多的黑麪包，對糧食實行了「緊急辦法」，購買食物要憑票券，後來甚至連水果都更加難買了。富農們一見托洛次基倒台就開始進攻，史大林們被迫實行了狼狽的反擊。這些現象，都是在我們的眼前親切地上演着的。看了這些結果，回想起數月前中央和反對派雙方的言論，即使是頂頂懶於思想的人，此時也不得不有些省悟：原來反對派的警告是對的，他們的立場不是荒唐的。這樣的心理變化在俄國共產主義者中當然發生得更快更強。據我事後得知，在 1928 年中，儘管較出名的反對派的領袖不斷悔過，對史大林投降，但是一般黨員，特別是青年

一輩的工人黨員，卻是成群成批地集合到走入地下的反對派組織周圍去。那時莫斯科中國共產主義者之群趨反對派，原不過是這個總的過程的部分表現罷了。

秋天，學期開始，我們一起回到了孫中山大學。由東大轉來的學生中，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已經是托洛次基主義者了。因為人數多，不得不認真考慮到組織問題。大概在9、10月間吧，某一星期日，有十幾個中國學生分批出發，攜帶了食物，坐電車到了終點，再步行到莫斯科郊外去，舉行了一次遠足野餐會。人們在一座大森林裏坐下來，吃着，唱着。當遊人稀少時，人們就嚴肅地談起話來，討論了莫斯科中國反對派的組織問題。結果，這個「積極分子」會議上推舉了三個人出來負責。那三人是范錦標、安福和我^[1]。出席那次會議的是什麼人，現在我已經無法全記得了。總之，其中沒有羅漢，因為他在未去野營之前就動身回國的。我記得最分明的是季達才，這個非常值得懷念的同志，他在大革命時，曾任浙江省總工會的主席，為人外粗內精，忠誠勇敢，深得杭州工人的信仰，在理論的學習中也是極其出色的。還有一位紗廠工人出身的卞福臨給我的印象也很深。他不大愛說話，想問題極切實，有所言時，總是扼要精當的。可惜這兩位最可寶貴的工人革命者，後來都沒有機會回國，送命在史大林的監獄裏了。

三人委員會成立之後，反對派影響更是穩步展開了。在由東大轉過來的舊同學中，這個秘密組織簡直是公開的。不管是否已經發生組織關係，同學們聚居一室時，總是毫不隱飾地談論着反對派的文件。這時候，我們剛剛接到了托洛次基對共產國際綱領草案的批評，那是用打字機打在複寫紙上，在聯共黨員中秘密地，但是廣泛地傳佈着。因為中國同志中大多數不能閱讀原作，就由我將它譯成中文。這工作

我回到東大的圖書館裏去做。那裏沒有中國人，外國朋友則誰都不認識中文。我把打字紙的資料夾在厚厚的《資本論》裏，就可以放膽地書寫中文。圖書館的外國人不會懷疑我，我們都很面熟；中國人雖然已不在東大讀書，但我以此地環境較靜的理由來解釋給館裏的老太太聽，她反而十分歡迎我的來到了。在那裏，我翻譯了文件中《帝國主義時代無產階級革命戰略》的大半章。後來，有一件事情使我無法再利用那環境了。北京大學教近代史的陳翰笙那時正在莫斯科，時時跑到這個圖書館去看書寫作。我怕被發現秘密，只好不再去。

我們那時跟俄國反對派發生聯繫，經過一個名叫波略可夫的年輕人，他曾經在拉狄克時代的孫大教過書，鬥爭時被開除出黨，失了業，此時正在莫斯科近郊一個小工廠裏做工。他知道了我工作上的困難，便邀我到他的家裏去。他的家離東大圖書館不遠，在一所俄國舊式的公寓中佔了一個小房間。他是一年多前才結了婚的，太太年輕、漂亮，還在莫斯科大學上學。不久才生了一個小女孩，由丈母娘照顧着。我頭一天去，波太太正吃完了早餐，在準備一瓶奶水。她歡迎我，同時笑着說，我來得正好，今天她媽媽有事不能來，讓我兼顧兼顧她的娃娃。胖娃娃甜蜜地正睡着在搖籃裏，她說，孩子醒來的時候，如果哭吵，請我餵點奶，「她很乖的，不會打擾您的工作。」交代完畢，她又給我斟了茶，遞給我一疊三明治，拉開了讓我坐着工作的椅子，夫妻倆就出去了。關上了門，我開始來翻譯托洛次基的《批判》，中間大概餵了幾次奶，毛手毛腳地給孩子換了兩次尿片，一直愉快地工作到這位賢明而美麗的主婦回來。

這樣，大約工作了一二個星期。

一天早晨，我拿了東西，走出學校的門，正取道向日常工作的地方去，忽然有一個女子聲音從後面叫住了我。我回過頭去，發現了一

個用大肩披包住了頭髮的婦人，我一怔，忽遽間不認識這個人；待走近之後，才認出是波太太。我伸出手去，她卻不同我握，示意我走向街道花園。她今天的神色大異，沒有了歡笑，更不見了那股頑皮氣，眼睛是哭過的，一臉子的哀愁。我知道事情不妙了。在街道花園的僻靜處，她告訴我波略可夫被捕了，因為他領導了廠裏的罷工。她又說她再不能回到大學了，她已給開除了團籍，失去了學籍。我問她打算怎麼辦，她說她不曉得怎麼辦，今天下午她就要帶着孩子，跟她媽媽回鄉下，她的故鄉在伏爾加河邊上。我想不出話說，不曉得怎樣安慰她，只好相對無言。最後，她拿出一本書來，交還給我，那是我留在她家裏的一本《列寧全集》，上面寫着我的中文名字。她苦笑了一下，說：「險得很，格柏烏來抄家的時候沒有發現這個，要不然，你也完了。」我接了書，更不知道用什麼話來感謝這位好心腸的年輕母親。她當然不敢久耽留，先伸出手來，我們緊緊地握了一會，然後她把大肩披覆蓋到前額上，互道了「好運」，走了。這是我第一次親自遇見的一個遭史大林特務迫害的革命家庭。這情景一直深刻地留在我心底裏，直到目前。此後我不再得到關於這三個屬於祖孫三代的女人的任何消息。但願她們真能獲得「好運」的眷顧。

波略可夫那時是莫斯科反對派秘密委員會的一員，與他同時被捕的有整個委員會，牽連的人相當多。不過我們完全無事，可見這些人被捕後是始終堅決的，沒有作什麼「坦白」。

我這一來又沒有地方可以工作了，而那時需要翻譯的文件積着很多。反對派的諸領袖散處在從中亞細亞起，橫過西伯利亞直達到北冰洋邊的各個流放地。那時史大林還不敢禁止他們作文字活動，這些老革命家彷彿又回到革命以前的生活了：在靠近中國新疆的小鎮上，在西伯利亞簡陋的旅館裏，在死海之濱的阿斯特拉罕的陋屋中，他們分

別從事於緊張的理論研究和國際政治的分析。他們把思索所得互相傳遞着，交換着。這時討論的問題主要仍舊是中國革命，其次是蘇聯經濟政策上史大林的開始「左傾」。在這兩個問題上，托洛次基與拉可夫斯基站在一邊，拉狄克與潑雷奧勃來順斯基站在另一邊，發生了尖銳的分歧，最後是後二人對史大林投降了。關於這些討論的來往書信，都是由秘密的反對派領導組織用打字機打成小冊子，廣泛地流傳於群眾中。我必須把它們翻譯出來，但工作地方實在難找，因為我們這些中國人，除了黨的關係之外，並無任何社會關係，根本不能在校外覓到一個房間。可是不久，我們卻出乎意外地得到了一個好地方。在談到這個地方之前，先得談談別的事情。

中國共產黨在莫斯科開過了六次大會以後，有一些代表留下來，參加共產國際的第六次世界大會。代表中包括了瞿秋白，周恩來，張國燾，王若飛，關向應，羅章龍等人。瞿秋白此時已經不是總書記，他的地位被向忠發所代替了；但因他俄文好，理論修養高，所以在共產國際大會上他仍舊是中國代表團的主要發言人。陳紹禹在代表團中幹點技術工作，可是在事實上，他和米夫這個直屬於史大林的小集團，已開始起着作用，瞿秋白時常感受到擠迫，另一些代表也頗懷不滿。米、陳小集團已經捧出了向忠發，這時候，顯然又想對周恩來做工作。他們覺得這個能幹出色的行政家，可以置在他們的「理論」指導之下。周恩來那時留起了長達數寸的大鬍子，在中國學生中間最為活躍；陳紹禹們對他的奉迎，比之於對瞿秋白是不可比擬的，比張國燾當然更不同了。這三人都向中國學生作過報告，而學校黨部為他們佈置的會場情形，其隆重程度，差別得十分顯然。

托洛次基向共產國際六次大會提出的《綱領批判》，主席團決定不予印發，後來大概受了某些代表的壓力，終於決定這文件讓每一代

表團中一兩個主要代表閱讀，讀後把原稿交還，不准帶出國外。雖然採取了這樣限制的措施，但結果正如我們所知道的，還是發生了廣大影響。幾乎所有的閱讀者都受了感動。至於讀後立即接受了托氏意見的，將文件抄副，私運出國，決定今後為此進行鬥爭的，則有美國和荷蘭等代表團。

中國代表團只有瞿秋白能讀原文，也就是說，只有他能夠看到反對派的全部意見。其他的主要團員，如周恩來和張國燾，只能從陳紹禹們的翻譯口中得悉一點。當然是斷章取義的。我和瞿秋白不熟識，那時候也沒有跟他晤談的機會。據一位與他接近的朋友說，瞿秋白讀了《綱領批判》後的最初反映並非全盤否定的。據說他認為有些意見還值得考慮。但結果，在國際大會上，他卻最堅決反對托洛次基，完全擁護史大林和布哈林的路線。這樣幹，瞿秋白是否違背着他本人的意志呢？我以為一半是，一半不是。在中共歷史上，瞿秋白雖然是武裝盲動時期的負責人，但他不但體質上是一個文弱書生，在氣質上亦非勇猛堅毅之輩。從他後來的行狀看，他是能夠在黨內部敵對者的壓力之下氣餒的。這個氣質使他在國際大會上能夠站到史、布一邊——如果他真的曾經多少同情托派的話。不過另一半，他當時之所以採取此一立場，以及他以後的一貫反托，我相信，乃更由於他自己的思想。在關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切基本問題上，瞿秋白始終屬於1917年以前的「列寧主義者」。無論由於思想和情感，他都是擁列反托的。他完全是一個「老布爾雪維克」型的中國共產主義者。他之所以會如此，我以為第一，是因為他有系統地研究了列寧的學說，卻不曾注意到因1917年十月革命的實踐而在列寧思想上所發生的修正和改變；第二，他是受了1923年以來史大林和齊諾維也夫們所一貫從事的，以「列寧主義」對抗「托洛次基主義」的思想運動的欺騙。

不過，瞿秋白畢竟是一位較有深度的革命思想家，即使陷在史大林主義的圈子裏，許多意見還是要通過他自己的思想，用他自己的話說出來。因此，他不會為史大林所喜愛，要受到米夫陳紹禹集團的打擊，會被扣上「半托洛次基主義者」的帽子。他此後幾年在黨內所受的待遇是非常難堪的，與他有關的人更受到無理的迫害，他的弟弟瞿景白，甚至在莫斯科發瘋而死。

周恩來對純理論問題向來缺少興趣，他的出人頭地在於其精明強幹、手腕高、風度好、言辭漂亮。他當然是一個革命者；但在革命黨的內部鬥爭中，為了遠大的理想，要他自願地選擇失敗者一方，卻與他的氣質不符。他是強者，永遠要站在較強的一邊；同時他是天生的輔弼而非雄主，所以時常成為最強者所欲爭取的助手。周恩來在黨內鬥爭中有「不倒翁」之稱，這和他的性格和才能，有着密切關係。陳紹禹在各方面和周恩來相比，都只好算是一個侏儒，但他有一點強於周恩來，就是他有奪取第一把交椅的野心和韌性；為達此目的，他甚至不惜應用任何手段的（包括非革命的和最卑劣的在內）。因為歸根結蒂說，陳紹禹不是革命家，而是一個富有冒險精神，工於心計，能玩無恥手腕的政客。

不過在 1928 年當中，周恩來在莫斯科之被捧（以及瞿秋白之被抑），卻有不小一部分是經過了這個侏儒，甚至還根據了這個侏儒的本身打算來進行和排演的。那時候，以陳紹禹在黨內的地位（即一無地位）說，離爭取「第一」的路程還非常之遠，但憑他和史大林直系的結託之親且密，他卻有充分理由來從事準備。以向忠發代替瞿秋白，陳紹禹的時間表上不過是將來取而自代的一個步驟。拉攏周恩來，只是一齣先期演出的隆中求賢罷了。

周恩來自然樂得受捧。他不會看得起陳紹禹，但他看重聯共和國際中穩掌大權的史大林和米夫們。在此情形下，他對於反對派的理論和政治意見，當然不會慎重考慮的。

張國燾沒有瞿秋白的學養，也沒有周恩來的才幹。因此陳紹禹們並不怕他，也不想拉他。人家簡單地冷落他，輕視他。在當時莫斯科的高級代表中，此人是非常寂寞的。有一次，我和他談過一次天，在一個姓施的翻譯的房間裏。座中無他客，各人都略略喝了幾口酒。張國燾的謹慎的口就鬆弛了一些。講了些生活上的無聊，最後他說：「列寧說，不識字的人站在政治之外，在莫斯科，不懂俄文的人站於政治之外。」言外之音，他對於陳紹禹們「紅色買辦」集團的不滿，是表示得極其露骨的。那位姓施的不安地笑了笑，我也笑笑，他似乎發覺到話說得過了分，立即把話題扯到劉伯承能做的拿手川菜上去了。

張國燾不得意，反對派同志中便有人企圖去影響他，結果卻一無成就。張國燾比之於周恩來，卻更不願將自己命運押在「失敗的真理」一邊。

然而代表團中卻真有想接近反對派的人。走得最近，曾經表示了可以接受，或至少值得考慮的，有王若飛，關向應和羅章龍。他們都曾經從我們手裏得到過托派文件，都讀了，而且有很好的反應。

談到這裏，我將接續前面中斷了的故事。我講過，自從波略可夫被捕之後，我又沒有地方可以譯文件了。這工作大約停頓了半個多月；同志們拼命尋找新的可用地點。結果找到了。而且是完全意想不到的，原來在王若飛的房裏，在一個名叫「歐羅巴」的中等旅館裏。若飛那時剛讀了俄國反對派的一些文件，非常受感動，覺得關於中國

革命方面的過去爭論，憑他切身的體驗，可以說，正確的完全屬於反對派。不過關於其他問題，例如蘇聯經濟建設、英國和德國的革命問題等等，他自認理論根底淺，國際政治的知識不夠，不能肯定地判斷誰是誰非；至於中國革命的今後問題，他並不完全同意六次大會的決定，但他也對托洛次基的反對民主專政這一點表示懷疑。在前途估計上，他在彷徨和考慮。不過即使這樣的程度，已足以使他對我們採取同情態度了。知道我正為工作地點苦惱着，他就讓我白天上他的房裏去，那時他自己是要到共產國際東方部去辦公的。我大約每天在9時以後去，他等我進了房，就拉上門，出去了。我自己帶着麪包，在房裏工作一整天。5點左右他放工回來，我立即離開。記不起在「歐羅巴」的工作時間延續了多久，日子一定不會太多，僅僅夠我譯完那個《批判》。若飛對我的幫忙有多少擔心，因為他的太太李沛澤，孫大學生，正是一個陳紹禹系的積極分子。若飛自然知道她的政治傾向，自然不願意把他對反對派的同情向太太公開。

王若飛現在是中共的烈士，當他任和談代表時，乘飛機失事而死的。我在這裏公開這段秘密，一則因為他已不在人世，這個「錯誤」決不會使他蒙受任何不利；二則因為我覺得若飛犯過這點「錯誤」，正表示出他不是一個趨炎附勢的政客，而是一個有良心有骨氣的革命者。我絕不以為這裏的「告密」會對不起逝世的故人。

在莫斯科對反對派表示了同情的王若飛，關向應和羅章龍，不久先後返國了。回到了中國，他們立即又成了出色的「唯幹主義者」，那些「不切實際的」理論的原則性爭論，不再煩擾他們的思想。配合在既有的，失敗而終還有力的機構中，他們又把全部生命力投到實際鬥爭中去。憑着他們堅韌的努力，在黨內地位也逐漸提升和鞏固。在

以後的年月，他們是不再與反對派有任何接觸了。羅章龍的命運較為不同，後來成了所謂「調和派」的領袖。「調和派」的鬥爭其實是極少原則性的；但在思想的底層，也許還可能找出若干那些領袖們在莫斯科所感受到的反對派影響吧。「調和派」被陳紹禹們用卑劣手段打敗了。蔣介石又最後幫了陳紹禹的忙，將全體領袖一網打盡。羅章龍成了幸運的漏網者。可是他並不因此找到了走向托派的路。他是消極了，並且與國民黨妥協了。

1928年冬天，莫斯科中國學生的反對派組織有了很大發展。從最高學府列寧學院起，包括各個種類的軍事學校，直到孫中山大學，我們都有了同志。在孫中山大學，若把有組織聯繫的，與未曾正式參加而思想充分同意反對派的全體計算起來，該有一百四五十人了。全部學生那時約共四百餘。托洛次基的有名文章〈第六次國際大會後的中國革命問題〉那時已傳到莫斯科，引起了非常普遍的反應，更熱烈的當然在我們中國同志中。我們並非全體一致與立即地接受了他的論點。特別是他提出的總口號：「國民會議」。那時我們的理論水準畢竟不高，對革命的戰略和策略，尤其不能靈活與具體地掌握。我們的革命理論太過抽象，太公式化。在實際鬥爭中受了慘痛的打擊，在革命的學校裏又讀了一年圖式化與表面化的布爾雪維克主義的歷史，我們自覺和不自覺地都成了無條件的「左派」。凡左的、直接行動的、「純粹社會主義」的口號和立場，很容易為我們接受；反之，「右的」，比較冷靜的，帶點「資產階級性質」的策略，不易得到我們贊同。在那個文件以前，我們覺得托洛次基的立場一貫是左的；而〈六大以後〉中的分析及其中心口號「國民會議」在我們這些狂熱的青年人看來，似乎老人忽然跳到史大林的「右邊」去了。

中共第六次大會反對將蘇維埃當作直接行動的口號，主張「宣傳蘇維埃思想」，以便為下一革命浪潮到來時行動的準備。這就是說，「六大」使中共在事實上完全沒有中心政治口號，而名義上則仍以蘇維埃口號來起這個作用。這種辦法是混亂而危險的，其根源在於對中國當時反革命勝利後的局勢沒有清醒與正確的認識，結果便是替未來長時間的盲動政策立下了政治和思想上的前提。在事後，特別在西安事變以後，回想起托洛次基的國民會議口號來，我深深地認識到老人思想的敏銳，以及預見的正確。托洛次基關於中國革命的意見，可以說無一不表示出他驚人的天才的，可是在所有的意見中，最勇敢、最靈活、最不可及的一點，則我覺得是他在 1928 年秋季的提出國民會議口號。有時我想，如果中共那時能接納這個口號，能依照托洛次基所規定的方式和精神來提出它，宣傳它，並為之進行最有力的鬥爭；如果並非在七年之後，即在 1935 年秋才用可恥的、對蔣介石投降的方式來拿取這個口號，那末，中國至少會少損失成千成萬最優秀的共產主義者的頭顱，蔣介石的反革命統治多半會早結束幾年，日本軍閥可能不敢如此冒險，二十餘年來中國和亞洲的局勢都可能不同的吧。

不過這只是事後的想法。在當時，別說史大林主義者們，便是在根本問題上都已經接受了托洛次基立場的人，也認為這個口號提得很不好。在莫斯科的托派中，沒有一個人不承認當時中國反革命勝利已是事實，其統治將有或長或短的一時期穩定，但如何從這個正確的判斷中，得出正確的策略，我們卻都不曾好好地想過。在這樣的局勢中，揮動蘇維埃的旗幟來進行直接暴動，我們知道是錯的，此時甚至史大林和瞿秋白都知道是錯的了。他們主張暫時把蘇維埃收起來，作為「宣傳口號」；至於用什麼「實際口號」，藉以概括反革命雖已勝利

而民主任務不曾解決，革命勢力依然存在，卻一時受了嚴重挫折——這一整個時局的特點？則史大林與瞿秋白沒有辦法，我們這些托洛次基主義者也沒有辦法。托洛次基給我們提出辦法來了，以國民會議為中心的一個完整的革命民主政綱。這當然是對症良藥。但史大林瞿秋白們卻斥之為「取消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傾向」，而我們也就在自己的幼稚成見與敵人的無知攻擊之前動搖了，不敢加以接受。

托洛次基的「國民會議」口號給了莫斯科托派以很大煩惱，釀成了思想上的極度混亂，這混亂後來一直還帶回到中國，成為中國反對派運動中拖延得最長，爭論得最多的一個分歧意見。

在表面，我們不久都同意了老人〈六大以後〉文章中的意見；不過很顯然，各人是依各人自己的了解程度、自己的氣質、自己的傾向去接受它的。最早接受這口號的是劉仁靜，他是列寧學院裏唯一的中國學生，是中國的早期共產主義者之一，曾任青年團書記。因為資格老，知道的東西較多，人也很聰敏，所以在青年反對派中有相當聲望。不過他關於托洛次基這個口號的解釋，卻使我們所有的人大為吃驚。他特別着重中國的議會制度前途。他強調中國資產階級的穩定，強調議會制的優點，以及爭取議會制的必要。在他的信念中，議會制乃是中國當時直後一個時期的必然發展，中國新的革命一定要在那一發展之後，在「更高的歷史階段」上提出來。

在莫斯科當時大多數的反對派看來，這個看法是確實的「取消主義」。有一部分人，甚至還被劉仁靜的極右的解釋嚇退了的。在最後，經過了相當討論，多數人接受這個口號是由於如下的解釋，即：「國民會議口號的主要作用，是為的要在反革命時期重聚與團結革命力量，進行民主鬥爭，反對蔣介石的軍事獨裁，藉以走上新的革命」。這個解

釋是左的，雖然也不甚完備，但比之劉仁靜的卻較符合於托洛次基的精神。

莫斯科中國學生中的反對派繼續發展着，因國民會議口號而引起的一時困惑，不久就克服了，新的同情者幾乎是每天增加。由陳紹禹一系把持的正式的學校黨部，雖然操着學校行政的實權，同時暗地裏，陰謀進行着將來把持整個中國黨的準備；但是這個黨部是毫無生氣的，思想生活根本談不上。所行所為，有時簡直無聊之至，譬如，為了一個姓朱的，由北京女師大來的女生的三角戀愛，竟會開了幾個晚上的全校黨員大會。這種作風，引起了最大多數的同學的反感。比較深刻的、嚴肅的、善於思想的人，此時便很自然地傾向到反對派來。反對派組織絕對秘密，我們這個三人委員會只有極少數人知道，但是反對派的影響的存在，卻是任何人都感覺得到的，要看到反對派的文件也不很難。舊東大學生中，只有很少幾個沒有加入或傾向反對派，大約只有兩個人投向了陳紹禹的小集團，其中一個綽號「老寡婦」，陝西人，曾在馮玉祥隊伍裏當過軍黨代表的，此時正在反對派與陳紹禹派之間玩弄兩面手法，後來是他出賣了全莫斯科的反對派組織。

反對派（正確些說，應該是反對黨部派）此種無言的威脅，自然為陳紹禹們所覺察。黨部不得不想出辦法來應付了。所用手法是多端的。第一，成立打手團（這自然並非專門對付反對派），在「提拔工人」的名義之下，陳紹禹們捧出了幾個孔武有力，蠻不講理的工人同志來。其中有數位是從法國轉來的山東人，第一次歐戰時候派去法國的華工。他們在法國的唯一工作，就是和曾琦們的國家主義的棍徒們打架。人很忠實，可惜頭腦非常簡單，他們信任了霸佔着黨部的陳紹禹們，把其他同志，陳派的異己者，看成為「國家主義派」一類的敵人；

另一些是從上海來的，其中最出名的是一個姓李的江北工人和另一個姓王的（可惜我都忘記了他們的名字；二人的下場據說姓李的後來在瑞金被槍決，姓王的回國後就投向國民黨了）。這些人時常打架，完全是陳紹禹的「馬仔」作風。陳氏所到之處，這些人大抵形影不離，前呼後擁，趾高氣揚，叫人非常看不順眼。第二種手法是所謂「轉黨」，這是完全針對反對派的。本來，凡是中共黨員，在蘇聯就視同聯共黨員，在任何方面都不分軒輊，不受歧視的。到了這時候，陳紹禹們忽然發明了「轉黨」的辦法，即要求大家申請加入聯共，成為聯共黨員。在申請轉黨時，申請者必須在黨員大會上踏上台去，簡述自傳，並聽憑群眾批評，倘群眾無異議，即算「轉黨」成功，從此成為「頭等黨員」；此時倘有人指責，或提出反對，那就難望通過，始終成為「次等黨員」（即僅僅中共黨員），有時，甚至連原有的中國黨籍都會被剝奪的。這種手法，充分表示出陳紹禹們的買辦根性，而其用心之卑劣，更令人髮指，這是無端地進行一次甄別和「整肅」，藉將他們的不同意見者及反對派分子，清出黨去。這辦法舉行了幾次，激起了極大多數人的反對。大家用消極態度來抵制它，就是根本不申請「轉黨」，就以中共黨員的資格為已足，不稀罕多得一張黨證。結果，陳紹禹們畢竟不便提出強迫「轉黨」的主張，事情只好不了了之，陰謀暫告失敗了。不過他們想打擊異己和摧毀異己的陰謀是繼續的，尤以踏進了1929年的春季時更甚。

此時整個蘇聯的反對派正如我在前面說過，都在飛速發展。由於農村的危機加甚，史大林不得不偷取反對派的主張來應付局面，同時開始與其同盟者右派布哈林們公開決裂。一年前被宣佈為「對黨誣衊」的反對派的種種警告，這時候一一證實了，或者由史大林自己述說出來號召全黨同志警覺或與之鬥爭了。事情證明得非常快而清楚，托洛

次基是正確的。他的威望便以驚人速度恢復轉來。人們此時愈來愈願意傾聽反對派的說話，拼命尋求托洛次基的秘密文件。蘇聯黨員和群眾中此種心理上、思想上與感情上的轉變，恰恰與我們中國學生中的過程一樣。一年前隨和了史大林的，此時卻以雙倍的熱情來懷念托洛次基了。莫斯科托派的秘密組織經常被破壞，但新的領導機關跟着成立。托洛次基被流放在遼遠的阿拉木圖（接近中國新疆的中亞細亞地方），他的居處被監視，對外的交通受阻礙，但是他寫的每一篇文章，寫成後至多不出一個月，總可以傳遍於全蘇聯。同情托洛次基的人太多了，即使在史大林的特務機關裏，被命令去對付托派的，卻在暗中幫助托洛次基。權位之爭彷彿還不曾最後決定，因之連職業官僚們都覺得應該留點餘地，以便和異日重行當權的托派做個見面之禮。中國學生規定着以部分時間參加生產，他們被派往各廠實習，還有少數業已失去黨籍的（其中有反對派同志），則被送至外地工廠做工，這些人時時回到莫斯科來，告訴我們一些外埠工人的情形。從這二種人的消息中，我們知道蘇聯工人當時非常傾向托派，對政府極其不滿，此種不滿在外埠工廠中，往往會使小故釀成為罷工。

此一客觀情勢，使史大林寢食不安；他不敢將托洛次基關進監獄，當然更談不到將他殺害了。他最初利用了中央委員會的名義，要求托洛次基停止一切政治活動，卻被後者拒絕。最後，他只好將托氏放逐國外。這是 1929 年 1 月間的事。

托洛次基的被逐出國，事先進行得非常機密。我們很早獲得風聲，說史大林們對托氏的活動限制得愈發嚴了，更大更重的壓迫隨時都可能發生的；但沒有人想到會送他出國，因為即使最狂妄的想像家，也不會想到史大林能和國外的資產階級政府締結協定，使外國的憲兵和警察替他看管這位蘇聯的創造人。我們料不到史大林會有這樣

的主意，更猜不到外國的資產階級政府居然能同意替史大林做這樣的工作。可是事實竟發生了。那是當 1929 年 1 月下旬或 2 月上旬的一期《真理報》上，在最不引人注目的報屁股上，登載了一段小新聞，說托洛次基及其家人被逐出國。那段小新聞的正確措辭我已經記不起了，彷彿只提到了他從事「反蘇聯的秘密工作」的罪狀，並未明言他被送到土耳其。

這消息在反對派的同志中引起了廣泛的激動，可是蘇聯的一般民眾對此事卻彷彿很少關心，我們在任何地方，任何人群中，都不曾看見有人談到這件事。根本那段消息太不叫人注意了。但是幾天之後，卻發生了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情。那天早晨，我們從宿舍走到學校去，只見街道花園裏，路角上出賣報紙的小亭旁，人們一簇簇的擁擠着，拿着報紙，紛紛在議論。我立即買了一份來看，在第一版上用大標題登載了監察委員會主席耶洛斯拉夫斯基的一篇文章，題目是：〈托洛次基先生出國的第一步〉。文章還附印了一幅照片，那是一期倫敦《每日快報》(Daily Express)，上面登載着的托洛次基的一篇文章。耶洛斯拉夫斯基沒有告訴人家托洛次基說了些什麼，而只是大聲疾呼地說：看哪，托洛次基一出國就和大英帝國主義勾結上了，勾結了來反對我們蘇聯！叛徒的原形畢露了！

這手法是非常惡毒的。因為十多年來蘇聯和帝國主義國家間尖銳而激烈的衝突，在一般群眾中，特別在年輕人中，造成了一個成見，即以為一個革命者，不管你用什麼態度，站在什麼立場，只要你利用資產階級的報紙來說話便構成了對革命的叛變。蘇聯是由共產黨獨佔了出版的，除黨報外根本不許有其他報紙存在，非由政府出版的刊物，一律屬於反革命的，因之，人們就無法了解處在資本主義統治下的革命者的行為，他們在許多場合中，不能不利用資產階級報紙發表

文章，利用資本家的書店來出版革命的書籍，或者，通過資產階級的宣傳機構來發出自己的聲音。耶洛斯拉夫斯基與史大林利用蘇聯人對於此種情形的隔膜，於是就拿托洛次基對倫敦報紙記者發表談話的事情來打擊他。結果倒是很有影響的。不但蘇聯的一般人中因此引起了波動，便是在我們中國人的托派中，都覺得托洛次基做了一件憾事，使仇者快心。那時托洛次基還是蘇聯公民，住在君士坦丁堡的蘇聯大使館裏，他和國內的消息是很靈通的。為此他立即寫了一封〈告蘇聯工人書〉，憤怒地揭穿史大林和耶洛斯拉夫斯基們的陰謀。他控訴史大林們和資產階級的反動政府勾結在一起來迫害他，抗議他們不讓他這個蘇聯國家的主要締造者之一住在自己的國內；然後他舉了列寧當年的例子，說革命者對資產階級報紙記者發表談話，甚至發表文章，都是常事，是完全允許的。這一封信很快在俄國的工人中傳開了，發生了甚大作用。托洛次基寫那封信時候的心境當然無限悲憤，因此寫得情文並茂，感人極深。我將它譯成中文，中國同志中有人讀了甚至飲泣的。可惜這封信彷彿沒有傳到中國，中文和外國文的我不曾在國內見過，可是在我記憶中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只有後來老人悼念兒子的那篇名文，給過我同樣深的感動和印象。

驅逐托洛次基出國沒有能阻止反對派在蘇聯的繼續發展，即使用最卑劣的污蔑也未能收得預期效果。當時布哈林和史大林的爭吵已成公開秘密；布哈林寫文章批評史大林的農業政策，又和過去的對頭、目前已經投降的加明尼夫們私相聯絡；史大林便立即給了右派以行政上的打擊，將布哈林、賴可夫與托姆斯基這三巨頭從他們的重要地位（第三國際主席，人民委員會委員長，全蘇聯工會主席）上打下來。這二派互相攻訐，揭開了不少內幕，讓人們看清楚了所謂「列寧主義的、精誠團結的中央」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後來，蘇聯的群眾中流行着這

樣一個想法：托洛次基是傑出的，是大英雄，但不安分，有野心，時時搗蛋，因之，他之被踢開雖然是可惜的，但為了黨和中央的統一，為了大家能和和氣氣做事，踢開他也好。當托洛次基被驅逐出國時，《真理報》上有一篇文章（記不清是台明揚·白德內伊的打油詩呢還是別人寫的文字），就是反映了這種情緒的。【朱正按 1930年3月14日的《真理報》上刊登了台明揚·白德內伊（瞿秋白譯為季謨央·別德訥衣）唾罵托洛次基的打油詩〈沒工夫唾罵〉，瞿秋白（署名向茹）的譯文刊登在「左聯」刊物《文學月報》第一卷第三期（1932年10月）上，現在收入《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六卷。當時《真理報》上當然還發表了別人寫的唾罵托洛次基的文字。】那篇文字的大意是：「好了，我們的『英雄』走了，從此不再要什麼英雄，讓我們這些平凡的人和衷共濟地幹下去吧。」這幾句話在史大林後期的環境中是不可思議的，因為它否定了史大林的「天才」，將他位於平凡人之列。不過，在那時，這不但是一般同情托派的群眾如此想，便是史大林自己都曾不止一次地這樣說的。他當年正是用「集體領導」的法寶來打敗對托洛次基的「個人崇拜」的。

可是自從1929年春天開始，上述那種天真可笑的想法，逐漸被事實所推翻了。「平凡人」之逐走「大英雄」，卻原來為的要讓一個真正的庸人來冒充天才。這秘密在那時雖然還不能一下子就看出來，但是至少，人們在托洛次基被逐以後一兩個月，就看出了那個「精誠團結」的中央委員會，雖然已不再有「搗蛋鬼」在內，卻還是不能「和衷共濟」，甚至分歧得更無原則性，因而是更無恥的。「正統的列寧學生們」的出乖露醜（時而攻擊，時而悔過），使一般人很自然地懷念起托洛次基來。「他才是一個漢子！」這句話愈到下層愈容易聽到，尤其是經歷過革命，在托洛次基的領導下當過紅軍的人。我在蘇聯的接觸面不大，其中大多數又是黨員，但也曾不少次聽到過這種說法。

那時候，我們和被開除回國的反對派建立了聯繫。據來信說，他們已經在上海、香港和北京開始了工作。上海，我們的朋友和一家書店（新宇宙書店）有往來，準備出版些反對派的書；香港的某些朋友聽說已經進了船塢，北京的朋友則在學生中活動，他們準備出版一種刊物——《我們的話》（我記不清這刊物是否那時即已出版）。莫斯科和中國的通訊經過上海新宇宙書店，我們曾幾次將譯好的文件寄給史唐。

五六月間，有大批中國學生將被送回國，有的是被指定的，也有些自己請求的，這中間有不少反對派。於是問題發生了：1、回去怎樣工作？2、國內反對派組織應該如何？為此，我們曾經在莫斯科的炮兵學校裏開了一次人數較多的會。到會的除了三人委員會外，還有劉仁靜，以及各學校反對派的負責人。在那次會議上，我們集中議論了上面這兩個問題。結論是：1、回國後必須留在黨內，要作成最好的共產主義的革命家。因為我們認為，只有在實際革命的忠誠勇敢上獲得了同志們的信仰，才有資格來堅持正確的革命主張。為了取得繼續留在黨內的權利，我們不主張公開自己的立場。在工作中遵守紀律，服從多數；在思想的討論中，應曲折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圖糾正六大決定的錯誤，但應儘量不暴露自己反對派的面目。關於第二個問題，我們的決定是：我們必須以中國共產黨中的一派自居，我們的目的是改正黨的史大林主義的錯誤。因此我們不是要到中國去組織新黨。萬一黨的領導機關不管我們完全符合於民主集中制的工作態度，無理地為我們的主張而開除出黨，則我們應該在中國當時已有的反對派組織中工作，不應另立門戶。這二點態度，為當時到會者所一致同意，唯一例外的是劉仁靜，他說，他一回到中國就要以全力從事反對派工作，不願意浪費精力於黨的工作上；同時，他根本看不起業已回國的十幾個「毛頭小子」，所以他說，以後他是否會和他們一起工作，如何工作，一切要等他回國後看過再說。我們大家不贊成他的態度；覺得他

的對黨態度與整個反對派立場不符，而他對已回國的同志的看法，則未免太傲慢和自我中心了。幾經辯論，他表示服從多數；不過後來事實證明，他並沒有照辦。他那次是由歐洲回國的，道出土耳其，在托洛次基的家裏做了幾天客。托洛次基就在此時起草了《中國布爾雪維克（列寧派）的綱領草案》，由劉帶回中國。

當時莫斯科反對派的回國情緒是相當高漲的。我們是中國革命者，我們戰鬥的地區是中國。留在莫斯科，在學識上固然可以進修，工作卻很少可做。宣傳與說服工作完全限於中國學生，時中國學生最多時期未曾超過1,000，此時則僅四五百了，在這個數目中，屬於反對派的快要佔到三分之一。所以那時同志們普遍地覺得，我們應該早早回國，到實際革命工作中去證驗反對派的主張，為此主張去尋找力量。留在莫斯科是安全的，豐衣足食的，中國此時則正厲行着蔣介石的白色恐怖。但只有少數人，屬於陳紹禹系統的沒出息的傢伙，才會聽見回國而發抖，因此又以遣送回國來威脅他們所不喜歡的人。我們十分輕視這些人，反對派的最大多數，都希望第二學年的結束就回國去。

不過我們的要求愈明顯，黨部對此問題的看法也愈審慎。如果陳紹禹們的目的和一年半以前一樣，以把持學校為限，那末問題便很簡單，將所有不喜歡的與「不可靠的」分子悉數送回就是了。但這顯然已不是陳系的主要企圖，現在，他們是以抓取整個中國黨為目標了，所以他們又不願把異己者（包括反對派與非反對派）隨便送走，讓他們在中國的實際工作中取得地位。他們又想將這些人扣留在莫斯科，放在他們的監視之下，以便隨時可以借蘇聯的警察力量來消滅他們。因此，在那時，想回國也不是容易的，特別是在他們眼中看來有能力的、積極的，回去了不會消極或反動的人，如果與他們沒有比較親密關係，那便更難獲得准許。

說到這裏，我要談到兩件完全與我個人有關的事情了，我的身體向來不結實，咳嗽傷風之類是常事。每箇月中，大約總有一二次上學校醫院去。但我並不患有嚴重的病，我自己也未曾請求休養。可是有一天，大概在5月間吧，忽然醫務處通知我，說我可以到南俄海濱休養去。這是完全意外的。我自然樂於接受這個優待，在黑海邊上一個風景非常秀麗的休養地中住了一個星期。同住的都是外國人，尤以來自列寧格勒的黨政和工廠中的高級幹部為多。在此地休養，顯然比到莫斯科近郊的休養所去要比較難能些，也就是說，休養者的地位必然要高些。可是我怎麼能擠入他們之列呢？而且又不是在暑假中？在溫暖的南方陽光中，躺在柔軟的沙灘上，看着那些快樂地嬉戲着的男女幹部們，我時時想到這個問題。很顯然，若非學校黨部給我說過方便話，我決不能有此待遇。但我和黨部的關係卻從來不親密，即使沒有公然敵對，至少也是冷淡的。陳紹禹與我絕不往來，見面不打招呼。我從心底裏討厭這個人，他當然也沒有任何理由來喜歡我。我的反對派活動，他雖不能確知，但他一定能看出我不是黨部的積極擁護者。陳系中坐着第二把交椅的，那時是何子述（此人品格較好，後來回國時是著名的所謂「二十八個真正布爾雪維克」之一，最後死於蔣介石之手），他與我的私交尚好，在同一班裏讀書。他是黨部要人，而我卻是「不活動分子」，所以後來我們之間的交情也說不上親密的。可是當我被送去休養之前的一個時期，他對我的態度卻突然親熱起來了，親熱到「噓寒問暖」的程度，老是以最關切的表情來談到我的健康問題。我的所以能夠到黑海勝地去，當係他「關切」之功。但陳何一體，人所共知；我之突被垂青，不用說，完全是陳紹禹們有計劃的一個步驟。目的也很易見，想拉攏我來打擊反對派。

第二件事來得更突然，那是發生在7月底，也就是說，當我從黑海邊休養回來不久之後。有天晚上，黨部突然叫我去，給了我一個

意料不到的任務：以中國黨的代表資格，隨同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委員們，到列寧格勒去參加8月1日舉行的反戰反帝大示威。我們這個代表團由德共當時的總書記台爾曼率領，其中包括了萊梅爾（後來亦被希特勒處死）以及法意等國的著名領袖。我，這個無名小卒，處身在他們之間，實在感到了莫名的驚異。驚異的固然也因為我忽然擠進了「名流」之列，卻更因為這種純粹去接受喝彩的榮譽任務，為什麼會派在我的頭上？如果說為了我能夠說幾句俄國話，那末精通俄文的陳系人物有的是。如果說人選是依照了黨齡和過去工作紀錄，那末我根本就算不得什麼。為什麼一定要拿我這個人去充當國際代表呢？我真是受寵若驚了。不用說，這當然又是陳紹禹們對付反對派計劃中的一個步驟。

不過感謝這個不懷好意的步驟，我總算體驗了當時特權尚未瘋狂發展以前的蘇聯特權官僚們的情形。有機會看見了曾經舉行過偉大的十月革命的現場。

台爾曼等剛剛開完了共產國際的第十次全體執行委員會會議。這是很重要的一次會議，它標誌着共產國際的從右邊向左邊的跳躍，正式宣佈世界革命踏進了第三時期，亦即是國際資本主義總崩潰與世界革命總進攻的時期。在組織上，史大林藉此完成了一項手術，將那由六次世界大會上選舉出來的主席布哈林革了職。因為台爾曼等在那次手術中當了史大林的重要助手，後者為了報償起見，因之當他們會後回國的途中，請他們在列寧格勒主持一項盛大的慶典。而我則真所謂「忝陪末座」，恭逢其盛。

我們大約在7月30日或31日的夜間，乘臥車去列寧格勒。與我同房的是一位意大利代表，那人的名字彷彿記得是尼可爾；意共中較

為年輕的一位領袖，這個人留給我的印象比較深，因為那晚上他教了我一首名叫「人民向前進」的反對墨索里尼的小歌，又因為後來意共領袖中有位同樣名字的人，曾經一度走近過反對派的。一天亮到達列寧城，車站上有長列的汽車等着我們，載我們到十月革命時作為總司令部的史莫爾尼學院。這地方引起了我一個教徒朝拜聖地的心情。不久前我才讀了約翰·里特的書：《震動世界的十日》。因之這所大廈在大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我是熟悉的，甚至它的走廊，它的幾個特殊的房間，列寧和托洛次基在這些房間裏的所作所為，我都非常清楚，今天一到現場，撫今思昔、「按圖索驥」，實有無窮興趣，當然也有不少感觸：當年在此地策劃和領導革命的二位巨人，一個已死，另一個被逐至國外了。

我和一位德國同志和那個意國同志被安置在史莫爾尼裏面的「農民之家」。地方非常清靜雅潔，最適於休息，看樣子，它可能是史莫爾尼學院時代由那些高級的尼姑住的。台爾曼等沒有留在這裏，他們另住酒店。

當天，烏里次基宮中開了大會，預先紀念明天的八一反戰日。我們這個國際代表團被請坐在主席團的席位上。後來因被暗殺而大大出名的基洛夫主持會議，由台爾曼作了主要演說。無疑的，台爾曼是一個出色的演說家。他和近年共產黨領袖們流行的演說方式不盡相同，即並非拿了一厚疊原稿逐字朗誦，而是像即興的煽動一樣，從腹稿中生動而流利地背誦的。他身體魁梧，音量宏大，給人的印象很有力。還有一點好處，他的演說並不太長，說話簡潔，所以對聽眾說不是一種疲勞攻擊。

記不清是次日還是同一日的下午，列寧格勒舉行了數十萬人的示威大遊行。我們又被邀請到主席台上。這是臨時建築在一座皇宮外面的，上面站的都是黨政軍的巨頭，檢閱遊行隊伍，接受過往人潮的歡呼。這是我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扮演這種角色，即在長長的時間內，微笑着，對下面的人群揮手答禮。在共產黨的一切儀式中，這是最習見的一種，而主持這儀式的人，也被視為最最光榮的。可是照我個人的經驗說，這毋寧是相當痛苦的。我絕不想否認群眾示威的意義；但任何事物，一旦變成了儀節，變成了形式多於內容的排場，變成了非因自發而是特意佈置的演習，其原有意義鮮有不隨之而喪失的。更何況今天那樣的演習，連接受歡呼者所站的地位都必須按時價不同而嚴格地分別先後，其滑稽可笑處有如伶人們的懸牌，而其可悲的實際含義則當然更甚於此，它顯明地指出了革命的墮落與官僚形式主義的猖狂。正是在這個儀式中，「個人崇拜」的毒害暴露得比任何其他事情更加清楚。這種儀式絕不再是革命力量的檢閱，而只是大領袖（或領袖們）虛榮心的瘋狂表現與帝王思想的極端發泄。我曾經見過一張蘇聯影片，關於這種場面的，史大林站在列寧墓的頂上，居於正中，亦即掛着頭牌，下面是不斷的人潮通過紅場，少先隊獻花，人們狂喊，這一切都履行如儀，最後，高潮出現了，莫斯科的數千運動員在場中展開了陣勢，表現了五花八門的節目，忽然間，陣勢突變，彩色的旗子分分合合，一下子寫出了幾個大字：「榮耀歸於史大林」，歡呼聲震動了天地，鏡頭劃到了史大林的面部，一種似笑非笑的表情，緩緩揮動着他的右手。主席台上圍而拱之的眾星則對了「北辰」大鼓其掌。這幾粒眾星中大多數是今天高唱「集體領導」的英雄們。

今天（1956年的秋天）中共的諸領袖也正跟在克里姆林宮的眾星之後，反對其「個人崇拜」。然而此一崇拜最露骨的、最「偉大的」與

最富戲劇性的表現——節日受賀，卻似乎還後來居上，愈演愈烈。扮演在天安門前由史大林定下來的醜惡的「朝儀」如果不改變或者取消，那末在真正反「個人崇拜」的路上，連第一步都不曾跨出呢。

檢閱的次日我們集體去遊了「沙皇村」，又參觀了工廠；俄國革命中起過重大作用的普的洛夫鐵工廠，引起我們最大興趣。下午沒有官式節目，我們自由活動。我找到了一位在黑海休養所裏結識的俄國朋友，「紅色十月」糖果廠的一位工會領袖，他很熱情地陪我整整玩了半天。我們在十月革命暴動的基地，維包格區裏遊了一陣，眺覽了尼瓦河的景色，看了河上有名的「彼得保羅堡壘」，在這裏，差不多拘禁過所有俄國的革命領袖與不少大作家的。我們走了尼夫斯基大街，又去看了那座名聞世界的「隱士畫廊」。那天晚上，他又拉我到他家裏，由他太太親自煮菜來款待我，席間還約來了在休養所認識的幾位男的和女的朋友。他們（與她們）都是這樣的熱情，這樣的好客，使我深深感動。不過從他們的態度和談吐中，我又深深地覺察到，這都是屬於贊助「特米多」的人物。在莫斯科，我接觸到的俄國朋友多數是反對派。他們中年紀有的很輕，但黨齡都相當長。在革命的艱苦的年月中，都曾經參加了鬥爭的。他們的性格比較沉着，思想比較深刻，眼界比較寬闊，對物質的享受不甚注意，書讀得很多。與我們相交，主要地，甚至唯一的是為了對革命的共同見解，深厚的感情完全建築在這個共同點上。列寧格勒那班朋友卻是大大不同的。他們頗安於現狀，根本不談思想，男女都相當講究衣着，我相信，他或她們都是好的工作者，是積極分子，但除了因此可以不斷改善自己生活地位之外，決不為了（也根本沒有）更大與更遠的目標。他們幾乎都是黨員或團員，可是對世界卻知道得很少，對中國更莫名其妙。有一位非常漂亮的糖果廠裏的女職員，甚至以為中國人是和猴子住在一起的。

他們對我好，一則由於俄國人那種可貴的熱情和良善，另一方面，在不小範圍內，卻因為我是一位「貴賓」，受他們政府優待的。這是新興一代蘇聯青年的好模型，他們比我在莫斯科所認識的一群，顯然更有代表性。在這裏，我彷彿更懂得了托洛次基何以失敗，史大林何以勝利。「不斷革命論」顯然與這些漂亮而天真的少男少女們的胃口不合，與他們的利益不合。

我們在列寧格勒一共住了四五天，主要的工作是分途出發，去到軍區各個駐防地向士兵們講演，有時一天得趕好幾處，還有遠至芬蘭邊境的。每到一處，總受着數千或上萬士兵們的歡迎。我們站在操場臨時搭起來的講台上，透過播音機對群眾說話，講的無非是應節的話，關於戰爭危機的加強，以及國際勞動階級的團結。反應是真正熱烈的，從他們的面部表情和他們的愉快舉動上看得出來。演說完結，我們總是無法脫身，才下台，那些活潑的紅軍小夥子們就從四面八方向你進攻，「捕獲」了你，歡呼着，將你整個人再三向空中拋擲，然後三四隻肩膀湊在一起，將你抬着走，送過操場。台爾曼身體肥碩，給人拋擲委實有點吃不消，有一次他只得向大家告饒求免。……這種熱情決不是故意裝出來的，十月革命離此時畢竟還只有十一個年頭，深厚強烈的國際主義教育，雖然已為史大林的「一國社會主義」所沖淡，可還是有力地存在着，普遍而牢固地抓住了人心。我們這些外國來的共產主義者，被視作與他們的生死鬥爭有着密切關係的朋友。將任何外國人視同間諜，把外國共產黨員看成僅聽呼喚的僕從，隨意生殺，那是要到 1935 年以後才有的事。

在列寧格勒，我們只參加了一次宴會，人數並不多，派頭也並不豪華。像三十年代後期，每逢佳節，當國際友人來臨時，克里姆林宮中例必舉行的盛宴，衣香鬢影，酒池肉林，其奢侈與排場使白金漢宮

中的酒會遠遠遜色者，在那時恐怕連最大膽的右派分子都不敢想像的吧。但雖如此，當時高級官員的享用已經超過平民多多了。就拿我這個「短期貴人」的一件小事來說吧，原來我們當學生的，每月的雜用津貼是 10 元，而當代表的每日伙食乾折恰好也是 10 元。因此回到莫斯科的時候，我幾乎變成「小富翁」了，口袋裏突然多了數十大元，有資格請朋友們吃中國飯了。

回到莫斯科，何子述愈發同我接近了，他「慰勞」了一番，並希望我以後更積極地擔任些學校黨部的工作。這意義很淺顯，要我向陳系「靠攏」。陳紹禹們的慣用策略我是熟悉的：「先禮後兵」，拉不到就打。如今人家的「禮」已經送過，下一步要看我的決定。我和反對派的同志們一商量，大家覺得我不能在莫斯科長久留下去了。人家不會再容許我表面消極，而暗中積極地幹反對派。我非儘早回國不可，要不然，打擊下來，想回去就不可能。但要求回國，得提出一個充分理由。很可能，陳紹禹們已懷疑我和反對派的關係，大概不會輕易放我走的。這時候，學校放暑假，全校學生送往南俄休養，我因才休養了不久，要求不去，准了。那時留在校裏的還有十幾個人，是已經決定回國的，其中有幾個反對派，有少數是陳紹禹的信徒。我在數月之前，和女同學 Y 結了婚，她在被遣送的名單之內，我於是抓住了這個理由，要求同走。學校黨部的負責人全去了休養地，我徑向蘇聯同志請求，他和國際的東方部一聯繫，立即就批准了我的要求。

就這樣，大約是在 1929 年的 8 月底吧，我又坐上了西伯利亞火車，結束了兩整年莫斯科的學習生活和政治活動。

那時莫斯科的反對派組織曾經改了組，因為我決心回國，所以在學校尚未休假時，就在一次會議上推出趙言輕來替代我在三人委員會中的工作。此人年紀比我們都大些，過去是武昌一師裏的名教員，河

南人，性情極厚，又因他的洋名諧音，人人都稱他「媽媽」。但事情真有出人意料的，在我回國半年之後，莫斯科整個反對派（二三百人）之破壞，竟是為了他的關係。不過此是後話，等到應該談到的時候再談吧。

注釋

1. 最近見到一篇在台灣發表的，有關此事的文章，說當時選出的共有五人，除我在這裏提及的三人外，還有李平和卞福臨。這是很可能的。不過就我記憶所及，我們經常會面與討論問題的，是三人而非五人。也許李、卞二人是「委員」而非「常委」吧。—— 1976年注

六、回國工作——被逐出黨

同行回國的彷彿是 18 人，其中有五對夫婦。後來在反對派中得人敬愛、至死不渝的黎彩蓮，那時是陸某的夫人。這個人二年後叛變了她，也叛變了共產主義，投降了國民黨。時間距今已有二十八年，尤其在這反革命和戰爭的大動亂時代，在年輕的革命者中，人事改變真是太多了。我本人，今天還是以托洛次基派共產主義者的資格來寫這幾行字，不管人家以怎樣的眼光來看我的命運，而我卻是以此自傲的。同回者中始終不曾背離托派的，還有濮德志與趙濟（他們現在國內，確實命運不知），另一人謝英，雖然二十餘年來實際上離開了任何政治，但他對托派的同情不衰，為此他正被今天的統治者判處了十二年徒刑。此外，惲雨棠和金貫珍被蔣介石槍斃了。有陸某和黃某則在事變中有如浮萍之轉，替每一個當權的政府服務，最後竟當過漢奸；餘下來的大多數，在黨內或反對派內或長或短地幹了一時期的工作。因為受不住革命生活的長期苦難，紛紛逃跑了，變成了最普通的「良民」，其中有我過去的妻子 Y 在內。不過後來「發達」的倒也有一個高某，他當上蔣經國手下的紅人。

1929 年秋天，一次大規模的軍閥內戰剛剛結束，蔣介石戰勝了桂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顯得穩定了些。然而革命方面的力量似乎也有

了復蘇，從 1927 年的潰敗以及後一年的盲動損失中透過口氣來了。從六次大會中產生的新中央，以上海為根基，正開展着全國性的地下工作。蔣介石的白色恐怖因此也集中於上海，希望砍去這個再度抬起來革命黨的頭。

我們化裝成為華僑，經過日本統治的朝鮮，秘密回到了上海。在沒有到埠之前，謠言很多，說上海港口搜查得極其嚴密。還在莫斯科的時候，從日本報紙《大阪每日新聞》上，就看到過一段消息，說有一批蘇聯回來的學生，在黃浦江上就給淞滬警備司令部的探員捉去了。為了這種恐懼，有些略能籌到一點錢的同志，如劉仁靜，吳季嚴，吳黎平等，便請准經由歐洲回國的。可是我們放大膽子打海參崴回上海，事實證明非常安全。那些謠傳顯然是誇大的。當然，這並非說那時上海沒有恐怖。恰恰相反，蔣介石的鎮壓機關正大舞其魔掌，用不遜於「清黨」時期的瘋狂程度，在每一角落追緝革命黨人。不過那一時期國民黨的鎮壓工作，還不是「科學化的」，不是職業探員與業餘特務相結的「群眾組織」。它還不曾從史大林的格柏烏學習過的；蔣介石所賴以對付共產黨者，仍舊是橫行租界中的「包打聽」一流，腐敗顛頑，野蠻愚蠢，兇惡有餘，效能卻是很低。這與數年後由 CC 團主持，用共產黨叛徒為骨幹的新特務相比，那就不可同日而語了。

我們回到了上海，遵照莫斯科那次反對派會議決定，立即向中央報到。劉仁靜比我們先到些時，他卻沒有照決定行事。他還是固執他原來的意見，認為不應該在黨的工作上浪費時間，應該立即以全部精力做獨立的反對派工作。在我們的反對之下，他總算寫封信給中央，報告他已經回國，但接着就完全表明他的托派身份。如此，關係當然斷了。這種「乾脆」的做法，若不是認為整個共產黨已經無救（這和我們當時的看法完全不符），便是借一藉口來逃避黨內艱苦的群眾工

作。我們因之決定繼續採取莫斯科時候的態度，即對黨不表明反對派立場。這樣做不是為了欺騙黨，乃是因為共產黨中的黨制，這時候已經沒有了派別合法存在的權利；我們為了適應此種情況，繼續保持黨員地位，不得不採取此種自衛策略。至於在實際工作中，我們也有了決定，即絕對服從紀律，按照民主集中制行事。這就是說，雖然在總的路線（六大決議）與個別策略上我們與黨的多數意見不同，但在工作中，我們必須按照多數意見做；非但要和多數人一樣做，而且要做得比他們更積極、更勇敢、更好，藉以取得信仰，以便在下一一次討論路線或政策的會議上，或明或暗地，或多或少地（這一切要視情形而定），能夠提出我們不同的看法，糾正黨的錯誤。我們的最後目的是要把黨從史大林主義的錯誤領導下解放出來，採取布爾雪維克列寧派，亦即托派的正確主張。

歷史事實雖不曾按照了我們的計劃來體現，但在當時條件中，我至今相信，只有這樣做才是正當的。

我們報了到，周恩來便約我們談話，他那時正擔任組織部長。談話地點在四馬路的振華旅館，他和我們十餘個人一起談天，談了兩個下午，內容記得是他給我們分析當時中國的一般情勢。幾天後，在麥根路上的一幢三層洋房裏，舉辦了一次訓練班，其中集合了二十餘人（除我們這批人之外，再加上取道法國新回國的一些同志）。這個訓練班的主要目的是讓我們熟悉中國實際工作的種種條件，因為我們中間至少是去國一兩年的，有的甚至在 1925 年以前就離開中國的，他們對中國情形相當隔膜，對秘密工作的一切更是茫然。訓練班延長了十多天，由周恩來，惲代英，向忠發，項英，羅綺園，顧順章等人輪流給我們做報告。李立三當時是宣傳部長，算是理論的指導人，但他始終不曾出席我們的訓練班，原因至今我都不曾明白。主要的報告人

是周恩來，他跟我們討論了幾天關於中國當前政治局勢的估計。我說過，那時第三國際正採取了「第三時期」的說法，認為在全世界範圍內，革命都正在走向高潮。這是史大林打擊了布哈林，向左邊跳躍的時期。在此時期中，中國黨真有點無所適從，進退失據。1927年秋冬到1928年上半年，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共，在史大林的直接命令之下，實行了盲動政策，結果加深了革命的失敗。在1928年7月舉行的中共第六次大會上，批評了盲動主義。它雖然仍沒有找到正確的路向，但至少為客觀的事變所迫，不得不承認革命失敗，不得不將武裝暴動從即日的議程上撤下來，不得不將蘇維埃改成宣傳口號。那時符合於中國政治形勢的革命策略，唯一正確與實際的，乃是托洛次基提出的國民會議口號及其全部民主革命政綱。但史大林派拒絕了這個政綱。遂使中共陷於無口號無方針的窘境。其實，那時如果單從中國一國以內的情形來考慮問題，史大林們多半也會清醒些，會提出民主口號，藉以重新團聚革命力量，以便在較佳時機，由退守再轉入進攻。不幸此時蘇聯國內情勢與西歐的資本主義新危機，使史大林突然「左」傾起來，提出了第三時期的「哲學」。而更不幸的，這個哲學和史大林的任何「哲學」一樣，都是機械與圖式化的，即欲「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既然全世界都已進入革命高潮，中國何能獨外？結果是，1928年7月所決定的一點點忍耐與後退，過不了一年時間，立刻就用新的精神來代替了，就在將布哈林打倒的那次國際全體執委會上，又決定了中國革命的「高漲」快要到來。根據了這個決議，中國黨再度進行了比瞿秋白時代更大規模的盲動，結果當然非常慘，而悲慘的後果完全呈露之後，史大林又來了一次同樣的遮眼法：正像當初把盲動主義記在瞿秋白名下一樣，這回的新盲動主義被命名為「立三路線」。李立三在1931年被打下來了，連帶被打擊的有周恩來與瞿秋白【朱正按 李立三是在1930年9月24日至28日的六屆三中全會上打下來的；「連帶

被打擊的有周恩來與瞿秋白」是1931年1月王明上台的六屆四中全會上的事情。】，以及幾乎所有中共老領袖們。替史大林來完成那次「偉業」的就是又名王明的陳紹禹，他趁此時機由莫斯科孫中山大學黨魁資格變成為中共黨的首領，竊據黨權達四年之久。據最近劉少奇在中共第八次大會的報告，陳紹禹的領導曾使「當時的革命根據地和工農紅軍損失了百分之九十，國民黨統治區的黨組織和黨領導下的革命組織幾乎損失了百分之百。」不過這些都是以後的事情，且待將來應該提到的時候再說吧。

讓我們回到周恩來和我們所討論的問題。這時候，中央正收到了「高潮快要來到」的決議。決議的措辭究竟如何，因為手頭沒有材料，記憶也不很精確，不能說得太肯定。但意見是不會錯的【朱正按 《共產國際執委致中共中央委員會的信》，1929年10月26日國際政治秘書處通過，其中對於形勢作了這樣的估計：「中國進到了深刻的全國危機的時期。」從而提出中國共產黨現在最重要的任務：「現在已經可以並且應當準備群眾，去實行革命的推翻地主資產階級聯盟的政權，而建立蘇維埃形式的工農獨裁，積極的開展着並且日益擴大着階級鬥爭的革命方式（群眾的政治罷工，革命的示威運動，游擊戰爭等等）。見《中共中央檔選集》，第五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0年版，791-792頁。】，在毛澤東的文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便可以看到它的反映。中國黨收到了這個決議之後，實在有點迷茫，首先因為盲動時期的記憶太新鮮，對盲動的斥責，言猶在耳。既然高潮快要到來，是否武裝暴動（後來改稱為起義）將再度提出於「議事日程」？高潮究竟高到什麼程度？其確實含義為何？至於「快要」二字作何解釋，尤其如毛澤東在那篇文章中所說，成為當時「許多同志的共同問題」。在最初，中央多數對這個國際指示傾向於較消極的接受，因

為剛不久才讓「滾牛奶燙壞了嘴」，如果將新高潮的快要到來作左的解釋，又怕要碰破頭顱。周恩來和我們研究這個文件時候，就顯出非常謹慎，甚至有幾分為難。我們曾反反覆覆地研究了「高潮」二字意義，查究了它的原文。這二字本是俄文 Подъём 的翻譯，含有「高潮」和「高漲」兩層意思，它有點等於英文中的 On The Rise，所以周恩來最後說，中譯文應確定為「高漲」，他怕的是「高潮」會被了解成「最高潮」(Climax)，因而重犯盲動的錯誤。至於「快要」二字，據我的記憶，我們在討論中的解釋，也傾向於較遠前途的。不過過不多久，由於國際第三時期的作風愈演愈烈，史大林主義在全世界範圍內的激烈左轉，再加上中國好些同志的附和，尤其是江西方面的意見^[1]，中央便日益從「左」的角度去解釋「高潮」與「快要」了。其結果便是所謂「立三路線」。

那次訓練班中除了周恩來與我們討論政治問題之外，其他的人都給我們報告實際工作經驗。在這些報告人中，最受我們歡迎的是惲代英，他口才好，經驗多而切實，說的都是書本上找不到的。羅綺園給我們講農民運動，大家對他的印象不好，他可能知道的東西不少，但是講不出來，同時他毫無泥土氣，無論談吐或舉動上，都不像是幹農民工作的；性情不開朗，也不適於群眾工作，此人在早期之主持農運，可能由於某些偶然因素。二年之後，我和他在龍華司令部的監獄中再見，在危急時表現得無恥與可憐，出賣了同志，終於自己又難逃一死。顧順章給我們講秘密工作，他那時主持着中央的特務。這個人流氓氣重極，思想談不到，雖然工人出身，為人機警異常；但領導革命特工終究不能靠這種人，他後來的叛變與作惡，我認為賞識他與提拔他的人也不能沒有責任的。任何革命中不能沒有此種人參加，拒絕流氓無產階級的歸附便不能做成群眾性的起義，但如何分別他們的正

反面作用（認清他們那種遠遠超過正作用的反作用），馬克思和列寧都已經充分教育過我們了。中共的領袖們不接受這個教訓，以致在長年的革命工作中，吃過流氓們無數次的虧，顧順章不過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個例子罷了。

訓練班結束後，我派定了工作，擔任中央組織部的幹事。部長周恩來，副部長是省港罷工中的著名領袖之一羅登賢，幹事四人：惲代英，陳潭秋，武扶經和我。武扶經就是當年東大「旅莫支部殘餘」的領袖，一年半以前被我們趕走了送回來的。我這幾位「同事」都老我一輩，我那時才是23歲的大孩子，他們不論在年齡與工作經驗上，都比我老成得多了。惲代英更是我讀中學時代就很敬仰的人物。今天竟有機會和他一起工作，心裏很是興奮。我決心積極地幹，同時從這幾位前輩那裏多多學習經驗。不錯，我是隱瞞起自己立場的反對派。但是這樣做決不會對不起黨，恰巧相反，我們相信，只有如此才是真正對得起黨，才會將黨從不正確的路上引出來，使它不致終於受一個陰謀小組織（米夫——王明系）的控制，因之斷送中國革命。當時中國黨的領導層，雖然已經受了蘇聯黨內部鬥爭的約束，在史托之間，業已公開採取了擁前排後的立場；但我們仍應承認，其中大多數人的心底裏，對此鬥爭仍然是「超然的」。有些人是根本弄不清楚史托鬥爭的全盤內容，有些人則覺得那主要是蘇聯的內部問題。他們的注意完全集中在（亦即局限於）中國問題上，甚至在簡單的實際工作上。因之照這些人的看法，不管你在莫斯科參加了什麼派，一旦回到中國，只要你誠心誠意為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及其政黨工作，你就是一個好革命者。我們這批回國的人，中間由托派嫌疑分子佔了多數這個事實，莫斯科一定通知了中央的。至少，中央知道我們中間有不少非正統派。但周恩來對我們絲毫不曾有什麼歧視；更堪注意的，即是在訓練班

上，討論中沒有一次提及了托派的「錯誤」，最後，分派工作時，我這個顯然已被莫斯科黨部懷疑的人，卻獲得了很重要的工作。

中央對托派的此種態度，一直維持到半年後莫斯科反對派全體被捕。那時，根據莫斯科的來電，將不肯放棄立場的托派同志開除出黨。再因陳獨秀及其接近的一群同志轉向托派，中央內部引起了較大的波動，當權一派的中央領導者才算對托派採取了更鄭重的，更不調和的立場。但雖如此，中共的老幹部們對於「托陳反對派」的敵意，和蘇聯史大林系對托派所懷有者始終不可同日而語。這在一方面固然因為中國托派始終不曾發展到能夠與他們爭衡的力量；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則因為老幹部們的真正敵對者（在權位而非思想上）不是托陳派，而是米、王派。王明派才是史大林在中國的直接代理人。毛澤東，劉少奇，李立三，周恩來等曾經長期間受過這群史大林嫡系的打擊，可不會和托陳派認真交過手。當然，這絕不是說，毛劉周等反對史大林主義，同情托陳派。他們是史大林主義者，他們之所以擁護史大林，由於勢利觀念所驅，也由於思想和作風的共鳴。史大林控制着蘇聯這個大國，他有可能援助別國擁護他的人，而中國共產黨運動在頗長的一個時期內，離開了蘇聯援助便無法存續與發展的，這是毛澤東們始終支持史大林主義的勢利的一面。另一面，史大林那種狹隘、實際、官僚從屬以及個人崇拜的思想和作風，確很投合中國現代「秦皇漢武」們的口味。因之，雖然他們未能被史大林視為親信，且被他派遣來的「義子」陳紹禹等多方壓迫，卻仍然一半兒真心，一半兒假意地擁護了克里姆林宮中的教皇。中共統治層對中國托派的態度，多少受了他們對史大林的此種態度的影響。這態度基本上是敵對的、鎮壓的，但有時候表現得比較緩和，有時候殺氣騰騰，有時候好像「有商有量」，有時候卻又歇斯底里。這種多少不同的表現，與中共上層

派系之爭有關，也與在特定事件上與托派所接觸的人物有關。其間經過，在以後敘述中將要談到。

中央組織部的工作非常緊張。因為上海市的工作直屬中央，我們組織部直接指導各個區委會的活動。在那時，無論國際或中央，甚至江西的毛澤東，都不曾想到把工作中心由城市搬向鄉村，也沒有誰敢主張將黨的基礎從工人移轉在農民身上。既然堅持城市第一與工人領導的路線，那當然要把黨的中心工作放在上海。黨幾乎是集中了最大力量，要建立和擴大上海工人區中的組織。為此目的，就用全力去領導上海各業工人的鬥爭。組織部的工作，簡直可以說有三分之二以上是關於上海各區的，我們只用小部分時間來應付全國各省的指示。上海分了五個區：東、南、西、北、中。組織部中四個幹事，加一個副部長，每人專門負責一個區。我出席的是滬中，惲代英管滬東，羅登賢管滬西。最忙與最重要的是東區與西區，那是大工廠集中之處。滬中是商業區，主要的成分屬於店員。他們在生產上的地位較不重要，但因它在全市的中心，觀瞻所繫，這部分的工人鬥爭也曾被重視。在那時候，這一區裏的估衣舖職工們，曾經鬥爭得有聲有色。百貨職工們的鬥爭也轟轟烈烈，而且二十餘年來始終站在前列，成為上海職工運動中一個堅強據點。當我接手這一區工作的時候，石路一帶估衣舖職工的總罷工結束不久，餘波此起彼落，勞資雙方的關係還異常緊張。中小型商店的勞資關係，和大工廠與大商店的情形很不同；這裏的老闆與夥計之間存在着親屬的、鄉誼的，或甚至家庭的紐帶。一旦發生了鬥爭，仇恨也就特別深刻與複雜；這兒不僅牽涉到待遇問題，而且夾雜了許多私恩私怨問題。因之鬥爭所採取的形式，有時看來分外的尖銳殘酷。近年來中共所執行的五反鬥爭及「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中所造成的無數血淚故事，在我那時碰到的估衣業鬥爭中，已經能

看到不少預演了。資本主義制度中的小工商業，本身就是一個悲慘的落後事實；它們可憐的處境勢必造成最難容忍的階級對立；可是它們那脆弱地位又最受不起階級鬥爭的打擊。站在共產主義者立場上，為了喚起一切勞動者的覺悟，我們自然要儘量發展他們中間的鬥爭；但從經濟發展的角度看，此類階級鬥爭往往是悲慘的兩敗俱傷。不幸這些小商業經濟在中國的城市經濟中佔了很重要的地位，因此，有關於他們鬥爭的領導方針，幾乎成了中共政策史上一個很大的爭持點。自從廣州時代、中經武漢時代一直到革命失敗以後，可以說，凡屬右派的都傾向「仲裁」與「勞資兩利」；而左派的則主張在那些部門中同樣貫徹階級鬥爭。幾個月滬中區的工作經驗，使我在實際上接觸了這個問題。我的立場是屬於左的，但同時我卻更深地感覺到，單獨這一群人的鬥爭沒有出路，它必須從屬於全國性的更高更大的經濟和政治鬥爭之下。今天中共政府對它們採取聯營與公私合營等等的辦法，這就問題的過去方面說（即結束小工商的可悲狀態），我相信是唯一可循的道路，我們在這裏懷疑的只是問題的未來方面，即此種經濟在今天中共的官僚統治之下，是否真會導入「社會主義」。於此，我們是持有異見的。

認識到店員鬥爭不能構成獨立的革命鬥爭的主流，並不等於說，我們不應領導此種鬥爭，或等待大工廠大企業的鬥爭普遍爆發後再來注意它。當時我不曾這樣想，後來，在長期的反對派活動中，我們也不曾這樣做。對於易燃性極大的店員鬥爭，我們始終是積極參加或領導的。在當時，為了配合或促成「快要來到的全國性的革命高潮」起見，我們真是晝夜奔忙，不放過一星半點兒的火種。有時候，為了某一舖子裏老闆夥計間的一些小爭執，我們，從中央到區委，甚至還加上江蘇省委（省委中與我密切聯絡的是後來變成「調和派」的王克全），

開上通宵的會議，策劃進行鬥爭的步驟哩。總之，我們那時往往以數隻獅子的力量，去圍搏一頭小兔。我們從絕早到深夜，始終睜大着警覺的眼睛，向四周圍察看一星星火點，想藉以造成燎原的局勢。急躁間雜了幻覺，使我們保持了人為的緊張，希望在全國首要城市的上海，在上海心臟區域的滬中，能夠爆發出一個革命高潮的信號。事隔二十七八年，我現在已無法詳盡地描述那時候的緊張，不過我一生中工作最拼命的那幾個月份，記憶始終仍留在腦際：一天亮就得起身，因為要在商店沒有開門之前，去找有關的工友們談天，然後是會議，接頭；接頭，會議，非弄到深夜不能回家。因為除了局部工作之外，還得開組織部的例會，還得與外地及各省來的同志見面（我負責聯絡的，記得曾經有安南以及安徽、雲南等省）。工作真是繁重極了，不過在組織部的諸幹事中，我算是最清閒的，他們幾位都比我更忙。所以有些文字工作放在我的頭上了。深夜回家，我不能就此睡覺，還要多少翻譯一點列寧《論組織》那本小冊子。這樣積極地幹，我並不覺得痛苦，精神倒寧可說是愉快的。我內心裏不同意「高潮快要到來」的估計，同時也不以為光靠這樣的主觀努力便可以促成「高潮」。但對這些問題既已認識清楚，當不會再因此而感到惶惑而痛苦了。我之所以愉快地為了一個不表同意的方針而努力，那是因為：1、工作中着着證明反對派的路線是對的；2、發現有些真誠的革命者，在工作中感覺苦悶，並從經驗中逐漸認識到六大方針的錯誤；3、藉此多少學習到處理實際工作的方法。

在那一時期中，我和惲代英最接近。在每次會議前後，我們常有短時間的閒談。他患了肺病，體力很差；全靠了他堅強的意志，以及對革命的無比熱忱，才支持他去幹這十分緊張與繁劇的工作。但每當休息下來，他便疲態畢露，有時會在會議進行中沉沉睡去。代英是

出名與出色的實幹家，他吃苦耐勞，不知困難；遇到任何難題，他腦子裏總有現成的或隨機觸發的應付之道。因此他始終樂觀，從不鬧情緒。如果說他有缺點的話，那便是這位由書生出身的革命家卻過分地看不起革命家的書生氣。可是當我和他相處的後期，他卻不止一次地向我表示：希望找個機會來好好兒讀點理論書。我們從來沒有機會把話談得很深很細；工作委實太忙了，相互之間絕無私人往來或閒聊半天的可能。只有一次，我記得，組織部的一個會議定在我的住所裏開，渾代英一個人最先來了。時間離約定的還早，他就倒在我牀上打了個盹。一會兒醒轉來，別人還沒有來，他便隨手翻翻我桌子上幾本列寧寫的英文小冊子（是組織給我的），就感喟地說：「唉，這些書我都沒有好好兒看過。」我說：「你應該請求休養一下，弄好身體，同時可以讀讀書。」他對我苦笑笑，不說話。「或者你索性到莫斯科去住一個時期，那邊的環境也許對你很合適。」我又說。「哦，去留學？！」他意味深長地說着，搖搖頭。

渾代英這句簡短的代表裏，包含着不少內容。老一輩的中共工作者，非常看不起從莫斯科回來的學生，尤其看不起那些以同情者資格前去，出國前根本與黨無關的一群，有如王明等輩。這些人沒有實際工作經驗，甚至全無革命家品質，卻學到了全套西洋「革命者」的氣派，以及滿口的革命詞句。他們一回到中國，生活在艱苦恐怖的環境裏，只有極少數能被再教育成「文武不擋」的真正革命家，大多數是很快投向了反動，最好的也是反而不動。這點對「留學生」的鄙視是應分的。另有一層，卻表示出中國共產黨之傳統落後性，那便是對實幹的過分強調，完全不了解列寧的所謂「理論乃行動的指導」的意義。幹決定一切的觀念，根深蒂固地存在於中國老幹部的頭腦中，以此造成了中共領袖們那種狹隘的、短淺的眼光；造成了經驗主義的、常識主義的思想；造成了官僚的、命令的與行政事務主義的作風。這個毛

病曾經斷送過許多次革命局勢，曾經使中共盲目地跟了史大林主義走，且使今天獲得全國政權後的中共，永遠受着策略性的政客手段的驅使，卻不能堅持原則性的方向，以致掉在官僚獨裁主義的泥淖中而不能自拔。

惲代英最完備地代表出老幹部們對「留學」，其實也就是對學習的正面和反面的態度。那時候，老人中也有不少派赴莫斯科的，例如林伯渠，吳玉章，徐特立，董必武，葉劍英，謝覺哉等人；可是他們之被送往莫斯科，只因他們原來專幹「外部」工作，即國民黨中的上層工作的；革命失敗後，黨轉入了地下，他們完全做不來這些新事情，但他們仍忠實於共產黨，且為國民黨緝捕的對象；無事可為，無地容身，便只好送出國外學習去。惲代英自不願接受這樣的安排，他不願人家將他視作此類老人，事實上他也決不是。他在國民黨的上層軍政工作中雖然幹過很長時期，但在新的秘密環境中，卻證明出他是一個同樣好的，甚至是更好的革命者。但是無法掩飾，除了生理的疾病之外，他正患有心理上的苦悶症。他從不曾對我公開說過苦悶，更不曾表示過對黨正式路線的懷疑，可是像拿了幾莖稻草想煮沸一大鍋冷水的人的焦急心理，卻是不斷地吐露的。

在我們那次談話中，他就埋怨滬東某幾個工人同志的「膽怯」，又說有一些同情者害怕他去訪問。我趁此機會，記得曾向他提了這樣的問題：「我們今天的局勢，究竟等於俄國 1905 年革命失敗以後呢，還是 1917 年革命高潮到來之前？」他聽了我提的問題，想了想，然後苦惱地說：「我對俄國革命歷史沒有詳細研究。得找個機會好好讀一下。」

我們的話沒有再往下談，人陸續來了，會議開始，每人的思想又集中在如何促成與迎接「快要到來的革命高潮」的一切具體而瑣碎的行動方法上了。

大約此後一年多吧，惲代英在滬東工廠區被捕，據說被捕時他正在分發傳單（那時我早已被開除出黨），人家只當他是一個普通黨員，判了兩年徒刑，繫於南京監獄。後來中共特工主持人顧順章叛變，才說出某某即是大名鼎鼎的惲代英，蔣介石當即將他提出來槍斃了。這一個異常傑出的革命家，直接死於顧順章——蔣介石之手，間接卻是被史大林的「第三時期哲學」所斷送的。如此斷送的中國優秀的共產黨員是太多了，惲代英不過是其中之一。

那時候遠東的局勢是這樣的：日本帝國主義正積極走上它冒險侵略的路，首先以東北，然後以整個中國為其吞噬的對象；在此壓力之下，中國資產階級與華爾街開始締結了親密的聯盟。因此局勢是動盪不安的，富有危機的爆發性；但遠不是革命前夜。在美帝國主義的扶持與結託之下，蔣介石的反革命政權正在加強。在世界性的經濟危機的背景上，中國資產階級卻正經歷了畸形的、殖民地化的經濟復興。資產階級比較有了自信。另一方面，工人階級於慘遭打擊之後，卻還只在「經濟復興」的影響之下，開始團聚起小小力量。這點力量是脆嫩的、「膽怯的」；希望苟安，害怕革命者拜訪的。大局既如此，那末無怪我們用了超人的努力，也終於不能把大鍋冷水——也許是溫水——煮沸了。苦悶感染了甚至最最積極的人。按說，我們應該暫時以冷靜的思考來代替熱烈的奔走，來探索一下自己基本的路向和步驟。其結果，無須說，應該立即採取托洛次基的立場，將整個黨的工作改弦更張。不要以盲目的行動去迎接幻想中的高潮，卻是要實事求是地，大力推進以國民會議為主的革命民主鬥爭，藉以在未可前知的一個時間裏，準備真的高潮。

不幸，罪惡的史大林路線是不容許檢討的。主觀主義永遠是它的特徵：既然宣佈了高潮就必須去造成高潮。當我擔任工作的後半時期，拔苗助長的工作方法更發揮到了極致。這時期的最出名的一件事

情，就是托洛次基所嘲笑的：拿了革命日歷來發動革命。每當一個國際革命的歷史紀念日，黨就決定來一次示威遊行。為了容易聳動聽聞起見，示威地點總是選定在我們那個區裏：南京路。這種示威簡直是兒戲，是給革命者自己開玩笑的惡作劇。約定了時間，動員了大量黨員（人數常常不超過數百），暗中集合於南京路兩旁。信號一發，少數人立即聚合一起，叫幾聲口號，拋擲幾把傳單。如果此時巡捕房的紅車子還不曾出現，就簇擁成一大堆人，在馬路上「示威起來」，冷清清地呼喊幾聲口號，向前移動數十碼。如此直到警車來到，人們便立即四散到行人路上，裝作路人。巡捕開始捕人，有幾個不幸者給拉上了紅車，開走。「示威」完畢，「高潮」一度就算過去了。這樣的示威在組織者心裏引起了極大惶惑，給了被動員去參加者以莫大痛苦，在同志們的口頭上，「做紀念」變成了無聊的同義詞。

總之，當我參加黨中央組織部的那幾個月中，黨雖然盡了一切力量來發動上海工人階級的鬥爭，而結果卻毫無成績；我們愈想在這個工人階級的中心地造成高潮，而真正高潮的到來卻似乎愈發渺茫。我們愈積極，工人階級對我們就愈害怕。每一次鬥爭或示威，幾乎都帶來了打擊和損失的。其實，在我被開除以後，黨的「高潮」路線以加倍的努力來執行，結果也不曾獲見成效；反而將黨的組織和幹部，迅速地摧毀着；等到陳紹禹等代替了李立三，則正如今天劉少奇在八大大會所形容的，使「國民黨統治區的黨組織和黨領導下的革命組織幾乎損失了百分之百」。

今天我們在事後回憶，可以把上海工人運動，在很大限度內，也可以說是中國的工人階級運動，描寫成如下的經歷：它在1925年「五卅」中首次躍登了階級鬥爭的舞台，在1927年春天發展到最高潮，做出了有名的三次暴動（或曰起義）。同年4月12日受到蔣介石的流血鎮壓，初次遭遇了挫折，不過他們的鬥爭仍舊繼續着。1927年秋季，革命在全國範圍內

失敗了，反革命的資產階級政權加緊壓制上海的工人階級；可是在 1928 年中，上海的工人們，特別是交通工人及郵電工人，卻從事了非常英勇的反擊。正是這個反擊，給瞿秋白時代的盲動主義構成了一個辯解的理由。後來事實證明，這時期的工人鬥爭，並不是「革命不斷升長」的象徵，而只是和當時兩湖的農民運動一樣，是剛剛逝去的那次革命的餘波。1929 年起，由於反革命形勢的深化，國民黨的刺刀威脅和黃色工會的雙重壓迫，上海工人階級就開始進入消極和癱瘓狀態了。1931 年後，因日本帝國主義的露骨侵略，由九一八事件發展到一·二八的淞滬戰事，促發了以學生為首的廣泛的民族民主運動，但工人鬥爭卻始終不曾真正復興轉來，他們並不在這些運動中起過十分顯著的作用。1937 年八一三抗戰軍興，在波瀾洶湧的群眾運動中，工人也只能跟在小資產階級後面，推推助助而已。在整整八年的日偽統治之下，上海工人階級只有更衰弱的。如此，一直延續到日本帝國主義投降，這才由於世界和全中國局勢中發生了某些根本大改變，階級關係和群眾心理上都起了深刻變化，我們才看見上海工人階級有了新的氣象，新的團結，因而有了多年未見的大鬥爭。

但是我們必須記得，這時候離開我們所日夜企待的「高潮」，已經有整整十五個年頭了！史大林將漫長十五年的時距預言成「快要到來」，中國共產主義者正不知為此付出了多少生命的代價！在這個長時期內，中國共產黨並不曾始終守着那個被欺蒙與被打擊的上海工人階級。大約在 1933 年前後，中央一半由於被迫，另一半由於自願，完全撤出了上海。這時候只有托派留着，始終與中國的工人階級主力分享着悲慘的命運；但雖如此，我們也不曾能將多少持久的與較大的組織形式提供給上海工人。一直到抗日戰爭結束為止，上海工人不曾有過

革命性的工會組織。這裏的原因，也許要牽涉到中國革命的「特殊情形」了吧，我將在此後的機會中，把它作理論性的研究。

現在讓我再回到 1929 年冬天去吧。這裏我必須談到上海當時的黨內生活。大約在 1929 年秋末冬初，我們組織部的例會，開始談到黨內「糾紛」了，那是關於滬東與閘北的幾個「陳獨秀分子」的支部的。在此以前，組織部所討論的可說全都是工作問題、鬥爭方法以及人事調派問題。理論極少談到。記得有一次，負責閘北區的武扶經，在例會上提出報告，說有幾個擁護陳獨秀的人向他提出質問：為什麼六大說未來的中國革命仍舊是資產階級性質。武扶經從來看不起理論，擅長的是背決議，他在小組會上就依照決議背了一遍，但那幾個「陳派」不滿意，引經據典，說出了大套道理，弄得他啞口無言。現在在組織部會上，他於是特別提了出來，要求伍豪（周恩來那時的假名）解釋。此時負責滬東區工作的惲代英，也便報告了他出席陳獨秀們小組時所遇到的問題與看到的情形，據他說，陳獨秀們是正在和托派合流了。

周恩來彷彿沒有把問題看得很嚴重，除了將革命資產階級性質的老論據翻來覆去地講了幾遍之外，就說陳獨秀事件已有中常會（即政治局）在考慮。當時他沒有說出如何應付之法，不過我在事後，以及從反對派方面，知道了所謂應付就是由當時駐上海的國際代表奧 XX（這名字我記不清了）【朱正按 這個「奧 XX」指 И. А. 雷利斯基，化名奧斯藤。1927 年初來上海，擔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成員。】約獨秀談話，再勸他到莫斯科去，和聯共黨的領袖們討論異見，並要他在共產國際中擔任工作。陳獨秀當時是堅決地拒絕了這個提議。

這裏我要補述幾句關於陳獨秀的情形。1927年8月7日武漢的中共緊急會議正式撤銷了陳獨秀的書記職務，他便秘密回到了上海，住在滬東。經歷了革命的慘敗，負起了失敗的主要責任，並蒙上了機會主義的罪名，他心情的苦痛是可以想見的。我不知道他最初回到上海一個時期的生活如何，在以後相處中，也不曾有機會談起這些舊事。據汪孟鄒先生（獨秀的一個非政治的朋友）告訴我說，那時獨秀是寂寞而悲傷的，有似一隻鬥敗了的雄獅躲在山洞裏，靜靜地用舌頭在舐吮牠身上的創傷。這比喻有幾分適當的吧。陳獨秀這個人，不管他有怎樣的弱點，但他畢竟是一隻雄獅。人家可以打敗他，甚至可以殺死他，但你休想叫他乖乖地做替罪的羔羊。史大林的機會主義路線有系統地斷送了1925至27年的中國革命，結果卻將全部責任往陳獨秀頭上一推。陳獨秀如果是一個軟脊骨的政客，他肯和史大林合作來串演這齣悲喜劇，自認全部錯誤，以此來洗清史大林的罪過，使後者能抵擋住托洛次基們的批評，那末，陳獨秀不僅可以在共產國際當要人，而且多半還能重坐中共的首把交椅。

這樣做便不成其為陳獨秀了；他當然不肯在史大林的整套齷齪把戲中，自願或被迫地，充當這樣一個角色。可是憑了他獨自的思索，獨秀卻無法弄清楚在中國革命失敗中的責任，劃分出他應分的與被誣栽的部分。由於他對聯共黨內部的情形不熟悉，也因為他對無產階級的革命理論終究不太精通，他不能自力檢討清楚革命中的全盤問題。因此，他憤恨於史大林們妄加罪責的無恥，卻不能揭出此類無恥的就裏背景。他只好靜靜地躲在角落裏舔吮創口了。如此大約過了一年多，這中間雖然為廣州暴動給中央寫過信，六大時期他拒絕邀請到蘇聯去出席大會。但這些都是消極的規勸多於積極的批判，受屈後的負氣多於理直氣壯的反擊。經過盲動時期，經過六次大會，直到1928年

秋天的中東鐵路事件發生，陳獨秀才靜極思動，給中央寫了那封所謂「誤國政策」的信。受到了曲解與斥責，這才使這隻負傷之獅再度奮起從事搏鬥。獨秀那時還不曾和托派發生關係，信中所提意見，也不能說是錯誤。為了揭穿蔣介石利用民族主義來進行反蘇的陰謀，至少在策略意義上說，「誤國」口號不能算是荒謬。但那時由李立三主持的宣傳機關，便藉此對陳進行了瘋狂攻擊。認為陳獨秀墮落到「資產階級愛國主義」的泥淖中去了。獨秀起而應戰，同時在行動上也開始脫離一兩年來的消極狀態，有一群老幹部逐漸在他的周圍團結起來，其中有鄭超麟、何資深、彭述之、尹寬、李季、馬玉夫等。一個黨內的思想派別就此形成了。

當我回國並在中央工作的時候，陳獨秀們正在向托洛次基的思想突進。他們最初從留俄歸國學生方面，稍後從劉仁靜那裏獲見了俄國反對派的文件。看了這些文件，關於中國革命的過去部分，他們立即接受了。這對於陳獨秀應該是一個大發現。他發現了史大林在革命失敗後歸在他名下的一大堆錯誤，原來都是史大林自己一貫堅持，而事前均已由俄國反對派指出來的了。這些錯誤，有些是陳獨秀在執行時就表示過異見，有些則盲目地，當作「布爾雪維克主義」而加以忠實執行的。革命一旦潰敗，史大林或者厚顏地賴掉他頒發過的命令，或者諉過於命令的傳達人（如羅易、鮑羅廷），或者硬派是陳獨秀的自出主張。陳獨秀一來因為不清楚命令之所自來（當時莫斯科來的一切指示，只籠統地知道是「國際」決定，卻根本不明白如何決定，誰的決定，經過了怎樣的爭論才決定。），二來在山崩似的失敗打擊下實在感覺到惶惑，同時史大林配合了瞿秋白所進行的一切諉過於陳的運動【朱正按 這裏說「瞿秋白所進行的一切諉過於陳的運動」與事實有出入。據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說，這個「諉過於陳」的主意，是瞿秋白

和鮑羅廷兩人在廬山商量好的。他們認為「中國革命是失敗了，責任問題要有交代。中共一切，雖然事實上是遵照共產國際的指示進行，但不能讓共產國際擔負這個失敗的責任，因為莫斯科威信的喪失，將會影響世界革命，也會助長托洛斯基派攻擊史大林的氣焰，更會使中共黨員不信任共產國際的領導。為了使共產國際今後能夠領導世界革命，中共中央只有挺身出來負擔起這個責任，才是避重就輕的辦法。如果這一失敗責任要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全體來擔負，中央的領導就會破產，損失也太大了。陳獨秀在這次失敗中，原有重大過失；現在又採取了不正確的消極態度，那我們不如把全部的失敗責任，推在他一人身上。而我們自己應站在擁護共產國際的立場上，反對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這樣才能穩定中共中央的領導。」】，聲勢如是之大，竟使他有口難辯。現在，看見了俄國反對派的文件，真是恍然大悟了。這些文件幫助陳獨秀弄清楚了他在失敗的革命中究竟居於什麼地位，起了什麼作用，以及他該負的是什麼責任。文件使他明白了，他過去的主要錯誤，就只是「忠實地執行了由史大林決定的命令」。憑着親身的經驗，尤其是在「痛定思痛」之後，他當然完全同意了他前所未知的反對派的意見。他又同意了托洛次基關於中國當前局勢的見解，唯一使他猶豫的，乃是關於第三次中國革命的性質問題。在最初，他仍以為資產階級民主的說法是對的。

陳獨秀傾向托派了。這消息最初在組織部裏透露時，周恩來毋寧是以輕蔑態度來表示其反應的。「好吧，讓『老機會主義者』向托派去找出路吧。」他說着，嘴角是帶着微笑的。但是過不多久，一方面因為此事在老幹部中引起了波動；另一方面，多半是莫斯科強調這件事情的嚴重性（史大林當然更懂得這個具國際聲譽的老革命家走向托洛次基所能引起的影響），黨中央不得不認真來處理這個問題了。結果便

是讓國際代表出面與陳獨秀談話，想把他騙到莫斯科去。陳獨秀堅決拒絕了這個「光榮的邀請」，並且進一步地積極為反對派思想作鬥爭。此時國際與中共便開展了所謂反對「托陳取消派」的運動，在中國開除一切附和陳獨秀主張的同志；在莫斯科則以格柏烏的直接力量，將孫中山大學中幾及半數的學生投進了監獄。

遭受了重重打擊和誣衊的陳獨秀，並不如當時某些中央的領導者所想像，是「人所共棄的老狗」。實際上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不論在黨內黨外，國內國際，他那時都還是最有聲望的一個中國共產主義者。他老人家的轉向托洛次基主義，事實上曾引起了中上幹部內一次軒然大波。在陳獨秀起草的那篇有名的告同志書之後，跟着發表了一個集體文件《我們的政治主張》，上面簽名的共 81 人，這些人都是老黨員，曾經擔任過重要工作，或當時仍然擔任着地方或省委級工作。除了簽名者之外，還有許多幹部是動搖的，他們很苦悶地猶豫着，決不定該跟「老頭子」走好呢？還是跟「新中央」走好？那時我還在中央，我有機會親眼看到了這些個苦悶的動搖者。譬如組織部裏做技術工作的黃文容，因為他一向跟在獨秀左右做書寫工作，對老人有很深敬意，在「反取消派」時期表現得非常痛苦。何柏丞是我們部裏的交通員，幾年來幹內部工作的，對陳獨秀也有深厚感情；當我被發現為托派，他與我作最後一次接觸時，他甚至歎息着自己家累太重，言外之意，否則他倒是可能同我們一起走的。

說因為「家累太重」，以致使本想傾向托派的人停止了動搖，這話聽起來似乎是不可信吧。這裏我必須談一點當時共產黨員的生活問題。以全部時間貢獻給黨工作的人，當然要由黨供給生活費，這是中外的任何政黨皆然的。列寧曾經特別研究了這個問題，他認為要使無產階級政黨能夠成功，一個先決條件就是培養「革命職業家」，這就是

說，必須有一部分人，用他們的全部時間，全部精力，去研究革命的理論和實踐，認真從事社會主義的鬥爭。列寧最看不起流行於社會民主黨的那種業餘革命作風，這些人只把黃昏或星期日貢獻給「革命女神」，因而也只有在歡樂的宴會上，或談笑的沙龍中，他們才用「社會主義者」、「激進分子」的資格去嚇唬嚇唬高貴的太太們。他們不能，其實也不想去傾覆資本主義。布爾雪維克黨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完成了無產階級革命，多種原因之一，我們應該說是革命職業家的養成。有了這批專家，才得完成了那樣艱巨的事業。因此列寧的此一觀念，本身是無可疵議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成敗，亦自當以這種專家能否養成為先決條件。

不過在中國共產黨反托運動時候，這個「特效藥」卻顯出了一種相當有害的「副作用」。在革命嚴重失敗以後，重建起來的黨機構擁有了為數不少的革命職業家。這種人數目之多，至少在城市裏，那是甚至超過了未曾職業化的普通黨員的。按照一般的組織辦法，普通黨員，即從事社會上普通職業的共產黨員，應該繳納黨費，以此去維持那些用全部時間幹黨工作的革命職業家。但因為黨費收入太微，而革命職業家的維持費又太大，巨大的不敷之數，從來靠聯共黨的幫助。當我在黨內工作時，黨的主要支出，據說是靠列寧格勒黨員的全部黨費。這種捐助生動地表示出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團結精神，授者與受者都極應當。只有反動派才會對此作無聊的叫囂；同時只有史大林才會無恥地將此種捐助之靳或予來挑選兄弟黨中的革命者，不過這事與我要講的史實無關，不去談它吧。當時，中央工作人員的生活費每月25元，區委會的同志為19元。這個數目約等於一個普通工人的工資。如有特殊需要，如疾病之類，或有家屬而「住機關」者，則有額外補貼。這點生活費當然不寬裕，但足夠維持。

我應該說，沒有一個人是為了這點生活費而當共產黨員的。那末我怎麼又說，生活上的顧慮曾使某些傾向反對派的人停止動搖呢？這裏必須指出一個明確的分別。在革命與不革命或反革命之間，生活問題不會使任何一個革命者作片刻的考慮；但若問題只關於兩條革命路線之間的抉擇時，生活是否安定就會起相當作用。而當時的史大林路線與托洛次基路線，畢竟還只是同一革命黨內的兩個派系呀。在蘇聯，許多人犧牲了崇高地位與優越的生活，只為了追隨托洛次基的主張；可是有更多的人，正為了要保持既得的地位和生活條件，以致放棄了反對派主張的。在中國，情形不如蘇聯那麼嚴重，兩條路線的選擇並不意味着克里姆林宮與西伯利亞，但是做反對派的滋味卻不是好嚼的。它沒有一個錢，沒有一個團體會給它以任何捐獻。每個反對派分子，非但要自謀生活，而且要從米飯錢中節省出可憐的餘款來，維持組織，進行工作。

後來脫離了中共的張國燾，當時曾對彭述之說：「你還能翻譯，如果我出來，靠什麼生活好？」這一句非常符合於張國燾精神的說話，其實能表示不少當時動搖者的苦悶。

當時時常可以聽見這樣的感慨：能從革命職業家變成職業革命家（意指另有一份職業來維持生活）就好了，這樣，行動可以自立得多。誰想得到呀，中國舊社會中就業的異常困難，竟在某種限度內幫助過史大林主義來打擊托洛次基主義。

話雖如此，因陳獨秀變成托派而釀成的黨內危機還是很嚴重的。由中央到各省省委，由黨到青年團，由黨組織到群眾團體，到處發現了「取消派」的附和者，於是進行了有系統的清除運動。在那一時期的《紅旗》周報上，每一期上都登載了個別的和集體的開除黨籍的通告。

不知道是周恩來真的不懷疑我的托派關係，還是明知我的關係而想給我一個「暗自轉變」的機會，總之，在反托陳鬥爭的初期，完全沒有牽涉到我的頭上來。我的工作一切依舊。我的態度是：拼命工作，儘少說話。在組織部的會議上，恩來的發言永遠要佔去全部時間的十分之九。周恩來是一個非常傑出的行政家，事務處理上簡直是天才，說話的才能也顯然屬於第一流的：但和他共事一長久，有一點使我很奇怪，就是他一開口卻不能自休；話說得有條理，卻不能集中要點；有層次，卻諸多反覆。一些原極淺近的事理，同時聽話的對象又只限於部裏的五個幹事（有時再加上他的太太鄧穎超），他卻會像對小學生教書似的，分析了又分析，解釋了再解釋，把一個報告往往拖長到七八個鐘頭，使聽者倦極欲睡。陳獨秀和毛澤東一樣，都是文字優於語言的，但他們那種雖不漂亮的演講，卻能言簡意賅。在這一點上，周恩來實較遜一籌。不過周恩來的此一弱點，倒給了我很大方便：我的有意沉默無從覺察了。健談如譚代英和羅登賢，會議中也是不講話的。他們多半在會議休息中，特別當停下來用膳時，才用閒談方式，提出某些意見。通那個時期，只有一次會議上我的發言，直到今天還記得很清楚，那是關於江西蘇區中的土地問題。江西意見由張國庶（張國燾之弟，後被蔣介石所槍決者）帶來，其中有這樣的一個問題：要認真發動土地革命，勢必反對富農；但反對富農，與六大規定的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性質不符。這個「矛盾」使會議上的好些人為難。周恩來發表了一大篇議論，可始終沒明確說出：究竟應該根據鬥爭的客觀事實來規定理論呢，還是固守理論來限制鬥爭。因為問題觸及了史托爭論的核心之一，我便不自禁地發表了意見，說：如果鬥爭的形勢和需要必須反對富農，那就反對吧，不必理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這樣說，自然不曾暴露我的托派立場，但它使座中人略略驚異

了。對反托鬥爭有過經驗的武扶經尤其敏感，竟提起這種說法的傾向性來，我於是又沉默了。

我的沉默使我一直工作到 1930 年初春的大病；黨籍則保留到莫斯科托派的全體被破壞，那邊的叛變者供出了我的關係。

莫斯科中國留學生中的托派組織，自從我們那批回國之後，據說仍有發展。我走的時候，全蘇聯各學校裏的托派約有二百多人；再有發展，大約要佔當時所有中國學生的半數了（合共五百餘人）。對於這潛存的托派勢力，我說過，以王明為首的學校黨部是早具戒心的。但他們始終不曾料到我們會有這麼大的力量。在黨部的估計中，真正的托派也許並不存在。他們以為在 1927 年年尾早就撲滅乾淨了。1928 年前後俄國地下反對派的飛速發展，王明等人當然不會知道，因為蘇聯的黨官們不會告訴他們。他們懷疑由東方大學轉入孫大的同學，推測其中會雜有托派，但是最大多數的東大學生，據他們想，只是些以老賣老的消極分子，並非真正托派。因此，黨部一向是以鄙視或歧視來對待東大學生，卻不曾達到敵視程度。這態度的激劇轉變，我相信是受了上海托派活動，特別是陳獨秀變成托派的影響；而學校當局竭盡一切力量去破壞托派，一定還由於國際（亦即史大林）的直接命令。

下面的事實是根據後來從西伯利亞越境逃歸的人敘述的：

大約在 1930 年初^[2]，學校當局掀起了一次新的反托運動。壁報上，小組會議上，紛紛舊事重提，把托洛次基「為害」中國革命的舊立場，連同他的新主張（即主張在中國提出以全權普選的國民會議口號為中心的民主政綱），拿出來加以斥責。托洛次基的新主張本來為一切非托派的同志所未知，此時才從黨部的斷章取義的文件中獲悉一

些。這主張被稱呼為「取消主義」，同時又宣佈他和陳獨秀的「有機的機會主義錯誤」勾結在一起了。托派同志們知道，這是國內托派活動在莫斯科引起的影響；人們的心理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他們料得到嚴厲的鎮壓將要下來。兩個一直當作托派標本留下來的陳琪、聞岳，據說於此時充了軍，充到南俄靠近波斯的邊界去；這二人想乘機逃入波斯，一人被國境衛兵當場擊斃，另一人押解回來，投入了莫斯科的監獄。其時所有舊東大的學生都成了被偵察的對象。一些特選的密探被派入「東大系」中，甚至要他們設法參加反對派。有一個東大學生，俄名「洛果夫」，諧音「老寡婦」的（此人我已在前面提起過），被派充去擔當這個任務。「老寡婦」與「媽媽希金」（即代替我任三人委員會委員的趙言輕）很要好，雖然政治傾向相反，但因友誼篤，生活密切，說話多半無所戒備，「老寡婦」一定知道「媽媽」參加了托派。前者於是就集中力量向後者進迫，軟硬兼施地壓迫趙言輕自首。趙為人非常老實，但感情纏綿，缺剛毅氣。經過了一個時期的痛苦動搖，終於屈服了，將他所知的托派名單全部交給了「老寡婦」。行動據說來得甚快，就在當夜，大批武裝的格柏烏警察來到了宿舍，將數約二百餘人的中國學生從睡夢中喚醒，送上囚車而去，趙言輕一個人沒有被捕，「老寡婦」們還帶笑安慰他，說他的「光榮的服務」會得到「黨」的優厚獎勵。

搜捕完畢，天尚未明，水晶流蘇的大掛燈照亮着空洞的大房間，房中十餘隻眠牀全都空了，趙言輕一個人靠在他的枕頭上，那種淒清寂寞的滋味足夠他受的，良心的呵責使這個感傷的變節者無法再生存下去，就在當夜裏懸樑自盡了。^[3]

竟有一半中國學生是托洛次基主義者！這個新發現的事實之激動史大林及其徒眾們，一定比陳獨秀們之變成托派更加強烈。他承認孫

中山大學的辦理是失敗了，決定停閉。非托派的學生多數遣送回國，少數撥入其他學校讀書，或派至某些機關服務。被捕的托派受到嚴厲的拷問，有些人屈服了，於徹底坦白之後，開除黨籍，並於短期刑滿出獄之後立即送回中國；又有些人，黨方認為能起作用的，則雖表示改悔，亦不准送回中國，怕的是他們回國後會增強中國托派的力量。他們被遣往邊區去做苦工。有些人非常堅決，其中有我的老朋友范錦標同志，據說他入獄不久便雙目失明。他們拒絕承認錯誤，受到了極其難堪的待遇，被長期幽禁在西伯利亞的監獄裏。關於這些同志們的消息，我們只從一個南斯拉夫的共產主義者安東·西里喀（他本是南共出席共產國際的代表，因忤史大林被捕，入獄數年，後被釋，離蘇後曾寫過一系列關於史大林監獄的文章）那裏聽到過一點點，據說，這些黃臉皮的共產主義者所受的待遇，比白種囚犯們更慘。

在那二百多個反對派中，除了不到十名被捕後因徹底改變而得以送回中國，更有兩名由西伯利亞偷越國境成功之外，全都下落不明。一定有不少同志殞死在史大林的監獄中，或喪命在格柏烏的排槍之下了。這批同志不可能回到中國來完成他們的志向，不但是他們的不幸，也是中國托洛次基主義運動的不幸。

從大批被捕人的招供中，黨部掌握了有關中國托派的全部情報。依照名單，有三十多個托派已在最近幾批遣送中回了國。莫斯科立即給上海打了密電。此時我正病倒在醫院裏。周恩來發現名單中有我的名字，找我談了一次話。他的態度很友善，大意說：他滿意我幾個月來的工作，所以希望我為了自己的「革命前途」，作一書面聲明，放棄托派意見，在《紅旗》上登載；這樣，他可以保證我依舊留在黨內工作。我沒有說什麼話，只答應寫聲明。第二天，部裏的交通來取，看了很是失望和難過。因為我所寫的完全不是他們所希望的。我表明了

自己的政治意見，聲明我不同意黨六次大會所作的關於中國革命失敗的原因，關於目前局勢以及前途估計的種種決定；但我同時指出：過去一時期的工作已經證明：我並不曾因自己的不同意見而在工作中違反多數的決定；我要保留自己的異見，願意繼續在民主集中制的組織路線下為革命服務；因此我希望黨也應該遵照列寧的組織原則，容許我依舊工作。

交出了聲明，我當然不會天真得以為周恩來李立三等人能有列寧式的寬容大度（他們即使有這種氣度，但在史大林的命令下也決不敢做）。我知道，組織不會再來找我，也不會再負擔我的醫藥費了。他們將要做的只是在《紅旗》報上登一個聲明，開除我的黨籍。就在當天，我遷出了醫院，另租一個亭子間住。原來住在滬中區的「機關」，我不曾拿取一椅一桌，通知組織去接收。幾天之後，我被開除黨籍的通告登出來了，那是與吳季嚴併案辦理的。季嚴當時是宣傳部的幹事，相等於我在組織部的工作。

就這樣，我被迫結束了前後不滿五年的與中共的關係。不過在我們方面，直到1934年成立中國共產主義同盟止，我們始終以中共的一派自居，並不以他們的非法（即違反了列寧組織原則的）處理而自外於共產黨。

這時立即遇到的困難是生活和醫療問題。妻子Y本由組織介紹在滬西勞工醫院做事，此時也因快近分娩而出來了。我患的一次割症不曾痊癒，根本不能起牀。生活的威脅相當大。唯一可以找點生活費的是賣稿子。一個反對派的同志那時正開了一間小書店：滬濱書店，準備出版些社會科學的古典作品。我於是口譯了蒲列哈諾夫的《從唯心

論到唯物論》，由妻子筆錄，居然賣到 120 元（約等於 5 個月的黨內生活費），如此才算渡過了被黨逐出後的第一個難關。

病中與病後，我開始以全力從事中國的「托派」運動了。

注釋

1. 為要更好了解關於「高潮」問題的爭論，讀者最好能參閱毛澤東在 1930 年 1 月所寫的文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那篇文章中，他引證數月前他寫給中央的信，信裏批評中央的指示消極。按照毛氏當時的意思，所謂「高潮快要到來」那句話，應了解為：「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我們如果假定 1946 年為中國新革命真正高潮的來到之期，那末上面所說的航船傍岸，朝暾上升，以及躁動了的嬰兒之離開母胎，需時十有六年！
2. 據當時在莫斯科的張國燾回憶，孫中山大學的清黨開始於 1929 年底，延續了三個月。—— 1975 年注
3. 最近看到美國堪薩斯大學東亞研究中心 1971 年出版的一本書：《莫斯科中山大學與中國革命》，著者盛岳，他原名盛忠亮，本是「二十八個布爾雪維克」之一。1935 年脫黨。當 1929 年秋冬，王明一系藉俄共格柏烏之力消滅旅莫的托派學生時，盛忠亮是學校黨部的一名委員，而且是專門負責對付托派的。書中有關當時反托鬥爭經過的敘述，與我所聽說的故事有些出入，茲特轉引若干歧點，讓讀者們參考。1、孫大那一次清黨運動是從 1929 年秋季開始的。趙言輕（盛忘記了他的姓名，只記得他是河南人，當過教師和校長）在緊張與恐怖的清黨空氣中，對自己的托派信心發生了動搖，感覺到彷徨痛苦。在他預定要在大會中上台自報生平並接受群眾批鬥之前四天，自動到黨部去找盛談話。談話中趙作了不徹底的自首。盛於次日將趙帶去見大學黨部

書記伊格那托夫，後者歡迎他「跳出火坑」，鼓勵他作更多的揭露，保證他不會受到托派的殺害。再次日，趙又找盛密談，向他透露厭世之意，說要自殺。盛加以安慰，可是第二天，即在趙接受審查的第一天黃昏，當同學們尚未回房時，趙卻在宿舍內自縊死了。2、趙的慘死給整個大學帶來了驚慌與恐怖。清黨大會繼續召開，會上由黨部預先安排的批鬥加緊進行，非王明系的學生人人自危，托派學生中有的動搖了，托派的領導機關也發生分裂，其中一個領導人李平，在一次大會上，突然自認托派，同時交出了大約 80 到 90 個托派學生的名單。3、有些托派宣佈退出組織，他們有不少人死硬到底，於是格柏烏動手，將所有拒不悔改的托派領袖逮捕起來，送進監獄。以上諸點，摘自原書第 175-177 頁。

我相信盛所講的經過比我當年聽自逃回中國的托派所敘述的更近事實，因為他與鬥爭直接有關。只是這裏有一點我必須指出，他說李平的名單為八九十人，這雖然比共產國際從來宣佈的「19 人」多了許多，但仍非當時莫斯科中國托派的確切數字，因據盛自己在書中所說：「托派的組織只有縱的聯繫，沒有橫的聯繫，一人叛變，能告密的只有他同一小組的人，不及其他。」李平雖然是領導人之一，但我知道他不是管組織的，他不可能掌握全部名單。—— 1981 年 5 月注

七、由四派到統一

從回國到開除這段期間，我以全部時間做黨的工作；但和反對派組織仍舊保持着經常接觸，大約每隔兩周，「我們的話」的人和我見一次面，談談兩方面情形。那時我和「我們的話」的上海負責人（史唐、張特等）一樣，對於陳獨秀等人的趨向托派，不但不表示歡迎，而且很是厭惡，「沒有出路的老機會主義者向我們托派投機了」，乃是我們共同的想法。從這一看法得出來的態度和對策便是：揭穿那些機會主義領袖們的「卑鄙動機」，爭取其下層群眾。

毋須說，這樣的看法和態度是徹頭徹尾錯的，但我一直保持着，直到托洛次基親自出來干涉為止。

劉仁靜，以及和我一同回國來的趙濟與劉胤等，根本不肯參加黨的工作。劉仁靜的情形我在上面已經說過，他回來後只簡單地給中央遞了個聲明，表明自己態度。劉胤（即後來變成國民黨文化人的李麥麥）和趙濟等則參加了訓練班，過後又被派赴滬東（劉）及浦東（趙）的區、地委員會實習，卻都藉故規避，甚至沒有去報到。他們就這樣離開了黨。他們和劉仁靜一起，以莫斯科回來的老牌反對派身份，整天與陳獨秀等討論中國反對派的新組織事宜。這意思就是說，根本不

承認在中國早已存在了一二年，並且在華南和華北均已有了了一些工作的「我們的話」，他們要成立一個不是「孩子們胡搞的」，而是由「成熟政治家」主持的反對派組織。「我們的話」方面從對陳獨秀派的基本態度出發，非常敵視劉仁靜和劉趙等人的作為。我也懷有這種敵視，理由則除了對「陳派」估計之外，又因為劉仁靜破壞了我們在莫斯科早已通過的決定：「參加已有的組織，不自立門戶」。至於劉胤，在莫斯科根本不曾參加過反對派，只是和我們有些接近而已。回來後自封老牌，招搖撞騙，更引起我的反感。

這是我未被開除時候的反對派情形。等到我被逐出黨，以及病癒之後，情形又不同了。劉仁靜和陳獨秀等決裂了，原因是為了他想當宣傳部長未成（這事實當時我不知，是後來人家才告訴我的）。「我們的話」內部也發生了紛爭，華北、上海和華南的領導分子之間，為了某些問題（這些問題在當時我就不太清楚，今天更是完全記不起了）鬧到了分裂程度。華北的反對派，以宋逢春及董自誠為首的，此時和劉仁靜聯合在一起，一方面反對陳獨秀，另一方面反對當時以區芳及張特為首的「我們的話」。為要證明自己的存在理由，劉仁靜起草了一個意見書，主要是駁斥陳獨秀的機會主義的「殘留意見」。劉胤與趙濟此時也跟「陳派」決裂了，其間的經過和理由，我始終不曾知道過，他們的左右也圍集了一部分人，過着「派系」生活。

我那時正害着大病，從偶然來探訪我的同志們口中，知道了這些情形，心裏非常懊喪。對「陳派」，因為有了上述成見，根本不願和其中我原來相識的人來往。「我們的話」，我自認為其中一分子的，卻失去了聯絡；因為區芳跟我不認識，張特與我也十分生疏，從來見面的史唐，此時卻進了「西牢」。劉胤們是我在生活上頂接近的，但我也最最看不起這些人。在數十年的革命經歷中，眼見過形形色色的「偶

然分子」和投機家，卻不曾見過一個自私自大的小資產階級政客有似劉胤其人者。此人在北伐時期是武漢學生運動的領袖，口才好，煽動力強，因此領袖慾也特別大，然而思想淺薄，品格異常卑劣；與捨己為人的革命家性格沒有絲毫共同點。所以他後來迅速轉變成蔣介石的御用文化人，那是十分自然的。在莫斯科時，他曾要求和反對派「統一」——他一個人和一二百多人反對派統一，意思就是說，反對派如果禮聘他來當領袖，他可以考慮加入。這樣瘋狂的提議，使范錦標大發脾氣，同時也成了莫斯科反對派中的一個笑柄。以這樣一位「大人物」為首的小派，我當然絕對不願接近。剩下來便只有劉仁靜和宋逢春他們了。宋逢春乃莫斯科最早的反對派之一，於1927年冬天被開除黨籍，和區芳等一同送回國的。回國後，他和後來死於獄中的葛崇鏗及蕭長彬到了北京，會合了當時在那裏擔任黨工作的羅漢，在學生中開展了一些工作。羅漢被捕後，宋逢春大約在1929年底來到上海，適值這裏的反對派在苗長中鬧着糾紛的時候。他原屬「我們的話」正統，但因為當時區芳和張特間正發生衝突，他看了不高興，管自己進紗廠當小工去了。他本是一個好革命家，具有高尚品質，首先就是能吃苦，不愛出風頭。可惜過分崇尚實際，對理論較少興趣，有經驗主義毛病。因此，當他與我一起被捕，及他出獄數日又與陳獨秀同時被捕之後，就對革命失去了信心，與老朋友們告別而去了。

在1930年春夏間，宋逢春是與我最接近的，那時他和華北來的其他一些同志，正和劉仁靜一起，想提出一個集體意見，作為團結反對派的基礎。我看了劉仁靜的〈告同志書〉，發現他關於國民會議口號的見解，依然是莫斯科當年的老一套，說是要為中國議會制的前途鬥爭，他在文章裏摘引了馬克思《霧月十八日政變記》中一段長文，藉以說明議會制度如何優於蔣介石的軍事獨裁。我看了完全不同意。可是劉仁靜當時卻非常「謙虛」，說意見書中關於國民會議一段可由我重

新起草。在宋逢春等人的催促下，我另行起草了一節，我的意見是：在反革命勝利而民主任務均未解決的當前局勢中，國民會議是唯一正確的口號，以此重新團結被擊潰的工人階級，以此統一農民和城市中小資產階級的鬥爭，從而使共產黨再度踏上政治舞台，並促使新的革命的到來。至於在此鬥爭的過程中，是否會出現議會制度，這制度是否要形成「歷史時期」，乃是另一問題；這些問題只有在實際鬥爭中才能回答。我們提出國民會議口號的主要目的，則在於，在反革命時期中準備革命和走上無產階級的革命。

關於國民會議口號的看法，構成了中國反對派在往後許多年中聚訟最多的一個問題。我在那時所持看法未必完全正確，但比劉仁靜的純粹社會民主黨人式的解釋，總更符合於托洛次基精神的。宋逢春等都同意我的意見，劉仁靜略事爭辯，卻竟同意將我所起草的一段代替了他原有的。這樣，我就不能不在〈告同志書〉上簽名了。這文件上簽名的彷彿記得共有 19 人，有黎彩蓮在內。整個華北區的反對派事後也同意這個文件，不過沒有簽名。劉仁靜和我不久辦起了一本雜誌，取名《十月》，因之在當時紛紛對峙的小派別中，我們這群人便被命名為「十月派」。

到 1930 年夏天時候，有四個激烈排他的反對派小組最後形成了：除「十月」外，陳獨秀等出版機關報《無產者》，名「無產者社」，《我們的話》仍繼續出版，被稱為「我們的話」派；還有劉胤趙濟等四五人則出版了一期（始終只出了一期）《戰鬥》報，因而號為「戰鬥派」。

現在回憶起當時派別間的「鬥爭」情形，只覺得五花八門，烏煙瘴氣；但若仔細想想，這也正是每一個政治思想在運動初期的共通現象。個人與派別偏見，和革命思想的真誠差異交織在一起；時常會表

現得非常怪誕。崇高的與卑劣的動機往往會用同一方式表達出來；而各個人品質上的賢或不肖，當事情還只限於說話或文字之時，也總是混淆不清的。光就轉向反對派的動機說，已經是頗不一致了。有的，為了黨內不易得志，企圖到新的方面去找出路；有的，在白色恐怖的猖狂中害怕了革命，把反對派看作了向後退卻的一塊墊腳石；又有一些人，只想利用反對派的更左的名義，藉以掩飾自己的消極，使自己的脫黨能心安理得……不過儘管有這許多卑鄙不純的動機，我卻還應該說，當時的最大多數反對派分子，都是由於真純的革命動機，即由於真誠相信託洛次基關於中國革命的主張比之於史大林們所定路線，更符合中國革命的利益；因之，不顧他們既得的「利益」或已有的地位，都願全心全力地為反對派鬥爭。

此種良莠不齊的現象，以各種程度之差，同樣存在於四派中。在四派「混戰」時期，卑劣的野心分子站在最前列，各自稱王，自命不凡，全不以整個反對派的利益為念。後來，由於多數同志的壓力，特別因為托洛次基的出面勸告，統一運動展開了，真的革命者抬起頭來，他們衝破了各自山寨大王們的封鎖與排他的禁律，很快就使這些莠草陷於孤立，促使他們消極離開，或積極地幹反動勾當去了。

四派分立時期延長了一年多，自1930年初至1931年5月1日為止。此一時期又可劃分為兩截：1931年1月以前主要是誇大分歧時期，1月（托洛次基1月8日來信，力勸反對派統一）以後則為「協商」階段。在前一時期內，主要爭論，就我記憶所及，乃關於：國民會議口號問題；紅軍問題；未來革命的性質問題；以及所謂過去革命失敗的教訓問題。我在這裏當然不想詳細描述那些舊爭論，事實上單憑記憶根本也不可能描述。我只想指出，那些爭論是被有意誇大了的，目的在於為分裂存在作辯解。當然在同樣誇大中，有人出於革命家的真

誠，有的卻是明知故犯。後一情形的最出色的例子是劉仁靜。他最初是熱烈地歡迎陳獨秀走向反對派，及至所謀未遂（「陳派」的宣傳部長），他便「我愛吾師，我尤愛真理」起來，再等到與「十月社」決裂，他又發現「吾師」與「真理」合而為一了。「真理」是放在他的口袋裏的，因之「爭論」之是否存在與解消，常在他一轉念之間，隨他個人的好惡與利害而轉移。不過像劉仁靜那樣的人畢竟是極少數，當時多數同志的投入爭論，或由於所見未明，或由於善意的偏見，或由於對真正分歧的不自覺的誇大。因此，當協商進入後期，各派相互間的接觸較頻，爭論差不多消滅於無形了。關於國民會議這個口號，幾年中浪費了中國托洛次基主義者最多的筆墨，爭持最久，分歧最多。然而正如托洛次基所指出，那些爭論不是學院式的，便是猜謎式的。譬如：它是否能實現；實現了能否解決問題？它與蘇維埃的關係如何？都提得相當可笑，因為只有真實的革命發展才能解答它們。在此問題上真有原則性分歧的，只有劉仁靜和大多數反對派之間的不同。但整個反對派中無一人附和劉仁靜的。至於紅軍問題與革命失敗教訓問題，那是專為對付陳獨秀的。在某期的《無產者》上，陳獨秀寫了一篇論中國「紅軍」前途的文章。文章內容其實只重複了馬克思、恩格斯對農民戰爭的傳統觀念，即肯定農民鬥爭如果不處在城市無產階級的政治領導之下，一定會墮落或被消滅，這意見其實亦為托洛次基所堅持，如果說陳獨秀這篇文章有錯誤，那末問題當不限於陳獨秀，而應牽涉到馬克思、恩格斯與托洛次基。（中共今天的勝利似乎證明了那個觀念的反面，那末問題也將是這一根本的馬克思主義的命題在現時代及落後國家中是否仍舊正確這一點，而不是什麼陳獨秀的錯誤。）可是在當年，為了陳獨秀那篇文章中一些不恰當的措辭及趨向偏頗的論斷，我們（我是其中之一）就與史大林派的叫囂混在一起，拼命攻擊陳獨秀的「誣蔑紅軍」（此事可參閱後面我和陳獨秀在武漢的關係）。

所謂革命失敗的教訓問題，簡單只是要陳獨秀承認他分擔着史大林罪惡政策的責任問題。當時許多人覺得陳獨秀承認他是史大林政策的簡單執行者是不夠而虛偽的；我們以為陳獨秀是一個自覺的執行者，因此他的如此承認乃是一種脫卸責任的狡計。這個要求，我至今不覺得是完全荒唐。陳獨秀決不是「傀儡」，而是一個有獨立思想，有堅強意志的革命者，所以當 1923 至 1927 年間，他對於國際來的訓令或決議，有的是違背了他的見解而服從的，有的則是同意了才執行的。如果陳獨秀真能把二者分清，詳細地追憶和記載出來，對於反史大林罪惡政策的效果上可能會更有力的吧。對於中國近代革命史及中共信史的編成亦必有極大裨益。可惜他不曾這樣做。不過從另一方面看，當時那群年青托派所以提出此要求為的要「打擊陳獨秀的投機」，換句話說，就是要陳獨秀先向「正統派」屈膝，那當然是荒謬的，以此而延阻了或妨礙了反對派力量的團聚和增強，更是不該有的事。關於革命性質的爭論大致是這樣：最初，問題圍繞於「無產階級專政」呢，抑是「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後來，它改以「第三次革命是否一開始就將是社會主義性質」這一方式提出來。在陳獨秀起草的《我們的政治意見書》中，說中國第三次革命的勝利必須建立「無產階級與貧農的專政」。這樣提出，與托洛次基的習慣提法略有出入。托氏的傳統公式是「無產階級專政」，或「領導貧農的無產階級專政」。陳獨秀的提法似乎將無產階級與貧農置於平等地位了，因此，彷彿有對布爾雪維克派的陳舊公式，即對「工農民主專政」有妥協之嫌。這指摘首先為劉仁靜所提出，而幾乎為全體非「陳派」的托洛次基主義者所附和。劉仁靜在這裏攻擊陳獨秀的虛偽，說他企圖用一種巧妙偽裝，將「民主專政」的毒藥偷運進反對派，故稱《意見書》為「一篇虛偽和可憐的文件」，我們沒有和劉仁靜一樣，想憑此一點以根本否定陳獨秀的左傾，但顯然受着這個批評影響，認為「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是接近

於「民主專政」而與「無產階級專政」根本相反。直到最後，托洛次基讀了陳獨秀的「文件」，說「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乃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通俗與補充的公式，二者性質根本不相衝突，此時劉仁靜才閉口無言，我們也恍然大悟了。「第三次革命一開始便將是社會主義社會性質」，這說法其實是托洛次基的，不過引起爭論卻由於我的一篇文章。只因此事發生已經在統一運動實際進行以後，這裏暫且不談。

總之，在 1930 年中的四派混戰，正如托洛次基後來所指出：「是完全沒有原則分歧的」，只因有了派別才有分歧，有了分歧更不免多所誇大。因此，托洛次基研究了各派寄去的文件之後，便於 1931 年 1 月 8 日給反對派來了一封長信，提議四派立即進行統一。托洛次基的話說得如此懇切：「親愛的朋友，你們的組織和報紙，今天就確定地合併起來吧！不要太延緩了統一的準備工作，因為不然，你們就會不知不覺地去製造一些人為的分歧意見。」他的威望又如此之高，以致連最死硬的宗派主義者都沒法再找拖延統一的藉口了。於是在接到來信之後不久，四派就決定設立一個「統一協商委員會」，以便起草一些共同文件，在共同立場上，實行四個組織的統一。

那次統一運動，正如我在前面說過，給反對派盡了很有益的作用。它不僅是一個集合和積聚的過程，而且是清除和淘汰的過程。有不少個像舊梁山上的王倫之輩，不須要林教頭動刀，僅僅因為受不了較宏大的新局面的壓力，便紛紛從「聚義廳」自動出走了。為了更好地了解這個分合過程起見，且讓我談一點各派的人的情形。這兒請先從我所隸屬的「十月社」談起。「十月社」的當然領袖是劉仁靜。他年紀大，資格老，當過中共第一次大會的代表，做過青年團總書記，又在托洛次基的土耳其家裏作過客，和老人討論過問題；據他說，他那個「列爾士」的筆名還是托洛次基給取的！在莫斯科時，我和他雖有

過不同意見（前面已經提及），但對這位前輩總有相當敬意。回國後，我和其他一些同志能夠於1930年初同他合幹「十月社」，多少總因為對他尚存有若干尊敬。可是一經和他共同工作朝夕相處之後，我們卻很快發現這個人的渾身毛病。本來我們相信他的理論修養會比一般人高些，書似乎讀得多些，而事實卻不然，其淺薄有時竟叫人不信。在列寧所指出的構成馬克思主義的三要素中，只有西洋革命史他算有多少涉獵，於政治經濟學全屬外行，對哲學則單單懂得一些名詞。思想絕不穩定，往往以「今日之我反對昨日之我」，一切可以隨自己的私人打算來改變；因此他所有的「學問和理論」，只是為此種不斷改變作詭辯之用。不過這些還不是最不能容忍的，使我們和他共同工作了數月而即行分手者，卻更由於他那種根本不是革命家的品質。可笑的自私，愚蠢的自大，眼睛永遠看見名流，足尖從不屑走近工人的那種作風，與我們所有的人無法合得來。《十月》只出了二期，劉仁靜便與「十月社」分裂了。此後我們繼續出《十月之路》，而劉仁靜則謀與「陳派」再接近而被拒後，乃單獨出版了兩期《明天》。反對派統一後，劉沒有在領導機關佔一席位，他便消極了。1934年受僱於易洛生，替他翻譯《中國革命悲劇》的材料，在北京被捕，表現得非常可恥，「反省」後出獄，索性投入了胡宗南的反共集團。中共當權，他又首先寫聲明來污蔑他久已放棄了的托洛次基主義。

幸而這樣的人物極少，在當時「十月社」（上海連同北方）的八十餘人中，跟劉仁靜走着相似道路的只有陸某一人。有更多的戰士，例如葛崇鏗、黎彩蓮、羅漢等老同志，都曾提供了最可貴的獻身榜樣，值得我們對死者的追憶與矜式的。

1930年以後被稱為「我們的話」派的，實則包括着上海和香港全體原有的反對派分子。其領導層即是莫斯科第一批被開除送回

大學生。他們已經在中國做了一兩年工作^[1]，特別在香港，因區芳、陳亦謀等的進入船塢做工，在工人階級中已多少建立了一些聯繫。在上海：由史唐、陸一遠等人主持，工作成績雖比較不甚顯著，但在知識分子和工人中，也結上了若干關係。所以在當時，如果1929年夏秋間回國的反對派分子，真能遵守大家在炮兵學校裏那次會議的決定，統統向黨報到，經由黨來開展（黨內黨外的）反對派工作，同時與陳獨秀等進行加入或合作的談判，那末「四派」的紛亂情形或可避免。中國反對派的歷史也可能多少不同。事情所以未能按照預定步驟來實現，我不得不把主要責任歸之於劉仁靜和劉胤。這二人的狂妄的野心，赤裸裸的領袖慾，嚴重地妨礙了那個決議的實行。不過另一方面，二劉野心之所以會得逞，一部分也因為「我們的話」方面初期（史唐、張特）的正統成見與缺乏經驗，以及後期（梁幹喬）的比二劉更甚的自尊自大與無原則的地位爭奪。

現在，我們追溯往事於二十七年之後，當不會再帶任何意氣或偏見來談論各派的是非得失。我應該承認，在當時的四派中，「我們的話」比較是最健全的，它比「無產者」有銳氣，較「十月」與「戰鬥」有基礎。在它的領導人物中，有幾位很難得的革命者，特別是區芳，他吃苦，耐勞，謙虛，樂觀，重實幹而能思想，狀似苦力而文采斐然。可惜他在統一尚未完成前，便與「十月社」的葛崇鏗同時被捕，一同歿死於國民黨的監獄中。陳亦謀在思想與文采上雖不逮區芳，但苦幹精神或尤過之。這位同志也是死於獄中的。還有宋敬修，也是堅苦卓絕的革命家，他領導了「我們的話」在上海的工人運動，不幸結果和區、陳二同志一般，亦在同一個國民黨的監獄裏喪了命。革命永遠是這樣來對待它的參加者的；它毀滅堅強者和忠貞者的軀體，同時敗壞軟弱者和卑劣者的靈魂。「我們的話」初期領袖中的史唐、陸一

遠、張特和梁幹喬，屬於後一情形：軟弱的史、陸是消極地離開了；卑劣的張、梁則積極地反動起來，成了國民黨裏的反共專家。

「無產者社」包括了八十多名中國共產黨初期造成的中上級幹部。他們都是有經驗與有能力的。不用說，這樣一個數目的有資格的革命家群，在任何一種思想運動中，都會代表着力量，會是一宗莫大財富。何況他們是以陳獨秀為首的。不管陳獨秀犯了真實的與誣栽的錯誤，但他直到那時為止，無論在國內國外，這名字始終是中國進步運動與革命鬥爭的象徵。因此，由他領導的「無產者社」，在反對派勢力的團聚和長成中，本應起最積極的帶頭作用。但事實上並不完全如此，原因在於那大多數老幹部們的暮氣太深。在長期的國共合作中，他們中有不少人已被定型為紳士或官僚了；同時做慣了現成的機關工作，今天要他們從一無所有的白地上重幹辛苦的下層活動，就覺得非常的不合適。這個純粹由「軍官」和「參謀」組成的集團只有一部分能從事於普通士兵的戰鬥，在統一運動中及其之後，就很快被事實所證明了。

「戰鬥社」名為一派，實際上在很長時期中只有四個大人。劉胤、趙濟之外，又有王某和徐某，均係留俄學生。王徐二人在統一後不久就與劉胤一起投入了國民黨，繼續和反對派相處的就只有趙濟一人，在統一運動時期，一個在閩北區從事黨內工運的雲南人，名閔蔭昌，由於趙濟的關係，加入了「戰鬥」，帶來了幾個工人同志。所以當統一大會召開時，「戰鬥派」也算有十餘個成員了。這一個派，在當時的諸派別中，無疑是最無基礎，也最不夠格的。

統一協商會議將如何組成？首先引起了各派內部那些「忠貞分子」的最大關心。代表派出依各派人數比例呢，還是以派別為單位？前一

辦法有利於大派，後一辦法則讓小派佔了便宜。幾次接觸後，決定按照後一辦法，即不分大小，每派派出二名代表組成之。當初的代表我記得是如下諸人：「無產者」：吳季嚴，馬玉夫；「我們的話」：史唐（他剛出西牢），區芳；「戰鬥」：劉胤，趙濟；「十月」：宋逢春和我。不久「我們的話」因史唐消極返鄉，區芳被捕，改由梁幹喬和陳亦謀代表。最初的協商會議可說是無休止的辯論會。每次會議，照例是把糾纏不清的古老爭論重提出來，互相間唇槍舌劍，弄到面紅耳赤而散。究其實，人們並不真想統一的，如果「不幸」地真的統一了，則必須事先保證自己或己派對統一組織的控制。當然，並非所有代表都有了這樣的心思，但整個氣氛總是如此。等到梁幹喬參加「協商」工作之後，那末此一存心竟發揮到赤裸與無恥的地步。因之有些真想統一的人，也不得不因「自衛」而在這方面謀所以對付之道。

此一名為協商而實則爭吵的會議，延長了大約兩月，使好些參加者與所有真誠的反對派同志感到失望和痛苦。會議的主要任務原定為二：1、起草統一大會文件；2、具體準備統一大會的召開。關於第一項，我被推舉出來起草中國反對派的綱領，即是說，將托洛次基給我們業已草成的綱領，加以應有的補充和擴大。我被派的這個工作說難其實不難，因為一切是現成的，寫就的，工作只屬於略加編輯的性質。在托洛次基的政綱上，關於未來中國革命的性質部分，作了這樣的說明：「我們的戰略底總路線是奪取政權」，「中國無產階級專政一定將中國革命化為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我覺得這樣規定在正式的政綱上略嫌不充分些；於是從托洛次基的另一篇文章：〈中國革命的前瞻和總結〉中抄了一句話：「第三次中國革命……將被迫於一開始時就要堅決地動搖與取消城市及農村中資產階級的財產。」我用自己的文字來寫出這層意思，說：「中國未來革命將一開始便具有社會主義

性質。」此語一出，不料引起了軒然大波，劉仁靜首先發難，認為這是機械的極左派的說法（根據劉的老意見，中國未來革命一定要經過克倫斯基階段。）接着在《無產者》與《我們的話》上，也刊出了代表贊成與反對意見的文字。現在我已記不清這爭論的詳細情形，可確言的只是：「我們的話」方面多數同意我的寫法，「無產者」方面則多數反對（最不贊成的是彭述之，而鄭超麟則與我持同樣意見）。陳獨秀的文章彷彿折中於劉仁靜的批評與我的解釋之間。協商會內部除了這一問題之外，還有一些較不重要的理論爭執，也是各持己見，互不相下。因之久久無法草成文件。至於協商的第二項目：具體準備大會的召開，則更是無從談起，因各派的人數就不能確定。在此問題上，梁幹喬的表現是最可鄙的。這個黃埔出身的軍人，對理論可說無絲毫興趣，人們為某些「空洞的」意見辯論時，他只是不耐煩地坐着，從不發言，但事情一談到組織，有關於未來機構的控制時，他的精神就完全不同了，睡貓立即變成了最警覺的獵狗，眼觀四力，耳聽八音。他把任何人的意見都看成「陰謀」，因之自己就肆無忌憚地公然玩弄組織詭計。為要在未來選舉中取得絕對優勢，他曾暗中向我們提議聯盟來對付「陳派」，我們拒絕了他，於是他就厚顏無恥地應用「報大數」的辦法，硬說「他的人」約等於其餘三派的總和。

協商會議此種烏煙瘴氣情形，確使很多參加者氣憤，更使各派真誠的同志們為之不安。此時，「無產者」的代表吳季嚴與馬玉夫首先表示消極，他們不願意再浪費時間了，統一運動似將從此告終。吳、馬「消極」，最初我們以為單單因協商遲遲不進之故。後來我才清楚，原來問題還有關乎「無產者社」內部的。托洛次基 1931 年 1 月 8 日的來信，對中國諸派反對派的關係說，乃是個轉換關鍵。在此以前，「陳派」彷彿有點「妾身未明」，另三派，特別是「我們的話」，則以正統

自居。在那時，陳獨秀等曾一再表示合作，且願參加既有組織，結果卻不僅遭到嚴拒，抑且受到打擊。此時「陳派」的心情是委屈的，而另幾派的態度是倨傲的。等到托洛次基讀了陳獨秀的意見書，大為喝彩，向陳獨秀伸出了熱烈的同志的手，並堅勸中國其餘的托派與他立即統一之後，情勢就不同了。三派被迫接受了這個勸告，心中不甚情願，還帶着幾分不好意思。「無產者」方面則相反，以勝利者姿態進入了協商。更有甚者，此時為吐過去的冤氣，覺得自己反而成了正統，因而不願與那些「孩子們胡鬧」之慨了。當然，懷有這種心情的人並不敢明言，他們只是冷笑笑，嗤嗤鼻，且讓代表們去跟人家談了再說吧。現在，一兩個月的協商結果，證明那些「小孩子們」確實是胡鬧的！吵得一天星斗，統一遙遙無期，代表們消極了，於是那個老資格的正統觀念公開出場了。它是以彭述之為首的。他主張不必再談統一，儘由我們自己幹吧，如果別派的人真想幹的，讓他們加入我們好了。彭述之主張獲得了「無產者」內部許多元老的贊成，特別受到那二位協商代表吳馬的支持。不過反對的亦大有其人，主要來自鄭超麟和尹寬二同志方面。統一協商會議瞬間便陷入了停頓。統一是否繼續，主要得看陳獨秀的態度了。

有一天，大約是在是年3月間吧，北大的舊同學陳其昌同志（他當時屬於「陳派」）跑來看我，說陳獨秀約我談話。地點在尹寬家裏。這是我第一次和陳獨秀見面。說實話，那時我並非以瞻仰偉人的心情前去的，雖然對他已沒有了先一時期的敵愾。不過才一見面，這位半老人（這年他大概是51歲）的樸質誠摯卻給了我異常好的印象。他將我心中殘存的一點派別偏見一掃而空了。我們談了整個下午，話題輕鬆隨便，主要是關於我的過去，從北京大學一直談到在周恩來下面工作的經過。他問的多，說的少；但問題如果他發生了興趣，那就也說個

不停。在談話中，我特別歡喜他的直捷痛快，沒半點兒客套虛矯，直捷中可並沒有他出名的暴躁，恰恰相反，我覺得他非常的和藹與謙虛的。最後我們才談到統一問題，他問我的意見，我毫不掩飾地說明了我的看法——當初的排拒合作與後來的渴望統一。他聽了表示很滿意。然後他肯定地說：統一是中國反對派當時的絕對必要。如果不統一，則不但其他三派沒有前途，「無產者社」也必然死亡，因為，反對派今後的艱巨工作，主要得靠年輕的革命者來負擔，而「無產者」中則「老人」太多了。談話完畢，他先走；跟着我在夜色中走回家去，心中充滿了一些不平凡的感覺。與來時心境不同，此時我似乎深深認識了這個中國近代革命思想運動的巨人，對他發生了崇高敬意——這敬意至今不減。

次日，其昌又來，首先告訴我獨秀與我談話後的觀感。據說，「老頭子」對他和尹寬提到我，說「這個人跟梁幹喬完全不一樣」，因為在前一天，獨秀曾經跟梁作了同樣的談話。獨秀對我的評語自然叫我高興，但也是應分的；如果一個革命者跟不久之後就要去當蔣介石手下特務頭子的人「一樣起來」，那就連起碼條件都沒有了。其昌又說，「無產者社」更換了代表，今後由獨秀和尹寬二人出席協商會議，務使在最短期限內促成統一。

陳獨秀親自出馬以後的協商情形果然大不相同。協商再不是吵架的同義詞，統一的決心感染了每一個參加者。理論的歧見常常解決於三言兩語中，誇大與挑別的爭執甚至覺得不好意思提出來。文件決定重新草擬，大家推舉「老頭子」寫政綱與土地綱領，由我起草國民會議提綱，組織決議草案彷彿叫梁幹喬寫，尹寬似乎被推起草職工運動決議案。這些文件在很短期內便草成和提出，經過善意而坦白的討論，很快就通過了。過去曾經引起紛爭的第三次革命性質問題，獨秀

在草案上完全摘引了托洛次基的原文，即是說，在第三次革命一開始時候，就要堅決地動搖城市和鄉村的私有財產。如此一來，當然也就無異議通過。

統一的政治準備既經完成，剩下來只有大會的代表問題了。這問題，協商會議交給尹寬，趙濟，梁幹喬和我四人解決。此事本極簡單，根據各派的真實人數，按比例選派代表就得。困難產生乃由於梁幹喬的「大數」。當時三派的人數大致如下：「無產者社」八十餘人，數月來在香港和華北有一些新加入者，連原有共約 100 人；「十月社」，上海的意見書簽名者 19 人，此時包括新發展者，合共約 30 人，加以華北的「我們的話」部分約近 50 人，故當時估定為 80 人。「戰鬥社」成員全在上海，共約三十餘人。「我們的話」的上海組織人數不多，約二三十人；香港較多，但相信亦不會多於七八十，而梁幹喬則硬說有三百多。我們要他提出名單，他說這有背於秘密工作的原則。尹寬提議派人實地調查，梁幹喬則說同志們散處於東江及中山各地，調查根本不可能。結果只好效法小商人做買賣，不斷和他「講價」，最後總算講妥了數目，將「梁幹喬的人」約定為 120 或 140。因為我記得代表是大致依每 20 人派一代表的比例而產生的。「我們的話」似得 6 人（抑 7 人？）；「無產者」5 人；「十月」4 人；「戰鬥」2 人。

一切協商妥當，最後一個問題是開大會的房子和些少經費。此事決定由「無產者」獨力承擔。事後我才知道，為此籌措的一百多塊錢，是拿了李仲三的衣服去典押來的。事務工作由何資深同志一手辦理，他在大連灣路租了一幢新蓋的石庫門房子，事先對任何人都保守秘密。不久，各派代表選出來了：「無產者」：陳獨秀，鄭超麟，江常師，彭述之，另一人記不清是鐵路老工人王芝槐還是何資深；「我們的話」：梁幹喬，陳亦謀，樓國華（後因事不能出席，由宋敬修遞補），

張九（香港工人）以及另外兩個或三個香港同志；「十月」：羅漢（出獄不久，被北方同志推為代表），宋逢春，濮德志和我；「戰鬥」：趙濟和來燕棠^[2]。

中國反對派的統一代表大會開於1931年5月1日，一連開了三天。頭兩天討論和修改由協商會議提交的各項文件，第三天選舉新的領導機關。獨秀致了開會辭，接着他又做了一個簡短的政治報告。在代表們的發言中，我記得只為一件事進行了比較熱烈的爭論：關於蔣介石統治下中國的統一可能性問題。說中國的所有民主任務，必須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才能解決，並無一人異議，但獨秀的政治報告上說，我們這個根本正確的認識，並不排斥一個遠景，即全中國的表面的統一，可能在國民黨統治下獲致。大多數代表反對這種說法（我也是反對者之一），結果，在決議案上彷彿撤回了這一項規定。其餘由協商會提交的決議，差不多全未經過爭辯就一致通過了。總之，那次大會確是結束了過去小派別對峙的局面，精神異常融洽，會場上洋溢着團結與希望。誰都彷彿看見了中國「布爾雪維克—列寧派」（當時國際托洛次基派的名稱）光輝燦爛的前途，誰都相信此一小房間裏代表着的力量，行將在中國未來革命中起着決定性的領導作用。這時候如果有人懷了相反心情的，那末只有梁幹喬，因為此種無私的大團結氣氛，與他關門稱王的狹隘心胸完全不相容。文件通過，跟着選舉。這次選舉就我所知，乃是真正出乎每一代表的自由判斷，決無事前聯絡，或暗中拉攏情事。崇高精神佔着上風，陰謀詭計自行退縮。代表們全都超出了原有派系的界限，紛紛投別派成員的票。票選結果，如下諸人當選為統一領導的正式中委：陳獨秀、羅漢、宋逢春、陳亦謀、鄭超麟、張九（？）和我；另有數人當選候補，至於彭述之，究竟是候補中委，還是正式中委，我已記不確切了。這裏有一個事實頗

值得注意，即一年來最露頭角的混戰英雄，他們處心積慮為自己的「交椅」打算了的，有如梁幹喬、劉仁靜、劉胤和馬玉夫這四人，這次竟全部落選了。不錯，「人們的眼睛是雪亮的」，尤其是革命者的眼睛，更尤其是在革命並未成功的時候。赤裸裸的史大林作風不會得到報酬的。統一果然是一個最好的淘汰過程，它毫不留情與毫不錯誤地將那些渣滓淘汰出去。梁幹喬於大會後不及一月就去南京找他的「校長」，發宣言聲明「共產主義不符合中國的國情」，劉仁靜消沉了，劉胤在沉默中待價而沽，馬玉夫則立即投入了龍華警備司令部的偵緝隊。

而統一了的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則以興奮的心情邁步向前，積極開始了自己的工作。新的中央常委會分配了職務：陳獨秀總書記，鄭超麟宣傳，陳亦謀組織，羅漢擔任秘書，我負責黨報。在第一次中全會上，由羅漢草成了一個致托洛次基的電報，喜洋洋地告訴他：他的中國同志正完成了一個有意義的開端，布爾雪維克—列寧派的旗幟不久就將飄揚在全中國^[3]。中國托派那時確實呈現了新氣象，遠大的憧憬鼓舞了每一個同志的心。工作正式開始，合併各派在上海的小組，其組織約略等於黨的規模，分成為滬東，閘北兼滬中，滬西與法南（法租界及南市）四個區。大會文件積極地油印，黨報雖然未曾決定正式名稱^[4]，文章卻立即着手準備了。那時國民黨正玩弄着所謂「約法問題」，社會各階級的民主鬥爭，確如托洛次基所預見，正從各個隙縫裏爆發出來。我們於是決定為真正的國民會議進行廣闊鬥爭。獨秀已經寫了一篇專門揭穿國民黨假民主的長文。

對於當時中共的內部鬥爭說，我們反對派的統一也來得非常合時。不過說到這裏，我必須跑點野馬，將我的那位老相識陳紹禹的情況，先來介紹一下。我們那批人回國之後，不到幾個月，陳紹禹也回國了。不能確定，他之回國是在孫大因托派事件解散以前還是以後。

但可以斷言的是：在1930年初，他和那批所謂「二十八個真正布爾雪維克」都已到了上海。28人中，有何子述，秦邦憲，陳昌浩，陳微明（即沙可夫），孫際明（此人回國不久就叛變，在南京國民黨中央黨部招待記者）等等。這些人都是我非常熟悉的，除了何子述有點深度之外，均屬淺薄空洞之輩。他們回來，最初受到的待遇與我們當時一樣。未因陳紹禹在莫斯科之得寵以及他和總書記向忠發的關係而有所不同。陳紹禹最初分配在李立三主持的宣傳部工作，地位很低。這情形當然為野心通天的「孫大黨魁」所不滿。他那時曾一度為法租界警探所捕，在慌張中，竟寫秘信託巡捕送到宣傳部機關，叫潘問友營救他，嚇得那個機關當場搬移。那個時期，陳紹禹和他的「布爾雪維克」們顯然很不得意。我在一次南京路的紀念示威中，看見他在新新公司的廊下閒蕩，神情落寞之至。其時李立三正得勢。史大林的「第三時期哲學」，被他用中國話翻譯成為「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他在上海表演紀念日「佔領馬路」的滑稽劇，在全國要彙集湘鄂紅軍來攻取長沙乃至武漢。同志們在接二連三的失敗中碰破了頭（許多人則乾脆是斷了頭），積累了教訓，於是對「立三路線」（其實是史大林路線）紛紛表示不滿。等到1930年9月紅軍二次進攻長沙失利，這條路線的破產已揭露在每一個同志面前，於是在同月召開的六屆三中全會上，以瞿秋白為主的一部分中共領導人物，起來結束了所謂「立三路線」時期。這次鬥爭，因為我們都已開除出黨，未曾目見，耳聞也不完全，所以不清楚陳紹禹及其「布爾雪維克」們此時起了多少作用，但根據過去一兩年來的勢力消長形勢看，業已在六次大會上被打下來的秋白，決不可能獨立完成此一政變。陳紹禹經過他所「提拔的」總書記向忠發，再配上駐滬的國際代表和莫斯科的直接聯絡，一定起了非常大的幕後作用。因此，隔不了四個月，等到1931年1月召開的六屆四中全會上，陳紹禹們便從幕後走到台前，他們打倒了李立三，

踢開了瞿秋白，在向忠發積極支持與周恩來的消極合作之下，竊奪了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權。自從1927年在孫中山大學中以反托派起家的陳紹禹，經過了反「江浙同鄉會」，反「旅莫支部殘餘」，合併了東大，統一領導了中國的留俄學生，現在總算贏取了他的最後一戰，奪到了整個黨的領導。其間經過，只有短短四年。一個與中國革命絕無淵源的野心小子，在此短期間內，簡單靠了一些縱橫捭闔手段，竟能爬進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局！實在駭人聽聞。不過，如果你明白史大林政治內幕，那你就會懂得這一離奇現象並不駭人了。陳紹禹們的飛黃騰達自然不能用陳系的「本領」或野心來解釋，他們卑劣的手腕與可怕野心只有在極小範圍內才起作用；也只因為他們正投合了史大林們的需要才起作用的。史大林在聯共內部先後擊敗了托洛次基和布哈林等，接着便想在國際共產黨中造成清一色的史黨。最初被肅清的是意見上同情於聯共反對派者，隨後則一切能獨立思想和具有堅強脊骨的人都在被清之列。為此，當時史大林特別提出了共產國際各黨「布爾雪維克化」的口號。而所謂「布爾雪維克」也者，僅指那些既無頭腦又無骨氣的史氏死黨而已。其中最標準的人物即如陳紹禹之類。中共的早期領袖陳獨秀自然不能成為這樣的「布爾雪維克」；瞿秋白也不甚適合條件，因為他頗愛「自作主張」；周恩來有幾分投合這個標準，可惜與史氏沒有直接淵源；向忠發夠資格而終嫌缺少「理論」；至於毛澤東則似離此標準甚遠。史大林及其直系如米夫等人，想在中國留莫學生中找一理想對象，且欲扶植之成為自己的忠實代理人，可謂蓄心久矣；至少在1927年底，陳紹禹被選中為史大林主義的兒皇帝，大致已是定局了。所以1931年的六屆四中全會，實際是史大林通過了米夫直接指導陳紹禹們演出的。那時這位陳紹禹即王明，完全仿照了當年烏里雅諾夫（按此乃列寧在革命勝利後的簽名式）即列寧的辦法，寫了一部名叫《為中共更加布爾雪維克化而鬥爭》的小冊子。同時為使

這本小書具有更多的歷史意義起見，又套用了當年列寧的書名：《兩個策略》，再加上「兩條路線」這個副題。在此大著中，陳紹禹重重地打擊了李立三的「左傾路線」，同時給瞿秋白戴上了一頂新帽子：「調和主義」。結果，李立三與瞿秋白都被逐出領導地位，二人都承認錯誤，痛罵自己（那時甚至周恩來都被迫「自我檢討」一番）；李立三被送至莫斯科「學習」，瞿秋白等於逐出了黨，住在上海一個非黨朋友謝澹如的家裏，從事文化工作。由六次大會選出來的中央被任意調整，陳紹禹、秦邦憲等根本不是中委的人，居然被提拔到政治局，而且擔任最重要的職位。這是什麼力量完成了這個政變的呢？難道是陳紹禹那本「天才的」大著的說服力嗎？那是史大林所代表的蘇聯和共產國際的威望，以及他所支配的物質力量，特別是援助中國共產黨的每月數萬元的金錢！正是這些精神的與物質的力量，使李立三與瞿秋白悔過和下台，使周恩來自我檢討而降尊與陳系合作，並使陳紹禹這小子躍登大寶的。

關於那次「布爾雪維克化」政變，在中共今天最具權威性的一個決議案：《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上，有如下的描寫和評述：

陳紹禹同志領導的新的「左」傾路線……在組織上，這條新的「左」傾路線的代表者們違反組織紀律，拒絕黨所分配的工作，錯誤地結合一部同志進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動，錯誤地在黨員中號召成立臨時的中央領導機關，要求以「積極擁護和執行」這路線的「鬥爭幹部」「來改造和充實各級的領導機關」等，因而造成了當時黨內的嚴重危機。這樣，雖然新的「左」傾路線並沒有主張在中心城市組織起義，在一個時期內也沒有主張集中紅軍進攻中心城市，但是整個地說來，它卻比立三路線的「左」傾更堅決，更「有理論」，氣焰更盛，形態也更完備了。

1931年1月，黨在這些以陳紹禹同志為首的「左」傾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分子從各方面進行壓迫的情勢之下，也在當時中央一部分犯經驗主義錯誤的同志^[5]對於他們實行妥協和支持的情勢之下，召開了六屆四中全會。這次會議的召開沒有任何積極的建設的作用，其結果就是接受了新的「左」傾路線，使它在中央領導機關內取得勝利，而開始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左」傾路線對黨的第三次統治……六屆四中全會及其後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了那些「左」的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同志到中央的領導地位，另一方面過分地打擊了犯立三路線錯誤的同志，錯誤地打擊了以瞿秋白同志為首的所謂犯「調和路線錯誤」的同志，並在六屆四中全會後接着就錯誤地打擊了當時所謂「右派」中的絕大多數同志……（14-16頁）。

上引文字中對於陳紹禹們罪惡活動的描寫，可說大致上是對的，但是不夠得很；它有意避開了這些罪惡的主要教唆者，有意把跳樑的小丑描寫成敢作敢為的大將，因之與歷史不符，不能讓人從中看到罪惡真相，更談不上從罪惡得到教訓。其實這件事情絕對不能從陳紹禹及其少數朋友的身上來解釋，必須追究到史大林；此事也不能單就上海一隅的角度來觀察，而必須將它置於整個共產國際的背景上。換言之，我們決不應該把陳紹禹的政變看成為中國共產黨某些人在某一時期所犯錯誤，而應了解成蘇聯與共產國際的墮落所加於世界共產黨（中共乃其中之一）的一種罪惡影響。我們知道，當列寧與托洛次基時代，共產國際是最高的權威機構；便是由共產黨所建立與主持的國家——蘇聯，也是從屬於共產國際，並為它服務，受它指導的。在此情形中，共產國際內各個兄弟黨之平等相處，自不待言，那時候，共產國際確實是世界革命的司令部，它由各國最有威望，最具有

才智的革命者所組成，而這些革命者在他們各自的國家內，又都因自身的忠勇服務而贏得了群眾信任的。不錯，列寧常常在國際中起着領導作用，但此作用之所以發生，僅僅為了他有過人的智慧和卓絕的經驗，絕非因為他是蘇聯國家的首長。有時候，某些不合適的領導者亦有被逐出國際的，但這總得經過廣泛的辯論，確乎為了革命利益，而且經由民主程序。可是逐漸地，為了種種原因（我們不在此地討論它們），蘇聯開始墮落了，「一國社會主義」的理論抬了頭，共產國際和聯共的關係改變了：它從世界革命司令部變成為蘇聯外交部的輔助工具：跟着蘇聯國家的墮落，作為它工具的共產國際及其所屬各黨的性質也必須改變。共產國際既然被放進了蘇聯官僚的公文包，各國共產黨的領袖們自應變成牽馬墜鐙、恭執皮包的僕役，否則便難收操縱自如之效。但是承繼了近百年社會主義革命傳統的，而且在第一次大戰後普遍燃起的革命火焰中鍛煉出來的老一輩的共產主義者們，並非一下子就改變得過來的。史大林為要改變他們（用他的說法，即是要將他們「布爾雪維克化」），曾經費了不少力氣，耗去好些年月，破壞了不少次革命（不在他私黨控制之下的革命寧可使之失敗），並且灑了無數革命者之熱血。為數甚多的外國共產主義者，曾經在這個過程中或瘐死於西伯利亞的監獄中，或倒斃於莫斯科盧平加的高牆之內（波蘭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曾全體被送進了格柏烏監獄）。其結果是：全世界的共產黨，從三十年代的初期以後，絕無例外地讓陳紹禹同一類型的「布爾雪維克們」所統治了。

由此看來，說陳紹禹們在1931年1月上演的那齣「逼宮篡位」，是陳紹禹獨自完成的中國獨有的好戲，是他個人所犯的一個「錯誤」，該是多麼的違背史實，又多麼的曲解了史實！當然我們相信毛澤東並非不清楚陳紹禹的靠山，也不會昧於「布爾雪維克化」的真實含義，

其所以要將一切罪過諉之於陳紹禹者，一來是礙於「中蘇邦交」，二來則因毛澤東本人畢竟也是史大林主義者——如果不是就宗派說，至少就思想說確是如此。

我們的責任卻是要把這個重要的歷史真相說出來！

* * *

中國反對派的統一大會，召開於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的三個月之後。那時，因陳系政變造成的混亂現象還充塞着全黨。尤其是那所謂「調和派」或「右派」的悲慘命運，在幹部同志中留下了極其深刻的痛苦印象。關於此事，我必須在此說幾句話：以羅章龍，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實等為首的一群老幹部，多數在江蘇省委中負責，有的則是長期的工會工作者。這群人可以說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到當時為止所造成一部分最優秀的職業革命家，特別是傑出的工人運動家。他們切實、苦幹，與無產階級息息相關。雖然其中沒有出色的「理論家」，不會像陳紹禹們的引經據典，賣弄「學問」，但因真正生活在革命中，密切地分享着工人階級的命運，所以他們的觀察，感情和見解常常是正確的：比那永遠以莫斯科來電和決議作思想出發點的中央，總是要正確得多。尚在1928年，當史大林派遣他的「神童」王明那次到中國來，指揮瞿秋白等進行盲動之時，這群以江蘇省委為中心的同志們，就曾經提出過正確而嚴厲的批評。他們的1928年5月決議案，曾被托洛次基整段的摘引於其論文〈六大以後的中國革命問題〉中，稱之為「關於共產國際政策和黨制的一個絕妙文件」。江蘇省委從自身經驗中得出的對史大林路線的批評，竟和反對派的理論分析不謀而合。

中共六次大會以後，這群人的某些個別分子曾經接觸到托派思想，接觸者自然受到了深刻感應。只因他們的實際主義和經驗主義作

崇，一時還跳不出史大林的圈子，正確些說，還沒有批判國際權威的勇氣。但是對於六次大會後緊接而來的「第三時期哲學」，即「立三路線」，他們卻和以前反對盲動主義一樣，深深感到不滿。六屆三中全會的批評李立三，正是這部分人構成了瞿秋白的群眾。後來，陳紹禹們起來徹底清算李立三和打倒瞿秋白，事前也可說獲得這班人的默許。可是陳派一經上台，以其更為荒謬的「左」傾路線，更為嚇人的氣焰，更為專橫的作風，立即逼反了這群真誠的革命家們。陳紹禹於是採取了主動，憑他原有的國際靠山，加上了新得的黨內權勢，發動了非常猛烈的「反右派」攻擊。這是一場上壓下的打鬥，一切優勢操在陳紹禹們手裏；但「右派」（同時又被稱為「調和派」）卻表現了堅強氣概，不肯屈服，明知是絕望的鬥爭，仍然英勇抵抗，甚至不惜組織第二黨來貫徹主張呢。可是不幸得很，當一次該派主要領袖們在先施公司後面的東方旅館關室會議之時，突被龍華派來的警探捕去。在威迫利誘之下，被捕者始終不屈，遂遭蔣介石屠殺於龍華警備司令部看守所。二十餘位烈士中有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實等，其中還有我舊友趙平復（即柔石，魯迅有專文追悼他），以及與我同舟回國的惲雨棠。小說家胡也頻，也是此次遇難者之一。

「右派」同志們的壯烈犧牲，在黨內激起了持久而深刻的悲憤。有一個流言傳播着，說這次事變是陳紹禹借刀殺人，是他告的密。這種卑鄙行為雖然符合於史大林——陳紹禹精神，終究沒有實據，難以肯定；但這是黨內激烈而殘酷的鬥爭所促成的慘變，卻總是無可否認的。因此，它在一般同志心中產生了敗壞性的與沮喪的影響。失望與消極情緒，伴隨了悲憤而擴展着。而陳紹禹們呢，卻還是不顧一切，為了自己宗派的利益，也為了要貫徹史大林以直接代理人把持中國黨的企圖，繼續無原則地，絕對無情地進行各種各式的迫害，將一切不合作的，或簡單「看不順眼的」老幹部們解除工作，甚至踢出黨去。

正在這時候，以中國共產黨創建人陳獨秀為首，中國反對派以統一姿態出現了。誰能說它不是來得恰是時候？一點也不誇大，我可以說，我們的統一對當時黨內的許多老幹部曾發生了很大吸引力。因為對照是太強烈了：一方面，幾個在外國啃了多年麵包的後生小子，依仗了洋大人的勢力，在黨內飛揚跋扈，「謀朝篡位」，「辱沒功臣」，把全黨搞亂得一塌糊塗；另一方面，有經驗有聲望的中共元老及其親近的戰友們，接受了失敗教訓，以正確的馬克思主義重新武裝了自己的思想，並且團結了同一立場的隊伍，正企圖來挽救黨的墮落。在這二者之間，中共的幹部們當不難決定何去何從。所以在我們統一之後，確有不少人傾向反對派；如果尚未在思想上接近，至少已在感情上靠攏的。我個人有過幾次經驗，在路遇黨內同志時，只覺他們對我的態度與早些時不同。以前，他們總是避之唯恐不及，彷彿我們真是「叛徒」，遇見了會一把將他們捕交警察似的；但當統一之後，亦即陳紹禹政變之後，他們便突然變得和氣了，親熱了。偶爾相見，還會停足道旁，談上幾句。當時的氣運確是轉了。我那時曾經設想：如果反對派人人遵守最初的決定，大家留在黨內積極工作；又如果莫斯科的反對派未被一網打盡，有許多人回了國，而原在黨內的托派又未被逐出，那末在1930至31年的「布爾雪維克化」政變中，托洛次基主義者一定能起很大作用，一定能在鬥爭中發生影響。縱使我們不能率領全體忠誠革命者擊敗陳紹禹等的篡奪者，縱使我們仍舊失敗於外力支持的史黨之手，但是力量也總會大不同的，我們一定能將多數優秀幹部團結在一起，組織強大隊伍，以此來壓迫和鞭策中央，同時領導革命鬥爭。如此則中國近三十年的許多史實都會不同的吧。

不過，撇開這些假設的想法不談，我們反對派在1931年5月統一之後，即使僅憑當時實有的一點力量，本來也可以發生作用的：在黨

外面影響和吸引被新貴們橫加摧殘的幹部們。這個作用之所以未能及時而充分地發揮，只因陳紹禹又是得了蔣介石的幫助，直接則是得了我們自己的叛徒馬玉夫之賜。我們的大會召開於 1931 年 5 月 1 日。新的領導機關開始工作未及一月，即在同月 22 日的夜間，因舊屬「無產者社」的馬玉夫叛變，向國民黨警探機關告密，而幾乎被一網打盡了。那次除陳獨秀外，正式中委幾無一倖免。同時被捕的同志有：鄭超麟夫婦，何資深夫婦，宋逢春，陳亦謀，樓國華，江常師，濮德志，王芝槐和我。才得統一的中共左派反對派受到了慘重打擊，組織一時陷於停頓。我個人也因之踏進了新的一章：長期監獄生活的一章。

不過在告別這一章之前，我還必須說一說此一時期反對派的文字活動，以及與此有關的我們反對派的生活問題。

中國在二十年代風起雲湧的革命運動，彷彿構成了革命史上的一個例外，它似乎是沒有思想而行動起來的。不錯，「五卅」乃「五四」的自然生長，它表示出資產階級民主思想之轉向於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意識。這轉向在當時的主要思想家陳獨秀身上及其所主持的雜誌《新青年》中，都有明顯的跡象可尋。所以在一個意義上看，五卅前後開始的中國革命（這次革命有人稱之為「第二次革命」，現在的中共則稱之為「北伐時期的革命」），也曾有思想運動為之前導。但是嚴格而仔細地觀察起來，這樣說不甚正確，事實上，中國當時的革命行動，非常迅速地，而且遠遠地超過了那些革命者頭腦中的思想。

歐戰結束，特別因為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思想來到了中國，成為中國知識分子「靈魂上最時髦的裝飾」。然而，它們只是「裝飾」而已。舉凡西方近百年發生過的各種社會主義，不管是科學的也好，烏托邦的也好，革命的也好，改良的也好，甚至帶着反動色彩

的也好，只要有社會主義其名，一律被歡迎進來，譯成中文，登上雜誌，在客廳裏談論，或在講堂上發揮，以此圖利（稿費也），以此沽名（前進也），等到刊出與談過之後，「社會主義者」自己也不再記得那些新花樣了，他們依舊奔走於軍閥權貴之門，或竟朝覲「遜帝」於紫禁城中而恬不知恥。

當然，並非所有趨向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都是如此。以陳獨秀、李大釗為首的一群人，不久就認真選擇了科學的社會主義，接受了其最新的形式——布爾雪維克主義，並決心由思想轉入行動，成立共產黨，與中國新興的社會力量——無產階級，結成親密聯繫了。但由於世界與中國的種種歷史的原因，中國自始就帶有社會主義傾向的革命實踐，無論在深度與廣度上，都大大超過了領導者的思想。行動飛速前進，思想遠落在後。結果，我們可以說，中國第一代的社會主義革命家們，對於中國如飛開展的階級鬥爭，非但不能作胸有成竹的領導，甚至不能有精闢透徹的了解。這與俄國當年的情形恰正相反。在俄國，那些先進的知識分子早在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亦即在實際革命爆發之前一二十年，已經將革命的一切基本問題研究和討論清楚，對策略與戰略都已定下了綱領，且已把最堅強的革命者團結在一個戰鬥組織中，因之，革命來到時，雖然仍舊經過無數艱辛的鬥爭，可是至少對列寧和托洛次基那樣的人物說，革命像是按照了預先畫就的藍圖來領導和發展的。中國卻完全沒有這回事。當1925至1927年革命期間，社會主義理論在幾乎全體共產黨領袖的頭腦中，都還只是一個外來的與抽象的思想，它們與中國的實際鬥爭聯不起來，也無法聯起來。結果是：莫斯科的頭腦代替了他們的。我們並不原則上反對這種代替，因為我們是國際主義者，我們相信單零一國的革命可以由一個世界革命的參謀部來策劃。不幸那時的莫斯科頭腦卻不是領導十

月革命勝利的那兩個，卻是出賣革命成果的那一個。托洛次基和他的一些朋友，雖然為中國革命規劃了可以獲勝的政策，卻被史大林與布哈林等抹煞了，且代之以俄國革命時原可因而失敗的門雪維克路線。中國黨的頭腦們沒有能力來鑑別這些路線，多少盲目地執行了它，這就招來了1927年的慘重失敗。

蔣介石反革命的沉重鐵錘，敲掉了無數中國革命者的頭顱，同時也敲醒了許多幸而未掉的腦袋。人們在失敗的巨痛中，深深感覺到了過去幾年中盲幹瞎幹的是非，尖銳地覺悟到沒有理論的行動，或全靠「遠方遙領」的行動，是多麼的像一艘失去了舵的船舶。

中國社會主義者幹完了一次失敗的革命才拼命去追求社會主義思想，這乃是一個非常奇怪與可悲的事實。不過遲來總比不來為好，開始於1929年前後，以上海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的文化運動，仍有巨大的歷史意義。中國反對派在那次文化運動中曾經盡了他們的力量，也是值得稱述的事。

那個時期的社會主義文化運動，並非某一些人倡導的結果，它乃是廣大的中國革命群眾的「痛定思痛」，是行動過後的必然思維。當然，大革命失敗後，不少知識分子被迫從積極活動中退出來，從街道回進書齋，多少也促成了那次運動；但基本的原因卻不在此，它是由種種更大的客觀和歷史的因素湊成的空氣。思想的要求不僅限於上海與北京，而是普及全國的。由於幾年來革命與反革命所提出的社會的和政治的問題太迫切了，致使一切略能思想的人，不論在城市或鄉村，都會或外省，都想了解那些與他們命運密切相關的大問題。要了解這些問題，則除了研究社會科學卻別無門徑了。

上海原是全國的出版中心。這時候，小型新書店又像雨後春筍地開出來。它們都是出版社會科學書籍的。新書店的投資者成分極其複雜。純粹的書賈較少，官僚軍閥較多。這班官僚或軍人都是受了蔣介石一系的排斥，做了南京政府的反對派。他們在無事可為中，也就略斥宦囊，交託他們直接或間接的朋友來搞「文化事業」，以為異日再起的資本。這些所謂朋友，多數是投資人的舊屬，會寫「等因奉此」，卻不知新文化為何物的。於是他們又找上海出版界的內行來編輯或撰稿，而那些內行，則幾乎全是革命中出來的知識分子。在所有新興的書店中，以神州國光社的聲勢為最大。這是陳銘樞投資的，而實際負責者則為王禮錫。王禮錫的出身我不大清楚，會吟點舊詩，以詩人自命，但對出版事業，尤其對社會科學則是十足的外行。人相當老實，於政治少所知，因而也沒成見。只要是「左方人物」，甚至只要你能賣弄幾個社會科學的名詞，他都延攬之唯恐不及。他每嘗以蔡元培自況，故作家中自陶希聖等起，中經史大林派，一直到我們托派，他都一視同仁。在1930年初期，他跟反對派特別接近，劉仁靜，李季，王獨清，彭述之，杜畏之，彭桂秋，吳季嚴等都和他來往甚密。我因劉仁靜關係，也受託編譯一部《插圖本俄國革命史》。每月按稿取酬，千字3元。這部書我一共編了三四十萬字，是根據一本共產國際出版的《畫史》，並參酌《震動世界的十天》寫成的。書成之後，王禮錫送交南京中宣部審閱，不幸竟被扣留了。我在1931年5月被捕以前，生活來源完全靠了此項稿費。

不僅我一人如此，所有的反對派幹部分子，只要是能夠提得起筆的，均以譯着社會科學來解決生活問題。不但各人自己的生活，甚至

當時各小派的經費，以及每派中從事組織工作的同志們的生活，也取給於那些賣文者的收入。無怪中國反對派要以窮出名了。不過那一時期由反對派分子直接為了生活時譯著出來的社會科學書籍，對於中國社會主義思想的普及和加深，確曾起了不小作用。除了神州之外，與反對派有關而多少出了書的書店，又有滬濱，新宇宙，春秋以及亞東等家。（亞東書店與反對派的關係既深且久，我將在後面再詳談它。）其他如由陶希聖、樊仲雲主持的「新生命」，也曾被我們利用了的。所出書籍，在反對派中並無統一計劃，完全由個人和書店商定，但雖如此，內容仍很豐富的，馬恩列的古典著作都有了一些介紹，托洛次基《自傳》出了三種譯本，優秀的西洋革命史也譯過不少。當時「無產者社」還經由神州國光社出版了一種期刊：《動力》，在一般的社會科學，以及特殊的托派主張的傳播上，曾發生了很大影響。

這時上海在共產黨的直接領導下，正開展着左翼文化運動；但它們在馬克思主義書籍的出版方面，反而落在我們托派之後，他們的主持者多數是文學家，因之運動的重點也放在「普羅文學」上面。他們在這方面的成就毫不足道，正如普羅文學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不曾做出成績來，一直要到1933年前後瞿秋白投入這個運動之後，才開始有了點生氣。可是到了那時候，托派方面的主要能文者都被繫禁在監獄中，外面有的只是些打着托派旗幟而其實未曾一日接近托派的人，再加上一些過去的托派，參加於《讀書雜誌》時期的學術爭論。這些人根本不是托派，僅僅從托派武庫中竊取一二槍枝，向史大林派射擊以便取悅於蔣介石。所以這些人的活動是敗壞托派而不利於我們的。但此已是後話，暫且不談。

注釋

1. 最近在當時國際左派反對派出版的一期《國際公報》(*Bulletin International* 德文，1930年第2期)上看到一篇由「我們的話」寄去的報告，才知道他們於1928年(未說明何日)曾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後來又曾於1929年9月舉行第二次大會。當時據說全中國已有500成員，分別活動於上海，武漢，香港，蘇州，廣州，北平與哈爾濱諸大城市。證以後來的實際調查，五百之數，多少有點誇大，但他們的工作確已有了一些成績，於此可見一斑。——1979年注
2. 「無產者社」代表沒有何資深。彭述之最後當選，但未及出席，王芝槐出席。「戰鬥社」只有一個代表來燕棠。——校者注
3. 中委無羅漢，有彭述之。濮德志、宋敬修是候補中委。秘書是宋逢春，不是羅漢。中全會寫給托洛次基的是信，不是電報，似乎是王文元自己寫的(參閱附錄4)。——校者注
4. 機關報已定名為《火花》。——校者注
5. 指周恩來等。

八、監獄進出

1931年春夏間，國民黨政府對工農革命勢力發動了瘋狂進攻。在江西，它對當時的「紅軍」進行了兩次「圍剿」；在全國，它用一個所謂「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去迫害革命者。回顧國民黨統治期內，用以壓迫革命者的手段，約可分為四個時期：一、「清黨」及其直後，這是捉到便殺時期。那時鎮壓的機構不一，處理的方法任意。國民黨警探勾結了各地的流氓幫會，亂扣帽子，胡砍亂殺，往往假公報私，勒索敲詐，以致弄得人心惶惶，連一部分資產階級都大表不滿；於是來了第二時期，即「民主」時期，它聲明：此後捉到共產黨員，將送交法院「依法」辦理了，但是這個時期延續得很短，同時實行也非常虛偽，事實上所有被捕的真正共產黨人，都不曾得到「法律保障」而被就地處決了；第三時期開始於1931年初，即當「緊急治罪法」公佈以後，此時規定一切「反革命」犯都得送交軍法機關辦理；第四時期乃是CC和軍統橫行時期，大約開始於1934年之後，那是摹仿希特勒的蓋世塔保和史大林的格柏烏的特務組織，這時期一直延長到國民黨政權在大陸垮台。

我們那次被捕，正趕上了上述的所謂第三時期。我們被捕的地點在英租界。本來，被捕者可以「託庇」於英帝國主義所享有的治外法

權，但在反對革命這一點上，英帝國主義者和蔣介石是充分合作的。在提藍橋的捕房裏過了一夜，次日被押赴「新衙門」過了一次形式的堂，立即給引渡到蔣介石的偵緝機關了。在白雲觀的偵緝隊裏住了兩三天，受了幾次鞫訊，便被移解到龍華警備司令部。

敵人這次緝捕我們，主要目標原在陳獨秀。如今獨秀漏網，網到的只是幾條小魚，告密者和辦案者都興致索然了。因之入獄不久，最初縈繞於我們案子周圍的緊張嚴重的氣氛，便逐漸鬆弛和減輕了。我們一經被送進龍華監獄，當局似乎就忘記了我們的存在，不聞不問地擱置了足足半年，直到秋末冬初時候，我們才被初次提審，並被判了徒刑，送到漕河涇去執行。因此，關於我們的案件本身，簡直沒有什麼值得記述。值得一談的倒是半年龍華拘留所中的情形，因為這裏多少反映着外面的黨內生活。龍華警備司令部拘留所一共有三條弄堂，每弄有 20 間囚室，經常大約囚禁着五六百名入犯，囚室（「號子」）是朝開夕閉的，白天只鎖着弄堂門，在押者可以自由在內活動，因此監獄裏自成一個社會，過着一種特殊生活。在押人中，大多數是政治犯，盜犯或綁匪嫌疑只佔少數，這一成分的比例，決定了監房的風氣。這風氣對於我十分敏感，因為我已經是第二次嘗這種滋味，心目中有了比較。記得當年漢口的公安局監獄，雖然是寄押短期入犯的拘留所，人的流動性甚大，卻也有了「龍頭」，有了一群「監董」。他們對新客施行敲詐，強迫你睡糞池旁邊，還有其他種種可怕虐待，務使沒有「外援」與值錢衣物的新入獄者，在痛苦中更加痛苦。可是龍華拘留所卻廓清了所有這些陋規惡習，並且建立了完全相反的辦法，凡新入獄者（不分政治犯與普通犯）都能得到「老人」們的照顧、指導和優待。使一個突然失去自由，生活在全新環境中的人，能夠適應，能夠安靜下來，因此減少他的痛苦。這風氣是如此地有力，以致連那些積盜和頑匪，都相當受了它的影響，自願或

被迫地不敢稱王作霸，積極或消極地維護這個新風氣。此一風氣在正式的監獄裏更為顯著，我將在後面談到它。

在龍華的「弄堂」裏，遇見了不少老朋友。他們大多是「立三路線」下面的受害者，有的還是製造「人工高潮」的「原料」；因陳紹禹政變之賜而入獄的為數亦不少；「調和派」中 25 人才被處死，尚有數名幸得不死的同案留在那裏。相識者中以關向應等較為重要。他們沒有被認出真面目，所以未曾解上南京去，留在此地「待價而沽」。

當時龍華司令部有「肉票窩藏所」之稱，事實完全如此。上海那時候捕獲的共產黨員，大約可以分為二類，第一類是「首要人犯」，捕得後就地「正法」。他們多半從租界當局引渡過來，只在龍華司令部的警衛室裏略坐片刻，讓法官「驗明正身」，遂即送往機場或司令部內空地槍決。彭湃、向忠發和楊匏安等的情形都是如此；第二是所謂次要人物（或最重要人物，必須讓「最高當局」親自處理者）則在司令部中寄押一兩天，轉解南京。第三類是較不重要的（所謂較不重要，乃指案發時的情形言，並非專指人物本身），他們就留歸司令部軍法處偵查辦理。這類人是最多的，亦最受國民黨軍警機關的歡迎，因為他們實際是肉票身份。所謂偵查即是講價，而辦理也者，不過放人或撕票而已。那時熊式輝當警備司令，拘押所所長是司令的一位「老表」，非常精於「接頭」。生意是明目張膽地做。在押人甚至可以自動請求會見所長，請他代查「案情」，詢問「票價」；並且還可以由他居間，與當事者討價還價。議價之時，往往被綁人的家屬都可以在所長室參加的。如果你不明白此中內幕，同時每星期前來接見你的家屬已被發現為衣冠楚楚者時，那末所長還會命令衛兵（幾乎也都是「老表」）來向你開導。因此，「偵查」時期拖得非常長，至少是半年，等到接觸再三，終於發覺無法成交，那時才開庭審問，判監撕票。

不用說，票價是很高的，因為人家終究要冒不小風險呀。為此，真能被贖出去的幸運者始終不多。個人的家屬總不能勝此負擔——革命者的家庭畢竟寒素居多；縱有富貴父兄，而關係多半在事先已搞得很壞了。所以我所看見的贖買成功的人，無一例外是黨內在朝派的密友，因而由黨出了大錢的。其中有關向應、陳為人、向忠發的秘書（浙江人，我已忘了他的姓名）等。而最突出的則是陳紹禹的好友陳微明（即沙可夫），他進來三兩天就談妥贖出了。有些人，身份雖屬於「最重要一類」，但因與在朝派不睦，也不會成贖買對象。這兒的最好例子是李震瀛。他是老共產黨員，北方工人運動的領袖，中央委員。1928年共產國際第九次全體執委會上，他和向忠發被派充為中國黨的代表。中共六次大會時，他仍被選為中委之一。此時他正被關在龍華的「肉票窩藏所」裏。按說，他這樣的人，應該是首先贖買的；但因他贊成了何孟雄等的反陳鬥爭，被視為異端，黨（陳紹禹霸佔的）對他不理不睬。非但不去贖他，甚至經由「紅色救濟會」（這是一個國際組織，全名為「國際革命者救助協會」，目的在援助全世界被迫害的革命者，特別要救濟在獄的人，其對象並不限於共產黨員）送進來的接濟品，李震瀛都沒有份拿到。他在獄中生活（小菜及日用品等）反而是靠我們的幫助。後來，他幸而出獄時，也靠了我們給他介紹的社會關係，才使他不致在出獄初期淪為乞丐。但雖如此，他還是在馬路上睡了幾晚。李震瀛從此消極了，他隱姓埋名，到天津一家小商店裏去當夥計，此後便不知下落。

李震瀛的情形只是無數同樣例子中的一個，它鮮明地表示出陳紹禹們打擊異己者的不擇手段，他們褊狹得驚人的心胸，以及不能饒恕的宗派主義作風。

陳紹禹一派竊奪黨權的最後成功，我在龍華的「弄堂」裏才初次獲得完整的印象。那時候，反對派與一般黨員之間，無論相識與否，都沒有敵對存在。大家的關係可以說非常友善，相互間的談話亦無所顧忌。尤其是我們的鄭超麟同志，以其謙和的態度與淵博的知識，獲得了全數年輕黨員們的普遍愛戴。由於那些同志的要求，超麟每天給他們講述一般共產主義理論和中共黨史。影響很好，以致連那些老資格的黨員如關向應，都曾參加在聽眾中。我和那些青年黨員也很接近，時常討論問題。正是在那些討論中，我第一次感覺到了陳紹禹在中國黨裏的影響。某些同志，新近入獄的，時常以敬佩的口吻提到一位名叫「王明即陳紹禹」的領袖，有時復以虔誠讚歎的神氣徵引他的「經典著作」：《兩條路線》。我面對着這些忠實可愛的年輕同志，聽到他們對新領袖的天真的頌贊，心裏不由自己地浮起了一點哀愁。難友們的言論給了我一個可靠消息：這個莫斯科一校中的陰謀玩弄者，在史大林與米夫的全力支持之下，居然已經實現了他的野心，做成一黨的霸主了。他的閃電勝利使我吃驚，同時使我為中國黨與中國革命悲哀。因為我太清楚了陳紹禹及其密友們的底細，他們是小圈子裏耍詭計的能手，也確實是諂上驕下的官僚，但絕對不是捨己為人的革命者。陳紹禹及其一群，不管他們後來和中國革命發生了何種關係，但分析到底，他們始終不是革命者。他們的性格、教養以及「成功」，都與墮落後的蘇聯政治密切聯結而不能分開，尤其與史大林的罪惡不能分開，因此，他們的最適當的名稱與身份，應該是蘇聯墮落官僚那個毒瘤上的蛆蟲，他們被分派到國外去，只為的要毒害其他國家的革命與革命者。

這不是我今天對「陳派」的事後估計，在當時監獄中，甚至在莫斯科和他們一起生活時，就是這樣的看待他們。可是，我看見這些蛆

蟲被天真的年輕革命者尊敬為「英明領袖」了！怎麼能不感到悲哀呢？在那個環境中，我不能，也不忍去打破那些青年難友們的被欺蒙了的幻想。（要知道，許多幼稚的革命者常常將當權的領袖與革命看成一物的；而在反革命的煉獄裏，幻滅可能有害於年青朋友的堅貞。）我只是更加相信，中國的托派運動是愈加需要了。

* * *

我們進了監獄，新統一的反對派經歷了一時期的大混亂。少數幾個「英雄」公開叛變了，較多的人則紛紛自尋生活門路去，就此遠離了積極的革命活動。但仍有不少的革命者留着，他們希望立即重建領導機關。大概不出兩三個月吧，陳獨秀從殘存的中委（其中包括了彭述之）之外，又另選了幾個積極分子，組成了新的領導機關。可是不幸的事跟着又發生，有一天，大約在 1931 年夏末時候，「肉票窩藏所」的新來者中，我們發現了尹寬、宋敬修、蔣振東和其他三四個同志。中國反對派真是多災多難的，一個打擊接着另一個打擊。

東北的九·一八事件發生了，我們仍在龍華拘押中。外面掀起了激昂的反帝運動，整個的政治形勢顯然在變，變得對革命有利。以陳獨秀為首的在外同志，聽說在新興的運動中也起了相當作用。我們的心情也跟着激昂起來，甚至於想出去；當然，無論我們的家屬或組織，都沒有為我們贖買的能力，幻想只好寄託於大局的意外轉變了。不過事情當然不會照幻想發展，有時常得其反。不久，約莫在 10 月間，我們的案子首次提堂了，所謂提堂，不過按照偵緝隊裏的口供覆問一遍，沒有一點新奇的。全案問完後，忽然發生了不尋常的現象；我們一案的人全體加釘重鐐。朋友們倒為我們擔了心，因為依照習慣，提堂後加鐐，只是行將「打靶」的暗示；這暗示，同時也等於綁匪們的哀的美頓書：再不接受條件就要撕票。可是我們這些人其實無

錢，根本無談判資格。大家只好靜待撕票。我們的心情倒是非常平靜的。難友們（他們全是所謂「史大林派」）對我們異常同情，甚至有請我們吃紅燒豬肉（當時司令部中唯一可以辦到的上菜）來送行的。不久，外面親友探得消息，據說有生命危險的只有超麟和資深二人，其餘都不致於打靶云。聽了這消息，鄭何二同志的表現是好極了，完全不當一回事。尤其是超麟，那時彷彿是一位得道的高僧，預知自己的解脫期近，欣然等待那個「好日子」到來。他一樣授課，一樣下棋，一樣地談笑自若。讓同囚的「史大林派」同志們深深地感動了。

當我寫這幾行字的時候，鄭何二同志（以及其他不少托派同志們）在他們「老朋友」毛澤東（1927年末何資深同志任中共湖南省委員會的組織部長，毛澤東任委員會的書記）的秘密監獄裏，又已度過了長長的四個年頭，或者更壞些，他們已在這個「老朋友」的公安軍的槍彈之下喪了命吧。革命誠然是「噬人的野獸」，在這裏人的温情更沒有絲毫地位，我們於此發任何樣式的感慨都只是可笑的軟弱與無知；但是，我必須假借每一時機來替這幾位高貴的同志們作證；他們是無辜的，與人家妄加的「反革命」罪名無絲毫相涉，不管他們今天得到了怎樣的待遇，他們始終是為中國無產階級解放與社會主義事業而鬥爭的最忠勇的戰士！

現在再讓我們回到1931年去吧。「生死未決」的懸宕時期延長了一個多月，大約在同年11月底，我們終於被判決而起解了，我們非常高興，因為鄭何二同志與我們一塊兒起解，並沒有證實那個不幸消息。臨解前，人家向我們宣佈了刑期，超麟十五年，資深十年，其餘的：宋逢春、陳亦謀、江常師和我，連同早幾時先行判決的樓國華同志，都是六年，唯有濮德志輕判二年半，因為他家人給他花過一點錢，並由許世英打了招呼。

在漕河涇的江蘇第二模範監獄裏，我們僅僅住了兩個月。當 1932 年 1 月 28 日的淞滬抗日戰爭一開始，我們便被集體解往杭州，復由杭州解至蘇州。不過短期的漕河涇監獄生活，在我記憶中留下了永不磨滅的恐怖印象。因為這個監獄之殘酷黑暗，確能稱為「模範」而無愧。我現在不願在這方面多費筆墨，不能給它作一縱使簡略的描述。其實只要指出這個事實就可以想像了：據說，一年來由司令部解來此地執行的「犯人」，到那時尚能存活的只有十分之一，其餘的十分之九都在病監裏「解脫」了。我們幸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之「賜」，沒有在那裏長住，總算還能活着出了牢門，否則，不需半年，我一定會死的。進去才不到二月，我們的「同案」陳亦謀就病死了，等到因戰事被送往杭州時，我衰弱得幾乎已經不能走路。總之，這個監獄是比槍斃略慢些的一種處死，而精神與肉體的虐待，實在比槍斃更加難受，它是一種非常「模範」式的凌遲死刑。

蘇州盤門外的軍人監獄，比之於上海的模範監獄，簡直是個天堂。這裏吃的是可以下嚥的紅糙米，不是上海監獄裏以沙石煤屑混和的爛臭米，儘量吃飽，而且有真正的白菜湯送飯。不過這還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精神上愉快得多。我們進去時的監獄當局比較開明，書籍可以自由送進來，獄卒不太專橫，難友間可以有某種程度的來往。到了這裏，朋友們都準備了長期的研究計劃，紛紛寫信出去要親朋家人買書。

這個軍人監獄囚禁了將近 400 個「犯人」。十分之八是政治犯，只有一二成真正的軍事犯及盜犯。先我們而來的共產黨人，都已住了相當時期。少則一二年，久的竟有兩三年了。他們和實際政治脫離已久，和黨的生活更是隔膜。對於最大多數說來，不知有什麼「立三路

線」或「調和派」，更無論史托之爭了。因此，他們是不懷任何成見來歡迎我們這幾個托派的。在獄中，他們有相當組織，領導着一些生活上的改善鬥爭，與外界通通消息，並多少照顧點同志們的生活。知道我們是以托派共產黨人資格入獄的消息以後，這個獄中的領導便向我們提出了要求，請我們比較客觀地將幾年來黨分成史托二派的原因和雙方論據寫出，讓他們閱讀和討論。我們很高興接受這個要求，朋友們就要我來寫提綱。我躲在獄室的角落裏寫托派的意見，「史大林派」的同志們卻替我在門洞口放哨，免被獄卒發現。東西寫成後，從「電話線」（即每兩「號子」之間靠近天花板的一個小洞，用以裝置電燈者）裏送遞，讓所有的政治犯傳觀。傳觀結果雖不曾出現動人的轉變，但影響總不是反面的。雖說有聯絡，人們卻畢竟處在隔絕和孤立的狀態中，充分交換意見自不可能。而且憑着簡略的「一面之詞」，當然不會使那些正在為「黨」付出自由代價的人對這個「黨」領導的正確發生動搖，他們決不能貿然對我們表示同意；但在另一方面，他們也不肯把我們當成異端，更不會隨聲附和地稱我們為「反革命」。總之，無論在傳觀前或傳觀後，獄中的所有革命者始終對我們非常友善、親熱、全不曾有敵對或見外的表示；雖然真正思想上轉向我們的並不多。

在蘇州住了數月，忽然有大批難友轉押赴南京第一軍人監獄，超麟和資深在被解之列。國華和我卻留了下來。我的同案就此更加分散了。此時江常師與宋逢春彷彿早已押回上海監獄，後者復於數月後，由家屬設法贖出去了。

國華同志和我在蘇州監獄裏住了四年（刑期滿三分之二以後，照例能取保釋放）^[1]，這是長年累月永無變化的日子。當然「生命是無處不在的」，即令在一丈見方的牢籠裏，在高牆四圍的井底，生命的力量

一樣在發揮，「靈魂」而且在從事更勇猛的冒險，但這總屬於精神的範圍，形相的變化太少了。因此，它們構成了「詩」的豐富材料，卻不能寫進這本散文的回憶裏。我不能在此多作題外的描寫。

監獄從來是革命者的大學，我們自然也不曾虛度了那幾年。我個人，總還算幸運的，在國內和國外都曾進過二年大學，可是我真正的大學卻仍在監獄開始。當初正式讀大學時，不是為了生活壓迫，便是因為課外活動太忙，從未有機會系統地讀過書。只有在蘇州的幾年中，我才比較認真地研讀了經濟和西洋古典哲學的書籍。不用說，那成績仍是不足道的。大原因是書籍不夠，而監獄制度又時常變換，有時候，來了一個壞的獄長，會把「號子」裏的任何書籍都給抄出去。

1934年底，我出獄了，數月後，國華也出了獄。長年間肉體和精神虐待，使我們的健康幾瀕崩潰；可是這還不夠，自由世界裏卻有更大的打擊等着我們：二人的妻子，都在我們入獄期間找到了新的配偶，這秘密卻到此時才向我們揭開。

在革命者的生活中，這樣的變故原是常事，算不得悲劇的；不過當每一個革命者接受他自己這一份變故時，仍永遠會感覺到新鮮的打擊力。我是病倒了，國華比我強些。他在一個農場裏隱居了半年，舐舔好創傷。

* * *

現在我得回敘一件事。大約在1932年的深秋，外面遞進來消息，說以陳獨秀為首的反對派領導人全體被捕，其中除獨秀外，有彭述之及其弟道之，又有羅世藩，以及與我們同時被捕才得獲釋的濮德志與宋逢春。這又是一個大打擊，它把一·二八以後頗有發展的中國托派運動打得支離破碎，長時期不能恢復轉來。

當我 1934 年年底回到上海時，反對派組織的主要負責人是陳其昌同志。相談之下，才知道幾年來反對派之得以繼續存在，可說多虧了他的勉力撐持。獨秀等入獄，組織曾由劉伯莊等老人試行維持，但過不久，這批人相率北上，進大學當教授了。以後便是其昌的獨木支大廈時期。大約在 1933 年或 1934 年初，有兩個外國記者同反對派發生了關係，一個是李福仁，他是南非的老共產主義者，在二十年代末就轉入了托派的；另一個是美國人易洛生，原本同情史大林主義，在上海辦一英文雜誌，態度很左傾。因為中共領導要他寫文章攻擊陳獨秀，並且供給他一一些虛偽的材料，要他誣衊中國托派，使他發生了反感，竟迫他變成了托派。易洛生成了托派，決心寫一部關於中國革命的歷史。他結束了雜誌，將印刷機捐給了組織，自己擇居於當時的北平，僱用劉仁靜作他的翻譯。其時，北京有幾個青年學生團結在劉和易的周圍，從事於比較積極的反對派活動。這些人中，有後來較為著名的劉家良，斯朝生與王耀華。當我出獄時，劉、斯、王三人以及另一位扈煥之已經來到了上海，並且與李福仁一起，組織了一個臨時的領導機關。在理論上，這幾位新出山的青年領袖受着劉仁靜的指導，所以他們一經登台，立刻就來清算監獄中的陳獨秀，把他早已由托洛次基為之刷清的什麼「機會主義」、「侮辱紅軍」，甚至「誤國政策」的舊罪名，統統搬將出來，加以鞭笞，而且還通過決議，列舉罪狀，要南京監獄裏的「老頭子」承認，否則「開除」。陳其昌和當時剛出獄的尹寬等，見了此種狂妄可笑的行為，竭力表示反對，斯朝生和劉家良等便將他們也一併「開除」了。這批人的氣焰有點像黨裏的王明派，因為他們似乎也有點「國際靠山」。其實李福仁與易洛生都是真誠的革命者（至少就那時說，因為今天，李福仁仍是托洛次基主義者，易洛生卻已退回到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去了），他們對中國反對派情形很隔膜，因之受了劉仁靜的蠱惑。易洛生而且幫劉仁靜寫了一本英文小

冊子，名叫《五年來的中國左派反對派》，內容是劉仁靜將自己描寫成中國托派運動中的列寧或托洛次基。劉仁靜的這一文件，亦即斯朝生和劉家良們當時所擁護的綱領。後來在 1935 年 8 月間，由易洛生攜送給住在挪威的托洛次基，並依據之進行討論。易洛生有談話記錄寄回來，我們曾將它譯載在《中國革命問題》裏。談話稿中某些批評非常出色，譬如易洛生記道：「他（即托氏——作者注）對於劉仁靜自命為中國運動中布爾雪維克傾向的代表的那種驕傲態度，頗覺有趣。」又說「劉仁靜把他自己心裏的東西和群眾心裏的東西『當成一個』了。」談到其他細微之爭，托洛次基連連搖頭地說：「把這些前途問題來妨礙行動的第一步——荒謬！荒謬！」至於斯朝生和劉家良們的「開除」陳獨秀，托洛次基認為「絕不允許」。

總之，那是劉仁靜利用了兩個外國同志的天真，又利用了少數青年同志的虛榮，想報復他過去幾年中所受「委曲」而鬧出來的一場悲喜劇。這齣戲是很快完場的，大約在 1935 年春夏間，由於一個水電工人中的國民黨特務的混進組織，斯朝生等四人在上海，劉仁靜在北京同被逮捕。劉仁靜被捕後的種種情形，我已在前面講過了。

* * *

其次我要敘述一下我入獄期間，發生於國內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某些大事。首先得提到的是：國際的托洛次基派運動，已經由自認為共產黨內一派的立場，變而為黨外獨立的立場了。這兒的關鍵是 1933 年德國希特勒的上台。在那時以前，我們認為共產黨正經歷着可怕的官僚主義的與機會主義的墮落，但未曾死亡，即尚有挽救之望；因此我們的責任在於用黨內改良方法，即經由黨內的民主手段，企圖改變共產黨的領導；也因此，不管我們已被官僚們開除了黨籍，而我

們繼續自稱為左派共產黨員，命自己的組織為「布爾雪維克—列寧派」或「左派反對派」，被史大林派控制的共產黨究竟還有多少生命力，並無任何一種儀器可以測量的。主要得看它們在革命中的試煉和表現。在 1933 年的德國，共產黨以及整個共產國際終於被試驗出是徹底腐敗與無能的了。它們幾乎不經一戰便在法西斯黨徒面前可恥地投了降。這是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事件，其重要性當不稍減於 1914 年第二國際在軍國主義面前的投降。托格茨基於是從那時起，便宣佈了「反對派」地位的結束，放棄了把共產黨（第三國際）加以改造的希望，今後必須另起爐灶，必須拋棄那面被徹底污損了的旗幟，必須豎起一面全新的旗幟，必須為一個新的第四國際的建立作鬥爭了。那時，各國的反對派大抵都易名為「共產主義同盟」。國際的共產主義組織會同了兩個屬於第二半國際的工黨，還有一個德國亡命的工人小政黨，發表了有名的「四團體宣言」，議定了「十一條」革命綱領，準備由此建立正式的新國際。

當我於 1934 年年底回到上海時，這個謀建新國際的運動已在那裏展開，只因人們的注意完全集中在「肅清陳獨秀派」的問題上，以致建立新黨方面的工作始終不曾認真舉步。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的正式「誕生」或開始，還要推遲到 1936 年初。

不過在談到那件事情之前，我還須提一提中國共產黨當時的情形。因為了解了他們的情形，可以更好地了解我們托派的處境。在迄今為止最具權威性的中共史料：《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上，有如下一段文字：「在 1933 年以後，又由於城市工作的更大破壞，臨時中央也離開了城市而遷入了鄉村根據地，實行了一個轉變。」我們若再記起以前摘引過的劉少奇在中共八次大會上的講話，即是說，那時城市中秘密組織幾被破壞了百分之一百，就很清楚我在 1934 年年底到上海

時候的情形了。中共組織之大遭破壞以致最後撤退，一半是由於領導上的盲動與無原則的派系鬥爭，另一半則因為國民黨政府之進一步的相對穩定，同時採用了新的特務制度。因此可以說，這是史大林（經過王明）與蔣介石的合作，使原應代表工人階級的政黨，終於完全遺棄了工人階級。從此中國共產黨在異階級的環境中存在和壯大，直到它勝利之後，以征服者的資格再來與城市的工人階級相見。一個自命為工人階級代表的政黨，與該階級根本脫離，靠其他階級的滋養而成長起來，且終於獲得勝利，是否仍舊是無產階級的政黨？這乃是一個全新的理論問題。我將在最後一章裏討論它，此地僅僅指出這一個事實。

中共組織竟無法在上海立足，那末托派只能有可憐的存在，事情就很可理解。當 1934-1935 年間，情形委實艱難。一般工人對革命都失了望，他們忍受了國民黨御用工會的控制。由共產黨叛徒們組織成的 CC 團特務，仿照了共產黨的秘密組織，經過一切孔道滲透到工人和學生中，無微不至地監視着他們的行動。真正的革命黨人，不管你是史派或者托派，只要稍有活動，總立即可以被檢舉出來，加以逮捕。那時他們對被捕者的辦法也完全不同了。絕不提審，很少槍決，而唯一目的是要在政治上毀滅你。他們為達此目的，曾採用了史大林與希特勒發明的一切「科學方法」。不過關於這些，我將以自身的經驗來說明。

現在讓我再回過來談談那時反對派的組織情況。

我出獄後，回鄉下養了半年病，直到 1935 年夏天再到上海，此時劉仁靜、劉家良們合演的悲喜劇已經收場。易洛生走了。李福仁還在。領導機關根本沒有，那時全上海大約只有二十餘個反對派同志。大家覺得非重新組織不可。獄中的獨秀對組織很關心，他寫信出來，主張由陳其昌、趙濟和我，暫時成立一個三人委員會，着手整理工

作。李福仁此時已和陳其昌及尹寬和解，常見面，也極盼組織能夠恢復。但組織迄未有恢復之望，主要原因是獨秀對李福仁的萬分厭惡。他老人家當時接連寫出信來，力阻我們再和「毛子」合作。獨秀的那種態度是難怪的，因為十多餘年的經驗告訴了他，「毛子」（即外國同志）在中國革命中所起作用，其實負數多於正數，而一般不肖的中國「二毛子」（以王明為傑出代表），奴顏婢膝，西崽僕歐一般跟在洋大人後面，同時挾靠山以自重，對本國同志發號施令，頤指氣使，這情景實在叫人看了齒冷，思之心痛。獨秀從來不喜歡此種作風，所以始終與國際代表們弄不大好；等到革命失敗，「最大毛子」史大林將一切的功歸之於己，把所有的過都諉之於陳獨秀，以此脫卸一己的罪責，冷酷地將昨天的合作者當作了替罪之羊，這就使「老頭子」痛心疾首，一聽到「毛子」就萬分難受。再加以不久以前，有兩個不知來自何方的「毛子」，聯合了幾個甫出校門的「小子」，竟歷數他的「罪狀」，勒令認錯，終且通過決議，「開除黨籍」，更使他舊恨重燃，氣憤得簡直啼笑皆非。劉仁靜們的短劇終場後，李福仁已經對中國的事情摸清不少，他深知數月來自己支持「青年布爾雪維克」的非是，於是數次要其昌轉達，想赴京與獨秀見面，被後者堅決拒絕。我病癒返滬，李福仁託黎彩蓮同志轉言，要和我談談。我最初不想去，因得知了半年來他們合搞的把戲，對他頗有反感。後經其昌敦促，遂和李福仁談了一次。結果，印象卻是好的。我開門見山問他：「你來上海，是否代表反對派國際書記處？」他聽了很愕然，並鄭重向我聲明，他只因職業關係來到中國，因為是托派一分子，當然要找組織參加，他從不曾向誰說過他是什麼國際代表，希望我能替他向獨秀解釋。我所以如此發問，因為我聽說，劉仁靜等一向就將他說成「國際代表」，抬在肩上，在中國同志中招搖撞騙。他得知了有人曾把他故意說成這種地位，非常氣憤。然後我們自由地交換了關於國際國內反對派的意見，我終於發現，這是

一位很忠厚老實的同志，絕非官僚，亦非冒險之徒。他只是一心要想參加工作，希望趁他在華之機，能給組織以多少幫助。可惜的是，過去他的熱心卻讓劉仁靜的野心給利用了，以致未能成事，抑且敗事。那次談話之後，我便決心把恢復組織的事情推動起來。不久，從一次上海現有同志的代表會議上，推出了一個臨時中央委員會，其中包括有陳其昌，尹寬，蔣振東，李福仁和我。此時獨秀方面，因得其昌，趙濟和我的不斷解釋，總算對「毛子」的合作也諒解了。

注釋

1. 洛陽開的國難會議決議大赦犯人（不限於政治犯），凡刑期在三年以下的一律釋放，三年以上的減刑三分之一。國民黨本不肯適用此決定於軍人監獄的犯人，1934年也適用了。王凡西依例出獄，樓國華因犯了監規再關了一些時候。——校者注

九、《鬥爭》創刊——第三次入獄

1935年年底成立的臨時中委會，在整個中國反對派歷史上佔有比較重要地位，因為這一機構存續的時間最長，做的工作也可說較多。它恢復和發展了上海和全國的組織，有計劃地出版了一些國際反對派的文獻，而更重要的，它創刊了政治機關報《鬥爭》（每月一期）與理論機關報《火花》。這兩種刊物，以1936年春天開始，中間差不多沒存間歇，一直持續到1942年年終。中國的托洛次基主義運動沒有任何一種期刊有過這樣長的壽命，起過如此持續的與逐漸擴大的影響。

新領導機關的第一件工作是建立一個自己的印刷工廠。易洛生本來留下一架小印刷機給組織的，但在斯朝生等當權時出賣了，換來的一筆錢，也當作工作經費花去了。我們那時沒有能力買機器，就憑了幾個印刷工人同志的智慧，製作了最原始的「木架鉛印機」。單單從外面買一些鉛字來，就能夠印出兩種顏色的漂亮報紙，致使當時的魯迅讀了會誣衊我們是拿「骯髒的錢」來辦報的！這個印刷工廠最初由兩個印刷工人管理，後來一個姓粟的叛變了，企圖霸為己有，對組織實行要脅，我們於是來了一次突擊；李福仁化裝成巡捕房裏的「三道頭」，再有兩個同志扮成「包打聽」，直入粟寓，將「機器」搶出。以後，印刷工作長時期地由林煥華及毛鴻鑑二同志負責。

臨委會的第二件事情是整理組織。上海的關係是現成的，組織一經恢復，生活便可開始。我們開始注意到了香港，那裏原是中國反對派最早的根據地之一，有很多工人同志，可惜幾年來大多斷了聯絡。因此在1936年5月，組織就決定我到香港去一趟。在香港住了一個月，以由「無產者社」留下來的老同志羅新及後來在抗日游擊戰中壯烈犧牲的陳仲禧為中心，終於重新團結了十幾個人，建立了組織，並且仿上海的例子，也製成了一架原始印刷機，出版華南機關報：《火星》。幾年來，因為與上海實際失去了聯繫，某些同志竟和章伯鈞們的第三黨混在一起了。因此我們那時的首要工作，就在劃清我們和第三黨之間的政治界限，並終止了組織上的跨黨現象。同志們恢復了區芳、陳亦謀二同志所定下來的傳統，又積極面向了工廠。李福仁那次與我偕行，他利用了洋人身份，給華南朋友帶來了大批多年來未見的反對派文件。所有這一切，對此後華南工作的開展，確實起了不小幫助作用。

同時，中國反對派意外地獲得了不少廣西年輕同志的增援。我說意外地，因為事實上並非歷來中央機關有意耕耘的結果。反對派有個張特，自從1931年四派統一之後，就背棄了所信，脫離了組織，回原籍廣西做官去了。那時的李白手下有個紅人名黃公度，曾留學莫斯科，卻從不曾與反對派有絲毫淵源，甚至恐怕根本不曾進過共產黨，他引張特作了自己的心腹。當時桂系反蔣、偽裝左傾，吸引了不少過去的共產黨或隱蔽的共黨。黃公度們為了爭權，乃大量招集過去的托派分子到廣西去，這些人無一例外地與托派組織斷了關係，大多數被安插在廣西的大中學校裏教書。其中有史唐。這個人，雖然脫離了托派，而思想卻仍是藕斷絲連，因之在和學生接觸中，他總是有意無意地散播着舊有的思想，結果倒產生了不少年輕的托洛次基主義者。在

我們那次臨委會成立前後，他們已經和上海有了直接聯繫，不久又派了人來。上面提起的林毛二同志就是那一批裏來的，另一人我記得就是麥俊奇。

華北當時無組織。1931年四派統一後，原屬於「十月社」和「無產者社」的人合併起來，華北（主要是北京）的組織相當強大。詳細情形，因我已入獄，不得而知。只聽說1932年10月獨秀等在滬被捕後，北京學生界曾發動了有聲有色的援陳運動。在幾個大學舉行的講演會上，擁陳與反陳的二派學生旗鼓相當。但到了1934年前後，斯朝生等南下，劉仁靜等被捕，北京卻已無組織活動可言了。只有在山東，有一些同志的工作，此時已在好幾個縣中有了點基礎。當臨委會成立之後不久，大概在1936年夏季吧，山東朋友們也派了幾個人，與上海的中央恢復關係。來人中有梁四同志，他是堅持到今天的少數托洛次基主義者之一。

溫州的托派活動那時還只在醞釀狀態，與我們發生關係彷彿還在較後時期。那個位於浙江東南部的古老城市，和廣西情形相似，也幾乎是「自發地」產生了一批年輕托派，種子是一個行為上和史唐差不多的人帶去的，他名叫曾猛，是莫斯科回來的老托派。與陳獨秀等一同被捕，後由家屬設法，利用他過去的黃埔軍校關係，有條件地提早釋放了。出獄後，也當然不再找組織，回到溫州去當隱士。其間和一些年輕人接觸，就傳播了托派思想。無心栽柳柳成蔭，後來溫州有不少中學生走向我們，並且他們與中山、廣西及山東一起，成為中國托派後半期幹部分子的四大供應地之一。

革命黨的歷史上不乏此種例子：有些人，為了主觀和客觀原因，自己離開了組織，變成了「全軀保妻子者」；但是他們並不完全甘心

的，在內心或下意識中，他們甚至還看不起自己的從革命中脫逃。尤其是當得勝的反革命者徹底腐敗，竟不能將當前的歷史問題解決半個，以致絕對不得民心的時候，則此類過去的革命者所犯的「人格分裂症」會愈加厲害。不管他們所從事的新職業是否成功，但想根本不擺脫他們害過的「幼稚病」卻是很難的。當然，這只是指那些尚有「良心」的人而言，至於「販賣人肉」的叛徒們，自不足以語此。我們以前嘗稱前一類為「反而不動者」，後一類則是徹底的反動者，是叛徒。那些「反而不動者」常能繼續成為同情者、成為朋友，而在某些「機緣湊合」的情形中，他們的贖罪式的說教，還可能產生積極結果，有如史唐曾猛之所為。

當革命重起，而那個革命黨又有力量的話，這些「反而不動者」多數會回來歸隊。這當然是投機，是「人性的弱點」，同時這也是過去多次勝利革命迅趨墮落的諸原因之一，但是這現象植根於社會及人性的深處，因而是無法避免的，除非你不想勝利。

中國反對派統一後迅速遭受打擊，原來不穩定的分子各自飛散了。這些分子中自有不少敗類，但像我上面所說的「人格分裂症」患者卻也不少。我們時常會遇見某些年輕托派輾轉找來，可是一問來源，那使他們走上這條道路來的人，有時連他的名字都已忘記，甚至根本不曾聽說過呢。這些遭遇，我自然無法一一記得了。

在整理及擴展組織的同時，新的臨時中委集中全力來發行政治機關報《鬥爭》。不過在談到這件事以前，我先得將當時世界和中國的政治形勢約略描寫一下。為了眉目清楚與說明方便起見，我把幾件最重要的大事分列如下：

德國法西斯黨執政已一年餘，大踏步向軍國主義邁進，以此大大加速了第二次大戰的到來；

在中國，日本帝國主義的鐵騎踏進了東北和華北，且正以劍頭指向着華中；

史大林用罪惡而愚蠢的「第三時期」路線，幫助希特勒走上了政權，如今在德日的軍事威脅前面發抖，於是在共產國際的第七次大會（1935年）上，提出了「人民陣線」的口號。他現在不但要和昨天被他當作法西斯來打擊的社會黨聯合，而且要和一切「民主派」，包括「民主」帝國主義者在內，締結一條反法西斯的共同陣線；同時在國內卻加緊迫害革命者，開始用槍彈來對付所有的老布爾雪維克；

國民黨政府繼續執行「先安內後攘外」政策，不斷對日帝讓步，集中全力向江西的共軍進攻，在1934年底獲得決定的勝利，迫使共軍突圍和長征；

1935年1月，在貴州遵義的中共中央會議上，毛澤東代替了陳紹禹為黨的最高領袖，這意味着中國的「土共」對史大林直系勝利；同年8月1日，中共依照莫斯科的新路線，發表宣言，主張停止內戰，與國民黨聯合抗日；放棄階級鬥爭，擬定抗日綱領；同年10月，共軍在陝北鞏固了新的根據地。

在這樣的一個政治大氣候中，我們的《鬥爭》誕生了。手頭沒有資料，我已記不清第一期究竟是何時出的；但一定是在1936年春天。因為第一期的第一篇文章〈給中國共產黨的公開信〉，由我起草，記得比較清楚，內容正是批評了共產黨的新路線。

《鬥爭》於斯時創刊，可說滿足了一個非常迫切的政治要求。它的出現是頗合時宜的。國內外的形勢進入了大動亂中，階級鬥爭與民族鬥爭突然緊張起來，令人迷惑的現象層出不窮，人人都要了解，人人都想行動。《鬥爭》在小小範圍內，多少能滿足一些人的要求。當時對我們托派說來，還有個特殊意義，那就是托洛次基在1929年關於中國前途所作的分析和預斷，竟在事實上一一應驗了。四五年來，史大林們一直稱呼我們為「托陳取消派」，理由是：我們認為自從1927年秋天以後，中國便不再有革命形勢，更沒有直接革命形勢；有之，將是民主與民族的鬥爭。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如想回到政治鬥爭的舞台上，就應該針對這個前途，提出自己的，亦即徹底革命的民主政綱（全權普選的國民會議及其他）藉以推進和領導這些鬥爭，並因而走上新的社會主義性的革命。史大林主義者根本排斥這種看法，在不變的一個錯誤前提，即「高潮很快就要到來」的前提下，進行了長達五年的所謂「左」的鬥爭。結果則如我們在上面已經提到的：城市組織與工作被全部消滅，鄉村的武裝力量也瀕於被消滅的險境，乃不得不突圍長征，企圖尋求一個較近於蘇聯邊境的新根據地。同時在另一方面，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節節進侵，國民黨的步步投降，城市裏，特別在小資產階級群眾中，激起了波瀾壯闊的反帝和反國民黨的浪潮。它們因為沒有工人階級及其政黨的領導，因之運動完全處於資產階級政客（救國會等）的影響之下。這種情勢充分證實了托派多年來的估計，而為了正確地應付它，也只有採取我們一貫主張的革命民主政綱。可是中共在客觀形勢的打擊下，從無以復加的「左」邊跳回來改作民主鬥爭時，卻變成無以復加的右了。他們幾年來替托派的民主政綱惡意描繪的那幅漫畫，現在則放上自己的嘴臉而作為民主的真容了。他們道道地地的將取消主義的實質冒充了民主鬥爭。昨天，他們將任何形式的國民會議要求稱為叛變；今天，他們非但要求國民會議（除去了革

命內容的)，甚至，為了要取得國民黨承認的「合作」，竟不惜放棄階級鬥爭，取消紅軍編制，改宗三民主義……這個轉變確是太大了，太突兀了，以致不但使黨外人看了莫名其妙，便是黨內人也都覺得非常奇怪。它不但叫普通黨員吃驚，甚至中共的領導層，連毛澤東在內，都頗感意外。據胡喬木在《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中說：「在這個時候，迫切需要對日本進攻中國以來的國內形勢作一次正確的分析，決定黨的政策，糾正在黨內濃重存在着的『左』傾關門主義。這個工作是1931年到1934年的黨中央所不能完成，毛澤東同志在1935年的長征中也不可能完成的。直到這時，在共產國際關於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正確政策的幫助之下……才滿足了這個要求。」從這段掩掩飾飾的文字裏，我們可以清楚看出，這個對國民黨的「取消主義」政策，並非中共自製，而是由共產國際（讀如史大林）代訂的。對於它，我們事後知道，毛澤東和中共的其他許多領導人，曾經表示若干抵觸與惶惑。（由後來的事實說，在不小程度內，他們始終是陽奉陰違的。）

當時只有我們——中國托洛次基主義者——因為一向留意蘇聯與共產國際十多年來種種轉變與墮落的歷史，能夠清楚地理解此一新政策的前因後果，能夠正確地解釋此一轉變的來龍去脈。《鬥爭》剛好在這個時候出版，可謂投合了客觀的需求。就我個人的接觸說，上海一帶的中共同情者，有不少人是以同情態度來接受《鬥爭》的。這種同情以前不曾有過，以後也沒有過。所可惜的我們的力量太小，遠趕不上這個時代要求。因為機器太原始，「生產力」低，每個月只能出得一張四頁半開的報紙，而且每期只印得200份。不過靠了它的經常與持久，這份報紙的影響總是不斷在擴大，在中國反對派全部存在時期的所有刊物中，它到底是最大影響的一種。

如上所述，《鬥爭》初期的主要內容是批評中共的新轉變，提出我們的抗日主張，為全權國民會議及其他革命的民主政綱作號召。到了是年8月以後，內容卻側重於反對史大林的恐怖了，因為發生於這一月中的關於齊諾維也夫等16名老布爾雪維克的審判，激動了國際與中國的輿論。不過在故事向這方面講下去之前，讓我先提到一件與「新轉變」有關的插話，那便是陳其昌與魯迅之間的通信。我沒有清楚當時發生於上海左翼文人中間的爭論情形。後來也不曾有機會去閱讀那一爭論的有關文章，不過大體是知道的，它多少牽涉到文學中的階級鬥爭立場和階級合作立場之爭，代表前者的是魯迅，他較執着於左翼作家們的原有立場；代表後者的是徐懋庸與周起應（即周揚）等，他們無條件擁護新政策的文學路線。故若從更大的背景看，這簡單是史大林由「第三時期」轉入「人民陣線」時所引起的一點新舊之爭。徐周等人提出了「國防文學」的口號，魯迅不甚贊同，他認為應該提「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我們並不以為「第三時期」比「人民陣線」較為正確；但在魯迅和徐懋庸等人的爭論，亦即他和史大林政策新轉變的爭論中，卻多少表示了真誠的革命者對於階級鬥爭的堅定，對於無條件投降於國家主義的厭惡。魯迅始終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但這位偉大的文學家永遠是一個同情被壓迫與被踐踏者鬥爭的戰士，因而即使不是思想上，至少在感情上他仍是階級鬥爭學說的服膺者。何況，在他思想和行動的逐漸成長中，反對各式各樣國家主義文學的鬥爭，曾起了決定性作用的。現在（1936年），提倡了多年的「普羅文學」，與國民黨御用文學及所謂「第三種人」等作了長期尖銳鬥爭之後，忽而要掉轉槍頭，化敵為友，從事什麼「國防文學」了，在他心裏當然不會舒適安靜的。於是引起了爭論，而且這個「內部」爭論，傳到了我們耳中。陳其昌聽到了這消息後非常興奮，於是寫了一封信（此信後來附印在魯迅的覆信後面，被收入全集中），附上《鬥

爭》及另外幾冊中譯的托洛次基的小書，由內山書店轉送魯迅。魯迅當時已病得很重，不能執筆，乃由 O.V.（據說即是雪峰）筆錄他的口授，給了答覆，公開登載在一本名叫《現實》的文學雜誌上。書信俱在，內容不必贅述，總之，他說，他看到了我們這些印刷得「很整齊」的書報吃驚，懷疑這是從日本人方面拿錢來辦的，又說我們「有背於一個中國人的做人道德」云云。

其昌做這件事時我在香港，事前他也沒有和其他同志商量，故事後頗受同志們的指責，尤其是南京監獄中的陳獨秀，知道了大發脾氣，問我們為什麼會對魯迅發生幻想。他認為，魯迅之於共產黨，無異吳稚暉之於國民黨，受捧之餘，感恩圖報，決不能再有不計利害的是非心了。其昌從北大時候起就熱烈崇拜魯迅，很敬重他的骨氣，幻想發生，即由於此。看到魯迅那封滿紙誣陷的覆信後，很覺得痛苦。他痛心的倒不是因為自己受了污衊，而是發覺到牽涉進黨派政治之後，甚至一個最有骨氣的人，也不得不人云亦云，而且不得不應用他本人從來痛恨的「流言」與「盧布」（這兒應指「日圓」）冷箭。他又寫了一封長信給魯迅，當然沒有答覆，不多久，魯迅也就死了。當時我對其昌此事也嫌他過於魯莽；但事後證明，魯陳二信被收在那大量流通的《全集》中，也未始不是好事。閱讀之下，明眼人自能看出，究竟誰是誰非。

在這裏，我還得讓野馬再多跑幾步，談談我們那些「很整齊的」書刊的經費問題。因為中國史大林派對我們進行鬥爭，從來不曾應用過理論武器，他們應用的只有兩種：1、在他們的統治之下，監獄與槍彈；2、在他們的統治圈外，流言與誣衊；而誣衊中之最大一項，便是說我們向「敵人拿錢」。武漢時期（1938年）由陳紹禹發動的所謂唐有壬拿錢給陳獨秀的大誣衊運動，我將在後面談到，這裏且談談我們

那時辦《鬥爭》的經費來源。為了印刷，我們租了一幢獨立的小屋，月租 13 元，維持兩位印刷同志的生活，每月共 30 元。買紙張油墨及添購鉛字之類，月需十餘元。合計每月支出，共約五十餘元。此外再無支出了，因為所有幹部，都得自謀生活，而且所有收入，還得繳納十分之一的黨費。我們幾個負責的均靠賣文為活，收入不多，所繳不敷組織所出，不足之數，悉由李福仁付足。那末李福仁的錢從哪裏來？是否「不乾淨」呢？請看他的收入吧。他最初是上海某英文報的編輯，月薪約 400 元，後來是《密勒氏評論報》的副主筆，月薪三百餘元，他是一個共產主義者，是托派成員，他的出錢是以此一資格繳納的！

現在魯迅故世已有二十年，被他直接指為拿「不乾淨錢」的陳其昌也在十四年前被日帝憲兵殺害了。可是我仍應在此用賬目和數字來答覆這個誣讞的，因為這個武器仍在史大林的中國弟子們手中使弄，在繼續進行着對我們的迫害。

1936 年 8 月 19 日至 24 日，莫斯科排演了一齣最駭人聽聞的審判劇。「反蘇托洛次基派中心案」。16 位著名的老布爾雪維克，以列寧最親密的戰友齊諾維也夫及聯共中最有地位的理論家加明尼夫為首，被控與國外的托洛次基聯合，「陰謀推翻蘇維埃政府，藉以在俄國恢復資本主義」，罪名是荒唐的；可是更荒唐的，卻是這些老革命家竟在公審法庭上，一一承認了控罪。結果，全體被判處極刑。這樣的審判，除了中世紀最野蠻的宗教法庭外，人類歷史上未曾前見。關於人的一些起碼民權，在西歐的資本主義國家中，一二百年來總算先後爭得了。蘇聯是號稱最進步的國家，對於先烈們用頭顱爭來的權利，應予以更大保障，尤其對於共產黨員，更尤其對於立有殊勳的革命元老們，應如何加以珍惜！這些人不幸犯了真正的罪，縱使不能賜以「鐵券」，保

證他們不受懲罰，但至少得以更大的謹慎來處理，並給他們以更多的申辯或悔改的機會。列寧當權時候，便是這樣來對付犯錯誤或「犯罪」的同志們的。可是現在，史大林卻用那比宗教法庭更荒唐的羅織來對待全體十月革命的元勳們，並且加以殺戮了。這到底是什麼回事？究竟是怎樣發生的？如上的疑問，與無比的震驚同時，產生在全世界關心蘇聯的人們的心中。無論是蘇聯的敵或友，都迫切需要明白這個問題。《鬥爭》的內容就很自然地移轉到這上面來了。我們儘可能就自己的所知，對正在上演的莫斯科悲劇作了種種解釋。同時，將托洛次基關於此事所發表的言論與文字，充分譯載出來。

講到這裏，我必須把故事扯到亞東圖書館的主人汪孟鄒先生的身上去，汪孟鄒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自稱「書賈」，實則其正確名稱應該是文化戰士。從戊戌到辛亥，從五四到五卅，從「國民革命」到共產革命，從共產黨到托派，他始終跟着歷史前進，而且還常常跑在時代前頭。他的書店存在了五十餘年（約自一八九十幾年到1952年）^[1]，永遠不曾發達過，就因為它永遠不曾落後過。一種新思想尚在被迫害時代，其作品並無一個書賈願意承印，他擔任了；但等那一思想「當令時興」，他自己卻跑到更前面了，因之那些昨日無人問，今日搶來買的書籍便由大書店去發財了。孟鄒先生卻承印着另一批尚在倒楣的作品，為了一種更新的思想服務。人事如是翻新，孟鄒先生的作風則一成不變，結果是他永遠和倒楣人搞在一起，以倒楣終其一生。孟鄒先生是陳獨秀的生死不渝的朋友，我和他的相識也是獨秀介紹的。當我從蘇州監獄出來後，生活潦倒不堪。此時汪先生正想請獄中的老友給他編輯一部「民族革命家的小叢書」，獨秀於是要我去擔任，和當時在滬的陶行知先生合編。叢書計劃不曾實現，可是汪先生和我之間卻締結了深厚的友誼。在很長的一個時期中，我個人的生

活就是由他老人家維持的。每月支薪 20 元，作為他書店的一個「編輯」。受薪以來，事實上不曾給他編過一部書，因為限於資本，根本不能出版新書。可是到了 1936 年秋天，發生了那件震撼世界人心的莫斯科審判之後，老人的心卻大大激動起來了。不管怎麼樣，他一定要為這件冤獄的洗雪盡幾分力。磋商之下，我們決定先出兩本小書：1、《莫斯科審判的國際輿論》；2、《莫斯科審判的真相》。由我來着手翻譯和編寫。不久，前一書出版了，接着準備第二部書，可是僅僅寫了一點點，我卻又被國民黨的特務捕去了。遺下未了的工作幸有其昌同志接手完成，得以出版。其昌後來又翻譯了托洛次基那篇有名的演說：《我賭我的生命》，又曾摘譯了「杜威委員會」的判決書，宣佈莫斯科審判為羅織，托洛次基父子無罪。這些書均由孟鄒先生出版，對於當時的中國的讀書界，多少起了有益的作用。

在我第三次入獄之前，我們新建的理論機關報《火花》，記得只出了兩期。那裏主要登載了第四國際籌備時期的一些有關文獻，托洛次基批評「人民陣線」與蘇聯新憲法的文章。其他內容中值得特別提出來的是陳獨秀的一個提綱，關於民主主義的。它表示出這位中國啟蒙運動大師思想上的新轉變，他在不斷躍進後的倒退。進了南京監獄，離開了實際鬥爭，陳獨秀的思想開始發生了一種後退的醞釀。最初是對蘇聯的國家性質發生了疑問。他覺得當時的蘇聯已經不再是工人國家，也不能像托洛次基所說的是什麼墮落的工人國家。他以為，工人階級一旦被逐出於統治機構——即國家機關之外，這個國家便不是，也不可能是工人階級的。因之，他認為史大林的蘇聯只能稱為官僚國家，決不能被描寫為任何種類的工人國家。不過陳獨秀的這樣意見，那時也還只是感情的，直覺的，未嘗深思的，他不曾為此作歷史的與社會學的研究，也沒有明確的自己意見，因之不曾正式用文字寫下

來。從這個「直覺」出發，他比較鄭重地研究了民主主義的歷史發展。結果他達到這樣一個結論：人類的歷史主要乃是一部民主的發展史。據他的看法，自從奴隸社會破壞了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的民主以後，繼起的各種社會形態更迭，不變地代表着民主的提高與擴大。雖然歷史發展所循的途徑是彎曲的，但在較長的時距內看，代表民主的那條線總在向上延伸。因此他獲得了又一個結論：民主是社會進步抑或倒退的最可信指標，它本身並不含有階級性，更不是資產階級的專利品，社會主義者若在民主頭上扣上某某階級的帽子而加以排拒，則是反動而非進步。他認為一個真正的工人國家絕對應該比任何資產階級更加民主。

我們看到了獨秀的文章，沒有一個人同意。他把民主主義看成為一個超歷史超階級的範疇，還原成一個抽象的觀念了。我信服列寧關於民主的見解，至今仍然相信列寧是對的。所以在當時，附在獨秀那篇文章後面，我寫了一些反對意見，一起在《火花》上登載。那時我正在讀托洛次基的《共產主義與恐怖主義》，其中用非常好的論據駁斥了考次基的民主觀。我就摘譯了有關幾段，寄給獨秀，讓他參考。這些對他當然不曾發生影響。他始終堅持着那個意見。等到德蘇協定以後，他的意見就更加徹底了，公然主張擁護民主國家反對德蘇。這時他和托派的思想上的聯繫已告斷絕。那一時期的所有見解，都包括於《陳獨秀的最後論文》中。

* * *

1936-1937年間，國民黨用以鎮壓革命者的機構是大大改進了。即是說，它已進入了我在上一章中提到的所謂「第四個時期」——「科學化特務的時期」，我們的新臨委會成立不久，尹寬突然失了蹤。過了好久才知道他已被關在特務監獄中。寒君同志適於此時被放出來，

由他遞補了尹寬的位置。據他說，國民黨特務很厲害，對我們又非常注意，我們應該加倍小心。但如何厲害，如何注意，他也說不清，因而所謂小心，也無從化為具體措施。大約在1937年三四月間，有一個與尹寬同時失蹤的工人同志在路上遇見了其昌，遂在路邊一個隱僻去處作了一次談話。這個人告訴了他如何被捕，如何悔過，如何獲釋之後，憑他一點「不泯的良心」向其昌建議：依照原來方式的活動是絕對絕對地不能繼續下去的了，因為，他說，他知道我們的活動已全部處在特務們的監視之下。他們要在哪一天幹完我們，便可以幹完我們，所以他自己是從此「洗手」了，只以過去的同志之誼，對其昌作此臨別贈言。其昌聽了這番話，相當激動，立即跑來找我。我們覺得事態是嚴重的，但又懷疑那人做了特務，故作危言。應該格外小心，但要根本放棄「原來的活動方式」，當然談不到。又過了一些時，一天下午，其昌去找寒君，進門時發見了可疑人物，立即轉身，兩個穿藍布工裝的特殊人物緊跟着他。其昌和他們捉了幾小時迷藏，一脫身，便奔回去通知寒君。後者盡棄所有，得以身免；同時一切可能受影響的工作者都搬了家。這樣才算又渡過了驚險的一關。

情勢確實非常嚴重。中共的秘密組織幾年來早已盡被撲滅，或自行撤退了。現在，國民黨顯然要把我們根絕。反帝的群眾運動隨着日帝的不斷進犯而日趨蓬勃，國民黨就更加迫切地要把我們這點火種熄滅。危險是清楚的，我們心裏非常明白。可是怎麼辦呢？停止嗎？根本不能想像！學中共的榜樣撤退嗎？可是我們沒有「蘇區」，同時我們的立場也不允許去做此種嘗試。結果，只有硬着頭皮照舊拼下去，讓要來的事情來吧。終於在1937年5月間，一件事情發生了，我被國民黨的特務逮住了。那時離我第二次結婚才一年，一個女孩子生下來還只一個多月。

憑了那次災難，我總算嘗到了新的特務滋味，見識了國民黨從史大林與希特勒那裏學來的「科學警察」。如今史希二氏均已作古，但他們的「科學」卻仍舊活着，在更多的國家中被採用着，而且我有不少朋友正在蒙受它的禍害。為此，我必須用多出於應有分量的文字，來記述我那次被作「實驗」的經過。這裏，痛苦的追憶只佔很小意義，重要的是要對此滅絕人性的野蠻制度，提出我一己的控訴。

我是在法租界被逮住的，捉我的是兩個便衣。他們根本不依什麼「法律手續」，簡單用手槍指着我，拖上預停好的汽車，一上車就向華界的特務機關疾馳。到了特務機關，連喘息的時間都不給你，立即向你進行了亦文亦武的全套攻擊，持續到四十餘小時之久。開始時，一個操陝西口音的青年人「歡迎」我。他說和我是「老朋友」，問我還認不認識他。這自然是鬼話，但聽他的言語，「過來人」是不會錯的，一陣「寒暄」之後，他拿出紙筆來，叫我「自首」，他說他那個地方不是拘捕人的監獄，只是一個「自首」機關罷了。我說我根本不需要自首，既然你們並不拘捕我，就讓我出去。他便說，要出去非常方便，甚至自己不自首也可以，只要我能告訴他們幾個同志的地址，請他們來「自首」。我說我的朋友都不是幹政治的，也不需要「自首」。這時候，兩個大漢突然從隔壁房裏衝進來，咆哮着，說不要和我「客氣」。一個傢伙抓住了我的肩膀，另一個就從後面用一支木棍在我的後腦殼上猛擊一下，木棍斷了，上半槓直飛出去，我眼前一陣黑，耳朵裏只聽到嗡嗡聲，痛反而不覺得了。一會兒清醒過來，頭上劇痛，只見前面幾個大漢，叉手而立，一臉橫肉，怒目而視，像要吃人的樣子。他們想再動手，此時兩個非常「和悅」的傢伙卻踏過來攔開了他們。有一人向我「敬茶」，另一個「很關心」我後腦上的創痛。一個首領模樣的人還「埋怨」了打手幾句，叫他們出去，同時面對着我坐了下來，向我「衷心地表示歉意」。

我感覺到陣陣的噁心；把戲實在演得太粗劣了。然而他們卻不管你愛不愛看，一而再，再而三地演下去。他們對我的要求最後歸結得很簡單：用三個同志的地址來換取我的「自由」。等到情形清楚，無法用推諉、沉默或欺騙來自衛之後，我的答覆也很簡單了：我決不會說出一個地址，無論他們怎樣對付我。於是在當天下午，大約車輪戰已經延長到七八小時之後，「戲肉」上演了，數名大漢將我拖入一個特殊房間，一人用長巾蒙住了我的嘴和鼻，按在地上，左右二人拉住了我雙手，腿子用繩子綁住了，然後由兩個傢伙用木棍打我的大腿和腳踝骨。究竟打了多少我不知，因為打不到二三十下我已經失去知覺，等到回復知覺的時候，卻發現被放在另一間房的長沙發上了。

全武行之後，接着當然又是文戲。「老朋友」問我想吃什麼。（從一早到那時根本不曾吃過東西）我不作聲。他卻給我去要了一客蛋炒飯來。我不吃，事實上也不會有食慾的。人家就勸我「以身體為重」，而且還說應該「為了妻兒的緣故，保重身體」，同時，「地址」的老要求又提了出來，我不理睬。「客氣」的局面弄得很僵；「武行」的人又進來了，可是白面的角色們示意他們出去，人們跟着都出去了，房間裏只留下一個人看守我。空氣很緊張，隔壁房裏的紛紛討論聲，大概是故意地隱隱傳過來，讓我聽見。留着的人便一臉同情地勸我說：「何必再討生活吃？到了這個地方，什麼人都得低頭的。還是聰明些吧，少吃眼前虧。」我這時心裏很平靜，滋味反正已經領教過了，大不了一個死。人們又回進房，我準備嘗嘗更毒辣的滋味。兩個大漢叫我走，我根本站不起，他們便一邊一個地扶持了我，走出房。我原以為是第二次「做」，誰知不然，我被扶到一個簡陋的木籠子裏讓我休息。倒臥在地上，全身的痛楚開始覺得了，腦殼和腳踝上都流着血，不過我並不覺得難受，太疲倦了，極想休息，我合上眼，昏昏欲睡，可是

不到五分鐘，一批打手又來了，把我再度帶出去。此時我已經完全不能步履，是讓他們「提」着走的。

這一回是更別緻了。一群「學者」型的人在等着我。房間裏數張沙發，中置小圓桌，茶煙俱備，任客自用。當我被攙進房的時候，「學者」們一齊起立，將我安置在一張沙發裏，照例「慰問」，照例「同情」，然後由一位「大學者」開始發言，他說，他們要和我「交換點思想」，談談問題。據說他們是「沒有成見的」，關心的只是「真理」，所以他說：如果我能說服他們，他們很願意跟我走；反之，如果討論結果，我覺得他們對，那就希望我也能有他們同樣的「磊落態度」，跟他們走。宗旨宣佈過後，一位「學者」就提出了第一個問題：「中國革命的性質」。雖然在這樣情況中，不知怎麼，我心裏竟發生了「幽默感」，情不自禁地想笑出來。當然，事實上我沒有笑，也不會笑；憤怒立即克制了那笑的衝動。「討論會」持續下去，「學者們」接二連三地發表着為「真理」服務的偉論。逐漸地，我連憤怒和憎恨都將消失了，我覺得這些「人」太可憐，我竟想痛哭，為了人中間居然有如此厚顏和卑劣的渣滓而痛哭！他們的「真理」彷彿是錄了音的。事實上也只是在長達數小時的時間內，周而復始地開着同一張唱片，借在座的幾個「學者」的嘴巴發出聲來。調子是這樣的：中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這一點，從列寧起，一直到史大林和托洛次基都承認。他們也承認這看法是真理，因此，他們覺得由「委員長」來領導中國革命是天經地義。我們，和毛澤東一樣，犯了一個最不可饒恕的矛盾，就是：一方面同意這真理，另一方面卻不認「委員長」、國民黨以及資產階級來領導革命。結果是作亂犯上，搗亂破壞，使「委員長」不能安心完成「革命」。這就是反對革命，甚至也就是違反了列寧和托洛次基的教訓。所以說到最後，據他們說，我即使想成為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也必須信服「委員長」云云。

我用沉默來應付「討論」，被迫再三，我說我根本不懂理論。最後忍無可忍，我就說：要真正討論，你們首先得恢復我的自由，在獄卒和囚徒之間根本不能進行任何討論。到這時候，「學者們」又得讓位給另一類型的「專家」了。他們要我站起來，但是我根本站不起，那末扶着桌子也得站；倒下來還得站。一個「專家」用僅有的一個問題向我追迫：「陳其昌住在哪裏？」他說，只要我回答了這個問題，立即可以回到籠子裏去睡覺，再若根據我的回答他們真能捉到陳其昌，我可以「立即自由」。我當然不說，人們就像瘋狗似的向我直吠：「陳其昌在哪裏住？」「陳其昌在哪裏住？」「說！」「說！」「說不說？！」……這樣的問句，單調地，不變地，厲聲地可時而又和悅地重複着。幾個大漢在我前後左右來回，詈罵着，怒視着，時時捋袖握拳作欲「做」狀，而每次真到動手的邊沿時，總有一個裝成「朋友」的人出來干涉，攔開「粗人」，同時勸我「合作」。此計又窮，人們跟着就再玩一個花樣：忽然間，一個傢伙從隔壁房裏進來，用大聲的「耳語」問那個領袖模樣的人：「要不要把陳其昌帶進來？」那人聞言，故作思索狀，搖搖頭，然後對我說：「陳其昌早已請進來了，我們問你地址，不過想給你一個試驗，看你是否有悔過的誠意。」可是花樣玩得太笨拙，連孩子都騙不倒的……這樣，時間一分鐘一分鐘地熬過去，文武場面間歇地排演着，一直延續了兩個白天和一個半的黑夜！中間除了帶去小便數次之外，放回籠子裏躺下的時間一共不會超過幾個小時。

第二個夜間，我早已成了個半死人，昏昏地躺在木籠的地板上。打手又來「弄」我出去。那個操陝西口音的「老朋友」在等着我。他說，他們很失望，費了這麼大的力氣卻終於不能把我從「陷坑」裏救出來。他們已經盡了一切力量，沒有辦法了，只好送我到南京去。臨走，他還以「老友」資格贈了幾句話：他們對付政治犯的新辦法是：

不是政治的毀滅，便是肉體的毀滅。判幾年徒刑，讓人在監獄裏坐吃「皇糧」，研究學問，期滿出獄，再接再厲；這辦法早已過時了，他叫我別再幻想有這樣的優待！

這幾句「贈言」並不假，「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確已「過時」了。史大林和希特勒發明，由蔣介石抄襲的這套「科學的特務辦法」，是愈來愈得勢了。作為一個政治犯，確應十分清醒地懂得這一點，在那僅有的兩者之中作一選擇。入獄前我正接觸到這個問題，老布爾雪維克們在莫斯科審判中的奇怪表現問題。不料研究尚在開始，自身的經驗卻讓我很快解透了這個思考上的謎。當時，偶爾想到托洛次基那句非常沉痛的話：「縱使是布爾雪維克也仍是血肉之軀」，竟讓我不寒而慄起來。

兩名大漢押我上了京滬夜車，上了車就睡去，驚醒來已經是南京下關了。

南京的第一個拘押機關是一所花園住宅。我被安置在一間陳設相當漂亮的房裏。太晒了，渾身是創痛，倒在一張沙發中悶睡。衛兵不打擾我，讓我好好地休息了半天。午後，一個穿黃呢軍服的人進來看我，我等待着新的熬煎，可是並沒有，他只問問我姓名、籍貫之類，走了。再過一會兒，我的一個真正「老朋友」來了，也穿着軍裝。我打起精神準備應付他的游說，可是出乎意料之外，他只是送我抽支煙，關照衛兵對我不得「怠慢」，又說我有什麼要求可帶口信給他之類，走了。最後，一個穿中山裝的人跑來，手裏拿了一些卷宗，說，他看過了上海機關送來的報告，認為我「封建道德觀念」太深。「其實」，他說：「說出朋友的地址，讓他們一起重新做人，乃是最最道德的。」他希望我好好考慮。我說我根本不知道什麼機關地址，他便冷笑笑，歎口氣，一再地說：「可惜，可惜！」走了。

接着是兩個衛兵一個特務將我押上了汽車。馳過南京市區，出了城門，車子在鄉間的公路上走。我被一兵一特務挾持着坐在後座，特務手裏擎着手槍，我上了手銬。沒有人說話，各人的臉色很嚴肅，兩邊是少見人煙的田野。車子疾馳着。我忽然想到，一會兒車子停下來，我被推下車，一粒子彈從我後腦殼上射入，生命就此完結了。好，這麼着也痛快，少受多少折磨，心裏倒是很平靜的。

但是事情並不照我想像發生，大約坐了點把鐘的汽車，我被鎖在與首都反省院毗連的秘密拘留所裏了。

這是一個幽靜的小庭院。圍着天井，新蓋的十間獨人監房。房間小得出奇，僅容一牀一便桶。寬不能伸展兩臂，長不及五步。牆壁與天花板潔白如雪，幾個鐘頭住下來，兩隻眼睛彷彿給照耀得很不舒服了。牀上空無所有，跟一般的監獄不同；這裏的「公家」完全不發什麼東西。你穿什麼衣裳進來，就應用這些衣裳吧。寒暖不分，晝夜一律。我入獄時是春末夏初，中經盛暑與清秋，在初冬時候出來，而白天穿的與晚上蓋的始終不變是件單西裝，這種待遇，當為古今中外所未有的。（也許史大林和希特勒的特殊監獄有此前例。）這裏絕對不許與外界通消息，因此談不上讓家人來供應這些東西。所以一切是讓你「自生自滅」。我曾經向獄卒要求發一件棉軍衣。回答是：「你要什麼都可以，只要你肯答應上面對你的要求。」這個所謂要求，當指變節而言。他們的「科學」方法真是無所不用其極的，連大自然的氣候變化都被利用來當作迫害的武器。這兒不同普通監房，房門外並無看守的不斷監視。獄卒只在換班時跑進「庭院」來，核對無誤後，他們便立即退出，讓班長鎖上外鐵閘，看守只在鐵閘外遙望。這並非優待，卻也是「科學方法」之一。因為如此做法，被囚者與獄卒之間永遠不會

發生親密關係。自來發生於普通監獄中的私信傳遞，這樣就永遠不能在此地發生了。

這兒根本見不到人，連猙獰的獄卒都看不見。各個小房間原本客滿了的，但相互間無法接觸。（也不敢接觸，誰知道隔壁住的是誰？）非但看不見人影，而且聽不到聲音。院子裏是太靜了，太寂寞了。人們是多麼的渴望看見一點生命！聽到一點聲音呀！孤獨和寂寞確實是能夠咬嚼靈魂的，這味兒如果不是長年累月地在那裏經歷過的決然想像不出來。你不可能日日夜夜地睡，有太多的時間讓你醒着；你也不可能老閉上眼，睜了眼就不能不看見東西；可是你看見的只是白茫茫的一片，耀眼的，單調的，帶着威脅的。這慘白的空虛會教你在生理上色盲，在心理上瘋狂。醒着，你得思想，但是沒有書籍，沒有紙筆，沒有人與事為之聯接的遐想，猶之乎是一隻失去了槳和舵、帆和篷，隨着水勢在中流迴旋的小舟，終於會無助、痛苦而沉沒的。何況，處在那個境地中，無盡的孤寂的時刻，事實上孕藏着最險惡的風暴，可怖的鍛煉隨時可以來臨，結束你這連時間邁步的聲音都能聽見的「清靜」。死不難，難忍的是經常籠罩着的欲來不來的待審的氣氛；苦刑的痛楚也有極限，可是行將以苦刑來中斷的無休止的「靜寂」，卻會使人的神經痛苦得炸裂。

我曾經要求過發本書看看，不論什麼書都好。看守的客氣而帶笑地回答道：「你不應該看書，應該多想想，想通了，可以要求上面來談話。」

專家們的「科學」真是厲害，我逐漸明白了，這是他們對待不屈的革命者的第二個方法：神經戰，或可名之曰「冷戰」，雖然在那時，邱吉爾先生（或許是李普曼先生吧？）還不曾發明這個名詞。事情原

來是這樣的：當一個革命者被這個「科學機關」（它的正式名字為「中央黨部組織部調查統計局」）捉到後，先由「行動組織」給你「三斧頭」（不分晝夜的疲勞拷問），如果你給砍倒了，那末「自首」手續就算辦理完成，此時，再看你「轉變」的真實程度，決定你的處分。如果你供了機關，因此又捉到了你的同黨，你可能立即「自由」了，這即是說，繼續在他們的監視之下，放你出獄（有的就此做了特務）。如果你是「轉變」了，但專家們認為你尚有問題，那就送你到反省院去，去受六個月一期的「洗腦」工作。倘若你不曾在三斧頭熱戰下面倒下來，那末他們便把你移交到南京的最高機關，放進秘密監房內，充作第二步試煉神經忍受力的對象。這個冷戰時期是沒有一定的，而結果則不外乎二種：1、送入反省院（不一定在你「轉變」之後）；2、自己死亡或被專家們秘密消滅。直接由這地方釋放出去的，在平常時期，那是根本沒有的事。

我被放進「實驗室」大約一個月之後，才第一次把我叫出去。氣氛是佈置得很嚴重的，兩個武裝的傢伙押了我走過了走廊，進了一間訊問室，這兒有幾個穿中山裝的特工先在這，他們或立或坐，對我裝出各種不同的表情：怒目的、微笑的、不理不睬的、或假意關切的。押解的叫我坐了，等着，說主問的人還不曾來。我緊張地等着，等待着可能發生的種種迫害。大約等了將近半小時吧，一個大員到了。空氣突然緊張起來。特工們諸多作狀，彷彿要從事一項莊嚴的祭獻似的。大員坐定，我被「請」到他的面前。他裝模作樣地翻了一下卷宗，接着就按照了上海送來的報告，問了我姓名、年齡、籍貫之後，再問我有沒有「新的話」想說。我說沒有，他竟宣佈「退堂」，就叫看守的押我回去，再去想想。這種虎頭蛇尾的兒戲審問，我猜不透是由於特務工作的腐化呢，還是神經戰中應有的節目之一。多半是二者兼有的吧。

一擱又是二月，有一天，一個高級人員來查監房，我乘機向他提出要求，要求把我移送到法院或憲兵司令部去受正式審判。這個傢伙非常客氣，問了姓名，還特別叫隨員記下來，說很快就會答覆。同日下午，我被提出去了，提到一間空無所有的房間裏。兩個特工除去了我的外衣，拉住了我的手，另外一個用紮實的一束藤條抽我的背，抽到我襯衫破爛，皮開血出，這樣，他們算是答覆了我願受審判的要求。我一直仆臥在牀上好幾天。

冷戰中另一個小變化是我被「優待」了，忽然被調進了一個三人合住的監房。這兒原來住的兩個人，一個是東北義勇軍領袖王德鄰的參謀長，記得是姓孔的。據他說，他被派到南京來向中央請示，因為不清楚這裏的派系關係，和軍統的人有了接觸，中統吃了醋，一怒便把這個軍人抓了來，不問不聞地關在暗牢裏已有好幾個月了。另一個是河南拳師，後來才知道他本是中統一個大頭子的保鏢，為了點小錯誤而受懲戒的。

我自然不明白突然被「優待」的原因，但不管怎樣，生活在真空中幾個月之後，忽而又跟有血有肉的人住在一起，也不管這些人是牛鬼蛇神，精神上總是愉快了些。那個姓孔的軍人是基督徒，相當虔誠的，年紀也不少了，所以是非常感情的，老是懷念着東北長白山森林中的家小。他痛苦異常，悲憤難訴，終日只好向「上帝」祈禱。晚上，臨睡前，在幽黑中他的禱告就最長，最懇切，也最動人。在祈禱終了時，他總要用幾句話給同室的二位難友代禱一下：「天上的父，願你饒恕那些迫害我們的人的罪，願你早日替我們作見證，證明我們的清白，讓我們早早自由，跟我們的親人團圓，父呀！……」這個軍人每次說到這裏，總是涕淚交流，哽咽不能成聲。「亞門」之後，誰也不再說話，默默地躺下了，我是無神論者，平素更厭惡這類感情泛濫的，

矯揉造作的哀鳴；但處在那種情形下，我不諱言，情緒也會被他攪動，弄得我不安靜。

最初，我懷疑那個軍人是偽裝的，晚禱也屬於神經戰的「科學方法」之一。不過不久之後，我知道他確實是東北的抗日義勇軍首領，他的禱告是由衷的；因為那個拳教師，每天都要被提出去一次（時間平均是一兩小時），忽然有一晚良心發現，向老孔和我坦白了。他說，他們命令他做工作，要採取孔和我的真實底細，最主要是要探出我上海的有關地址。上面答應他，如果他的工作有了成績，可以早日恢復自由的。「但是」，拳師說，「我不願意給他們再幹那些傷天害理的事。我給人家賣過命，可是犯了一點點小錯（他沒說是什麼錯誤），今天人家就這樣待我。我不給他們幹了，得給孩子們積積德！」

「優待」沒有結果，我又給調回了獨人監。這兒依舊是大沙漠中似的慘白和空虛，無休無止的寂靜咬嚼着人的靈魂。此一情形，一直要到八一三滬戰發生，而且戰事日益趨於逆轉的時候，才有了一些改變。在中間時期，這庭院裏只有過兩次聲音打破了那特有的空寂。一次是半夜，聽見有不少厚重的皮鞋腳從遠遠的走廊過來，愈來愈近，終於打開了庭院的鐵閘，進來了。這情形是不尋常的，因為平時獄卒的換崗無此嚴重：皮鞋聲中，還間雜了鐵器的碰擊聲。我坐了起來，準備着。可是那群人過了我的房門，在最後一間小號子前停下來，開鎖，拔鐵門，跟着傳來了一句嚴厲而低沉的命令：「出來！」然後是可怕的靜寂，我想像得出那雙方緊張的對峙。一會兒，有人用激動的聲音問：「幹什麼？」「出來！」再度命令。「我不，我不出去，要出去也得明天！」這是東北口音，語音中聽得出恐懼，激動和憤恨。「出來吧，沒有事，給你換一個地方。」命令者這回改變點口氣，哄着。接着又是一陣可怕的寂靜。然後是混雜的糾纏聲，沉重的敲擊聲，拉扯

聲，雜沓的皮鞋聲，經過我門口，出了鐵閘，消失於長廊中；這兒又回復了無休無止的黑暗的空寂。

另一次也在深夜裏，聲音發生於我住房的左隔壁。那是突然起來的，有人拼命地打門，大聲哭喊着。看守們立即從外面進來了。人們對他始而吆喝，繼而恐嚇，最後毆打，可是怎麼也制止不了這個人的哭喊與吵嚷。原來他是瘋了。特工們用盡了種種方法，終於拿大繩子將他捆綁了，隨他鬧去。瘋子盡哭盡嚷，一刻不停地叫喊着一個女性的名字。聲音從宏亮喊到嘎啞，從嘎啞變成裂塞。如此繼續到次日午後，這個不幸者才像隻死豬似的被抬了出去。這兒又恢復了無休無止的慘白的空寂。

「七七」事變我毫不知道。等到8月十幾號，有三架飛機在我們頭上飛過，跟着響起了高射炮，我們這才知道大局已經變了。自然我們不知道是怎樣的變化，日本帝國主義者業已發動了戰爭卻是無疑的。那天我感覺到興奮、激動。不管戰事將怎樣發展，而我親受的那種緊張而孤寂的神經戰爭，多半會告個結束了吧。或者會成為國民黨戰敗時泄憤的無數祭品之一；或者可以安然出獄了。自從南京上空空戰以後，我們小庭院裏的氣氛也多少不同，首先，看守的不再那麼嚴肅而冰冷了。有時也會跟我們談上一兩句話。在開飯或拿便桶的時候，偶爾也會兩房同開，讓那些相隔一牆而老死不相往來的難友見見面，甚至談談天。看守出去時，難友們站在門洞上，居然也敢於高聲叫應了。

此時我才知道我的鄰居是王紹鏊，民主建國會的領袖。【朱正按王紹鏊（1886-1970），他是1934年參加中國共產黨的秘密黨員，沒有擔任過民主建國會的領袖。1947年參與組建中國民主促進會，為常務理事；1950年以後為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副主席。】解放後的人民政

府中曾經擔任了財政部次長的。這位老人精神頗好，在號子裏經常用太極拳來消磨時間，在「電話」中我們談得相當投機。大約在8月20日左右他就被開釋了，出去後他替我捎了一個信給我的妻子，以後我們還保持了友誼。在所謂民主派的諸領袖中，我多少認識一些人，其中多數是投機的政客型人物，做官很是內行，革命卻非所宜。王紹鏊這老頭子倒是不同的，他骨頭硬，不隨聲附和；雖然他的思想並不清楚，例如主張什麼「教育權」與「勞動權」為革命二大綱領之類。

有一件奇事發生了。某日下午，從反省院的長廊裏傳來了震動屋宇的口號呼喊聲，喊聲很齊整，是由一人領喊，眾人隨呼的，所以聽得很分明：「蔣委員長（或者是主席？我記不很清楚了）萬歲！」「三民主義萬歲！」「國民黨萬歲！」……我猜想不出是什麼回事。同時，又聽見一個尖銳激越的聲音在演說。這個演說聲音也就是領喊口號的。演說和叫喊延續了幾小時。乘看守進來換班之機，我打聽了一下底細。據告：那是中共代表周恩來前來演說，對反省人（亦即周恩來的同志們）宣佈共產黨的新路線，我此時仔細再聽，辨出來了，那個尖銳激越的聲音確是屬於「我的老朋友」的。我原知道共產黨的新路線；而在長期的革命活動中，也知道有所謂「策略上的權變」，但是此情此景的表演，對我這個「教條氣味」較重的革命者說來，總覺得是離奇而難信的。我實在不能相信我自己的聽覺了。

此事過後不久，反省院的人全體開釋了。就是拘押在我們這個小庭院中的人，也陸續放出去了。我期待着自己命運的轉變。約莫在8月底，「上面」終於記起了我，派了兩個穿黃呢中山裝的人來同我談話，要我發一個擁護「蔣委員長」與國民黨的聲明，便可出獄。我拒絕這樣做，卻聲明堅決擁護抗日戰爭，甚至擁護國民黨領導的抗日戰爭，但不能放棄自己對其他種種問題的看法。談話繼續了幾個鐘頭，

情形有點像小菜場上的討價還價。可終於沒有成交。我被押回監房。臨走時，那兩個穿中山裝的對我說：「這是你自己不願意出去，不是我們不放你，以後可別怪我們啦。」

這樣度過了9月，度過了10月，又度過了11月的大半個月，我仍被單獨拘禁着。小庭院裏的「犯人」進來了又出去，成分從抗日分子變成了形形色色的漢奸。我這個「自己不願意出去」的人仍舊被拘禁着。戰爭顯然很不利於中國方面的，從侵入南京上空的敵機的愈來愈猖狂上看得出來。燕子磯（我們住的地方）彷彿是日機空襲南京的必經之道，每次總好像飛過我們頭頂才聽見爆炸聲的。最初，國民黨尚有飛機起來攔截，在我們的上空進行了幾次空戰，可是後來便不見有中國方面的飛機了，日本飛機自由地進出於首都天空，一來總是整日不去，老在我們頭頂盤旋。炮彈的碎片曾經落在我們的小庭院裏，重量炸彈也不時在我們這所大建築的周圍爆發；可是我們沒有權利「避難」。空襲警報一響，看守在鐵閘上加了鎖，逃入防空壕，將我們這些囚徒交給敵機安排。我起初有點恐懼，不久也就慣了，反正是這麼回事，索性從鐵窗下欣賞敵機的表演與高射炮火在天空中繪成的花朵。

將近11月底，南京政府的解體已能在我們這個小天地裏看出來。監房中一切日常的規矩全沒有了。有時，看守上了班，到應該接班時，竟會沒有人來替代：不少看守兵都開了小差，逃難去了。當我出獄的前二天，「庭院」中的客人只剩了我和一個姓金的漢奸嫌疑犯。我們吃着從附近鄉下人家包來的伙食，因為廚房都已不在。天空中不再有很多飛機，隆隆的大炮聲卻愈聽愈近，我相信日帝軍隊已離南京不遠。次日，那個漢奸開釋了，我變成了監獄中的「碩果」。再次日，記得是1937年的11月28日，大約在日軍正式開進南京的十二天之前，我終於也得到了自由。唯一的看守——我至今記得他的名字叫王順林，

把我開出去，他說：「什麼人都走了，我也要逃難，你出去吧。」我對他說，進來時，我有一隻表，還有幾塊錢，被封存在科裏的，要他去給我找來。他一聽卻笑了，笑我這隻「井底之蛙」，完全不清楚外面的實情。「哪兒還有這些呀？」他說：「人都逃光了，什麼都給帶走了。快逃命吧。」可是我怎樣逃法呢？人地生疏，不名一文，而且在寒冷天氣，身上只掛着一件爛成布條的襯衣，再加上一件西裝上褂。不餓死也會凍死的。這位王看守從自己口袋裏摸出兩塊錢來送給我，讓我可以到南京城裏去找朋友。

我就這樣跨出了那個「科學的」人間活地獄，踏入了我生命歷程中的又一階段。

不過在結束這一章之前，有一件事還應該提一提，那就是：當時以中共駐京辦事處主任名義住在南京的葉劍英，曾為我的出獄奔走了一兩天。這是我出獄後朋友們告訴我的，事情大約發生在那一年的九十月間。當時，在獄的托派全體恢復自由了。陳獨秀、彭述之等從司法監獄出來，鄭超麟、何資深等走出了軍人監獄。可是大家不見我的蹤跡，甚至連半點音訊都聽不到。獨秀託人去問了中統（即所謂CC團）的負責人，回說並無此人。羅漢同志那時也到了南京（他正在宜興的陶器學校當教員），聞說此事，便想請葉劍英幫忙。這作法原本很天真（非常符合於羅漢精神的），誰知葉劍英竟也答應了。二人坐了汽車，找遍了南京半公開的特務機關，一連找了兩天，回答都是一樣：「根本沒有這個人。」因此，朋友們都認為我早已完蛋，已被國民黨秘密處死。

今天我提起這段故事，絲毫不是為了誇示我的「重要性」，彷彿現今中共的一位元帥，曾經為我的出獄奔走過的。絕對不是，我不會如

此無聊。所以要提及者，只想說明我以前屢次說過的一個看法，即：中共黨員對於托派關係，並非一貫敵對，亦非一致敵對的。站在史大林主義的立場上，他們當然要反對托派，但只有少數人弄清楚雙方意見，因而自覺地站在史方，只有極少數如陳紹禹一派，才把反托作為重要的政治資本。很多人並不看重這鬥爭，把它當作主要是蘇聯內部的事。在老一輩的共產黨人中，多數還不會認真相信史大林一手捏造的加於托派的荒唐罪名，他們始終相信托派仍是共產主義營壘中的革命者。葉劍英當時仍對羅漢以老友相待，並偕同着去營救另一個托派，我們不能不作如是解釋的。

注釋

1. 上海亞東圖書館，1913年才在上海開辦，至1952年關閉，才四十年。但汪孟鄒在蕪湖曾經營科學圖書館，清末就開始了。亞東成立後，蕪湖的店仍存在，直到1937年蕪湖淪陷為止。這個蕪湖書店是辛亥革命安徽革命運動的一個據點，陳仲甫住在那裏，《安徽俗話報》就是在這個店內辦的。——校者注

十、抗戰初期的陳獨秀

憑了 22 塊錢（在南京城中幸運地從國華同志的一個朋友那裏又借到了 20 元），如何在這兵荒馬亂，天寒地凍，而且不再有正常交通的情況中，由南京到徐州，復經鄭州抵達了武漢，那半個月中的非常經歷，說起來真是一個動人的故事。瀕於乞丐的難民滋味，我總算也嘗過了。那一段旅程中的所見所聞，實在又充分暴露了國民黨此時領導抗戰的反動措施，以及一切可悲的後果。把這些事詳盡地描繪，並非沒有意義。可惜談起來話長，同時比我更有資格的人早經寫過這類文字，我這兒就此從略了。

重臨這闊別了十年的武漢，記得已是 12 月中旬。在武漢的報紙上，我看到了唐生智如何放棄了那「誓共存亡」的南京，日本軍閥如何實行了野蠻的屠城。不過這些大事雖然值得注意，卻沒有我個人的問題來得迫切。因為集中在武漢的朋友雖然多，但不知道任何一個確實地址。馬路上及江輪渡口去碰了兩日運氣，沒有半點收穫。在大智門車站裏挨過了兩個夜，身上連買燒餅吃的錢都沒有了。第三天早晨，在鐵路邊的舊貨攤上賣去了我唯一的財產——一隻來路貨搪瓷的漱口杯，得洋數毫，預備渡江到武昌洛伽山去，尋找一個在武大當教授的舊同學。這個人雖是我的同學兼同鄉，只因我平素鄙薄其為人，雅

不願向他求助。此時凍餒難忍，也只好去告急一回了。渡了江，在一家小麪館裏吃陽春麪，卻意外地遇見了老友李仲三，這一喜真是非同小可。它不但免去了我一次尷尬的求乞，而且使我真正脫出了厄運，讓我結束了八個月來生平最坎坷狼狽的一段路程。

飽餐之後，仲三給我買了棉衣，下午就一同到了獨秀家，晚上便在他家裏住下了。在那裏住了十幾天，暢談了種種問題。關於這一切，那是值得詳記的。

獨秀比我早出獄三個月。在將出獄未出獄之時，他對於抗戰便起草了七條根本意見。（因為手頭沒有文獻，沒法記得內容。）出來後，他送給上海的托派朋友們看，並未獲得全部同意。此時羅漢到了南京，一看意見，完全擁護，且以為應以此作為綱領，不分是否托派，廣泛地團結一些人。首先，他（羅漢）以為可向中共提出，尋求合作。獨秀知道羅漢這個主張，但並未予以鼓勵。羅漢卻獨自個行動起來了。他跟葉劍英談了，葉自然作不得主，不過贊成他這樣做，並主張他親赴延安，與毛澤東面洽。羅漢於是動了身，前往西安，住在他的另一老友，當時中共駐西安辦事處主任林伯渠那裏，受他們的招待。同時，林伯渠將羅漢所攜的獨秀意見及羅漢自己主張的合作提議，專差送給了延安。過了幾時，毛澤東的答覆來了，大意是：讓陳獨秀承認過去錯誤，公開聲明反對托派，歡迎一起工作。這樣的答覆，好好先生的羅漢雖然天真，也知道獨秀決不接受的。掃了興，他離開了西安。羅漢的此一行動不但使獨秀生氣，而且引起了上海托派臨時領導機關的怒斥。羅漢便默默地回到宜興去教他的陶器製造法了。

獨秀當時非常不滿意上海的托派組織，他覺得宗派的做法沒有出路，因此他決定不回上海，往武漢去了。本來，在滬戰結束，國民黨

軍隊在京滬線潰敗以後，武漢早已成了政治軍事的中心以及群眾運動的新的策源地。由抗戰激起來的種種社會力量與政治流派，紛紛彙集在這裏。獨秀此時雖然是孤單一人，但他在群眾中的聲望很大，任何政派都還不得不注意這個革命老人。在我抵達武漢以前，獨秀曾被邀請在青年會做過兩次公開演說，據說聽眾非常擁擠，在會上他闡明個人的而非托派的抗日主張——這在大體上就是他在南京時提出的綱領。

那個綱領和兩篇報上揭載的演講稿，是在作客的第二天拿出來給我看的。在第一天，為了讓我能養息精神，他不願意提起那些正經事。我們只是隨便聊天，主要是談談各自在南京的生活，那天晚上，我記得，他還很不平常地要太太特備了三四味可口的菜，非常隨俗地款待我這個睽違了六年有餘的同志。

獨秀那時住的是一所頗具庭園風味的舊式平屋。屋主是一個桂系軍人，獨秀只付點象徵房租。老人其時身體很好，起身早，在監獄裏養成了來往踱步習慣，他出來後仍舊堅持着，每早晨就在屋前荒蕪的園子裏溜步。便是在這樣的散步中，他和我於次晨開始了「正式的」談話。話一開頭，他就怒氣勃勃地攻擊上海的領導機關。（這個新臨委是當彭述之等由京返滬後，在一次積極分子會議上產生的，事實上就是於陳其昌、寒君等之外，加入彭述之與劉家良當臨委罷了。）說他們只會背老托的文章，於實際的政治鬥爭一無所知。講到最激動時，他甚至說，今後他再不屬於任何黨派，陳獨秀只代表陳獨秀個人，至於誰是朋友，誰是敵人，得在新鬥爭的分分合合中決定了。我對他的攻擊、牢騷與宣佈，無法插上一句嘴。因為長期脫離了運動，對各方面的意見都不知道。我表示，希望先看看最近的東西。於是回進他的書房裏，他揀出了自己的對於抗戰根本態度的提綱，連同二篇演講詞來給我。上海方面的意見，他說寄來過，可沒有保存。大概是一怒之

下，扔進字紙籠了。讀了他的意見，我不能同意，覺得除了一般的擁護抗日之外，我們特殊的立場完全不曾提到。不過我們沒有立即進行討論，我還準備多看看各方面的言論。就在那個上午，我要他考慮一個可能：是否可以在武漢創辦一種刊物。對於這項提議，他立即與堅決地否定了。他認為：不但無可能，而且無必要。他告訴我，舊的一套工作方法得拋棄，今後如果還想在中國的政治鬥爭中起若干作用，必須採取新的方法，走新的途徑。我問他什麼是新的方法，他只說他想過了，慢慢談吧。

以後，我們幾乎把所有的上午都消磨在那個破敗的小園裏，海闊天空地談論一切問題：從他的文字學談到老托的俄革史（這是他隨身帶着的唯一外文書），從南京的監獄生活談到莫斯科審判，從中國托派談到第四國際，從抗戰前途談到未來戰爭的遠景……我們不辯論，不爭持，只是各述所見；而在大多數的場合中，都是他說我聽，並不採取交換方式。這樣，逐漸地，我終於知道了他此時對各個當前問題的根本立場。首先，他嘲笑那種天真的看法：從抗戰中可產生革命。「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他說，抗戰失敗的結果是喪失了工業城市，潰散了無產階級。如果戰爭延長，西南一帶在美國支援下，可能發展點新工業，但遠不足以抵償東南沿海的損失；因此，在抗戰中，他以為決不可能爆發我們所想像的革命，更不能以我們所設想的方式爆發出來。當然，戰爭給民眾——特別給農民——帶來了日益不可忍受的壓迫與痛苦，而這些痛苦會造成騷動的，可是只要國民黨一天抗日，這些騷動便不可能生長成打倒國民黨統治的革命。將來，變化是多的，城市與鄉村的不滿也將日益增長，可是誰能領導這些運動呢？據他想，只有那些主張民主和自由，同時又擁有武裝實力的黨派。因此，舊的一套靠文字在工人中宣傳，藉此組織起來，實行革命的老想法，必須

拋棄。唯一可行的辦法是一方面以自由及民主的寬廣政綱去團結反國而又不阿共的政治流派，另一方面則積極跑進抗日的武裝隊伍去，為未來任何變化預先取得有利於革命的可靠保證。

獨秀極度不滿意上海的組織，小部分由於對人的私怨（主要是彭述之，在南京監獄中，二人關係弄得非常壞），大部分卻因為上海的人不能看到像他所看到的事和理。從他那時的意見中，據我看，尚未達到與托派有根本分歧，更不曾根本反對列寧思想。相反，他那時經常提到列寧；認為列寧的最了不得的地方就是不被馬克思主義的現成公式所束縛，在不同的時間和環境，大膽地決定不同的政治口號和鬥爭方法。因此，在那一時期，他和上海一些人的差異，只在於政策方面，而非關於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立場。他最痛惡上海作風的，就是繼續坐在租界的亭子間裏喊抗戰，沒有在實際行動上跨前一步，沒有鄭重地投身於政治的乃至軍事的鬥爭。不論任何時候，任何條件，總是將革命之所有能事歸結於辦一張可憐的報紙。無怪他一聽到我提議創辦刊物，便痛心疾首地以為不必了。

對於獨秀的議論，我並不贊成，但他關於工作方面的意見，我覺得頗值得注意。誠如托洛次基所說，獨秀是一個「敏銳的觀察家」，同時具體地懂得政治鬥爭是什麼回事。這個優點，便是在他當時對我敘述的意見中，也就清楚地可以感覺到。在熱烈沸騰的抗日怒潮中，我們絕不該再以背誦「教條」為能事，必須設法實實在在地投身進去，積極地起作用。這一層是不待獨秀提出我就痛感到的。但是我絕不能同意他把我們的政綱降低到「爭自由與民主」，不贊成他與各個所謂「民主政派」聯絡的方針，也不同意他抗戰中不能引發革命的悲觀估計。我認為他的尋求新的鬥爭方法是對的，但同時得注重辦報，以此

作為組黨中心。我特別向他提出列寧的基本思想（正因為他此時常常想到列寧）：「黨報乃黨的組織者」，如果沒有黨，則一切政治的與軍事的工作都將如斷線風箏。我們這不足道的力量，定將散失在抗戰的大海中了。他自然懂得這個道理，所以不能在根本上反對我的看法；不過他說：目前最根本與最迫切的問題並非該不該辦報與辦黨，而在於：是否我們懂得事實上而非空言上參加抗戰，是否懂得只有這樣的參加才能讓我們真正地辦報和辦黨。據他看，上海朋友的做法決不會從空口說白話前進半步，他們離實際的抗戰相去十萬八千里，因之，根本也無法辦好報，更不能辦起黨。

談了幾天，問題彷彿只關於如何工作了。其實潛伏在底裏的，他和我之間，關於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想法，此時早就存在（無產階級專政和民主的爭論，幾年前我們早已展開在《火花》上。），不過當時，他大概不願意重提那些爭論，所以竭力避免談到它們，同時偶爾牽涉到它們，他總似乎還保持着傳統意見。陳獨秀的此一態度一直維持到德蘇協定（1939年8月）以前。在1938年下半年，陳其昌繞道香港，到四川江津去訪問獨秀，那時他對根本問題（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論點）仍未採取公開反對態度，照他後來自己的話說：尚在「深思熟慮中」。故他託請其昌轉寄給墨西哥托洛次基的信上，所持態度仍與他1937年歲末與我所談者一樣：即主張中國托派必須盡一切力量去實際參加抗日，蓋不如此便無從談起其他任何的革命行動。德蘇協定使獨秀思想在很大程度內作了最後的轉變。這個轉變，如果用現成的名字，簡單地說，便是從布爾雪維克主義退回到了考次基主義。不過那些都是後話（勝利後，何資深來到上海，曾將獨秀有關此一思想的論文和通信，以小冊子形式出版，名為《陳獨秀的最後論文和書信》），我將在最後一章裏再談它們。

在獨秀家裏住到將近半個月時，濮德志從安慶來了。我們還是在龍華警備司令部（1931年）裏分了手的。睽違了足足六個年頭。在此期中，我們彼此都是兩次入獄與兩次出獄了。他的第二次入獄和獲釋均與獨秀同時，和老人在南京監獄裏共度了親密的四年。六年不見，我發覺他外表上還是那個樣子：「小濮仍舊是小濮」。他童年就去了日本，愛好戲劇，南國社舊人，故性格是藝術家型的，從來給人的印象往往是輕些、浮些；但是此次再相見，多半是由於獨秀的薰陶吧，我覺得他深厚得多了。他在8月間出了獄，回懷寧老家去養息了一個時期，此時健康恢復，便前來武漢找尋老朋友。獨秀很喜歡「小濮」的到來。自從有了這個活潑而熱情的朋友參加，我們的談話就更有風趣，獨秀的神情也更見其明快與生動。「小濮」與我搬到我的一個老友吳甲原那裏去住，因為他無眷屬，起居上方便些。不過白天的時光仍多數耗在獨秀家裏，如果我們不去，老人便來找我們。我們三個人有時一同上小飯店，有時則在馬路上閒蕩。此時所談，不再關於基本看法，而集中於如何實際參加軍隊以及如何與其他的政派接觸了。「小濮」在基本問題的看法上接近於我，他頗不滿於獨秀的「降低政綱論」。（小濮的筆名為「西流」，他與獨秀間關於根本問題的歧見，見《最後論文和書信》中獨秀給他的信。）對於老人在漢口青年會中所作的二篇演說，曾譏之為「可恥的灰色」。不過談到工作方法，他也和我一樣，深受獨秀那種「實幹態度」所影響。

獨秀的工作態度當然不會僅限於空談。憑了他的地位和關係，很快便開始了具體的接觸。原屬宋哲元部下的陸軍第一百二十旅，「盧溝橋事件」爆發時正在該地駐防，直接與日本軍隊開了第一槍的吉星文團，便屬於該旅所轄。旅長何基澧，其時已被擢升為一七九師師長；因作戰「掛彩」，在漢口養傷。這個軍人很不平常，據獨秀說，他無任

何不良嗜好，無粗獷氣，更沒有虛矯的架子。夫婦倆住在一個廂房樓裏，連個勤務兵都不用。我因獨秀關係和他見面時，他的創傷已癒，不久便要回到部隊去，相談之下，他予我的印象不壞。他堅決抗日，對國民黨的領導感到異常痛心。半年來在華北的實際戰鬥，使他深深地懂得一點：不將軍隊的政治認識提高，無法有效地抗日，更無法取得勝利。因此，在養傷時期，他幾乎讀遍了漢口所能買到的有關乎抗日乃至一般社會科學的書籍。學習和思索的結果，他決心要從漢口邀請一些革命青年，去到他的部隊裏，為兵士們進行政治教育工作。在這樣的探索中，他與獨秀發生了關係。他們二人很談得來，這軍人對獨秀執禮甚恭，待如師長。獨秀這邊當然也不會吹牛撒謊，說他後面有多大力量。據我的記憶，獨秀當時和他的談話中，總是非常坦白的，說明他與中共早無關係，甚至也不代表托派，他只是個人，他的幾個朋友也只以個人資格和他發生關係，乃至進行工作。有我參加的幾次談話中，涉及的均是關於今後政治的方向問題。一個中心思想被確定下來，就是：以有限度的土地改革來發動群眾，藉此增強軍隊力量，謀取抗日的勝利。

「小濮」跟我初次與那軍人見面之後，印象也不壞，但我們懷疑這種做法對革命究有什麼好處。因為聯絡軍人，替軍隊做「姨太太工作」（北伐時人們普遍地以之稱呼軍中的政治工作），在1925-27年的革命中幹過不少，而它們的可悲的結果也很新鮮地留在記憶中。共產黨與馮玉祥的一段惡姻緣，想起來更是親切。在北京時，我親眼看見了馮玉祥與李大釗的「初戀」，讀過他有名的「五原誓師」的宣言；同時，我們曾經大賣力氣，為馮氏在群眾中做其「政治工作」，使大家相信他是「農民出身的革命軍人」。可是在武漢，我又親眼看見了他與蔣介石復合，壓垮了武漢政府，同時會見了大批被馮玉祥用專車送來的政治

工作者。這些人後來有不少成了反對派，在私交上與我相當親密。我從他們口中，聽到過數不清的關於馮玉祥貌誠摯而心叵測的事例。想到了這些，小濮與我不約而同地發生一個感想：今天我們面對的何基澧，安知不是一個較小型的馮玉祥？我們是否應該將馮玉祥的故事在更小的規模中重演一過？回得家來，我們便向獨秀提出了這個疑問。獨秀認為：我們毫無理由把目前的行動當成軍事投機。「情形是根本不同的」，他說，「我們是窮光蛋，不是第三國際，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讓人家騙取。其次，我們進入他的軍隊，目的雖然不在『篡奪』，可也不一味希望他本人變成革命家。有過以前和軍人打交道的經驗，今後我們應該很清楚地懂得，我們在現存軍隊中的首要工作是兵士群眾的教育，以及竭力造成群眾的革命環境，即在轄區內儘可能發動土地改革運動，以便使軍隊同時革命化。最後，我認為何基澧本人不是馮玉祥式的狡猾之徒，可能會真心轉向革命的；倘如此，則不難使這不小數量的武力置於我們的政治領導之下；如果不然，那末我們既然一開始就坦白地表明了自己的面目與行動方針，自不難進退隨意，不可能遭受任何損害。」

我同意老人的看法。不過在更進一步的態度上，他又和我們分歧了。依照我的想法，這工作如想順利開展，必須通知上海的臨委，讓他們核准，並通盤決定工作步驟及調派工作人員；而獨秀則由於討厭上海的人，反對這樣幹，他認為讓我們幾個人幹好了，待有成績與需要時，再向上海要工作人員。此事不曾有一決定，因為事實上，計劃尚未開始，就被意外地中斷了。本來我們連什麼都已準備好了的：小濮，我，另外一個姓馬的河南青年（也是同志），將於二三日內隨何基澧回到內黃的師部去，我算是秘書長，小濮彷彿是參謀（已記不真了）。平漢路車的票子都已到手，可是臨動身的前夜，突然得到了通

知，何基澧被免除師長職，「着毋庸回任」。據我們當時推測，多半是他和獨秀的往還讓國民黨軍統的特務偵知了，於是便先發制人。

事情成了泡影，我們到軍隊去的夢想不曾實現。從此之後，也不再找到第二個機會，使我們能以實現它。終抗日之期，除了山東和廣東，一些單零的托派同志（據我所知，在山東有王長耀同志等領導的一支游擊隊，結果被中共軍從背後消滅；在廣東中山，陳仲禧同志也曾從事軍事鬥爭，結果他為日軍所殺。）在這方面有過若干行動外，托派的整個組織確實不曾安置到軍事鬥爭中去。這情形，在事後回溯中，我們應該承認為托派的一大缺憾。由於反對軍事投機而懼怕作任何性質的軍事活動，由於根本放棄軍事活動向使自己處於抗戰的主流之外，我們至少在今天，應該承認是一大錯誤。

二次世界大戰後發生於多數落後國家中的群眾運動所告訴我們的一個巨大教訓，乃是：在這日益反動與日益軍事化的時代裏，任何革命政黨若想獲得勝利，離開了武裝鬥爭便不可思議。誠然，在過去也是如此，列寧主義有別於各式改良主義的諸基本點之一，便是對武力之重要性的認識。不過時至今日，與資產階級民主制的衰落成正比例這個認識是益增其重要性了。

就個人論，獨秀對何基澧的判斷也不曾錯。此後我們和他便斷絕了往來，不聞不問地過了許多年。再度聽到這個名字是在1948年最著名的徐蚌戰役中。中共軍在此戰役中所以能取得決定性的與非常漂亮的勝利，一個直接的造因乃是我們這位一度與之接觸的軍人的內應。他在1948年11月8日與張克俠一同起義，致使黃伯韜兵團被圍。目前，他是中共的國防委員會的委員之一。

與此軍事圖謀同時並進的，獨秀正和第三黨，救國會以及另一部分「民主人士」（我已記不起究竟是哪些人）相接觸，企圖組成一個聯合戰線，想在抗日陣營中獨樹一幟，不擁國，不阿共，以爭取民主和自由為共同目標。這個醞釀在當時武漢是相當有力的。國民黨的統治委實太不得民心了，以致不但工農和廣大的城市小資產階級，就是從來擁護國民黨的一部分資產階級，也都怨懣不平，日益採取了反對派態度。他們對延安發生了愈來愈多的期待。中共自然不會放過這個有利形勢，於是或明或暗地在促成這聯合戰線。陳獨秀此時以他特殊敏銳的政治感覺，確認為我們（他表面上否認托派，而言談中卻仍以托派自居的）必須參加此一運動，藉以擴大我們的影響；打破我們自建的與人築的圍牆，且使這個普遍而真實的反國民黨的群眾運動不為史大林黨利用了去。我和小濮堅決反對他的看法，我們承認客觀上有反國民黨的群眾存在，但我們以為要爭取到這些群眾，首先得打破他們對那幾個所謂民主黨派可能發生的幻想。要打破他們的幻想，我們必不可與他們締結聯盟，必須保持獨立。在具體問題上儘管可以和他們採取共同行動，但在思想與政治上，我們卻必須對他們進行批評，因此，我又提出了獨立辦報的意見。獨秀為我們的反對非常生氣。他覺得我太看重教條，太不懂實際政治，與上海的人竟是一丘之貉。他要我代表他去出席「四派會議」，我拒絕；改派小濮，小濮也不肯去。正在此時，羅漢到了武漢，問題才算解決了。

羅漢自從在西安碰壁之後，回到了宜興的陶器學校。不久，戰爭波及宜興，他老人家不肯隻身逃難，竟帶了一大群學生同走。到了南京（在我出獄前）因根本找不到交通工具，他設法弄到了一些木排，將男女老少搬了上去，儲備些糧秣燃料，又不知從哪裏搞來兩支步槍，就此緩緩溯江而上，實行當年劉玄德式的移民。他的木筏隊大約走了

一個多月，歷盡驚險，總算到達武漢。一到目的地，他的第一件大事是拿了兩支步槍，去找他的老友葉挺，要這位紅色將軍高價收買，藉以安頓他帶來的那批難民高足。葉挺對於這位已成「敵人」的老友是毫無辦法的。他不能「收買」槍械，只好將它們呈繳到某一機構，同時卻不得不給這個好心腸的羅漢弄錢，讓他去安置孩子們。……

羅漢和民主派名流們大多是舊相識，周旋起來比我適宜，但他氣質上畢竟不是那一類人，性情又太樸實忠厚，到底不是「應對諸侯」的長才。因此，他只和其他派別的人碰過一兩次頭吧，就向獨秀「告退」了。獨秀於是想起當時住在長沙的高語罕，想招他前來擔任這個工作。可是老高尚未來到，「民主派」與獨秀的關係突然變了。獨秀的整個計劃垮了台。它和我們的軍事圖謀一樣，未出娘胎就死了。不同的只是軍事上的打擊來自國民黨，政治活動的阻礙則來自共產黨。中共為了要阻遏托派政治影響的擴展，竟授意它的「民主派」盟友們立即割斷與我們的來往，並且緊接着，在當時新創的漢口《新華日報》上，發動了一次無恥的，瘋狂的對於托派與陳獨秀個人的誣衊運動。

策劃和主持那次誣衊運動的，正是我們久違的舊相識——王明即陳紹禹其人。他此時從莫斯科回來，擔任了中共對國民黨的主要代表。

讓我趁着這個機會，來補述一下中共內部派系鬥爭的經過。我們知道，陳紹禹及其一系，是在1935年1月中共中央的遵義會議上，被推下了領導地位的。此後毛澤東一系的人掌握了黨，一直到全國勝利，以至於目前。但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對陳紹禹的勝利並非徹底與決定的，以後幾年中仍舊是餘波蕩漾，迴浪時生；即使時至今日（1957年—王凡西注），據我觀察，這個鬥爭也還是潛在着。要明白陳紹禹勢力之敗而不滅，死而不僵，理由其實並不難找。陳紹禹是真正

的史大林派，他在克里姆林宮主人（不管是史大林或赫魯曉夫）的眼中，始終是最可信賴的代理人。而中共呢，即使在「民族主義的」毛澤東的領導之下，甚至即令在自己腳下已有強固基礎的今天，也仍不能不諸多依賴蘇聯援助，因而不能不迎其所好的。這一微妙關係，說明了陳紹禹被清算而未被整肅，受批判而仍叨中委末座的原因。如其不然，他縱不成為高饒，也得踵武張國燾，因為他所犯的「錯誤或罪過」，即使照今天中共具有權威性的黨史材料上（例如：《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與《中國共產黨的卅年》）的記載，也遠超過高饒和張國燾的。

國際派雖在遵義會議上受到打擊，陳紹禹卻仍在莫斯科當其國際代表。在那裏，他仍是頭等紅人。根據李立三在最近中共八次大會上的發言，他在「王明同志的直接領導下工作了七年，好像過了七年小媳婦的生活，終日提心吊膽，謹小慎微，以免觸怒，但還是不免經常受到斥責……」由此可以看出陳紹禹在「祖家」的不可一世！他坐在第三國際的高位上，將史大林的意圖和命令演成「理論」，寫成俄語的大文章，並且登載在各國共產黨的刊物上，他以中共的代言人自居，以史大林的親信自傲，借蘇聯對中共的援助以自重，仍保持着遙領中國革命的氣勢。中國的抗戰發生後，他提出了一整套不同於毛澤東路線的主張，與之對抗，企圖重新恢復他在中國黨內的已失地位。我們迄今沒有看到陳紹禹當時主張的文件，不過根據毛澤東一邊的描述，那時的「王明路線」是：「第一次國內戰爭時期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在新情況下的復活」。他們「錯誤地斷定抗日戰爭的勝利必須依靠國民黨，而且必然是國民黨的勝利而不能是人民的勝利，斷定國民黨可以成為抗日戰爭的領導者，而否認共產黨可以成為抗日戰爭的領導者，他們輕視共產黨領導的游擊戰爭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而幻想依靠國

民黨軍隊求得速勝。他們否認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的革命方針，否認『有團結有鬥爭，以鬥爭求團結』的革命方針，因而抹煞共產黨和國民黨在抗日戰爭中的原則分歧……要求八路軍新四軍完全統一於國民黨軍隊……」；在行動上，陳紹禹等甚至「不經中央同意擅自發表了很多表示錯誤意見的宣言、決議和文章，並且拒絕中央的正確指示。他們的這種錯誤思想和行為，在1938年由王明同志在武漢負責的黨的工作中，和1941年1月『皖南事變』以前項英同志在新四軍的工作中，曾經發生影響，因而妨礙了當時長江流域人民抗日戰爭的發展，並造成了在『皖南事變』中新四軍部隊的失敗。」^[1]

上述的「王明路線」，顯然不曾獲得勝利，在1937年的中共中央洛川會議，以及1938年10月的中共中央全體會議上，都受到了排斥。不過陳紹禹那時的克里姆林宮欽差大臣資格，仍起了很大作用的^[2]。其中之一便是在武漢發動反對「托陳取消派」的誣衊運動。

我初抵武漢時，陳紹禹還未曾來。主持當地「辦事處」而暗中策劃工作的，乃是董必武、秦邦憲。那時節，他們對托派的關係竟可說是友好的。羅漢是中共辦事處的常客，不時在那裏「大放厥詞」，提出種種天真的建議，引得主人狼狽或歡笑。董必武對我的朋友彭徹三甚至還表示過願意和獨秀見見面，並且說，等周恩來到漢口後，希望那二人能夠談談。這不僅是「中國式的客氣與交情」，多少卻也反映出中共當時並不曾決定把托派當成敵人來打。可是陳紹禹一到漢口，情形就立即改觀了。與托派成員講交情的場面立即結束。起初在暗中，隨後在表面，一種針對托派，特別針對陳獨秀個人的惡毒而大規模的誣衊開始了。這運動據說是陳紹禹直接奉了莫斯科命令來進行的，為的要配合在全世界範圍內史大林反對一切左派革命者的運動，尤其要配

合他在蘇聯內部瘋狂地進行着的消滅整代老布爾雪維克的罪行。在此運動的影響之下，一切唯中共馬首是瞻的所謂民主派，當然急不可待地要斬斷和托派分子的任何聯繫，並加入到群犬吠聲的反托派的合唱隊中去了。

獨秀與民主派共同行動的計劃就這樣地結束了。跟着他被迫進行了一場反誣衊的戰鬥。不過當我離開武漢時，這場戰鬥尚未正式開始。我是在1938年2月間離開漢口的。所以要離開，首先是覺得無事可為，獨秀的所謀都不成。其次是對於抗戰和前途的種種看法，與獨秀合不到一起，我發現在這方面我和「上海」接近得多——雖在某些工作方法上，我是贊成獨秀的。最後，經過了將近一載的困苦顛沛生活之後，非常思念妻兒，因此我決定走了，決定回到上海去，從事於秘密的敵後的抗戰工作。獨秀很不同意我走，主要理由是：回滬以後，又得按着從來方式工作，而此種工作，據老人形容，乃是「三個月活動，三整年長監」，一定不會有其他結果的。可是我去志已定，無法挽留，他只好讓我走，臨走時他送了我30元旅費，並約我至多半年後再到「大後方」來，和他一起打開更有效的工作出路。那時日軍沿江而上，有進撲武漢之勢，國民黨政府已部分遷重慶，所有人均紛紛作撤退計。獨秀準備入川，小濮準備去滇，羅漢擬赴湘，我則先走，獨自經由湘粵取道香港，回到「孤島」上海。

回到上海不久，漢口《新華日報》上由陳紹禹發動的反托反陳運動就「大張旗鼓」地展開了。詳細情形我無法述說，因為我們始終不曾讀到當時《新華日報》上的誣衊文章。後來由獨秀自己搜集，由亞東圖書館付印的反對史黨誣衊的小冊子，並沒有附載那些誣衊。現在已找不到那本小書，因此連答辯中所摘引的「罪狀」也記不清了。搜索記憶，彷彿是說獨秀經過唐有壬，曾經收受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金錢

吧。總之，那「罪狀」是非常荒唐的，構造得全無常識的，以致那些文章一發表，不但使獨秀的朋友萬分氣憤，甚至那些素來不問政治的而有正義感的普通人士，更甚至某些親共人士，都覺得誣陷得「太不成話」，紛紛表示驚駭和不平。陳紹禹在這件事情上，彷彿也充分暴露了為毛澤東所指責的「教條主義」，他沒有認清楚 1938 年的漢口根本與當時的莫斯科不同，《新華日報》不可能起《真理報》的作用，不可能一手掩盡天下耳目，以莫須有罪名來誣陷革命者的。其實陳紹禹在此事上的錯誤，和他在其他事情上的錯誤一樣，原因均在於史大林。我們知道，1938 年是莫斯科冤獄發展到最高潮的一年。當陳獨秀與中國托派在漢口橫遭誣陷之時，正是布哈林、賴可夫等老布爾雪維克在「托洛次基主義」罪名下慘遭屠殺之日（1938 年 3 月）。遵照史大林主義的一貫作風，凡蘇聯與聯共內部發生了什麼事情，必須同時在全世界的共產黨中「依樣描繪」一番。陳紹禹不過是捧了莫斯科的葫蘆，在武漢作拙劣與愚蠢的臨摹罷了。不過除此之外，陳紹禹（也包括史大林）於那時發動此一誣讎，卻尚懷有另一動機。當時我們因為不甚清楚中共內部的爭論，故將誣讎解釋為中共整個奉命右傾時用以威嚇下層左派的武器。這個解釋，即使在今天看來仍舊有其正確性的。因為國共「再度合作」時，共產黨內部確實存在過深厚的不滿和廣泛的惶惑。領導者為要鎮壓這些不滿，故特預先捧出了這頂現成的大帽子。不過今天，我們從中共發表的文件中研究，則我們還應同時指出，這頂帽子又是陳紹禹曾有意為毛澤東預備的。目的在於重握黨權。歷史證明陳紹禹的企圖不曾實現；但若當時陳系在黨內鬥爭勝利，假定毛澤東劉少奇等被攆下了台的話，則此二人留在中共黨史上的，多半是戴着「托匪黨」的大帽子了，有如齊諾維也夫與布哈林等人的命運一樣。自從 1934 年第一次莫斯科大冤獄開始，直至 1953 年史大林死去為止，舉凡共產黨內的派系鬥爭，勝利者必自稱馬列嫡

傳，敗北者總被斥為「托派匪徒」。「成王敗寇」，已成定例。那次陳紹禹之所以拋出此塊石頭，目的原是想打中陳獨秀與毛澤東二鳥的，不幸他在鬥爭中未能獲勝，以致那塊石頭從半空中落下來，恰好打破了自己的頭——被毛澤東套上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在新的情況下復活」的帽子。陳紹禹還不曾連「托」的帽子也扣在頭上，只表示他敗得未算徹底罷了。

那時中共反托的陰謀，甚至還企圖延伸到當時處於日軍大後方的上海。這個企圖進行得更不光明，更加可恥。事情經過約略如下：李鴻章的孫子李國杰當了漢奸，做着招商局總辦。給抗日的地下特務暗殺了。此事發生之後數日，上海當時由中共主持的日報——《譯報》上，發表了一則新聞，說，李國杰被殺前，曾與托派彭述之同行云。這段陰險的記載具有兩個顯然的目的：1、企圖捏造一個罪名：「托派與漢奸勾結」；2、然後可能由中共特務直接行動，或假手國民黨特務來暗殺彭述之，藉以「證實罪名」。為此，我們採取了對策，彭述之暫離寓所，以防被害，同時我們請了一位外籍律師喬維孝夫（他是被希特勒逐出來的德籍猶太人。我們所以要請他，因為中國籍的律師都不敢牽涉到「複雜的政治鬥爭」中）致函《譯報》，提出抗議，要求更正。結果，那報紙彷彿「照登來函」，以此了結了這段卑鄙醜惡的反托神話。

* * *

回滬途中，在香港我初次見到了劉家良。他那時是臨委委員，負責香港工作。一見面他就要我表明對陳獨秀的態度，並提出了幾個問題，叫我作是或否的答覆。我似乎又遇見了反對派四派分裂時期的「敵對者」。在這樣的情況中，任何談話都是不可能的，加以我已買好了去上海的船票，因之話就根本沒有談下去，匆匆分別了。帶着異樣

的心情，和陳仲禧同志走向中環的旅館去。在路上，陳仲禧對我大大訴說他心中的鬱結。他說，劉家良在香港的主要工作是劃分什麼「新人」與「老人」，自己以「新人」的中心自居，工作上對他和羅新等老人，採取了非常歧視的態度。我這時開始明白劉家良剛才與我談話的神氣，我是被列入「老朽」之列了。我勸仲禧不要太看重人家的歧視。我自來以為打破歧視（或稱為「小組織」）的最好方法，就是自己別跟着也歧視人，別儘在「新老」或其他抽象與落後的標準上打圈子，把自己的注意提高到政治思想上，把目光投射在較遠的利益上，那末無原則的分劃與歧視便不攻自破。仲禧同志沒有很高的文化修養，但是他非常善良的氣質與長期實際鬥爭的經歷，確能使他超越於狹小打算的。他送我上了船，互道珍重，可惜在他被日軍殺死之前，我們不曾有機會再見一面。

回到上海，與其昌、國華等舊友重敘，確是平生快事。溯自1937年5月被解離滬，1938年2月繞道重來，其間相去未及一載，可是人事變遷之大，恐怕比平時的數十年猶有過之。上海成了孤島，四郊圍以大鐵絲網，網外群醜跳樑，牛蛇亂舞，一個十足的鬼蜮世界。我個人的遭遇更是歷盡劫數，出死入生，回憶起來像是一場噩夢。今日卻居然又與故人晤對，不能不說是「恍如隔世」了。汪孟鄒先生也非常為我的「生還」高興，在書店裏給我「接風」，邀了幾位朋友共飲，其中也有彭述之與陳碧蘭夫婦。到滬數日，我的才及周歲的大女兒病故，生活又煎迫着，煩惱接踵而來。身體很差，我想休息一個時期。但事實卻任何方面都不允許我這樣做。為了生活，立即着手給書店翻譯一本馬爾勞的小說：《征服者》。同時，組織也需要我。臨委改稱為《鬥爭》的編委會，我被邀參加了。此後便開始了我個人生活上一個新的時期：較多量譯作的一個時期。

在十年反對派生活中，我非常厭煩了內部小派別的糾紛。在漫長而悠閒的監獄歲月裏，讓我回憶和反省了許多事。我毫不以所參加的事業有所追悔——這是我至今還認為完全應該的，因而迄今仍繼續着這個事業；不過在形形色色的工作中，有若干事情的努力，我卻每次想起都不免於隱隱心痛，其中之一便是為小派別而爭取人的那種精力浪費。「把這些可貴的精力用以加深自己的研究與譯述老托的著作該多麼好呢？！」這是我時常自嘆，並常常以此告訴朋友們的。這次從南京的監獄出來，性命可說是僥倖揀回來的，因此更加發了心，希望將今後的「餘年」好好利用，無論如何，必須儘量介紹點托洛次基的著作到中國來。我常常把這樣的情形看成為離奇的，那就是：托派在中國存在了十年，可是國際托派賴以產生的1927年後托洛次基關於中國革命的文字，卻不曾完整地與好好地譯成中文。我嘗自誓要補足這一缺憾。

當然，時代正處在極度的激盪中。一個嚴肅的革命者不能不體會到，他的主張和事業之是否能夠成為時代發展的一個積極因素，主要決不賴於文字工作，而更賴於政治的組織工作，乃至有力的軍事工作。獨秀當時的着重點在此，而我也是充分了解，因而完全支持他的。可是如上所述，我們在這方面的嘗試可惜都失敗了。此時我回到上海，處在更積極的工作無法開展的條件下，興趣又回到譯述工作的宏願上去了，不過即使是這樣的工作，亦非獨力所能完成，也得等點「機緣」。在「待緣」期中，讓我約略回溯一下當時我所見到的上海領導機關的情形。

初抵上海，其昌、寒君兩同志先後來看我，從他們的談話中，我知道這裏也有所謂新人與老人之分，寒君是「少壯派」中心，團聚了一些年輕人在周圍，主要反對陳獨秀的機會主義，同時卻歧視一切「老

一輩」的人（即從四派統一時期留下來者），連彭述之在內。幾天接觸後，我更明白了所謂新老分化運動是劉家良與寒君合搞的，他們二人分別在港滬二地進行這同一運動。當時上海的蔣振東同志與香港的陳仲禧一樣，也非常不滿意劉寒二人的小組織行動，覺得我們必須設法來揭穿並制止它。我並不把這現象看得太嚴重，因為我自來相信，此時更相信，任何小集團，如果不以明確的政治或組織的思想作基礎，便不能持久，不能鞏固，更不能起作用。「新」和「舊」是一些抽象標準，這裏並不包含具體的意義。我們不能說凡新的都是好的，也不能說一切「老人」都已腐朽反動。反對陳獨秀的政治思想是一回事，反對一切與陳獨秀有過或長或短關係的「老人」則是另一回事。前一件是對的，後一件事便錯了。當然，如我在上面所說，陳獨秀發表於1937年秋冬及1938年春天的那些政治立場和工作觀點又應該分別來看，並非絕無值得我們考慮價值的。寒君與劉家良都是想有所作為的革命者，尤其是寒君，其艱苦卓絕處，承繼着中共中下幹部自來實幹的好傳統，曾為多數反對派的年輕同志所欽佩。至於「老人」方面呢，留存到抗戰初期的為數原已不多，而在此少數人中，大多數又確是暮氣深沉，空談比實幹更有興趣。他們很熱心回憶個人過去的「光榮」，卻無意瞻望整個組織的前途。有些人，甚至專為全軀保妻子，分別去作個人活動了。在這樣的情形中，那些在抗戰前夜參加組織的青年分子想排除障礙，單獨前進，原是可以設想的。但問題是，那些真正消極的「老人」，毋須人家去排除，早已自動離開了托派。極少數掛名組織且備位於領導者，也不必人家去排擠，他們自己頗願讓賢。剩下來不足十人的「老輩」，非但不是組織前進的絆腳石，倒是相當可貴的「財產」呢。如此而自立中心，必欲盡去「老者」而後快，其實不必要，抑且有害。寒君、劉家良那種行動也許懷着無邪的動機，但其於組織無益卻屬顯然。幸而「寒劉中心」僅僅維持了一個短期間，等到1938

年夏天劉家良被迫離港來滬，寒君前去接替負責之後，新人「同盟」就破裂了。因此這個插話性的非政治的小組織活動，沒有給組織帶來什麼損害。

然則在抗戰初期，中國托派內部有沒有原則性的政治意見分歧呢？有的。約略分別說來，可得三種：第一，為陳獨秀所代表，其主張可說是「無條件地擁護抗戰」；第二，為鄭超麟同志所代表，他不贊成「擁護抗戰」的說法，因為他覺得中日戰爭自始就應了解為新的世界大戰的一部分；第三，包括最大多數的托派同志，其立場可概括為「擁護抗戰，批評其領導」。屬於這一立場的，不僅「新人」，「老人」亦然；不僅有彭述之，而且有其昌和我。這三種意見，按理是要促發嚴重爭論的，但事實上未曾發生。因為陳獨秀既已自動聲明不代表托派，托派中亦無人完全同意他的意見；另一極端的超麟則住在偏僻的鄉下，他根本不擬將此意見在組織中提出，爭取影響。因此，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的前夜（1941年冬），中國托派無論在領導機關中或下層群眾中，都不曾有過思想上的紛爭，故亦無組織上的對立。「新老」之分，只是暗地裏開放的曇花一現而已。

上海的「孤島」時期（自1937年冬至1941年冬）是政治性的出版活動非常蓬勃的幾年。當時日帝漢奸的勢力不能明目張膽地在租界上發揮，租界上的英法當局則利用他們法理上的中立地位，相當袒護抗日活動。一個刊物，只要它名義上有個英美籍的發行人，就可以公開發行，從事抗日宣傳，不怕日本的干涉。那時無論屬於中共或國民黨的報章雜誌，無一例外是掛着「美商」或「英商」招牌的。這些出面來做發行人的英美人，有的為了錢，有的卻由於對中國抗戰的同情。我們那時恰巧有一個美國朋友在上海，一個名叫盤克曼的年輕攝影記者，是托派的同情者。同時又有兩三個比較有點經濟能力的中國

同情者，願意月助百元來幫我們創辦雜誌，於是文字宣傳工作的「機緣」算是成熟了。盤克曼做了發行人，我們便辦起了一種月刊，取名《動向》。執筆者有王獨清、陳其昌、彭述之、劉家良與我。由我編輯，而技術方面的一切工作，包括資金籌措與發行流通在內，則悉歸國華擔任。《動向》的銷數不大，每期共印 2,000 份，但在「孤島」上，這個影響不算小，即使在短短幾月的存在期中，已能讓我們見到一些結果了：其中的「讀者來信」都不是編輯人的創作，很有些思想聯繫是賴以展開了的。可惜它的壽命不長，一共只出了四期，就不得不停刊了。原因是發行地址發生了問題。這地址本來是借用一家兒童日報的，交換條件是盤克曼也替那家小報當發行人。日本憲兵當然知道此種「美商」招牌的實情，於是由漢奸的特務組織出面，向兒童日報頻施威嚇，結果小報主人不敢繼續冒險，地址不允再讓我們利用。同時日帝又向租界警務處與美領館施行雙重的外交壓力，連盤克曼都不能繼續擔當發行人了。《動向》只好夭折。不過惋惜的人是很多的，他們願見它以別種姿態存在，有的還自動的願意捐錢，因此我們決定以小冊子形式來繼續《動向》，因為這樣辦毋需登記，不會遭遇上述麻煩。在新形式下，我們又出了兩期：《破曉》與《西流》。

《動向》第一期出版於 1939 年 7 月，每月一期。最後一期，即第四期，出版於是年 10 月底。被迫停刊後，過了一個月，接着於 12 月出版《破曉》。次年（1940 年）4 月，出版《西流》。

在此前後，我們曾經獨力地，以「春燕出版社」名義，印行了托洛次基著的《蘇聯的現狀與前途》（此書由羅世藩同志在獄中譯了一部分，後由超麟校改並完成的）^[3]，《德蘇協定的前因後果》（劉家良譯並序），《俄國革命軼史》（維多·綏奇作，超麟譯）。經過亞東圖書館，出版了大約 14 本托洛次基著的以及由我們自己編寫有關托派意見

的小冊子。這些小冊子影響較大，因為公開出版，發行網遍全國。其中最大影響的一本是《在新的世界大戰之前》，一共曾銷售了萬餘冊。這數字在托派書刊的印行史上可說是空前絕後的。

《破曉》出後不久，鄭超麟同志從皖南鄉下來到了上海。他的來到，大大促進了我們的出版計劃。超麟同志學文字有天才（雖然他不善於說話），於歐洲的主要國文字幾無一不曉，而尤精於法、德文。中國最早與最有影響的那本共產主義課本——布哈林與潑來奧勃來順斯基合著的《共產主義ABC》，便是他翻譯的。他的翻譯是既快且好，又因精力充沛，生產率高。他這次離皖來滬，一半固然是長期休息之後，靜極思動；另一半也因為我們在上海已開始翻譯托洛次基的最大著作《俄國革命史》，希望他來參加。此書的翻譯乃是中國托派文字工作中最巨大的一宗，由超麟與我合作，歷時一載，才得完成。我平生衣食之需，都靠譯書所得。故從1929年翻譯普列哈諾夫的《從唯心論到唯物論》以來，譯的東西已不算少，只因目的在於賣錢，書的選擇大半取決於出版人，以致此項工作對我成了無可奈何的勞役，感不到多大興趣，自然也不會有美好的成績。不過那次《俄國革命史》的翻譯是不同的。我（超麟同志亦然）是以教徒的虔敬，以一個作家由內心發生的創作的熱情，來從事它的。我們謹慎翻譯，用幾種文字的本子來參照，然後二人又互校了譯稿，總希望能做到即使不是完全無誤，也應該錯得最少的地步。付排後的校對工作也做得非常精細與求全。在國華同志與已故的亞東圖書館的朋友胡鑑初先生的努力下，總算做得盡善盡美了。據出版後的統計，在全書一百餘萬字中，「魚魯」「成或」之誤還不足十字呢。

在工作進行中，我們就通知了住在墨西哥的原著者，並要求他為歷史的中國版寫一專序。托洛次基極其高興地接納了我們的要求。為

了趕上我們的出版期，他放下了別的工作來寫這篇序文。但是萬分不幸，序文還未寫成，作者那個賦有不世出的智慧的頭腦，讓史大林派去的一個卑微的兇手用斧頭砍死了。《俄國革命史》排印時，我們在卷首留下了四張白頁，表示了我們對此事的深刻的遺憾與無比的哀悼。可是在臨出版時，一件意外事情發生了，墨西哥的托氏夫人從遺稿中檢到了托洛次基遇難前寫了一部分的序文殘稿，立即給我們寄了來，我們在悲欣交集中將它譯出，附排在《俄國革命史》的卷末。

《俄國革命史》一共印了2,000部，可是才發賣了二三百部，太平洋戰爭發生了，上海失去了孤島地位，日本憲兵竭盡一切力量來消滅反日與一般的革命書籍。我們曾用種種方法來保存《俄國革命史》；但最後，於一次日帝清查全滬倉庫之前，它終於遭到了厄運，約近千部的《俄國革命史》竟毀於火。此事即使在今天回想起來都尚覺心痛的。

抗戰勝利後，我們又曾照原版影印了200部。但面目卻差得多了。

托派的「命運」相當坎坷，連一書之微都逃不出此一總的命運。我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結果竟付之一炬，使它不能產生預期的廣大影響。不過，想開些，想遠些，我們仍有理由為那次工作的完成而慶幸的。真理畢竟會勝利的，而有關於俄國十月革命的真相與真理的描寫，除托著此書之外卻不曾有第二部。史大林為了抹殺真理，曾經動員了驚人的力量，寫出了與印刷了數不清的所謂歷史；可是你們瞧呀，這個大獨裁者剛死去三年，在蘇聯共產黨的第二十次大會上，他欽定的公認為權威著作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竟被他自己的弟子米高揚宣佈為「不忠實與不可靠」，決定要另寫歷史了！

早些晚些，今後的歷史家與共產主義者必然要找到真理的，中國的共產主義者也決不可能例外。在此尋找過程中，托洛次基的此一歷史必然要成為黑暗海洋中照耀遠近的一座巨大的燈塔。

我們有此自信，也以此自慰。

* * *

正在校對《俄國革命史》最後一部分稿子時，肺結核病困擾了我。大咯血使我不得不放下一切。在病牀上我遭逢了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參加了因此而引起的內部爭論，以及接踵而至的中國托派的再分裂。

注釋

1. 我們，至少我個人，在當時並不知道中共內部對於抗戰態度曾經發生了兩條路線，我只知道在洛川會議上，曾經有過比中共表面聲明較左的決定，國民黨曾經引用這些秘密決定來攻擊中共的「兩面手法」的。今天由中共官方公佈的歷史文獻上，將此「兩條路線」描寫為毛與陳主張的對立；不過據我看，更正確些說，應該說是當時中共革命一翼（可能包括毛澤東）對史大林在該一階段上所指示的某種抗議。陳紹禹自然是無條件地，始終站在史大林立場的。我們知道，自從希特勒在德國勝利，納粹德國以一個雄偉的軍事力量在蘇聯的西面升起，同時軍國主義的日本在東方顯出無饜足的侵略狂以後，史大林是終日處於恐懼病中了。此時他最後地失卻了靠外國革命來挽救蘇聯的希望，他嘲笑「世界革命」為一種「悲喜劇式的誤解」。此時蘇聯以外的共產黨力量，一律被視作蘇聯和外國實力者從事買賣的「零找錢」，將它們的存在或取消當作達成協議的一個小代價和條件。任何實力者，不管它是法西斯或民主，只要願和蘇聯和解（自然是暫時的與虛偽的），史大林

都不惜命令該實力者下面的共產黨人予以服從與支持。在東方，史大林此種出賣共產黨的政策表現得特別露骨與無恥，一方面，他「要求共產黨人對國民黨的反人民政策實行讓步，把自己的行動限於在國民黨蔣介石所允許範圍以內，要求八路軍新四軍完全統一於國民黨軍隊，實行『統一指揮，統一編制，統一武裝，統一紀律，統一作戰行動』……反對放手發動群眾鬥爭，反對在日本佔領地區放手擴大解放區和擴大人民武裝，害怕這樣就要從抗日陣線中『嚇跑』了蔣介石國民黨。」（見《中國共產黨的卅年》中轉述的「王明路線」）總之，史大林要中共跪在蔣介石面前。使他去拖住日本帝國主義的腿，以免後者進攻蘇聯。同時，史大林卻以更大熱心，向日本帝國主義者拋媚眼，希望和它締結「互不侵犯條約」。這一企圖，到了1942年也就終於實現了，此時他擁抱了那個「道德的共產主義者」——日本軍閥的代言人松岡洋右。

史大林如此無原則地（無恥地）叛賣他的國外同志，不能不引起一切多少還是革命者的人的反抗。抗戰時期的中共，在大處與主要處固然屈服於史大林的命令，但在執行上與策略上可能做了自己的修改，這就是所謂「兩條路線」對立的真實內容了。

2. 陳紹禹初抵漢口的聲勢，我是間接覺察到的。那時我和一群江浙流亡來的青年人很接近。這群人的成分很複雜，有過去的共產黨員，有初涉政治的大孩子，甚至有三青團的群眾，但主要的卻是多少在救國會影響下幹過抗日工作的純潔青年。他們為了找工作，謀出路，同時也為了迫切的生活，終日追蹤着一些國民黨的以及民主派的要人。我從他們口中經常能聽到一些可貴的消息。有一次，幾個人去看了沈鈞儒回來，轉述了沈鈞儒和陳紹禹會見後的興奮情形。據說，沈鈞儒完全為陳紹禹那種「聰敏能幹，以及他那淵博的理論所感動了。」民主派認為陳紹禹確實是中共「最傑出的人才」。又一次，據說孔祥熙設法和陳紹禹會見（結果是會見了），「因為」，我的青年朋友告訴我，「老孔認為陳紹禹才是真正的代表，他直接代表第三國際。」這些間接反映讓我回想起六年前龍華監獄裏的情形。前一次的反映使我認清了陳紹禹的得勢、這一次則使我明白了陳紹禹的雖失勢而未曾跌倒。
3. 《蘇聯的現狀與前途》在南京的老虎橋監獄中由羅世藩和濮德志翻譯，每人各譯三分之一便出獄了；剩下三分之一，由鄭超麟翻譯，全書亦由鄭超麟整理。——校者注

十一、太平洋戰爭與組織再分裂

中國托派之再分裂發生於 1941 年太平洋戰爭之後。促成分裂的直接原因有政治和組織兩方面。政治上，有關於中國抗戰被捲入於世界大戰後的性質以及我們對它的態度。組織上（那是後起的），所爭的是少數派的合法地位及其權利問題。

不過在記述那次事情之前，我們得先談一談第四國際中自 1939 年以來的爭論情況。

1939 年 8 月德蘇協定簽訂，同年 11 月爆發了芬蘇戰爭。這兩件舉世震驚的大事，不但在全世界工人階級與社會主義者中激起了洶湧的波瀾，同時也在第四國際的隊伍中促發了廣泛爭論，並造成了組織的分裂。爭論的範圍很廣，牽涉問題甚多，不過一個最根本的問題，乃是蘇聯的國家性質。托洛次基直到 1940 年 8 月被史大林遣派的兇手謀殺為止，始終認為蘇聯是一個「墮落的工人國家」。理由：這個國家裏保存着國有財產制，它是一次無產階級革命所造成，也只有無產階級革命才能造成的。因此，他認為，不管目前統治蘇聯的早已不是生產大眾，而是非常跋扈與專橫的官僚，但只要財產國有的制度未被取消，則其本質仍是工人的。如果它牽涉或被牽涉到大戰中去，我們還是要保衛它，雖然我們對史大林的統治階層保持着絕不調和的敵對地

位。托洛次基將此立場確定於《被背叛的革命》（即《蘇聯的現狀與前途》），在《第四國際與戰爭》的小冊子中，在《過渡綱領》（第四國際政綱）中。自從1927年以還，托洛次基的此一立場，經常受到一部分左派社會主義者的反對。在左派反對派與繼起的第四國際運動中，每次重要的爭論和分裂，也差不多總是為了這個立場。托洛次基在此問題上不容許任何偏差和修正。為了它的歧見，他曾經一再和很親密的同志分了手。

中國反對派的歷史上充滿了理論的爭執。但是關於此一第四國際的主要立場，卻從來不曾引起過爭辯。有之，陳獨秀一人而已。而且他的不同意見，在1939年以前，也從不曾有系統地形成，公開用文字寫出，並為之竭力爭持的。大約在1934年，即當莫斯科審判初次上演時，在南京監獄中的陳獨秀曾經對「蘇聯乃墮落工人國家」的看法表示懷疑。但他的懷疑與其說是理論的，毋寧說是印象的。「這樣不民主，還算什麼工人國家？！」這是他當時的牢騷想法。至於是否真的已從工人國家變成非工人國家，如何變，幾時變，我們應該對它改取什麼態度……諸如此類的問題，至少就我個人所知，他都不曾考慮。直到1937年年底，我在他家中作客時，我們在談論中偶爾觸及這個問題，他對「老托」的立場也不曾提出異議，彷彿他還是同意着舊立場的。這要到1939年德蘇協定之後，他才公開而堅定地否定了這一立場。當然，他的否定仍導源於民主的見解：沒有高於資產階級制度的民主，根本不可能是工人國家。

陳獨秀之外，中國托派中，不曾有過一個人或一群人，在1949年之前曾經對托洛次基的蘇聯看法表示過異議。因此，當1939年秋冬，整個第四國際（特別是美國支部）因蘇聯問題進入爭論並陷於分裂之時，我們中國托派卻是一致的，一致地擁護托洛次基的意見。當德蘇

協定與芬蘇戰爭發生時，我們都來不及等候托洛次基的態度，根據了我們素來的立場，便在當時發行的《破曉》上發表了意見。這意見一方面指出這些都是史大林多年來叛變世界革命所獲致的結果，特別指斥他因和希特勒作外交妥協而放棄了反法西斯的鬥爭；在另一方面，我們又根據了第四國際的綱領，聲明不管蘇聯為何與如何捲入戰爭，我們仍舊要保衛蘇聯。我們這立場讓陳獨秀看了大為生氣。在他當時寫給我的信上，說我們「思想上與死狗（按指史大林）無二，即詞句亦多相同，近讀《破曉》一小冊，……竟放過法西斯，專向英美攻擊，且為蘇聯征伐芬蘭辯護……『反對民主國英美』，『不攻擊法西斯』，『擁護蘇聯』，這三個政綱合起來，第三第四國際在理應該合併了……除了史大林手中掌握的軍警法庭等國家統治機關，誰能尋着一個懸在空中的蘇聯來擁護呢？」（見《最後論文和書信》。）

陳獨秀這個態度，與第四國際中當時發生的蘇聯問題的反對派（主要以美國的盤納姆——夏克曼派為代表）本質上是一致的。不過它沒有能在中國托派中引起共鳴。以上海編委會為首的全體托洛次基主義者，在德蘇協定與芬蘇戰爭的爭論中，始終擁護了托洛次基以及國際中的多數派，堅決反對任何對原有立場的修正企圖。在討論中，約略地與短暫地表示了不同意見的倒是彭述之，他在我們尚未接讀托洛次基對芬蘇戰爭的文件以前，曾主張在蘇聯軍隊中提出反戰與和平口號，因為他覺得根據於保護弱小民族獨立的立場，我們未便擁護蘇聯對芬蘭所從事的戰爭。這立場他保持得不堅決。一俟紐約方面與他相反的意見寄到上海，他便立即放棄了。

現在我敘述這些事情，並不想批評當時的爭論，而只是要指出這個史實，即在1939年與40年，當國際托派為蘇聯問題爭論得最熱烈之時，我們中國托派卻不受影響。當時不爭論蘇聯問題的原因可以

找出好幾個來，而其中之一，我想應該說是中國同志將自己的最大注意集中在抗戰問題上了。中國的對日抗戰此時已經延長了兩年有半，國民黨政府偏處在西南一隅，如果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在西歐及時爆發，多半整個國民黨都要參加日本帝國主義的「大東亞共榮圈」了。歐洲戰爭給了蔣介石以新的刺激和希望，讓他在複雜錯綜的國際關係中，能從事於新的買賣。在抗戰初期，蔣介石主要是依賴了蘇聯的援助（因此他不得不接受共產黨的合作），與日帝周旋，藉向日帝爭取較好的妥協條件。不過戰爭的進程，以及中國國內的階級關係和國際條件，阻止了蔣介石實現這一企圖，抗戰便長期化了。蔣介石只好坐以待變。等到1939年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局勢已成，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資產階級也就根本改變了抗戰的指導方針，他決心將中國的抗日戰爭投入世界大戰的民主方面。特別要將自己繫在美帝國主義的戰車上。因此，在國內政策上也明通地轉變着，他開始對一切左派施行彈壓，後來向新四軍開了刀。在美國大老闆愈來愈積極的支援之下，他再不能忍受共產黨的合作，也不需要一般民眾的擁護了。蔣介石的此一傾向，當1941年4月的日蘇協定簽訂，日美戰爭愈形迫切，以及同年6月間德蘇戰爭發生之後，更加來得顯明。

中國托派從1940年初開始，內部就普遍地提出了一個問題：一旦中國的對日抗戰變成為世界戰爭的一部分時，它的性質是否發生變化？我們對它的態度應否同時改變？大概在1940年秋天（已記不真切），我寫了一篇文章登在《鬥爭》上，題為〈太平洋戰爭與中國抗戰〉，目的就是要解答上述的問題。文章的結論大致是這樣的：1、太平洋戰爭發生後，中國的對日戰爭不能不視作帝國主義大戰的一部分，因為它不能不以美帝國主義者小盟友的資格作戰，它的戰爭不能不從屬於美帝參謀部的作戰計劃，因而它的民族解放的目的也不能不從屬於美帝爭奪對弱小民族奴役權的目的；2、在中國多少以獨立資

格對抗日帝時是進步的，但當它參加於世界大戰，這個進步性便失去了，至少退居不重要地位了；3、當太平洋戰爭發生後，我們中國革命者對國民黨領導的戰爭態度，在本質上更應符合於列寧在第一次大戰中所揭出的「革命失敗主義」。

這篇文章登出來時，前面加了聲明，說這是作者個人的意見，未能代表整個《鬥爭》報，亦即整個中國托派的態度。文章發表的用意在於幫助同志們的討論。不過這個聲明，並非表示當時編委會的其他委員都不同意此文的意見，相反，倒是全體同意的。那時彭述之去了香港，留滬的編委是陳其昌、鄭超麟（這裏必須附帶提一提，當超麟從皖南來到上海後，就因他是統一大會上當選的正式中委而受邀參加了編委會）、國華、劉家良和我。文章審閱時，沒有人反對，劉家良尤其贊成。差不多在同時，彭述之在香港發表了一篇關於同一問題的文章，彷彿是登載在香港的地方機關報《火星》上的，卻發表了相反意見，他認為不管中國抗戰如何與帝國主義戰爭相結合，其進步性仍舊不變，除非——他附了一個條件——英美帝國主義軍隊在中國登陸，在中國領土上與日帝進行戰爭，則那一部分戰爭的性質是不進步的。

所以等到彭述之回到上海，一場激烈而延長的內部爭論就發生了。最初進行於編委會內，後來擴大到全組織；編委會中開頭是五對一的爭論，後來變成四對二，因為劉家良不久改變態度，轉而積極擁護彭述之立場。在上海和香港的支部討論中，在第一階段，多數亦屬於「抗戰變質論」者，只因後來美國朋友們所採立場與彭述之相同，李福仁帶了這個決議（它彷彿是以「第四國際太平洋書記處」這樣的名義通過的，為李福仁所起草）重來上海，這便影響了二種立場擁護者的比例，原來的多數派變成為少數派了，雖然編委會中的四二之比並未改變。

那爭論繼續了半年以上，採取着書面形式，兩方面的文章集成了好幾巨冊的《校內生活》。要把爭論內容在此地敘述出來，即使擇其最主要者，也都是不可能的。同時這樣的敘述也不必要，儘管那爭論在其邏輯的本身發展中，範圍愈廣，研究愈深，以致在某些方面對於實際政治以及純粹理論都可能有若干價值，但爭論本身總已為歷史的迅速進展所超越了，拋撇在後頭了。新的時代提出了新的問題，新問題又促發了新的歧見，而革命者的分分合合，也主要地不再為了回顧過去，應該圍繞於更迫切的分歧周圍了。我個人，關於那一時期的思想爭論的總結，曾經寫入 1947 年出版的中譯本托洛次基著《中國革命問題》的長序中，因此更不必在此作任何交代。

思想問題的爭論不曾直接促成組織分裂。組織分裂乃由於一個有關於組織原則的步驟。在 1941 年夏天，彭述之等主持了一個所謂中國托派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我因病根本沒有參加。超麟、其昌與國華三人則因反對如此草率地召開大會，不願參加。）^[1] 在會議上，產生了一個新的領導機關，五個成員全體屬於多數派^[2]。我們對那次會議的準備與進行都不滿意，但接受了它的結果，我們自安於少數地位。不過我們要求一個權利，即在機關報《鬥爭》上闢一討論欄，雙方繼續進行問題的闡明。新中委會拒絕了我們的要求，我們又要求繼續出版內部生活，延長討論，又不獲允，我們乃自行出版內部生活，後來我們命名這個獨自輯印的內部生活為《國際主義者》，以此同時對黨內黨外的革命者發言。我們這樣做的時候，同時聲明新中央如能答允我們在《鬥爭》報上開闢討論欄的要求，隨時可以停刊《國際主義者》的。以彭述之為首的新常委會不允考慮我們的要求，並指出少數派的行動破壞組織原則，如果繼續發行，則宣佈所有少數派的同志已「自動脫離了」中國托派。

就這樣，於 1931 年 5 月 1 日統一起來的中國托派，在 1942 年 5 月再陷分裂，從此便以兩個組織存在着，迄今不曾復合。

時間逝去得真快，彷彿還是昨天的事，可是一經計算，這分裂離今天竟有十五年了！今天我自然不會以偏激的派別感情來重算舊賬；既然為之分裂的政治歧見都已被歷史推到很次要的地位，則較政治問題更次要的組織問題，尤其是有關組織問題的某些措置和步驟，更值不得來爭辯是非曲直了。歸根結蒂，組織是應該從屬於政治的。不過有一個基本的組織觀念，即關於黨內派別的合法存在，少數派權利之應予確定和尊重這個問題，我覺得並未因爭論問題之過去而過去。對於將來托派運動，乃至一般的革命社會主義者運動，都仍具有非常重大意義，所以我不能不在此多說幾句。

不少史大林的罪惡假「列寧主義」之名以行。最重要的諸端之一，該是所謂「鐵的團結」或「鋼的團結」了。其意是說：黨內禁止一切派別存在。換言之，那便是「黨內無派，黨外無黨」。可是事實上，將成百成千，或數萬、數十萬乃至數百萬的人組織在一個團體之內，要想沒有不同意見發生是不可能的；有了不同意見，要想沒有相互對立的派別也是不可能的。既然不同意見的派系發生為不可避免，而任何一個團體的力量卻在於其行動上的一致；那末其間的矛盾將如何解決？早在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中就為此立過一個榜樣，那便是：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則容許少數的合法存在。此原則應用於一黨之內為多少數派；應用於各黨之間就是在朝黨與反對黨。資產階級民主的此一方式，並非某一資產階級的政治學者發明出來欺騙民眾，而是十八世紀以來各個革命階級用鮮血鬥爭而換得的。列寧的組織原則（包括他關於國家學說的一部分）並非根本否定此一資產階級的民主傳統，而

是它的承襲，它的進一步的發展。不錯，列寧鄙棄了資產階級的國會制，但他的蘇維埃制並非原則上排斥了多黨政治。在十月革命後的初期，蘇維埃中原包括有其他的社會主義政黨的；蘇聯的一黨統治，它的黨外無黨，本只是空前階級鬥爭（內戰）所形成的事實，而非根據於既定原則所造成的結果。至於黨內，列寧一貫所堅持的民主集中制，完全不排斥少數派別合法存在的權利，更不曾禁止居於少數地位的同志繼續向黨內黨外發言。在布爾雪維克主義的成長史中，列寧本人就多次居於少數地位，而每當他成為少數時，總是要享受這個反對派的權利，繼續讓自己為正確的主張而鬥爭。聯共黨第十次大會上禁止黨內派別的決議，顯然就是權宜性的，暫時性的。可是史大林們卻利用了這個決議，將它解釋為一成不變的硬性規定。從此就黨內分派有罪，更進而保持不同意見者（即不同意總書記意見者）有罪。處罪之法，始則假手黨紀，繼則借助司法，終至以總書記直轄的特務部隊來做「黨內無派，黨外無黨」的維護人，一切犯此「天條」者殺無赦。結果，列寧的「民主集中」原則，被以無量數革命者的鮮血畫成為希特勒的「一個國家，一個元首……」的荒唐與反動的最可悲的諷刺畫。

毋須說，列寧的組織原則被利用得如此醜惡，還由於更大的歷史原因。但是反過來，我們也仍有若干理由說，史大林的此一「列寧主義」組織原則，在其應有限度內，也助成了那些反動的史蹟。

這樣的「原則」在已取得政權的國家內會造成冤獄、流血和反動。在未得勢的政黨內，會造成無窮盡的糾紛與分裂。三十年來蘇聯和史大林黨的悲慘經驗，已經充分明白地證明了這一點。時至今日，誰若仍以史大林精神來了解列寧的組織原則，那他是不配稱為真正的托洛次基主義者的。

我不想在此地批判作為革命家的彭述之，順帶地，我卻願意在此聲明：他自是一個革命者，且具有不少革命者的優點，譬如說，他的穩定和謹慎（雖然，從另一視角看，他的穩定可能變成劉家良所描寫的「絆腳石」；他的謹慎會變成對於較高權威的無思考的信賴，以致犯了超麟同志所稱他的「王明主義」）。不過在我的認識中，覺得他有一個最大毛病，那就是接受了被史大林偽裝過的「列寧主義」，特別是我們上述的那個組織觀念。我無意說，彭述之的此種組織觀念造成了中國托派的再分裂；但是應該說，如果不是此種觀念充塞了當時的組織，則分裂縱使仍舊發生，也可能遲些，採取不同形式，甚至可以避免。史大林官僚式的、唯我獨尊的組織原則，對於一個宣傳較多於行動性的小團體，更具有毒害作用。故不論為了回顧中獲取教訓，或者為了未來工作中有所保證，都必須鄭重地指出來。

組織分裂不久便發生了太平洋戰爭。日帝軍警侵入了租界，我們的工作就更加困難了。從1941年12月起至1945年8月日帝投降為止，在整整的三年零八個月中，我們的《國際主義者》繼續出版着，大約一共出了十五（？）期。《鬥爭》本由彭述之領導的新中央續辦，但自「孤島」淪陷之後不久，這個創刊於1936年的壽命最長的托派機關報終於停刊了。在日帝統治上海的長時期中，「多數派」除了最初一個短時期外，並沒有機關報。

那是幾個十分艱苦的年頭。幾乎任何工作都無法開展，甚至我們的最低生活也不易維持。我們和國外的關係斷了，和全國其他地方的聯繫也被割斷。組織工作限於極小規模內的活動。在這方面，律師張德澤和他妹妹德涵之由同情者變成同志是值得提的。由於他們的忘我捐獻，我們能夠在滬西工人區裏辦了兩所小學校，以此作為基地，多少增加了些工人關係。綢廠工人與托派有長久淵源，此時由蔣振東

同志領導，在我的侄子頌九（他於1952年12月被捕後，自殺於毛澤東的監獄中）的協助下，經由一所小學校，又發展了若干新的關係，甚至領導過幾次鬥爭。在電車工人中，我們總算也於此時生下了一點根。個別的同志曾經入了蘇北蘇南的抗日游擊隊。有些與組織脫開了聯繫的同志，曾經在游擊隊裏起過相當大的作用。不過整個說來，我們那時期的組織活動是不足道的。我們主要的精神仍被放在文字工作上，在對於戰爭和革命的理論性的分析與觀察上，也就是說，在於《國際主義者》的繼續出版。鄭超麟長期從事於黨內以及反對派內的文字工作，不過在過去，他的文字多數屬於翻譯方面；只有在那時，他的理論性的創建工作才達到了旺盛時期。超麟的文字精簡生動，說理條分縷析，邏輯性非常之強。儘管你對他的結論可以不同意，但你不能不為他的文字和理論所吸引的。在那最最黑暗的幾年內，超麟寫下了也許是他一生（自然我不希望如此）中最精彩與最結實的作品。他寫了《三人行》，寫了《回憶錄》，寫了《不斷革命論ABC》；而以更謹嚴更鄭重態度來寫作的，則有《陳獨秀評傳》（根據我閱讀原稿後的印象，覺得這是一部最出色的中國近代思想史）。可惜的是：這些書除了《ABC》之外，都不曾付印出版。原稿雖曾錄副，但是均不及帶出，故於1952年12月托派全體被捕之時，稿與人同時被毛澤東的特務帶走了。《國際主義者》上的主要文章出於超麟手筆，只有較少部分才是我寫的。抗戰勝利後，超麟曾有意將他的與我的文章分成單行本出版，號《國際主義者論文集》，這企圖卻終於不曾實現。時至今日，這些巨大數量的文字竟連一張原稿紙都找不到了。長年累月的心血結晶，都變成了寫在水上的字。

寫到這裏，我不得不提到幾個在那一時期失去的同志。「孤島」一淪陷，內地與上海的通信完全斷了。我們不知道留在川湘滇的一些朋

友們的情況。那是在 1942 年 5 月某一日的日本軍部出版的《新申報》上，我們看到了陳獨秀逝世江津的消息。獨秀去世消息對我們不能算是意外，因為他的病，血管硬化症很久已是絕望了的。在太平洋戰爭之前，經常可以接到他報告病狀的信，由上海的一位相識的醫生給他處方，並寄送一些內地無法買得的藥。據醫生說，這種病是隨時可以發生意外的。但雖如此，這噩耗在我們中間還是產生了激動。這激動雖不如二年前因托洛次基被害所引起的那樣深刻，但也有那樣的沉重。在一些與老人曾長期相處過的同志中，這悲痛可能還會更加親切的。獨秀的晚年思想，一如在他的《最後論文與書信》中所表示，離托洛次基主義已很遠了。可是不光是我，還有不少同志們，都認為獨秀在那些文字中所表示的思想並不能算是「最後的」。倘若「天假以年」，在往後的歷史事變影響之下，他多半仍將是托派的同志——因為他那絕不勢利的徹底革命者的性格，以及那個所謂天才式的觀察者的思想方法，不可能符合於「他的朋友」胡適之的願望：由無條件歌頌民主制進而擁護資產階級的統治。所以我們——當時《國際主義者》的編輯部，雖在思想上，特別在戰爭態度和抗戰態度上，和陳獨秀的距離比「新鬥爭」派和他相去得更遠，卻仍以同志的，甚至是學生的立場，在刊物上追悼了這位中國近代革命史上的巨人。超麟寫了一篇長文，我寫了一篇短文，來紀念獨秀一生的為人和事業。同時彭述之也寫了一篇文章，登在一期油印的《鬥爭》上，指斥了獨秀的「晚節不全」。

當時彭述之曾經非難我們的「非政治」態度，為了我們竭力頌揚一個在思想上業已走到敵對陣營裏去的過去同志。我們當時不以為然，今天我更以為我們那時的態度是對的。因為關於陳獨秀這個人物的評價，不單單是一個思想問題，而更是一個實際政治的鬥爭問題。在批評與追悼陳獨秀的時候，我們首先要看到一個事實：為了熾熱的

政黨鬥爭的利益，中共和國民黨對陳獨秀都採取了非常陰險的立場。中共採取的是沉默和誣衊，國民黨用的則是奉迎與曲解。手段雖殊，目的卻同：不外乎要抹煞陳獨秀應有的歷史地位，或用醜陋的顏色塗在他的臉上。而這些目的的最終歸趨，又都是要辱沒中國的托派。因此，我們來追悼陳獨秀，必須針對着中共和國民黨在這方面的陰謀戰略。我們必須儘量恢復陳獨秀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無人可與抗衡的地位，他那一身兼具西洋史上從盧騷直至馬克思的「配合發展」的代表資格，同時要指明這樣一個人物之終於走向托派，正表明出中國托派在中國的歷史作用也是繼往開來的。為要這樣做，我們自必強調陳獨秀的積極處，進步處，他的偉大處以及他在中國近三十年來所做過的對於文化和政治的重大貢獻。關於他晚年和托派間的思想距離（我們要特別指明，這距離根本不曾發生過什麼消極的或積極的影響），我們自應置之於較不重要地位。在大敵之前，我們對於自己的老戰友是不妨與應該「護短」的。

為確定陳獨秀正當的歷史地位而作的鬥爭，不但當時為必要，今後可能更為重要。這鬥爭和「恢復中國托派名譽」的鬥爭是分不開的。毛澤東很懂得這個道理，所以直到今日，並不因為自己的輝煌勝利與陳獨秀的早已作古而緩和了這個鬥爭。我們知道，在毛澤東對美國記者史諾口授的傳記（1937年曾在漢口發售）中，曾坦白承認了他受陳獨秀的重大影響；事實上，無論就思想或關係說，毛澤東都是陳獨秀親炙的學生。那本傳記中所講述的影響，無疑還是故意減損了的。可是為了當時奉命進行的反托反陳的鬥爭需要，這樣的承認都覺得不相宜，於是那本書不久便收回了。從那時以後，延安及其外圍的文化界便有計劃地進行了對於近代思想運動，特別是五四運動的歷史偽造。偽造集中於貶損陳獨秀的作用。他們非分地抬高魯迅的地位，以便將

他來扮演陳獨秀所曾演過的腳色。這種偽造與竄改，最初畢竟因為史實太新鮮，偷換的手法太離譜，以致使一切參加過或見聞過五四以來思想運動的人們大為震駭；可是積非成是，見多不怪，到了今天，不必說對近代史全無知見的新一代，便是較老一輩，都自覺或不自覺地接受這部欽定的「歷史」了。中共勝利之後，毛澤東在那篇有名的文章〈論人民民主專政〉裏，曾企圖歷數中共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前驅者的名字，文中他竭力捧出了康有為，又照例讚揚了孫中山，可是他完全抹煞了陳獨秀。康孫二人在中國晚近文化與政治運動史中所佔地位，無人可予否定。雖然康有為是真正的「晚節不全」，以發霉的清室遺老資格終其天年；雖然孫中山在文化思想上說，並無什麼貢獻可言，他始終只是一個資產階級的政治家；但二人對於中國現代化的變革，若從歷史觀點看，畢竟曾發生了巨大影響，故有其應得的地位。毛澤東的此種承認是應分的。可是承認了康有為與孫中山而抹煞了陳獨秀，則猶之乎俄國的布爾雪維克黨人只把十二月黨人和民粹派奉作自己的先驅者而否定了普列哈諾夫的作用一樣，這在列寧是絕不容許的。陳獨秀在中國的革命思想史上，地位至少可以和普列哈諾夫齊肩，如果說他「晚節不全」，則至多也不過和普列哈諾夫齊肩。然而列寧在十月革命之後，曾經不止一次地表彰這位「俄國馬克思主義之父」，號召年輕的共產主義者細心研讀普氏的哲學著作，且譽之為「國際馬克思主義此類文獻中的最佳者」。在紅場側面巍然矗立的「先賢碑」上，普列哈諾夫的名字被列在直接走向布爾雪維克的地位。列寧和當時的布爾雪維克黨如此作為，不但表示出真正革命者的恢宏氣度，也反映了辯證唯物歷史觀的正確應用。那末為什麼以中國列寧自況的毛澤東卻不肯以同樣的公平來對待中國的普列哈諾夫（其實陳獨秀還不止是普列哈諾夫）呢？問題是很清楚的，使毛澤東不能如此做的主要原因，乃在於陳獨秀和托派的關係。這個托派，不論中國的與國際

的，直至今日為止，仍然代表着史大林主義的最不可調和的敵人，他們堅持着真正的馬列主義，保持着十月革命的真正傳統，因之，代表着史大林主義的掘墓人資格。

從毛澤東對陳獨秀的態度裏，中國托派可以學到許多東西。陳獨秀這隻死去已久的「大蟲」竟仍然成為中國史大林黨不能安睡的夢魘。這個偉大的名字和他在歷史上所起的真實作用，一直使中共頭子們感到重大困擾。由此可見，陳獨秀決不是中國托派的「盛名之累」，恰恰相反，乃是它光榮的象徵。陳獨秀歷史地位之重被確定，如果不意味着托洛次基主義的完全勝利，也至少將標誌出史大林主義對中共統治的最後結束。但願中國的托派同志們能夠懂得這個意義。

* * *

我們哀悼了陳獨秀大約一年之後，又遭受了一次慘重損失：陳其昌同志被日帝憲兵捕去而且加以殺害了^[3]。其昌那次被捕，並非直接為了他是托洛次基主義者，而是為了他的抗日工作，因此，他在政治上的敵對者便乘機加以攻擊，說他的犧牲是並不光榮的。這種攻擊是惡毒的誣衊。一個強調「抗日第一」的人，竟會指斥為抗日而遇難的同志，未免犯了宗派第一的毛病了。其實陳其昌不僅是中國托派的光榮烈士之一，而且是最值得我們後繼者學習與矜式的一個革命家。革命家與政治家是兩種不甚相同的品格。有革命的政治家，有不革命的政治家。有兼具政治家品格的革命家，也有完全不能充任常態政治家的革命家。一般說，在艱苦的創業時期，需要的因而「時興的」是革命家；革命完成後，當令而爬到前列去的是政治家。真正偉大的政治家必然是革命家，但偉大的革命家中有很多並非政治家。反之，片面地具有政治家條件的人，即使因為時勢所趨，被捲入了革命家的隊

伍，但在事件的發展中，這種人多半在失敗中最先變節，在勝利中最先官僚腐化。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固然看重環境對於人的品質的決定力，但也不忽視個人的品質。因為這種品質，隨着其人的地位不同會發生大小不同的影響的。陳其昌可能不會成為好的政治家，但他具有最優秀的革命家的一切性格：吃苦安貧，從不懂圖生活的享受；疾惡如仇；對一切被踐踏與被欺侮者懷有無上悲憫；最不喜歡架子；他不但沒有領導分子的裝腔作勢，而且永遠把自己安置在危險的最前列；他身上混和着新式的同志愛和舊式的義氣；對一般同志的安全和生活照顧得無微不至；所以他是「大哥」這個綽號聞名的。在1931年至1937年蔣介石白色恐怖最猖狂的時期，中國托派的組織一次接着一次地被破壞，而在每次破壞後作慘淡的重建工作，使組織得有一線存續者，總是我們這位「大哥」。其昌在秘密工作中非常機警，他的警惕性是永不鬆弛的。不止一次的組織險遭破壞，都因他的事前覺察而勇敢地加以挽救了的。最著名的一次便是他在寒君家的門口被特務追逐，他用盡方法，使自己既脫於難而又把寒君救了出來。這正與某些「政治家」不同，他們太看重自己地位，因此太看重自己的安全，因此一經嗅到危機，便獨自遠颺，棄其他有危險的同志們而不顧。其昌最鄙視那種行為。自然，其昌和一切革命者（一切人）一樣，不是完全沒有弱點的。一種略偏於經驗主義的思考方法，也許就可說是他的小毛病了。不過他絲毫不輕視理論。他做學問和他的做人一樣，非常之切實，所以基本理論的修養是很高的。有時他為人所詬病，多半是因為他歡喜歸納尤甚於演繹，調查研究比抽象和綜合的思索更有興趣吧。

我說過，他的被捕並非為了他是托洛次基主義者，乃因他的抗日工作。這工作原是他的長兄擔任的，負責着一個報告日偽經濟情況的秘密電台。可是一經被捕，日憲兵在他家中搜出了大批托派文獻，「罪

名」便改變了，案情也為之嚴重了。特務給他上了種種毒刑，要他招供托派機關，他雖被摧殘得遍體鱗傷，卻終於不屈，最後便在憲兵部內被秘密處死。

陳其昌同志河南洛陽人，於1925年在北京加入中國共產黨，一直從事學生和工人的秘密革命工作。經過大革命失敗後的可怕年月，他始終擔任着黨的中上級幹部。1929年轉入托派反對派，被開除黨籍。嗣後就全身投入托派鬥爭，以1942年某月遇難於上海。其昌生前也是以賣文為生的，寫的主要是報章上的社評。北新書局出版的《青年界》雜誌上，那些有關乎國際政治的文章都出於他的手筆。亞東圖書館的小冊子中，《我賭我的生命》是他譯的，《莫斯科審判的真相》與《杜威委員會判決書》是他編譯的。此外，他還寫過一冊《中國民族大遷移問題》。在托派的機關報《鬥爭》上，他是主要的撰稿者之一，差不多所有關於經濟的文章都是他寫的。

寒君同志大約在1945年新正病故於香港。太平洋戰爭發生，日軍攻佔了這個英國殖民地，寒君沒有可能離開，他留在那裏做工，並保持了地下的組織活動。我們曾經設法讓他回到上海來，為此國華同志還給他匯去了路費。他接到了，有信告訴我們，說他將爭取第一個機會動身。可是始終不見人到，連個消息都沒有。記不清是在1942年冬天還是在更後些時候，他的妻子發了一個信給我們，說寒君肺病嚴重，生活又陷絕境，希望我們設法資助；可是這封求援的急信最後來到我們手上時，日本已經投降，即已在1945年8月以後了。那時，我們事後才知道，距寒君死去已有大半個年頭。

我和寒君的相知比較淺，共同工作的時間也很短，而且在那個時期中，彼此關係又都不甚愉快的，因為他把我算入「老人」之內。

不過雖然如此，我體察到，而且應該在此承認，寒君是一個可貴的革命者。他的氣質較偏於實際工作，處理事務很能幹，有領導群眾鬥爭的經驗。這和他黨內工作的經歷是有關係的，他原屬於何孟雄們的一派，對工人運動很熟悉的。寒君同志對革命非常忠誠，曾入獄三年。幹工作吃得苦，有毅力，由於生活永遠和下層同志及黨外同情的工人們打成一片，深得同志們的愛護。我們中國托派中最傑出的女革命者——黎彩蓮，就是與寒君在共同工作中相愛而結婚的。不幸他們二人同居了很短時間，寒君即被國民黨特務捕去，等到後者刑滿而快要出獄的時候，彩蓮卻咯血死了。

寫到這裏，我禁不住自己要跑一段野馬，為黎彩蓮說幾句話，雖然她之逝世是在1936年，不屬於我目前敘述的這個時間內。彩蓮出生於漢口一個窮苦家庭裏，父早故，母親為人洗衣。1927年北伐軍進展到武漢，彩蓮那時還只是一個15歲的小姑娘，可是她立刻投進革命浪潮中去了，在橋口一帶做着積極的工人運動。革命失敗，她被派赴蘇聯學習，在莫斯科的孫大中，彩蓮以「美麗的小麻雀」出名的，因之不斷為一些國民黨大官們的貴介公子所追求。但她看不起他們，甚至深惡他們，終於和一個並非公子的陸某結了婚。聯共黨的派系鬥爭發展到中國學生中後，彩蓮加入了秘密的反對派。1929年她與我們一同回國，在黨內做了短期工作，與我差不多同時被開除出黨。在反對派的四派分峙中，她屬於「十月社」。反對派統一以及大破壞後，她的丈夫陸某變了節，投向南京政府。那時彩蓮正在紅十字會醫院內產子，驚聞此訊，忍痛棄子逃出了醫院，與叛變的丈夫決裂。此後的彩蓮就變得更加切實與深刻了，一面參加最艱苦的下層工作，一面又拼命研讀馬恩列托的著作。彩蓮身體單薄，生活卻過得非常之壞，「人不堪其

憂」，而彩蓮則「不改其樂」。對於「美麗的小麻雀」，人們從來是愛惜的，可是一經她迅速地成長為一個完善的革命家，人們對她的敬重就遠超過了愛意。我們簡直是以驚異目光來注意了她的成長的，因為在如此嬌弱的小軀殼中，竟會有這樣堅強宏毅的靈魂。可是，太艱苦的生活畢竟毀壞了她的健康，她發現了嚴重的肺結核症。因為窮（同志們是無一不窮），她得不到任何療養，病勢便益見其沉重。我在1935年年初（經過了四年睽違）再度見到她時，她已經失了音，經常得躺在牀上了。不過我驚奇於她精神的仍然高昂，對事業滿有信心，談笑也仍不減當年的輕鬆樂觀。我們都希望她那異常堅強的意志會克服體力的衰竭，希望她終於還能復原；至少，她的生命能維持到寒君的出獄。可是人的意志和希望終究還是戰不過自然的法則。她在1936年春夏之間的一個晚上，在供給她膳宿的那位朋友家裏，突然死了。同志們的哀思可以從獨秀當時寫給趙濟的一封信想見的。信中字句我雖不能原樣覆述，但因印象甚深，相信大致不差，他寫道：「……彩蓮的死使我很悲傷。一生中我遭遇到這樣的事已不算少；可是我從來不曾如此難受過，也許是我老了……」不，我不以為獨秀「老了」才如此地感傷，我們這些年輕人都一樣難過的。堅貞的同志的摧折總會使人難受，而堅貞的女同志的損失尤其令人悲悼，因為歷史的條件使然，迄今女戰士一般地比男戰士少些，也因此更珍貴些，她們的犧牲或摧折更扣人心弦些。

彩蓮的後事由國華同志料理，她的棺木掩埋在上海梵皇渡鐵路附近的義塚裏。寒君的遺骸據說葬在香港柴灣，現在當然也已淹沒無蹤了。革命者大多數是「死無葬身之地」的，有如我們被日帝殺害的「大哥」，在西伯利亞被消滅的一二百名中國反對派。彩蓮、寒君能得後死

的同志們代為掩埋，算來已屬「奢侈」了。我們自不必為這等事感傷，因為他們都會活在同志們的心坎裏，而這個心的墳墓，比任何永固的墳墓更為永固。

以上各位並非中國托派在該一時期內所有的犧牲者。不，他們僅僅是其中一小部分。在國民黨統治區，中國托洛次基主義者繼續受着殘酷的迫害。不少人被捕，還有一些同志喪命在息烽的集中營裏（其中有在 1934 年間參加過中央領導的王耀華）^[4]。在中共統治區內，一些自動前去參加工作的托派（例如王實味等）^[5]遭到了無情鬥爭，並最後被殺害了。像這樣因忠於自己的思想而遇難的，為數甚多，可惜我這裏無法一一介紹。上舉諸人及其事蹟的簡略敘述，只是想讓人看到在那些年月中，中國托洛次基主義者艱苦生活的一斑罷了。

注釋

1. 王凡西和鄭超麟得到通知：「你們願意參加，就來參加！」可是並未說明是什麼性質的會議。開會後，彭述之方宣佈為繼承 1931 年統一大會的中國托派「第二次全國大會」。如果是先宣佈了，王凡西和鄭超麟就會以第一次大會選出的中央委員的身份去參加的。——校者注
2. 被舉為新中委的蔣振東、毛鴻鑑二人，不久卻轉變為「少數派」。
3. 陳其昌被日本憲兵捕去犧牲，並非在獨秀死去一年，而是在獨秀死去不久。——校者注
4. 王耀華不是死於息烽，而是死於臨解放時重慶的中美合作所。——校者注
5. 這裏談到王實味的這一句話，出乎我意料之外，竟給中共對王實味的平反帶來了麻煩。為此，我曾於 1985 年在香港的《九十年代》雜誌上發表一篇文章：〈談王實味與「王實味案」〉，回紮了大量事實之後，我寫道：「這句話說得不甚確切……王實味與陳其昌和我有過長期較密切的關係，雖然他思想上受過托洛次基某些意見（特別是文學方面的見解）的影響；但他始終不曾參加過中國托派的組織。我們可以說王實味曾經是托派的同情者卻不能說他是托派分子」。我的這個聲明，據說曾經有助於王實味的最後平反。—— 1993 年 8 月注

十二、在戰爭與革命的日子裏

1945年8月日帝投降，淪陷區的民眾霎時間激動起來。此種由長期蟄伏而突然活躍的群眾轉變，在我一生中可說還是僅見。我沒有趕上辛亥革命，卻自始至終參加了自1925年延及1927年的所謂「第二次革命」。我在滬杭看見了「五卅」，在北京參加了「三·一八」，在廣州我目睹了省港工人的偉業，在武漢也曾為那個革命中心跑過龍套。但是在那些時候，若就群眾心理的過程說，其速度與範圍，總似不及日帝投降後發生於淪陷區民眾的那麼飛躍與廣泛。8月15日日帝宣佈無條件投降，人們心理之由消沉死寂轉而為活潑希望，完成於一夕之間，而由活潑希望轉成為對統治者的憤懣不平，也是以快速的躡等姿態完成了的。我們從抗戰開始時候起，就深信戰爭中尤其戰爭直後必然要發生革命（戰爭乃革命之母）。所以在我們和獨秀之間，甚至和「多數派」之間關於一個遠景的不同估計，便是我們有着這樣的信念：不但要準備革命，更加要為革命的來臨而準備。雖然如此，一俟「革命迫人來」的時候，我們仍覺得是沒有準備的。組織上固然如此，甚至思想上都有點這樣。

群眾發酵，卻沒有一個組織堅強與思想正確的革命黨來將他們焙成餅或釀成酒。事情正是這樣。當時中共在東南諸大城市裏並沒有組

織，各個「民主黨派」也只掛了幾塊招牌。就革命領導說是個半真空。在那個時候，如果中國托派擁有數百，最好能有數千名基幹的組織，我相信能起來填補這個真空。如果填補了的話，則當中共跟着進來爭奪領導時，我們也不一定會棄甲曳兵而敗的。如此，則自1945年至1949年初的「國民黨統治區」中的政治情勢，至少會以不同的面貌留在歷史上了吧——如果終於仍舊讓中共的軍事力量征服了全中國的話。

任何人任何樣式的後悔都是頂無出息的。我們如果怎樣怎樣，便能如何如何的冥想，當然有損無益；但若當個教訓來了解，亦未嘗無若干價值。何況我現在寫的是個人的回憶，回憶中自有權利去作此種追溯的。近幾年來每當我想起那一時期時，總覺得中國的二派托洛次基主義者當時不曾切實地做過再統一的嘗試是很大的不幸。當時二派的人數都很少，合起來雖然不一定大有作為，但分裂行事畢竟是更不起作用。其實戰爭過去，關於蘇聯性質的爭論還未發生，此時在重大的原則上並無非分裂不可之點，再統一的基礎是存在的。群眾有此要求，客觀的工作有此需要；但小組織形成後所必存的排他性卻妨礙着雙方的領導者（我絕不想將自己除外）去鄭重考慮這個可能。當然，在此地我仍必須指出：以彭劉為首的多數的與正統的觀念，以及他們迅速造成的所謂「嚴肅的組織路線」（包括領袖權威的人為樹立，派別界限的絕對不准逾越——例如屬於「多數」的同志如與「少數」方面談話，須得事先批准與事後報告。）主要地妨礙了當時再統一的嘗試和實現。如果我們記得，彭述之對1931年的四派統一始終採取了反對態度，那末1945-46年他不願見二派之復合，乃是毫不奇怪的。

不過微弱的托派雖然分裂為兩個更微弱的小派，對於當時的群眾運動還是能夠參與並且發生了作用的。我們的力量很快增長，影響因而擴大。這主要因為當時中國的政治局勢，客觀上有利於我們的立

場。八年抗戰，人們受夠了痛苦，他們不願再見戰爭，他們渴望和平生活。可是「勝利了的」國民黨卻拼命準備一次反共的全面內戰。戰爭打起來，整個國家陷於經濟的嚴重危機與崩潰。結果，國民黨控制下的人民，特別是其中的學生與勞動群眾，在「反內戰」、「反獨裁」與「反飢餓」三大口號之下，憤怒地站起來聲討國民黨政府。這個口號完全與中國托派的革命民主政綱相吻合。為了這個政綱的實現，中國托派已經鬥爭一二十年了。在抗戰「勝利」初期，我們（《國際主義者》）便利用了一點社會關係，在由今天擔任着中國政府駐倫敦代辦宦鄉所編輯的報紙——《前線日報》上，獲得了一個副刊地位。一切能動筆的朋友全動員了，每天給這報紙寫些戰鬥性的小品文。影響不能說沒有。這對於戰後上海學生和工人的激發上，多少也起了一點酵素作用。可惜這副刊只延長了一兩個月，國民黨的社會局便出來干涉了。他們最初對副刊的主編者——一位在政見上並不同意我們，卻極富有革命正義感的民主人士——施加壓力，無效；進而向報紙的大老闆願祝同說話，於是那個戰鬥性的副刊被迫改換作風，主編為此辭了職。

此時我們已不再繼續油印的機關報《國際主義者》。在各種各式的期刊像雨後春筍似的發行中，我們決定出版一種鉛印的可以公開發行的報紙。我們的《新旗》便於1946年6月問世了。這是一本十六開16頁的半月期刊。由於執筆的人數少，我們又不願延誤出版期限，超麟和我便負起了主要責任。那時期的工作相當緊張。《新旗》出版到第16期遭到了國民黨政府的明令禁止，報攤不敢為我們出售，印刷也成了問題；可是我們不願放棄，決定用其他方法來繼續，自己建立一個小型印刷工廠（比以前印《鬥爭》的卻要大得多），由自己的同志來排印。此種較不漂亮的，手工印刷的《新旗》，一直出到第22期。第16期以後的《新旗》不能按時與經常出版，為了印刷困難之故。那時我們遂

將出版的重心移到書籍上。出版「新旗叢書」。記得已出的有超麟譯作的《不斷革命論》、《不斷革命論 ABC》，以及他翻譯的簡本《托洛次基自傳》。我則校譯了托洛次基寫過的所有關於中國革命的論文和書信，名為《中國革命問題》。關於叢書出版的經濟與技術方面，照例由國華籌募和辦理，他當時又在汪孟鄒先生的幫助下，影印了托洛次基的《俄國革命史》。

在同一時期內，「多數派」也出版了期刊。先出一種學術性的雜誌《求真》，後又發行了《青年與婦女》，復改名為《新聲》。這兩種雜誌也有影響，特別在一些知識青年中。它們與《新旗》不同的不是在基本思想上，而是在編輯方針和批評態度上。為了竭力維護刊物的合法性與公開性，它們說話就含糊得多，並且把批評的最大火力射向了中共。

組織工作那時也相當開展。這一小半由於戰爭過後舊同志的散而復合，一大半則是文字宣傳在群眾運動高漲中的新收穫，不少老朋友回到了上海，其中有我十五年前在蘇州監獄中分了手的何資深。他這次帶了獨秀的遺稿來出版：《小學識字課本》（這是獨秀費了許多年心血完成的一部文字學著作）已說妥由商務印書館印行；《最後論文與書信集》則由朋友們集資自印。散處在四川、雲南、廣西等省的老朋友們，此時有的來滬作短期逗留，與我們重建了關係，有的則恢復了通訊。他們都是此時才知道中國托派已再度分裂，難免有些惶惑的。他們多數希望能統一，與雙方談話，藉以探測分歧的深度與重合的可能。結果如事實所示，復合至少在短期內並不可能，於是他們只好和二派之一締結了聯繫。「老人」中除了尹寬「騎牆」之外，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加入了「少數派」。

我們在戰後所做的文字工作，與一些年輕的革命者「結了緣」，《新旗》每期印2,000份，由報攤售出的約有二三百份。（這數目並不經常，因為史大林派的作怪和國民黨特務的迫害，在明令被禁前，有一期只賣出了六十餘份。）賣不脫的卻都設法送出去了。因此在識與不識的群眾中，它總算起了不小作用。上海有一個名叫「翌社」的青年團體，成立於抗戰時期，主要成員為大學生、中小學教員，商店以及工廠的職員，還有較少數的手藝人和工人。這個團體表面是學術性的聯誼組織，實則還有抗日的政治目的。領導諸人的政治思想最初傾向於中共，後來，由於私人的接觸，個別地轉向了托派。待到抗戰勝利，《新旗》出版以後，差不多整個組織跟我們接近了。「翌社」朋友和我們的年輕同志經常生活在一起，成立了「筆談會」，經常出版一種油印的筆談彙錄，讓青年人自由交換意見，討論問題。這個筆談會後來便改組為我們的「馬克思主義青年團」。當「勝利」以後，「解放」以前上海學生中掀起的多次「反內戰」、「反飢餓」大運動，我們這些年輕朋友及其組織，曾貢獻了不小的推動力。

同樣的發展與同樣的工作，也曾在「多數派」中發生着與進行着。他們的情形我不大清楚，據當時某些同志的描寫，他們的群眾活動似乎更多採取了史大林派所提倡的文藝活動方式。

隨着組織的相當開展，「建黨」思想在托派的兩部分中同時進展着。我說過，當時雙方的領導層都沒有再統一的願望和決心，因之不管許多同志有此種「調和傾向」，中國的托洛次基主義者還是大踏步地從二派走向了二黨。「多數派」的領導者們簡直是以勝利者的神氣從事於建黨大業的。他們在1948年8月召開了全國代表大會，選舉了領導機關，通過了彭述之起草的綱領，名其黨曰「中國革命共產黨」。我們

這方面也積極地籌備着，在 1949 年 4 月二十七、八日，舉行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有關組織與政治問題的諸決議，產生了領導機關（共 5 人：超麟，資深，林煥華，原屬「翌社」的俞碩遺同志和我）^[1]。我們的黨名決定為：「中國國際主義工人黨」。其實我們的黨員是很少的，我記得，此時集中在上海的大概是 64 名，全國同志統算在內，不過一百餘人。「多數派」大約比我們多一點，但即使多也多不了很多。二黨合計的人數，不過 1931 年統一大會時的一半，甚至還不足 1929 年莫斯科中國學生反對派的數字。但雖如此，到那時為止存在了二十個整年的中國托洛次基主義者，在經歷了重重摧折之後，總算是走上了復興的機運。如果這種革命前的群眾運動局勢不為中共的軍事勝利迅速打斷與控制，那末假以時日，第四國際中國支部可能已成為一個堅強的政治力量了。

不幸，事情並不依照了我們的最佳願望來發展。

國民黨政權從戰爭中出來，比戰前更加腐敗了，這情形原本是誰都知道的。當時圍繞在國民黨周圍的統治階級，早已變成一個投機家、走私客、寄生蟲與搶劫者的龐大集團。它幾乎脫離了乃至敵對着中國社會中其他所有階級。但是，這個政權究竟腐敗與孤立到什麼程度，卻還是不完全清楚的。在美國帝國主義的扶持之下，它表面上依然強大。只當它後來在內戰的真實測驗中，國民黨這座威風凜凜的巍峩建築，才被證明是全部已經讓白蟻給蛀空了的大廈。這幢大廈傾倒之速，不僅震驚了蔣介石集團及其華盛頓的主子，而且出乎史大林的意外。在某一程度內，它甚至還不曾為毛澤東所料及的。我們中國托派，不用說，也是未曾料到的。

如此，在 1948 年年底，當解放軍在徐蚌戰役中取得輝煌勝利，大軍直迫南京之時，彭述之在他那一派的緊急大會上仍舊堅持說中國的史大林派不能與不願在全國範圍內取得勝利——雖然與此同時，他和他的追隨者們決定將他們的中央委員會與一些領導人員立即撤退到香港。

我們的全國代表大會舉行之時，中共軍隊業已渡過長江，南京也已解放，陳毅的軍隊正沿京滬路而下，直指上海。那時候，中共之是否能夠勝利，早已不是理論的猜測，而是事實問題了。我們的大會是面對了這個事實而舉行的，所以無論政治或組織問題，都以中共的勝利作為考慮和佈置的出發點。政治方面的詳細見解，因為我有關的文件都已在香港的不幸事件中損失了，現在無法記憶出來。我只記得我們沒有提出黨綱，只起草和通過了一個《關於黨綱的決議》（那是超麟寫的），上面確定了我們所信奉的馬列以及托洛次基給我們遺留下來的一些有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的基本立場。至於由此等立場引伸的關於現時代較現實的政治問題，並不每一個都確定了立場，那個決議只提出多少指示，作為未來黨綱起草委員會的依據。政治決議案是由我起草的，可是詳盡內容，沒有文件幫助，不能憑空記出來了。俞碩遺同志起草的組織決議案，特別提到了我們與「多數派」分裂的教訓，即規定了在民主集中制的正確應用下，黨內同志可以持有不同意見，為了不同意見可以有派。少數派在行動上必須服從多數，多數則必須尊重少數的權利。這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文獻中，首次正式地規定了這個真正符合於馬列主義的組織原則，那次大會上討論得最多與最迫切的，乃是在中共統治下如何工作的問題。會議決定了組織不撤退。我們並非對中共的「寬容」存有幻想，也並非看不到中共那種群眾性的特務制度將會很容易破滅我們的組織。會議所以如此決定，由於這樣一個簡單信念：為了在工人階級中長留影響，一個革命黨應

該在行動中被撲滅，而不該未經接觸而先行逃避。這個信念之確立，首先自應歸功於許多同志的堅強戰意，不是任何一個人的主張所能促成；但我仍必須指出超麟在此事上所起的示範作用。這個人，即使不計及其他的優點，僅憑他彼得使徒式的殉道精神，已足以在革命史上永垂不朽。在我們決定此一問題之時，情形確有幾分像在尼羅王迫害下的原始基督徒。留在「羅馬」呢，還是逃向安全地？這確是一個大問題。大家都在考慮它，為它煩擾，有些人為了一己的命運，有些人則更多地想到了全組織的未來；可是超麟同志卻彷彿想得很少，他不待「天空的聲音」向他詢問：「你往何處去？」他早就下了決心留在「羅馬」了。

當然，我們那時的態度決不是「集體自殺」。在那個根本態度決定以後，我們便進一步地考慮了並且規劃了今後工作的方法。這方法簡略說，就是切斷橫的關係，以不相聞問的小單位獨立行動，同時將各單位的整個聯繫放在安全地方。我便是為了執行這個聯繫任務而受命離開上海的。所以按理說我不是逃兵，可是在整個「聖彼得精神」的感染下，我得承認，我並非不帶了愧怍心情而走向「安全」的。

事情的發展往往推翻了人的安排，我們那次的工作安排更是被推翻得迅速而且殘酷。在「安全」地帶的我，四個月之後便發生了事故；在那裏遭受了短期拘禁，便被迫離開了。而留在「羅馬」的同志們的命運卻一直延長到了1952年12月21日的深夜裏。

自從1949年5月下旬中共軍進入上海起，一直到1952年12月底，足足三年有半。在這時期中，我們的組織做了不少事情。年輕的朋友們還出版了油印的《新方向》，對新政權的種種作了應有的批判和鞭策。我們中間有很多同志參加了土改，原在工廠裏的同志領導了鬥

爭，在不少地方被群眾推為領袖、由於他們維護工人階級利益的立場堅定，又因為他們有過較長久的馬列主義和托洛次基主義的教育。這期間當然也有一些人在中共的勝利前面目眩，於是公然或秘密地放棄自己意見，向中共投降。這些人的轉向，曾經從 1950 年年初起給組織帶來了多次的破壞（這情形特別發生於上海與溫州）。那幾次的事務中，也曾有人遇了害的，譬如溫州的連正炎同志，以及廣西的一兩個早就與托派無關的過去同志，竟被以反革命罪名處死。不過一般說，中共當時似乎還不曾下大決心來消滅我們。有些關係他們明明知道而不動手；對某些同志他們甚至還間接地人予以聯絡（中共此種的內部情形與真實動機，我們始終不曾清楚）。因此，在那三年有半的不短時間內，我們的人數有了增加，我們的影響不斷在擴大。正因為這點增加和擴大，使得中共的特務機關不得不在 1952 年 12 月採取了那次全國逮捕托派的大行動。那次行動株連的人非常之多，只因此後我始終沒有可能與任何同志發生聯繫，故當時究竟有多少人被特務送進了牢獄，我們無法估計。就我個人的關係說，那種株連的方式是非常可怕的。我的兩個姪兒和一個內弟，除了看過一些我們的出版物之外，與托派並無任何組織關係，卻都於那一個黑暗的深夜裏同時被捕。更可痛心的，甚至他們的某幾個朋友，連《新旗》讀者的資格都不曾具備，卻也讓那隻大網給網進去了。我那個根本與政治無關的妻也受了短期拘禁……

如此大規模的一次拘捕行動，始終不曾公開出來。一切均保持在嚴格的秘密中。此事發生至今已過了四年有半，可是我們的同志不曾得到過一次公開的、多少按照點法理模樣的審訊。他們自然沒有釋放，被關在監獄裏，或受着勞改，或者竟已被槍決了。他們的被捕、

被押或被殺，自然都是為了那個「反革命」的罪名；他們被迫與真正的反革命犯，與普通的刑事犯過着一樣的、多半還要不堪的生活，受着更加難堪的精神虐待。可是我必須在任何一個機會替他們聲明：他們是絕對不該受此種待遇的，他們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他們都是將一生的寶貴年月獻給了工人階級的解放利益的。中共不敢將他們作公開的審判，顯然因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與李維漢等深深知道他們的「往日的朋友」，一旦把他們清白而革命的生平公開出來，會獲得中國工人階級與一切革命者的同情！

中共勝利所及於中國托派的最直接的一個結果，乃是思想生活的開展和激盪。在1949年年終與1950年年初，標誌了中國托派內部思想生活的一次高漲，差不多每一個同志都在思考問題，整個第四國際都進入討論和研究的熱烈心情中了。超麟在上海，我在華南的一個海隅，差不多同時研究了一些有關史大林主義、蘇聯性質、中共勝利原因及其新建國家性質等問題；並且各自用文字記錄下來，作為同志進一步討論的參考。「多數派」或中國革命共產黨中的情形也是一樣。內部的思想生活沸騰起來，許多人寫了文章，而首先出版的，則有劉家良的《中國的現狀與前途》。後來，大約一兩年後，彭述之寫了他對國際所作的長報告。

自從寫下這些思想記錄，到現在又度過了六個多年頭。其間中國和國際都發生了多彩與複雜的大小事件。究竟我們各人所寫下的意見，在事件的證驗下站住了多少，被駁斥了多少，又該作一次深刻與全面的檢討了。趁這回憶的機會，我將在下一章裏記下它的一些結論。

注釋

1. 國際主義工人黨選出的領導，除書中所舉 5 人外，尚有廣西麥俊奇同志和在
香港的羅新同志。——校者注

十三、在寂寞中思索

寫這幾行文字的時候，我正 50 歲。在中國大門外的一個小島上蟄居，也已過了整整八年。有的是空閒，有的是思索的機會。幾年來為了生活，我曾將大部分時間耗費在戲劇的寫作上。不過沒有因此改了行。我始終注視着世界上發生的變動，特別注意在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的變動。自從 1952 年 12 月 21 日我在國內的同志們悉數被中共捕禁以後，我不再能有什麼積極的政治活動，但思索是不曾停止的。在絕對孤獨的情形中，思想生活反而更加緊張起來。可惜的是：生活的擠迫使我不能在這方面作廣泛與深入的研究。也不曾有機會將所有思想過的事物，統統記錄下來。

在這裏，當然不適於做此種記錄工作。不過當作感想，多少應該在這裏做個交代。

阿 Q 精神要不得，尤其對革命者而言。不過自來革命者卻最易犯這個毛病。真正的革命者需要百折不撓的堅韌，需要對自己的事業有無限信心。正為此故，往往不肯認識別人的勝利，不願承認自己的失敗。這個精神原極可貴，它與卓絕的革命性不可分離。但若超過限度，盲目保護自己的信心，因之將他人勝利的事實說成失敗，以自己的失敗當作勝利，那便是最要不得的阿 Q 精神。這種精神對革命者其

實是有害無益的。因為事實終究是事實，不管你承認不承認，它早晚要和你碰頭。盲目的否定會叫你碰得焦頭爛額，終而致於卸甲丟盔，向無情的事實作無條件的投降。

真正的革命者的信心應該建立在對事實的清醒認識上，建立在對勝利和失敗的冷靜的理解上。只有建築在正確的認識和理解上的熱情，才是可靠而持久的。任何人的熱情都是如此，革命者的熱情更是如此。

認識別人的勝利不等於投降，確認自己的失敗不等於灰心。因為人世間的一切鬥爭，特別是現社會中複雜而慘烈的階級鬥爭，乃是一個勝利和失敗不斷更迭的過程。它不是坦平筆直的，而是嶇崎起伏的。不通過失敗不會達到勝利，不領受過失敗教訓根本就不會勝利。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這兩句被毛澤東徵引過的老子的話，我們也可以借來看史成托敗，人勝我負的這一個事象。

禍福無定，能理解者便屬有福。托洛次基最喜徵引的那句斯賓諾莎的名言：「不要哭，不要笑，但要理解。」含義正同。

* * *

我在上面說過，中國托派在 1949 年年終到 1950 年年初這段時間內，經歷了一次緊張的思想生活。當時發生在國內的種種，實在太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了：中共從來執行的政策，我們深信是錯誤的；托派一貫堅持的戰略，我們相信是正確的；可是到頭來，取得勝利的反而是中共而非托派，這到底是什麼回事？這個問題苦惱着每一個托洛次基主義者。苦惱驅使我們深思，它驅使我們在新事變的光照之下，去重新考慮我們某些基本的立場和信念。在非常紛亂與熱烈的氣

氛中，我企圖從蘇聯和史大林主義的性質着手，去了解中共勝利的原因。結果寫成了一個提綱和一篇長文，合印一小冊，題名《蘇聯研究》。在那本書裏，我認為蘇聯已經變成一個官僚集產主義的國家，史大林主義的政黨則是官僚集產主義的政黨。因此，我認為中共的勝利只是一個集產主義的官僚政黨的勝利，它決不代表中國無產階級政黨及其革命的勝利。

這個新立場，我覺得，對於蘇聯與史大林黨的許多現象，尤其對於中共何以能夠勝利這個事實，確給我們提供了不少解釋上的便利。跟着我便從這個立場出發，企圖規劃出對中共應該採取的某些具體態度與步驟。當我這樣做的時候，卻逐漸地又發覺到，這個新立場在理論上雖然幫助我們解開一些思想上的結，但若應用之於政治實踐，卻顯得頗不相宜。於是我又從政治領域走回到社會學的領域來，從實踐性的思考再回到純理論的探索，終於我又肯定：關於蘇聯與史大林主義的認識，在目前流行於第四國際內外的諸般學說中，最站得穩，因之最符合於社會主義革命利益的，還得數托洛次基的舊立場。

關於我那一次思想探索的詳細歷程，當然無法在這裏敘述。此項工作，只好俟之異日^[1]。

在這裏，我只想簡單討論兩個問題：1、中共的階級性質；2、一般史大林主義政黨的歷史作用。所以要先來討論它們，因為中國托洛次基主義者在1949年前後所作的種種錯誤分析，完全導源於他們對此二問題所採取的特殊立場。

好多年來，中國托派中流行着一個見解，即是說中國共產黨是代表小資產階級的。何所據而云然？大家都彷彿沒有鄭重考慮過。簡單視之為當然而已。因為，彷彿事實擺在面前：中共完全退出了城市，

長期存在於農村中，其成分幾乎百分之百是農民與少數知識分子，其主張則偏向於階級合作和勞資兩利。

究竟是誰最先提出這樣的看法呢？無從查考。彭述之於1951年11月向第四國際書記處提出報告，把這個看法的首倡者說成是托洛次基。他說「托洛次基不斷指出中共已逐漸從一個工人政黨墮落成農民政黨」。但是這個說法並無根據。彭所引證的托洛次基寫給中國左派反對派的信（〈中國的農民戰爭與無產階級〉），根本不曾說過中共「已逐漸從一個工人政黨墮落成農民政黨」的話。他在信中只指出了中共內部兩個派別之間鬥爭的可能結果。他說：如果在由史大林派的農民軍隊與由列寧派所領導的無產階級先鋒隊之間發生了內戰，那末「左派反對派與史大林派將不再是兩個共產主義的派別，而已成為敵對的兩個政黨了——各自具有不同的階級基礎」。但是做了這一個理論假設之後，托洛次基立即問道：這是一個不可避免的前途嗎？「不」，他斬釘截鐵地回答說：「我完全不那麼想。在史大林派（即正式的中國共產黨）內部不僅僅有農民的，即小資產階級的傾向，也還有無產階級的傾向。」

由此可見把中共說成是小資產階級政黨這個見解，不能推在托洛次基身上。

何況托洛次基這封信寫於1932年9月22日，離開他決定號召組織新共產黨與新國際之期尚約有整整一年。當我們還自居於中共內部一派之時，托洛次基怎麼能聲稱這個黨已經由工人黨墮落成農民黨呢？

不過無論如何，正是這一個不知不覺間形成了的有關中共階級性的錯誤估計，在很大限度內，決定了我們在1949年前後我們對中共勝利的看法。既然斷定中共是一個小資產階級政黨，那末我們為自己看法的邏輯所驅使，必然要達到這樣的結論：這個黨決不能領導一次

真正的革命，更不能領導它取得勝利。因為依照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論點，特別是根據由托洛次基發展了的不斷革命論的立場，在目前這個時代，在落後國家，莫說為了走向社會主義，便是為要解決資產階級的革命民主任務，也必須在無產階級及其革命黨的領導之下，實行徹底革命，才有可能。因此在 1946 年至 49 年國共兩黨進行內戰時期，我們雖然衷心支持中共一邊，竭力要使它贏得勝利，但同時我們卻總認為，由小資產階級政黨領導的農民軍隊是無法勝利的；即使勝利了也一定會陷於死巷之中——有如中國歷史上一再出現的農民起義的勝利一樣。後來，事實證明，中共所領導的農民軍隊正在內戰中取得勝利，我們便說，這個軍隊勝利不將等於革命勝利。再後來，勝利了的中共證明出它能確保勝利，還能加深勝利，並且能從事於國家在經濟與政治方面的深刻改變，這時候，我們便覺得若要堅持不斷革命論的基本立場，就無法同時保持對中共階級性的原來看法。因為中共的勝利極其尖銳地向我們提出了這樣一個抉擇：或者我們承認，在目前，即在二十世紀的四十年代，在中國那樣的國家裏，一個小資產階級的政黨仍有可能領導一次深刻的社會革命而使其成功，這也等於承認不斷革命論至少不適用於中國的特殊情形；或者，我們改變對中共階級性的看法，承認它至少在某種程度內確實還是一個代表無產階級歷史利益的黨，因而在某一意義內，我們承認中共的勝利代表着革命的勝利，中國革命的經過並不構成不斷革命論的例外。

對於這樣一個抉擇，超麟與我是痛切地感覺到的，因此我們努力去解答面臨的問題。彭述之和他的一些追隨者則根本不曾體察到這個問題的存在。不斷革命論的基本立場與中共乃小資產階級政黨這個看法，在中共領導革命勝利的事實面前，對他們說來，根本不曾產生任何矛盾。在很長一個時期內，即一直在 1951 年 11 月以前，彭述之始

終肯定北京新政權「實際上便是建築在依靠農民武裝的小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妥協基礎上的，一種赤裸裸的巴拿帕脫的軍事獨裁」，並且說「此種獨裁政權，不論將來再經過什麼『人民代表大會』的偽裝，其資產階級的性質是決不會改變的。」彭述之的這個見解，乃是簡單拒絕承認中共的勝利所代表的社會革命的意義，以此非常輕易地回避了不斷革命論與我們對中共所作階級性看法之間的矛盾。但是回避絕不等於解決，而中國當時發生着的連串事變，迫得你去解決不可。因為北京新政府不是一個「小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赤裸裸的巴拿帕脫軍事獨裁」，在事實上愈來愈清楚。終於，彭述之覺得有重新考慮的必要了。於是在1952年5月間，他突然宣佈「在過去兩年餘的時間內，中共內部的工人黨員已經增加，它的工人階級方向業已加強……」（見彭述之〈寫給第四國際書記處的報告的幾點補充與修正〉）。因此，中共這個小資產階級政黨變成工人政黨了，北京這個「赤裸裸的巴拿帕脫軍事獨裁」也就變成畸形的工人國家了。

如此這般來解決矛盾，其實只是添加了矛盾。例如：一個以武裝鬥爭推翻了資產階級政權，從而建立了另一個資產階級巴拿帕脫軍事獨裁的那個小資產階級政黨，為什麼會在兩年餘的時間內自動增加其工人黨員，自動加強其工人階級傾向？一個增加了工人黨員並加強了工人階級傾向的政黨，為什麼便可以從小資產階級政黨變成工人階級政黨？再如，一個資產階級的軍事獨裁政權，如何可以因執政黨內工人黨員的增加與工人階級傾向的加強而和平地變成為任何類型的工人國家？諸如此類的問題，彭述之及其追隨者們卻從來不去思索，因而從來不曾給我們解答。

我們當然不會如此對待歷史給我們提出來的重大問題。我們，主要是超麟與我，首先認為，過去把中共看成小資產階級農民政黨是

錯了。我們必須放棄這個舊公式。因為事實已很清楚證明，無論就鬥爭的規模，就它所發揮的力量，就它帶來的成果以及它所表露出來的動搖舊制度的那份決心來說，中國當時發生的革命，決非一個小資產階級政黨所能領導的。在近代歷史上，我們只看見過一個無產階級的政黨，在俄國十月革命中曾經發揮過類似而更大的力量，完成過類似而更為深刻的社會變革。可是同時我們又覺得，如果從革命路線的一貫性，從領導者對工人階級以及全體勞動者所採取的態度（那種控制與調唆而絕非依靠與信賴的態度）來看，中共決非像俄國布爾雪維克黨一樣的無產階級政黨。然則，既非小資產階級政黨，又非無產階級政黨，中共到底是代表哪一個階級的政黨呢？我們研究的結果，認為它是代表着一個全新階級的利益的政黨。這個新階級超麟稱之為國家資產階級，我則名之曰集產主義的官僚階級。依我們之見，這些階級之所以出現，乃是世界革命的連串失敗與資本制度過度成熟的結果。因此它們是反動的，但是強大的。它們與小資產階級不同，不僅具有推翻資產階級的力量，並且還有實行社會變革的力量，同時它們卻又與無產階級不同，這兩個新階級不能使這些變革循社會主義的方向前進，充其量只能建立起一個國家資本主義的或官僚集產主義的政制。

就這樣，鄭超麟與我，把我們一向對中共階級性所作的舊看法^[2]，進一步地發展了。

我在上面說過，這個新看法我保持得並不長久（超麟在這方面後來是否也有所改變，因他被捕入獄，不能確知）。在迅速發展的新事變的印證下，在政治實踐的驅策下，我終於放棄了官僚集產主義的說法，承認中共在某種程度內仍不失為一個代表工人階級的黨。這樣做，不管是正確還是錯誤，我們在企圖解決上述那個抉擇時，卻始終是合乎邏輯的，是鄭重地經過思考而不含有任何其他考慮的。

彭述之的情形與我們恰恰相反。他唯一關心的不是要在明顯的矛盾（舊看法與新事實之間的矛盾）中去求得正確的解決；而是要在這個矛盾中竭力保持自己的「一貫正確」。因此他的努力顯得支離破碎，窮促狼狽，絲毫不曾堂皇地做出什麼交代，其成果也就無教益可言^[3]。

其實，中國與國際的托洛次基主義者如果真想從過去學到點東西，以免將來重蹈覆轍，必須老老實實承認我們從三十年代中期以來對中共階級性看法的錯誤，並仔細研究所以錯誤的緣故。

在本世紀三十年代中期，當我們最初宣佈中共已墮落為小資產階級政黨之時，原是有充分理由的。它從城市撤退到了鄉村，它的成員幾乎全部來自農民。自從1937年開始，它在聯合抗日的名義下投降了國民黨：宣佈信仰三民主義，願意改編紅軍為國民黨軍隊，並答應放棄階級鬥爭政策。這些事實，就其本身說，無疑具有決定性意義，足以構成我們對中共指責的根據。因為一個政黨既然和工人階級完全脫離，離開了主戰場並且放棄了它的革命政綱，它自然不再有資格稱為工人階級的政黨。

後來我們之所以會在這個問題上犯錯誤，乃因我們一經確定了這個看法之後，卻從來不再拿它來和發展中的真實加以核對。我們只留心一切利於證實我們看法的新事實；卻不願考慮不符合於我們看法的另一些事實。

現在，如果我們回顧當時情形，至少有四個事實顯然是為我們所忽視了的。第一，中共之從城市撤退到鄉村，既非自願，亦非有意，它主要是國民黨瘋狂鎮壓與迫害的結果，因此，不能拿來當作它改取新戰略（即以農民戰爭代替無產階級革命）的證據。第二，當中共撤退到農村之後，無論在言論上或實踐上，都不曾放棄它「由無產階級

領導革命聯合戰線」的綱領。第三，在 1937 年中共與國民黨實行第二次合作之後，中共確實放棄了階級鬥爭，取消土地革命，並且服從蔣介石的領導——當此具有決定意義的緊要關頭，我們斥之為最後的投降，那是完全有理由的。但是，由於一系列客觀和主觀的因素（其中很重要的一個主觀因素是中共內部繼續存在着反對史大林投降政策的一些傾向），中共這條退讓路線並未引伸到它合乎邏輯的結論。在大體上，這種退讓只限於策略性的縱橫捭闔，卻未達到改變戰略方向的程度。第四、不論在「蘇維埃與紅軍」時期，或者在「聯合戰線與八路軍」時期，中共始終保持其為一個紀律嚴明的革命家組織；它的黨員與兵士的徵集，也始終照顧到階級標準。上述種種情況、如果我們中國托派曾經密切注意，經常拿這些事變發展來核對我們對中共的看法，那末我們便不致於無法理解中共勝利的真正意義；當我們決定自己立場與採取行動之時，也一定會少犯一些錯誤了。

關於如何決定一個政黨的階級性質這個問題，列寧曾經說過如下的一段話。那是在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上說的，當時討論英國共產黨應否加入工黨的問題。列寧說：「當然，工黨的大多數黨員是工人。但是，一個黨是不是真正的工人政黨，不僅要看它黨員的工人成分，而也要看領導這個政黨的是些什麼人，也要看它的行動及其政策的內容如何。只有看了後舉兩種情形，我們才能決定究竟我們所面對的可真的是一個無產階級政黨。從這個唯一正確的觀點來看工黨，它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資產階級政黨……」（見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上所作為有關加入英國工黨的演說。）

依照列寧的方法，我們中國托洛次基主義者為要確定中共的階級性質，原該多多注意那些領導中共的人，密切注意中共領導中各個派系（特別是毛派與王明派）之間的鬥爭，並且不懈地分析它的「行動

與政策的內容」。如果我們曾經這樣做的話，我想，我們對於中共的估價早該有個不同的看法，我們會承認它在時大時小的限度內始終還是保持了工人階級傾向的一個政黨。雖然，它是以非常醜陋與奇異的方式來保持的，它是異常可怕地官僚化與特務化了的，其成分由小資產階級佔絕大多數，其理論則常常表現為對馬克思主義之政客式的曲解與玩弄。

只因我們當時對中共未曾作過這樣全面的理解與認識，以致我們在四十年代及新政權建立直後對中共所作批評，會顯得如此的不濟。

除了對中共階級性的錯誤判斷之外，我覺得，我們從來對於一般史大林主義的歷史作用及其性質的了解，也促成了我們在中共勝利面前所感到的思想混亂與狼狽。

自從發起第四國際（1933年）以來，我們對於整個第三國際及其所屬諸黨，有這樣一個傳統想法：整個地與歷史地看，第三國際是完結了，它不再可能起世界革命總司令部的作用。其所屬各黨，無論在制度與思想上都已徹底經歷了史大林主義的墮落，因之再不能經由改良方法使之更生。此後這些黨不可能領導任何革命，甚至不願領導革命勝利，更甚至不能與不願讓他們自己勝利。因為，任何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在最後計算上總不利於克里姆林宮官僚統治的存續，而各國史大林黨則骨子裏都是克里姆林宮的臣僕。

國際托洛次基主義者的此一見解，基本上不能算錯。而且從1933年直至1945年，世界上發生的主要事變，幾無一不證明了此一立場的正確。但是，一部分由於原則立場中包含有比較機械的，因而是不能不盡正確的肯定，另一部分由於人們在解釋和應用這個想法時又作了過分誇大；以致至少有一個見解變成了成見，即認為史大林黨在任何時候

與任何條件中都只能破壞革命，它們不能與不願使之（即使那革命會推它們走上政權）成功和勝利。

懷着這個成見，面對了中共的勝利，我們便無法不感到惶惑了。

我們這個成見到底何自而生與如何形成的呢？

為了使問題更易說明起見，我必須將托派對史大林黨態度的演變，作一簡略的歷史敘述。

在 1927 年的聯共第十五次黨大會前後，因史大林、布哈林聯合的中右派用簡單組織手段解決了托洛次基和齊諾維也夫的反對派，並借助警察和特務力量，逮捕、監禁、流放了反對派的成員。這時候，有一個工人反對派，由薩普朗諾夫領導的（即所謂「民主集中派」），便宣佈聯共黨業已徹底墮落，無產階級專政已被取消，俄國的工人階級為了社會主義的利益，必須建立新黨並實行新的十月革命了。托洛次基堅決反對這個「革命」立場，堅持「改良」辦法。他認為不但十月革命所由創建的社會制度還有不少存在，而且那個被中右派把持的共產黨仍保持着無產階級的核心和傳統，他們在整個無產階級的幫助之下，遭逢到較為有利於革命的國際形勢，極有可能推翻中右派的官僚統治的。因此，左派共產黨人雖在組織上被擯於黨外，卻仍以黨內一派自命。整個努力集中於改良黨的領導，絕不容許任何獨立建黨的企圖。這個態度，托洛次基一直保持到 1933 年。

這是希特勒在德國取得勝利的一年。我們知道，希特勒之所以能夠勝利，直接乃由於史大林及德國共產黨的幫忙。托洛次基曾經及時發出了警告：注意德國法西斯勝利的嚴重危險，提議全德工人階級政黨聯合起來反對希特勒。可是史大林們非但不接受這個警告和提議，

反而罵托洛次基對社會民主黨投降。他們提出了「社會法西斯」口號（即認為德國的社會民主黨才是法西斯），視社民黨為「主要敵人」；以此輕輕放過了希特勒，讓國社黨坐大，終致於讓它奪得了政權，一舉消滅了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

在此時期中，不僅充分暴露了史大林黨的錯誤與罪惡，而且暴露了這些黨的徹底腐敗（最出名的有如漢堡黨部的大貪污案）。一個政黨犯下了如此巨大的罪惡，並如此玷污了革命旗幟，那是不能不受到歷史膺懲的。信仰過它和從屬過它的一切革命者與工人階級迷惘了，消沉了，憤怒了。在這時候，一個最迫切的歷史需要，是要豎起一面新的旗幟來代替那污損的，建立起一個新的革命政黨來代替那個被篡竊與叛賣的。於是，托洛次基改變了他一向對共產黨改良的立場，宣佈第三國際的完蛋，發起一個新的、號稱第四的世界社會主義革命黨。

此事與 1914 年列寧因第二國際諸黨之擁護帝國主義大戰而宣佈其死亡，從而準備建立第三國際，具有同樣重大的歷史意義。

不過，自從發起第四國際到現在的二十餘年中，我們可以看出：被我們宣佈為完結了的第三國際諸黨的所作所為，與 1914 年以後的第二國際諸黨的情形，並非完全一樣。自從 1914 年之後，作為一個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第二國際，確實已經死了。雖然這些政黨迄今仍舊存在，它們在許多國家裏依然控制着不少工人群眾；有時候迫於形勢，它們甚至還「領導」一些鬥爭；可是它們為資產階級在工人中充當代理人的作用始終不變，他們實際上破壞革命的作用也始終不變，他們是死定了。可是 1934 年以後的第三國際諸黨呢？是否和第二國際諸黨一樣，始終不變地為資產階級服務，一往不復地向資本主義的方向走去呢？並不盡然。我們且回過頭去，看看他們二十餘年來的作為

吧。有時候，他們比第二國際更無恥，更赤裸地為資本主義服務；更殘忍、更大膽地去背叛革命。例如，他們在蘇聯殺害了整代布爾雪維克，取消了所有十月革命創建起來的政治民主，造成了最可怕的個人獨裁與官僚等級制；在西班牙，他們肆無忌憚地替帝國主義者撲滅了一次無產階級的革命。同時在「反法西斯人民陣線」的名義之下，實行了對全體「民主」資產階級的投降。然後在一個突然的轉變中，史大林與希特勒擁抱起來，替法西斯清洗罪孽，由此引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大戰中，各國共產黨人完全拋棄了列寧立場，無原則地跟在克里姆林宮的外交政策後面打轉，表現得比第一次大戰中的第二國際黨人更加可恥……這些事充分有力地證明了1933年托洛次基那個決定的歷史必需性與正確性，證明了第三國際（意即各國史大林黨）的完結。但是在另一些時候，或者可以說，在另一方面，我們又看見這些黨和第二國際諸黨之間有個根本不同，即他們和資本主義在本質上仍處於不可調和的地位。他們在蘇聯保存與擴大已有的國有財產制，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則亦以此一制度的實現為目標。誠然，他們時常說着與寫着與資產階級妥協的典型的門雪維克言語和政綱，但這個「門雪維克主義」與舊有的門雪維克主義不同。如果後者是原則性與戰略性的立場，前者卻始終（至少自1930年以後）被當作策略、手段、以及施展詭計的煙幕。我們托洛次基主義者時常不區分這兩種門雪維克主義，以致忽視或低估了史大林黨的反資本主義的性質。因此在最近十年內，至少有三件大事出了我們的意料之外。那三件是：1、蘇聯從大戰中出來，非但沒有恢復資本主義，反而更鞏固了國有財產制；2、靠了紅軍的刺刀，這制度被輸出到了東南歐；3、中共獲得勝利，在中國也大踏步地建設起蘇聯的那種制度。

是的，今天我們應該坦白承認，過去我們是低估了史大林黨的反資本主義性質。也就是說，過去我們沒有充分估計到史大林黨迄未盡失的反資本主義的革命可能。因此今天我們回頭去檢討 1933 年的決定，我以為應該從兩個方面來看問題：

一方面，就世界社會主義革命長遠的與真實的利益說，第三國際諸黨從那個時候起，確實可以斷定為不能再起積極的正面作用了。易言之，這些政黨的思想、作風、制度墮落到如此地步，以致讓我們可以斷定他們不再能導成俄國十月革命式的革命，不再可能締造早期蘇聯那樣的工人政權了。內部改良的道路已告絕望，歷史需要的是一面新的旗幟，一個新的政綱及其國際。

這一個立場，不但在 1933 年是唯一可行因而是完全正確的，到了今天也還是正確的。我們不但過去堅持得應該，今後更應該貫徹這個方針。

不過在另一方面，自從我們做了這個決定之後，我們往往作如下的推斷：第三國際諸黨此後只能直接為克里姆林宮服務，間接為國際資本主義服務。它們在蘇聯只能浪擲革命成果（指國有財產制），在國外只能妨礙和斷送革命機運。它們在任何方式與任何條件中都不能起若干革命作用。它們不能與不願使任何革命得到成功，甚至不能與不願使自己走上政權。這種推斷是頗成問題的。

但是二十餘年來決定托派對各國史大林黨的態度者，主要正是這種推斷。我們中國托派，縱使不是此一看法的最堅決的懷抱者，至少是最堅決者之一。無怪乎我們中間的某些人，當中共軍隊完成了徐蚌決戰之後仍硬說他們不能勝利；在廣州解放之後仍宣佈他們不願勝利；當中共已在北京組織政權，土地改革行將推及全國之時，尚說他

們不能與不願保持政權，說他們必然要對資產階級讓步，又莫名其妙地預言土改將以長江為界！

這套看法中的某些觀點，特別是說史大林黨對資本主義之不變的投降以及它們不能與不願勝利之類，必須予以放棄，因為它們被歷史所否定了。

那末，有些人說，既然承認這個看法有錯誤，承認 1933 年以後各國史大林黨仍持有反資本主義的性質，仍有可能領導革命以致於勝利，而且勝利後又有可能完成社會關係的變革；然則又怎能說 1933 年我們發起第四國際的決定曾經是正確與必要，且將繼續是正確與必要呢？為什麼不乾脆宣佈建立第四國際的決定根本是一個錯誤的歷史判斷？為什麼我們今天不乾脆宣佈結束第四國際，不乾脆向共產黨投降？

主張並實行此種投降路線的，在我們隊伍中已經出現了不少人；其中有一些中國托派的老戰士，我曾有機會與他們長期共事過的。可是我必須說，他們的想法是錯的，對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利益來說，他們的行為是罪惡的。

我們決不該將上述的兩個方面混淆起來。史大林黨尚能反對資本主義，尚能夠在某些特定條件之下造成革命是一回事；而它們如何反對資本主義，如何造成革命，以及造成怎樣的革命與制度，卻是另一回事。後一回事決不比前一回事不重要。相反，隨着新國家之愈益增多，後者比前者更為重要了。

我們當然不能訂造革命。不能事先劃定一條「必由之路」，強使一切真實的革命者循此道而行；也不能懸掛起一張理想藍圖，要求發

生着的革命將它照樣體現，不然的話，革命即使成功，我們也不加以承認。這樣的想法，至少是書獃的。過去中國托派多少有過近似的想法。但雖如此，我們卻仍然相信：手段與目的之間，確實存在着相互依存關係。為要達到某一目的，雖不能說只能通過一種手段，卻絕非任何手段都可以採用。我們相信：極端專橫的官僚統治絕對不可能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絕對不能建設成社會主義社會。

極端專橫的官僚統治能「建設」成怎樣的社會制度？以前我以為它可能造成（甚至在蘇聯已經造成）官僚集產主義的社會，卻決不能達到社會主義。今天我仍舊肯定它不能達到社會主義，但不以為代之而來的是官僚集產主義這個制度。立足於國有財產制度上的官僚等級的統治，我相信會引起不斷的戰爭與革命。它們除非在新革命成功的條件下更生為健全的工人國家，因而建設社會主義；便將在戰爭與反革命的打擊下陷整個社會於破壞、黑暗與野蠻之境。

這是托洛次基關於「社會主義抑野蠻主義」這個公式的傳統了解。我贊同這個看法。

看見了南斯拉夫經驗，看見了聯共黨第二十次大會的揭發，看見了波蘭事件以及匈牙利悲劇之後，誰若以為史大林主義的思想、作風與制度已經是一條可靠的道路或完善的手段，藉此人類便可以安穩地走向社會主義，則此人不是自欺，必然是政治上的盲目者。

如何完成一次無產階級革命，特別是，如何締造與保持一個工人政權，使它真正為工農謀利益，乃至為全人類造幸福，亦即真正建設社會主義——這課題在歷史的現階段上，以無限的具體性與迫切性提出於人類之前。可是為要解答這個課題，在世界現存的政治集團中，只有第四國際有鬥爭的經驗與完備的思想。

我們怎能最需要第四國際的時候拋開它？怎能最需要普渡眾生的時候自沉這隻慈航？

南斯拉夫聯邦執行委員會副主席卡德爾於 1956 年 12 月 7 日在南國聯邦國民議會上發表了一篇有名演說，中間有一節談及這一方面的問題。他說：

……應該注意到，進步的社會主義力量太缺乏克服官僚主義的經驗，還談不上能從其中最後總結出一種民主形式。在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以前，實際上只有南斯拉夫比較認真地探求而且找到了某種從政治上解決過渡時期矛盾的辦法，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建立了群眾的自治機構。從而使社會擺脫了官僚主義分子力圖借以使整個社會陷於停滯不前的那些政治形式和方法。

卡德爾強調了克服官僚主義的重要性是對的（南斯拉夫本國未曾做到這一點是另一問題），但說「只有南斯拉夫比較認真地探求並且找到了……解決過渡時期矛盾的辦法」，當與歷史不符。他首先忘記了，或者故意不肯提到，自從 1923 年以來，托洛次基及其同志們所認真從事的，一半固然是關於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戰略與策略，另一半恰恰就是有關乎「解決過渡時期矛盾的辦法」。（這兩半實質上是緊密聯接的，因為勝利了的工人國家不發生墮落的最佳保證，乃是世界革命的順利發展。）托派正是從反史大林派的官僚主義鬥爭中誕生的。它關於保持工人政權的「民主形式」和「擺脫官僚分子」的腐蝕，積累了豐富經驗，並且完成了深刻與正確的理論。第四國際縱使在實踐的政治鬥爭中不曾有過巨大成就，可是至少，在關於過渡時期種種矛盾的檢討、理解和提出解決辦法這上面，卻總是獨步的。正是這方面，它代表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更高成就。

聯共第二十次大會的反官僚主義是虛偽的，它主要是被用作史大林死後統治層中權勢爭奪的一個武器，故決不能算成「解決過渡時期矛盾」的一個認真企圖。1956年秋天的「波蘭事件」，確實是矛盾的爆發，因之它確實代表了波蘭工人階級與部分波蘭共產黨人的「認真」努力，目的在於探求解決辦法。不過他們迄今找到的辦法還不是官僚主義的真正解毒劑。匈牙利悲劇無情地揭破了史大林主義是走向社會主義最可靠辦法的神話，同時它反襯出了只有第四國際的綱領才能使此種悲劇不再重演。南斯拉夫在它與克里姆林宮決裂後的十年中，雖已透露了些少工人民主的可喜象徵，但離十月革命後初期工人政權的程度尚遠，離無產階級的革命國際主義更遠。總之，無論波蘭或南斯拉夫，或無論二十次大會以後的蘇聯，縱然它們有了或多或少，或真或假的反官僚制度的鬥爭；但若不能採取第四國際所一貫主張的「辦法」或「措置」，則其探求都不可能是認真的，真正與健全的工人國家都不能建立起來，這也就不可能順利平穩地走向社會主義。

今天，人家一邊叫喊着反官僚主義，或甚至叫喊着反官僚制度；一邊卻仍在反對或漠視第四國際的經驗與理論。這情形決定了那些叫喊所能獲得的效果，決定了他們還不想實質上與真正地擺脫史大林主義。但它畢竟是一個令人鼓舞的現象了。三十餘年來托派所從事的鬥爭，至少在客觀上已得到了印證和聲援。史大林主義那個看似全盛而將會永續的控制已開始在各方面顯出其裂縫了。事情還要發展的，也一定會發展的。下一步發展的成就如何，將決定於第四國際的主張究竟和一切共產黨中的反官僚主義分子以及一切共黨統治下反官僚制度的群眾兩相結合到何種程度來決定。

第四國際的基本立場正適應了這個歷史要求，也能夠適應這個要求。唯一的條件是我在上面說過的：必須經常在發展的歷史條件中檢

討我們自己，堅持我們的正確的立場，同時將某些被事實所否定的論斷隨時加以糾正與捨棄。

如此這般的具有生命的第四國際，今後自然比從來任何時期更有它存在和擴大的必要，我們沒有理由悲觀，更沒有理由消極。

* * *

自從 1933 年發起第四國際以還，我們對史大林黨的統治採取了革命而非改良的立場。對於所有的史大林黨則採取了「另起爐灶」的獨幹態度，而非加入進去加以轉變的反對派態度。這個態度的確立，一半由於我們對史大林黨的認識，一半也由於共產黨黨制所促成。今後，在共產黨與共產國家開始出規分化，顯示了它們又有自內改良的些少可能時，我們是否也要改變態度呢？我想，直到目前為止，主觀上不應該，客觀上也不允許我們有另樣的態度。所以在基本上，我以為仍應該是革命的而非改良的。匈牙利事件清楚地告訴了我們，在黨和國家中佔統治地位的官僚層會怎樣保衛自己。非到萬不得已，不在群眾的革命威脅之下，他們是決不退讓半步的。反官僚制度的鬥爭乃是一次艱苦的政治革命，這看法決不容許我們有任何搖擺。但同時，我以為，在新的條件中，我們也不應該把它作機械的了解。今天的各國共產黨，今天的各個共產國家，在保持或擺脫史大林主義的程度上是有些差別的。他們之間有矛盾，也有鬥爭。不加區別而採取一概抹煞的態度將是莫大的錯誤。我們應該不倦地注意這些矛盾與鬥爭，參加它們，干預它們，使它們向徹底反官僚化的道路走去。矛盾可以很小，鬥爭容或很微；但只要它們是反對官僚制度的，則不管它們代表着黨內二派之一，或二黨之一，或兩國之一，我們都必須盡全力來支持它們（這裏的所謂支持自然是批評的支援，有如我們支持改良派去

反對資產階級之類)。到了這樣的時候，那末對於被我們支援的某黨或某國，在策略應用上，我們必須是機動靈活的。將所有的共黨派別與共黨國家在任何時候與任何情形中都視之為「一丘之貉」，以同樣態度攻擊而排斥之，其實據我看，不但會使我們自陷孤立，而客觀上又是幫助了真正的史大林主義者與官僚制度。

今後我們政治革命的基本立場，必須在具體情況中作具體的規定。不用說，永遠站在爭民主、反特權的勞動大眾方面，反對史大林主義的、半史大林主義的、非史大林主義的官僚等級制，乃是我們不變的立場。

* * *

在整個史大林主義世界中，中共究竟佔了怎樣的地位？它是不是一個史大林主義的政黨？它的史大林主義化的程度如何？毛澤東會不會成為鐵托？或他是否已經是鐵托？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性質為何？我們應該對它採取怎樣態度？

這一連串問題，近來也常在我腦際縈回，這裏也該約略談談。從我前面的憶述中，特別是從1936年以來中共內部派系鬥爭的歷史，人們不難看出，若就人事系統上說，毛澤東從來不是史大林派。史大林集團不可能要一個會自作主張的人作親信，毛澤東也不是一個軟脊骨者。我不曾與毛澤東有過生活上的接近，但我的老友許志行卻是毛澤東教書時代就開始的夥伴，他們二人一直從長沙相處到廣州時期。何資深與毛澤東有過長期共同工作的經驗，相知頗深。我從二人那裏所得的間接印象，再證以毛澤東本人的自來言行，覺得毛氏為人的基本態度及其性格，與陳獨秀是不乏共通點的。他們知識上的初戀都是儒家思想，主要是線裝書築成了他們意識形態的基礎，一般的西洋近代

學問，特殊的馬列主義，都是到達了成年之後，才加建於那個基礎上的。所以在本質上，陳毛都可以說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人。他們不是，也不可能是「全盤歐化」者。他們始終脫不了中國舊式知識分子的「土氣」，同時他們也保持着中國舊式讀書人的「傲氣」。我們知道，陳獨秀對「洋人」的態度是非常不恭的，特別當1927年，莫斯科將革命失敗責任全部推諉在他身上之後，更引起了他的反感。他時常以最厭惡的口吻來提起那些「紅色買辦」。毛澤東將「紅色買辦」客氣地稱之為「教條主義者」，他非常鄙視那群只會子曰詩云引證馬列經典的王明之流。據何資深告我，在1927年冬天毛澤東曾經對他說過：「革命不成功，我不去莫斯科。」這句話我相信有真實性的，它明顯地表示出毛澤東所懷的「大志」。十分符合於《沁園春》詞中的口氣。

克里姆林宮中那個大野心家不會不感覺到當時困鬥於江西山區的另一野心家的不恭。所以他一貫地支持其親信王明，終至取毛氏的地位以代之。其後「紅色買辦」在實際的戰爭中證明得全不濟事，毛澤東於被擯幾年之後復出掌權。從那時起，毛澤東其實早已是未有鐵托之前的鐵托了。

所以鄭超麟時常說：中共一向有鐵托主義。

然則毛澤東不是史大林主義者？中共不是史大林主義的政黨？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受官僚制度可怕地控制與窒息着的國家嗎？

決不能夠如此說。

毛澤東不屬於史大林嫡派這個事實，並不妨礙毛澤東本人是一個頑強的史大林主義者。中共是一個充分史大林主義化的政黨，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主要依照了史大林主義塑造的一個國家。歷史和社會的因

素，比之於任何個人的好惡是無可比擬的更為強大些。比俄國更加落後的中國經濟，中共長期所處的農業環境，以及它始終從事的軍事鬥爭；再加世界革命的退潮和蘇聯的不斷加深的墮落，使毛澤東和中共自願地與不自願地採取了史大林主義。這個主義在基本的思想上是以民族主義代替了國際主義；以策略性的階級調和代替了戰略性的階級鬥爭；以官僚獨裁代替了勞動群眾的民主。至於在具體的表現上，則為黨和政府組織中，一切自下而上的創意的被取消和壓制，實行自上而下的專斷性的命令，瘋狂的個人崇拜，厲行等級特權，以特務管制思想，用冤獄清除異己，黨內不許有派，黨外不准有黨……凡此一切，毛澤東和中共縱使不曾變本加厲地接納，卻總是照抄如儀的了。

國際上有一部分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中共之所以勝利，主要因為它脫離了史大林主義的影響和控制。因此依他們之見，我們不應再把中共看成一個史大林主義的黨。這個看法是大有毛病的。問題應該分開來看。如果說，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受中國國內階級鬥爭的直接影響，以致在指導革命鬥爭的策略上部分違反了史大林的命令和意旨，特別在嚴重關頭，違犯了史大林的階級調和路線，放手發動群眾，敢於領導他們鬥爭，因而獲得了勝利，這是對的。在這個意義上，說中共勝利乃離開了史大林主義的影響之故，自然正確。因為事實正是如此。但若以為勝利前後作為中共指導思想的毛澤東主義，基本上已不再是史大林主義的一種——這樣說卻就錯了。因為從我們剛才所說的史大林主義的基本特徵來看，無論在理論或實踐上都仍然具備於毛澤東主義之中。

當中共勝利之初，好多人曾經有這樣想法：中共的史大林主義將較易與較早地被清除。在某些方面，史大林主義的體制甚至可能不被完全

建立起來。這想法已被事實證明為相當天真的。從中共對聯共反史大林運動的反響，從它對匈牙利革命的態度看，中共領導對史大林與史大林主義的執着，比我們所想像的要頑固得多。它非但不提促成史大林主義崩潰的一個積極因素，反而是這個醜惡主義的一個堅強堡壘。

何以會如此？也只能在另外的文字中說明了^[4]。我這裏只指出這個事實。此地該略略談到的，那是關於中共這個史大林主義統治的趨勢問題。

「社會主義陣營」的擴大，對史大林主義的建立和鞏固說，畢竟是損多於益的。尤其是共產黨在較先進的國家中掌權，雖然在暫時間增加了史大林主義的聲勢，但從較長時距來看，卻是要毀壞它的。因為歸根說來，史大林主義畢竟是一次工人革命被禁錮於一國之內且被迫在落後基礎上掙扎圖存而產生的一種醜惡制度。如果問題已不再限於單獨一國，而且已不完全在落後基礎上謀解決，則其解決的方式終究會不同。不錯，今天中共腳下的基礎比當年的俄羅斯更原始，它建設的計劃主要也是民族的，奧他基（Autarky）的。因之我們仍舊可以從一國和落後的理由去預言中國史大林主義的繼續存在和進一步的發展；但時代畢竟和史大林主義興起和鞏固的當時不同了。世界革命不是在走向低落而是在上升了。而且，即使被民族的史大林主義所牢牢限制的革命運動，也仍有其感染力的。請看吧！如果沒有匈牙利的革命，哪裏會有「大鳴大放帶反右派」的中國悲喜劇？自然，我們不會天真得將那齣悲喜劇當作中國認真反史大林主義運動的一個企圖，但匈牙利革命與此劇之間的因果關係，卻是誰都不能否認的。

從「大鳴大放」中看得出來，中國不僅最大多數的高級知識分子，而且相當多的學生、工人，以及幾乎全體農民，都對中共的史大林主

義統治表示深刻的不滿。這種不滿只有小部分代表了真正右派的資產階級傾向，大部分反映了工農民主的健全要求。這些要求如今是遭到了「殘酷鬥爭」與「無情打擊」了。而其結果卻亦必如毛澤東所說：「把事情鬥亂，不可收拾。」經過此次「反右派」鬥爭，中共的史大林主義的作風和體制如果愈益鞏固了，則中國知識青年與工農大眾的反史大林主義爆發將愈快臨近，並且爆發時會愈加有力。在國際國內種種革命因素的影響下，中共將會發生一個有力的真正左派。他們多半會和中國的第四國際分子聯合起來，將領導一切反史大林主義運動，完成一次新的，反官僚制度的革命。由此使中國建立真正的工農政權，與全世界無產階級一起，順利而迅速地走向社會主義。

我深信：這不是一個任意的願望，歷史一定會證明給我們看的。

注釋

1. 在本書寫成後的次年，即 1958 年，我終於在另一本小書：《思想問題》中做了這個交代。—— 1976 年注
2. 鄭超麟自始便未接受中共是小資產階級黨的說法，不管這說法是否出於托洛次基。固然，他未曾公開反對這說法，但他考慮問題、議論問題，從來沒有以這說法為根據。——校者注
3. 對於彭氏這一方面見解的批評，我於 1973 年寫了篇長文〈論第三次中國革命中共勝利與中國托派失敗的原因〉。
4. 在 1972 年出版的《毛澤東思想和中蘇關係》及 1973 年出版的《毛澤東思想論稿》中，已作了充分說明。—— 1976 年注

十四、從陳獨秀的最後思想談起

—

在長期寂莫的思索中，陳獨秀的影子常在我心中徘徊。我根本不同意他的「最後意見」，整個托派中也沒有一人完全同意他的。但我們不能不承認，陳獨秀的意見不管正確與謬誤，總觸及了我們時代思想的幾個中心問題，所以我願意借他書中的幾個論點，略加檢討，略加發揮，籍以結束我幾年來思想情況的敘述。

首先讓我們看看他關於革命獨裁的意見：

所謂無產階級獨裁，根本沒有這東西，它只是黨的獨裁，結果也只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都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見〈我的根本意見〉第九條。）

這條意見裏便包含了根本錯誤與促人深思的兩方面。

一個階級經過其政黨實行獨裁，不僅理論上說得通，而且事實上經常有（差別只在於各該獨裁的程度不同）。至於有深度的社會變革，不論它是反動抑是革命，為要確保其勝利與成果，從來總要採取獨裁形式的。所以說根本沒有無產階級獨裁這樣東西，在理論上是無視了革命史的教訓，在行動上則等於根本否定了無產階級革命。

革命專政之不可避免，乃決定於新舊階級統治交替中的暴力性質，決定於除舊布新時的階級鬥爭的長期性，又決定於任何革命政權都必然要遭到國外反動政府的明暗反對這些情形。不能憑人們的願望來加以取捨，也不能以道德標準來予以批評。只要你承認無產階級革命的歷史必需性，那末在目前的歷史條件中，在現有的資本主義國家統治情況中，你總得承認多半是必須經過革命獨裁這個手段的。

第二國際諸政黨為要避免獨裁的罪惡，主張選舉票是工人階級唯一賴以取得政權之道，也是當政後實行社會主義的不二法門，事實上只是自欺欺人。大半個世紀的歷史證明了他們的「工人內閣」從來不曾真正侵犯過資本主義，因之我們可以斷定他們將來也不能實行社會主義。

馬克思，尤其是列寧和托洛次基曾經從理論與實踐兩方面充分討論了並確定了關於此一問題的立場，我們此地再毋需多所辭費來批判陳獨秀的此一錯誤。

不過，我們自然因革命專政之不可避免，就忽視了，或竟認可了專政所能帶來的一切副作用，有如陳獨秀所列舉的。尤其是生當今日，歷史讓我們飽看了史大林式獨裁的種種可怕罪惡之後，倘仍以為它們不成問題，無可避免，或竟以為理所當然，視之為革命大手術進行中必有的痛苦，那就是非常壞的馬克思主義者，或根本不能算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是罪惡的史大林主義的官僚。

1956年1月，當波蘭正與克里姆林宮鬥爭，法國的史大林主義者斥責波蘭共產黨不該試圖「民主化」之時，波蘭的一位理論家回答得好：「被塞爾文（按：此人為法國共產黨書記處書記）大大發揮了的列寧關於被推翻的階級會付諸武力以求報復的理論，確是馬克思主義基

礎之一。但馬克思主義並不停止在這兒。各人民民主國家充滿黑暗與光明的歷史上的新經驗，使得我們今天可以超越某些觀念。」

是的，人類經受了三十餘年（我們且從 1923 年蘇聯的工人專政開始墮落算起），獨裁政治的黑暗禍害，並且同樣的獨裁已經移植到許多新國家中以後，今天我們馬克思主義的任務不該停止在宣揚專政對於革命的重要上，而且應該走向前去，指出革命專政民主化的重要，使它只能為善不能為害的重要。

如何才能使一個革命專政真正成為無產階級專政而非一黨專政，更非個人專政？如何才能使革命專政不像過去歷史上一再證明的那樣，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不可分離？在今天，確實是一個重要問題。如果說它是現時代有關乎人類命運的中心問題之一，那是一點都不誇張的。今天全世界所有真誠的馬克思主義者，應該竭盡心力，以便在實踐和理論上解決這個問題。

希望發明幾條政治道德的「無上命令」，或摩西十誡式的教條，藉此一勞永逸地醫治及防止因革命專政而造成的種種禍害，那是唯心主義的空想。托洛次基批評史大林主義的罪惡時，從來不忘記指出其主要根源乃在於俄國經濟的落後及俄國革命的孤立。只有記住這兩個基本原因，才能正確而不誇張地估定史大林在使蘇聯墮落過程中所起的罪惡作用，才能正確地解釋十月革命所創造的優良制度何以會變質，才能了解史大林所自創的一切反動制度何以能建立，才能有效而非空想地訂出反對史大林主義的辦法。在這裏我們是必須從基礎去看上層建築，甚至去看上層建築所及於基礎的影響。

史大林的性格與思想，對於史大林主義（制度）的形成，究竟起了怎樣的作用，佔有什麼成分，在托洛次基的著作中，討論得非常

精詳，我這裏自不必再談。我這裏預備約略涉及的，乃是這樣一個問題：究竟布爾雪維克主義（亦可說列寧主義）的某些關於工人政黨與工人政權的組織思想，是否供給了史大林以便利。

許多反史大林的人說道，史大林主義就是布爾雪維克主義。史大林本人及其所有信徒們，亦都如此說。

陳獨秀不曾如此說，他只是說：不能把一切歸罪於史大林。他不會在史大林主義與列寧主義之間畫上等號；但他以為列寧把資產階級民主一筆抹煞，恰恰給了史大林以反對任何民主的藉口。

在這個問題上，我個人是始終同意托洛次基的見解的：史大林主義是布爾雪維克的反對物。我從不同意陳獨秀對民主的抽象看法、他那超階級的看法。

不過我承認：史大林建立其野蠻獨裁時曾經利用了布爾雪維克主義的某些觀念，以此作為護符，作為招牌。這些個觀念，有的是真正屬於列寧的，有的是被可怕地曲解偽造了的，有的則在具體特殊的情況中列寧當作權宜性的辦法提出來的。史大林黨本是一個歷史上空前巨大的偽造工廠，它們曾經偽造出一切需要的「列寧言論」來支持他們每一個反動的步驟。關於這些，我自然不能在此敘述。在此地對我們真有興趣的，只是被史大林利用了的某幾個列寧真正主張過的觀念。布爾雪維克派關於工人政權結構的一個基本觀念，就是讓蘇維埃兼享立法與行政之權，反對資產階級的三權分立制，尤其反對國會那個空談俱樂部。這個思想，原本繼承自馬克思所分析並加讚揚的巴黎公社經驗，同時亦為當時尖銳的階級鬥爭的利益所需要，被客觀進程所決定的。所以不管我們歡喜不歡喜，只要我們真正關心無產階級革命的利益，真欲保衛革命的勝利，真欲鎮壓反革命與防止其復辟，我

們就得將一切權力集中於工農兵會議及其通過民主選舉產生出來的政府。在這一點上是不允許有絲毫懷疑與動搖的。

與此同時，我們卻還必須注意到史大林藉此思想以達成其個人專政的經過。開始是蘇維埃的代表職權被限制了，他們不再能創制法律，監督行政，實行憲法所賦予的最高權力，他們僅只能夠聆聽「首長們」的冗長報告，「全體一致」予以通過，並毫無異議地接納內定的下屆政府名單。後來，連這種形式的蘇維埃大會都不召開了；甚至執政的蘇維埃機關也名存實亡了，一切權力集中於黨，實則集中於黨的政治局，更進而集中於總書記一人之手。諸凡一切「民選」的政府機關，簡單只是辦理一些總書記交下來的事務工作而已。真正的權力，無論屬於行政、立法或司法，都是總書記經由秘密警察來實施的。

列寧的由蘇維埃獨攬工人國家大權的這一思想，便如此這般地墮落成史大林的個人警察獨裁。

我在這裏自無須再提起此種墮落的客觀原因。此地想加以提出的只是：為要在一定範圍內醫治及防止此種個人獨裁起見，我們應該採取怎樣的辦法。首先我覺得：「工人政權必須集中」這一個思想，應該用另一個資產階級民主的舊觀念來補充，那就是，統治機構各部門之間的「互相箝制與互相平衡」(Check and balance)。別以為由工人與老革命家出身的統治者永不會濫用權力，或者不會變成官僚。只要國家存在，只要社會尚保有統治與被統治分別，官僚墮落的可能就永遠存在。為了反對官僚專制，自下而上的民主自然是最有效的解毒劑，可是同屬上層的內部分權也是一個重要措施。列寧是深深懂得這一點的。雖然直到他逝世之前，面對着日益嚴重的官僚制度，只得來及提出三個可注意的辦法：(1) 黨的中央委員會人數增加；(2) 工會應對

政府機關獨立；(3) 設置工農監察委員會並提高其權力。這三個辦法，如歷史所證明，並不曾阻止工人政權的墮落，而且工農監察委員會這個組織，後來反而成了史大林完成其特爾米多反動的一個得力武器。可是我們卻不能因此就說一切趨向於「箝制與平衡」，趨向於「集體領導、相互監督」的企圖是徒勞無功的。從列寧逝世前提議的那幾個反官僚主義措施中，我們應該更加相信，無產階級專政的集權制，應該用同階級內部的分權制來加以民主化。列寧在分權化的路上沒有走得有多遠，因為他遭遇到這個問題並殫思竭慮來予以解決之前，不幸他的命快臨近終結了。他把這個問題留給了後起的馬克思主義者。

托洛次基繼承了列寧的反官僚主義鬥爭。在此方面，他對於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做出了與他完成十月革命同樣偉大的貢獻。不過對於「箝制與平衡」這個古老的民主觀念，托洛次基是不甚感到興趣的，至少，就我所知，他始終不會在任何文件中，提到過要拿它來補充集權觀念。

我覺得，今後的托洛次基主義者應該在這方面予以較多的注意和發揮。

我並不以為，工人國家中實行了「三權分立」後便有了足夠的保證，使它不致於變成個人獨裁，不致於發生猖狂的官僚專制，不致於重演莫須有的大冤獄。但是至少，我們必須承認，此種分權制是無產階級專政民主化的重要保證之一，因而也是工人國家不致墮落的重要保證之一。

其次，我要談談反對黨的合法存在問題。我們知道，俄國社會民主黨的歷史是一部派別鬥爭的歷史，布爾雪維克主義乃是在派別鬥爭中鍛煉而成，甚至十月革命也是在派別爭論中完成的。在蘇維埃國家

存在的最初幾年中，革命政權的任何一個向前躍進，無一非經過了激烈的黨內鬥爭而遂行的。那時候的派別及其相互間的鬥爭，正如馬克思哲學的一個基本命題所指示：矛盾乃進步的動力。1921年3月間舉行的第十次聯共黨大會禁止了黨內派別存在，雖然是一個權宜之計，但如後來歷史所證明，實在是貽害無窮。這個禁令事實上不曾能禁止派別，卻給了佔上風的某一派別以法理的藉口，去禁止、迫害和用非政治的手段消滅反對者。史大林的反動行為在初期，即當他還不能用羅織的方法來打擊同志以前，幾乎完全假此一禁令以行。甚至到了今天，新的史大林候補人赫魯曉夫，為想建立其獨裁地位，也還是捧出這個古老的禁令來，藉以放逐史大林的嫡系人物——莫洛托夫與馬林可夫等等。

「黨內無派，黨外無黨」這個非常反動的公式，構成了史大林主義反動理論的幾個基石之一，它實質與列寧的基本精神完全不符。但歷史的不幸卻在於：通過此一決議的聯共第十次大會有列寧參加，而且決議為列寧所提出。這就給了「不肖門徒」以充分理由，去稱此一公式為不折不扣的「列寧主義的組織路線」了。如今是不但蘇聯共產黨，而且全世界的所有共產黨，都奉行了這條「路線」，使共產黨變成為「絕對統一的」，即由一派獨裁的，亦即由一人獨裁的組織。事實上，在一個群眾政黨裏，光想靠思想的說服力來完成和維持這樣的統一是絕對不可能的，只能借助於特務的恐怖手段。由此便產生了不斷的清黨、黨內殘殺與史無前例的冤獄。

如果在一九二零年代人們還不易看出這個禁令的荒謬和反動，那末現在，我們讀過了二三十年來由數以萬計的全世界最優秀的革命者用血淚寫下的歷史之後，我們總該充分認識其反動本質了。關於無產階級的革命黨究竟應如何處理其內部生活這個問題。我想托洛次基在

1940年為美國托派所規定的四點保證，應該被我們奉為「圭臬」。那四點是：「1、不禁止派別；2、除了共同行動所必需的某些限制外，對派別活動不加以其他限制；3、正式的刊物自必代表那由新的大會所確立的路線；4、未來的少數派如果願意，可出版一份給黨員看的內部公報，或出版與多數派共同的討論公報。」（見《保衛馬克思主義》英文本，101頁。）

革命黨內部派別的合法存在，乃是黨內保持民主的一個最重要條件。在工人階級取得了政權的國家中，代表勞動階級各傾向的人們可以組成政黨，也是使落後國家不致官僚地墮落的保證之一。托洛次基非常重視這個保證，所以寫進第四國際的綱領中。

總之，無產階級獨裁政權的組成倘能放在「箝制與平衡」的原則上，這個政權下面倘容許不同傾向的勞工政黨存在，而執政黨內又若准許各派共存，那末，無產階級的革命獨裁雖然仍無免於官僚墮落的絕對保證，卻至少會賦有堅強得多的抵抗能力。

沒有人能發明一種藥方，使無產階級專政能絕對免於官僚化的墮落。縱使在「法理上」與思想上，無產階級的政黨及其政權具備了上述三個條件，而它們在事實上施行到如何程度，以及它們的實施對於民主化的體現有效到何種程度，仍然是要靠各該政黨之內與各該政權之下的諸傾向的鬥爭去決定的。

不過，這絕不等於說：「法理上」與思想上的種種確定沒有價值。為使獨裁下面那些民主化鬥爭的易於成功，這些確定和認識具有無比重大的意義。

二

如果我們確認了陳獨秀否定無產階級專政的根本錯誤，那末他關於民主的某些見解，我卻認為值得重視的。例如他說：

……民主之內容固然包含議會制度，而議會制度並不等於民主主義之全內容……議會制度會成為過去，會成為歷史殘影，民主則不然也，蘇維埃制度若沒有民主內容，仍舊是形式民主的代議制，甚至像俄國的蘇維埃，比資產階級的形式民主還不如。

……如果認為資產階級民主制已至其社會動力已經耗竭之時，不必為民主鬥爭，即等於說無產階級政權不需要民主，這一觀點將誤盡天下後世！

近代民主制的內容，比希臘羅馬要豐富得多，實施的範圍要廣大得多，……其實此制不盡為資產階級所歡迎，而是幾千萬民衆流血鬥爭了五六百年才實現的……（以上引文均見陳獨秀〈給西流的信〉。）

陳獨秀這個見解，實際不是他的獨創。馬克思主義者原本分為為資產階級統治形式的議會制度與人民在資產階級統治下所爭得的民主權利。馬克思主義者從來認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多半會打碎議會制度，他們堅決反對把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僅僅與永遠限制在議會鬥爭的框框之內，不敢越雷池一步，以致讓此「民主」像套索似的絞殺無產階級革命；但在同時，他們從來主張要保持並擴大民衆在資產階級政制下所已爭得並已享有的民主權利。當初蘇聯打碎了議會制度，

卻並不廢棄那些民主權利。蘇聯人民之被剝奪此種權利，一如歷史所示，是經過了內部反動的、即它乃是史大林主義代替了列寧主義以後的事，陳獨秀把這筆賬算在列寧身上，顯然不符合歷史事實。

毋須說，經過了史大林的黑暗反動之後，今天的馬克思主義者比列寧當年更應看重專政之下民主權利的保障了。在這個意義上，我完全同意把民主權利與無產階級專政之間的相輔相成，決非相拒相斥的情形強調出來，藉以反對史大林主義者以專政名義取消任何民主權利，將一切民主權利扣上資產階級帽子的絕對反動做法。

正像當年列寧強調無產階級專政來反對考次基們的民主拜物教一樣，我們今天要特別強調保持和擴大「資產階級」民主權利的必要，藉以反對史大林主義者的獨裁瘋狂。在這樣做的時候，當然我們不應該像陳獨秀那樣，把根本立場退回到考次基主義。

在過去，我們把議會制乃是資產階級統治方式這一點看得太呆板了。議會制度與無產階級專政不相容，只是在如下的意義上，即在官僚制度與軍國主義業已鞏固的資產階級國家中，無產階級為無可能通過議會制度來走上政權，來推翻資產階級在政治與經濟中的統治，來真正實行「剝奪剝奪者」的革命，為要達此目的，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一定得絕不顧及議會制度的束縛，得主要地憑藉本階級與一切被剝削階層的組織力量，在主客觀有利的條件之下，實行多少含有暴力（多少程度視被革命階級的抵抗而定）的革命，打碎舊階級統治的國家機器（包括議會制在內），建立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藉以鎮壓被推翻階級的對抗，鞏固革命勝利，並發展此勝利以走向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在此種情形中所以要打倒議會制度，並非因為它是民主的，而是因為它是反革命的，因其實權操在資產階級手中，妨礙着打倒資本主義的革命。

如果說，某一國家的議會因為當時當地特殊的階級關係之故，它不妨礙無產階級的革命，那就不須解散議會，僅僅按民主方法，清洗其內部的反革命少數就夠了。

無產階級革命並非在任何時候與任何條件中均與議會制度衝突的，在革命未勝利前固然要利用議會這個講台，便是當革命勝利之後，也並非不能採取議會制的。真正的蘇維埃（即未被史大林官僚毒化和事實上取消以前），其實就是一種議會制度。它與舊議會制度不同的只在於它拋棄了「全民」的謊言，老老實實說明它是具有階級差別的民主制，同時它不僅有立法權，且兼有行政權罷了。

今天蘇聯的蘇維埃與「人民民主」國家的議會，非但沒有行政權，而且也無立法權，它們擁有的僅是聽取報告權，鼓掌喝彩權，與一致通過權。這些議會，誠如陳獨秀所指責，非但沒有高於或優於資產階級的議會，而且比後者更不如。

今後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議會（不管叫什麼名字都好），如何能恢復舊議會制所持有的民主優點，增加和擴大這些優點，使它們、也因而使那些國家，真正成為高出於資產階級民主國家的組織——我以為是我們這代社會主義者的重要任務。

無產階級不要民主而只要專政這個籠統的觀念必須拋棄。

然則，保障充分民主權利的無產階級專政這個觀念是否站得住呢？它有無現實性呢？

托洛次基是此一觀念的最完備的代言人。正因此，他一方面被史大林罵成社會主義民主主義者與門雪維克，另一方面被傑拉斯斥為「非現實的理想主義者」。這兩個不同方面的共同立場是：要專政便不能

有民主，要民主就不該專政。二者等於魚與熊掌，不可得兼。然而世界人類的歷史出路，若就比較抽象的觀念上說，卻正是要解決這看似水火的矛盾，正在於魚與熊掌的兼得。無專政不能完成推翻資本主義的革命，無民主不能使革命存續乃至前進至社會主義。如果這個矛盾不解決，那末歷史已經有足夠的事實向我們證明：人類只好陷進到野蠻主義——不管其路徑是直接由資本主義出發，或繞道史大林—拉科西—毛澤東的社會主義。

歷史既如此迫切地提出了這個矛盾，它自然同時提供了解決此矛盾的條件與可能。負擔此解決任務的物質條件是早已成熟了——至少在全世界範圍內。意識上的條件，至少在根本上和大體上也早由托洛次基和第四國際提出來了。目前在這方面尚嫌不足的，據我個人看法，只是上述使無產階級專政民主化問題上，一些更具體、更明確的措施罷了。

為使清楚明白起見，茲將我的看法再簡單地歸結如下：

1. 在目前的歷史條件下，無產階級經過其政黨想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治的與經濟的統治，必須憑藉武力革命，建立剝奪剝奪者的專政，因此，十九要破壞資產階級統治的傳統方式——議會制度。能「和平地」通過議會制度完成此一變革，如果不是絕無可能，至少也只能視作極小可能的例外。
2. 如此建立起來的無產階級專政，絕對不必，而且絕對不應取消在資產階級民主制下面人民所已爭得的種種民主權利，它們包括：人身保障法，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諸自由以及罷工權等等。
3. 由全體勞動人民選舉產生的專政機構，應徹底受選舉人自下而上的監督，並事實上可隨時被撤換，同時，專政的權力不應集

中在一個機構的手中，而應實行分權，俾收「箝制和平衡」之效，藉以防止個人獨裁的產生。

4. 專政下面應允許反對黨存在——自然我們只能讓擁護革命的政黨存在。至於哪些政黨合乎此一條件，應由工農自由投票決定。
5. 無產階級政黨內部必須容許反對派的存在，絕不允許以組織制裁，特務手段，刑事迫害來對付不同意見者，反對以思想入罪。
6. 無產階級的專政絕不應該變成一黨的專政。由部分工人階級與知識分子組成的工人政黨，決不能代替由全體勞動者民主選舉產生的政權。今天實行於共產黨國家中的以政府機關作幌子，事筆由黨部書記直接「掛帥」的情形必須結束。執政黨的決策必須首先在真有權力的，包括反對黨派在內的議會（或蘇維埃）中提出與通過，然後由政府執行。執行中仍受議會的監督。
7. 最後，我們還必須提到一點（這是在上面文字中未曾提及的），即南斯拉夫與史大林破裂後所竭力提倡的一個觀念。鑑於政治民主實際上乃是經濟民主的反映，鑑於在絕對集中的經濟控制下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政治民主，因此，他們認為，為使社會主義的民主有其物質的基礎起見，應實行計劃經濟中的分權制與自治制。迄今為止，南國在這方面的成就雖不顯著，但在基本方面卻是完全正確的，完全合乎馬克思主義。

上述種種，其自身自然不足以挽救一個革命政權的官僚墮落；但因它們並非憑空設想，而是從血腥史實中得出來的教訓，故若明確地規定下來，等到專政國家民主化的條件更為成熟之時，一定會大有助於那些國家中工農反官僚鬥爭的勝利，並使新的革命政權自始就免於官僚化的毒害。

三

陳獨秀並沒有提到過如下的問題，例如：像中國這樣的落後國家，是否可以比先進國家更早建立工農政權，由此走向社會主義？以政黨為中心，以秘密鬥爭配合公開活動，藉以積聚力量，組織群眾，終於在條件成熟時憑暴力奪取政權，是否符合於無產階級革命的利益？佔人口中少數的革命者及其群眾，以此一方法走上政權，是否為史大林式獨裁制的先天性來源？

這幾個問題，曾經是，目前仍然是，一切最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如考次基與普列哈諾夫等輩，提出來反對列寧，托洛次基以及他們領導的十月革命的。同時按照理論說，他們也比陳獨秀在「最後意見」中所揭出者更為根本。陳獨秀的立場，如果發展到徹底，原應該與考次基採取同一態度，根本否認人口中佔極少數的工人可以組織政黨來領導革命，根本否認一些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可以組織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政黨，根本否認憑藉軍事鬥爭可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

可是陳獨秀不會這樣否定，他至死不會對這些根本意見提出疑問。在我的回憶錄中，讀者可以看到，他非但沒有像考次基那樣，詆十月革命為兵士革命，甚至還積極主張我們托派應該作軍事鬥爭的。至於中國工人階級可以而且應該組織政黨來革命，這種革命可以而且應該以社會主義為目標，那是他用自己的一生來肯定了的，至死不會在思想上放棄它們。

陳獨秀的最後見解其實沒有發展到它們邏輯的最後。當然，邏輯的「不足」恰好是它政治上的「有餘」：他畢竟沒有完全陷入第二國際的泥坑裏。不過為了幫助我們清楚思想起見，我們卻應該把他沒有發展的發展出來。

在他那篇《根本意見》中，陳獨秀只是非常感情地指出了：無產階級政權應該如彼而不應該如此，應該民主的而非獨裁的。至於事實上為什麼如此而不如彼，為什麼獨裁而非民主，他簡直不曾思考過。他只是為人「不能把一切歸罪於史大林」，言外之意，就是說，罪惡的最初來源倒在於列寧關於民主的見解。

這種看法不但唯心，而且膚淺。要想解釋無產階級政權之為獨裁而非民主，須在社會的實際階級鬥爭中尋覓理由。要想解釋那個獨裁政權之墮落成可怕的專制，自須從國家的經濟文化水平，從取得政權與防衛政權所採取的手段，以及從革命和反革命的國際關係上去尋求。

第二國際中最正統的理論家們，從來喜歡摘引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那句名言，即是說，一個社會制度沒有竭盡它生命之時不會讓位給另一種制度，新的社會制度當其存在條件尚未充分成熟時，不會去代替那個老制度。他們摘引它來反對十月革命與布爾雪維克主義。按照他們的指責，社會主義革命必須要在資本主義爛熟的先進國如英德等國中首先發生，絕對不能在落後的俄羅斯硬造。社會主義者如果利用暫時的行情性的有利局勢，打破了資本主義的脆弱環節，以此建立工人政府，則不管那些社會主義者主觀上的意圖如何善良，而結果那個「工人政府」必然要墮落與變質，變成為絕對非社會主義的政權。

此外，「正統派」們又有兩個反對布爾雪維克主義與十月革命的傳統理由，那就是：(1)「工人階級的解放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事情」；(2)「工人階級只有應用民主手段來爭取政權，才能建立民主的工人政府。」根據前一個命題，他們便認為：由少數革命職業家組織政黨來領導無產階級革命，實際便是革命家代替工人階級革命，因而不可能是工

人階級的真正解放。為了後一個命題，他們認為革命黨應用暴力和陰謀手段來推翻舊政權，建立起來的新政權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是民主的，因為，據他們說，手段決定目的，暴力的手段只能產生暴力的政權。

總括起來說，那些第二國際的理論家，最初用以反對十月革命，其後用以解釋史大林暴政的主要理由是：第一，在經濟落後的國家裏，社會主義者本來不可以，因而是不能奪取政權的；第二，工人階級只有憑它自己的組織和力量去實行革命，才能於勝利後建立真正屬於工人與為工人的政權；一切由非工人出身的「政客」所策劃的革命與所建立的政權，必不可能是工人的政權；第三，民主的工人政府一定要靠民主的普選手段來建立。

這些說法（我這裏不再細分出其中機會主義與無政府工團主義的成分），不管我們是否同意，卻必須承認它們比陳獨秀的最後見解是更徹底與一貫的。陳獨秀如果要把他的絕對民主論貫徹到底，就得接受這些個說法。因為它們雖然是錯誤而反動的，但至少局部的客觀的「唯物主義的」根據，也在某種限度內，符合於某些歷史事實的表象。陳獨秀的民主發展論卻是唯心的、主觀的、以願望來代替事實的。

近年來，形形色色的史大林主義的批判者，看到了蘇聯和另一些新建的共產黨國家中的極權措施，竟在回顧中承認了考次基主義與無政府工團主義的「真理」，他們把我們上引的三個論據，當作了一切共產黨國家所有罪惡的根源。

我自然不必在這裏重述列寧主義與考次基主義在這些基本問題上的爭論。今天，我們雖然親身遭受了一個史大林政制的殘酷迫害，但是我仍然相信：真理在列寧一邊。我相信，在經濟落後國家中，社會主義者可以而且應該奪取政權；我相信，為達此目的，那些國家中的

工人階級必須與應該受着一個包括大量非工人出身的革命「政客」在內的革命黨領導；我又相信：工人階級僅憑普選制度，特別在根本沒有民主傳統的落後國家中，絕對建立不起工人政府；我相信：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及其政權的建立，至少在現有的歷史條件中，無法不經過武力鬥爭。

三四十年來我們看見了不少次真的與假的無產階級專政，讓我們看到了不少光明面，又看了更多的黑暗面。這情形，當然使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僅僅宣佈上述的所信為不夠了。痛苦的經驗給了我們教訓，而教訓則更使我們認識了托洛次基的不斷革命論的精深而正確。如果我把上述的三點稱為列寧主義，那我們應該堅決地說，列寧主義倘不着重地用托洛次基主義來補充，則勢必要墮落成為史大林主義。

列寧關於世界革命的基本戰略是：落後國家的工人階級在條件成熟時，可以而且應該起來打倒各該國較脆弱的資產階級統治，建立自己的政權，以此作為一個有力據點，去推動先進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同時把本國的經濟作有計劃的，走向社會主義的改造。

托洛次基與史大林二人都接受列寧的看法。但托洛次基特別看重落後國家工人政權的第一個歷史任務（這正是列寧自己所着重的）：推進世界革命；史大林則完全着眼於第二個任務，即在本國建設社會主義。

在落後的經濟基礎上，關起門來建設「社會主義」，意即大大地提高一個國家內的生產力，唯一辦法只是：瘋狂地榨取本國的生產大眾的勞動價值。由此便發生了史大林制度一切政治的以及經濟的野蠻主義。

所以問題很清楚，關鍵不在於落後國家的工人階級應否先於先進國兄弟們去奪取政權，而在於奪取了政權後的做法，亦即在於這政權在國際階級鬥爭中所應取的整個戰略方面。若將它作為世界革命的一支部隊，一個堅強堡壘看，它便有健全的社會主義前途；反之，若將它囿於一國之內，希望「自力圖強」，即必然要墮落成野蠻的專政。

陳獨秀探究無產階級政權的民主與獨裁問題，卻不從不斷革命與「一國社會主義」的根本分歧點出發，自然要陷入唯心與玄學的錯誤中了。

一個國家，尤其是落後國家，它的工人階級如果首先取得了政權，無論其本身的命運、其民主設施、乃至其社會前途，都只有在革命之既深且廣的不斷發展中，才能獲得保障。若想在「一窮二白」的「祖國」的基地上，僅憑一腔主觀的「幹勁」來建設「社會主義」，則非但政權的民主化根本談不到，便是政權本身的存續都會大成問題。

總之，當我們為無產階級政權的民主化而鬥爭時，不應該像陳獨秀似的抽象地反對獨裁，更不應該像考次基們似的，根本反對工人階級在落後國家先行實行革命，而應該像托洛次基所指示的，以全力反對史大林的一國社會主義和毛澤東的一國共產主義。

1957年9月

後 記

該寫和可寫的已經寫完，心頭卻似乎尚有話說。到底，像我這樣一個革命戰線上的小兵，為什麼要寫自己的回憶？有什麼值得寫的？

寫作的動機應該提一提。

說起來，事情卻得追溯到十幾年前，在日軍統治下面的上海，超麟同志曾經寫了一部回憶錄。書從他有意識的求知活動開始，一直寫到1927年秋天中國革命失敗，寫到他參加八·七會議，寫到他在上海和瞿秋白一道工作……寫到這裏他就不起勁了。關於他自己的轉向反對派以及中國托派的初期種種，他寫得很少，甚至未終篇而擱了筆。我們要他繼續寫下去，他卻反而要我寫一些，關於1927年後中國共產黨人如何在莫斯科與托洛次基主義發生關係的情形。他認為，那段歷史在中國托派史乃至整個中共史上都將具有重要性，而知道這段史實的人卻太少，知道得較全面的甚至在那時也只有我一個人。我頗為他的提醒而動心，因之頗有一寫之意；可是因為其他工作忙，始終不曾寫得。

現在，超麟同志是生死未卜，他的回憶錄如果不曾被人隨意毀滅，也至少被深藏於中共公安機關的檔案庫裏了。想起當年那段因由，彷彿對朋友負了文債似的。

幾年來我被迫處於一無可為的境地中。失去了一切，卻換來了悠悠無盡的空間。孤寂使人愁思，而停頓——不管它是被動或自動的——又總要叫人向後看。過去的事，過去的人，無論它們是悲是喜，是可恨或可愛，不時像幽靈似的闖進心裏來，緊緊地抓住了我，常使我「魂牽夢縈」。有些事和人，留在心頭，又若似「骨鯁在喉」，不吐不快。為此，幾年前我曾經寫過一些小文，紀念幾個難於忘卻的故人；又曾多次動手，想寫「自傳的一章」，即記述當年莫斯科中國同志中的分派情形。可是始終沒有寫成功——不是為謀生的瑣事所打斷，便是一經提筆即鑑於工作的巨重而放棄了。

使我最後決心來寫這「一章」的是去年春天聯共黨二十次大會上的反史大林運動，特別是它要重修黨史的決定。後來中共對此的反應益使我的決心堅定下來。因為從中共的一些文獻中看，不但二十餘年來中共的歷史深深留下了當年莫斯科派系鬥爭的記印，而且今天，甚至今後的發展，還可能要在若干程度內受其影響。中共領導人為了對外對內的顧慮，不可能坦白與公平地寫這段歷史；此後的史家即使想寫，恐怕也不易有充分的材料吧；那末作為這段歷史的一個參加人與見證人的我，自應盡我所知地記錄一些，雖不能完全填補這一缺憾，至少可提供多少材料。

超麟的提議在心中迴響，於是，在國華同志的鼓勵和幫助下，我終於着手寫起來。最初計劃還是「一章」，我不預備寫前此與後此的事。可是任何事物均有其自身邏輯的，即令寫一篇文章亦然。把一個人的全部見聞截取一段，卻總得敘點前因，說些後果。而此種因果一經敘說，由於其為一大時代中的大事件故，卻想簡短而不可得。「來龍」寫長了，「去脈」的尾巴自不能裝得太短。如此一來，即使計劃仍

舊是「一章」，而事實將是一本不分章目的書。那末何不逕自寫書，讓它有個清楚的章目呢？結果，原想寫得不長的「一章」，變成了目前那樣的「中型傳記」。

因此，我這部「自傳」目的其實不在於傳我自己。我允許自己在這中間佔一地位，只為了要有一條線索，可用以把過去半世紀中一些重要或不重要的事情，比較方便地貫串起來。套句被人用爛了的話說，我只是想做到：「從一個普通人的鏡子裏，讓人看到大時代的若干方面」。這部東西也不是中國托派史，因為其中敘述雖與中國托派的歷史有密切關係，但畢竟只是從我個人視角來看的一面；同時所有敘述，主要是憑我記憶，我不曾與不可能將它們用真實的文獻來作檢核和比對。

一部不以自我作中心的「自傳」，當不可能給「私事」留下太多地位。有幾個朋友曾經讀了我的原稿。他們或者指出：關於我的某些方面寫的太少了，例如我的戀愛生活；或者向我提議，應該儘可能做點「自剖」，因為書裏有不少地方批評了我所接觸過的人物，卻沒有專用一段話來批評自己。我覺得「自剖」不但多餘，抑且無聊。自誇和自謙兩不足取。法國作家蒲風的名言我非常信服：「風格即人」。既然已經寫了這麼多的文字，不管好壞總已給人看到了「風格」，然則又何須乎為「人」多言？而且，批評別人亦即批評自己，長度的本身就已指明了度量器的品種；鏡中之影，顯出了鏡片的好壞。人們不難從批評裏看到批評者。因此，於「自剖」一道，即使在這篇後記裏我也不想有所詞費。至於「私事」，書中其實已說得過了量，若依照我原本計劃，其中十九都不該談。可惜現在書已寫成，重讀時總不免為姑息的常情所累，不能儘量刪削了。我曾經有意避免的是屬於所謂「純情生

活」方面。這些事，常常構成傳記文字的主要的乃至精彩部分的，卻與我這傳記的「體例」不符。我不願將嚴格限於個人的悲歡經歷，和時代的較大事件放在同一平面上描寫。

總之，我寫這部東西不是為了一己情緒的發泄，而正是為了我畢生從事的事業。回憶不僅為了回憶，卻更為了它能幫助我們繼續前進之故。只有在這個意義上，這部書才找到它寫作和存在的理由。

1957年7月26日 記於濠江

附 錄

牛津版英譯本序

本書寫成於 1957 年。回憶所及，終止於 1949 年之冬。距離現在，即離開它得以英文出版之時，已有二十三年了。本書不是嚴格的傳記，它的起迄原不必涵蓋著者全部有生之年。但以此書究非客觀描述的史書緣故，讀者終有權利要求知道著者在此漫長年月中的所思所為。

因此，在這方面約略加以說明是有必要的。

1949 年 11 月尾我被迫離開香港。1975 年 3 月，在朋友們的幫助下，來到了歐洲。這中間的整整二十五年餘，我始終蟄居在南中國海外另一個島嶼殖民地。最初二年過的是緊張思想生活，同時與國內朋友們進行着密切的聯繫。可是到了 1952 年 12 月我在國內的朋友全部被中共拘禁以後，任何積極的政治活動都停止了。為了生活，我教過書，還寫了一些文學劇本。但我的思想卻未曾停頓，亦未曾改變。我注視着世界上發生的種種事變，特別是在共黨統治下的中國的變動。對於中國發生的每一次較大變動，例如「百花齊放」、「大躍進」、「人民公社」、中蘇爭論、以及「文化大革命」等等運動，我都及時給它們以分析和解釋，為了自己的認識，也為了與少數尚能接觸的中外

朋友們交換意見。在這些文字中，有散篇，有小冊，也有較大的書——例如《毛澤東思想論稿》。

這些寫作，都是在老友國華、梁四與其他少數朋友的幫助之下才能出版流通的。

不過在1968年以前，我們的思想在海外華人中得不到任何反響（國內則無由到達）。一方面由於中共眩人的勝利，另一面因為西方世界正經歷着戰後的繁榮，中國的革命馬克思主義運動，就組織言已停止存在，就思想說也陷於停滯。1966年開始的紅衛兵運動曾多少給海外華人青年以刺激，部分打破了他們不問政治的消極狀態。但要他們真正表示出基本方向上的轉變，卻還得等到1968年。在這一年裏，因反越戰引起的全世界青年的左傾運動，使海外華人，特別使香港青年們，真正從個人前途的打算提升到為較高的理想而努力。他們既厭惡了西方世界，也不滿於中國的官僚統治，因而他們相當自然地接受了無政府主義的思想。可是為時不久，他們從實踐中獲取了經驗，從與其他思想的接觸中得到了啟發，這群先進的青年中間起了分化——其中一大部分走向於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四五年來，這部分青年的影響日見其落實壯大，逐漸擴展到歐美的華人社會中去，以致到了今天，我們可以看見一個相當有力的運動，興起於世界各地的華人青年中，它正圖謀使新中國走向真正符合於社會主義民主利益的道路去。

在這個轉變的氣運中，我個人談不上起過多大作用，但畢竟不是全無關係。當一個人走近生命旅程的終點時，看見前面出現的竟不是夕陽已墮的一片昏暗，而是朝暾初露的瑰麗景色，這該是十分可喜的事。

1977年1月3日

法譯本自序

這是完全出於我意外的事：三十年前我在偏僻的澳門寫成，以極其簡陋方式刊印出來的《回憶錄》，先後竟已有日、英、德三國文字的譯本，現在又快要有法文譯本了。個人的喜悅是毋須說的，因此引起的感想也很多，但是除了給英譯本寫過一篇短短的後記外，我不曾為以前三種譯本寫序。這次法文本出版，本來也不想說什麼多餘話。只因年來見到不少專家學者對本書所作的評論，聽到過很多讀者給我提出的意見，趁此機會，想作一個簡短回答。

很顯然，我不能談及所有的批評和意見。在大致可以分為讚許與苛責的二十大類中，我將不談前者而只談後者。即使對於後者，也只能選取其中有代表性的幾項，略抒己見。

有人稱我的書是中國托派的一首輓歌。有人說它只是中國革命史的一條腳注。又有人說它是描寫一群狂熱者為一個注定失敗的事業而苦鬥的一齣悲劇。

看一個嚴肅的政治流派到底是一個注定失敗的事業，還是一個極有成功希望的事業，依我之見，不應該看它在某一時期的組織大小，力量強弱，乃至暫時成敗，首先要看它的基本立場是否符合客觀需要，是否經受得起歷史的考驗。

托派所以產生並賴以存在的政治基礎是不斷革命論。這個理論，我認為不但已經為過去的革命證明為正確，而且為目前的事實證明為極端必要。

首先我們看到，本世紀內兩次最大的革命——1917年10月的俄國革命與1949年推翻國民黨統治的中國革命，都是遵循了不斷革命論的

戰略路線而獲得勝利的。俄國布爾雪維克黨是有意識地，而中國共產黨則是不自覺地（即違反了他們原有的立場地），在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中，奪取國家政權，建立工農專政（雖然在中國所建立的這個專政，從一開始就可怕地歪曲了的），並由此開展社會主義的前景。

其次，我們知道，中國與國際的托派從來堅信：落後國家的革命者在民主革命勝利中建立起來的工農政權，只有對內實行社會主義民主，對外執行國際主義政策，才能鞏固並發展這種勝利。同時他們堅決相信：這些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只有被安排在世界革命的前景與全局之中，將它們當作國際社會主義整個體系的一個部分，才能真正完成。

因此，蘇聯的可怕墮落，中共勝利後竟造成了「史無前例的浩劫」，決不能用來證明不斷革命論那個基本立場是錯的，即不能證明共產黨人在一個經濟落後國家民主革命中強奪政權這條路線是錯的。相反，它們恰恰證明了不斷革命論另外一個基本立場的正確，即它們證明了在一個國家之內，特別在一個落後國家之內，社會主義是無法建設成功的。它們證明了如果對內沒有符合廣大民眾利益的民主措施，對外沒有徹底的國際主義政策，這些國家非但建設不成社會主義，而且要想保持並鞏固一個健全與進步的政權都不可能。「一國社會主義」的結果，正如我們已經目睹與身受的，只能是史大林式與毛澤東式的「新封建」統治，甚至是波爾·波特式的狂妄與野蠻的殘殺罷了。

因此，我絕對不以為托派運動是一個「注定失敗的事業」。過去不會是，將來也不會是。在今後，我深信只有托派主張，特別是它有關民主與國際主義的立場，才能使今天陷進窮巷而力圖改革的中蘇等國

家找到正確出路。這在另一個意義上，也就是說，只有這個運動獲得成功，才終於能使人類不會睜着眼睛走向自我滅亡的災難。

也因此，我非但不為我過去的思想行為感到「後悔」，反而以我能將一生參加於此一「悲劇」為榮。至於我這本書到底是中國托派運動的一首輓歌，或者，它將成為國際托派運動全面勝利時那首凱歌的一支短小的序曲，我不想作任何猜測，只有歷史老人才能回答的。

最後，我必須對已故的比艾·佛朗表示懷念和感激，他是我這本書的熱心讀者之一，是第一個企圖將它譯成法文的人。這裏，我更要感謝馬丁妮·波那堂娜與比艾·羅舍二位同志，沒有他們無私與熱情的幫助，沒有他們的翻譯與推薦，這本書是絕無可能與法國讀者見面的。

1987年7月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版英譯普及本序

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決定重印我的回憶錄的英譯本（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1980年初版），使我非常高興。

這個重印本的問世可以說適逢其時，它正趕上了史大林主義的總崩潰。自從去年春夏之際開始，在那個「社會主義」陣營的所有國家裏，發生了，而且還在發生着天翻地覆的變化。這個變化來得如此的富有戲劇性，以致不論是贊成或反對史大林主義的都竭力想弄清楚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要弄明白史大林主義今天何以會崩潰，我想，首先得知道它過去是怎樣形成的。我這本書的主要內容，亦即它的中心故事，就是敘述一個中國革命者與他的同志們一起，從1927年開始，最初在蘇聯，然後在中國，如何反對史大林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的全部經歷。當然，這點經歷是有限的、部分的，但它總已提供不少資料，讓人能夠形象地看到史大林主義及其變種毛澤東主義如何產生、興起以及它們在蘇聯與中國的終於得勢。並且在某種限度內，它或許能幫助人們去預料史大林主義及其制度的未來。

新局勢提出了新問題，或者應該說，新局勢重新提出了一些久已被認為不成問題的老問題。趁着這個機會，我很想談談它們。這些問題中最常見的或最多聽到的有：史大林主義到底是不是社會主義？它的崩潰是否證明了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破產？能夠與將要代替史大林主義的是否只能是資本主義？從此以後，資本主義是否將永存不替；而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將以反動的空想而記錄在歷史的總賬上？

我對這些問題的總回答是一個「否」字。我曾經將我一生中最大部分精力花在為社會主義而反對史大林主義的鬥爭上。這個事實本身縱使在某種程度內影響我的思考，卻不是使我用「否」字來回答問題的主要理由。在新局勢中，即使老問題也必須聯繫新事實來考慮、來解答的。面對上述諸問題，我確實好好地思索過了。我也儘量考慮過別人對這些問題所提出的意見。結果我還是認定史大林主義的破產絕不等於社會主義的破產。我仍然不相信資本主義會「萬壽無疆」，我仍然相信人類的前途有賴於真正社會主義的實現。

非常遺憾，我的健康情形不允許我為這些信念作充分的理論說明。同時一篇短短序文也不是大發議論的合適場所。為了稍稍補償一下這個遺憾起見，我這裏想借用喬治·奧威爾在五十二年前寫下的一段文字。那是他在評介佛朗次·鮑克諾博士(Dr. Franz Borkenau)所著《共產國際》一書的文章中說的：

鮑克諾博士以為共產國際政策諸多錯誤的根本原因，在於馬克思與列寧所預料的，而且在俄羅斯多少已經發生了的那種革命，在先進的西歐國家中，至少在目前卻是談不到的。我同意他這個看法。可是接下去，當他說西方民主國家的前途只能在或者是法西斯主義，或者是通過所有階級的合作來實行一種有秩序的改造，這時我卻與他分道揚鑣了。我不相信有第二種可能。因為我不相信一個每年收入5萬英鎊的人，能夠或者願意同一個每周收入5先令的人合作的，他們之間那種關係的性質十分簡單，那就是其中的一個人搶劫另一個人；我們沒有理由相信那個搶劫者會「改過自新」。因此，如果西方資本主義的那些問題真要得到

解決，看來只有一條第三途徑，經過一次真正的革命運動，亦即經過一次這樣的革命，它能實行各種激烈改革，如屬必要，它又能應用暴力來實行這些改革的；但在同時，它卻並不像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對待民主的方式，它是能夠保持民主政治的基本價值的。這樣的事情決非不可想像。在許多國家中早已存在着這種運動的萌芽，而這些萌芽是會生長的。無論如何，如果它們不能生長的話，那末我們正生息其中的那個豬圈是沒有出路的了。（見1938年9月22日《新英周刊》）

我不是「奧威爾主義者」，但是在上引這段話中，除了我不同意他表示同意於鮑克諾的看法，即認為馬克思與列寧所預言的革命不可能發生於西方民主國家這一點外，我都可以同意，都認為說得很好——當然，他筆下的「共產主義」一詞是必須改為「史大林主義」的。社會上存在着階級是事實；要求「搶劫者」與「被搶劫者」自願合作是空想；希望「搶劫者」自願「改過自新」，自願放棄「搶劫」，那更是自欺欺人。奧威爾所期望的第三條道路，即既非法西斯主義，又非史大林主義的道路：它一方面能實行激烈的、必要時不惜憑藉暴力來進行反對與打倒「搶劫者」階級的革命，同時，在另一方面能竭力保持並擴大人民數百年來鬥爭得來的民主權利——確實是人類能脫出「豬圈」，能進入平等、自由與民主的唯一道路，也是實現社會主義的唯一道路。

可是這樣的道路與托派共產主義者的歷來主張有什麼相干呢？依照通常的看法，托派之異於史大林派者，不是只在於前者比後者更激烈，更可怕，更主張獨裁和集中，更不要民主嗎？這樣一種籠統抽象的說法，非但不正確，而且是有意的歪曲。我不敢說，奧威爾所說的「運動的萌芽」是否指的托派，或包括托派；但我應該說，托派的立場

正是代表了這種「萌芽」。托派過去의思想和實踐，在我所講的故事裏已多少作了敘述。它們是否像人們所指責，讀者們讀了我的回憶，至少在中國問題上已可以作出自己的判斷。這裏我只想再指出這樣一個事實：正是托洛次基和他的一群同志們，最早（1923年起）與最有系統地（在《新路向》一書中提出一連串的主張和批評）出來反對蘇維埃國家的墮落；正是他們，一貫反對「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幻想；正是他們最早與最不妥協地起來反對官僚獨裁，要求工農大眾的民主，並要求蘇維埃內部實行多黨制，要求共產黨內部准許派別存在。他們一直進行這種反官僚鬥爭，直至被革職、被開除黨籍、被送進監獄或被逐出國，以至被處死或被謀殺。

總之，那是托派，而且只有托派，在過去七十年中，恰恰為了實現上引奧威爾所期望的「第三條道路」而鬥爭，而不惜付出一切代價的。

今後的世界，無論目前正陷於分崩離析、彷徨覓路的原有的「社會主義」國家，或者表面繁榮而實則充滿矛盾的資本主義國家，要想找到真正出路，是否只有依照托派已有文件中定下的具體方案呢？我不這樣想：人事太複雜，「歷史老人」太狡黠，任何個人或任何團體制訂的方案，總得隨事變的發展而發展。但是，就基本方針說，我深信，只要這個社會裏「搶劫者」與「被搶劫者」，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對立繼續存在，那末托派的方針，亦即馬克思當年定下的方針是不會過時的。

這個本子完全是牛津版的重印。除了校正初版中若干印刷上的錯誤，以及英譯者對他的導言略作改動與補充外，這裏只增加了本書原有的最後一章：〈在寂寞中思索〉。這一章當初為應出版者削減字數的要求而割捨了的。此外，我又將我為法譯本所寫的序言附在後面。

我這裏要對 Alexander Buchman 表示深深的感謝。沒有他長達二年的不懈努力，這本書的出版是不可能的。他是我五十年前在上海結識的老朋友，我們曾經在那裏一起工作，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

利用這個機會，我還要對本書的英譯者 Gregor Benton 表達我對他久欠的謝意和感激。多虧他的既忠實而又有創造性的翻譯，我這本回憶錄不但和英語世界的讀者結緣，而且還能藉以轉譯成德、法文字，與更多的朋友們見面。他不但是我文字上的合作者，而且是我生活上的一位支援者，沒有他的幫助，我最近十五年的歐洲流亡生活會遭到更多困難。

1990年4月

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統一大會寫給國際書記處和 托洛次基的信（第一號報告）

親愛的書記處諸同志：
親愛的托洛次基同志：

中國反對派的統一大會已於五一這個歷史紀念日在上海召開。出席代表共 17 人，另有四名列席代表。他們一共代表了（原屬於四派的）483 名成員。大會通過了我們的共同政綱，還通過了別的幾個決議案——這些議案是預先在統一委員會中起草的。大會選出一個全國執行委員會（其中包括九個正式委員和四個候補委員）。全國執行委員會又選出其中五人組成書記處。我們的組織已定名為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它的機關報定名為《火花》。我們的政綱與各個決議案將於最近將來翻譯成歐洲文字。

中國反對派的統一引起了反動派的注意，也引起工人大眾的注意。我們相信，在國際左派反對派的領導之下，它定能完成它偉大的歷史任務。我們希望今後在（國際）書記處與中國支部之間能建立起經常的與密切的關係。

托洛次基同志的圖書室被焚毀的消息，我們是從資產階級報紙上獲悉的，現在又讓你們的通告給證實了。我們已設立一個特別委員會，為重建托洛次基同志的圖書室募捐。

致

反對派的敬禮

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書記處

書記處書記 陳獨秀

組織部主任 陳亦謀

宣傳部主任 鄭超麟

黨報主編 王文元

書記處秘書 宋逢春

1931年5月9日 上海

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 執行委員會寫給托洛次基的信

親愛的托洛次基同志：

從資產階級報紙上我們得悉您那個無法估價的珍貴的圖書室被焚毀，這消息又讓國際書記處的通告給證實了。對此，我們感到最大的痛惜。為得重建您的圖書室，我們已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進行募捐。

四個分別存在的中國反對派現在已經統一了。我們希望這個好消息能多少補償您新蒙受的巨大損失。

統一大會是在5月1日這個歷史紀念日召開的。從各個反對派團體選出了17名代表，此外還有4名代表列席。我們（預先）起草的共同政綱和其他決議案已由大會通過。這些文件在最近將來會翻譯成外文。從今以後，中國反對派是一個單一組織了，它的口號也將是單一的（按：上面這句話原稿上無法認清，大意如此——譯者）。關於中國的一般情況以及我們這個運動的特殊情況，我們將會給國際書記處和您另寫詳細報告。

致

共產主義的敬禮

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執行委員會

1931年5月5日 上海

* * *

按：上面這兩封信，都是從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收藏的托洛次基檔案中找到的。未編號，原件都是英文。第一封信又附有打字的俄文翻譯稿。我把它們翻譯出來，作為附錄之一，因為——

中國托派的這一次大會，不但是中國托派歷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一件大事。但因開會後不及一月，組織便遭到極其嚴重的破壞，大會的所有文件和記錄都損失了。

這次大會的經過，因此只保留在少數幾個參加者的記憶中。沒有文件幫助，各人的記憶勢必有所不同。例如出席大會的代表究有幾人，這和出席中共第一次大會的代表人數一樣，長期間定不出一個確實數目。這個簡短的報告都確切地解決了問題，正式代表 17 人，無表決權代表四人，他們代表了原來分屬於四派的 483 個成員。它又告訴我們：大會給新組織選出的領導機構包括九名正式委員，四名候補委員。從九名正式委員中又選出五人成立書記處。未來機關報的名稱也決定了：定名《火花》。

上述諸點，都是與鄭超麟的憶述的相符（見本書〈從四派到統一〉一章中與此有關的校者注）。又從二信的筆跡與粗淺的英語來判斷，寫這信的人確實不是羅漢而是我。—— 1993 年 8 月，王凡西。

各家書評摘引

一、泰瑪拉·獨伊徹 (Tamara Deutscher)

王凡西的這本回憶錄，從好幾個方面來看，都是一個獨特的文件。在政治方面，它回顧了從 1919 到 1949 年期間發生在中國的革命鬥爭，它是由一位鬥爭的參加者，由這個運動的老戰士之一來講述的。它講的又是一個優美與動人的故事——是將一生完全獻身於共產主義崇高理想的故事，是以感人的謙遜和自抑來敘述的一個堅決與勇敢的故事。

……

那些最具理想主義的革命家們（中國托派），在那改變亞洲面貌的巨大鬥爭中幾乎不曾起過實際作用，這是事實。但是，他們在這個大鬥爭的歷史上卻還是取得了一個光榮的位置。王凡西，也許是中國托派中不曾瘐死在蔣介石與毛澤東監獄中的最後的生存者，現在寫下了這些戰士們的努力的寶貴記錄，因此，他會贏得未來歷史學家們的尊敬和感激。

（見 1981 年 4 月號《今日馬克思主義》雜誌）

二、馬丁·凱脫爾 (Martin Kettle)

英國《衛報》評論員

在二十世紀的歷史中有的是政治流亡者，其中只有少數幾位，由於命運之戲劇性的逆轉，勝利地結束了他們脫離故土的漂流歲月——有如列寧、莫加其、霍美尼。這些流亡者中的極大多數卻是像聖經創世記中的伊希美爾一樣：始終是漂泊流浪，默默無聞地終其一生的。

中國的托派，比之以近代其他一些（革命）流派，有更大的可能會遭到此種湮沒無聞的命運。跟俄國的托派一樣，中國的左派反對派在革命鬥爭中曾經遭受到迫害、鎮壓、以致於四散流亡，他們的文獻記錄遺失了，他們的存在被官方的黨史肆意抹煞了。

王凡西是少數現尚生存的見證人之一。1957年，在葡萄牙殖民地澳門，他決心把他所知道的有關中國托派運動的種種寫下來。他原是這個運動的領導人之一。他用回憶錄的方式來寫這段歷史，但他堅持不把它寫成為太屬於個人性質的自傳。他將自己的種種回憶聯繫貫穿起來，並依據少量由他從中國攜帶出來的文件，寫成了這本書。……

（見1980年10月23日出版的《新社會》周刊）

三、矢吹晉

《雙山回憶錄》日文本翻譯者，橫濱市立大學商學部助教授

著者曾經說：這本書只是一個中國托洛次基主義者的回憶錄，它不是一部中國托派史；但是讀者卻能從中知道中國托派的發源、發展和失敗的經緯。對於中國托派的歷史，我國除了因彭述之關係而作的若干介紹外，可說完全不知。這部譯作卻填補了這個空白，有助於我們對現代中國的理解……

（見日文本《回憶錄》譯者於 1979 年 3 月所作小序）

四、詹納爾（Bill Jenner）

澳洲國立大學教授

王先生的書對他的個人生活幾乎完全不談，但這本書卻給了讀者以一種精彩的敘述——敘述了一個人如何發現了他在人生中應扮的角色；並且如何頑強與堅韌地扮演這個角色的一種情景；任何一個不為偏見蒙住眼睛的讀者，都會被這個富有人情的文件所感動，並且承認它作為中國革命第一手記述的那種價值。……

（見 1980 年牛津版回憶錄〈前言〉）

五、鄧玉汝教授 《陳獨秀年譜》作者

《雙山回憶錄》作者王凡西是一位托洛次基主義者。他所寫的這本書，據筆者所知，是中國托派成員中唯一的一本自述。本書文筆清暢，內容樸實無華。僅僅基於此點，這本書就值得注意。

……

綜觀《雙山回憶錄》一書，所記固是二十年中個人的經歷，重心卻在記述中國托派的興衰。歷歷直陳，不厭煩瑣。凡研讀我國現代政治社會思潮者，此項第一手的資料，不可不讀。……

(見 1984 年 12 月《中報月刊》〈雙山回憶錄讀後〉)

六、英國《經濟學人》周報

……

王凡西君的故事從那個時候開始，當時莫斯科約莫有 200 名中國學生——約等於孫中山大學與東方大學中國學生的半數——傾向了左派反對派，反對史大林，而此時（1927-1929）托洛次基已被打倒，並且已被流放了。本書作者是這個中國學生中的反對派的發起人之一，目前他也許是他們中間唯一的生存者。當他回到中國之後，他在莫斯科的一位接替者將托洛次基主義者出賣給史大林的秘密警察，然後，此人自己懸樑而死。史大林於是逮捕了這些左派，……接着，他把他在學生中的傀儡王明扶植起來，去充當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並因此釀成許多災難。

作者這一段敘述乃是這本書中最精彩的一章，另外一章也讓人極感興趣，那是他本人在蔣介石監獄中的悲慘經驗的回憶。至於那幾百個托派被中共開除及內部派系糾紛，則是令人讀着煩厭而且悲慘的。那些比較軟弱的兄弟們讓國民黨的鎮壓給壓倒了，其中有一人甚至當上了蔣介石秘密警察的一個頭子。而其餘（比較堅強的）大多數同志則首先被國民黨，接着被日本人殺害或監禁了。

（見 1981 年 2 月 14 至 20 日的周刊）

七、理察特·C·卡庚教授 (Prof. Richard C. Kagan)

這本書產生於葡萄牙的小殖民地澳門，它的起始發源是寂寞與寒愴的。最初的本子是用手寫在脆薄的蠟紙上，僅僅油印了 20 本。其中一本為一位斯堪地納維亞的水手（這裏，由於傳聞失實，卡庚弄錯了。將這本油印的回憶錄帶到歐洲去的是一個中國海員，是著者的朋友兼同志——梁四。——編者（樓國華）1993 年 8 月注）在香港取得。他將此書帶到日內瓦的海員工會總部。一位女漢學家的丈夫從那裏獲得了這本書，再由他轉到我的手裏。這個油印本子現藏於美國康乃爾大學的圖書館。此書（指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英譯本）的譯者大概是從著者本人那裏獲得這個本子的。

……

王的一生記錄是有價值的，因為它並不是怨天尤人的情緒發泄與教條式的判斷。它是介於自傳與歷史之間的東西。它不是作者個人的生活記錄，可也不是廣泛的歷史敘述。對於歷史家來說，最能引起興趣的，乃是他所描寫的如何與彭述之——這個現尚在世的唯一的中國托派領袖——之間的衝突，或者、是他論及托派對文化與文學發生影響的地方。

這部書有三個最重要部分：1、關於當年莫斯科中國學生的生活與史、托二派之間的鬥爭……；2、對於工人運動的分析以及他對中共與托派在這方面的批評……；3、他談到那由五四運動中發揮出來的諸原則：民主、文化表達的自由與廣泛的人道主義——從而提醒人們：五四時代的遺產並不限於偶像破壞；並不限於狹隘的民族主義與關於階級鬥爭的教條式的看法。

……

（見 1981 年英文《中國季刊》秋季號，528-529 頁。）

八、李福仁（法蘭克·格拉斯）（Frank Glass）

.....

我覺得，無論作為一種政治性的遺教，或作為對年輕一代革命者的教育材料，這本書都是有價值的。在托洛次基主義的文獻中，於此增添了一個很有用的文件。

.....

還想說幾句與我個人相關的話。你的回憶錄當然勾引起我在遙遠的上海過的那些日子，讓我記起我和中國同志一起幹的工作。如果我們的努力不曾產生出預期的結果，如果在第二次中國革命中我們的人被擠到一邊，可是我們至少在黑暗的反動條件下保持了革命馬克思主義的傳統。我們保證了我們的運動的繼續向前。對於這項成就，誰都不能低估它的重要性的。

好了，親愛的朋友，當你的回憶錄的英文版問世之時，我向你祝賀。

（1981年1月23日給作者的信）

九、比哀·佛朗克（Pierre Frank）

第四國際領導人之一

.....

讀着你的書，我非常激動。我要想盡一切辦法，使我們更多的同志讀這本書。這本書是以中國的幾次革命作背景的。他們讀這本書的時候，將會看到我們的運動並非像他們一向所見的那樣：只是一些思想、原則、政策等等；而且——從你的書中看到——又是由懷着希望、受盡苦難、具有（高尚）品質而又非沒有缺點的人物所推動的。

.....

（1980年11月16日給作者的信）

十、烏爾立奇·曼采爾（Ulrich Menzel）

德國漢學家

誰想知道一點關於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到現在為止，總只能或者去讀一本被黨核准了的書（例如胡喬木寫的《中共三十年史》），或者去讀王明寫的自傳《中共五十年與毛澤東的叛變》。……讀這兩本書，人們得到的一種完全相反的印象。但雖如此，這兩本黨史卻具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它們都在極大程度內完全抹煞中國共產主義的第三個流派——托洛次基主義派。

王凡西的這本回憶錄（法蘭克福社會主義出版社出版），卻不僅彌補了這個缺陷，而且，即使對於相當熟悉這方面歷史的人來說，也開闢了一個新境界。

……

（見1984年3月號德國法朗克福出版的《新中國》雜誌）

十一、保爾·勒·勃朗克 (Paul Le Blanc)

美國社會主義者，作家

凡是參加革命社會主義運動的人，一定會有這樣的感想：他們是在繼承一個革命傳統，而這個傳統是反映着成千上萬、最有遠見與懷有理想的先驅者的生活和熱情的。這些同志們生活在與活動在不同的國家與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我們不知道他們的名字，也不知道他們的生活經歷。這樣的同志是為數甚多的。不過也常有這樣的事；時常有人從世界的某地給我們帶來了消息，讓我們至少能夠活生生地看到這些人中的幾位。這時候，歷史與理論便變成不再是抽象的東西了，它們給賦予了個別人物的呼吸和脈搏，他們用思想、感情與經驗使革命運動生動起來了。王凡西的《回憶錄》便是起了這樣一種作用的。

……

(見美國紐約《保衛馬克思主義公報》1992年5月號第96期)

十二、班國瑞博士 (Dr. G. Benton)

英國里茲大學東亞研究系高級講師

王凡西的回憶寫到 1952 年為止。這個年頭，對於他曾經協力造成的那個運動來說，是異常陰暗與令人沮喪的一年。毛派得到了意外的勝利後，許多中國的托洛次基主義者最初認為北京的新政權決不會超越它的資產階級性質。但是，這新政權彷彿跟這些人的預見開玩笑似的，它很快開始向激烈的反資本主義的道路上前進；它似乎已處於無懈可擊的地步了。當托派遭到如此嚴重失敗的時候，王仍能堅決反對毛派，並且對自己的想法仍抱毫不動搖的樂觀態度，那是由於他深信：一個制度如果它的決策大權僅僅操於一小撮「精英分子」之手，而對任何不同意見都加以粗暴鎮壓的話，其結果必然會促成它自身的毀滅。……

(見哥倫比亞大學版《回憶錄》的譯者導言)

毛澤東思想與中蘇關係

三 原 著

信達出版社印行

第二部分 毛澤東思想與中蘇關係

序

- 一、走上了國際舞台
- 二、「分歧」發展中的五個關鍵問題
- 三、國際爭論中的毛澤東思想
- 四、兩個根本原因

序

本書內容，原本是我另一部稿子中的四章。只為了出版方便，才單獨拿出來先行付刊的。

我的另一部書是《毛澤東思想論稿》。那是一個相當大的企圖，企圖對毛澤東思想作一種全面的，客觀的與歷史的研究。全書共十六章，本書乃是它後面的四章，——專門討論毛澤東與毛澤東思想和中蘇衝突的關係。

《論稿》開始寫於1961年之春，草成於1964年8月。因此，文中所涉及的毛澤東的言行，自只能以發生在1964年秋天以前者為限。

自從那時到現在，不用說，「橋下已有大量的水流過了」。同時在這個時期中，採取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形式，毛澤東思想有了驚心觸目的表演，而那個思想本身，似乎也有了「飛躍發展」，似乎也有了新的意義。

那末我們這幾篇數年前的舊稿不加改作地拿出來付印，是否合適？是否有用呢？

我想是合適的，因為這幾章裏敘述的是中蘇共衝突的歷史，所研究的是衝突之深遠的原因。近三年來新材料的出現雖於史實有所增添，但基本上不能改變我們的敘述；這幾年中的事實發展，更不會影響到我們關於原因的論斷。同時我想這也不會無用的，因為中蘇衝突，用毛澤東的話來說，乃是他「反對蘇聯修正主義的鬥爭」。可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不小範圍內，卻正是那「反修鬥爭」的結果，或者可以說，毛澤東這個對內鬥爭，多少也就是他對外鬥爭的產物。二者之間有着不可分割的因果關係。所以要正確與深刻地了解毛澤東反對「中國赫魯曉夫」鬥爭的原因，必先正確地知道他和蘇聯赫魯曉夫們鬥爭的經過，必先深刻地了解他和蘇聯赫魯曉夫們鬥爭的意義。

可是為了知道其經過並了解其意義，我相信，本書是可以——至少在相當限度內——滿足人們要求的。

臨了，我希望以本書為其中一部分的我的那部《毛澤東思想論稿》，不久也能和讀者相見。

* * *

上面這幾句話寫於 1966 年 11 月間，因為當時曾經有將本書出版的計劃。計劃終於沒有實現，一耽擱，轉眼又將五年了。

現在，離稿子寫成竟已有七年之久，卻真的有了出版機會。在接受出版者的提議之前，我不免有多少疑慮：是否真的還值得付印呢？於是將稿子再讀了一遍，結果，答案倒是肯定的。

如果，我這幾篇東西是新聞記者式的報導，不用說，到了今天只配拋進廢紙箱了。如果它是所謂「中國觀察家們」半逞幻想半賣情報式的作品，那更不用說，毋需等到今天，本就應該付之一炬的。

但我這書既不同於前者，更不同於後者。它是嚴肅的研究——雖然也還只是一種企圖，是作者對於當前世界的巨大事變，對於今後人類的某些根本問題，以毛澤東思想作引子，配合在中蘇共衝突的史實中，站在科學社會主義的原則立場上，全面思索之後所提出的一份報告書。

這樣性質的作品（好壞正謬是另一回事），決不會在短短數年中變得不合時宜。因為這裏的時間尺度不是十年八年，甚至不是數十年，而竟是上百年的。

當然，如果讀者中有誰只願將它當政論讀，當史料看，我想也不會一無所得的吧。

1971年9月 三原序於香港

一、走上了國際舞台

所謂「中蘇思想衝突」，若就毛澤東思想的傳記角度看，可說是此一思想從一國範圍擴展到國際範圍的表現。毛澤東思想於 1945 年在中共內部取得了法定的一尊，復於 1949 年因革命勝利而確立了對全國思想的控制。一種思想既然征服了一個國家，不管它是純憑思想的說服力也好，或借助於軍政的威懾力也好，其勢力一定要越出國界，向世界「進軍」的。這情形在過去的時代裏已如此，當四海業已一家的今日自然更要如此。

不過毛澤東思想之國際影響，卻遠落在中國革命的世界影響之後。中國革命一經勝利，對全世界便立即發生了巨大影響。它影響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勢力的比重，也影響了兩個陣營在政治、經濟或軍事的任何方面。可是作為此一革命的思想旗幟的毛澤東思想，卻不曾在世界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運動的思想派系中，很快發生任何值得注意的作用。

至少這和俄國十月革命時期的列寧思想的情形，是完全不同的。十月革命一爆發，列寧思想便和俄羅斯工人階級的捷報同時傳遍了五大洲，在一切進步人群的心智上，特別在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激起

了空前未有的動盪，燃起了偉大希望的火焰，並且在非常短暫之間，形成了一個全新的、以列寧思想為指導的國際共產主義的組織和運動。

為什麼俄國革命勝利後列寧思想的影響，與中國革命勝利後毛澤東思想的影響，有如此顯著的不同？原因當然要從兩種思想的形成過程及其本身性質中去尋找。

十月革命勝利以前，作為馬克思主義中特殊一派的列寧思想，最少可以說已確立了十二年。它首先在俄國社會民主黨內，然後在整個社會主義國際內，獨樹一幟，團聚了最革命的分。列寧，與歷史上稀有的真正大天才一樣，是一出場就嶄然露頭角的。早在十九世紀的九十年代，這個二十掛零的年青人就已經精通了馬克思的全部學說，並藉此去研究當時世界的、特別是舊俄羅斯的種種關係，把握歷史發展的規律，階級鬥爭的法則，尤其是分析與消化近代革命的經驗，由此得出了自己的獨特見解。列寧關於俄國革命的基本戰略思想，關於世界革命的總路線，與社會民主黨的，乃至與整個第二國際的傳統思想根本對立。他的整套思想確定形成於兩個世紀之交，發揚光大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後，終於由十月革命加以證實和體現。這裏，十月革命恰好像一次成功的科學實驗，它把列寧關於革命的科學假設，在所有的主要點上悉符原意地證實出來了。以致人們有理由說那是列寧思想導成了十月革命，同樣也有權利說這是十月革命實現了列寧的思想。這裏列寧思想與革命勝利之間的關係，其密切程度竟有如一位巨匠打下的藍圖與那據以完成的大廈之間的關係。這樣一種思想，這樣一種高瞻遠矚，怎能不因那壯麗無比的建築物之出現而為人景仰呢？因此，列寧思想之隨十月革命之震動世界而震撼人心，那是十分自然的。

還有，列寧是一位徹底國際主義的革命家。他一貫從世界革命的總戰略來考慮俄國革命，即把俄國革命認真當作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來處理。這種國際主義精神，表示在列寧一生的全部文字與事業中，而最具象徵性的則可說是那個著名的「四月提綱」。我們知道，這個提綱是俄國十月革命的戰略計劃，它像羅盤針似的指引着俄國布爾雪維克黨與工人階級走上了政權。但有趣的是，這個實踐的、戰鬥的、俄國的革命計劃，卻緊密地結合着理論的、原則的與國際革命的因素。以致它以「革新國際」作結，主張「發起建立革命國際，建立反對社會沙文主義者和反對『中派』的國際。」事實也正是這樣發生的。新的國際幾乎同新的工人國家同時誕生：第三國際的正式成立，僅僅後於蘇維埃政權的成立十六個月。

徹底國際主義的思想及其實踐，不用說，必然要在國際上立即發生深遠影響。

可是毛澤東思想的情形卻大大不同。首先，他是個「未識中國，不學希臘」的人。他主要是一個民族規模的革命家，土生土長，不染洋氣，甚至還鄙視洋氣。

從我們上面的敘述中，讀者們可以看到：無論就個人氣質，就文化背景，或就教養的過程說，毛澤東都不可能是、事實上也不曾是，以全副武裝了的馬克思主義戰略思想家資格，投身到革命鬥爭中去。他是在工作中摸索，在鬥爭中學習，逐漸由革命實行家長成為革命思想家的。與馬、恩、列三人不同，他主要不是先以思想家資格在革命隊伍中確立其地位；但與史大林相似，他憑革命隊伍中的既得地位來建立其思想家身份。這兩類思想家的性質不同；他們思想的價值也差得甚遠。前一類自然比較難能，也比較可貴，因為他們能高瞻遠矚，

能處處從原則出發；後一類之所以較為卑下，較為普通，因為他們往往急功近利，經驗主義，胸襟見解都難免比較狹小。

以思想家論，毛澤東的地位究竟能有多高？這問題我們不在這裏談，因為前面已經談過許多【朱正按 參見王凡西《毛澤東思想論稿》】。這裏我們說明的只是這個事實，為什麼中國革命勝利不曾像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一樣，在全世界的社會主義運動中，立即發揮巨大的思想上的影響力。此中原因自然不止我們上面指出的那一個；但「毛澤東思想」本身的局限性，特別是中國革命勝利並非證實了或體現了毛澤東思想，而是在許多基本點上駁斥了他的思想，（我們在論戰略問題的一章中已經詳盡地證明了這一點。）這個事實【朱正按 參見王凡西《毛澤東思想論稿》第四至六章】，應該說是毛澤東思想與列寧思想在各自革命的勝利之後，發生了不同影響的大原因。

不過沒有隨中國革命勝利而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發生立即的與巨大的影響，並不意味毛澤東思想不曾發生影響。中國這個國家在現代世界上所處的重要地位，中國革命對於帝國主義統治所給予的沉重打擊，以及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所起的巨大作用，都命定着中國革命的頭號領袖的思想，遲早要以此一或彼一方式對世界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運動發揮影響。

如今，當中國共產黨取得全國政權的十三年後，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終於讓我們看見毛澤東思想全身披掛，公開出來作最高領導權的爭奪戰了。

這當然要構成毛澤東思想研究的一個專題。在毛氏思想發展的傳記上，更將形成非常重要的一章。在這裏，我們擬從四個方面去研究它：

1. 毛澤東思想從一國獨霸進向國際爭霸的過程；
2. 中蘇共思想衝突的切近原因；
3. 在大爭論中起了主要作用的幾點毛澤東思想；
4. 中蘇共衝突的兩個根本原因。

要談第一個方面，我們先得回顧一下公開爆發之前的醞釀過程。這個過程是無法截取得太短的，至少要從中國革命的勝利講起。

中國革命勝利前夕，毛澤東在他著名的文章〈論人民民主專政〉中，相當簡潔地說明了中國革命與中共，和俄國革命與聯共之間的關係。他說：「謝謝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史大林，他們給了我們武器。這武器不是機關槍，而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你們一邊倒』。正是這樣。一邊倒，是孫中山的四十年經驗和共產黨的二十八年經驗教給我們的，深知欲達到勝利和鞏固勝利，必須一邊倒。積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經驗，中國人民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他又說：「『不要國際援助也可以勝利』，這是錯誤的想法。在帝國主義存在的時代，任何國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沒有國際革命力量在各種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勝利了，要鞏固也是不可能的。偉大的十月革命勝利和鞏固，就是這樣的，史大林早已告訴我們了。」最後他說：「……在列寧和史大林領導之下，他們不但會革命，也會建設。他們已經建設起來了一個偉大的光輝燦爛的社會主義國家。聯共就是我們最好的先生，我們必須向蘇聯學習。」

毛澤東在這裏說明了師徒關係，說明了支援與受援關係，說明了兩黨與兩國之間的親密關係。不過特別有意思的，卻在於這篇文章記錄了當中國革命勝利之際，中共對蘇共，中國對蘇聯，以及毛澤東

個人對史大林，處於怎樣一種感情狀態。因為，我們知道，兩個方面的關係並非始終如一，感情狀態屢經變化。在此以前，中蘇共產主義者間沒有國的關係，但有黨的關係。自從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到那時已滿二十七年了。在此期中，兩黨關係不能說完全正常，路線的決定，領導的更迭，權力多半操在克里姆林宮的主人手裏。這裏多的是主奴之分，少的是兄弟之誼。毛澤東與史大林的關係，歷來更是不洽。不洽的原因，並非在於思想上的歧異，倒在於性格上的類似。二人都是實力主義者，都是狹隘的一國社會主義者，都是高明的實行家，都是偉大的策略家。基於「同性相斥」的原理，史大林多半不會幻想去支配毛澤東，毛澤東也決不甘心接受史大林的指揮，二人的搞不到一起是注定的。所以在1935年以前，毛澤東經常受着史大林直接代理人的排擠和威脅，務欲使他倒下去爬不起來而後快。等到1935年以後，毛澤東在黨軍兩方都樹立了無可爭衡的地位，史大林只好消極地容忍他，讓他去自力圖存，或甚至於自生自滅。自從中共在陝北建立根據地起，中經抗日戰爭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直到國共再度內戰，終至革命勝利，前後十四五年間，我們很難看出史大林對毛澤東有過怎樣大的幫助。當然，因為種種關係，從來莫斯科對中共的支持是保守秘密的；但雖如此，只要是相當數量的物質援助，無論是普通性質或軍事性質的，總不能不讓人知道，但迄今無人能提出證據，證明中共曾經在那個時期獲得過此種援助。蘇聯在中日戰爭的初期，曾經援助過中國，但正如後來在中蘇簽訂友好同盟條約時用明文規定下來的那樣：「此項援助當完全供給中國中央政府，即國民政府。」（見同盟條約有關的照會甲。）在「理論上」，中共可以從蔣介石手裏間接獲得蘇援，而事實上卻從來不曾拿到過。所以終抗日戰爭時期，我們應該相信，中共確實是自力更生，憑自己的奮鬥來圖存與擴大的。那末，等到戰爭結束，八路軍進入東北以後，究竟史大林與毛澤東之

間，特別是蘇聯紅軍與林彪軍隊之間存在着怎樣的關係？根據可能接觸到的材料，有着完全相反的報導，一個極普遍的說法是：馬林諾夫斯基曾將日本關東軍的軍械武裝了林彪部隊。可是這種說法，卻為最有資格的人士所否定，例如當時前來「調停」國共關係的馬歇爾將軍就說過：並無任何證據可以證明中共受俄國支持（見1947年1月12日《紐約時報》）。還有當時駐華的美國大使司徒雷登，在1947年10月也說過：關於中共「接受莫斯科物資援助一點，極少證據」^[1]。這兩個人的證言是很有價值的，因為這兩位代表美帝國主義利益來華，「調解國共衝突」而終於失敗的主要負責人，沒有任何理由要替蘇聯或中共撇清——如果確有蘇援的證據的話。同時以彼二人當時所處地位的方便，說如果有了這種援助而竟被蒙在鼓裏，也屬難於入信。因此我們有更大理由相信另一種說法，即日本投降後中共對國民黨的鬥爭，並未受到莫斯科的援助，甚至還沒有受到鼓勵。中共主要是憑藉戰後中國工農大眾以及一般群眾的革命力量，憑藉自己的武裝力量，打垮了國民黨的。

史大林為什麼不曾積極地援助中共進行革命的內戰？原因有三。（1）由於對中國局勢的錯誤判斷，並從而得出關於中共政策的錯誤指導。（2）由於自私的（一國社會主義的）俄羅斯民族利益的考慮。（3）由於對毛澤東及其一系的猜忌。

關於第一點，南斯拉夫的卡台爾奇曾經給我們透露了極有價值的消息。1948年2月，卡台爾奇率領了一個黨的代表團來到莫斯科，為的跟史大林討論一些歧見，在討論中史大林順便談到了一些關於中共的話，他說：

……例如戰爭終了之後，我們邀請中國同志來到莫斯科，我們討論了中國局勢。我們直截地對他們說，依我們之見，中國實

行武裝起義是沒有發展前途的，因之勸他們和蔣介石締結一種暫時協定，勸他們參加蔣介石的政府，並解散自己的軍隊。中國同志在此地同意了蘇聯同志的觀點，可是回到了中國，卻反其道而行之。他們積聚力量，組織軍隊，現在，我們見到，他們正在擊潰蔣介石的軍隊。現在，我們承認在中國事件上的錯誤。它已經證明出正確的是中國同志而不是蘇聯同志。（見《鐵托傳》英文本，331頁。）

這段話說明了至少在1948年2月以前，史大林反對中共針鋒相對的政策，不主張它以武力對抗國民黨的武力，卻主張解散共軍，主張參加蔣介石的聯合政府。一句話，便是要中共走戰後法意共黨所走的路，放下武器，回到議會，給資產階級做忠貞的反對派。當時幸虧毛澤東陽奉陰違，自行其是，才算沒有在四十年代重演二十年代的中國革命悲劇，沒有讓蔣介石再度在史大林的幫助之下，屠殺共產黨人，壓服工農大眾的革命。

1948年2月，即當史大林親口承認他對中國局勢看錯了之時，中國的內戰形勢已達到了什麼程度呢？那時，解放軍從守勢的迎擊戰轉入到全國規模的戰略進攻，已經有半年之久。在1947年的冬季攻勢中，無論東北、西北、華東、或晉冀魯豫戰區，都獲得了重大勝利。特別是在東北及華東兩戰區，前者在四平街等著名戰役之後，東北的蔣介石軍事實上已成甕中之蠶，後者則在萊蕪及孟良崗二地區先後重殲了國民黨精銳，已能挺進魯西南，大軍直指豫皖蘇邊區，正在走向十個月後決定內戰最後命運的淮海大會戰了。對着這樣的一個戰爭形勢，當然無需什麼有經驗的眼睛才能看出「中國同志們」的正確。但雖如此，「蘇聯同志」當時的政策還是非常持重的。它在中國內戰中一直保持着中立，它始終信守着只認國民政府為中國政府的諾言。內戰

初期不必說，當時史大林確信中共的武裝鬥爭注定要失敗的，所以在東北，蘇聯紅軍不但等待由美國人代為從海空運來的蔣軍接管城市，甚至當撤兵期滿之後，又一再徇國民黨之請，留下來代為看守那些防區。就是到了1948年初，即史大林已改變對中國局勢看法之後，也還是示忠於國民政府，最明顯的有如：城市一經被共軍佔領，她即關閉該地領事館，而蘇聯大使，則比帝國主義國家任何一個大使表示得更為友好，居然是追隨國民黨政府遷移至廣州的唯一使節。不過更耐人尋味的一件事，卻是在1949年3月間，即在北京解放後兩月，上海解放前兩月，蘇聯竟和國民黨的駐新疆代表，討論了經濟合作計劃。綜上所述，蘇聯在整個國共內戰時期的態度，可說是：1948年春天以前，採取了偏袒國民黨的一種表面中立，而在史大林認錯以後，則採取了暗助共、明幫國的兩面手法。

蘇聯為什麼要採取這種腳踏兩頭船的態度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得說明上述的第二點。

明乎蘇聯共產黨自從三十年代以來的演變史的人，應該知道當時蘇聯的對外政策，其目標早已不是援助被壓迫民族，或發動世界革命。克里姆林宮由一國社會主義的立場出發，在很大限度內復活了沙皇俄國的擴張主義的，對外掠奪的政策。這政策在遠東，特別對於中國，表現得非常清楚。在英美蘇三強簽訂的雅爾達協定上，史大林竟毫不掩飾地要「恢復1904年喪失的俄國的權利」，其中包括了：「大連商港國際化，但確保蘇聯對它享有優先利益，租借旅順，作為蘇聯海軍基地。」他又要求「中蘇共同經營中東路與南滿路，並確保蘇聯在這上面的優先利益。」……這態度和1919年7月，由列寧當權的革命政府在同一問題上的態度，造成了怎樣強烈的對比！那時，由蘇俄代理外交人民委員長加拉罕署名發出的聲明上，是這樣寫了的：「工農政府已向中國政府建

議開始談判，進行廢止 1896 年之條約，1901 年之北京草約及 1907 年至 1916 年間與日本所訂之一切和約，將沙皇政府自行掠取或與日本及聯盟國共同侵奪者，概行交還中國國民。」這也就是說，史大林在 1945 年，恰恰要求在中國恢復列寧在 1919 年聲明放棄了的，那些在 1904 年以前由「沙皇政府自行掠取或與日本及聯盟國共同侵奪來」的特權。史大林政府為什麼在這個問題上會發生如此重大的改變？這問題如果要解釋，需要從蘇聯這個工人國家的墮落過程，從其統治集團的徹底官僚化過程中去尋找。在這裏，我們不想做這項研究工作，所以此地只限於指出這個事實。我們只要記住這個事實就夠了，就是：當二十世紀的三四十年代，史大林政府的對外政策，其中包括它的對華政策，完全是基於民族利益，是普通形式的強權政治的應用，這裏是甚少談得上階級鬥爭與國際革命的觀點的。因此，史大林在中國問題上的主要關心，已不是中國應在什麼階級統治之下，而是如何才能最安全地確保蘇聯在東北、新疆以及蒙古，甚至朝鮮的特殊權益。只要能達到這些民族的與掠奪的目的，他可以不必計較誰是中國的統治者。與一切舊式的侵略者一樣，他最心愛的是柔順的、無力的與容易駕御的工具；他最害怕那些倔強的、自作主張的、強有力的對手。一個由共產黨統治的，階級性質上代表了工農利益的新中國，對蘇聯說，如果蘇聯是健全的工人國家的話，自有百利而無一弊。工農中國的出現，如果從列寧式的國際革命的戰略眼光來看，就是表示着蘇聯國際地位的無限增強，也意味着社會主義建設任務的較易完成，因此，它不但要日夜企求，而且要竭盡全力來促其實現。可是從蘇聯墮落了的官僚層的保守與反動利益出發，中國共產黨的成功與中國之變成強大的工農國家，卻非全屬好事。不錯，這將給美國在遠東的勢力以大打擊。但是這個新興國家是否能如腐敗無力的國民黨中國那樣，乖乖地接受雅爾達要求呢？是否能讓蘇聯置外蒙、朝鮮於「保護」之下？是否讓她自由自在地開發新疆的資源？這些疑問，在

列寧時代的蘇聯是連考慮一下都會等於背叛的；可是在史大林蘇聯的政策考慮上，卻起着極大的作用。大到什麼程度呢？大到，甚至可以不願見中國革命的勝利。這即是說：在史大林的天秤上，蘇聯在中國保持特殊權利，重於整個中國革命的勝利。倘二者不可得兼，他寧取前者而捨後者。我們只有懂得了這一點，才能懂得蘇聯在國共內戰後半期的腳踏兩頭船態度，才能懂得她為什麼要在 1949 年 3 月還在烏魯木齊跟國民黨談判新疆省的經濟合作；才能懂得為什麼她的大使一直追隨國民黨到底，甚至在南京解放前夜，她還如此熱心於「調解國共內戰」，希望成立「聯合政府」。

顯然，中共在內戰中所發揮的力量大大出於史大林意外。解放軍由戰術性的退卻轉入全面戰略性的進攻以後，澎湃奔騰，勢如怒潮，將國民黨數百萬軍隊驅散擊潰，制壓殲滅，那時候感到憂惶不寧者，杜魯門之外，當推史大林了。史大林那時的心境看來不能以喜懼參半形容，因為所懼的遠超於所喜。一個強大的，充分獨立的共產黨中國，對蘇聯官僚在中國特權的保持，一定比腐敗的國民黨統治中國時較為困難。然則怎麼辦呢？公開出來干涉，甚至破壞中國革命嗎？（這對史大林說來並非辦不到的，在許多地方，特別在西班牙革命時期，因為無法控制革命而將革命破壞的事，史大林們是一再幹過的。）可惜中國革命的力量已經太強大了，而且當時整個世界與中國的形勢，即令由克里姆林宮的狹隘利益出發，也不可能，並且不宜於實行破壞性的干涉了。史大林這才從 1949 年的夏季起，即當淮海戰役結束，蔣氏王朝的軍事力量業已基本摧毀之後，被迫改取了積極援助中共的態度，派出大批專家，特別是鐵道專家，前來中國，幫助中共軍搶修平漢等路，促成對長江天塹的飛渡。那時以後，史大林的態度才算一邊倒了，不再保持偽裝的或真實的中立。

至於以毛澤東為革命領袖這個事實，是否影響了史大林對中國內戰的態度。如果是，那末它是怎樣影響了這個態度呢？在這方面，我們當然看不到任何有關的文件或事實。但是我們有充分理由，可以確斷是有影響的，即斷定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領導，曾經是原因之一，使史大林對中國的內戰採取了如上所述的態度。因為史大林不喜歡毛澤東做中共領袖，是有不少事實證據的。許多文件上告訴我們，史大林從來看不起中共，例如1944年1月10日，他對當時美國駐蘇大使哈里曼說：「中國共產黨人不是真正共產主義者，他們是麥淇淋（即人造牛油）式的共產主義者。」後來他又稱中共為「紅皮白蘿蔔」式的共產主義者。這些說話通常被解釋為史大林想愚弄美國人的花招，企圖鬆弛敵人警惕的。可能有這個意思，但絕對不應否認其中確含有史氏對中共的評價在內。由他的直接代理人王明套在毛澤東頭上的那些帽子，舉如「機會主義」，「槍桿子主義」，「農民意識」，「地方觀念」等等，不可能不在史大林的頭腦中造成印象，甚至，這些帽子的製造廠或竟就設在克里姆林宮裏。當毛澤東推倒了王明，執掌了中共的領導權之後，史大林如何對待毛澤東的情形，從李立三在中共第七次大會的發言中，我們可以看出一個非常好的例子。據李立三說，他在海外（莫斯科）十五年，根本不曉得中共的實際情況，「直到1946年初回到哈爾濱以後，我才初次讀到《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初次讀到延安整風文件，初次讀到毛澤東同志的一些重要著作。」由此可見，毛澤東的重要著作，在莫斯科被視作禁書，連留莫的中共高級幹部都不准閱讀，這顯然不是王明這個「國際代表」所能單獨辦到的了。這若非出於史大林本人的主意，至少也曾獲得他的支持。

史大林為什麼不歡喜毛澤東做中共領袖？原因該如我們前面所說，由於思想之差異者少，由於性格之類似者多。「同性固然相斥」，

「惺惺往往不惜惺惺」，「曹丞相與劉使君」畢竟不可能和平共處的。當然這裏的「原始罪過」在於史大林。只因他把各國共產黨當成工具，當成克里姆林宮與其他國家進行外交買賣時的籌碼，所以他一定要嚴格控制各國共產黨，一定要嚴格選擇最柔順的人來做領袖，以便確保他的指揮權。為達此目的，他從來是不顧一切的，他曾經誘殺（騙到莫斯科去，加以捕殺）過不少國家共產黨的最好領袖，也曾有意破壞了那些脫出了他控制的革命。如果毛澤東較少「猜疑」一點，對莫斯科更加天真一點，不堅持他「革命未成不去莫斯科」的信念，那末十有八九，他可能早已喪生在格柏烏的秘密監獄中了。

毛澤東所以能逃過史大林的清算，主要因為他是土生土長，並非由莫斯科訓練；因為他崛起於自己的槍桿子上，並非依靠國際任命；因為他「經濟自給」，並不需要蘇聯援助。毛澤東對史大林從不爭論，更不違抗，可是一切有他自己做法，有他自己的一套；國際有令，合固照辦，不合亦不反對，只給你個「陽奉陰違」。他最大的關心，是積聚力量，鞏固地位；造就既成事實，以實力代替空言。對國內的敵人蔣介石固然如此，對國外的老大哥史大林也是如此。「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句朱老夫子的名言，毛澤東確實是實行得非常到家的。

史大林被人以己道治己，當然要在對手身上認出勁敵，要千方百計施展其猜忌，甚至不惜以種種手段阻撓其成功了。

然則，我們上引毛氏當中共二十七周年紀念時所表示的毛史之間，中蘇共之間的親密友誼，又該如何解釋？

〈論人民民主專政〉特別強調了「一邊倒」，強調了「國際援助」以及對史大林的感謝。這在一方面標誌着史大林對中共態度的最後轉變，另一方面表示出在全國革命勝利的前夕，毛澤東對蘇聯所懷抱的希

望。面對着中國革命勝利這個無可否定的事實，一直不願見中國在毛澤東領導下走上勝利的史大林，此時不得不去支持這個領導；同時，從來受着晚娘般屈待的毛澤東，此時也不得不對她虛表孝心，竟或存着真實的希望，想從她老人家那裏弄點援助來，藉以經營那個得來頗出意外的，長期間為戰亂所破壞的龐大國家。

所以這是一種由形勢造成的友好姿態，雙方被迫向友誼前進，卻不是真實友誼的體現。

在〈人民民主專政〉一文發表之後大半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四個月，毛澤東與史大林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這個條約，當時曾被中蘇雙方報紙譽為「以條約形式鞏固下來的中蘇親密友誼」，是中蘇真實友誼的體現。這個說法是否對呢？換句話說，這個新的中蘇同盟條約，是否證明出毛史二人因中共勝利而「前嫌盡釋」？它是否表明因中國之變成為「新民主主義」國家，所以克里姆林宮一反它多年奉行的大國沙文主義政策，完全回到列寧當年的國際主義立場，因而以充分平等，真正無私的兄弟態度來建立和北京的新關係？

我們在當時便指出過事情並非這樣發生，如今，證明十三年來中蘇關係的真實經過，更可以肯定它不是如此發生的。應該說，中蘇同盟條約的談判和簽訂，對毛澤東說來是上了重要的一課。上了這課以後，毛澤東思想中原有的「民族主義」不是減弱了而是加強了；他對蘇聯與蘇共的疑忌是增大了，不是減少了；他對史大林個人的認識是更清楚了，把史氏當作國際革命領袖的殘存幻想消滅了，而對史氏奉社會主義之名，行民族擴張與官僚掠奪之實的那種絕對現實態度，可能是更加傾倒了。

這樣說，完全不是憑空臆測的，而是有事實為證的。

首先讓我們來看看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談判和簽訂的經過，並且分析一下條約的本身。

為了談判和締結中蘇之間的新條約，毛澤東率領了一個代表團，於1949年12月中旬前往莫斯科。這當然是一件大事。不論就中蘇關係說，或就毛澤東個人的生活說，這件事都具有非常大的歷史意義。由於革命的勝利，中國從一個半殖民地的、由資產階級地主當權的、親帝仇蘇的國家，一變而為獨立的、由工農勞動大眾當權的、反帝而親蘇的全新的「人民民主共和國」了。對於這樣一個國家，蘇聯應該採取怎樣態度呢？這個問題，雖然在當時（1949年）已經不算全新，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東南部歐洲成立了好一些由共產黨執政的國家，史大林已經同它們締結了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並且同其中之一（南斯拉夫）的關係，已經由締結而歸於破裂了。只是歐洲諸「衛星國」與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二者誕生的情形不同，前者主要是直接依靠了紅軍的刺刀，而後者則主要依靠了自己鬥爭的力量；她在許多方面都比歐洲諸「衛星國」更有資格以平等身份來和蘇聯說話，所以克里姆林宮將如何對待新中國這個問題，實質上還是新的。所謂新，即是說，就算是雙方談判的當事人史大林和毛澤東，都還不能於事先確定一個答案，以便在談判及條約中一一實現出來。在史大林那一邊，一個最大的疑問是：由雅爾達會議確定下來，向國民黨中國業已取得的特權，是否能讓共產黨的中國原封不動地繼續承認下去。如果不能，那末最大的讓步該是什麼？在毛澤東這一邊，最大的未知數應該是：史大林曾經向蔣介石索取到的種種特權，能否全部還給他——毛澤東。如果不是全部，那末最多可以收回幾多？此外，毛澤東當然

還希望得到蘇聯真正無私的經濟援助，而史大林呢，則憑藉着自己能有所予的地位，希望以最佳方式或最好條件來控制新中國及其領袖毛澤東。

在 1949 年年底直到 1950 年 2 月的莫斯科中蘇談判，雙方的主要矛盾如上所述。

自然，我們無法設想毛澤東當時的心境。不過把一些客觀存在的事實作「指數」，大致還可以求得點主觀的心理狀態。這是毛氏生平第一次踏出國門。與任何國家的共產黨領袖不同，他之前去莫斯科，不是為了學習取經，也不是為了聽取命令，而是以一個勝利革命的領袖資格，來與一個「革命領袖」（其實是革命成果的篡竊者與浪擲者）作平等商談。這對毛澤東說來，無疑要躊躇滿志的。當他的國賓專車徐徐開進雅洛斯拉夫車站，受到莫洛托夫以下蘇聯顯貴以及各國駐莫使節的親迎，在中蘇國歌高奏聲中，檢閱了儀仗隊，發表了演說。當他說這是他「生平很愉快的事」的時候，我們不難從這句淡淡的言辭下面，聽出極度壓制的、壯志得酬的狂喜的聲音。二十二年前他在長沙說過的豪語：「革命未成，不去蘇聯」^[2]，此時一定會萬分得意地浮上心來，有如當年劉季在未央宮大宴的時候，追問他老子「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的光景。

毛澤東於 1949 年 12 月 16 日到達莫斯科，即晚便受到了史大林的盛宴款待。史大林初次給予毛澤東的印象如何，當是一個極其有興趣的問題。可惜這和史大林初會毛澤東的印象如何一樣，兩者都沒有給我們任何直接的甚至間接的資料。這方面我們只好借助於類推和猜測。一般的政治領袖（例如邱吉爾），特殊的共黨政治家（例如鐵托），有不少曾將他們會見史大林的印象記錄過。無論前者或後者，有一點是共同的，就是驚奇於史大林之赤裸裸的現實主義。譬如，邱吉爾在

一張小紙上，用簡單的百分數寫下了英蘇二國在羅馬尼亞，希臘與南斯拉夫的勢力分配，等史大林在上面畫了同意號之後，卻自覺以如此隨便方式解決有關千百萬人命運的問題，有點「犬儒主義的」，提議燒了它，而史大林卻滿不在乎地說：「不，你保存它吧。」想不到，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總理，竟比大英帝國的首相更加「犬儒主義」！【朱正按 此處「犬儒主義」可理解為厚顏無恥，實用至上，毫無原則。】

鐵托所講的故事，想必會更加接近於史毛初會的情形。鐵托在1944年9月，由南國前線飛往莫斯科，與史大林談判南國解放軍與蘇軍夾擊貝爾格拉的計劃，並商談此後南國的政治問題，據鐵托描寫，他初次的印象如下：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會見史大林，第一次和他談話。……他的個子看來比照片上的要矮小些。不過他給我的印象是精力充沛的，雖然略帶倦容。

我說過，與史大林的首次會談弄得很緊張。差不多我們討論的事情，件件都有若干衝突。我觀察到，史大林是不能容忍反對的。他和周圍的人談天，談吐是粗魯而易怒的。蘇共中委會政治局的全體委員中，只有對莫洛托夫，他有時轉過頭去詢問一下意見，可是永不聽完他的回答，就照自己的想法說下去了。

談話在很痛苦的空氣中進行。史大林開始向我說明南國有讓彼得王復位的必要。想不到竟會勸我幹這種事情，熱血湧上我的頭腦。我強自壓制，告訴他說這是辦不到的。……（見《鐵托傳》英文本，232-234頁。）

上引文字，幾乎把所有史大林訪問者的印象概括下來了：（1）達到了犬儒主義程度的現實主義；（2）令人不堪的傲慢、粗魯與易怒性

格。這兩個特點，當史大林會見毛澤東時候發揮到什麼程度，我們自不得而知，但要它們完全收起總是辦不到的。不用說，當年來到莫斯科的毛澤東，其身份及其地位，既不同於邱吉爾，也不同於鐵托。他多半比邱吉爾所得的要多些坦率，比鐵托所得的要多點禮貌。但即令如此，這態度比毛澤東所期待的仍有着極大距離。毛澤東毫不天真，極少幻想，非常實際。對於共產主義，他當然信仰；對於蘇聯，也羨慕；對於布爾雪維克黨人，他也不會不欽佩。但是他自己二十幾年的政治活動，蘇聯三十餘年變遷與墮落的歷史，不能不教懂他共產主義這學說一旦和政治活動相結合，勢必要受政治鬥爭本身一些規律的影響；不能不使他知道史大林時代的蘇聯已多少不同於列寧時代的蘇聯；不能不讓他看出創業苦鬥一輩的布爾雪維克已大量為守成的甚至是不肖子弟式的黨官員們所代替。尤其是因為自從1931年以後，他親自遭受到各式真假國際代表的白眼和壓迫，對蘇聯共黨，乃至對史大林個人，決不會懷有虔誠的天主教徒對羅馬教皇那樣的感情了。毛澤東那次前往莫斯科，心理上是有準備的。

但是我們仍可肯定地說，當他實際與史大林談判以後，還一定發現了自己太過天真，太過迷信蘇共與史大林，太過相信他們的國際主義，因而大大感到幻滅與震駭。不錯，無論毛氏本人或他的隨從人員，迄未透露過一言半語有關於此的證言。然而事實非常清楚。第一，中蘇談判曠日持久，遷延將達兩月，毛澤東在12月16日到達莫斯科的當晚便會見了史大林，亦即開始了中蘇談判，可是這談判一直沒有結果，以致拖延了一個多月，才算有了點頭緒。此時周恩來奉到毛的電召，率領了又一個代表團，於1月20日來到莫斯科。此後又談判了半個月，方於2月14日締結了三個文件：(1) 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2) 關於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3) 關於蘇聯

經濟援助中國的協定，兩國首腦足足會談了兩個月方能達成協議，這在一般的外交史上，特殊的蘇聯對外交涉史上，都是沒有先例的。這事實倘非完全由於中蘇要求的懸殊，致使談判僵持，則至少應該說是它的主要理由。

第二，如果仔細研究一下三個文件的內容，就更能證實我們關於毛史初會並不十分美滿的假說。毛澤東那次前往莫斯科，主要目的，自是在於用新條約代替 1945 年 8 月由宋子文與史大林簽訂的舊條約。本來，中國既然從資產階級與地主統治的國家變成為由共產黨所代表的工農國家，舊的中蘇關係理應自動取消，新的關係可以很方便地建立起來。宋子文與史大林簽訂的中蘇同盟條約，以及關於旅順大連的協定，依照史大林自己的稱呼，乃是沙皇俄國於 1904 年所喪失的特權的恢復。這，無須說，是不平等的，是掠奪來的。當年沙俄所以要獲取這些特權，乃由於帝國主義使然；後來史大林的予以恢復，如果硬要找尋一個理由的話，只能說是由於「對國民黨中國的防衛」。可是國民黨中國完蛋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個親蘇的、共同信奉共產主義的國家，那就連上述那種勉強的理由都不存在了。所以站在毛澤東的立場，廢舊約，訂新約，應該是十分自然而又簡單輕易的事了。誰知一經談判，事情竟不是那麼簡單。為使「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確認自 1945 年以來遠東形勢起了根本的變化……認為這種新的情況提供了從新處理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諸問題的可能性。」（見中長鐵路，旅順口及大連協定的引言。）竟需要毛澤東親自出馬，在莫斯科用兩個月的時間來「說服」史大林！「說服」的過程我們雖不得而知，但說服的結果卻清楚地透露出過程的艱苦。關於中蘇同盟條約，毛澤東所締結的與宋子文所簽訂的，無論文字或實質上都無大出入。這方面算不得重訂，只是調換一下形式罷了。關於

中長路與旅順的協定，新約與舊約出入很大，這裏可說是史大林讓了步，亦可說毛澤東獲得了勝利。因為舊約上規定的三十年租借權或共同使用權，新約上取消了，代之以「一俟對日和約締結後立即實現，但不遲於 1952 年末」，便可將鐵路無償地交還中國，蘇軍自旅順根據地撤退。關於大連的處理，蘇方的讓步更加明顯。根據舊約，中國政府要將「所有港口工事及設備之一半無償租與蘇方，租期定為三十年」；新約則乾脆聲明：「現時大連所有財產凡為蘇聯方面臨時代管或蘇聯方面租借者，應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接收」，至於有關財產的接收辦法，應於「1950 年內完成之」。

毛澤東取得了這個結果，無疑，是把史大林在雅爾達會談上拿回去的沙俄特權又拿過來了。但這顯然不是史大林心甘情願交出來，更不是從社會主義國家或共產主義國際主義者的立場出發，主動且以理所當然的態度交出來。在文件簽訂的儀式上，代表蘇方的蘇聯外交部長維辛斯基說了這樣的話：「這種協定的每一條款，都證明了蘇聯方面對中國人民的民族獨立與民族權益的尊重，也證明了蘇聯外交政策原則的偉大。」請看這幾句官話暴露了多麼傲慢的施捨者的態度！關於同樣問題，列寧還在三十年前，通過他的外交委員長加拉罕，作過如下宣言：「勞農政府更宣言廢止一切中日及其昔日之聯盟國所訂之秘密條約。蓋俄皇政府及其聯盟國，藉此等條約，誘迫兼施，羈束東方民族，尤以對中國為甚，至其利益，則盡為俄國資本家，地主及將領所得也。勞農政府且已向中國政府建議開始談判……將俄皇政府自行掠取或與日本及聯盟國共同侵略者，概行交還中國國民。」（見 1919 年 7 月由加拉罕簽署的《致中國國民及南北政府宣言》）這是何等光明磊落、真正偉大的態度！如果我們想一想史大林的態度是用以對待他「親愛的同志」毛澤東，而列寧的態度還是對待當時仍由北洋軍閥所統治

的中國的，那末其間的區別就更加大了。由此，我們可以很有根據地說，在遷延二月的中蘇談判中，毛澤東一定受夠了史大林和維辛斯基（順便提一提，此人便是莫斯科歷次大冤獄的檢察長，因而是十月革命老戰士的直接劊子手）的氣——大國沙文主義的氣！

毛澤東受了這種烏氣而爭到手的勝利，還受着另一些條件的限制。譬如關於旅順，協定上拖了這麼一條尾巴：「一旦締約國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其他與日本相勾結的任何國家之侵略因而被捲入軍事行動時，經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提議及蘇聯政府同意，中蘇兩國可共同使用旅順口海軍根據地，以利共同對侵略者作戰。」其實，這只表示出史大林對這個不久才恢復起來的沙俄特權的捨不得放棄，想用種種藉口來繼續保持。所以到了1952年9月，照協定蘇軍必須退出旅順基地之前三月餘，果然由周恩來「自動提議」，要求蘇軍在1952年12月31日以後繼續駐守旅順，理由是：「日本拒絕簽訂一般性的和約，而與美國及其他國家簽了單獨和約。」史大林接到這個提議，便由維辛斯基覆一照會，予以「接受」，旅順口便無限期地「共同使用」下去了。這種做法，連最天真的小學生都騙不過的，史大林卻偏偏要在毛澤東「兄弟」身上應用，毛澤東的感想如何，固不待我們喋喋了。

還有苦果要毛澤東當時直着脖子嚥下去的，這乃是同年3月27日簽約成立的所謂「中蘇合股二公司」（新疆省石油公司及有色金屬公司），以及同日簽訂協定的所謂「中蘇民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前二公司實際上不過是長期以來克里姆林宮苦心謀取的新疆經濟開發特權的變相保持；而後一種組織則史大林曾經強加於東歐「衛星」國家，且曾迫使南斯拉夫起來反抗的。當史大林在南斯拉夫反抗之前讓步之時，還曾親口說過：「合股公司只適合於在從前是敵國的國家中設立」（見《鐵托傳》，294頁。），可是當他和毛澤東談判之時，卻仍舊要把

他不久之前在南國施行失敗了的辦法強加於新生的中國身上。是否他發現毛澤東比鐵托易欺呢？是否毛澤東比鐵托較少「民族主義」因而更關心中蘇的「合作」利益呢？是否經過了鐵托「反叛」之後，史大林有了教訓，以致使中蘇合股公司認真做了「平等互利」，因此毛澤東樂意接受了呢？回答這些問題，只要看看1954年10月由赫魯曉夫與毛澤東簽訂的新協定就夠了。根據當時會談的一項公報，上述三個合股公司，連同另一成立於1951年的合股公司（大連造船公司），其中蘇聯股份全部轉讓給中國。這裏轉讓的本身並不有趣，有趣的在於公報中所指出的轉讓理由。它說：「現因中華人民共和國業已恢復了它的經濟，已勝利地完成了第一個五年計劃，而中國經濟組織已經積聚了必需的經驗去自行經營這些合股公司所管轄的企業……」這個理由簡直不成其為理由。

不過更有趣的卻是同時發表的，關於蘇軍放棄共管旅順的理由。在那一次毛赫會談的另一個公報上，蘇軍聲明自旅順撤退的理由如下：「鑑於因朝鮮戰爭停止及越南和平恢復而發生的遠東國際形勢的改變，又鑑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力量的增強」……這裏的第二個「鑑於」，與上面所謂「中國經濟組織已經積聚了必需的經驗」，屬於同一類的官樣文章，是勉強抓來的藉口。

事實上，很顯然，這都是以赫魯曉夫為代表的蘇聯新當局，來和毛澤東修好，因而作出的讓步。（為什麼赫魯曉夫要對毛澤東作這個讓步，將在下面談到。）從老赫的讓步我們可以看到當年史大林的要挾，從赫氏的修好我們可以想見當年毛澤東的委曲。

毛史談判的另一個結果是中國獲得了蘇聯3億美元的貸款。就是這，也完全不能「證明蘇聯外交政策原則的偉大」，更不必說國際主義

的「無私援助」了。首先，3億美元的貸款對中國戰後的經濟復興及經濟建設說來，真是杯水車薪，難於濟事。這個數目和美帝的「對外援助」不能相比。第二，這筆貸款，限定用途為償付蘇聯購買的機器設備與器材。可是我們知道，自從日軍投降之後，蘇聯從中國東北拆卸運走的偽滿工業設備，為數甚大，據 Edwin Pauley 率領的美國賠償委員會調查，因直接戰爭（紅軍出兵東北與日本關東軍一共作戰9天）及戰後拆運而遭受的偽滿地區工業損失總數，估計為8.581億美元。人們無法確定蘇軍拆去的「戰利品」究竟佔這個數目的幾成。但即使很保守地假定為三分之一，則其數已等於蘇聯的那次貸款了。再若當時資本主義國家的消息有幾分真實。即若蘇聯以之賣給中國的機器多數就是這些「戰利品」，那末史大林當時對毛澤東的「援助」，實際等於侮辱性的玩笑了。

綜觀以上所述，可知毛澤東的生平首次出國及其首次會見史大林，結果確像我們在前面所說：他思想中原有的「民族主義」不是減弱了而是加強了；對蘇聯與蘇共的疑忌是增大了不是減少了；他對史大林個人的認識是更清楚了，這在一方面使他消滅了把史氏當作國際革命領袖的殘餘幻想，另一方面卻讓他更賞識了史氏十分現實的，絕無絲毫書生氣的政治家態度。毛澤東受了他老師親授的一課，決不會震驚於蘇聯共產黨墮落的深刻，決不會想到史大林的所作所為代表着列寧和托洛次基時代的反面。因為直到如今，我們知道，毛澤東從來不想去弄清楚聯共黨內派別鬥爭的史實，他從來總是全盤接受史大林所編排的說法。因此當他親身體驗到史大林對他乃至對他所代表的新中國施行種種無禮、偽善、欺凌以及剝削之後，他不會拿列寧的作風來作對比的，不會由此看出史大林所代表的那種思想和行為的反動性質，而只能達到這樣一種「徹悟」：呵，社會主義國家的現實政治原來

應該如此的！他，毛澤東，雖然不是陳獨秀式的書呆子，可是未曾親炙史大林之前，總還不免為國際主義等等的教條所束縛，還不免為書本上種種漂亮詞句所感動。此後以史大林為師，必須更加切合實際，必須更加堅持民族利益，必須更加看重現實力量，必須更加看重自力更生，建設一國社會主義。

在這個意義上，應該指出：1950年春天的史毛會談以及他們所簽訂的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及其他協定，確實具有巨大意義。它不僅代表着中蘇二國間新關係的確立，而且又意味着中蘇兩黨之間「思想衝突」的開始。這中間的相互關係是複雜錯綜的。首先是史大林的民族社會主義思想造成了蘇聯和新中國之間的甚至不愉快的國家關係。這個國家關係又加強了毛澤東固有的民族社會主義思想。而民族對民族，則不管它們上面是否冠以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字樣，結果自必引起衝突，一步進一步地要引起衝突。

不過，讀者一定會有疑問：如果毛澤東那次會談回來，已經對史大林的蘇共很為不滿，那麼為什麼事實上看不出來呢？更奇的是：當1953年3月，史大林逝世之時，中共如喪考妣地為他舉哀追悼，這難道像是毛澤東對史大林不滿的表示嗎？

要解釋這個疑問，首先我們要記得：毛澤東是有理學根底的，他最懂得忍字工夫。「小不忍則亂大謀」，普通有點涵養的中國讀書人都明白這個道理，何況毛澤東？莫斯科會談上連吞了幾杯苦酒，決不會就此教毛澤東改變他「一邊倒」的想法。非但不會如此，而且我們相信，他當時還堆着笑容吞下去，連眉頭都不曾皺一下哩。形格勢禁，「一邊倒」在所必行；同時處境使然，求者總要從予者那裏受多少骯髒氣。這種情形雖然和真正國際主義兄弟般援助的最高理想相去太遠，

但毛澤東畢竟不是書呆子式的革命者，而是有二十八年實際工作的現實政治家。所以史大林所賜的苦酒縱然使他有所幻滅，即令讓他感到心痛，但這裏的幻滅不會太多，痛楚也不會太過劇烈。其次，1950年春天史毛初次交手，一切都帶有試探性質，故協定雖成，而彼此都存「以觀後效」的希望，隨時都準備作進一步商討或修正的。第三，毛澤東從史大林那裏親自上了一堂「民族社會主義」的課，獲得了雙重的與矛盾的印象。一方面，作為此一主義的直接蒙害者，他自應對史大林有所不滿，但是另一方面，他若設身處地，站在此一主義的實行者的立場上，那末這個學生卻會對老師衷心敬佩了。從「一國社會主義」出發，史大林曾經確立了空前的個人崇拜；造成了最可怕的官僚獨裁；發揮了大俄羅斯瘋狂的沙文主義；抬高了俄羅斯各民族，特別是斯拉夫民族的文化傳統，貶低了，甚至踐踏了馬列主義的革命原則，以致將國際主義變成幌子，把世界革命當作外交籌碼，使之全部為俄國的民族利益，乃至為克里姆林宮的官僚利益服務：凡此種種，如果曾使毛澤東在初見之下吃過驚，那末在回味之後一定會深深歎服的。

中蘇兩國在經濟文化落後上的相似，史毛二氏在性格與素養上的雷同，以致毛澤東無論從客觀或主觀方面，都不得不採取整套史大林主義的辦法，不得不以史大林為師。因此，1953年3月史大林死後毛澤東為他在全中國舉哀，決不能說是虛偽姿態，其中確含有真正崇拜的一面。

那末史大林如果不死，如果他活到今天，是否中蘇不會發生「歧見」呢？當然不是。如果史大林不死，「歧見」和衝突也許爆發得還要早些，而衝突的性質還一定會更加激烈些，尖銳些。何以故？理由很簡單，在這裏，學生所賞識於老師者，並不是國際主義崇高理想的事實體現，而是如何在現實政治中嘲笑這些崇高原則的活生生的榜樣。在這裏，毛澤東之崇拜史大林，多少有幾分像邱吉爾之推重史大林，

因為前者在後者身上看到了赤裸裸的，毫不迂腐的現實「政治家丰度」。史大林如此公然為俄羅斯民族利益，甚至為克里姆林宮官僚階層的利益，推行他的「社會主義的」內政外交，在邱吉爾看來是瘋狂的布爾雪維克們恢復了「常識」，因而較易對付，而在毛澤東眼中，則看到了「社會主義政治」的老成規範，使他可以在中國心安理得地奉行起來。可是正像邱吉爾並未因他對史大林的好感而減少了英蘇衝突一樣，毛澤東對史大林的崇拜，也不會阻止中蘇不發生「歧見」。因為，如果毛澤東親炙了史大林而愈發篤信了「一國社會主義」的話，則其第一個結果只能是愈難忍受蘇聯「一國社會主義」所強加於中國的不平等待遇。

迄今我們未曾見過任何證據，足以證明從中蘇首批條約簽訂，直至史大林逝世這整整三年中，毛澤東對史大林有過什麼不滿或歧見。但是有過不滿或歧見，卻屬毫無疑問^[3]。我們可以從1954年10月間，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聯代表團的訪華，以及他們和毛澤東所訂的條約中，充分看出來。

1954年9月29日，蘇聯政府代表團應中國政府邀請，來到北京，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第五屆國慶。代表團陣營的堅強是空前的，迄今為止也是絕後的。它以赫魯曉夫為首，包括着布爾加寧，米高揚，希維尼克，謝比洛夫，富爾采娃，與尤金等人。代表團在中國住了將近半個月，除了參加國慶典禮之外，它和中國政府作了多方面的商談，發表了六項聯合公報，兩項聯合宣言，並與毛澤東交換了一次函件。在這些文件中，主要的內容為：（1）蘇軍自旅順海軍根據地撤退，一切設備無償地交還中國，撤退及交還設備，須於1955年5月31日前完成；（2）將四家中蘇合股公司（一、中國新疆省有色及稀有

金屬開發公司；二、中國新疆省石油提煉公司；三、大連造船公司；四、民航公司）內蘇聯方面所持有的股份，應自1955年1月1日起全部轉讓於中國方面。股份所值，將於數年內由中國輸出貨物至蘇聯清償之；（3）簽訂中蘇科學技術合作協定；（4）建築自蘭州經烏魯木齊直達阿拉木圖的鐵路，蘇方願給中方以技術援助；（5）中蘇蒙三國協議建築自集寧至烏蘭巴托，並自烏蘭巴托延長至蘇蒙邊境的鐵路，此路將於1955年內通車；（6）蘇聯政府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以5.2億盧布長期貸款；（7）又由草約規定，蘇聯將幫助中國政府再建15個工廠，並將對依據前約供給的141個工廠添供設備。此種增添設備的總值將達4億盧布；（8）以該次蘇聯代表團的名義，贈送一座大規模國營穀物農場的全套機器與設備。

光是浮面地看一下上述內容，我們便能明顯看出，它們和數年前史大林與毛澤東所締結的協定有很大不同。這些協議確實稱得上「無私援助」，也才真的有點像維辛斯基當年的說法，它們「證明了蘇聯方面對於中國人民的民族獨立與民族權益的尊重，也證明了蘇聯外交政策原則的偉大。」換句明白的話來說，即是：當時簽訂與議定的一系列協定和辦法，表示出蘇聯方面最後地放棄了俄國在中國東北與新疆省內為沙皇所掠奪，為列寧所拋棄，且為史大林所恢復的種種特權。除了消極的放棄之外，並且還提供了積極的經濟方面與技術方面的援助。因此，我們應該說，在1954年10月間，即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五周年紀念時，亦即在史大林逝世以後一年有半的時候，中蘇兩國（事實上是中蘇兩黨）之間的關係，達到了親密友好的最高點。究竟這個熱愛時期延長了多久，且待後面再說，此地，我們先要研究一個問題：為什麼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聯代表團此時採取了如此慷慨的，一反乎史大林方式的友好行動？

主要的回答是：它乃是蘇共領導層於史大林死後進行內部鬥爭的結果與表現。

1954年秋天，蘇共內部的領導權鬥爭正在激烈進行。赫魯曉夫一系的非史大林嫡派，雖然步步佔據上風，但離開最後勝利尚遠。馬林可夫與莫洛托夫等所代表的史大林嫡派，顯然還很有力量，特別在黨內，在高級官僚中，他們仍有很強大的支持。赫魯曉夫為了要鞏固他的初步勝利，為了要徹底擊敗對手，他主要從兩個方面去尋求援助；（1）國內黨內外的廣大群眾；（2）國外兄弟黨的領袖集團。為達此目的，他基本上應用了同一個方法：反對史大林。如何反對呢？主要在於給一部分受過冤屈的人們翻案，給長年受了史大林壓制的民眾鬆一口氣，給某些受了史大林不公平待遇的方面以若干補償。總之，史大林這個大白臉下場以後，他扮演了紅臉甚至小花臉的角色，對那些曾被踩痛了腳趾的人們給以愛撫，賠笑臉，或竟至於打恭作揖。以此贏取人心，以此打倒對手，以此來繼承大白臉所遺下的領袖地位。

事實證明，赫魯曉夫這一套手法是成功的。毛澤東在史大林手裏雖然不曾受過冤屈，卻是受過不公平待遇的。

他與這位蘇聯候補新領袖初打交道，印象一定美好愉快。和三年前的史大林情形對比一下，他不能不發現新人和舊人大異其趣。一個是平易近人，一個是盛氣凌人；一個移樽就教，謙恭下士；一個坐宮侯觀，奴視儕輩；一個是退還特權更送禮，另一個則恢復了舊的還要索新的。如此一比，毛澤東怎能不衷心支持赫魯曉夫，以中國革命的全部的聲望加在他的一邊，幫助他去打倒克里姆林宮裏的對手？

在這方面，我們只要指出這一個事實就夠了。赫氏從北京回去不足四個月，即在1955年2月初，便把他的第一號對手馬林可夫從部長會議主席位置上打下來了。

赫魯曉夫這個人，用句中國的老話說，確乎稱得上「聖之時者也」；假使套用一個現代名詞，可說是「機會主義者」。他善觀氣候，能夠敏銳地覺察群眾心理，而當他有所企求時，又完全放得下任何架子，裝得出任何姿態，甚至於付得出任何代價，最低限度，他作得出任何諾言。本來，一個群眾領袖，特別是革命運動的領袖，一定要得風氣之先，要能及時看出歷史季節的推移，要不斷按住群眾運動的脈搏，要密切注意群眾心理的轉變；在這方面，列寧自然是最最傑出的。列寧之外，許多革命領袖，在或多或少程度內，都有這些本領，就是史大林也算得是此中能手。不過列寧之可貴，列寧與其他革命領袖，特別與史大林之間的重大區別，就在於列寧的這些本領服從於原則性的堅持，而史大林則當他施展這些本領的時候，往往忘記了，或者有意踐踏了原則。因此，列寧及其他原則性的革命者，明明懂得時尚的動向，卻不一定利用，更不會趨附，倒是常常逆流而進的；史大林等則一味窺探風向，一味順風而進，只要它能將他個人權力的小舟維持在崇高的地位，便不去計較那風向或潮流之正反。因此，前一類人是真正馬列主義的革命家，而後一類人卻是機會主義的革命家或反動家。赫魯曉夫自是史大林類型而非列寧類型；不過他優於亦可說次於史大林的，便在於他沒有史大林那種死硬的、貴族式的、傲慢的官僚氣，卻天賦有彈性的、平民式的、丑角型的政客味。正因這個「優點」，使他在史大林逝世之後，當蘇聯人民受盡了二十餘年史大林專制與長期戰爭苦難而迫切企求民主與和平的時候，扮演了自由、民主、和平甚至公道的衛士角色，出來和史大林的更直接的繼承者鬥爭。馬林可夫與莫洛托夫等輩，於「譁眾取寵」，甚至「審時度勢」這方面，本事原不差於赫魯曉夫。故當史氏死後，馬林可夫繼承部長會議主席的短期內，也曾做了不少姿態，藉以迎合蘇聯民眾的「自由化和民主化」要求。可是他們終於不敵赫魯曉夫，原因之一固然在於他們與史

大林的關係太密切，而更大原因，乃在於他們的作風太像史大林了，無法演好「平民政治家」或「工農政治家」這個角色。因為這些以及另一些原因，赫魯曉夫在黨內鬥爭的第一個回合中勝利了。接着，便是爭取國外同情，造成自己在國際上，特別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聲望，赫魯曉夫於是率領了龐大的代表團，浩浩蕩蕩飛到北京來了。

赫魯曉夫第一次北京之行顯然是成功的。由於他所付的慷慨的代價，他所作的慷慨的諾言，一個稱得上「赫魯曉夫——毛澤東的聯盟」結成了。這個聯盟，在赫魯曉夫與馬林可夫鬥爭的第二回合中，起了不小作用的，已如上述。

這個「聯盟」延長了多久呢？

大致可以說，毛澤東和赫魯曉夫的親密友誼延長到1956年2月，即延長了將近年半。在此期中，究竟這友誼親密到何種程度，究竟北京會談中的決定執行了多少，答應的代價付出了多少，許下的諾言兌現了多少，因為資料關係，我們無法確定。但是憑該一時期內所發生的重大事件與所能見到的主要文獻看，蘇方當時是積極地實行了「無私援助」的，中國方面則盡力為赫魯曉夫——米高揚一系壯大了聲勢。投在毛赫友誼上的第一個陰影，乃是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大會的結果。1956年2月間召開的蘇共大會，標誌着赫魯曉夫對史大林嫡系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這個結果，原是在中共的聲援之下獲得，毛澤東對之應無不滿之理。但是赫魯曉夫們藉以獲得這個結果的那面旗幟，即對個人迷信的攻擊，卻使毛澤東非常頭痛。中共一向奉史大林如神明，在中國群眾中已造成為不可侵犯的偶像，今二十次大會突如其來地^[4]發動了對他的攻擊，確使中共異常狼狽。尤其使中共難堪的，它多年來辛苦建立起來的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不能不在蘇聯反史大

林崇拜的面前受到影響，不能不感受到間接的攻擊，以致弄得進退兩難，一時不知如何是好。

毛澤東們的疑懼、惶惑，最明白的表示於此一事實中：北京對於二十次大會遲遲不作表示。大會舉行於2月中下旬，可是會後一個多月內，北京始終保持着意味深長的沉默。這時毛澤東對赫魯曉夫顯然發生了初步歧見，首次透露了有所不滿。

我們自然不清楚當時北京如何向莫斯科表示了意見。我們所見到的，只是4月6日，赫魯曉夫的副手米高揚，率領一個代表團到北京來了，第二天便簽訂了一個早已談妥的新協定。根據這個協定，蘇聯將援助中國建設55個，總值25億的新的工業企業，作為對於根據以往簽訂的中蘇協定而正在建設中的156個項目的補充。4月5日，即米高揚到達北京的前一天，《人民日報》上首次表示了對蘇共二十次大會的態度，即發表了那篇出名的文章：〈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這些事情是簡單的「巧合」嗎？當然不。我們不想說，赫魯曉夫——米高揚一派用了25億盧布的代價，才買來了中共對蘇共第二十次大會的支持。但事實確是這樣的。因二十大結果而投在毛赫親善關係上的第一個陰影，經過了雙邊談判，簽訂了一個新的經濟援助協定，才算消失了，至少表面上是消失了的。

根據1963年2月27日中共發表的文章：〈歧見從何而來？〉中共對於蘇共二十次大會的「消極方面，即有關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某些重大原則問題上的錯誤觀點，我們歷來是有不同意見的。我們在中蘇兩黨會談中，在兄弟黨會議上，都沒有隱蔽自己的觀點」……不過在當時那篇〈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上，顯然沒有公開不同的意見，它所表示的只限於支持方面。而且從文章一開頭所作的，全面肯

定的概括看：「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大會總結了國際關係和國內建設的新經驗，作出了關於堅定地執行列寧的社會制度不同的各國可以和平共處的政策，發展蘇維埃民主制度。貫徹遵守黨的集體領導的原則，批評黨內的缺點，規定發展國民經濟的第六個計劃等等一系列重大決定」，這裏我們甚至無法看出還隱蔽着有重大原則問題的不同意見。關於最最頭痛的個人崇拜問題，文章中甚至說：「中國共產黨慶祝蘇聯共產黨在反對個人崇拜這一個有歷史意義的鬥爭中所得到的成就。」

因此我們有理由說，由二十次大會引起的第一次「中蘇歧見」，曾經成功地解決了的。自從米高揚那次來華會談以後，中共非但不再對二十大保持疑懼或反對態度，而且事實上擁護了它的新路線，在許多方面實施了出來。其中最顯著的例子，便是掀起於同年春夏之間的所謂「大鳴大放」運動，對民主黨派提出的所謂「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朱正按 所謂「大鳴大放」運動，卻是1957年的事情。不過毛澤東是在1956年4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的。這裏說「大鳴大放」運動，似不如說「百花齊放」運動。】，以及收抬起對史大林的崇拜，連帶也在相當程度內停止了對毛澤東的歌頌，並且在對外關係上，跟隨蘇聯之後恢復了對南斯拉夫的友好關係。

由此可知杜列士等說「中國共產黨沒有接受蘇聯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論點」，並非事實，至少是把事實太簡單化了。在同年9月間，即在蘇共二十大舉行之後約半年，中共召開了它的第八次代表大會。毛澤東在會上致了開幕詞，其中有關蘇共二十大大會的有如下的話：「蘇聯共產黨在不久之前召開的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又制定了許多正確的方針，批判了黨內存在的缺點：可以斷定，他們的工作，在今後將有極其偉大的發展。」劉少奇在他的政治報告中說：「今年2月舉行

的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是具有世界意義的重大事件。它不僅制定了規模宏偉的第六個五年計劃，決定了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事業的許多重大政策方針，批判了在黨內曾經造成嚴重後果的個人崇拜現象，而且提出了進一步促進和平共處和國際合作的主張，對於世界緊張局勢的和緩作出了顯著的貢獻。」在鄧小平所作的「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還特別發揮了反對個人崇拜的意見，他說：「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一個重要功績，就是告訴我們，把個人神化會造成多麼嚴重的惡果。……因為這樣，我們黨也厭棄對於個人的神化。」在八大通過的新的黨章中，還把七大寫定的「以毛澤東思想作為一切工作指針」的規定不聲不響地刪除了^[5]。

以上種種，都表示出蘇共第二十次大會對於中共是有巨大影響的，確實發生了「拘束力」的。它們表示出中共至少在那個時期內，確曾完全支持了蘇共的新路線，也就是完全擁護了赫魯曉夫——米高揚系統的鬥爭綱領；不但在口頭和文字上擁護，而且還在事實上遵行了的。

是什麼事情與什麼條件改變了這個情況呢？

這得從國際和國內兩方面來說。在國外，特別是在東歐的諸「人民共和國」中，一方面由於克里姆林宮中新當權派的壓力，另一方面由於群眾中反官僚壓迫的真誠願望，在1956年春夏間開始了普遍而深刻的爭取民主化的革命運動。其結果是在所有那些「衛星國」裏，一切臭名昭著的、為史大林所最親信的領袖們，都在這內外上下的壓力之下先後失勢，代之以平素較得民望的、或遭受舊統治者迫害的、或及時與蘇聯新當權派搭上關係的一些領袖們。此一所謂「解脫史大林化」的運動，在有些地方完成得比較和平，有些地方完成得比較激烈，

這主要得看那個地方勞動群眾反官僚鬥爭的力量有多大，爭民主的要求有多高；得看那個國家裏原來的官僚統治的腐敗有多深，專橫有多甚；還得看蘇聯控制該一地區的勢力有多強。在史大林式統治最強、勞動人民以及一般人民對蘇聯的勢力懷有最大反感的地方，這個「解脫史大林化」鬥爭就爆發得最激烈，其激烈的程度，甚至會遠遠超出克里姆林宮新主人們所導演與所期望的程度，會使那些半真半假的反史大林的與反官僚的鬥爭，變成為無產階級真正爭取民主的革命。這個假戲真做的第一個信號是6月間發生於波茲南的波蘭工人的起義，而10月間發生於匈牙利的革命則是此種轉變的最高點。

波茲南起義與布達佩斯的革命向蘇共的新路線提出了這樣一個抉擇：或者，徹底推行「解除史大林化」運動，根除官僚制度，恢復無產階級的真正民主；或者，根本放棄那種反史大林的把戲，回復官僚專制的真面目，以無情的鎮壓來結束那些由假表情惹引出來的真事變。

這個抉擇是如此堅決與如此無情地提出來，致使那些戴了民主假面具導演「解脫史大林化」喜歌劇的赫魯曉夫們弄得驚惶失措，立即改變論調，放出高壓的鐵手^[6]，並使國內莫洛托夫與馬林可夫等人及其主張，一時間有轉居上風之勢。此種情形，當然會給中共以甚大影響。

這個影響很清楚地反映於1956年12月29日中共發表的那篇重要論文，即〈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教訓〉中。這篇〈再論〉和第一篇的〈歷史教訓〉前後相距將近九個月。二者的態度顯然有很大不同。如果〈初論〉主要是中共於惶惑疑慮之後終於追隨蘇共二十大所提出的新路線的一種解嘲或辯解；那末這篇〈再論〉，卻是親自試行了新路線、嘗到了試行的味道，同時又看到了它在東歐諸國試行結果，加以深思熟慮，開始決定不追隨，至少是不完全追隨這條新路線的一個宣

告。那篇〈初論〉的基本態度是消極的，是被動地對於蘇共新路線的遷就；可是〈再論〉卻是積極的，它主動地提出了中共自己的主張，不僅在對史大林的估計問題上，而且在許多有關蘇聯與共產主義運動的基本理論問題上。因此，我們頗有理由稱此一論文為毛澤東思想進軍國際舞台的檄文，是此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大爭論的一個綱領。不過這是後話，我們暫且不去談它。在這裏，我們只想指出一點，中共在1956年12月29日發表了這篇文章，表示出中共自從同年4月間正式接受了蘇共新路線之後，此時因匈牙利事件的教訓，又開始對新路線表示更自信的、更具原則性的、而且更全面的不同意見罷了。

當然，中共達到〈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教訓〉中所表示的立場，不單單由於匈牙利事件的經驗，也由於中共自己在大半年頭中實行新路線的經驗。我們說過，自從米高揚於1956年4月初前來中國，與中共中央解釋了蘇共第二十次大會的決定，並締結了新的經濟援助協定之後，中共是正式擁護了赫魯曉夫的新路線的。不但在文字和口頭上擁護，而且也在生活中實行。5月2日，即當第一篇論《歷史教訓》的文章發表後不及一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了重要演說，首次號召「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以及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是為鳴放運動之始。接着，在同月26日，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在懷仁堂召集科學工作者和京中重要文化工作者，開會傳達鳴放之意，要求大家各抒己見，放膽批評。此後，全國報刊及各種大小會議上，都集中此一問題，大張旗鼓地開展了大鳴大放的運動。同年6月間召開第一屆全國人大的第三次會議上，這運動掀起了新的高潮，此後復經過中共中央的統戰工作部，一連串召集民主人士的座談會，號召人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不要放棄「互相監督」的權利。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於是年9月，那時東歐雖然已

經發生了波茲南起義那樣的大事件；但在中共八大的整個會議上表現出來的，卻仍然是蘇共第二十次大會的新路線。譬如在劉少奇的政治報告中，說「目前在國家工作中的一個重要任務，是進一步擴大民主生活，開展反官僚主義的鬥爭。」又說：「為了繁榮我國的科學和藝術，使它們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黨中央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黨對於學術性質的問題，不應當依靠行政命令來表現自己的領導，而要提倡自由討論和自由競賽……」在鄧小平所作的修改黨章的報告中，更是着重提倡黨各級機關的集體領導，反對個人崇拜，並號召黨員要善於和黨外群眾合作，甚至聽取他們的批評和意見。總之，直至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發生為止，中共的整個表現是趨向於民主化和自由化的。在黨內如此，對黨外尤然。那末在中共的此種號召和表現之下，社會上，黨內外，特別在年青一代的學生和工人群眾中，發生了怎樣的反應呢？我們至今舉不出具體的事實來說明這個問題，因為這些反應並不曾登載在中共的報紙上。不過毛澤東自己卻曾經給我們一個扼要的答覆，他在那篇〈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上，告訴我們說：「1956年，在個別地方發生了少數工人學生罷工罷課的事件。」（見該文第九節：「關於少數人鬧事問題」。）不管這裏的「少數」代表了多麼大的一個絕對數，而事實總已經確定了：在中共試行蘇共二十大的新路線時期，有「少數工人學生」起來響應反官僚主義的號召，曾經「鬧了事」。這種情形，當然也要影響中共的領導方針：它和國外情勢配合起來，促成了中共最高當局對4月份以來所實行的新路線的檢討，促成了他們去「再論」一下「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

不過，歷史證明，1956年歲尾的〈再論〉只是中共對新路線再檢討的開始，並未確定地拋棄了這個新路線。事實上，這個「民主化與自由化」的試驗，在新的一年，即1957年中，還延續了大半年。至於

中共在〈再論……歷史經驗〉中所提出的獨自的主張——這些主張以後我們可以看到它們造成了中蘇思想衝突之原因的——在那時卻非但不曾惹惱了赫魯曉夫們，甚至還為他們所歡迎，而且還大大借重了的。因為當時赫魯曉夫用軍事力量鎮壓了匈牙利的革命，在東歐各國的民眾中，甚至在共產黨的群眾中，蘇聯聲望低落到從來未有的程度，而中共卻以它如日中天的革命威望，出來挽救了這個瀕於破產的蘇聯聲譽。《再論》中有許多替史大林及其一系說好話的地方，固然不合赫魯曉夫們的胃口，但文章中卻以更多更好的好話替蘇聯辯護。替蘇聯的軍事干涉匈牙利內政辯護，替蘇聯的對波蘭政策辯護。文章特別提醒東歐國家的人民：「如果沒有蘇聯存在，帝國主義將怎樣對待這些國家和這些國家的人民。」（順便提一提：在最近一次——1963年1月德國黨的大會上，波蘭的戈默爾加恰恰以同樣的話來回敬中共，這倒是很有趣的。）那文章還着重指出了「由歷史條件所自然形成的」蘇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心」地位，因而號召「必須繼續加強以蘇聯為中心的國際無產階級的團結」。如此這般的議論，出之於超然的與最大的兄弟黨中共之口，其效果之大，自非《真理報》上登出來的蘇共自捧自吹者所能比及。因此，當時周恩來還被請到東歐去，將此種議論親口向那些受委曲的東歐共產主義者宣揚，藉收安撫之效哩。所以〈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這篇文章，雖然在較長的時距內看，它是中蘇思想衝突的第一道戰書，是中共接受蘇共二十次大會新方針後再放棄的起點，但是在當時，這個文件卻還加強了中共和蘇共的團結。當然這裏的所謂團結，意義並不簡單。蘇共中央的「史大林分子」，一定是全心全意接受這個文件，而赫魯曉夫則部分地歡迎中共的立場；至於中共方面，當時攻擊的對象確實是鐵托及其在東歐國家中的同道者，遠未以鐵托名字來影射赫魯曉夫。中共當時的目的顯然在於保護蘇聯與蘇共，使之不受東南歐諸國共產黨人的攻擊；它無意

干涉蘇共內政，它不想恢復史大林以及「犯同類錯誤」的人的名譽，它所要求的，只是請求新掌權力的赫魯曉夫們，不要「用對待敵人的態度來對待他們」，要「在批評他們的錯誤方面的同時，保護他們的正確方面，而不應該否定他們的一切。」（就是這樣的「請求」，也不曾直接提出，而是以東歐國家的情形來說明的。）

因此，我們可以斷言，在 1956 年年底，非但中蘇衝突尚未正式開始，而且中共本身也還屬於蘇共二十大路線的試行時期。

1957 年 2 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又做了一個重要報告，即《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篇報告的主要用意，就是仍想推行新路線的。波茲南事件、匈牙利事件以及中國自己內部的「鬧事」，一方面固然讓毛澤東們重新肯定了「無產階級專政」絲毫放鬆不得這個真理，體會到史大林的一套確實有其必要這個事實；但在另一方面，他們畢竟不能不看到官僚專政所曾激發出來的種種反抗。中共雖然一口咬定在匈牙利事件的諸般原因中，「國際帝國主義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但他們總不能不指出「在過去時期的匈牙利，勞動人民的民主權利和革命積極性受到破壞，」因而使「反革命分子在 1956 年 11 月間能夠很容易地利用群眾的不滿情緒，組織武裝叛亂。」毛澤東自然知道，他腳下的基礎比拉可西與吉羅等人的要深厚牢固得多。同時他卻也不會不知道，隨着中共的意外勝利與飛快發展，官僚主義的墮落是可怕的，群眾的不滿是普遍的，黨群關係弄得很不好。毛澤東知道了並且見到了這些「壞事」，他想把「壞事」變成「好事」。如何變呢？用什麼辦法來作為由壞變好的條件呢？他覺得「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辦法行不通，這辦法只會「把事情鬥亂，不可收拾」。他主張採取「團結—批評—團結」這個公式。這公式以前曾經幫助中共解決了黨內矛盾的，此時他希望拿來解決全國範圍內的人民內部矛盾，並且用「百

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個口號來賦予那個公式以具體內容。

我們知道，這個口號原是上一年（1956年）5月2日毛澤東提出來的。為什麼在將近一年之後還要着重提出來呢？因為在1956年內，中國的工農學生中發生了相當普遍的罷工，「鬧社」（合作社也）與罷課。但比較上層的知識分子^[7]，工商界「民主人士」以及一般的黨內外幹部，卻並不熱心起來響應毛澤東的鳴放號召，所以不熱心，並非為了不願意利用「民主權利」，更不是為了毫無不滿之處。所以不響應，只因為人們有所顧忌，只因為怕上大當，怕落圈套。因此1956年的中國，在工農學生「鬧事」的基調上，在東歐國家連串事件的陪襯下，人們還看見了社會上大批中上層分子的一種險惡的沉默，這種沉默，對於中共的民望的維持，對於它的政策的推行，甚至對於它的政權的鞏固，都是一種可怕的威脅。在較近的意義上來說，它甚至比下層群眾的「少數鬧事」還要可怕。

毛澤東一定要設法打破這個沉默。這可說是他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主要理由之一。這篇報告的原文，據後來（6月19日）正式發表時的聲明說：是「經本人根據當時記錄加以整理，並且作了若干補充」的。怎樣整理，補充了什麼，我們自不能從文字推斷；不過據當時聽過報告的一些人在事後傳說，原報告中對於鳴放並未立下任何限制與標準；發表的文章中列舉的六條關於「辨別香花與毒草」的政治標準，是事後「補充」的。同時整個報告，都着重於鳴放方面，着重於「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方面。

很顯然，毛澤東在1957年2月間的態度，是要打破那種不祥的沉默，是要讓所有怨毒之氣統統發泄出來。他相信共產黨仍舊擁有的巨

大聲望，他相信自己手中擁有的無限權力，他也相信怨毒之氣即使全放出來，也不會動搖民心於萬一，更不會妨礙共產黨的領導；他相信如此鳴放之後，是可以把「壞事」變成「好事」的。因此我們認為，毛澤東當時號召大鳴大放，不能說是完全虛偽的詭計，不是一個有意安排的陷阱，它具有相當誠意。

由於毛澤東這個「真誠坦白」態度的感召，再受了統戰部等等機構的慫恿與鼓勵，於是真正的鳴放開始了。特別從4月份起，中共中央於該月27日發佈指示，號召全黨整風，並要求非黨群眾協助共黨整風，全國便發出了一片鳴聲。首先是民主人士，其次是一般知識分子，再其次是一般的非黨幹部，終於連黨內的一些中上級領導者，都投入了這個運動，一時沸沸揚揚，滿城風雨，鬧得全國震動。逐漸，鳴放愈響亮，批評愈大膽；原來說是要幫助共產黨整風，攻擊局限於個別的官僚與個別的官僚作風，但隨着運動的發展批評的矛頭卻進而指向了整個的黨。人們指責了「黨天下」，要求「黨部退出學校」，要求「外行的黨官不要干涉內行的職工」。短短的時間，氣候突然變了，「歌德派」受盡奚落，鳴放派變成了最時髦的英雄。此時一般共產黨員的心理，正如當時上海《解放日報》所描寫的：「感到又怕、又屈、又難、又急。他們『怕』什麼呢？怕大家議論紛紛，不好領導了。『屈』什麼呢？自以為辛辛苦苦，幹了幾十年革命，到頭來還只落得一個官僚主義，大不服氣。『難』什麼呢？四面八方的意見壓來，以後工作不好幹了，沒有安定的日子了。『急』什麼呢，認為大事不好了，自己又無能耐，如何才能想個主意趕快把亂紛紛的意見收拾了才好。」（見1957年4月22日社論）這種情緒，《解放日報》雖然只派給「有些共產黨員」，同時社論如此描寫，目的也在於批評此種情緒的不當；但事

實證明，鬧這樣情緒的應該是最大多數的共產黨員，而且正是這樣情緒，促成了距此一個半月之後，中共趕快改變政策，用大力高壓，將「亂紛紛的意見收拾了的」。

不過使中共在 1957 年 6 月初旬亮起紅燈，一方面固然是鳴聲迅速變成吼聲的那種輿論，另一方面，也是更為重要的一方面，卻是受了鳴放影響後更趨激烈的學生與職工們的「鬧事」。根據《人民日報》（5 月 13 日社論）：「最近一個時期，在某些企業裏，發生了一些職工群眾請願以至罷工之類的事件。」社論當然接着說：「這些事件雖然發生得極少，範圍也很小」，但是這兩句話顯然是官樣文章，不足置信。我們知道這些事情發生得很多，範圍也很大。「鬧事」的方式雖然大多採取了消極的不合作，或和平的請願，但也有發展得很激烈的，例如中共事後自己公佈的發生於 6 月 12 及 13 日的漢陽學生的「小匈牙利事件」（見 8 月 8 日《人民日報》記載），其激烈程度，簡直真的要讓人想起布達佩斯的情景來。

1957 年 4、5 月間及 6 月上旬大鳴大放的結果，顯然大大出乎毛澤東以下的中共領導層的預料之外。他們沒料到民眾之口一經撤防，便會真的似大河決了堤。他們沒想到平素以為極其可靠、至少是極其聽話的民主人士與一般幹部，對共產黨的領導竟會有這樣惡毒的怨氣。他們沒有估計到共產黨員和一般群眾之間的矛盾竟會達到如此敵對地步。他們看到了中國的具體條件確實不能作任何民主化的試驗；他們看到了有限度的言論開放非但不能起安全活塞的作用，反而會使整個思想控制有被衝破之虞；他們看到了鳴放辦法非但不能和平解決「內部矛盾」，反而有使「內部矛盾」迅速轉變為「敵對矛盾」之勢。更可怕的，它有影響黨員和兵士群眾的思想的危險。

於是，才真正「放」了兩三個月的新政策，不得不在驚惶失措之中，在「又怕、又屈、又難、又急」的情緒中，急促而粗暴地「收」了。從6月8日開始，一直到同月14日，《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連串的重要社論：〈這是為什麼？〉、〈要有積極的批評，也要有正確的反批評〉、〈工人說話了〉等等。這些文章發動了對鳴放者的反擊，開始了所謂「反右派的鬥爭」。同時，中共開動了它非常龐大的宣傳機器和組織機器，讓各地工廠，兵營和學校，召集會議，通過決議，指責那些原說「無罪」的敢言者們以大逆不道之罪。要堅決反擊並徹底粉碎右派的猖狂進攻。

轉瞬之間，氣候又完全變了，一股強烈的冰冷空氣突然吹來，樹林間一片鳥鳴蟬噪立刻收起了聲音。景象在頃刻間變成肅殺，未枯的枝葉都紛紛搖落了，上面棲止着的鳴唱家們，傲然挺立的，或者是縮成一團的，都給吹了下來。

6月19日，毛澤東在2月間所作的那篇發動鳴放的演說，經過他本人「整理」和「補充」之後發表了。裏面赫然列舉了六條鳴放的政治標準。違者有罪！接着就召開了第一屆人大第四次會議的預備會議，用五天時間來討論毛澤東的文章。6月26日會議正式揭幕，以此最後結束了鳴放並開始打擊右派。在大會上，不少曾經奉命批評共產黨的「人大代表」們，都爭先恐後地登上講台，痛哭流涕地斥責自己，說他們「辜負了人民」，聲明自己過去散佈的是「毒草而決非香花」，放的是臭屁而非清氣，鳴的是小資產階級或資產階級的反革命思想而非志在助黨整風的積極批評。因之要「向人民伏罪」，「向人民低頭」，「請求人民寬恕」，讓他們改過自新，「從新做人」（凡用引號的字句，都是著名右派分子發言的標題）。總之，這裏發生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

轉變，過去數月對中共的埋怨和抨擊一掃而空，代之而起的是齊聲頌讚與自辱自責。天下再度太平，矛盾也不解自決。

在這裏，我們不想更加詳盡地討論毛澤東發起與停止鳴放的理由與經過，也不擬多談中共和鳴放者們之間的是非曲直。我們這裏要着重指出的乃是這個歷史事實，即自 1956 年 4 月開始，中共相當勉強接受下來並且遵行了的由蘇共第二十次大會決定的新路線（反對個人崇拜，有限度的民主化與自由化等），到了 1957 年 6 月底召開的第一屆人大第四次會議上，算是最後地結束了，最後地宣佈失敗了。從此以後，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領導層，決心再走史大林的舊路，亦即走蘇共第二十次大會以前的舊路。

這個決定，毋須說，終於要和赫魯曉夫的二十大路線發生衝突的，問題只是爆發的早晚罷了。

這個衝突之所以不可免，是否因為赫魯曉夫們是徹底的、堅持原則的革命思想家，因此絕對不能與擁護史大林舊路線的人調和呢？

當然不是。赫魯曉夫所以不能與史大林路線和解，只因為他在蘇共黨內鬥爭的地位，絕不能與史大林路線調和之故。

現在讓我們來討論這一個方面。首先，讓我們指出一個看似巧合的事實，即在 1957 年 6 月下旬，正當中國召開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來結束鳴放與痛擊右派的時候，蘇聯也舉行了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那是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全體會議（自 6 月 22 日至 29 日）。在這個會議上，赫魯曉夫憑藉中委會的多數力量，打倒了主席團中佔多數的以馬林可夫及莫洛托夫為首的所謂反黨集團。

這兩件表面上好像完全無關的大事，其實與中蘇兩黨的思想衝突密切相聯。真相如何，請讓我們作一個略有系統的敘述。上面我們說過了中共方面的故事，現在要講蘇共方面的故事，也就是說，要講這整個故事的蘇共一面了。

這得從第二十次黨大會講起。

蘇共第二十次大會，不用說，是赫魯曉夫高奏凱歌的大會。但同時亦很顯然，赫派此時的勝利還不鞏固。它非但不能和聯共黨的第十七次大會相比，那時史大林最後確保了絕對權力；它甚至還不能和第十五次大會相比，在那次大會上，史大林將左派反對派逐出了黨的。在二十次大會上，赫魯曉夫最多不過在政治意見上戰勝了對手，但遠不曾在組織上打敗他們，更不必說消滅他們。二十次大會以多數通過的決議，是否真能幫助赫魯曉夫去最後打敗「馬、莫集團」，還得經過試驗，且得憑試驗的後果來決定的。

新路線試驗的結果如何呢？國內，這路線既是蘇共黨內外群眾普遍企求的結果，那末施行起來，特別是在它的初期，總會給人帶來新鮮感，帶來鬆舒的心情，因而獲得人們的擁護和贊成。不過在國外，為了一些相當複雜的原因，新路線推行結果，正像我們在上面所說，卻發生了一連串出乎克里姆林宮始料之外的事變，其中最大的就是波蘭工人暴動與匈牙利革命。同時赫魯曉夫與之改善了關係的南斯拉夫，則非但在匈牙利事件中公然幫助反蘇的領袖，而且更加自以為是，以先知的姿態出現，從而教訓蘇共，竟欲以「由南斯拉夫所開始的新道路」來和一切「史大林主義的」與非史大林主義的道路相對抗。這樣一來，赫魯曉夫不得不改用史大林用慣的高壓辦法，去鎮壓由新路線所引起的種種後果，同時，又不得不和才得改善關係的南斯拉夫共產主義同盟爭吵，重新揀起那件反修正主義的武器來。

此時蘇共內部如果沒有對立的派系存在，赫魯曉夫多半會從此拋棄那個新路錢（當然只以國外為限），一直沿史大林的老路走下去了。可是蘇共黨內的派系鬥爭顯然不容許赫氏那樣做。新路線一旦在東歐國家推行中闖了大禍，馬林可夫與莫洛托夫自然會指着赫魯曉夫的鼻子，面對蘇聯的民眾說：「怎麼樣？現在你們看見了吧。果然闖了這麼大的禍來！我們早就對他說過的，專政的鐵手絲毫放鬆不得，領袖的權威毀損不得，蘇聯對鄰邦的控制放寬不得，跟南斯拉夫的叛徒們要好不得，可是他都不聽，現在你們看，如何？一切都證實了我們的預言，還是讓我們這些有經驗的，忠於馬、恩、列、史的老幹部來領導吧。」

事實是這樣發生了的。自從10月間發生匈牙利事件，11月間爆出了波蘭的政治危機，同月南斯拉夫的鐵托發表了他挑戰性的演說，馬林可夫與莫洛托夫等人便認為反攻赫魯曉夫的時機已經成熟，在蘇共中央的主席團中展開了還擊。一時間，赫魯曉夫的處境是相當危險的，原先擁護他的人，有的開始轉到敵對方面去（例如謝比洛夫），有的則開始動搖（例如布爾加寧等），以致他不得不作相當讓步，以便爭取時間。他的讓步主要表現於三個方面：（1）着重地指出史大林犯錯誤的「悲劇性」，指出它的客觀原因，並指出他的功勞；（2）重新反對南斯拉夫；（3）加強對東歐國家的「領導」。這些讓步，暫時間雖能緩和一下反對派的攻擊，但反對派自然也要利用這些讓步來增強自己的地位，提高自己的聲勢。故自1956年12月^[8]蘇聯領導圈內再度爆發鬥爭，赫魯曉夫派被迫略作讓步以後，兩派隨即積極活動，多方尋求支持，準備下一步鬥爭，決定最後勝負。

在國際方面，雙方首先要追求的，自是中共的支持。此時的中共，就其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中所表示的立場說，本來與馬、莫集團接近得多。它原應該將自己的同情寄託在這一邊的。

但因赫魯曉夫一系自從「平反」了史大林加於中共身上的屈待以來，跟北京先有了不錯的交情；加以赫魯曉夫此時已佔據了黨和國家的重要地位，坐上了近水樓台的好位子，因此，雖然蘇共二十次大會以後，毛赫兩人開始有了分歧，可是中共這個月亮，不管毛澤東願不願意，卻還是讓赫魯曉夫先得了去，讓他先借了光，派了有利於自己的用場。

赫魯曉夫一系如何對待〈再論〉中所表示的中共立場，他們如何利用它來渡過難關，我們在前面已經講過。此地我們只想再補充幾件明顯的事實，藉以看出當時從北京來的「聲音」，對於赫魯曉夫們是如何地「重要」。下面是蘇共中央最高機構於12月26日會議以後，緊跟着發生的幾件大事：

1956年12月29日，中共的人民日報發表〈再論〉這篇文章。

1957年1月7日，周恩來率領一個中國黨政代表團抵達莫斯科。

1月11日，匈、中、蘇三國黨政代表團會談結束，發表公報。公報強調要擴大三國間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的合作，堅決反對任何想減弱社會主義陣營團結的企圖。同日，周恩來等到達布達佩斯。

1月17日，中匈發表聯合公報，中共對匈牙利政府的種種措施與觀點，表示完全支持與完全一致。

這幾件簡單的事實，讓我們看見，在短短的二十天中，中共如何幫助蘇聯當局挽回了它因匈波事變而喪失了的聲望。這同時也就是幫助赫魯曉夫們抵禦了「馬、莫集團」對他們所進行的攻擊。

這在某一意義上說，中共曾經在蘇共內部，幫助思想上的敵人，打敗了思想上的盟友。

不過赫魯曉夫一系的勝利。主要當然不是靠國外盟友的幫助，而是靠國內群眾的擁護。1957年春天，正當中國熱火朝天地進行鳴放運動的時候，蘇聯的同性質運動已差不多快進行一年了。跟着工業管理的分權化與民主化，民主自由的要求也在文化藝術方面，甚至政治方面提出來。因為反史大林專制的新路線，主要是蘇聯本身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發展到那一階段的產物，所以實行起來，並不曾發生東歐以及中國那種決堤潰防，一發而不可收拾的情形。新路線確實有它的群眾基礎，贏得相當大的群眾擁護。所以不管這條同樣的路線在國外造成了亂子，但赫魯曉夫一系的立場，在國內還是受到較多人歡迎的。當然這不是說，代表舊路線的，或更正確些說，那個被人認為是代表舊路線的馬、莫派，一點都得不到黨內外的群眾擁護。他們也還是有力量的，如果不是在廣大群眾中，那末至少在黨內，特別在較老一輩與較高幾層的官僚中，他們擁有一些支持者。因此，正和中國「右派分子實行猖狂進攻的同時」，這些蘇共內部的舊派，在立場上似乎可稱之為「左派」的馬、莫一系，也在拼命積集力量，利用東歐各國「右派」與「修正主義者」的「興風作浪」而企圖一舉打倒黨內新路線（這在馬、莫派的立場看來似乎可稱為右派的）的代表者赫魯曉夫。這個鬥爭終於在1957年6月17日公開爆發了。在那一天召開的蘇共黨中委會主席團會議上，以絕大多數通過了決議，決定將赫魯曉夫開除出主席團。赫魯曉夫系輸了第一個回合，卻不曾倒地不起，他立即着手召開中央委員會的全體會議，藉以最後解決問題。中委會的全會召開於同月29日，會議上展開二派的第二個回合，這時候，形勢卻完全變了，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派」毫不費力地擊倒了以馬、莫為首的史大林嫡系。會議將馬林可夫，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撤除了主席團委員與中委之職，並將原屬赫派的謝比洛夫革除了主席團候補委員與中委職務。

史大林逝世之後，發生於蘇共黨內的二派權力之爭，至此才算最後決定了，——這是蘇聯方面的一段故事。

現在讓我們將中蘇兩個方面的故事連串起來吧。同是在 1957 年 6 月下旬，兩個重要會議分別舉行於北京與莫斯科，會上決定了不同的方向。兩個會議的主題是相同的，都是要解決因蘇共二十次大會新路線所引起的紛爭。但解決的方式卻正相反對：如果在中國，是「左派」擊潰了黨內外的「右派」；那末在蘇聯，恰恰是「右派」打倒了黨內的「左派」。如果在中國，那次會議宣告了舊路線的重被採用與新路線的壽終正寢，那末在蘇聯，黨的中全會卻最後排斥了舊路線的代表們（這當然不等於完全放棄舊路線），重申了新路線的繼續及其進一步的推行。

這是非常清楚的背道而馳，是循着相反方向延長的兩條不平行線，早晚要交叉到一起的。

所以有誰若問中蘇共的衝突何時開始，我們有充分理由回答說是 1957 年 6 月下旬。因為從那個時候起，中蘇之間的分歧才確定不移地存在了。它們將以哪一方式，假哪一事件，在哪個時候爆發出來，當時雖還不能預知；但它們之必將爆發為衝突是必然的。

為的要更清楚地說明這個「必然性」起見，請讓我們再看看「馬、莫反黨集團」的意見。根據蘇共中央全會的決議，「反黨集團的錯誤意見」有如下幾點：

(1)「力圖反對緩和國際緊張局勢及在蘇聯和世界各國人民之間建立友好關係」；(2)「反對中央委員會主席團所實行的改善同南斯拉夫關係的措施」；(3)「反對黨所提出的下列根本主張：關於在目前條件下防止戰爭的可能性以及關於加強蘇聯共產黨和國外進步黨派的接觸的必要性」；(4)「否認蘇聯領導人同其他國家的政治家建立個人接觸

的適宜性」；(5)「反對工業管理的改組」；(6)「不承認有必要增加集體農民在擴大農產品生產方面的物質利益。反對取消集體農莊舊有的官僚主義的計劃經濟」；(7)「在國內問題和外交政策問題上，他們都是宗派主義者和教條主義者」。

這些罪名，今天幾乎全部可以用來加在中共頭上。在當時，我們雖然無法確定中共是否已經形成了如上所舉的主張。同時我們可以相當肯定地說，當時中共與蘇共內部的馬、莫派不會有具體聯絡；但當 1957 年六七月間，中共領導層在思想上已經偏向於赫魯曉夫的反對者，卻是不容置疑的。事實表示得很清楚，當蘇共中央的決議，由尤金大使正式通知中共之後，中共只簡短地回了一個極其外交式的電報，說：「我們相信，蘇共中央全會所一致通過的這一決議，將有助於蘇聯共產黨的進一步的團結與鞏固。」此外，便不再有任何聲援和響應了。

形勢既然如此，赫魯曉夫在這方面自只有一條路可走：要想避免與毛澤東公開衝突，必須及時設法叫中共回頭，回到與蘇共同一方向上來。赫氏自己是無法以轉向來遷就中共的。其所以會無法，因為他若對中共路線作重大讓步，此時已經等於對「馬、莫反黨集團」的投降，也就是等於給自己的存在掘毀根基。

但是毛澤東能否因赫魯曉夫的要求、勸告、利誘或高壓再度回到二十大的路線來呢？——問題就在這裏。

毛澤東自從 1957 年夏秋之際決心退回原路之後，非但自己不曾再動搖過，而且還想叫蘇共以及一切跟隨蘇共的兄弟黨也跟着他走。這樣一來，試問怎能避免衝突？又怎能防止分歧不日趨嚴重？

不過歷史證明，從不同路向的確定直到中蘇衝突的公開爆發，中間經過五年有餘。為什麼會有這段漫長曲折的過程呢？大敵當前，不應讓「仇者快，親者痛」，固然是一個原因，但是更重要的卻在於：(1)「歧見」並非一下子就形成了完整綱領的，它逐漸積聚起來，是在鬥爭過程中形成的；(2)毛赫二人都是現實政治家，他們首先都要考慮到分歧弄成衝突的後果，要考慮到這些後果會給他們各自當權的國家（特別對於中國）帶來多麼不利的影響。

當然，鬥爭有它自己的邏輯，人的主觀願望大多駕御不住客觀的進程，同時潛伏在中蘇共思想分歧下面的還有着更為深遠的原因，於是，在不算短但更不算長的時間內，終於使「堅如磐石」，「親似骨肉」，「永恆長青」，「牢不可破」的中蘇兩黨與兩國之間的關係，由分歧而瀕於破裂了。這中間經過了怎樣「針鋒相對」的，又妥協又衝突的鬥爭，才弄到這個地步呢？關於這些，我們將在下一章裏敘述。

注釋

1. 羅辛權等 (L.K.Rosiuger and associates) (1951)。《亞洲情況》，倫敦出版。37-38 頁。
2. 1927 年秋，中國革命失敗，中共曾派遣大批黨員赴蘇聯學習，當時毛澤東在湖南工作，不願到莫斯科去，決定上山打游擊，未離長沙前，曾對他的同志何資深說過那句話。
3. 中共治下的反蘇言論，首次見於 1957 年龍雲在人大一次常務會議上的發言，據他 7 月 13 日在第一屆人代會第四次會議的發言中說：他的反蘇言論歸結為三點：(1)「抗美援朝戰爭經費，全部由中國負擔不合理」；(2)「美

國借款給盟國，又實施租借法案，後來他們有的賴了債，有的美國不要還了，蘇聯對我國借款，十年以內還清，時間過短，還要付息」；(3)「蘇聯解放我國東北時，拆走了工廠中的一些機器，有無代價，償還不償還？」龍雲的反蘇言論，當時曾受到嚴厲的譴責。龍雲本人因此被列為「右派」，結果做了屈辱的認罪。不過據蘇聯方面的說法，龍雲們的反蘇竟是由中共當局授意的（見1964年6月21日尤里·茹可夫的文章）。這當然不會是事實。但是有一點我們卻可以確信：1957年以及1957年以前，對於蘇聯的上述種種不滿，在北京的領導層中，一定相當普遍地存在，否則，龍雲這個老奸巨猾的官僚，決不敢在人大會的常務會議上作此大膽發言。

4. 據後來中共的文件透露，此事叫中共不滿，固然由於事情本身，但也同樣地由於發動此事的方式，所以中共一再責備蘇共沒有和兄弟黨事先商量。彷彿如果先行商量，使中共在應付方面有所準備，事情會有所不同的。【朱正按據《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所收的〈赫魯曉夫與義大利共產黨代表團談話記錄：批判個人迷信及其影響〉（1956年7月10日）這一檔案透露：「赫魯曉夫同志首先談及他在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秘密會議上的報告中所談的個人迷信問題。他說，我們曾考慮不公佈這個報告，否則寫法就不同了。此外，提出這個問題的決定不是在籌備代表大會期間作出的，而是在大會進行過程中作出的，因此我們就沒有機會與兄弟黨協商並在對待史大林的態度上使肯定和否定兩方面保持足夠的平衡。原計劃關於個人迷信的報告由波斯佩洛夫同志作為通報來作，不過這可能使人們難以完全理解或者懷疑蘇共領導人中間存在分歧。因此這個報告委託蘇共中央委員會書記來作了。」（第六卷，292頁）從這裏就可以明白：為什麼「蘇共沒有和兄弟黨事先商量」的原因了。】
5. 後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時透露出來的事實，讓我們知道了：接受蘇共二十大的決議，特別是接受其中反對個人崇拜的決議，中共領導層中的態度不是一致的。以劉少奇為首的一群，很願意藉反對史大林崇拜來遏止中共黨內日趨嚴重的毛澤東崇拜，因而他們是自願接受的；至於以毛為首的一系，鑑於反史大林崇拜間接打擊毛氏崇拜，極不願接受那個決議。但從我們迄今為止所見的文獻來看，毛在當時並未將反對意見公開說出來，中共領導者內部更不曾為此發生分歧。這多半因為國內外的大勢所趨，反個人崇拜的潮流太強，他當然還不便為史大林的崇拜辯護，同時也不便為對自己的崇拜辯護，於是要出了他歷來最擅長的一套，陽奉陰違。——1968年2月注

6. 按照中共在〈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中的說法，彷彿蘇軍之粉碎匈牙利革命，還是中共「堅決主張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的結果。這話顯然是言過其實的。因為，由於當時的局勢使然，縱使沒有中共的「堅決主張」，莫斯科當局也必然會堅決鎮壓的。【朱正按 作者的這一條注釋說「中共在〈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中的說法……顯然是言過其實的」。從《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中可以知道：劉少奇列席了蘇共中央主席團 10 月 30 日討論匈牙利局勢的會議的，「劉少奇同志代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轉達，軍隊應該留在匈牙利和布達佩斯」（第七卷，82 頁），還有，在 1960 年 11 月 26 日《米高揚、科茲洛夫與劉少奇等會談記錄：關於莫斯科會議聲明的爭論》這一件檔案裏，劉少奇說：「請回想一下 1956 年的匈牙利事件，當時我們建議蘇共中央不要從匈牙利撤走軍隊，要利用部隊鎮壓反革命叛亂。我當時曾說，如果你們不鎮壓匈牙利的反革命而撤走軍隊，那你們要犯歷史的錯誤，給國際工人運動帶來損失。」（第九卷，239 頁）可見這裏並沒有「言過其實」的地方。】
7. 「鳴放」口號的提出，最初原是為了從事科學研究和文藝工作的知識分子提出的，後來才被擴大應用，借用於政治，社會的各方面。可是事實上，知識分子響應得最遲，這是很有意思的。
8. 一次蘇共中央全體會議舉行於是月下旬，這次會議上通過了一些對付赫魯曉夫的決定，其中之一，是設置了一個「國家經濟委員會」，其任務在於監督全部國家經濟的進行，其權力操在復起的莫洛托夫與卡岡諾維奇一系的手中。

二、「分歧」發展中的五個關鍵問題

從 1957 年夏秋之間到 1962 年冬天，這五個年頭是中蘇分歧由暗鬥到明爭的時期。用中共文章中那句形象性的話來說，這乃是「三尺之冰」，在日趨酷冽的寒冷中逐漸凍結的時期。

關於這個時期，現在中蘇共都已經發表了不少文字。它們從各自的立場出發，描繪了一幅由交到交惡的經歷圖。根據這兩幅圖畫，比對雙方互相指控的所謂「誹謗」與「偽造」，參證當時的客觀事實，我們原已可以確立一個比較信實的與比較全面的真相了。

這是一項頗有意義的歷史研究工作，是值得做的。

但是我們這裏不能做。我們為自己的研究對象和研究範圍所限制，只能從毛澤東思想的傳記角度，只能從毛澤東思想的鬥爭史和發展史角度，來看中蘇分歧。甚至，我們還不得不把自己的探討範圍規定得更加狹隘些，即無論談事實，或者談問題，都首先從下面這兩個考慮出發：那就是：在上述這個時期內，究竟是哪幾件事情，使這位平素頗有涵養而又能忍讓的毛澤東變得忍無可忍，挺身而出，從事戰鬥的？究竟是哪幾個問題，使這位從來只重實力，鄙視教條的現實政治家，忽然看重了理論，為反對「修正主義」竟不惜搞壞中蘇邦交呢？

這樣一種有限度的研究，使得我們無法用「編年」體形式來全面敘述那段「冰凍過程」。我們只能從中選取若干最主要的問題，把它們和當時的事實聯繫起來，作一種姑且可以稱為「紀事」體的簡略評述。

在中共發表的〈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與發展〉那篇文章中，有如下的一段話：

中國共產黨人發現蘇共領導的錯誤，不自今日始。從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開始，我們就憂慮地注視着蘇共領導走上了修正主義的道路。

面對這種嚴重情況，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們黨曾經幾十次地反覆地考慮：怎麼辦？

我們曾經設想，可以不可以跟着蘇共領導走，一切照他們的意見辦？當然，這樣做，蘇共領導會高興，但是我們自己豈不是也變成修正主義者了嗎？

我們曾經設想，可以不可以對蘇共領導的錯誤保持沉默？我們認為，蘇共領導的錯誤不是偶然的、個別的、無關宏旨的，而是一系列原則性的錯誤，危害着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利益。對於蘇共領導這樣的錯誤，我們作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隊伍的一員，怎麼能夠無動於衷，緘默不言呢？如果我們那樣做，豈不是放棄保衛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責任嗎？

我們也考慮到，我們批評蘇共領導的錯誤，勢必遭到他們報復性的打擊，這就不可避免地給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帶來嚴重的損害，但是共產黨人難道可以採取民族利己主義的立場，因為害怕報復性的打擊就不敢堅持真理嗎？共產黨人難道可以拿原則做交易嗎？

這段話我們覺得相當有意思，因為它讓我們看到了在做出重大決定之前的那種毛澤東式的猶豫，讓我們看到了現實政治家在投入理論原則鬥爭之前所感到的彷徨。它告訴了我們：在蘇共二十次大會以後，毛澤東曾經長期苦悶地考慮了怎麼辦；他曾經想對蘇共領導的錯誤保持沉默，希望把蘇共的新路線簡單看成蘇聯的內政；他曾經考慮到蘇共領導的報復性的打擊，怕給中國的經濟建設帶來嚴重損害，因而想「採取民族利己主義的立場」（即「不干涉別人內政」之謂）：——這些都說得很好，因為都符合於毛澤東精神；同時這些又都是真話，因為有事實為證（這些事實我們在前一章裏已相當充分敘述過），而且事實上表現的還比說的更甚哩。

在另一方面，文章說他，毛澤東（當然也指中共領導），為了不願意讓自己「也變成修正主義者」而決心不跟蘇共走；說他為了不肯「放棄保衛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責任」，因而終於打破了對蘇共的沉默；又說他為了「堅持真理」，為了不肯「拿原則做交易」，因而不怕蘇共的打擊，不怕給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帶來嚴重損害，毅然放棄了只掃自家門前雪的立場——這些，說得也不算壞，因為它們雖然不是事實，或不完全合乎事實；但是符合於毛澤東作風的，符合於「名正而後言順」這個古老教訓的。

我們自然不想說，原則性的思想問題根本不曾是中蘇爭執的原因。我們也不想說，中蘇分歧中一切有關意識形態的爭論都不過是幌子。我們只想說，使中蘇兩黨發生嚴重分歧，使毛澤東忍無可忍，使他擺脫一切顧慮，挺身出來與蘇共領導戰鬥者，其中在意義上起決定作用，在次序上居於前列的，並不是抽象的與原則性的理論問題，而是有關乎政治、經濟、甚至軍事的一些具體的利益問題。

細細觀察中蘇分歧的經過，我們覺得，下面五個問題才是一切分歧的直接原因。它們是：反對「個人迷信」問題；解放金、馬、台灣問題；中印邊境衝突問題；經濟技術援助問題；黨與黨，國與國之間的平等問題。至於其他問題，幾乎全部是由這五個問題，直接間接地引申出來的。

先談反對個人迷信問題。

所謂反對「個人迷信」問題，實即史大林問題。中共有時又稱它作「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教訓」問題。

史大林問題如何會變成了毛澤東問題；史大林崇拜如何牽涉到毛澤東崇拜；毛澤東崇拜又如何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教訓」；這些，我們在上一章裏講過了。毛澤東如何在這個突然發生的問題上感到尷尬苦悶，如何在言論與行動上初擬追隨，繼而遲疑，終於決定反對的情形，我們也都在上一章裏敘述了。

總之，在 1957 年秋天，當「鳴放運動」在紛擾與狼狽之中結束之後，毛澤東便完全肯定了：「無產階級專政」確乎絲毫都放鬆不得；定於一尊的領袖制度片刻都放棄不得。他決心要把史大林時代的全部方式保持下來，不管蘇共領導人的容許或反對了。

這樣做，自然要叫赫魯曉夫們不高興的，必然要與蘇共發生衝突的；但不曾立即引起衝突。因為對蘇共的新領導集團說來，最關重要的在於中共對蘇共第二十次大會的聲援，卻不在於這個聲援的真實程度。只要是聲援，就有利於他們在黨內鬥爭中的地位；至於中共在響應了「反對個人迷信」之餘，實行的到底是「集體領導」還是個人獨裁，對他們，對赫魯曉夫們，那就無關宏旨，至少沒有直接害處的。

他們儘可以優容。其實，首揭「反個人迷信」的赫氏自己，又何嘗真能推行「集體領導」呢？

在1957年11月召開的莫斯科「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由毛澤東親自率領的中共代表團，根本就不曾把這個問題提出來。至少，它不曾在會議上爭論過。在該次會議發表的《莫斯科宣言》上，關於這個問題，讓我們看見了一個有趣的、外交式的、因而絕非馬列主義的妥協。一方面，中共讓《宣言》寫下了這樣的字句：「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歷史性決議，不但對於蘇共和蘇聯的共產主義建設具有偉大的意義，而且開闢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新階段，促進了它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上的進一步發展。」這是中共在「法理上」支持了蘇共的反史大林運動。另一方面，蘇共則讓中共把〈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中，「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共同規律」，即關於中共意在替史大林專制作理論辯護而規定的五點規律，擴大成為九點，寫進共同文件。這是蘇共在「理論上」默許了中共的親史大林行為。

這是一筆典型的「原則交易」。照我們所知當時發生的情形看，這交易完成得並不困難^[1]。

莫斯科會議以後，反對或擁護史大林崇拜的聲音都聽不見了。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非但聽不見這個聲音，而且，在赫魯曉夫的口中，居然還聽到過不同的調子，類似「不能全盤否定史大林」的話。毛澤東方面，則將「個人崇拜」始終表演得比較隱蔽與克制。中共文章每當提到大師們的時候，總只限於馬恩列三人，對史大林的頌揚至少從公開宣傳中消失了。

就這樣，那個反史大林問題或反個人迷信問題，雖然是發生於毛澤東與蘇共新領導之間的第一個分歧問題，也是最使他頭痛過和煩惱過的問題；但若沒有後來更現實更有關中蘇兩黨（亦即兩國）實際利益的問題發生，那末，這個問題，很可能始終不成為中蘇爭吵的事端之一，可能始終以「內政」問題來看待，雙方各行其是，互相不加干涉。

是什麼新的利益問題使中蘇關係再度緊張呢？這且待後面再說。這裏要指出的是：每有一次新緊張，就要重提一下這個舊「分歧」。新緊張積聚得愈多，這個舊「分歧」就叫嚷得愈響，舊「分歧」叫嚷得愈響，自然又製造出更多更新的緊張。二者的關係非常密切，影響極其直接。所以然之故，因為緊張到了某個程度，雙方勢必都要發生「顛覆」對方的同一願望。要顛覆對方，那末在共產國家的特殊情形中，很自然地企圖和對方的「反黨分子」建立聯盟，企圖號召對方的群眾起來，反對上層領導。要實現這樣的企圖，那末在赫毛鬥爭的具體條件下，赫魯曉夫一邊的最佳武器自是「反對個人迷信」，進一步反對「獨夫」史大林，以此打擊「獨夫」毛澤東，而在毛澤東一邊，當然要強調「領袖權威」的重要，以此替死去的史大林恢復名譽，替倒了台而仍活着的「反黨集團」撐腰助勢，同時給自己的個人膜拜制度固基培土。

事情就是這樣發生了的。

就中共方面說，個人迷信問題從「內政」問題再度變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原則問題」，大致在1960年夏秋之際，即當中共在羅馬尼亞京城各國共黨會議上遭到「突然襲擊」之後。1960年9月出版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以此作為因由，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又高高舉起，

毛主席的頌讚又響徹雲霄，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被當作一個戰鬥信號推行出來。

這個戰鬥信號正確地標誌了中蘇共緊張的程度，它表示了兩黨兩國之間的分歧已達到不再能夠妥協的地步。

在是年 11 月舉行的莫斯科國際共黨大會上，中蘇共在 1957 年《莫斯科宣言》中所達成的有關個人迷信問題的妥協，完全被破壞了。會議所發表的《聲明》，特別提到了「個人迷信的有害後果的克服」，特別強調：「黨內民主和集體領導的原則」，又特別指出了「不允許有束縛共產黨員發揮創造性思想和主動性的個人迷信」。同時，《聲明》還把《宣言》上關於「共同規律」的部分，乾脆刪去了。這些都顯然是針對着毛澤東的，是赫魯曉夫利用「個人迷信」這個題目來打擊毛澤東的。

鬥爭繼續下去。等得到了 1961 年 11 月召開的蘇共第二十二次大會上，中蘇兩黨關於「個人迷信問題」的爭論，關於「史大林問題」的爭論，那就發展到了白熱化、甚至戲劇化的程度。史大林的屍首成了一齣胡鬧劇的中心道具：周恩來向它獻花致敬，赫魯曉夫連忙將它挖掘出來，焚化改葬。大會上蘇共領導人指着阿爾巴尼亞霍查那個和尚，大罵毛澤東這個禿驢，說他犯了史大林犯過的一切罪惡，說他企圖建立比史大林當年還要醜惡的個人迷信。從此以後，「個人迷信」問題不僅成了中蘇共之間的大分歧之一，而且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派系分裂的重大問題之一。從這個問題出發，又牽涉到整整一系列的分歧問題。例如，對史大林的估價問題，民主與集中的比例問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國家機器的加強或減弱問題等等。

那末，從 1957 年莫斯科會議到 1960 年的羅京會議，亦即從「個人迷信」的暫時妥協，直到為這個問題再起爭執，這三個多年頭中間，究竟發生了什麼重大事情？究竟是什麼問題，使中蘇關係愈來愈緊張，以致使那個原已相當妥協的「個人迷信」問題再度被提出來，而且成為中蘇共之間難於和解的一個重大分歧？

據我看，首先是 1958 年的解放台灣問題。這是中蘇關係惡化過程中的第二件大事情。

在中共發表的那篇〈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長文中，1958 年項下，提到了一句話：「1958 年，蘇共領導提出企圖從軍事上控制中國的無理要求，遭到中國政府正當的、堅決的拒絕。」僅僅是這樣一句話。這裏沒有說明要求的內容，也沒有說出它被提出時候的具體情形。

同樣，在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蘇斯洛夫 1964 年 2 月對蘇共中央全會所作的所謂「反華報告」中，我們也看到了一句有關 1958 年的話，他說：「但是，遺憾的是，中國政府從 1958 年開始愈來愈頻繁地採取各種破壞蘇中友誼的措施，並且以自己的未經協商的行動，在國際舞台上不僅給蘇聯，而且也給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造成困難。」這句話也說得沒頭沒腦，也是只有罪狀，卻無事實的。

不過，我們如果將 1958 年發生的大事，稍稍精細地研究一下，卻不難找出雙方互控罪狀的事實；從這些事實中，我們還可以看出，那些雙方都不明言的爭執，卻正是那些公開爭論的理由與基礎。

因此我們得在可能範圍內，填補這一頁空白。

1958年7月的中旬，美英帝國主義者為了干涉伊拉克和黎巴嫩的革命，突然出兵黎巴嫩與約旦，引起了緊張的國際局勢。在中近東，更造成了迫切的戰爭危機。為要解決這個危機，赫魯曉夫在7月19日提出了意見，主張召開「五大國首腦」會議。即主張由蘇、美、英、法以及印度的五國政府首長舉行「高峰會議」。這個提議非常奇怪。當時美國原本主張由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來解決問題，蘇聯表示反對。它所持的反對理由，是說安理會裏沒有「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可是它自己提出來的辦法——「五大國首腦會議」，卻一樣不請中國參加，而且建議由印度來充當亞洲大國的代表。

是否在那個時候的中蘇歧見，就已經使赫魯曉夫企圖抬高「中立親善的」尼赫魯印度，藉以平衡或牽制不易就範的毛澤東中國，因而有意提出這個輕視與侮辱後者的提議呢？據我們看還不見得。誠然，即使在1958年秋天，赫魯曉夫都已經有這種企圖和用心了。但是這種心意，至少在當時還不至於以如此露骨方式表演出來。當時克里姆林宮所以要用印度代替中國，最重要的理由，多半是這樣的：如果提出中國，美國絕無考慮餘地，美國拒絕考慮，那末所謂五大國首腦會議勢必變成純粹的宣傳，毫無實現可能；但是赫魯曉夫提出這個建議，卻是希望實現的；不但希望實現，而且希望真能解決危機，真能緩和國際緊張局勢，更甚至真能跟着解決東西方的其他許多矛盾，因而大有裨益於和平共處的。赫魯曉夫的這樣一種想法，在北京看來，比之於中國未被列為「五大」之一，也許具有更嚴重的政治意義，因而更為不滿。

當時北京對於中近東局勢所採取的態度，在7月20日，即當赫魯曉夫提出「五大國會議」的次日，《人民日報》的社論（〈不能袖手旁

觀)裏表示得很清楚。它說：「帝國主義者從來就是欺軟怕硬，只承認力量的。只有進行堅決的鬥爭，才能教訓這些慣於進行侵略、干涉和戰爭冒險的帝國主義強盜，迫使他們接受和平。」

顯然，北京非但不贊成由印度代替中國作亞洲的發言人（關於「五大會議」根本不提），它而且根本反對向侵略者表示軟弱，根本反對和侵略者談判，它主張「堅決鬥爭」，叫帝國主義者在力量面前接受和平。

中共究竟預備採取怎樣的「堅決鬥爭」？如何反對那正在遙遠的中近東侵略的美英帝國主義呢？問題因為牽涉到軍事秘密，當時不曾明言，後來的爭論文件也不曾說明。但從後來實際發生的事實判斷，中共當時主張的辦法，多半是要乘機解放台灣，首先攻取近海島嶼。這個實際行動，當然與赫魯曉夫所追求的以任何代價避免戰爭，用一切手段緩和局勢的主張，正相反對。

這樣，一個新的中蘇共之間尖銳衝突形成了。為要解決分歧，協調步驟，赫魯曉夫於7月31日親自飛到北京，同毛澤東作為時三日的談判（這是赫魯曉夫的第二次訪華，也是毛赫二人的第三次會面）。至於他們如何討論了這個問題，因為雙方迄今並無任何透露，我們只能作如下的推測：

毛澤東多半是這樣提出問題：反對侵略戰爭，單靠大國會議來商量是沒有用的，至少是不夠的。要有效而切實地反對侵略戰爭，只有用革命的解放戰爭。目前美國正在中近東發動侵略，蘇聯應該支持中國，先攻取靠近大陸的金門馬祖諸島，然後進而解放台灣，倘美國回師東顧，防守台灣，則此舉至少可以緩和中東局勢，援助了伊拉克和黎巴嫩的革命。赫魯曉夫自然不同意這個做法。在他看來，這樣幹

不能緩和危機，只能加重危機。這是將中近東的戰爭擴大到遠東，並且大大增加了世界大戰的危險性。這和他全面緩和國際關係的主張，特別和他緩和美蘇關係的主張，根本衝突的。但是毛澤東堅持他的主張，赫魯曉夫也不肯讓步，於是問題就很自然地發生了：如果因台灣海峽的局勢而引起中國與美國之間的戰爭，作為中國同盟的蘇聯，究竟應該怎麼辦？依照同盟互助條約而介入戰爭呢？還是違背條約而站在一旁？介入，自非赫魯曉夫之所願；袖手旁觀，則恐勢有所不能。在此情形中，蘇方多半提出了這樣的要求：在中蘇同盟互助條約之下，組成一個聯合機構，該機構由中蘇平等組成之，但由蘇方保持決定權力。這也許就是中共指控的所謂「從軍事上控制中國」的要求。結果，當如中共的文件所說，毛澤東給它以「正當的與堅決的拒絕」。

毛赫會談後發表的聯合公報，雖然也「堅決主張立即召開大國政府首腦會議討論中近東局勢」，但不指明由哪幾個大國來代表，更不曾提出由印度來代替中國充任亞洲代表。至於實際如何反對美帝侵略，則公報隻字不提，也不曾提及收復台灣之類的問題。很可能，那次會談沒有在任何一个爭論問題上取得妥協。

可是中共方面卻不管蘇方態度如何，在會談之後不滿一個月，從8月24日開始，便以行動來實現台灣解放，首先炮轟金門馬祖了。台灣海峽的局勢驟然緊張起來。中美之間全面戰爭的危機變得非常迫切。這時候，我們看見赫魯曉夫寫信給當時的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他表示「對我國偉大的朋友、盟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侵犯，也就是對蘇聯的侵犯。」他同時聲明蘇聯忠於中蘇互助條約上所規定的義務，「將盡一切可能……來維護兩國的安全，維護遠東和平的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利益。」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難道赫魯曉夫在北京會談上同意過毛澤東的辦法？難道中共之進攻金馬事先獲得蘇共的充分支持？

據我們看，都不是。事情多半是這樣：問題根本不曾有過一致的決定，或僅僅有過一個模稜兩可的協議，或者是赫魯曉夫只做了一個極其虛偽與不切實的、乃至有條件性的承諾。可是北京則明知莫斯科在解放台灣問題上所持的反對態度，或誤信了有條件同意的勉強態度，卻盡照自己的計劃幹起來了，致使莫斯科在既成事實面前，不得不出來為盟友撐腰。

事情如果是這樣（我們相信是這樣的），那麼，赫魯曉夫此次的被迫聲援，該是莫斯科不滿意北京的最大導因之一，該是二者之間所發生的最早與最現實的不愉快事件。

蘇斯洛夫所謂「中國政府從 1958 年開始……以自己的未經協商的行動在國際舞台上不僅給蘇聯，而且也給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造成困難。」主要當指此而言。

勉強而被動的支援聲明，當然不會認真切實地見諸行動；這，自然又會反過來激怒毛澤東。如果在北京的毛赫會談上，後者對此做過虛偽而閃爍的承諾，但當事實展開後卻不肯將承諾兌現，那末毛澤東的惱怒將更加理直氣壯了。

觀乎那次解放台灣之役的有雷無雨，觀乎那次進攻金馬之以鬧劇（「單日開炮」）收場，我們相信，毛澤東確是有理由責備赫魯曉夫「背信棄義」的。

無論如何，1958 年秋天所發生的事情，對於往後中蘇關係的發展總具有莫大影響。由於這些事情，蘇聯責備中國只顧一己的局部利

益，不顧世界的全域利益；責備它只為沿海幾個島嶼，竟不惜將盟國拖入戰爭，甚至不惜引起世界大戰。由於這些事情，中共責備蘇共企圖與美帝拉扯交情，不援助反帝鬥爭；責備它的支援徒託空言，事實上卻暗中拆台。甚至，責備它想混水摸魚，想利用台灣海峽局勢來軍事上控制中國。

一切關於反帝鬥爭，援助殖民地解放鬥爭，乃至關於戰爭與和平的種種理論問題，可以說都從這個現實的政治問題引出來，或因此問題而加劇了爭論。

自從那件事情與那個時候起，中蘇共的關係便急劇地惡化了。愈來愈不能妥協了。此後不到一年，即到了1959年6月間，蘇聯政府片面廢棄了1957年10月簽訂的中蘇國防新技術協定，拒絕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生產原子彈的技術資料——這，一部分的原因，也正就是中蘇在台灣海峽局勢上所形成的軍事歧見。

這個歧見，到了1959年下半年，又因為中印邊境衝突而加劇了。

中印關係的惡化，看來與蘇聯原不相干，可是事實上，中蘇關係大大受了中印關係的影響。兩種關係的惡化幾乎同時進行，彼此間讓人看到異常密切的聯繫。

中印兩國如何為了西藏問題的處理而失和，它們如何從「本查希拉」發展到兵戎相見，這些我們不想追敘。我們在這裏必須指出來的，只是中印關係如何牽涉到中蘇關係的一些簡單事實。

1959年3月發生「西藏事件」，中印關係開始惡化；同年6月，蘇聯政府片面地廢棄了中蘇有關國防新技術的協定。同年8月，中印軍隊在朗久地方首次發生衝突；蘇聯政府於9月9日經過塔斯社發表

聲明，偏袒印方。9月底，赫魯曉夫以此聲明作為「見面禮」，飛去美國，和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舉行大衛營會議。10月初，赫魯曉夫乘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十周年紀念之便，與毛澤東舉行他們二人之間的第三次會談，叫毛澤東不要「用武力去測驗資本主義制度的穩定性」，尤其要對印度和解與讓步。印度政府顯然從蘇聯態度得到了鼓勵，在毛赫會談之後不出一個月，便在中印邊界西段造成了更嚴重的武裝衝突。1960年7月，中蘇之間直接發生了邊境糾紛。此後，經過一年之久的醞釀和進一步惡化，在1962年4、5月間，新疆伊犁地區爆發了「難民出亡」和與之有關的中蘇邊境事件。接着，從10月下旬開始，中印邊境發生了大規模的戰事，蘇聯公然給予印度政府以軍事上與經濟上的援助。

這一串簡單的事實，讓我們清楚地看到了，中蘇糾紛是如何緊密地與中印糾紛牽涉到一起的。

為什麼會這樣的？

原因據我看不外乎下面三個：第一，蘇印兩國在對華邊境問題上有共同利益。中蘇邊界比中印邊界長，歷來有爭議的地點又比較的多。中印之間既然有了問題，則中蘇之間遲早也會有問題。莫斯科顯然要想在中印邊界問題上，造成一個能令北京克制的先例。第二，莫斯科覺得北京為了「幾公里荒無人煙的土地」，不惜與朋友翻臉，不惜以兵戎相見，大大妨礙了國際緊張局勢的緩和，特別妨礙了美蘇關係的改善，而且將中立的印度驅入美國的懷抱，影響了國際政治的全盤形勢。第三、為了對付難於就範的毛澤東，赫魯曉夫早已採取了「口稱中國是兄弟，卻把尼赫魯當親人的政策」。（例如我們上面談過的「五大國會議」的提議。）不過自從中印邊境糾紛爆發之後，那個「捧疏

抑親」的立場，立即轉變為「遠交近攻」，甚至「借刀殺人」的辦法了。他最初在政治上，繼而在經濟上，終於在軍事上實行公開的助印反華。

赫魯曉夫既然採取了如此肆無忌憚的，公然沙文主義與強權政治的政策，藉以壓迫中國，毛澤東豈是好惹的？別說毛澤東，就是換過比較沒有那麼多民族主義的領袖們，也一定要起來反抗，也一定要造成「分歧」。

許多「意識形態」上的分歧便由此發生，它們是：階級性質不同的兩個國家發生了戰爭，處於第三者地位的「社會主義國家」應該採取什麼態度？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對外政策，應該受社會主義，國際主義與世界革命的原則的決定呢，還是應該讓自來強權政治的均勢觀念來決定？兩個「社會主義國家」發生了邊界糾紛，應該用怎樣的方法來決定？為了「緩和國際緊張局勢」，主要是為了緩和美蘇之間的緊張關係，是否其他國家應該放棄一切為民族獨立或領土完整的鬥爭？以及諸如此類問題。

第四，我們要談經濟與技術的援助問題。

在談到中蘇兩共黨如何為經濟與技術援助發生衝突之前，讓我們先列舉一下赫魯曉夫當家之後，有關這方面的幾件大事：

1954年9月，赫魯曉夫第一次訪問北京。結果是，改訂了史大林和毛澤東之間所簽訂的一些政治上與經濟上的不平等條約，此外還簽訂了「中蘇科學技術合作協定」；簽訂了建築分別自蘭州至阿拉木圖，自集寧至蘇蒙邊境兩條鐵路的協定；蘇聯予中國以5.2億盧布的長期貸款；幫助中國政府再建15個工廠，並對以前供給的141個工廠添供設備；還贈送了一座國營農場的全套機器和設備。

1956年4月，米高揚訪華，簽訂了一個新的經援協定，蘇聯援助中國再建55個（總值25億盧布的）新工廠。

1957年10月，中蘇簽訂（有關原子彈的）國防新技術協定。

1957年11月，毛澤東親自率領中共代表團，前往莫斯科，出席召開於該地的81個共產黨及全體社會主義國家的會議。關於經援方面，沒有任何結果。

1958年8月，中蘇間簽訂了一項協定，蘇聯助建47座工廠。

1959年6月，蘇聯片面撕毀了原子協定。

1960年7月，蘇聯片面決定，一個月內撤走全部在中國的蘇聯專家，撕毀幾百個協議和合同。

1961年10月，周恩來率領中共代表團，出席蘇共第二十二次大會。蘇聯曾向他提出提前償清朝鮮戰爭時期所欠的借款。

上面這一個非常不完全的事實排列，卻已經給了我們一個明確印象：1957年11月的莫斯科會議好像是一條界線，它把蘇援的意義劃分出兩個時期。在此以前，赫魯曉夫們主要是以經技援助作為誘餌，或當作賄賂，從中共方面取得政治上的「照顧」。在這條界線以後，蘇聯當局卻主要以經技援助作為武器，或當作要脅，藉使中共領導人在政治上讓步，在理論上順從。

1954年赫魯曉夫、1956年米高揚，兩人前後來華所做的「慷慨」事業，它們所含有的政治意圖，它們所藉以成交的政治交易，我們在前一章裏已詳細講過，不贅。在這裏，我們只想聯繫着1957年的莫斯科會議，比較詳細地談談蘇聯對中國的援助為何與如何會發生了轉

變，它為何與如何從「香餌」變成「要挾」，以致激惱了毛澤東，並使中蘇「分歧」進一步地惡化起來。

我們知道，自從1957年7月，中共大張旗鼓地反對右派以後，毛澤東終於決定走上蘇共第二十次大會的相反道路。這個態度，當然為蘇共所不喜的，但不曾立即影響到蘇聯對華援助的方針。所以在10月間，中蘇關於國防新技術的談判，即關於蘇聯答應讓中國分享原子秘密的談判一經成熟，雙方便簽訂了協定。

到了11月，在莫斯科會議上，在中蘇關係的全盤檢討中，這個援助問題才讓人覺察到了有所轉變。但因許多問題交織在一起，事情絕非單獨為了援助問題，所以我們不得一般地談談莫斯科會議以及表現在那次會議上的中蘇矛盾。

1957年11月舉行於莫斯科的世界共產黨及全體社會主義國家的大會，不但對於中蘇關係，而且對於整個共產主義運動，都有非常大的影響。這是史大林逝世以後，甚至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所舉行的第一次國際共產黨大會，是蘇聯共產黨的領導層經過一度紛爭而建立了新中心以後的第一次國際大會，也是赫魯曉夫們的新路線在國內外遇到種種挫折和考驗後所召開的第一次國際大會。蘇共新領導利用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紀念來召集那次會議，顯然具有這樣的企圖，那就是要把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大會上所完成的人事上與政策上的改變，在世界共產主義者大會上獲得正式批准；並且經過這次大會，將此改變從一國範圍，合法地、徹底地推廣到國際範圍去。

可是由毛澤東親自率領的中共代表團，卻是懷着不同企圖，前來參加會議的。這位中共的頭號領袖，我們知道，對莫斯科從來就不懷着至誠虔敬的心情。後來中共勝利，史大林逝世，赫魯曉夫為了黨內

鬥爭前來求救，以及蘇共的「解脫史大林」運動在東歐引起的連串波瀾：所有這些事實，又逐次減低了毛澤東那份原不很高的虔敬。因此當 1957 年冬初，毛澤東第二次前赴莫京，他的情懷和 1949 年歲末的第一次赴俄，該是非常不同的。第一次，他如果還是以學生資格，以朝山進香者資格，來到這社會主義革命的發祥地，從史大林那裏上了所謂「共產主義」現實政治的一課，那末，第二次，他卻是主要以教師和前輩資格，以正確路線的堅持者資格，來向史大林的「不肖門徒們」，向那些只會跟隨克里姆林宮指揮棍跳舞的可憐革命家們，上堂授課了。換句話說，毛澤東是要利用他生平第一次參加國際共產黨會議的機會，把中國革命的經驗，把所謂毛澤東思想，親自帶上國際共產主義的政治舞台去。

就這樣，蘇共和中共，赫魯曉夫和毛澤東，從兩個正相反對的方向，懷着兩個難於和解的企圖，聚首於莫斯科會議廳中。究竟誰的方向與企圖能夠在大會佔據上風，能夠為大會所採納呢？這就得看兩者地位的誰強誰弱了。在共產黨國家與共產黨領袖之間的所謂地位強弱，必須從兩個方面來看的。第一個方面，就是普通意義的強弱，即是要看誰所統治的國家，在經濟、軍事以及一般文化上所達到的程度。誰的國家在這些方面強些，那麼這個共產黨和它的領袖所發表的言論就響亮些，有分量些；他們在共產黨人的行列中的地位也就排得顯著些，前面些。這方面，跟資本主義國家及其政治家們之間的關係是完全一樣的。唯一不同，只是共產黨人有時把這種關係表現得更加露骨罷了。第二個方面，另有一種強弱關係，卻是為共產黨集團與「社會主義陣營」所獨有的，那就是：某一共產黨巨頭（因而也是他所代表的國家）的強弱，還要看他在自己黨內與整個國際上所享有的革命威望，看他所享有的革命政治的力量。

當 1957 年莫斯科會議時，毛澤東和赫魯曉夫的地位和力量對比，在第一種意義上說，當然相差甚遠；但若就第二種意義說，前者卻強過後者多多。這就是說，雙方各有所強，各有所弱。彼此都不能說處於絕對優勢，沒有一方能輕易屈服對方。雖然，歸根說來，第一種意義的強弱畢竟能最後決定問題；可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這個第二種意義的強弱亦自有其不可輕視的力量，它是能夠變弱為強的。就這樣，我們看見，毛澤東與赫魯曉夫在莫斯科會議上，處於微妙的勢均力敵的地位上。

可是一切均勢總須打破；似是而非的、勉強形成的均勢則更須打破，也更易打破。蘇中、史毛之間原不曾有過均勢。二者強弱分明，後者是注定要對前者「一邊倒」的。赫毛均勢的形成，既然由於蘇共黨內的鬥爭，由於東南歐諸「衛星國」的反蘇，由於毛澤東在這些紛爭中所能發生的舉足輕重的影響，那末到了 1957 年莫斯科會議時候，「社會主義陣營」中的政治氣候已相當不同。第一、赫魯曉夫一系在蘇共內部的地位業已穩固；第二、以匈、波為首的反蘇政治風暴已經過去，相互間的關係已經好轉。赫魯曉夫是仰仗過毛澤東的政治「照顧」的，為此，他曾經付出了代價。可是氣候一經轉變，「照顧」的時價也就不同了。它不但跌了價，而且根本不需要了，因為從蘇聯和蘇共的真實力量和傳統威望看來，毛澤東的繼續「照顧」竟成為侮辱了。因此，從赫魯曉夫的立場出發，需要在莫斯科會議上打破與中共之間的均勢，要重新建立蘇共的片面優勢^[2]，毛澤東則從他自己的立場出發，卻想在那次空前盛大的國際共產黨會議上，把他已經享有的政治威望鞏固起來，並且在範圍上推廣開去，使他原來對蘇共的一黨照顧，擴大成對所有共產黨的普遍領導。

這，自然意味着中共對蘇共的國際領導權的挑戰。這個挑戰，剛巧又碰上了蘇共要重建與鞏固這個領導的努力，激烈的衝突於是就無法避免了。

不過在莫斯科會議上，我們卻看不見中蘇之間發生認真激烈的鬥爭。兩黨雖然在幾個問題上有了分歧，為了這些分歧彼此發生過一些爭論；結果卻是客客氣氣地妥協了，甚至還是赫魯曉夫作了較大讓步而妥協的。

然則兩黨的激烈鬥爭又在哪裏？赫魯曉夫的態度變化表現在什麼地方？

據我們看，它不表現於業已發生的事情上，卻表現於未曾做出來的的事情上。什麼是未曾做出來的的事情呢？經濟與技術援助是也。

我們知道，莫斯科會議的舉行，離開中國第二個五年經濟建設計劃的實施，已不足兩月。毛澤東此番親自出馬，不可能不和蘇聯當局談到這個問題的，不可能不談到在新的計劃中蘇聯所能給予的經濟和技術方面的幫助。過去，每次中蘇最高領袖會面，接着總帶來一批新的協定，這次又值中國經濟建設的重要關頭，理應在這方面有更多成就。可是事實上，我們不知道當時有這種談判，事後也不見有任何協定。毛澤東空手而去，空手而回。原本應該發生的事情卻沒有發生，這兒便是衝突，這兒也就是變化。

這樣推斷，我們是否犯了「想當然」的毛病？

我們相信還不致於。當然，截至目前為止，我們沒有在中蘇共的任何文件中找到證據，證明雙方在莫斯科會議期間討論過經技援助問

題，也不曾見到過任何材料，透露出此種會談的經過^[3]。不過從會議的全盤形勢看，從會議的結果看，我們相信下面的想法不致與事實相去太遠。

毛澤東來到莫斯科，主要就「和平過渡」問題與「個人迷信」問題，提出了與蘇共的不同意見。但他提出不同意見的態度是非常妥協的。譬如在《關於和平過渡問題的意見提綱》的結尾處，中共聲明：它的不同意見「並不妨礙在宣言草案中獲得共同的語言，為了要表明宣言草案在這個問題上與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的提法相銜接，我們同意以蘇共中央今天提出的稿子為基礎，在個別地方提出修正。」

毛澤東為什麼要採取這樣態度呢？那個同一提綱就給了解釋：「為了種種考慮」。是什麼考慮呢？其中重要的一個，也可以從中共的文件裏找到回答，那就是：為了怕「遭到報復性的打擊」，怕「給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帶來嚴重的損害」。換句話說，怕激惱了蘇共領導人，從此拿不到經濟上與技術上的援助。

那末毛澤東根本不提出不同意見不更好嗎？這卻又不行的。前面我們說過，毛澤東與赫魯曉夫相比，其強處在於他享有的革命威望，其價值也在於這個威望。如果他想抵消赫魯曉夫所享有的經濟、軍事和文化上的優勢，並使這個優勢轉過來為他所利用，他就得保持與加強業已享有的革命威望。但要做到這一點，顯然，他絕對不能表現成別人指揮棒下的跳舞者，而必須繼續扮演蘇共新貴們的政治上的保護者。

所以毛澤東的態度是無法不矛盾的。他必須一方面在政治上保持獨特的主張，藉以抬高身價；另一方面又要表示出充分的和解可能，以此換取援助。

赫魯曉夫自然不會喜歡這個態度。只要他發現自己「已經好了」，立刻就會對中國朋友「狠」起來。在1957年的莫斯科會議時期，據我們的看法，赫魯曉夫是已經狠了的。雖然這個狠不曾表現在政治討論中，而主要表現於援助問題上：他根本拒絕談判這個問題，或者，談判了而不曾有任何結果。

憑着三年來和毛澤東的交道，赫魯曉夫認識到他的對手跟自己一樣，是一位現實主義的政治家。對於這樣的政治家，用錢來講話，自然比用論據講話要方便得多。過去他曾經用錢買到了中共方面頗為悅耳的「聲音」；現在，他想用同樣的錢，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即用斬而不予的方式，壓下中共那個不再悅耳的「聲音」。赫魯曉夫相信這是他走了最狠的一步棋，也是最容易叫對手清醒，叫毛澤東屈服的一步棋。

可是照往後發展的事實看，當時赫魯曉夫這樣做法是打錯了主意的。

毛澤東誠然看重實際的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不很計較「茶杯裏的風波」；但是，他代表着一個古老而巨大的民族，更重要的，他代表着一個潛力深厚的革命，而且他本人又是一個睥睨一世而雄心萬丈的人物，怎麼肯「食嗟來之物」呢？顯然，赫魯曉夫那次的手法是弄巧成拙了。用錢講話而不得其法，往往比用論據講話更易激怒對方而非安撫對方。那次的情形也正是如此。

毛澤東正是在那次親自領教了赫魯曉夫的手法以後，我們相信，才開始由「一邊倒」的想法移轉到「自立更生」立場。

1958年5月間，中共決定了「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8月間，它提出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這些措施之所以採行，自然有很多

主客觀方面的原因；但是不能否認，其中一個不小的理由，就是要給赫魯曉夫的要脅態度以一個答覆，是要儘可能用土力量土辦法來代替洋力量洋辦法的一種企圖。

不過這個轉變，無論就赫魯曉夫或毛澤東方面說，都還不是最後的。

1958年8月，我們看見蘇聯的錢袋又鬆過一次，它向中國提供了47座工廠的新的援助。原因為何，我們在上面已經講過了，那是為了當時因中近東局勢所引起的國際緊張關係，赫魯曉夫想取得毛澤東的一致行動，不得不再遷就一下：不但登門拜訪，而且還完成了又一次的「無私援助」；可是結果，我們在上面也已經講過，在這宗新的「政治與經濟交易」後不出一個月，台灣海峽出現了新緊張，為了對付這個緊張局勢，毛澤東非但沒有滿足赫魯曉夫的希望，而且幾乎將他拖下了水。

從此以後，赫魯曉夫便決定勒緊「錢袋」了。此後與中蘇歧見的發展同時，他便愈勒愈緊，而且愈緊愈勒，與這些歧見的加深互為因果。其間最出名的是1959年6月的片面撕毀原子協定，以及1960年7月的撤退全體蘇聯專家。後一行動可說是最嚴厲的經濟制裁與技術制裁，對於中國經濟建設是一個毀滅性的打擊。這個打擊其實已經超過了想使毛澤東屈服的目的是，而竟是旨在逼迫毛氏下台，或搞垮整個中共的統治了。如此煎逼，如此壓迫，則其結果自然只能是非此即彼：或者毛澤東在制裁之下倒下去，或者，他終於渡過了難關，那就從此恩斷義絕，直奔「梁山」而去了。

蘇聯當道憑藉其經濟與文化上的優勢，常想以經技援助作為手段，使「兄弟國家」永遠保持於「衛星」地位，永遠對克里姆林宮百

依百順。這套辦法，有時雖然見效，有時卻適得其反。當年史大林曾經用以逼反了鐵托，現在赫魯曉夫也因此與毛澤東徹底鬧翻。

今次事件之曲在蘇方，咎在赫魯曉夫，那是不待言的。可是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在他尋求援助與接受援助的態度上，是否完全正確呢？不，並不正確，而且並不符合於馬、列國際主義立場。

中共中央 1964 年 2 月 29 日給蘇共中央的信上，關於援助問題，是以這樣的話來開頭的：「我們對於蘇聯在史大林領導時期開始提供的友好援助，從來給予恰當的評價。……」接下去，文章一轉，說道：「近年來，蘇共領導慣常以恩人自居，無數次地吹噓什麼『無私援助』……」這裏的意思清楚表示：史大林在援助問題上是正確的，只是「近年來」，在赫魯曉夫領導之下，在援助問題上才出現了不正確的態度和辦法。

這，我們知道，並不與事實相符。在上一章的敘述裏我們看到過，當史大林與毛澤東簽訂第一批中蘇之間的條約時，根本不曾以平等相待。同時，我們知道：「連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向中國提供的軍事物資，也不是無償援助」，當時蘇聯借給中國用以購買軍事物資的貸款，還得付很高利息。又須於短期內歸還——這些，也都是在「偉大的」史大林領導之下幹出來的。至於赫魯曉夫，我們看見，他之與毛澤東拉上交情，卻正由於他在這方面改正了史大林的錯誤。毛澤東自己在 1957 年就曾說過：「在中國問題上，消除一切不愉快事情和芥蒂，應該歸功於尼·謝·赫魯曉夫同志。」

毛澤東只為的要建立和維持自己的個人膜拜制度，便不得不維護史大林的「個人迷信」；為要維護史大林的個人迷信，竟不惜在任何方面，即使在為他自己所身受的方面，也違背一切歷史事實，替史大林

文過飾非，甚至洗刷罪惡，竭力在獨夫與屠夫的身上畫上全不相稱的榮光。這實在是毛澤東衝上國際舞台，全身披掛中所暴露的一個最大破綻。

其實，赫魯曉夫「近年來」在經技援助問題上對中國所要的種種無賴與無恥，一切都是師承史大林的。史大林當年對付南斯拉夫的一套，便是赫魯曉夫用以對付中國者。毛澤東不把這個事實指出來，反而顛倒這個事實，這非但由於他在史大林問題上所採取的錯誤態度，而且由於他在國際援助問題上，根本也採取了非列寧式的立場。從毛赫往來的記錄看，每次總只見一方面的政治「照顧」，另一方面的經濟援助，這裏進行着赤裸裸的交易，其現實不下於普通商人的買賣。本來嘛，政治這種東西，反動也罷，前進也罷，都是十分現實的。誰不現實，誰便是書呆子，而書呆子的政治家，常常要演出他個人的悲劇，或釀成他所當權的國家的悲劇。話雖如此，歷史卻終於給我們證明了：正是在這個現實主義上，偉大的革命政治家與比較小型的革命政治家之間（更不必說與渺小的革命投機家之間），暴露了極大的差別。二者的差別，當然不像我們中國儒家所說，前者只知「義」，後者但言「利」。現代的大革命家，馬克思主義的大革命家，最懂得大眾的與物質的利益的重要，不僅為了破壞舊的，而且為了創造新的，都必須要顧到此種利益，甚至以此種利益為依歸。否則要流於空想，要脫離群眾。不過為要滿足或者獲得這種利益，他們卻不是不擇手段的，決不肯以原則來做買賣的。有時候，為要從某一方面（用毛澤東的話來說：無論從人民內部的矛盾或人民外部的敵對者方面）取得「利益」而不得不作出讓步，他們總是公開說明，說明這是不得已的讓步，說明非讓步不可的理由；更重要的，他們決不會因此種不得已的讓步而給那個讓步的對手塗脂抹粉，也不會將退讓說成為前進。因為這種做

法，在那些大革命家看來，是有意欺騙群眾，會麻痹群眾的意識，要癱瘓群眾的鬥志，所以是一種對革命的背叛，至少是對於革命原則立場的放棄。至於另一方面，在予人以援助的方面，那末他們即使為了最崇高的革命目的，也決不肯拿物質利益當作賄賂，或以經濟支援作為武器，去誘使人接受自己的主張，或當人不聽話時以停止支持作為懲罰。馬克思與列寧，特別是列寧，曾經有過不少機會，以實例告訴我們：當我們為了革命之「利」而必須對朋友或敵人作出讓步之時，應如何維護與堅持革命之「義」。至於如何在思想與物質兩方面真正無私地援助國際無產階級，那末在列寧一生中，特別在十月革命勝利之後，曾經以最完美的例子昭示了我們的。可是等到史大林一當權，事情便反其道而行之。當他不得不對敵人讓步，或從敵人那裏接受援助時候，他可以將希特勒說成為「民主主義者」，可以把邱吉爾恭稱為「百年才出生一次的大人物」，甚至可以稱日本的松岡洋右為「道德的共產主義者」，同時，在政治上，對以上各人（及其所代表的勢力），當然停止了一切批評和攻擊。另一方面，當他處於援助者地位的時候，那末一分錢都要派一分錢的用處，任何給予都要看對方是否「跟着他的指揮棒跳舞」。他本人是可以因「利」忘「義」的，因之對他人也要求以「利」易「義」。如果他付了錢而不能遂他所追求的私願，則第一步的對付是停止「付錢」，然後則紀律隨之，如有可能（即如在他權力直達範圍之內），則拘禁隨之，刀斧隨之，務使那些不肯以「靈魂」的屈從為「受援」代價的人，以肉體毀滅來償還他所使用過的「援助」。

從上面的正反例子看，可見，無論受援者的毛澤東，或援助者的赫魯曉夫，在這件事情上都不是堪與列寧齊肩的大革命家，而是只能與史大林為伍的較小型的政治家，不管他們兩人中誰是欺人者，誰是被欺者，只要他們的基本立場仍是史大林主義的，那就叫「易地則皆

然」，能欺人時便欺人的。不過，今天毛澤東既然處於被援者地位，因而是受害者的身份，是利於記起列寧立場的，所以他提出了一連串有關這方面的原則性的問題：兄弟國家的經技援助是義不容辭的國際主義責任呢，還是片面施恩？赴援與被援兩方是互相幫助呢，還是單方負擔？兩黨之間的思想分歧應否藉經濟壓力來解決？國家關係應不應該被利用來解決黨的關係？爭論再深入和擴大下去，便發生了例如這樣的問題：援助是否可以憑藉其有利地位，指揮或代為規定受援國的經濟建設？國際間的經濟合作如何才能一方面打破落後的民族單位，一方面又不妨礙諸落後弱小國家的民族利益？

從這些問題，很自然地就牽涉到國與國之間的平等問題，特別是黨與黨之間的平等問題。這個問題，事實是從蘇共第二十次大會決議案對各國共產黨的有無約束力而來的。按原則（列寧時代規定下來的原則）各國共黨當然平等。沒有一個黨能指揮另一個黨，各個民族的黨，只能聽命於最高司令部——第三國際。但因事實上，第三國際，無論在列寧時代或史大林時代，都主要是受蘇聯共產黨推動的，因此，諸凡蘇聯黨的重大決議必然會反映在第三國際的決議上。列寧時代是憑精深的思想，道德的威望以及革命鬥爭的豐富經驗，使第三國際，通過它又使各國的黨，心悅誠服地接受了蘇聯共黨的領導；到了史大林時代，第三國際事實上已成為聯共黨中史大林一系所操縱的工具，它憑了雄厚的資力，精選過的代理人以及列寧時代革命權威的餘蔭，通過這個工具，把聯共的任何決定，強加於各國共產黨。等到第三國際解散後，聯共便直接地對各國黨「舞動指揮棒」了。所以蘇聯共產黨是「上級黨」，其他各國黨是「下級黨」，那是由來已久的事。聯共的一切決定，甚至蘇聯政府所採取的任何一個內政外交的措置，對「兄弟黨」都是有拘束力的。毛澤東一向默認這個事實。他雖然常常「陽

奉陰違」，卻從未對它公然提過異議。第一次公開反對這種辦法，那是從蘇共的第二十次大會開始的。

不過在最初，我們看見，毛澤東還是想服從「蘇共領導」的。即使二十次大會的一些決議使他不滿，他也寧願就個別問題，與蘇共領導進行秘密協商，藉以解決歧見。他絕不想公然出來爭辯，更不想直接向蘇共歷來享有的事實上的領導權挑戰。在1957的莫斯科會議上，毛澤東雖然懷着問鼎領導的雄心，卻仍舊承認這個領導權。蘇共大會決議對各兄弟黨具有不言而喻的拘束力，這件事根本不曾引起爭辯，所以在會議宣言中，並不需要確定這個早已確定的事實，而只指出它「開闢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新階段」。黨與黨的關係問題以特別尖銳的方式被提出來的，乃是在1960年6月召開於羅馬尼亞京城的共產黨會談上。當時赫魯曉夫「突然襲擊地提出了會談公報草案」，「濫用蘇聯共產黨從列寧以來長期形成的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威信，絕端粗暴地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赫魯曉夫採取了「家長式的、武斷的、專橫的態度，……把偉大的蘇聯共產黨同我們黨的關係，不看成是兄弟黨的關係，而看成是父子黨的關係。」（見《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在布加勒斯特兄弟黨會談上的聲明》。）這才迫使毛澤東挺身而出，直接向蘇共的領導權挑戰。在三四個月以後召開於莫斯科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黨和黨的關係首次被正式提出討論了。結果以如下方式得到了暫時的妥協：一方面，會議「聲明」規定：「所有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都是獨立的，平等的；」另一方面，「聲明」卻又強調說：「蘇聯共產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最有經驗和久經考驗的隊伍，過去是，今後仍然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公認的先鋒隊。」這是一方面宣佈父子獨立與平等，另一方面卻聲明父子終歸是父子。這是一種多少滑稽的腐敗的妥協。它僅僅使鬥爭雙方達成表面休戰，衝突隨時可以復發，而且復發時雙方都有權力指責對方破壞「莫斯科聲明」的。

這樣，我們看到了使中蘇兩共黨走到目前那個地步的，主要是上述五個現實的具體問題，我們又看到目前提出於中蘇共黨之間的全部思想問題，實際可以歸結到這五個問題，歸結到政治與經濟的問題。我們看出這些現實的利益問題是根本的，起始發源的；而其他的意識形態問題，不管它們具有多麼重大的原則性，卻是派生的，是在爭論中拉進來的。我們這樣說，用意當然不在於指那些抽象的思想問題都不過是幌子，是藉口，因而完全虛偽，不足重視。非也。思想爭論常常掩飾着利益衝突，這是事實；但是思想爭論一發生，那它們就跟一般的思想一樣，會自己取得其重要性與存在權利，且會受其本身邏輯發展的支配，同時回過來影響那些促其發生的利益問題。還有，愈是代表着歷史上進步利益的階級或個人，對於那些思想「幌子」（旗幟）愈是嚴肅，愈是鄭重；反之，愈是自覺到反動與腐朽的階級或個人，便愈把思想當作簡單的幌子，當作騙人的宣傳。今天，全世界的共產主義運動，比起馬克思、列寧時代來，雖然已經向現實政治走得很遠了，在理想主義方面是大大地墮落了的，但是一般說來，若比之於資產階級政黨的競選綱領或口號，甚至比之於改良主義工黨的政綱政見，都還不能夠同日而語。至少這些黨的普通黨員群眾們，他們仍舊嚴肅地對待理論問題，嚴格地把它看作行動的指導，而不會像領袖們那樣隨意拿來作幌子的。所以中蘇共之間的理論分歧，即使其中大部分問題為實際的與狹隘的利益（民族或國家的利益，甚至個別領袖的利益）所引起，其中某些還是臨時抓取來湊合的，但它們同樣會發生作用，會相當影響到中蘇兩國的命運，也會多少影響到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乃至世界革命的進展。

我們自應注意所有這些問題，討論這些問題。

注釋

1. 在莫斯科會議上中蘇共發生了爭論，而且爭論得相當激烈的，乃是關於從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問題。
2. 在〈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一文中，有如下的一段文字：「他們自以為他們的內部問題已經解決了，他們自己的地位已經『穩固』了，可以加緊推行他們的『對敵和、對友狠』的政策了。」這裏說的當然就是我們前面一再分析過的赫魯曉夫對毛澤東那種前恭後倨的態度變化。不過中共文章把這個變化的時間說得十分含糊，而從全文義看，彷彿這變化開始發生於1957年莫斯科會議以後，彷彿在莫斯科會議上，蘇共方面還根本不曾有此變化，這顯然是不符事實的。

在同一篇文章的另一個段落裏，說到當蘇共召開第二十二次大會之時，周恩來以中共代表團團長資格與赫魯曉夫會談，據說後者曾經表示：「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以後，當他們開始走上『同史大林不同的道路』，也就是走上了修正主義的道路的時候，他們還需要兄弟黨的支持。他說：『當時中國共產黨的聲音對我們有很大的意義』。『現在不同了』，『現在我們好了』，『我們要走自己的路』。」

這段文字給人以一個印象，彷彿蘇共對中共的「仰仗」要到1961年才改變，這當然更不確切了。綜觀前後發展，我們覺得，蘇共對中共「聲音」的從需要轉變到不需要，關鍵性的轉變時間應該是1957年的莫斯科會議。

3. 1957年11月訪蘇代表團為：毛澤東、宋慶齡、鄧小平、彭德懷、郭沫若、李先念、烏蘭夫、陸定一、陳伯達、沈雁冰、王稼祥、楊尚昆、胡喬木、劉曉、賽福鼎。照此名單看來，不像是要和蘇聯談判經援問題，只像是要談思想文化問題，不過中國同時派出一個由60位科學家擔任顧問的訪蘇科技代表團，其任務為「徵求蘇聯科學家對我國十二年科技發展遠景規劃的意見」，並「同蘇聯政府商談加強科技研究合作的協議」。

三、國際爭論中的毛澤東思想

中共中央於 1963 年 6 月間寫給蘇共中央的長信：《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1]，可以說是毛澤東思想的一張總清單。這裏面綱舉目張，應有盡有。要研究與批判中蘇爭論中的毛澤東立場，儘可以拿它來作為依據的了。

不過，我們在這裏，卻不想做逐條的與平面的討論。我們首先感到興趣的是這樣一個問題：在這張總清單中，究竟哪一些論點真正可以稱之為毛澤東思想，哪一些並非為毛澤東所固有，甚至從來為他所反對，而只是在爭論中硬拉進去的？換句話說，我們要問：在所有那些爭論問題中，究竟哪一些毛澤東思想是不變的，哪一些是可變的？所謂「不變的」：即是說，這些意見，毛澤東歷來就是這樣主張，是根深蒂固的，是有機的，一貫的，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也多半會如此的。至於所謂「可變的」，那是指這些意見而言，它們過去曾被毛澤東所反對，現在卻為他所贊成了；或者相反，它們過去曾為他所贊成，現在卻被他派作敵對者的主張而加以攻擊了，因此它們是不一貫的，前後矛盾的，不曾構成整個毛澤東思想的有機部分的；它們今天如此，卻保不定明天是否還如此。

為什麼我們要從這樣的分別着手？因為，這樣一分，我們可以截枝去葉，直捷了當地接觸到毛澤東思想的根本。又因為，這兩種毛澤東思想，無論在理論上或實踐上，都具有顯然不同的價值。「可變部分」的毛澤東思想，嚴格說，根本不能稱為毛澤東思想。它們可以拿來做毛澤東在思想上缺乏一貫性與原則性的例證，可以拿來做毛澤東在論爭中如何將原則當策略使用的說明，卻不能當做毛澤東思想的本質來研究。它們在中蘇分歧的一般性的歷史研究中有地位；但是在毛澤東思想的專門研究中卻甚少價值。

在那張「總清單」中，哪一些是可變部分呢？有下面這兩類：

第一類，對於某些見解的批評。這些見解原本是屬於史大林的，現在讓赫魯曉夫原封不動地接收過去，或更進一步地發揮出來，毛澤東稱它們為「修正主義」；可是他這樣稱呼時候，卻絕不追根到史大林，而且還硬說這些同樣意見出之於史大林之口是「偉大而正確的」，讓赫魯曉夫拾起來的唾餘則是有毒而錯誤的。第二類，一些確乎屬於毛澤東的見解，但它們不是深思熟慮的結果，也不是他長期工作經驗的總結，而是純粹在論戰中產生的。它們之所以被提出來，與其說是根據於原則性的立場，毋寧說是為了爭論中策略性的方便。

屬於第一類，重要的有如下面這幾項：(1) 和平運動與革命的關係；(2) 和平共處與反壓迫鬥爭的關係；(3) 全民國家與全民黨問題；(4) 對於兄弟黨的所謂「莫斯科之手」問題；以及公平對待論敵等等問題。

我們知道，將和平鬥爭從整個革命鬥爭的綱領中分離出來，將它抽去階級鬥爭的內容，將和平希望寄託於各個階級，特別寄託於上等階級著名人士的呼籲與贊助之上，認為不經過世界革命鬥爭，在資本

主義制度下便可以保持和平……這個立場的發明人是史大林而非赫魯曉夫，而且一直在中蘇分歧爆發之前，不論在史大林時代或赫魯曉夫時代，毛澤東都曾經擁護過這個立場的。其次，我們知道，為了與帝國主義國家和平共處，特別是當蘇聯與某一特定的國家希望共處的時候，總是在那些國家，尤其在那個特定國家中宣傳階級合作與民族和平，總是要求屬於該一國家的殖民地中的共產黨員停止支持民族解放運動（例如第二次大戰時期的印度），這個立場的發明人當然是史大林而非赫魯曉夫，而且一直在中蘇分歧爆發之前，不論在史大林時代或赫魯曉夫時代，毛澤東都曾經擁護過這個立場的。我們又知道，說蘇聯已消滅了階級，因此已變成了全民國家，也因此，無產階級的政黨已變成為全民政黨，這看法的發明人也是史大林而非赫魯曉夫，而且一直到中蘇分歧爆發之前，毛澤東從來不曾指斥過這個說法。如今毛澤東雖然說史大林當初這樣說是一個錯誤；但他接着立刻聲明：「雖然如此，史大林仍然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而赫魯曉夫繼承了這個說法，便是渺小的「修正主義者」了。關於「莫斯科之手的誹謗」，即克里姆林宮對於各國共產黨與各國兄弟國家的橫加干涉，那末始作俑者更不必說是史大林而非赫魯曉夫，可是毛澤東卻硬要說史大林的干涉是「國際主義的」，那些被干涉者是理應被干涉的，而赫魯曉夫那種遠不及前者毒辣與殘酷的干涉卻是「沙文主義的」，絕不容許的。對待政治上的敵對者，禁止其發言，不許刊載他們的文章，斷章取義地歪曲他們的本意，用莫須有的罪名控告反對派，最後還在肉體上消滅了一切反對者，這種事的首創者自是史大林而非赫魯曉夫，可是毛澤東卻硬說史大林曾經公平對待了反對派，硬說他曾經充分發表了托洛次基等人的文章……硬說只有赫魯曉夫才將反對者的意見完全對蘇聯人民隱藏起來。

上面這五點，毛澤東今天對赫魯曉夫的批評顯然都是正確的。但是因為他不提史大林對這些錯誤與罪惡的始創權，因為他替史大林完全賴掉這些罪惡（這也就是替自己賴掉對這些罪惡曾經給過的默許與支持），因為他將史大林的錯誤說成正確，將他的罪惡說成功績，所以我們對於毛澤東今天在這些問題上所採取的較為正確的立場，不能認真相信，也不值得認真重視。因為形勢稍稍改變，當他有利於採取昨天史大林與今天赫魯曉夫所採取的立場時，毛澤東毫不猶豫地就會採取它們。

事實上，即使在今天，毛澤東上述五點對蘇共領導的批評，也並不妨礙他同時實行那些被批評的主張和行為，只是實行的隱顯程度有點差異。所施的對象有所不同罷了。根本說來，毛澤東在這些問題上，與赫魯曉夫固然同是史大林弟子也。

毛澤東思想中可變部分的第二類，表現在《總路線建議》上的，主要可以指出三點：（1）共產主義實現的時間問題；（2）自力更生問題；以及，（3）對於南斯拉夫國家性質的估價問題。

在《建議》的第十八點中，說：「現在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的水平，都還離開『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很遠很遠。」這個意思，在〈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長文中，又加以更確切的說明道：「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幾十年內是不行的，需要上百年到幾百年的時間才能成功。」可是六年前，在1958年8月中共中央通過的，關於建立農村人民公社的那個有名決議中，毛澤東卻說過這樣一句有名的話：「看來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麼遙遠將來的事情了。」在如此根本的嚴肅問題上，前後發表了如此矛盾的意見，實在不是一個嚴肅的革命思想家所應該的。

在《總路線建議》第二十一條中，鄭重規定道：「任何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事業，主要地應當依靠自力更生。」又說：「實行自力更生為主的建設方針，就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具體表現。」可是在1949年，當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在成立之際，毛澤東卻說過那段非常出名的話：「不要國際援助也可以勝利，這是錯誤的想法。在帝國主義存在的時代，任何國家的真正人民革命，如果沒有國際革命力量在各種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勝利了，要鞏固，也是不可能的。」毛澤東所以會有這樣的轉變，當然可以說，由於他十多年來「一邊倒」的痛苦經驗，由於蘇聯之利用援助來干涉內政，妨礙建設；但是，毛澤東如果真是一個有原則性的嚴肅的革命思想家，那末他從痛苦經驗中得出來的教訓，應該是以正確與真正的國際主義去對抗蘇共錯誤而虛偽的國際主義。他不該以民族主義的經濟計劃去對抗人家沙文主義的經濟侵略。

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究竟非靠國際援助不可呢，還是應該自力更生？毛澤東忽而主張前者，忽而堅持後者，沒有從根本的理論方面企圖給人以原則性的解答。所以我們只能說這個問題的毛澤東思想是可變的。至於在另一方面，毛澤東在此問題上始終不變地相信「一國社會主義」的學說，我們已在有關經濟的一章裏討論過了。

在南斯拉夫問題上，也非常充分地暴露了毛澤東處理原則性理論問題時的輕率和易變。中共最初跟着史大林罵鐵托，後來又依從赫魯曉夫的指揮棒與南國「發展了友好的來往」（劉少奇語）。在1956年9月召開的中共的第八次大會上，鐵托的代表被當作社會主義國家兄弟黨的代表邀請出席，而且還請他在大會上發表了演說。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中，還說當初史大林和南國鬧翻是一個錯誤。可是過不了好久，〈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中，便改變了

這個態度。跟着，這個態度就愈變愈壞，不斷改變着對南斯拉夫這個國家性質的看法。它從怒斥南國的修正主義開始，接着否認這個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終且斷言資本主義在該國業已復辟成功，宣佈南斯拉夫是一個國家資本主義的國家了。

這個樣子的反覆多變，固然反映出中共從來對蘇聯亦步亦趨的這一事實，同時，又反映出中共與赫魯曉夫鬧翻後所採取的指桑罵槐的策略；但是，毛澤東在原則問題——估計一個國家的社會性質是一個根本原則性的問題——上的隨便與不嚴肅，卻總也充分地暴露了出來。

毛澤東在這個理論問題上的不嚴肅態度，我們只要指出一點就夠了。依據毛氏一個深刻的信念：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必須經過暴力鬥爭；可是資本主義的反革命，依據毛氏看法，卻毋需經過任何暴力鬥爭，只要靠「和平演變」就可以成功，而且在南斯拉夫已經成功，在蘇聯也快要成功。其實，任何嚴肅與一貫的理論工作者都應該明白：和平反革命不過是和平革命的反定理。如果理論上排除了和平革命的可能性，也就不能不排除和平反革命的可能性。如果說，二加二不能等於五，那怎麼可以說五減二卻能等於二呢？

* * *

所以我們上面說過，這一部分的毛澤東思想是不能認真相信，也不值得認真重視。不過這是指純粹思想研究的價值而言，是從研究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家地位而言。若從政治鬥爭的角度看，從行動的革命家地位看，那當然是另一回事，它們是應該重視的。這不僅因為毛澤東是中共這個強大政黨的頭號領袖，他的任何一個思想，甚至他的一個離奇幻想，都可能見之行動，都可能與中國乃至世界的實際政治有關，從而發生巨大影響。而且因為毛澤東那些不一貫的，口是心非

的，或今是而昨非的意見，只要投進到實際的革命鬥爭中去，只要讓群眾認真地堅持起來，那末不一貫的可能被迫出一個一貫性來，口是心非的可能要被迫顯出原形，假戲可能真做；至於今是而昨非的，則多半會在鬥爭的客觀邏輯的壓迫下，要讓人們去弄明白那個雖屬過去但仍與當前鬥爭有密切聯繫的歷史真相。

因此，一切對國際社會主義運動認真關心的人們，必須詳細研究與正確評斷毛澤東的（不用說，也要研究和批評赫魯曉夫的）所有思想——不管它們是可變的或不可變的，藉以確立自己的態度，決定中蘇兩黨在爭論中誰是誰非，決定自己的何去何從；或者，如果發現兩者誰都不曾全對，而且誰都還陷在史大林主義的泥淖裏，那就應該決定誰的立場比較對些，或誰的立場中的某些觀點，比較有利於國際社會主義革命的健全發展些，因而決定給它們以有條件的、批評性的擁護。

不過，這將屬於革命組織的綱領範圍了。對毛澤東思想的傳記說，最重要的畢竟不是它的偶然的，或竟是任意扯來的可變部分；而是那些貫穿着毛澤東全部思想活動的，長遠地決定了毛澤東其人及其事業的那些不變部分。

讓我們來談談那個部分。

在《總路線建議書》所提出的全部意見中，究竟哪幾點屬於毛澤東思想的不變部分呢？據我看，首先是下面這兩點：（1）武裝革命論；（2）以鄉村包圍城市的戰略路線。這兩個論點，原可以合併為一的，那就是，革命者首先在落後的農村中從事武裝鬥爭，積聚力量，建立根據地，然後包圍城市，再然後俟機攻取城市，解放全國。

不過為了討論的方便起見，我們仍舊將它分開來談。

關於武裝革命，毛澤東在 1938 年曾經做了一番理論探討。他企圖從馬列主義，特別從史大林主義中，給自己行之十年的武裝革命鬥爭尋找理論根據，企圖將革命的實踐作一個理論的說明和概括。結果他得出了這樣一個斷語：「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原則是普遍地對的，不論在中國在外國，一概都是對的。」對於它，我們在前面討論毛澤東的戰術與戰略之時，已經充分研究過，批評過，此地不贅。在這裏，我只想聯繫着目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兩個主要爭論問題，再看看毛澤東的這個立場。

那兩個主要爭論問題是：（1）革命可以通過和平道路來完成呢，抑或必須經由武裝鬥爭道路來完成？（2）國際戰爭能否避免？

第一個問題是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的老問題。近百年來，它曾經不斷地爭論過，不斷在事變中得到了解決，又不斷在新的歷史條件中給重新提出來。

這一次，赫魯曉夫們是依據什麼新的歷史條件而斷言革命可以通過和平道路來完成呢？從綱領性的文件中，我們只看到了如下的理由：

國際舞台上的力量對比有利於社會主義的深刻歷史變化和巨大躍進，社會主義思想的吸引力在工人階級，勞動農民和勞動知識分子中的增長，為社會主義的勝利創造了更加有利的條件。（見《莫斯科宣言》第四節）

換成更加清楚明白的話來說，那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國際上已造成了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陣營，這使得社會主義在力量對比上，大大超過了資本主義；同時在各個資本主義國家內部，以工人階級為首的一切勞動人民，愈來愈趨向於社會主義；因此，《宣言》接着說：

在目前條件下，在一些資本主義國家裏，以自己的先進部隊為首的工人階級，有可能在工人陣線和人民陣線的基礎上，在不同的黨派和社會團體達成各種可能形式的協議和建立各種可能形式的政治合作的基礎上，把大多數人民團結起來，不經過內戰而取得國家政權。

國際舞台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力量對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發生了巨大變化，這自是新的歷史條件。不過這個條件是否有力到足以使工人階級和平地取得國家政權，我們暫且不談，我們預備將它併入下一個問題——即國際戰爭能否避免——來談，現在先請談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在政治、經濟及社會階級諸方面所發生的變化，是否產生了赫魯曉夫們所斷言的、和平實現革命的可能性。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發生了兩個最顯著的現象。它們是：壟斷資本更進一步地與國家機器相結合，以及國家機器更進一步地軍事化。這兩個現象雖然特別明顯地發生於北美合眾國，但在或大或小的程度內，也發生於所有資本主義國家中。這個客觀情形反映到革命政黨的主觀的政策上來，應該得到怎樣的結論呢？很顯然，應該得出的是與赫魯曉夫們所得到的結論恰恰相反：和平實現革命的可能性並不是大了，而且愈發的小了。小到可以說沒有了。赫魯曉夫們以為在資本主義的經濟與政權更密切結合，而那個政權又飛速地軍事化的條件下，在未來的革命鬥爭中，那裏的剝削階級反而會有更大可能不以暴力反對人民，會自動「明智地」退出歷史舞台，會讓他們制度和平地過渡到社會主義，這當然是違反一切情理的。

赫魯曉夫們也許以為，各國工人階級以及一切勞動人民繼續增高地趨向社會主義，這個條件會抵消上述那兩個不利現象而有餘，會強

迫那愈益反動的統治階級退讓，因此出現和平革命的可能。這樣想，也是不符實際的。列寧早就指出過：「每當剝削者開始感覺到資本的權力動搖時…… 恐怖和專政就公開表現出來。」事實正是如此，勞動人民愈是為「社會主義的思想所吸引」，愈是想推翻資本統治，那個資本統治，特別是軍事化了的資本統治，便愈是不肯和平退位。

赫魯曉夫們怎麼會把最起碼的列寧教訓都忘記得乾乾淨淨？原因當然很多，而最主要的，自是蘇聯的統治官僚層愈來愈變得保守自足，愈來愈害怕一切震動（無論戰爭或者革命），愈來愈發現世界革命對他們的利益不符，因之，愈來愈徹底發揮由史大林規定的「民族社會主義」的理論。

毛澤東在許多基本問題上都是史大林主義者，在「民族社會主義」問題上尤其是史大林主義者。但因中國革命的現階段與目前蘇聯的處境有很大不同，又因毛澤東的革命經歷與赫魯曉夫們的有極大差異，所以，雖然是同樣從「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利益出發，毛澤東卻並不害怕戰爭的震動，而且極歡迎革命的震動。

不過我們且別把問題拉得太長太遠，讓我們專談毛澤東關於武裝革命的意見吧。

毛澤東堅決反對赫魯曉夫們的和平實現革命的立場，並不需要研究目前世界的新的歷史條件，也不需要馬克思列寧的經典著作裏去尋找指導。作為毛澤東思想中一個不變的成分，這個武裝革命的意見可以說是「出乎他的本能」的。

拿起槍桿子鬧革命，槍桿子裏出政權，槍桿子裏出社會主義，——這是毛澤東主義的中心的中心，當然，毛澤東的這個見解是偏頗到了

庸俗與錯誤的程度（這一層我們曾經在前面指出過了）；不過在同時，我們卻必須指出，他比之於書齋革命家，比之於空談革命家，比之於一切所謂非暴力革命家，總是更接近於一個痛苦的真理，即歷史不同傳說，那裏是沒有所謂「禪讓」的。從來沒有一個統治者，更不曾有過一個統治階級，曾經自動地、不在敵對力量的壓迫之下而讓出了統治。而所謂力量，在最後分析中，總得有暴力的因素在。所以一個革命者，一個代表着進步思想的革命者，如果不努力去獲得包括武力在內的物質力量，如果根本看不起武力，那麼這個革命者終於不會搞出任何名堂來，不管他所代表的思想是如何的進步與正確。毛澤東是認真懂得這一點的，並且以最大熱忱和最切實的步驟去實行了的。毛澤東的這一不變思想究竟是從哪裏來的呢？為什麼會變成他的「本能」呢？我以為首先是吸收了一百多年來中國人民在中外統治者暴力壓迫下所獲取的痛苦教訓。一百多年來，中國民眾的苦難太過深重了。他們由於軟弱而所受的欺凌，由於善良而嘗到的幻滅，使他們深深知道與虎謀皮是一個可憐的幻想。取得虎皮的唯一辦法，就是要以武力和它搏鬥，擒住它，打死它。所以必須以牙還牙，必須以槍桿子對付槍桿子，這不但是毛澤東個人的理論，而且是幾億受盡凌辱，受盡欺壓的中國人民大眾的普遍感想。這樣的感想，基本上當然完全正確。毛澤東便是堅定不移地把握了這一點，使他自己成功，也使革命成功。

今天毛澤東在革命的和平道路或暴力道路問題上所採取的立場，實質上便是拿他對中國革命的這一個基本看法應用於西歐革命、應用於全世界的革命。西歐革命與世界革命的主客觀條件是否與中國革命的條件一樣？當然不。但是不管有多麼大的不同，「每當剝削者開始感覺到資本的權力動搖時，……恐怖和專政就公開表現出來」，卻是中外相同的，而且至今沒有改變。

因此，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和赫魯曉夫們所發生的爭論，正確無疑在毛的一邊。

為革命的和平發展提供另一個理論根據的，有所謂「結構改革」論。這是意大利共產黨人首先喊出來的。他們認為戰後意大利憲法「基本是具有社會主義精神的」，因此意大利革命可以在憲法所允許的範圍內，和平地發展到社會主義。意大利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民主？照陶里亞蒂的說法，這乃「由於共產黨人在1946年拒絕採取破壞法制來拼命試圖奪取政權的道路，而選擇了參加立憲會議的道路」。

事實是否這樣呢？顯然不是。意大利共產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原本有力量和可能奪取政權的，可是在史大林的指示之下，拒絕這樣幹，同時，資產階級政黨卻沒有可能實行赤裸裸的獨裁，於是便形成了這種維持在不穩定的階級力量對峙上的政制，一種「極其民主」的政制。因此，這個政制，並非意共以及它所代表的工人階級的革命勝利的結果，而是它放棄革命，叛變革命的結果，是無產階級革命挫折的結果。第一次大戰之後，德國無產階級革命受到挫折，也曾經產生過一部「基本上具有社會主義精神」的憲法，即魏馬憲法。這部憲法曾經將德國過渡到什麼地方去呢？人人知道，它和平地過渡到了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而非過渡到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

毛澤東當然深知這個有名的「和平過渡」，深知德國那一次的「結構改革」。不過他之所以堅決地反對這個理論，自不必從魏馬道路去取得教訓與經驗。他自己就盡有這一類經驗。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毛澤東接自克里姆林宮的命令，也是要他「拒絕採取破壞法制來拼命試圖奪取政權的道路」。要他學習法意共產黨人的榜樣，與蔣介石組織聯合政府。如果他服從了指揮棒，放棄了武裝鬥爭，將一切押在

一部美妙憲法的賭注上，那麼中國也多半會走上了「意大利道路」的。至於這條道路僅僅等於蔣介石國民黨腐朽統治的延長，那更是不在話下了。

當然，說毛澤東當年完全沒有遵守莫斯科的指示，說他從那時起就採取了與陶里亞蒂相對立的路線，說他至少從抗戰勝利時候起就堅持了為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的政策，那是不正確的。因為正像我們在前面論戰略的兩章裏所指出，事實上並非如此。事實上，別說在抗戰勝利之初，就是到了內戰全勝之後很久，毛澤東還是堅持這是「新民主主義」（也正是今天他在與陶里亞蒂論戰中所批評的「新民主制度」）的革命，而不是社會主義的革命。因此，陶里亞蒂曾經理直氣壯地指出，中國革命的成功並非依照了十月革命的道路，即不曾經由徹底階級鬥爭的道路，而是採取了階級合作的辦法。陶里亞蒂這個看法不是全無根據。若憑中共踏上全國政權前後的政治綱領看，問題確實如此。那末，同樣是標榜「聯合政府」，同樣是主張「各黨各派協商」，同樣是聲稱要實現「新民主主義」或「新民主制度」的毛澤東與陶里亞蒂，為什麼有了成敗之分，為什麼成了敵對的論爭者？這裏，主要是為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在毛澤東，不管他嘴裏說些什麼，文件上寫些什麼，他手裏卻永遠拿着槍桿子；他相信任何主張，有了槍桿子就可以實現，放棄了它便變成空話。在陶里亞蒂呢，卻相信協商就是和平協商，民主便是合法民主。他相信任何主張，都可以憑選舉的勝利來實現。

所以根歸結蒂，毛陶二人（亦即毛赫二人）的根本分歧，也在於無產階級革命中的武力問題。其他種種都是枝節的、派生的、甚至是在爭論中隨手拉扯上去的。

毛澤東偏信武力的結果，從來不很看得起革命的精神影響力。這當然是大毛病。對於這個毛病，我們早已在適當地方（論經濟建設的一章裏）批評過了。一個革命業已勝利國家的所作所為，對於世界無產階級的認識與覺悟具有莫大的影響力。列寧與托洛次基最看重這個影響力，而史大林卻根本看不起它。列寧當國時代，每當蘇聯採取一個內政外交上的重大政策時，首先要問：這在世界無產階級的觀感和認識上，會造成怎樣的印象。他非常看重這種印象。可是一到史大林，這種考慮完全不再需要了。只要於他有利，於克里姆林宮有利，什麼事都能做，而當他做的時候，隨便什麼不成樣的理由都可以順手抓來做藉口，甚至於可以根本不要什麼藉口，「笑罵由人，我行我素」，這種「大無畏」的態度，他自以為是革命家本色，其實是非常有害於革命的「肆無忌憚」。在這上面，毛澤東接近於史大林而遠離乎列寧和托洛次基。

可靠的「輸出革命」之道，乃是在革命勝利的國家內，首先造成比不革命國家，未革命國家遠較優勝的制度，讓人們望而景仰，見而生羨，不禁起仿效之心。毛澤東今天即使不是見不及此，至少也是信心不足。赫魯曉夫們在這方面批評中共，原非全無理由。不過，赫魯曉夫們以「和平建設」及「和平競賽」的名義，反對並且阻止任何方式對於帝國主義的動武，以為這樣一來便不能「緩和國際緊張局勢」，便妨礙了「和平共處」的總路線，那就完全跑到列寧路線的反對方向去了。他們大大地落在毛澤東後面。蘇共說中共主張用戰爭輸出革命，主張用武力去試探帝國主義的穩定性，這顯然是一種歪曲。毛澤東不大相信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對其他國家的勞苦大眾會有深遠的影響力，但他堅決相信一個革命國家或革命民族要想從帝國主義那裏獲得讓步，捨武力鬥爭無其他道路。毛澤東的不相信是錯的；但他的所信卻極其正確。被壓迫民族不能用和平的乞討方法向帝國主義謀

取獨立，帝國主義者只有在反抗者的武力前面才能退讓，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毛澤東特別強調這個真理，正如我們前面所說，只不過表示百年來歷盡苦難的中國革命者，在這方面付出過太高代價，以無數頭顱換來一點經驗罷了。

以上我們是聯繫了革命的和平發展道路抑或武裝鬥爭道路這個新爭論，再度評量了毛澤東關於武裝革命的一貫思想。現在讓我們從「國際戰爭能否避免」這個爭論的視角，看看那個同一思想。

在前面，我們保留了一個問題，那就是：第二次大戰以後，國際範圍內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造成的新的力量對比，是否已經有利於社會主義到這樣一個程度，竟致資本主義國家裏的工人階級毋需經過武裝鬥爭，就能取得國家政權了？我們將這個問題保留到此地才來討論，因為，它和「國際戰爭能否避免」問題密切相關；而且解決了後一個問題，前一個問題便自動地解決了。

毛赫雙方有關戰爭能否避免的論爭，牽涉的問題很多，各個問題之間的性質差別也很大。其中最主要的有如：帝國主義性質不變是否帝國主義戰爭就不可避免？帝國主義戰爭能否阻止？用什麼方法來阻止？世界革命是否為唯一的阻止之法？……等等。要羅列雙方的論據，加以批評，那將需要大量篇幅，不是我們這裏所能辦到。同時這樣辦，也將大大越出我們研究毛澤東思想的範圍。為此，這裏我們只想談談下面這個問題。

《莫斯科聲明》說：「在社會主義在地球上還沒有取得完全勝利之前，在世界部分地區存在資本主義的情況下，將會出現把世界戰爭排除於社會生活之外的現實可能性。」

蘇共的這一個意見究竟是否正確？

顯然，赫魯曉夫們作出這個斷語的最大的客觀事實根據，便是前面說起的，所謂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力量對比已變得大有利於前者；所以在社會主義陣營方面只要，或者主要靠「和平競賽」就可使「社會主義在全世界勝利」，並因而「最終消除產生任何戰爭的社會原因和民族原因」。

赫魯曉夫們的這個斷語及其根據是否站得住，首先我以為應該決定於下面這幾個問題：所謂「部分地區」究竟多大？這個地區位置在哪裏？它所佔的經濟文化上的地位有多麼重要？像目前資本主義國家所佔的地區，是否已能適用上述斷語？所有這些問題，《莫斯科聲明》都不曾明確給予答覆，它只是混統含糊地下了那樣的判斷。這如果不是有意欺蒙人，便是《聲明》的寫作人自己糊塗。其實，要下這樣的一個斷語，首先就得明確地答覆上舉那些問題。因為在某種情形下，例如資本主義已經在所有的主要國家中被推翻，其餘勢只被保留在某些無足輕重的國家中，那末，戰爭（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當然談不到，甚至連自下而上的革命都幾乎不需要了。反之，如果仍舊生活於資本制度下面的那個部分地區，像目前一樣，佔據世界更重要與更廣大的地方，包括大多數人口，代表着經濟文化上的極發達的階段，那麼要想這些地區的統治集團不從事戰爭，在和平競賽下乖乖地認輸，將資本主義讓位於社會主義，簡直是癡人說夢，完全不合實際。不錯，在長期的和平競賽之下，資本帝國主義國家會發生困難，它們的危機會愈來愈嚴重。但正因為這個緣故，它們除了加緊壓榨本國民眾外，首先要加緊在政治與經濟上去臣服那些剛獨立與未獨立的殖民地國家；而此種臣服企圖，勢必要引起那些國家的反抗。此種反抗又極有可能導致與帝國主義鎮壓力量的武裝衝突，亦即導致廣泛的民族解放戰爭。這是一。其次，帝國主義在和平競賽中愈失利，它們的處境愈困難，愈受民族解放運動的打擊，則愈會傾向於進行最

後的與最大的冒險，即準備與不同制度的國家一決雌雄，進行戰爭。誰若以為帝國主義者為了核武器的空前破壞力量，為了害怕在核子戰爭中同歸於盡，因而會「明智地」有所顧慮，不敢冒險，這是非常天真的因而是非常錯誤的想法。歷史上有這樣的一個規律：任何一個將被逐出舞台的統治階級，總是要進行瘋狂而絕望的掙扎的，這種掙扎愈絕望，掙扎者就愈瘋狂，愈不明智，以此去加速自己的滅亡。這條「規律」，看來，今天全身配備了核子武器的帝國主義者，也不可能不受其支配。

對於戰爭問題，馬列主義者有一個傳統的看法，那便是：只有革命能夠結束戰爭與防止戰爭；只有無產階級的世界革命成功，才能根絕帝國主義的戰爭。這個立場，雖然確定於熱核武器發明之前，但不曾因此一武器之發明而成為過時。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和赫魯曉夫爭論，正確的顯然在毛澤東一邊。【朱正按 今日毛派可能會爭辯說，1976年後鄧的上台正是反革命資產階級通過「和平演變」上台的例證。但是從社會經濟事實上，中國真正開始走向、且根本蛻變為資本主義（勞動力商品化、社會生產的市場化和私有化以及相應國家大方向的轉變）是在一九八零年代後期，直至二十一世紀初期。今天這個具體過程還在繼續。這其間是不是和平的過程呢？不是，這中間發生着愈演愈烈的階級鬥爭——換個說法也不能改變這個事實：大量工人對國企改制的抗議集會、遊行和罷工鬥爭與城鄉大眾反徵地反強拆鬥爭，以及從地方到中央對抗議群眾頻頻出動軍警鎮壓，從中充滿了悲與恨，血與淚。這豈能叫「和平演變」？這樣的顯著的大規模反革命蛻變，顯然沒有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南斯拉夫和蘇聯發生過。】

現在我們來看看毛澤東的第二個不變思想，即以鄉村包圍城市的革命路線。

在《毛澤東思想論稿》專論戰術家毛澤東的一章裏，我們曾經敘述了毛澤東此一思想的形成經過。它讓我們看到了：這條路線原來是當革命（1927年）失敗之後，因為中共繼續武裝鬥爭，在客觀形勢的逼迫之下形成的。所以它是武力革命路線的必然產物。在理論上，它是從屬於武力革命論的。故在1938年10月間，毛澤東首次將自己的槍桿子主義理論化的時候，將「戰爭解決問題」這個論斷說成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原則」，說它是「普遍地對的，不論在中國在外國，一概地都是對的」，他卻沒有以同樣的程度來看重那個「以鄉村包圍城市」的路線。他只說先佔鄉村後取城市乃是「中國的特點」。在以後的毛氏言論中，最多說這條革命路線可以應用於中國相類似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卻不會做更為廣闊的結論，即沒有說它「在中國在外國一概地都是對的」。

不過在中共取得全國勝利之後，毛澤東對這個問題的看法顯然有了變化。隨着武力革命論的一再強調，逐漸地，它也被提升為世界革命的重要戰略了。他要將這條使中國革命走到了勝利的路線，在整個世界範圍內應用，藉以促成世界革命的勝利。

事情很清楚，目前世界革命與反革命的局勢，與中國在一九二零年代的後半期，特別與一九三零年代的前半期確很相似。如果把亞、非、拉丁美洲諸國比作世界鄉村，把歐美諸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比作世界城市，那末，城市的資產階級經歷了嚴重危機之後，確實已重趨穩定，表面還呈露了欣欣向榮之勢，那裏的工人階級鬥爭一時很難發展到革命形勢；而另一方面的農村則因為「矛盾集中，統治薄弱」，卻成了「革命風暴的主要地區」。面對着這樣大勢，毛澤東自然要提出他施之於中國獲得成功的戰略了。他要先「鄉村」而後「城市」，要進行武裝的民族獨立鬥爭，要在世界鄉村建立革命的根據地，要以革命的世

界鄉村去孤立與包圍反革命的世界城市，最後並「攻取」這些城市，完成世界革命的大業。

不過截至目前為止，就我們所見到的毛氏文字而言，毛澤東卻不曾公然作此聲明^[2]。在《關於總路線的建議》中，他也只是說：亞、非、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同國際社會主義革命運動，是當代的兩大歷史潮流。他說這些地區的民族民主革命，是當代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他說這些地區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鬥爭，嚴重地打擊着和削弱着帝國主義和新老殖民主義的統治基礎。是當代保衛世界和平的強大力量。因此，他說，「在一定意義上說來，整個國際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終究要以佔世界人口絕大多數的這些地區的人民革命鬥爭為轉移。」

這一段話，表面上看來，彷彿不過是列寧關於世界無產階級與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這個老口號的重新肯定，最多也不過是這個口號在新的歷史條件中所作的新的說明。可是在實質上，這裏卻已經隱含着毛澤東的那個「不變思想」，已經在說明以世界鄉村圍攻世界城市的理論根據了。

不過《建議書》這一段中所含的毛澤東思想的本質，毛澤東的蘇聯論敵們卻都不曾看出來。

在7月14日（1963年）蘇共中央委員會給蘇共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中，赫魯曉夫們斥責了中共《建議》中有關二類革命關係的理論，說道：「根據這種理論，我們時代的基本矛盾竟然不是社會主義同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而是民族解放運動同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在中國同志看來，反帝鬥爭的決定性力量不是世界社會主義體系，不是國際工人階級的鬥爭，而仍然是民族解放運動。」由此，

赫魯曉夫及其追隨者們指責毛澤東犯了「種族主義」，「民族主義」，或者「顛倒過來的種族優秀主義」，即認為有色人種優於白種人——這些個錯誤。

赫魯曉夫們的這個批評，顯然沒有打中問題中心。他們稱這個意見為「新理論」，其實這是毛澤東由來已久的舊思想。他們不知道這只是「以鄉村包圍城市」這條路線的延展，他們不知道這正是毛澤東在中國施行過的路線在世界規模上的擴大應用。

毛澤東頭腦裏誠然有嚴重的「民族主義」或「種族主義」；但是在這個特定問題上起作用的卻不是這些「主義」，而是毛澤東這條得意的與創新的革命路線。它的可能的對立意見並不是簡單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而是一方面馬克思，列寧在此一問題上的傳統立場，另一方面則為赫魯曉夫們的（部分也是承繼自史大林的）「修正」立場，即「和平競賽」的主張。

因此，要討論和研究毛澤東這條路線，我們也得從兩個方面着眼，首先從傳統的列寧的立場來看問題，其次從赫魯曉夫們的觀點來評是非。

在馬克思主義者諸大師中，列寧是第一個看出殖民地與半殖民地民主民族革命的偉大意義，並且是第一個在實際上將這些革命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中的社會主義革命聯繫起來，作為世界革命的戰略路線而提出的。這個立場的偉大意義及其正確之處，已經有四十年來的革命鬥爭史作了佐證，毋需我們多言。我們要看的是列寧這條路線，究竟與毛澤東的路線是否相符。如果不相符，其差別何在？如果有同有異，則二者的同異為何？

前面我們說過，《建議》上有關國際矛盾的說法，表面與列寧立場並不違反。然則那二者又怎樣在實質上違反了？

主要在於領導作用的認識與確立問題。

列寧指出了「先進的東方，落後的西方」；他指出了東方被壓迫民族的革命對西方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能夠起巨大的促發作用與支援作用。但是在同時，列寧又時時指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對東方被壓迫民族的民主革命要起領導作用，特別要起使之不斷前進，終能勝利的完成作用。可是在毛澤東思想中，卻只有「東方革命」對「西方革命」的促發與支持作用，根本沒有「西方」對「東方」的領導作用，更沒有什麼完成作用。毛澤東所提到的無產階級領導，是只限於一國之內的，他只談到亞、非、拉丁美洲各國的民族民主運動必須在各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領導之下。至於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在毛澤東的心目中，事實上既不能先於落後國家由民族民主任務開始而進向社會主義任務的革命，意義上亦不重於這種革命。後者的發展，只要依靠「自力更生」，便可建設社會主義乃至共產主義至於成功，所以根本不需要前者的援助來完成。

這樣，列寧和毛澤東雖然同樣都指出落後國家民族民主革命與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主義革命這「兩大歷史潮流」，只因二人對兩種革命的關係看法不同，便產生了他們對世界革命戰略路線的差異。在列寧，那是全世界的無產階級領導全世界的農民；可是在毛澤東，卻是全世界的農民首先起義，在世界鄉村成立革命根據地，以此攻取世界城市，解放全世界的無產階級。

這是本質上有所差別的兩條路線。

然則，毛澤東以鄉村包圍城市的路線，應用之於世界革命，是否絕對荒唐？是否完全違反馬、列主義，因而在任何方面都與世界革命的利益不符？

或者，我們又可以這樣提出問題：毛澤東的路線雖然在無產階級領導問題上與列寧路線根本不同，但是，第一，因為他在理論上（或可以說在口頭上）畢竟是承認無產階級領導的，至少他從來不曾主張過農民領導工人；第二，因為歷史證明，無論在中國一國之內，或在世界範圍之內，「鄉村起義」確實比城市革命來得容易與「切實」，因此，是否可以說，毛澤東的這個路線是列寧路線在新的歷史條件中的活的應用或發展？

我以為，毛澤東的這條路線並非「絕對荒唐」；它有其謬誤的一面，亦有其正確與合理的一面。

何以見得？讓我們從較遠的地方解釋起。

第一次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不成功於工業最發達的德國或英國，而成功於遠較落後的俄羅斯，歷史就已經「修正」了馬克思主義在這方面的一些看法。列寧替俄國的此一「修正」作了一個簡單明瞭的解釋，那就是俄羅斯代表了世界資本主義制度的最弱一環。托洛次基同意列寧的解釋，卻更補充以不斷革命論的理由。根據這個看法，因為在比較落後的國家中，那裏的資本主義業已發生與發展，但落後的封建殘餘的（或前資本主義的）關係卻仍舊存在，這時，站在民主（包括民族的）任務上興起的革命鬥爭，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領導之下，可以而且應該不斷發展成社會主義的革命，因而比先進國家的階級兄弟們更早打倒本國的資本主義，建立無產階級的政權。

這樣解釋十月革命與補充馬克思主義，是完全正確的。因為自從十月革命以來的四十餘年中，歷史重複地證明了這個真理，即在資本主義不很發達的國家中，在世界資本主義的薄弱環節上，工人們領導了一切被剝削與被壓迫的階級和階層，比先進國家中的無產階級更早與更易地踏上了革命的道路。當然，這些革命有的失敗了，有的成功了。但成敗不能改變這個事實：最先進的革命往往是在比較落後的國家中首先爆發或成功的。這個事實，在某一個意義上，也就是證明出：世界農村地區卻比世界工業地區，較早與較易發生了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並且獲得了成功。這種情形如果縮小到一國範圍內（當然也只在特定意義上），那恰好就是毛澤東先在鄉村中積聚力量，建立根據地，在部分地區中首先實行革命政綱那種做法。

所以我們如果光從這種角度來觀察問題，我們應該說，毛澤東那條先從落後地區下手革命的路線是正確的——不管在世界範圍內或者在一國範圍內。

那末謬誤又在哪裏呢？

上面說過，在於領導問題。在於沒有先進工業城市或先進工業國家的革命領導，落後區域或落後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是否能夠勝利與完成的問題。

列寧他們認為無產階級革命可以而且應該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最弱環節上首先爆發，也就是認為落後的農業性的國家可以比先進的工業國家更早與更易地實行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這絕對不等於說這種革命在這些國家中，可以單獨地進行至於最後成功。換句話說，他們認為落後國家中爆發的社會主義革命，其最大的作用，亦即主要作

用，在於喚起先進國家中的社會主義革命，因為他們堅決認為，只當先進國家中的社會主義革命成功了，在它們的援助與合作之下，落後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才能達到最後完成。列寧在這裏是始終堅持着馬克思主義的，堅持着世界範圍內無產階級對農民的領導，堅持着城市領導鄉村的原則，堅持着社會主義革命的國際主義與社會主義建設的國際任務。

史大林的「一國社會主義論」恰恰就是對列寧這一個基本思想的背叛。而毛澤東在這一方面，從來是跟隨史大林而離開了列寧的。

毛澤東主張在一國之內與世界範圍內的落後區域首先發動革命，這是對的，可以說是符合列寧主義的；但當他這樣幹的時候，不論在革命期間與革命勝利之後，都不重視先進區域的領導，都把它們看成為獨立的範疇，那就錯了，是違反了列寧精神的，而且在較長的時間內看，是有害於世界革命的。

然則我們憑什麼說毛澤東抱有這樣的錯誤意見呢？遠的不說，且拿6月14日那個綱領性的文件來看吧。在《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的第四點中，作者將「世界政治、經濟的總和，世界的具體情況，即當代世界的基本矛盾，進行具體的階級分析。」分析的結果，它指出了如下四個基本矛盾：（1）社會主義陣營同帝國主義陣營的矛盾；（2）資本主義國家內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3）被壓迫民族同帝國主義的矛盾；（4）帝國主義國家同帝國主義國家，壟斷資本集團同壟斷資本集團之間的矛盾。列舉了這些矛盾之後，文件宣佈說：「這些矛盾及其引起的鬥爭是相互聯繫，相互影響的。人們既不能抹煞這些基本矛盾中的任何一個矛盾，也不能主觀地用其中的一個矛盾代替其他矛盾。」換句話說，文件不承認四者之中有哪一個

是最基本的，起領導作用的。文件的第八點中，作者雖然指出了「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廣大地區，是當代世界各種矛盾集中的地區，是帝國主義統治最薄弱的地區，是目前直接打擊帝國主義的世界革命風暴的主要地區。」但它並不聲明民族解放運動與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是當代最基本的矛盾。所以事實上它完全沒有指出什麼是最基本的矛盾，而只指出了相互聯繫相互影響而不分主從的四個矛盾。如此這般地分析矛盾，一方面固然暴露了毛澤東思想方法的主要特點，暴露了他那個「主要矛盾隨時易位」的機會主義理論；在另一方面，也證明了毛澤東根本不承認世界範圍內階級性鬥爭是最基本矛盾，證明了他把落後地區的民主民族革命看成為獨立範疇，證明了他毫不看重，甚至根本否定先進區域革命對落後區域革命能夠發生與必須發生的領導作用與完成作用。

爆發於落後地區的民族民主鬥爭，雖然能直接打擊帝國主義，能促發先進國家中的革命，但它們若以民族鬥爭為限，則在較為長遠的計算中，並無損於資本帝國主義的總力量；它們縱能由民族民主鬥爭生長為社會主義革命，但若囿於一國範圍之內，一切以民族國家為單位，那末這種革命終於不可能最後成功，終於不可能真正實現社會主義。

因此，否認世界工人階級對於世界農民的領導作用與助成作用，使毛澤東在落後地區先鬧革命這條路線，犯上了致命的錯誤。使它可能產生的有害結果，大大抵消了超過了它所能造成的有利結果。

從列寧標準評量了毛澤東路線，再從赫魯曉夫們的標準來看這個問題。

首先得指出：在一國建設社會主義問題上，赫魯曉夫們不但始終是史大林的忠實信徒，而且在許多方面還比史大林走得更遠。世界革命實際上早已從他們的心目中消失，世界革命的戰略問題對他們就不再存在。因此，關於毛澤東戰略路線的上述錯誤，赫魯曉夫們根本沒有資格批評。我們：站在第三者地位，也無從將他們的立場加以比較。

能夠拿來和赫魯曉夫這方面的立場比較的，乃是我們上面認為毛澤東路線中的正確之處。

依照赫魯曉夫們的意見，要「埋葬世界資本主義」，只要社會主義國家主動地採取措施去緩和國際緊張局勢，不惜以任何代價避免戰爭，埋頭經濟建設，與帝國主義國家從事和平競賽，就可以辦到。他們沒有說不要資本主義國家裏的無產階級革命，也沒有說不許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起來反對帝國主義，只是從他們傾全力於和平共存與和平競賽這條總路線出發，他們當然不會看重國外的革命力量，不會積極幫助這些力量，而且當這些革命運動與他們總路線的實行有所抵觸時，他們還要加以反對和壓制的。

赫魯曉夫們的此一「世界革命路線」，若比之於毛澤東的以世界鄉村包圍世界城市的路線，不用說，是兩相對立的。如果我們不考慮到問題的其他方面，而專就其打擊帝國主義的功效，專就其推動與促發先進國家革命的影響一面來看問題，那麼應該說，毛澤東的路線完全對。赫魯曉夫們的「和平競賽」，實質上已退回到社會民主黨人的立場去了。

* * *

以上我們討論了中蘇共黨思想戰中操在毛澤東手裏的兩件「不變」武器。

除了上述兩者之外，其實還有第三件的，那便是深深埋藏在毛澤東靈魂底層、以中國傳統文化作根底的民族主義與個人英雄主義。

前面我們討論「可變部分」時候，我們談到過這個方面的毛澤東思想。我們說它是可變的，意思是指毛澤東只要對自己有利，一時可以將史大林的沙文主義說成國際主義，一時卻可以將赫魯曉夫繼承自史大林的同樣政策說成沙文主義。同時，他自己總是隨情形而異，忽爾沙文，忽爾「國際」。

不過這個樣子的「可變」，其實只是形式而已。實質上，毛澤東在這方面也始終不變，他是徹頭徹尾地民族主義的，又是十足十足的個人英雄主義的。統觀毛澤東的一生行事，不論其積極方面或消極方面，都很強烈地受着他此一思想因素的影響，為這個因素所決定。譬如，我們在前面說過，他的堅決反帝，他的絕不媚外，他的不肯妄自菲薄，乃至他的以農民造反方式來實行新式革命的內容——這些，在或大或小限度內，都曾得力於他青少年時代所吸收的中國固有文化。同時我們又指出過，正是這個先入為主的儒俠思想的底子，妨礙了毛澤東成為一個民主精神的擁護者，妨礙他成為一個徹頭徹尾的馬列主義者，妨礙他成為一個世界規模的大革命家。中共勝利，毛澤東成了擁有7億人口、三四千年歷史的泱泱大國的頭號統治者，這地位自然不會減少他原有的民族本位思想與英雄帝王思想，卻大大地提高了與鞏固了它們。因為要削弱這種思想，使它們不致在國內外政治中造成有害影響，只有靠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蓬勃開展，尤其要靠先進工人國家的、特別是蘇聯的真正無私的國際主義的物質援助與精神啟發。可是在這方面，一如我們在前章所述，事情不幸恰好相反。史大林既恢復帝俄特權於先，赫魯曉夫復揮舞錢袋與大棒於後，民族主義碰上了沙文主義，其勢自然要似火上添油，一發而不可控制矣。

不過直至今日為止，諸凡多少由於毛澤東的民族自尊或自傲感而促成的中蘇衝突，據我們比較客觀觀察，正確也大多在毛澤東方面。換句話說，今天居於中國革命領導者地位的如果不是毛澤東，而是列寧一般的人物；如果毛澤東不是帶有強烈民族感情的人，而是徹頭徹尾的國際主義者；遇上了史大林和赫魯曉夫那樣的對手，也一定要發生「分歧」的，雖然，發生的方式與原因一定不會相同。反之，如果史大林與赫魯曉夫的蘇聯換成了列寧或托洛次基的蘇聯，那末毛澤東即使還是目前那樣的毛澤東，許多「分歧」便很有可能不發生，縱然發生，其性質與原因一定會完全不同。這就是說，毛澤東今天在民族主義方面跟蘇聯引起了麻煩，主要原因在於蘇聯一邊的沙文主義與強權政治，中共一邊的民族主義罪過倒是被動的，是被迫加強的。

中共要求國與國之間，黨與黨之間的完全平等；它反對「把社會主義國家對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支援，看成是一種負擔，或者看成是一種恩施」；它反對把經濟或技術援助用作使受援者服從指揮的手段；它反對對「兄弟國家」玩弄強權政治，反對挑撥與幫助一個普通的資本主義國家來向它進攻。這些要求和反對，雖然中共的出發點是民族利益或民族傾向，但並不根本違反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說得更確切些，為了在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真正實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上述那些「民族主義」的要求本來就必須滿足的。在民族不平等與民族歧視或民族迫害的基礎上，絕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國際主義。所以中共一邊的民族要求無可厚非，問題只在於它們在另一方面是否代表着大國沙文主義，是否以它「己所不欲」的東西，「施之於人」。在許多綱領性的文件中，中共的領導人曾經一再自己警惕，並且告誡黨員，切不可犯大國沙文主義的罪惡，決不能讓歷史上根深蒂固的大漢族主義借屍還魂。這種警惕和告誡自然是好的，那種願望是善良的；但是

一切歷史唯物論者全都懂得，決定問題的常常不是人的意志，而是客觀的社會的壓力。以今天中國的條件論，即在有大量主觀因素加入到經濟建設中去的條件之下，如何繼續革命，如何建設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那種方針，對於上述善良意圖的能否兌現，具有決定性的作用，至少具有非常之大的作用。如果這個建設方針是以世界革命為目標的，是以不斷革命精神推廣及加深社會主義革命的，那末時間愈久，客觀的社會力量愈不利於民族主義的存在與滋長，愈不會有大國沙文主義的發生。反之，如果毛澤東中國追步史大林蘇聯的後塵，堅持一國社會主義的建設路線，又因為反對大國沙文主義與反對上級黨指揮棒之故，在這條路線上變本加厲，愈走愈遠，那末即使毛澤東以及中共其他的領袖們，對於大漢族主義或大國主義如何警惕，如何防止，而結果這些主義一定還要發生；它們一定要對中國革命，乃至對世界革命，起一種非常有害的作用。

不過這是後話，至少是明天的禍害。今天，當中共以受屈者與受害者資格對壓迫者及加害者抗爭之時，人們應該同情這種抗爭，甚至支持這種抗爭，因為它這一邊的民族主義在相形之下，起着多少積極作用。南斯拉夫的鐵托當年起來反對史大林，可說主要與唯一地是從民族利益出發的，他要求黨國與黨國之間的平等，他反對以經濟援助之名而行經濟剝削之實，他以南斯拉夫民族社會主義的名義反對史大林的一國社會——沙文主義，那時候，全世界的社會主義者與革命無產階級都同情與支持了鐵托。理由當然不是為了南斯拉夫方面的民族主義，而是為了它打擊了蘇聯方面的沙文主義。後來，鐵托們也正是從那民族的狹隘利益出發，在內政外交上，特別在國際政治方面，愈來愈趨於保守妥協了；但這種消極作用，並不能據以否定當年反克里姆林宮鬥爭的積極作用。

今天毛澤東的反對莫斯科，比起鐵托當年的行為來，還有個很大不同，值得我們注意。鐵托與史大林決裂之後，為了南斯拉夫革命成果及其一黨的自保，從不曾向國際工人階級投訴過，從不曾想從世界革命中尋找過出路。鐵托們所採取的是極其現實的辦法：「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一經與蘇聯弄翻，便拼命向美英靠攏。但當毛澤東發現了與赫魯曉夫的分歧業已無可妥協之時，便立即響起了「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戰號，立即讓「國際歌」代替了「祖國頌」，立即採取了一系列左傾的政策。這些，人們自然可以說是「策略性的」，或者「虛偽的」，是簡單的姿態。但不管怎樣，鐵托卻總是連同樣策略性的與簡單虛偽的姿態都不曾採取過，而且還從來堅決反對這種姿態，認為它們有害於南國和西方國家的「積極共處」。所以這個不同不能等閒放過。從同樣為民族利益的鬥爭中，可能引出頗為不同的前途。目前中共方面所以會有這個不同，我想，首先當然因為它和美帝國主義的關係，為了台灣問題，正處於無法緩和的境地中；又因為它和蘇共衝突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為了要求強硬對付美帝國主義，所以它不可能將失之於蘇聯者，便立即轉而求之於美國。在這個情形中，我們可以說毛澤東是被迫向世界革命找出路的。他目前的號召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乃至號召世界革命，並非由於一貫的原則使然，而是實逼處此，隨時可以改變和放棄的。只要時改勢易，只要有有可能與美帝國主義謀得妥協了，那末「一國社會主義」重新提到宣傳的首要地位，一點不會出奇。不過人們仍不能因為這個可能而輕視毛澤東的「世界革命姿態」，因為中共之敢於擺出這個姿態，而南共卻連起碼的姿態都不敢擺，歸根結蒂，總由於中國革命比之於南斯拉夫革命，源更長，底更深，力度遠較強大這個事實。而正是這個事實，倘在革命發展的有利條件下，有可能使毛澤東們的半真半假姿態，變成為全心全意的路

線——當然，到了那個時候，這路線是否仍然由毛澤東等執行，那是大有疑問了。

一旦世界革命的路線真實實行起來。為什麼多半不可能由毛澤東來執行？甚至一定不可能由他來執行呢？原因不一，而其最主要者厥為毛澤東的氣質、思想與學識，畢竟是民族的而非國際的，與世界革命的領導不相稱。

落後的中國是否有資格領導世界革命？或至少參加領導一般的世界事務與特殊的世界革命？當然有資格。根據經濟落後，或甚至根據人種優劣而否定這個資格，否定有取得這種資格的可能，那是錯誤或反動的。是錯誤，因為它從機械的經濟決定論出發；是反動，因為它以白種人的優越論為根據。人們曾經否定過落後的俄羅斯在社會主義的世界革命中能夠佔據領導地位，這個否定，已經被歷史所否定了。可是對於中國，人們卻仍舊堅持這個老否定，而且用了加倍的理由，除了經濟落後之外，又加上了人種的「次劣」，來堅持的^[3]。對於這種錯誤的與反動的理由，毛澤東與所有的中國革命者起來憤怒地加以否定，從理論和事實兩方面來加以否定，原是十分應該的。「先進的東方，落後的西方」，在今天事實上已不再是預言，而是由半世紀的革命歷史充分證明了。中國革命繼俄國革命之後，無疑是世界革命中一大事件。它即使不在主觀的思想方面起了嚮導作用，至少在客觀的政治方面發生了鼓舞、影響與示範作用。而此種客觀的政治作用遲早要反映在主觀的思想因素上，遲早要使中國革命的領導者對世界革命要求取得領導權，至少要分享領導權，那是很自然的事。這，我們在前一章的開始部分已經講過了。

毛澤東要爭取對世界革命的發言權乃勢所必然，也是理所當然。問題只在於勝任與否。

馬克思是一個共產主義者，同時是一個名符其實的世界公民。列寧首先是一個共產主義者，其次是一個俄國人。史大林首先是一個俄國人（「格魯吉亞人的政治家時常比正種大俄羅斯的政治家更加傾向於大俄羅斯主義」），然後才是共產主義者。毛澤東若和上述三人相比，顯然與史大林相似，他首先是一個中國人，其次才是共產主義者。這裏的所謂首、次、先、後，時間上的意義小些，思想品質中兩類成分的偏重意義遠較大些。「首先」是共產主義者的人，必然是徹底的國際主義者，因此，他具備了領導世界革命的起碼條件。「其次」與「然後」才算是共產主義者的人，他們的國際主義總難免屬於「第二輪」的，因此，他們之能否大公無私地領導世界革命，並非毫無疑問。史大林將列寧的第三國際變成為克里姆林宮外交政策的輔助工具，他以領導世界革命為名而實行摧殘世界革命之實，在許多原因中，史大林那種「俄人第一，共產主義者其次」的身份，不失為其中之一。妨礙着毛澤東去擔當世界革命大領袖這個角色的，原因之一亦應該是他那「首先是中國革命者。其次才是共產主義者」這種氣質和學養。

另外一種障礙，使毛澤東難於成為真正世界革命的領袖，而且還大大妨礙他去贏取此次中蘇共爭論的勝利的，乃是他對「個人崇拜」的偏愛。

關於「個人崇拜」問題，我們已經在《毛澤東思想論稿》第二章裏詳盡地討論過了（雖然當寫作那一章時，中蘇共關於這個問題的爭論還不曾公開出來），這裏毋須重複，也沒有新的論點需要添加。在此地，我們必須談一談的，只是中共在此一問題上所採取的立場，表示出毛澤東對於蘇聯的內部情形是多麼的隔膜。

來到了北京的毛澤東，要想研究與了解蘇聯，比他在延安時代是方便得多的。當一九三零年代毛氏補修馬克思主義之時，關於馬、恩、列等人著作的中文翻譯，無論在品質或數量方面，都非常可憐。就是史大林的作品，也譯得不多，這從毛澤東那時的文章的引證中，很明顯地可以看得出來。那時，中蘇的聯絡是相當困難的，正式的接觸沒有，暗中的往還也不經常。在那樣的環境中，毛澤東想系統地研究馬克思主義的一切重要著作，要徹底地了解蘇聯的過去與現狀，確實非常困難。可是在今天，當一切文獻方面以及人事方面的障礙都不再存在之時，毛澤東好像已更多地閱讀了列寧的作品，而且還親自去過兩次蘇聯，但他對蘇聯的認識，不論對它的過去或現在，從最近的爭論文章中看，特別從中共對史大林的態度看，都表示出他並不比延安時代知道得更好或懂得更多。這是十分叫人驚奇的。

1941年，在延安幹部會議上做報告（《改造我們的學習》），毛澤東說過這樣的話：「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應以《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為中心的材料。《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是一百年來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最高的綜合和總結，是理論和實際結合的典型，在全世界還只有這一個完全的典型。」這幾句話非常重要，因為它不但充分表示出毛澤東研究馬列主義所達到的程度，而且十分浮突地顯現了毛澤東這個人的思想性格，同時又證明了他和史大林之間的精神聯繫。

首先我們得知道被毛澤東稱讚為「一百年來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最高的綜合和總結……」的那本蘇聯共產黨史，究竟是怎樣一部書？讓我們聽一聽有資格批評的人的意見吧。譬如托洛次基寫道：

……極權制度，即一切生活部門都須受官僚指揮的制度，——不可避免地也要擴張其統治權於過去時代。歷史變成原料，隨

統治的極權黨派之需要而構造一切。十月革命和布爾雪維克黨的歷史也陷此命運中了。最近的而且最完備的偽造和誣蔑，乃是不久之前在史大林親自指導下出版的《蘇聯共產黨史》。全人類圖書館中，我不知道——別人恐怕也不知道吧？——是否有過一本書，其中事實、文件、尤其是人所共知的事實，被人如此無恥地竄改過的、割裂過的或簡單從事變進程中塗抹去的，有如這本《蘇聯共產黨史》一樣，這樣做只為了榮耀一個人，即史大林。

……

偽造的東西，即使是強有力的國家機關來偽造的，也是經不起時間考驗，總有一日為了內在矛盾原故而被人揭穿的。……（見《俄國革命史》中文版自序）

可見毛澤東向共產黨幹部推薦的第一部必讀書，原來是一種最無恥、最徹底與最粗糙的偽造品。

不過人們也許會說，托洛次基既是史大林的頭號敵人，他的證言是不足信的。

那末請看另一位，近年來已被普遍地認為客觀而有科學良心的傳記家——德伊徹（I. Deutscher）的證詞吧。在他所著的有名的《史大林傳》中，關於這部《蘇聯共產黨史》，有如下的敘述：

現在他又從事於另一件事業了^[4]，那就是編寫《蘇聯共產黨簡史》，其目的是要在這一方面首次弄出一個正確無誤的與理論上可靠的作品來。在這本書中，黨的全部歷史，都根據了莫斯科那幾次大審判案的觀點重新寫過。過去所有的黨史教本，甚至那些由史大林最親近的信徒有如耶洛斯拉夫斯基^[5]所編寫的，也被宣佈為不可靠的偽經，停止了流通，因為這些書所記述的黨史，都

被認為與最新的「發現」不符。這部新歷史一經出版，立即被宣佈為黨的聖經。這本書是在史大林親自指導之下，由他的秘書們編寫的。其中只有關於哲學的一部分——這是對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學說所做的一種粗疏的摘錄——出於史大林手筆。這位莫斯科審判案的發動者始終隱身幕後，不為人見，他卻以哲學家，歷史家與憲法制訂者的角色出現在公眾之前。（見英文本《史大林傳》，381-382頁。）【朱正按 1957年1月，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裏這樣批評了這本書中史大林親自執筆的哲學部分：「史大林有許多形而上學，並且教會許多人搞形而上學。他在《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中講，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有四個基本特徵。他第一條講事物的聯繫，好像無緣無故什麼東西都是聯繫的。究竟是什麼東西聯繫呢？就是對立的兩個側面的聯繫。各種事物都有對立的兩個側面。他第四條講事物的內在矛盾，又只講對立面的鬥爭，不講對立面的統一。按照對立統一這個辯證法的根本規律，對立面是鬥爭的，又是統一的，是互相排斥的，又是互相聯繫的，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的。」】

你們看，一本人類史上空前的偽製，僅僅為了榮耀一個人，全部根據了莫斯科大冤獄觀點重新製造的，非常粗糙，矛盾百出的所謂「蘇聯共產黨史」，竟被毛澤東宣佈為一百年來共產主義運動在文獻上所取得的最高成就，這怎麼能不令人萬分驚異呢？不過仔細想想，也完全可以解釋。從這件「小事」，我們至少可以看出兩點：第一、毛澤東對百年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知識實在太少，對五十年來俄國馬克思主義運動的歷史知識也非常貧乏。因為知道得少，所以能將最粗劣的偽鈔當作如假包換的真貨。第二、毛澤東由於其本人的性格、氣質和思想使然，確實欣賞史大林的所作所為，以致明知其中的多數史實是簡單偽造，他卻為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利益」，「為了權威建立的需

要」，「為了它能替社會主義事業服務」，因而接受了這種做法，接受了這部偽史，並將它高捧為最重要、最權威的經典著作。

在這個方面，毛澤東的情形是始則因無知而受了蒙蔽，繼則因同聲、同氣、同地位、同利益而自願受欺，並藉此以欺蒙他人。

說「在國際工人階級和革命人民範圍之內，多數人……不贊成全盤否定史大林，而且愈來愈懷念史大林。就是在蘇聯，也是如此。」（見〈關於史大林問題〉）這說法表示出毛澤東對國際工人階級與蘇聯人民的情緒，是多麼地無知與武斷。「國際工人階級和革命人民」是否「愈來愈懷念史大林」問題比較微妙複雜，我們且不談它；至於說蘇聯人民也在「愈來愈懷念史大林」，那顯然是違反事實的。開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發揚於戰爭結束之際，爆發於史大林逝世以後的蘇聯人民要求民主、自由與法治的呼聲，是如此地嘹亮與普遍，以致史大林生前的親信中，簡單為要贏取繼承人的地位，都不得不或多或少反對史大林的道路。這是人盡皆知的事。赫魯曉夫一系之所以能擊敗馬林可夫與莫洛托夫的「反黨集團」，原因中的最大一個在於前者比後者更放手地反對史大林，在於他們不但反對史大林的舉措；而且反對史大林本人——這更是無可爭論的史實。其實僅憑這一個事實，已足以推翻「蘇聯人愈來愈懷念史大林」的說法了。

是否最近幾年來，因為赫魯曉夫集團在國際上實行的妥協路線，使蘇聯人懷念起史大林「正確的馬列主義政策」呢？我們見不到事實的佐證。同時以情理推測，在史大林逝世以還的短短十年中，如果說每一個家庭都幾乎有若干親友嘗過被史大林拘捕、流放或殺害滋味的蘇聯人，竟已懷念起這個大獨裁者來了，那未免把他們看得太健忘，

太天真。毛澤東硬要替史大林「鳴冤翻案」，主要固然由於中國革命現階段的客觀需要。但這裏仍多少反映出毛澤東對蘇聯情況的隔膜。如果他更通曉俄國工人運動與社會主義運動中派別分合及其論爭的歷史；如果他更清楚十月革命與內戰的史實及其在布爾雪維克領導層中的思想反映；如果他更了解列寧臥病及其死後發生於聯共中的派別鬥爭，並且更深刻地了解這些鬥爭的性質，如果他更熟悉史大林如何排斥異己，如何殺戮與譏謗異己的實情；如果他更多知道史大林如何利用國際去破壞別國革命，以及摧殘各國優秀革命家的情形；再如果他肯虛心調查研究史大林所有這些罪行在國內外勞苦大眾與革命者隊伍中，如何損壞了蘇聯與共產主義的聲譽——那末毛澤東即使對史大林的鐵腕無限欣賞，也決不會冒天下之大不韙，挺身出來為史大林這個奇臭的屍骸，作徒然的「塗脂抹粉」工夫了。因為這只能敗壞他自己的聲譽。只能使他原較正確的論爭立場，反而得不到多數的擁護。

一個真正配做世界革命大領袖的人物，對於蘇聯以及全世界革命群眾的動向，決不能如此無知。當然，毛澤東在這一方面的「先天不足」，在相當限度內，原本可以憑他的一些助手來補償的。只因問題已經不單單限於知的方面，而是涉及到了願不願意知，或涉及到可不可以接受這種知的地步，因此，毛澤東縱然有這方面的最好的合作者或顧問，卻極少可能受一點影響了。但是中蘇理論鬥爭的誰勝誰負，中國共產黨人是否終於能在將來的一個時期擔負起世界革命主要領導者的角色，卻在不小程度內，取決於他們之是否有這種「知」呢？

注釋

1. 這個文件的著作者沒有說明是誰，但這不妨礙我們斷定它縱使不是毛澤東親自起草，也總是完全代表了他的意見的。
2. 我們這篇文章寫於1964年夏天。在我們寫了這幾句話之後一年餘，我們看到了林彪發表在《紅旗》上的那篇有名論文：〈人民戰爭萬歲〉。在這裏，毛澤東才首次借了這位業已內定為新繼承人的「親密戰友」之口，發表了而且有系統地發揮了這層意思。他說：「必須着重指出，毛澤東同志關於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的理論，對於今天世界上一切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的革命鬥爭，特別對於亞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革命鬥爭，更是突出地具有普遍的現實意義。」他又說：「從全世界範圍看問題，如果說北美、西歐是『世界的城市』，那麼，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就是『世界的農村』。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北美、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由於種種原因被暫時拖延下去，而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運動卻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今天的世界革命，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一種農村包圍城市的形勢。」（見1965年第10期《紅旗》）——1966年11月加注
3. 這裏，我覺得提一下邱吉爾所講的一個小故事是適當的。在開羅會議上，英美蘇三國曾經談到了戰後「四名警察」的問題。當時羅斯福為了美帝國主義的利益，竭力高捧中國，主張將它列為戰後四強之一。史大林提出反對，所舉理由是：「他不相信戰爭結束之時，中國會變成強國，退一步講，即使它成了強國，歐洲國家也一定會憎恨中國人來做他們的執法官的。」史大林代表歐洲國家出來反對的雖然是蔣介石中國，但若國民黨中國換了共產黨中國，史大林的論據不但英美會擁護，就是「同一陣營」的蘇聯領導人也仍會擁護的吧。
4. 這裏所說的「現在」乃指從1936年末開始直至1938年初的那段時間。《蘇聯共產黨簡史》是在這個時期內編造成功，在1938年正式由黨的中央委員會審定的。此地說編黨史為「另一事業」，至於此一之外的又一事業，乃指1936年11月史大林在蘇維埃第八次大會上的公佈新憲法。
5. 耶洛斯拉夫斯基（E. Yaroslavsky），老布爾雪維克，史大林最親近的朋友之一。當史大林與其他的布爾雪維克領袖們鬥爭之時，耶氏被任為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大大幫了史大林的忙。所著《蘇聯共產黨史》，主要目的就是貶低托洛茨基在革命中的作用，拼命抬高史大林。此書當時被採用為有關黨史的正式教科書。

四、兩個根本原因

以毛澤東為中心，以他的思想甚至性格為着眼點，我們已經研究了中蘇共「分歧」的種種方面。最後我們要相當離開這個中心，要從遠較深刻的社會方面着眼，要從遠較悠久的歷史方面着眼，研究這個「分歧」的兩個根本原因。把問題始終局限於「傳記主人」身上，是無法徹底弄清楚問題，也無法徹底了解這個「主人」的。

什麼是中蘇衝突的兩個根本原因呢？從我們上面的敘述和分析中已不難看出，那是下面這兩個：第一，中蘇兩國之間民族利益上的乃至民族主義上的矛盾；第二，中蘇兩黨各自代表的革命發展階段的不同。

讓我們先談民族利益的矛盾問題。

依照一般人的想法，彷彿革命一進入社會主義階段，國家一旦由共產主義者當權，民族問題便不成其為問題，民族利益便不可能成為對外改善關係的障礙，特別在同樣性質的國家之間，似乎再不可能發生民族主義的矛盾，決不應該發生民族利益衝突了。其實不然。

民族問題這個十分頑固的症候，其困擾人類之甚，其根本解決之難，非但遠遠超出於一般人的想像，甚至還大大違反了社會主義大師

們的預見，因而使他們所下的診斷與所擬的療法，在頗大限度內失去了功效。

列寧說過，歷史比任何狡猾的人更為狡猾。這句話如果對所有的政治問題說是對的，那末證驗在民族問題上也許顯得更為正確。

馬克思恩格斯關於無產階級革命中的民族問題，最早與最原則性的立場，發表於《共產黨宣言》中。它是以如下方式說明了的：

工人無祖國。決不能從他們那裏剝奪他們所沒有的東西。既然無產階級首先應當奪得政治統治，提升為本民族的主導階級，確立成為民族，所以它暫時還是民族的，雖然完全不像資產階級對於此語所了解的那樣。

各國人民間的民族隔絕性和對立性已隨着資產階級的發展，隨着貿易自由和世界市場的確立，隨着工業生產以及與其相適應的生活條件的一致化，而愈益消逝下去。

無產階級的統治將使這種消逝過程更形加速。共同的努力，至少是文明各國工人共同的努力，乃是無產階級獲得解放的一個首要條件。

人對人的剝削被消滅下去，民族對民族的剝削也會同樣被消滅下去。

民族內部的階級對抗一消失，民族間的敵視關係也就會跟着消失。

馬克思與恩格斯在這裏所表明的基本態度是：人對人的剝削，各民族內部的階級對抗，是起決定作用的；民族對民族的剝削，民族之間的敵視關係，卻是被決定的。前者主動，後者被動；前者是根本，

後者是枝幹。因此他們認為，只要前者能夠消滅，後者便跟着被消滅，只要前者能解決，後者便會自動得到解決。同時，他們又認為，隨着資本主義勢力的向深廣兩面的不斷發展，階級間的對抗是愈來愈明顯與激烈，而民族間的隔離性和對立性，卻「愈益消逝下去了」。

這些論斷，若證之以一百多年來的歷史，顯然不是完全合乎事實的。資本主義關係的征服全世界，固然在一方面如馬克思所說，使階級對抗日趨劇烈，而在另一方面卻與他的預斷相反，不曾將民族對抗消滅，不但不曾消滅，它們反而更加緊張了。

歷史證明，資本主義的世界性的發展，其影響之及於民族隔離者，曾經是極為矛盾的，比《共產黨宣言》作者所預見者遠為複雜。一方面，資本主義的世界市場的形成，確實消滅着「各國人民之間的民族隔絕性和對立性」；可是在另一方面，被外來的資本主義生產方法與資本主義關係所促成的各個晚起的資本主義國家，卻為了要保證自己新生幼稚工業的存在與發展，卻竭盡一切力量來創造和防衛一個民族的市場，其結果是人為地造成了或加強了民族的隔離和對立。當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時代，各個帝國主義國家為了分割和再分割全世界的市場，為了準備戰爭，更是瘋狂地培養本民族的沙文主義。

當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共產黨宣言》時，顯然只看重了資本主義消滅民族隔離這一個方面，卻不曾注意它促成和鞏固民族對立的另一個方面。因此《宣言》作者們不曾把民族問題當成了問題，因為在他們看來，這是根本不成為問題的。

為什麼會有這樣看法呢？主要自是時代使然。我們知道，《共產黨宣言》草成於1848年歐洲革命大浪潮的前夜。那時候，就西歐幾個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說，歷史確已進入了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其中

有的國家雖然還有民主民族任務尚待解決，但是這些任務，放在整個歐洲的勞資兩大勢力直接鬥爭的背景上，總彷彿顯得是已過了時令的花朵，或竟像是明日黃花了。至於在全世界範圍內，雖然有更多地區還處在「古典的」民主民族革命的「史前時期」，但因問題未曾以其應有的規模與充分的明晰性呈現出來，以致這些地區的民主民族鬥爭究竟能起與將起怎樣的作用；它們對社會主義革命究竟能發生怎樣的影響；它們與先進工業國家中的無產階級革命究竟有與應有怎樣的關係；——這些問題，即使是大天才都無法解答的。同時，在當時西歐的社會主義者中，有一種比較流行的，但是不甚明確的見解，那就是：歐洲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將自動地解決全世界的民族問題。馬克思自是高出於這些流行見解之上，他曾經儘可能地密切注意了亞非等地民主民族革命的興起；但關於我們上面提及的一些問題，他還是不曾來得及解決的。

歷史發展的線索千頭萬緒，其發展過程中的「分子運動」更是變幻莫測。因此，無論哪一位偉大天才的預見，都或多或少要為這位古往今來最狡黠的「老太太」所嘲弄。馬克思關於人類歷史發展的看法，關於階級鬥爭的理論，雖然捉摸到了這位「老太太」的基本脾氣，但決不能預言她老人家的全部行徑。馬克思本人也從不對己對人，提出過這樣的要求。馬克思主義，和其他一切真正偉大的思想體系一樣，重要的是它的方法及其基本論點，決不是它為某事某物所做出的個別結論。

關於資本主義發展與民族國家之間的關係，《共產黨宣言》所作的結論，一部分確被事實推翻了。首先是它關於資本主義繼續發展可能性所作的斷語成了問題，跟着，它對於民族國家的命運及其作用的想法，也就不得不重新估價。

1848年歐洲工人階級革命失敗之後，資本主義不僅沒有像《宣言》所指出的那樣，「已經不能再促進資產階級的所有制關係的發展」，而且相反，它在那時以後，又有了數十年的大發展。它不但在既有資本主義的地區作深度地增長，而且向未有資本主義關係的地區作橫面的推廣。在這個過程中，民族國家也隨着起了未曾預見的作用。

關於資本主義發展問題，馬克思自己就作了「修正」的。在1872年他和恩格斯共同署名的德文版《宣言》序文上，他寫道：「出於最近二十五年來大工業已有大規模的發展以及工人階級的政黨組織已跟着增長起來，……所以這個綱領現在有某些地方已經陳舊了。」

不過在民族國家方面，對於《宣言》舊立場的「修正」和補充，馬克思卻基本上來不及作，而是由恩格斯一人完成的。在1892年給波蘭文版《宣言》所寫的序文上，他寫過如下的兩段話：

……強盛獨立的波蘭的恢復，卻又不只是與波蘭人利益攸關，並且是與我們大家利益攸關的事情。歐洲各民族間誠懇的國際合作，只有在每個民族都成為自己家裏全權主人的條件下才能實現。

……然而這種獨立卻是為確立歐洲各民族協和合作所必需的。這種獨立只有年輕的波蘭無產階級才能爭得，而一當波蘭無產階級把它爭到手的時候，那它就會完全有保障了。因為歐洲所有其餘各國工人都是如波蘭工人本身一樣需要波蘭獨立的。

次年，即在1893年，當恩格斯給《共產黨宣言》的意大利文版寫序文時，他把民族鬥爭和無產階級革命鬥爭之間的關係，說得更清楚了。他說：

若不使每個民族都恢復其獨立和統一，那末無論無產階級的國際聯合，亦無論各民族為達到共同目的而必須實行的和睦與自覺的合作，都是無法辦到的。

這些話，都是《共產黨宣言》作者在新的歷史條件之下，對民族問題的舊立場所作的補充。恩格斯這裏是以十分明確和肯定的話語，說出了共產主義者對於民族獨立鬥爭的重視和支持。

不過，堅持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原則，根據了新時代所提出的條件，更深、更廣、更徹底地解決了馬克思當年未曾解決、甚至未曾見及的一些新問題，以此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特別發展了它有關民族問題的立場，——這工作主要還是由列寧完成的。

列寧所處的時代和馬克思所處的時代，倘就特殊的民族問題的角度看，有一個根本不同點。這個根本不同點曾經由托洛次基以極精簡的話來說明了的。他說：

在十九世紀，戰爭和革命的根本任務都還在於如何替生產力保證一個民族市場；至於我們這個世紀的任務，則在於如何替生產力解除民族的疆界，因為現在民族的疆界已變成生產力的鐵的桎梏了。（見《俄國革命史》第三卷第二章）

這個不同，主要就是自由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之間的不同。帝國主義將世界經濟，整個說來，帶到了在私有財產基礎上所能達到的最高發展階段，這使世界經濟生產力的增長和民族國界之間的矛盾加劇到最大的緊張程度。

第一次世界大戰實質上乃是這個無法解決的矛盾的大爆發，也是這個矛盾的大暴露。所以在那時以後，別說像列寧那樣的天才，就是

於世界經濟政治略有認識的普通人，也看得出世界經濟已經將世界聯成一體，其不可違抗的趨勢必然要造成世界一體的政治了。

問題只在於：由誰來造成它？由哪一個階級來造成它？由帝國主義者，由某一個或某幾個最強大的資產階級統治者，通過無窮無盡的戰爭，終於在廢墟上造成世界一體呢，還是由無產階級，由各國無產階級推翻本國統治者着手，由民族內部的革命發展到國際間的革命，以此締結各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聯邦，再由此進入真正的大同世界。

列寧是後一道路的最堅決與最徹底的倡導者與實行者。因此他絕不妥協地與形式式的社會沙文主義者決裂，因此他最堅決地反對在帝國主義戰爭中「保衛祖國」，他主張在戰爭中對「各自民族的統治者」倒戈相向，以此進行革命，爭取革命勝利。等到革命勝利之後，他又最堅決地反對「一個國家的社會主義」，要把業已奪得革命政權的國家不成為一個自足的單位，而把它僅僅看作走向世界社會主義聯盟的一個起點。總之，列寧心目中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策略和戰略，無論在十月革命之前或之後，都是以打破民族國界這個「鐵的桎梏」為其主要目標的。

這，在基本的原則上當然承繼自馬克思，即承繼了馬克思最徹底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但若從鬥爭實踐的觀點看，從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與形式式的民族國家主義作鬥爭的觀點看，從進行此一鬥爭而確定下來的策略和方針看，我們卻不能不指出列寧是大大超過了馬克思在這方面的舊立場和舊方針的。因為在馬克思，生產力之衝破民族疆界，多少是一個歷史的「自然過程」，他沒有見到那個人為的、必須由革命來突破的鐵的桎梏；對於無產階級的趨向國際主義，也多少被看成為理當之事，他不曾充分估計到即使在工人階級乃至社會主義者

中，也會發生頑固強大的民族主義。因此，如何為打破民族疆界而鬥爭，如何為反對各種民族主義與沙文主義而鬥爭，也就不會在策略上詳盡地去考慮它們了。

列寧正是在這個方面補充了，甚至修正了馬克思。

不過列寧在民族問題上的貢獻還遠不止此。他的堅決反對民族國家主義，他的堅決反對社會沙文主義，不過是問題的一半。另外一半，意義上同樣重要的，在於他看出了某些國家，即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國家的「民族主義」的進步性，看出了它們的民族解放運動的進步性，並對它們作了堅決而有力的支持。

歷史踏進了二十世紀，整個說來，民族國家誠然已成為人類前進的主要障礙。因此，打破民族國界已成為國際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目標之一。但是，整體中有局部，主流外有旁支。民族國家對於工業發達的帝國主義國家來說雖然成了「鐵的桎梏」，成了戰爭與其他禍害之源，可是對於落後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來說，民族國家卻正如它在十九世紀時候對於歐洲的某些國家的作用一樣，能夠促進並確保其生產力的發展，因而是進步的。不過列寧支持這些國家的民族運動，卻並不為了（至少並不單單為了）這個進步性；在更大程度內，那是為了這些民族運動能夠給予帝國主義國家以致命的打擊，為了它能夠成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為了它能夠幫助完成世界革命，亦即為了它能夠和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配合到一起，去共同完成世界革命。

這樣，我們看到了列寧辯證的、全面的、深刻而靈活的關於民族問題的政策和態度。他一方面十分堅決地去打破「民族國界」；另一方面他卻以同樣的堅決去支持為「確保民族市場」而作的鬥爭。一方面，

他以萬分鄙夷的神情斥責了那些「文明國家」的保衛主義；另一方面，他卻以無限誠懇的態度鼓勵了「野蠻國家」的「民族主義」。這種表面上矛盾的態度，卻是為了一個統一的目的，即為了要打倒資本帝國主義的統治，為了要實現全世界的無產階級革命。

列寧這個又矛盾又統一的態度，最初表現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即共產黨前身）的黨綱上。由於列寧的堅持，黨綱上主張沙俄境內一切民族享有民族自決權的條文得以保存下來。這規定承認即使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之後，少數民族都享有這個權利。只要真是某一民族最大多數人的意思，他們甚至可以從革命的國家中分離出去，無產階級的國家機構不應該用暴力將它強留在一國之內。可是另一方面，黨綱卻嚴格規定：凡是一國之內的工人階級，不分民族或種族區別，都必須組織在一個統一的無產階級革命黨之內，絕不允許組織以民族為單位的多個工人黨。（甚至不容許組織任何分裂成為民族的一般工人組織。）

列寧的這個立場曾經引起了不少來自左邊或來自右邊的批評。甚至那位傑出的女革命家羅莎·盧森堡，都曾經說「民族自決權」是列寧的一個「癖好」，說這個權利其實「不是別的，只是一句空洞的小資產階級的廢話與欺人之談。」

可是歷史證明：列寧的這個立場，把無產階級革命的國際主義，與實際存在的民族問題結合了起來，使兩者處於最最適宜的地位，是完全與唯一正確的立場。它曾經幫助了一個最堅強的無產階級革命黨的組成，它又曾助成了人類歷史上一次空前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

所以托洛次基說得好：「無論蘇聯的命運如何，列寧的民族政策總是永遠登入人類寶物庫的目錄中了！」（見《俄國革命史》卷三第二章）

列寧政策中的這顆珠寶，等到十月革命一經勝利，立即開始從一國範圍擴大應用到國際範圍中去。首先，他把黨綱上的民族政策兌現。幾乎在勝利的翌日（11月15日），列寧便以人民委員會主席名義，聯同當時擔任民族人民委員長的史大林，發表了《俄國各民族的權利宣言》。它確保俄國境內各民族的平等與主權；重申了「俄羅斯各民族享有自由自決的權利，甚至享有與俄國分離而自組獨立國家的權利。」（《宣言》第二點）在《宣言》的序文中，列寧還特別指出了新政府要推行「俄國各民族間自願的與誠實的聯盟」政策。這個政策不但規定於文字，而且立即見之於行動。自從1919年正式成立了巴什基爾共和國起，一直到1922年3月成立橫貫高加索的社會主義聯邦止，在短短三四年內，列寧政策或者體現為同意原有小民族的分立（如芬蘭），或者體現為扶助國內諸弱小民族建立自己的共和國或自治區，一共有13宗之多。同時列寧又把「各民族間自願的與誠實的聯盟」這個原則，從俄國內部擴展到了俄國外部：他使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與那短期存在過的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芬蘭蘇維埃共和國以及拉脫維亞共和國之間，都實現了「聯邦式」的關係。這些關係，依列寧自己的話來說，「都已在實踐上顯示了自己的適當性」。（見列寧為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起草的《民族與殖民地提綱初稿》）

這是列寧民族政策中有關民族自決權這一方面的進一步的發揮。第一是讓各民族自決，其次是將各個自決了的民族組成爲「自願的與誠實的聯盟」，再然後，以「聯邦制為過渡形式」，「走向各民族勞動者的完全統一」。

列寧民族政策的另一個方面，即關於共產黨與各種革命群眾組織之絕不依民族為基礎這個原則，此時也跟着擴大了。它從俄國的一國範圍擴大到了全世界的範圍。他發起和成立了共產國際。

共產國際的任務當然在實行世界革命，在於推翻世界資本主義的統治。不過就特殊的民族問題說，這個組織在列寧的整個思想體系中，恰恰和俄國布爾雪維克黨一樣，其觀念與原則也都是在補民族自決權的不足，而與之相輔相成的。為要克服民族分立和對立這個歷史事實，為要使民族情感逐漸消逝於國際主義的團結中，必須把全世界勞動者的先鋒隊立即組成為一個國際。組成為一個全新的、真正能實現世界無產階級國際團結的新國際——共產國際。這個革命組織是徹底國際主義的，它不許帶有任何民族主義與沙文主義的色彩，也不理什麼民族之間的差異。它雖然由各國共產黨合組而成，但決非各個民族黨的聯盟。在這裏，「聯邦制」完全不合適，也根本不能容許。各國黨是共產國際的支部，共產國際則是世界革命的領導機關。各國黨對國際的關係，正好像各個民族黨內部各支部對中央的關係。

有了這樣的一個世界性的布爾雪維克黨，列寧認為，作為過渡形式存在於各個蘇維埃國家之間的「聯邦」，便可以「走向各民族勞動者的完全統一」。因為有了共產國際，便可以「進一步地發展、研究以及用經驗來檢查在蘇維埃制度和蘇維埃運動基礎上所發生着的這些新的聯邦。」（見《提綱初稿》）

以上是列寧國際主義的民族政策的兩個矛盾因素的統一。這也是他在十月革命以後，在理論與實踐兩方面，同時發揮了的和實施出來的民族政策的全貌。

自從列寧這個政策確立和實施以來，已經半個世紀了。這是一個狂風暴雨的時代，是戰爭和革命交織的時代。這中間不但許多民族的命運起了興衰離合的大變化，而且整個人類的命運都遭受了存亡絕續的大考驗。在這些變化和考驗中，究竟列寧的民族政策起了怎樣的作用？它得到了怎樣的證明？現在是可以作個小小總結了。

首先得指出，它是收穫了巨大成果的。十月革命以後全世界共產主義革命的迅速展開，特別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的風起雲湧，客觀上與基本上固然是歷史的大勢所趨，但若沒有主觀上與思想上的推動卻也決不能致此，而此種推動，可以說唯一地來自共產國際，也可以說，它主要導源於列寧那個「國際主義的民族政策」。至於蘇聯內部各少數民族政治地位的改善，它們經濟文化程度的提高，因此而鞏固了並且加強了整個蘇維埃國家的力量，那就更加不必說，是直接拜列寧這個政策之賜的。

不過這些成果十分明顯，我們毋須多說。這裏需要我們比較詳細地說明的，倒是關於問題的另一面，關於問題的消極的或「不幸的」一面。

在過去半個世紀中，共產主義的影響誠然是大大擴張了，受共產主義者領導的落後國家民族解放運動，誠然是蓬勃興起了，其中有的而且已經成功了；但同時我們卻無疑看到了不少令人沮喪的事實，它們表示出列寧的革命立場變了質，以致這個立場所獲得的革命成果落了空。

列寧逝世以後不久，我們便看見了蘇聯內部大俄羅斯的狹隘民族主義迅速抬頭。民族迫害，甚至種族歧視，不僅再度出現於國內，而且實際發生於黨內。國際關係方面，我們看見了強權政治的原則又成了蘇聯外交政策的指導。

第三國際繼續存在，一直存在到第二次大戰時期。可是它的性質和作用卻曾經不斷改變，終於改變成為根本相反的東西。原本是世界革命的總參謀部，落到了史大林一系的手裏之後，竟逐漸變成為蘇聯與各帝國主義國家進行勾搭的零找錢；同時更加可惡的，它又終於成了一個幌

子和陷阱，史大林們拿它來奴役各國共產黨，控制乃至破壞各國革命，憑一己好惡來選擇兄弟黨的領導，甚至謀殺各國的優秀革命者。

列寧的最徹底的國際主義，竟這樣地被史大林利用來實行最血腥的與最狹隘的民族主義的罪惡。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東南歐洲先後產生了好幾個由共產黨執政的國家。這些新國家之間所形成的關係，更顯得是一幅對於列寧理想的諷刺畫，無情地嘲弄了列寧國際主義的民族政策。按照列寧當年訂下的並且實行了一個時期的原則，這些新國家原該與蘇聯結成「自願的與誠實的聯邦」。這個聯邦原該締結和保持「各蘇維埃共和國」之間的「密切的經濟聯盟」，以便一方面「實現被帝國主義所破壞的生產力的恢復和勞動者福利的保證」；另一方面「趨向於建立一種統一的、依照總計劃由一切民族的無產階級所調節的整個世界經濟……」（見《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第八條）

可是事實上，我們在他們的關係中，一點也看不出列寧所希望的東西，無論從哪一方面看，都一點也看不出國際主義。人們所見的只是資本主義國家之間所常見的關係，只是以種種形式表現出來的極端民族主義。人們所見的只是大國（蘇聯）對諸小國（所謂衛星國）的壓迫與榨取，只是諸小國對大國的屈服、爭執或反抗。誠然，史大林曾經組織過共產國際情報局。但它和列寧時代的第三國際根本不是同一回事。它既非領導世界革命的參謀部，亦非調整諸共產黨國家關係的一個國際組織。它只是史大林蘇聯壓榨與臣服諸衛星國的一個輔助工具；它只是克里姆林宮對諸「兄弟國家」所施加的，於軍、政、經諸般壓力以外的另一個壓力——思想的壓力罷了。所以結果，當南斯拉夫起來反抗這整套壓榨以後，情報局也就悄悄結束了。

鐵托宣告獨立，東柏林工人暴動，波蘭工人起義，1956年10月間的波蘭政治危機，以及匈牙利革命，——這一連串事件，都主要地表示出蘇聯沙文主義壓迫下各該國被激發起來的基於民族利益的反抗。今天毛澤東與赫魯曉夫之間的爭吵，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也就是弱小一方的民族主義和強大一方的沙文主義之間的衝突。

* * *

說到這裏，人們不禁要問：體現着列寧民族政策原則的蘇聯，怎麼會墮落成沙文主義的國家？究竟是哪一些主觀的與客觀的原因，使列寧正確的民族政策變成為史大林的罪惡的民族政策？

主觀原因，首先自是列寧和史大林在思想性格上的差異，兩人在學問見識上的各殊。兩人在這些方面的差別真是太大太多了，其大不啻天壤，其多何止千百；不過歸結起來，我們卻還可以這樣說：一個是廣闊的世界規模的、天才的革命理論家與偉大的革命戰略家；而另一個則是狹隘的囿於一國之內的狡黠的革命實幹家和短視的陰謀策略家。這一個基本的不同點，使前者能永遠成為客觀世界的主人，能主動地改變世界；而後者則只能成為客觀世界的奴隸，只能受客觀局勢的支配。根據這樣的不同，我們有充分理由說：如果列寧不曾過早地為史大林所代替，如果他多領導世界革命一二十年，那末縱然世界不一定發展得諸事如意，但至少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至少在共產黨國家之間的關係上，不會弄到目前那個地步。不過話說回來，主觀原因終究是次要的。歷史的行程主要還是讓客觀因素來決定。早在1925年前後，列寧夫人就很正確地說過：如果列寧未死，他多半會被關在史大林的監牢裏。

使列寧的民族政策讓位於史大林政策的客觀原因，也就是使蘇聯從工人民主國家墮落成官僚專制國家的客觀原因。簡單說，那就是俄羅斯在經濟文化上的落後，以及蘇聯在長時期內的陷於孤立。俄國的落後是十月革命的先天不足；蘇聯的孤立則是十月革命的後天失調。十月革命的一切崇高理想與偉大原則，亦即列寧所主張與所執行的有關世界革命的諸般戰略與政策，其所以會逐漸喪失，會逐漸變質，最最根本的原因，應該從這個「不足」和「失調」中去尋找。

不過在這篇文字裏，我們不想討論這兩個根本原因，我們這裏只想於此二者之外，再略為具體地指出幾個比較特殊的特殊原因，它們曾經使列寧的民族政策變質而歸於失敗的。這些原因，據我們看，重要的有如下五者：（1）因為社會主義革命首先爆發於落後國家中，它們是從民主革命不斷生長出來的，即它們是從民主民族鬥爭中發展出來的，故當勝利了的社會主義革命，在許多方面，仍脫離不了民族鬥爭的影響，甚至脫離不了民族主義的影響；（2）一般講來，由共通言語，共通的歷史文化，共通的生活習慣所形成的民族感情，比政治與經濟上的民族主義更難消除，它雖在資本主義下便已經大量消除；但其消除程度與消除速度，顯然比人們所預料者為小為慢。在那些「社會主義」國家中，非但沒有消除得更多更快，甚至在某些地方與某些時候，還被人加以保留和培養哩；（3）社會主義革命先後分別地在各個國家中發生，以民族單位組織的工人政黨在勝利中執掌政權，結果多少總要造成一個統治階層，這個階層以單獨國家的利益為利益，以這個國家的保存而保存，因而妨礙着諸工人國家間真實的自願聯盟，延長着民族的分立與對立；（4）即令兩個社會主義國家都在正確而健康的無產階級政黨領導之下，他們中間的較大一方沒有沙文主義，較

小一方亦無民族主義，雙方都遵循着徹底的國際主義，但究竟如何在政治上合作，在經濟上協調，在一切活動上齊一步驟，即使兩國毫無抱怨地、真正互利地、因而完全不損害任何一方的民族感情與民族利益地，逐漸合而為一，作為走向世界大同的一步——這在實行上還是有着無數困難的事，決不會像預料那樣地順利方便；(5) 由於無產階級解放事業的世界性質，由於「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歷史要求，全世界工人階級革命政黨的國際組織是絕對必需的。要實行世界革命，必須有世界革命的司令部。所以勞動解放運動的國際組織，與革命社會主義的歷史同時開始，兩者的命運似二而實一。但是這個司令部或參謀部，同它所轄的各個部隊（各支部）之間究竟採取怎樣關係，應該集中到什麼程度，應該民主到什麼程度，它與各支部之間的分工究竟應該怎樣，司令部應該管哪些事情，不應該管哪些事情，各支部在哪樣的問題上必須服從國際，在哪樣的問題上可以而且應該自作主張，諸如此類的問題，要經常處理得正確恰當，實在是非常難的。不過這還只是「組織上」甚至是「事務上」的困難罷了；此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困難，那就是，從來的國際組織，出於明顯的原因，總是受着國際中最有力的支部（十月革命後則受着最有力的國家）的維護與領導，因之，它們總是在政治上受着某個黨或某個國家的影響，它們總是在或大或小程度內與該黨該國共同經歷着政治的演變。這情形使得那個國際失去獨立，會隨領導黨或領導國家的健全或墮落而異其作用：在前一情況中它可以推進世界革命，但在後一情況中它卻能成為世界革命的妨礙者與破壞者。

上述五種情形，曾否為列寧所見及或預料到？如果是見及或預料到的話，他曾否採取了對策或預防措置？如果他曾採取了對策或預防措置而其民族政策還是因此五者而出了毛病，我們是否可以說病因畢竟在於列寧政策的本身？

現在我們就想研究這幾個問題。

據我們看，上述五者，幾乎全部是為列寧生前所見及的。不但見及，他而且還深刻地考慮過，實行了對策，藉以應付或防止了的。它們終於還是使列寧的民族政策「失了效」，則並非由於政策的本身，而是由於列寧死後，以史大林為首的蘇聯領袖們在不利的客觀條件（即上述的「落後」與「孤立」）所促成的種種困難下，不能堅持列寧的政策，而且叛變了這個政策之故。

何所據而云然？其說如下：

在一切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家中，列寧是最清楚民族主義的病源的，他最懂得這個毛病之難醫；他最懂得這個痼疾必須在長期間，而且還要在正確醫療之下才醫得好。他懂得，即使在社會主義革命已經成功的國家中，特別在比較落後的國家中，民族主義這個頑症也還能在長期間發生壞作用，仍能毒害其中原來的統治民族與過去的被壓迫民族，因此，列寧不但制訂了正確的民族政策，而且還規定了實施此一政策的正確的態度和辦法。

在為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起草的有名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上，他寫下了這樣的一段話：

帝國主義列強歷來加於殖民地與弱小民族的壓迫，引起被壓迫國家勞動群眾對一般壓迫民族，同時也對這些民族中的無產階級，不僅表示憎惡，而且表示不信任。1914至1919年，當這一無產階級的大多數正式領袖們按社會沙文主義精神，藉口「保護祖國」而來掩蓋其保護「本國」資產階級之壓迫殖民地和掠奪財政上依賴國的「權利」時，以致他們這種卑鄙背叛社會主義的行為，曾不能不加強這一充分合理的不信任。

另一方面，一個國家愈是落後，則這國家內的小農業生產，宗法制度和閉塞性就愈加厲害，而這種情況必然使最深刻的小資產階級成見，如民族利己主義及民族狹隘性特別加強和鞏固起來。因為這些成見只有在先進國家內的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消滅之後，只有在落後國家經濟生活的整個基礎有了徹底的改變以後，才能消除，所以這些偏見的絕滅過程不能不是很慢的。因此，一切國家覺悟的共產主義無產階級，必須以特別的謹慎和特別的注意對待長期受壓迫的國家和民族中的民族情感的殘餘，同樣，為了更迅速地克服這種不信任和這些偏見，必須作某種讓步。沒有全世界一切國家和民族的無產階級乃至一切勞動群眾之力求自願地聯合和統一，則戰勝資本主義是不能順利完成的。

這裏是說得再清楚也沒有了：殖民地和弱小民族對帝國主義國家，甚至對這些國家中的無產階級，表示憎惡與不信任是「充分合理的」，落後民族中的民族偏見「特別強大和特別鞏固」；這些偏見的「消滅過程不能不是很慢的」；它們「只有在先進國家的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消滅以後，只有在落後國家經濟生活的整個基礎有了徹底改變以後，才能消滅」；因此，一切覺悟的共產主義者「必須以特別謹慎和特別的注意」去「對待民族情感的殘餘」，而且，為了「更迅速地克服這種不信任和這些偏見」，還「必須作某種讓步」。

這一個實施民族自決權的態度與辦法，亦即謹慎、耐性與必要時須作某種讓步的那個態度，列寧充分貫徹在他當政年代的有關事件中。當十月革命勝利以後，蘇維埃政權從自己一方面出發，如何迅速而誠實地將民族自決政策兌現的事，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了。這裏我只想讓讀者們看看列寧從他人的一方面着想，又如何謹慎而緩慢地實行這個同一政策。下面是一個例：1919年12月，紅軍戰勝了白黨鄧

尼金的軍隊，克服了基也輔，坡爾塔瓦等等要地，解放了烏克蘭。為此，列寧給烏克蘭工人和農民寫了一封信，其中提到烏克蘭的革命問題，也提到民族問題，特別提到烏克蘭蘇維埃共和國與大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的關係問題。信中，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因為它同我們討論的問題有關）有如下的一些：

我們主張建立自願的民族聯盟，即不允許一個民族對另一個民族施行任何強力的聯盟，即基於充分信任，明確了解和親密合作而完全自願同意的聯盟。這樣的聯盟是不能一下子實現的。應當以最大的耐心和謹慎態度來逐漸實現這種聯盟，以免損害事業，以免引起不信任心理，好使那種由於歷來地主資本家的壓迫，由於私有財產以及因瓜分和重分這私有財產而引起的仇視等所造成的不信任心理得以泯滅去。

接着他說：

所以在力求實現各民族統一和無情打擊一切離間民族的行為時，我們應該非常謹慎而有耐心，對民族不信任心理採取讓步態度。……因為在廣大農民和小業主群眾中，現有的民族不信任心理常常保持得很牢固，急躁辦法從而可以使這種心理加強起來，即是說，反而會危害完全徹底統一的事業。

列寧充分了解，烏克蘭民族對大俄羅斯民族「所懷抱的義憤和不信任心理，業已積累了好幾百年。」這種義憤和不信任，在俄羅斯工人政權的合理與正確的對待下，雖「在逐漸消失着，不過要很久很久才能消除下去，而且曾經在長期中充當壓迫民族的大俄羅斯人若表現得愈加謹慎，愈有耐性，則這種不信任心理的清除就會愈有保障。」（加重圈是我們加的。）【朱正按 王凡西這裏說的「我們」應該是指

托洛次基派。】所以列寧不放過任何一個機會來教導：必須謹慎，必須有耐心，甚至必須讓步，才能加速民族偏見的消滅而非加強它們。對於大俄羅斯的共產黨人，列寧更是諄諄告誡：「應當極端嚴格地防止自己隊伍中有絲毫大俄羅斯民族主義的表現，因為這種表現，一般地本是叛變共產主義，便會造成莫大的危害，而使我們和烏克蘭同志之間發生分裂。……」

在民族問題上，列寧不但要從來壓迫人的民族中的共產黨人對長期遭受壓迫的民族中的廣大群眾讓步，而且還要他們對後一民族中的共產主義者讓步哩。關於這，他在那封信上是這樣說的：

所以我們大俄羅斯共產黨人，當有關烏克蘭國家獨立問題，有關烏克蘭和俄羅斯聯合形式問題，以及一般民族問題而與烏克蘭共產黨人布爾雪維克與鬥爭派發生爭端時，便應採取讓步態度。……^[1]

從上面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出，列寧為了解決民族問題，為了正確地實施民族自決，為了使這個問題的解決有利於國際無產階級的解放事業，真是考慮得非常周詳，可以說無微不至的了。從這個例子我們又可以看出，史大林如果能一貫遵循着列寧的態度去實行列寧路線，那末蘇聯與南斯拉夫不會決裂，即使決裂，也決不會像實際發生的那種情形來決裂。如果史大林的繼承者真能恢復列寧正確的民族政策，並以正確的辦法來執行，那末蘇聯與東歐許多兄弟國家的糾紛可能不會發生，即使發生也決不會像實際發生的情形而發生。如果赫魯曉夫當年真能「糾正」史大林的對華政策，真能對毛澤東的民族偏見採取「耐性、謹慎與讓步」的態度，那末中蘇衝突可能避免，即使終於不能避免，也決不會為了民族的或民族主義的利益而衝突的。

由此可見，史大林及其後繼者們不能以列寧的正確態度來實行列寧的民族政策，甚至根本放棄了這個政策，實在是這些年來共產黨世界許多糾紛與衝突的一個大原因。

* * *

說到這裏，我想略跑一段野馬，談談中共方面的民族主義，談談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主義之間的關係。

中國共產黨，在一個意義上說，正是中國近百年民族獨立鬥爭的產物。它的勝利，在不小程度內，正是依靠了中國民族獨立鬥爭的。這樣的黨，這樣取得勝利的一個黨，要它不染上民族獨立的過敏症。要它不多少受着民族主義的影響，簡直不可能。

中國的民眾歷盡了千辛萬苦，將欺侮他們和剝削他們的帝國主義者趕了出去，當然不準備再受任何外國的欺侮與剝削了，不管那個外國憑的是什麼藉口，用的是什麼名義。所以把中國革命的民族自尊過敏症，歸因於毛澤東個人的民族主義殘餘，顯然是不對的。這是為中國革命的歷史過程與歷史地位所決定，並非任何一個個人所能左右。毛澤東在這方面的感情和見解，不過是那個過程與地位的反映罷了。

當然，反映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中國共產黨人並非自始就能夠反映了這個「過程與地位」。把中國人民大眾的民族感情鄭重地加以考慮，鄭重地將它反映到共產黨的政綱中去。反映到他們的政策中去，本身就是一個相當曲折的過程。要想清楚地懂得毛澤東與中共為何得勢，要懂得他們得勢了又為何如此頑強地抓住民族主義不放，略略談談這種曲折的過程倒是必要的。

自從中國共產黨執掌政權以來，中國的文化生活中十分明顯地讓我們看到了一種復古運動。古老書籍大量地整理出版，前賢先哲的地位拼命抬高，古代文物的推重，名勝古蹟的保存，失傳的戲文樂曲紛紛發掘，被斥為「謬種」的舊體詩詞又時興當令。【朱正按 毛澤東1957年1月12日給臧克家的信中說：「這些東西，我歷來不願意正式發表，因為是舊體，怕謬種流傳，貽誤青年」。】這些情形，和五四以後共產黨活動初期那種否定中國一切文化，簡單給它蓋上封建烙印，要把「線裝書統統拋進毛廁裏去」的光景，恰恰成了個鮮明對照。有人把這個現象解釋為中國共產黨對民族主義的投降，這解釋即使不算大錯，卻總是極其片面。有人說，這是毛澤東個人嗜好的反映，是他那「中學為體」的表現，這是不適當的誇大說法。「楚王好細腰」，固然能使「宮中多餓死」；但若沒有更深遠的歷史原因和社會原因，就算是至尊所好，也不能在整個文化動向上，起如此巨大作用的。中共的「文藝復興」運動，顯然還有比毛澤東本人更為強大的推動力在。

中國文化，亦可說是漢民族的文化，在其久遠性，持續不斷性，乃至其單純性上說，都是非常獨特的。在文化本身的質與量方面，它並不高於其他幾個主要民族的文化，雖然也並不低過它們。但就上述三點說，即就它的源遠流長，就它發展中間不曾為另一較高的異民俗的文化所中斷，就它雖然也吸收了其他文化，最主要是印度文化，但以儒學為主體的文化始終支配着漢民族的絕大多數這些事實來說，卻是獨特的。這個與封建的及前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相結合的、獨特的、久遠的與深閉固拒的文化，一直自我肯定了兩千多年，過着自尊自大的與停滯不前的生活。

一百多年前，西方資本主義開始侵入中國。它用廉價商品與堅甲利兵攻破了中國閉關的長城，動搖了中國文化的基礎。與中國開始走

上半殖民地道路同時，中國的傳統文化也逐漸由頑固的自誇轉入到喪失信心的自卑。它開始被他人否定，旋即也被自己否定了。再後來，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定局之後，形形色式的外來思想，從唯心的、甚至神秘的各種資本主義的思想流派起，一直到唯物辯證的革命馬克思主義止，像激流，像洪水，從四面八方，浩浩蕩蕩，沖進了撤了防的、徬徨摸索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心田中來。他們一時間被這些洪流沖昏了，被這種五光十色迷惑了，只覺得外來的樣樣新奇，式式可愛，就不知選取哪一種好。不過在此紛亂惶惑之中，有一件事是確定的，那就是中國固有的東西是完全要不得了。中國必須以外人為師。所以在一個時候，特別在從「五四」到「五卅」期間，中國一切前進的有志之士，無論傾向於歐美資本主義的也好，或傾向於俄國共產主義的也好，都對中國文化採取了全盤否定態度。

這個否定態度一方面表示出中國殖民地化的益趨深刻，另一方面卻表示出中國民族及其文化窮極思變，變中求通的情形。因此，除非中國將長期處於某一帝國主義的奴役之下，那麼這個全盤否定態度一定要在短期內再度變為肯定，一定要讓位於較高平面上的再肯定的。

事情正是這樣發生了。人類的歷史進入了二十世紀，資本帝國主義的世界統治已開始為社會主義的世界革命所打破。中國變成印度的可能性，幾乎已自動地排除了。客觀的大勢既不利於「全盤否定」，那末「再肯定」也就只差主觀上的努力，其實現只是遲早問題。

對中國文化的全盤否定自是虛無主義的態度，甚至是買辦主義的態度。它雖能破舊於一時，卻總不能建新於來茲。它的作用主要是消極的，它的進步意義是短暫的。而它的影響是浮面的，僅僅限於大城市，限於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它同中國最大多數的農

民工人，乃至一般下層小資產階級，都不曾有過什麼關係。不過它在中國那兩個主要的政黨：國民黨與共產黨中，卻都曾得過勢，起過大作用。國民黨中有所謂親歐美派，共產黨中有所謂「國際派」，都屬於這類全盤否定者。不用說，這二派代表着根本不同的國際背景，代表着國內不同的階級利益，所以他們不能等量齊觀；但他們之根本否定或完全抹煞中國文化，他們之「只懂希臘不懂中國」，甚至他們之只精洋文不通中文，他們在中國勞動大眾眼裏變成了「假洋鬼子」，卻是相同的。三十年來國共兩黨的長期鬥爭，結果一勝一負，原因當然很多，不過這些「假洋鬼子」在二黨內部的不同命運，卻不能不說是其中之一。國民黨因為依賴帝國主義而親美派得勢，親美派得勢更使國民黨遠離了中國文化，因而也遠離了中國大眾。共產黨則因長期和中國的廣大民眾接近，特別是和農民群眾接近，結果就被迫地，逐漸地擺脫了洋教條主義者的統治，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文化上接了種^[2]，因此獲得了更廣大更深厚的群眾擁護，並使它最後走向了勝利。

在這一個意義上說，中共的壯大及其成功，確曾部分得力於他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再肯定。

事情既然這樣，那末，當中共取得了全國政權並鞏固了自己勝利之後，這個黨，乃至整個民族，對中國的傳統文化推崇備至，竭力加以表揚，甚至過分地，精華與糟粕不分地，誇大而沾沾自喜地以自己固有的文化，以自己偉大的祖先們自傲，當是很自然的事了^[3]。

* * *

中共這個樣子的民族主義的自大自傲，不必說，與無產階級革命的國際主義精神大相徑庭；但是，正如我們上面所述，它是中國革命

中自然的、甚至是相當必然的產物。對於中國革命後這種「民族情感的殘餘」，若依列寧的意見，先進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假定它仍然是這樣的一個國家）自應以「特別的謹慎和特別的注意」來對待的。雖然中國革命勝利後代表這種「小資產階級偏見」的是中共，是自命為無產階級代表的中國共產黨。對於「覺悟的共產主義者」可以而且應該提出較高要求，可以而且應該對他們的民族主義偏見作嚴肅的批判。但是根據列寧當年解決烏克蘭問題時的態度，對於那些原來被壓迫民族中的共產主義者的民族偏見，進行鬥爭或進行教育時，也必須謹慎、耐性、而且應該「採取讓步態度」。因為只有採取這樣態度，才能有保證地消除那種民族不信任心理。

可是事實上，史大林以及他的後繼者是如何對毛澤東進行了「教育」的呢？有關此事的種種，我們在前面的兩章裏詳細敘述過了，不贅。一切都是列寧立場的反面，一切都表現了大國沙文主義，一切都表現了比普通沙文主義更加令人噁心、更易引人反感的沙文主義。這樣幹，又怎能不在中共民族主義的火上加油？這樣幹，又怎能不引起中共對蘇聯那些「共產主義領導人」的不信任和反對？這樣幹，又怎能不促發「中蘇分歧」？由於蘇聯方面對中國施加沙文主義壓迫之故，竟使毛澤東的小資產階級的落後的偏見，似乎變得進步而合理了。

不過有人會說，史大林們之所以不能堅持列寧政策，安知不是這個政策在新的客觀條件下根本無法堅持之故？亦即根本無法實行之故？如果列寧在，可能也會因不能實行而無法堅持，可能也要採取史大林政策的。

要知道這個說法是否對，只要回憶一下列史二人關於喬治亞【朱正按 即格魯吉亞】問題的爭論就夠了。

十月革命勝利後，喬治亞一直處於門雪維克派組成的政府統治之下。這些門雪維克領袖們，當俄國的中央政權操在妥協派手中時，最堅決地反對喬治亞的民族主義，竭力主張喬治亞要成為全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是一旦布爾雪維克派奪得了中央政權，這些「社會主義的」領袖們卻於一夜之間變成了最頑固的民族主義者。他們利用了列寧所宣佈的民族政策，要求讓喬治亞人自決，要求與俄國分離。當時俄國正陷於內戰之中，蘇維埃政府忍受着喬治亞政府那種敵視的態度。列寧一直反對它用兵，主張一方面與門雪維克的領袖們談判，一方面靜待喬治亞內部勞動民眾的革命成熟。如此一直等到 1921 年 2 月，當時身為蘇維埃政府民族人民委員長的史大林卻等不下去了。他隱瞞了紅軍的最高負責人托洛次基，他誇大喬治亞工農的起義藉以騙取了列寧的支持意見，竟擅令紅軍第二軍入侵喬治亞，趕走了門雪維克派政府，以此加深了喬治亞人的民族偏見。列寧在入侵這個既成事實面前曾竭力命令史大林等要「更加溫和，更加小心，要準備對小資產階級，對知識分子，特別對於農民作出讓步。」可是史大林卻一味用專斷橫暴方法去反對喬治亞的「地方民族主義」；不但打擊上層，而且打擊群眾，不但迫害當地門雪維克，而且壓迫喬治亞的布爾雪維克。這樣，引起了列寧的非常不滿。我們知道，列寧逝世之前，他和史大林的關係完全破裂了，而造成破裂的原因，喬治亞問題乃是其中之一。

史大林如此「實行」列寧民族政策的結果，使喬治亞在 1924 年還發生了暴動，而且使它在長時期內成為最不願意接受十月革命的一個小民族。

喬治亞事件讓我們看到了：即使當列寧在世之時，即使在他的直接指導之下，史大林也能把這個政策弄成為「大國沙文主義」的。可

見史大林之背叛列寧政策，並非由於受到「新時代新條件」的壓迫之故，而是由於他根本只在口頭上擁護了列寧的民族政策，實際上他是以自己的、完全與列寧相反的辦法去「實行列寧政策」，藉以棄絕這個政策。

喬治亞事件又告訴了我們一個十分重要的道理：列寧確認民族自決權這個原則，與他為實行此原則而規定的「耐性、謹慎、溫和、讓步」的方法或態度是完全不可分離的，沒有後者，便沒有前者。不經過這些方法而賜予或強加於人的民族自決，不是欺騙，便是強姦。

所以在這個問題上，不僅目的與手段相互關聯，甚至還是手段決定目的哩。

列寧逝世到現在已經四十多年了。四十多年新的歷史證明：為要醫治民族偏見這個痼疾，為要使民族主義逐漸消融於國際主義中，我們原則上將無所加於列寧的立場，更不可能設想出一個不同於這個立場的立場。整個問題，將在於如何嚴格地遵行列寧當年諄諄教導的實施方法，在於我們按照新的歷史條件，具體而細緻地去貫徹那「謹慎、耐性與讓步」的態度。關於民族成見之消亡不能不是很緩慢的這個意見，四十多年的史實並非修正了它，而是以加倍的力量證實了它。因此，當某些人想以簡單迅捷的方法來解決民族問題時，更應該記住列寧給「緩慢」所曾定下過的時限：「只有先進國家內的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消逝之後，只有在落後國家的全部經濟生活基礎激劇改變之後」，民族成見才能泯滅。

忘記了這個「時限」，企圖以快速步子解決問題，那末任何社會主義者或共產主義者，縱使出於最良善的動機，而在客觀上也一定會成為大國沙文主義者，並且把對方的民族成見加深和加強起來。

近四十年來，特別是最近二十年來，發生於各個「社會主義國家」中間的民族糾紛，不小原因就在於此。

* * *

從上面的反覆說明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不管今天各國共產黨如何受民族主義的腐蝕，也不管今天民族問題如何毒害着各個「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列寧關於民族問題的看法與政策，非但不曾讓歷史從「人類寶物庫」中清除出來，反因得到反面證明而愈益顯出它寶貴絕倫的性質了。

於此，我們也就談過了上述五個情形中的首二項。

現在讓我們來研究其餘的三項。

社會主義革命在單獨一個國家內成功之後，建立了工人國家。這個國家造成了一個統治階層，它以單獨國家的利益為利益，它藉這個國家的保存而保存，因而妨礙着諸工人國家間的真正自願聯盟，延長着、甚至加強着民族的分立與對立——這個情形，是否為列寧生前所計及？它是否完全出乎列寧的意料之外呢？換句話說，工人國家之官僚主義的可怕墮落，工人國家之趨於保守，它之趨於民族主義，是否為列寧生前所預料到的？

在如下的意義上：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由於官僚主義的深刻墮落，變成了官僚對無產階級的專政，可是在經濟上，在財產關係上，這個國家卻仍舊保持着公有制，仍舊保存着十月革命的勝利品。換句話說，由於官僚毒化的結果，蘇聯這個工人國家是可怕地墮落了，但它不曾因之而根本覆滅，它在某種意義上，仍舊可算是一個工人國家。

這是不曾為列寧所預料的。更加不曾為列寧所預見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歐亞兩洲先後產生了一些「人民民主國家」。這些國家，連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內，都是一出娘胎便是可怕地官僚主義化的。並且是高度軍國主義化的，但它們仍能算是工人國家。這些國家在反對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方面，無疑地發揮了革命作用，但它們與馬列主義者所預期的理想國家卻差得太遠：它們既非國際主義的，亦非根本打毀了國家機器的；它們以民族利益為立國之本，以一國的疆界為社會主義建設的界限，更以官僚命令與軍事強制為建設社會主義的不二法門。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現象？為什麼工人國家的實際發展會如此出乎列寧的意料之外？這個問題是極端重要的。一切真誠的社會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都曾思索和研究了這些問題，而且已經得出了不少有價值的結論（其中最主要與最傑出的貢獻者是十月革命的二位領導人之一——里昂·托洛次基）。不過在此地，為了不使我們的討論離題太遠，我們不作這方面的介紹和討論了。我們在此地所以要談到這個現象，只為的要說明：由於這個不曾為列寧所預見的事實，即由於官僚化墮落的工人國家的出現和存在，大大妨礙了列寧的民族政策的實施和貫徹罷了。

不過有一個很自然會發生的問題卻仍不能不在此稍稍涉及，那問題是：「官僚化工人國家」這個歷史事實，是否無情地否定了馬克思，是否最後地否定了列寧最初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所說，然後在蘇維埃政權最初幾年內所做的，關於新國家與新社會應該如何如何，不應該這樣那樣的種種主張？這些主張，在今天的現實背景上看起來，竟好像是天真可笑的。它們是否應該當作烏托邦理想而加以拋棄？

如果不墮落與不官僚化的工人國家根本不可能產生，那末以此為基礎的列寧的民族政策，也就根本無從實施和貫徹了。

為要解答所提出的問題，讓我們先看看馬克思與列寧二人關於社會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的兩個基本立場：第一，社會主義革命的徹底勝利必須在國際規模內取得，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必須世界一統才可完成——這不是願望，也不是憑空的預言，而是從經濟政治發展規律中找出來的必然結論。因為民族國家的劃分既已為資本主義生產力的桎梏，那末它不能作為遠較高出的社會主義生產力的基地，自不待言。第二個立場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完成與國際社會主義社會的建立，與任何形式的官僚制度不相容，與各個民族的官僚統治不相容，它們必須靠生產大眾的民主自治才能實現——這也不是什麼願望或憑空的預言。因為社會主義的生產既然以公有制為基礎，以大眾福利的增進為前提，以階級及一切剝削壓迫的消滅為目標，那末，它只能由大眾的民主來取得和確保，絕不能靠少數特權官僚來賜予，這當然也是自明之理。

不錯，迄今為止的事實似乎是違反了這兩個立場的。「社會主義國家」是日見其多了；但是那所謂由社會主義革命所要求、由社會主義本性所決定的國際性與民主性，卻非但不見其增多，反愈見其減少。這到底說明了什麼？

據我看，它們說明了如下的兩回事：（1）社會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事業的實際發展，證明出比列寧當年（更不必說馬克思當年）所預料者曲折得多。它們的國際性與民主性在體現之時，遭遇到比預期的遠為強大的阻礙。（2）目前各個「社會主義國家」可怕的外部困難及其相互間的外部糾紛，恰好反證出：違反了國際性與民主性的原則，事情會糟到什麼程度。

從第一個證明看，馬克思列寧在這方面的預言誠然「錯」了；但當我們指出這個錯誤時候，必須知道，他們的「錯誤」僅僅在於：把那隨無產階級革命以俱來的國際性與民主性的實現，在時間上料得短些近些，在過程上想得簡單些，順利些罷了。這樣的與事實不符是完全不可避免的，是應有的，而這樣的錯誤是相對的。若從上面所說的第二個證明看，那末他們預言的正確卻就完全不容置疑了，是絕對的了。今天「社會主義」各國內政上所以會專橫乖戾，他們相互間的關係所以會如此緊張敵對，原因固然千頭萬緒，但其中極重要的原因之一，則不管蘇聯也好，中國也好，總在於他們違反了社會主義革命所必不可少的國際主義，違反了社會主義建設所必不可缺的工人民主。

因此，從「社會主義國家」的現狀及其相互關係，人們沒有理由得出結論：說不墮落的與非官僚化的工人國家終於不能實現。相反，若能放長眼光看問題，我們倒必須肯定，它們是必將實現的。這個必然過程，不用說，與人的努力和鬥爭分不開。這就是說，這個過程的實現，必將意味着工人國家中反官僚革命的勝利。要獲得這個勝利，必須恢復列寧的全部立場。而其中十分重要的，必須恢復他的民族政策，必須實施和貫徹這個政策。

現在讓我們看另一個問題。如果兩個新社會主義國家，正確些說，如果兩個工人國家，內部都沒有墮落的官僚制度存在，它們都是在正確而健全的無產階級政黨領導之下，那末，二者之間，或更多成員國之間的經濟、政治與文化上的合作是否會融洽無間？是否會毫無困難？更是否會在短期內由合作變成統一？對於這樣的假設性問題，當然無法給予確切回答；不過根據已有經驗，我們的回答與其趨於輕率的樂觀，毋寧傾向於「審慎的悲觀」。不錯，這種合作是必然的，由合作而進於統一也是必然的；但問題在於時間有多長；在於其間的過

程如何才能真正免於強制暴力的成分；更在於合作以後或一統以後，對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文化而言是進步了，還是後退了。要真正做到自由自願的結合，又要使這個結合做到讓全體成員國在種種方面都獲益而不蒙害，那末很明顯，即使各國的掌舵手都是徹底的國際主義者，都不是官僚，卻也得經過較長時間，累積大量正反經驗，在不斷犯錯與不斷糾正中，逐漸到達。

有什麼辦法可以縮短它的過程，減少它的困難，並確保它的實現呢？原則是有的，但細節的規定卻不可能。

列寧關於共產國際的理想，便是這個方面的原則上的辦法。在《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上，列寧就這樣指出過：

共產國際在這方面的任務，就在於進一步發展和研究並用經驗來檢查這些新的在蘇維埃制度與蘇維埃運動的基礎上所產生的聯邦。……並且注意……第三，趨向於建立一種統一的、依照總計劃由一切民族的無產階級所調節的整個世界經濟，而這樣的一種趨向在資本主義下就已經完全明白地表現出來了，在社會主義下更會無條件地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和充分的完成。

但是，國際革命領導機構本身似乎就成了問題的。自從共產國際情報局不光榮地結束以來，沒有一個國家的共產黨曾企圖恢復一個國際聯絡機構，更不必說國際性的領導機關了。這些年來舉行過的國際性會議，其中最重要的有二：1957年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1960年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這兩次會議，現在我們知道，其目的主要為的要解決一些思想問題，特別要解決中蘇之間的思想問題。按說，它們一定要討論到如何調整各國黨的

關係，如何統一它們的思想行動問題，也就是要討論到共產國際的復興問題；但事實恰好相反，那兩次會議對於國際聯絡與國際領導問題絕口不談^[4]，反而談論了與正式規定了各國黨互相獨立，各自為政的立場。在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上，規定了有關各社會主義國家關係的所謂五項原則：(1) 完全平等；(2) 尊重領土；(3) 尊重國家獨立和主權；(4) 互不干涉內政；(5) 兄弟般的互相援助。1960年的莫斯科會議所發《聲明》，更以同樣精神，規定了黨和黨之間的關係，文如下：

所有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都是獨立的、平等的，它們從本國的具體條件出發，遵循着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制定政策，並且互相支持。……

共產黨和工人黨根據需要舉行會議來討論迫切的問題，交流經驗，互相了解彼此的觀點，協調在爭取共同目標的鬥爭中的共同行動。

當某一個黨遇到有同另一個兄弟黨的活動有關的問題時，由這個黨的領導方面向有關的領導方面提出，必要時進行會談和協商。

……1957年11月會議和這次會議的結果表明：在目前條件下，這種會議是相互交換意見和經驗、通過集體努力豐富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和在爭取共同目標的鬥爭中確定一致立場的有效形式。

在這段引文裏，我們清楚地看到了，列寧一貫堅持的世界黨與世界革命總司令部的概念被徹底否定了。各國共產黨不再是，而且不必是一個世界共產黨的支部。它們是獨立與平等的，相互不許干涉「內政」的；二黨活動倘有牽連時，可以雙方協商；為了交流經驗，彼此了解觀點，以便共同行動，則可以召開各國共黨會議，除此之外，據說在「目前條件下」，一切別的辦法都不是「有效形式」。在這裏，

民族共產黨的立場被正式批准，共產國際組織終於被宣佈為「無效的形式」。

這種思想別說與列寧的立場根本對立，甚至還落後於社會民主黨的，因為後者至少在形式上還有個國際存在，至少在口頭上還承認有這種組織的需要。

全世界的共產黨由國際性的組織，後退成為民族至上的政黨，這到底表示了什麼？共產國際的理想經過了這樣一次實驗，人們是否還有理由相信它對於世界社會主義革命事業有益？是否還應相信它對人類在經濟文化諸方面之終能走向大同有利？

目前有很多人認為：今天世界共產黨人的唾棄國際主義，充分表示了馬克思列寧們所渴望的國際主義終於被證明為不實際的幻想；它表示了民族主義是永久的，是不會消滅的；它表示了民族國家是一個永恆的範疇，人類是終究不可能生存於以世界為單位的組織中的。

這個思想是否站得住？它是否可以稱為業經證實的歷史的真理？

並不。要知道民族主義是否為永久的與不滅的，民族國家是否為一個永恆的範疇，只要看一看它們發生和發展的情形就可自明。無終不應有始，有始必然有終；如果有了發生和發展，早晚必定要歸於消滅。有了生滅，就根本談不上什麼永恆。

稍懂歷史的人都知道，民族是一個歷史現象，而民族國家則更是一個晚近的歷史現象。以共同語言，共同文化與共同的經濟聯繫為基礎的人的群體，是隨着經濟的發展而逐漸由小變大的，人類為了與自然作鬥爭，為了相互合作鬥爭，不得不以群體而存在；這個群體，自從最初的氏族形式一直發展到目前那種國家形式，是經過了不少中

間形式的。現代民族國家這個形式，嚴格說來，在人類四五千年的文明史上，其實只佔了一二百年，這情形尤其在西歐是如此。正如一位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家說得好：「在西歐，資產階級民族形成時代，如果除開尼德蘭的獨立鬥爭和英格蘭的島國命運不說，那是從法蘭西大革命開始的，根本完成於德意志帝國的成立，中間大致經過了一百年。」（見《俄國革命史》第三卷第二章）在中國，既然兩千多年前就有了夷夏之分，後來又有了胡漢之爭，再後來又有了蒙古人的統治全國，以致有了明朝的驅虜運動；明亡於清，又引起了民族間的壓迫與反抗——所有這些，都彷彿我們中國的民族主義，或漢民族的民族主義，是自古已然，於今為烈，且將永續不替了。其實不然。第一、所謂中華民族，實際上早已是一個多民族的混合體；姑不論中國境內有許多弱小民族這個事實，便是以漢族論，它也不是純淨的；第二、中華民族真正形成了一個多少帶有群眾性的民族意識，企圖不是為一姓一朝的利益，而是為「全民族」的利益，起來和外民族抗爭的，嚴格說，只能從鴉片戰爭後的反帝排滿鬥爭算起，因此，現代意義的中華民族主義，至今也不過一百多年罷了，至於現代意義的民族國家，那只能勉強從中華民國的成立算起。

由此可見，無論中外，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都不是什麼超時間的現象，而是相當新近的歷史現象。說得清楚些，它們是隨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而產生，隨資本主義的成長而加強；可是，等到資本主義發展到某一個程度，那就要像馬克思在《宣言》上所指出的那樣：「隨着資產階級的發展，隨着貿易自由和世界市場的確立，隨着工業生產以及與其相適應的生活條件的一致化」，而使「各國人民間的民族隔絕性和對立性」，「愈益消逝下去」。

這是說，現代意義的民族主義與民族國家，在全部人類的歷史上，是與資本主義同起同落，同生同死的。列寧在《殖民地和民族提綱》上所說的：「民族利己主義與民族狹隘性的偏見……只有在先進國家的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消滅以後，只有在落後國家經濟生活的整個基礎有了徹底改變以後，才能消滅。」只是用不同方式，說明同一道理罷了。

誠然，現在的問題正是關於業已推翻了資本主義的國家，正是關於經濟生活的整個基礎有了徹底改變的國家，正是在孤立國家中，我們不但看不見民族利己主義與民族狹隘性的消滅，不但看不見國際主義的發揚，恰恰相反，我們看見了民族主義的猖狂與國際主義的退卻。

這難道不是否定了馬克思列寧等人關於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的看法嗎？我看不是。據我看，一切所謂社會主義國家中民族主義之反乎預料的發展，一方面乃由於今天世界經濟中佔最大比重的畢竟還是資本主義，同時在所謂「社會主義國家」中，其經濟生活的整個基礎，差不多又都不曾有「徹底改變」；另一方面，它證明了列寧一再強調的那個道理，即證明了「這些偏見的絕滅過程不能不是很慢的」。它甚至證明了：民族主義與民族偏見的消滅過程，竟比列寧所預料的緩慢過程還要緩慢得多；比他所預料的曲折過程還要曲折得多^[5]，這樣的證明當然不等於肯定民族主義的永久性。

如果我們不從一時一地的興替看問題，而從長時期的趨向，從整個世界的全域看問題，那末隨着世界資本主義的逐漸衰亡，民族主義與民族國家也終於會跟着消滅，其過程及其趨勢之必然，正有如在過去的歷史階段上，人類一切較低較小的社會政治組織，總隨其相應的經濟組織的更迭而讓位於較高較大者一樣。今天我們如果說民族國家

是永恆的範疇，那無異我們的祖先在數百年前說小邦小邑是人類不變的範疇；也正如數千年前我們的老祖宗們說氏族或部落是人類最終的社會組織一樣。這都是違反乎歷史發展規律的。

因此，不管今天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怎樣被人踐踏，也不管國際領導這個觀念如何受到揶揄，只要人類發展的總方向確是走向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我們於此毫無疑問），那末國際主義終將憑其自身的力量，亦即憑其客觀的需要，讓人去看重與力行出來。

當然，我們不是宿命論者。即使在歷史發展的必然性問題上都不是宿命論者。歷史的客觀必然性離不開人們的主觀努力，而主觀努力要想不成其為徒然的浪費，則總結經驗，吸取教訓，以為爾後工作之助，是十分必要的。因此，為的要維護與恢復正確的國際主義的原則與國際領導的觀念，人們自須詳盡地研究共產國際的全部經驗，特別要研究它在史大林控制時期的悲慘經驗。我們在前面指出過的那兩種情形，即：一、國際領導與各民族支部間如何保持正確關係；二、如何使國際領導能不受一黨或一國的控制與操縱問題，更須着意研究，以免再蹈覆轍。當然，要建立和保持一個正確的國際領導，主要是一個世界規模中階級鬥爭的政治問題，它不是什麼規章或制度問題。只是不斷的鬥爭才能保證那個領導的不斷正確；但雖如此，過去經驗的研究和分析，從而得出教訓，卻決非書生的勾當，它有利於今後的鬥爭。

不過在這裏我們顯然不能從事這項巨大工作。因為在這裏，我們的目的畢竟是在於指出民族主義與民族成見如何在一般的政治中，以及在特殊的共產主義運動中作怪，在於指出中蘇共的衝突中民族偏見如何起了作用，在於指出馬克思主義的大師們如何對待了民族問題，以及他們的看法如何受到了歷史的考驗；最後，在於指出無論是中蘇

間的衝突也罷，或共產主義陣營中其他國家間的分歧也罷，要想根本而圓滿地解決，總非走列寧當年規定的舊路不可，即非經由真正國際主義的國際領導不可。

所有這一切，我們已儘可能地說過了。

* * *

現在，我們要談另一個問題了，那便是：中蘇兩國革命所處不同階段，如何觸發了這個衝突。

說中國革命是俄國十月革命的繼續與延申，在比較寬廣的意義上，原是正確的。但必須了解，無論就時間的承續或空間的擴大說，都不是簡單直接，而是複雜錯綜，並且極為矛盾的。中國革命在全國規模內成功，後於十月革命成功三十二年。三十二年，在人類整個歷史上，即使在某一個單獨國家的歷史上，都只能是短暫的一瞬。但在革命進展史上，卻是一個極長時距。革命的年月，不但是「一年等於二十年」，甚至，一天或一月都可以等於二十年。在極短時間裏完成了的某些大事件，常能決定往後數十年，甚至數百年的歷史行程或面貌。而當革命與反革命搏鬥時代，這樣的大事件，前進的或後退的大事件，卻是屢見不鮮的。自從十月革命成功到中國革命成功的三十二個年頭中，蘇聯發生了多少帶有歷史性的大事情？這些大事情對於中國未成功以前的革命運動發生了怎樣的影響？這些都決定了俄中兩國革命的關係。決定了二者之間繼續和延申的性質。

三十二年內俄國革命的主要發展，其實是一種反動的發展。所以像「俄國革命發展的現階段」那樣的說法，嚴格說來是根本不能成立

的。應該說的是：反對十月革命的反動發展，現在已到了什麼階段。打從二十年代的後半期起，以史大林為首的一批人物，驅盡殺絕了整整一輩布爾雪維克黨的老戰友，實際取消了蘇維埃的民主，以官僚專政代替了無產階級專政，同時以民族主義代替了國際主義，以「一國社會主義」代替了世界革命：這時候，蘇聯早已不再處在革命發展的過程中，而是處於反動發展的過程中，亦即處於蘇維埃國家墮落的過程中了。這一點，當我們來談中蘇二國革命發展的不同階段時，不得不首先予以指出的。

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於1921年；但它由宣傳組織變成為行動的政黨，它與蘇聯共產黨發生思想、政治與物質援助上的真實聯繫，卻是在1923年以後，甚至可以說是1925年開始的。那時候，列寧已由病廢而至於死亡，以史大林為首的一批篡奪者已開始出來修改列寧的遺教和敗壞他的事業，俄國革命已開始了新的、本質上是反動的一章。這個史實具有巨大意義，因為它告訴了我們，中國共產黨雖然直接因十月革命的影響而產生，但它組織上與思想上的實際形成，卻是在反十月革命的一個勢力的指導之下。這個史實，與中共在1925-27年革命中所起的可憐與可恥的作用有密切關係；同時也是中共始終陷於史大林主義泥淖中的一個重要原因。中國革命失敗，回過來又加深和加速了蘇聯革命中的反動過程。當初史大林與布哈林聯合起來的中右派，主要就是趁着中國革命失敗後在全世界所引起的反動形勢，把托洛次基的左派打敗了的。此後，蘇聯共黨內部的反十月革命派，亦即反列寧主義的一派，在國內，同時在整個共產國際內進行着反動的手術，務使一切事物符合於史大林一系狹隘民族主義的、官僚主義的與機會主義的路線。人事上更進行了無微不至的、以反動派系利益為標準的嚴厲的清洗。這種反動手術（美其名曰「布爾雪維克化」），在中共中

也曾切實而長期地進行過。以王明為代表的克里姆林宮的直系，一度曾經把毛澤東為代表的「土共」迫下台去，在幾年內控制了中共的黨政軍大權。只因中國的階級鬥爭太過激烈尖銳，史大林的領導又謬誤，又遙遠，他的直接代理人又太過無能，毛澤東們才有機會恢復權力，才能給史大林在中國所施行的反動手術以一個有力的反擊，阻止了它的完成。

所以在1935年以後，在有限度的意義內，我們可以說，中共與蘇共是走着相反道路的：前者以自己的方式，向革命的道路上摸索前進；後者則以比前更快的步伐，在內政外交兩方面，在反對十月革命的道路上走去。

我們說，二者之相反只是「在有限度的意義內」，理由是：毛澤東雖然打敗了史大林的直接代理人，但他沒有反對史大林主義。正像我們上面所敘述，事情恰好相反，從他在組織上戰勝史大林直系之後，卻開始認真地來研究史大林主義，並且在不小程度內，從此他做了真誠的史大林主義者。毛澤東為史大林主義所俘虜，原因是相當複雜的，除了當時根據於策略性的考慮，希望以史大林主義去爭取史大林的恩寵之外，還有如下比較根本的諸點：（1）無論就狹隘的世界觀，就經驗主義的思想方法，就非常現實與渴求權力的性格，乃至就偏於民族文化的教養說，毛澤東均與史大林頗為接近，而與馬、恩、列、托這些真正具有世界規模的，經常以崇高的理想與原則性的理論為指導的人物，有着較大距離；（2）史大林以開明專制式的個人獨裁代替了無產階級獨裁，以非常野蠻的手段來實行「社會主義建設」，最投合毛澤東的脾胃，而蘇聯因貧窮落後所造成的整套史大林制度，對於更貧窮落後的中共控制區（即解放區），當然也更為合用。

如此，毛澤東從一九三零年代後半期開始，便成了有意識的史大林主義者與史大林的崇拜者。從那個時候起，中共的領導層，在基本的政治思想與組織思想上是十足史大林主義的；但在革命的策略上，革命鬥爭的方法上，以及其他許多實際行動的應付上，卻有它自己的一套。困處在陝北時期的中共，與史大林和蘇共的關係是頗為奇妙的。物質上並無從依賴，思想上卻跟隨着克里姆林宮的腳步打轉。政治上似乎受着莫斯科的影響，但決非在史大林的巨棒指揮之下跳舞。尤其在人事上，黨、政、軍隊的制度，延安早已完成了一個獨立的體系，一個以史大林為榜樣，但是以毛澤東為事實中心的太陽體系。這個體系比之以史大林的體系，其顯著特徵為：一方面是足以供給統治者享受基礎的剩餘生產異常薄弱，另一方面，它們腳下的群眾革命情緒卻非常強烈。因此，從三十年代底到四十年代初蘇共所經歷的那個最深刻的反動過程，並不曾使我們上述的中共那個向革命摸索前進過程停止下來，或倒轉過來。與毛澤東的底定一尊過程同時，中共在品質與數量雙方，特別在數量方面，大大地發展了。

德蘇戰爭對於蘇聯發展過程的影響，如果在最初一個時期加重了專制壓迫，也就是說，由於一切軍事化而加深了反動控制；那末在不久之後，卻就顯示出相反的情形來了。戰爭是殘酷的，在任何方面都是殘酷的。戰爭一方的目的在於摧毀對方，但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首先必須摧毀自己方面不符合此一目的的事物。否則，它就得為對方所摧毀。戰爭是最無情的考驗，它是作戰雙方軍力的考驗，也是雙方政治制度的考驗。腐朽透頂的政治制度，戰爭中絕無幸勝之理，那些雖病而尚有生命力的政制。則戰爭往往能多少治癒這些病症，其勝負又多少視病症的治癒程度而定。

德蘇戰爭當然沒有使十月革命更生；但至少使那個壓得使人喘不過氣來的重負輕鬆了一下，使那架靜靜地吞噬着革命的恐怖機器轉移了一下對象，使那些生活在漆黑長夜裏的人們似乎看見了一線曙光，至少使那些無可奈何呻吟着的，將悲慘當宿命來接受的人們似乎看到了變動的可能。同時，戰爭又使那個從來好像強大無匹而不可違抗的專橫統治，儘量暴露了它的無能，因而使那些戰鬥着的人民，逐漸恢復對於自己力量的信心，逐漸敢於主張自己的權利，提出自己的要求。

在這些意義上，我們能夠說，當第二次世界大戰期中，蘇聯的發展過程是從反動的最低點向上回升了一些，逐漸有憑下面壓力，遏止其徹底反革命之勢。

中共的區域割據政權，自始就處在戰火的鍛煉之中，上面所說關於戰爭對於執政黨派的考驗與清洗作用的話，在中共並不新奇。1935年史大林的直接代理人在中國失勢，首先得從戰爭的無情淘汰來說明。自從定居陝北以後，中共的統治層確實是較前更固定了，更僵硬了；特別當抗日戰爭之後，隨着整個共產國際的右傾而公開宣佈了階級合作政策，以致中共的發展路線，彷彿又從革命趨向於反動了。事實證明出來卻不如此。中國社會的階級矛盾太深刻，階級鬥爭太激烈，以致不管哪個政黨——尤其是長期敵對着的國共兩黨，即使其中之一的共產黨想放棄鬥爭，「精誠合作」，對手方亦決不會答應的。事實上那時擺在中共面前的只有兩條路：或者是「真正合作」，解散邊區政府，改編軍隊，藉以換取國民政府中幾個部長職位，這是徹底投降和被消滅的道路；或者是對史大林的指示「陽奉陰違」，對蔣介石的合作則「表裏不一」；階級鬥爭的路線是名義上與表面上停止了，但基本上與實際上卻仍不放棄。以階級標準及階級教育團結起來的共產黨仍舊保持着與發展着；以共產黨為主體的獨立的軍政力量也絕對保持

着，並且發展着，如此，一方面進行對日戰爭，另一方面準備着，實際上也進行着對國民黨的鬥爭。

我們見到，以毛澤東為主的中共領導層曾經採取了後一路向。因此，終抗戰時期，由中共表現出來的中國革命的發展路線，可以說是以搖擺的、偽裝的、蒙蔽的方式在走向更高的階段。

世界大戰結束，任何一個交戰國的群眾都有革命的酵母在發作。中國固然如此，蘇聯亦不曾例外。在這個世界規模的革命形勢中，中蘇共的地位有如下一個最大不同：中共成了群眾革命的領導者（在某種意義內亦可以說是控制者或駕御者），而蘇共——特別是它的領導層，則成了革命情緒所反對的對象。這個不同，一方面使中共在很大限度內革命化，另一方面則使蘇共在作相當讓步的同時更加保守了。

戰後蘇聯，自由與民主的要求是十分有力而普遍的，它們匯成了一個暗潮，形成了一個背景。這個潮流和背景，使得以史大林為象徵的那個蘇共專橫的政權，顯得不但可怕，而且荒謬可笑。如果史大林的恐怖曾經是「一國社會主義」的必然和必需的產物，那末到了四十年代的後期，這個必然和必須性質顯然已經失去。不合時代的任何事物都是可笑的，不合時代要求的大獨裁者則更是可笑的。可是任何獨裁者不會有明察時代變遷的眼光，史大林當然也看不見這種改變。因此大戰勝利之後，我們看見史大林在蘇聯大眾爭民主自由的潮流前面，手忙腳亂地，仍然想用秘密警察，集中營，荒唐冤獄與血腥屠殺，來恢復三十年代的「太平天下」。

結果，史大林死了。如果他不死，蘇聯是否會發生像後來在匈牙利所發生的革命呢？那是很有可能的，不過這裏我們不去作那種假設性的研究，我們只想指出這一點就夠了：戰後蘇聯的整個形勢決定了要鞭打史大林，至於他在生前被鞭或死後被鞭，那並不重要。

如此，從大戰後直到目前，若從中蘇兩國革命發展的觀點來看中蘇兩黨關係，可作如下簡述：

第一是保守對革命的時期，它開始於大戰勝利一直到史大林逝世。在這個時期內，克里姆林宮如何勸延安對國民黨妥協，它如何可恥地搖擺於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它如何企圖乘日本帝國主義崩潰之機而恢復沙俄時代在中國所享受的特權，以及當中共不顧「老大哥」指示而贏取了中國革命之後，史大林又如何在「慷慨贈與」和「無私援助」的美名之下，愚弄和勒索了毛澤東——這些，我們都已在前一章裏講過，茲不贅。我們現在想講中蘇關係的另一個時期，那就是從史大林逝世，赫魯曉夫繼起，以至目前這個時期。這個時期，如果依照中共的說法，似可稱之為正統馬列主義反對修正主義的時期。甚至，可稱之為忠於革命和叛變革命二派分道揚鑣時期。事實究竟是否如此呢？當然不能看得如此簡單。有關這時期中蘇兩黨恩怨向背的種種事實，已在上一章中講過，這裏不必重覆。在此地，我們想談談史大林逝世前後，蘇聯黨內與國內的勢力關係。因為只有明白了這種關係之後，我們才能適如其分地估計赫魯曉夫「鞭屍」運動的意義，才能確定中蘇兩黨所代表的革命或反動發展的階段。

早在1938年，托洛次基就對聯共黨內的派系與國內民眾的分化，作過如下描寫：

官僚內部的革命分子只是極小的少數，他們消極地反映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利益。不斷生長的法西斯反革命分子，以更大

的堅持性來表現世界帝國主義的利益。……在這兩極之間還有一些中間的散漫的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自由派的傾向，這些傾向都以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為歸趨。

在這個所謂「沒有階級」社會的下層裏，毫無問題，也有極類似於官僚的分派的集團存在，只不過表現得較為溫和，且其配比也相反：自覺的資本主義傾向主要的是集體農場中興旺的部分，而且只佔人口中微小的少數……（見《過渡綱領》第十六節）

這個描寫，不管其中有些看法，例如關於法西斯反革命分子的不斷生長一點，已為歷史證明為不符；但基本上卻至今仍然正確。官僚內部與民眾內部，以不同的比例，存在着相同的三類人物，即左中右三派。左邊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利益的代表，這類人在官僚內部佔最少數，在民眾內部佔大多數；其次是右派，他們想同化於「西方文明」，想根本取消十月革命的成果，這類人在官僚中佔大多數，在民眾中卻佔少數；最後是中派，其中包括史大林的統治集團。他們搖擺不定，時左時右，利用左右的矛盾以自重自保，這類人的數量，在黨內和國內都介乎兩者之間。

第二次世界大戰直前，特別是德蘇協議簽訂之後，右邊的法西斯反革命勢力顯然是飛快增長。但當德蘇兩國棄盟交戰，史大林面向「民主」以後，右派就停止增長了。接着，正由於我們上述的戰爭規律，左邊力量隨着戰爭的愈加艱苦，隨着中右二派無能與懦弱的不斷暴露，愈來愈抬頭了。這趨勢發展到戰爭勝利，便形成了蘇聯黨內國內反專制與要民主的有力運動，迫使史大林一面偽裝讓步，另一面又加緊壓制。史大林便是在這樣的相持中死去的，史大林一死，左邊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勢力固然要抓住機會，以便恢復蘇維埃的民主與權利；但在同時，右邊的思想使蘇聯西方化的那些勢力，卻也緊緊抓住

了民主鬥爭高漲的機會，以便從中取利，使大眾所要求的社會主義民主推向右邊，使它解釋成資產階級的民主，使它變成西方國會制的代名詞。

左右雙方都要求民主。雙方要求的民主含義不同；但都向着同一對象去要，都向着拿帕脫的最高層的官僚集團去要。無怪史大林一死，從來似乎擁有空前龐大權力的史大林一幫官僚，竟突然間發現自己懸在半空，毫無辦法了。它原本只有一塊小小的立腳石，它貌似龐大實則建築在社會矛盾的操縱上的。如今左右兩方在要求民主的共同要求下「聯合起來」，一致對它，它便無立錐之地了。

馬林可夫，莫洛托夫，卡崗諾維奇諸人，多少年來叱咤風雲，不可一世，而那時卻變成了「紙紮老虎」，「神壇貓屎」，既不可怕，而又可厭了。在這情形之下，一個歷史上屢見不鮮的現象發生了：統治者中間發生了分裂，其中有一部分與過去的正統較少瓜葛，對群眾的情緒較能適應的統治圈內人物，此時便見風轉舵，投向下層的反叛勢力，並且站在他們的前列，率先反對他們往日的靠山、領袖或盟友，藉以造成自己新的地位，緩和革命的衝擊力，以及在基本上挽救舊的統治，赫魯曉夫便是此類分裂中來的投機派的代表。如所共見，他將這個角色表演得非常出色。

這裏讓我們看清楚了一個事實，那就是：赫魯曉夫的新修正主義原來代表着兩個對立着的勢力，兩種對立着的思想。他一方面固然像中共所指責，代表着黨內和國內的右派，反映着國內的資產階級影響和國外的帝國主義壓力；但在同時，他也代表着至少是有意取悅着，黨內和國內的左派，反映着工農大眾以及一般知識分子對史大林官僚專制的厭惡與反抗，反映着他們既肯定社會主義，又渴望民主與民權的要求。

蘇聯反史大林運動的雙重意義是必須牢牢記住的。偏執其一面，忽視其另一面，都將犯極嚴重的錯誤。目前，赫魯曉夫一系所執行的路線，特別是它的國際路線，顯然是愈走愈右，但我們還不能完全斷定，說那從左邊產生的壓力已經不起作用了。今後赫魯曉夫們只會與只能和資本帝國主義妥協了。事情顯然還不曾到這個地步，因為蘇聯內部擁護社會主義的勢力，如果就黨內與國內合計，仍舊是大大超過了資產階級影響的。

要反對赫魯曉夫的右傾，顯然不能以「修正主義」的大帽子，一股腦兒套在反史大林運動的頭上。換句中共的慣用語來說，顯然不能「全盤否定」這個運動的。只有堅決站在反史大林主義的立場上，才有資格去反對右邊的修正主義，才有必需的力量去完成這個反對。

中共今天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恰恰符合於史大林生前蘇聯黨內的中派意見。它和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比較起來，是更為反動同時卻又更為革命的。它比左邊的修正主義反動，但比右邊的修正主義革命。

今天的毛澤東思想在許多基本問題上都就是史大林主義，因此，它不願意作任何修正。然則，中共要保持正統的史大林主義，而蘇共卻要對它作或左或右的修正，這從中蘇兩國的革命發展看，應該是個怎麼樣的對比呢？在這裏，如果說是「年青」對「中年」的關係，顯然是不正確的，至少是不恰當的。那末，說它們是「貧窮」對「富裕」的關係又如何？這比較接近真相了。

史大林主義產生於革命的孤立和經濟文化的落後上。它適應着在這樣基礎上勉強建設社會主義的要求。它是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的一個產物。不管蘇聯從二十年後半期起至三十年代的情形，和中國的今

天有着多麼大的差異，但必須「自力更生」，即必須想盡方法，甚至不惜以最野蠻的方法，來榨取資金，藉以建設經濟，鞏固國防，提高生產，卻是一樣的。因此，除非毛澤東能夠跳出一國社會主義的狹隘圈套，能夠認真具有馬、列與托洛次基那種廣闊宏偉的國際主義立場，能夠採取既忠於原則，又合乎實際的政策，以便將世界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這兩大任務，處處聯繫在一起提出，時時聯繫在一起考驗和解決，他才能不走史大林走過的舊路^[6]，否則，不管中共願不願意，它總只能仿效史大林的「個人崇拜」及其全部醜惡制度。

到了五十年代的蘇聯為什麼會發生普遍的「反個人崇拜」的要求呢？諸多原因之中，一個主要的就是，經過二十餘年血淚建設之後，它的工農業，特別是它的工業的生產力大大提高了。它成了世界上第二個大工業國，它已有足夠的富裕，同時也有足夠的安全（史大林一貫是以被侵略的危險來辯護其恐怖統治的），可能讓老百姓鬆一口氣，享受若干民權的奢侈了。

因此在這個意義上，目前的中蘇「分歧」可以說是「一窮二白」對「豐衣足食」的衝突，是一國社會主義建設史上的「原始積累時期」對其積累完成時期的矛盾。如果從政治思想立場看，那末，蘇共今天所代表的是蘇聯黨內與國內原有的左右兩派的混合體，而中共今天所代表的卻是以史大林為主的那個中派。

1964年8月初稿完

注釋

1. 列寧當然不是說，在一切問題上，大民族中的共產主義者要對小民族中的共產主義者讓步，如果這樣，便不成其為列寧了。緊跟着這段文字，列寧說：「無論大俄羅斯共產黨人，或烏克蘭共產黨人或其他民族的共產黨人，對於無產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不容許與資產階級妥協，不容許分散我們在抗拒鄧尼金中的力量等等，這些對一切民族都同樣是基本的和根本的問題上，應當是不讓步的，應當是不調和的。」
2. 我們這裏只指出這個「接種」與「結合」的事實，不批評它的好壞。這個批評，我們在前面談到毛澤東思想的來源與討論文藝政策等章節中做過了。
3. 我們這段話寫於1964年夏天，那時離那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還有兩年。現在，從「文化大革命」的事實來看這段文字，彷彿它已經站不住腳了。其實不然，據我看，「文化大革命」發生的原因，其背景及其意義，正是要從我們所點明出來的情況中去尋找的。只有懂得解放前後，以及中共統治最初十五年內的「文藝復興運動」，才能較深與較正確地了解「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當然與文化的關係極小。它主要是中共內部的一次派系鬥爭——它多少代表着與反映着中國當前的階級鬥爭，也多少代表着與反映着當前國際上各種力量間的鬥爭。

不過從文化的觀點來看「文化大革命」也還自有其意義的。從文化觀點看，首先我們要問的是：過去由中共領導或推動的「文藝復興運動」，是否真如毛林派所說，是「走資派的文藝路線」，是與毛澤東所提倡的「無產階級文藝路線」相對立的？當然不是，事情恰恰相反，它們是在毛澤東的首倡之下進行的，是執行了毛澤東路線的。

1940年，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說：「中國文化應有自己的形式，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義的內容——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新文化。」

1941年，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毛澤東又說：「不論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國史，在許多黨員的心目中還是漆黑一團。許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者也是言必稱希臘，對於自己的祖宗，則對不住，忘記了。」

1942年，在那有名的《講話》中，毛澤東說：「對於中國和外國過去時代所遺留下來的豐富的文學藝術遺產和優良的文學藝術傳統，我們是要繼承的，

但是目的仍然是為了人民大眾。對於過去時代的文藝形式，我們也並不拒絕利用，……」

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又說：「我們必須繼承一切優秀的文學藝術遺產，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東西，作為我們從此時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學藝術原料創造作品時候的借鑑。有這個借鑑和沒有這個借鑑是不同的，這裏有文野之分，粗細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們決不可拒絕繼承和借鑑古人和外國人，哪怕是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東西。」

根據了這樣的認識，毛澤東竭力主張共產黨「宣傳的民族化」，主張「把國際主義的內容和民族形式緊密地結合起來。」（見《反對黨八股》）並且具體地指出：「在藝術工作方面，不但要有話劇，而且要有秦腔和秧歌。不但要有新秦腔、新秧歌，而且要利用舊戲班，利用在秧歌隊總數中佔百分之九十的舊秧歌隊，逐步加以改造。」為此，他又說：「我們的任務是聯合一切可用的舊知識分子，舊藝人，舊醫生，而幫助、感化和改造他們。為了改造，先要團結。」（以上見《文化工作中的統一戰線》）

以上種種，不就是今天歸之於「中國赫魯曉夫」的所謂「走資派的文藝路線」嗎？所謂「民族文化」，所謂「民族形式」，所謂「不要忘記自己的祖宗」，所謂「繼承中國和外國過去時代所遺留下來的豐富的文學藝術遺產和傳統」，所謂創新與改舊並進，所謂「聯合並團結一切可用的舊知識分子，舊藝人，舊醫生」——所有這一切，如果翻譯成今天紅衛兵們的通用語言，不就是「復辟封建文化」，不就是「崇古崇洋」，不就是「牛鬼蛇神」，不就是「招降納叛」，不就是「高捧封建文人與資產階級的學術權威」嗎？

不管怎麼辯說，中國共產黨在反對掉自己黨內的「教條主義」，打倒了黨內「全盤歐化派」之後而興起的那個民族化運動，那個在全國勝利後蓬勃一時的「文藝復興運動」，不論其功過如何，而毛澤東在這中間起了重大作用，終是無可否認的。

那末我們應該怎樣來解釋（自然在嚴格的文化意義上）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呢：這個「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在基本上反對「民族文化」，因而反對「民族主義」呢？

簡單的回答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首先代表着對於一般文化的摧殘。它代表着在國內和黨內重重困難中，毛林派想以個人神化和個人思想絕對化這個辦法去克服難關而實行出來的愚民政策——這是主要意義。另一個遠較

次要的意義是：它代表着毛澤東「民族文化」路線走到了極端的一種反動。民族主義的文化，一切有產階級的過去文化的復興，與中國工農大眾的文化覺醒之間，自然有矛盾。這矛盾必須解決，也應該解決。毛澤東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一個意義上正是反映着這個矛盾的。但因他只是想利用這個矛盾來達到神化自己的目的，來達到打倒異己的目的，以致他所採取的不是他從來所標榜的「推陳出新」的正確而細緻的辦法，而是最粗暴的文化上的虛無主義，最專橫的行政上的官僚主義，以及最可怕的流氓無賴主義。

懷着這樣目的，用了這樣手段而推行的「文化大革命」，自然不可能（事實上也決不曾）解決「民族文化」與工農大眾文化覺醒間所生的種種矛盾，也不可能創造出什麼「無產階級文化」來，相反，它只能造成更多更大的矛盾，同時使無產階級，亦即使一切工農大眾更加遠離文化。原因是：以毛澤東崇拜為絕對框框的「文化」代表着最最狹隘的民族主義的文化，而這樣的「文化」實質上只是任何文化的反面，是地地道道的愚昧主義。——1968年2月注

4. 據某些歐洲共產黨代表後來透露：1960年的會議上是討論過國際聯絡問題的，中共主張建立某種形式的常設機構，但蘇共反對。
5. 跟每一個真正偉大的革命者一樣，列寧也是一個革命的樂觀主義者。同時跟所有的革命樂觀主義者一樣，有時也總不免為「歷史老太婆」所捉弄的。譬如，在第三國際第一次大會上他作的閉幕詞，是以這樣的話來作結的：「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是有保證的。國際蘇維埃共和國的建立已經為期不遠了。」在〈爭取到的和記載下來的東西〉那篇文章中，他在結尾處高叫道：「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的成立是國際蘇聯共和國的前階，是共產主義在國際範圍內勝利的前階。」發表該文的次日，在慶祝共產國際成立大會上，他又以同樣精神，不過以更加肯定的語氣說道：「在這個大廳裏的同志已經看到第一個蘇維埃共和國是怎樣成立的，現在他們又看到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是怎樣成立的，他們也會看到世界蘇維埃聯邦共和國將是怎樣成立的。」

這些宣告，在長遠的展望中，從原則看問題，當然非常正確，至今仍舊正確；但從較短的時距與比較具體的事實來看，那是「過於樂觀」的。

6. 中國目前的經濟建設，是否除了中國所執行的路線之外無他途可循；今天中共的路線是否是一國社會主義；如果現在中共的最高指導者不是毛澤東，而是某些真正馬列主義者，是否能另外一套不同辦法，與史大林——毛澤東辦法根本有別，這些問題，我們在有關社會主義建設的一章裏詳細討論過了。

卷一 托派與中國
卷二 論毛澤東思想
卷三 晚年札記

王凡西的一生著譯甚勤，發表過的作品遍佈中外報刊。作為中國托派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其作品也是中國現代史、中共黨史、中國托派史的重要史料。《王凡西選集》共分三卷——《卷一：托派與中國》、《卷二：論毛澤東思想》、《卷三：晚年札記》，由內地著名學者朱正選編，並補充珍貴史料及注釋，是王凡西最重要的著譯作品首次結集出版。

卷一共分兩部分，分別收錄了《雙山回憶錄》和《毛澤東思想與中蘇關係》兩本重要著作。《雙山回憶錄》可說是中國托派成員中罕有的一本自述，王凡西通過自身加入托派的經歷，記述了中國托派的興衰，令中國托派——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的歷史不致淹沒在歷史洪流中。《毛澤東思想與中蘇關係》則環繞中蘇共衝突的歷史，王凡西從多角度剖析了中蘇共兩黨的微妙關係，一方面展現了蘇共錯綜複雜的黨派鬥爭，同時展現了毛澤東的個人思想在這場外交角力中所發揮的作用。

王凡西一生都是堅定的托派分子。他身在風雲年代，處於風暴的中心。透過本卷，讀者可從另一個視角去了解風起雲湧的中國現代歷史。

根叔一輩子是一個永遠忠於自己理想的革命家，儘管我們後來對世界的看法不一樣了，卻永遠不會影響我對他的敬重。

岑建勳

根叔的著作，為我們畫出多元多彩的中國共產革命，引領讀者往更寬闊的層面思考政治。

成令方 台灣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教授

我也希望，透過這套選集，中文世界年輕一輩的讀者能夠獨立地、批判地重估王凡西、中國托派、世界左翼運動的得失是非，並從中探索社會變革的動力。

萬毓澤 台灣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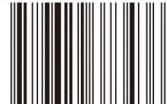
微信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ISBN 978-962-937-343-6



9 789629 373436

Published and Printed in Hong Kong

王凡西選集



卷二
論毛澤東思想

朱正
編



CITYU HK
PRESS

王凡西選集

王凡西選集

卷二 論毛澤東思想

朱正 編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編輯 陳明慧
實習編輯 關喜文（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四年級）
封面設計 蕭慧敏
版面設計 劉偉進  *Création*
排 版 蘇少嫻 城大創意製作

©2018 香港城市大學

本書版權受香港及國際知識版權法例保護。除獲香港城市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媒介或網絡，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數碼化或轉載、播送本書文字或圖表。

國際統一書號：978-962-937-344-3

出 版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香港九龍達之路
香港城市大學
網址：www.cityu.edu.hk/upress
電郵：upress@cityu.edu.hk

©2018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elected Works of WANG Fanxi
Volume 2: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Maoism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s)

ISBN: 978-962-937-344-3

Published by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Tat Chee Avenue
Kowloon, Hong Kong
Website: www.cityu.edu.hk/upress
E-mail: upress@cityu.edu.hk

Printed in Hong Kong

目 錄

卷二說明	vii
序一（岑建勳）	ix
序二（成令方）	xi
序三（萬毓澤）	xiii
編者序	xv
作者簡介	xix
編者簡介	xxi
王凡西部分著譯作品	xxiii

第一部分 毛澤東思想論稿

序言	4
一、寫在前面	9
二、論個人崇拜	14
三、毛澤東思想的來源與組成	46
四、毛澤東思想與「毛澤東思想」	72
五、高明的戰術家	99
六、不高明的戰略家（上篇）	141
七、不高明的戰略家（下篇）	173
八、理論與實踐	210
九、文藝政策與文藝創作	247
十、自力更生與「一國共產主義」	315
十一、歷史地位——論風流人物	382
附錄：我們對於人民公社的認識與態度	400

第二部分 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出版說明 | 450

致友人書——

略論中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幾個方向 | 451

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 466

卷二說明

本卷收王凡西兩種著作：《毛澤東思想論稿》、《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思想論稿》一書據香港信達出版社 1973 年初版本錄入。

《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一書據香港信達出版社 1974 年初版本錄入。

兩書都只改正了錯字，內容沒有改動。

在作者原注之外，編者加了少量注釋。

朱正

序一

岑建勳

應該是由於他其中的一個筆名「連根」的緣故吧，我們年輕一輩都親切地稱呼王凡西為根叔。這大概與他平易近人的性格很有關係，彭述之我們當面稱呼他彭先生或彭老，背後叫老彭，但就算是吳仲賢吧，也是根叔、根叔的稱呼王凡西，不曾叫過老王。

第一次聽到王凡西的名字，是在1972年秋冬，那個時候我和吳仲賢及其他幾個《70年代》雙週刊的成員經常去彭述之、陳碧蘭夫婦巴黎的家裏，請教彭老關於1925-27國共從合作到分家的歷史，這就不可避免地談到當時共產國際以至蘇聯內部史達林和托洛次基之間對於中國革命的分歧，以至中國托派的產生和以後發展的歷史了。自五十年代開始，中國托派組織在香港殘餘下來的人數很少，直至1973年之前也基本上沒有什麼活動，所以當彭老急不及待地述說中國托派內部於1941年由於太平洋戰爭爆發引起的「中日戰爭性質變化」的辯論以至不同派系的產生，我們是完全聽不懂亦無從分辨誰對誰錯的，王凡西代表了與彭不同的意見——而這個分歧顯然三十年之後仍然影響着彭對王的看法，對彭來說，王代表的是一種失敗主義的意見，而彭認為，是這種意見，讓中國托派被魯迅，以至中共打成為漢奸的主要根據。

直至今今天，我也不同意根叔當年關於中日戰爭由於太平洋戰爭爆發而性質上產生了變化的意見，但是無論現在還是當時，我也不曾認同過根叔在托派內部提出的這個討論，是中國托派被誤解為（或刻意地被歪曲為）漢奸的主要根據，我認為是陳其昌魯莽地給魯迅發信，

引致魯迅情緒化的公開回信才是讓中共抓到機會打擊托派的一個缺口（現在中國大陸的抗戰史研究已不再提中國托派是漢奸的說法），彭述之的指摘，是不符合事實和對王凡西不公道的。

73年中我回到香港之後，有一年多的時間我常到澳門與根叔及另外一位被流放到那裏的老同志見面，有陪同來自世界各地的托派同志去拜訪的，也有和一些新加入的年輕同志去徵求意見的，次數頻密到我也數不清了。根叔給我的印象永遠是從容和親切的長者，如果說彭述之的姿態是帶有家長式訓示的話，那麼和根叔的交談就像平輩之間的討論；由於身體的狀態不容許他持續交談太久，我們每次探訪都會限制不超過三數小時。根叔並沒有因為人家說我是「彭述之關門弟子」而心存芥蒂，對當時香港五十出頭的一些「彭門弟子」對他的戒心，他是坦然和不放在心上的，也從來不提過去與彭的紛爭或批評香港同志的消極和不作為，是一個典型的君子學者。

由於英國里茲大學（University of Leeds）中文系一位同志 Gregor Benton 的努力，75年秋根叔終於來了英國。我早一年已經因為厭倦了香港組織內部的派系紛爭脫離了組織生活移居倫敦，但是我們之間的關係並沒有因此而生疏或見外了，根叔欣然答應替我出版的《復醒》月刊寫創刊詞，而十多個圍繞着《復醒》的香港留學小伙子也跟着我根叔、根叔起來，一直到2003年後他離世前，這些長大了的忘年小友（根叔語）還都會有事沒事的老遠開車去 Leeds 探望他，敬愛如故。

根叔一輩子是一個永遠忠於自己理想的革命家，儘管我們後來對世界的看法不一樣了，卻永遠不會影響我對他的敬重，在我們的眼中，他或許表面上是度過了一個孤寂的一生，但我深信，他是活得很充實的。

序二

成令方

台灣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教授

當我 1976 年在英國里茲留學時，得班國瑞（Gregor Benton）的引介，結識當年已經 70 歲的根叔（香港左派年輕人對王凡西的親暱稱呼）。根叔平易近人，讓年輕人一見面就可以沒大沒小天南地北地聊開了。從此，就每星期定期拜訪，成為忘年之交。

在里茲大學圖書館，我閱讀了很多當年台灣的左派禁書和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歷史，後來閱讀了由香港朋友油印出版的《雙山回憶錄》，才開始理解中國共產革命發展過程中曾經出現過的「托洛次基少數派」，也才對這段歷史開始有非官方版的認識。

1949 年中國共產革命成功後，根叔的托派同志們若留在中國，都先後被捕入獄，他因被組織派到香港去工作，就倖免牢獄之災。不久後又被香港政府驅逐出境，轉到澳門在嶺南中學謀一份教職。他在劉醫師的家中租一間房間，一住 20 多年直到 1975 年移居英國里茲。這段期間根叔與立場反共的劉醫師夫婦成為莫逆之交，他們經常聊文學、戲曲、詩詞、電影，還有世界歷史等。但劉醫師夫婦卻不知這位好友竟然是共產黨的托派，而這位王老師每天勤勤肯肯在房間讀書寫作，竟然寫的是革命回憶錄，評論毛澤東思想和文化大革命，檢討中國與蘇聯的關係，討論托派的歷史爭辯與在香港的組織工作。現在要出版的三大冊巨著的前二冊，都是在這段「隱藏身份」「暢談文藝」的情誼中產生的。這讓我們除了敬佩根叔不斷書寫其對革命信念的執着

外，還增添一分他豐富柔情的日常生活的想像。1975年葡萄牙軍隊撤離澳門，劉醫師夫婦移居德國。之後，根叔寄送一本《雙山回憶錄》，他們才恍然大悟，這位老友의 複雜身份。對我而言，他們的關係真是人間奇談。

終其一生，根叔一直在思考討論托派革命的種種議題。這在《晚年札記》一冊中可以看到他思考的軌跡。連1989–1998年的生活日記也都可以看到他持續對話的對象是托派同志和左派知識分子。1995年3月8日，他寫道：「得梁耀忠從香港打來電話，知子春已於今晨逝世。子春死了，我也不會再寫札記了。」子春就是與他多年共度患難定居香港的樓國華（老樓）。自從1949年以來，根叔的作品都由他負責籌錢印刷傳播。住在英國的這20年，老樓則是根叔中文世界的訊息來源。他在香港與《十月評論》的同志經常聯絡，也經常引介年輕的左派到英國拜訪根叔，而根叔則將書寫的作品陸續寄給老樓，由他負責出版。在此要向老樓致敬感謝，謝謝他印出根叔的手稿，為如今根叔中文著作的再現奠下重要的根基。

面對當今全球新自由資本主義的橫行，很多人認為馬克思、恩格斯當年對資本主義的批判還是目前最有力的武器。同樣的，雖然托派思想有其時代的限制，但是托派對史大林官僚主義的批判，多年來還深受歐洲左派的擁抱。雖然中國共產黨在習近平的領導下，看似將成為世界強國，但根叔等托派同志對共產黨的官僚主義與黨內不民主的批判，至今仍然擲地有聲。他們為懷抱左派理想的我們，畫出了民主的共產世界藍圖，讓我們看到共產政黨與民主的必然關連，而根叔的著作，為我們畫出多元多彩的中國共產革命，引領讀者往更寬闊的層面思考政治。

序三

萬毓澤

台灣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對我這一輩一部分受左翼思潮洗禮的人而言，王凡西有不可取代的意義。由於左翼思想在台灣長期缺席，因此，當年許多關心台灣民主前途與社會改革的台灣人，很自然地受到殷海光等人代表的自由主義的影響。我自己也是循着這樣的知識軌跡成長的。但年歲漸長，參與不少社會運動之後，反倒越來越受左翼的思路吸引，並試着理解馬克思主義在台灣、在中國的發展歷程。然而，中共或蘇聯的官方意識形態與歷史書寫始終沒能真的說服我。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因緣際會接觸、瞭解了王凡西等人投入的中國「托派」運動，頓時覺得耳目一新。對當時的我而言，王凡西（乃至國際的整個「托派」傳統）的著作雖然是長期受到壓抑的「小敘事」，卻彷彿開啟了一扇窗，讓我能夠在令人窒息的「國共內戰」的夾縫中重新探索中國現代史、國際共運史，並由此思索台灣與中國、東亞的關係。後來，我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還曾在港台再版了王凡西的《毛澤東思想論稿》，算是為傳播他的思想盡了棉薄之力。

國際「托派」幾乎無窮盡的內部爭論與分裂往往使人喪氣，我也認為，是否堅持「托派」這個標籤，今天也許不再那麼重要了。然而，他們留下的思想遺產仍有豐富的現實意涵。以我目前的學術與政治關懷為例，我最關切的，是如何突破我所謂的「冷戰格局下的鏡像構造」

（表面上水火不容，實際上雙方都需要對方來證成自我，且雙方都接受了某些核心前提，如「社會主義」等同於一黨專政、國家主義和集中式的計畫經濟），而完成真正的「去冷戰」知識工程。這樣的「鏡像構造」並沒有隨着冷戰的終結而消失，而是不斷支配、形塑着許多人的認知架構，從而封閉了政治想像。對我而言，「托派」（或至少一部分托派）代表或參與的社會主義傳統，恰恰是冷戰結構下受壓抑的「由下而上的社會主義」（借用 Hal Draper 的說法）。這樣的社會主義不會不加批判地擁抱深陷民族主義敘事的「大國崛起」，而是始終對國家（主義）戒慎恐懼；它的核心價值不是由少數菁英或政黨來包辦革命事業，而是不忘馬克思強調的「工人階級的解放應該由工人階級自己去爭取」；不會試圖以革命為名強化官僚體制的權力，而是要建立普遍的自治，實現馬克思筆下的「自由人聯合體」。我一直認為，這樣的社會主義傳統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源，讓我們有可能突破僵固的冷戰結構，尋找多重的解放路徑。

Karl Korsch 曾說「社會主義，不論是其目的或手段，都是一場實現自由的鬥爭」。王凡西一生的言行著述都生動體現了這種精神。如今，我們終於見到了《王凡西選集》的問世，讓他的思想得以世世代代流傳下去。我也希望，透過這套選集，中文世界年輕一輩的讀者能夠獨立地、批判地重估王凡西、中國托派、世界左翼運動的得失是非，並從中探索社會變革的動力。是為序。

編者序

這是王凡西著作的第一次結集出版。

王凡西（1907–2002），本名王文元。浙江海寧人。1925年在北京大學求學的時候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他奉黨組織的派遣去蘇聯留學。在這裏他接受了托洛次基的觀點，成為莫斯科中山大學托派秘密組織的一員。1929年8月奉調回國工作。不久即因為托派問題被共產黨開除。1931年5月1日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托派）開統一大會，他被選為統一組織的中央常委，分管黨報工作。不久之後他第一次被捕了。就因為他一直不放棄托派的活動，以後還被捕兩次，直到抗日戰爭爆發，南京失守前夕他才出獄。1949年5月移居香港，不久再遷澳門。1975年3月定居英國，直到去世。

他一生著譯甚勤，稿費是他的生活來源。他留下了大量檔次很高的著譯。像《雙山回憶錄》，就是一本關於中國現代史、中共黨史、中國托派史的重要史料，東方出版社將它收入現代稀見史料書系之中，足見承認了它的價值。他的其他一些作品也都受到學術界的重視。按說，這是一位有資格編印全集的著作家。只是他早年出版的書籍、晚年在海外報刊上發表的文章（更不必說外文作品）都不易收集齊全，至於要收集歷年所寫的大量書信，更不知如何着手。我看要為他編一部嚴格意義的完整的全集是不可能的了。只能就現有的材料給他編一部選集。

要編這一部選集，我應該貢獻一點微力。我想，我也許是國內收藏王先生著譯較多的一人。我所收藏的這些書是哪裏來的？這就說來

話長了。1980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借調我去擔任《魯迅全集》第六卷的工作。孫用先生介紹我認識了樓適夷先生。樓適夷先生又介紹我認識了上海的鄭超麟先生和他的堂弟、香港的樓國華（字子春，筆名一丁）先生。子春先生很熱心，送了许多書給我，其中包括王凡西先生在香港出版的全部譯著。我還記得，為了能夠順利得到這些書籍，是李普先生托新華社香港分社楊奇先生幫我帶過來的。此外樓子春先生還把王先生在香港刊物上發表的好些文章複印寄給我。我挑選了他翻譯的一些作品編為一本小冊子《書信、日記及其他》，於1988年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他對這本小冊子是滿意的。因此他也就有了願意讓我來編輯他的著作的想法。

今年我知道了魏時煜博士在做「北大三人行·中國知識分子三部曲」，其中一人就是王凡西。我就向她建議：趁此機會同時出版他本人的著作。經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社長同意，我就來着手進行編選了。

大家都知道：王先生一直到死，都是一個堅定的托派分子。他對托洛次基的尊崇和信仰，可以說就像宗教信徒那樣的虔誠。我尊敬他的為人和學術成就，卻無法同意他所堅持的托派觀點。我以為在今天已經可以看得很明白：托洛次基主義和史大林主義都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流派，都屬於已經過去的那個時代的了。當年共產國際即史大林對於中國革命的錯誤指揮導致中國大革命的失敗，托洛次基指出史大林的這些錯誤，是有道理的。這也就是吸引陳獨秀等許多人成為托派的原因。六十多年之後，世界已經有了極大的變化，依然認為托洛次基主義是一種指導革命的有用的理論，未免太不切實際。而王先生就正是這樣一種見解。1989年蘇聯和東歐發生巨變，他認為這不但是史大林主義的失敗，而且還是托洛次基主義的勝利！他在這一年

除夕寫的札說：「在此局勢中最使我苦悶的一個現象是：為此變革準備了半個世紀的第四國際，卻未能在此巨變中起任何顯著的作用！我們是應該起很大作用，必須起領導作用的！但願 1990 年開始，第四國際的作用能再大大發揮出來。」他在 1991 年 2 月 13 日寫的札中說：「在史大林主義徹底與普遍崩潰的今天，如果沒有以第四國際為代表的那個思想體系，即是說，如果沒有以真正國際主義和徹底大眾民主相結合的不斷革命理論的思想與實踐，那末，我們真的要看到資本主義不僅在事實上，而且在思想上也全部與徹底地奏凱了。可以說，今後人類仍能對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保持信心，並終於會見到它們的實現者，全靠有第四國際所代表的思想在！」這年 12 月 27 日，也就是蘇聯解體兩天之後，他寫的札說：「史大林主義的制度是根本無法改良的。要代替它，只有兩條路：或者代之以真正工人民主的、國際主義的革命政權——也就是恢復列寧—托洛次基時代的革命政權；或者，恢復資本主義的統治，最後地與徹底地推翻由十月革命所造成的最後殘餘。」到了這個時候，他還在幻想「恢復列寧—托洛次基時代的革命政權」哩。不知道本書的讀者中有沒有一個兩個同意這個意見，反正我是完全不能同意這個意見的。

我注意到了：作者在 1990 年 4 月寫的《雙山回憶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版英譯普及本序》中表示：

今後的世界，無論目前正陷於分崩離析、彷徨覓路的原有的「社會主義」國家，或者表面繁榮而實則充滿矛盾的資本主義國家，要想找到真正出路，是否只有依照托派已有文件中定下的具體方案呢？我不這樣想：人事太複雜，「歷史老人」太狡黠，任何個人或任何團體制訂的方案，總得隨事變的發展而發展。

可見他完全懂得對於未來預測之難。我很欣賞這個見解。

所以我在選編本書的時候，作者寫的那許多討論第四國際綱領的文章，那些托派組織的工作計劃、工作方案之類的文章，就都不收入了。一些關於時事的評論，儘管當時看來寫得很有分量，畢竟時過境遷，也就不收入了。現在收入的都是他最重要的作品，必將傳世的作品。

作者有一部逐日寫成的《晚年札記》，生前沒有發表過。2004年香港新苗出版社少量印製，編號發放，作為紀念。我得到的是第二號這一本，即據以編在卷三第二部分。它真實地記錄了作者最後十幾年的生存狀態和心情，彌足珍貴。

出版社領導體諒我年老力衰，無力擔負許多具體的工作，特地安排了陳明慧小姐同我合作。許多工作（特別是校對）都是她做的。

2017年12月6日 朱正

作者簡介

王凡西 (1907-2002)，本名王文元，浙江海寧縣人，筆名雙山，後輩多稱為「根叔」。中國托派領袖之一，曾任中國國際主義工人黨書記。王凡西 14 歲小學畢業，開始受到五四運動的新思潮影響，決心追求學問，做大事。中學時養成對文學的熱烈愛好，也顯出了演說的才能。1925 年參加響應五卅運動，擔任杭州學生會宣傳部長。1925 年進北京大學後，參加了校內的共產黨組織。1927 年 6 月奉派武漢工作，7 月下旬去蘇聯留學。在蘇聯東方勞動大學期間接受托派思想影響，並秘密加入托派組織。1928 年秋，成為莫斯科中山大學托派秘密組織的領導人之一。1929 年 8 月回國，到上海後任中央組織部幹事，1930 年初，因托派身份被發現被開除出共產黨。



王凡西回國後，起初參加托派「我們的話」組織，後來屬於「十月」派。在四個托派組織商談統一時，王凡西開始和陳獨秀密切合作，

終於促成 1931 年的統一。王凡西當選為統一的托派組織中央委員，並擔任機關報編輯。

中國托派統一不滿一個月，大多數中委就被捕，其中包括王凡西。1931 年，王凡西被國民政府逮捕下獄。1934 年出獄，1935 年底參加新成立的托派中央臨委，創辦《鬥爭》及《火花》。1937 年 5 月再次被國民政府特務機關逮捕押去南京。抗戰開始後出獄，1937 年 12 月中旬到武漢。1938 年 2 月經香港回到上海，繼續參加托派工作。後與鄭超麟創建托派政黨中國國際主義工人黨，任該黨書記。

此後幾年間，王凡西做了大量文字工作，如擔任《動向》月刊編輯，翻譯第四國際的《過渡綱領》和《俄國革命史》等，在上海創辦《新旗》半月刊。他還把所有已經譯成中文的托洛次基論中國革命問題的文章集中起來，經過校訂，編成一冊出版。1949 年 5 月，王凡西由上海遷移到香港，幾個月後被香港政府逮捕並驅逐到澳門。

王凡西在澳門住了 25 年，繼續思考和寫作，著有《雙山回憶錄》和《毛澤東思想論稿》，譯作有《帝王術》、《詩與自傳》、《文學與革命》。1975 年 3 月移居英國，2002 年 12 月 30 日在英國里茲去世，終年 95 歲。

編者簡介

朱正，1931年生於長沙。1949年9月考入李銳先生擔任社長的新湖南報社工作。1956年在樓適夷先生擔任社長的作家出版社出版第一本書《魯迅傳略》。1957年被劃為右派，受到開除公職、勞動教養的處分。1962年解除勞動教養後以體力勞動維持生計，其間在馮雪峰、孫用兩位先生指導下寫有《魯迅回憶錄正誤》，在葉聖陶指導下寫有《魯迅手稿管窺》。1979年平反，1980年借調人民文學出版社參加新版《魯迅全集》的編注工作。其間經樓適夷先生介紹，與上海的鄭超麟和他在香港的堂弟樓子春交往，並從樓子春處得到王凡西的許多著譯。後來回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一度擔任總編輯。其間編輯出版了鄭超麟的詩集《玉尹殘集》、王凡西的翻譯小品集《書信、日記及其他》。1993年寫成一本研究反右派鬥爭的專著，1998年以《1957年的夏季》的書名在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後來用不同的書名幾次在海外出版。每一次都有一些增補和修改，最近的一版是2013年以《反右派鬥爭全史》的書名在台北秀威公司分上下冊出版。此外重要一點的學術著作，有去年在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當代學人精品·朱正卷》，討論此前



出版的《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並涉及《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以及《蘇聯歷史檔案選編》。

在編輯工作方面，為人民文學出版社做的，有1981年版《魯迅全集》第六卷的編輯，2005年版《魯迅全集》編委、第六卷編輯。《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一卷編輯。此外編有聶紺弩的詩集《散宜生詩》，並作注；還替聶紺弩編了回憶文集《腳印》、《高山仰止》，還為李銳編輯了《廬山會議實錄》。期刊方面，現在是《新文學史料》的編委。

王凡西部分著譯作品

著作

書名	署名	出版者	出版年份
炮火中的世界動向	鳳崗	上海：華盛頓印刷出版 公司發行館	1939
電影漫談	雙山	香港：世界出版社	1956
《過渡綱領》二十年	王凡西	—	1958
思想問題	三山	香港	1962
三齣小戲	雙山	香港：周記行	1968
我們的意見	雙山、一丁合著	香港	1970
七零年代往何處去？第一、四 篇	耕莘	上海：春燕出版社	1972
毛澤東思想與中蘇關係	三原	香港：信達出版社	1972
論中國第三次革命中斯大林 派勝利與托派失敗的原因—— 兼答彭述之夫婦	王凡西	—	1973
毛澤東思想論稿	雙山	香港：信達出版社	1973
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雙山	香港：信達出版社	1974
雙山回憶錄	王凡西	香港：周記行	1977
印支問題	雙山	香港：信達出版社	1979
謊言與真實	王凡西、鄭超麟、 樓國華合著	香港：信達出版社	1984

譯作

書名	署名	出版者	出版年份
從唯心論到唯物論	王凡西譯 普列漢諾夫著	上海：亞東圖書館	1936
蘇聯黨獄之真相	張家駒編譯	上海：亞東圖書館	1937
恩格斯評傳	李書勳譯	上海：亞東圖書館	1940
兒子・戰士・朋友	李書勳譯 托洛茨基著	上海：亞東圖書館	1940
中國革命問題	克全編校 托洛次基著	上海：春燕出版社	1947
史大林與中國革命	雙山譯 托洛次基著	香港：國際出版社	1947
俄國革命史	王凡西、 鄭超麟合譯 托洛次基著	上海：春燕出版社	1964
帝王術	雙山譯 馬嘉維里著	香港：信達出版社	1969
詩與自傳	雙山譯 耶夫土欣可著	香港：信達出版社	1970
文學與革命	惠泉譯 托洛次基著	香港：信達出版社	1971
他們的道德與我們的道德	李書勳譯 托洛次基著	香港：信達出版社	1975
托洛次基致中國同志的信	雙山譯 托洛次基著	香港：信達出版社	1981
第四國際基本文獻新一輯 〈蘇維埃國家的階級性〉 及〈戰爭與第四國際 (綱領草案)〉	雙山編校 托洛次基著	十月書店	1983

卷二 論毛澤東思想

毛澤東思想論稿

雙山著

信達出版社印行

第一部分 毛澤東思想論稿

序言

- 一、寫在前面
 - 二、論個人崇拜
 - 三、毛澤東思想的來源與組成
 - 四、毛澤東思想與「毛澤東思想」
 - 五、高明的戰術家
 - 六、不高明的戰略家（上篇）
 - 七、不高明的戰略家（下篇）
 - 八、理論與實踐
 - 九、文藝政策與文藝創作
 - 十、自力更生與「一國共產主義」
 - 十一、歷史地位——論風流人物
- 附錄：我們對於人民公社的認識與態度

序 言

本書取名《論稿》。顧名思義，可知它不是普通那種章節分明、體裁劃一、組織謹嚴、前後密切呼應、從任何角度說來都已經是完備的一部著作。

一年前，當本書有關毛澤東思想與中蘇關係的四章以「三原」筆名先行出版時，我曾經說過，這整部作品只是一個相當大的企圖，企圖對毛澤東思想作一種全面的、客觀的與「歷史的研究」。這樣說既非自謙，亦非自負。它確是一種鄭重與虛心的研究，但確實還只能說是企圖罷了。所以然者，第一因為作者體力關係，疾病時常打斷工作，一擱往往歷數月或半年之久。因此，這本中等長度的書，自從1961年1月動手，直到1964年8月方才寫完，前後耗時共三年有七個月。如此寫法，要想作品在體制上如何統一，文字上如何完美，在敘述上絕無重出，那是很難做到的。第二，因為作者被迫居住在一個閉塞的地方，材料搜集困難，參考書不易充分獲得，以致有些問題或某些事實，不得不因此而撇開不談，或暫不討論。有此限制，當然會影響作品的全面性與完備性的。

由於自己對作品的上述不滿，稿子雖然寫成了將近十年，始終任它放置，不曾作出版打算，事實上當然也沒有出版的可能。

去年秋，經友人慫恿，並得信達出版社協助，終於先將有關中蘇衝突的四章出版了。我的一部分稿子，以此總算和比較廣大的讀者結了緣。結果，經出版者與銷售者的反映，倒不如預料之壞，這本小書似乎還能獲得某些讀者的歡迎。有些人看了該書序文，知道除此四章外尚有十數章未曾付印，他們竟向出版人或經售者提出要求，催促出版，希望儘早看到全稿。更有些熱心朋友，竟付款預定，俾助印刷所需。

這樣的熱情深深地感動着我。它讓我體會到了一件事：一個作品，只要作者是鄭重其事的，本着科學良心的，不懷有別種用心的，真想說些同時只想說些自己確認為真理的東西的，那末，縱然它在體裁上鬆些，結構上散些，或文字上差些，都會有真心的讀者歡喜，甚至還真會有人賞識。這個體會驅散了我多年深陷的孤獨感，它讓我知道了世間尚有同道在——決心將餘稿全部付印了。

不過，這部稿子寫成迄今，畢竟已經八年多了。是否應該根據八年多來新發生的史實，將全稿重新校訂或補充一下呢？懷着這樣的目的，我最近將全稿重讀一遍，卻發現這樣做是既無可能，亦非必要。無可能，因為一髮動全身，牽涉太廣，改不勝改；非必要，因為本書寫作的最初計劃就是學術性的，就是從問題的根本着眼的，八年來新的史實只能證實我們的基本論斷，毋須乎用新的史實來修改我們對根本問題的看法。

因此，本書便完全照八年前寫完時候的原樣出版了。

從本書完稿到目前付印這段時間內，發生了許多有關毛澤東與毛澤東思想的大事。其中最大的一件，自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它是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是毛澤東思想的精彩表現之一。按理，《論稿》中應該為此添一專論，或至少在已有文字中增加一些有關此事的評論。可是一因本書作者對「文化大革命」已另有專文，文字太長，不備用作本書附錄；二因在既有文字中增添特殊段落或冗長注釋，將使《論稿》更加龐雜，令人無法卒讀，所以我都不曾這樣做。

其實，我們雖然不特別討論「文化大革命」，本書中所曾討論的有關毛澤東思想的種種方面，尤其關於毛澤東在文藝、經濟以及「人民公社」方面的思想，已經頗足以幫助讀者們去了解「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來龍去脈了。甚至可以這樣說，只當人們弄清楚像我們所指出的毛澤東思想的諸般特徵之後，才能正確地了解這個「大革命」，才能了解它發生的原因，它所採取的形式，它所經歷的過程，以及它的趨向與它的全盤意義。

在這裏，我們自然不能具體地說明毛澤東思想與「文化大革命」在各個方面的關係。不過抽象地，我們卻立即可以指出來：毛澤東性格上與思想上的優點與缺點，長處與短處，時而相輔相成，時而此長彼消，它們交互錯綜着，迭為雄長地，像幽靈一般飄盪在整個運動之上，或者像靈魂一般作用於全部運動之中。試想想，如果不是想實行「一國共產主義」，如何能在國內造成如此深刻與眾多的矛盾？如果不是毛氏的「經濟的浪漫主義」想一步登天，如何能造成長達三年的「特大災害」？如果沒有造成這些災害性的錯誤，黨領導又怎能落入「走資派」之手？失權之後，如果沒有敢作敢為、乾坤一擲的氣概，誰又能做出如此規模的「革命大彩排」？等到「彩排」變成正戲，「欽定造反」

又轉變為真正革命之勢的時候，始則用槍桿子「平亂」，繼而以黨的名義制軍，如此經營，如果不是策略聖手，權術大師，又怎能運用得如此得心應手？同時，如果不是斥原則為教條，以理論為幌子的人，又如何能這樣忽左忽右，出爾反爾？……諸如此類的問題，還可以提出一大串的。

當然，我們絕不以為「文化大革命」乃「毛澤東思想」所一手造成，也不以為「毛澤東思想」的特徵便可解釋「文化大革命」的一切。我們決不會這樣想，因為這種想法是唯心主義的，是「英雄史觀」的；它與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無共通之點。個人，無論多麼重要與偉大的個人，其作用總是有限度的。對於一般的中國革命，或對於特殊的「文化大革命」，毛澤東與毛澤東思想無疑都起過作用，都發生了影響，都留下了記印。但很顯然，這些作用、影響和印記，縱然十分巨大深刻，卻決不能說是決定性的，更不能說是獨一無二的。歸根結蒂，客觀的條件總決定着主觀的意圖，歷史和社會的「形勢」，總強於任何偉大人物的計謀。因此，在整個的中國革命中，特別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誰要想拿毛澤東的性格和思想來說明其中的許多問題，無論解釋其有利於革命的方面或指出其為害於革命的方面，都必須牢牢保住着一個限度，必須時時記住「存在決定思想」那個命題，必須時時懂得從中國與全世界的種種特殊情形和關係，去觀看毛澤東思想中此一或彼一見解的正確和謬誤。只有站穩在這個立場上，我們才能反過來，正確地將某一或某些毛澤東思想去解釋中國革命，特別是去解釋這次「文化大革命」的現象與性質。

在全部《論稿》中，作者自信還能始終保持這樣一個立場的，因而我相信它不但能幫助讀者們拿這樣的毛澤東思想去了解過去，而且能憑以解釋今日一切與毛澤東有關的事變。

稿子寫成，曾經請不少朋友閱讀過，他們大多給我提出了一些寶貴意見：或者指出引文上的錯誤，或者糾正事實上的出入，亦有在看法上表示異見提出來與作者商酌的。凡此種種，都會有助於本書的寫成，我謹在此對所有這些朋友表示謝意。

1972年12月7日雙山序

一、寫在前面

毛澤東其人及其思想，在過去三十年的中國政治史上發生了巨大影響，目前，正在對中國乃至世界的政治發生着巨大影響，將來，那個影響還一定會繼續的。這樣的人物，這樣的思想，值得人們之精詳研究，自不待言。

中共把研究毛澤東思想當作一個「最主要的政治任務」提出來。與《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的出版相配合，一個轟轟烈烈的學習運動更掀起在全黨全民之中。對於這樣的任務和運動，我們該作怎樣的看法？如果我們認為毛氏的生平及其思想值得精詳研究，那末對於中共的這個研究運動是否贊同與擁護呢？

研究毛澤東思想與中共大張旗鼓提倡着的毛澤東思想研究運動，根本不是一回事。前者應該是科學性的，而後者則完全是政策性的。如實地、科學地研究毛澤東其人及其思想是一回事，懷着神化目的，以建立「永不錯誤」的權威為目的，因而材料經過選擇，甚至經過改竄，研究被納入一定軌轍，討論必須在「領導」之下，這樣的研究學習，乃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我們主張前一種研究，反對後一種研究。如實地，科學地研究毛澤東及其思想，不但能確定歷史的真相，

能使人從事變的發展中得出規律，從而得出教訓，並且能使這樣的規律和教訓，應用於其他國家中，特別是落後的殖民地國家中，使那些國家中的工農大眾，也能夠取得革命勝利。如實地、科學地研究毛澤東及其思想，不但能使一些掩蓋在狹隘派別利益的宣傳下面的真相得以恢復，使三十餘年來有關中國革命的各派思想，特別是史大林與托洛次基二人所代表的思想，獲得公平的證驗，並且據我們看來，毛澤東思想的真正歷史地位，反而會因此有所提高，不會因之而降低，因為「始終正確」的「神」沒有生命，而有錯有對，特別是錯得比人少對得比人多多的「人」，卻是有偉大生命的。可惜，今天中共（其實是毛澤東自己）所發動的那種思想研究，其目的顯然不是要確立毛澤東這個人的整個內容及其成長過程，而是要把這個人變成神，要把一個有生命有血肉的人和思想，變成為無生命無血肉的神和神話。

中共不諱言毛澤東思想的研究運動是一個政治任務。不過他們沒有把這個政治任務的真實內容說出來，他們不敢說這是要確立和鞏固廣大群眾對於毛澤東的一尊的崇拜。這樣一個任務，在我們看來是反動的。

我們反對以「造神」為目的的毛澤東思想研究，卻要做信實的、科學的與歷史性的毛澤東思想研究。不過着手做這樣研究之時，我們卻遇到了幾乎難以克服的困難，那就是：需要材料太多，而作者今日所處的環境卻難於接觸到所有必需的材料；少數能夠獲致的材料，又都是經過化妝手術的，難於知道其中保存着多少真面目。研究毛澤東思想的主要材料自然是毛氏本人的著作，可是我們所能得到的卻只有精選過的四冊，而這些選出來的文章，「其中有些在文字方面着者曾作了一些技術性的修改（見1951年版《毛澤東選集》的出版說明），「也

有個別的文章曾作了一些內容的補充和修改」（見1953年版《選集》的出版說明）。究竟怎樣才算是「技術性」的？「補充」了什麼？作了怎樣的「修改」？選集中完全不給標準，也根本不曾注明。因此，當閱讀毛澤東的著作時候，我們就無法知道究竟哪一些是事先預見，哪一些是「過後方知」。不能確切知道這一些，就大大妨礙了我們研究工作中想要做到的「信實的」、「科學的」與「歷史的」這些個守則，因此在我們書中的某些判斷，有時只能採取保留式的，假定性的態度。

毛澤東為什麼只出選集而不出全集，據出版委員會的聲明，乃「由於國民黨反動派對於革命文獻的毀滅，由於在長期戰爭中革命文獻的散失」，以致「現在還不能夠找到毛澤東同志的全部著作」。上述無疑是一個理由，但決不是主要理由。毛澤東不學列寧以及蘇聯其他領袖的樣。不出版全集而出版選集，其最主要理由我以為是：實踐重於理論、策略重於原則的毛澤東，前後文章中有的矛盾和不一貫的地方，今日之我常與昨日之我為敵的；同時過去當作手段而採取的許多對國民黨蔣介石的卑恭詞令、態度和立場，在今日勝利後看起來是太礙眼了，特別在年輕一輩革命者的眼中，這些文字會大大損害他們對毛澤東的偶像崇拜。為要建立「一貫正確」與「永遠正確」的神話起見，這樣的選擇便被認作是必要的了。

不用說，這種動機和辦法都是非常不好的。即使不是為了歷史的真實，而是為了教育年輕的革命者，也是非常不對的。因為正確的事例固然可以教育人，而不正確的事例（只要如實地指出其改變經過），卻具有更大的教育價值呢。人不能從神的奇蹟中獲取經驗，卻能從人的事蹟中學習教訓。可惜一切中了個人崇拜毒的政治家，一切為個人崇拜所支配了的制度，總是不明白這個最淺近的道理。

一個作家，當他將自己的作品彙編出版時，是否可以選擇？是否可以補充和修改？這，首先得看是什麼性質的作家，得看是什麼性質的作品。如果是文學或科學的作家，如果那些作品與人與事無關，也不帶有爭論性質，那末，作者自然有充分選擇與修訂補充的自由。甚至還應該這樣做，以便精益求精，力圖以最完美，最正確的形式和內容跟讀者們相見。可是，政治家的政論文章，有關於歷史事變，具有了歷史的文獻意義，更或牽涉到與別人的論爭，已構成了關於是非曲直的相當定案的，那就不應該作任何事後修正。即使是技術性的修改，也應該以注解方式出之，或修改後附以未修改的原文。作者們這樣做，並非為了什麼道德教條之故，而是對歷史的忠實，對思想的負責。這個態度，每一個認真的政治思想家（甚至是科學思想家）都必須具備的。否則便談不上什麼「科學的良心」，談不上光明磊落的責任心。史大林對於社會主義的革命事業犯了無數罪惡，其中最重大者之一便是偽造歷史，偽造文獻，竄改和虛構他本人和他論敵們的文字。我們在這裏絕無意說毛澤東在這方面已犯了與史大林同樣大的罪惡，我們只是指出這種「選」和「改」的辦法不是承襲自馬克思列寧，而是仿效史大林的。毛澤東在這條岔路上走得還不很遠，是否尚有可能「回過頭來」呢？（其實他儘可不學史大林，因為他對中國革命無論實踐與理論上都確有成就，有貢獻，不像史大林必須靠十足的偽造才能有自己的一份革命史的。）

在這方面，有兩個典型例子應該舉出來，讓我們——正確些說，是讓毛澤東——學習的：

1、馬克思、恩格斯對《共產黨宣言》的態度。大家知道，這個宣言寫成於1847年，二十五年以後，即在1872年，馬、恩二人給德文新版合寫了一篇序文，說道：宣言中某些次要段落已經過時了，「但因

宣言是一個歷史文件，所以我們認為自己已無權加以更改。」（這一聲明，後來恩格斯又寫入 1888 年的英文版序言上。）

2、恩格斯對於《反杜林論》的態度。《反杜林論》一書的寫成，直接動機雖然為了反駁杜林，但主要卻是發揮恩格斯他自己的和馬克思的見解，這樣的書，作者當再版時原本有修改補充的完全權利與自由。但當第二版付印時，恩格斯在其序文上還是這樣說：「現在的新版，除一章以外都是照樣翻印第一版的。一方面，雖然我自己很想修改好些地方的敘述，可是我沒有時間來做徹底的修訂。……此外，我的良心也不許我對本文作任何變動。這書是部論戰性的著作，我以為論敵既然已不能修改什麼，那我對論敵也負有責任不作任何修改。」

毛澤東的著作，除了極少數像詩詞之類以外，今天當然都已經是政治性的歷史文件，其中大多又都帶有論戰性質。然則，他對原文是否有「權」修改？他的「良心」與「責任」應該要他如何處理自己作品的出版？觀乎上述的兩個例子，答案是自明的了。

二、論個人崇拜

時勢造英雄呢，還是英雄造時勢？天定勝人呢，還是人定勝天？這兩個說法不同而意義實等的命題，一直在中國思想家的頭腦中聚訟，卻不曾得到過十分完滿的、因而可說是正確的解答。自來有些思想家傾向於那兩問題的前半截，有些則比較着重於問題的後半截。傾向前半截的就不免要強調客觀，強調氣運，強調天命；而着重後半截的當然要看重主觀，看重努力，看重人事。第一種說法是宿命的，但多少包含了一些客觀的與唯物的成分；後一說法是積極而能動的，但大多陷於純粹的主觀與唯心。

由上述兩種歷史觀所得出來的一個相當普遍的，本質上正確的倫理學的命題，那就是：「盡人事以待天命」，「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以及所謂「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這種態度雖不曾根本解決了「時勢與英雄」，「天和人」的關係，但至少已經道出了二者之間的主從關係與相互關係。中國古代的思想家不能徹底解決這個問題毫不足怪。中國的社會長期停頓於落後的小農經濟與商業資本經濟，生產力停滯不前，以致那個所謂「時勢」與「天定」究竟是什麼東西？它們如何發生作用？如何造成與決定着「英雄」和「人」？那是無法獲得清楚正確的認識的。人類歷史只有發展到工業資本主義時期，由它造成的較

為簡單與赤裸的階級關係，才算有了足夠條件，讓思想家們清楚地發見並確定那隱藏在歷史發展後面的「時勢」、「氣運」與「天」。

只有發現了歷史唯物論法則的馬克思派，才終於對時勢與英雄的關係問題給了滿意答覆。只有馬克思的辯證的而非機械的唯物論，才能在重客觀與重物質原因的歷史中，排斥了消極的宿命論，給人的主觀努力找到了適當地位。只有這樣，才算最後解決了歷史發展上人與物、主觀與客觀、英雄與群眾之間的迷人關係。

馬克思本人在這方面做過極高明的應用，他在那本有名的《拿破崙第三政變記》中，一方面反對了雨果代表的「唯人史觀」，另一方面排斥了以蒲魯東為代表的「唯物史觀」。在該書的德文第一版序言中，說過這樣的話：

雨果只是對政變事件負責發動人作了一些辛辣的和諷刺的詈罵。事件本身在他筆下卻竟繪成了晴天霹靂。他認為這個事變只是一個人的暴力行為。他沒有覺察到，當他說這個人表現過世界歷史上空前強大的個人主動作用時，他就不是輕蔑而是抬舉了這個人哩。蒲魯東呢，他想要把政變描述成為先前歷史發展的結果；但是他對於政變所作的歷史的說明，卻不知不覺地變成對於政變主人公所作的歷史辯解了。這樣，蒲魯東就陷於我們那班所謂客觀的歷史家所犯的錯誤。反之，我們所作的論述是說明法國的階級鬥爭怎樣創造了一些條件和形勢，使得一個平凡而可笑的人物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馬克思在《政變記》的正文裏，恰恰就是從法國當時的階級鬥爭所創造的、特殊的社會條件與形勢，說明了拿破崙第三這個「平凡而可笑的」人物如何變成了英雄，同時，他又指出了：正是因為這個渺

小而非偉大的人物性格，投合了當時的反動情勢的需要，以致更能相得益彰，做成許多骯髒的反動勾當。馬克思這兒是以「時勢」為主，「英雄」為輔，指出了二者的關係，因而正確地解釋了那段歷史的「來龍去脈」，前因後果。

將馬克思的此一見解，用更簡單明瞭的字句規定下來的，據我所知，在後繼的馬克思主義者中，要算普列哈諾夫了。在他所寫的〈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一文中，有如下的一段：

……一個偉大人物之所以偉大，並不因為他個人的特性給了偉大的歷史事變以個別的特徵，而是因為他賦有那種特性使他最能夠為他那時代的偉大的社會需要服務，至於這些需求之所以發生，乃是一般原因與特殊原因的結果。卡萊爾在其《論英雄與英雄崇拜》的名著中，稱偉人為開始者。這是一個很適當的稱呼。一個偉人恰好是一個開始者，因為他比別人見得深遠些，期望事物比別人更強烈些，他解決那些社會心智發展的以往過程所提出來的科學問題；他指出那些由社會關係的以往發展所造成的新的社會要求，他主動地創議去滿足這些要求。他是一個英雄。但他不是這樣意義中的英雄，即他不能夠停止或改變事物的自然過程；他是這樣意義中的英雄，即他的活動乃是那不可避免的與無意識的過程之自覺的與自由的表現。這是他的全部意義之所在；這是他的整個力量之所在。但這意義是非常巨大的，其力量又是可怕的。

普列哈諾夫這兒給偉人或英雄所下的定義，同樣也解釋了像拿破崙第三那樣的貌似偉大而其實渺小的歷史人物。因為，真偉人與真英雄既然是能自覺滿足新的社會要求的人，那末另一些人，他們自覺

地滿足舊的社會要求，他們努力替某一時代中成為反動的社會要求服務，只由於階級鬥爭的特定形勢，將這樣人物暫時捧到了社會之巔，捧成為英雄偉人，——這些人，按照上述普列哈諾夫的定義，當然是既非英雄，亦不偉大。

歷史上是充滿了這等正反英雄的。而且在不少大人物身上，會同時具有正反兩種性質。只當我們牢牢把握住馬克思主義對歷史人物的上述看法，才不致「認賊作父」或「誣良為奸」；才能還英雄以英雄本色，讓民賊們無所遁形，因而給「問題人物」以正確的評價。

在我們論述毛澤東這個人物及其思想之前，稍稍回顧一下馬克思主義者對英雄人物的正確看法，不是沒有理由的。因為近二三十年來，正是在馬克思主義者中間，發生了對於英雄人物的不正確的態度。在共產黨中發生了非常荒謬的個人崇拜。這種風氣無論從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哲學或政治經濟的學說中，都找不出任何足以辯解的藉口，因而是根本違反馬克思主義的。個人崇拜這風氣開始醞釀於二十年代之初，形成於它的末期，形成於蘇共黨中，以史大林為中心。最初它之出現是為了迎合黨內鬥爭的需要——要在整整一輩代的老布爾雪維克中定出「一尊」來。這個「一尊」之需要，乃是跟着列寧之病與死而發生的。列寧原是俄國社會民主黨多數派的天然領袖。他之獲得此一地位，並非他費盡心機謀取的結果，而是因他的出類拔萃的才智，精深淵博的學識，以及他對無產階級革命的無比忠誠，對共產主義事業的最出色的服務，極其自然地造成的。如果換句我們上面引過的普列哈諾夫的話來說，那便是：因為列寧「比別人見得深遠些，期望事物比別人更強烈些。他解決那些由社會心智發展的以往過程所提出來的科學問題；他指出那些由社會關係的以往發展所造成的新的社會要求；他主動地創議去滿足這些要求」，因此他自然而然成了英雄，

成了領袖。因為在事實上，在實際鬥爭中，而不僅在紙面上，不僅在文字中，列寧確實證明出他比當時俄國，甚至比全國際中，任何一個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者，具有更充分完美的「最能夠為他那時代的偉大的社會需要服務的種種特性」，所以他的領袖地位可以說是天生的，「命定的」，無可與爭的。也因此，只要「時代的社會需要」這個客觀情勢不變，沒有一個老布爾雪維克會妄想與列寧爭奪這個地位。就算出來爭奪，也決沒有幸勝機會。

列寧本人深深意識到自己的力量。所以和歷史上一切真正的偉大的英雄一樣，他最看不起個人崇拜。他正好像卡萊爾所稱讚的克倫威爾一樣，最討厭「那些庸人俗子」，這些人「拼命誇耀自己，硬要別人承認他的天賦」，並且「拼命要人看在上帝面上，承認他是偉人，讓他出人頭地。」卡萊爾說：「這樣的傢伙是人世間最可憐的光景之一。」「我勸你避開這種人。他不能在僻靜的小徑上行走；除非是萬人矚目，為人驚羨，報刊上常有文章恭維他，否則他是活不下去的。」「真正的大人物絕不會希罕這些勞什子」，「鍍金的馬車，繁文褥禮，一切勢派……去你們的吧，我身中已經有太多的生命。」（以上均見卡萊爾《英雄與英雄崇拜》第六講）

自覺到「有太多生命」在身的列寧，無論在外表與內心都極度樸質、極度誠實、極度謙虛。不但是那深入「靈魂」的共產主義的思想和感情要他樸質、誠實與謙虛，而且因他具有真正偉大人物的多方面的特性，使他無法兼有那些浮誇、權謀與虛驕等渺小的性格。首先，因為這些渺小性格對他簡直是毫不需要的。認真富有的人，怎會喜歡鍍金的，即使是真金的小裝飾呢？在這一點上，精神的富有者與物質的富有者有多少相同之處。列寧的領袖地位不爭自在，他毋須爭，也不怕爭。他充分讓他的同輩們和他競爭——在才智上、學問上、能力

上、工作上和他競爭。他歡迎這樣的爭，因為真理愈爭愈明，同時爭的結果，十次倒有九次的真理屬於他的方面；至於真理如果屬於對手方面呢，那末他就乾脆認錯、改過。這真所謂如日月之蝕，「其過也，人皆見之，其更也，人皆仰之」，一時之晦，反而愈顯其明。所以列寧時代的黨內爭論，不管是非誰屬，卻從不影響爭論者的領導地位，更不曾隨之以組織的或行政的處分。至於因此而獲罪，並為之付出自由或生命的代價，那簡直是出乎最狂妄的人們狂想之外。因此，十月革命以前在黨內，革命以後則在國內外，列寧雖然享有了最高權威，但蘇聯以及所有共產黨中，都沒有個人崇拜。他自己不愛這種崇拜，不許發生這種崇拜。別人也就不會、抑且不敢拿這種淺薄惡俗的行為來損污對列寧的真誠崇敬。

列寧死了，一個不可爭衡的權威沒有了。論才識功績，托洛次基原該是最合理的繼承人。自從十月革命以來，托洛次基在各個方面表現出來的智慧、能力、功勳，甚至個人的文采氣度，都遠遠地高出於其他老布爾雪維克之上，而與列寧齊肩。在某些場合，特別在廣大群眾的心目中，他竟致超越了列寧哩。像這樣的一個「得力助手」，當主帥病廢或死亡後出來代替他的地位，本是順理成章的事。列寧病中，特別當他發見了黨政機關中嚴重的官僚化危機，並發見了史大林的專橫不忠之後，便決心要將托洛次基來填補他留下的空缺。不幸的是：在列寧下了這個決心之後才兩個月，犯了第二次中風，於是只好讓史大林拉攏了加明尼夫與齊諾維也夫，以「老布爾雪維克」，「列寧忠實弟子」的名義，組成「三頭領導」，以此排斥和打擊托洛次基。他們敢於這樣做，那是利用了托洛次基的一項「弱點」，便是：在十月革命以前，托洛次基曾經與列寧作過許多次理論爭執，而且組織上並不屬於布爾雪維克派。但雖如此，史大林們的此一企圖並非輕易能夠成功，

更無成功把握的。主要原因是：托洛次基在具備革命領袖的諸特性這一方面，實在超過史大林們太遠了；而他憑這些特性在群眾中所已取得威望，也比「三頭」大得無可比擬。那末，史大林怎麼辦呢？接受託洛坎基作列寧的繼承人嗎？當然不甘。（這裏是有主觀和客觀原因的。）如何才能戰勝這個顯然佔優勢的政敵呢？首先當然得破壞他在群眾中巨大的聲望。如何破壞呢？齊諾維也夫與史大林便先後發明瞭「個人崇拜」這個法寶。他們的第一步是把列寧所享有的無上民望轉變成宗教式的崇拜。將列寧這個人變成了神，當列寧未死而事實上已不能顧問一切之時，齊諾維也夫與史大林就發明了「列寧主義」，以此和另一個發明所謂「托洛次基主義」對立起來。等到列寧一死，史大林們就乾脆將列寧變成共產主義的摩罕默德，將他放在水晶棺材裏，安置在與列寧精神絕不相侔的「陵墓」中，就此「以死的列寧來反對活的列寧和托洛次基」（托氏語）。這個陰謀，得到了其他有利於此陰謀的其他條件的配合，大家知道是達到了目的的。因為在列寧身上進行了全套「個人崇拜」手術以後，他成了全知全能、永不犯錯的絕對真理之化身，成了上帝，成了基督，那末那個長期間做過他爭論對手的托洛次基，便不言而喻地、自動地成為不知不能，永遠錯誤的絕對荒謬的化身，是撒旦，是魔鬼了。而一向追隨列寧，從未對列寧說過一個「不」字的史大林、齊諾維也夫之流，自然成了彼得與保羅，托洛次基則不用說是法利賽人或猶大了。

一九二〇年代初期「個人崇拜」發生於蘇聯共產黨之中，其政治原因便在於此。

但自1925年起，特別是從1927年托洛次基等左派反對派在組織上被完全擊敗以後，「個人崇拜」的內容及其實施方向便不同了。最初的内容是造成對列寧的崇拜來打擊托洛次基，後來，一俟托洛次基

被放逐以後，個人崇拜的機器便轉向了史大林，竭其全力來神化史大林，藉以反對整輩老布爾雪維克（連齊諾維也夫在內），反對無產階級黨的民主，反對俄國及全世界的社會主義革命。史大林這個卑鄙罪惡的計謀，如歷史所曾昭示我們，也是成功了的。當然，其所以成功，主要是獲得了有利於此陰謀的其他客觀條件的配合。本來，史大林這個人，誠如赫魯曉夫在蘇共第二十次大會秘密會議上所作的演說中所說，「出席這次黨代表大會的人，在 1924 年之前，有百分之九十九對他是很少聽到或認識的。」其實在蘇聯的廣大群眾中，當時可說是百分之百不知有史大林這個人的存在。然則，如何能在短短的、不足十年的期間，一個默默無聞的人變成為空前未有的暴君與神？究竟是怎樣的歷史條件使這一簡直是不可能的手術成為可能，而且成為現實？企圖解答這個問題的人很多。不過在我看來，其中解答得最扼要與最正確的乃是此一「崇拜」手術的主要受害者——托洛次基。他認為史大林這個陰險的庸人所以會做成上帝一般的「最偉大的天才」，歸根結蒂是由於兩大客觀原因：（1）蘇聯在經濟文化的落後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2）二十年代中期起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遭受不斷失敗，以致使那唯一的工人國家長期間處於極度孤立之中，受着資本帝國主義的包圍與壓力。這兩個歷史社會性的客觀條件究竟如何幫助了史大林的篡奪陰謀，如何幫助了他的民族社會主義與官僚共產主義的思想，如何使他這樣的一個人物恰恰代表了由上述條件所促成的蘇聯群眾的情緒與願望：這些問題，托洛次基在他所有的著作中，曾經再三再四地給過精詳深刻與令人信服的分所，我這裏不予重複了。這裏，我想提出來討論的，是被某些人認為關於「個人崇拜」之「更為根本」的理由。他們認為史大林「個人崇拜」的理由應該從人性深處去找；或者，他們說：任何暴力革命，由於其本身的規律使然，結局一定是「個人崇拜」；又有人說：史大林的個人崇拜，事實上不過是列寧關於共產黨和

革命職業家的見解的實施，所以不管好壞，史大林的所行所為，都該由列寧負責。因為這三種說法是更一般地、雖非真正更根本地、觸及了史大林的、亦即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問題，所以我們願意詳為討論。如果「個人崇拜」確實發生於人性深處，如果群眾暴力革命的發展規律最終必然造成個人崇拜，如果列寧關於黨及革命領導的見解確實是個人崇拜的思想根源，那末不但史大林在這方面的一切作為都屬「合理」，是必需，因而是現實的，而且今天毛澤東所刻意製造的那種崇拜儀式，也都是如此。同時，以托洛次基為代表的反對此種崇拜的種種努力，便成為虛幻的、反歷史要求的、以及不現實的了。如果史大林與毛澤東們的「個人崇拜」合乎「人性」，順乎革命歷史的規律，又導源於列寧思想，那末，一切社會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的反官僚主義的鬥爭都將是違反人性，違反歷史與列寧遺教的反動行為了。非此即彼，彼是即此非。因之這幾個問題，我們一定要首先弄明白。

崇拜據說是人類的天性。這說法似非毫無根據。從歷史上看，人類最初震懾於一切自然界的力，然後又困惑於社會的諸般災難。以個體的人來說，實在是太渺小了，因此他不得不處處感到畏懼，時時覺得恐怖，這種畏懼和恐怖，從來驅使他去尋求一種保護，向天，向神，向帝王，向領袖，去尋找一種免於威脅的安全。他們從那些地方去尋求並獲得了虛幻的或真實的保護與安全，這就發生了崇拜。這可以說是人類崇拜這個「天性」的主要的（雖然不是唯一的）根源。這也就是說，人的崇拜主要乃起於恐懼。當然，我們在人與人之間，時時會看到欽佩、愛慕、敬仰等等高貴感情，構成了相互間崇拜的基礎和原因。這不用說也是事實。光是令人畏懼，絕不能贏取心悅誠服的崇拜。但是單憑心悅誠服的愛慕，卻同樣不可能造成一種群眾性的具有巨大力量的崇拜，人群的結合，固然由於諸種因素，但最主要與最

基本的，卻終究是「利」而非「義」。只有在利害共同的基礎上，才能建立起鞏固與長遠的感情關係。共同利益決定了共同的情誼。因此，一個偉大的藝術家、詩人、或思想家，可能為廣大群眾所敬愛，所崇拜，但他們自身不可能因此成為群眾的領袖，更不可能形成一種對內具有強制力對外具有排他性的崇拜制度。可是那些宗教家、政治家和軍事家就不同了，他們可能各各具有令人敬愛的品德，但他們卻並非因此才成為領袖的，他們之所以為廣大群眾所擁護，所崇拜，主要乃因為他們代表着群眾（自然只是一部分）的利益，他們有能力保護群眾的利益，或者在不崇拜的情形中能損害群眾的利益。（最後一種情形乃是領袖崇拜制度最堅固與最現實的基礎。）「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從來被指責為暴君口吻，但若我們從事情的本質看，這個「順昌逆亡」的抉擇，卻是任何一種統治、任何一個領袖制度得以建立的基礎。當然，領袖不是懸空存在，更不是受命於天的，他首先得「順」着群眾中一部分人的利益才能興起，不過興起之後，特別是當他已形成為一個有組織的群眾勢力的象徵之後，事情便表現為群眾對他的「順昌逆亡」了。由於群眾的趨昌避亡，便產生了自動的或被動的領袖崇拜。

可見領袖崇拜決不能從人的天性中尋找原因。它們植根於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諸關係中。怎樣的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便會有怎樣的統治與被統治關係；有怎樣的領袖和群眾關係，便會有怎樣的領袖崇拜制度。一般說，社會的階級衝突愈緩和，社會的生產力愈發達，一般人的文化教育程度愈提高，則領袖的地位愈降低，它愈不會高超於社會之上，群眾對領袖的崇拜愈少，以致根本建立不起「個人崇拜」的制度來。在這方面，古希臘偉大的傳記家普魯塔克說過一句極有意思的話，他說：「強大的民族對自己的大人物忘恩負義。」這句話，非常扼要地道出了我們上面用許多文字來說明的那個道理，如

果我們用淺顯明白的話來翻譯一下，那是說：人民對於其領袖的崇拜，是和他們的自覺和自為程度成反比例的。邱吉爾於領導了英國贏取第二次大戰之後，讓自己的人民一腳踢下了台，於是在其回憶錄中感慨繫之地引取了那位古希臘人的名言。我們對英國戰時首相的牢騷毋須寄以同情；因為邱吉爾的政治命運，至少在相當程度內，反映了英國人民不低的政治水平。我們對這個牢騷發生了一些興趣，只因為它替我們很好地說明了「領袖崇拜」的根源在於社會歷史方面，並不在於什麼人性方面。

現在讓我們來研究第二個問題。

是否任何一個暴力革命，由於其內在規律之故，都必然要歸結到個人崇拜呢？這問題，我們上面多次引述過的英國唯心史家卡萊爾，也有過一段非常有趣的議論，茲節引如下：

我們晚近的許多英雄，其行為都像是革命者，但雖如此，我們可否說一個大人物，每一個真正的人物，都天性上是「秩序」的兒子，而非「無秩序」的兒子？真誠的人在革命中工作是處於悲劇性地位的。他看來像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而其實，一種痛苦的無政府的成分使他在每一步上受累——因為他的整個靈魂是仇視、痛恨無政府的。他的使命是要保持秩序，每個人的使命都是如此的。他在其中的任務是要將無秩序的、混亂的事物變成有管理的、有規則的。……一個木匠找到了粗糙的樹幹，他加以砍伐，使成方圓，以便適合於某種目的和用處……

人事亦然，最瘋狂的法國「短褲黨主義」，也必須向秩序前進。我說，每一個人，在瘋狂的深處猖獗，同時卻無時無刻不被迫向秩序。人的生命本身需要如此；無秩序即是瓦解，即是死

亡。沒有一種混亂不尋找一個中心來打轉的。當人還是人的時候，某一個克倫威爾或拿破崙乃是「短褲黨主義」的必然終結。（見上引書第六章）

在卡萊爾的這段話裏，也好像在他別的議論中一樣，把一些半真理揉雜在糊塗的見解之中，近代的英雄們都是革命人物，這點他看到了。「其天性上都是秩序的兒子」，「其任務是要將無秩序的混亂的事物變成有管理的有規則的」，這點就看得糊塗了。每一個革命都要造成「混亂」，即要破壞舊的秩序，同時任何革命都不會無限期地混亂，即不能無休止地破壞，它必須造成秩序。這是事實，也可以說是事理。但那由「混亂」造成出來的秩序，並非一樣性質的秩序。它可能是一種新秩序的創建，亦可能是舊秩序的復辟。前一秩序與後一秩序，用人類歷史進步的標準來衡量，顯然不具有同一意義；而促成此一秩序的領袖和促成彼一秩序的領袖，當然也不能等量齊觀。可是卡萊爾、和所有唯心主義的歷史家一樣，把這兩種秩序與領袖不加分別，他在克倫威爾與拿破崙之間加上了等號，這就是大錯特錯了。卡萊爾犯這種錯誤是不足為奇的，因為他觀察歷史不是從階級鬥爭的立場出發，而是從抽象道德的原則，從「混亂」和「秩序」那樣的表面現象，從「真」和「偽」那樣空洞的概念出發。所以他雖然知道克倫威爾是比拿破崙更偉大的英雄，但他在兩者間加以軒輊的理由是很薄弱的：只是說前者比後者更「誠實些」，他不知道從人類歷史進步的標準看，克倫威爾誠然是個大英雄，而拿破崙則根本配不上這個名稱。因為前者建立了革命的專政，而後者的獨裁則不過是法國革命反動潮流的登峰造極。就性質論，二者根本不能同日而語。

「沒有一個混亂不尋找一個中心來打轉的」。說得很對，也說得很好。古今中外的革命，不管它是臨時促發的或事先準備的，只要它

持續相當時候，發展得多少有點深度，就不得不在一個中心左右「打轉」。群眾革命運動本身的規律與要求，都需要、並且都一定能夠尋找出一個中心，即湧現出與鍛煉成一個領導核心，其中又造成核心的核心，亦即領袖或如卡萊爾等之所謂英雄。如果不這樣的話，那些革命者始終不過是烏合之眾，他們無法前進、堅持，更談不到成功。因此，當卡萊爾說：「某一克倫威爾或拿破崙乃是短褲黨主義的必然結果」時，他確實是看到了歷史的一個必然現象，即看到了群眾革命後必然要造成專政。可惜的是卡萊爾不能將這個現象從表面看入內心，以致他不能看出表面上看來都是個人獨裁的兩種政制，清教徒的一種卻代表着「短褲黨主義」的堅持與部分實現，而那位科西嘉大皇帝的出頭，則宣佈了正牌「短褲黨主義」的最後埋葬。不區別獨裁英雄們所代表的歷史意義與社會實質，而僅僅指出了革命必然以獨裁作結這個現象，那是錯誤的。再若以此現象為論據，進而反對一切革命運動，當然是十足反動的了。

一切鄭重其事的革命都要趨向於國家政權的移轉，一切具有較深的社會意義的革命，又都必然要利用這個新政權，藉以改變舊的階級關係和財產關係。要完成這種改變，自非實行革命專政不可。所以革命專政與革命分不開。不企圖建立革命專政的革命，那意思只是說：這是一個虛偽浮淺的革命，或者那革命已被叛賣了。在此意義上，凡是真正的革命者，或深刻的歷史家，都必須承認：「一切暴力的群眾革命」都曾經、而且都將以革命專政的建立為歸趨。

然而，這樣的認識，我以為並不等於承認任何暴力革命的結局都是「個人崇拜」。個人崇拜與確認領袖需要不是一回事，這，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了。革命專政往往表現為革命領袖的獨裁，這是事實。但獨裁的領袖，只要他是革命的，尤其其他若是由平民革命或勞動人民革

命湧現出來的，多數不會無意中，更不會有意地去給自己造成「個人崇拜」。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說，圍繞於革命領袖的「個人崇拜」的儀式，與該領袖本身所具有的革命特質，以及由他所體現着的某一特定時期的革命的進退，發生密切關係。某一革命領袖的革命特質愈多，他所代表的社會利益或階級利益愈處在革命的進潮中，則他就愈不需要「個人崇拜」；反之，如果一個領袖本身具有的革命氣質愈少，他所代表的愈是革命的退潮或其反動，則他就愈來愈多的需要「個人崇拜」。這個「定理」，也和上述所謂凡革命必趨於專政同樣，是歷史的真實。可惜一切唯心的與反動的歷史家們從來都只看見專政這個真實，卻看不見革命專政不能有與不會有「個人崇拜」這個真實。

由此可知，說一切暴力的革命都不可避免地要造成個人崇拜，並不確實。

那末列寧可是「個人崇拜」的理論上辯護人與發明者呢？他是否該替史大林的此一醜惡制度負責？先讓我們看看列寧在這方面最受人攻擊的一段話吧。在《做什麼？》中，列寧寫道：

且拿德國人來講吧。他們的組織包括有群眾，一切事情都是由群眾發動起來，工人運動已經學會了自動行走，——我想你們一定不會否定這點吧？可是，這百萬群眾又是怎樣善於重視自己「十來個」有鍛煉的政治領袖，怎樣堅決擁護這些領袖呵！在國會中往往聽到敵黨議員譏諷社會黨人說：「好漂亮的民主主義者！你們只是口頭上空講工人階級運動，實際上上台說話的總是這一班頭領。一年又一年，十年又十年，還是這個伯伯爾，還是這個李卜克內西。你們的那些好像是從工人中間選舉出來的議員，真是比皇帝任命的官吏還難得調換些哩！」這是企圖把「群眾」和「頭領」

對立起來，想激發群眾的劣根性和虛榮心，想以群眾破壞對於「十來個聰明人」的信仰來奪取運動的隱固性和堅強性，——但德國人對於這種蠱惑人心的企圖，卻只是加以鄙笑而已。德國人底政治思想發展程度和政治經驗已足使他們懂得：在現代社會內，若無「十來個」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卻不是成百成千地產生出來的），久經鍛煉，擁有專門訓練，受過長期教育而聲應氣投的領袖，無論哪個階級都無法進行堅強的鬥爭。（見《列寧文選》兩卷集中譯本，282-283頁，外國文書籍出版局，1949年版。）

上引的列寧文字，簡單扼要地說明了關於無產階級革命黨的如下幾點組織思想——（1）必須有革命職業家（「十來個」富有天才，有專門訓練，受過長期教育而聲應氣投的領袖）；（2）沒有這樣的領袖，無論哪一階級都無法進行堅強的鬥爭；（3）為使革命運動具有穩固性和堅強性，不能破壞群眾對領袖的信仰；（4）在現代社會內，天才人物都不是成千成百地產生的。列寧這樣的思想，自然會給那些自命為天才的野心家所利用，「流弊」當然在所不免。如果說史大林的官僚獨裁，他的個人崇拜，曾經從這個思想裏獲得辯解，亦無不可。但問題的中心顯然不在於流弊或利用。問題的中心在於：列寧的此種見解，是否為現代的革命鬥爭所絕對必需？其中所指出的一些事理，是否是客觀存在的最無情的現實？列寧一生，最痛恨譁眾取寵，最不喜蠱惑人心，從來不願以違心之言去滿足群眾的落後性與虛榮心。在現代社會裏，天才不是成千成百產生的；無產階級想掙脫自己的枷鎖不是一件輕易的事，他們必須要從本階級或別階級中培養出少數革命專家來，使他們領導鬥爭；對這些領袖，必須予以信任，才能使革命運動獲得穩固性與堅強性。這樣的話，聽起來好像是老生常談，「並不深刻」；但若你能將這一個見解，與那必須團聚群眾的事實與否定一

切權威的革命家氣概聯結起來想想，那你就會知道，沒有最大智慧、最精觀察，特別是面對真實的最大勇氣，就無法說出（甚至想都不敢想）這種老生常談的。正因為列寧兼具了這樣的大智、大慧、大勇，他才能給歷史上空前的為人類徹底解放與真正民主而鬥爭的無產階級革命黨，定下了「貴族式」的、「英雄主義的」、集權的與「獨裁的」組織原則。正是這樣的原則造成了布爾雪維克黨，正是這個黨幹出了人類史上第一次勝利的工農革命，正是這次革命締造了歷史上第一個工人國家。這些個事實，難道還不夠證明列寧的「領袖學說」為現代革命鬥爭所絕對需要，證明它是唯一符合客觀真實的要求嗎？既然如此，那末它縱能發生「流弊」，縱然可以為野心家所利用，也就決不能有損於它整體上的正確性與必需性。何況那些所謂流弊與利用，又絕非為其本質所命定，不是在任何條件下一定要產生，而絕無防止之法呢？

列寧的組織思想，乃是現代條件中無產階級革命得以成功的唯一辦法，這是首先應該肯定的。從它那裏可以蛻化出新官僚主義；野心領袖利用了它可以造成「個人崇拜」；這都是事實。但我們不能因此否定列寧思想的價值，正猶之乎人們不能因噎廢食一樣。同時，我們相信，列寧也如此相信，只要社會主義的革命繼續前進，不斷向深處與廣處發展，則上面所說的流弊不會發生，而且任何野心的領袖都不可能利用它來造成「個人崇拜」。本世紀初，列寧傾向於領袖集權的組織思想，到了二十年代末期以後竟會醜化成史大林荒謬絕倫的「個人崇拜」，每一個唯物主義的歷史學家，都會從世界革命相繼失敗、社會主義被迫局限於落後的俄國範圍內這個事實來解釋的。如果1919年以後的世界歷史不像實際所發生的，而是相反，它符合於當時革命者的最佳願望，十月革命點燃起全世界的革命之火，而且這個革命在大多

數國家中獲得成功，那末，我們可以確信，蘇聯不會經歷史大林主義的醜惡時期，不會有史大林主義，甚至史大林也不會成為最高領袖，更不會是唯一領袖。這就很明白了，那個保證了布爾雪維克勝利的列寧關於「領袖集權」的組織觀念，決不是史大林個人崇拜制度的必然前提。前者絕不能為後者負責。只要客觀的歷史條件有利於那種崇拜制度的形成，沒有任何可資利用的思想，它無論如何都可以自己發明的。何況，列寧關於黨和國家的整個組織觀念，決不能以上引一段文字所能概括的呢。

列寧的思想永遠是具體的，他的頭腦裏沒有空洞的真理，沒有浮泛的範疇。《做什麼？》一書寫於1902年，當時，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尚未處於嚴格意義的組織狀態中。（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成立於1898年，才開完會即全體被捕；第二次大會召開於1903年。）那時的各個社會民主主義的小組織，不僅政治立場無一致意見，就是關於全國黨的組織方針，也是眾說紛紜。所以列寧在《做什麼？》一書的序文中說：此時充滿了「構成俄國社會民主運動史上整個時期特點的離散狀態與動搖現象」。列寧認為：「我們若不能徹底結束這個時期，便不能前進。」（以上引文均見《兩卷集》中譯本上冊，179頁。）【朱正按 見於《列寧選集》1972年版，第一卷，第222-223頁：「那種構成俄國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史上一個整個時期的特點的混亂和動搖；所以我們同《工人事業》雜誌進行的初看起來似乎是過分詳細的論戰也是有意義的，因為徹底結束這個時期，我們就不能前進。」】為此，他寫下了《做什麼？》。為了針對那種「離散狀態與動搖現象」，他提出了我們引述過的那個「領袖集權」的組織思想。列寧從來不射無的之矢。我們要了解列寧，首先不能將「的」和「矢」分開來。一分開就

會斷章取義，而斷章取義地利用列寧，恰恰是史大林叛變列寧、打擊托洛次基以及其他列寧戰友時所應用的主要戰術。

倘若不僅從一事一時的意見，而且從整體全面的立場，來看列寧對黨和國家的組織態度、看他對領袖和群眾，對領導與被領導之間的關係的看法，那末我們應該說：列寧並非傾向於「領袖集權」的。愈到後來，特別當革命已經成功，工人階級建立了自己的國家，布爾雪維克黨成了執政黨以後，列寧針對了新「的」所射出的新「矢」，就愈發「偏向於」群眾民主。這個方面的文字證據是太多了，以致不勝舉，也不必舉。整部《國家與革命》主要就是講求如何打破官僚制度，如何防止其再發生，如何逐步地，但是徹底地消滅一切人對人的壓迫，實現普遍的真正民主。等到國內戰爭結束，俄國被迫暫時在一國之內建設其新制度之時，列寧的全部精神，全部病中時間，可以說是用以反對黨和國家內的官僚化的，其主要的攻擊目標是史大林，因為正是他代表了官僚傾向，亦即代表了日後獲得荒唐發展的「個人崇拜」制度。由此可見，不論就思想或行為說，列寧非但不是史大林個人崇拜制度的「始作俑者」，而且是它的反對者。人們將個人崇拜溯源到列寧的革命職業家理論或其他關於領導或集中的見解，徒然暴露他們的愚昧無知，或蓄意誣讎罷了。

至此，我們總算說明了「個人崇拜」的根源並非生長在人性深處，說明了暴力革命的本身並沒有這樣一個規律，其結果一定要造成「個人崇拜」；說明了頗具威望的領袖，雖然是革命成功的主要條件之一，但領袖的存在並不等於「領袖崇拜」，更不等於「個人崇拜」，而「個人崇拜」之出現恰恰反映了革命之被背叛，至少反映了革命經歷着反動的危機；最後，我們又比較詳細地說明了列寧無論在哪一方面，都

不能替史大林的「個人崇拜」受過或負責。這樣的說明給了我們根據，使我們能夠一方面堅持社會主義革命與共產主義革命，堅持這種革命的進行必須在一群領袖們的領導之下，堅持這種革命在必要時應不惜採取暴力手段，但同時我們能夠而且應該反對「領袖崇拜」，更反對「個人崇拜」，反對種種式式的官僚主義，更反對其中最一貫、最兇惡與最有理論掩護的史大林主義。

毛澤東思想在大多數基本問題上都就是史大林主義，在個人崇拜問題上尤其如此。至於個人崇拜制度所已達到的程度，則毛澤東與史大林之間實已相去不遠。這個情形，在所有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者看來原極自然：他們以為這是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任何共產主義者都應該期待着個人崇拜，更不該反對個人崇拜；如要反對個人崇拜，則請自反對共產主義及其暴力革命始。這套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理論，我們在上面剛剛批判過了，這裏不必重複。總之，我們是有理由堅持共產主義的革命，同樣有理由反對個人崇拜這個醜惡制度的。依據上面我們的分析，關於領袖崇拜，我們已經有了如下幾個認識：（1）一個社會，或一個國家，那裏的經濟文化愈落後，或階級鬥爭愈尖銳，則政治領袖的重要性愈大，其地位愈高，個人崇拜制度愈易建立和鞏固，反之亦然；（2）革命正當上升和發展時候，革命及其領袖直接地與密切地反映和代表着廣大群眾的利益，因而獲得了巨大的尊敬和威望，此時無需乎而且也不可能為領袖們（更不必說為某一個個別領袖）建立起崇拜的儀式或制度；但當革命的發展陷於停頓，受到挫折，或由於革命勢力的內外原因而發生反動之時，那末與那些最革命的領袖遭受打擊與摧殘同時，一些較軟弱、較保守、較妥協與較卑鄙的領袖或領袖們，便必須為自己建立領袖崇拜或個人崇拜的制度，以便在「革命權威」的掩護之下進行反動或反革命的實質；（3）一個革命領袖，

或甚至一般的政治領袖，其才智能力愈強，精神視野愈廣，對事業的忠誠愈堅，為人類歷史服務的抱負愈大，則愈不會喜愛淺薄無聊的阿諛，愈不能容忍脅肩諂笑的恭維，愈不肯讓人活生生地埋葬在「生祠」與紀念碑裏，讓虛偽和反動的力量拿去作傀儡，藉以完成愈來愈骯髒的勾當。這條「規律」，也適用於相反情形的。

根據上述「規律」，我們可以解釋列寧——托洛次基時代的沒有領袖崇拜，也可以解釋史大林個人崇拜的興起。但是，它們彷彿不足以解釋毛澤東崇拜的建立。因為首先人們會向我們提出這樣的反駁：你們儘可以不同意中共所實行的許多政策，但你們總不能不承認中共直到今天為止，一直在推進着中國革命；其次，人們會提醒我們，毛澤東這個革命領袖，雖然在種種方面都不曾達到列寧、托洛次基那樣的規模，但至少和史大林比起來，無論才智能力、或胸襟抱負，都高出多多；最後，人們還會指出這個事實：毛澤東是中國革命勝利的直接組織者，而史大林則是俄國革命政權的繼承者（事實上是它的篡奪者與叛賣者）。因此，照我們的假想的辯難者的意思，如果照我們上面的說法，毛澤東是不應該喜愛領袖崇拜的，也不需要建立個人崇拜。因此，依他們之見，這情形或者證明了我們關於領袖崇拜的解釋錯了，也就是說，證明資產階級的唯心論的看法對了；或者，它證明我們對毛澤東的批評錯了，即他根本不曾建立什麼領袖崇拜。

要證明毛澤東的領袖崇拜思想不難。中國今日早已建立了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而且拼命在鞏固着這個制度，這都是無須證明的事實。但人們可以從毛澤東的說話或文字中，找出大量叫人謙虛，力戒驕傲的段落。他們還可以找到同樣多的證據，證明毛澤東看重群眾，堅持群眾路線。這些段落，這些告誡，無疑也是事實，我們不會去抹煞的，非但不加抹煞，而且我們願意承認，毛澤東的此種言論和態

度，都出於真誠。但是，這並不能證明毛澤東沒有領袖崇拜思想，而且是極為強烈的領袖崇拜思想。力勸幹部「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是一回事，如何設法鞏固自己的領袖地位則屬另一回事。它們不是互相衝突，而是相輔相成的。認真想成事的領袖都懂：「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幹部才是好幹部，有了這樣的好幹部才能保證自己事業的成功。因此，力戒部下驕恣的領袖，其本人不一定是毫不驕滿的偉大領袖；那些渺小的、自私的、極不謙虛的領袖，只要他認真希望自己的事業有些成就，只要他不被多少成功沖昏頭腦，只要他始終對事理能保持若干清醒，那末，他決不肯讓自己的部下驕橫跋扈。但這並不妨礙他自己驕橫起來，而且，有時正為的要使屬下謹慎，正為的要使他們不敢驕橫，於是特意建立一個非常驕橫的領袖崇拜制度。如此，他一方面希望維持整個統治機器的工作效力，另一方面藉以確定一尊，使任何幹部不敢生「取而代之」的非份之想。所以任何領袖，任何獨裁者都同時作着「謙虛」的說教。甚至愈專橫的君主，此種說教作的愈多。基督教最講究「謙卑」，但是古往今來最不謙卑的統治者中，羅馬教皇是要算上一個的。史大林這個人，今天連他最直接的弟子們都不能不稱他為個人崇拜的獨裁者了，然而最會叫人謙虛的正是他。列寧死後，他曾經借了這個死去的領袖的名義，號召人們要「謙遜」、「不驕矜」、並且要「確信群眾」。（見史氏《論列寧》的演說）自此以後，直到他死去，總不斷重複這個說教，反對幹部們的驕躁自滿。然而所有這些說教，從積極方面說，其作用只想做個人獨裁制度下必然形成的官僚制度的解毒劑（事實上解不了毒）；從消極方面說，則想做那同一醜惡制度的掩飾物。因此，毛澤東的滿口謙虛，決不能憑以斷定毛澤東沒有領袖崇拜思想，更不足以否定中共業已建立毛澤東崇拜制度這個事實。

1949年3月13日，毛澤東在中共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所作的結論中，據說說過如下一段話：

……力戒驕傲。這對領導者是一個原則問題，也是保持團結的一個重要條件。就是沒有犯過大錯誤，而且工作有了很大成績的人，也不要驕傲。禁止給黨的領導者祝壽，禁止用黨的領導者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業的名字，保持堅苦奮鬥作風，制止歌功頌德現象。^[1]

這段話的意思當然非常好。所以當蘇共第二十次大會之後，中共為要證明它從來反對個人崇拜，從來沒有這個制度起見，上面這段話曾被到處徵引。不過事情很顯然，這段漂亮的言詞始終只是言詞，事實上從未被遵守過，因此，中共想拿它證明中國並無個人崇拜，卻是落了空的。不錯，中國迄今還不曾出現過用黨領袖名字來命名的城市、街道和企業，但祝壽風氣卻曾盛行於延安時代。記得當年朱德和徐特立等，都曾鋪張揚厲地做過生日。今天雖然不做了，但這完全不能表示中共已放棄了個人崇拜，因為祝壽也罷，將城、街、企業取上自己名字也罷，雖然其本身也具有甚大的象徵意義，人們可憑以看出官僚制度所到達的程度，但畢竟屬於表面現象。官僚制度（個人崇拜即是此一制度的一端）的建立和鞏固，可以有那些現象，也可以沒有那些現象；而對黨國大領袖的無上崇拜，更不一定要出之於祝壽和「私有城市與產業」。今天，中共沒有給毛主席大做生日，中國也還不曾出現什麼毛澤東「格勒」；但誰能否認，對於毛澤東個人的歌功頌德，中共已做得比當年蘇聯的史大林崇拜不相上下了呢？有些地方，甚至前者還超越了後者的。1937年前，當史大林崇拜初步完成之時，俄國那位有名的小說家阿萊克舍·托爾斯泰寫過如下一首傳誦一時的詩：

你，各民族光明的太陽，
我們這時代的不落的太陽，
你比太陽更偉大，因為太陽沒有智慧……

另外還有一位較不出名的詩人，寫過一首更妙的詩如下：

我們從史大林那裏獲得太陽，
我們從史大林那裏獲得繁榮的生活……
縱然是風雪遍地的北極苔原上的好生活，
我們也是跟他，
跟智者史大林，——一起創造的。

這些「詩」，曾經被托洛次基稱之為「豬糞叫」的，不是也充塞於中共的報章刊物上嗎？那首最出名的，託名為「陝北民歌」的《東方紅》，難道不只是「豬糞叫」中調換一個名字嗎？同樣是「太陽」，同樣是「智者」，同樣是「繁榮美好生活」的創造者或賜予者，同樣是那些毫無分寸、不加思索、因而是肉麻難堪的最高級形容詞。如果這個樣子還不算是「歌功頌德」，那真不知要怎樣才算是「歌德派」作品哩！

我們說，在有些地方，毛澤東崇拜還超過了史大林崇拜。是哪些地方呢？在史大林，即使當他最狂妄的時候，也還不得不自居於列寧之下。「列寧之子」，「列寧的學生」，「列寧事業的忠誠繼承人」，充其量，也不過是「列寧最親密的戰友」或「十月革命之共同領導者」而已。史大林不能，或不曾超列寧而上之。但在毛澤東，卻沒有這種權威上的委屈感，沒有這種歷史繼承上的負擔，他可以集最初及最高於一身，事實上他已做到了。所以毛澤東比之於史大林，彷彿具有更加理直氣壯的自大，更加心安理得的自信。這一點，我們從中共第七次

全代會通過的黨綱中，可以最清楚地看出來。總綱的第二節一開頭就說：

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反對任何教條主義或經驗主義的偏向……

這樣的條文，在社會主義的與共產主義的運動史上是空前的。憑我們寡陋的見聞來說，一個革命的工人階級政黨，將某一在生當權的領袖的思想規定在政綱中，宣佈為「一切工作的指針」，在歷史上未曾有過。即使在史大林個人崇拜登峰造極的蘇共第十七、十八、十九三次大會上，都不曾通過黨綱，規定「史大林思想」為一切黨工作的指針與基礎。在這裏，毛澤東確乎是出於藍而勝於藍了。這個事實所表示出的領袖崇拜程度，比那些「歌德派」的所謂「民謠」，那些生日，那些地名路名要嚴重得多的。什麼是「毛澤東思想」呢？定義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之統一」；但這樣說是極其空洞的。它唯一的具體解釋是：毛澤東的一切思想都代表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的統一，再具體一點，那意思只是說：毛澤東這個人，其所言所行，都代表了這個「統一」；凡違反了毛澤東的意思，或任何人的言行表示若干與毛澤東的看法不同之處，便是犯了「偏向」。這個標準不但用以概述過去，而且用以拘索未來。如此，這規定實際上是授與毛澤東個人以「永不錯誤」的特權，給了他以「絕對真理」的榮光，以此樹立了政治思想上的最高無上的個人崇拜。

毛澤東為什麼要造成這種個人崇拜？如何造成了它？這些問題，等我們到適當的地方詳談。這裏我們先行提及它，只為的證明毛澤東

在領袖崇拜制度的建立上，其熱忱與史大林不相上下，有時抑且過之這個事實罷了。

1956年9月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大會通過的新黨章，我們上面引述過的文字被修改如下：

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自己行動的指南。只有馬克思列寧主義才正確地說明了社會發展的規律……

這裏刪去了「毛澤東思想」。此事是否表示毛澤東本人突然謙虛起來，或黨內民主因革命勝利而抬頭，所以那個充分代表個人崇拜的、史無前例的規定竟致刪掉了？當然不是。唯一重大的原因，只是在此半年以前，蘇共黨舉行了第二十次大會，會議上反對了史大林的「個人崇拜」。所以這是在一種壓力之下的讓步，是國際史大林主義運動內部鬥爭的一個微妙的標誌。與毛澤東的領袖崇拜思想毫無關係。（毛氏在反史大林個人崇拜問題上的態度，我們也將在合適的地方詳談。）

在這裏，我們想進一步研究的，乃是下面兩個問題：（1）毛澤東領袖思想的主觀因素；（2）形成中共個人崇拜制度的客觀原因。

在《整頓黨的作風》一文中，毛澤東曾經用如下簡短的話，敘述了他的學習經過：「我幼年沒有進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校，學的是『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一套，這種學習的內容雖然舊了，但對我也好，因為我識字便是從這裏學來的。」（見選集，820頁。）接在「子曰詩云」這個階段之後，便是他在長沙的學習時期。在此時期中，毛澤東建立了他學問和思想的基礎。這個建立過程是從兩個方面完成的。一方面，在他的老師楊昌濟影響之下，研讀以儒家的倫理思想為中心的中國傳統哲學，特別是宋明理學；另一方面，他肆意閱

讀了十八九世紀英法資產階級學者關於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經典著作。這樣，毛澤東同時兼修着中國的舊學和當時的所謂「新學」。不過很顯然，給毛澤東的學問思想乃至他為人處世之道打下基礎的，主要是舊學而非新學，是中國儒家思想中最正統的一派（宋明理學直至王船山、譚嗣同），而非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學說。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寫道：「自從 1840 年鴉片戰爭失敗那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洪秀全、康有為、嚴復和孫中山，代表了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時求進步的中國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麼書也看。向日本、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派遣留學生之多，達到了驚人的程度。國內廢科舉，興學校，好像雨後春筍，努力學習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時期，學的也是這些東西。這些是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文化，即所謂新學，包括那時的社會學說和自然科學，和中國封建主義的文化即所謂舊學是對立的。」這當然是事實。但它並不改變毛澤東「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基本精神。毛澤東「學這些東西」，增加了知識，改變了思想，但它們顯然沒有走進血液，更不曾深入「靈魂」。所謂精神，所謂血液，所謂靈魂，我們知道不能單靠讀幾本書來造成，也不能憑此而改變的。知識固然可以對它們發生影響，但它們主要的促成者與影響者，卻總是整個民族的歷史文化，是吾人（特別在幼年）所處社會的物質環境，是當吾人意識思想形成時期所接觸的人和事，是吾人在趣味上和知識上所遇合的最初戀人。從這些方面說來，長沙這個「半封建的」官僚政治的中心，這個中南諸省，甚至包括西南整個地區的地主經濟與商業資本經濟的重要樞紐，這個溝通南北的要道，這個頑固與維新均趨極端的思想戰場，這個宋明以來即成為理學堡壘之一的古城，乃是青年毛澤東的精神土壤；而那個滲入了西方唯心哲學的「板倉先生」的新理學，特別是他那種正誠修齊，躬行實踐的態

度；以及司馬光的通鑑、韓愈的文章，施耐庵、羅貫中的小說，蘇東坡與辛棄疾的詩詞，形成了毛澤東精神的血液和靈魂。這些東西潛進到這個農家青年的意識深處，建立了思想或精神的基礎之基礎，使他終生受用不盡。此後，毛澤東無論在思想或學問上當然繼續增加，最初是英法資產階級民主派的；以後便是馬克思主義派的。但後兩者比起前面的基礎來，顯然是浮淺的，不過是架在上面的一層建築罷了，是「停留在靈魂尖端的東西」。它們可能在毛澤東的思想上代替了他基礎的一部分（事實上是代替了的），但決不能根本影響，更談不到徹底改造他的精神基礎。

毛澤東思想「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個實質，大有助於他事業的成功，因此這個實質並非毛澤東思想的弱點，倒是他的強處（其實，弱點和強處常常相互轉化的）。不過我們不想在此地詳談這個問題，且待以後再說。在這裏，我之所以要指出這個實質來，只為的要說明：毛澤東具有濃重的領袖思想，歡喜個人崇拜，和他「靈魂」深處的正統的儒家思想分不開。共產主義的革命家懷有非共產主義的領袖思想，原來一部分是「聖德王功」，「替天行道」的老口號在作怪呢。

現在讓我們看看中共個人崇拜制度的客觀原因。

經濟不發達，政治上承受着亞洲專制源遠流長的重壓，廣大勞苦群被擯於任何文化圈子之外：這當然是成長於此一環境中的政黨（任何政黨，連自命為代表無產階級的共產黨亦非例外），會形成官僚主義，特別是形成個人崇拜制度的第一個客觀原因，這也是最基本的原因。此外一些原因，都是從這個基因派生出來的。因為經濟發展落後，當中國共產黨開始組織之時，中國現代式產業工人還只有極少數人；他們和全國龐大的總人口相比更顯得可憐。所以曾經不斷有人

懷疑，中國到底能否組成名符其實的共產黨。這懷疑當然不對，事實上與理論上都被駁倒了，這裏我們不必再為它浪費筆墨。不過由於現代工人階級在人口中比重極小，使那個以代表工人階級歷史利益自命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上不得不以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為主體，成分上要靠小資產階級的農民作基礎——這個事實，我們卻必須明白而且承認，乃是中共官僚主義硬化的一大原因。中共官僚制度，特別是它的個人崇拜制度所以形成的另一種原因，乃是它二十餘年來的特殊鬥爭方式。

1925-27年的中國革命失敗之後，國民黨投靠帝國主義，建立法西斯式的軍事獨裁，剝奪了一切民主權利。合法的革命運動甚難進行，改良性的工人鬥爭也遭到無情鎮壓。此時中國共產黨一方面由於錯誤的估計（「新革命高潮即將到來」）和錯誤的對策（盲動主義）；另一方面也由於客觀局勢所迫，逐漸走上了在農村中組織革命的地方政權，進行長期武裝鬥爭的道路。這種鬥爭方式的本身意義為何，它在共產主義的革命戰術中應佔何種地位，我們將在後面詳談。這裏我們要先行指出的，只是：這種鬥爭方式由於其本身性質使然，不能不形成領袖崇拜與個人崇拜。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書中，毛澤東寫過如下的一段話：

在幹部和人民還沒有經驗時，在軍事領導的權威還沒有達到把戰略退卻的決定權集中到最少數人乃至一個人的手裏而為幹部所信服的地步時，說服幹部和人民的問題是一個十分困難的問題。（見選集卷一，213頁。）

文章中這段話雖然是為戰略退卻而發，但其意義卻可擴大到並適用於整個戰爭。戰爭，即使是最革命的戰爭，都不可能以民主方式

來指揮的。戰爭，尤其是革命戰爭，其基本的取勝之道雖在於政治性質而非軍事安排，但戰場上技術性的勝負卻總取決於指揮部中極少數人，乃至一個人的決定，取決於這些人或這個人的才智和威望。毛澤東這段話完全是經驗之談。它很好地，很具體地為我們說明了：中共既然長期從事於軍事鬥爭，就必然要產生個人權威，因此產生了個人崇拜制度。

體現在毛澤東身上的、中共的個人崇拜制度，其主要成因，已略備於上述種種。這些成因，和史大林崇拜的成因之間，雖有很大差異，但最基本的一點還是相同的，那就是：兩者都導源於國家的發展落後，導源於民主傳統缺乏，以及民眾一般文化程度的低落。所以這兩種崇拜，基本上都是客觀決定的，都是落後的表現，是國家的落後性在革命中的反映和對於革命的「報復」。從革命的利益說，無論史氏或毛氏的個人崇拜，都是有害的，我們革命家都應予以堅決反對。不過在另一方面，至少我們如果站在歷史家立場上看問題，那我們還應分別並說明史毛兩種崇拜的不同意義。首先，史大林崇拜代表了對十月革命民主精神的直接叛變，故其意義是徹頭徹尾反動的；而毛澤東崇拜則只是間接地反映了這個反動（即指其為史大林主義的國外延長而言），直接地，而且在較大意義內，它倒是一種被國家落後性所彎曲了的革命專政的體現，其意義可以說曾經是革命性較多於反動性的。史大林個人集權乃是消滅整個老布爾雪維克的手段和結果，藉此完成其「特米多」（熱月）的反動。毛澤東的個人集權，在最直接的意義上說，乃是他擊敗史大林在中國的代理人（陳紹禹系）的結果；而就其較為廣泛的意義說，它卻大半由於革命鬥爭（特別是武裝鬥爭）的真實需要，小半才由於毛氏的野心（利用此需要來達成其個人崇拜）使然。我們指出這個不同，當然不想說：史大林崇拜的主要矛頭指向

了革命與革命者，而毛澤東崇拜的矛頭卻主要指向着反革命與反革命派。這樣區分，那是將事情太簡單化，而且也不正確地美化了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我們認為，無論是誰的個人崇拜，對於革命，特別對於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雖然在特殊情形中，例如需要立刻決定與應付的某些軍事危機之類，此時倘有一個絕對的無上權威出來作正確干預，能獲得迅速的勝利。但這種極有條件性的一時便利，絕不能以之證明：讓全黨全民崇拜一個人，將絕對正確的標準與生殺予奪的權力賦給了一個人，能使革命順利進行，達到最後勝利。事情恰好相反，一個黨或一個國家，如果出現了這樣一個「救世主」，倒是該黨與該國走向失敗或毀滅的最可靠保證。因為個人崇拜能最有效地摧毀群眾的創意力，能最迅速地鞏固黨和國家的官僚制度，同時也能最可靠地在精神或肉體上毀滅革命的真正領導者們，包括那個被崇拜的個人在內。因此，縱使毛澤東崇拜在中國革命中曾經起過若干正面作用，但其反面作用早已超過了它，且將愈來愈多地超過它，以致僅見其害而不見其利。因此，我們應該說：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與史大林的個人崇拜，同樣有害於革命。

革命領袖因自己的忠勇才智而贏得的巨大威望是一回事，由此威望而轉化的個人崇拜，或並無威望而全憑「人工」製造的個人崇拜，則是另一回事。前一回事是自然的、必需的、符合於革命利益的；後一回事則是虛矯的、不為革命所需的、因而是違反革命利益的。我們必須分別這兩回事。有了這個分別，我們不但能對革命中的真正權威知所愛護，對個人崇拜知所反對；而且能讓我們在同一個革命領袖身上，看出哪些是革命威望，哪些是個人崇拜，在同一個革命領袖身上，看出他在哪一時期起着革命作用，從哪一時期起逐漸墮落為反動的工具。

毛澤東在過去的革命中所以有所貢獻，原因之一是史大林式的個人崇拜還不曾完全代替他多少應得的威望；今後，隨着那由巨大威望的絕對化與神化這個過程，即隨着毛澤東崇拜制度的日益加強，日益荒謬，毛澤東對革命的作用亦將日益消極，日趨反動。

譬如在人民公社的悲慘試驗中，就已非常清楚地表現出毛澤東個人崇拜之如何為害於革命。因此，我們反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雖然是為了革命的利益，但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說是為了毛澤東的利益哩。我們研究毛澤東其人及其思想，主要是要把業已半神化的毛澤東還原為人的毛澤東；要把精心選擇並事後修改過的神話化的毛澤東思想，恢復為反映鬥爭的、既有正確亦有謬誤的真實的毛澤東思想。正如有血有肉有生命的人遠勝於虛妄的神怪一樣，那個在革命鬥爭中被證驗出價值、有時亦被證驗為錯誤的真實的思想紀錄，是遠勝於事後改作、藉以證明「絕對正確」的思想神話的。神怪與神話，在文學中自有地位；但以之應用於實際政治中則全無價值。有之，只能為反動服務而已。

我們的這一工作，就是希望在此一方面能盡若干力量。

注釋

1. 很難相信這段話便是毛澤東當時演說的原文。我們自然無法找到真正的演說稿來和《選集》中的文字核對。但依情理推測，在當時（史大林活着）的條件中，要毛氏說出這種顯然指向史大林崇拜的言語，是十分不可能的。在1956年2月召開的蘇共黨第二十次大會上，赫魯曉夫的那篇演說中有這樣的話：「只要提出這一點便夠了，那就是許多城市、工廠、工業計劃、集體農場、國營農場、國立學院以及教育機關都被我們加上了一項像私人財產的稱號——假如我們可以這樣說的話——以這些或那些仍然活着，並且還很健康的黨的或政府領袖的名字加上去。」請看，這段話和上引毛澤東的演說多麼相似。究竟是1956年的赫魯曉夫重複了毛澤東在1949年說過的話呢，還是1960年毛澤東將1949年的演說加以選印時，針對着赫魯曉夫的話作了事後修改呢（以此表示毛澤東從來反對個人崇拜）？我們不能用證據來確定。不過我相信後一可能要大的多。

三、毛澤東思想的來源與組成

要研究一個人的思想，首先得研究他思想形成的歷史。一個人，尤其是一個比較具有系統思想的人，他的思想在最後定形之前，都或長或短地要經過一連串的變遷。這變遷是一個不斷否定的過程，又是一個不斷累積的過程。思想既定以後，這個過程在一種意義上說是停止了，過去了。但是在另一種意義上說，它卻既未停止又未過去的。因為，定了形的思想繼續在進步，故未停止；而在累積了的成果中，卻永遠包含着過去變遷中似被否定而實已消受的許多因素。這些因素——特別是在思想生活初戀期中所吸收的——經常會有意識或無意識地起着作用，在「定形思想」中佔據重要位置，甚至築成它最隱蔽、最內層的因而也是最堅固的基礎。在此意義上，那個思想形成的變遷過程是永不會過去的，永遠留在靈魂底層的。

為此，要想認識以及把握毛澤東思想的本質，我們就得從他思想生活的成長史研究開始。

毛澤東的思想成長史是相當長的。他8歲啟蒙，27歲成為馬克思主義者。這是說，從他識字求學開始，直到他思想的初步確定，中間經過了十九個年頭。這如果和十九世紀末期俄國那些著名的馬克思主

義者的同樣時期相比，顯然是長得多的。譬如，托洛次基確定地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年僅 17 歲，在 26 歲那年他已經當上 1905 年革命中彼得堡蘇維埃的主席了。史大林也是在 20 歲以前便走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列寧年長托、史二人九歲，但他之脫離民粹主義影響而確定地走向馬克思主義，這過程也完成於 20 歲左右。

毛澤東之所以會較遲與較晚地走到馬克思主義，歷史和客觀的原因當然不少，不過其中最為主要的一個，則在於中國近代發展史上的一個特殊現象，那就是：從提倡君主立憲的保皇黨起，中間經過鼓吹資產階級革命的民主派，直至號召工農革命的共產主義者，時間上一共才渡過了二十多個年頭。可是類似的過程，在比較先進的國家中，多則經歷了數百年（如英、法），少亦延長了將近百年或數十年（如俄國）。在經歷了較長的發展過程的國家中，當馬克思主義出現之時，不但開明貴族的君主維新思想不再能對年青人發生任何影響，便是資產階級的激進主義，也不能讓青年革命者一顧了。因為形形色色的「進步思想」，早已在事變中證明為業已反動，並且已有充分的時間讓那些跟上時代的思想家逐一揭露和批判其本質了。因此，當客觀上已具備無產階級革命的條件，思想領域內又已出現了馬克思主義之時，那些堅強而徹底的革命者（例如誕生於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那幾位俄國十月革命的領袖們），幾乎在自己思想生活的一開始就擺脫了各種新舊思想的束縛，一起步就走向了馬克思主義。

十九世紀後半期與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情形卻不同。停滯了約莫二千年的中國社會，突然間，在強大的外力衝擊之下，被迫發生了非常激烈的與非常迅速的變化。正因為是被迫與激劇的，所以這個變化帶上了所謂「配合發展」的性質。那意思是說，當舊的未能被廓清

之前，新的已經闖進來了，新的還遠不曾確保其勝利與取得存在之時，更新的卻早已使新的變為舊的了。結果是：舊與新往往在某一程度內混和，最新的有時竟和最舊的同時存在。二者配合着變化，互相拉牽，使整個社會時而飛躍向前，時而反撥後跳，忽左忽右，屢進屢退，形成一種極其複雜混沌的局面。

這情形反映到思想界來，一方面便是發展過程的縮短，另一方面則為新品種內含有大量的舊渣滓。

過程縮短，這是就整個思想界而言的；若就個別人物的思想發展說，這過程卻反而顯得長了。因為剛巧生在這一時期的人（值得我們注意的幾個年歲數字是：毛澤東出身於1893年，距康有為出世三十六年，少譚嗣同二十八歲，後孫中山二十二年，晚於陳獨秀十四年），其思想的發展成長，大體上要跟隨或重複着當前思想界的發展。從康有為到陳獨秀（就二人出生的年份說），中間相差二十二年，這在整個社會思想發展史來說是太短了；可是在毛澤東個人身上，由「康有為主義者」（1906-09年間）發展至「陳獨秀主義者」（1920年），一共需要大約十二三年，這就非常之長了。

一個現代革命家走向馬克思主義的遲或早，與革命家本人的品質當然關係不大，但它與革命家的革命思想的品質，卻有較大關係。誰的成長過程愈長，誰在成熟時候的年齡愈大，則其人的思想史愈是複雜，他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根底可能會愈不單純，他在整個成長時期中所吸收的學問思想愈會影響到他最後接受的馬克思主義。

思想形成時間的長短，和思想本身性質之間的此種關係，如果我們把毛澤東的這段時間，亦即將「毛澤東思想的史前時期」，加以具體研究，那就可以更加清楚了。

毛澤東思想的「史前時期」，那整整的十九個年頭，按照他在各個期間求知活動的情形，大致可以分為如下幾個段落：

1901-06年（8歲至13歲），這是毛氏就讀本鄉小學的時期。在這個期內，他「讀了經書，可是不歡喜經書。」他說，「我最喜歡讀那些中國的傳奇小說；對於造反的故事，尤其歡喜。我讀過精忠傳、水滸、隋唐、三國和西遊記……」（見斯諾《西行漫記》）

1906-09年（13歲至16歲），這是半耕半讀時期。一方面助父耕種，一方面繼續自學。「凡鄉間能借到的書幾乎都讀盡了。」（見李銳著：《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在他所讀的書籍中，計有11本《新民叢報》，以及廣東人鄭觀應等「一些舊式改良派學者」所寫的《盛世危言》。據毛澤東自己後來在回憶中對斯諾說，他「非常歡喜這本書」。

1909-11年（16歲至18歲），在湘鄉讀高等小學的時間。他是在16歲那年離家到湘鄉的，進東山高小讀書。在這個學校裏他大約逗留了不足二年。這期間他開始讀到一點自然科學及西方學問的新知識，同時從他的表兄那裏得到了關於康梁維新運動的書，非常崇拜康梁。

1911-12年（18歲至19歲），這是毛氏生活上極度動盪並在思想上開始摸索的二年。他在1911年初春到達長沙，進長沙的湘鄉中學讀書，半年後便發生了辛亥革命，他「投筆從戎」，參加新軍，當兵半年，退出軍隊；胡亂地報考一些職業中學，均未讀成，終於進了湖南省立第一中學。這個學校他也不歡喜，在那裏讀了幾個月，唯一可記的事是他從國文教員那裏借到了一部《御批資治通鑑》，他讀得津津有味，而且終身受用。接着他索性離開了學校，每天到省立圖書館去博覽群書，特別是讀了「世界地理和世界歷史」，讀了亞當斯密的《原

富》，達爾文的《物種原始》和一本穆勒《名學》。他還讀了盧梭的著作，斯賓諾莎的《論理學》和孟德斯鳩的《法意》。把詩、小說、古希臘的故事，和關於俄美英法以及別的國家的歷史和地理的研究，胡亂地混在一起了。（均見《西行漫記》）

1913-18年（20歲至25歲），這是毛氏就讀於長沙師範的時期，也是他思想的奠基時期。毛澤東的自修活動結束於1913年春天。因為要和父親妥協，取得經濟援助，他考進了湖南第四師範，半年後該校與第一師範合併，毛便在一師裏讀了五年。據毛澤東自己說：「我的知識，我的學問是在一師建了基礎的，一師是一個好學校。」（見李銳《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18頁。）

在這個好學校裏有一位最好的先生，同時對青年毛澤東的生活和思想發生最深遠影響的，便是那位教修身等課的老師、後來且成為毛氏岳丈的楊昌濟。關於他、毛澤東自己曾這樣說過：「對我印象最深的教員是楊昌濟，一位從英國回來的留學生；他的生活，後來和我有了極密切的關係。他教授倫理學，是一個唯心主義者，一個有高尚道德性格的人。他很堅強地信仰他的倫理學，努力灌輸一種做公正的、道德的、正義的而有益於社會的人的志願給他的學生們。」（見同上引書19頁。）

據李銳的敘述，楊昌濟的思想是這樣的：

楊昌濟先生號懷中，世居長沙東鄉板倉，所以當時亦被稱為板倉先生。他自幼喜歡程朱之學，留學日本和英國共九年……在外國專心研究教育和哲學，探求做人的道理。……

楊昌濟先生對於中國的舊文化很有修養，尤其對於宋明理學有深刻的研究，同時他又吸取了王船山、譚嗣同、康得一派的

學說，考察了歐洲舊民主主義的社會制度和風氣，加以抉擇、批判、融會，因此自成一種比較有進步性的倫理思想和講究實踐的人生觀。在哲學思想上，他雖然是一位信仰進化論的唯心主義者，過於誇大主觀能動性的作用，他的倫理學見解中的唯心主義成分也很重，但是他的某些觀點和主張，特別是他的追求新思想和躬行實踐的精神，對於當時受教的青年確曾起過很大的積極作用。

……第一師範的進步青年自然而然地都團結在楊昌濟先生的周圍。大家對他心悅誠服，在教室裏聽講非常用心；下課後，毛澤東同志等更常到「板倉楊寓」去聆教，或聽治學、做人方法，或求改正筆記，或談論天下大事。楊先生也非常喜歡這一批青年，特別是毛澤東同志。

在這樣師生相得、相敬、相愛的情形下，楊昌濟先生悉心教導他的學生；學生則虔誠地在許多方面向先生學習，甚至模仿。

毛澤東和他的朋友們據說在如下幾方面，受了這位現代理學家最深刻的影響：(1) 研究王船山和譚嗣同；(2) 將孔子的倫理學說現代化。把儒家思想與西歐民主派唯心哲學「貫通」起來；(3) 介紹以初期《新青年》為代表的新思想；(4) 言行謹慎：「靜坐^[1]，默思，不說謊話，不涉狎邪等，生活刻苦鍛煉；做事勤懇，崇尚勞動……冷水沐浴，長途步行等。」（見《初期活動》，24頁。）

1918-20年（25歲至27歲）。這是毛氏由唯心主義者變成為唯物主義者的時期。他在1918年師範畢業後，就決心北上，到當時新文化運動中心的北京去。在李大釗主持下的北大圖書館任職，接觸到一大批新人物，並且首次和陳獨秀見面。此時他拼命吸收新知識，貪婪

地閱讀一切能夠見到的新書。其中有一個時期，與無政府主義者區聲白來往很密，同意了不少無政府意見。但據他自己說，陳獨秀給他的影響也許比任何別人所給他的更大。1919年春天離京赴滬，復由滬回湘，從事「新民學會」活動。五四運動在北京發生後，立即波及到湖南，毛澤東成了長沙學生運動的主要領導者，成立學聯會，辦《湘江評論》，並積極發動驅逐張敬堯的鬥爭。不久《湘江評論》被封，學聯被解散，毛又經過一個時期的文學活動和組織活動後，因為湖南軍閥的高壓日甚一日，於是第二次離湘赴京。這次在北京只住了不多日子（大約自1919年底至1920年夏天），但它對毛澤東的思想轉變卻很重要，據他自己說：「當我第二次遊北京時，我讀了許多關於俄國事情的書，拼命訪求當時已譯成中文的共產主義的文獻。有三本書給我留下的印象特別深，而且造成了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心。我一經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後來從未動搖過。那三本書是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以及第一本用中文出版的考次基的《階級鬥爭》和刻兒枯樸的《社會主義史》。」（見《西行漫記》），接着，毛澤東說：「大約在1920年夏天，我已經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多少也在行動上，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從那時候起，我便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命了。」「在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將工人們組織起來，在工作中，我開始為馬克思主義學說與俄國革命史的影響所指導了。」（均見《西行漫記》）

從上面的敘述中，我們可以將毛澤東的思想成長史（或學習進程史）排成如下表：

第一時期（八年），由8歲至16歲。完全依舊的方式誦讀中國儒家經書。補充讀物為：中國的幾部長篇小說（初期），以及極少數偶然獲得的舊式維新派的書報（後期）。

第二時期（三年），自 17 歲至 20 歲。此時開始接觸到一些西方科學與英法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思想，初步見到國民黨的理論（《民立報》）。但此時期中對他發生最大影響的一部書，卻是一中時代所讀的《御批通鑑》。

第三時期（五年），自 20 歲至 25 歲。此時在新理學家楊昌濟的指導和影響之下，在思想與實踐上，有系統地學習儒家學說，特別是研究它激進的、現代化的、與民族主義相結合的，資產階級化的一翼。（以王船山、譚嗣同為代表的一派，直至初期《新青年》時代的陳獨秀思想。）

第四時期（兩年），自 25 歲至 27 歲。這是他尋找出路並找到出路的時期。最初，他「思想依然混沌……在 1920 年冬天……開始被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俄國革命史的影響所指導。」

在這個簡單的羅列中，甚至幾個數字都有很大意義。一共是十八年（如果按虛數算是十九年），其中八年是舊孔子學說的統治時代，三年可以說是由舊到新的摸索時代，後五年為新孔子學說的學習和實踐時代，最後兩年則為由激進儒生成為馬克思主義革命家的轉變時代。這意思是說，在毛澤東思想的前史時期中，新舊孔子主義支配了這個青年人幾達十六年，而離開（其實並未根本決裂）這個主義，走向馬克思主義，則僅佔年餘兩年。我們指出這個事實，用意當然不想藉以「證明」：毛澤東思想中新舊孔子主義佔十八分之十六，馬克思主義佔十八分之二。這樣的「數學」不用說是荒謬絕倫的。但上述的年數比例，卻無疑可以幫助我們去確定毛澤東思想的各種來源，更好地了解它的實質。

列寧有一篇出名的文章，叫做《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與三個組成部分》。他在文中指出了「馬克思主義是人類在十九世紀所造成的那些優秀成果，即德國哲學、英國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社會主義的當然繼承者。」同樣，我們也可以在毛澤東思想中尋找出它的幾個「來源與組成部分」。從我們上面所做的敘述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出來源了，不過要確定它的組成部分，卻不是容易的。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非常清楚，三者對馬克思整個思想體系的形成，差不多做了不分高低的貢獻；這三者經過馬克思天才的思維作用而化成一物後，其所佔地位和重要性也可說是不相上下的。毛澤東思想的情形可不同，幾個來源雖然相當清楚，但它們如何組成這個思想；組成這個思想時對它們各自經歷了怎樣的取捨或批判；組成以後各自在此統一物中所佔的比重如何；以及各個因素在毛澤東思想這個統一物中究竟是有機的組成呢？還是簡單的拼合呢？要解答這些問題，卻比列寧討論馬克思主義時來得困難些。不過，我們必須研究這些問題。

毛澤東思想的來源，我們早已看得很清楚了，它們是：（1）新舊儒家思想，或者可以說，朱熹的孔子主義與楊昌濟的孔子主義（後者代表了起自程朱，中經船山，迄於康譚的孔學）；（2）傳統的游俠思想，特別是由《水滸傳》集中表現出來的劫富濟貧主義；（3）西方社會主義思想。

這三個來源，當它們會合在毛澤東身上時採取着怎樣的面目，是很難確定的。它們不同於馬克思主義的情形。當年馬克思吸收他的思想來源時，他將每一個來源都精詳地批判過了，取捨過了，而且經此批判與取捨之後，每一個來源——不論哲學、社會主義或經濟學——都達到了新的，前所未有的高度，前所未有的正確性與科學性。馬克思主義和其來源之間有何不同，人們是一目了然的。馬克思對它的三

個來源否定了什麼，繼承了什麼，發展了什麼，也表明得一清二楚。可是毛澤東思想和它來源之間的關係卻不是這樣。其間沒有很清晰的界限，讓人不易看出哪裏是舊的終點，哪裏是新的起點。所以有這個不同，最主要的原因自然在於毛澤東的思想家地位，根本不能與馬克思的相比；甚至我們應該說，毛澤東根本不是思想家，而是政治的實踐家。他並非完成了自己整套的革命理論（包括宇宙觀、人生觀、歷史觀以及革命對象之分析及革命戰略的規劃）而後從事革命活動；相反，他是先接受了一個革命目標，然後在長期的革命活動中，「調查研究」，鬥爭學習，因而形成了他的思想的。這樣的思想自有其優點和價值，但欠缺系統，不能一貫，權宜高於原則，戰術指揮戰略，卻是它不可避免的特性。這個特性我們現在初次遇見於尋覓毛澤東思想的來源之時，將來，當我們研究實際應用中的毛澤東思想時，還將隨處遇見。

毛澤東思想的一個重要來源是新舊「孔子主義」，這是事實，不容爭辯。但我們說這個「孔子主義」迄今仍不失為毛澤東思想的組成成分，卻一定要引起人們的責難。唯心的、「封建的」、階級嚴明的孔子學說，如何能成為毛澤東共產主義思想的組成因素呢？人家一定會說我們胡言亂語，或甚至是「血口噴人」。但若我們把上面的意見換一個方式說出來，即若說：毛澤東思想繼承了中國思想的一個重要傳統，那我們這些憤怒的反駁者可能會點頭同意了。可是，試問，中國思想中一個最重要的傳統是什麼？不正是孔家思想嗎？然則為什麼我們不能說毛澤東思想的一個組成成分是「孔子主義」呢？人和他的思想，都是環境產物，是傳統產物。偉大的傑出人物雖然要改變環境，要創造歷史。但首先他得是這個環境和歷史的一部分，否則他便無法了解它們，更談不上改變和創造它們。完全脫離自己的環境，根本斬斷自己

的歷史，這個人好像是無根之木，無源之水，非但起不了任何作用，抑且毫無生機。

孔家思想之於中國人的社會，正好似回教思想之於阿拉伯人及其他一些民族的社會，基督教思想之於歐美人的社會一樣，數千年來，深入了人們的意識「靈魂」，浸透了一切風尚制度。因此，生息在這些社會中的人，不管有無知識，不管你願不願意，甚至不管你贊成或反對這些思想，可是它們總像大氣裏的濕度那樣影響着你。影響的程度雖有差別，但受影響這個事實卻是相同的。革命者，尤其是共產主義思想的革命者，首先自應革各自民族中反動思想的命。因為這些反動思想，縱使它在民族歷史上起過一定作用，給某一進步階級服過務，但時至今日，站在民族的與國際的無產階級立場上來說，那些宗教的或非宗教的為統治階級信奉的思想，卻都是反動的，應予徹底批判，徹底打倒。沒有做過這份批判打倒工作的人，有如西歐所習見的什麼「基督教社會主義者」之類，那是絕對不會有革命氣味，更不會有社會主義氣味。他們僅僅是反動思想的假面具，反動政治最可惡的幫兇。在這個意義上說，什麼「孔教共產主義」或「儒家社會主義」，其反動性正與基督教或天主教的「社會主義」相同，根本談不上什麼革命，這自然與毛澤東思想全不相干。我們說毛澤東思想中留得有，或者結合得有「孔子主義」的成分，其義應如下述：童年與青年的毛澤東既從孔家書中獲得了最初的知識與思想，他自不能不受「孔子主義」的深厚影響，在 25 歲以前，他基本上始終是一位「孔門弟子」，其間思想的進展，不過從孔子學派的正統（程、朱），逐漸趨向於它的「左翼」（黃梨洲、王船山、康有為、譚嗣同）罷了。五四之後，毛澤東當然受到清算孔子的影響，他的崇拜對象從康、梁變成陳、胡。但因中國遲發的「啟蒙運動」，由於國際和國內關係的特殊形勢，無法構成一

個長期獨立的時期，故其對於中國舊思想，特別對孔子主義的批判工作，無論在深廣兩方面都做得極其有限。隨着階級鬥爭的迅速發展，「新文化運動」本身起了分化，一部分投降了「孔家店」（這個孔老闆自然是全身洋裝的），另一部分則不再繼續文化思想的深研，而一經浮面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政綱，便傾全力於實際的革命行動了。胡適之是前一部分人的代表，而陳獨秀則是後一部分人的領袖。毛澤東跟在陳獨秀後面，走了後一道路。所以他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和陳獨秀一樣，是建築在儒家思想的基礎上的。在此意義上，我們說毛澤東思想結合得有孔子主義的成分。至於這成分是否至今還留得有，如果有，它們是什麼，它們在整個思想中佔多大地位，那且待後面詳說。

一般說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革命者都是先幹革命，後讀馬克思主義（最大多數則始終不曾有機會讀馬克思主義），因此，人們雖然加入了共產黨，雖然以全生命鬧共產革命，但除了根本的鬥爭目標，以及一些時事意見和行動方針由黨決定之外，其他關於人生和社會（更不必談宇宙等）的種種根本思想，卻是各想各的，而大致則是屬於儒家。知識程度愈高，入黨之前的思想愈成系統，則其頭腦中積存的非馬克思主義思想也就愈多、愈深。毛澤東在 1920 年因「三本書」的影響決定了他共產主義的信仰，此後自然讀過 30 或 300 本書，但這些書顯然無法完全代替他以前十八年中所讀的 300 或 3,000 本的孔孟書。這裏數字的意義是很小的，而且是假設的；重大而真實的乃是人類思想發展上的「先入為主」，即人當其知識奠基時期和思想形成時期所受教育，往往終身起着有意無意的決定作用這個事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毛澤東自然要「以今日之我，反對昨日之我」。但這種自我否定工作，任何人不能做得徹底淨盡的。愈有根底，愈不能做得徹底。「昨日」思想

的結論可以拋棄，甚至可以全部否定，但其方法則多半無法擺脫。這情形和人的學習語言頗有相似之處：年齡愈大，學習愈難；鄉音的根底愈深，則對新方言的遷就愈不易；成年人學習新方言，詞彙最易，句法其次，音調最難，甚至是終於無法改變的。毛澤東從16歲那年離開家鄉，開始「否定」他的湘潭土語，學講普通話；可是直到如今，雖然就詞彙句法言他早已學成功，而基調都還是濃重的鄉音。這現象，我們若能緊守類比的範圍，確實可以和他的思想發展及其不同因素間的關係相比擬。那就是說：普通話如果代表了他的馬克思主義，湘潭語音便有點等於他的孔孟思想。

帶土音的普通話，就其表達意思的效用而言，不一定輸於字正腔圓的京片子。問題的中心在於二者（音與語）之間的結合如何。如果結合得好，運用得流利自然，那末對不懂京音的最大多數中國人發言，也許比道地的「國語」還實惠，毛澤東的湘潭普通話，特別對湖南省的工農大眾說話，那是絕對優於「標準國語」的。因此，以「土思想」打底的馬克思主義，非但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到世界各地時無法避免的產物，而且，只要它結合得好，還會比「百分之百」的原裝馬克思主義為實際而有效。因此，單單說毛澤東思想中含有孔子主義的成分，意思絕不等於說毛澤東思想不是馬克思主義，或者含有反動思想。是否馬克思主義，是否含有反動思想，並不決定於含有某一成分這個事實，而決定於這個成分的性質，以及此性質如何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的情形。

洪秀全、康有為、孫中山，基本上都是孔門弟子，都從西方找來了一些「真理」。他們都把孔子主義與西方真理結合起來，在不同程度內又都形成了各自的思想。在這方面，毛澤東和他三位前輩的情形沒有什麼不同。不過就中西思想的結合情形說，卻有很大不同。洪秀

全的基督教義，康有為那味烏托邦理想和立憲主義的雜拌，孫中山的傑弗遜主義加亨利喬治的思想的拼湊，當然都不能和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相提並舉。無論作為一般的哲學，或特殊的社會科學，馬克思主義與上述洪、康、孫三人所知道與所採納的各種思想，自不能同年而語，唯此理太顯，不必申論。我們這裏要談的是各人對於各該「西方真理」的認識深淺，以及各個被吸收成分和原有孔子思想結合的好壞。各人對各該「西方真理」的認識程度，毛澤東比他的三位前輩是高明得多的。因為時代關係，在洪、康當年，西洋學識根本不曾有系統地介紹到中國來，不通洋文的中國舊知識分子，只有經過傳教士之流，一鱗半爪，道聽塗說地獲得一點新知。洪秀全不必說了，他憑了自己粗疏的認識，將基督教弄成一種非常奇怪的東西。康有為博學，且較晚出，卻也會將達爾文當成烏托邦社會主義者，把傅利葉當作英國人。孫中山雖然出身英文書院，足跡遍天下，但他根本不看重（因之不屑學）西方的文哲思想，他所注意的僅僅是歐美民主政治的規章制度。所以他對「西學」的認識也極不全面，甚至非常淺薄。（在這方面他還不如嚴復，而且不及譚嗣同。）毛澤東雖然不懂外國文，雖然也不很看得起西方的文哲思想，但因他思想的成長期正趕上了中國知識界的「競趨歐化」時代，他所尋到的「西學」，即由俄國十月革命送來的馬克思主義，又是在中國的廣大群眾中於頃刻間蔚成了研習風氣，所以他雖然不曾（始終不曾）成為一個淵博精深的馬克思主義者，但他總已全面地、仔細地、有系統地認識了它、研究了它、應用了它。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當然自限於他實行家的性格，並固封於史大林主義的體系；但即使如此，與洪、康、孫三人的「西學」比較起來，不容說已有天壤之別了。其次講到中西學結合的情形，前面我們說過，毛澤東和陳獨秀一樣，而且和洪、康、孫三人一樣，都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但這只就他們思想中所含的成分而言。若就

二者的結合情形看問題，則對毛澤東說，「體」、「用」二字便不能呆板地解釋為主輔之別了。在洪、康、孫三人的思想中，「中學」（即孔子思想，特別是儒家的思想中若干帶民主氣息與大同理想的方面）無疑是主體，而各自從西方拾取的一些斷爛錦繡，則是「零用」，外表的裝飾。在上述三人中，特別是前二人，他們所幹的革命與所主張的改革，與其說是維新，毋寧說是復古。西哲的理想，不過借用來證明中國古已有之的仁政而已。孫中山自然比他們進步，他要造成的新中國是現代英美式的民主國家，甚至是更為美好的「民生主義的國家」。但什麼是民生主義呢？孫中山卻告訴我們說：「這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所以他說，「夫蘇維埃主義者，即孔子之所謂大同也。」孫中山思想究以何者為體，何者為用，即此就很明白了。可是毛澤東決不會在中國革命與復古之間加上等號的。他明白孔子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在根本上的對立，唯心與唯物的對立，他知道儒家思想與科學的社會主義各自代表着什麼階級利益；他懂得要「立」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觀，必須「破」孔子主義的反革命觀；總之，他清楚：要想在孔子主義本幹上接一次馬克思主義的種是不對的，也不可能。所以他在意識和思想上，曾經努力擺脫他以前獲得的孔子思想，代之以馬克思主義思想。因此，毛澤東思想的中西二學的關係不再是主輔之差，其結合也不是簡單的拼湊，而是某種程度的化合了。在這上面，毛澤東不僅和洪秀全、康有為不同，就是和孫中山都大不相同。

但是一種化合物是否根本取消了它的組成成分呢？當然不。因之毛澤東思想中的中學成分即使和後來的西學起了化學性的結合，我們卻仍不能否認它是組成成分之一。

值得研究的是迄今留在毛澤東思想中的，究竟是哪些儒家思想？

所謂儒家思想，我們知道，含義非常寬廣，難以下一簡單明確的定義。兩千年來，孔子主義獨霸了中國人的思想，範圍了中國人的頭腦；可是反過來，中國人的思想，透過許多優秀的頭腦，卻又各自將反映其時代特點與階級特點的解釋賦予了儒家思想。因之，在儒家思想這個共同名義之下，你可以發見很不同的見解，這些不同見解形成了不同的流派。這些不同流派，其對各自的環境和時代言，曾經起了不同性質的、進步的或反動的作用。我們這裏自然不想談儒家思想發展史，也不想研究各派儒家的異同學說——這種研究在此地並不需要，亦非本書作者所能勝任——在這裏我們要做的，只是列舉幾項在中國人思想中最起作用的儒家思想。然後讓我們看看究竟這些思想是否可以在毛澤東的言行中發現出來。孔子將「六藝」傳授弟子，可是以思想論，影響於後代中國人既深且遠者，卻莫如《春秋》、《禮》、《易》。孔子自己說過：「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確是有自知之明的。《春秋》的褒貶筆削，實質上乃是「禮」在政治史與政治學上的應用。至於所謂「禮」，則只是封建等級制度，乃至一切等級制度中人與人關係的一種規約。所以二「經」的基本精神只有一個，那便是：分上下，定尊卑。孔子的「禮」不是絕對與片面的約束，它毋寧是一種較為進步的等級間的「契約」：父慈則子孝，君仁則臣忠，這裏的上下尊卑之間，有一種關連性的責任與義務存在。因此，秦始皇的絕對專制就不歡喜儒家，而後來的某些儒家，又可以從孔子學說中發揮出某些民主的進步見解。但雖如此，不論就孔家「禮」教的本身說，或就其發生於中國社會政治的實際結果說，其反動性總是遠遠超過進步性的。孔子所以能成為「聖之時者」，二千年來他之所以能不斷獲得專制統治者的無上崇敬，主要就因為他老人家那點子「春秋大義」，那個嚴尊卑上下之序的「禮」教。儒家思想中第二個重大特點，在中國歷史上起了不小影響，特別對漢民族的思想發生極大作用的，

乃是由《易》傳所代表的那種辯證思想。「孔子晚而喜易」，有「假我數年」的願望。其實，孔子的辯證思想是原來有的，他的讀易與傳易，不過是把他的唯心主義的辯證哲學加以系統化罷了。司馬遷作《孔子世家》，給孔學做了一個簡短提要，其中就提到了他的「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這是太史公的高明處。因為這個「四毋」不但是孔子思想方法的基礎，而且正是他一生為人處世的根本態度。不要臆度、不要武斷、不要固執，不要主觀；這裏面一方面包含了科學精神與辯證思想；另一方面卻意味着中庸、妥協、圓滑的改良主義與機會主義，有時甚至發展至赤裸裸的犬儒主義。中國歷來的儒家，繼承前一進步方面的固然不是沒有，但屬少數，繼承和發揮後一反動方面的則比比皆是，佔絕大多數。

如果「春秋大義」與「四毋」哲學是孔子主義的兩大要素，那末毛澤東思想中保留着何種孔家思想這個問題就不難解決。毛澤東是革命家。依春秋之義，乃屬於「亂臣賊子」之列。因此人們會自然地以為毛氏決不會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再擁護孔子尊王之說，即不會贊成盲目尊君的學說與實踐了。可是事實上並不如此簡單。因為春秋尊王，並非尊一固定之王，而是凡王必尊。所以問題在於是否做成了王。一旦成了王，則聖人的春秋大義便全部呈送給你，你便成了「綱」。只有那些失敗了的「亂臣賊子」才始終是亂臣賊子，才受不到「士」（即儒家）的尊崇。原來「春秋大義」是跟「成王敗寇」這個現實連在一起的，所以，不管是「犯上」勝利了的新君王，或甚至外族入主中國的侵略者，只要「所業已就」，都無妨於此一「大義」之接納，並發見其為幫助統治之最好思想武器。毛澤東早年習孔子之「禮」；後來當然在思想上拋棄了它。但當他初則在黨內，繼而在國內，最初對同志，後來對全民建立了唯一的無上權威之後，是否會發現「春秋大義」又有

了利用的新價值呢？或者，更正確地可以這樣問：這個分上下、別尊卑的儒家禮教觀念，雖在表面思想上早被毛澤東所放棄，但在較深的意識中，是否仍保留在毛澤東的心中腦際，因而促成了他的黨、政制度的等級懸殊的官僚主義；促成了他衷心接納史大林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並促成了他瘋狂發展的個人崇拜作風（實質上乃是變相的帝王思想）？對於這些問題，特別對於後一方式提出的問題，我們的答覆是肯定的。人們無法否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思想與孔子的禮教有血緣之親。^[2]

孔子主義的第二個特點留在毛澤東思想中的影子更顯而易見。無論敵友，誰都承認毛澤東是傑出的權術家，更確切些說，他是一個偉大的策略家。不管就軍事、政治或人事方面說，毛氏那種聰敏、靈活、圓通、狡黠的應付，實在高明之至。這種本事，一半固然由於天賦，另一半顯然是從孔老夫子那裏，首先是從他那個「四毋」中學來的。孔子可說是古往今來最不受「教條」束縛的人了。他的任何主張沒有一成不變的說法，因時而異，因地而異，亦因人而異。這在教育方法上是「因材施教」，在思想方法上便是所謂「真理永遠是具體的」。他在某個時候可以「從眾」，在另一個時候可以「違眾」，一切看情形而定。弟子們同樣問「仁」，而孔子對顏淵、仲弓和司馬牛的回答各不相同。紂王無道，「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三人三種態度，而孔子卻同樣稱之為「仁」。這是他能在同中見異，異中見同；並且對人對事，都能從適當的視角來觀察。孔子說過：「親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但「公山弗擾以費畔」，「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都想前去；說什麼「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有人嘲笑他「棲棲皇皇」，近於「佞」了，而孔子則辯曰：「吾疾固也」。他反對一成不變，討厭頑固不化。他「無

可無不可」。孔子與蒲人盟，不去衛國；但一出東門，他即負盟適衛，理由是：「要盟也，神不聽」。那意思就是說，在強力要挾之下可以與人締盟，但這樣的盟誓完全可以違背，因為鬼神是不聽的。孔夫子那種隨機應變，實事求是，有經有權，不執一見的態度，在毛澤東的言行中，不是隨處可以發現的嗎？三十餘年來，毛澤東奮鬥於中國共產黨內外，終於能有今日那樣的地位，是靠他應付了一連串敵手的。第一號內部對手是已故的史大林及其在中國的派遣人王明。毛澤東在這一戰鬥中顯然處於劣勢，而且是敗局早成的，如果當時他沒有玄德種菜、勾踐嘗膽的精神，沒有韜光養晦，隱忍待時的修養，便不可能在遵義會議上翻身；再如果當他翻身之後，對王明派不能做到小勝不驕，適可而止，主從有別，恩威兼施；對史大林不能實行敬而遠之，陽奉陰違，以及時奉時違的「柔道」政策，則無法保持並確立他在黨內的勝利，更不能擴大之為全國性的勝利。對付黨外的大敵蔣介石，毛澤東更是充分發揮了「毋固，毋必」的儒家精神。西安捉放，國共重圓，這齣悲喜劇的導演固然是史大林，但其精彩演出卻無疑要歸功於毛澤東。他並非死板地扮演了劇中人，而是將自己的性格注入於角色中的。十年內戰，能於一旦間被宣稱為「兄弟鬩牆」；反動的三民主義，一經「正名」，冠以「新」字，就不怕信奉。改編易幟，答應無妨，只要易而不改，強加之約，可以簽訂，反正「神不聽」也。對於國民黨旁敲側擊，應之以「有理，有利，有節」，隨機應變，法無常法。與民主人士遊，則「恂恂如也，闇闇如也，鞠躬如也」，禮不嫌其繁瑣，只要能爭取同情好感。凡此種種，別說硬橋硬馬的馬克思辦不到，就是更為實際的列寧和托洛次基也因「教條」所限，絕對不肯做與做不來；甚至那個專講策略的史大林，雖然願意做能夠做，但因先後天都沒有那種圓通周到的應付本領，也一定做不到這樣的。只有深得乎「夫子之道」的毛澤東才能演得如此出色。由此可見，策略意義上地位甚

高的毛澤東思想，其中有重要一部分並非繼承自馬克思列寧，而是從孔子思想中得來的。

策略家的毛澤東，或毛澤東的高明的策略，在不小程度內的確曾促成了中國革命的勝利，我們應該承認這個事實。但這事實是否表示出對於中國革命的領導，馬列主義不及孔子主義實用呢？或者，又可以這樣設問：非馬克思主義的、但運用得很巧妙的一些策略，足以促成革命勝利的嗎？這些問題值得研究，我們也一定要研究它們。但不在此地，我們將在本書以後適當的地方談到它們^[3]。這裏，我們的目的，是要證明毛澤東思想中確仍含有孔子主義的成分，而這目的總算已經達到了。

我們說，毛澤東思想的另一個來源是中國固有的游俠思想。這說法大概較易得人首肯。毛氏自己說：他小時讀經書而不歡喜經書。（其實——讓我們順便在此一提——沒有一個小孩子會歡喜那些晦澀艱深的聖賢書的，但不歡喜決不意味着不受影響。）他歡喜讀水滸、西遊等等小說。這些通俗歷史小說對近百年來中國青年人的影響，無疑是大大超過了經書的。尤其是識字不多的下層社會等級，他們的想法和部分知識，可以說都是從那些小說得來，或間接由取材於此種小說的戲劇中得來。所以愛那些小說甚於愛「聖賢書」，並不只以毛澤東為然，幾乎最大多數的孩子都是如此的。毛澤東比眾不同的，我覺得只在於他把從某些小說中得來的思想，能鄭重予以實行而已。中國舊小說的思想，基本上反映了唐宋以來中國社會思想的整個混沌體。此一混合物以孔氏學說為基礎，加添了濃重的佛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入世與出世的想法糾纏在一起。在此糾纏中，二者較高明的（不必等於前進或正確）成分互相抵消，而最腐敗的成分則相得益彰。比如入世部分的積極面，即儒家的所謂「行其義也」的負責精神，消失了，

留剩下來的只是學優則仕，求取利祿的庸俗見解；出世部分也只有一些最淺薄的東西留下來，猶如於佛家為因果報應的小乘教義，於道家則為煉丹修仙的荒唐理想。中國舊小說的這些思想，憑藉故事之力，廣泛傳播於中國廣大人民群中，真是流毒無窮。不過有一種思想，特別見於像水滸那樣的傑出小說中的，卻在上述那個思想混沌體上放射異彩。這個思想，我以為應名之為游俠思想。一些古典小說能夠特別吸引少年讀者，能在儒釋道三者的酸腐氣中透出強烈的清新氣息，因而使某些小說不僅在藝術上，而且在思想上亦具有較高價值者，我覺得，主要得歸功於這個思想。如果沒有這個「鋤強扶弱」、「劫富濟貧」的「游俠主義」，那末老是在陳腐、庸俗、怪誕的儒釋道圈子裏打滾的中國舊小說，其實將一無足觀了。

毛澤東熱愛這些小說，他主要顯然是歡喜這個思想，他吸收了這個思想，在他以後的行為中，將假戲真做起來。

秦漢之際，儒俠並稱，韓非所謂「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是也。究竟儒（亦即士）代表什麼階級？俠代表什麼階級呢？以當時的孔子而論，應該說是新興的中小地主的代表。他的學說代表了為數不小的，非封建貴族出身的，屬於中小地主或兼營商業的地主們的政治理想，特別代表了出身於此等「貧賤」階級的官僚利益與思想。所以他的思想是改良的、妥協的、搖擺的，其實質頗近乎現代社會中的中上小資產階級的立場。等到後來，一自漢武將儒家奉為「國教」以後，「孔子主義」自然只為統治階級服務，替專制君王作「仁政」的粉飾，以致盡失其改良的或妥協的性質。至於游俠，司馬遷雖然區分為「顯貴之俠」與「布衣」、「鄉曲」、或「閭巷之俠」，但其實是專指後者而不及前者的。「布衣」、「鄉曲」、「閭巷」，就字面看已很清楚了，這些是些下等的普通人。他們的特點是：「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

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因阨，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這些游俠者的美德，或他們同類標榜的道德標準，與歐洲中世紀的騎士，日本的武士道，頗多相同之處。不過中國游俠的階級成分，卻比歐洲的騎士與日本武士，似乎要低，騎士本身是貴族，武士則是貴族的幫閒和打手。而中國歷史上的俠，則大多是市井小人；其中間或有農民、有小地主、有下級官吏，而最大多數則為大小城市裏的工匠、販夫走卒與無業游民。一般說，他們代表了比儒家所代表者為低的社會等級。故為儒墨所「排擠」。俠的品類很雜，良莠不齊。暴戾恣肆，侵凌孤弱而自稱為俠的流氓劇盜當然很多，但真正具有上述美德的豪士也一定不少。這些人，特別當政治極度黑暗，或戰亂頻仍，小百姓受盡欺壓，顛沛流離，痛苦無告的時代，確實能起一些反抗作用。他們將「公道」掌握在自己手中，鋤強扶弱，劫富濟貧，以此替無告者出口冤氣，讓「豪暴」者得點懲戒。這種精神，在整個中國的歷史上，可說都起了積極作用的。如果沒有這點精神，沒有這種「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那末在儒家精神的絕對統治之下，中國人（尤其是所謂「士」）一定會像司馬遷所指出，只剩兩種類型了：一種是「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的自私的清流，另一種便是「卑論儕俗，與世沉浮而取榮名」的無恥的俗子。事實上，一兩千年來中國的讀書人恰恰只有過這兩種人。非清流即俗子，非俗子即清流。而更壞的，這兩種人往往交互為用，隨時可以易位，弄成清流亦俗子，俗子即清流的情形，真是非常可悲可嘆的。歐陽修為馮道作傳，發過如下的感慨：「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怪士之被儒服者以學古自名，而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多矣，然使忠義之節，獨出於武夫戰卒，豈於儒者固無其人哉？」歐陽修在這裏的見識遠不及司馬遷。他不知道：若不多少具有「朱家、郭解」精神的正統孔子之徒，其不成為「長樂

老人」者幾希。馮道處處以仲尼自況，當時人亦稱譽之為孔子復生，這在一定的意義上說，倒並非絕頂荒謬的。

自來比較傑出的儒家，都知道「以武彥文」的重要性。近世的譚嗣同更看重游俠精神。孫中山則拼命從會黨中求豪士。良以「秀才造反」，雖三十、三百年亦不能成功；更何況一成「秀才」，便根本連造反的念頭都不敢存呢？毛澤東從《水滸傳》中學到了上梁山的重要，把這點游俠精神吸收到思想中去，與外來的西學再結合一下，成為他以武裝對武裝的全套革命理論的一個重要因素。這情形是顯而易見的，不須多所辭費了。

馬克思主義組成毛澤東思想的第三個成分，情形自比上述二事更加清楚，以致毋須證明的。在這方面我們要提出來討論的，乃是毛澤東的馬列主義究竟是怎樣的馬列主義；以及此一成分在其整個思想中所佔比重如何。毛澤東親口告訴我們，他在1920年頃之轉向馬克思主義，在書籍方面是受了《共產黨宣言》，考次基著《階級鬥爭》及刻兒·枯樸著《社會主義史》的影響。此後毛澤東在馬克思主義文獻閱讀及研究方面的進展情形，他自己不曾說過，別人亦少記載。但我們不難推想得之。毛澤東是不懂外國文的，而馬克思主義書籍被大量譯成中文，是在革命失敗以後，即開始於1930年前後。可見從1920年到30年這段期間，毛氏是不會讀更多的馬克思主義著作的。不但因為這方面中譯本太少，而更因為那時期的革命運動開展得意外迅速，毛氏和所有的年青共產黨員一樣，不得不以全部時間，全副精力去應付忙迫的實際鬥爭。接着又因革命失敗，毛澤東從事於武裝鬥爭的組織和領導，這就使他更沒有任何閒暇來做理論上的深化與進修。因此，不僅在1930年以前，甚至在1937年以前，即當中共的軍政權力在延安相當穩定以前，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的書本知識，大概不會比他於

1920年從三本書中所獲得者增添許多。這當然不僅毛澤東如此，參加或領導1925–27年中國革命的全體共產主義者，可說全都如此。最大多數人是讀了鄭超麟翻譯的布哈林與潑雷奧勃拉欣斯基合著的《共產主義ABC》；較少人讀了李季翻譯的《通俗資本論》。後一種人在當時已算是高級理論家了。

毛澤東「有機會寬泛地閱讀史大林的著作」，據陳伯達告訴我們，「是在抗日戰爭的時候（按即1937年以後），毛澤東同志用最高的熱情來閱讀和深思熟慮他所得到的史大林的各種著作。」（見陳著《史大林和中國革命》，16頁。）陳伯達的這點證言極其重要。他告訴了我們毛澤東何時才「寬泛地閱讀和深思熟慮」史大林的著作。同時他又間接地告訴了我們：毛澤東所研讀的究竟是哪一種馬克思主義。

原來毛澤東是在1937年以後才鄭重其事地研究馬克思主義的；而他所研究的卻只是史大林的著作，所以是史大林主義者^[4]。

1937年頃毛氏所以能研讀史大林著作，因為抗日之後國民黨對中共的軍事壓力多少放鬆了，毛氏可以抽點工夫出來進修理論。而他之所以要進修理論，則最直接為的要應付王明一系的進攻。他和「教條主義者」的鬥爭當時雖已獲勝，但未結束，為了與王明們上爭克里姆林宮的主人的支持，下爭全黨的信仰，他必須加強理論學習，尤須學習克里姆林宮主人的理論。

毛澤東和史大林（及其直接代理人王明）之間的思想淵源與政治關係，我們將以專章詳談。這裏應該注意並引起我們最大興趣的乃是下面兩件事實：（1）當毛澤東做了十七年共產黨員，領導了十七年共產黨革命之後，亦即當毛澤東到了44歲那年，才比較廣泛深刻地研讀馬克思主義的著作；（2）他此時（甚至以後）所研讀的馬克思主義，

又僅僅以史大林所解釋與所代表者為限。為要估量毛澤東思想中馬克思主義成分所佔比重，為要認識毛澤東所接納的馬克思主義的性質，上述二事，無疑具有極大價值。

光是憑了這兩個事實，我們甚至可以肯定地說：儒、俠思想乃是毛澤東思想之深入地下的基礎，而史大林主義則是毛澤東思想之人所共見的上層建築。在潛意識的、較抽象的精神方面，土生的儒、俠思想顯佔上風；在有意識的、較具體的思想方面，那個主要來自史大林的洋成分似佔優勢。——隨着歲月的增長，它愈來愈佔優勢。

下面，我們準備從各個有關中國革命的具體問題上，去認識和評估毛澤東思想，並從而證驗我們在本章中對毛澤東三個主要來源所作的剖析。

注釋

1. 毛澤東對於靜坐法並不贊成，他認為「天地蓋唯有動而已」。（見《初期活動》，33頁。）
2. 說到這裏，我們還想順便指出毛澤東思想在其發展中與孔子思想之間的一個有趣關係。前面說過，那是孔子學派中的左翼，也就是儒家學說中的民主傾向與大同理想，讓毛澤東過渡到西歐式的民主主義，終於達到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可是到了後來，等到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成為一個武裝力量，毛澤東成為這個力量的首領，同時蘇聯的共產黨在史大林領導之下趨於極權官僚化的墮落——毛澤東正在這個時候補修他的馬克思主義，——於是那早年鑽入他心底的最正統的孔子主義，特別是那種「春秋大義」起了重大作用，這就使他心安理得地接受了史大林主義；反之，這個史大林主義當然又加強了他「靈魂」深處那個極右翼的孔子主義——帝王思想。

3. 這一點我們在後面論戰術家與戰略家的毛澤東的諸章中，已詳細解答了。
4. 光憑陳伯達這段證言，自然不足以斷定毛澤東除了史大林著作之外，根本沒有「寬泛地閱讀和深思熟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人的著作。因為這篇文章談的是「史大林和中國革命」，說的是毛澤東和史大林的關係，他不一定要扯到題外去，不一定要連帶來談毛氏和馬克思和其他幾位大師的關係。

但是沒有陳伯達或其他人的直接證言，我們仍舊有充分理由可以斷定：從1937年以後毛氏廣泛閱讀的只是史大林的著作。除了列寧的幾本小書之外，他根本不曾研讀過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品。

最有力的證據是毛澤東自己的文章。在毛氏所有文字中幾乎沒有馬克思與恩格斯的直接引文；從列寧那裏，我們也只見他引用過幾段哲學文字；而引自史大林的則隨處（指1937年以後的毛氏文字）可見。這些引文或被用作自己思想的印證或奉為卓絕的先見。

毛澤東是反對死讀書與讀死書的。他「帶着問題學」，學到了就要用的。因此，如果毛氏確曾深深鑽研過馬、恩、列諸大師的書籍的話，他絕不會隱藏不用的。

四、毛澤東思想與「毛澤東思想」

有兩種毛澤東思想。一種是如實的毛澤東的如實的思想，即是說，毛澤東這個真實的人，這個革命的政治家與軍事家，他確曾有過與確實保持着的那些思想；另一種是為了特定的政治目的，首先是為了造成毛澤東在黨內和國內的一尊地位甚至神一般的地位，故意製造出來的一個盡善盡美的、始終正確的思想體系，在其廣深度上均已被認為相等於、甚至高出於馬克思主義的一種思想體系。這兩種不同的毛澤東思想，應該加以區別的。關於前一種毛澤東思想的來源，我們在前一章裏已約略談過，現在要談的是後一種毛澤東思想的產生經過。

我們在前面研究個人崇拜問題時提起過，一個在生的政黨領袖，將自己的名字定為主義，寫入黨綱，宣佈它為全黨共遵的指針，這在世界工人運動史中是史無前例的。不但此也，一個在生的革命思想家，將自己的思想定名為某某人思想或某某人的主義，在社會主義運動史上亦屬少見。從來，什麼主義這個名稱，總是先由思想上的敵對者給取的，然後由他的信奉者（多半在領袖死後）接受過來，自稱為某某主義者。馬克思只當他嘲笑那些愚蠢的追隨者時才提到過「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這名詞最初是門雪維克為了攻擊他的「非馬克思主

義」才發明的。列寧絕不曾自己承認，也決不肯讓別人宣稱：他有不同於馬克思主義的什麼主義或思想體系。「列寧主義」被當作「俄國馬克思主義」提出來，時間已在列寧重病之後，提出人首先是齊諾維也夫，然後是史大林，其目的為了打擊「托洛次基主義」。托洛次基和馬克思與列寧一樣，終其身不曾標榜過什麼托洛次基主義。這些偉大的革命思想家為什麼不肯將自己的思想定名為主義或思想體系呢？更為什麼不肯將自己的主義寫入政綱，作為一切行動的方針呢？簡單為了謙虛嗎？不，不盡然，謙虛固然是一種美德，甚至對革命家都是一種重要的品德，但近乎虛假的謙遜，對於當仁不讓的馬克思派思想家說，卻非重要的事。如果不是為了更重大的理由，他們決不會單單為了謙遜的禮貌之故而不為的。那末到底為了什麼呢？首先，他們都深惡痛疾個人崇拜，他們都太革命家了，太討厭官僚作風了，太反對那種以個人名義掠眾人之美之傳統罪行了，以致他們不肯讓自己有任何可能陷進這個庸俗的圈套中去。其次，他們都上感乎繼自前人的深且厚，下感乎日新又新的必需與必然，因而他們自己總覺得無法將冠以己名的主義來概括全部思想，或標誌出自己特殊貢獻的部分思想；第三，一個人對於自己的思想，如果知道雖完成而未完結，總不肯將它加上名字，定為科律，仰大眾遵行的。因為任何一位大思想家，其最重要的總是方法與立場，並非所有的結論。其自信最堅者也是前者而非後者，憑着正確的方法與立場，他們可以得到，而且已經得到過很多正確結論，但他們沒有理由說，也決不會說，他們行將獲得的任何結論也一定會正確，要求黨員或群眾事先答應服從一切；因此，馬克思、列寧與托洛次基都不肯，也都不曾規定一種標上自己名字的主義或思想；他們不容許別人替他們這樣做，更不會授意別人這樣做；至於將此主義或思想明定於他們所領導的政黨的綱領內，作為一切行動的指針，那是出乎他們想像之外的。

然則以馬列二人的門人自居，並自幼聽慣「謙受益」教訓的毛澤東，怎麼會做出如此「不客氣」的事來呢？在解答這個問題之前，請先讓我們看看十餘年來「毛澤東思想」的提出，放下與再提出的經過。

「毛澤東思想」主要是中共黨內鬥爭的產物。其直接的對象為王明路線，甚至可以說是史大林路線，或俄國路線。中國共產黨存在到我寫這幾行字的時候，已經四十年了。其間當然發生了不少爭論和鬥爭。但除了直接受蘇聯共黨內部爭論的影響而發生的史托之爭以外，爭論中延長最久、範圍最廣、深度最大的一次，卻要算發生於毛澤東和王明之間的鬥爭。第一次革命中的所謂陳獨秀路線，八七會議後的所謂瞿秋白路線，1930年的所謂李立三路線，事實上都是名不符實的，亦可以說是一種虛構，因為被貼上這三個名字標籤的所謂路線，前二者應該由史大林、布哈林負責，後者則應由史大林單獨負責。無論陳獨秀、瞿秋白或李立三，根本不過是國際路線的執行人，那些路線絕對不合冠上他們名字的，至於所謂反這些路線的鬥爭，事實只是當每一國際路線破產之後，史大林要使那個執行人做替罪的羔羊，於是指使出另一個人來做上獻燔肉的祭司，——這祭司，當新路線再度破產時，便也被燔炙如儀了。當年瞿秋白之反對「陳獨秀路線」，六大期間及其以後的所謂反「瞿秋白路線」，以及1930年9月間瞿秋白再度被王明等捧出來反對「李立三路線」；同年11月與次年1月間王明派的所謂「反立三、反調和路線」——其基本內容都是一樣，即都代表史大林本人的錯誤路線，在中國的實際鬥爭中不斷碰壁、不斷破產而引起的不斷的文過飾非，不斷的覓羊替罪。

王明（即陳紹禹）的命運原本可以和陳、瞿、李一樣的，其所以能終於不做史大林的燔肉者，主要因為他和克里姆林宮官僚的深厚關係，以及他天生有狡黠異常的性格。王明的思想記錄與革命履歷，與

毛澤東的剛好相反。被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去讀書的時候，他還只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孩子。「子曰詩云」這一套當然未曾讀過，一般的中國文化與文學修養都根本談不到。他寫的俄文也許比中文好，知識與思想的初戀都是史大林學校的「馬列主義」。這個人，未必像毛澤東所指摘的「懂得希臘」（因為除了蘇聯黨校課程中所包含的小量西方哲學常識與若干政治經濟學說之外，王明等根本不曾見識過什麼西方文化），但對自己出生的中國，卻是肯定地不懂的。人當然聰敏，特別是絕頂狡黠，非常長於玩弄陰謀詭計，野心尤其少有的大，領袖欲強得令人吃驚。他是在莫斯科入黨的，中國 1925-27 年的革命，他正在俄國讀書，當然無分參加。此人的頭角顯露於 1927 年中國革命將敗未敗，蘇聯共黨內部的托史二派為此發生了激烈鬥爭之際。中山大學的校長原本是拉狄克，他在鬥爭中站在托洛次基的反對派一邊。學校中以米夫為首的史大林派起而與校長鬥爭。此時中國學生中也分為二派，王明成了史大林—米夫派的領袖。結果反對派失敗，拉狄克被免職，米夫繼任校長，王明就成了學校黨部的主要人物。此後，王明和米夫密切合作，上通天，下着地，周圍團結了不少積極分子，其中後來出名的有秦邦憲、王稼祥、陳昌浩等等。1928 年中共第六次大會在蘇聯舉行，王明等以翻譯資格列席，而實際上卻起了不小作用。史大林為了要直接與完全地控制中國黨，乃通過他的米夫—王明機構，干涉與安排了領導機關的人選。他們有步驟有計劃地籠絡了工人出身，易於擺佈的向忠發，換下了多少有自己主張的瞿秋白，如此預備了王明們由黨校控制走向全黨控制的第一步。王明派從 1929 年起開始陸續回國，最初扼於國內的「實際工作派」，鬱鬱不甚得志（王明僅被派充宣傳部幹事）。1930 年夏天，史大林的「第三時期哲學」（即宣佈全世界均處於直接革命局勢中的「左」傾跳躍路線），在李立三的執行下^[1]，達到了瘋狂程度，並在短短期間（三四個月），被證明為完全破

產。這路線引起了下層同志普遍的惶惑與不滿。此時，王明等就利用了時機，首先利用了瞿秋白等，在9月間召開的六屆三中全會上打擊了李立三；然後王明們與此時已當上了第三國際東方部主持人的米夫直接聯繫，上下合作，又於同年11月間通過了對六屆三中全會的補充決議；12月中發第九十六號通告，「進一步指出了立三路線錯誤及六屆三中全會的調和錯誤」，將瞿秋白也套入「錯誤」的網中。王明派此時乘勝追擊，毫不放鬆，乃於兩個月後，即在1931年1月召開了「改造」中央的六屆四中全會，此時，在六次大會上根本不曾當選中委的王明派人物竟進入了領導機關，將李立三、瞿秋白乃至何孟雄、李求實等實際工作者排擠了出去。如此，王明那個由佔領黨校進而佔領全黨的野心，在史大林的直接扶持之下，總算初步成功了。

所有這些鬥爭都是在上海秘密進行的。毛澤東當時正困鬥於湘贛地區，遠離着這個勾心鬥角的中心。關於理論和政治問題，毛澤東原沒有給以多大注意。他根本上同意六次大會的決議，並且完全同意史大林「第三時期」的盲動路線。因此在原則上他是擁護「立三路線」的。他對「立三路線」有所批評，只限於執行的技術上，屬於軍事的策略性質。他從親自的經驗中，知道了當時以紅軍直接進攻大城市之不可能。毛澤東主要是一個實幹家，並非精深貫通的理論家，所以在初期，而且在本質上是自始至終地，他都將理論的意義看在行動之下。這方面他和史大林有共同之處，因此，在那些年中，毛澤東縱不曾將當時上海發生的理論鬥爭（無論在進行於史托二派之間的真正的理論鬥爭，或由王明們搞出來，當作權力鬥爭幌子的「理論鬥爭」）叫做「茶杯裏的風波」，卻總是不屑一顧，或無暇一顧的。在今天公佈出來的毛氏文字中，人們找不到毛澤東當時對種種爭論性的問題發表了什麼意見，這便是證明。當時毛澤東的心理多半是這樣的：「沒有力量

沒有發言權，而最可靠的力量乃是帶槍的群眾。隨你們在亭子間裏去謀王篡位吧，我只要積聚我的力量。」

至於王明們呢？在最初，他們也看不起毛澤東。對於中國南方諸省由共產黨員領導的武裝鬥爭，共產國際看不出任何前途，在六次大會上，由布哈林擔任發言人的報告中，就說過：「那些紅軍會把農民的最後一隻雞都吃光」，並嘲笑那種劃一支火柴點一罐火油的暴動。六次大會決定把蘇維埃口號改成為「宣傳性的口號」，意思就是要停止這種立即的農民暴動。同時也是為自己留下餘地，等武裝鬥爭一旦完全失敗後，可將全部責任推給中國的執行者。六大決定的工作對象是工人，工作的重點限於城市。在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下，恢復黨和工人群眾的聯繫，儘量恢復和擴大黨組織和工會組織，始終被確定為中國黨唯一的與最重要的任務。本此精神，王明派集中一切力量來奪取上海的黨中央，暫時不注意江西毛澤東領導下的軍政勢力，乃是自然的事。不過一旦取得了黨中央的領導權，又加以毛澤東的軍事力量不但沒有像國際所預料那樣的受到摧毀，反而日趨鞏固，日漸強大，此時王明們便不得不以往日對付李立三瞿秋白的方法去對付毛澤東了。

事實也正是如此。所以我們回顧中共的歷史，竟可以說，自從1931年1月六屆四中全會之後，中共全部的內爭史，乃是以毛澤東及王明為首的兩派鬥爭史。這鬥爭經過很長時期，雙方互有勝負，直至1945年4月的中共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澤東一系才贏取了徹底與最後的勝利。這個延長十四年的鬥爭，因為有不少微妙理由，真相至今還對外界，甚至對共黨內部的群眾隱瞞着。其中最大一個理由，便是王明背後站着史大林，他直接代表了莫斯科的官僚層，王明是中國「洋共產」的代表，與「土共產」的代表毛澤東作戰的。因此這個鬥爭間接地牽涉到史大林，牽涉到當時的第三國際，牽涉到

蘇聯。身受打擊的毛澤東，自然看到了這一切，但是主要為了鬥爭的策略之故，他不願與不敢直接攻擊王明後面的靠山，甚至對那靠在大山上的王明都不敢攻擊得過分，攻擊得非常「有禮」，「有節」。

兩派十四年鬥爭的主要經過如下：

1931年1月，在六屆四中全會上，王明派非法奪取了中共中央的領導機關。他們憑藉着莫斯科的直接支持，在舊人中取得了向忠發、周恩來等的合作，打下了李立三、瞿秋白以及一大批從事工人運動的前輩革命者。王明用以奪權的政治口號是：「反立三路線」，「反調和主義」，「反右傾」。而他們自己的立場則是極「左」派的，當時史大林在全世界推行的所謂「第三時期」的直接革命路線。這路線由王明寫成小冊子，名叫《兩條路線》，又名《為中共更加布爾雪維克化而鬥爭》。王明的這本小冊子，據毛澤東勝利後所起草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上說，「在當時及其以後十多年內還繼續被人們認為起過『正確的』『綱領作用』的。王明們如此『改造』了中央機關以後，又將此種『改造』推廣於各個革命根據地和白區地方組織。他們極有系統地向全國各地派遣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機關或新的領導幹部，以此來貫徹其『反右傾』的鬥爭。」（見《歷史問題的決議》）

1931年9月，在四中全會上獲得勝利的王明派，成立了以秦邦憲為首的臨時中央。從此就更公開地向毛澤東的勢力進攻了。

1931年11月，召開江西南部根據地黨代表大會；1932年10月，又召開了黨中央的寧都會議。這兩次會議的攻擊目標都是毛澤東。當時贛南閩西的蘇區領導者被指執行「富農路線」和犯有「極嚴重的一貫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於是黨和軍隊的領導被改變了。毛澤東本人於1931年12月11日在第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主席，讓他當

了共產黨的「林森」【朱正按 林森（1867-1943），1931年12月起擔任國民政府主席，並沒有實權力；權力都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手裏。】，一切實權被剝奪了。

1933年初，王明們的中央機關因一再被蔣介石的特務所破壞，不得不拋棄他們自來堅持的城市路線，逃入農村根據地^[2]。此後，王明們便更接與徹底地控制了從毛澤東手裏奪過來的一切力量。

1934年1月，六屆五中全會召開。這是王明派控制中共完全成功的紀念會，是「第二次『左』傾路線發展的頂點」（見《歷史問題的決議》）。在這次會議上他們宣佈「中國革命危機已到了新的尖銳的階段——直接革命的形勢在中國存在着。」同時在反對「主要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反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調和態度」和反對「用兩面派的態度在實際工作中對黨的路線怠工」等口號下，打擊毛澤東及其擁護者。

從1930年起，直到遵義會議後的1935年12月，這期間毛澤東沒有寫過任何原則性的理論文章（以選集中所搜集者為根據）。王明們直呼毛澤東為「右傾的機會主義者」，罵他的政策為「富農路線」，按理，毛澤東應該有所辯護，或竟像立三、秋白與周恩來那樣，寫了「承認錯誤的自責書」，不過我們不曾見過任何此類文件。在《選集》中搜集的此一時期的文章，共計四篇，都是屬於經濟政策的，沒有對王明路線的批評，也沒有為自己被指責罪名的辯訴。在《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只空洞地提了一句：「在第三次『左』傾路線時期中，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主張正確路線的同志們，是同這條左傾路線完全對立的。他們不贊成並要求糾正這條『左』傾路線……」可是怎樣對立的，以什麼論據或立場來對立，卻沒有說出來。實情可能是這樣的：

毛澤東自然不會贊成王明們的路線與領導，但這條路線與領導卻是代表國際，代表史大林的。毛澤東們不敢和它公開對立，於是採取「兩面派態度」，玩弄中國的古法：陽奉陰違，虛與委施，保持沉默，坐以待變。

這個變化是不久就來的，而 1934 年秋季紅軍反第五次「圍剿」的失敗，開始了突圍的長征。

1935 年 1 月，毛澤東發動召開了擴大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即所謂「遵義會議」，推倒了王明派的領導，「糾正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上和組織上的錯誤」。毛澤東那次「起義」之能夠成功，原因據《歷史問題的決議》說是這樣的：「『左』傾路線在實際工作的不斷碰壁。尤其是中央所在地區第五次反『圍剿』中的不斷失敗，開始在更多的領導幹部和黨員群眾面前暴露了這一路線的錯誤，引起了他們的懷疑和不滿。……紅軍長征開始後，這種懷疑和不滿更加增長，以至有些曾經犯過『左』傾錯誤的同志，這時也開始覺悟，……於是廣大的反對『左』傾路線的幹部和黨員，都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團結起來……」遵義會議的前後經過，以及會議上做了什麼決定，至今還不曾有文件發表出來，或至少我們還無法看到。不過此次會議所討論的只是軍事的與組織的問題，毛澤東並沒有提出對立的、不同的政治綱領來和王明們鬥爭，那是非常清楚的。《歷史問題的決議》是如此說，在胡喬木編寫的《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中也是這樣說。後者還進一步告訴了我們一個有趣的事實，它說：要根本改變政治路線，「……糾正在黨的濃厚存在着的『左』傾關門主義」，非但「1931 年到 1934 年的黨中央所不能完成，毛澤東同志在 1935 年的長征中也不可能完成的。直到這時（按指 1935 年秋冬），在共產國際關於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正確政策的幫助之下，黨……才滿足了這個要求。」（見該書 38 頁）這個

意思就是說：不論遵義會議之前也好，之後也好，王明當權也好，毛澤東當權也好，只要共產黨國際（實則史大林）的極左的「第三時期」路線不改變，則中共的政治方針是決不能改變的。同時這段話的意思又在說：不管王明罵毛澤東犯了右傾機會主義，也不管毛澤東罵王明犯了左傾機會主義，可是兩人誰都沒有跳出史大林的手掌，誰都在「第三時期哲學」的圈子裏翻筋斗。

總之，遵義會議除了改換中共中央書記，改組革命軍事委員會，讓毛澤東及其一系代替王明及其一系之外，沒有解決其他問題。以毛澤東為首的「土共產」雖然勝利了；但以王明為首的「洋共產」卻未嘗潰敗。王明仍舊擔任中共出席國際的代表，仍舊在政治上指揮中共，並繼續在那裏稱王稱霸，欺壓留在蘇聯的政治上的異己者。李立三在中共八大大會上作證說：「我在王明同志的直接領導下工作了七年，好像是過了七年小媳婦的生活，終日提心吊膽，謹小慎微，以免觸怒，但還是不免經常受到斥責。……」在李立三那次發言中，又證明了在中國黨內業已獲勝的毛澤東，其言論著作在莫斯科卻不准流傳的，李立三要「直到1946年初回到哈爾濱以後，才初次讀到《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初次讀到延安整風文件，初次讀到毛澤東同志的一些重要著作。……才第一次看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鬥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原則』這個術語。」

由此可見，在遵義會議之後，王明在史大林的直接支持之下，其權力與氣焰並沒有馬上失去，不但在他的「直接統治」地區——蘇聯為然，即使在中共黨內亦是如此。毛澤東雖然從1935年1月起重掌了黨、軍大權，卻還須經長年努力，才能將王明安置在黨領導機關中的黨羽排除，將王明的聲勢真正壓下去，其間經過大致如下：

從 1935 到 1945 的十個年頭，毛澤東與王明之間的鬥爭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毛澤東的自我進修時期；第二，毛、王意見再度直接衝突時期；第三，毛澤東政治意見獲勝與「毛澤東思想」正式誕生時期。

「長征」結束於 1936 年 10 月。在此以前，紅軍轉戰流徙，幾瀕於殆。內有意見分歧（反對意見主要以張國燾為代表），外有國民黨軍的窮追堵截。毛澤東重握兵權於敗亡之際，在絕對優勢的敵軍攻擊下求取生存，自然只有集中一切於軍事問題的解決。等到 1936 年 10 月間，各路紅軍會師甘肅，然後進入陝北，有了相當穩固的根據地；同時因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略，全國抗日情緒高漲，蔣介石在西安被拘等等變化，中共所受於國民黨的軍事壓力大大鬆弛；這時，毛澤東的生活和活動也顯然有了變化。他一方面總結過去的爭論，另一方面補修他一向欠缺的馬克思列寧等大師的基本理論，特別要讀史大林的著作。毛澤東這方面的努力是極易理解的：（1）在和王明（不僅王明個人，他後面還有一大群中俄「理論家」）鬥爭時，當對方從一切共產主義典籍中引經據典，大掉書袋之時，毛氏一定痛感到自己在這上面的欠缺，以致有無法招架之勢，為要駁到對方的教條，自己得先摸清這些教條；（2）地位愈重要，形勢愈有利，鬥爭愈複雜，毛澤東不能不衷心地感覺到自己一般基本的馬克思主義教育的不足；（3）當研究馬列主義時，一半由於策略的考慮，即「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或由於勢利的考慮，即欲與王明爭奪史大林的恩寵，擬在思想上趨奉這位蘇聯的獨裁者，以便最後排除王明這個克里姆林宮與中共之間的代理人；另一半由於氣質與思想上的真正接近（例如實幹重於理論，策略高於戰略之類），故毛澤東特別研究以史大林為代表的那一派「馬列主義」。

我們在前面敘述毛澤東的思想成長史時，曾經提到過陳伯達說毛澤東要到抗日戰爭時期才閱讀史大林著作。現在，在這裏，得更多地引述陳伯達對這方面的證言，他說：

不論是在 1927 年陳獨秀還在當權的時候，或在 1927 年以後，機會主義者總是或有意地或無意地阻礙在中國黨內散佈和宣傳史大林關於中國問題的許多著作，又因為文字的條件，反革命的隔離，就使得我們黨內許多在實際上領導中國革命的同志沒有機會去有系統地閱讀到史大林關於中國問題的許多著作，而毛澤東同志也是其中的一個。史大林關於中國問題的許多著作是 1942 年整風運動以後，才在我們黨內有系統地編輯出來，……機會主義者為着散佈自己錯誤的觀點和主張，而或有意地或無意地掩蓋史大林關於中國問題的著作，這一點對我們黨說來，是很不幸的。但雖然這樣，毛澤東同志在許多根本問題上，都能根據馬、恩、列、斯的革命基本科學，以自己獨立的思考達到了與史大林相同的結論，因而保持了自己和他的戰友們的正確。

毛澤東同志有機會寬泛地閱讀史大林的著作，是在抗日戰爭的時候。毛澤東同志用最高的熱情，來閱讀和深思熟慮他所得到的史大林的各種著作。大家知道，毛澤東同志在他所寫的《新民主主義論》裏面，就說明了史大林的著作所給他的重要的啟發。（見陳伯達《史大林和中國革命》，15-16 頁。）

陳伯達這段文字很有價值，因為它老實地說出了中共黨內馬克思主義教育落後的情況^[3]。並且正式證實了我們的看法：一直在抗日戰爭之前，毛澤東的思想和行動，只根據了馬、恩、列、史的革命基本

科學，這即是說，只憑了共產主義的一般的基本立場，此外卻「以自己獨立的思考」，即運用中國傳統的思想方法與知識成果，來達到具體結論的。毛澤東的此一缺點，我們在上面某一處曾經說過，其實正是他的優點。不過這個優點，只在特種情況下，兩害相權時才顯出來的。故在另一情況與另一意義中，優點仍舊會變成缺點。特別當「教條主義者」引用大量列寧遺教，或史大林文字，做成帽子，變成圈套，以便亂扣亂套政治上的對手時，毛澤東一定會痛感到「子曰，詩云」的還擊無力，以致大發宏願來修讀洋典，補救自己的缺點了。

1936年以後的三四年內，毛澤東確以「最高的熱情」補修了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史大林主義。成績是可觀的。試翻開四冊《毛澤東選集》來看吧，毛氏一些帶理論性的重要文章（從《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實踐論》至《新民主主義論》），都寫成於1936年底至1940年期間。從文章的內容判斷，我們知道毛氏在那一時期的理論研究工作主要可以分做三部分：第一，武裝革命中戰略與策略問題的回顧與總結；第二，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哲學的認識；第三，史大林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意見及其在蘇共黨內鬥爭中的立場。

我們暫且不討論毛澤東上述三方面研究的成果（後面當會談及）。這裏我們需要指出的只是：這三方面研究的主要爭論對象都還是王明，同時，經過這番研究之後，毛氏有了更大的理論上的自信；更能有所依據地指斥王明們為「教條主義者」；自己則更自覺地成為史大林的崇拜者。

毛澤東這個「自我進修」時期，與我們上面所說的「毛、王政見再度直接衝突」時期，並非截然劃分，亦非先後銜接，這兩個「時期」差不多是同時並存，交互錯綜的。依據《選集》所載，遵義會議後毛

澤東首次向王明派作理論進攻，時在 1936 年 12 月。那時他寫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企圖總結十年內戰的經驗，並「系統地說明有關中國革命戰爭戰略方面的諸問題」。在這篇對陝北紅軍大學演講過的文章裏，他以如此方式對王明們開了火：「他們主張回到一般情況的反面去，拒絕了解任何的特殊情況，拒絕紅軍血戰史的經驗，輕視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力量，輕視國民黨軍隊的力量，對敵人採用的反動的新原則視若無睹。結果是喪失了陝甘邊區以外的一切根據地，使紅軍由 20 萬人降到了幾萬人，使中國共產黨由 30 萬黨員降到幾萬黨員，而在國民黨區域的黨組織幾乎全部喪失。……他們自稱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其實一點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沒有學到。列寧說：『馬克思主義的最本質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就在於具體地分析具體的情況。』我們的這些同志恰恰是忘記了這一點。」（見《選集》卷一，186 頁。）毛澤東做這樣嚴重的指責，控訴如此大的罪名，卻不說出被告的姓字。同時更有趣的，差不多在同一時候，即在同年 7 月間，當毛澤東前往陝北採訪的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提到紅軍不可征服的兩大原因時，說：「另一原因是由於革命幹部的異常幹練，英勇與忠實。朱德、王明、洛甫、周恩來、博古、王稼穡、……陳昌浩、賀龍、蕭克等許許多多優秀同志們……」（見《西行漫記》中譯本第四章，125 頁。）王明在這張名單中位列第二，僅次於朱德。同時在毛澤東所提的 18 個有功的「優秀同志」中，除王明外，計有博古、王稼穡、陳昌浩這三個王派大領袖，以及洛甫等等的王明政權的支持分子。這一切表示出：遵義會議召開以後的將近二年內，王明系統的黨內勢力仍然很大，完全可以和毛澤東爭衡的——更何況整個克里姆林宮站在他們背後呢。毛澤東當時那種隱名射擊與欲抑故揚的做法，固然顯示出孔門弟子的涵養功夫，但到底也反映着那時史大林直系在中共內部實力的大小。

我們迄今無法確知王明本人何時從莫斯科再來中國^[4]。他以國際代表及中共代表雙重資格來到武漢是在1937年冬。那時他的氣焰還是非常之大，無論在國民黨人眼中或中共自己的安排上，他都在周恩來之上。那時武漢流行着一種說法：周恩來、董必武只能代表延安，而王明卻兼能代表莫斯科。事實上這說法並非完全無稽。那時王明們與延安毛澤東領導的中央之間是否已有新的政治意見的衝突，我們卻不能確知。我們只知道，在此以前，中共曾經於1935年12月12日召集了瓦塞堡會議，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之後，寫了那篇名叫《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文章。這是毛澤東重新掌權後的第一篇文章（就選集中所搜集者而言），也是中國第一篇發揮「人民陣線」理論的文章。

在這裏我們必須提到一件大事：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舉行於1935年夏天。在那次大會上，史大林對全世界共黨發出了「向右轉」的命令，初次提出了「人民陣線」口號，代替了那個開始於1929年的「第三時期」的哲學。正是這個「第三時期」的盲目「左」傾路線，斷送了德國革命，扶助了希特勒走上政權，同時在中國，造成了以王明為首的所謂「第三次左傾路線」的全部罪惡。如今，在一方面希特勒，另一方面日本軍閥的東西威脅之下，乃不得不做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喊出與一切民主、民族的資產階級合作的口號了。

中共的瓦塞堡會議顯然是七大決議到達陝北後的結果。目的在於討論、接受並執行「人民陣線」（在中國則稱為「抗日統一戰線」）的新路線。會議上大概發生了對新路線的懷疑派，毛澤東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主要是答覆這些懷疑派，只在附帶中觸及了「過去某些同志」的錯誤。對於新路線，我相信王明那時和毛澤東不曾抱有不同態度。王明這個人，如果不能因「國際」（史大林）的轉變而隨之作不多不少的轉變，那就不成其為王明了。至於毛澤東，那

末無論從哪一方面說，右的「人民陣線」，比左的「第三時期」，更要合他的胃口得多。

瓦窯堡會議以後的重大會議是1937年5月在延安舉行的中共全國代表會議，會議上毛澤東做了報告（《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與結論（《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那次會議上發生了意見不同，但毛澤東的對手不是王明，而是張國燾。他此時所反對的左傾不是王明路線，而是托派主張了。

洛川會議舉行於1937年8月，會上通過的毛澤東文章是一份宣傳大綱（〈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鬥爭〉），這裏當然沒有內部爭論。【朱正按 因為這時王明還沒有回國，沒有出席洛川會議，當然他不可能在會場上和毛澤東發生爭論。不過他回國之後立刻表現出了他的不同立場。洛川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意見通過的《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規定：一、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二、全國軍事的總動員；三、全國人民的總動員；四、改革政治機構；五、抗日的外交政策；六、戰時的財政經濟政策；七、改良人民生活；八、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肅清漢奸賣國賊親日派；十、抗日的民族團結。可是王明12月25日在武漢發表《中共中央對時局宣言》，提出的抗日戰爭必須實現的六項任務（也被稱為六大綱領），取消了《十大綱領》中關於進行政治經濟改革，廢除國民黨一黨專政等項主張，並提出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抗日武裝要接受國民黨政府的「統一指揮」。這就放棄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的獨立自主地位和對統一戰線的領導權，是對「十大綱領」的嚴重倒退。這件事，後來毛澤東在1958年的成都會議上說到了：「抗日時期我們同王明的爭論，從1937年開始，到1938年8月為止，我們提十大綱領，王明提六大綱領。按照王明的做法，即史大林的做法，中國革命是不能成功的。」（《毛澤東文集》第七卷，371

頁。)】不過正在這個時期毛澤東卻寫出了兩本與王明派思想鬥爭中最根本的小書：《實踐論》與《矛盾論》。他企圖從馬克思主義認識論與辯證法着手，去反對王明們的「教條主義」與另一些實際工作者的「經驗主義」。

毛澤東和王明在抗日戰爭時期意見之正面衝突，首次導發於1937年11月毛澤東對延安黨活動分子會議上所做的報告：《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此時王明派據說從右邊攻擊這個報告提綱，特別攻擊提綱中所着重的「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立場。據《選集》編者的注釋告訴我們，這個新右派主張「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堅決反對毛澤東提出的「獨立自主」^[5]。雙方爭論，據說延長了將近一年，直到1938年10月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才在基本上克服了這種右的偏向」。(見《選集》卷二，378頁。)

所謂基本上「克服了」王明派的偏向，意思即是說，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上雖然對王明從右邊來的新進攻獲取了勝利，但這勝利卻既非全面，亦非徹底的。在六中全會的報告與結論中，毛澤東根本不曾提到過王明。遇到要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這立場記上名字時，則不是說「有人」，就是說「某些同志」；當他提到王明的論據時，或用上「如果」，或諛稱「聽說」。這類外交方式主要雖然用以應付莫斯科，然對王明派的勢力有所顧忌，則也是事實。毛澤東此種無記名射擊改作指名攻擊，甚至要遲至中共全國勝利之後，而且還是假手於人的。在《選集》二卷編輯人對《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一文的解題中，才明白說出：「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是當時毛澤東同志與陳紹禹同志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上意見分歧的突出問題之一。」(見卷二，526頁。)

據說，王明的右傾思想，當時還影響了新四軍的領導層，特別影響了項英。結果據毛澤東在 1942 年的回溯中說：「又使得這些同志的錯誤思想影響最大的那些地方的革命工作，遭到很大的損失。」（見卷三，952 頁。）

「皖南事變」發生於 1941 年 1 月。不管事變中項英的錯誤是否確實與王明的「思想」有關，或只是毛澤東故意將這兩項錯誤拉在一起，總之，到了那個時候，有一個事實是明白的：王明從抗日戰爭以來，在政治上發動反攻，以便奪回中共黨軍大權的那個企圖，此時已被毛澤東確定地擊敗了。在同時期中，毛澤東一直在繼續他的理論工作，其間比較值得注意的是《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1939 年 12 月）與《新民主主義論》（1940 年 1 月）。在這兩部著作中，毛澤東首次將中國革命的各個基本理論問題，主要依照了史大林的觀點，作了有系統的，全面的研究和闡述。在這以前，除了 1937 年的兩小冊哲學論文之外，毛澤東的所有文字，可以說都是政論性的、策略性的，特別又偏於軍事性的。因此，如果我們一定要指出一個日期，標誌出作為一個完整體系的毛澤東思想之出現，那應該說是 1940 年，其作品為《新民主主義論》。自從這個時期起，毛澤東無論在思想、政治、組織諸方面，都具有前所未有的信心與力量。因此，他和王明之間的鬥爭，也就從上述的第二時期踏入第三時期，即從二人的再度衝突時期進入毛澤東的全面進攻與絕對勝利的時期了。

這個時期開始於 1941 年春天，是由毛澤東的兩篇文章：《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與《改造我們的學習》揭開序幕的。後一篇文章原是毛氏對延安幹部會議所作報告，其用意及其重要性，《選集》編者在該文的解題中有如下說明：

這篇報告和《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兩篇文章，是毛澤東同志關於整風運動的基本著作。在這些文章裏，毛澤東同志進一步地從思想問題上總結了過去黨內路線的分歧，分析了廣泛存在於黨內的偽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小資產階級作風，主要是主觀主義的傾向、宗派主義的傾向，和作為這兩種傾向的表現形式的黨八股。毛澤東同志號召開展全黨範圍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運動，即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原則整頓作風的運動。毛澤東同志的這個號召，很快地在黨內和黨外引起了無產階級思想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大論戰，鞏固了無產階級思想在黨內外的陣地，使廣大幹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了一步，使黨達到了空前的團結。（見《選集》卷二，796頁。）

這裏沒有提到王明名字，但「黨內的偽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小資產階級作風」究竟以誰為代表，卻是不言而喻的。不過這個「學習與整風運動」，如果說其唯一目的只在打擊王明，那是不對的。踏進四十年代，毛澤東和王明在黨內的地位可說已經懸殊。後者縱然有「國際」做背景，雖然在黨內還保留得若干勢力，但認真想和毛澤東抗衡，想和一九三〇年代的初期一樣，借外力再度打敗毛氏，可能性已屬不大。所以那一時期的運動，主要任務與其說是在於「破王明思想」，毋寧說而且應該說是在於「立毛澤東思想」。此一時期王明路線之屢被提及，逐漸帶有示眾之意，而不是為了它有什麼特別嚴重的威脅。《題解》說毛澤東這些文章「進一步地從思想問題上總結了過去黨內路線的分歧」，這確是那次運動的主要目的之一。在那個「總結」中，統治全黨的時間最長、氣焰最盛、為害最烈的王明路線自須清算，陳獨秀、李立三、張國燾的路線當然也被一一批判；可是「總結」的用意決不在於真正客觀地算清舊賬^[6]，而主要在於造成這樣的一篇賬，

即：毛澤東的過去一切都入於「資產」項下；而陳、李、張、王以及其他有過意見的人的種種，都記在「負債」一邊。換句話說，那時的總結有着這樣一個大目的：過去一切正確意見均出於毛澤東，一切錯誤和罪惡的立場由於他的對手方。毛澤東是一切正確，從來正確，你不信嗎？有史為證；其他的人則一切皆錯，無一不錯，你若不信，也有史為證。一句話，學習運動與整風運動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造成「毛澤東思想」這項精神武器，以此造成史大林式的思想統一，更以此造成史大林式的個人崇拜。

毛澤東的此一企圖，他的這項運動，當時在黨內引起了怎樣的反應，是否引起過抵抗，我們至今還沒有足夠的材料來做出答覆。事實可以確定的只是：這個運動延長了差不多四年，到1944年才結束。同時，原本決定在1938年（六中全會將它推遲至1939年）召集的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一再推延，終於延期至1945年4月才得真正召開（延期的原因可能有幾個，但「總結」未曾完全確定，必然是原因之一）。由此二事，可見王明派，以及另一些不願見「個人崇拜」出現的人們，對毛的企圖是給過一點抵抗的。不過到1944年年底與45年年初，毛澤東終於獲得了對一切反對者的徹底勝利。一個全盤奏凱的宣告出來了，那就是差不多與七次大會同時召開的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上通過的決議：《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朱正按 擴大的中共六屆七中全會於1945年4月20日開會，並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4月21日七次大會開預備會，23日七次大會正式開幕。】

如此，「毛澤東思想」誕生了。在跟着舉行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澤東思想」被史無前例地寫進了黨綱，被宣佈為黨的「一切工作的指針」，更被規定於黨員的義務中，明定每一黨員的第一項義務是要：「努力地……領會毛澤東思想的基礎。」

延長十四年，進行於毛澤東和王明之間，亦即進行於「土共產」與「洋共產」之間的中共黨內鬥爭，就這樣以毛澤東的巨大勝利，以「毛澤東思想」的加冕來結束了。

不過，這場大勝還不是殲滅性的，關於「毛澤東思想」的故事也未曾完結。

王明的故事多半已經完結了。在「毛澤東思想」登極的第七次大會上，王明也上台歌頌了「偉大的領袖毛澤東」，也公開承認過自己的錯誤。在毛澤東方面，大概為了表示「治病救人」這一口號的非假，或者要給莫斯科留點面子，還是讓王明叨陪中委的末座（僅在秦邦憲之上）。中國全國勝利之後，王明擔任了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主任委員，起草過《婚姻法》。中共八次大會上沒有他發言的份，卻讓他聽了許多人對他的控訴（特別是在他手下做了七年「小媳婦」的李立三）；結果，他在新中委中仍舊以末名入選。法制委員會的工作被取消了，近年來轉行做研究工作，其成績讓我們見到的有他所編注的《太平經》——一部後漢人着的有關宗教、哲學和社會思想的書。這種工作自然也是很有意義的，不過對雄心齊天的王明而言，總未免太寂寞，或「大材小用」了^[7]。「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今後這位自己也來「澆菜的青年」（王明年僅五十餘）是否還有機會起來與孟德的崇拜者，或這個「崇拜者」的後繼人，爭一日之長呢？照目前的情形看，可能性是消失了，但並非絕對沒有可能——至少和毛澤東的後繼者之間。

現在讓我們再談「毛澤東思想」的故事。那故事是發生在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我們知道，八次大會召開於1956年9月。那時離毛澤東的勝利大會十一年，離中共之取得全國政權七年。在這些年中，毛澤東的威望和力量，在全黨、全國乃至全世界，都大大提高

了，提高得和 1945 年的七次大會時候絕不能比。可是，在那個八次大會上，一個新黨章通過了。新舊黨章之間一個最大的不同，那就是：作為「一切工作指針」的「毛澤東思想」被取消了。黨員的義務，也不再規定要「領會毛澤東思想」了。為什麼做這個修改？報告人鄧小平沒有一言提及。大會上沒有一個代表發出疑問，普通的讀者當然也不會注意及此。可是，這是一個極大的修改呀。我們必須尋找原因。

毛澤東突然謙虛起來了？不成理由。王明們勢力又抬頭了？不是事實。「毛澤東思想」業已完成了革命，所以不需要了？不成話。廣大黨員群眾的理論水準提高了，反對這個規定？看不見跡象。那末究竟為了什麼呢？很簡單，為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在八次大會召開之前半年，蘇聯共產黨召集了有名的第二十次大會。大會上，以赫魯曉夫為首的一系，為的要反對和打倒以馬林可夫、莫洛托夫等更直接的史大林系統，便利用了當時蘇聯民眾中普遍存在的民主要求，清算了史大林的獨夫作風，指責了他的「個人崇拜」。

不管蘇共黨內反「個人崇拜」鬥爭的真實性如何，此一鬥爭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形成了風氣，發生了影響，卻總是事實。它所及於中共的影響，更屬非常巨大。中共領導層接到這個消息，簡直是狼狽不堪的。因為，它正在黨內國內繼續製造並鞏固毛澤東崇拜，正在仿照三十年代後期史大林的辦法，把毛澤東神化，變成「救世主」，變成「有智慧的太陽」。在普通民間，中共更在將毛澤東代替人們過去膜拜的一切偶像，它叫人們每飯不忘，每事不忘去感謝主席的恩情。不論婚喪慶弔，主席像都被抬出來當作儀式的中心，承受「人間的香火」。正在這樣熱烈的造神運動中，攻擊「個人崇拜」的消息來了——這是一個多麼鮮明、又多麼煞風景的對照呀！造神運動無疑在一般人中，

部分也在黨員群眾中，引起了反感，至少引起了惶惑。人們所以容忍它，甚至支持它，徒以革命正在前進之故，又以它有史大林的前例之故。可是，現在，史大林的「個人崇拜」都被宣佈為錯誤，為罪過而加以進攻了。那末對於史大林「弟子」的「崇拜」更不必說了。這種情緒迫得中共的領導層有所顧慮，終於迫得毛澤東「謙虛」起來。

結果是：在八大大會上，他不聲不響地將「毛澤東思想」這塊招牌從黨章的綱要和條文中除下來了。

當然，整個共產主義陣營中的民主風向，都驅使毛澤東這樣做。波茲南工人暴動，匈牙利工人起義等等一連串反對史大林式獨裁的鬥爭，更有助於毛澤東的「謙虛」。他發動了「大鳴大放」，他發表了解決「內部矛盾」的辦法。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毛澤東思想」這個名詞在所有的刊物上與演詞中消失了。若以《紅旗》雜誌的文字為例，那末我們看見，只在1958年7月的第四期上，登載了陳伯達為紀念中共成立三十七周年在北京大學發表的演說：《在毛澤東同志的旗幟下》。此後又沉寂了，沉寂了一年有半，直至1960年1月，《紅旗》才突然再以顯着地位登載一篇文章：〈學習毛澤東思想，充分發揚自覺的能動性〉。第八期上，登載了〈列寧主義萬歲！〉（這是以列寧主義掩護毛澤東思想，表面上反對鐵托，實際上反對赫魯曉夫的。）接着，到了10月份的第十九期上，配合着《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的出版，一次轟轟烈烈、大張旗鼓的「毛澤東思想」運動又開始了。那一期上發表了林彪寫的〈中國人民革命戰爭的勝利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發表了〈在戰略上輕視敵人，在戰術上重視敵人〉的社論，以及〈選集第四卷介紹〉。接下來，在第二十、二十一期合刊上，發表了〈中國人民革命勝利經驗的基本總結〉，以及〈辯證法是革命的代數學〉。第二十二與二十三期中，又再接再厲地，登載了頌揚「毛澤東思想」的

煌煌大作，總之，「毛澤東思想」自從在 1956 年 9 月的中共八大大會上被黨章「除名」之後，表面上「消聲匿跡」了四年。直到 1960 年 10 月間，才再度被當作一個迫切的政治任務，以全力在全黨全國提出來，提到政治宣傳運動的最前列。現在（1961 年夏），這個運動還在繼續，正在向文化政治的各個領域普遍開來，深入下去。究竟這個運動將如何發展？會發展到如何荒唐程度？在未來的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會否再度「正名」，會否將「毛澤東思想」在黨章上恢復地位？這些，我們不想猜度也不必猜度。我們在結束以造神為目的的「毛澤東思想」的故事之前，只想解釋一下這樣一個問題：在 1956 年靜下去的「毛澤東思想」的呼號，為什麼在 1958 年再度響起，且在 1960 年又大叫大嚷呢？難道是為了宣傳第四卷《選集》的發行嗎？當然不是。理由顯然還要大得多，簡單說，有下列二者：（1）對外，由於中共領導層和克里姆林宮新主人之間發生了爭執；（2）對內，由於「總路線」，「大躍進」以及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所造成的經濟和政治上的種種困難。加強個人崇拜自非解決困難的好辦法，但是已被崇拜的個人，以及屬於此一崇拜制度的內裏人物，卻往往會錯誤地認它為不二法門。

講完了「毛澤東思想」的故事，讓我們來研究毛澤東思想的真實內容。

不過在開始研究之前，請允許我稍稍跑一段野馬。因為「毛澤東思想」這個名詞是劉少奇第一次正式報告出來的，是他，在《論黨》的報告中，首次闡揚了這個思想的。由此我想起了劉少奇和毛澤東的關係，更由此我又想到了數百年前那位出名的英國哲學家和政治家——佛蘭西斯·培根。此人寫過不少篇精深簡短的散文，其中一篇是〈論友誼〉。目前令我特別感興趣的是下面幾句：

人有一身，而此身又局限於一地。可是他若有了友誼，生活上的一切職務可以請到代表了。因為他的朋友可以替他去做這些事情。要知人世間有多少事，是為那些略要面子與略具風度的人所不能親說親為的呀！一個人很難自道功績而不失謙遜，更不必說自誇功績了；一個人向人求懇，有時也是難於啟齒的；諸如此類的還有不少。可是所有這些事情，自己開口不免臉紅的，倘若出之於朋友之口便無傷大雅了……

當初，略知中共歷史的人，看見劉少奇位於毛澤東之次，而且確定了繼承人資格，都非常詫異的。因為劉少奇的資格雖老，理論與工作的能力雖然不低，但論「文采風流」，不但遠輸毛澤東，而且略遜周恩來。如今我們讀過了上引培根的文字，那末毛劉之間的關係便可以釋然了。劉少奇在七次大會上的報告，全篇就是對毛澤東與毛澤東思想的頌讚，它說：「我們的黨，已經是一個有了自己偉大領袖的黨，這個領袖，就是我們黨和現在中國革命的組織者與領導者——毛澤東同志。」報告又說：「我們的大會應該熱烈慶祝：在中國共產黨產生以來，產生了、發展了他們這個民族的特出的，完整的關於中國人民革命建國的正确理論。這個理論……就是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就是中國的共產主義，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這樣的話，不必論其所含的真實性有多大，但若由本人親口說出來，總是不便的吧。誰能替這個人代說，誰便是這個人最親近與最知心的朋友。

野馬跑過，讓我們來看看由劉少奇首次正式報告的毛澤東思想的具體內容為何：

毛澤東思想，從他的宇宙觀以至他的工作作風，乃發展着與完善着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乃是中國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國理

論。這些理論，表現在毛澤東同志的各種著作以及黨的許多文獻上，這就是毛澤東同志關於現代世界情況及中國國情的分析，關於新民主主義的理論與政策，關於革命統一戰線的理論與政策，關於革命戰爭的理論與政策，關於革命根據地的理論與政策，關於建設黨的理論與政策，關於文化的理論與政策等。這些理論與政策，是完全馬克思主義的，又完全是中國的。這是中國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現和理論上的最高標準。（見劉少奇《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論《總綱》的第二部分）

劉少奇在這裏列舉了毛澤東思想的九項內容，條目雖多，而含義卻嫌龐雜；如果我們從更能概括的角度去看問題，那末，我想可以分作如下三大類：（1）關於革命的策略和戰術方面；（2）關於革命的原則和戰略方面；（3）關於思想文化方面。下面我們將依循這三個方面，比較詳細地研究毛澤東的思想。我們將客觀地肯定他的積極的貢獻；同時也將公正地指出它的錯誤或軟弱的地方。他的功績我們必定承認，但為了神化目的而硬造出來的榮譽卻必須揭穿。這樣做，我們希望能夠確定毛澤東其人及其思想的真實面目，並確定他作為中國乃至世界歷史上一個大革命家與思想家的真正地位。

注釋

1. 李立三當時是政治局委員兼宣傳部長，黨的總書記為向忠發，政治局中還有周恩來等其他委員，同時更有國際代表常駐上海；以如此組織實行莫斯科決定的史大林路線，那是絕不能由李立三負責的。

2. 根據我們已經看到的中文文獻，王明本人好像並未隨同中央機關內遷到江西。他從上海回到他的「祖家」莫斯科，當國際代表去了。一直要到1937年冬天，他才從蘇聯回來。
3. 不過為了更符合於事實起見，我們應該替他再說明兩點：(1) 有意地不願將理論著作大量翻譯，並阻礙它在黨內散佈，在中共的歷史上只有過兩種人，一種是最早的旅莫支部人物，另一種便是王明派。他們要這樣做，首先倒並不「為着散佈自己的錯誤的觀點和主張」，而是為了壟斷理論，獨霸「經典」的引徵權與解釋權，藉以造成其「紅色買辦」的地位。(2) 文中只說「史大林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著作」，其實，為中國革命的實際領袖們（毛澤東乃其中之一）所未曾讀到，為「機會主義者」所有意或無意地阻礙翻譯流傳的，不僅是史大林的著作，而是所有馬克思的著作。
4. 最近看到張國燾的回憶錄，才知道王明與康生、陳雲，是在1937年12月下旬，坐蘇聯飛機飛到延安的。——1971年1月補注。
5. 因為我們無法看到爭論對方的文件。王明究竟比毛澤東更右幾多，我們無法確定。因為毛王兩人此一時期的爭論，和其他所有時期的爭論一樣，我們都只能從「經過技術性修改」的毛澤東的文字裏約略見到一點王明路線的面目。我們並不因此懷疑王明的「右的偏向」，因為史大林正在偏右的時候，王明決不會不右的。我們所懷疑的是毛澤東可曾真的比王明左些，以及如何左法，何時左起。據《選集》，那個引起右派反對的提綱：《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如果發表時不曾做過本質上修改的話，那末毛澤東的立場確比史大林的，也就是比王明的立場左得多。他提出了統一戰線中「誰領導誰」的問題，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號召克服投降主義或遷就主義。但照那未曾選入《選集》中的《論新階段》（此書即毛對召開於一年之後的六中全會所作報告全文）看，則毛氏主張其實也非常之右，與王明所代表者難分高下。
6. 撇開史大林的第三國際而來「總結過去黨內路線的分歧」，就絕對不可能真正客觀地清算舊賬。這樣的清算只能愈算愈糊塗，愈結愈混亂。這一層我們將在後面詳說。
7. 事後知道，研究道家的王明是另有其人，他不是原名陳紹禹的王明。這是個誤會。——王凡西，1987年7月注。

五、高明的戰術家

毛澤東有句名言：「戰略上輕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這句話，不同的了解可以有不同的意義。有的意義正確，有的意義謬誤。簡單地將它了解成對付敵人時候的膽大心細，當然絕對正確。若了解為大處不妨輕敵，小處必須重敵，那就糟了。依毛澤東的本意，這句話首先是說帝國主義及一切反動統治，在整個歷史的發展上是已經過了時的，注定要死亡，其本身充滿了無法解決的矛盾，所以外強中乾，是紙老虎，我們不必怕它們；不過雖然如此，反動制度是不會自行死亡的，在臨死掙扎中而且要加倍兇惡的，因此和它們鬥爭時，仍必須鄭重其事，戰戰兢兢，一絲兒都鬆懈或疏忽不得。這個了解，當然對的。但用「戰略」和「戰術」來表示上述兩種態度，卻並不恰當。資本主義之注定要死亡，其本身矛盾無法解決，至少，從馬克思寫《共產黨宣言》，寫《資本論》以來就已經如此了。可是馬克思的全部革命理論，特別是由列寧發揮出來的布爾雪維克主義，主要的，亦即他們所「重視的」，乃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戰略思想，而非實現這些戰略的戰術手段。說「戰略上輕視敵人」，意思當然不是說克敵的戰略可以輕視，它只是說：在我們的戰略部署上，敵人的力量不必重視。但這樣的說法也還是有毛病的，因為第一，任何意義的輕敵都會招致失

敗；第二，今天的帝國主義畢竟還不是死大蟲，因而不必講求捕捉的戰略，而只須考慮宰割的方法得了。

毛澤東所以會說出這樣一句口號來，我覺得，是由如下兩種情形促成的：一、毛澤東本質上原是一個非常傑出的、聰敏靈活的戰術家與政略家；卻不能算是同樣傑出的、高瞻遠矚的、受着一貫原則性指導的戰略家；二、在長時期鬥爭中，毛澤東高明的戰術時常能補救與改正他不甚高明的戰略；且因許多有利的客觀因素之助，常能來得及完成這些補救與改正工作，因此，使他相信彷彿只要有了好的戰術，便可以獲取革命勝利了。

從「戰略上輕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這句名言的一個特定意義着想，我們不但可以看出毛澤東首先是一個戰術家這個事實，而且還可以看出，中國革命在其爭取到勝利的途中，戰略與戰術的關係曾經具有了如何彎曲的形態。

這裏先讓我們研究戰術家的毛澤東。不過首先，我們還得解釋一下戰略和戰術之間，戰略家與戰術家之間的區別，尤其是要解釋我們是怎樣了解這個分別的。關於這個區別，毛澤東有過這樣的說明：「研究帶全局性的戰爭指導規律，是戰略家的任務。研究帶局部性的戰爭指導規律，是戰役學和戰術學的任務。」（見《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這個定義並不錯，但非我們在本文中了解的意義。我們是在更寬廣的意義上，即不僅在軍事意義、而且在政治意義上來觀察和區別這兩者的。廣義的戰略和戰術，即不僅指軍事意義的，而更加指政治意義的戰略和戰術，其區別當不限於「全局性」與「局部性」之分。二者的區別，我們認為主要得看：凡事先求原則性的貫通，全面性的融會，然後從原則立場來觀察與解決各個具體問題，這是戰略家的態

度；反之，凡事只對個別的具體問題調查研究，不能作全面性的概括，不能作原則性的綜合，同時以個別問題的答案，不斷影響或經常改變原則立場，這種人，屬於戰術家。

就狹義說，即單就軍事意義說，毛澤東不但是高明的戰術家，抑且是傑出的戰略家。但就廣義說，即就軍政兩義，更特別就政治的意義說，那末作為一個戰略家的高度，便遠不如他戰術家的高度了。

我們如今在此談論他的戰術家地位，當然是取其廣義。

「毛澤東思想」對於中國革命的最大貢獻，乃是當 1927 年革命失敗之後，將力量投向農村，武裝農民，建立根據地，實行革命戰爭。在這方面，也正是戰術家毛澤東的身型長得最高的地方。不過我們這樣說，一定有人會出來反駁：如此重要的一條革命路線，為什麼只能算是戰術上的大成就，卻不能算作戰略上的大貢獻呢？單憑這一點，為什麼還不能稱毛澤東為偉大的革命戰略家，卻只能稱為偉大的戰術家呢？列寧之所以成為偉大的戰略家，主要因為他為俄國革命提出了一條戰略路線：無產階級聯絡農民，反對資產階級，為工農民主專政的建立而鬥爭，藉以完成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並開展社會主義的革命。然則毛澤東的武裝農民，建立根據地，實行革命戰爭的路線，為什麼不能與列寧的路線齊肩，同被看作為革命戰略呢？

我們認為二者不能等量齊觀。理由第一是，毛澤東所最先堅持的領導農民武裝革命的路線，實質上屬於鬥爭方法，並非革命原則。鬥爭方法正確與否，對革命的成敗自有極大影響；但革命方法和手段的本身，對革命性質，甚至對革命諸動力之間的結合關係，卻不會有決定作用。毛澤東的武裝革命道路，是在史大林給規定的戰略路線之下採取並進行的。當毛澤東走上這條路線時，一再聲明：「我們完全同意

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見《井岡山的鬥爭》）。「黨的六次大會所指示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是對的」（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由此可見，毛澤東關於農村革命根據地的思想，僅僅是如何實現共產國際與中共六次大會所規定的戰略路線的一種戰術路線，它本身決不是戰略路線。第二，毛澤東這個「以武裝對武裝」的思想，自始不曾從我們這大時代的特性，從國民黨資產階級統治的半法西斯式的軍事化特性出發，加以分析而提出的；它是從中國政局的不定，統一難成，等等條件出發，因而斷定了紅軍以及紅色政權之有存在可能，並發明出、從戰鬥中歸納出許多武裝鬥爭的戰術。因此，它不是一個原則性的、瞻顧全局的如何完成革命與完成何種革命的戰略，而只是革命失敗後，被迫自衛、先行後知、逐漸自覺的一種戰術。誠然，還在1928年11月，毛澤東就說過：「以農業為主要經濟的中國的革命，以軍事發展暴動，是一種特徵。我們建議中央，用大力做軍事運動。」（見《井岡山的鬥爭》）同時在稍後兩月的另一篇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毛澤東批評了「這種全國範圍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爭取群眾後建立政權的理論」，說它「是於中國革命的實情不適合的」。但他並未在戰略意義上提出這個批評，即毛澤東不曾與當時的中央主張根本對立，他不曾明白堅決地提出放棄城市的群眾運動，集中力量於各個根據地的建立，然後由鄉村的根據地出發，以武力解放城市和全國。相反，在同一篇通信中，毛澤東引徵他的一封舊信上的立場如下：「……黨的無產階級基礎的建立，中心區域產業支部的創造，是目前黨在組織方面的重要任務；但是在同時，農村鬥爭的發展，小區域紅色政權的建立，紅軍的創造和擴大，尤其是幫助城市鬥爭，促進革命潮流高漲的主要條件。所以，拋棄城市鬥爭是錯誤的……」這裏說得很明白，依據毛澤東當時的想法，和當時及以後的所有中外馬克思主義者的想法一樣，農民的武裝隊伍及其地方政權，

對整個的革命鬥爭說，只能起「幫助」與「促進」的作用罷了。由此可見，以後中國革命的實際發展，即完全離開了城市（1933年以後），完全依靠農民的武裝及其地方政權，終於在內戰中擊敗了國民黨，解放了全中國，顯然不是按照了一個預見的戰略路線，而是違反了中共的、乃至毛澤東本人的戰略路線的。因此，如果說毛澤東關於「解放農民，武裝鬥爭與革命根據地」的理論，對於中國革命的貢獻，在理論的價值上簡直堪與列寧那個著名的戰略公式齊肩，是不確實的。

但雖如此，毛澤東的此一方面的理論，即使屬於戰術性質，卻仍具有非常巨大的價值，值得全世界的革命家研究，尤其應為落後國家的革命者所認真學習，並加以接受和實行的。

前面我們提過，中外馬克思主義者關於如何組織，如何促進與如何實行革命，有一套傳統的與正統的辦法——戰術。那套辦法是：發行報紙，將革命幹部組成政黨，組織無產階級群眾，組織無產階級以外的勞動群眾，不斷進行鼓動宣傳，不斷領導一切（經濟的和政治的，合法的和非法的）鬥爭，以此擴大政治影響，增加組織力量，直至全國性的革命危機成熟（主觀上有廣大群眾的擁護，客觀上統治階級陷於政治與經濟的崩潰），乃由工人階級發動一次或數次革命（暴力的或非暴力的，議會內的或議會外的），首先在中心城市奪取政權，組織新的國家機構（包括軍隊在內），然後將革命（經過內戰或不經過內戰）推廣至於全國。

這樣一條進行革命的道路，導源於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導源於資本主義社會中勞資兩階級的主要對立，並導源於由此發生的城市領導鄉村，工人階級領導一切非無產階級鬥爭這個事實。巴黎公社以後的三十年中，西歐資本主義有了長足發展，在發展中形成了以議會

運動為主要目標、以組織廣大群眾，領導群眾的日常鬥爭為中心工作的鬥爭道路，這條道路到了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顯出了嚴重的機會主義與改良主義的墮落，於是在政治與經濟均較落後的俄羅斯，當那個改良的議會主義的「革命」道路最突出地暴露了自己的不合適之後，就發生了以列寧為首的布爾雪維克派的戰略戰術路線。這條路線以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為基礎，一方面繼承了俄國固有的民粹派革命鬥爭的一些傳統，另一方面採取了西歐工人運動的某些方法；它接納了二者的優秀之點，否定了二者的錯誤與墮落之處。它從前者繼承了戰鬥先鋒隊的組織特點：嚴密、集中、戰鬥性與「陰謀性」；卻否定了它的農民觀點，否定了它的少數單幹主義，官僚命令主義等等。從後者，它採取了組織群眾、教育群眾、領導群眾的路線，卻否定了它的只改良不革命的想法，否定了它的選票之外無鬥爭的那種觀念。如此完成起來的列寧的這種革命方法，配合了他正確的基本戰略思想，完成了俄國革命，因而便推廣到了全世界。

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從它存在的第一天起，便是在共產國際的直接指導之下，實行上述的革命方法或革命戰術的。以「黨報」作為「組織者」，以中國最大的工業中心上海為基地，以爭取工人、教育工人、組織工人為主要工作，將同樣的黨組織與群眾組織擴大到全國，首先擴大到國內各大城市。黨活動的最大目的在於散佈自己的政治影響，增大自己的組織力量，然後在合適的、未可預知的條件中，實行革命。這樣的革命方法，不但當北伐戰爭以前及其進行期間如此，便是革命失敗以後，處於國民黨恐怖統治下之時亦是如此。不但史大林主義的中共中央系統如此，由中共分裂出來的中國托洛次基主義派也是如此，不但王明們是如此想與如此做，就是毛澤東也是如此想的，雖然他不曾一貫地如此做。毛澤東在思想上接受了傳統的革命方法，

事實上卻不曾始終這樣做。這因為毛澤東首先是一個實行家，是一個將行動看得重於理論的革命家。又因為毛澤東的思想主要是由中國的傳統知識構成的，外來的馬列主義的理論他知道得少（特別在二十年代），受束縛的程度沒有「洋教條主義者」那麼厲害。所以在客觀事變與鬥爭邏輯的壓迫之下，他被迫改變了他自己和一切馬克思主義者共同奉行的革命戰術。他以落後僻遠的鄉村代替濱海的現代化的大城市；以武裝農民的暴動來代替對工人階級的領導和組織；以少數共產黨人對部分農民軍隊的統率和控制，代替了工業無產階級的政治鬥爭對鄉村農民的影響和領導；以武裝割據、持久戰爭、槍桿子打天下的路子，代替了宣傳鼓動、長期組織、由總罷工走向革命的方針。當毛澤東實行如上種種「代替」之時，並非放棄（至少不曾公然放棄）了共產黨革命的正式策略，他堅持工人階級的領導，他繼續承認大城市工作居於首要地位。當他發現「知」與「行」之間有所衝突之時，他便讓前者去適應後者，但此適應決不越過一個限度，即決不公然違反馬列主義關於革命遂行的方法，尤其不放棄那些更加根本的立場。譬如關於「工人階級領導」問題，毛澤東決不會說（也從不曾說），農民根本不需要這個領導，而只是說，信仰堅定、組織嚴密的少量共產主義者的領導，為了指引或保證武裝農民進行反國民黨的鬥爭，已經足夠了。又如關於武力割據的前途問題，毛澤東亦非自始就具有絕對信心，更不敢賦與它以獨一無二的重要性。他老是宣稱：「割據」鬥爭是繫於全國革命形勢的是否進展的（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總之，毛澤東採取了不同於傳統的與正式的共產黨革命的戰術，最初是實迫處此，事與願違，然後是知隨行變，逐漸形成自己的看法。不過一直要到1938年11月，即當他實行了十一年之後，他的這個獨特的看法才首次有了一次全面的與理論性的說明。那是他當時對六屆六中全會

所作結論的一部分，以《戰爭和戰略問題》為題收入於《選集》中的。為了它的意義重大之故，特長段摘錄於後：

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原則是普遍地對的，不論在中國在外國，一概都是對的。

但是在同一個原則下，就無產階級政黨在各種條件下執行這個原則的表現說來，則基於條件的不同而不一致。在資本主義各國，在沒有法西斯和沒有戰爭的時期內，那裏的條件是國家內部沒有了封建制度，有的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外部沒有民族壓迫，有的是自己民族壓迫別的民族。基於這些特點，資本主義各國的無產階級政黨的任務，在於經過長期的合法鬥爭，教育工人，生息力量，準備最後地推翻資本主義。在那裏，是長期的合法鬥爭，是利用議會講壇，是經濟的和政治的罷工，是組織工會和教育工人。那裏的組織形式是合法的，鬥爭形式是不流血的（非戰爭的）。在戰爭問題上，那裏的共產黨是反對自己國家的帝國主義戰爭；如果這種戰爭發生了，黨的政策是使本國反動政府敗北。自己所要的戰爭只是準備中的國內戰爭。但是這種戰爭，不到資產階級處於真正無能之時，不到無產階級的大多數有了武裝起義和進行戰爭的決心之時，不到農民群眾已經自願援助無產階級之時，起義和戰爭是不應該舉行的。到了起義和戰爭的時候，又是首先佔領城市，然後進攻鄉村，而不是與此相反。所有這些，都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所曾經這樣做，而在俄國的十月革命中證實了的。

中國則不同。中國的特點是：不是一個獨立的民主的國家，而是一個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國家；在內部沒有民主制度，而受

封建制度壓迫；在外部沒有民族獨立，而受帝國主義壓迫。因此，無議會可以利用，無組織工人舉行罷工的合法權利。在這裏，共產黨的任務，基本地不是經過長期合法鬥爭以進入起義和戰爭，也不是先佔城市後取鄉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

……

所有這些，表示了中國和資本主義國家的不同。在中國，主要的鬥爭形式是戰爭，而主要的組織形式是軍隊。其他一切，例如民眾的組織和民眾的鬥爭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一定不可少，一定不可忽視，但都是為着戰爭的。在戰爭爆發以前的一切組織和鬥爭，是為了準備戰爭的，例如五四運動（1919年）至五卅運動（1925年）那一時期。在戰爭爆發以後的一切組織和鬥爭，則是直接或間接地配合戰爭的，……

「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也是中國革命的優點之一。」史大林同志的這一論斷是完全正確的，無論對於北伐戰爭說來，對於土地革命戰爭說來，對於今天的抗日戰爭說來，都是正確的。這些戰爭都是革命戰爭，戰爭所反對的對象都是反革命，參加戰爭的主要成分都是革命的人民；……革命戰爭「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也是中國革命的優點之一」，這一論斷，完全適合於中國的情況。中國無產階級政黨的主要的和差不多開始就面對着的任務，是聯合儘可能的同盟軍，組織武裝鬥爭，依照情況，反對內部的或外部的武裝的反革命，為爭取民族的和社會的解放而鬥爭。在中國，離開了武裝鬥爭，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務。

在這一點上，我們黨從1921年成立直至1926年參加北伐戰爭的五六年內，是認識不足的。那時不懂得武裝鬥爭在中國的極端的重要性，不去認真地準備戰爭和組織軍隊，不去注重軍事的戰略和戰術的研究。在北伐過程中，忽略了軍隊的爭取，片面地着重於群眾運動，其結果，國民黨一旦反動，一切民眾運動都塌台了。1927年以後的一個長時期中，許多同志把黨的中心任務仍舊放在準備城市起義和白區工作方面。一些同志在這個問題上的根本的轉變，是1931年反對敵人的第三次「圍剿」勝利之後。但也還沒有全黨的轉變，有些同志仍舊沒有如同現在我們這樣想。

經驗告訴我們，中國的問題離開武裝就不能解決。……

毛澤東比較原則性與戰略性地提出了並說明了武裝鬥爭在革命中的重要性之後，接着又拿國共兩黨的戰爭史來做了例證，他說：

從孫中山組織革命的小團體起，他就進行了幾次反滿的武裝起義。到了同盟會時期，更充滿了武裝起義的事蹟，直至辛亥革命，武裝推翻了清朝。中華革命黨時期，進行了武裝的反袁運動。後來的海軍南下，桂林北伐和創設黃埔，都是孫中山的戰爭事業。

蔣介石代替孫中山，創造了國民黨的全盛的軍事時代。他看軍隊如生命，經歷了北伐、內戰和抗日三個時期。過去十年的蔣介石是反革命的。為了反革命，他創造了一個龐大的「中央軍」。有軍則有權，戰爭解決一切，這個基點，他是抓得很緊的。對於這點，我們應向他學習。在這點上，孫中山和蔣介石都是我們的先生。

……

中國也有些不要軍隊的政黨，其中主要的一個是進步黨，但是它也懂得必須靠一個軍閥才有官做。袁世凱、段祺瑞、蔣介石（附蔣的是進步黨之一部轉變而成的政學系），就成了他的靠山。

歷史不長的幾個小黨，如青年黨等，沒有軍隊，因此就鬧不出什麼名堂來。

外國的資產階級政黨不需要各自直接管領一部分軍隊。中國則不同，由於封建的分割，地主或資產階級的集團或政黨，誰有槍誰就有勢，誰槍多誰就勢大，處在這樣環境中的無產階級政黨，應該看清問題的中心。

共產黨員不爭個人的兵權（決不能爭，再也不要學張國燾），但要爭黨的兵權，要爭人民的兵權。現在是民族抗戰，還要爭民族的兵權。在兵權問題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點東西。勞動人民幾千年來上了反動統治階級的欺騙和恐嚇的老當，很不容易覺悟到自己掌握槍桿子的重要性。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全民抗戰，把勞動人民推上了戰爭的舞台，共產黨員應該成為這個戰爭的最自覺的領導者。每個共產黨員都應該懂得這個真理：「槍桿子裏面出政權」。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但是有了槍確實又可以造黨，八路軍在華北就造了一個大黨。還可以造幹部、造學校、造文化、造民眾運動。延安的一切就是槍桿子造出來的。槍桿子裏面出一切東西。從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學說的觀點看來，軍隊是國家政權的主要成分。誰想奪取國家政權，並想保持它，誰就應有強大的軍隊。有人笑我們是「戰爭萬能論」，對，我們是革命戰爭萬能論者，這不是壞的，是好的，是馬克思主義的。俄國共產黨的槍桿子造了一個社會主義。我們要

造一個民主共和國。帝國主義時代的階級鬥爭的經驗告訴我們：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只有用槍桿子的力量才能戰勝武裝的資產階級和地主，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整個世界只有用槍桿子才可能改造。我們是戰爭消滅論者，我們是不要戰爭的，但是只能經過戰爭去消滅戰爭，不要槍桿子必須拿起槍桿子。（見《選集》第二卷，529-534頁。）

我們如此冗長地抄錄了毛澤東的文字，因為它太重要了。作者在這裏不但想把武裝鬥爭從戰術提高到戰略地位，而且還想把它當作革命的一個基本原則提出來；不但在中國的特殊的條件中討論這個問題，而且企圖在全世界範圍內解決這個問題，不但談到了近代中國諸政黨和軍隊的關係，而且回溯了中國共產黨對軍事鬥爭態度的歷史的變遷。在這裏，作者是第一次拿自己的革命戰術（或戰略）和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的戰略相對立；在這裏，作者是第一次明白而確定地說出了自己對城市與鄉村，階級與黨，軍隊與黨等等的關係。因此，在此地，毛澤東確實地說明了，至少是提出了不少有關於革命戰略的原則性的問題。如果要說毛澤東思想或毛澤東主義的話，那末我認為，毛氏在這段話中所說種種，最具有代表性與概括性了。

毛澤東從1927年年底開始去拿起槍桿子，走上武裝鬥爭的道路，但他一直是把這當作一種戰術去做的。換句話說，他始終站在由莫斯科規定的、符合於馬克思主義傳統的戰略圈子內去從事武裝鬥爭的。再換一句話說，即當他在湘贛鄉間從事槍桿子運動之時，並不否認城市工人運動仍居首要地位；並不否認城市在全國經濟政治生活中的決定性，並不否認工人對農民，城市對鄉村的領導；並不否認無產階級政黨離開無產階級環境與工人鬥爭便無法建立與鞏固；並不否認若非全國性的革命高潮及時重起，「紅軍」與紅色政權便無發展可能，便不能無限期存

在；並不否認他所發動和領導的農民武裝，對整個革命前途說，只能起輔助作用。總之，毛澤東在 1938 年以前，從來不曾宣佈，至少不曾在文字或演說中公開發佈：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所曾經這樣做，而在俄國的十月革命中證實了的」所有那些，不適合中國，中國要走「相反的道路」。以前，毛澤東的「槍桿子」辦法只是在和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所走的相同的道路上，因為城市革命遭受挫敗，一時無法照樣做，故而暫時採取的一個戰術。一直到了那時，毛澤東才公然宣佈以武裝的農民軍隊來代替城市民眾進行革命，並不是共產黨傳統的戰略路線受到挫折後的一時權宜之計，一種輔助性的活動，而恰恰是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國情所要求的，因而根本與資本主義國家（包括俄國）各共產黨所曾實行過的戰略路線相反的一條戰略路線。

這裏，我們首先可以看出這個事實：原來戰略家的毛澤東是由戰術家的毛澤東不自覺地，逐漸地（十年之久）積累而成的。這個事實原本不足為毛澤東病。因為一般地說，實踐總先於理論，許多戰略家都是從戰術經驗的累積而形成的。即使是「天生的」大戰略家，他的戰略思想亦必須經過實際戰役的考驗，必須在戰術的執行中加以不斷審核，才能完成。所以要評估一位戰略家的高度，可以較少注意於他如何形成的這個過程，較多注意於戰略思想的本身。那末就思想的本身而言，戰略家的毛澤東的地位如何呢？據我們的看法，卻遠不及戰術家毛澤東的高明與傑出。

不信，請讓我們分析一下上面的引文。

說「革命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就未免把一個（正確些說是幾個）正確的原則說得過於片面、過於簡單、過於機械，因而會變得不正確，甚至變得謬誤。「一切革命的

根本問題就是國家政權問題」，這是列寧的名言。「革命是一部分居民用刀槍大炮，即用非常有威權的手段強迫另一部分居民接受其意志的動作」，那是恩格斯給下的定義。至於說奪取政權歸根結蒂是要靠力量，甚至要靠暴力，說以武裝起義獲得了政權的革命多半會發展成內戰，或發展成反對外國反動派干涉的革命戰爭，那是馬恩以下所有革命導師時常這樣說的。所以問題只在於，這幾個正確的原則立場，像毛澤東以上述形式的一句話表達出來，是否依然正確？據我們看是不正確的。依照毛澤東那句話的意思，革命者的唯一與全部能事，就是去研究和組織革命戰爭，憑此以奪取政權。毛澤東稱這個想法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原則」，宣佈它是「普遍地對的，不論在中國在外國一概都是對的」，未免太武斷了。我覺得，從馬克思和列寧的立場中，不可能得出「戰爭解決問題乃革命中心任務」這個原則，同時，以革命戰爭解決革命任務這個屢見不鮮的事實，卻不能憑以確定一個規律，彷彿中外古今的革命一概都是由戰爭決定的。革命，特別是深刻的革命，大抵要變成內戰，要變成革命戰爭，這是事實，也可以說是「歷史的規律」，誰若害怕這個事實，誰不認識這個規律，誰就根本不配談革命，更不能領導革命至於勝利。但在另一方面，鑑於革命和戰爭的密切關係，因而將二者混為一談，認為只要戰爭有辦法，革命就有辦法，戰爭能勝利，革命的任務便解決，那是非常錯誤的。

在毛澤東的那個斷語裏，據我看，便含有並且能發生下述的一些錯誤。第一，把戰爭解決革命問題這種情形定為「中國外國一概對的」通用原則；第二，將革命與戰爭，特別是將革命與革命戰爭混為一談；第三，將群眾性的非軍事性的一切革命運動（宣傳與組織），統統看作革命戰爭的準備與配合；第四，很自然地會相信戰爭萬能，暴力萬能或「槍桿子萬能」。現在讓我們來逐一加以說明：

跟在那個「普遍原則」之後，毛澤東接着指出：「在同一原則下，就無產階級政黨在各種條件下執行這個原則的表現說來，則基於條件的不同而不一致。」接着他說明了這個不一致，即在資本主義國家走的是「不流血的、長期的合法鬥爭的」道路，在中國那樣的「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國家中」，「共產黨的任務，基本地不是經過長期合法鬥爭以進入起義和戰爭，也不是先佔城市後取鄉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

在這兩段說明中，包含着一連串的錯誤。首先，資本主義國家中那種「不流血的長期的合法鬥爭」，不能簡單解釋成「以戰爭解決問題」這個「原則」在「執行」時候的不同「表現」。當毛澤東企圖指出資本主義國家的特殊「條件」時，充分暴露了他「只懂中國，不懂希臘」的弱點。他完全不曉得（至少他不曾說出來）西歐資本主義百餘年來「歷史條件」的變遷，以及適應於此變遷的無產階級政黨「執行原則」時的「表現」的變遷。大致說來，1848年前後的西歐資本主義國家，並非全體一致地內無封建制度，外無民族壓迫。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更不曾普遍存在。因此那一時期的西歐各國的革命黨，其任務基本地亦非「在於長期的合法鬥爭，教育工人，生息力量」……等等。那時候的西歐革命也是不起則已，一起便是暴動、巷戰。這時期一直延長到七十年代之初，以巴黎公社的產生為其頂點。適應那個時期的「條件」，不但有勃浪基主義的暴動戰術，而且也有馬克思主義的暴動藝術。一句話，那時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的革命也要流血的，也是「以戰爭解決問題」的。七十年代之後，一方面因為資本主義的巨大發展，另一方面因為有組織的工人階級力量的日益強大，西歐諸先進國家中的民主制度普遍地加強了，鞏固了，這個時候，工人階級革命的任務才像毛澤東所說的，變成了「長期的合法鬥爭，利用議會講壇，經濟的和政治的罷工，組織工會和教育工人」。人們稱這個時期為資本主義的

「民主的」或「自由的」時期。因為它尚未進入壟斷的財政資本的階段，亦即處於帝國主義前期的、由「自由」資本主義進入到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帝國主義，約莫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之初。這和新的革命戰略與戰術的產生是幾乎同時的。那種戰略戰術發生在歐洲國家中生產最落後但資本組織最集中的俄羅斯，「表現」為列寧所主要設計的布爾雪維克主義。這個主義在許多特徵上是復回到 1871 年之前了，即回復到「陰謀」，回復到「暴力」，回復到「以戰爭解決革命問題」。在典型的社會民主黨人的眼中，列寧主義不多不少地就是勃浪基主義的復活。自從 1905 年以來的半個多世紀中，歐美資本主義國家中無產階級革命黨的任務，隨着帝國主義制度之日趨法西斯化與軍事化，愈來愈被迫轉向於不合法與不和平了。

由此可見，資本主義國家中共產黨（無產階級革命黨）的任務並非如毛澤東所指出，始終是合法的議會鬥爭。它曾經是「流血的」，中間曾有過和平與不流血時期，可是很久以來就又讓人嗅到血腥氣了。

說到這裏，也許有人會反駁我們道：這一切與毛澤東所說的完全沒有衝突，因為毛澤東的文章恰恰說明了即使是那種和平的與不流血的鬥爭，實質上仍不過是「武裝奪取政權，以戰爭解決問題」這個原則在不同條件中的一種不同表現罷了。既然正當西歐和平革命的典型時期，歷史也不曾告訴過我們一次工人階級用非武裝手段奪得了政權，不經戰爭解決過問題，那末毛澤東宣佈「以戰爭解決問題」這原則為普遍真理，不是做得完全對嗎？這斷言不正是打擊了第二國際英雄們那種社會主義，那種和平革命的迷夢嗎？

我們覺得：重視暴力在革命中的作用是一回事，將革命的一切歸於暴力則屬另一回事。我們覺得：說階級鬥爭的徹底發展，特別是工人要取得政權，必須訴之於暴力，必須依靠力量（包括武裝與非武裝

的，物質與非物質的）是一回事；說一切革命問題必須用戰爭來解決則是另一回事。前一回事是普遍地正確的，對後一回事卻不能如此說。

是否主張革命的和平發展便是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是否馬克思與列寧不論在實踐上與理論上，都從來絕對否定革命和平發展的可能呢？當然不。馬恩且不談，讓我們來看看被考次基稱為「兵士革命論者」的列寧，對此問題曾經有過怎樣的態度。十月革命當然是暴力的革命，由此開展出來的數年內戰，更是流血和恐怖的。但是，在此革命起義爆發之前四個月，列寧卻肯定俄國革命有和平發展的可能，並曾竭力為此可能而鬥爭。在《論口號》那篇文章中，列寧認為在1917年2月27日至7月4日這個時期中，俄國「整個革命有按照和平道路發展的可能。『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就是在這和平發展道路上之最近步驟，即可以直接實現的步驟的口號。」當然，列寧當時所以會力爭革命的和平發展，並非因為反動派能自願放棄政權，也不是叫群眾放棄一切暴力性的革命行動與準備，而是因為階級力量的對比及國家政權處於一個特殊狀態中，即：「臨時政府與蘇維埃根據自願協定分掌着政權。……武器在人民手中，……這就展開了並保證了」革命和平發展的前途。列寧是古往今來最偉大的革命現實主義者，他不會相信任何方式關於政權的「禪讓」故事，也不會迷信以選票代替槍炮這顆萬應靈丹，但是他相信當階級鬥爭發展到某個有利時機，特別當統治階級分崩離析，權力（甚至武器）事實上落在民眾手中，只因群眾的思想與覺悟還趕不上事變發展因而未能奪取政權時，那時，革命在賢明的革命黨的指導之下，循和平發展的道路獲致勝利，是完全可能的，也是最值得爭取的。在這上面，列寧的「和平革命論」恰恰等於我們中國孫武子的「不戰論」。「百戰百勝，非戰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說到這裏，毛澤東的辯護者自然又會反駁道：「不戰而屈人之兵」，乃戰之一種；不戰之戰，卻是最善之戰，並非真正不戰。故唯最善戰者，才能不戰。列寧所說的革命的和平發展也是戰爭的一種，也是最善之戰，只因「武器在人民手中」，戰可勝，不戰亦勝，故能和平奪取政權。所以他們說，列寧的和平發展說非但不違反毛澤東的「以戰爭解決問題論」，恰恰是證實了它。只有站定了一切由武力解決的立場，只有拼命讓人民拿起武器，然後可以談和平發展。否則便是可憐的幻想，或反動的欺騙。

這樣說當然沒有問題，但若僅僅肯定「以戰爭解決政權問題」這一個原則，絕對排除了在某些情形下這個原則有採取和平發展的「表現形式」的可能，卻是很不對的。倘由此而產生了「一切由槍桿子決定」，或「槍桿子可造成一切」的簡單想法，那就非但不對，而且有害的了。這個想法與馬克思主義無緣（恩格斯在《反杜林論》的《暴力論》裏，十分精詳地批判了那種「暴力萬能」的謬說），卻和勃浪基主義接近，甚至是馬嘉維利主義。毛澤東在這問題上的整個看法，當然沒有處處都像他在這個通俗說法中的那麼簡單，他還不至於時時簡單到以為除掉槍桿子以外一切都不重要（如果這樣，他不會有什麼成就，更不會有今天那樣的成功）；可是這種簡單想法不能不說是毛澤東思想的一個重要成分。在很多情形中，它都曾以毛澤東的長處和短處表現出來了的。

革命與戰爭不是同一件事，這是易明的，它甚至和革命戰爭都不是同一回事，這對許多人說就不甚明白了。按照德國兵學家克勞瑞維次的說法，「戰爭乃政策在特殊方法中的繼續」，革命戰爭便是革命政策在特殊方式中的繼續。既然是「特殊方式」，既然是「繼續」，那末很顯然，本物及其繼續之間，就該有形式的與實質的不同。革命戰

爭是從革命中發生出來的，它卻具有了自己特別的方式，而且具有了量的、因而也影響於質的差異點。一個革命發展成了革命戰爭，並不失去其革命性，但它主要將依照戰爭規律而非革命規律去進行。這不是兩種相同的規律。革命是自下而上的，趨向過分民主的，群眾意志佔取上風的，破壞權威的，除精神的風氣外不受任何強制力束縛的；而戰爭，即使是革命戰爭，則是自上而下的、集中的、少數領導者的意志起決定作用的，必須樹立權威的，必須普遍行使強制力的。由於如此不同的規律，所以革命與革命戰爭即使為同一群人所進行，為着同一事業，趨向於同一目標，而其所得結果，卻可能很為不同。生活決定意識，而到達目的的手段與目的的性質又有很大關係。當然，革命可以不經戰爭而成功，或必須通過慘酷的戰爭才能勝利，並不視革命者的願望而定。革命戰爭永遠是被迫進行的——為了確保革命的勝利，不得不跟武裝的反革命作戰。所以贊成革命而反對革命戰爭，不是傻子，便是騙子。不過這不是我們目前討論的問題。在這裏我們要討論的乃是：看不到革命與革命戰爭之間的差別，看不見二者可能造成的不同後果，也是不對的。至若以為沒有群眾的革命，單靠少數革命者的「起義」便能發動革命戰爭，而且這個革命戰爭又可造成革命，或代替革命，那是非常錯誤的。

毛澤東因為不區別革命與革命戰爭，因為斷定在中國除革命戰爭外不能有任何其他形式的革命，所以他認為一切非軍事性的群眾革命運動，僅僅是戰爭的準備與配合。由此再進一步，毛澤東便得出他那個著名的結論：槍桿子決定一切，槍桿子造成一切。「俄國共產黨的槍桿子造了一個社會主義，我們要造一個民主共和國……整個世界只有用槍桿子才可能改造。」

從我們上面粗疏的分析中，讀者們當已能夠看出，毛澤東企圖將他的革命實踐，他的武裝鬥爭提高到戰略水平時，顯得多麼地不高明，多麼地偏頗，多麼地庸俗。應該解答的根本問題，例如城鄉關係，工農關係，黨與階級的作用和二者的關係，應用暴力的必要、限度及其後果之類，都沒有解答，或解釋得不夠，或解釋得完全錯誤。拿西方工人階級的鬥爭特點來作對比研究時，他既不能弄清他們的歷史，也沒有明瞭他們的現狀。將中國革命者武裝鬥爭的特點加以總結時，則十分頗偏與粗俗地着重了暴力的作用，竟將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任務歸結到「槍桿子」問題。

以革命的戰略家論，毛澤東實在是弱的。

然則如何解釋中國共產黨在政治與軍事上的輝煌勝利呢？勝利事實的本身，不是最雄辯地說明了他領導者的高明嗎？高明的戰術，配合在貧弱的戰略之下，難道能夠取得革命勝利嗎？

我們不想在這裏討論中國共產黨勝利的的原因。在後面，當我們研究毛澤東對革命的貢獻時會比較詳細地來討論它。這裏我們要先行指出的一點是：決不能，也決不該將革命勝利的全部功勞歸於共產黨或毛澤東個人。毛澤東個人的貢獻無疑是非常大的，但這事實並不能改變他戰略家的地位。不高明的戰略家，應用其非常高明的戰術是能夠取得勝利的；正好似一個高明的戰略家，配合了不高明的戰術也能招致失敗一樣。在勝利中，一似在失敗中，人們依舊能分別出戰略或戰術所起過的作用。在勝利中，一似在失敗中，同樣能讓人看出領導者的高明在於戰略方面或在於戰術方面。成敗論英雄是勢利的庸俗之見。勝負論戰略也不是公平的衡量。取得勝負的過程，獲致勝負的代價，應付勝負的態度，在在都可看出那個最高領導者的戰略才能來

的。從上面的三者出發，我們有時還得承認負方主帥比勝方主帥倒是更高明的戰略家呢。所以僅僅拿勝利來證明毛澤東是怎樣高超的戰略家是不夠的，你至少還須考慮到那個勝利是如何得來，付出怎樣的代價以及人們如何保持與推廣這個勝利。不過這些留在下一章裏談，這裏且讓我們繼續談戰術家的毛澤東。

在戰爭中毛澤東應用戰術（在純軍事觀點上其中許多是應該稱做戰略的）的高明，出乎一般人的意料之外。因為人們的印象從來都是：毛澤東長於政治，朱德主管軍事。可是你若仔細研究了中共文獻，特別是研究了毛澤東的著作，那你就會驚奇地發覺到，原來軍事家的毛澤東還高出於政治家的毛澤東。毛澤東的軍事學不是從歐美日本軍官學校的教本中學來，甚至也不是學自俄國共產黨人。在這方面，毛澤東以其特有的傲慢與明智說道：「有一種人的意見是不對的……他們說：只要研究一般戰爭的規律就得了，具體地說，只要照着反動的中國政府或反動的中國軍事學校出版的那些軍事條令去做就得了。他們不知道這些條令僅僅是一般戰爭的規律，並且全是抄了外國的，如果我們一模一樣地照抄來用，絲毫不變更其形式和內容，就一定是削足適履，要打敗仗。」又說：「又有一種人的意見也是不對的。……他們說：只要研究俄國革命戰爭的規律就得了，具體地說：只要照着蘇聯內戰的指導規律和蘇聯軍事機關頒佈的軍事條令去做就得了。他們不知道，蘇聯的規律和條令，包含着蘇聯內戰和蘇聯紅軍的特殊性，如果我們一模一樣地抄了來用，不允許任何的變更，也同樣是削足適履，要打敗仗。」毛澤東要為中國人的特殊的足，定造一雙合尺寸的布鞋，他的原料主要是從中國土產中選取的。他的戰史課本是《左傳》，是《資治通鑑》，甚至是《三國》，是《水滸》。他研究過的著名戰役不是奧斯脫立希，不是滑鐵盧，不是色唐，甚至不是蘇聯內戰中

的察利津，彼得格勒與斯維雅希斯克；而是春秋時代齊魯長勺之戰，楚漢成皋之戰，新漢昆陽之戰，袁曹官渡之戰，吳魏赤壁之戰，吳蜀彝陵之戰，秦晉淝水之戰，甚至是《水滸傳》中「林沖與洪教頭之戰」。他在戰略和戰術的理論方面，私淑的不是克勞瑞維次，不是拿破崙，不是毛奇，也不是蘇伏洛夫等等，而是中國的孫武子。毛澤東自己不曾敘述過他對這位被他稱為「古代大軍事學家」的孫子的關係，別人也沒有（就我個人所閱讀的而言）講到過毛澤東如何研究「十三篇」。不過毛澤東的戰略戰術（當然指純軍事的）思想，與二千年前中國這位兵學巨人的思想有非常密切的血緣關係，卻是一望而知的。中共游擊戰術的基本原則，曾被毛澤東歸納成為一套所謂「十六字訣」：「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這個口訣，據毛澤東說：雖然是「從1928年5月開始，適應當時情況的帶着樸素性質的游擊戰爭的基本原則」，但在1931年戰勝敵人的第三次「圍剿」中，卻大大豐富起來，並最後形成了的「全部紅軍作戰原則」，……基本上「仍然是那個十六字訣。十六字訣包舉了反『圍剿』的基本原則，包舉了戰略防禦和戰略進攻的兩個階段，在防禦時又包舉了戰略退卻和戰略反攻的兩個階段。後來的東西只是它的發展罷了。」由此可見，這個「十六字訣」，簡直是毛澤東戰略戰術思想最簡明的概括。那末它是從哪裏來的呢？請讀下面這幾段孫子兵法吧：

- (1) 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見《謀攻篇》）
- (2) 兵者，詭道也。……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見《計篇》）

(3) 避其銳氣，擊其惰歸……以治待亂，以靜待嘩，……以近待遠，以佚待勞……。(見《軍爭篇》)

所謂「敵進我退」，不正是孫子的「強而避之」，「避其銳氣」，「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這些意思嗎？所謂「敵駐我擾」，不正是「佚而勞之」嗎？所謂「敵疲我打」，不就是「以佚待勞」，「亂而取之」等意思嗎？至於「敵退我追」之完全等於「擊其惰歸」，那更是不言而喻的了。

發展後的毛澤東的戰略戰術思想是豐富多采的，但正如毛澤東自己所說，最基本的原則仍舊是那個「十六字訣」，也就是說，仍舊是孫子兵法。十年內戰史就是一部紅軍反「圍剿」史。這個定義下得很精簡。全部戰爭是被圍與突圍的循環反覆，紅軍在戰略上屬於內線作戰，戰術上屬於外線作戰。戰略上是儘量不讓敵人消滅或削弱自己力量，戰術上則儘量去殲滅敵人力量。戰略上儘量不被人圍，戰術上則儘量地圍人。想要不被人圍，便得處處搶主動，時時求靈活；要能主動地決定進退，靈活地實行閃避與襲擊。要想圍人，那就得集中力量於一點，以數倍甚至十倍於敵的力量，出其不意，捷如脫兔地去打擊它、消滅它。這套戰法使紅軍打退了蔣介石的四次「圍剿」。反第五次「圍剿」時據說正因為王明等擯棄了它，改用了「正規戰法」，以致大敗虧輸，被迫放棄贛南基地，「遠征」西北。長征中紅軍又採取了上述戰術，結果成功地到達了陝北；接着來的抗日戰爭，以及抗日勝利後的所謂「第三次國內戰爭」，中共應用的基本戰法卻仍舊是那一套，不過更明確、更豐富罷了，其內容曾被毛澤東於1947年12月在那篇《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中歸納為十點，即現在普遍地被中共作家所引述的所謂「軍事十大原則」。

「十大原則」既然是「十六字訣」的發展；而「十六字訣」與孫子學說的關係既然已如上述，則「十大原則」與「十三篇」之間保持着師承相續關係，原是不待言的。所謂師承關係，意思當然不是說毛澤東的每一戰略戰術思想都恰恰導源於孫子的某一句話；更不是說毛澤東的軍事思想只是像舊式儒生對四書的態度一樣，僅僅子曰詩云地背誦古書，或簡單將「聖人之言」付之實行。這樣想，將是最大的傻子。誠如毛澤東所說：「一切戰爭指導規律，依照歷史的發展而發展，依照戰爭的發展而發展，一成不變的東西是沒有的。」二千四百餘年前的孫武子，對當時當地的社會情況與生產力情況中所進行戰爭提出來的戰爭指導規律，決無可能一式一樣地應用於目前的戰爭。毛澤東的軍事思想首先自然是帝國主義時代（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半殖民地中國的工農（特別是農民）大眾，在共產主義者領導下進行的革命戰爭中產生出來的。它絕不可能相等於春秋時代產生的戰略戰術思想。這一點是必須明白的，但同時我們又應該知道：戰爭規律的發展和改變，和其他一切社會現象的規律的發展和改變一樣，有其變動不居的，有發展和改變的一面，又有其永久的、亦可說「不發展和不改變」的一面。全盤否定不成其為發展，所謂「奧伏赫本」是有取有捨的。因此，在毛澤東的「十大原則」中保存着或包含着「十三篇」裏的思想，並不稀奇，倒是完全符合於毛澤東思想的整個性格的，即符合於「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性格。

現在且讓我們從「十大原則」和「十三篇的字面」上來看看毛澤東和孫武子的關係：

「軍事原則第一條」：「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敵，後打集中和強大之敵。」

「十三篇」：「避實而擊虛」。「軍有所不擊」。「將不能料敵，以少合眾，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

「第二原則」：「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廣大鄉村，後取大城市。」

「十三篇」：「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避實而擊虛」。

「第三原則」：「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不以保守或奪取城市和地方為主要目標。保守或奪取城市和地方，是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的結果，往往需要反覆多次才能最後地保守或奪取之。」

「十三篇」：無。

「第四原則」：「每戰集中絕對優勢兵力（兩倍、三倍、四倍有時甚至是五倍或六倍於敵之兵力），四面包圍敵人，力求全殲，不使漏網。……」

「十三篇」：「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眾而敵寡；能以眾擊寡者，則我之所與戰者，約矣。」

「第五原則」：「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每戰都應力求有準備，力求在敵我條件對比下有勝利的把握。」

「十三篇」：「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故兵貴勝。」「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也。」

「原則第六」：「發揚勇敢戰鬥，不怕犧牲，不怕疲勞和連續作戰（即在短期內不休息地接連打幾仗）的作風。」

「十三篇」：「兵之情貴速。」「是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彊弩，節如發機。」

「原則第七」：「力求在運動戰中殲滅敵人。同時，注意陣地攻擊戰術，奪取敵人的據點和城市。」

「十三篇」：「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

「原則第八」：「在攻城問題上，一切敵人守備薄弱的城市，堅決奪取之。一切敵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備，……」

「十三篇」：「城有所不攻。」「攻城之法，為不得已。」「拔人之城而非攻也。」

「原則第九」：「以俘獲敵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員，補充自己。我軍人力物力的來源，主要在前線。」

「十三篇」：「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

「原則第十」：「善於利用兩個戰役之間的時間，休息和整訓部隊。休整的時間，一般地不要過長，盡可能不使敵人獲得喘息的時間。」

「十三篇」：「謹養而勿勞，並氣積力。」「兵不頓。」「兵之情主速。」

上面的十項對照，當然不是全部相等的，特別是其中第三項、第七項和第八項，因為古今戰爭條件的大不相同，古時運動戰、殲滅戰和攻堅戰等等的觀念尚未充分劃清，故「十三篇」中所說的與「十大原則」所提出的思想之間，其關係只能說是萌芽之於果實，藍圖之於建築罷了。我們做這樣的對照，自然也不是企圖證明毛澤東的某一軍

事思想，恰恰導源於孫武的某一意見。這種愚蠢的想法，我們上面早已指斥過了。不過無論如何，看了我們上列的對照表，對於毛澤東軍事思想主要從「土祖師」那裏學來的這個看法，大概不致於否認了吧。

毛澤東如何得到了孫子的「真傳」，如何在此時此地的條件中，在現代戰爭武器的條件中，發揮了二千四百餘年前那位中國大軍事學家的思想，乃是一個有趣問題，也是極專門的問題^[1]。不過這項工作顯然不是我們在此地所能做的。此地，我以毛澤東思想的敘述者與批評者資格，應該指出的只是他軍事思想的淵源，以及指出他確實在實踐中完成了一套適合於中國特殊性的戰爭理論，並符合此理論，他又確實領導了勝利的戰爭這個事實罷了。發揮於毛澤東著作中的軍事思想，不但具有歷史價值，具有軍事的理論價值，而且還具有非常現實的革命的實踐價值。在可以想像的未來，至少在某些落後的、半殖民地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像中國發生過的內戰之重演是有極大現實性的。這情形今天連華盛頓的五角大樓的主持人都很懂得了。

中國歷來名將，無一不宗孫子，尤其是文人轉業的所謂儒將，更無一不熟讀「十三篇」，然而打起仗來，真能善用者卻不多見，大多是馬謖一流人，迂腐顛頑，成為武經的「教條主義者」，可笑得很。自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用現代武器打開了中國的大門，這種可笑情形就更多了。「精通兵法」的儒將們在科學的軍事技術之前，雖然不是個個像葉名琛，榮祿那樣地去出乖露醜，但感覺到中國老的一套戰法完全無用，有如紅纓槍大刀之無用一樣，卻是非常普遍的。驕傲自大的中國士大夫，最先對「夷人」折服的是堅甲利兵，他們衷心承認自己不行的是這個方面，也僅僅是這個方面。所以在很長的時間內，他們雖然頑強地排斥了西洋的一切新思想，繼續相信中國的精神文明是「天下第一，蓋世無雙」，可是在「武備」上，他們卻很快就毫無保留地「全

盤洋化」了，那些講武堂裏講的盡是些洋兵典，做的是洋操，穿的是洋制服，拿的是洋槍洋炮。「十三篇」跟「十八般」中國的舊武器一起被放進了「博物館」。中國新軍的指揮群是日本仕官、德國陸大、更後則是美國的「西點」訓練出來的。民國後各地軍閥更時興直接僱用洋參謀，讓他們拿了普法戰爭以來的各種戰略戰術，將中國老百姓的血肉來做實地演習。國民黨軍隊北伐中受蘇聯軍事家的影響，內戰時受德國將軍們的指揮，抗日戰爭中則以西點系統代替了魯登道夫的弟子們。總之，數十年來中國戰場上中國人的自相殘殺或與敵軍爭鬥，都在西洋戰法的支配之下，而且在外國軍事家的指揮下進行的。中國共產黨軍隊的幹部，大多是由蘇聯軍事家直接（蘇聯軍事學校）或間接（黃埔）訓練出來的。在某一個時期（主要是王明系統掌握黨軍權力時期），蘇聯的軍事專家還曾親自指揮過江西紅軍哩。可是所有這些，「俱往矣」，沒有幹出什麼了不起的「名堂」來。在近代中國如此這般的軍事理論與實踐的背景中，毛澤東這個自修的軍事家，從中國的「土祖師」那裏學到了許多訣竅，並且將它們和農民武裝鬥爭的實踐結合起來，卻自己形成了一套軍事理論，更以此獲致戰爭的勝利。這一點，不論你在政治上反對或贊成毛澤東，都不能不加以承認、不能不給以很高評價的。

這裏我們是否想強調毛澤東的「軍事天才」？是否想確定中國古已有之的軍事學高出於現代任何一家的軍事思想呢？不是。我們誠然不能否認毛澤東有很高的軍事智慧，同時在他的情形中，我們也應該看出中國的古軍事學迄今仍不失為一宗寶貴的遺產，不過，由毛澤東消化活用出來的孫子兵法所以能克敵制勝，其根本原因到底不在於純粹軍事方面。蔣介石也熟知這些軍事方法，而且擬定有成套的對付它們的反方法；可是並不能藉此挽救他的敗亡。為什麼呢？毛澤東自己對

此曾提出了答案。他說：「因為我們的戰略戰術是建立在人民戰爭這個基礎上的，任何反人民的軍隊都不能利用我們戰略戰術。在人民戰爭的基礎上，在軍隊和人民團結一致、指揮員和戰鬥員團結一致以及瓦解敵軍等項原則的基礎上，人民解放軍建立了自己的強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這是我們戰勝敵人的重大因素。」這個答案基本上是正確的。因為歸根結蒂，只有戰爭的群眾性與革命性，才能有效地利用高明的戰爭方法，才能憑這些方法來取得勝利。而毛澤東等所領導的戰爭，不管人們在許多方面可以不同意，表示反對，提出批評，但它對國民黨而言代表着群眾的與革命的利益，則是必須肯定的。

以上是我們對軍事方面作為戰略家與戰術家的毛澤東的評價，下面我們要再談談他在政治方面的戰術家地位。

政治方面的戰術，通常被人了解為政略、政策或權術。毛澤東在這些方面的高明，也是有目共睹的。在毛澤東從事革命的四十年中，站在領導者地位，充分發揮了他政策上的智慧者，乃是從1935年至1947年的十餘年。這個十餘年又可分為三個時期：（1）國共「破鏡重圓」前後；（2）新四軍事件前後；（3）勝利後直至內戰爆發。毛澤東在這三個時期中所應用的策略，就公佈出來的文字（我們假定它們不曾做過根本的事後修改）看，參證了那些時期實際發生了的事件，我們確實無法不承認他是第一流的、傑出的戰術家。

現在先談第一個時期。這個時期大致從1935年冬天延續至1938年冬天。國共二黨打了十年內戰之後，忽然又要言歸於好，我們前面多次說過，這個大方針，不是毛澤東個人，也不是中共中央，而是以史大林為首的共產國際決定的。這不過是「人民陣線」政策在中國的應用。史大林在1929年開始整個國際之內的向「左」轉，從極右的機

會主義路線轉向極「左」的所謂「第三時期」；在此時期中，共產國際不管各國共產黨的主客觀條件如何，一律進行「最後決戰」。此一「決戰」的後果，在德國打出了一個希特勒，在東方讓蔣介石打敗了江西紅軍，並使日本軍閥更加猖狂起來。史大林處在東西二面的戰爭的真正威脅之下，不得不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重新回到右傾機會主義的老路，提出了「人民陣線」。這回是叫所有國家的共產黨跟「自己的」、「民主的」資產階級成立聯合戰線，反對國內國外的法西斯主義。這條新路線傳達到中國，正當中共軍隊「長征」了二萬五千里，到達陝甘地區之時。毛澤東是衷心接受了這條新路線的。因為由王明系在中國執行了五年之久的「第三時期」路線，所造成的結果已極其明顯，毛澤東本人差一點做了此一路線的犧牲品，同時只因在軍事上及時地改換戰略戰術，才挽救紅軍於消滅厄運的。其時紅軍雖已歷盡艱險，到達了比較可以喘息、蔭蔽、固守與迴旋的西北；但若繼續過去幾年中的「總路線」，繼續在若干割據地區內作軍事困鬥，不改弦易轍作全國性的政治號召，那末要想長期抵抗蔣介石的「圍剿」是很難的。這一點，毛澤東自己知道得很清楚，例如他在1935年12月中共召開的瓦窯堡會議上說：「……像過去那樣地過分性急是不行的。還得提出一個很好的革命策略，像過去那樣地老在狹小的圈子裏打轉，是幹不出大事情來的。」毛澤東這番說話目的在替史大林的右轉彎找辯護，無形中卻替托派在那一時期所提的策略做證人。自從1928年初，托洛次基便向中國共產主義者推薦了「全權普選的國民會議」這個口號。只因史大林派否定了它，並污蔑這口號為「取消主義」，以致陷於無口號狀態（他們攔下了「蘇維埃」口號，卻不曉得拿起「國民會議」口號），以致「老在狹小的圈子裏打轉，幹不出大事情來。」不過這裏我們不想詳細討論這個問題，這問題留待後面再談吧。

這裏首先要談到的是：不管史大林為了什麼理由要實行轉變，也不管毛澤東為了什麼緣故歡迎這個轉變，總之，自從1935年下半年起，在史大林毛澤東上下合作之下，「人民陣線」政策開始實施於中國了。這個政策在理論上是否正確，也得留待後面再談；這裏我們要先行討論的只是毛澤東實施這個政策時候所採取的態度與所應用的戰術。

從極「左」的「第三時期」，一下子跳到極右的「人民陣線」，從相斫相殺的血海深仇，一變而為「相親相愛」的「精誠合作」，別說「頭腦簡單」的工農大眾要驚奇惶惑，就是習慣於服從信賴的共黨幹部，也要懷疑，甚至反對。為了解釋疑惑，平抑反對起見，毛澤東在上面提到過的瓦窩堡會議上，作了題名為《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報告中企圖用階級分析的理論來為新政策辯護，那是既膚淺而又錯誤的，並無多大說服力量，更少理論價值。不過有兩點從戰術立場為「統一戰線」辯護，卻是頗有分量的。文如下：

- (1) 現時革命方面的特點，是有了經過鍛煉的共產黨，又有了經過鍛煉的紅軍。這是一件極關重要的事。如果現時還沒有經過鍛煉的共產黨和紅軍，那就將發生極大的困難。
- (2) 共產黨人現在已經不是小孩子了，他們能夠善處自己，又能夠善處同盟者。日本帝國主義者和蔣介石能夠用縱橫捭闔的手段來對付革命隊伍，共產黨也能夠用縱橫捭闔的手段對付反革命隊伍。

毛澤東這兩段話的意思說得非常清楚：跟蔣介石國民黨再度聯盟是毋須害怕的，不會重蹈1927年覆轍的，只要牢牢地記得兩件事好

了：第一要以槍桿子為主；第二要以狡猾的手段為輔。毛澤東這樣說了，他也這樣做了，而且做得很高明、很徹底。「人民陣線」政策原本是革命的陷阱，數十近百年來無產階級的革命史上，凡革命黨方面追隨了這個政策的可說無一次曾經跳出過這個陷阱。中國共產黨此次能夠造成一個難得的例外，能終於不為這一陷阱所害，在諸多原因中，我想毛澤東上述的兩大戰術論點，應該是其中很佔重要地位的一個。

國共第二次合作即使在「蜜月」期間也不曾停止過槍彈和手段的冷熱戰爭。不過在不同時期，冷的或熱的戰爭各佔着不同的重要性。在上面所說第一時期中，冷戰曾經代替了熱戰，從明爭變成了暗鬥。可是到了1938年，熱的成分又逐漸超過冷的成分，這過程繼續發展，一直到1941年年初，爆發了「新四軍事件」，達到了熱戰的高潮。在那個時候，毛澤東曾經寫過幾篇戰術意義上非常值得注意的文章，其中最主要的有1940年3月間寫的〈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寫於「新四軍事件」發生前不到一月的〈論政策〉，以及「事變」後三月餘所寫的〈關於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在第一篇文章裏，毛澤東提出了跟國民黨軍隊熱戰時所遵守的「有理、有利、有節」的口號；在〈論政策〉中，毛澤東規定了關於「又聯合又鬥爭」的十項具體辦法，其中特別着重地指出了「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這個「策略原則」，並給國民黨統治區域內的工作，規定了「蔭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這個政策。在第三篇文章中，毛澤東主張以「革命的兩面政策」對付反革命的兩面政策。主張「以打對打，以拉對拉」。他指出「極端地複雜的中國政治，要求我們的同志深刻地給以注意。……和國民黨的反共政策作戰，需要一整套的戰術，萬萬不可粗心大意。」今天我們事後來讀這幾篇有關皖南事變的黨內文件，即使它們是事後加以修改的，可是基本上我們仍舊

看得出，毛澤東和蔣介石玩弄起「縱橫捭闔的手段」來，實在是非常高明的。人們雖然不同意「統一戰線」的大方針，卻仍不能不承認這些手段是傑出的，是從長期革命實踐中獲取來的寶貴經驗，值得叫所有的革命者鄭重研究的。

第三時期始於 1945 年 8 月，止於 1946 年 7 月，亦即從日本投降開始，直至國共全面內戰的再度爆發。這個時期內毛澤東的戰略或戰術，也照例規定在一個對句裏，那就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國民黨在美國人幫助之下，一方面舉行談判，一方面積極進攻；共產黨也就一面參加和談，同時努力備戰，實行堅決反擊。雙方都是「現實主義」的，雙方都極盡了「縱橫捭闔」之能事。但即使擱開各自所代表的階級政治的利害不談，僅僅從戰術或手段說，毛澤東方面所應用的確實比蔣介石方面要高明得多，勇敢得多，因而取得了無可比擬的，更大的政治影響與宣傳效果。

綜上以觀，毛澤東無疑是一個善於「冷戰」的人，是高明的權術家，無論是中共的敵和友，都樂意承認這一點的。因此，有些人便以為毛澤東不能算是大革命者與大政治家，僅僅是一個工於心計、能玩小智術的政客罷了。另一方面則有人以為，政治和軍事原無本質不同，二者都是「詭道」，都「不厭詐」。善於此「道」者勝，不善者不勝，能勝，那便是大軍事家，大政治家。這裏是不能以其他標準例如道德之類——來衡量的。至於革命，那末重要的也是勝利，以「詭道」勝，以正道勝，都是一樣，凡能致革命於勝利者，即是大革命家。毛澤東令革命勝利，毛澤東自是大革命家。

這兩種說法，究竟誰是誰非？說大革命家只重原則，不重策略，其可笑正好像說大政治家只談仁義，不講權謀一樣。那是迂腐的書生

之見，或者是年青的革命家易犯的幼稚毛病。為了醫治這種毛病，列寧曾經寫過一本精采絕倫的書，開列了許多藥方，其中有一則如下：

為推翻國際資產階級而進行的戰爭，要比國家間的普通戰爭中最頑強的戰爭困難百倍、長久百倍、複雜百倍；要進行這樣的戰爭，而事先就拒絕採用機動手段，拒絕利用敵人間的利害矛盾（哪怕是暫時的矛盾），拒絕與各種可能的同盟者（哪怕是暫時的、不穩固的、動搖的、有條件的同盟者）通融和妥協，這豈不是可笑到了極點麼？這豈不正像我們想攀登一座艱難險阻，未經考察，未通人跡的高山時，卻預先拒絕有時要迂回前進，有時要折轉回來，放棄已選定的方向而試走各種各樣的方向麼？（見《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

誰都承認，列寧是古今大革命者中最看重原則的一個，他處處不忘原則，事事從原則出發。然而他卻主張在革命鬥爭中我們不能不「採用機動手段」，即毛澤東所說的「縱橫捭闔」手段；他承認應該利用敵人中間的利害矛盾，哪怕是暫時的矛盾。他還要我們同各種可能的同盟者（暫時的、不穩固的、動搖的、有條件的）有時通融一下，有時妥協一點。列寧不但這樣主張，而且也在事實上實行了的。誠如他自己所說：「布爾雪維主義全部歷史中，無論在十月革命前或十月革命後，都充滿着它對其他政黨，其中也對資產階級政黨採取機動、通融和妥協的事實。」列寧採取「機動手段」時，總是十分勇敢大膽的，以致讓許多「堅持原則的、清白的」革命者驚惶得瞠目結舌。最顯明的例子有如：1917年二月革命後，為了要參加革命，不怕那些庸人俗子罵他「俄奸」，決定接受德國軍方的提議，坐了「密封火車」經德軍佔領區回到俄國。再如，為了要讓俄國革命獲得喘息時間，他竟排

除黨內黨外的一切反對，堅決與德國帝國主義簽訂「喪權辱國」的勃來斯脫·立刀夫斯克條約。這些例子表示了什麼呢？它們表示了：最堅持原則的偉大的革命家，同時可以是而且必須是善於應用機變手段的人。有了前者而沒有後者，至少好像是定了方向而不真實地踏上道路，那是永遠抵達不了目的地的。

那末，是否任何道路都能到達目的地？是否只靠「縱橫捭闔的手段」，沒有正確的戰略大計，或根本沒有這種原則性的方針，也一樣可以促成革命勝利呢？為了革命勝利，革命者可以無所不為嗎？

當然不是的。「條條道路通羅馬」，卻不是任何手段都能幫助革命成功。「為目的不擇手段」這個耶穌會派的格言，並不能應用於革命政治中。對革命言，特別是對社會主義的革命言，目的與手段是相互依存的。必須是何等樣的手段，才能達到何等樣的目的。有些手段使目的接近，有些手段使目的遠離。有些能達到目的，有些卻能斷送這個目的。完全相同的手段，只因採取時候的主客觀的條件不同，以致在不同時候它可能是對革命的很好服務，也可能是對革命的最壞叛變。關於這方面，列寧在「左派幼稚病」裏舉出過罷工中的妥協為例。「一種妥協是為客觀條件所迫（罷工者儲金涸竭，沒有外方援助，飢寒交迫，困苦不堪），這種妥協絲毫無傷於接受妥協的工人們之矢忠革命的精神，以及他們準備將來鬥爭的決心；另一種妥協是叛賊的妥協，他們進行這種妥協，表面上也藉口客觀原因，而實際上卻是貪圖私利（破壞罷工的工賊也締結「妥協」！）怯懦畏縮，甘願向資本家效勞，屈服於資本家的威嚇或勸說，或為資本家方面的微利所誘，甘言所惑。」

然則毛澤東從來應用的策略手段，特別是在上述三個時期中他所採取的機動對策，他所做過的妥協與同盟，究竟該屬於哪一類呢？所

有他的策略，他的權變，都是為革命所必需，因而都是正確的嗎？渾統的答覆是不可能的。因為正如列寧所說：「有時也可以遇到異常困難複雜的個別情形，使人們要費極大力量，才能正確地決定某種『妥協』的真實性質，——如在有些殺人案件中，很難斷定這種殺人行為，究竟是完全正當的，甚至是必要的行為（如必要的自衛），抑或是不可饒恕的粗野舉動或甚至是精密佈置的謀害。在政治上當然有時因各階級和各政黨間的國內和國際相互關係異常錯綜複雜的緣故，所以有許多事件，若辨別起來，較之辨別罷工時的合理『妥協』，或者是工賊及叛徒領袖等等背叛階級的『妥協』的問題，要困難得多。」所以要個別地、精詳地、依據特定時間的主客觀條件，來決定毛澤東所曾採取的每一政策，每一戰術的「真實性質」，雖然不是不可能，但是極端困難（原因之一是我們根本不可能接觸到必需的資料），同時對我們目前的研究，亦非必要。在這裏，我們可以答覆而且必須答覆的，倒是如下一個問題：毛澤東應用這些權變時，其基本態度是否正確？它是否與馬列等革命大師們的態度相同？我認為是很不同的，所以不能說是正確的。我們知道，當那些大師們，特別是列寧，採取「機動、通融和妥協辦法」的時候，不論任何時候，或任何條件中，總抱着一個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藉此來「提高無產階級的覺悟性、革命精神、鬥爭能力和致勝能力的一般水準，而不是降低這種水準。」（見同上引書）列寧認為這乃是「全部問題」之所在。所以當他應用「縱橫捭闔的手段」時，不管其暫時的與立即的原因是為了它能損害敵人，或為了它能保全自己，或為了環境所迫無法不作的屈服，或為了避免一場形勢顯然於己不利的戰鬥，或為了使主要敵人孤立而對次要敵人讓步，或為了要並力克敵而與某些動搖勢力聯盟……不管為了什麼，他們心目中卻始終樹立着這樣一個標準：這樣做會使無產階級（國內的與國際的）的覺悟性及革命性提高呢，還是降低？怎樣做可以提高？怎樣做

便會降低？這樣的問題永遠在列寧心中佔據第一位置的。當他採用一個手段時，首先他總要問：它對無產階級（在我們，應該包括全體勞苦大眾）會發生什麼影響？我們應如何藉此進行教育，以便提高他們的革命覺悟？如果說，有一個手段，應用起來可以收得一時之利而卻會模糊或甚至降低無產階級覺悟的，他就決不採用。列寧是絕對主張用一切手段來打擊敵對階級的，但絕非毫無條件。倘能加害敵人而同時足以癱瘓革命者意識的手段（如個人恐怖之類），他就堅決反對；倘能欺瞞敵人但同時亦欺騙本階級的那些手段，他更是絕不容許。在這方面，列寧的態度是大膽與精細相結合的最佳範例，是原則與手段決不割裂的最好榜樣。就拿我們上面提過的兩件事來看吧。二月革命以後，亡命在瑞士的列寧，因為急於要回俄領導革命，而回國路程，除了取道當時與俄國處於交戰狀態的德國國境之外，別無辦法，於是列寧便勇敢地向敵人申請過境，與敵人締結條約，坐了「密封車廂」回去；但同時，一方面為了堵塞俄國政敵們誣讟之口，另一方面（亦即主要的方面）要消釋國內外無產階級對於此事的疑慮，於是在動身之前，在瑞士邀集了幾個外國革命家：法國的勞里奧與吉爾波，德國的保羅·雷維，瑞典的潑拉頓以及瑞典的左派代表，共同草就並簽署了這樣一份宣言：「俄國的國際主義者，他們……現在正要動身到俄國去，以便在那裏獻身於革命事業，他們將幫助我們喚起別國的無產階級，特別是德國的無產階級，去反對各自的政府。」列寧等借道德國，答允交付的代價僅僅是堅持釋放同等數目（30人）的非軍事俘虜，他絕對不會在事實上或形式上對德帝國主義者作絲毫讓步。勃來斯脫和約的情形則更清楚，為了俄國革命正處於無法作戰的情況中，為了要取得喘息時機以待世界無產階級，特別是德國無產階級及時起來，因此俄國工人政府不得不暫時屈服於德國強盜的軍事勒索之下。這個立場、這個說法，非但在對內解釋和對外宣傳中不折不扣地明言實講，而且在

正式談判的議席上，也不許任何外交辭令掩蓋了那個痛苦的真相。因此，俄國革命的此一「屈服手段」，非但不曾降低了國內外無產階級的覺悟與鬥志，反而將它大大提高了。俄國革命中的第二位領袖，亦即勃來斯脫和約的實際「談判」者與簽署者——托洛次基，在應用「手段」或政策時的態度，也完全是這樣的。他甚至說：「宣傳的秘密在於說真話」。詭計絕不能代替階級政策。對敵人自然可以不厭其詐，但對無產階級與勞苦大眾必須至真至誠，一些兒都虛偽不得，半點手段都用不得。只有史大林掌握了蘇聯黨政大權以後，才一反列寧、托洛次基的傳統態度，將陰謀詭計完全代替了原則性的政策，並且將對付敵人的「縱橫捭闔手段」同樣拿來對付無產階級，更甚至對付自己的同志。當他為了「機動」之故而與某一敵人、敵黨或敵對階級進行妥協時，他就在原則上也實行妥協，老是在那些敵對人物或敵對勢力的臉上塗脂抹粉，讓無產階級與一切勞苦大眾「衷心地」相信敵人已化為朋友。史大林從來不估計、而且絲毫不顧慮到那些手段之應用，結果會對無產階級的覺悟與鬥志起什麼影響——可是這個影響，正是列寧與托洛次基等革命大師在策略運用時所首先注意的標準，是某一手段或策略之取或捨的標準。

列寧托洛次基在這上面和史大林之間不同，基本上乃是無產階級革命者與革命官僚之間的不同。

毛澤東運用權術時候的基本態度，究竟是屬於列托一類還是史大林一類呢？不幸得很，他是遠前者而近後者的。毛澤東曾經取笑不懂策略的革命者說：「和蔡廷鍇握手，必須同時罵他一聲反革命。」按照說話人的意思，跟那些原來反革命的暫時同盟者妥協，就必須至少在形式上要做出客氣姿態，必不能揭人家的瘡疤，一定要親善尊敬。和蔡廷鍇握手的時候，縱使不稱他為革命者，至少得叫他一聲親愛的朋

友，在人前表示一下親熱。其實，這態度與列寧態度根本相反。依照列寧，當我們有必要和蔡廷鍇或蔣介石握手之時，我們的責任必須同時以加倍力量告訴無產階級以他或他們的反革命本質和原形，並向他們解釋目前為什麼要同這些敵人暫時妥協，以此提高而非降低本階級基本革命群眾的覺悟與鬥志。如果照毛澤東的做法，一旦有必要與可能和反革命者「握手」，那就必須做得親親密密，非常「老友」，那末試問無產階級大眾看了這個表演將作何感想呢？知道蔡廷鍇或蔣介石過去的人會發生莫大迷惘——究竟蔡、蔣進步了還是共產黨退步了？不知道蔡、蔣過去的人則自會因此而相信他們真是很好的革命者。無論前一感想或後一感想，總之都不是提高而是降低群眾的覺悟與鬥志的。

史大林同敵人握手時決不罵敵人做反革命，恰恰相反，他總是表現得非常友善的。例子太多，舉不勝舉，其中最出名的應該數他同希特勒、松岡洋右與邱吉爾的親善了。對希特勒，一旦與之簽訂協定以後，他便整個地改變了關於法西斯主義的論調，儘量美化大獨裁者的醜臉。與希特勒在德蘇協定後仍繼續反共叫囂的情形相反，史大林竟公然致電希特勒，說什麼「德蘇兩國人民的友誼是用血凝成的，我們有每一理由相信它會持久與鞏固。」（見1939年12月25日《真理報》，史大林對希特勒的覆電）對松岡洋右，史大林為的要和日本簽訂中立協定，便跟這個日本帝國主義最兇惡的外相表演最不平常的友誼。史大林對松岡洋右大攀「亞洲人的鄉誼」，談論什麼「道德共產主義者」的鬼話。臨行之時，這位總書記還打破前例，親赴車站，同那個窮兇極惡的侵略者擁抱話別。史大林與邱吉爾的交往，更是客氣得異乎尋常。一交朋友，便將戰爭的性質來了一個改變：成了蘇聯盟友的英美，其戰爭再不是帝國主義的了。一向是反蘇頭子的邱吉爾，如

今得到史大林的保證，說「一切都已過去，而過去的事都屬於上帝。」（見邱吉爾《第二次世界大戰》卷四，443頁。）總之，依照史大林的辦法，如果我們有必要和可能與敵人握手，那就得客客氣氣、誠誠懇懇地握，最低限度也得假戲真做，將敵人和革命大眾同樣欺蒙。否則，照他的意思，敵人是不肯和你握手的，這就是說：策略便會不靈了。至於無產階級大眾是否會因此種真戲或假戲而降低覺悟與鬥志的水準，那末史大林是毫不在乎的。因為他認為一切力量的來源，是由少數人（甚至是他一個人）所指揮的國家機器和軍隊，絕對不是什麼無產階級大眾。他和列寧托洛次基等恰恰相反，絲毫不需要提高無產階級的覺悟、鬥志與革命性，他根本不需要它們。

毛澤東應用策略手段時候的態度正是如此。為要與蔣介石再度握手，他非但收起了一切反革命的罵聲，而且竭盡力氣來使「賣國賊營壘的總頭子蔣介石」（見《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變成為「偉大的領袖」（見《論新階段》第十八節），同時宣佈共產黨接受三民主義，政府和軍隊接受改制，一切服從國民黨中央。他認為「全民族的第二個任務，在於號召全國，全體一致誠心誠意的擁護蔣委員長，擁護國民政府……務使蔣委員長與國民政府的威信不受任何影響。」又說：「全國必須是依照中央法令而推行民主制的，但全國必須是統一於中央的。」因此，他再三聲明：「我們堅決擁護蔣委員長及其領導下之國民政府與國民黨，並號召全國一致擁護。」（上引文均見《論新階段》）

毛澤東此種矢忠矢誠的擁蔣表示，目的當然可以說是要維持聯合戰線，以便共同抗日，因此不惜講講「現實主義」，與蔣介石「針鋒相對」，玩弄「縱橫捭闔的手段」。我們承認他是在用手段（即不是有意的叛變或投降），我們也承認：革命者是應該與可以對敵人用手段的；

但手段玩弄到這般田地：明知某人為「賊」，卻為了權術之故，號召全黨全民「誠心誠意」認賊作父，並且以此定為主要任務，要大家堅決擁護其領導，決不能使此「賊」及其政府的「威信受任何影響」。如此做法，縱使有一萬個最好理由，也總無法為下述那樣的壞結果作辯釋，即：無產階級大眾會因此而降低其覺悟與鬥志，會因此減弱（甚至消滅）其革命性。因為，我們在上面再三說過，正是這個結果，乃是列寧當年運用「機動手段」的最高標準。誠然，我們中國這位大軍事學家孫武說過：「辭卑而益備者，進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為了欺騙敵人，讓自己加緊準備，不妨用些卑恭的口氣，委婉的謝辭，可是這種主要適用於古代戰爭的計謀，畢竟不適用於近代的革命政治。今天，一方面由於政治的群眾性與民主化，另一方面由於出版與廣播之無遠弗屆的影響力，任何政治家的心智術與明顯的虛偽，到底只能有損施術者本人的威信。毛澤東自己不會得見不及此，所以在選集中，這篇有名的《論新階段》的報告，只收入了八個部分的一個部分：「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而且被選取的這一部分中，一些過於礙眼的字句也刪去了，例如在該部分的第二節中，就刪去了這樣幾句：「全力援助蔣委員長與國民政府是天職，是責無旁貸，在這裏，不能有一點消極性。」在第六節裏，刪去了：「沒有問題，統一戰線中，獨立性不能超過統一性，而且服從統一性。」

像這樣的「卑辭，委謝」，根本不會出之於列寧托洛次基之口，卻常見於史大林的筆下，因此，史大林也和毛澤東一樣，當著作彙集出版時，不得不先做一番精密的選擇和改作工夫。這無論如何都不是大革命者的應有作風。

「但是」，有人會反駁我們，「最重要的不是勝利嗎？能致革命勝利的一切策略，跟那些能使戰爭獲勝的任何計謀一樣，都是最好的、應

該的、正確的。」話不錯，勝利是重要的，勝利本身常常是最有力的論據。但還得看是什麼樣的勝利，而勝利的性質，則要看它是如何勝利的。列寧托洛次基念念不忘於無產階級的「覺悟性、革命精神、鬥爭能力和致勝能力」，不但因為只有靠無產階級此種精神和能力的提高才能使革命勝利，更因為只有這樣獲得的勝利才是符合於國際社會主義利益的革命勝利。

毛澤東今天是勝利了，中國革命，由於不少原因（其中毛澤東的高明的戰術乃是原因之一），也是勝利了。但正因為它的勝利很少得力於無產階級上述的精神和能力，以致勝利後的中國革命及其新創造的國家，遭遇到許多難於克服的困難和危機，陷於深刻的官僚主義的乃至狹隘的民族主義的泥淖中。

這些問題我們將在下面的章節裏談到。

注釋

1. 與毛氏戰略思想對立的所謂「第三次左傾機會主義派」的軍事路線，實際是當時蘇聯軍事顧問的意見。如能獲得當時的有關文件，這種研究是極有價值和興趣的，因為它和蘇聯內戰時期托洛次基和「軍事反對派」之間的某些爭論相似。

六、不高明的戰略家（上篇）

（新民主主義與不斷革命）

說毛澤東不是高明的戰略家，我們不是就軍事意義而言，卻是指革命政治的意義而言的。革命政治方面的戰略，首先指革命家或革命黨對於革命的動力、革命任務、性質與前途的認識，特別是指對於革命政權（即一切革命之最重要與最直接的目標）所懷抱的態度和理解。毛澤東對於這些問題的認識和理解，根據文獻，證以事實，卻很不高明。

為了便於問題的說明，讓我們先看看革命戰略這個問題最初怎樣在社會主義的革命者中提出，它對於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曾經發生了怎樣的影響，有過怎樣的關係。托洛次基——俄國十月革命的第二位領導者——對於這些問題曾有過精簡扼要的說明，茲抄錄如下：

我們在政治學上借用軍事學名詞：所謂「策略」乃是指領導個別的運動而言，所謂「戰略」乃是指奪取政權而言。大戰以前，我們一般未曾作此區別。在第二國際時代，我們只限於社會民主黨的策略觀念裏面。這也不是偶然的。社會民主黨實行議會策略、工會策略、市政府策略、合作社策略等等。但是配合一切力量 and 資源——一切隊伍——以戰勝敵人，這個問題在第二國際時

期，關於奪取政權的實際任務並未曾提出來。1905年革命，經過一個長時間之後，才第一次提出無產階級鬥爭的根本問題或戰略問題。為此之故，俄國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即布爾雪維克派，才佔得了莫大的便宜。革命戰略的大時代開始於1917年，起初在俄國，後來普遍於其餘的歐洲。（見《十月教訓》，第一節。）

1905年革命，不僅是1917年革命的「總演習」，而且是一個實驗室，其中製成了俄國政治生活內所有基本的派別，又設計了俄國馬克思主義內各種不同的傾向。爭論之焦點，不待說，是關於俄國革命的歷史性質及其未來發展道路。（見《三種俄國革命觀》）

這些派別的爭論意見，大致有三，可概括如下：

民粹派，同斯拉夫主義一般，從下一幻想出發，即認為俄國的發展道路是完全特殊的，俄國可以避免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普列哈諾夫的馬克思主義則集中於證明俄國歷史道路和西方歷史道路原則上並無不同。但由此產生出來的綱領，反而漠視俄國社會結構和革命發展上真實的而非神秘的特殊點。門雪維克派的革命觀，除去其插話性的歧異和個人的偏向以外，可以概括如下：俄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只有在自由資產階級領導之下才是可能的，此勝利必然推送自由資產階級走上政權。以後，民主政制就將使得無產階級，以比前更大得多的成效，在社會主義鬥爭道路上，趕上它的西方兄弟輩。

列寧的見解可以概括如下：落後的俄國資產階級是不能完成其自己的革命的！經過「工農民主專政」得到的革命完全勝利，將肅清土地上的中古制度，將給俄國資本主義發展以美國的速度，將加強城市和鄉村無產階級的力量，將使社會主義鬥爭成為

真正可能的。他方面，俄國革命的勝利亦將大大推動了西方社會主義革命，後者不僅能保障俄國免除復辟危險，而且能促使俄國無產階級於較短的歷史時期內奪得政權。

不斷革命論的見解可以概括如下：俄國民主革命的完全勝利，只有在農民支持的無產階級專政形式之下，才是可以思議的。無產階級專政將不可避免地不僅提出民主任務於議事日程，而且提出社會主義任務於議事日程，同時亦將大大推動國際社會主義革命前進。唯有西方無產階級的勝利才能保障俄國免於資產階級復辟，並保證它有完成社會主義建設的可能。（見同上引書）

門雪維克派所主張的前途是根本錯誤的：他們給無產階級指示錯誤的道路。布爾雪維克派所主張的前途是不完全的，他們很正確地指示了鬥爭的總方向，但關於鬥爭的階段說得不正確。布爾雪維克派所指的前途的不完全，1905年革命時尚未明顯暴露出來，僅僅因為革命本身尚未更進一步發展。可是，1917年革命開始時，列寧就不得不直接與他的黨的老幹部衝突，而改變布爾雪維克前途了。

任何政治診斷都不能自命為算學一般精密無訛的。只要它能正確指示發展的總方向，能幫助實際事變過程，不可避免地旁逸斜出的過程，沿這路向走去——就足夠了。在這意義上，我們不能不看出不斷革命論的俄國革命觀確曾完全通過了歷史的考驗。（見同上引書）

事實正是如此：俄國的資產階級民主任務是在十月革命中完成的，而十月革命中建立起來的政權卻是農民支持的無產階級專政。這個無產階級專政不但提出了並解決了民主任務，而且提出了並解決了

社會主義任務。俄國革命的經驗證明了俄國資產階級確實不能完成「自己的」革命；證明了領導資產階級革命的人只能是無產階級（經過它的黨）；又證明了革命勝利了的無產階級只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農民支持的），而不能建立工農民主專政，更不能建立什麼數階級聯合的「民主政府」。俄國革命證明了這些，也就證明了最初由托洛次基提出、然後為列寧所堅持的不斷革命論的完全正確。

俄國革命依照了不斷革命論的政治預見而發展而完成，這個事實並不表示不斷革命論只適合於俄國革命。不斷革命論的客觀根據並非是俄國獨有的特殊性，而是一切落後國家所共有的特殊性。這個特殊性，正如托洛次基當年對俄國所說，「首先顯出來的是它的落後性。歷史的落後並非這個國家將依樣葫蘆於一百年或二百年後重走先進國所已走過的路徑之意。寧可說，這個國家有完全不同的『配合的』社會形態，其中資本主義在技術上與結構上的最高成就，進入於封建的或封建前的野蠻的社會關係之內，改變這些關係，支配這些關係，造成一種特異的階級對比。」（見《三種俄國革命觀》）這種「特異的階級對比」構成了俄國不斷革命論的基礎。但因這個「特異的階級對比」並非僅僅出現於舊俄，同樣也形成於其他落後國家中，故它同樣構成了其他落後國家的不斷革命論的基礎。因此，不斷革命是一切落後國家必須遵循的一條革命戰略。順着它走的「資產階級革命」會獲得勝利，違背它的就必然歸於失敗。把握不住它，或只能在經驗中偶爾摸索到它的，自然不可能是高明的戰略家。

由此標準，我們就不難衡量戰略家毛澤東的高度。

一般說，中國共產主義者從來輕視革命理論，更加看不起「學院式」的關於革命性質與革命前途的理論。在他們眼光中，一個共產

主義的遙遠目標，幾條反帝反封建的具體與切近的綱領，已經完全夠了，餘下來的全部問題只是努力苦幹、實幹。一切「空談」，「清談」都是不必要的，甚至是有害於革命的。因之研究學習理論的傾向受到了斥責，「馬克思主義的學者」成了嘲笑的名詞。這種盲目的、不用頭腦的實幹主義作風，使得 1925-27 年間共產國際種種錯誤決議得以毫無批判的執行，因而也部分地促成了中國那次革命的失敗。革命失敗了，革命者跌倒了，犧牲了；其中幸而未曾喪失生命，僅僅受了傷，或只是撞痛了頭腦的，那時痛定思痛，才開始用自己的頭腦，將革命反映於概念上的種種大問題，思索和研究起來。正好像 1905 年的俄國革命首次將革命戰略的原則問題提出於俄國革命者面前一樣，中國革命的戰略問題也是在 1927 年革命後，而且是在失敗之後，才初次闖進中國革命者的頭腦。只是有一個不同，當時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是自己直接考慮了問題，發生了派別的；而中國馬克思主義者關於革命戰略的不同意見，基本上卻是蘇聯共產黨內的不同意見在中國引起的響應。關於中國革命的戰略路線，共產國際的領導層中，亦即在蘇聯共產黨的領導層中，自從 1925 年以來就發生了兩種對立立場。一種以史大林為首（其中包括布哈林、馬丁諾夫等人）主張中國共產黨應採取本質上相等於俄國當年普列哈諾夫所提出的門雪維克式的戰略路線，這就是說，中共與中國無產階級應該擁護資產階級去領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在鬥爭中建立四個階級（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農民、無產階級）的民主政權，藉使中國走上非資本主義的道路。這戰略的主張者口頭上也提到「無產階級領導權」的重要，但事實上反對共產黨與無產階級為此領導權所作的一切真實鬥爭，他們妨礙這些鬥爭，勒令中共加入國民黨，直至蔣介石清黨也不准退出國民黨，要中國共產主義者信仰小資產階級的三民主義，服從國民黨紀律，以此企圖始終保持那個「反帝反封建的聯盟」。另一個立場是由托洛次基提出的，

後來又為列寧的老戰友齊諾維也夫與加明尼夫所贊同。此立場的要點如下：中國資產階級是不能完成它自己的革命的。一部分所謂民族資產階級雖然也受帝國主義壓迫，但因他們一方面與帝國主義，另一方面與封建殘餘保有千絲萬縷的血緣關係，他們既不能堅決反帝，也不能堅決反對國內落後勢力。在工農革命興起的威脅下，他們倒寧願與帝國主義及封建殘餘及早妥協，藉以壓制工農革命的。因此，蘇共反對派堅決主張中共採取獨立的階級政策，反對加入國民黨，更反對共產黨人不批評三民主義與服從國民黨紀律的承諾。主張徹底發展階級鬥爭，特別在北伐軍進展中發展土地鬥爭，藉以爭取武裝農民——兵士——的擁護，主張組織蘇維埃，藉以代替資產階級的政府，建立由農民支持的無產階級專政，以此解決民主任務，並由此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

因為史大林一系當時已經在蘇聯共產黨及共產國際中攫取了大權，他們所代表的立場便被實際執行了出來。可是中國革命的全部經過，絕對無情地證實了此一立場的錯誤，反證出反對派立場的正確。結果如所周知，這個被證實了錯誤的當權派，為了要維持其對內對外的威望，應用了官僚行政手段，甚至應用了絕對與布爾雪維克精神相違反的特務恐怖手段，鎮壓了與摧毀了被歷史證明為正確的反對派。錯誤的史大林派為何與如何摧殘了托洛次基派，因問題與我們這裏所討論的無直接關係，不具論。這裏我們需要談的乃是史托二派的意見在中國共產主義者中間所發生的影響。特別是，它對毛澤東發生了什麼影響？更確切些應該說，毛澤東對蘇聯共黨中二派關於中國革命戰略之爭，採取了什麼態度？他作了怎樣的左右袒？

蘇聯共產主義者的這個爭論，主要因為史大林一派當權者的嚴密封鎖和惡意曲解，其次由於當時中國共產主義者一般理論水準的低

下，所以在 1927 年革命完全失敗之前，對整個中共言，可說是根本不存在的。即使在中共的最高領導層中，包括總書記陳獨秀在內，都不曉得除了由國際代表傳來的所謂國際指示或決議（其實是史大林派立場的指示或決議）之外，還有其他意見。少數有機會派出去莫斯科參加國際會議的領袖，例如譚平山之流，只是在史大林派的「中國問題專家」領導之下，奉命反托如儀罷了。他們根本接觸不到反對意見的代表人物，甚至讀不到反對派的文件（除了一些惡意改竄的，斷章取義的「摘引」），因之他們（且不談他們是怎樣氣質的人吧）不可能把這個有關中國革命根本理論的爭論帶到中國黨內來。中國革命失敗後，史大林便是利用中國黨內對於史托二派關於中國革命爭論的無知，當然更利用他所把持的蘇聯共產黨的無上權威，將斷送革命的全部罪責統統推在陳獨秀身上了。可是這樣一種張冠李戴的手法，居然為陷於迷惘中的中國共產主義者所接受。這樣，中國共產主義者雖付出了一次革命失敗的代價，卻仍舊得不到關於中國革命的原則的戰略問題的正確認識。從失敗中沒有獲得教訓，沒有得到經驗。

中國革命者首次得到這個認識、教訓和經驗，那是在 1927-30 年間。由於大量的年青共產主義者被送去蘇俄學習，在那邊接觸到了反對派文件。這接觸使不少人變成了反對派。這些反對派又將此種文件偷送到留在國內的老革命者手裏。如此，有關於中國革命根本戰略問題的爭論，在實際革命失敗以後二三年，才輾轉流傳到中國革命者中間，引起了他們的爭論，並促成了他們的派別。代表反對史大林派意見的政派，在 1930 年正式從中國共產黨中分裂出來了，他們組成中國的「托派」，以陳獨秀為首，包括了很大部分大革命中擔任過領導工作的人物。

毛澤東對這次爭論和分裂（即托派被開除）採取什麼態度呢？從《毛澤東選集》中我們找不到他當時的意見。在1935年12月他對中共瓦窯堡黨活動分子所作報告（《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之前，毛氏提起革命失敗原因、革命性質及前途等基本的戰略戰線之時，總是空洞浮泛，不着邊際，僅僅背誦國際決議案上的一些字句，而對這些字句，他都不甚了了的。比如在1928年10月5日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中，他用如下的話來說到這些問題：

中國迫切需要一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這個革命必須由無產階級領導才能完成。從廣東出發向長江發展的1926年到1927年的革命，因為無產階級沒有堅決地執行自己的領導權，被買辦豪紳階級奪取了領導，以反革命代替了革命。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乃遭遇到暫時的失敗。……

中國的民主革命的內容，依國際及中央的指示，包括推翻帝國主義及其工具軍閥在中國的統治，完成民族革命，並實行土地革命，消滅豪紳階級對農民的封建的剝削。這種革命的實際運動，在1928年5月濟南慘案以後，是一天一天在發展的。

在這一段小學生式的背誦中，人們完全看不出毛澤東本人對革命的根本問題抱什麼見解和態度。因為無論史大林派或托洛次基派，誰都不曾否認中國革命的民主性質，因為誰都承認這個革命的主要內容是民主的。至於說這個革命必須由無產階級領導才能完成，恰恰是托洛次基派所特別堅持之點，史大林們主張由「四個革命階級」共同領導革命，拚命反對托派的無產階級領導論，他們認為單獨一階級的領導就是違反了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性；有時他們雖然也談談這個領導，但事實上他們卻自始至終總是叫中國革命者及無產階級服從資產

階級的領導，因此正是在這一點上，他們一手斷送了中國革命，使一次大有希望的革命，終於為反革命所代替。那末毛澤東當時文章中提出此點，是否表示他在史托之爭中左袒後者呢？當然不是。因為，我們相信，他當時是並不清楚聯共二派關於中國問題的立場的。「必須拿起槍桿子」，「必須由無產階級——簡單地了解為共產黨人——領導革命」，只是代表革命失敗後的一種普遍認識罷了。

不久以後，毛澤東給中共中央寫的那個著名報告：《井岡山的鬥爭》，中間是以如下的文字表示他對革命性質問題的意見的：「我們完全同意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中國現時確實還是處在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階段，中國徹底的民權主義革命的綱領，包括對外推翻帝國主義，求得徹底的民族解放；對內肅清買辦階級的在城市的勢力，完成土地革命，消滅鄉村的封建關係，推翻軍閥政府，必定要經過這樣的民權主義革命，方能造成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真正基礎。」

1929年4月5日，毛澤東以前敵委員會名義給中共中央寫的信上，又觸及這個問題，文如下：「黨的六次大會所指示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是對的：革命的現時階段是民權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黨的前目前任務是爭取群眾而不是馬上舉行暴動。」

上面這兩段文字，雖然沒有明顯地說出他對聯共黨中關於中國問題的二派意見何去何從，但意思是清楚的，他擁護史大林，反對托洛次基。因為托洛次基的意見，在中國革命失敗後的那一時期中，被史大林歪曲成這個樣子：他，史大林，認為中國革命仍是民主性的，即其主要任務為反帝反封建；而托洛次基則依據史大林的轉述，認為中國資產階級革命已由蔣介石完成了，故今後的革命將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性的，即其主要任務為反對資產階級的私有制度。根據了這樣一

個虛偽的對立，毛澤東表示他同意中國革命仍為資產階級民主性質，就無異對史氏投了贊成票，對托氏投了反對票。

其實，中國革命失敗以後，發生於史托二派之間的關於中國革命的比較重大的乃至原則性的問題，有如下的不同看法：

史大林：最初根本不承認革命失敗（將失敗說成為「革命的更高階段」），後來（廣州暴動後），承認革命是失敗了，但他第一不認為這個失敗是深刻的，因而將是相當長期的，所以他反對讓中國共產黨在反革命的新局勢中，用國民會議口號從事民主革命鬥爭。第二，他否認資產階級的反革命勝利對中國革命的往後發展會有任何影響。他認為雖然以蔣介石為首的大資產階級叛變了革命，但未來民主革命的領導者將仍是包括民族資產階級在內的各個革命階級的聯盟，他又認為，蔣介石的反革命雖然讓資產階級攫取了全國政權，但它絲毫不影響未來革命無論政治上成經濟上的純粹民主性質。

托洛次基：及時指出了革命的失敗，指出了資產階級反革命勝利的局勢，竭力反對在不利局勢下舉行盲動，力主提出全權普選國民會議這個民主政綱，藉以蓄積力量，準備新的革命。他認為資產階級的反革命勝利絕不等於革命勝利，故革命的民主任務依然存在，在此意義上，中國革命的性質仍是「資產階級民主性的」；但因資產階級在反革命勝利中掌握了全國政權，以致民主革命的矛頭首先必須指向這個政權，而為要解決民主任務，又必須由無產階級領導革命，奪取政權，建立自己的專政，方才可能，在此意義上，則未來的革命將一開始便是社會主義的。

根據上面敘述，可見史托雙方關於中國革命任務之仍屬民主性質，並不曾有所爭論。實質上發生爭論的乃是如下三個問題：（1）

對反革命時期的認識以及以何種合適的口號去進行鬥爭，藉以縮短這個時期，早日迎接新革命的到來；(2) 在未來的民主革命中，反革命的資產階級是否還能起領導作用？即使是部分的領導作用？未來革命的勝利是否一定要建立無產階級專政，還是多階級的聯合專政？中國民主任務的徹底解決是否必須經過而且只有經過無產階級專政？解決民主任務的無產階級專政是否不可避免地、立即地、甚至同時地去提出社會主義任務；(3) 反對資產階級專政為無產階級專政而進行的革命是否其本質便已經是社會主義性質？

毛澤東最初當然完全不清楚這種爭論內容，後來才從史大林派片面的彎曲轉述中知道了一點。只因毛氏一貫的輕理論、重實幹的精神，又因他和史大林同樣具有現實主義的本性，所以他看不起發生在遙遠地方的「茶杯裏的風波」，不想好好兒弄清楚它，因此不須等弄清之後才採取態度，僅僅為了爭取「國際」（史大林把持的「國際」）對他的聲援之故，他就毫不猶豫地作出了左右袒，宣佈自己贊同「國際和中央的指示」，說他仍認中國革命為民主性質，以此表示他之擁護史大林與反對托洛次基。不過毛澤東明明白白的擁史反托立場，在正式公佈的文獻中，則始見於 1935 年 12 月的報告：《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他說：「中國革命現時階段依然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這是十分明顯的。只有反革命的托洛次基分子才瞎說中國已經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再要革命就只是社會主義的革命了。」從這段文章中可以看出，直到 1935 年 12 月，毛氏還不曾知道「托洛次基分子」對中國革命的真正主張，或者他已經知道了，卻有意搬弄着史大林的誣栽來污衊托派。「托洛次基分子」從來不曾說過「中國現時階段^[1]不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而是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因為他們認為：第一，那時根本

還不曾有革命，舊革命已經在 1927 年秋冬結束，而新革命則尚未見端緒；第二，若說客觀存在的（或可稱潛在的）革命任務，則其主要的屬於民主性質，當無疑義。「托洛次基分子」從來也不曾說過「中國已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他們說的是：中國資產階級的反革命勝利了，卻未完成（其本身亦決不能完成）民主性質的革命任務。至於「再要革命就只是社會主義的革命」這個意見，「反革命的」托派確實說過，但他們是在特定的意義中說這句話的，那意義是：新的革命一開始就要反對資產階級專政，就要為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這是政治意義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這是主要的一方面。其次，新革命在開始及持續進行中，固然要為民主任務的解決而作鬥爭，但對城鄉資產階級利益或多或少的侵犯，亦屬難於避免者——這是經濟意義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這是次要的一方面。

毛澤東於 1935 年年底對「托洛次基分子」作出上述控訴，可見是不盡不實的。這裏暴露了毛澤東對革命理論的輕率和輕視，暴露了他對革命戰略的原則性問題所採取的勢利態度。同時更根本地，暴露了他不能從局部的、策略性的實際經驗，自行綜合和提高到戰略水準。譬如拿我們上述史托二派當時爭持的三爭論的第一問題來看吧，是否在反革命猖狂的局勢中，共產黨應該積極提出徹底民主的國民會議口號呢？托洛次基說必須提出，史大林竭力反對，斥之為「取消派的政綱」。那末毛澤東的親身經驗告訴他什麼呢？他在 1928 年 11 月寫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井岡山的鬥爭》）中說：

我們一年來轉戰各地，深感全國革命潮流的低落。一方面有少數小塊地方的紅色政權，一方面全國人民還沒有普通的民權，工人農民以至民權派的資產階級，一概沒有言論集會的權利，加入共產黨是最大的犯罪。紅軍每到一地，群眾冷冷清清，經過宣

傳之後，才慢慢地起來。和敵軍打仗，不論哪一軍都要硬打，沒有什麼敵軍內部倒戈或暴動。馬日事變後招募「暴徒」最多的第六軍，也是這樣。我們深深感覺寂寞，我們時刻盼望這種寂寞生活的終了。要轉入沸熱的全國高潮革命中去，則包括城市小資產階級在內的政治的經濟民權主義鬥爭的發動，是必經的道路。

這真是給國民會議口號所能作的最好的說明，是此一民主總口號必須提出的最有力的理由。如果毛澤東當時是優秀傑出的戰略家，那末簡單憑了他本人的這點「調查研究」，就足夠到達與托洛次基當時提出的同樣結論了^[2]，即：革命局勢早已為反革命局勢所代替，針對着新的局勢，中國共產黨必須提出徹底民主的國民會議口號，藉使「冷冷清清的」「寂寞生活」早日結束，經過「包括城市小資產階級在內的政治的與經濟的民權主義鬥爭的發動」，使反革命局勢「轉入沸熱的全國高潮的革命中去」。可是毛澤東不能從自己的觀察引伸到這個邏輯的結論。他不能、或者不敢提出為史大林所反對的總的民主口號——國民會議。以致他雖大力肯定「現階段」革命的民主性質，雖然深深感覺到反革命局勢的嚴重，雖然痛感到孤軍奮鬥的寂寞，雖然十分明白局勢轉變之有賴於廣大城鄉民眾政治的與經濟的民主鬥爭，雖然十分明白「少數小塊地方紅色政權」的保持與擴大，有賴於工人農民以至民權派資產階級為「普通民權」而鬥爭的全國性的民主運動，他卻不能，或者不敢違背史大林的主張，將那個唯一能總結全部民主鬥爭的、因而是唯一能適合當時鬥爭需要的國民會議口號提出來。

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的不高明，還可以從另一方面來說明的。當史大林在整個國際內由極左跳回到極右，在中國由十年內戰再度謀與蔣介石聯盟之時，便突然提出了一直被他斥之為「取消主義」的國民會議口號，撤換了多年來被奉為神聖的「蘇維埃」。中共幹部對於這

個突變當然會感到驚奇的，特別因為他們聽慣了誰提國民會議誰就是不要革命這套理論，但毛澤東卻跟他過去之無條件贊成史大林的排斥國民會議一樣，現在也非常積極地出來為克里姆林宮主人的新立場辯護。在1937年5月3日對中共全國代表會議所作報告中，他說：「全國人民及各黨派的愛國分子，必須拋棄過去對於國民大會和制定憲法問題的冷淡，而集中力量於這一具體的帶着國防意義的國民大會運動和憲法運動。」（見《選集》，卷一，254頁。）毛澤東說這話的時候不可能不知道過去使「全國人民及各黨派愛國分子」「冷淡了國民大會和制定憲法問題的」，恰恰是史大林，恰恰是毛澤東自己；而八九年來竭力要他們「拋棄」這種「冷淡」的則是被他們罵為「取消派」的托洛次基派。毛澤東至少在那時（1937年）已經清楚了史托二派的爭論點，所以說過這段話之後，趕緊就號召大家去和「托洛次基派的陰謀」作鬥爭。在對同一次會議所作的結論中，毛澤東更着力地說明了必須強調國民大會的理由。他說：「為什麼強調國民大會？因為它是可能牽涉到全部生活的東西，因為它是從反動獨裁到民主的橋樑，因為它帶着國防性，因為它是合法的。……中心的東西是國民大會和人民自由。」（同上引書，273-274頁。）這個理由，除了帶國防性這一點有些莫名其妙之外，都說得很好很好，簡直好得很！但人們應該問問毛澤東，這個同樣理由為什麼不可從1928年以後就用來提出國民會議或國民大會呢？為什麼國民會議口號在1928年到1935年之間是反動的，到了1935年^[3]便正式宣佈為革命的、必須強調、而且成為「中心的東西」了呢？

我們可以因此責備毛澤東對史大林的盲目追隨，這裏確乎也暴露了毛澤東現實主義的勢利的一面；但是更重要的，我以為此事證明了，測定了作為一個戰略家的毛澤東的高度。

當然，正如我們在上面所說，一個革命戰略家之最無誤的衡量標準是他對政權問題的態度，是他對以政權問題為中心的全盤革命發展的瞻矚。因此，我們還必須回到革命的根本問題上來談毛澤東的戰略家地位。

毛澤東是在 1937 年前後才認真與廣泛地研究了馬克思主義著作的，特別是史大林的著作。經過了這次系統研究，毛澤東對於中國革命問題上史托二派的爭論，便有了明確立場。如果在這以前，毛澤東的步趨史大林主要是由於「紀律」，由於「不明就裏」，由於現實主義的趨附，那末在那時之後，毛氏贊同史大林的主要理由，應該說是由於思想和氣質的共同，其他因素的影響倒反而居於次要了。我們曾經多次說過，毛澤東和王明不同，他不是買辦型的，更不是崇洋派，有足夠勇氣在權威面前反抗的。所以毛澤東在 1937 年以後成為史大林的堅決擁護者與崇拜者，只有一小部分可以用他所擅長的策略手腕（即欲藉此利用史大林所把持的蘇聯及共產國際的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來解釋，大部分應該用他和史大林之間的思想相同，意氣相投來解釋。二人都是高明的策略家，都是不高明的戰略家。大家同樣地重實際，輕理論。大家都是經驗主義者，歸納主義者，因之都看不起原則性的「冥想」，都鄙棄從思想出發的演繹。大家都喜歡談現實主義的「常識」政治，不喜歡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鬥爭的「迂腐」教條。二人都不懂外語，對西方思想，甚至對一般的外國文化都很隔膜，以致表示某種程度的輕視或敵視，故二人都是國際主義者其名，民族主義者其實的。最後，二人都視實力（不論槍桿子或機關）高於思想，都懷有非凡的大志，都要造成個人的領袖崇拜，都看不起群眾自發的創意，因之二人在精神上都是官僚主義的，英雄主義的，甚至是帝王思想的。當然，二人除上述相同之外還盡有不同之處，譬如思想的來

源不同，各自對革命與黨的關係和地位不同，以及二人才智有高下（毛澤東無疑比史大林高些），性質有厚薄（史大林當比毛澤東陰險刻薄得多）。不過這些個不同在那些個相同之前顯得非常無力，所以儘管在某些特定的事件或特殊問題上，毛澤東可以怨恨史大林（例如後者之拚命「栽培」王明與毛氏作對）或不同意乃至看不起史大林（史大林所作的關於中國革命的指令，曾有不少由毛澤東這個執行者看來是荒謬可笑的。在這些時候，毛氏的應付方法，總是「陽奉陰違」，「先斬後奏」。倘事實證明了毛澤東判斷的正確，則他照例不以此揭穿史大林指令的荒謬，卻往往將功勞歸之於「國際」的「正確領導」^[4]，但在整個思想上，特別在落後國家民主革命這個戰略思想上，毛澤東是由衷地追隨了史大林的。蘇聯共產黨中的二大領袖，托洛茨基的文采風流雖然可能引起過毛澤東的景仰，但史大林的平庸現實總彷彿更合乎他的胃口。這該屬於同氣相求之類的。

毛澤東以完全成熟的史大林主義者姿態出現來談中國革命的性質與戰略問題，當以1939年12月發表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為首次。在這本小冊子裏，他有系統地與極其明確地說明了：「現階段中國革命的性質，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而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但是，現時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已不是舊式的一般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我們稱這種革命為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這種新民主主義的革命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堅決地反對帝國主義即國際資本主義的，它在政治上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於帝國主義者和漢奸反動派的專政。」這裏他提出了與舊民主革命不同，又與社會主義革命有異的所謂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這個革命的政治上的目標為「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的專政」。

在時間上幾乎是緊相銜接的《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1月)中，毛澤東的此一戰略思想有了更充分的說明，有更自由的（即不是襲取他人的而為自己思索之成果的）發揮。其中最重要的一節如下：

這種新民主主義共和國，一方面和舊形式的、歐美式的、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的共和國相區別，那是舊民主主義的共和國，那種共和國已經過時了，另一方面，也和蘇聯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的共和國相區別，那種社會主義共和國已經在蘇聯興盛起來，並且還要在各資本主義國家建立起來，無疑將成為一切工業先進國家的國家構成和政權構成的統治形式，但是那種共和國，在一定的歷史時期中，還不適用於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因此，一切殖民地國家的革命，在一定歷史時期中所採取的國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種形式，這就是所謂新民主主義共和國。這是一定歷史時期的形式，因而是過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

……

第三種，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所採取的過渡的國家形式。……即幾個反對帝國主義的階級聯合起來共同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見《選集》，卷二，668-669頁。）

上面這一段由毛澤東深思熟慮後、用他自己的言語說出來的史大林主義的關於中國的革命觀，讀者可以拿來和本章開始時候的三種俄國革命觀比對一下，這不正是當年門雪維克派的立場嗎？自然表面上的區別也不是沒有的，譬如門雪維克並不區別民主主義的新舊，他們又公然說革命應該在自由資產階級的領導下，而毛澤東所爭的資產階

級民主主義卻是「新」的，且其國家形式必須是「幾個反對帝國主義的階級聯合起來的共同專政」。但是實質上，只要這個說法不是宣傳技倆，而是共產黨的原則性的戰略路線，那末在嚴格地不使之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之下，這個所謂一切「反帝階級的共同專政」，除了由資產階級，而且是最有槍桿子的資產階級，佔有實際專政的權力之外，還能有什麼形式呢？因此，毛澤東的這個立場實質上就是門雪維克派的立場。

按照門雪維克派立場，俄國無產階級幫助自由派資產階級成立民主共和國以後，便將「以比前更大得多的成效，在社會主義鬥爭道路上，趕上它的西方兄弟輩。」到底他們以怎樣大的成效，如何趕上他們西方兄弟輩的社會主義鬥爭，可惜（其實是幸而）門雪維克派沒有機會用事實來告訴我們。如果1917年十月革命沒有成功，如果門雪維克派的「戰略」如願實現，即俄國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得能穩固與繼續存在下來，那末，我們可以肯定，俄國由這些「社會主義者」領袖們率領的俄國工人們的社會主義鬥爭，一定至今還趕不上英、法、美諸國的兄弟們哩！

依照實質上是門雪維克主義的毛澤東的革命觀，即認為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其革命不能為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但只能為「一切反帝的階級的共同專政」而鬥爭，——其前途的轉變又是怎樣呢？在《新民主主義論》中，他對前途給了很明確的說明和回答。他說：

沒有問題，現在的革命是第一步，將來要發展到第二步，……中國革命不能不做兩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義，第二

步才是社會主義。而且第一步的時間是相當地長，決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

至於如何轉變？如何與幾時由第一步轉入第二步？則他沒有回答，他只是一再地，着重地說：革命「有階段之分，只能由一個革命到另一個革命，無所謂『畢其功於一役』。」第一階段有「自己的一定時間」，形成「一定的歷史時期」，在此時期內，民主任務只能用各階級的民主專政來解決，等到解決之後，「再使之發展到第二階段，以建立中國社會主義的社會。」

關於兩種革命之間的轉變條件及其時間問題，倒是在此以前，當中共初向國民黨提出正式再度聯合之時，毛澤東比較明白地說過。那是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1935年12月）及〈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1937年5月）兩篇文章中的態度。在第一篇中，毛對轉變問題的答覆如下：

革命的轉變，那是將來的事。在將來，民主主義的革命必然要轉變為社會主義的革命。何時轉變，應以是否具備了轉變的條件為標準，時間會要相當地長。不到具備了政治上經濟上一切應有的條件之時，不到轉變對於全國最大多數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時，不應當輕易談轉變。懷疑這一點而希望在很短的時間內去轉變，如像過去某些同志所謂民主革命在重要省份開始勝利之日，就是革命開始轉變之時，是不對的。這是因為他們看不見中國是一個何等樣的政治經濟情況的國家，他們不知道中國在政治上經濟上完成民主革命，較之俄國要困難得多，需要更多的時間和努力。

在第二篇文章中，毛澤東說：

我們是革命轉變論者，不是托洛次基主義的「不斷革命」論者。我們主張經過民主共和國的一切必要的階段，到達於社會主義。我們反對尾巴主義，但又反對冒險主義和急性病。

因為資產階級參加革命的暫時性而不要資產階級，指聯合資產階級的抗日派（在半殖民地）為投降主義，這是托洛次基主義的說法，我們是不能同意的。……

我們不厭其長地抄錄了上面文字，首先因為這可說是毛澤東談到革命性質轉變問題最明白肯定的兩個地方，第二，因為這裏面頗有意義地將三種關於中國革命的「轉變論」羅列在一起了。

第一種是以王明為代表的（當然就是「第三次左傾時期」共產國際的立場，也就是史大林本人，或其親密助手當時對此問題所持見解），即以爲：「民主革命在重要省份開始勝利之日，就是革命開始轉變之時。」

第二種是毛氏自己的意見：「何時轉變，應以是否具備了轉變的條件為標準，時間會要相當地長。不到具備了政治上經濟上一切應有的條件之時，不到轉變對於全國最大多數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時，不應當輕易談轉變。」

第三種是毛澤東派給托洛次基主義者的，說他們主張「不經過民主共和國的一切必要的階段」，立即進行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毛澤東這裏的描寫當然不正確。我們從當時托派的文獻中，可以知道他們對此問題的見解大致如下：中國革命無疑將因民主民族鬥爭而復起，但此革命一定要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領導之下，才能前進與深入，如

此，無產階級就勢必在客觀上與主觀上都要為自己的政權而鬥爭，因而走上政權；一旦這樣的政權在全國範圍內建立起來，自不能自限於民主任務的解決。因此，根據托洛次基派的見解，所謂革命性質的轉變問題根本就提得不正確，就革命的客觀任務說，當無產階級專政建立之後，也還有一段民主時期，若就革命動力說，特別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這個歷史必要性說，那末一開始都已經是社會主義性質了。

史大林毛澤東因為根本否認在民主革命中，無產階級可以而且必須為自己的專政而鬥爭；因為他們根本否認落後國家的民主革命任務只有而且必須經過無產階級專政才能解決；因為他們囿於門雪維克的老說法，一貫認為民主革命一定要先由民主政權（或民主專政）來解決，解決了之後，上面的政權與下面的任務才能同時進入（或轉變到）社會主義性質。因之，他們絞盡腦汁來尋求一個轉變的時機和某些轉變的條件。結果，史大林與王明（當盲動與冒險時期）就硬性規定出一個標準：「在重要省份開始勝利之日」。這個標準當然是荒唐而可笑的。如果當時的「蘇維埃政府」與「紅軍」是代表無產階級的政權和軍隊，如果它早已實行了反對富農的政策，不管它的轄區限於一個井岡山，或者廣及「重要的省份」，革命都早已「轉變」到社會主義性了，否則，即蘇維埃與紅軍僅有其名，其政權是「各階級共同」執政，其政策是嚴格地限於反封建，那末，即使其力量到達了全國，其性質也不會有什麼改變。「由量變質」的法則被史大林王明如此應用，真是莫名其妙。

毛澤東反對這個標準是對的；但因上述的基本立場相同，他其實也不曾定出更好的標準來。所謂不到「具備了轉變的條件」之時，「不應當輕易談轉變」，事實上等於什麼也沒有說。所謂「政治上經濟上一切應有的條件」，不但空洞，而且是十足門雪維克派的陷阱。因為，如

果要等中國這個「一窮二白」的國家，在政治上與經濟上都具備了成熟條件後才談社會主義革命，那末意思只能說：在「新民主主義共和國」沒有將中國的政治與經濟都提高到至少有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標準以前，社會主義革命是不能輕易談的。這樣看法，「轉變」的「時間當然會相當地長」。豈但「相當」，其實是非常之長，最早也得在英法美日等國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以後了。毛澤東的這個轉變論，實質上（如果他原則地堅持起來）是比史大林、王明更右的。

毛澤東的這個觀點始終不曾公然改變過。在《聯合政府》這本著作中，他的這個意見甚至解釋得更右了，他說：

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達到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而在中國，為民主主義奮鬥的時間還是長期的。沒有一個新民主主義的聯合統一的國家，沒有新民主主義的國家經濟的發展，沒有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合作社經濟的發展，沒有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即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發展，沒有幾萬萬人民的個性的解放和個性的發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廢墟上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來，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這裏毛澤東是把革命轉變的條件具體地列舉出來了，那就是：一個由各階級聯合統治的新民主主義的統一國家，高度發展國家資本經濟、私人資本經濟、合作社經濟、高度發展文化、高度發展人民的個性、經過長時期後，等到上述種種發展達到了可以成為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基礎之後，那時革命才轉變了，即各階級的聯合專政才變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為民主主義的奮鬥才轉變成為社會主義的奮鬥。毛澤東的這個立場，為了要祛除某些人對它的忠實性的懷疑起見，他便着重地聲明道：

幾個民主階級聯盟的新民主主義國家，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是有原則上的不同的。……中國現階段的歷史將形成中國現階段的制度，在一個長時期中，將產生一個對於我們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時又區別於俄國制度的特殊形態，即幾個民主階級聯盟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形態和政權形態。

毛澤東這一條關於中國革命的戰略路線：建立一個原則上與無產階級專政不同的多階級的共同專政，在此政權下，在長時期內，發展民主主義的經濟和文化，一直發展到足夠之後，才由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形態和政權形態，轉變為社會主義的國家形態和政權形態。這條基本路線，毛澤東從未改變過。自從他在 1935–37 年期間最後確定以後，中經抗戰，內戰以至共產黨軍政力量統治全國，毛澤東在所有大小文件中，舉凡涉及這個問題，都一直是這個說法——雖然着重點是移動了：在內戰尚未爆發之前，他着重於那個專政之「聯合與共同」上，內戰爆發以後，特別當勝利在握時起，則愈來愈着重於「聯合專政」之無產階級的領導上。不過無論毛澤東將重點置於何處，他直至 1948 年 3 月，還是十分強調地指出：

這就決定了我們現階段革命的性質是新民主主義的人民民主革命，而不同於十月革命那樣的社會主義革命。（見《關於民族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問題》）

當全國革命勝利之後，毛澤東在 1949 年 6 月為紀念中國共產黨二十八周年寫了他著名的論文《論人民民主專政》。在這篇文章裏，據中共的官方宣稱，「毛澤東同志創造性地提出了關於中國革命轉變問題的一系列方針和政策。……對於革命轉變問題的方針和政策，從理論上作了詳細的闡述……」（見 1960 年 9 月 30 日《人民日報》社論）但

如我們細讀該文，所謂「創造性地提出」與「詳細闡述」了的關於革命政權性質及其轉變問題的意見，只有下面這幾句；首先是：

人民是什麼？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

「人民民主專政」便是由這四個階級共同組成的，這說法至少從1935年提出聯合戰線以來，聞之久矣，完全沒有新意，更談不上什麼創造。另一段，今天特別為所有中共理論家們不斷引證，不斷讚揚，且稱之為毛澤東主張不斷革命論之依據的，則為下列文字。

我們現在的任務是要強化人民的國家機器，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軍隊、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藉以鞏固國防和保護人民利益。以此作為條件，使中國有可能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穩步地由農業國進到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消滅階級和實現大同。

這一段話，據《紅旗》雜誌的主要理論家施東向（按：這個筆名代表的多半是陳伯達，或竟是毛澤東）解釋，乃是毛澤東認為中國革命業已轉變的正式宣告。所以施東向說：「這時候，如果認為革命還不到轉變之時，那當然是完全錯誤的。」（見《紅旗》1961年份第一期）不過我們如果看看〈論人民民主專政〉的原文，很顯然，這個所謂「轉變」立場的正式宣告，乃是中共理論家們事後追認的。所謂「強化人民的國家機器」，毛澤東說的很清楚，是指「軍隊、警察和法庭」的強化而言，其目的在於「鞏固和保護人民的利益」。這裏，不管人們在事後作何等樣的彎曲和注釋，總無法使之含有這種意思，即：各階級聯合掌權的人民民主專政現在必須「強化」為（即轉變為）無產階級的專政了。毛澤東整篇文章就是論人民民主專政的，而這個專政，依據

毛澤東歷來一貫的聲明，和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之間具有「原則上的不同」。然則，兩個原則上不同的政權，如何可以僅僅因軍隊、警察與法庭等鎮壓機關的強化而發生轉變呢？顯然是不可能的。因此，施東向劉少奇陸定一等想從這篇文章裏找出毛澤東從來主張中國革命之不斷論的證據，總歸是徒勞罷了。

當然，「以此作為條件，使中國有可能在工人階級……」這一段話，可以看成為「不斷革命論」的，即可以被了解為無產階級堅強地掌握了政權，憑此去完成民主任務，並開展社會主義的道路。但是如此了解，與毛澤東的一貫主張相背，與「人民民主專政」這個觀念本身衝突。因為，依據毛氏的理論，民主革命有民主革命的國體與政體，社會主義革命有社會主義革命的國體與政體。前者為民主共和國與人民民主專政，後者為工農共和國與無產階級專政。二者代表着兩個不同的歷史時期，代表着不同的革命階段，代表着兩種絕然不同的社會性質。因此，既不能跳越前者，亦不能提前後者。「兩篇文章」，一定要做完第一篇之後才能再做第二篇。然則，遵守着這個理論，如何可以將屬於「第二篇文章」中的政體（無產階級專政）拿來解決「第一篇」文章裏的問題呢？毛澤東的邏輯不至於如此不通。他當時所說的「人民專政」，一定還是與無產階級專政有着原則性差異的。當毛澤東寫那篇文章時候，如果他確實是一個堅守原則的革命思想家，他一定還以為中國革命的民主任務將由當時的「四階級共同專政」來完成，等到完成之後，即等到中國社會客觀上已具備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之後，民主專政才變成無產階級專政，民主革命才變成社會主義革命。

所謂「人民民主政權，實質上已經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一種形式」（劉少奇語），毛澤東當時是決不可能有這個思想的。因為這個思想，不多不少，恰恰就是被毛澤東罵作「反革命」的托洛次基派的思想。

(托洛次基將俄國革命的經驗和理論運用到中國革命來，認為：或者是資產階級專政（蔣介石道路），或者是無產階級專政（中國的十月革命道路），至於什麼「多階級的聯合共同專政」，則是理論上說不通，事實上不可能的。)毛澤東在漫長的歲月中為各階級聯合的人民專政而努力，一貫而拚命地反對主張建立中國無產階級專政的托派，然則他怎能當自己的戰略目標終於實現之時，突然否定了它，並宣稱事實上所實現的並非他所想望的，而是他從來反對的托派的目標呢？毛澤東不會認輸，他也不曾認輸。在〈論人民民主專政〉文章中，只是反映了客觀事實和他主觀想法之間的嚴重矛盾罷了。

出來在理論上企圖解決這個矛盾，並且事後承認中國革命的發展確是遵照了「不斷革命」路線的，不是毛澤東自己，而是劉少奇與施東向（假定他不是毛澤東的化名）。就我個人所接觸到的中共文獻而論，首次正式改變了毛澤東關於民主專政那個戰略觀念的，要算劉少奇於1956年9月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會所作的政治報告了。其中有下面一段非常值得注意的話：

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已經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一種形式。這就使我國的資產階級民主性質的革命有可能經過和平的道路，直接地轉變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誌着我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的基本結束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開始，標誌着我國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的開始。

這一段話，除了某些說明尚有若干問題之外，根本符合於托洛次基派的革命戰略觀。因此，它可以稱為中共事後確認的托洛次基主義。它徹底與乾淨地廓清了史大林毛澤東歷來堅持的、由「新民主主

義」與「人民民主專政」這兩個基本概念所構成的虛幻、錯誤與反動的整套革命觀。

1956年9月，離開毛澤東發表的〈論人民民主專政〉已過了整整七個年頭。在勝利以前，毛澤東固然看不到中國的革命專政只能是無產階級專政這個事實，而在勝利以後，當這個事實擺在面前時，也還需要長長七年的教訓（其中不少是悲痛的），才使他（經過劉少奇之口）終於認識到人民專政已經是一種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實質^[5]。毛澤東究竟是怎樣偉大的一個革命戰略家，但憑這一點就完全可以測定了。

革命性質轉變問題只能與政權問題聯合來考慮才得解決，這在毛澤東也是從來弄不清楚的。他一直有這樣一個想法：革命性質主要表現在「國體」和「政體」上，因而革命性質的轉變也表現在「國體」和「政體」的轉變上。在毛澤東，革命性質，即革命任務，與國政二體的形式有絕對關係。民主任務、人民共和國、人民民主專政是三位一體，是一個獨立的範疇，是「第一篇文章」的三要素。社會主義任務，工農共和國，無產階級專政乃是另一個三位一體，另一個獨立的範疇，是「第二篇文章」的三要素。前後三要素之間隔着一個長長的歷史時期，在此時期內，國家的經濟文化大大提高，準備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等到條件成熟，才由「第一篇文章」轉到「第二篇文章」。至於具體地如何變法，憑什麼來實行轉變？是否當社會主義革命的客觀條件成熟之後，共產黨領導無產階級再來一次社會主義革命，藉以改變「國體」和「政體」呢？還是「人民民主專政」這個政體到那時自動來一個和平的轉變，使「共同執政」的其他階級退出領導，以便「人民性」的國體變成「工農性」的國體呢？對於這些問題，毛澤東其實從來不曾給過回答，只因為他從來不曾鄭重地考慮過它們。

如果毛澤東確是一個偉大的革命戰略家的話，那末，縱使他不清楚馬克思、列寧以及托洛次基關於不斷革命的見解，縱使不熟悉俄國革命的思想史；但憑他根據於中國階級鬥爭的實踐而作的獨立思索，也多半可以很早達到如下的，亦即不斷革命論的結論了。那就是：中國人民為民主任務而作的廣泛的革命鬥爭，既然必須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才能勝利，那末，這個革命鬥爭的勝利，勢必要將無產階級推上政權——這是一。踏上了政權的無產階級（自然是通過它自己的政黨），為要防止反動復辟，確保革命勝利，並解決革命任務，勢必要實行依靠城鄉廣大貧民的無產階級的專政——這是二。專政的無產階級當然不能自限於民主任務的解決，它必然要於掌握政權、解決民主任務的同時，就開始採取若干社會主義的措置，藉使國家能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這是三。無產階級專政的建立與該政權之開始採取社會主義措置，並不等於說這個國家在經濟文化基礎上已成熟了社會主義的建設條件。社會主義建設成功必須在世界規模中才能思議，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任務是與世界社會主義革命任務分不開的——這是四。以上四點，毛澤東除了第一點中的上半截，即關於民主革命中無產階級的領導權之外，就完全不曾想到過。今天，當毛澤東在事實的壓迫之下承認自己為「不斷革命論者」之後，其實還是不曾領會的。他始終不懂得，如今或者是不肯懂得，「革命性質轉變」問題的中心關鍵在於政權問題，即在於落後國家中勝利的民主革命勢必造成無產階級專政，以及只有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同時解決民主任務與提出社會主義任務這個事實。換句話說，民主革命中無產階級專政的必然性與必要性，決定了落後國家中革命發展的不斷性，這也就是說，解決了那些國家中關於革命性質「轉變」的全部問題。毛澤東既然跟在史大林後面，排斥了在民主革命中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於是在「轉變」問題上就永遠脫不出矛盾可笑的境地。當他攻擊不斷革命論時候是如

此，當他借他人之口來自命為「不斷革命論者」的時候，也是如此。譬如在施東向的長文〈中國革命兩個階段的區別和銜接〉（這是中共在此主要的革命戰略問題上突然改變態度後，想把新舊二說法調和起來的一次最鄭重的企圖）中，毛澤東那個「革命階段論與不斷革命論相結合」的戰略思想，被如此奇怪地規定在下面的定義中：「在全國範圍內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以前，人民政權的性質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各個階級聯合專政，它擔負着民主革命的任務，……在全國範圍內推翻了國民黨的反動統治，並且建立起人民共和國以後，這個全國範圍的人民政權的性質實質上是無產階級專政，它擔負着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施東向於下此定義同時，特別又舊事重提地指出了王明派的錯誤：「民主革命在重要省份開始勝利之日，就是革命開始轉變之時」，可是按照他的定義，所謂「全國範圍……以前」，「全國範圍……以後」，難道不也就是按照「人民政權」的控制面積的大小來判斷該政權與革命的性質？難道不也是錯誤的？最多，不過是百步與八十步之差耳。根據施東向所持理由，在全國勝利「以後」，民主任務「已經基本解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已經逐步上升而成為國內的主要矛盾。」這個理由，且不問它與毛澤東的舊立場有多麼明顯的衝突（依照毛澤東的說法：當民主革命在全國範圍內勝利之後，在人民民主專政之下，必須經過民族資本主義與合作社經濟的長期發展，才能談得到「國體」和「政體」的轉變），其本身也是不通的，不符合事實的。所謂「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誌着中國民主革命的基本結束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始」，這斷語根本有問題。無論俄國革命的經驗，或此次中國革命的經驗，都證明了革命專政的成立，既不是民主革命的結束，亦不能說是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始。因為，民主任務的解決——特別是土地問題——實際是革命政權成立以後才開始的，至於社會主義性的革命，如果從政治意義上說，則自從革命黨及其主要群

眾明確地為爭取「無產階級領導的」政權而鬥爭時，就已經開始了。施東向有一句話說得對：「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國家的政權問題」。可是在毛澤東思想中，表示出最無遠見，因而被事變駁斥得最為殘酷的，恰恰是關於這個根本問題的立場。他一直堅持到勝利以後的那個老調子，所謂由於革命的民主性質，中國只能建立人民民主專政而絕不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見解，使他在新事實面前遇到了非常尷尬的抉擇：或者，承認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完全錯了，承認民主革命勝利的結果確實只能像托派所說的建立無產階級專政^[6]，如果真要實行像他與史大林所預言的什麼建立「各階級的聯合專政」，那只好讓資產階級來專政了；或者，口頭上，堅持說一切發展都完全證實了他戰略預見的正確，堅持說勝利後由政協產生的人民政府正是「各個民主階級聯合的共同專政」，並且堅持說這個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有原則性的不同，可是在事實上，卻將一切奪到的東西緊緊抓在共產黨人的手裏，非但不讓各「民主階級」插手插嘴，甚至不讓他們自以為代表其利益的工人階級插手插嘴。很顯然，毛澤東是選取了後一抉擇的；但因此他那種口是心非與言行不符的情形，卻隨時日的增加而愈加赤裸與愈加不堪了。而更使毛澤東與中共難於繼續玩弄這套表裏不一的把戲的，就是當資產階級利用毛澤東那套民主聯合理論，向新政權作政治的與經濟的進攻時，竟發現自己辭窮理曲了。無情的事變迫得他們非改變方針不可。他們被迫從事「三反」、「五反」，被迫宣佈私人資本主義不可能在革命勝利後再有長時期的發展，被迫宣佈革命性質的轉變，因而「政體」亦必須作相應的改變了，即人民民主專政必須改為無產階級專政了。然則將怎樣改變呢？事實上是什麼改變都不需要的。全部實權操在共產黨人手中。如果說逐出幾個花瓶式的屬於「民主黨派的」「副部長」就算是「民主專政」轉變為「無產階級專政」，那末情形未免過於滑稽，以致連最不怕將人民當孩子來玩耍的中共，

也覺得多此一舉的。然則如何可以把一貫認為有原則性不同的兩種政體「轉變」呢？它們在事實上又是怎樣「轉變」了的呢？毛澤東對此沒有說過半句話，劉少奇也不曾費力企圖解釋這個問題。首次，就我所見到的文獻而論，出來想用理論解釋這個尷尬問題的，還是那位施東向先生，他說：

中國無產階級在領導民主革命取得勝利的同時，鞏固地建立了自己對國家的政治統治權，因而不需要在民主革命勝利以後為社會主義革命再進行一次奪取政權的鬥爭。這是因為我們黨在領導民主革命中絲毫沒有忘掉社會主義的目標，在民主革命鬥爭中緊緊地抓住了政權的問題，並且堅決地確立了和鞏固了無產階級領導權的結果。

這段話說得很不壞，回顧的解釋也可令人滿意；但對中共卻有一個最大缺憾，那就是：它在本質上完全是托洛次基主義，它把毛澤東一二十年來對此問題的全部理論粉碎無餘，因此徹底否定了毛澤東作為一個偉大革命戰略家的地位。

注釋

1. 即 1935 年前後——王凡西。
2. 及時判斷局勢並靈活地提出適合於新局勢的口號，自應屬於戰術或策略範疇。不過像 1928 年托洛次基提出國民會議口號，作為代替「蘇維埃」口號，管領整個反革命時期，並將憑此走上新革命中奪取政權之路，這樣一個口號，卻應該說已充分提高到戰略平面了。因此我們有理由在此一問題上衡量毛澤東的戰略家高度。

3. 毛澤東文章中第一次正式提及國民大會口號是在 1937 年，但整個路線的改變既在 1935 年秋，則國民大會策略之採取，當與「人民共和國」口號代替「工農共和國」口號的同時，1935 年的中共八一通電中，這個新策略是以「真正代表全體同胞的代表機關」名稱提出的。
4. 這類例子我們知道有過很多，只因中共從來不將此種事情公開，要找直接的文字證據是相當困難的；但間接的證言卻有的是。比如從鐵托的自傳中，我們知道史大林曾經親口對南共領袖們說過，當日軍投降之後，他曾反對中共對蔣介石硬拼作戰，毛澤東不聽，結果中共在內戰中勝利了。此事證明了史錯毛對，但毛澤東從來不宣揚此事。
5. 「人民政府」究竟在哪一意義上稱得上無產階級專政，它與俄國十月革命後的無產階級專政有何不同，暫不在此論述。
6. 中共在革命勝利後所建立的政權，究終是不是無產階級專政？如果說是，那末它到底在怎樣的程度內，在什麼意義上，才算是無產階級專政？這在國際非史大林主義派的共產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中間，曾經引起很多爭論。筆者個人，對此問題也有過一些不同看法。最初，我認為他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只能說是官僚專政。後來，經過繼續研究和思索後，我的結論是：「中國共產黨仍能算是代表工人階級傾向的政黨，其政權在其主要的經濟措施上仍能算是代表工人階級歷史要求的政權——不用說，這裏的所謂代表是以非常畸形，非常野蠻，非常官僚化，因而是非常僭妄的形式表達出來的。詳見拙作：《思想問題》。

七、不高明的戰略家（下篇）

（武裝革命與革命戰略）

上面我們是從革命性質問題，特別是從革命政權的性質問題，研究了戰略家身份的毛澤東思想。

現在讓我們從另一個問題，即從武裝鬥爭這個問題，來研究毛澤東的戰略思想。在《高明的戰術家》這一章裏，我們曾經研究過毛澤東這條武裝革命路線，且曾給過它適當的評價。我們指出過，毛澤東的這條路線，在1938年以前，一直是以戰術路線，即以策略路線來提出的。等到他在《戰爭和戰略問題》的文章中，企圖以獨特的、全面的革命戰略路線提出之後，我們又曾詳細地分析了毛氏用以支持此路線的那些思想，它們是粗俗、膚淺與錯誤的。凡此種種，我們自不必在此地再談。這裏我們必須談的，乃是上一章中提出而未曾解答的問題，即：毛澤東如果自覺地、全面地、將武裝鬥爭提高到革命戰略地位，特別是如果自始就能將此一戰略路線，安置在整套不斷革命的戰略中來提出、考慮和執行，那末，中共以及一般的中國工農，在其走向革命勝利，取得勝利和擴展勝利的過程中，會呈現出與實際上已經呈現了的情形有怎樣的不同的？

這個問題，表面看來彷彿是完全學院式的。對於某一件業已完成的事情，事後指手劃腳，賣弄聰明，說什麼原不該如此，早應該如彼之類的話，自然是無聊之極。但是嚴肅的歷史研究卻不屬於這一類行徑。鄭重檢討經驗，藉以獲取教訓或確定真相，和那些專說風涼話，扮演事後諸葛亮的作風，並無絲毫共同之點。像中共走上勝利這樣的巨大歷史事件，不但歷史家有資格研究，就是實踐的革命家也有充分的資格——而且必須——對它作詳盡的、多方面的探討。這中間，特別是屬於托派的革命者有權利來這樣做。因為三十餘年來，簡直可以說一自中共開始成立以來，史托二派差不多對所有的中國革命問題——不論戰略性或策略性的——均提出過兩種不同的立場。因此在今天，回顧這些年中所發生了的史實，根據二派主張的文獻，作如果如此而不如彼則將如何如何的研究，絕對不是無聊，也不是學院式的。因為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決不曾因中共勝利而完結，從橫的世界範圍看，或從縱的繼續發展看，中共的勝利都不過是一個段落——雖然是具有很大意義的段落——有關於這一革命的那些基本問題，現在有，將來也會有不僅是歷史的意義，而且是實踐的意義。

事實自然勝於雄辯。勝利這個事實尤其如此。主要是服膺史大林路線的中共既然獲得了勝利，那末，過去關於中國革命的史托之爭彷彿已經最後解決了。套句陳腔濫調，即歷史已經給這個爭論做了答覆。其實，這樣的想法是淺薄的、勢利的，因而是錯誤的。根據中國古老的智慧，我們不主張「以成敗論英雄」。就是西方的賢者也不許憑結局來判斷計劃的。古代的迦泰基人曾經處罰過一些將軍，為了他們蹩腳的作戰計劃，雖然這些計劃曾僥倖地獲得了勝利。今天中共是勝利了，但此一事實並不足以證明史大林與毛澤東的戰略路線，確實比托洛次基與托派的戰略高明或正確。

在上一章裏我們曾就不斷革命論方面研究了這個問題。現在我們要從武裝革命的戰略方面來談同樣問題。

毛澤東經常引述史大林的一句話：「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對武裝的反革命作鬥爭。中國革命的特性之一和優點之一便在於此。」毛澤東做這個引述的意義有二：第一，想確認史大林為中國武裝革命戰略路線的奠基人；第二，想說明毛澤東所倡導和執行的武裝革命路線，乃是一種深思熟慮的戰略，它一方面在理論上師承史大林，另一方面在實踐上根據於他本人對中國國情的調查研究。

讓我們先看看史大林此一論斷的性質，看看它是在什麼時候，什麼條件中說的。因為在毛澤東的引述中，它永遠是當作抽象的、懸空的、像康得的一條「無上命令」式的真理提出來，以致讓人無法確切知道，究竟史大林下此斷語時何所根據，何所指示，以及他究竟付它以何種性質。下面是史大林說這幾句話的全文：

因為廣東軍隊的推進就是對帝國主義的打擊，對其中國走狗的打擊，就是一般地給中國一切革命分子，特別是給工人以集會自由、罷工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中國革命軍隊的特點和極重要的意義就在這裏。

從前，在十八和十九世紀，革命是這樣開始的，通常是大部分沒有武裝或武裝很差的人民舉行起義，他們和舊政權的軍隊發生衝突，他們竭力瓦解這些軍隊，或者至少把一部分軍隊地拉到自己方面來。這是過去革命爆發的典型形式。一九〇五年我們俄國的情形也是這樣。中國的情況卻不同。在中國，和舊政府的軍隊對抗的，不是沒有武裝的人民，而是以革命軍隊為代表的武裝的人民。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中國革

命的特點之一和優點之一。中國革命軍隊的特殊意義正在這裏。

【朱正按 《史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八卷，325、326頁。】

上面這段話是史大林在1926年11月30日，對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中國分委員會演說的，演說的題目是《論中國革命的前途》。這裏所指的「人民革命軍隊」就是指當時以蔣介石為總司令的北伐軍。他說這些話的用意，在於批評他的兩個支持者，彼得洛夫與米夫所提出的中國問題提綱，其中，據說把中國革命軍隊問題「遺漏或低估」了。那末史大林自己究竟怎樣重視這個問題的意義？為什麼要批評這點呢？要明白這些，那就得談一談當時蘇聯共產黨領導層中有關此問題的爭論。不用說，這爭論也是一方面以史大林為首，另一方面由托洛次基領導的。依照史大林的意見，當時蔣介石統率的國民黨軍隊就是「人民的革命軍隊」，它「是中國工人與農民為自己的解放而進行的鬥爭中的最重要的因素。……廣東軍的推進，就是對於帝國主義的打擊，就是對於帝國主義在中國走狗的打擊，……」如此估計了「廣東軍」之後，史大林接着就給共產黨人提出了兩個任務：一、必須加強軍隊中的政治工作，使蔣介石的「軍隊成為中國革命思想的真正的和模範的傳播者」；二、共產黨人必須研究軍事，以便「在軍隊中佔據這個或那個領導職位」。以托洛次基為首的反對派，對此問題抱着相反的意見，他們首先不承認那由蔣介石控制的軍隊為「人民的革命軍隊」，因為，論成分，「資產階級和地主的子弟在軍官中佔大優勢」，論領導，它是完全操縱在資產階級國民黨手中的。為了讓廣東北伐軍真正變成「中國工人與農民為自己解放而進行的最重要的因素」，托洛次基竭力主張成立兵士的和工農的蘇維埃（即代表會議），主張武裝工農。依照托洛次基等人的看法，軍隊中的政治工作，即所謂黨代表制度，因為「沒有獨立的革命黨與兵士蘇維埃，早已變作資產階級軍國

主義的一個空洞掩飾物。」至於某些共產黨人在國民黨軍隊中「佔據這個或那個領導職位」，絕對不能防止軍隊被反革命所利用，倒是「佔據了領導地位」的這個或那個共產黨人，大可能被資產階級的反動影響所腐蝕呢^[1]。

基於上述認識，史大林所控制的共產國際不但堅決反對在北伐軍進展時候組織工農代表會議與兵士代表會議，而且竭力反對武裝工農。決議上正式規定：「為了革命利益，武裝工人應該在最低限度內」進行；而事實上則共產國際的代表反對任何限度內的工人武裝，以免「觸怒蔣介石」（1927年四一二之前），或「逐走汪精衛」。

史大林《論中國革命前途》的演說發表於1926年11月30日，也就是發表於「人民革命軍」總司令屠殺工農之前四個月零十二日。那時候，他拚命反對托洛次基派那種用工農兵代表會議方式以圖建立真正革命軍隊的主張，他的兩個追隨者，自然格外奉承，在提綱上半句都不提革命軍隊問題了。可是規避問題顯然不就是解答問題，同時一經規避，人們是更加會傾聽反對派主張的，於是史大林便自己出來，糾正這兩個捧場者的錯誤。他出來肯定了武裝鬥爭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性，肯定了革命軍隊的重要性，因此，他反對反對派武裝工農的意見，反對反對派成立工農兵代表會議的意見。理由是：革命軍隊已經存在了，那就是以蔣介石為總司令的北伐軍，武裝鬥爭也正在進行了，那就是廣東軍隊和孫傳芳、張作霖的戰爭。依照他的見解，在那個時候武裝工農，組織工農兵代表會議，事實上是破壞業已存在的「人民革命軍」，破壞正在進行中的革命武裝鬥爭。因此，他當時大聲疾呼，要人家重視軍隊或武裝鬥爭，事實上只是替蔣介石及其統率的軍隊說話，決不是給中國的革命定下什麼戰略路線。他說：中國革命的特點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意思只是：蔣介石指揮的正在

跟北洋軍閥作戰的軍隊，正好是中國工農自己解放的最重要因素，你們千萬不可以拿什麼工人武裝或兵士蘇維埃來破壞它。

這便是史大林說出那句著名論斷來的真實意義。它根本不是毛澤東日後所了解的意義，也不是毛澤東要我們接受的意義。針對着這幾句話，托洛次基曾經有過如下的批評：

共產國際的中央機關刊物，於1927年2月25日，即上海流血的一個半月以前寫道：

中國共產黨與中國覺悟的工人，在任何情形之下，都不應進行分解革命軍的策略，這因為資產階級影響，在那裏還相當強固……（見《共產國際》，19頁，1927年2月15日出版。）

史大林於1927年5月24日，在共產國際全體執委會上，有如下演說——這幾句話是他在任何時候常常重複的，他說：「在中國，不是徒手人民反對舊制度的軍隊，而是武裝的人民用革命軍形式反對後者。在中國，是一個武裝的革命在反抗一個武裝的反革命。」

在1927年夏天和秋天，國民黨軍隊被形容為武裝的人民，但是當這些軍隊撲滅廣州暴動的時候，《真理報》又宣佈說，中國共產黨之「最長久的（！）缺點」，是在於他們的無能去分化「反動的軍隊」，在廣州暴動前夜，這同一軍隊還被稱為「革命的人民」。

「真是一些無恥的騙子們！」（見1930年8月寫的《史大林與中國革命》。）

這裏說得不能再清楚了，史大林這個「以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的公式，其全部含義只是替蔣介石的僱傭軍隊掛上一個革命武裝的招牌，並以此作為盾牌，藉以抵禦工農武裝對蔣軍的分化。毛澤東在史大林說了這幾句話的十一年後，竟在其中找到了他「槍桿子革命」的理論根據，顯然是出於誤解。如果此話確曾使毛澤東的武裝革命路線由策略地位提高到戰略地位，那末居功的顯然不應該是史大林那個公式本身，倒應該是毛澤東的誤解。中外歷史上不乏這種值得稱道的誤解，不少帶有進步性質的反抗運動，曾經從統治階級的聖經賢傳中，有意無意地摘取了一些「公式」，作為運動的辯解。毛澤東在此情形中之徵引史大林，也應當算入「神聖的誤解」之列。

至此，我們已經可以確定一點：與毛澤東告訴我們的故事相反，史大林從來不曾替中國革命提出過一條有別於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派革命戰略的路線，即從來不曾說過中國工農的革命應該不像西歐各國的兄弟們那樣，（在長期間做群眾的組織工作）而應該走獨特的武裝革命的道路。他非但不曾這樣說過，而且在中國工農最有可能武裝自己的時候，他還堅決加以反對了的——其反對理由正是要讓蔣介石的軍隊發揮「中國革命的優點和特點」，去和「武裝的反革命作武裝鬥爭」。

那末當中國革命失敗之後，當中共在共產國際的指揮下完成了一個極端轉變，由機會主義跳向盲動主義，實行了自南昌以迄廣州這連串暴動之後，史大林是否給中國革命規定了武裝鬥爭的戰略路線呢？我們知道並不。自從 1927 年 8 月開始的（由所謂「八七會議」決定的）武裝革命路線，由該一時期的所有文件證明，絕對不是根據於一條新的關於中國革命的獨特的戰略路線，而是根據於史大林等對當時中國革命的奇怪估計。即認為：不管革命勢力之一再失敗，其總的形勢卻

是繼續上升，它因每一挫折而登上更高階段。當武漢工人繼上海兄弟們被屠殺於血泊中之時，共產國際卻宣佈中國「處於直接革命的局勢中」，號召「立即組織蘇維埃，組織工農暴動」。等到了1928年夏秋之間，史大林們先後在中共六大與共產國際的六次大會上，承認了「中國革命的第一階段」已經過去，即不好意思地、虛偽地承認了中國革命業已失敗，同時也就把武裝暴動口號改為「宣傳的」了，即在議案上取消了這條「以武裝革命反對武裝反革命」的路線。至於事實上，自從那時以後，中國在部分地區始終繼續着這個「路線」，那也決非因為史大林等對中國革命的「特點」的認識，首先，它是由大革命所引起的南方農民鬥爭的客觀邏輯造成的。農民鬥爭，不發展則已，一發展就得演成武裝衝突；衝突一起，如果不想失敗，不想受到慘酷的鎮壓和報復，就得堅持下去。農民鬥爭由於本性使然，自來是難得堅持的。1927年秋冬湘贛區域農民暴動之所以能夠持續，自然因它和當時由武漢戰敗下來的共產黨員及其軍隊合流之故。這兩股力量彙集在一起，在國民黨反革命軍隊的恐怖壓力之下，除了設法以武力抵抗之外，再想不出其他「路線」來了。如果不想走這條道路，那便只有繳械投降，靜待屠殺。所以當時這條路線並非什麼人深思熟慮地定出來，而是鬥爭的客觀邏輯迫出來的。走上井岡山的道路，和走上梁山的道路一樣，都是「迫」字築成的。其次，史大林當時所以會「批准」毛澤東等走這條路線，那是由於「第三時期」的總估計，並非為了執行什麼對中國革命「新戰略」。所謂「第三時期」的估計，乃是指上述共產國際的六次大會所決定的一種對整個世界資本主義的看法。根據這個看法，資本主義制度已經到了總崩潰的時機，它認為曾經有過短短一時期的「相對平衡」，此時已經終結，因此，擺在全世界無產階級與共產主義者面前的任務，就是要組織和進行對資本主義的「最後一戰」。也因此，就在同一次共產國際的大會上，中國的「蘇維埃暴動口

號」，雖曾因被迫承認中國革命失敗而暫時從「行動性的」改變為「宣傳性的」；但因全世界已被宣佈為處於「直接革命的局勢」中，史大林們對於中共領導下的農民武裝鬥爭，也就採取了雖不積極鼓勵卻是消極容許的模稜態度。這個態度，在1930年的蘇聯共產黨第十六次大會上，史大林表示得最為清楚。他說：

若以為帝國主義者的惡行，就這樣過去而沒有受到處罰，那真是可笑的。中國的工人與農民已經建立了蘇維埃和紅軍，來答覆他們。聽人說中國已經建立了蘇維埃政府。我以為假使這是真的，那麼這裏面沒有一點驚奇。毫無疑義的，只有蘇維埃才能挽救中國免於完全的瓜分和衰亡。

這樣含糊、這樣不着邊際、這樣滑頭、這樣帶有假說性的說法，竟出之於那個中國革命戰略的最高決策者之口，而且在最有權威、最嚴肅的聯共黨大會的正式報告中，是史大林關於當時仍為最重大國際問題的中國革命的全部指示，真是令人驚奇的。史大林為什麼要這樣做，理由應該首先從當時聯共黨內的派別鬥爭中去找，我們這裏不談這些。此地我們提出史大林那段有名的所謂「五句評述」來，只為的要證明，在那一時期，即當中共的盲動主義正在實行之際，史大林也不曾從中國的什麼特點出發，給中國革命指出過獨特的、不同於傳統馬克思主義的戰略路線，即「以武裝革命反對武裝反革命」的路線。誠然，他的「五句」中提到了「蘇維埃」，提到了「紅軍」。那不過如托洛次基所指責，是一種「計謀」。是怎樣的計謀呢？我們知道，在那時候不久以前，中共與共產國際剛剛在正式決議上，停止了武裝暴動的口號。這表示在事實面前，史大林終於不得不承認，當時中國已由反革命的猖狂局勢代替了直接革命形勢，而在反革命局勢中，想靠工農，甚至單靠農民暴動來組織蘇維埃與紅軍，則依照他傳統的馬克

思主義的革命戰略，知道是決無前途的；所以史大林不得不贊成取消暴動口號。可是在同時，中國南方農村裏的暴動仍在繼續，且自稱蘇維埃，自稱紅軍；這對於「全世界均已處於直接革命局勢」這個認識是有利的，他便覺得不妨讓中國同志們自己去繼續武裝暴動路線吧；不過他得當心說話，他不應負起這種做法的正式責任，以便這種鬥爭遭到鎮壓或消滅時，他可以脫卻干係。由此可知當時史大林在此一問題上的想法是非常矛盾的：一條傳統的路線和一個不合傳統的希望在他心中交鬥。一個前途比較現實合理，但比較遙遠；另一個前途較為冒險難恃，但較為切近。二者對他都有誘惑力，都有用處（至少在對付黨內政敵上），於是他不分軒輊，兩面贊成：議案上主張取消暴動口號，言論上則對暴動加以讚揚；不過讚得有分寸，揚得有條件：「聽人說」，「假使是真的」，那末……「沒有什麼驚奇的」。這意思等於說，假使人們所說不確，假使不是真的，假使那些暴動遭到了悲慘結局，那末也沒有什麼驚奇的，反正，史大林已經在專門關於中國問題的議案上，斥責過，取消過暴動口號了！

如此態度，如此指導，無怪他的對頭托洛次基要在〈史大林與中國革命〉一文中評之為「最權威與最顯赫的官僚論斷」，斥之為「無恥的計謀」了。

事情至此已經很清楚：說史大林奠定了中國革命武裝鬥爭的戰略道路，其實乃是一種神話。1930年以前種種已如上述。至自聯共黨第十六次大會以後，則就筆者個人所知，史大林根本不曾再對中國革命問題說過任何原則性或戰略性的意見。當整個共產國際在1934年間從極左的「第三時期」轉變到極右的「人民陣線」時，中國的武裝革命力量，索性被命令置於武裝的反革命頭子蔣介石的統一指揮之下，即在實質上它索性被取消了，當然更談不上什麼武裝鬥爭的戰略路線。

【朱正按 共產國際是在 1935 年 7 月至 8 月開的第七次代表大會才轉變到「人民陣線」路線的。】

既然史大林對中國革命的武裝鬥爭戰略無所貢獻，那末，這個戰略是否更應歸功於毛澤東呢？

毛澤東在這方面有甚大貢獻，是無容爭辯的。我們不會、而且也不曾否認過這個事實。我們所爭論的只是關於毛澤東在這個方面的戰略家地位。換句話說，首先應該研究的是：毛澤東將中國革命運動引向農村，在那裏拿起武器，長時間從事蓄聚、教練和實行以武力對武力的鬥爭，究竟是根據於深思熟慮的戰略呢，還是但憑中國歷史上造反起義的傳統？前面我們說過，毛澤東一直要到他慶戰十年之後，即在 1938 年冬天，才將他「抽劍、揮鞭」、「為江山折腰」的風流壯舉，第一次原則性地、歷史地，站在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戰略平面上，從中國革命鬥爭的多方面的特殊點，加以考慮研究。那時毛澤東的武功雖然離最後勝利尚遠，但其成就已非常可觀，根底已經穩定了。憑此經驗，作理論性的回顧與總結，事情是相當自然與輕易的。但在獲得這個總結以前，即當他未曾將武裝鬥爭當作中國工農之唯一正確可行的戰略路線來進行的漫長歲月中，特別是當此鬥爭萬分艱難的初期，到底是什麼東西推動毛澤東走上這條道路的呢！客觀方面，那時中國特別尖銳與血腥的階級鬥爭，自然是最大的推動力。倘就主觀方面說，則毛澤東之並不精通馬克思主義；他之熟悉中國歷史，而不深明西方革命史；他的出身於農村，以及他的性格上與思想中的儒俠因素，都應該說是重要理由。同樣在 1927 年秋冬大革命失敗的環境中，人人呼吸着當時低沉壓迫的空氣，人人懷抱着悲憤痛苦的心情，可是在共產黨的上層領袖中，恰恰是毛澤東最堅決地走上了武裝農民鬥爭的道路，那是必須要從主觀方面解釋的。

「一個人的缺點往往也就是他的優點」，這句話在此地說是非常合適的。正因為毛澤東那時候馬列主義懂得少，這個外來思想對他束縛力不大，於是他可以本能地、常識地、憑一己經驗地、按照傳統地、對革命的行動問題作出判斷，決定道路。那時候，他如果「熟知希臘」，更壞的，如果他食而不化地或一知半解地懂得「希臘」；如果他熟諳半世紀來西方工人革命的方式；如果他深信馬克思主義關於先工人後農民，先城市後鄉村，前者領導後者的不易立場；如果他知道工農紅軍乃是全國性工農政權的產物這個史例，並受其束縛；如果他嚴守工人政黨必須以工業城市為主要據點的規定，那末，當1927年革命終於在武漢潰敗之後，毛澤東多半會跟極大多數共黨領袖一樣，潛回上海，或蟄居武漢，而不會深入湘贛農村，奔上井岡山了。毛澤東當年的離開長沙，「投筆從戎」，不管事實上是否真的如其同事何資深所云，行囊中僅僅帶了一部《水滸》，一本《詞選》；而此時毛氏之以宋江為師、以黃巢為師、以李自成、洪秀全、孫中山乃至蔣介石為師，而根本不曾受馬克思列寧的遺訓的指導，卻是毫無疑問的。革命失敗了，革命者慘遭屠殺，反革命的將軍政客們在工農的屍骸上狂歡跳舞，後死與未死的革命者怎麼辦呢？軟弱的屈服了，叛變了，堅強者從泥污中爬起來，揩乾淨傷口上的血，痛中思痛，便認為過去失敗的主因在於沒有自己的武力，今後鬥爭的唯一道路是要拿到槍桿子。這個想法原非毛澤東所獨有，它乃是普遍的，存在於當時每一個不以失敗而喪失鬥志的革命者的胸中。毛澤東比眾不同的（更正確些說：比大多數共黨領袖不同的），只在他從中國舊的方面說，能夠由「秀才」變成真正的「反寇」，從外來的新的方面說，他能夠不為馬克思主義派的戰略公式所束縛，以致將上述的普遍想法變成決心，並不顧一切將此決心實行出來。毛澤東的此種不同是難能可貴的，那些由於本身的優點以及因缺點而轉化的優點所促成的、他對於中國革命已經

作出的貢獻，不用說，是非常巨大的。但雖如此，我們卻仍不能說毛澤東是偉大的革命戰略家。因為毛澤東所選定與所堅持的武裝鬥爭道路，主要乃是中國固有的農民戰爭傳統的繼續，而且是被迫地、經驗主義地、甚至不很有意識地走上了這個道路的。誠然，先行後知，乃是人類認識的正規程式。尤其是有關乎戰爭與革命那樣千變萬化、難得有規律可循的事情，拿破崙那句名言「打起來再看」，更起着甚大作用。但這決不能否定先知後行的價值，更不能因此而認為歸納出來的系統化了的知，只能作事後空談；而不能用作「行」的指導。一個戰爭統帥或革命領袖，是否能精通過去的與前人的知的成果，是否能憑此作事先的通盤籌謀，並因而立下原則性的戰略路線，應該是其人之高明或不高明，其事業之勝利或失敗的重大決定點。「打起來再看」，與「謀定而後動」不相矛盾，它們不是兩回事，卻是一事的兩方，是相輔相成的。二者缺一不可。無前者會劃地為牢，迂腐因循；無後者則會隨波逐流，亂闖瞎打。對事業的成敗言，二者所佔的重要性可說是難分高下的；但就軍事家與革命者的品質言，則後者無疑要高過前者多多。唯有「廟算」高手，決策奇才，才能勝統帥之任，而隨機應變，因時制宜，則主要是執行者的能事。當然，我們這樣說，並非要將這兩種品質截然分開，因為它們根本是不能絕對分開的。決策者固須有應變之才，而執行者亦不可無高遠之見，不然的話，那就既不能有美備可行與不落事後的全盤計劃，也不能有變不離宗與雖折不摧的局部實行了。我們這裏說「謀定而後動」這個品質，比「打起來再看」這個品質要高得多，意思只想說：要成為一個軍事意義上或政治意義上的偉大的戰略家，「先知後行」這個品質確是比「先行後知」這個品質更為必須而已。這裏的分別固不僅在「機先」與「事後」之差，而更在於這樣一個事實：能先知而後行者，行後所獲得的乃是更高、更完備的「知」，故能促進下一步的「行」，而先行後知者，其所得之知，

未必真知，它多半屬於過去行為的表面的乃至謬誤的概括，因之它不足為下一步行動的指導，甚至會變成下一步行動的妨礙。一個人，當他在各方面均已成熟之後，思想方法是固定了的。先知後行的人也許可能衰退為先行後知者，或甚至退為不知不行者，但是一貫都只能先行後知的人，卻甚少可能因學習或歷練而進為先知後行者。毛澤東到達武裝革命戰略路線的經過既如上述，是先行後知的；然則，他所得的知是真知還是假知呢？這個知成了他下一步的行的指導呢，還是妨礙呢？最後，當毛氏在 1938 年思想上總結了武裝革命之後，是否已進而為「先知後行」者了呢？

這幾個問題，有的我們在「戰術家」一章中解答過了，有的將在以後的章節中，特別在「社會主義建設」一章詳論。這裏需要複述或指明的，只是：毛澤東從十年武裝鬥爭（截至 1938 年為止）中概括出來的知非常偏頗：槍桿子可以造黨，槍桿子可以造革命，槍桿子可以造社會主義，一句話，槍桿子萬能。至於中國的特點為什麼迫着共產黨人走上與歐洲共產黨人相反的道路？為什麼中國共產黨在「不到資產階級處於真正無能之時，不到無產階級的大多數有了武裝起義和進行戰爭的決心之時，不到農民群眾已經自願援助無產階級之時」，便可以而且應該舉行「起義和戰爭」，並且「到了起義和戰爭的時候，又不是先佔城市後取鄉村」呢？對於這些問題，毛澤東都只有提出與肯定，卻不曾給過解答，或者解答得極不充分。僅僅一方面的資本主義，另方面的封建壓迫，一方面的無民族壓迫，另方面的有民族壓迫，顯然不足以解釋這兩條根本不同的方向的。因為這裏牽涉到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問題，牽涉到無產階級在現時代革命中的領導問題，牽涉到共產黨與無產階級的關係問題，牽涉到工人對農民、城市對鄉村的領導問題，也牽涉到工農革命起義的準備，即是否必須要他們自己有決

心並自願援助這樣的問題。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內容不是別的，就是分析了近代社會（主要自然是西歐）的內部階級構成及其鬥爭歷史之後，得出了這樣一些結論：現時代的革命（不管它發生在什麼國家），離開了無產階級的領導就不可思議、就不可能有真正勝利的前途；無產階級領導只能體現為與必須體現為共產黨的領導，共產黨如想成為名實相符的無產階級先鋒隊，則除了接受社會主義革命的政綱之外，還必須植根在無產階級的群眾中，因此它必須以工業城市為主要據點；至於農民，則因其迷戀於私有財產的觀點與他們分散軟弱的狀態之故，其鬥爭往往是不夠革命的，保守的，至少是不能起獨立作用，更談不上領導作用的；因此農民鬥爭在歷史上（特別在中國歷史上）總是當了王朝更迭之際的簡單苦力，並不能將社會歷史向前推進一步。歷史上的農民戰爭曾經起了社會制度的推進作用的，只當他們受着城市中某一革命階級的領導之時，所謂城市中某一階級對農民實行領導，其意主要乃指該一階級在城市中展開的革命鬥爭所及於農民的覺醒及其鬥爭而言；並非指城市革命遭受失敗，或根本沒有此種局勢之時，少數革命者跑到鄉村去發動鬥爭而言。

上述這些根本立場，最早揭櫫於《共產黨宣言》中；後經數十年來各國革命從正面或反面加以證驗，終於在俄國的十月革命中開花結果，因而在共產國際的早期綱領上作了更充分與更明白的確定。當這些根本立場被應用到中國和中國革命來的時候，雖然遭受到史大林、布哈林一群人的可怕歪曲；但關於許多屬於方向性的認識，至少在口頭上，還是保持着這些立場的面貌的。即使到了1927年秋冬以後，被鎮壓的中國革命從機會主義走到盲動主義，再從盲動主義退回到新的機會主義，其間走着碰壁轉彎、迂回曲折的摸索路線，可是無論史大林或毛澤東那時都不曾對上述立場，有過任何一項懷疑或反對（事實

上的脫離是另一件事)。他們(尤其是毛澤東)把事實上的脫離當作策略，當作革命處於特別情況中走向同樣原則立場的一些手段。

1938年在這方面應該是有特殊意義的一年。在這年裏，由於武裝革命路線的勝利已經大有把握；又由於毛澤東此時補上了馬克思主義基本知識的課，於是，武裝革命路線被提到戰略平面上來考察了。可是在此考察中，正如我們前面一再指出，毛澤東雖然說出了中國革命所走的不是傳統的路，但不曾從根本上回答我們剛才列舉過的那些原則立場。譬如，他甚至提都不曾提出如下的一些問題：(1) 一群以共產主義者自居的革命者或革命黨，遠離無產階級的基本群眾及其鬥爭，不以工業城市為主要據點，是否仍能是好的共產主義者或共產黨，他們是否能有健全的生長，是否能保證在品質上不墮落，並且繼續增高地發揮社會革命黨的作用？(2) 如果對上述問題的回答是否定的(根據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應該否定的)，那末，接着的問題是：中共「實迫處此」地這樣做了，是否意味着作為一個共產黨已經是墮落了呢？或者，它若仍舊是一個健全的馬克思主義的革命黨，則此一事實應如何與馬列主義關於共產黨存在和發展的觀點和解起來？(3) 一群有組織的革命知識分子，信奉着一般的社會主義政綱，在農村裏組織農民，實行武裝鬥爭，這能夠代替無產階級對農民的政治領導嗎？如此組織和領導起來的農民武裝隊伍，能夠堅持嗎？能夠不受農民的散漫性和地方性的影響嗎？能夠憑以奪取城市，進行全國性的國內戰爭，且藉此獲致無產階級的革命勝利嗎？(4) 如果能夠，則原因何在？(5) 站在農民群眾及其武力基礎上面的共產黨及其政權，是否能堅持無產階級革命政綱的純潔？是否能在革命中貫徹這個政綱？同時如此取得勝利的革命是否帶來不少疾病？如果會，那末它們是怎樣的疾病？

上舉問題，不但毛澤東在將武裝革命當作戰略來考察時不曾提出與不曾回答，甚至直到今日，當他勝利以後，而且在這種特殊性質的勝利引起了特殊性質的困難和失敗之時，也不曾提出和回答。可是不僅為了解釋過去歷史，而且為了迎接今後艱難，這些問題卻絕對必須提出與解答的。毛澤東不曾這樣做，也不能這樣做，然則他怎配稱得是偉大的戰略家呢？

毫不誇大地可以說，今後的革命戰略家一定要從上述基本問題的解答作為起點。為此，我們不能不在此試作答覆如下：

先讓我們來談第一個問題，也可以說是第一組問題。「工人階級的解放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事情」，「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的政黨必須與無產階級共命運」；這兩個斷語，可以說是馬克思主義大師們在這方面的最概括的意見。與此相符合，他們主張了並且實行了下列的一些事情：社會主義革命者應該與工人大眾同甘共苦，深刻了解工人階級的生活、思想與感情；無產階級政黨必須以工人出身的黨員為基幹，必須提拔工人黨員參加領導機關；黨必須不懈地參加與領導工人們的一切鬥爭，不管它們是日常的或不尋常的，屬於經濟性質或政治性質；為了做好這些鬥爭，並在鬥爭中壯大自己的力量，黨必須團結、加強或創造各種各式的工人階級的群眾組織：只有這樣（依照那些大師們的意見），這個社會主義的或共產主義的政黨才能名符其實地成為工人階級的革命黨，也只有這樣，這些工人政黨才能堅定、清楚、始終不渝地為工人階級的解放事業，亦即為全民族，乃至全人類解放的社會主義事業而鬥爭。因此，植根在工人群眾中，與工人階級息息相關，和他們休戚相共，乃是一個社會主義政黨存在與發展的首要條件，也是它在存續過程中不致墮落與變節的重要保證。這個見解，過去證明是對的，今後也不會變得謬誤。如果我們這裏可以引用一個常識性

的比喻，那就是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那句話了。工人階級和工人政黨的關係，至少在出生和存在的意義上說，確乎有似皮之於毛也。那末，像中共那樣的政黨：論成分，一直以農民為主體；論領導，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佔壓倒多數；論存在環境，長時期脫離工人群眾，甚至遠離工業城市；論鬥爭方式，從來講究的是純軍事性的迂回進退，攻城掠地。這樣的一個黨能否算是代表無產階級的黨？這樣的一個黨，即使它標榜着與執行着傳統社會主義政黨的綱領，是否會認真貫徹，不墮落變節，且終於完成社會主義性的革命呢？對於這些問題，馬克思主義者自來的答覆都是傾向於否定的。因為這種做法，顯然與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政黨與無產階級領導革命的學說相背反，歷史上不曾有過如此做了而革命竟能成功的例子，反而充滿着如此做了遭致政黨變質或毀滅，革命失敗或被撲滅的先例。

然則中共如此做了，非但不曾被撲滅，而且它還將革命導致了勝利；同時這個勝利又不是簡單的軍事勝利，而是已被一切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派承認為具有深刻社會意義的革命的勝利，承認為（雖有一切缺點）符合於工人階級解放之歷史利益的革命勝利。這倒是什麼原因？應該怎樣解釋呢？

我們覺得，看到了勝利及其走向勝利的經歷之後，關於馬克思主義的上述那些基本立場，雖不必予以修正，卻必須作某些不同於傳統的了解或解釋，或者可以說，必須糾正一些誤解，首先是關於「皮與毛」的關係問題。一個國家，必須先有工人階級的存在，然後才能產生工人階級政黨，工人階級政黨，只有在感情、思想、生活以及鬥爭等方面與工人階級保持密切關係，才能真正代表這個階級的當前利益與歷史利益。這兩層意思，本身絕無疑義，但是怎樣密切與如何代表，卻是大有文章的。自從歷史上產生了工人運動與社會主義運動以

來，許多非常重要的原則性的爭論，就是為了兩者之間的如何結合，結合得怎樣密切，以及後者如何代表前者等等而引起。

工人政黨或社會主義政黨的誕生以工人階級的存在為前提，時常被了解為民族現象，其實，它主要應該被了解為國際的或世界的現象。社會主義革命的成熟，無產階級革命及其專政的成熟，首先是由世界資本主義制度的爛熟程度及其矛盾的程度來決定的。整個人類的歷史，至少自從俄國十月革命以來，就已進入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期。毋須說，倘以個別國家而論，世界上有大多數國家未曾在「經濟上或政治上成熟到」社會主義革命，但這並不影響到我們說人類歷史正處於社會主義革命時代的看法，因為在那些落後的與未獨立的國家中，如果發生了「民生、民權與民族」的革命，只要它時間延續與範圍擴大，那末由於其內在的邏輯與外來的壓力，它就一定要不斷發展，在或長或短的時間內，成為世界革命、亦即社會革命的一部分。正因為此，在單獨的落後國家內，儘管它本身的現代工業並不發展，儘管新式產業工人的人數在總人口中佔極小比例，卻有可能產生、並且應該發起與發展工人階級的、或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社會主義的或共產主義的政黨。總之，一個工人階級政黨的「毛」，不一定要附在本國本民族的工人階級這個「皮」上。主要是世界性的工人階級，在近百年來久已乎成為世界性的革命社會主義思想，提供了各別國家的工人政黨的存在前提及其意識思想與行動指導。

因此，將「毛」和「皮」的關係十分形式的、狹隘的加以觀察，顯然是錯誤的。由這個錯誤的看法，產生了各式各樣的其他錯誤見解。它們主要表現於如下兩個方面：(1) 認為工人政黨必須存在於工人區域中，其成分必須全部為工人，領導者主要須由工人出身，該政黨的主要的甚至唯一的活動應該是改善工人利益，他們將全部注意幾

乎集中於工人的經濟鬥爭，他們對全民族的、與工人階級無直接關係的政治鬥爭不感興趣……這種思想，在歷史上曾產生過工聯主義、經濟主義與尾巴主義等等。(2)認為在工人階級佔全國人口極少數的國家中，根本不應該組織獨立的工人政黨，而應該組織「工農黨」，或者主張將工人黨加入民族資產階級的政黨——例如國民黨，自居於左傾的一翼。他們並認為這些政黨不應該有自己獨立的行動與立場，而應自限於「革命資產階級」的贊助者、推動者與監督者的資格。這種思想，主要表現於史大林布哈林對中國革命的領導上，特別暴露在他們對中國國民黨關係的政策上。

上述兩方面的錯誤，發生的原因當非一端，不過我們指出那個關於工人階級與工人政黨之間的形式的與狹隘的看法，民族的而非國際的看法，卻不失為重大原因之一。此外，列寧在《做什麼？》一書中，更從另一方面，從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的不同來源，徹底精詳地批判了工聯主義與經濟主義的錯誤。他大膽地，似乎公然違反馬克思主義地，駁斥了一般「馬克思主義者」對於工人階級意識及其自發性的拜物教。他令人吃驚地宣佈：工人本來也就不能發生社會民主意識。這種意識只能從外面灌輸進來。各國歷史證明：工人階級憑靠自己的力量，只能造成工聯主義的意識，即對於必須組織工會，必須與廠主鬥爭，必須從政府那裏爭得頒佈工人所需要的某種法律等等的信念。而社會主義學說是由有產階級出身的那些受過教育的分子，即知識分子所製定的哲學理論、歷史理論以及經濟理論中長成的。」（見《列寧文選》兩卷集中譯本，202頁。）他又說：「當工人還沒有根據各種具體而且確實迫切的（當前的）政治事實和事變來學會觀察現社會中其他各個階級在其思想道德和政治生活上的一切表現時，當工人還沒有學會用唯物主義觀點來分析估計所有各個階級，各個階層集團的活動

和生活中所有各方面的表現時，工人群眾的意識是不能成為真正階級意識的。」（見同上引書，237頁）列寧在這些話中以其特有的誠實、勇敢與深刻，說明了這樣一個真理：目前唯一進步的階級——工人階級，在其走向自我解放與社會解放的革命途中，並非自給自足，不假外助的，特別在意識和思想方面，它得從外「輸入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整個思想不可能從工人階級的生活和存在中自動地，「客觀地」產生出來。（這種「自動」產生出來的工人階級意識思想時常替資產階級服務的。）它首先倒是被出身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不依賴於工人運動的自發增長過程，而從革命社會主義知識界底思想發展中自然和必然產生出來的結果。」（同上引書，202頁。）從這裏，列寧強調了社會主義政黨對工人階級與工人運動的領導作用，確定了先鋒隊與階級群眾之間的相互關係。依據這個關係，「皮」和「毛」的比喻，只有在原始與根本的意義上才能成立。在發展了的關係中，社會主義政黨的生活（其行動及其意識）決不是它所代表的階級之直接與簡單的反映，二者的存在也不是絕不容許有任何離開的。一個強大的歷史悠久的工人階級可以有一個軟弱無力的政黨；反之，一個數量微少、誕生不久的工人階級倒往往會有一個堅強戰鬥的先鋒隊。有些工人政黨，由工人自己領導、在工人區中生長、年長月久地與工人群眾息息相通，可是一到緊要關頭，碰到了勞資衝突的大問題，這些工黨卻總是幫資本家的。另一方面，有些社會主義政黨，特別是它的領導機關或領導人物，因為種種原因，被迫與他們所代表的階級群眾離開，或長期地離開，但因他們堅持革命社會主義的思想，堅持革命的綱領之故，卻終於領導了工人階級走上了革命勝利。

可見根據列寧關於工人階級與工人政黨相互關係的見解，一個決心要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社會主義革命黨，並不一定要片刻不離地存

在和活動於工人區域之中。工人政黨如能擁有大量工人出身的優秀領袖和幹部，如能擁有壓倒多數的工人黨員，如能在工人區域中築成最堅強的據點，如能與工人大眾的生活息息相關，這當然是最大好事，是最大幸運，但單靠這件好事，卻不能保證這個政黨能成為社會主義的革命黨。另一方面，一個工人政黨，如果因為客觀原因，主要例如反動政府用極端嚴密的恐怖手段控制城市，特別控制城市中的工人區域，以致這個政黨的領導機關及其領袖人物，被迫進入牢獄，或流亡海外，或逃向僻遠的農村，在那裏，他們不得不主要生活在、並依靠着小資產階級的勞動者（農民）與知識分子，藉以繼續從事首先代表工人階級利益同時亦代表廣大民眾利益的革命鬥爭——這情形當然是不好的，是一個工人政黨的大不幸，但是單憑這個事實，我們不能就此斷言這樣的政黨絕對不能成為革命的社會主義者，不能斷言它不會引導革命至於勝利。

在這裏，列寧當年用以打擊俄國經濟主義者的那些論點，現在倒可以幫助我們改正一個正統馬克思主義者在組織工作方面的重要見解了。那個見解是：一個革命的工人政黨，在任何情形之下都必須以城市工作為主，如果這個政黨，不管因為自動的或被動之故，離開了城市和工業區，以致其成分變為以小資產階級分子（知識分子或農民等）為主幹，那末它必然要墮落或死亡的。這個見解當然與經濟派的主張風馬牛不相及。它是真正馬克思主義的，也是布爾雪維克主義的。無產階級政黨要想免於墮落或死亡，要想鞏固、發展以至勝利，其重要條件，不用說，是要擁有和保持城市工人階級中的堅強據點，是要擁有大量無產階級的黨員和幹部，乃至不少個工人出身的、在鬥爭中久歷鍛煉的革命領袖，近代革命史上不少例子，曾經從正面和反面證明了上述見解的正確。但是一些新的史實向我們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即

若那個革命的工人黨遭到了我們剛才提及的「不好與不幸」的情形，又若他們試盡一切方法以圖繼續城市地下革命工作而不可得，或幸能維持地下工作而無法開展，那末他們是否可以與否應該暫時以主力離開城市和工人，在嚴格堅持革命政綱與馬列主義原則思想條件下，以並非無產階級的一般勞動者為基礎，進行革命工作，而且確能進行革命工作，使政黨不致墮落與死亡呢？簡單些，這個問題可以這樣提出來：在某些特定的條件之下，一群堅強團結的社會主義的職業革命家，在或長或短的時期中脫離了無產階級，是否仍能代表這個階級的利益？或者，更簡單些，問題可以規定如下：社會主義的思想，抓住了一群知識分子的革命者，再經過他們，抓住了廣大的非無產階級的勞苦群眾，是否也能夠在相當長時期內，擔負起工人階級革命黨的責任？上面用三種方式提出而本質上相同的問題，按照傳統馬克思主義派的立場，所給的答覆都應該是偏於否定的。因為，如果我們肯定地答覆這些問題，就彷彿不但違反了馬克思主義最根本的階級觀點，而且離開了存在決定意識，生活決定思想的基本立場。所以，像俄國當初的經濟派以及類似的人不必說，他們是「主張『純粹工人運動』的，主張「與無產階級鬥爭發生最密切的、最『有機』的聯繫的，反對任何非工人出身的知識分子的。」（見同上引書第 208 頁），當然要以絕對否定的態度來答覆我們上面的問題，但即使同意列寧在《做什麼？》一書中意見的人，他們堅決相信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是「並排產生出來，不是彼此產生出來，而是在各不相同的前提下產生出來的」；堅決相信工人階級要受社會主義的「灌輸」，其鬥爭與革命必須受社會主義政黨的領導的，也未必會輕易地以肯定方式答覆上面的問題。因為，他們雖然不機械地將存在與意識問題移到這方面來，他們卻看見過太多的例子，暴露出長期間脫離了工人大眾的知識分子的社會主義者或共產主義者集團，或者在革命勝利前就經歷了資產階級的腐化墮落，

以致斷送了工人階級的事業，或者在革命勝利後，他們迅速變成騎在勞動大眾頭上的新統治者，成為肆無忌憚的官僚，因而同樣敗壞着工人階級的歷史事業。

這一種人對於我們上舉問題採取懷疑或否定的答覆態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在某種限度內，今後也還是正確的。佔據工人政黨上層的非工人出身的（甚至是工人出身的）社會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長期間脫離了工人群眾會變成怎樣醜惡的面目，我們可以一方面從老機會主義的第二國際政黨中的領導層，另一方面從史大林們的情形中見到的。這二者的腐化與墮落，不用說有許多更大的歷史原因，但領導群之脫離其所代表的群眾，無論如何是原因之一。所以我們說，如何保持階級群眾及其領導者們的密切聯繫，乃是防止革命黨腐化墮落的重要保證，這保證在今後也許愈來愈重要的。但是，人們如果為了這個理由而認為無產階級的黨任何時候都不能離開城市環境與工人階級，那就有點因噎廢食了。

綜合上面所說，我們可概括如下：從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關係及其階級鬥爭中，產生了一方面的社會主義的思想運動，與另一方面的勞工運動。二者結合，造成了最近百餘年來以工人階級為主力的、以改造整個社會制度為目的的社會主義運動。社會主義思想只當它與工人階級結合後才有力量，才能體現；工人階級則只當它接受了正確的革命的社會主義思想，並接受了根據此一思想組織起來的政黨的領導之後，才能讓自己的鬥爭獲得進展和成功。因此，社會主義的革命黨必須建築在工人階級的基礎上，必須與它保持最密切的關係。但這個關係並不是密切到有如形之於影，或肉體之於精神。二者不是同一事物的兩種不同作用，更非一物之兩面。社會主義思想並非為工人運動派生出來的東西，它們乃是並排產生的兩個力量。因此，社會

主義（其思想及其組織）與工人階級運動在生活上是可以分離而又不可以分離的。可以分離，即是說，一個社會主義的革命組織，如因種種客觀的不利條件，被迫離開了工人階級的基礎與環境，並不意味着立即墮落或死亡，它能夠存在，能夠繼續鬥爭，甚至能夠發展——即使暫時間依靠了非無產階級群眾——只要他們認真努力來堅持和貫徹社會主義思想及其政策。所謂不可分離，那是說，一個社會主義革命黨，不管主動或被動地長時間離開了它所代表的工人階級，那末作風上、行動上、政策上、乃至根本思想上勢必要多少蒙受異階級的影響，這種影響如果經過了或戰勝了上面所說的堅持，那末黨、特別是它的領導層，就要發生嚴重的墮落或變質。

這樣的可以分離與不可以分離，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中，針對着不同的對象，為了不同的目的，列寧曾經一再發揮過的。粗略地說來，在二十世紀初，正當布爾雪維克黨締造之時，列寧強調了二者的「可以分離」；當十月革命以後，特別在新經濟政策實行後，他是強調了「不可以分離」。前一強調的目的，在於建立革命職業家的組織，在於樹立不屈服於工人階級自發性的革命理論，在於超出工人狹隘的經濟利益，高瞻遠矚地奠定俄國無產階級革命、乃至世界革命的宏偉計劃。後一強調的目的，則在於保證黨和國家的不致於官僚墮落，在於保證社會主義革命及其建設的健全發展。

只有像列寧那樣，在最根本的理論認識上把握了那個可以分離而又不可以分離的道理，才能一方面勇往直前地去創建有別於工人組織的革命職業家組織；另一方面知道如何與工人大眾保持生活上與思想上真正密切的聯繫，藉以防止那個職業家組織的硬化與腐化。

現在讓我們來看毛澤東在這方面的情形。

在將社會主義者的組織和工人階級分離這條路上，毛澤東簡直比歷來所有馬克思主義者走得更遠。在整整二十四年的長時期中——從1927年秋到1949年春——他遠離了城市和工人階級。其間除了三四年以外，一直以他為首的那個共產黨，憑藉着武裝的農民力量，始終困鬥圖存並俟機發展於邊遠的鄉村中。他以為這樣做並不危害共產黨之成為共產黨，並不妨礙這個黨之繼續為工人階級服務，並不會斷送無產階級革命的歷史利益。但是為什麼會如此呢？換句話說，即為什麼共產黨跟它所代表的工人階級長期分離而仍能保持其為工人政黨，並仍能起這樣政黨的作用呢？毛澤東從來不曾考慮過這個問題，不僅在當初、事前，即使在今天、事後，他也不曾接觸到這個根本的有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問題。關於社會主義革命黨和工人階級之間的「可以分離」，為什麼「可以分離」，即列寧當年為要創造一個存在於工人階級之外與之上的革命黨時，曾經精詳地探討了的那些問題，毛澤東卻完全不曾探討過。可是在事實上，毛澤東所做的是要使工人黨和它所代表的階級實行史無前例的分離，所以他如果是一個偉大的革命戰略家，他應該比列寧更迫切地要研究那些問題。毛澤東卻不僅行前不曾求知，而且行後也不去思索其所以成功之理。試問，他怎配稱為偉大的戰略家？

還有，毛澤東既不曾理論上探索過「可以分離」的原因，以致他也不可能深切懂得二者「不可分離」的道理。毛澤東所率領的知識分子的黨和農民組成的軍隊，和他在政綱上所代表的工人階級分離了二十四年之後，終於又復合了。那是以解放者及被解放者的資格復合的。糟糠夫妻睽違了不只十八年，回來的丈夫不但「做了官」，而且「封了王」，他對於苦守寒窰的老妻是很難於平等相待的。剩留的可能還有一些憐憫，卻不會是早年似的恩愛了。如何才能使做官封王的浪

子忠實地為貧婦人服務，實在是一個極其困難的任務，極其複雜的問題。可是在毛澤東，這樣的任務和問題不曾存在。他完全不曾看見那個長離基地的工人政黨之可怕的變樣，它那嚴重的官僚化的墮落，那種勢所必然的騎在人民頭上的作風、思想和行為。毛澤東完全沒有在理論上預見到革命黨與工人階級之間的「不可分離」，更沒有體會到「可以分離」與「不可分離」之間的相輔相成關係。因此過去並非有意識地實行了這個「分離」，現在也就不能有所準備地來完成這個「不可分離」。要使那個並不直接依靠工人階級的、憑槍桿子打天下的共產黨充當工人階級的勤務兵，要他們不以主人翁自居，該是多麼艱難的一回事呀。如果黨的覺悟領袖們，深深預感到這個艱難，並痛切地意識到此一艱難任務之能否完成有關於整個黨與整個革命事業的成敗，那末他們在不能不離，以及離而復合之際，又該多麼戒慎慄懼，翼翼惕惕，不僅在內部教育上要拼命反對違反群眾利益，違反工人階級利益的官僚主義，而且更重要的，必須採取具體嚴格的步驟（有如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所擬議者），阻止官僚制度的形成，反對一切已經形成的官僚政制。

毛澤東顯然沒有這樣做。特別在防止和反對官僚制度的實際步驟方面，可以說連一點鄭重的企圖都不曾有過。自從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人階級重逢以來，中共無論在黨、政、軍諸方面，都不曾絲毫放鬆過自上而下的、訓政式的、軍事性的管制，因而完全窒息了工人民主的發生，完全閉塞了上情下達的孔道，讓官僚主義與官僚制度達到了可怕程度。目前中共將中國的經濟民生導入了空前緊張和痛苦的地步，一個最大原因，就是窒息了這點勞動大眾的民主，以致官僚們能一意孤行，胡作妄為，不受絲毫群眾監督。這問題如果縮小到毛澤東個人的責任上來，如果僅僅從毛澤東的思想中去尋找部分原因，那我

們不能不指出：這是由於毛澤東不懂得工人政黨如在某種條件下和它的本階級分離，則必須同時切記二者的不可分離，尤在事後要加倍強調這個不可分離。

毛澤東既然沒有這樣的體會和了解，則不管他初時以武裝鬥爭來實現了這個分離，也不管他後來因武裝鬥爭的勝利而完結了這個分離，卻終歸不能算是偉大的戰略家。

研究了毛澤東在這方面的種種，我們倒可以而且應該規定出一些馬克思主義關於武裝革命鬥爭的戰略來：

- (1) 現代（十月革命後）國家中社會主義政黨或共產主義政黨的產生，其主要客觀背景乃是國際無產階級的存在及其革命鬥爭，其次才是各該國工人階級的存在及其鬥爭狀態。各個民族的工人階級政黨並非完全靠本國工人階級賦與生命的。何況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原本有其不同的來歷，它們不是一物化二，而是二物合一。因此二者的聯繫並非像某些人所想像一樣：必須「有機」與「純粹」，必須形影相隨，而是容許形跡上，甚至思想上有所分離的。
- (2) 隨着世界資本主義國家的法西斯化與軍事化，主要實行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西歐國家中社會主義的工人運動方式，在許多落後國家中早已行不通，在另一些地方也逐漸行不通。組織工人階級，然後以此為中心而團結全國最大多數民眾，社會主義者或共產主義者憑此力量以贏取選舉——這樣的傳統鬥爭道路，在某些地方是僅餘形式，在另一些地方則連形式都不讓存在。工人階級的任何獨立組織，工人政黨的任何活動，都會遭到極其殘酷的摧殘鎮壓。在此情形中，工

人政黨如決定固守基地，不與本階級作片刻分離，不後退半步，不作任何迂回，那末結果不是被統治者連根剷除，便是蟄伏不動，若有實無。

- (3) 在上述情形中，社會主義者暫且把部分力量，或甚至主要力量，從工人區域撤退，以便在較不受人注意之處，或較易藏身的群眾與環境之中活動，非但容許，抑且必要。如果條件有利，特別是當統治階級進行內戰或外戰時，革命者乘機組織武裝是必須的。
- (4) 「以武裝的革命對付武裝的反革命」確實曾經是，而且將來還可能是許多國家中革命戰略的一個重要特點。無產階級政黨為要執行這樣的戰略，勢必要像劉少奇所說，讓「幾十萬黨員長期脫離了他們原來的社會職業，轉入革命的軍事集體生活與生死鬥爭中，使他們在思想上，組織上受到了嚴格的教育與鍛煉……」（見劉少奇《論黨》，第二章。）這情形自然是好的，而且是必要的。但其本身決不像劉少奇所說，是那個政黨獲得無產階級性質的一個條件，恰好相反，這種情形出現在「先鋒隊」和它的階級長期分離之時，倒是使政黨失去其無產階級性質的一個條件。「長期脫離社會職業」，「長期過着軍事集體生活」，長期處於落後的農村環境中，長期習慣於對上級服從對下級指揮的作風，這「幾十萬」戰鬥員自能養成「集體意志」，但難於「提高階級覺悟」，他們的「組織性與紀律性」可能加強，但他們的民主性與首創性卻勢必減少，而上諂下驕、自命不凡的官僚優越感則一定要發生滋長。因此，當一個無產階級的革命黨，倘為形勢所迫，不得不暫離工人區域與工人階級，轉移到農業的落後地區去

進行長期武裝革命之時，黨的領導者為了保證不失去其無產階級的性質，必須時時警惕，加倍警惕，在思想上固然要進行堅決的保衛馬列主義的鬥爭，同時卻必須採取具體步驟，不斷反對官僚主義，設立明確的制度（主要是勞動大眾的民主監察機構），藉以防阻與克制任何背離無產階級歷史利益的思想、作風或行動。再若這個全身武裝的黨遇到了形勢轉變，以勝利者資格回進城市，與長期分離的工人階級重逢，那時，黨為了要確保與鞏固其無產階級性質，更應如何面向工人，如何設法以群眾的民主來醫治軍事官僚性質的宿疾，那是不容說的。在所應採取的方法中，第一是要儘量吸收廣大工人群眾入黨，藉以改變黨員成分上不利於無產階級的比例，（今天中共的黨員成分，根據 1956 年 9 月劉少奇在中共第八次大會上的報告，在「1,073 萬黨員中，工人佔 14%，農民佔 69%，知識分子佔 12%」。）第二必須儘速廢止黨內生活與政治生活中的軍事統制，儘量創設黨內外的民主監察機構，使黨內外的工人大眾真能發揮對於其階級代表的督促、監視、批評與擁護的積極作用。

總之，長久分離與勝利歸來的工人政黨，如想真正成為工人政黨，如想真正為無產階級的歷史利益服務，以便進一步完成社會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任務，那末它的領導者必須以加倍的注意和努力，去做二者「不可分離」方面的工作。

- (5) 一個用槍桿子打定了江山的工人政黨，成功之後，如果它能及時與盡力地將自己鞏固在無產階級大眾的基礎上，那末無疑，它可以向而且應該向社會主義的建設前進。但是向這路

上走去的社會主義革命者應該清醒地懂得：社會主義建設這個任務，比之於在某一民族中建立社會主義政黨這個任務，甚至比之於這個政黨在各該國中以革命奪取政權這個任務，都具有大到無可比擬的國際性質。這個國際性質大到這樣程度，竟使它在單獨一個國家之內是無法徹底完成的。有誰如果沒有這個清醒認識，以為社會主義政黨只要統治了一個國家，不管它所統治的地方大小如何，也不管國家中原已到達的經濟文化水準高低如何，只要有了「英明的領導」，有了「正確的計劃」，驅使本國勞動大眾去苦幹、躍進、便能在這地方造成社會主義的綠洲，那末不但錯誤，抑且罪惡。史大林「一國社會主義」的全部悲慘史，本已足為前車之鑑，無奈毛澤東不能從中引出教訓，以致在中國又表演了「三面紅旗」的諷刺大悲劇，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神聖旗幟大大污損了。

從上述五點原則性的標準來評量武裝革命論方面毛澤東這位戰略家的高度，評量他的長處和短處，我相信會是公允而客觀的。一切社會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的革命家，如想研究毛澤東思想的這一個重要方面，我相信只有秉着這些個標準，才能有所獲得。

現在我們可以來討論本章開頭提出的那個問題了。

我們的問題是這樣提的：「毛澤東如果自覺地、全面地、將武裝鬥爭提高到革命戰略地位，特別是如果他自始就能將此一戰略路線安置在整套不斷革命論的戰略中來提出、考慮和執行，那末，中共以及一般的中國工農，在其走向勝利，取得勝利和擴大的過程中，會呈現出與實際上已經呈現了的情形有怎樣的不同的？」這問題又可用另一方式

來提出：如果毛澤東那個武裝鬥爭的戰術，並非與史大林的「第三時期的哲學」和「人民陣線」相結合，而是與托洛次基的不斷革命論的戰略相配合，中共是否會勝利？如果勝利，其間所走道路，以及它所付代價是否會一樣？

我們不想在這裏太詳細地、逐步跟着歷史發展地，將事實上的史毛結合和假設中的托毛結合兩相對照，從而指出其可能做成的不同。這樣做，一來是勢必佔去大量篇幅，二來是要重複本書其他部分所已談過的評述。因此，這裏我們只預備從如下三個方面來解答上面的問題。第一，蘇維埃或國民會議；第二，聯合政府或共同行動；第三，民族社會主義或國際社會主義。

中國的蘇維埃口號，我們知道，原本是托洛次基最先提出的，那是在 1927 年春天，北伐軍進抵長江，工農運動在湘贛鄂等地蓬勃興起的時候。為使這些廣泛而散漫的群眾運動獲得力量，足以和控制軍隊的國民黨資產階級對抗起見，以托洛次基為首的聯共黨內的反對派便提議組織工農兵代表會議（即蘇維埃），這提議遭到了史大林當權派的堅決反對，理由是：（1）蘇維埃乃無產階級革命的組織，與「資產階級性質」的中國革命不相容；（2）蘇維埃乃暴動機關，與國共聯合的政策不相容。結果如所周知，國民黨軍政領袖利用了革命群眾的鬆散無力，一再叛離革命，最後將革命和革命者撲滅屠殺於血海之中。關於這個時期史托雙方爭論的誰是誰非，歷史證明得直截明快，以致公正的歷史家與革命戰略家只要稍稍了解雙方爭論的事實與理由，就不難斷定：如果 1926-27 年，中國共產黨實行的不是自縛手足向國民黨投靠的史大林路線，而是特立獨行廣泛組織工農本身軍政力量的托洛次基路線，那末，中國乃至全世界近幾十年的歷史都可能要重寫了。如果中國的工農政府建立於 1927 年而非 1949 年，則其間當然不會有

蔣介石血腥的軍事獨裁，多半也不會有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戰爭（因為日本在勝利的中國革命影響之下，很可能有不同的發展），即使仍有中日戰爭，則其過程一定會比較短促，對中日雙方都不會有如此悲慘的後果，蘇聯多半不會經歷如此可怕與深刻的墮落，因而德國在三十年代再度崛興時可能不是納粹主義而是共產主義，如此，則第二次世界大戰亦可能不會發生，整個世界都可能以革命代替戰爭，因此呈現出一個完全不同於現狀的「今日世界」的了。

1927年冬天中國革命失敗後，圍繞於蘇維埃口號的爭論，發生了極有趣的相反變化。過去的反對者變成了擁護者，擁護者變成了反對者。史大林最初因為把革命失敗說成為革命轉入了更高階段，於是突然間提出蘇維埃口號來進行反國民黨的暴動。托洛次基則斷定全國性的革命局勢業已消失，革命已因機會主義的領導而遭受嚴重失敗，此時以蘇維埃口號來進行絕望的暴動，結果只能加深反革命的程度，延緩新革命的到來。托洛次基主張立即提出革命的民主口號，即普選全權無記名的國民會議口號，藉以重新團聚革命力量，反對國民黨的軍事獨裁。

這爭論的結果也是大家熟知的，經過一連串絕望的可悲的盲動以後，史大林被迫宣佈蘇維埃口號僅僅當作宣傳口號，卻仍反對採取任何形式的革命民主口號，以為行動之用。因此，中共在很長時期內（自1928年夏至1935年秋），竟沒有一個中心政治口號，以為一切鬥爭的總方向，總目標。江西紅軍在反圍剿戰爭中終於失敗，它之所以要突圍「長征」，所以會喪失全部城市力量，會損失軍隊的百分之九十，原因固然許多，但當時共產國際與中共領導之排斥國民會議口號，拒絕為總的民主綱領作革命鬥爭，以致其武裝的土地革命運動陷於孤立無援與困苦絕望之境，卻不失為重大原因。

當時的武裝革命到底該不該與國民會議口號結合起來？如果二者真的從1930年前後就聯合成一起，以武力為徹底的民主要求而鬥爭，那情形與事實上（即排斥了國民會議綱領）所發生的該有怎樣不同呢？回答這兩個問題，最好引用毛澤東的話。1928年冬天，毛澤東領導的武裝鬥爭已經進行了一年，作為行動口號的蘇維埃被取消也有半年多了，此時他寫了那個名為《井岡山的鬥爭》的報告，其中有一段話，恰恰是回答了我們剛才提出的第一個問題。這段話，我們在本書前一章的有關章節中全部引用過。為了避免重複起見，這裏只將其中最最重要的幾句重引一下：

我們深深感覺寂寞，我們時時盼望這種寂寞生活的終了。要轉入到沸熱的全國高潮的革命中去，則包括城市小資產階級在內的政治的經濟的民權民主鬥爭的發動，是必經的道路。（加重點的是我們——雙山。）

在同一報告中，我們又看到了如下的話：

中央要我們發佈一個包括小資產階級利益的政綱，我們則提議請中央制訂一個整個民權革命的政綱，包括工人利益、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使各地有所遵循。（以上兩段引文，均見《井岡山的鬥爭》中「革命性質問題」一節。）

這兩段短短引文，非常扼要地說清楚了「一個整個民權革命的政綱」，即一個以普選全權國民會議要求為標誌的整個民主革命政綱，在當時是如何迫切需要，並且非常生動地描寫了因此一口號之被排斥，使革命隊伍如何深深陷入寂寞之中。看過了毛澤東這樣的證言，那末當時究竟該不該將武裝鬥爭與國民會議口號聯合起來，可以不答自明的了。

然則，毛澤東們如果在國民會議口號及其政綱下進行武裝鬥爭，中國革命的實際發展會有怎樣不同呢？在這裏，任意的假設當然不相宜，但從毛澤東當時的願望中，我們卻至少有理由指出這樣一種可能的不同，那就是：「紅軍的寂寞生活」可以較早「終了」，因為「包括城市小資產階級在內的政治經濟的民權主義的發動」，「沸熱的全國性的革命高潮」也會較早來到。如此，則「紅軍」可能無須「長征」；國共也可能不需要表演令人迷惘的悲歡離合，革命勝利大有可能獲致於長期戰爭之前。

如上所述，可見毛澤東的勝利，並不能表示他所長期結托的史大林路線的正確，也不曾判定了他歷來排拒的托洛次基路線的錯誤。事實真相，倒是應該相反的。不錯，托洛次基從來不曾贊許過共產黨人離開城市和工人階級，去做武裝鬥爭。當 1930 年秋天，中共的軍事鬥爭有了相當發展，初次在國際上引起廣泛注意之時，托洛次基及其同志們曾經原則性地表明了對此問題的態度，他說：「中國共產黨員現在就需要一個適合較遠前途的政策，他們的任務並不在於分散其力量於農民暴動之散漫火焰裏去——人數甚少力量甚弱的黨總是不能籠罩這些區域的。共產黨員的任務乃在於集中力量於工廠、作坊、工人區域、向工人解釋鄉村事變的意義，提高疲累者的精神，並在為經濟要求為民主口號並為土地革命而鬥爭中將他們團結起來，唯有走上這條道路，即唯有經過工人的覺醒和團結，共產黨才能夠成為農民暴動的，即整個農民革命的領袖。」（見《中國革命問題》中譯本，277 頁。）這是正統的馬列主義對此問題的立場，這個立場是否已被歷史證明出需作若干修改，我們在上面已經詳論過，此地不贅。我們這裏必須介紹的，乃是托洛次基雖然採取這樣立場，可是並不根本排斥這個鬥爭在適當條件配合下可以發展的前途。在同一文件（《國際共產

主義左派反對派告中國及全世界共產黨員書》)中，他說：「農民暴動之廣大漲潮無疑可以推動工業中心的政治鬥爭活躍起來，我們堅決地預信這個。」他說：「誰也不能預言：農民暴動的火焰是否能夠在長久時間繼續支持着，直至無產階級前鋒隊自己強固起來，領導工人階級鬥爭並使工人的爭取政權的鬥爭與農民對其切近敵人的進攻相配合起來。」更重要的，托氏在當時又很具體地提出如何能使這些武裝鬥爭可以勝利的辦法，他說：「農民運動，縱然掛上蘇維埃招牌，仍舊是散漫的，地方性的，省份性的，要將農民運動提高至全國規模，必須使爭取土地和反對軍閥捐稅壓迫的鬥爭與中國獨立和民族自主的觀念聯繫起來。這種聯繫之民主的反映就是全權的國民會議，在這個口號之下，共產黨前鋒隊可以在自己的周圍團結起工人，被壓迫城市平民以及幾萬萬貧農等廣大群眾，以從事反對國內外壓迫者之暴動。」(同上引書，279頁。)

托洛次基這些話是在1930年9月說的，它們和二年前毛澤東對中共報告中的願望多麼相符呀。只因毛澤東不是有理論修養的戰略家，所以他雖有那種需有民主政綱的迫切感覺，卻自己不會這樣主張，而且不得不跟在史大林後面誣衊國民會議口號為「取消主義」。此後毛澤東不但還要「寂寞」，而且還要痛苦五六個年頭，等史大林在全世界由冒險主義跳回到機會主義之時，才能在史大林頒佈的新政策的掩護之下，來委宛曲折地承認過去在這方面的錯誤：「全國人民及各黨派的愛國分子，必須拋棄過去對於國民大會和制定憲法問題的冷淡。」(見《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毛澤東當然不會說出，正是史大林在過去叫中共「冷淡」國民大會和制憲問題，正是中共叫「全國人民及各黨派」保持這個「冷淡」的。如果自始沒有冷淡，如果自始就像托洛次基所說：在全權國民會議口號之下，共產黨前鋒隊在自己周圍團結

起工人、被壓迫城市平民以及幾萬萬貧農，從事反對國內外壓迫者的暴動，那末中國的革命史會有多麼大的不同呢？這問題毛澤東本人應該最有資格來回答的，可惜礙於派系鬥爭的利益，這位曾因沒有民主政綱而深感寂寞的經歷者，不肯出來為托氏作歷史的證人了。但是，沒有證人，問題是同樣清楚的。

注釋

1. 上引托氏文句，均引自他於 1927 年 5 月所寫的《中國革命與史大林同志的提綱》。

八、理論與實踐

毛澤東寫過兩本系統地論述哲學的小書：《實踐論》與《矛盾論》。前者寫於1937年7月，後者完成於同年8月。【朱正按 據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毛澤東傳》說：「1937年7、8月，毛澤東應紅軍大學（後來改為抗日軍政大學）的請求，向學員講授唯物論和辯證法。總政治部把他講課的記錄稿整理出來，經他同意，列印了若干份。以後，毛澤東把其中的兩節，經過整理，成為收入《毛澤東選集》中的〈實踐論〉和〈矛盾論〉。」（第一冊，50頁。）當時延安曾經出版了這一本《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重慶還出版了未署作者姓名的翻印本。「提綱」共分三章。《實踐論》是原書第二章第十一節，《矛盾論》是原書的第三章。後來經過增刪修改編入《毛澤東選集》。】據兩書的編者所作題解，其目的均在於「為了克服存在於黨內的嚴重的教條主義思想」。換句更明白的話說，即毛氏寫作這兩篇論文的主要用意，在於從根本理論上給予王明派以打擊。看過我們前面的文字，讀者們想必記得1937年前後正是毛澤東補修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時期。讀者們想必也還記得，在抗日戰爭初期，那個在遵義會議上被撤職的王明及其一派並未完全失勢，他們所能予毛澤東一系的威脅還是相當「嚴重」的。毛澤東為要確保並鞏固其業已取得的勝利，必須繼

續鬥爭，而且要全面地鬥爭。那意思是說，毛澤東不僅要在軍事和政治的領導上（這方面他當時業已獲得重大勝利），而且要在理論思想的領導上，打擊並克服王明系統的「教條主義」。在理論鬥爭中，最基本的一個戰場自然是哲學陣地。毛澤東於是開闢了這個陣地。此外，我們知道，毛澤東很久以來被王明們稱為「經驗主義者」。為要摘去這頂不很光明的帽子，毛澤東也必須向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學問鑽研一番，以便一方面提高自己，另一方面予攻擊者以反擊——將另一頂帽子回敬論敵。

這樣一種寫作情況，決定了這兩本小書的性質。首先，它們與其說是毛澤東闡明或發揮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專著，毋寧說是毛氏自修這種學問時的筆記而加以系統化的敘述。其次，它是政治性超出於學術性的。我們說二書實際上是讀書筆記，絕無想貶低其價值的意思。任何一種著作的價值，都不是決定於它的體裁的。列寧的《哲學筆記》，價值絕不低於他的哲學專著《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十一條綱要，當然與恩格斯的正式著作《費爾巴哈論》具有同樣的價值。所以問題不在於形式上的體裁，而在於實質上的思想內容。同樣是筆記，可以是平庸的抄錄，簡單作備忘之用；亦可以是高明的提煉，其中迸發出智慧接觸時的火花；它們可以是低能的誤解，將原作的精華變成糟粕；同時相反，亦可以是天才的領悟，或化原作的腐臭為神奇，變謬誤為真理（例如馬列諸人之於黑格爾），或將原有的寶藏發掘光大，將普遍的真理具體應用（例如列寧在許多問題上對馬、恩的關係）。列寧的許多名作其實都可算作筆記，特別是《國家與革命》，其中一大部分是摘錄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國家學說的文字，它只加了「許多注釋和附論」（見列寧致加明尼夫的信）。可是這種體例卻毫不影響讀者「感覺到思想和意志的強烈的衝動」，毫不損害這本名

著非常巨大的價值。因此，如果有誰看見我們將毛氏的兩篇哲學論文算作他自修哲學時的筆記感想而生氣，那只由於他要神化毛澤東的可憐企圖罷了。

至於說那兩篇文章中，政治性遠超於學術性，其本身亦非絕對的毛病。列寧說得好：「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學上自始至終都是有黨性的」。哲學上的超然態度原不過是一種有意或無意的欺人之談。哲學總是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為某一階級利益與某一政治思想服務的。所以問題不在於談哲學時是否牽涉到政治，卻在於它談得對不對，牽涉得好不好。

毛澤東的「哲學筆記」夠得上我們上舉的哪一種標準呢？它們對馬、恩、列諸人的原著說來，是平庸的抄錄，是低能的誤解，是高明的提煉，還是天才的領悟呢？依今天中共的宣傳家們的說法，毛氏的哲學著作也是對於馬列主義的「天才的、創造的發揮」。這當然是胡說八道。不過我們也願意承認，毛澤東這方面的成就，比之於他所崇拜的史大林，卻確是高出一籌的。史大林為要表明他在哲學上也是「偉大天才」起見，我們知道，他曾經給舊本《聯共黨史》寫了第四章中的第二節：「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他是這樣寫法的，首先，他宣佈：「辯證法是與形而上學根本相反的。」接着，他便一二三四地列舉了二者相反的四點，亦即從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上，抄錄了辯證法的四個基本特徵，然後他就跟着做了七個「由此可見」，有如：「由此可見，為了在政治上不犯錯誤，便要向前看，不要向後看」；「由此可見，為了在政治上不犯錯誤，便要做革命家，而不要做改良主義者」；「由此可見，為了在政治上不犯錯誤，便要執行不調和的無產階級政策，而不要執行調協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利益的改良主義政策……」最後，他便做結論道：「以上便是應用馬克思主義辯

證法去觀察社會生活，去觀察社會歷史的情形。」史大林這個樣子的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揮」，給人的印象是與哲學頂頂沒有關係的。它令人想起法院裏判案的主文，也叫人想起基督教會裏的教義問答與十誡。實際上，這些根本不能叫做哲學討論，而只是共產黨官僚在「哲學」方面所發的絕對命令罷了。普列哈諾夫在恩格斯《費爾巴哈論》俄譯本第二版所作序文中，寫過這樣有意思的話：

斯賓諾莎談到培根時說：培根沒有證明自己的意見，而只是敘述了自己的意見。如果頒佈命令這個詞還不能更好地說明別爾嘉耶夫先生敘述自己思想的方法，那末用斯賓諾莎論培根的話來論別爾嘉耶夫也可以。不過當培根這樣的思想家敘述或是像頒佈命令似的闡述自己的觀點時，在他的命令和描述裏可以看到許多非常有價值的東西。但是在別爾嘉耶夫先生那樣糊塗的頭腦所頒佈的命令中，根本沒有一點教益的東西。

這幾句話，我們可以移贈給史大林，只要將「別爾嘉耶夫的糊塗頭腦」，改成為「史大林的官僚頭腦」就夠了。

史大林這種官僚的哲學抄錄，不但沒有教益，而且還極其錯誤，因而是非常有害的。稍稍學過一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人都明白，馬克思關於社會主義的全部學說，並非從辯證法的基本特徵上「由此可見」出來。杜林先生當年就曾如此誣衊過馬克思，恩格斯為此回答道：「馬克思只是在提出自己的歷史經驗的證明之後」，才說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佔有方式以及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對那種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個人所有制的第一個否定，而將來的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則是否定的否定。恩格斯接着又說：

所以當馬克思把這一過程稱為否定的否定時，他想也沒有想到要以此來證明這一過程的歷史必然性。相反地，在他以歷史觀點證明了這一過程部分已經真正實現，部分往後還一定要實現以後，他才指明，這樣的一個過程而且是按一定的辯證法的規律發生的。全都就是如此。（見《反杜林論》中譯本，138頁。）

可是史大林的「哲學」恰好是反其道而行之。因為辯證法的基本特徵之一是否定的否定，「由此可見」，資本主義的所有制否定了自己勞動的個人所有制，而社會主義的所有制一定又要否定資本主義的所有制。這樣一來，馬克思的客觀的唯物主義的辯證法，給變成了比黑格爾更不如的（因為黑格爾絕不會如此淺薄的）主觀的唯心主義的辯證法。馬克思叫黑格爾的辯證法頂天立地站起來，史大林卻將馬克思的辯證法又來一個倒栽蔥着了地。

毛澤東研究辯證法的態度雖然也一再聲明：「當馬克思、恩格斯把這事物矛盾的法則應用到社會過程的研究的時候……」，「馬克思把這一法則應用到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結構的研究的時候……」因此也多少犯着我們上引恩格斯所指出先後倒置的毛病；不過整個說來，毛澤東確能注意對事物作具體與客觀的研究，並非簡單規定了幾條辯證法原則，就「由此可見」地推論出種種有關於社會歷史與革命行動的戒律，他並不企圖用辯證法法則去代替社會科學與革命科學。因此我們說，毛澤東在這方面確高出史大林一籌。

史大林給聯共黨史寫的那一節「欽定哲學」，不但是最平庸的抄書，而且是極低能的誤解。至於毛澤東的「筆記」，雖然完全稱不上高明的、更不必說是「天才的」、對於辯證唯物論的發揮，但最低限度，它們表明了毛澤東如何以自己的方式體會了馬克思列寧的思想方法，

並且給自己的思想方法找尋了哲學根據，人們可以不同意他的體會，也可以批評他找來的根據，卻不能說他是簡單的抄襲。

毛澤東不是以哲學家的資格，而是以革命政治實行家的資格來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所以他不像恩格斯與列寧那樣，從所有方面接觸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而只選擇了認識論中的一部分：實踐的意義，以及辯證法中的一個規律：矛盾論。正確些說，毛澤東主要是從這兩個特定問題入手，企圖把握縱非全部但屬主要的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思想，毛澤東這樣做，一方面固然暴露出他在各種基本知識與基本理論上的修養不夠，但另一方面——這方面是更重要的——卻也表明出毛澤東比史大林有自知之明，不肯強不知以為知，且能充分利用自己的優缺點，以便在學習或研究上能多少有所獲得。

因此，史大林的哲學專著是毫無價值的，而且應該拋棄的。今天由赫魯曉夫下令重編的蘇聯共產黨史，雖然整個說來不見得比史大林的欽定本高明，但完全刪去了那一節「御制」文字，倒是做得不錯。毛澤東的「實踐」與「矛盾」二論雖然於馬列主義的哲學無所增益，但作為毛澤東思想及其實踐的哲學根據看，卻無可否認地有其價值。就此一意義說，《矛盾論》的價值與重要性大大超過了《實踐論》。《實踐論》只能說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常識之系統敘述，無論哪方面都無新意可言。如果有若干意義的話，那只在於它代表了毛澤東自我教育與自衛鬥爭的一個重要標誌罷了。整個的中共，以及個別的毛澤東，一直在1935年之前，對於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的一切基本問題，都可說尚處於感性認識階段。他們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自稱為中國無產階級的代表；他們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勢力」，反對買辦資產階級，他們拿起槍桿子，他們拼着性命和國民黨進行了長期的生死血戰；可是，他們正如毛澤東在《實踐論》中所指責的那些「庸俗的事

務主義家」一樣，只「尊重經驗」（當時流行的名字是「實際工作」）而看輕理論，因而不能通觀客觀過程的全體，缺乏明確的方針，沒有遠大的前途，「沾沾自喜於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見」。「這種人如果領導革命」，毛澤東說的非常對，「就會引導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結果真是如此，而且是一再碰了壁的。不過碰壁的主因不在於這些實幹家的「事務主義」本身，而在於他們的缺乏通盤、明確與遠大的方針和前途，即缺乏理論的分析力與洞察力，以致讓莫斯科的假理論家們的錯誤方針，得以通過其直系王明等人的執行而使革命碰壁罷了。毛澤東兩面碰了壁：一面碰革命事實的壁，另一面碰那些假洋鬼子假理論的壁。痛苦使他思索學習，使他要從「感性認識躍進到理性認識」。所以這個過程是很自然的。而《實踐論》與《矛盾論》便是這個過程中的兩塊重要路標。

毛澤東首先是實行家，是先行後知者。關於這方面，我們在前面的文字中已經說得很多。王明們稱他做「經驗主義者」，並非沒有根據的。毛澤東最看得起實力，最信賴槍桿子。不管他沒有好好兒讀過馬克思主義，實際工作卻總已經給他爭到了不少「一得之功」。因此，他骨子裏是始終不會看重理論的。但他不會不懂得「經驗主義者」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科學的詞彙中所佔的卑微地位；他不會不在「教條主義者們」的搬弄「理論」時感覺到應付為難；同時，在漫長的鬥爭道路中，由於自己「不能通觀客觀過程的全體，缺乏明確方針，沒有遠大前途」，一個鄭重的革命家絕不會不深感痛苦而立志去學習理論的。因此，毛澤東當三十年代中期補修理論時的動機是複雜的。首先，得為自己一向看重實際工作的特性辯護；其次，確實要弄清楚馬列諸大師在知行關係問題上的態度；第三，要坐實王明們教條主義者的罪名。

為要達到這幾個目的，毛澤東的哲學研究，就很自然地要從「實踐」問題開始，要集中於「知行」問題。

辯證唯物論重視實踐，將它作為人類認識之真理性的標準，它看重感性的經驗，將經驗當作認識的來源與基礎……這些基本觀念其實與中共傳統的，特別與毛澤東強調的所謂「實際工作」完全不是同一回事，甚至不是同一類事。前者是樹立真理的客觀性與思維的「此岸性」的一些重要論點，而後者卻有關乎革命工作中理論與實踐孰先的爭論。後一爭論，當它發生於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政黨中時，在前述的基本哲學立場上，至少已假定為一致同意的。大家都同意真理的實踐標準，大家都承認感性認識（經驗）是理性認識的基礎，卻仍舊可以發生，而且事實上常常發生如下爭論：究竟一個革命家最可貴與最需要的品質是理論的洞察力與概括力呢，還是事實的調查研究？是戰略性的高瞻遠矚呢，還是策略性的隨機應變？是原則性的堅持貫徹呢，還是政策性的趨避適應？不用說，前後兩種品質無法截然分開，不能機械對立。以革命事業或革命黨的整體而論，二者都可貴，二者同樣需要，因為它們相輔相成。但是正像我們在前面的章節裏一再闡明的那樣，一個革命家就其主要的特性來看，大體上確實分成這兩個類型，而這兩類革命家對於革命與革命黨的貢獻，確實有大小高下之分的。毛澤東企圖抹煞這種分別，更不願在二者之間有所軒輊。他強調知行合一，一方面反對空談的理論家，另一方面反對經驗主義的事務家，以此指出一個好的無產階級的革命者必須既看重理論，又注重實踐；他們必須是又文又武，能文能武的全才。其實，這樣他並不曾解決問題。至低限度，這除了表示毛澤東不是像王明們誣衊的「經驗主義者」，表示他不是一味講幹的實行家，而是理論與實踐兩方面同

樣高明之人，此外便不曾說明什麼。因為事實上，人人都是有所長與有所短的，這種偏能一半由於天生，一半由於教育和環境。革命者是人，他們也不可能是全才的。所以否認理論家與實行家之分是否定事實；而將理論與實行一視同仁、無分高下，實質上總就是輕視理論，偏重實幹。

我們不是孫中山「知難行易」的信徒，更不是宗教先知崇拜的擁護者，因為它們的出發點是唯心論，是反動的等級論。但是我們應該承認「經過思考作用，將豐富的感覺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的改造製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論的系統」，這能力比獲取感覺材料要難得多，同時這個能力，並非每個獲得感覺材料的人都能養成的，而培養成功的這種能力，又非高下相等的。然則，我們怎能不看重那些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能作更好飛躍的理論「先知」呢！

毛澤東從來不公然說理論可以看輕。他主張理論與實踐並重。在《實踐論》中，也像在別的地方一樣，他非常稱道了史大林的那兩句話：「理論若不和革命實踐聯繫起來，就會變成無對象的理論，同樣，實踐若不以革命理論為指南，就會變成盲目的實踐。」可是這個「二元論」不曾回答了我們的問題，我們所問的是：和革命實踐聯繫起來了的理論，跟那以革命理論為指南的實踐，到底是何者為先？何者更重要？難分先後，同樣重要，是一種回答，不算錯。在某種具體的歷史情況中，理論重於實踐；在另一種不同的具體條件中，實踐又會重於理論，這又是一種回答，更加站得住。可是這種回答都難完全免於「二元」之病。馬克思曾經說過一句話：「一步實際運動勝過一打綱領」。這句話，一直是種種式式的「實際工作者」或「事務主義者」的護身符。憑此，他們想證明馬克思肯定地認為實踐高出於並重要於

理論。然而這是曲解。列寧曾經很清楚地解釋過這句名言的真意。他說：「在這封信裏^[1]，馬克思嚴厲斥責了人們在說明原則時所抱的折衷態度：如果要聯合的話，「馬克思當時向黨的領袖們寫道，——那末為達到運動的實際目的起見，儘可締結條約，但決不要拿原則來講交易，決不要作理論上的讓步。」原來馬克思說的這句名言是一句反話，其真意在要強調理論原則的重要性。所以在《做什麼？》中，緊接着這段解釋，列寧便提出了他自己的名言：「沒有革命的理論，便不會有革命的運動。」列寧這句話當然也不是憑空說的，他針對着當時國際社會民主運動的實際情形，即「當醉心於最狹隘實際活動的偏向與機會主義的時髦宣傳打成一片的時候」，這種「沒有革命理論便沒有革命運動」的思想是「必須始終極力堅持的」。就俄國的特殊情況言，理論重要性的必須強調，他又指出了三個原因：（1）黨在奠定初期，「還遠沒有同革命思想界中的其他各種會使運動離開正確道路的派別算清賬目」；（2）為了要善於用批評的態度來看待別國社會主義鬥爭的經驗，獨立地檢查他們的決議；（3）為了俄國社會民主黨擔負着世界上任何一個社會黨都還沒有擔負過的民族任務。上引列寧所舉的具體條件，對當時俄國說誠然是特殊的條件，可是對以後在東方陸續成立起來的各個共產黨或社會黨說，卻變做共通的條件了。因此，列寧在彼時彼地提出的關於革命理論先於與重於革命運動的斷語，對於此時此地的東方各工人黨無疑是完全適合的。又因為「其他各種會使運動離開正確道路的派別算清賬目」的工作並不限於「奠定黨的初期」；歷史證明，隨着社會主義勢力的增加，資本主義危機的加深，世界各國階級鬥爭的日益尖銳，形形色色的可使與已使革命運動離開正確道路的思想派別不斷發生，以致所有真正的革命者必須善於用批評態度來看待它們，檢查它們——因此，列寧的那句名言，在今日，其實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了。這意思就是說，對於一個現代社會主義的（或稱

共產主義的) 革命黨說, 以及對於這類政黨中的個別黨員說, 學習與精通馬列主義的理論這個要求, 應該置於積極行動之先與之上。理論是方向。不先確定方向, 愈積極的行動也許會在錯路上走得愈遠。

毛澤東提到了列寧重視理論的名言, 但跟着卻說:「然而馬克思看重理論, 正是, 也僅僅是, 因為它能夠指導行動……。」彷彿列寧會在重視理論的名義下提倡清談的! 接下去他就特別稱讚史大林「說得好」, 引述了史氏的「好話」來對消列寧的「空話」, 以四平八穩的因而近乎廢話的所謂理論實踐並重論, 對消了列寧那個似有所偏的, 但是切實深刻的理論先於運動說。

四平八穩的並重說, 在哲學上多半是折衷主義的表現, 在社會科學中則常常是以輕為重的一種遮眼術。史大林的半斤八兩說其實是他本人慣於行而不長於知的缺點的掩飾, 而毛澤東之所以會欣賞這個「二元論」, 因為它有兩種好處: 一方面可以替他擺脫「經驗主義者」「實行家」這些名字, 另一方面卻給他保持了重實幹而輕理論的實質。【朱正按 還有第三種好處: 讓史大林看看毛對他尊崇的態度。】

「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 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 這是正確的唯物論的認識論, 這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立場之一。這裏, 毛澤東是正確地敘述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正確立場的。可是接下來的那句話:「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 又從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 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卻屬於機械的引申, 而且是錯誤的引申了。人類一般的認識的過程, 誠如毛澤東所描寫, 是「實踐, 認識, 再實踐, 再認識, 循環往復, 以至無窮。」但這並不是說, 每一群特殊的人, 甚至於每一個個別的人, 在任何時候, 也不論做什麼事, 都必須按部就班地走上這個過程, 並走完這個過程。人類實踐和認識的經驗長期累積, 它們不斷地進行着縱的傳遞

與橫的交換，因此，今天許多人（個別與群體）的認識不是從自己感性的摸索開始，而是從學習、接受並消化前人和同輩的理性的產物開始的。試問今天的社會主義革命者，難道一定憑自己經驗，先行搗毀機器，試走各種反抗道路，再做形形色色烏托邦社會主義者做過的調查研究，最後才以「自己的道路」走到馬列主義嗎？當然不，他們可以、而且必須愈早愈好地，一開始就去接受目前人類已經到達的最高的認識——即馬列主義了。因此今天一切社會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的革命實踐，應該從認識開始，應該從竭力取得革命理論的已有成就開始，然後才可以事半功倍地進行革命運動。——革命的實踐。他們不應該浪費時間精力，先去「感性地」進行革命活動，因為這樣的活動，在今天的條件下，不先有「理性的」革命理論作指導，鮮有不大敗虧輸的。

然則毛澤東為什麼要把「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個公式定為革命黨人應該遵循的標準呢？原因很簡單：這裏無意地反映着他自己的認識過程，並有意地為此過程作了辯護。

其實，「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個公式，應該說是屬於人類和個人認識的幼年時期。等到人類（包括個別人的生命與一個人群的歷史）進入到成年時期，這個實踐和認識的往復循環，不應該，也不會再以實踐作起點，而以認識作起點了。如果毛澤東所規定的是一般的與低級的認識公式，那末特殊的與高級的公式應該是「認識，實踐，再認識，再實踐」。後一公式並不否定前一公式；後者卻是前者的補充與發展。沒有後者，前者作為一般的認識公式是可以成立的。但若以之作為特殊的，比如作為革命黨人的成長規律，那就十分錯誤了。這裏暗藏着經驗主義者與實幹家的「哲學基礎」，這裏否定了「沒有革命理論便沒有革命運動」的真理。

可惜的是：毛澤東的《實踐論》，就其根本思想與主要意圖說，恰恰就是這樣的哲學基礎，恰恰就是這樣一種對於理論首要性的否定。

* * *

〈矛盾論〉比之〈實踐論〉，內容豐富得多，其中所表現的毛澤東自己的思想成分也清楚得多，雖然文章的主要性質，仍舊屬於讀書筆記一類。它其實只是毛澤東閱讀了列寧的《哲學筆記》，特別是他閱讀了那篇專文〈關於辯證法問題〉以後的感想和心得。

我們沒有必要研究由毛澤東轉述出來的列寧的思想，我們感到興趣的是毛澤東借這些思想作為因由而充分發揮出來的他本人的思想。在〈實踐論〉裏，毛澤東當然也有不少發揮：但是比起〈矛盾論〉來，這種發揮比較拘束，比較不充分。理由我們說過，毛澤東想借馬列主義哲學中的實踐標準來為自己平素的「實際工作論」辯護，為他一向輕視理論的作風辯護，那是無法不吞吞吐吐，藏頭露尾，或張冠李戴的，因為哲學認識論中的實踐標準與看輕理論的實際工作，毛氏自己也不能不知道是兩回事也。但是踏進了「矛盾論」的領域，毛澤東的感想便大不相同。精明靈活的策略家頭腦，在這裏似乎找到了策略概括化的公式，這裏面的一些思想法則，又似乎給他擅長的權謀理論化與系統化了，這就使得他歡欣鼓舞，魚躍鳥翔，文思奔放起來。

毛澤東個人的心得，特別發揮於「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鬥爭性」這三節中。在這三節裏，毛澤東並非簡單記述了列寧在這些問題上所表示的意見，而是用大量議論和革命史實，企圖說明那些意見，而其實是發抒他自己的見解。這些見解是非常值得我們注意的，所以如此者，並非為了它們對辯證法的科學有甚貢獻——這方面並不足道——而是為了它們

在基本的思想方法上，說明了毛澤東在當時之前及之後的政治立場和策略路線之故。無論什麼人，在某一意義上都是哲學家。因為人人都有思想，而各人的思想都有其多少各別的思想方法。對這個方法能夠自覺到若干，他便是若干成分內的哲學家。所以了解一個人的思想，從這個「哲學」見地入手，總是比較能夠舉一反三的，因而能夠較為全面與深刻的。毛澤東是一個高明之極的策略家，不論在政治方面或軍事方面都是如此。這一層，我們在前面已經再三說明過了。在後天的修養上，我們曾經將毛澤東的此一才能，歸源到他深厚的儒家思想的訓練。孔子是一個出色的辯證法家。中庸之道實際上是任何一種中間階級所能主張的哲學。孔子的階級性為何，迄今仍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家的聚訟之點，但他地位上屬於某種中間階層卻是無可否認的。一個植根於中間社會階層的思想家，由於其本性使然，他多半是「天生的辯證法家」。這一點，馬克思很早就指出過了。他有時能從統治者地位看被統治者，有時又能從被統治者立場去看統治者。他兩面搖擺，不固執一見，常能面面俱到，左右逢源，這在某一意義說確乎帶點辯證法的，只是，正像馬克思所指出的，它屬於機會主義的辯證法，決非革命的辯證法。中國儒家學說裏無疑包含着辯證法成分，老莊學說裏更有着辯證法的發揮，但無論前者或後者，他們都一方面是主觀唯心主義的，另一方面是機會主義的。馬克思將辯證法建立在客觀唯物主義的基礎上，又確立了它革命的立場，固然，應該歸功於馬克思的才智學說；但是更重要的，都應該歸功於一方面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長足進步，另一方面世界歷史上最革命的、最不會妥協動搖的無產階級的產生及其覺醒。

所以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以前，世界人類的思想史上不可能有客觀唯物主義的同時又是革命的辯證法的存在。

早年的毛澤東從儒家思想裏吸收了一些辯證方法。加上他天生的慧黠以及他在中國史書中所學到的那套處世與治人之術，便造成了他那麼一個高明非凡稱得上偉大的策略家與實行家，但也正因為這個緣故，妨礙了他成長為同樣高明的戰略家與理論家。毛澤東身上固有的，以儒家學說打底的那點子「土辯證法」，妨礙了他全面地，即既唯物而又革命地去把握馬、恩、列所代表的「洋辯證法」。毛澤東辯證法的本質是機會主義的。這種思想方法上的機會主義與他政治上的機會主義互為表裏，互為因果。是他的機會主義的實踐影響了他機會主義的思想，也是他機會主義的思想方法規定了他機會主義的實踐。〈矛盾論〉第三節中有一段文字，我個人覺得非常清楚地透露了這方面的毛澤東思想。文如下：

不同質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質的方法才能解決。例如，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用社會主義革命的方法去解決；人民大眾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決；殖民地和帝國主義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戰爭的方法去解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用農業集體化和農業機械化的方法去解決；共產黨內的矛盾，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去解決；社會和自然的矛盾，用發展生產力方法去解決。過程變化，舊過程和舊矛盾消滅，新過程和新矛盾發生，解決矛盾的方法也因之而不同。俄國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所解決的矛盾及其所用以解決矛盾的方法是根本上不相同的。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不同的矛盾，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嚴格地遵守的一個原則。教條主義者不遵守這個原則，他們不了解諸種革命情況的區別，因而也不了解應當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種自以為不可改變的公式到處硬套，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將本來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壞。

在這段冗長的引文裏，讀者們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澤東如何了解着矛盾的特殊性以及矛盾總過程的特殊階段。你們當然還看見了他如何應用這個辯證法去解釋歷史事件，並如何實際地應用於事件。但是讀者們是否已經看出其中表明出來的深刻的機會主義？為什麼我們要說這段文字最清晰地透露了毛澤東的機會主義思想呢？請聽我慢慢分析。

「不同質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質的方法才能解決」，這個斷語似乎是非常辯證，其實不盡然。A 變成非 A，B 跟着也要變成非 B；這個公式，實質上不過是 A 等於 A，B 等於 B 這個公式的變形。它完全合乎常識範圍內的形式邏輯。按事理來說，矛盾的質變了，解決的方法也得跟着變，這是真理的一個方面。可是另有一方面，有時我們看見矛盾的性質已有若干改變，但解決的方法卻不能改變；反之，有些矛盾的性質未曾全變，而解決的方法卻必須改變，這個方面，自然也屬於真理，而且比前一方面的道理更加合乎辯證法的。A 矛盾只能以 A 方法來解決，這命題本身可能正確；但若絕對否定 A 矛盾有時也可以甚至必須以 B 方法來解決，那就陷於機械的形式邏輯的泥坑中了。毛澤東關於矛盾特殊性及其特殊的解決方法的了解，便是犯了機械論的毛病。這個機械論，也正是毛澤東在政治上屢次犯過的機會主義思想方法上的根源。

毛澤東企圖用以證明這條「辯證法規則」正確性所舉的實例簡直絲毫沒有辯證法的氣味。說「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用社會主義革命的方法去解決；人民大眾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決……」以及諸如此類，其實在辯證法教科書中只能當作反例證提出來的。真正符合於辯證法運動的例子應該是這樣：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即使在民主革命中就已經不斷地要求解決；至於

人民大眾和封建制度的矛盾，在目前這個時代，卻必須用社會主義的革命方法才能徹底解決。這個說法表面看來似乎荒謬，事實上卻是辯證的。它合乎現代社會中階級鬥爭的真實關係，而且為半世紀來各國革命的勝利和失敗，從正反面一再證明了。毛澤東提到了俄國二月革命與十月革命的情形，說二者「所解決的矛盾及其所用以解決矛盾的方法是根本不相同的」。這裏表示出毛澤東對俄國那兩次革命的歷史知道得不清楚，或者他受了史大林們的欺蒙，以致懷着錯誤的了解。因為我們知道，儘管俄國二月革命與十月革命所要解決的矛盾多麼不同^[2]，而以列寧為代表的布爾雪維克派所用以解決矛盾的基本方法卻是相同的。那個基本方法是：無產階級憑藉農民大眾的支持，反對資產階級，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列寧這條基本的戰略路線，不但在「民主的」二月革命時期已經確立，而且早在1905年，在他那本非常出名的著作中，就已基本上規定了。列寧當時與新火星派所爭論的兩個策略，實質就是關於用怎麼樣的革命方法去解決「人民大眾和封建制度的矛盾」問題。雙方論據，如果撇開許多次要的不談，恰恰可以歸結如下：門雪維克方面：因為俄國將要發生的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革命，亦即人民大眾反對封建制度的革命，所以一定要用民主革命的方法來進行，「奮鬥的無產階級和奮鬥的資產階級在某種意義上是協同行進，並從不同的方面來共同攻擊專制制度。……我們的利益是要政府找不到同盟者，使它不能把反對派分開，使它不能拉攏資產階級而把無產階級置於孤立地位。」（以上見列寧《兩個策略》，第七節中的引文）列寧方面：正因為俄國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所以「無產階級政黨在現時『一般民主的』運動中必須保持完全的階級獨立性」。「資產階級始終是不徹底的。企圖擬定一些條件或條款，希望資產階級民主派加以履行來證明他們是誠實無欺的人民之友，那就是再幼稚和再無聊不過的。」因此列寧主張在民主革命中，無產階級必須

聯合農民群眾，堅決鬥爭，實行革命到底，建立工農民主專政。同樣是為了要解決民主革命的任務，而門雪維克所用的方法是聯合資產階級，絕不許採取過火行動，讓沙皇政府能以拆散反對派，讓工人階級孤立。這個方法，確實是合乎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亦即合乎「人民大眾和封建制度之間的矛盾」的。可是依照列寧意見，唯其因為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所以要更加提防資產階級，要不斷揭穿它的虛偽，反對它的動搖妥協，不讓它取得對革命運動的控制，而為達此等目的，工人階級應該在農民中間爭取同盟軍，藉以增強力量，以備成立反對資產階級的工農民主專政。列寧這個立場，門雪維克們是有理由攻擊它方法與對象不符的。即有理由說他用社會主義革命方法去解決人民和封建之間的矛盾。因為依照形式邏輯的思想方法，既然俄國的歷史發展不可能跳過資本主義階段，既然俄國當前的主要矛盾是資本主義發展與封建障礙之間的矛盾，因而革命是資產階級的性質，因而資產階級也利於參加革命，那末，理所當然，即使不讓資產階級領導革命，至少也要和他們共同進行革命，共同打倒封建制度的代表——沙皇專制，共同建立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可是列寧在矛盾的客觀認識方面與門雪維克一樣，承認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但在用以解決矛盾的主觀的方法方面，卻採取不同看法，堅持反對資產階級，主張工人與農民聯盟，建立工農民主專政。這是說，列寧主張用反對資產階級的方法去解決本質上屬於資產階級的革命任務；他反對用資產階級的民主政制去代替沙皇專制，卻主張用工農民主專政去代替那個「封建政體」。這在泥守傳統成見的門雪維克看來，當然是荒唐矛盾了。列寧雖然力辯工農民主專政仍然屬於民主革命範疇，並力稱這個專政將要解決的乃是純粹民主革命的任務，但是歷史證明，後來列寧自己也在事實上指出，工農民主專政如果要和資產階級的專政有本質上的不同，只有將它了解成並實現為社會主義性的。因此，我們可以說，當

俄國民主革命的前夕，門雪維克派主張以民主革命方法來解決矛盾，而列寧則主張用社會主義革命方法來達到同一個目的。換句話說，門雪維克的策略符合毛澤東所說的「辯證方法」，而列寧策略卻違反了那個方法。

俄國二月革命以無限的現實性與尖銳性將舊爭論重新提了出來。在初期，不但一向反對列寧的門雪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瘋狂地反對列寧，便是歷來追隨列寧的老布爾雪維克們，也幾乎全體起來反對列寧。他們大家反對列寧，為的他要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號召工農奪取政權的那個主張。他們用種種式式的名字來稱呼列寧的主張，從「瘋狂」，「脫離現實」，「冒險」，一直到「勃浪基主義」，至於門雪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甚至還動用了「俄奸」與「德國間諜」那樣的罪名哩。列寧的政敵們，特別是他的同志們（包括史大林、加明尼夫與齊諾維也夫），所以會如此激烈與惡毒地攻擊列寧，主要的一個原因，恰恰就是為了毛澤東在《矛盾論》裏所提出的那個「必須嚴格遵守的原則」，即解決民主革命的矛盾必須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在他們（列寧的學生們）看來，列寧當民主革命尚未完成的時候，即資產階級的革命性尚未竭盡之前，號召工農奪取政權，乃是張冠李戴，是牛頭不對馬嘴，用毛澤東的話來說，便是列寧不懂得用不同方法去解決不同性質的矛盾。可是事實上又怎樣呢？群眾自發地在二月間（西曆3月間）發動了革命，腐朽透頂的沙皇制度在群眾的頭一個衝擊下便倒下去了，政權非常自然地落在工農兵蘇維埃手中，這就是說，二月革命的客觀過程自動地產生了列寧從來預言的工農政權。只因各個領導工農的政黨，各式各樣的社會主義領袖們——從社會革命黨到布爾雪維克派的多數——太遵守那個「必須嚴格遵守的原則」，他們一定要「用民主革命方法解決人民大眾和封建制度的矛盾」，這才產生了「符合於民主共

和制度」的臨時政府，只因已掌握實際政權的蘇維埃中的「教條主義」的退讓，雙手將政權奉獻給作為「歷史的合法承繼人」的資產階級政府，這才造成了二月革命後的離奇現象：蘇維埃與臨時政府並峙的雙重政權時期。

由此可見，用民主性質的（即資產階級控制的）臨時政府去「解決」二月革命的民主矛盾，絕非符合於歷史發展辯證規律的一個必須與必然的現象，而是違反歷史進程，因而也違反革命利益的一種人為辦法；這個辦法的理論根據是十足形而上學的，機械論的，徹頭徹尾錯誤，因而是罪惡的。這樣罪惡的原則差一點斷送 1917 年的俄國革命，只因列寧、托洛次基等人的堅決反對，不久又爭得了布爾雪維克黨的大多數，勇敢地走上社會主義的工農奪取政權的路線，實行十月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藉此使民主性質的革命生長到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這樣才算徹底而勝利地解決了俄國革命問題，並進一步開始了解決世界革命的問題。

這些事實表示什麼呢？它們首先表示出：儘管俄國二月革命與十月革命所面臨的矛盾有若干不同，可是列寧用來解決這些矛盾的方法卻根本相同：都是以工農聯合（自然在工人階級領導下）來奪取政權，建立專政。這個方法不管在 2 月提出，或在 10 月提出，甚至早在 1905 年提出，其性質都是社會主義的；因為人類史上不曾見過，也不可能看見一個不反對資產階級與資本制度的工農專政。

歷史的最大不幸：那個使俄國二月革命的成果免於斷送，並使十月革命得以勝利的列寧方法，即以社會主義革命解決民主革命的方法，亦即馬克思以迄托洛次基所主張的不斷革命的方法，卻不為列寧的後繼者們所了解、所接受。以民主革命方法解決民主革命矛盾的老

路線，雖然在 1917 年俄國革命的偉大實驗室中從正反兩方面都證明為徹底破產了的；可是以史大林為首的那些老布爾雪維克們卻仍舊頑固地拒絕接受其經驗，並不顧一切地繼續聲明用兩種截然不同的革命來解決兩種截然不同的矛盾為天經地義。他們曲解列寧路線，他們宣佈不斷革命論為異端邪說，而更壞的，他們假借了共產國際的權威，將那個在俄國革命中證明破產的路線，以更加徹底態度，一再應用到各個落後國家的革命中，特別是中國的革命中，以致斷送了好幾次極有成功希望的革命。中國 1925-27 年的革命，失敗原因固然不一，但是最重要的與最根本的一個原因，總要算史大林一布哈林等所堅持的那個「民主革命方法」。他們藉口中國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叫中國無產階級服從資產階級政黨的領導和紀律，叫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要它效忠小資產階級的「三民主義」，不許它獨立宣傳和行動，不准它自組軍隊，不許它組織工農兵代表會議……總之，不許它採取任何一種超越資產階級民主範圍的革命方法去參加和領導民主革命，以致結果，當資產階級依靠群眾革命勢力已向國內外反動派索取到若干讓步，當這個階級在全國政權上佔取較大比重之時，就毫不顧忌地，非常殘酷地，將那被史大林政策綁縛了手足的中國無產階級與共產黨，一舉屠殺並摧毀於血海之中。

非常清楚，1925-27 年中國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如果用「哲學」方式表達出來，在於當時的最高領導者堅持了「解決 A 矛盾必須用 A 方法，絕不能用非 A 方法」這個傳統的、自以為辯證的其實是十足形而上學的公式。

毛澤東沒有從失敗中得到教訓，始終還把這個公式捧為至高無上，稱之為「必須嚴格遵守的原則」。那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直後所造成的新的革命中（毛澤東在這中間起過巨大作用是無可否定的），又怎

能獲得勝利呢？這次勝利的理由，和上次失敗的理由一樣，當然都不是簡單的，而且為數不一。但若擇其革命主觀方面重要者言，則毛澤東與中共中央對上述「原則」的「口是心非」，他們口頭上堅持要用人民民主革命方法去解決民主革命任務，而實際上卻被事實所迫、採用了並非屬於民主革命範圍以內的方法，而在自己的轄區中恢復了土地革命，以全力去和資產階級國民黨作戰，「敢於勝利」，「敢於奪取全國性的政權」，……一句話，即在客觀上走上了「以社會主義革命方法去解決民主革命矛盾」的路線，亦即在客觀上實行了某種意義的不斷革命戰略，自是最大原因。在中共取得勝利之後七年^[3]，當他們企圖在理論上解釋自己勝利的理由之時，不得不拉出他們歷來拼命反對的「不斷革命論」來，也可算作一個證據。中共在事後，出其不意地自認為「不斷革命論者」，自然絕不意味着他們真正懂得了不斷革命論，他們那種令人驚奇的舉動，顯然還別有用心的（這些我們前面已經指出過，在後面合適的地方還會詳細談到的，這裏從略），但若不是不斷革命論這個唯一正確地反映着落後國家革命發展過程的理論，像一種自然力似地作用於中共及中共領袖們的身上，毛澤東們無論如何不肯對這個理論，作任何讓步或屈服，即使在名字上都不肯的。

可惜的是：毛澤東雖然借劉少奇之口承認了不斷革命論在中國革命中起了「客觀上」正確的領導作用，卻不能由此進一步認識：用不斷革命方法解決了中國民主革命的矛盾，實際上便是推翻了他那條「必須嚴格遵守的原則」。他無法在回顧的反省中發現這樣的事實：如果毛澤東與中共領導層認真忠於原則，因而在革命中嚴格遵守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及《論聯合政府》等重要文件中所規定的基本立場，因而他們雖在革命戰爭勝利的條件下，堅決拒絕組織任何有無產階級專政之嫌的政權；一定要不僅在名義上而且在實權上與「民族資產階級」

組成聯合政府；不肯採取任何會妨礙資本主義發展的政策；盡一切力量來幫助資產階級在長時間發展其經濟，……以此表示他們懂得以不同方法來解決不同矛盾的「辯證規律」，那末中國這次革命不管有其他許多有利條件，亦必失敗於垂成之際，或迅速敗亡於成功之後。因為毛澤東看不到這個事實，所以他今天如果再寫〈矛盾論〉，也不會改變「A 矛盾必須以 A 方法解決」那個機械定理的。

上面所說種種，有人也許會覺得與哲學無關，有人可能覺得說得太多，多過於應該談及的比例。其實，〈矛盾論〉裏最集中地表露了毛澤東思想的是這個問題，而毛澤東策略智慧的哲學根據也正在這裏。對於革命任務與革命方法的關係問題，「純粹的」哲學家們也許不感興趣；但在實踐的革命理論家看來，這該是頭等重要的哲學問題。在這方面，本書作者既然與毛澤東屬於同一類型，我們當然有權利在此問題上作較長停留。

上面我們說明了「以同一方法去解決不同矛盾的原則」。我們所舉的主要實例是：列寧用同一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戰略路線，曾經企圖去解決俄國二月革命的矛盾，並實際解決了十月革命的矛盾。我們又指出了：由毛澤東們親自領導的 1947 年至 49 年的中國民主革命，事實上正是違反了毛澤東們的主觀願望，不採用他們原欲採用的民主革命方法，卻採用了本質上屬於社會主義革命的方法才得勝利的。我們希望讀者們已經看到了毛澤東那句名言：「不同質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質的方法才能解決」，是並不正確的。我們更希望讀者們已經懂得：毛澤東之所以不能全面地、一貫地、原則性地了解並接受不斷革命論，即他不能把握現代世界革命、特別是落後國家革命的那個共通法則，至少其部分原因，乃由於他在《矛盾論》裏充分發揮了的那句名言。

A 性質的矛盾，只有用 A 性質的方法才能解決，這句話的本身並不錯，我們已經說過。可是這個斷言正和「A 等於 A，A 不等於 B」這個公式一樣，其正確性是有限度的，是初步的，屬於形式邏輯範疇。在較高級的邏輯上，即在辯證法上，「A 不等於 A，A 可以等於 B」的公式，非但不是荒謬，卻是更加正確，更加符合於客觀的物理和事理的。因此，A 性質的矛盾，有時偏偏不能用 A 性質的方法來解決，偏偏要用 B 性質的方法才能解決，雖然不合於形式邏輯的思維，但完全合乎辯證的思維方法。毛澤東將「A 性質矛盾必須用 A 性質方法來解決」這個思想高舉為辯證法中極重要的因而必須嚴格遵守的原則，可見他實在不曾認識到辯證法。

「然則辯證法難道叫人『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種自以為不可改變的公式到處硬套』嗎？」有人也許會這樣反駁我們。這當然不是我們的意思。其實，一味固執用民主方法解決民主革命任務，用社會主義方法解決社會主義革命任務，因而不懂得時至今日，民主革命任務竟非用社會主義革命方法不能解決——這才是「使用一種自以為不可改變的公式到處硬套」哩。有時候民主革命矛盾要用民主革命方法解決，有時候這同樣矛盾卻必須用社會主義革命方法來解決，這裏是不可以千篇一律的，這才是真正的辯證法。毛澤東正是在目前（世界革命時代）民主革命的最根本的戰略問題上，即不斷革命問題上，犯了「硬套公式」的毛病，這就妨礙他高升到偉大的戰略家的地位，這就使他永遠只能是高明的策略家與實行家的主要原因。

「在具體環境中要提出具體政治任務。一切都是相對的，一切都是流動的，一切都是變化的。」這是列寧留給我們的寶貴教訓。對於這個教訓，毛澤東是違背一半，遵守一半。在一個意義上他是完全不

懂，在另一意義上卻「裏手」精通。他違反而又不懂的，在於革命之最根本、最重大與最原則性的戰略方面。人類歷史已踏進了國際性的無產階級革命時代，而他卻仍拘拘於落後國家民主革命必須用民主革命方法來解決那個古老立場。毛澤東這一個致命的弱點，我們前面已講得很充分了。至於他遵守而精通的，則在於革命之次要的、偏於實行的策略方面。在這些方面，毛澤東真是高明得很，靈活之至。在什麼環境提出什麼任務的那種本領，便是視策略高於原則的史大林也要遜一籌哩。隨機應變，能屈能伸，「針鋒相對」，「有理有節」，諸如此類的策略性的智慧，我們不能不說它是含有辯證思想的。本書前面論戰術家的一章裏，已相當詳細地敘述了毛澤東這方面的本領，此地不必重複。在〈矛盾論〉中，特別在第四節「主要的矛盾與主要的矛盾方面」中，毛澤東親自將他的戰術智慧概括化了。這是很有價值的。它一方面確實增加了辯證法在戰術應用方面的實例，這雖然不在哲學意義上，卻多少在實踐工作的意義上，值得人們研究學習的。另一方面，它用了抽象的哲學言語，非常清楚地道出了毛澤東政治上機會主義的思想根源。毛澤東寫道：「在複雜的事物的發展過程中，有許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種是主要的矛盾，由於它的存在和發展，規定或影響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他又說：「例如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這兩個矛盾力量是主要的矛盾，其他的矛盾，……都是為這個主要的矛盾力量所規定，所影響。」這話說得也完全正確。可是接下去，他寫道：

半殖民地的國家如中國，其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關係呈現着複雜的情況。

當着帝國主義向這種國家舉行侵略戰爭的時候，這種國家的內部各階級，除開一些叛國分子以外，能夠暫時地團結起來舉行

民族戰爭去反對帝國主義。這時，帝國主義和這個國家之間的矛盾成為主要的矛盾，而這種國家內部各階級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眾之間這個主要矛盾在內），便都暫時地降到次要和服從的地位。……

然而在另一種情形之下，則矛盾的地位起了變化。當着帝國主義不是用戰爭壓迫而是用政治、經濟、文化等比較溫和的形式進行壓迫的時候，……這種時候，人民大眾往往採取國內戰爭的形式，……

這樣說便是錯誤百出了。因為這個錯誤說法恰好就是史大林毛澤東三十年來聯合施行於中國革命的那條正式路線的哲學解釋，所以很有價值，值得我們在此作比較詳細的研究。

在任何一個社會中，我們知道，矛盾都是複雜的，尤以現代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的社會關係為然。人們要想知道這種社會，誠如毛澤東所說，必先分清楚種種矛盾，並把握住那個最主要的矛盾。同時在多變的社會關係和民族關係中，這些矛盾的地位——主要的或次要的——可能隨種種關係的改變而改變：主要的變成次要的、或次要的變成主要的。以上所說，如果僅就抽象意義，將它看成代數公式來了解，也許可以說是完全正確，但若代之以實數，賦之以具體內容，那就大成問題了。毛澤東指出中國近三四十年來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的關係，說是因為帝國主義對中國所採取的壓迫形式不同，便使那兩種矛盾時時易位。當民族矛盾成為主要時，階級矛盾就得退居次要，就要「服從它」，換句話說，當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的統治階級被迫與外國侵略者作戰時，國內的被統治階級就應該停止階級鬥爭，與統治階級團結一致，共同禦侮，直至勝利為止。當戰爭勝利，民族危機業

已過去，亦即民族矛盾退居次要地位之時，階級矛盾的地位便自動提高，因而成為主要的。那時，階級鬥爭的利益又高於一切，工農的革命黨又可以放手領導階級鬥爭了。

毛澤東這個說法不是新的。歐洲大戰時一切社會主義的叛徒們都主張「國內和平」，所根據的便是類似毛氏那樣的「矛盾易位」說。第二國際的破產，也正是為了它主張戰爭期內，暫停鬪牆，外禦其侮。列寧最堅決地起來反對「國內和平」論，號召工人階級實行內戰來反對外戰，主張乘統治階級因戰爭而增加的困難而推翻它。因此，列寧被那些叛徒們重則誣為「德國奸細」，輕則斥為昧於「矛盾的主次之分」。關於列寧和第二國際叛徒們之間的歷史分歧，毛澤東自然站在列寧一邊。但是為什麼當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他會跟在史大林之後主張民主陣營方面的「國內和平」呢？為什麼在中國的對日抗戰時中共要停止階級鬥爭呢？答覆都是一樣，即：主要的矛盾對象是德國法西斯與日本帝國主義。為要擒賊擒王，要首先解決主要矛盾，所以必須把民主陣營裏（不管帝國主義國家或殖民地國家）的階級矛盾降為次要，將對內革命的利益服從於對外戰爭的利益。可是同樣理由，難道不可以應用於第一次大戰嗎？事實上，社會愛國主義的英雄們曾經搬出了這套理由的。那時候，協約國方面的「社會主義者」說德國的軍國主義是人類和平的主要威脅，因此軍國主義與反軍國主義是主要矛盾，必須首先解決；同盟國方面則特別指出俄國的沙皇制度的野蠻統治，因而宣佈東方的野蠻和德國所代表的西方文明是主要矛盾，必須首先解決。列寧不屑跟隨任何一邊去尋找「主要矛盾」與「主要的矛盾方面」，他只是着眼於這樣的認識：第一，雙方都是帝國主義性質；第二，革命的矛盾在所有這些國家中成熟了，以革命手段起而推翻統治階級並結束資本主義，這任務已普遍地向各國社會主義者與無產階級

提出。在社會主義革命與資本主義統治這個主要矛盾之前，一切其他的矛盾都不值得考慮其地位了。列寧的基本戰略是這樣決定的，我們能夠埋怨他不辨矛盾地位的主次嗎？列寧這樣的看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難道會因軍國主義之換上納粹主義而過時、而變得不合時宜嗎？顯然，史大林以及毛澤東，在這個基本問題上是違背了列寧遺教的，他們恰恰採取了列寧當年所拼命反對的第二國際立場。

不過在中國問題上，毛澤東當然會更加理直氣壯，因為中國是半殖民地，日本是帝國主義，中國方面的戰爭，不管它是在誰的領導之下，都是正義的，進步的，甚至是革命的。列寧教我們用革命來反對雙方都屬帝國主義的戰爭，卻必須擁護殖民地國家的反帝戰爭。不錯，在這個意義上，中日戰爭確實不應該與帝國主義間的戰爭等量齊觀。中國的革命者應該堅決地站在中國一邊，應該堅決地擁護中國方面的戰爭。但是如何擁護呢？是繼續階級鬥爭呢還是停止階級鬥爭？這是問題的焦點。要想解答這個中心問題，我們就應該回顧一下列寧提出「國內戰爭」戰略時的第二個着眼點：在中國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面前，歷史是否也已提出了革命任務——特別是奪取政權的任務？如果國際和國內條件使然，中國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根本談不到奪取政權，甚至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根本還沒有這個前途，因此，它們只能以一個小幫手資格，參加在資產階級領導的反封建反帝國主義的民主革命中，那末，當這個「革命的資產階級」或甚至「革命而反帝的封建階級」與侵略的帝國主義作戰時，就只好死心塌地參加這個進步戰爭中，竭盡一切力量來打仗，藉以一方面獲致戰爭勝利，另一方面以行動博取愛國民眾的同情，提高其政治上與社會上的地位。一句話，在這樣的戰爭中階級矛盾是必須退居次要，不可能讓它去和民族矛盾爭高下的。可是，情形如果不同，即若該一對外作戰的半殖民地

國家雖然落後，但資本主義關係已起巨大作用，階級鬥爭已有高度發展，全民的民主革命業已發生過，分化過，在分化中大資產階級且竟已掌握了政權，因而該國的歷史發展已十分明確地向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提出了聯合農民奪取政權的任務，那末，當這個國家與帝國主義作戰之時，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仍應將階級矛盾看得比民族矛盾更重要更根本。因為在戰時一如在平時，革命黨的中心任務在於取得政權，藉以完成民主革命，並進而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在戰時，統治階級的罪惡與腐敗總比平時暴露得更清楚，更徹底，所以革命的環境與條件也照例比平時更為有利。所以在這樣情形中，革命黨如果為戰爭之故，為了民族危機之故，而停止了、或放棄了革命的階級鬥爭，實在是對革命犯了最大罪惡。當然，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進步戰爭中，無產階級政黨為革命而採取的政策，應該和它在帝國主義的反動戰爭中所採取者不同。前一種政策應該是革命勝利主義或革命保衛主義的，後一種政策應該是革命失敗主義的，換言之，在前一情形中，革命黨所以要在戰爭中繼續革命路線，理由是：只有實行革命才能喚起最大多數的勞苦大眾來從事戰爭，只有以革命的工農政府代替腐朽妥協的資產階級政府，才能徹底擊敗帝國主義的戰爭侵略，並根本打倒帝國主義。在後一情形中，革命黨所以要在戰爭中繼續革命路線的理由更簡單：因為戰爭是帝國主義性的，因為它只有利於統治階級，因為只有打倒了統治階級的政府，才能結束戰爭禍害，才能以革命從根本剷除戰爭的禍害。這兩種政策的具體應用可能多種多樣，可能千變萬化；但是在本質上，民族矛盾（即使發展到戰爭形式）決不應該排除階級矛盾，革命利益決定着戰爭利益這個最基本的原則，卻是一樣的。換句話說，無論在殖民地國家與半殖民地國家的戰爭中，或者在帝國主義國家的戰爭中，無產階級政黨的戰略總路線都應該是準備革命，發

動革命與完成革命；二者不同的，只是在不同的條件中用以實現此戰略的種種策略罷了。

從上面粗疏敘述的，革命和戰爭（包括資產階級領導的反帝戰爭與帝國主義戰爭）的關係看，毛澤東那種主要矛盾不斷易位說顯然是不正確的。我們應該說，在某一特定的歷史時代內，某一種社會矛盾總是不變地居於主要地位，或更正確些說，它經常地處於最基本的地位，其他的矛盾是服從於它，被它規定，受它影響，以之為變換的軸心。在帝國主義時代，亦即在無產階級的世界革命時代，最基本的與最主要的矛盾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這看法不但對資本主義國家說是對的，便是對一切落後國家說，只要那裏的資本主義關係（政治上與經濟上）已佔統治地位，那裏工人階級在農民支持下起而執掌政權的前途已經提出，——這看法也是對的。因此，毛澤東認為在中國那樣的半殖民地國家中，「其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關係呈現着複雜的情況」，認為中國根本沒有一個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內固定的主要矛盾，而只是許多複雜的矛盾（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僅為其中之一），它們隨着國內外政治的行情性的變化而經常互易其主要或次要地位，——這看法十分錯誤。這是嚴重的機會主義的理論根源。無產階級政黨發生機會主義的根源固然很多，而其中最深刻的一個思想根源，卻是忘記了勞資矛盾乃是我們這時代與我們這世界上的矛盾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是中心矛盾。忘記了這個事實和道理，將勞資間的階級矛盾看成為現代社會中諸般複雜矛盾中的一個，將所有矛盾一視同仁，聲明其中沒有一個是更為主要與根本的，因而說它們各自的地位時時變動，視具體的政治情況而定，有時 A 必須服從 B，有時 B 服從 A，更有時 B 還得讓位於 C，而「服從」等於壓制，「讓位」意即取消，如此一來，那個工人政黨焉得不叛變本階級的利益？

焉能不上機會主義道路？當然，另一方面，一個革命家或革命黨，如果只曉得死死記住那個主要矛盾，完全不理會國內外與社會中一切階級和階層之間的矛盾，完全不理會客觀形勢的變化，食而不化，冥頑不靈，只看見紅白兩種顏色，只分別天使和魔鬼兩類人物，將一切可能的朋友都當成敵人，將所有應該利用的力量拒加利用，以為非如此便不能進行最純淨與最理想的工人階級的革命，這也是可笑而錯誤的，他們是教條主義者，是「左派幼稚病」患者，甚至是革命的吉訶德先生。

二者都是革命的大患，不過機會主義的病根更加深些。

毛澤東機會主義實踐的哲學根源，應該說是對於辯證法觀念之機會主義的或虛無主義的理解。同一辯證法觀念，古今中外，因為持此觀念者之立場與思想各異，有過形形色色的不同理解。西歐從赫拉克利脫斯與柏拉圖算起，中國打周易和老莊哲學開始，有意識的對辯證規律所作研究，都經過了好幾千年。在這個研究中，對辯證法本身規律的闡明並不見有太大分歧（當然有極大的粗細深淺之別），呈現着五花八門的倒是在於那些思想家們理解和應用辯證法的時候的態度。這裏有唯心與唯物之分，有消極與積極之別，更有機會主義與革命立場的不同。辯證法本身在黑格爾手中與馬克思手中並無多大差別，不同的只在於後者將前者倒立着的東西翻轉過來罷了。古往今來有許多唯心主義的哲學家體會到了辯證法，因此在他們的著作裏迸發出燦爛奪目的智慧的光芒，他們給宇宙和人生打開了不少神奇的秘密。但這些聰明而深刻的才智，通過辯證法的力量而對自然和社會所作的觀察結果，卻幾乎都是消極的，懷疑的，因此是詭辯的。他們對自然史傾向於作虛無玄妙的解釋；對人類史傾向於作後退或循環的了解。這主要當然由於各該哲學家所生息的歷史條件之故：人對自然的鬥爭還限

於很小程度內的勝利，而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不像現代那樣的簡單化，對階級與階層間的鬥爭前途，不可能有堅定而樂觀的看法；因此，呈現在自然現象與社會現象上的貌似的循環與反覆，一方面使那些聰明深思之士獲得了多少合乎辯證的思考方法，另一方面卻讓他們得出了虛無玄妙的宇宙觀，以及消極懷疑的、玩世不恭的甚至於厚顏無恥的人生觀。辯證法要到黑格爾身上才發揚光大，更重要的，落到他手裏才賦與積極的看法，可見不是偶然的。雖然黑格爾是個極端的唯心主義者；但他對辯證法的理解卻是積極而革命的。因工業革命而引起的自然科學的大進步，因法國大革命而促發人類思想的大解放，對於黑格爾那樣的偉大頭腦，不能不起積極與革命的作用。所以黑格爾回顧了辯證法的歷史後，就指出人們「主要的成見在這裏是認為：辯證法只有着否定的結果」。他又說：「但是他者在本質上並非是空虛的否定，亦非通常被認為辯證法之結果的虛無，它乃是第一者的他者，直接者的否定；因此，它被規定為被媒介者，一般地在自身內部包含着第一者的規定。……於是第一者在本質上也在他者之中被包含着和被保存着。認為在其否定的東西中保持有積極的東西、在結果中保存着前提的內容，——乃是理性認識的一個最重要的部分……」（轉引自列寧《哲學筆記》。）

黑格爾這一段論到「揚棄」的話，列寧認為「對辯證法的了解甚為重要」。故於摘錄之後，作了如下的引申：「並非空洞的否定，並非徒然的否定，並非懷疑的否定，動搖、疑惑，是辯證法中特徵的和本質的東西，——無疑地，辯證法自身包含着否定的要素，——不，辯證法中特徵的和本質的東西，是作為聯繫契機的、作為發展契機的否定，這個否定是保持着肯定的東西，即是，沒有任何動搖，沒有任何折衷。」（見列寧《哲學筆記之一》中譯本，197-198頁。）

黑格爾那種積極的辯證法，特別是他那個「作為聯繫契機的、作為發展契機的否定」，被馬克思無限豐富地應用在人類社會史的研究中，然後又被列寧無限壯烈地應用於國際社會主義革命的實踐中了。

雖然如此，這卻並不是說，從此再不會有消極的、懷疑的、機會主義的甚至不革命的辯證法。事實證明相反，正好像科學昌明還不曾根除迷信，唯物主義的奏凱尚未徹底排除唯心主義一樣，革命的、徹底的、積極的辯證法的確立也還遠不能阻止不革命的（包括機會主義的）、折衷主義的、消極與虛無的辯證法立場的存在。這裏我們不準備討論所有與革命辯證法相反的辯證觀，因為本書畢竟不是一本專門哲學的著作，我們要談的只關於機會主義的辯證觀，因為它和毛澤東的思想方法，亦即和他對辯證法的理解，有密切關係。

前面我們曾經提到，馬克思辯證法很易和小資產階級的立場拉扯到一起。下面便是馬克思表示這個意思的原文：

蒲魯東按其本性是傾向於辯證法的。但是因為他從來也不理解真正科學的辯證法，所以越不出詭辯主義的界限。實際上這是和他的小資產階級觀點有關的。小資產者也像歷史家勞麥一樣，是由「一方面」和「另一方面」所構成。他在自己的經濟利益上是如此，因此在自己的政治上，在自己的宗教觀點、科學觀點和藝術觀點上也是如此。他在自己的道德上也是如此，他在一切方面都是如此。他是個集中體現的矛盾。而既然他同時還像蒲魯東一樣是個有機智的人，所以他就很快地習慣於玩弄自己本身的矛盾說法，根據情況把這種說法變成一些意外的、鮮豔奪目的、時而是出醜的、時而是輝煌的怪論。科學中的江湖騙術和政治上的

隨機應變是與這種觀點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的。(見馬克思給施維澤爾的信)

不難看出，這段文字裏提及的蒲魯東、勞麥、小資產者，在某一限度內，完全可以代之以毛澤東這個名字。毛澤東與蒲魯東不同，曾經努力去理解真正科學的辯證法的，同時不能否認，他確實學到了不少此一方法。可是在本質上，他仍然「越不出詭辯主義的界限」。他非常出色地懂得「一方面」和「另一方面」，他善於將任何事物分割成十七八個方面，他有機智，所以他很快習慣於玩弄自己本身的矛盾說法，根據情況把這種說法變成時而庸俗出醜的、時而輝煌奪目的議論。憑着這種觀點，毛澤東雖然在科學中（除了社會科學）不曾施展什麼江湖騙術，而政治上則永遠在隨機應變。為什麼會如此的呢？原因，毛澤東當然和蒲魯東一樣，是「和小資產階級觀點有關的」。然則當上了一個共產黨的領袖，長期進行着為工農解放的革命，怎麼還不能在思想上脫盡自己所從出的小資產階級觀點呢？這自然和他走上馬克思主義的過程有關，和他未曾成為馬列主義者以前的思想基礎有關，和他長期間從事活動的小資產階級環境有關，與中國共產黨的迄今仍以農民為主要成分這事實有關。這一些，我們在以前談到毛澤東思想形成時候都講過了，此地不贅述。這裏我還須着重指出的一個原因，即是：蘇聯在史大林統治下的官僚主義墮落，以及史大林官僚制度與官僚思想的普及於全世界共黨，也大大促成了毛澤東那種貌似辯證的、蒲魯東式的詭辯主義。史大林官僚主義的最初的階級來源是小資產階級，而官僚作風的最重要的一個「方面」便是「面面俱到」，「超出於所有階級之上」，以公正的仲裁者自居。毛澤東的「隨機應變」便是這一「方面」的一個最成功的因而是最完善的標本。

至此，我們已經說明了毛澤東對辯證法所抱的機會主義的（在某一意義上也可以說官僚主義的）理解。但跟着我們很自然地會聽到這樣的疑問：如果毛澤東的基本思想方法是機會主義的，那末他憑此方法所決定的機會主義的政治路線又怎會促成了中國革命的勝利？這問題我們在前面提出過，而且在一個意義上回答過，現在讓我們在另外意義上來解答它。首先要指出，促使中國革命在 1949 年前後勝利的的原因，無論主觀上與客觀上都相當複雜，所以我們完全不能說毛澤東的政治路線促成了革命勝利；第二、毛澤東的思想和活動自然對中共起很大的決定作用，因而也對中國革命的進展及其勝利起若干作用；但凡機會主義的（或官僚主義的）政治路線只能起負作用，而起過或能起正作用的政治路線則總是被迫放棄了機會主義的。可是什麼叫做被迫放棄呢？這便是我們需要解釋的第三點了。前面我們不止一次地指出過：毛澤東本質上是一個先行後知者，是實行家而非理論家，是理論為行動辯解而非行動受理論規定的人，是策略高手而非戰略大家：這個品質在壞的方面使他陷於經驗主義的泥淖，使他不能高瞻遠矚，使他不能成為列寧式的第一流的大革命家，可是在好的一面，這同一品質卻能使他在行動時候不始終受錯誤理論的束縛，使他能隨機應變，能令理論遷就行動的需要，或竟能使行動與理論脫離或兩相背反。此種言行不符，雖然大大損害了毛澤東作為一個徹底思想家的聲譽與地位，但在許多情形中，特別在革命迅速發展的場合中，卻曾幫助了作為革命實行家毛澤東的成功，因為它抵消了機會主義對革命可能造成的禍害。

好了，現在讓我們從政治再回到哲學上來。我們看見了毛澤東政治方面的機會主義，在思想方法上，原來導源於他對辯證法理解的機會主義。而後一種機會主義則植根於他與生俱來的小資產階級立場以

及他日後獲得的「超階級的」官僚地位。從「超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官僚立場或地位來看，什麼矛盾都是相等的，其重要性隨時變換。因此他今天可以因客觀需要站在「這方面」反對「那方面」；明天又可以因同樣需要聯絡「那方面」攻擊「這方面」。「兼顧，兩利」，四面八方，可左可右，頭頭是道。此種玲瓏活潑，無所不可的態度，雖時常披着辯證法的外表，其實卻屬於最要不得的詭辯。這裏一個根本原因，在於這些人完全否認了絕對，完全否認了不動。一切都是相對，一切都變動不居，這是辯證觀念。但若由此而進一步斷定說：即使在特定的條件下，也不可能確定一個在某一時期內的絕對標準；又若在絕對的變動中，根本否定了有任何相對的不動，那末就陷於無救的詭辯中了。我們應該承認，在資本帝國主義與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整個時期內，勞資矛盾是主要的、是基本的、是一切矛盾中的矛盾。這是一個有條件的絕對。當此一歷史條件不變之時，此一矛盾的主要地位是不動的，是不可能讓位給其他矛盾——有如民族矛盾之類的。我們不可能將此主要矛盾與其他矛盾一視同仁；我們不應該隨次要的歷史矛盾的改變而宣佈階級矛盾退居於次要地位。對現時代從事於無產階級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說，勞資之間的階級矛盾是一種絕對，是一個不變的軸心。這裏正是「萬變不離其宗」，正是「以不變應萬變」。如果說勞資之間的階級矛盾只是目前形形色色的社會矛盾之一，它並非一定居於主要地位；它的地位是跟着社會諸般關係的暫時變動而變動；因而階級鬥爭（包括工人對資本家，農民對地主）可以隨共產黨的政策（特別是它對資產階級政黨與地主政黨之間的策略）不同而時收時放，有時採用，有時放棄，那末，這個共產黨不但會喪失勞苦大眾對它的信仰，而且事實上它確已失去了階級立場，即失去了一個自命為共產黨的政黨所以存在的理由。

不管毛澤東及其所領導的中國共產黨，迄今為止，給中國革命贏得了多大勝利，但至少一小部分由於上述毛氏哲學上與政治的機會主義，特別是由於那個「主要矛盾隨時易位論」；再加上前面我們批判過的「A 矛盾必須用 A 方法來解決」的那個機械論，所以他們造成了許多原可不犯的大錯誤，走過了漫長的嶇崎的冤枉路，並且當他們取得全國政權之後，又不斷犯着原則上與策略上的錯誤，危害着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與世界革命的開展。（不用說，毛澤東思想方法的此一毛病，並非所有這些錯誤與過失之直接原因，更非唯一的原因；它只是諸般客觀與主觀原因中的一個，而且在主觀原因中也不是主要的一個，因為對中國革命的方針性的決定上，毛澤東在長時間處於莫斯科決定的執行者地位。不過它之所以會反對不斷革命論，擁護史大林的階段論與四階級聯盟，擁護一國建設社會主義，原因之一，即在於思想方法上史毛二人的同一。）

注釋

1. 指給威廉·勃拉克的信——王凡西。
2. 毛澤東說俄國二月革命與十月革命所要解決的矛盾性質不同，嚴格說來，並不完全正確。二者的性質其實是既相同而又不相同的。相同，因為引起二月革命的民主任務並未解決，促成十月革命的正也是這些任務；不相同，則因無產階級在十月革命中走上了政權，當然要解決社會主義的矛盾了。
3. 1956年9月，劉少奇在八大報告，說，「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已經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一種形式……」自八大二次會議（1958年5月）開始，公開使用「不斷革命」這個名稱（當然有他們特殊的解釋）。

九、文藝政策與文藝創作

要談一般共產黨人關於文藝的見解，特別毛澤東關於這個問題的見解，我們先得談談列寧的一篇文章，因為這篇文章，一貫被奉為這一方面的最高標準而加以徵引的。這篇文章便是列寧在 1905 年 11 月間所寫的《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

人們不斷地徵引這篇文章，拿來做他們文藝政策的護符。但是，我們假使詳細地研究列寧的原文，卻不難發現，列寧的本意與徵引者們的用意並不一致，至少有不小距離。

首先我們想指出，歐洲文字裏 Literature 那個字，並不僅僅與恰恰等於中文裏的「文學」。除了「文學」之外，它還有「文獻」或「文件」，「出版物」或「出版業」之意。在普通文字中，人們應用這個字，倒是取其後一意義者為多，取其前一意義者較少。列寧在這篇文章中，談到 Literature 時顯然不是專指狹義的文學，卻同時指廣義的「出版物」或「出版業」而言的。這個詞義在通篇文章中並不統一，有時着重其廣義，有時又偏重其狹義。約略區分，可以說在文章的前一小半作「出版物」解，在後一大半作「文學」解。徵引者們一律將它作狹義解，顯然是不正確的。【朱正按 《列寧全集》第二版裏已經把這一篇的標

題改譯為《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了。】其次，我們看到，所有徵引者都不曾把列寧的這篇文章，與它寫作時候的客觀條件聯繫起來，因而他們的徵引是斷章取義的，他們的了解是片面甚至歪曲的。

其實，只要我們不有意或無意地忽視列寧文章的頭兩段，上述的誤解與曲解都很容易避免。文章一開頭就說得非常清楚：

十月革命^[1]以後在俄國造成的社會民主黨工作的新條件，使黨的文學問題提到日程上來了。非法報刊和合法報刊的區別，這個農奴制專制俄國時代的可悲的遺跡，正在開始消失。它還沒有絕滅，還遠遠沒有絕滅。……

當存在着非法報刊和合法報刊的區別的時候，黨的報刊和非黨報刊的問題解決得非常簡單，非常含糊和很不正常。一切非法的報刊都是黨的報刊，它們由各個組織出版，它們由各個同黨的實際工作者團體有某種聯繫的團體主辦。一切合法的報刊都是非黨的報刊——因為黨性是被禁止的——但是它「傾向」於這個政黨或那個政黨。畸形的聯合、不正常的「同居」、虛偽的掩飾是不可避免的。願意表達黨的觀點的人被迫說出的含糊其詞的話，同那些還沒有成長到黨的觀點的人，實質上還不是黨人的人們的考慮不周和思想畏縮，混淆在一起了。

伊索寓言式的筆調，文學上的卑躬屈膝，奴隸的語言，思想上的農奴制——這個該詛咒的時代呵！……

革命還沒有完成。沙皇制度已經沒有力量戰勝革命，而革命也還沒有力量戰勝沙皇制度。我們生活在這樣的時代，到處都看得到公開的、誠實的、直率的、徹底的黨性和秘密的、隱藏的、

「外交式的」、狡詐的「合法性」之間的這種反常的結合。這種反常的結合在我們的報紙上也看得到！……

無論怎樣，已經完成了一半的革命，迫使我們大家立刻重新安排工作。現在文學都可能成為、甚至可能「合法地」成為百分之九十的黨的文學。文學應當成為黨的文學。與資產階級的習氣相反，與資產階級營利的商業性的出版業相反，與資產階級文學上的名位主義和個人主義，「老爺式的無政府主義」和唯利是圖相反，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應當提出黨的文學的原則，發展這個原則，並且盡可能以完備和完整的形式實現這個原則。

這個黨的文學原則是什麼呢？這不只是說，對於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文學事業不能是個人或集團的賺錢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與無產階級總的事業無關的個人事業。打倒無黨性的文學家！打倒超人的文學家！文學事業應當成為無產階級總的事業的一部分，成為一部統一的、偉大的、由整個工人階級的整個覺悟的先鋒隊所開動的社會民主主義機器的「齒輪和螺絲釘」。文學事業應當成為有組織的、有計劃的、統一的社會民主黨的工作的一個組成部分。

……文學事業必須無論如何一定成為同其他部分緊密聯繫着的社會民主黨工作的一部分。報紙應當成為各個黨組織的機關報。文學家一定要參加黨的組織。出版社和書庫、書店和閱覽室、圖書館和各種書報販賣所，這一切都應當成為黨的機構，都應當彙報工作情況。有組織的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應當注視這一切工作，監督這一切工作，把生氣勃勃的無產階級事業的生氣勃勃的精神，帶到這一切工作中去，無一例外，以此消滅古老的、

半奧勃洛摩夫式的、半商業性的俄國原則——「作家寫，讀者讀」——的一切基礎。

從上面這些引文中，很顯然可以看出，列寧此地所用「文學」這個詞的意義，並非專指狹義的美文學，而時時兼指出版物而言的。否則，像「現在文學都可能成為、甚至可能」合法地「成為百分之九十的黨文學」那樣的句子能有什麼意思？如果依照該文最大多數的徵引者的意思，將列寧此地所說的「文學事業應當成為無產階級的事業的一部分」，解釋為文學家的創作活動應當成為無產階級的事業的一部分，那末，下面像「出版社和書庫、書店和閱覽室、圖書館和各種書報販賣所，這一切都應當成為黨的機構，……」那樣的話，將何從而生？又能有什麼意義？其實單憑我們上面摘引的幾段話，已清楚地可以看出列寧寫這篇文章的重要用意之一，是在於主張把一切與革命有關的刊物置於黨組織的監視和領導之下，要它們完全為黨和革命的利益服務；又在於主張這些報刊上的文章（文學）應充分表明自己革命的立場，不應為了合法地位，說些灰色的、模稜的，伊索寓言式的，卑躬屈膝的，奴隸式的語言，而應該代以公開的，誠實的，直率的，徹底的黨性。列寧提出這樣的主張，並非空空洞洞的（列寧終身不曾空空洞洞地寫過一篇文章），卻是針對着當前的情形，有所指而發的。因此我們如果不先查清楚列寧寫作此文的時代背景，簡直就不能正確了解文章的內容。

我們知道列寧這篇文章發表於 1905 年 11 月 26 日的《新生活報》上。這時候，1905 年的革命正處於日益上漲的高潮中，在一切因革命而爆發出來的新事物中，最顯著的是那個做了幾世紀大啞巴的俄羅斯，突然間說起話了，他通過街頭，通過會場，特別是通過了報紙，發出了最宏亮的聲音。形形色色的報紙，可說像雨後春筍般創辦出

來。其中最出名、影響最大的，則有下列幾種：《消息報》，彼得堡蘇維埃的機關報，創刊於10月30日；《俄羅斯報》，該報原屬激進自由派，此時由托洛次基與巴爾武斯接過來辦，變成社會主義派的刊物；《開始》，門雪維克派與托洛次基合作發行的，創刊於11月13日；《新生活》，布爾雪維克派的合法刊物，由列寧、高爾基、盧那查爾斯基、波格丹諾夫編輯，大約創刊於11月15日。此外，在莫斯科，布爾雪維克辦了一份《戰鬥》報，門雪維克派辦了一份《莫斯科報》，全俄其他的較大城市中，也幾乎同時出現了許多傾向革命的合法報紙或期刊。這些報刊有的是由某些個別的革命家或文人創辦，他們表示了對某一革命黨派的某種程度的傾向；或者直接由某一政黨的某一機構主持，作為該黨該組織的合法的發言地盤。不過無論前一情形或後一情形，黨性都是不夠的，換句話說，這些報刊的言論大多不是「公開、誠實、直率與徹底的」，它們對敵人的攻擊婉婉轉轉，對報紙的立場掩掩飾飾，對自己的主張吞吞吐吐。所以會如此之故，客觀上固然是由於革命尚只獲得部分勝利，主觀上卻又由於在黨革命家與非黨革命者的見解都尚未成熟。這裏的所謂未成熟又是分為兩種的：一種，其本人的思想見解確實不曾跟得上革命的發展，他們那種「卑躬屈膝的、奴隸式的語言」，其實代表了他們「卑躬屈膝的、奴隸式的思想」；另一種，他們本人的思想是已經成熟到革命了（戰略上與策略上是否正確是另一回事），但是寫文章，辦報紙，都不敢把自己真正的想法說出來，故意說些轉彎抹角的，假撇清的，灰色的與「伊索寓言」式的花腔，以此（照他自己的辯解）取得「合法性」，求取存在，「適應環境」。

正是這後一種態度（這態度在任何革命初期都會流行），列寧在那篇文章裏特別加以攻擊的。當然，列寧在這裏也攻擊了那些對黨獨立的，個人自由的辦報態度，所以他特別強調了「報紙應當成為各個黨

組織的機關報，文學家一定要參加黨的組織。出版社和書庫、書店和閱覽室、圖書館和各種書報所，這一切都應當成為黨的機構，……」我們知道，列寧對無產階級革命的貢獻，一半在於政治理論方面，一半在於組織原則方面。列寧關於黨的看法，他主張必須經過組織嚴密、紀律嚴明的黨，在革命的任何方面加以監督和領導，無產階級才能推翻統治階級，實現民主的與社會主義的革命。這個組織觀念，對於布爾雪維克黨的完成革命，無疑是起了十分重大作用的，其重大意義，如果說與列寧的政治見解不相上下，決非過分。列寧這個以黨領導一切革命工作的觀念，在不同時候，不同情形，曾經在不同的活動範圍內為其實現而鬥爭。而在1905年11月間，列寧便是為它在「文學事業」中的實現而鬥爭的。針對着黨內黨外某些人，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要以「作家寫，讀者讀」不受其他任何束縛的態度來辦革命報紙，他就叫出了「打倒非黨的文學家！打倒超人的文學家！」的口號，並且明白聲明：「文學事業應當成為無產階級的事業的一部分（加重號的是列寧自己），成為一部統一的、偉大的、由整個工人階級的整個覺悟的先鋒隊所開動的社會民主主義機器的『齒輪和螺絲釘』。文學事業應當成為有組織的、有計劃的、統一的、社會民主黨的工作的一個組成部分。」

列寧這裏的態度和用意都是非常清楚的，他決不是對狹義的寫小說詩歌的文學家說話，更不是說這些文學家若不加入本黨就要「打倒」，如果列寧真的「蠻橫」到如此程度，他也不成其為列寧了。列寧這裏顯然主要是對黨內或接近黨的「文學家」（包括一切從事文學活動的人）發言的，說他們的活動和事業必須置於黨的領導之下，與整個社會民主主義的革命機器，有組織地與有計劃地配合起來，成為這架

機器的「齒輪和螺絲釘」。否則，他們不可能為革命服務，革命亦必因此蒙受損失，所以必須「打倒」。

因為 1905 年 10 月以後俄國發生新形勢，非常尖銳地提出了「文學事業」與革命及革命黨的關係問題，列寧便及時地在《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中解答了它。列寧是從來不會無的放矢的。

我們還可以有相當理由說，列寧這枝矢乃射向他自己黨內的一些文學家，特別還可能是射向高爾基或盧那查爾斯基的。有一件事實應該在這裏提起：當《新生活報》剛在彼得堡創辦之時，列寧還留在瑞典斯德哥爾摩。那時新成立的蘇維埃正起着愈來愈大的作用，可是布爾雪維克派的領導機關對此組織，卻採取了教派的不合作態度，因為他們認為不問黨派、每一千工人得選一個代表的辦法不對，他們主張以黨派為基礎。列寧反對布爾雪維克派的此一態度，從瑞典京城寄來了長信，要在《新生活報》上登載，可是始終不曾登出來。（按：此信要在三十五年之後，首次發表於 1940 年 11 月 5 日的《真理報》上）。我們不知道此信不被刊登的確切原因。可能因為郵遞延阻（即列寧本人比信早到，一到彼得堡，他就將布爾雪維克的教派態度轉變過來了），但也可能因為信的立場不合當時彼得堡一些布爾雪維克派的意思，更可能因為文章的口氣和調子，與《新生活報》上其他文章的「伊索寓言」與「外交辭令」不相一致，於是信被編輯部同人為了顧全報紙的「合法性」而壓下來了。

不過無論如何，列寧在此事發生後不到旬日的時間內，寫出了〈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這篇文章，二者之間，多半是有若干關聯的。多半是由於此事，列寧在一個實例中看到了「合法」革命刊物不受黨組

織監督與領導的害處，由於此事，列寧更痛感到那種遷就合法存在而大量湧現的「奴隸式」的廢話；由於此事，列寧要「在日程上提出黨的文學問題」，要一勞永逸地解決非法刊物與合法刊物的關係問題，要解決黨領導與一般的黨的出版事業之間，以及黨領導與特殊的黨的文學活動事業之間的關係問題。我們如此設想，看來與史實不會有甚大乖離的吧。

歷來史大林派的文學理論家們，抽出了列寧這篇文章的時代背景，抽去了它的客觀條件，更不肯研究此文的實際用意與所指為何，卻簡單摘取其中的某些段落或字句，從而昭告天下，說馬列主義關於文學創造活動的唯一正確立場，便是它必須服從黨的領導。這樣的昭告，不但貽害無窮，而且也厚誣列寧。

要求在革命時期，一切有關革命的文學（出版）活動必須嚴密地置於黨的監督與領導之下，必須與其他革命活動配合統一起來；同時要求此時的報章文字必須充分徹底地發揮黨性，不可吞吐掩飾，玩弄外交，以致癱瘓群眾的革命意識——這是列寧文章〈黨的組織與黨的文學〉的重要含義，這是一回事；至於要求在任何時期，即不管在什麼時候，（狹義的）文學家的創造活動必須在黨機關的監督與命令之下進行與完成，必須適應於黨的政策與口號——這是列寧文章中未曾說過的，這是另一回事。前一回事是符合列寧精神的，後一回事卻是史大林主義的。

「然則列寧在文章裏根本沒有原則地與一般地談及狹義文學的創造活動與黨和革命的關係嗎？」

有的。前面我們曾經說過，文章的後半段，主要就是談到了這種關係。對於某些人指責列寧「否認絕對個人的思想創作的絕對自

由」，他答覆了兩點：第一，「我們說的是黨的文學及其對於黨的監督之服從」，即是說，這裏問題首先只關於黨和它所屬的文學家（一般的作家）之間的關係。文學家固然「有寫他所願意寫的和說他所願意說的」自由，但革命黨卻同樣有「趕走利用黨的招牌來鼓吹反黨觀點的成員」的自由。一個革命黨為了不願自己在思想上瓦解，不願在實踐上癱瘓，為了要使革命成功，它必須堅守自己的黨綱，堅守自己策略上的決議和黨章，因此它一定得要求自己的成員，在各自的活動範圍內（文學活動乃此種範圍之一），嚴格服從黨的領導。如果有誰不肯那樣做，那就得請他離開。第二，所謂創作的「絕對自由」其實不過是一種偽善。「資產階級的作家、藝術家和演員的自由，不過是他們依賴錢袋，依賴收買和依賴豢養的一種假面具（或一種偽裝）罷了。」社會主義者要揭露這種偽善，要「打破這種假招牌，不是為了要有非階級的文學和藝術（這只有在社會主義的沒有階級的社會中才有可能），而是為了要使真正自由的，同無產階級公開聯繫的文學，去對抗假裝自由的、事實上同資產階級聯繫的文學。」

列寧這裏非常扼要與恰當地闡明了革命的無產階級政黨對於文學家與文學的態度。首先，文學家如果想革命，想以自己特有的勞動催促人類歷史的前進，那他必須參加革命黨的組織，並使自己的文學活動遵照着黨綱、黨章與決議的領導，不能一任己意，胡亂發表與黨相反的觀點。否則，黨有必要將他清洗出去。這在文學家方面說來，也就是喪失了為革命服務的可能。其次，革命的社會主義者認為，文學在有階級存在的社會中，不能不無意反映着或有意代表着某一階級立場。所謂超階級與非階級的文學根本是一種欺騙與偽善。當無產階級革命時期，革命的文學家必須有意識地去反映乃至代表無產階級的利益，由此去贊助革命，並使文學本身成為有價值的、真正自由的文學。這兩個態度，雖然表明於1905年革命的條件中，是聯繫於當時合

法刊物問題而表明出來的；但基本上卻一直可以作為社會主義政黨對文學家與文學的正確態度。不過歷史證明出非常不幸，列寧的此一態度卻被可怕地曲解了、濫用了。以史大林為首的共產黨的領袖們，假列寧這個立場來實行的，卻是黨機關（實則黨官僚）對文學藝術的極其精微的創造活動，做了極其粗暴可笑的干涉與指揮。這些官僚們在進行此種干涉時，老是抬出列寧上述的兩點態度，卻根本不理列寧同時在同文中所指出的兩點注意：

一、無可爭論，文學事業最不能作機械的平均、劃一、少數服從多數。無可爭論，在這個事業中，絕對必須保證有個人創造性和個人愛好的廣闊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內容的廣闊天地。

二、我們還沒有想宣傳什麼清一色的制度或者用幾個決定來解決任務^[2]。不，在這個領域中是最不能來一套公式主義的。

上面我們替列寧的一篇短文做了冗長的詮釋。讀者們由此不難看出，史大林與毛澤東們的文藝政策，與他們自稱為所從出的列寧態度，其間有着多麼大不同。

首先讓我們約略回顧史大林的文藝政策，然後再詳盡地評介由此派生的毛澤東的文藝理論。

史大林自己說過：「我不是文學專家，當然也不是批評家。」（見他寫給別塞勉斯基的信）這句話，在史大林及其所有信從者方面，雖然是含有無上優越感的一種謙辭，但在客觀的讀者看來，這倒是史氏以謙虛來掩飾的一種真實的、雖然是痛苦的自認。史大林當然不是文學家，也不是文藝批評家。不管到了三十年代後期，尤其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史大林的文章被宣佈為俄文修辭的典範，他對文學

(乃至所有藝術)的見解及其一己的愛好被當作一切文藝創作的最高標準；可是事實仍舊是事實。史大林既不是文學專家，當然也不是文藝批評家。這裏我們還可以補充說，史大林甚至不是文學和藝術的喜愛者，他根本對於這些空洞的、無助於權勢之獲得的東西不感興趣。因此，即使他在「語言藝術」方面亦被捧為無上權威之後，他也不曾對文藝政策，不曾對共產黨與文藝創作之關係等等，作過任何有系統的與正式的發言。(有之，只有被編入《馬、恩、列、斯論文藝》一書中的六封信。)「史大林主義的文藝觀」，乃是以史大林的得力助手日丹諾夫為發言人的。

史大林最初注意到文藝問題，只因為他的主要政敵托洛次基在這個問題上發了言。那是在一九二〇年代的初期。內戰停止，新經濟政策開始，蘇聯的文學藝術生活也跟着活躍起來。這時候，在某些年青的文學家中，同時也在一些負責文化教育工作的老革命家中，發生了所謂「無產階級文化」與「無產階級藝術」的思想和活動。他們認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制度，正好如過去的封建統治與資產階級統治一樣，應該有符合於自己階級觀點的文化和藝術。他們否定過去一切階級社會中所創造的文化遺產，要一刀斬斷過去的傳統，要單靠無產階級出身的作家們，憑空創造出無產階級特殊的文化。這當然是一種左傾的革命幼稚病，是文藝方面的虛無主義。列寧竭力反對這個傾向，斥之為有害的^[3]。這些「無產階級的文藝家們」受到了列寧方面的怒斥，就轉而求助於當時與列寧齊名的托洛次基。托洛次基的答覆是這樣的：他無論如何要保護他們自由主張這種觀點的權利，但他同時聲明，關於無產階級文學與無產階級藝術的有害性與空洞性，卻完全同意列寧的看法。後來，在1922年夏季及第二年的夏季，他利用了休假的時間，寫出了那本非常出名的著作，《文學與革命》，他在那裏充分

發揮了共產黨對於文學與文化的全盤看法，並且確定了一種在他認為可取與應取的政策。

托洛次基首先認為「無產階級文學」或「無產階級文化」是不可能存在的。理由是：一、無產階級專政不可能像封建貴族統治與資產階級統治那樣，構成一個漫長的與獨立的歷史時代。它多半只能延長數十年。在此短時期內，不可能形成一個特別文化的。因為所謂文化，據托洛次基的看法，並非指某一作家，在某一作品或某一學問方面的突出成就，而是指某一社會的「知識與技能的總和，這個總和要成為整個社會的特徵，至少要成為其統治階級的特徵的。」第二個理由是：「無產階級專政，就其本質說，總不是產生新社會的文化的一種組織，而是為新社會作鬥爭的一種革命的與軍事的制度。」無產階級專政時期非常活躍的變動性集中於政治，集中於革命與戰爭，而這二者卻是要大量破壞技術與文化的。理由之三是：無產階級專政與過去各種的階級統治不同，它的歷史使命不在於鞏固階級，而在於消滅階級；不在於創造一個階級的文化，而在於創造沒有階級的文化，即創造社會主義的文化。可是社會主義文化的產生，卻只有在社會主義的社會基礎上才是可能的，換句話說，它只當無產階級專政業已消滅的時候，才能出現的。

那末在以無產階級專政為統治形式的過渡時期中，難道沒有文化藝術工作？沒有新文化的建設任務了嗎？托洛次基當然不否認這種任務；不過他認為：「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主要任務，不在於不顧基礎之缺如而造成抽象的新文化，而在於從事明確的文化孕育工作，即是說，他們應該有系統地，有計劃地，當然又要批評地，將既存文化底重要成分輸送給落後群眾。」他認為：「工人階級拼命把國家機關變成一架強有力的壓入機，將文化的液漿灌注到群眾中，藉以解消他們的

文化飢渴。這是一個具有偉大無比的歷史意義的任務。」總之，他認為：「過渡時代還不是一個新文化的時代，而只是進入新文化時代去的入口——給一種新文化鋪平道路。」

在無產階級專政的過渡時期，可以產生而且必須助其產生的，托洛次基認為是革命的文藝。這種文藝不是無產階級的文藝，而是為無產階級的文藝。它「注意到無產階級所讀、所需與所吸收的是什麼，注意到什麼能催促他們行動，什麼能提高無產階級的文化水平且因而給一種新藝術準備基礎。」

關於共產黨與工人政府對於文藝與文學家所應採取的態度，托洛次基的意見是：「向他們提出了擁護革命抑反對革命這個不含糊的標準之後，我們要容許他們在藝術園地內有自決的完全自由。」對於互相競爭着的文學團體，黨不應該急躁地與粗暴地作左右袒，「只要這個派別在企圖接近革命，而且在企圖加強革命的一個環節，即加強城鄉之間，或黨員與非黨員之間，或知識分子與工人之間的連繫」，那末即使這個團體的成員都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黨都不應該加以排斥的。

那末黨是否在文學藝術方面採取折中態度與放任政策呢？托洛次基說：不是的。他主張黨應該在文化方面亦都發揮其領導作用；不過他叫人家注意這一方面的特殊性質，注意到黨領導的特殊方式，他說：「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了我們一個機會，讓我們能以估量新藝術的發展，探索其來源，藉批評的指明道路之法來幫助那些最進步的流派，但我們的能事只能以此為限，藝術一定要走它自己的道路，運用它自己的方法。馬克思主義方法與藝術方法並不是一個東西。黨領導無產階級，但不領導（全部）歷史過程。在有些領域中，黨直接地用命令來領導，在某些領域中，黨只能協助。最後，在又一些領域中，

黨只能表明自己的方向。藝術領域是這樣的一個領域，它不是依靠黨的號令行事的。黨能夠而且必須保護藝術與幫助藝術，但它只能間接領導藝術。對於某些藝術派別，它們誠心在趨向革命的，黨能夠而且必須予它們以額外信任，以此幫助一種革命藝術形式的確立。」

最後，托洛次基談到了革命藝術所應採取的藝術態度，他認為現實主義這個態度是合適的；不過他對現實主義有他自己的了解法，那就是指「人生哲學中的一種現實主義的一元論」，不是文學派別傳統武庫中所貯放的那個「現實主義」。所謂「人生哲學中的現實主義」，意思是指：「對如此這般的人生所發生的感情」，「在藝術上接受現實而非躲避現實」，「對生命的具體動靜具有積極的興趣」。一句話，托洛次基所主張的現實主義，首先是指藝術家必須以如實的人生作活動的對象，而且必須對這個對象抱有積極關心的態度；至於革命藝術家應該以怎樣的手法去體現這個態度，托洛次基卻並不以為必須套取文學史已經有過的現實主義。在這方面，他倒認為：「新的藝術家反而需要以往演變完成了的一切方法，並且還需要一些補充的方法，以便把握新的生活。」他認為重要的在於藝術家必須「首先關心於我們這個三度空間的生活。以之作為足夠的與無價之寶的藝術主題。」至於如何處理這個主題，那末他說：你可以「如實地描繪人生，或者把人生理想化，或為它辯解，或給它以譴責；或加以攝影，或加以一般化與象徵化」^[4]，這些都沒有問題。

以上是托洛次基和「無產階級文藝派」爭論時所提出的全部積極意見。同時，它也是馬克思主義派有關文藝和文化政策的首次詳盡的闡明。此書出版至今，已經有四十多年了。四十年來蘇聯以及其他由共產黨執政國家的歷史，特別是它們文化建設與文藝鬥爭的歷史，曾經提供了極其豐富的材料，讓我們來和《文學與革命》一書中所作的

預斷和主張作一個對照。讓我們看出哪一些已被證明為不確的，哪一些證明出有先見之明的，哪一些是今後必須要讓人引作借鑑的。【朱正按 托洛次基的《文學與革命》，香港信達出版社 1971 年出版王凡西的譯本，譯者署名惠泉。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3 年出版了劉文飛、王景生、季耶三人的新譯本，所據底本比王譯本完全。】

人人看得清楚，托洛次基沒有料中無產階級專政這個過渡時期的長短。但是，以此預料作為理由之一，托氏所否定的無產階級藝術與無產階級文化，卻並未因這一個理由之失效而呈現。無論在蘇聯，無論在其他後起的共產黨執政的國家中，我們都不見有這樣的藝術，這樣的文化。有之，不過是資產階級既有文化的加速的採納，以及歌頌政府乃至歌頌領袖的一些毫無光彩的藝術罷了。

托氏有關共產黨對文化藝術應如何領導的方針，他關於革命藝術應如何方能茁長的種種意見，可說已由蘇聯以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在這方面的歷史供給了最出色的例證，讓人們從正相反對的方面，去認識那些方針和預見的完全正確。

不過，這是後話，我們還得先把當時的情形講完。

當《文學與革命》出版及上述文學爭論進行之時，托洛次基在政治上正受着以史大林為首的其他領袖們的排擠與攻擊。為要在蘇聯群眾的眼中，把一向聲望僅次於列寧的托洛次基打下去，史大林等真是無所不用其極，不擇任何手段的。他與任何反對托洛次基的人締結聯盟，他插手於任何與這個頭號政敵有關的鬥爭。

托洛次基既然在文學藝術方面樹了不少敵，史大林就很自然地成為他論敵們的保護人與朋友了。不過他並不親自出馬，他只假手於

人，多假手於布哈林與盧那查爾斯基，甚至假手於某些少不更事的「無產階級文學家」。經過他們，終於判定了托洛次基的見解乃是「無政府主義者的『左翼』辭句，與門雪維克派的溫情主義的混合物」，「是應用於觀念形態和藝術上的托洛次基主義」（見1925年1月全蘇聯無產階級作家第一屆大會的決議）。他們特別攻擊托洛次基下述這個說法：「馬克思主義方法與藝術方法並不是一個東西」。決議案把這句話的文字改成為：「馬克思主義方法——不是藝術的方法」，並從而加以解釋道：「用了別的話，便是說，在藝術上，階級鬥爭的法則是不通用的。」這個明顯而幼稚的曲解，如果只牽涉到論爭的良心問題，那還是小事；不幸，它更是有關乎往後蘇聯共產黨對文藝工作的整個方針的。根據托洛次基，馬克思主義方法不等於藝術方法，因此，精通馬克思主義及其方法，不一定能很高明地從事藝術創造。一件藝術作品，從馬克思主義觀點看非常正確，但從藝術觀點看完全糟糕，或並不出色，那它便不是好的藝術品；反之，如果從馬克思主義看並不正確，或不甚正確，而從藝術觀點看卻是相當高明的，或甚至很高明的，那就仍不失為好的藝術。但是根據托洛次基的反對者的意見，即認為馬克思主義方法與藝術方法是一個東西，即認為不論在政治活動上或藝術活動上，最主要的方法同樣是「階級鬥爭的法則」；那末，其結論便必然是這樣：判斷一個藝術作品的唯一標準是作者對馬克思主義方法的把握，是他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換句話說，一件藝術作品價值的大小高下，決定於其中所含馬克思主義正確性的多少。結果是不言而喻的，最類似黨報社論的詩歌小說，便是最優秀的文學作品。流風所及，真叫做不堪設想，史大林時代文字賈禍，懷才遭殃，成千上萬的文藝工作者被捕入獄，被送勞改，不少人才枉死檣下，雖然原因甚多，而此一以「政治標準」衡量所有藝術的那個見解，不能不說是原因之一。

當然，從這個標準的確立發展到憑此標準以坑人，其間經過了將近十年。離上述的文學大爭論不久，於1925年6月由俄共中央委員會通過的，《關於黨在文藝方面的政策》這個決議，本質上是排斥了「無產階級作家」們那種專橫、放肆與幼稚的想法，在很大程度內還採納了托洛次基的立場，譬如，它聲明：「雖然無產階級手中現在已經有對於任何文學作品的社會政治內容的正確標準，但是它對於藝術形式的一切問題都還沒有同樣肯定的回答」；它反對「純粹在暖房裏培植『無產階級文學』的嘗試」；它主張「利用舊技巧的一切成就」；主張文藝「這個領域中的各種集團和派別自由競賽」，反對「用任何旁的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認為這樣的解決「都不免是衙門官僚式的假解決」；又譬如它強調：「共產主義批評應當在文學上避免使用命令的語氣」，認為「這種批評只有以自己思想的優越性為依靠的時候，才能具有深刻的教育意義。」它號召「馬克思主義批評應當從自己中間堅決驅除狂妄的、半文盲的和神氣十足的共產黨員架子。」「黨應當用一切辦法根除對文學事業的專橫和不勝任的行政干涉底嘗試。」所有這一切都規定得很好，很正確。雖然在這個決議後面，正如我們前面所說，已經「舞着史大林的指揮棒」了，但若和十年以後的蘇共文藝政策相比，那這簡直是十足「自由主義」的或十足「托洛次基主義」的了。事實上，這個決議也確乎反映着那時還存在於蘇聯的十月革命的平民民主精神，還反映着大時代群眾覺醒的創意力，還保持着列寧以下整輩老革命家的那種非官僚的風氣，並且還遵守着列寧關於文藝的那種正確態度，即一方面強調黨性，另一方面又強調文學事業之「最不能機械地平均，劃一，少數服從多數。」

由列寧時代轉變到史大林時代並非完成於一朝一夕的。而二十年代，即令在1925年，列寧精神也還遠不曾為史大林精神所代替。

不錯，那時政治的氣候在變，反對十月革命精神及其制度的勢力在抬頭，但這個更替並非在所有範圍內以同一步驟完成着的。蘇聯的「特米多（熱月）派」首先在黨、政、軍方面着着奪取陣地，而文藝學術方面的風氣轉變，雖然也依照了同一方向，但總是落後些，跟在後面。

在共產黨對文藝活動採取比較開明與放任的條件下，二十年代的蘇聯文藝，在各方面都有了輝煌成績。

無怪許多蘇聯的文學批評家，在史大林死後，要在回顧中稱二十年代為「蘇聯文學史上失去了的樂園」了。事實也確乎如此，你們看，馬雅可夫斯基的力作都是在這些年中產生的，詩人別德納衣也只在這些年月裏，寫下了他最出色與最完美的詩篇；小說方面，這時期出現了法捷也夫的《毀滅》，富曼諾夫的《恰巴也夫》，綏拉菲摩維奇的《鐵流》，格拉特可夫的《土敏土》以及蕭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等等極其優秀的作品，這些作品，大多是為同一作家的後期作品所無法比擬的；至於戲劇方面，特別是電影藝術方面，由愛森斯坦，普道符金等導演攝製出來的幾部電影，例如《波捷姆金戰艦》與《震動世界的十日》等片，簡直將電影一下子提高了好幾級，從技術性的活動影片高升到有十足資格的電影藝術，以此震驚了國際影壇。此外，無論音樂繪畫建築等方面，即令成就上大小不同，卻總也是生氣蓬勃，意氣昂揚，在繼往開來的創造上，作出了多采多姿的，清新別致的貢獻。

二十年代蘇聯文學與藝術的成就，確實無愧於由十月革命開放出來的時代精神的。雖然就積極成果說，就各個作品的品質說，它們中間還不曾都達到俄國古典文學的高度水準；但就風格、氣魄與抱負論，卻早已邁越前輩，甚至是不可同日而語的了。這個文藝新軍，如果假以時日，不用說，一定會產生空前絢爛的，不僅屬於俄羅斯，而且屬於全世界的花朵來的。

可是不幸得很，蘇聯政治上對於十月革命的反動，在 1930 年左右徹底完成了。以史大林為首的官僚獨裁，代替了工人階級先鋒隊的專政。在蘇聯人生活的任何部門中，官僚們的專橫「領導」撲滅了群眾自發性的創造。結果，初顯豐收美景的蘇聯文藝，就在官僚統治的慘酷摧殘下斷送了。

馬雅可夫斯基在 1930 年將一粒子彈結束了自己生命，那是一個富有意義的象徵。它象徵着被十月革命喚醒，茁長，發揚於二十年代的蘇聯新文藝，此時給官僚統治的手槍射中了心房。

為的要把所有的天才變成奴才，史大林也應用了他對付革命同志的同樣方法，應用了十分恐怖與血腥的手段。首先被史大林拿來開刀的，是當初曾經被他利用來反對托洛次基，那些文學藝術中的極左派，那些主張過各式各樣無產階級文藝的人們，幾乎毫無例外的，都被加上了「暗害分子」，「人民公敵」與「托洛次基分子」的罪名而肅清了。其中大多數人之被清除，是所謂「破壞了社會主義法制的準則」的，即簡單地加以拘捕，投入牢獄，或乾脆殺死。對那些成就較大，名氣較響的作家或藝術家們，大抵經過了開會批評，自我檢討這個階段，藉收警戒與宣傳之效。這時候，一個無情的抉擇提出於那些才子藝人之前，或者跟着官方的指揮棒跳舞——這對於其中的多數人意味着拋棄自己所信，意味着虛偽的奉迎——以此達到精神的毀滅；或者堅持自己的想法與做法，以此走向了肉體上的毀滅。所以三十年代初的蘇聯，真乃是才智之士遭大難的年頭。這些年頭裏一方面充分表現了荒謬的無知，暴露了官僚們可笑與可悲的顛頑，可恨與可惡的粗暴；另一方面，卻造成了最慘痛的精神分裂，迫出了「人類靈魂工程師們」最辛酸的血淚。人類「靈魂」中的軟弱與堅強，卑鄙與高貴，這時候也假借了不同氣質的作家，盡情表現了出來。有些人逞其小慧，

揣摩當道心意，極盡了文學弄臣的能事；另一些人珍惜一己才能，重視本人創造活動的成果，不肯人云亦云，不願違心說話，他們便受盡了屈辱摧殘。有關此一時期「斯文遭殃」的詳細情形，我們不必在此地敘述。因為自從赫魯曉夫們掌權以來，這類記述已經發表過不少了。

1932年4月23日，蘇聯共產黨中央通過了《關於改組文藝團體》的決議，並責成中央組織局擬訂實行這個決議的辦法。這是實行了已有數年之久的文藝界整肅運動的正式宣告。至於將整肅的經驗加以歸納，並且為未來整肅定下標準的，那是1934年八九月間第一次蘇聯作家代表大會通過的《協會章程》，以及在大會上發表的日丹諾夫的講演。這個章程和這篇講演，從此成為蘇聯文藝工作的最高指導，而且也擴大其影響到外國共產黨去，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內。

1925年聯共中央關於文學決議中的主要精神，在這兩個文件中完全消失了。《章程》首次提出了文學必須為黨和蘇維埃政權的當前政策服務，同時，它首次宣佈了一個蘇聯文學的新的創作原則已經找到，那便是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這，如果借用日後中國胡風的話來說，可說是兩把刀子，懸掛在蘇聯作家的頭上，它們斬去了任何創作的萌芽，甚至斬去了不少作家們本人的頭顱。

文學必須要為黨和政府的當前政策服務，原則上是否對呢？所謂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到底它的含義為何？為什麼會扼殺作家與藝術家們的創造生機？這些是必須討論的，不過讓我們留待後面，聯繫着毛澤東的文藝理論，聯繫着中共推行文藝政策的史實，來詳細討論吧。

毛澤東的文藝思想完全是從史大林那裏承繼來的，其中真正可以稱之為毛澤東思想者，簡直少之又少。實質上它不過是史大林的文藝政策，由毛澤東作一番中國化的講述與辯解罷了。

史大林文藝政策自稱以列寧 1905 年那篇文章為主要根據，反對托洛次基的文藝理論。毛澤東的文藝思想亦然。毛澤東一方面抬出列寧，強調無產階級的文學藝術是無產階級整個革命事業的一部分，是整個革命機器中的「齒輪和螺絲釘」；另一方面，他也攻擊托洛次基，說托氏曾經主張「政治——無產階級的；文學——資產階級的。」

其實，讀者諸君，你們讀過了我們在本章前面的敘述，就不難看出，毛澤東既不曾正確地了解列寧，又不曾親自研究過托洛次基。他只是受了（當然出於自願地）史大林與日丹諾夫的欺騙，把史大林對列寧的曲解當作列寧意見，又把史大林對托洛次基的誣衊當作托洛次基主張。

毛澤東在這裏是完全欠缺了他一貫向人推薦的所謂調查研究精神。

不過我們現在也不想為毛澤東而重複我們前面已經說過的話。無論列寧在這個問題上的確切意見，也無論托洛次基為此發表過的主張，前面已經介紹和分析得足夠詳盡，此地不必再來浪費筆墨。在此地，我只想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作為進一步研究的起點：

究竟史大林和毛澤東的文藝政策是否應該由列寧來負責？

因為人們看了我們上面的論述，很自然地會說：「你自己承認，列寧文章中所指的『文學』，除了廣義的『文學事業』之外，確實也指狹義的『文學藝術』而言。那末將文藝活動比作黨機器的『齒輪與螺絲釘』，要將文學創造嚴密地置於黨的監督之下，始作俑者到底還是列寧。因此，史毛二氏的文藝政策不論正確與否，畢竟要由列寧負責的。」

好吧，讓我們來討論這個問題。

首先，我們以為列寧不應該替他們的文藝政策負責。

你們看，列寧在文章裏做了「螺絲釘」的比擬之後，接下來他便立刻聲明：「法國俗語說：『一切比喻都有缺陷』。我把文學比作螺絲釘，把生氣勃勃的運動比作機器也是有缺陷的。」為要指明比擬的缺陷所在，他就特別指出：「無可爭論，文學事業最不能作機械的平均、劃一、少數服從多數。無可爭論，在這個事業中，絕對必須保證有個人創造性和個人愛好的廣闊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內容的廣闊天地。這一切都是無可爭論的，可是這一切只證明，無產階級的黨的事業的文學部分，不能同無產階級的黨的事業的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來。」接下去，他說過了「文學事業必須無論如何一定成為同其他部分緊密聯繫着的社會民主黨工作的一部分」之後，又着重地聲明：「我們還沒有想宣傳什麼清一色的制度或者用幾個決定來解決任務。不，在這個領域中是最不能來一套公式主義的。」

列寧的意思這裏說得非常清楚，他並非簡單地作出決定，要使普天下的文學藝術活動，統統聽命於黨的命令和指揮。他是在極其明確的條件下，在很清楚的意義中，將文學事業，或甚至文學藝術，比之以「齒輪和螺絲釘」的。換言之，他不是無條件地要文學活動服從於黨的監督，而是有條件地，或竟可以說是「雙方互惠」地使它服從於黨的領導。黨一方面，必須尊重該一部分工作的特殊性，充分保證它的個人創造性等等的「廣闊天地」；而文學家的一方面，則應自願地，根基於清楚認識的需要地，在其創作的範圍內充分保持獨立地，將文藝為革命服務。所以列寧的黨的文學觀包含着兩個不可分割的要素：（1）文學事業要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齒輪和螺絲釘」，它必須受黨的監視；（2）黨對文學事業實行監視的同時，必須保證這個特別部分工作的充分獨立和自由。

我們說這兩個要素是不可分割的。因為，如果沒有前一要素，那末文學本身固然又要墮落成為「資產階級文學上的名位主義和個人主義」，又要墮落到「老爺式的無政府主義和唯利自圖」，而革命也將失去一件最有影響與最有力量的武器。但若沒有後一要素，那末，文學藝術必然會被機械地平均化了，被劃一化了，被置於少數服從多數的表決機器中，因此，被根本摧毀了。

這兩個要素就是這樣地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二者合一，它就成為既有利於文學又有利於革命的正確立場；倘有偏頗，那就是首先要扼殺文藝，然後又要貽害革命的惡毒路線。自從1905年列寧提出這個黨的文學方針之後，直到他的去世，中間再不曾有機會回到這個問題上來。但我們從他關於托爾斯泰的幾篇文章，以及他最後反對「無產階級文化」的態度看，很顯然，他是始終堅持這個立場中那兩個既矛盾又統一的要素的。

列寧是一個淵博精深的學者，他充分了解文學藝術活動的獨特性質。他自己雖不是文學家（就其狹隘的意義而言），但他是極其高明的文學欣賞者。又因他在哲學上的深邃造詣，他通達了一般的、以及特殊的馬克思主義的美學。〈黨的組織與黨的文學〉一文，自非列寧刻意經營，專為發揮馬克思主義美學的文字，文章的主旨正如我們前面所說，完全是政治的。但是，從他不着意的論述中，即從他為了補救「螺絲釘比擬的缺陷」而作的說明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多麼精確地指出了文藝活動生命所繫的那幾個必要條件。他這裏指出了兩個要點：（1）「個人創造性和個人愛好的廣闊天地」；（2）「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內容的廣闊天地」。這兩種「廣闊天地」，亦即一切文藝創作活動的必要條件，列寧這裏指點出來是極端重要的。因為列寧文章的主旨，是要將個人主義的文藝活動，變成為集體主義的。形象地說，就是要使它變

成一架龐大機器的小「齒輪與螺絲釘」，但是，正因為列寧不是不懂文藝的革命政治家，所以他先從革命利益，或從革命角度提出了這個集體主義的要求之後，卻立即又從文藝本身的利益，或可說從文藝特性的角度，提出了「個人主義」的要求。這裏，既表示了列寧這個天才革命家與思想家的深廣莫及，而且表示了列寧這個天才的辯證法家對於事物觀察之聰明無比。他在文學政策上，也首先把握了矛盾統一這個規律。無產階級革命的集體性與紀律性，要求文藝活動也一定要參加這個集體，服從這個紀律，否則，文藝便不能隨革命而俱進，不能幫助革命，而且還要妨礙革命，甚至反對革命，所以使文藝具有充分的黨性，公然為革命，幫革命，使自己的活動像一枝螺絲釘那樣緊扣在革命機器上，那是絕對必要的。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變成了「螺絲釘」以後的文藝，一定要仍不失其為文藝，而且要成為更好與更高的文藝。如何才能做到呢？使文藝家集體來創作嗎？叫他們完全受命於革命黨的指揮嗎？這，顯然不是辦法。因為我們必須承認，文藝創造絕對離不開個人的才能，離不開由某些個人秉賦的天才，所以就創造活動的具體過程說，這總是個人的，亦可說是個人主義的。當然，如今文學上有過不少所謂「集體創作」，在藝術中，特別像建築與電影之類，都屬於集體創造的範疇；但無論集體創作的文學也罷，或藝術也罷，如果想有一個渾一的風格，那其中總得有一個主導的「靈魂」，而「靈魂」卻必須屬於某一個人的，因之仍然是「個人主義的」。

文藝活動的特性使然，需要特別保證個人的創造性，需要特別尊重個人的愛好。沒有前者，根本產生不出任何形式的集體創造；沒有後者，便無從激發任何種類的創造熱情。因此，列寧認為當我們提倡黨的文學同時，必須要給文藝家的個人創造性和個人愛好以「廣闊天地」。換句話說，就是在這方面要讓文藝家享有廣闊的迴旋餘地，廣大的活動自由。

指明了這一點還不夠，列寧更加具體而明確地說道：文藝家的「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內容」，都應該被賦有「廣闊天地」，不應該受革命黨的束縛和規定。列寧說這句話的時候，彷彿預先見到了後來的思想統制，彷彿他已經看見有些大權在握的革命領袖們，發出「不許幻想」，「不許嘆氣……」那一類的可笑命令。他彷彿已經知道有人規定某一主義作為「社會主義文藝」的唯一可能的形式；所以他特別提出了這一方面的「廣闊天地」。非但思想，而且連幻想；非但內容，而且連形式，他都不許革命黨給他以狹小的範圍，而主張保證它們自由翱翔、從容飛躍的「廣闊天地」。

這樣，我們看見了列寧那個「螺絲釘」說的全貌，認識了列寧關於「黨的文學」的正確立場，同時，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史大林與毛澤東的文藝思想和文藝政策，根本與列寧的相反，所以絕對不能由列寧負責。

史大林與毛澤東的文藝思想，如果簡單地說，只是襲取了列寧「螺絲釘」的譬喻，卻非但不曾糾正其缺陷，反而荒唐地誇大了這個缺陷。

在1934年9月通過的蘇聯作家協會章程中，關於文藝與文學批評的方針，主要確定了那個標準：（1）「與黨和蘇維埃政權的當前政策問題的密切和直接的聯繫」；（2）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為蘇聯文學創作的的主要原則。

在有名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毛澤東以如下方式複述了這個標準：「黨的文藝工作……是服從黨在一定革命時期內所規定的革命任務的。」^[5]

說文藝要為黨和政府的政策服務，或文藝要為黨在一定革命時期內所規定的革命任務服務，自然都可以解釋為列寧「螺絲釘」說的應

用和引申，但因其片面着重之故，一個原本正確的立場，便被歪曲成非常錯誤，甚至有毒害性的態度了。

這個態度的第一個不良結果是：將整個文藝活動縮小成文工團的宣傳工作。我們不是為藝術而藝術的主張者，好的文藝作品必然是與人生深相結托的，也必然是自己時代的鏡子。在革命時代，離開革命的（不必說反對革命的）文藝作家，不可能是優秀的，更不可能是偉大的。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一個深刻而成功的革命，多半有其文藝革命作為先行，並且在革命中會產生或形成出一種符合於革命精神的新文藝來。此外，在現代革命中^[6]，革命黨方面又都有意識地利用文藝的諸般形式，從事宣傳，當作與武力相配合的「文化大軍」。因此，文藝與革命的相互關係，特別是革命文藝與革命之間的關係，總是非常密切，而且是必須密切的。但雖如此，我們卻不能說，革命文藝，甚至一般的文藝，只能夠，並且只應該起革命某一組織的文工團的工作。換言之，它只能與只應完成着由革命機關交給它的定單，只能與只應跟隨在革命組織後面，密切配合它們的變動不居的政策，為每一個任務，每一個運動與每一個口號做出文藝形式的宣傳。

我們不否認革命文藝應該起這個作用。我們相信文藝也能夠在這方面對革命作出貢獻。在劇場、電影、無線電、電視業已普遍化的現代，在印刷業發達、書報閱讀已成為人民大眾日常生活一部分的現代，一個文藝家要想參加革命，完全不必「投筆」，完全可以用筆來戰鬥的。這情形，決不是現代文藝家的不幸，而是他們的大幸。革命對他們提供了廣大的戰場，讓他們可以用自己擅長的武器來直接參加戰鬥，參加革命。在這樣的戰場上發明出來的武器與所完成的戰績，非但不會降低其價值，反而有大收穫的可能，因為這些文藝家不是從外面，而是從內部認識了革命的；他們不是間接地而是直接體會了戰鬥

生活的。俄國革命時，別德納衣在報章上所寫的時事詩，曾經受到了列寧以下的革命領袖的熱烈稱讚，便是成功的例子。

但是，那種文工團式的「任務文藝」是否是唯一可能的革命文藝，甚至是唯一可能的文藝呢？是否除了這種形式的文藝之外，便不是革命文藝，甚至不是文藝，或只配被打倒的文藝呢？當然不能這樣說，理由何在，且待後面再說。

說文藝只應為革命黨政策服務的第二個不良結果，便是：以政治標準否定藝術標準，根本漠視藝術的特性。在《文藝講話》中，毛澤東提出了文藝批評的那個標準：政治標準與藝術標準。這個提法的本身原是正確的。問題只在於如何應用與如何對待它們。在這方面，我們看見過兩種完全不同的態度，一種是這樣的：

我們的標準顯然是政治的，無上的與不可寬容的。但正是為了這個理由，黨一定要清楚明白地規定自己的活動界限。為了要把我的意思更確切地表示出來，我願意這樣說：我們應該有一個警戒的革命檢查制，還應有一個對藝術方面的寬廣而融通的政策，它不應帶有小派別的惡毒意氣的。（見《文學與革命》，第七章。）

另一種態度可以毛澤東為代表，譬如在《文藝講話》中，他說：

但是任何階級社會中的任何階級，總是以政治標準放在第一位，以藝術標準放在第二位的。資產階級對於無產階級的文學藝術作品，不管其藝術成就怎樣高，總是排斥的。無產階級對於過去時代的文學藝術作品，也必須首先檢查他們對待人民的態度如何，在歷史上有無進步意義，而分別採取不同態度。

上面這兩種態度，初看彷彿是相同的。大家都分出兩個標準，大家都將政治標準放在首要地位。但是細按其實，二者卻代表着兩種根本不同的精神。依照前者，黨和政府的干涉只限於政治方面，它要求樹立一個警戒性的檢查制，要求立下一些明確的政治性的限制，它要寫明着什麼不准侵犯，什麼不准觸動，以便文藝家一望而知，易於遵守，至於此外，在藝術方面，那讓文藝活動家自由自在，各適其適，黨和政府並不命令他們該做什麼，可做什麼。它們定下了「寬廣而融通的政策」，「保證」他們在「個人創造性與個人愛好方面的廣闊天地」，保證他們在「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內容方面的廣闊天地」。一句話，按照這個態度，黨只是消極地預防着文藝犯政治標準上的錯誤，卻並不積極地拿了這個政治標準，去廣泛干預文藝家們的藝術活動。

可是按照了後一態度，事情恰好相反：既然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既然文藝活動必須處處服從政治指導，那末政治家提出的政治標準，首先也就是文藝家們的藝術標準。政治家不但應該按照政治標準來指揮藝術家的政治思想，而且也可以憑它來「領導」藝術家的藝術活動。結果就必然是只有政治標準，沒有藝術標準。不管你口頭上說得如何好聽；不管你主觀上是否真誠地要求「政治和藝術的統一，內容和形式的統一，革命的政治內容和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但只要你主張政治家應該而且有權對文藝活動作廣泛與嚴密的干涉，那麼，無論你怎樣進行「兩條戰線鬥爭」，而結果只能有「只有正確的政治觀點」（即完全符合當權政治家的觀點）而沒有藝術力量的所謂「標語口號式」的文藝。

前一態度是嚴格地限於政治的，而且只在明確與有限的範圍內行施這個政治標準的干涉，以此保證了藝術標準的確立，亦即保證了文藝活動的健全發展與蓬勃生長。後一態度是既政治又藝術的，而且無

論在政治上或藝術上，它都不給自己立下任何明確的界限。它無所不管，無所不理。它主張管得寬，管得多。它要求文藝家在任何方面都服從黨的領導。文藝創作的題材固然要符合於黨在某一時期政策與任務的需要，就是他們從事創造的「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內容」都必須時時聽「上級」命令，處處受領導指揮。至於列寧提起過的「個人愛好」之類，則被歸入於「小資產階級」或「資產階級」範疇，一定要棄盡棄絕的。

政治標準與藝術標準之間的這樣一種關係，實際上自是前者對後者的否定與毀滅的關係。在這樣關係中，其實已根本談不上什麼藝術標準，因而也根本不容許產生完美的、且別說偉大的、文藝作品。

主張對文藝工作實行無微不至的領導，主張以政治標準來包辦藝術標準，這些人的起碼錯誤，就是不承認文藝創造有它自己特有的道路。在某些高高在上的政治家的頭腦中，以為文藝作品的產生，與任何物質生產的過程一樣。所以只要在上者定出計劃，發出指示，標明規格，就可以坐待來取了。其實這是大錯的。不錯，文學家與藝術家的創造活動也是勞動，他們的創造也是生產，但這是一種非常特殊的勞動，相當微妙的生產。和一般的勞動生產相比，它顯然具有不少特點的。列寧說得好：「在這個領域中是最不能談公式主義的」。「不能機械地平均」，不能「劃一化」，不能「少數服從多數」，其勞動不能還原成簡單的勞動日的。顯然，當列寧考慮到黨的文學政策的時候，他已經充分考慮到了文藝的特性。

可是毛澤東並不如此。在《講話》的結論中，毛澤東首先說明了他是如何考慮問題的。他說：「我們討論問題，應當從實際出發，不是從定義出發。如果我們按照教科書，找到什麼是文學，什麼是藝術的定義，然後按照它們來規定文藝運動的方針，來評判今天所發生的各

種見解和爭論，這種方法是不正確的。」因此，毛澤東完全不顧文藝活動的特性，而只從當時「客觀存在的事實出發，從分析這些事實中找出方針、政策、辦法來。」

其實在這裏，光從方法論的觀點看，不正確的也恰恰是毛澤東自己。試問，要制訂共產黨對於文藝的基本政策方針，怎麼可以簡單羅列一下當前的政治局勢與階級關係就夠了呢？不從文藝創造這種勞動生產的特殊性質（亦即「什麼是文學」，「什麼是藝術」）着手，如何可以按照「客觀的形勢需要」，對這門特殊的「生產部門」定規劃，下命令，落定單呢？研究客觀的政治形勢與階級鬥爭的情況，乃是一個革命黨起草宣傳大綱、工作綱要或政治決議的前提，但絕不是黨決定它對文藝創造活動的基本方針的前提。要決定這樣的方針，重要的（當然不是唯一的）恰恰是要從「定義」出發，不是從「客觀事實」出發。不是從隨便哪一本「教科書」所給的定義出發，但必須從研究文學藝術這門勞動生產所具有的獨特性質出發。不清楚明白地了解這些性質，黨便無法規定自己對它的態度和方針，無法對它進行任何形式的領導，無法利用它來促進革命。如果不了解這些特性，或者了解了而不理會這些特性，一味依照客觀需要，將文藝這枚「螺絲釘」與革命機器上所有其他的螺絲釘等同起來，用同樣的命令方法來領導文藝，來對文藝提出這樣那樣的要求，那末結果必然與「豐收」的期望相反，必然要造成文藝的大荒歉。

什麼是文學與藝術？我們毋須給它們下定義的，也不必抄錄前賢先哲們對它們業已下過的定義。從黨的政策觀點看，這樣的定義是多餘的。但我們必須解答這個問題：什麼是文藝活動的特性？因為只有符合這些特性，順着這些特性，不違反這些特性，黨的文藝政策才能一方面保育文藝，另一方面從文藝獲取有利於革命的成果。

根據馬克思主義，文學和藝術都是「上層建築」。它們的形態和發展在某種程度內決定於社會的物質基礎，它們與這個基礎相適應，並且反映了建築於此基礎之上的社會和時代。但是，這裏的所謂「決定」，「適應」與「反映」，從馬克思本人開始，一切高明而正確的馬克思主義者就不斷地警告過那些「馬克思主義者」，或不斷地給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家們反覆說明過：千萬不可以把它們解釋得機械了。早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裏，馬克思就指出過：「大家知道，在藝術上，它的某些繁盛時期決不是同社會的一般發展成比例的，因而同那成為社會組織骨骼的物質基礎的一般發展也決不是成比例的。」

可見機械的決定論或反映論，是違反了馬克思主義的。原來並非什麼樣的生產關係，就必然會產生什麼樣的文藝創作；並非較高或較低的生產發展，就決定了較好或較差的文藝作品；並非某一社會和時代的階級關係，必然會像照相一樣全部如實地反映於文藝之中。在一個意義中，在基本的與長遠的意義中，文藝雖受決定於「客觀事實」，適應這個「事實」，反映這個「事實」；但在另一意義中，在一種並不微小的意義中，它對這個「客觀事實」卻顯得不受拘束，獨立而主動。誠然，在所有的「上層建築」中，對他們腳下的基礎都表示了或大或小的游離。它們都享有相當程度的獨立性。不過游離最遠、獨立性最大的一種上層建築，大概得數文藝了。

這裏的秘密就在於文藝活動的特殊性質。

在過去的馬克思主義派大師中，俄國的普列哈諾夫可說與文藝最有緣。是他，曾經出色地應用了馬克思主義來解釋歐洲的文藝史。是他，拿了無可駁斥的實例，極其雄辯地說明了只有唯物史觀才能夠解釋文藝的發展史。可是也正是他，指出了用唯物史觀來解釋一般的思

想與特殊的文藝，該有哪些「保留」之處；也正是他，指出了文藝家之反映客觀，並非單單靠了解客觀就夠了的。在《歷史一元論》那本著名的著作中，他說道：「……我們要告訴米哈伊洛夫斯基先生，在那些涉及思想發展的問題中，就算是非常熟悉『弦』（按：此地指生產力的發展）的人，如果他們不賦有某種特殊才能，即藝術感覺，也可能無法去解釋歷史過程的。心理自行適應於經濟。但這個適應乃是一種複雜過程，為的要了解其全部進程，且能生動地給自己與別人描繪出來，描繪得有如真實發生一般，那末不止一次地需要藝術家的才能。」

由此可見，「藝術感覺」與「藝術家的才能」，同那對客觀事實或客觀史實的明白理解，並非一回事。馬克思主義，政治教育，或「政治標準」，可以給人以那種理解，卻不能給人以那種感覺，也不能給人以那種才能。至於從「客觀事實」出發，那至多可以讓人獲得正確的理解，明白時代的要求，卻不能讓人取得藝術感覺和藝術才能。

馬克思主義方法與藝術方法之非屬一物，是顯而易見的。

那末藝術方法的特性究竟何在呢？它是否微妙得連捉摸都不可能？玄虛得連說明都不可能嗎？不是的。據我看，文藝創造活動的特性，有如下述：它是情感的多於理智的；幻想的多於紀實的；潛意識的多於有意識的；渾統體會的多於分析理解的；形象的多於理論的；表現的多於論說的。它主要是個人的而非群眾的^[7]，是發乎內心的而不能受自外命的；它必須真誠的與自願的，帶不得絲毫虛偽與勉強的。

如果我們承認上面所述確是文藝創造活動的特性，是為它所固有的，即如果違反了它們，就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有價值的文藝創造的，

那末，藝術是否可以像哈巴狗跟隨牠主人那樣，寸步不離地跟着黨的政策走，跟着口號走，也就不言而喻了。

列寧和馬克思、恩格斯一樣，總是把政治標準與藝術標準分開。他從來不憑前一標準來抹煞後一標準，也不強迫叫誰去服從誰，或分什麼第一與第二的次序。他是革命的政治家，是在思想問題上絕對嚴格的政治家，對於一件藝術品，特別對於含有思想性的文學作品，自當首先着眼於那位作家的思想立場，着眼於作品的思想內容。在這方面，列寧總是應用他犀利無比的馬克思主義的解剖刀，把對象進行無微不至的分析和研究。但同時，他卻能以藝術欣賞者與批評者的資格，在政治思想以外的藝術標準上，指出這個作家的地位，指出這篇作品的價值。有文字為證，列寧是能夠分清這兩種資格的，並且能夠使它們不相干擾，各自存在的。最顯然的例子是他對托爾斯泰的看法，譬如他說：

托爾斯泰的作品、觀點、學說、學派中的矛盾，的確是顯著的，一方面，是一個天才的藝術家，不僅創作了俄國生活的無比的圖畫，而且創作了世界文學的第一流作品；另一方面，是一個因為迷信基督而變得傻頭傻腦的地主。……一方面，是最清醒的現實主義，撕毀所有一切的假面具；另一方面，鼓吹世界上最討厭的一種東西，即宗教，企圖用信奉道德的神父來代替官方的神父，這就是說，培養一種最巧妙的、因而是特別惡劣的神父主義。（見《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鏡子》）

列寧處處着重托爾斯泰身上這個矛盾的兩方面，一方面是天才的偉大的藝術家，另一方面是反動的與糊塗的思想家。「為了使他的偉大

作品真正為全體人民所共有」，列寧認為「就必須作鬥爭，就必須向那使千百萬人陷於愚昧、卑賤、苦役和貧窮的社會制度作鬥爭，就必須有一個社會革命。」可是在同時，列寧指出，「托爾斯泰的學說無疑地是空想的，就其內容來講是反動的，而且是在反動這兩個字的最準確和最深刻的意義上。」

列寧沒有因為托爾斯泰的藝術天才而曲宥他的反動思想，同時，他也不曾因為托爾斯泰的反動思想而抹煞他的藝術成就。

同樣態度，我們可以從列寧對高爾基所表示的關切和批評中看出來。譬如在《遠方來信》中，有這樣的一些令人感動的話：

本文作者有一次在卡普里島會見高爾基的時候，就警告他和責備他在政治上的錯誤。高爾基用他的無比的和善和真誠的話擋開了這些責備：「我知道，我是個不行的馬克思主義者。並且，所有我們這些藝術家，都是有點不大負責的人。」要反對這個話倒不大容易。

無疑的，高爾基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天才，他帶給了，並且還將帶給全世界無產階級運動許多貢獻。

但是為什麼高爾基在政治上搞錯了呢？

這裏列寧顯然也沒有因為高爾基犯了政治上的錯誤而否定高爾基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天才」。更有趣的是下面一節列寧給高爾基的信：

我認為藝術家是可以在任何哲學裏採取許多對自己有利的東西的。最後，我完全絕對的同意：在與藝術創作有關的事情上你是最好的裁判者，當你既從自己的藝術經驗裏，又「從哲學裏，

哪怕是從觀念論的」哲學裏，提煉出「這樣的」的一種見解，你會達到對工人的黨有巨大利益的結論的。

列寧認為一個藝術家，當然是真正的藝術家，可以從「任何哲學裏」，「哪怕是觀念論」的哲學裏，「採取許多對自己有益的東西」。這說法跟思想決定藝術，特別跟政治思想決定藝術的見解，有着多麼大的距離！今天，如果有位藝術家，為了「擋開」史大林主義者或毛澤東思想者對他所作的政治錯誤的責備，說道：「我知道，我是個不行的馬克思主義者」，這位史大林主義的，或毛澤東思想的對話人，是否會覺得「不太容易反對這個話」，並且還會宣佈那個被批判者為「一個偉大的藝術天才」呢？

不，決不會，這些文藝領導人一定會覺得非常「容易反對這個話」的，他們只要舞起「政治標準」這條粗棍子，一棍子「徹底解決」了任何一位真的或假的藝術大天才。

光想想這些小地方，我們就可以斷言史大林—毛澤東的文藝政策，根本不是列寧主義的。

恩格斯自己在很大程度內就是一個傑出的藝術家，他極其清楚文藝創造的特性，所以他遺留下來的少數有關文學或文學家的書信與文章，乃是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的典範。恩格斯對於巴爾札克和歌德所說的話，在基本上，與列寧對托爾斯泰和高爾基的態度吻合的。他們都指點出思想和藝術不是一個東西；他們都告訴了我們：政治標準與藝術標準不是一個東西。恩格斯一方面說巴爾札克「在政治上是一個保皇黨」，另一方面卻說他「比過去，現在和將來的一切左拉都偉大得多的一個現實主義藝術家。」為什麼一個思想上十分反動的人，卻能

創造出偉大的藝術品來呢？恩格斯的回答是，因為這個藝術家採取了正確的藝術創作方法之故。恩格斯說，「我所提到的現實主義，甚至不管作者的觀點怎樣，也會顯露出來的。」一個作家採取什麼創作方法，問題主要不在於他有意識的選擇，而更在於他整個藝術修養與藝術才能所決定的方法。因此，恩格斯這裏所說的意思，顯然不是僅要推薦一個好的創作道路，而且還表示了這樣的意思，即藝術家的藝術作品不是由他的思想觀點來決定，而是由藝術家的創作才能來決定的。好的思想固然不一定能使藝術家創造出好的藝術；同時壞的思想也不一定就使藝術家創造不出好的藝術。因為，藝術品的好壞畢竟不取決於思想，而取決於創作方法，即取決於由藝術家的藝術才能與藝術素養所選定的創作方法。

關於歌德，恩格斯在他的論文中說：

歌德在他的著作裏是以雙重態度對付他當時的德國社會的。他是對它敵視的，他厭惡它……但是，相反地，像在……作品裏，他是和它親善的，和它妥協的……他心裏經常發生着天才詩人與法蘭克福市參議員的謹慎的兒子或魏瑪的樞密顧問官之間的鬥爭；前者對於環繞在他四圍的鄙陋抱着嫌惡的心情，後者使他必須和它妥協，適應於它。因此，歌德有時候是偉大的、有時候是渺小的；他有時候是反抗的、嘲笑的、蔑視世界的天才，有時候是拘謹的、滿足於一切的、狹隘的小市民。（見《論歌德》）

從恩格斯這段話裏，我們可以悟出如下幾點道理來：（1）像歌德那樣世界上稀有的大天才，也不是百分之百用偉大的原料來做成的，他一身含有極其明顯與尖銳的矛盾，他有偉大的一面，也有渺小的一面；（2）我們絕不可以因為他是天才而寬容、甚至讚美他的缺點（恩

格斯文章的主要目的就是反對這一點)，但在反面，我們當然也絕不可以因為他狹隘的小市民性而抹煞或否定他那縱橫千古的天才；(3)並非先得有完美正確的思想性格，才能產生出完美偉大的美術品的；不錯，偉大的藝術家的思想氣質不可能是庸俗渺小的，但它們並非時時如此，亦非事事如此；他們有時可能庸俗，對某事的態度亦可能渺小，因為，藝術與思想，藝術與道德畢竟不是一回事啊。

「一般說來，我們不是從道德的、黨派的觀點，而主要是從美學的、歷史的觀點來對他（歌德）加以責難。」恩格斯這句話說得好極了。彷彿恩格斯事先知道，當他「百年」以後，會有許多自稱為他的信徒的人，出來認為除了道德的與黨派的觀點之外，不可能有什麼獨立的美學觀點，不可能憑此觀點去批評文藝作品和作家的！

毛澤東承認矛盾是絕對的，和諧是相對的。所有史大林主義者亦都承認矛盾是進步的動力。但是他們要求文藝活動家具有絕無矛盾的思想與性格，他們要求文藝作品的思想百分之百正確，他們絕對不能容忍思想上錯誤（或只有部分錯誤）而藝術上完美的作家和作品。依照毛澤東的說法：「內容愈反動的作品而又愈帶藝術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應該排斥。」如此，則不但宣揚「特別惡劣的神父主義」的托爾斯泰，不但將同情放在保皇黨一邊的巴爾札克，應該為了他們天才的藝術性（因為它最能毒害人民）而「愈應該排斥」，便是有時發散出庸俗的小市民性的歌德，便是哲學上同情馬赫派，政治上自稱「不負責任」的高爾基，也要因為他們天才的藝術才能而更受到打擊了。

矛盾是進步的動力，絕對順從是停滯與衰退的起因。這情形如果在自然界與社會現象中是正確的，那末在文藝家的創造活動中是更加正確的。文藝家的創作「靈感」，首先與主要地乃由於他自己身上的矛

盾，由於他和周圍世界的矛盾，由於他和過去或現在的時代之間的矛盾，所激發出來的。說「文藝乃苦悶的象徵」，未免失之於偏頗。但說文藝的創造活動基本上乃由矛盾所激發，卻是合乎實情的。因此，「不許有矛盾」，事實上等於堵塞了文藝的來源。而史大林與毛澤東的文藝政策要求文藝家在絕對順從政治標準的條件下，甚至在絕對跟隨政策口號的條件下，從事文藝創作，事實上便是不要他們創作。

讓我們做個這樣的假定吧。假定中國目前產生了像歌德、巴爾札克、托爾斯泰與高爾基那樣偉大的藝術天才，他們寫出了夠得上世界第一流水準的文學作品；但是從政治標準看，這些作品卻不是完全正確的，或竟是很不正確的。他們將得到怎樣待遇？他們將遭到怎樣的命運呢？根據毛澤東的標準，既然政治第一，藝術第二，既然前後兩者有着主從關係，那事情就很簡單：首先，要他們依照政治標準，即依照當時面對的特定政治任務，亦即當時流行的政治口號，徹底修改他們的作品。如果作者的思想與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有若干基本分歧，那作者首先得進行徹底的思想改造，然後再去改作他的藝術作品；在修改中，應該不吝惜在任何藝術上的優點，應該把一切不合標準的東西大刀闊斧地砍掉，務使作品在政治標準上達到百分之百的正確，即百分之百地符合於黨和政府的迫切要求，這是第一關。這幾位藝術天才如果闖過了這座政治關，並不就此一無險阻了，他們還得通過藝術關。這座關口雖然號稱藝術，但守將手裏拿的武器都還是政治，而且是更加空泛，更無範圍可守的政治，因為所謂「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究竟有什麼內容，言人人殊，一個領導者有一個領導者的解釋。毛澤東沒有給它下過定義，他只給它下過一個反定義，即他曾經列舉了一些創作情緒，號召大家徹底破壞它們，以便建設起新東西來，即確立起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毛澤東所列舉約有如

下的一些：「封建的、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的、虛無主義的、為藝術而藝術的、貴族式的、頹廢的、悲觀的以及其他種種非人民大眾非無產階級的創作情緒。」「天條」如此之多，如此之寬，又如此之伸縮不定，要想使一個作家全都不犯、實在是難而又難的。更壞的是所有這些「天條」的解釋權，完全操於文藝黨官之手；其解釋又完全要依據於這個或這些領導者的個人口味，以致作家即使想努力遵守種種標準，拼命想不違犯清規戒律，事實上亦很難辦得到，因為顧此勢必失彼，「順了哥情失嫂意」，原想面面俱到，而結果卻處處碰壁。萬一你百依百順，奉命一改再改，終於讓你連這第二關也闖過了，可是，試問，如此通過出來的中國藝術天才，還可能有歌德、巴爾扎克、托爾斯泰或高爾基的成就嗎？

不過這還不是最壞的情形哩。在我們這個假定的例子裏，那位藝術天才多半不會順利過關的。打從王實味事件以來，中共表現過不少次的文藝戰線上的鬥爭，已經很清楚地告訴我們，任何一個具有真正藝術家氣質的人（更不用說藝術天才了），都無法通過那道關口的，他們多半在第一道關口就要蒙上「不光彩的政治罪名」倒下去，以致不但失去了藝術生命，而且喪失了肉體生命的。說到這裏，就得談史大林主義文藝政策的第三個惡毒結果了。

那便是宗派主義的假公報私，以及阿諛成風的領袖膜拜。這兩者原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上諂者必下驕，驕下者必諂上。為的要傲視儕輩，欺凌同行，一些本無才氣而偏好文藝的作家，或不喜辛勤而極想成名的文人，就拼命想從文藝創作以外的活動中去造成作家身份，一味想從「政治標準」上去抬高藝人地位。對於這些「文藝活動家」，史大林主義的文藝政策真是大開了方便之門。他們不必辛勤創作，卻可以成家成名，他們只須登台指揮，便能高人一等。

不過要想登上台去做文藝的指揮官，雖然不需要藝術上的才能，卻需要有做官的本領。為的要爬上台去，為的要爬了上去而不倒下來，那就得付出代價，對上諂媚。否則，這些文化官既無革命功勞，又無文藝成就，叫他們憑什麼樹立起威望來呢？

就這樣，一種非常奇特的關係造成了；一方面，黨為了要維護它的那個標準，為了要嚴密地控制文藝活動，必須成立一整套機構，必須保持一大批文化官僚；而另一方面，這批文化官僚為要鞏固自己的地位、就無所不用其極地來發揮領袖謳歌制度。

史大林與毛澤東的領袖崇拜制度，成因當然很多，不過他們文藝政策所必然產生的歌功頌德風氣與阿諛諂媚的作風，在不少程度內，總曾經起了推波助瀾、幫腔作勢的功用的。

在蘇聯，史大林崇拜的瘋狂推行，與蘇聯作家的統一組織，與控制文學的整套衙門的設立，是同時開始的。在中國，毛澤東崇拜的建立經過，簡直與中共在文藝戰線上的鬥爭分不開，特別與中國文藝運動中的宗派鬥爭分不開。

毛澤東的《講話》發表於1942年5月，這是由同年3月間王實味發表的〈野百合花〉引出來的。〈野百合花〉事件是中共文藝戰線上的一次重要戰役，它的意義遠遠超過了那幾篇雜文的本身。作者王實味這個人，和後來的胡風一樣，其重要性也並不在於他們本人，而在於他們所代表的傾向，在於他們有意或無意代表着的宗派。就〈野百合花〉那幾篇文章的本身說，並不含有什麼了不起的深遠意義，它之所以能引起軒然大波，能造成中共治下的第一次文學大獄，能促使毛澤東親自出面干涉，親自出來領導座談者，主要因為它代表着魯迅傾向耳。

中共對於魯迅的態度是極其矛盾的。魯迅反對國民黨，擁護中共，這自然使中共歡喜，使他們由衷地高捧魯迅，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魯迅的骨頭太硬，有自己主張，歡喜批評，不容易受指揮，這卻使中共頭痛，希望給他一點抑制或教訓。魯迅本人非常幸運，死得其時。正當他的可喜作用發揮到頂點，他的可憎作用初露端緒的時候，就離開了人間。因此，中共只需要捧他揚他，完全不需要打他抑他。魯迅就這樣以最完善的人格留在中共的歷史上，而他和中共的關係，也只記載着和洽愉快，沒有多大的隔閡揆離。

可是魯迅作風和中共之間的本質上的矛盾卻不曾因魯迅之死而消失。相反，隨着中共勢力之鞏固與擴大，隨着中共自己一套文藝政策與文藝控制制度的確立，中共與魯迅風格代表者之間的矛盾，卻日益尖銳了。

直到 1942 年以前，毫無疑問，在中國左翼文藝隊伍中，魯迅享有無上權威。一切趨向革命的青年們，可說無一不以魯迅為師的。他們在思想上接受了他那反帝反封建的批判精神，風格上承繼了他的嬉笑怒罵的諷刺筆調，抗日戰爭把大批青年送到了延安，魯迅風也跟隨他們吹到了延安。結果，魯迅與中共之間潛伏着的矛盾，在事實接觸之下而終於爆發出來了。

與中共的過分吹捧相反，魯迅不曾是五四運動的主要領袖；但就五四運動的精神說，魯迅卻確實比當時任何一個領袖代表得更充分，繼承得更徹底。魯迅，不管他後來在思想上已接受了多少馬克思主義，可是他的整個精神，在他的靈魂深處，卻主要仍是一個徹底的民主主義者，一個自由主義的人道主義者，一個個人主義的批判精神的堅持者，一個孔家文化的叛棄者，一個西方文明的崇拜者。這樣的一個藝術家，如果光從思想與政治的標準看，他實在應該像高爾基一

樣，是「一個不行的馬克思主義者」，甚至是「一個不負責任的人」。但是這樣一個有天才的藝術家，倘在列寧眼光中，不管他在思想上和科學的社會主義有着多少距離，特別和無產階級的戰略與策略，有着很大距離，卻仍然會「帶給了，並且還將帶給全世界無產階級運動許多貢獻」的。因為列寧對於高爾基（如果在中國的情形中，亦都會同樣地對於魯迅），所期待與要求的並非一般革命者的工作，而是一個賦有巨大藝術才能的人，在他特殊的範圍內所能做的對於無產階級乃至全人類的貢獻。列寧的這個態度，我們可以從他給高爾基的書信中看得最清楚。對於他的思想上的糊塗與錯誤，列寧總是嚴格地加以批評的；但他從來不因此而減少了對於藝術家高爾基的敬愛，從來不因為哲學與政治上的「負號」而抹煞他在藝術事業上的「巨大的正號」。列寧曾經一再聲明：「無論在什麼情形之下都不容許把作家們關於哲學的爭論和『黨的』（即『派別的』）事混在一起。」所以列寧始終不斷地要求高爾基在黨報上合作，時常要他寫些短文，有時甚至要他起草傳單，有時要他編輯報紙的文學欄。他希望高爾基以這樣方式「把文學批評『更密切地』和黨的工作、和黨的領導聯繫起來。」但在同一信裏，列寧卻又說：「如果你覺得更歡喜寫『大』作品，那末當然，我不勸你中斷它。它會帶來更大的貢獻！」列寧說這幾句話絕不含有譏諷之意。在同一時候，為了同一件事情，列寧給盧那查爾斯基的信上還說得更加明白，他說：「因為我『不知道』高爾基工作的性質（以及他的工作意向）。如果一個人在忙着某種重要的巨大的工作，如果拖他來搞些瑣事，搞報紙，搞政論，而損害到那個工作——那樣，擾亂他，拖他離開那個工作就是愚蠢行為，而且是有罪的行為！」

這裏有一個意見非常重要，列寧希望高爾基能盡「螺絲釘」的作用，希望他的文學工作能與黨的工作密切地聯繫起來；但是，（重要的

「但是」！）如果高爾基自己有更大的工作（自然是文藝創作工作）在着手，那就不應該「擾亂他，拖開他」，應該讓他給無產階級運動「帶來更大貢獻」；這時候如果硬叫他「搞瑣事、搞報紙，搞政論」，「就是愚蠢行為」，甚至是「有罪的行為」！

列寧是多麼尊重藝術家的獨特的藝術活動！多麼懂得區別政治活動與藝術活動！多麼正確地一方面對藝術家的錯誤思想進行批評，另一方面充分保證藝術家創作活動的「廣闊天地」呀！

如果列寧遇到了魯迅，毫無疑問，也一定會採取同樣態度來對待他的。對於他思想上的不足之處，一定會用嚴格而親善的態度來批評，來幫助其前進；而對於他藝術上的才能，則一定會予以充分的尊重：不僅給以崇高的評價，而且還一定會保證不干涉他的活動，一任他自己發揮和發展的。

說到這裏，讀者們也許會說，中共與毛澤東不正是這樣對待魯迅嗎？是的，他們是這樣對待死去了的魯迅的；但他們用了完全不同的態度對待了繼承魯迅衣鉢的人，對待了魯迅未死的精神。

誰是繼承魯迅衣鉢的人？什麼是魯迅未死的精神呢？把魯門弟子僅僅限於胡風，雪峰等人，未免將問題看得太小了。其實，二三十年代整整一輩的中國進步的文學青年，都可以算是魯迅弟子的。他們幾乎無一例外地，只在程度上略有差別地，都學習着魯迅的筆法，魯迅作風，魯迅精神。那末究竟什麼是魯迅精神呢？它簡單可以歸結為：對黑暗的反抗，對權威的挑戰，對傳統的批評，對弱小的同情。這個精神，我們上面說過，主要是五四時代形成的，其思想根基首先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但隨着中國社會情形的發展和改變，魯迅精神的

思想基礎也逐漸在變，在固有的「啟蒙運動」式的思想中，又參加了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思想的成分。這樣，到了晚年的魯迅精神，確實建築在比較堅實的思想基礎上，它與社會主義革命的思想及其體制，應該可以融合無間，完全可以適應的了。

那末為什麼會和中共發生衝突呢？

原因在於：1942年前後的延安中共政權，早已徹底史大林主義化了，它完全不等於列寧的蘇維埃政權，而完全依照了史大林官僚的方式建立起來的了。對於這樣的政權，不用說，由上述內容所構成的魯迅精神，是格格不入的，是無法容忍的。毛澤東為了要造成史大林式的個人崇拜，當然首先要清除這種魯迅精神。

1942年春天的〈野百合花〉事件與接着發表的《文藝座談會講話》，其主要意義應作如是觀。

王實味是北京大學學生，胡風的同班同學，魯迅的崇拜者。由這樣一個人來引起中共和魯迅之間的鬥爭，具有很大象徵意義。〈野百合花〉的幾篇雜文其實不配造成「事件」，它之所以被抓住來迎頭痛擊，只因為它代表着魯迅風罷了。

所以等到毛澤東出場，《講話》中便不再提到什麼王實味或〈野百合花〉，乾脆就打擊魯迅本人和魯迅精神了。在講話中，毛澤東列舉了延安當時存在着的一些「糊塗觀念」。它們是：

「人性論」；

「文藝的基本出發點是愛，是人類之愛」；

「從來的文藝作品都是寫光明和黑暗並重，一半對一半」；

「從來文藝的任務就在於暴露」；

「還是雜文時代，還是魯迅筆法」；

「我是不歌功頌德的，歌頌光明者其作用未必偉大，刻畫黑暗者其作用未必渺小」；

「不是立場問題，立場是對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現不好，結果反而起了壞作用」；

「提倡學習馬克思主義就是重複辯證唯物論的創作方法的錯誤，就要妨害創作情緒」。

上述八種「糊塗觀念」，歸結起來，最中心的其實只有一點：內容不許批評黑暗，應該歌功頌德；筆法不許冷嘲熱諷，應該熱情讚揚。他宣佈「雜文時代」的魯迅已經過去，魯迅筆法必須廢除。當然，毛澤東的講話沒有說得那樣簡單直率。其中有些批評，例如關於人性論與人類愛那些段落，說得又頗為對症的，同時在明顯涉及魯迅的段落中，褒貶也頗有分寸，所謂廢除也保有限度；但是我們如果不拘拘於文字，如果着眼於文字背後的精神，以及它發表時候整個中共的政治形勢，那我們就能清楚看出，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的主要用意，是要阻遏中國新文藝運動中已成主流的批判暴露精神，就可以懂得講話的中心打擊是向着魯迅及其門徒的了。1942年，即發表《文藝講話》時候的中共政治形勢，有什麼特點呢？那便是毛澤東對王明系統的鬥爭已取得決定性的勝利^[8]，他的一尊地位業已造成而有待於鞏固與擴大，因此，迫切需要消滅文藝方面的魯迅傳統與魯迅精神。因為魯迅精神既然以反權威、反壓制、重批評、倡民主為其骨幹，對於以神化領袖為其象徵的官僚極權制度的造成，自必被證明為最大的障礙物；自必要以任何代價去撲滅它了。

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的文藝講話，可說是中共反對「魯迅風」的第一聲戰號，是第一個完整的綱領。

信號一出，團集在中共內外的各個文藝小宗派便紛紛響應。它們以不同方式，將各自的立場去遷就這個綱領。由此爆發了新的鬥爭。原來受魯迅影響的人，有的被加上「托派」罪名被整肅了，有的真心地或假意地由「批評派」轉變成了「歌德派」。其中處於中共軍政勢力以外，以胡風為精神領袖的一群人，則表面上接受《講話》，而實際上堅持魯迅作風。至於原本在非解放區「領導」文藝的一群文藝官僚，那當然奉毛氏談話作聖旨，「拉大旗作為虎皮，包着自己」，變本加厲地去「嚇唬別人，定人罪名」了。這一批人，就是當年被魯迅痛罵過的周揚（即周起應）和徐懋庸等人所率領的。

關於中共治下文藝小派別的鬥爭，我們不將作充分敘述，因為後來的反胡風，打丁玲，踢倒馮雪峰，壓下王任叔的連串事實，都是公開進行，眾所周知的，毋需我們在這裏浪費篇幅。在這裏，我們想要指出來的，只是那個鬥爭的歷史淵源。原來所有這些鬥爭，歸根結蒂，無非是當年（1936年）見拒於魯迅的周起應輩，「抓到一面旗幟，就自以為出人頭地，擺出奴隸總管的架子」，將曾經受魯迅保護而多少保持着魯迅精神的胡風、雪峰、巴人等輩，「鍛煉」入罪，「充軍……殺頭」，以遂公報私仇的宿願罷了。（以上引號中文字，均見魯迅〈答徐懋庸信〉）

被魯迅畫盡了嘴臉的周揚等輩，這些「戚戚嗻嗻的作家」，這些「破落戶的漂零子弟」，這些「輕易誣人的青年」，這些「信口胡說，含血噴人，橫暴恣肆達於極點」的人，能夠幹出魯迅所預言的齷齪勾當來，對於稍明近三十餘年來中國文壇內幕的人，一點都不稀奇。稀奇

的是：顯然與此文壇恩怨毫無瓜葛的毛澤東，對魯迅又表示敬佩的毛澤東，為什麼會將「大旗」與「虎皮」授給周起應等人，讓他們去胡作非為，讓他們去摧殘陷害魯迅的那些及門弟子？

要解釋這個疑問，當然不能從宗派利益着眼，更不能從個人恩怨着眼。這裏起着決定作用的，乃是中共黨制走向個人崇拜的過程，是史大林主義文藝政策的性質。那個過程和這種性質所加於毛澤東的影響力，遠遠超過了毛澤東個人的愛憎。在藝術上，毛澤東可能喜歡魯迅的，但是在政治上，他卻必須撲滅魯迅精神。因為「政治第一」、「藝術第二」；而藝術必須為政治服務，藝術必須為政策服務的。所以中共將文藝大軍的帥印付託給周揚而不交給魯門弟子，只有一小半是人追路線，一大半卻是路線擇人。試想，必須將文藝家的脊骨折斷的路線，有誰比那些原本無骨的人更能和它配合呢？吮疽舔痔者流，未必為神化了的獨裁者們所珍視；但是個人崇拜制度建立時候的需要，以及這個制度建立後它本身邏輯的推動，使獨裁者只能喜好與利用那些隨時準備舔靴的人。這是個人獨裁制度無可解決的矛盾之一，也是獨裁者本人無法解消的悲哀之一。任何一個獨裁者都希望有真正傑出的文藝來裝點他的時代，連最反動的墨索里尼都存在過這個希望；但所有這些希望都落空了，因為文藝，正如意大利小說家伊那齊·西龍對墨索里尼所說，是「一朵野花」。毛澤東固不能與墨氏相提並論，他是代表進步的個人獨裁者；但他既然踩死了「野百合花」，他那溫室裏的「百花」，也就不可能「齊放」的了。

文藝必須為政治服務，甚至必須為變動不居的政策服務，其對於文藝的毀滅性的影響，到此我們已相當詳盡地說明了。這裏我們還想簡單談談的，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這把「刀子」。

首先我們覺得，將某一個創作方法定為標準，命令所有的作家與藝術家嚴格遵循，不得有違，根本就不是在「內容和形式上」給文藝家們「保證廣闊天地」。在題材與內容上限制文藝創作已經貽害無窮；在形式和方法上定下規格則簡直是愚不可及。限制內容，還可以說是由於革命的利益需要；而規定形式，即使就「革命的功利主義」說都是多餘的，都是有害無益的。一個革命故事，或者一個革命激情，誰能說如果用現實主義派的手法表現出來，一定會比用浪漫主義派手法表現高明而進步呢？毫無根據這樣說，也全無理由這樣說。

無產階級革命政府最大的責任，是要保衛革命的利益，使它不受任何方面的攻擊。它關心到了文藝，首先也應該在這個方面。這即是說，它所關心於文藝的是某一作品，或某一流派對革命的政治態度如何，絕不是他或他們所從事創造的藝術態度如何。由無產階級專政的政府發號施令，甚至制定條款，使普天下的文藝活動家一定要按照這種方法創作，不許採取那種方法創作，那不但徒勞無功，而且會根本窒息任何文藝的真誠活動。這樣辦，於革命並無一利，於文藝卻有百害。那末史大林為什麼要行之於前，毛澤東又要繼之於後呢？理由很簡單：官僚制度向文藝領域的延申與控制而已。

這裏還應該指出：由史大林與毛澤東們欽定的所謂「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其實只是「只許歌頌、不許批評」那個勒令的別名罷了。

不過說到這裏，史大林主義者與毛澤東思想者一定會提醒我們道：「現實主義方法是恩格斯首先提倡的；而且，在你前面一再引證而認為正確的《文學與革命》中，托洛次基不也是主張現實主義的嗎？」對，我們得解釋兩句。首先我們得清楚，不論恩格斯在《致哈克尼斯》的信中，或托洛次基在《文學與革命》中，他們之推重現實主義，都不是簡單指文學中某一特定的流派而言的。恩格斯說工人階級的一

切鬥爭「都是屬於歷史的，因而可以在現實主義的領域中要求一個地位」，其意義顯然是說：凡是符合於歷史發展進程的事物都可以而且都應該現實主義地表現出來。反過來，他認為，一部小說「如果能忠實地描寫現實的關係」，那末甚至不管作者的觀點如何，也會讓他看出歷史的真相，看出社會發展的正確趨勢，並且完成很好的藝術作品。這裏恩格斯主要是在應用哲學唯物論的認識方法到文藝領域中，他不曾排斥文藝中的其他創造方法，更不曾給現實主義方法謀取唯一獨尊的地位。在《文學與革命》中，托洛次基把這層意思說得非常清楚。他如何在寬廣的哲學意義而非文學派別的狹隘意義中，說「新藝術將是現實主義」的。我們已經在前面充分介紹過，這裏不再重複。

總之，恩格斯與托洛次基所竭力推薦的現實主義，決不是想在文藝創作的形式上限制或縮小文藝家們的「廣闊天地」。它們只是以社會主義的革命家資格，以文藝批評家的資格，指出了認識世界與認識人生方面的現實主義態度對於文藝活動家們的極端重要性，卻完全不以為現實主義乃是文藝創作唯一可行的、或唯一准許的方法。

這和史大林毛澤東將現實主義當作文藝創作的唯一方法，以決議昭告天下，咸令遵守，違者有罪的做法，根本是兩回事。何況，史大林毛澤東將所謂「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僅僅解釋為文藝對於政策的追隨、僅僅解釋為對於「最高領袖」的歌頌，僅僅解釋為對共黨政權下一切舉措之最淺薄無聊的宣揚，這和恩格斯所說的「忠實地描寫現實的關係」，非但不符，而且是正相反對的。因為這樣的追隨、歌頌和宣揚最不忠實，往往最為虛偽，因而是最非現實主義的。

只有一方面堅持「新的藝術家反而需要以往演變完成了的一切方法，並且需要一些補充的方法，以便把握新的生活」，同時另一方面提倡文藝家去學習和把握一般哲學意義上以及特殊的人生哲學意義上的現

實主義態度——才能促進而非妨礙文藝家的創造，才能既使文藝為革命服務，又使文藝創作的「廣闊天地」得到保證。

不然的話，如此這般的規定只能窒息任何文藝創造的生機，更壞的，只能成為宗派鬥爭的武器，成為某些得勢文人坑害敵對文人的陷阱。

胡風們曾經拿了這個武器去攻擊「浪漫主義」的郭沫若一夥。反過來，後者則在「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相結合」這面大旗之下，對業已落井的「胡風集團」下石^[9]。一種文藝創作上的形式或方法，竟然變成譏諷乃至羅織對手的罪名，這當然違反了列寧的立場，也決非首先推重現實主義的恩格斯和托洛次基所能料及的。

* * *

談到這裏，有兩個問題很自然地會在人們心中發生：毛澤東的文藝思想是否僅僅起了負的作用？在它的控制之下，二十餘年來，中共在文藝方面是否從來沒有過值得稱道的任何收穫？

下面是這兩個問題的簡短回答：

我們說過，毛澤東的文藝思想基本上承襲自史大林，但仍然有一小部分屬於他自己的。那個極大部分起的作用屬於負數；可是這個小部分卻不失為一個正數。這裏的所謂極大部分與小部分，也就是結合在他思想的任何領域中的所謂國際因素與民族因素，亦即所謂「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民族特點。如我們在以前諸章中所述，在許多領域中，毛澤東在民族特點方面的發揮，總是比「普遍真理」的運用上要高明得多，甚至還正確得多。這裏最主要的一個道理，乃是在於毛澤東所學到的「普遍真理」，實質上與主要是史大林主義而非馬列主

義。因之，如上所述，凡毛澤東獨出心裁的地方有時反能有利革命，抑且走向勝利，而照抄了史大林辦法的時候則或者失敗，或者有所成功而傾向反動。情形在黨、政、軍方面如此，在文藝方面尤然。

毛澤東文藝思想中「普遍真理」如何為害了乃至如何可能為害中國的文藝創造，前面已經充分講過，不贅述，這裏得談談他文藝思想中的民族特點。

批評地肯定傳統文化，提倡民族形式，推重民間藝術，這些，雖然不能完全記在毛澤東的功勞簿上，但總是與他的思想分不開的。中國早期的共產黨人都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健將。五四運動在「反對舊禮教」與「打倒孔家店」的旗幟之下，曾經企圖用「全盤歐化」來建立新文化。他們不加選擇地崇拜和介紹西方資產階級的文化，同時不分青紅皂白地排斥中國文化的遺產^[10]。等到五四運動的領袖們發生分化，向左的一群接受了馬克思派的共產主義，並且組織共產黨，決心把中國實行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大改造時，他們——這些早期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人，對中國的文化傳統仍舊採取着根本否定態度（何以如此，也不在此討論）。因此，自從中國共產黨成立（1921年）直至中國第二次革命失敗（1927年），共產黨和共產主義，對於中國大多數的群眾說來，始終是外來的東西，始終不曾在中國廣大土地上生根，因而也難於結果。這情形在政治和社會的意義上是如此，在文化的意義上也是如此。革命失敗，部分的革命群眾勢力被迫深入到廣大的農民區域，深入到真正的中國去。那時，一方面由於客觀環境的逼迫，另一方面由於主觀上求生存和求發展的需要，中國共產主義者不得不逐漸放棄其「假洋鬼子」的思想和作風，不得不對中國固有的文化作深刻的認識和廣泛的適應。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開始民族化了，農民化了。因此也更為群眾化了，在中國的社會中紮下了比較堅實的

根。這個過程給中國共產黨帶來了怎樣的好處和壞處；它對中國革命的勝利起了怎樣的作用，毛澤東在這個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究竟有多大……這些問題，我們在本書其他適當地方論列過了，這裏不贅；我們在這裏須得指出的，只是：在這個過程中，毛澤東憑了他過去的教養和性格，曾經非常合適地，甚至相當出色地扮演了將史大林牌共產主義嫁接給中國固有文化的角色。關於這方面，我們覺得毛澤東的下面兩段話值得徵引一下。其一：

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歷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對於這些，我們還是小學生。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見1938年10月發表的《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

其二：

所謂「全盤西化」的主張，乃是一種錯誤的觀點。形式主義地吸收外國的東西，在中國過去是吃過大虧的。中國共產主義者對於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應用也是這樣，必須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完全地恰當地統一起來，就是說，和民族的特點相結合，經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處，決不能主觀地公式地應用它。（見1940年1月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

這兩段言論所代表的態度，對於整個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國化固然有幫助，對於中國新文藝之民族化卻有更直接影響。五四以來，在語法、體裁乃至題材與思想上都以西方為師、竭力向外國摹擬的新文

藝，在三十年代末與四十年代的延安，確實讓人看到了某些不同以往的新氣象，首先是小說，其次是詩歌，戲劇與音樂，都產生了一些土生土長的、內容上超出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感情的、讀起來順口，聽起來熟悉的文藝作品和音樂作品。這些作品以農村的階級鬥爭為主要題材，大致採取着中國文藝的傳統形式，應用着民眾的口頭活言語，或採用了民間流行的老曲調，在這樣的基礎上加工與提高，其成就是不容否認的，同時，這點成就與毛澤東思想中的民族化主張有關，也是明顯的事實。

自從中共在內戰中勝利，建立起全國政權以後，新文藝方面的這一種民族化趨勢，不但繼續着，而且加強了。它被規定在「推陳出新，百花齊放」的口號中。不管這個口號後來與「百家爭鳴」聯繫起來之時曾經變成了騙人的圈套；但是在文藝領域中，它無疑是起了進步作用的。特別在戲劇、舞蹈、音樂、繪畫等方面，它確實盡了些起死回生的作用，做了些改舊創新的工作，它確曾相當刺激起群眾的創造努力，大大提高了那些部門內的數量和質量。

但是不幸得很，上述種種成就，還只在初見端倪的時候，卻很快被毛澤東文藝思想中的另一個因素，即繼承自史大林主義的那個毒素所抵消了，甚至被以壓倒的優勢摧殘了。文藝必須為政治口號服務，它必須成為這些口號的文學上與藝術上的表現，結果便把文藝因民族化及群眾化而獲得的若干生機窒息了。

瘋狂的領袖膜拜制度，又來完成了這個窒息過程。原本在「政治任務」追迫之下奔波得氣盡力竭的新文藝，再給它戴上那副「唯毛是頌」的鐐銬之後，終於就一蹶不振，整個倒下了。

* * *

談完了毛澤東的文藝政策，最後還得談一談毛澤東本人的文藝作品。這位中共領袖賦有文學才能，並且對中國的古老文藝有相當修養，那是無可爭辯的事實。這一點，便是台灣方面的文化小卒，那些千方百計想貶損毛氏的「專家們」，也不得不默予承認的。

其實，非凡的遭遇總能產生非凡的感情，而「情動則言形」，這個非凡的感情又常能產生動人的詩歌。劉項原來不讀書，但是一則榮歸故里，一則兵敗垓下，卻都自然地給我們留下了「大風」之歌與「拔山」之詞。然則，自來文宗昌黎，詞追蘇辛的毛澤東，當他功成業就，志得意滿的時候，又怎能不寫出些壯麗激昂的詩篇來呢？

毛氏詩詞，沒有疑問，將來一定也會像漢高祖酒酣擊筑所歌的篇什一樣，可以傳之永久。

至於它們從中國舊體詩詞的技巧標準上看，究竟其成就達到了什麼程度，那末筆者既沒有批評資格，又覺得沒有批評必要。同時這方面早已出了專業人材，有郭沫若在那裏作只此一家的詮釋和無以復加的讚揚，我們更不必多所辭費。

我們從毛澤東詩詞裏所感到興趣的有如下兩點：第一，毛澤東的文藝作品否定了他自己的文藝政策；第二，他的詩詞比他的文章更好地表明了毛澤東思想。

在延安的文藝講話中，毛澤東提出了兩個中心問題：（1）為誰服務？（2）怎樣服務？對於第一個問題的解答是：革命文藝應該為工農大眾服務，「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服務」。對於第二個問題的解答是：文藝工作的首要任務應着眼於通俗和普及，給工農兵大眾「雪中送炭」，然後再在這個基礎上設法提高，「錦上添花」。毛澤東對這兩

個問題的提出與解答，在基本上都是正確的，特別是為革命利益所需要的。但正如我們前面所指出，如果以為這是唯一可能的革命文藝，甚至是唯一可能的文藝，除此以外，一概都被斥為「非無產階級文藝」，非革命文藝，因而必須打倒，那就將文藝創作活動僅僅限於文工團的活動，未免把文藝的範圍劃得太小了，把文藝創作的能事看得太低了。結果，是會窒息文藝，會殺害文藝的。理由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此地我們只想以毛氏本人的作品，反觀一下上述道理。

毛澤東迄今發表的 37 首舊體詩詞，據郭沫若的推薦，已「使中國的文學寶庫增加了無比的財富」。（見《紅旗》：〈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我們自不必同意這位毛詩權威詮釋者的評價；但我們仍願承認，這些詩詞是優秀的文藝作品。我們也真誠地喜悅，看見中國漫長的文學史上增加了幾首傳誦的詩篇。不過有一點使我們大惑不解的，乃是這些詩詞如何能夠與毛澤東自己提出的那兩個立場相調和。同時這樣顯然不是「為大眾」和「謀通俗」的文藝，即屬於毛氏自己所說的「只為少數人所偏愛而為多數人所不需要」的作品，為什麼「硬要拿來上市，拿來向群眾宣傳」（引號中的文字，均引自《講話》）；不但此也，在「上市」和「宣傳」的時候，竟是以強大無比的聲勢，以比登載中共最重要政治決議更顯著的地位，並且以同樣方式登載於全國所有報刊之上，——如此做法，是否也為毛氏自己所斥，有「不但侮辱群眾，也太無自知之明」呢？

我們不想拿毛澤東本人之矛，攻他自己之盾。我們也不想從擴大到荒謬程度的詩詞宣傳中，再論建立毛澤東領袖崇拜制度的反動用意。談文藝時只談文藝，我們卻願意指出：毛澤東這幾批詩詞的發表，恰好證明了將文藝活動僅僅限制於文工團的活動，是如何的偏頗。當然，有人可以強辯說：「詩詞」的題材都是有關工農兵，特別是

首首都與革命有關的；所以它們是「間接」地為「千千萬萬人服務」。就算這樣吧。那它們又怎能符合於通俗要求呢？為了一首《送瘟神》的詩義的詮釋，臧克家與郭沫若有異，沈尹默則又和他們二人不同。臧、郭、沈三人，既不是「只能欣賞低級文藝的」「工農兵」，也不是只能欣賞普通高級文藝的幹部，他們是成了名的詩人詞家，是此道中的內行；但毛詩到了他們手中尚且了解不一，遑論群眾？如果這些詩詞不是出於毛澤東之手，而是別個作家所寫的，試問，倘若繩以《講話》中的標準，有不被斥為「謬種」，因而遭到圍剿予以禁絕的嗎？

幸而這是主席所作，於是乎，在大眾與通俗文藝之外就別開一格，並從而出版之，流傳之，無所不用其極地頌揚之，「使中國的文學寶庫中增加了無比的財富」。

斯雖毛氏文藝政策之不幸，卻是「中國文學」之大幸也。

或者，毛澤東可以這樣為自己辯護的：我不是文藝工作者，我作詩作詞，原只為了發泄自己的感情感想，所以不計對象，不計形式。我只用了我自小學到的一點形式，滿足我的創作要求。我原不想拿去上市的，就是怕「謬種流傳」。等到《詩刊》一定要拿它們去發表的時候，我也曾特別聲明：「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為這種體裁束縛思想，又不易學。」

這番話，毛澤東或他的辯護者一定會說的。我們承認說得有理，談得非常對。但是我們要請問：不計對象，不計形式，只為了發泄自己的感情感想而寫點文藝東西，這權利是否為毛澤東所專有？如果不是，那末其他專業的或業餘的文藝工作者們為什麼不可以同樣做？為什麼他們一做便是「侮辱民眾」與「沒有自知之明」呢？這不是只准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嗎？

「我說過『詩當然應以新詩為主體』，只因我自小學就的是謬種，做不來新詩，如果勉強做，一定做不好。」——這也可能是毛澤東的辯解，同時我們也認為這個辯解有理，說得非常對；但是我們要請問：除了毛澤東之外的專業或非專業的文藝工作者，難道他們自己就沒有「自小學就」的本領（順便說一下：自小學就的本領與自小獲得的感情感想，常是一個文藝家決定性的條件），難道他們便不會受各自特殊情況的限制，而可以隨便依照黨的指示（不論形式與內容），可以毫不勉強地創造出好的文藝作品來嗎？

由此可見，毛澤東本人的文藝創作情形，非常突出地證明了：如果不給作家「保證個人創造與個人愛好的廣闊天地」，「螺絲釘」式的文藝政策乃是任何文藝創造活動的劊子手。如果有位文藝官將這些戒律硬叫毛澤東遵守，不許他採用那些連高級知識分子都不熟習的文學形式，不許他搬弄那些屬於「封建主義」的帝王將相，更不讓他拉扯到屬於「神怪迷信」的吳剛、嫦娥，只准他用大眾化的口頭白話，寫些現實主義的工農兵生活，那還能有這些「無比的文學財富」嗎？很顯然，毛澤東的詩詞乃是毛澤東文藝政策的直接否定，同時也是它無情的諷刺。

至於他口稱「不宜提倡」而偏偏大事宣揚，斥為「謬種」而廣為「流傳」；那不過屬於個人崇拜制度下面必有的「侮辱人」的怪現象。它屬於陳舊政治的權術範疇，不屬於文藝，甚至不屬於道德範疇，不必在這裏論列了。

* * *

詩言志，歌詠懷，散文長於說理。所以詩歌情真，文章矯飾。在散文裏，在論說體的文字裏，固然仍須有作者在，仍舊能讓人看出個

別作者的個別風格；但若比之於詩歌，這種主觀性總要差得多，隱得多，間接得多。詩歌不一定全是主觀的，尤其屬於史詩一類的作品，詩人的自我也不是無所不在的，但是在抒情詩中，在詠懷詩中，卻主要與首先總是把作者的感情感想呈現出來。

中國歷來的詩歌最大多數是抒情體，毛澤東的幾首詩詞尤其如此。因此，我們如果在毛澤東的文章裏看不到毛澤東這個人，那末在他的詩詞裏卻完全可以滿足我們的要求。

讀毛氏詩詞，呈現在我們心目中的那位作者的形象，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和一個現代馬列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者聯繫到一起。甚至，連孫中山式的近代人都似乎想不起來。能從那些美麗鏗鏘的語言中喚起來的，好像總只能是秦皇、漢武、唐宗、魏武；最摩登的，也只能讓人想到太平天國的洪秀全、或石達開。何以會這樣的呢？那隻盛酒的舊瓶子當然是一個原因。內容與形式是不能截然分開的。中國的舊詩詞，特別是詞這個形式，彷彿已經給作者們規定了內容：不是風花雪月，兒女柔情；便是劍酒鼓角，壯士悲懷。此外的物和情，好像就不適於表達，抑且難於表達了。近代的、比較複雜的思想感情固然裝不進去，就是平民化的、不屬於英雄豪傑或才子佳人的情操志趣，都和它格格不入。當然，有才氣的人可以「推陳出新」，「古為今用」，可以在這隻舊瓶子裏裝新酒；但是即使如此，也不是無需代價的。新的內容要想裝得進去，總必須改頭換面，甚至脫胎換骨，弄得面目全非，才能兩相適應，叫人看來順眼。

舊詩詞體裁之所以成為「謬種」，新體詩之所以成為「主體」，其故即在於為要歌詠新人新事，為要發泄新感想新感情，必須借助於新形式了；否則，新內容必然受舊形式的影響。

毛澤東詩詞叫人讀了只能想起古人古事，想不起今人今事；只能叫人看見帝王將相，看見才子佳人，卻看不見百姓萬民，看不見庸夫愚婦——在不小程度內，我想是舊體詩詞的形式有以促成的。不過，更重要的原因卻總在於內容，在於毛澤東本人的思想，他本人的志向、他本人的感情。

這裏，主要是內容尋求着形式的。

如果毛澤東不擅作舊體詩詞，那我們簡直可以肯定說，他的感情抱負多半不可能記錄下來；因為在近體白話詩歌的形式中，毛澤東詩詞中所表達了的東西，便會顯得非常不合適，會顯得極端的不協調了。

正因為毛澤東懷抱的是帝王思想與英雄主義，所以才選取了最適於表現那種思想和主義的舊詩詞形式。這裏表裏相符，形式與內容二者相得益彰。

前面，在專門的一章裏，我們曾經研究過毛澤東的思想來源及其組成成分。其中我們指出了馬克思主義（主要是由史大林竄改與修正了的）只佔了毛澤東思想來源的三分之一，其餘的三分之二是儒家思想與游俠精神。我們又指出過，這三種成分並非平均配搭，亦非同時拼成的，其間有深淺，有先後；後二者顯然還是毛氏思想中的先入之見，因此在「靈魂」和意識的最深之處紮了根的。它們是進入了潛意識的東西，因之是半先天的，類乎本能性的東西。至於那在毛氏 27 歲上才開始攝取的馬克思主義，雖然變成了毛澤東思想中最有力的成分，但始終還是有意識的、不是最純熟的，一不小心便會走樣，時時會讓另二種成分捉住後腿的。

文藝創作的特殊性，正如我們在本章前面所說，其中非常重要的兩項是：感情的多於理智的；潛意識的多於有意識的。因此，儘管在毛澤東政論文章中充滿了馬列主義；儘管毛澤東在文藝講話中號召小資產階級出身的文藝作家要站穩工農立場，要改變自己的思想感情；儘管毛澤東還舉出了自己的例子，說明他已經徹底完成了「感情變化」，已從頭完成了思想改造；但是當他一進到文藝創作的範圍，一從事於詩詞的寫作。那真是鬼使神差，不由自主，毛澤東思想中清醒時候佔上風的三分之一不見了，那平時受着壓抑，潛伏心底的三分之二卻大肆活動起來。在抽象美麗的文字下面，在生僻古奧的典故下面，在現成詞句的引誘下面，毛澤東不僅欺蒙着讀者，甚至還欺蒙着自己，把一些與無產階級革命的民主精神及群眾精神根本對立的感情，極其鮮明地發泄出來了。

從毛澤東的詩詞裏，我們看見的確實不是一個「靈魂深處的小資產階級的王國」（毛氏《講話》中語），而是封建時代士大夫階級的帝國。我們在那裏當然看不見「工農兵的知心朋友」，看不見一個與工農兵感情上完全同化了的革命者；卻看見了一個倚天抽寶劍，挽弓射大雕，同時又文采風流，為江山折腰的霸王雄主。文藝誠然是離不開誇大的。我們更不以為浪漫主義的幻想手法絕對與革命文藝對立。但誇大中可以看見真實，浪漫的幻想其實反映着不浪漫的願望，如果真是一個思想感情徹底解除了陳腐包袱的革命者，率領着一支工農革命的軍隊，在與反動派久經戰鬥之後，終於來到了河套外，長城邊，眼見「北國風光，千里冰封，……山舞銀蛇，原馳臘象」，當然也會和毛澤東一樣「發思古之幽情」，大吐一下胸中的壯志；但是，他首先想到的卻多半會和毛澤東大不相同的。他多半會悼念那無數萬拋妻子、離故鄉、被牛馬似的驅策到這裏來服役的可憐的「黔首」們。他多半會同

情那些敢於違抗焚書令，因而頭上給刺上了字、被充軍到此地來日夜修築長城的士子們。至少，他多半會想起「適戍漁陽」，揭竿而起的貧僱農陳勝、吳廣們的吧。因為這樣才算得上「站穩工農立場」，這樣才真的是處處從階級同情出發，這樣才配稱為痛恨一切壓迫與剝削的革命態度。緬懷往昔，思考當前，本質上不可能出之於兩種感情。如果有人將列寧和過去的沙皇相比，他一定要當作莫大的侮辱；對自己，他當然連一秒鐘都不會作此種荒唐想法的。自從馬、恩以下，所有徹底真誠的社會主義革命者，無一不以能和古之「叛逆者」等同為榮，無一不深惡痛疾古之「壓迫者」，有如身受其害一般。

可是毛澤東怎麼樣呢？他站在這座古代勞苦人民和知識分子的最大血淚紀念碑旁邊，首先想起了打江山的「英雄」們，想起了「秦王」、「漢武」。他想起他們不是為了他們的罪惡，而是為了他們的功業。他想起他們不是為的要批判他們，而是要拿他們來和自己相比。相形之下，覺得他們功業雖盛，但可惜「略輸文采」。然後面對這多嬌江山，他又按次想到了為此折腰終於成功的三位開國大皇帝：「唐宗、宋祖，成吉思汗」。想到了又作對比，結果是其中二位「稍遜風騷」，另一位有勇無謀，不足掛齒。他們根本不是毛澤東的對手。因此，「數風流人物」，畢竟要讓能文能武，智勇兼備的今朝的開國之君了。

試問，這是什麼感情？這是什麼感想？這是什麼思想？

有好些文學侍臣，為的想替毛澤東掩飾表現在這裏的太過明顯的帝王思想，就硬說「風流人物」乃指「今天覺醒起來的工農大眾而言」，那真是不知所云，欲蓋彌彰。

其實，毛澤東的帝王思想並不只表現在《沁園春·雪》裏。有形無形，它幾乎散見於所有的詩詞中。譬如，在北戴河避暑，他就想起

了當年曹操在此地「揮鞭」；又譬如當一位詩友想回故鄉養息，他便想起了漢光武的老友嚴子陵的故事，叫他別回富春江去釣魚。在這些地方，一部分雖然由於舊體詩詞的限制，所謂「活人讓死了的給捉住了」。可是較大部分，卻總因為作者的感情和思想使然，以致一到情景湊合，便不期而然地流露了出來。

「我志未酬民亦苦，東南到處有啼痕」，這詩句不管是否是石達開寫的，但它總相當好地表達了一個革命領袖——自然是社會主義革命以前的革命領袖——的悲憫心懷。自古奮起民間，率先倡義的英雄豪傑們，不用說都懷有雄心壯志；但因為各人的性格不同，處境不同，在這種雄心壯志後面，多少可以看出兩種「發動力」，一種是為人的，大公的，即對於苦難者與受壓迫者的同情；另一種則是為己的，自私的，即個人對於富貴榮華的追求。劉季遊咸陽，遂見秦始皇的威風闊綽，於是就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是也！」項羽在會稽，看到同樣情形，也發了同樣感慨，曰：「彼可取而代也」！劉項不是文人，說話直截痛快，他們毫不掩飾地把心裏的話說出來了。其實，歷朝那些開國之君，以及每當末造在各地崛起的豪傑們，其中大多數人的動機幾乎是莫不如此的。他們往往打着「為民除暴」、「替天行道」的旗幟，但這些都是宣傳，是幌子，是藉此博取廣大起義農民擁護的；等到他們功業成就，總是原形畢露，一味在權勢威儀、窮奢極欲的個人享受上去超越被他們打倒了的暴君。這種歷史循環，其決定性的原因，不用說，在於社會經濟的長期停滯，在於現代無產階級出世以前各個被壓迫階級的性質。領袖們的個人意志在這裏是起着極小作用的；不過最小也不等於零，我們仍不妨從各個起義英雄的言行上看出兩種心腸。我們仍能看出他們的賢抑不肖，正好像我們能看出他們的智或愚一樣。

「仁政」與「我入地獄」精神，其本身自是崇高理想。不過在人類過去的歷史上，因為階級社會的客觀條件使然，這種理想不是做了暴君們欺人的幌子和面具，便成了庸君們被人所欺的可笑話柄。為了不忍見民眾陷於水深火熱中而揭竿起義的英雄，他們的悲憫襟懷，常常變成他們悲劇性失敗的原因。或者，為客觀事變的邏輯所迫，他們的初衷逐漸改變。逐漸拋棄，與無情的現實相妥協；終於以放棄對苦難者的同情為代價，換取了帝業的成功。

過去確是如此的；但無產階級革命的新時代卻根本改變了這個情形。因為它造成了客觀條件，使根本消滅人類苦難的理想有可能實現，使領袖們任何偉大的悲憫心懷有可能實現。

有一種見解，認為「仁愛」與「慈悲」，根本與無產階級或社會主義革命不相容。它認為，這些都是過去統治階級用來麻醉與欺騙被壓迫與被剝削階級的符咒。所以它主張，馬克思主義者應以仇恨和無情來代替那些迷人的毒藥。這個見解，我覺得只對了一半。在劃分了階級的社會裏，不用說，什麼道德都是蓋上了階級記印的。不曾有過超階級的仁愛，也不曾有過超階級的慈悲。在階級鬥爭中，特別當它發展到激烈的時候，誰主張反抗的奴隸應該以仁愛對付壓迫者，以慈悲對付垂敗或已敗的敵人，當然是最值得鄙視的說教者，是最可恥的叛徒。在這種情形中，社會主義的革命者，乃至一切性質革命的革命者，其首要的與最神聖的責任當然是要喚起和提高被壓迫與被欺騙階級的階級仇恨，要號召他們，並且堅決地組織他們，以便進行以牙還牙，「針鋒相對」，絕對無情的反抗和革命；以便「徹底、乾淨、漂亮」地打敗階級敵人，摧毀他們的反動力量，使他們不能再度起來為害革命。

在這個意義上說無產階級革命者應該用仇恨和無情來反對「仁愛」與「慈悲」是完全對的。但這與我們前面所說的「為人的、大公的、即對於苦難者與受壓迫者的同情」，根本不是一回事。向壓迫者乞求慈悲，對被壓迫者實行仁愛是一回事，這是徹底荒謬與反動的一回事。對被壓迫者表示同情，以悲憫心懷去喚醒群眾對壓迫者的仇恨，參加他們反對壓迫者的鬥爭，幫助他們去組織鬥爭，領導他們去完成鬥爭，這卻是另一回事，是完全符合於革命利益的一回事。後一回事並不與堅決的階級鬥爭相矛盾，而只是與群眾領袖們的個人野心相對立。對被壓迫者的深厚悲憫，非但不會減少對壓迫者的強烈憤恨，反而是加深這種憤恨的。古來革命領袖，多數不是原來屬於革命階級的人，他們大多是統治階級或半統治階級中的優秀分子，他們之所以「叛變」自己的階級，投向敵對階級裏去領導革命，總是一半由於看不慣同階級人物的荒淫無恥，另一半則由於同情被壓迫階級的悲慘無告。民主革命的領袖姑且不論，烏托邦社會主義的大師們也不必去談，就是拿科學社會主義的二位奠基人來看吧，他們的情形也是如此的。誰若以為馬克思恩格斯只憑着冷靜的理解，單單憑着科學的分析，一絲感情不動，即全無愛憎地，達到了資本主義必倒，社會主義必興的結論，並且發出了進行無產階級革命以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的號召，那是大大錯誤的。《資本論》是一本嚴格科學的大著。在這裏，馬克思用了解剖刀，用了顯微鏡，把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及與其相應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當作自然過程，加以考察、分析、和批判。這是絕對冷靜的、客觀的、不滲雜半點主觀情緒的。但是你如果讀讀《資本論》卷一的第二十三和第二十四兩章，即關於《資本主義蓄積的一般法則》與《所謂原始蓄積》這兩章吧，雖然仍是嚴格的科學，仍是無情的解剖；但那是怎樣的嚴格與無情呀！在這裏，馬克思這個科學家對於他所研究的對象，完全不是無動於衷的，完全不是冷靜得殘酷的。恰好

相反，讀者在那些無情與客觀的材料和記載下面，感覺到了一種極度強烈的愛憎，感覺到了作者對於榨取者的無限憤慨，對於被剝削者的無限同情，對於資本主義辯護士們的徹底揭露，以及對於這一制度的說教者們的辛辣嘲笑。資本主義的社會分成兩極：「一極是財富的蓄積，另外一極是窮困、勞動痛苦、奴隸狀態，無知、兇暴及道德墮落等等的蓄積。」這個情形，馬克思不但用科學家的準確性指示出來，而且用藝術家的非凡的感染性，用了滿腔悲憤描繪出來的。他斥責那些「冷血的資產階級空論家」，有如特·托拉西門的「殘忍」，這些人心安理得地指出「富國的人民一般都貧窮的」，彷彿這是「自然法則」，是「理所當然」。馬克思對於「自從出世以來，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滲透着血和污物」的資本，對於這些「血和污物」的敘述，是如此地不「心平氣和」，是如此地充滿了感情，因之竟可以說它是一首關於工農業勞動者悲苦貧窮的偉大史詩。在這方面，它簡直是超越了同時代英國那些「人道主義」的作家們的。

人們在這裏，在這個意義上，那是有完全的權利說：馬克思也是「從愛出發的」，以深厚的「人道主義」作根底的，是以「悲憫心懷」作發動力的。

可是在毛澤東的詩詞中，我們卻看不見這種心懷。詩篇中充滿了雄心壯志，但無法讓人看到悲憫的根底；這裏面多的是慷慨激昂，多的是英雄氣概；卻完全缺少了人溺己溺的博大精神，更談不上己達達人的利他主義。英雄壯志，如果不受着悲憫情懷的拘束，終於要變成個人野心的。「縛蒼龍」，「驅虎豹」，鬧它個「天翻地覆」，讓「日月換上新天」，壯志誠然凌雲，豪氣可吞山河；但若腳底下沒有那點子平民民主精神，心坎裏沒有一些兒為人為公的打算，那末充其量不過是「以野蠻對付野蠻」的所謂開明暴君，或者「以百姓為芻狗」的所謂聖人

罷了。這樣的「聖人」，郭沫若已經非常乖覺地從秦始皇、曹操、武則天等人的身上給發現出來，並且聰明地影射到「領袖」身上了。看來，毛澤東還是樂意接受這個道統的。

可是這樣的聖人，絕不應該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領袖。他和社會主義的基本精神差得太遠了。

注釋

1. 指 1905 年 10 月的全俄政治罷工——王凡西。
2. 文學事業的創造任務——王凡西。
3. 列寧在《論無產階級文化》決議草案中寫道：「全俄無產階級文化協會代表大會堅持這一原則觀點。非常堅決地反對一切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實踐上是危險的企圖：捏造自己的特殊的文化，把自己關在與世隔絕的組織中……」（《全集》卅一卷）
4. 以上凡用引號引出的文字，均係《文學與革命》中的原句。
5. 毛澤東在《講話》中沒有提到「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這乃因《講話》發表的時候，中國革命正處於「新民主主義」階段之故，不過在基本精神上，也是發揮了這個精神的，只是不指名罷了。
6. 革命者注意到文藝這件武器乃是非常近代的事。像中共那樣大規模地與系統地組織文工團，使文藝活動與軍事政治的革命鬥爭緊密地聯繫起來，則幾乎可以說是空前的。俄國十月革命以後的國內戰爭中，雖然也有一些文藝隊伍在戰地甚至在前線服務，但在規模上根本不能與中共的文工團相比。文藝活動如此這般地被做成革命機器與戰爭的「螺絲釘」，大致是從蘇聯的史大林時代開始的，它和黨部絕對控制文藝活動的制度同時實現。

過去革命對文藝所採取的態度，不是冷淡，便是仇視。其中最有趣的要算英國十七世紀的清教徒革命了。那次革命一勝利，倫敦的所有戲院全給封閉。1642年，革命政府還發佈了命令：一切優伶均應依照懲處流氓法條治罪。這些戲院，一直要到查理第二登位才得重開，中間停演了十八年之久。

不過革命黨沒有組織「文藝大軍」，並不妨礙革命的新精神產生出好的或偉大的文藝家和文藝作品來。清教徒如此敵視文藝，卻擁有了偉大的革命歌手——密爾頓，使他產生了偉大的詩篇：《失樂園》等。

革命黨人在不同時代對文藝曾經採取過種種不同的態度這一個歷史事實，如果要解釋，那是要從多方面來解釋的。不過我們這裏不想跑這趟野馬；除了指出這個事實之外，我們只想借它來證明一個道理，「有心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陰」——革命黨與文藝的關係就是如此。

7. 偉大的作家永遠是時代的代言人。這事實意味着一個文藝方面的天才不是脫離了與他們共同生息的群眾而憑空產生的。他的創作激情與藝術思想也不屬於他個人的。但這絕不等於說藝術創作必須是集體的。
8. 王明系統在中共內部的最後失敗，不妨以1941年1月間新四軍事件為標誌，因為王明等曾經企圖拉攏項英等人，以為黨內復起的資本的。
9. 毛澤東自己始終不曾談到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這個問題。不過，從我們前面引徵過的那段有關必須破壞的種種不好創作情緒的話來看，他自然是完全贊成這個主義的。因此中共的文藝理論家們，從胡風起一直到周揚，自來都高舉了這面大旗，在文藝的王國裏東征西討，攻擊異己。後來毛澤東「出其餘緒」在文藝中也來獻上一手時，卻使這些舞弄大旗的人們狼狽萬分了。因為毛氏詩詞中特別在《蝶戀花》中，應用了不現實的神話典故，浪漫主義的氣息非常之濃，這跟文藝官們平素宣揚的現實主義——至少跟他們對此主義所作解釋，成了鮮明的對立。此時，過去曾經中過幾枝現實主義冷箭的郭沫若卻興高采烈了。他說他「個人特別感着心情舒暢」，因為「毛澤東同志詩詞的發表把浪漫主義精神高度地鼓舞了起來，使浪漫主義恢復了名譽。比如我自己，在目前就敢於坦白地承認：我是一個浪漫主義者了。這是三十年從事文藝工作以來所沒有的心情。」輕鬆之餘，郭沫若接着還乘機報復，說道：「如果我們要重新編寫『五四』以來的中國文藝發展史，我認為我們應該採取科學的方法來正視現實，像胡風、馮雪峰等人所擺下的一套一手遮天，一手遮地的迷魂陣，是應徹底粉碎的了。」（見郭沫若《浪漫主義者和現實主義》，載1958年7月1日《紅旗》。）

這個小故事告訴了我們不少東西：(1) 文藝創作者的毛澤東首先違反了文藝政策制訂者的毛澤東，這一點我們在後面還要更詳細地談到；(2) 用黨和政府的權威去規定文藝創作方法，對作家發生了多麼可怕的影響：人們「不敢坦白承認」自己是屬於官定路線之反對方面的；(3) 當極權全能的領袖崇拜制度業已確立之後，那個最高領袖的個人時尚會如何影響着他下面的宗派鬥爭，尤其是如何影響文藝界各個宗派之間的鬥爭。

10. 這裏我們絲毫不想否定五四運動的偉大意義。在近代史上，落後國家中奮發圖強的先驅者，無一不主張徹底除舊與全盤更新的。這是歷史必然的幼稚現象，絕不貶損整個運動的進步性與革命性；唯此乃另一問題，不在我們討論之列。

十、自力更生與「一國共產主義」

毛澤東在任何一方面的理論，都是從行動中總結出來的。政治方面如此，經濟方面也是如此。所以要研究毛氏經濟思想發展的過程，得先清楚他經濟實踐的歷史。

毛氏一生的最大部分精力和時間，是消耗在軍事鬥爭中的。因此，他的軍事思想也就最為豐富，最有特色。在經濟問題上，毛澤東生平所耗的時間比較的少，比較的少得多。好像只在一兩年不長的時期中，他才是專門負責經濟指導工作的。因此他在這方面的思想紀錄也少得多。不過雖然少，雖然《選集》中只有將近十篇專談經濟的文字，它們的意義卻仍然是很大的。而且，這寥寥幾篇文章，卻已足夠讓我們看到毛澤東經濟工作的大致面貌。

毛澤東的經濟工作，以及他在工作中所採取的辦法和所形成的見解，我們約略可以分四個時期來談。它們是：(1) 蘇區草創時期；(2) 蘇區內的經濟建設時期；(3) 抗戰中的「自力更生」時期；(4) 全國勝利以後以迄目前這整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即蘇區草創時期，大致可以說起於1928年之初，迄於1931年之秋，為時三載餘。關於這個時期，特別是它的初期，舉凡

「蘇區」中的經濟實況，以及當政者所採取的對策，在毛澤東的文章裏有很好記錄。

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這篇文章（該文寫於1928年10月5日，即在「南昌起義」之後一年又二月）中，有如下一段話：

在白色勢力的四面包圍中，軍民日用必需品和現金的缺乏，成了極大的問題。一年以來，邊界政權割據的地區，因為敵人的嚴密封鎖，食鹽、布疋、藥材等日用必需品，無時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貴之中，因此引起工農小資產階級群眾和紅軍士兵群眾的生活的不安，有時真是到了極度。紅軍一面要打仗，一面又要籌餉。每日除糧食外的5分錢伙食費都感到缺乏，營養不足，病的甚多，醫院傷兵，其苦更甚。這種困難，在全國總政權沒有取得以前當然是不能免的，但是這種困難的比較地獲得解決，使生活比較地好一點，特別是紅軍的給養使之比較地充足一點，則是迫切地需要的。邊界黨如不能對經濟問題有一個適當的辦法，在敵人勢力的穩定還有一個比較長的期間的條件下，割據將要遇到很大的困難。這個經濟問題的相當的解決，實在值得每個黨員注意。

這段文字把紅色割據區域初期遭受經濟封鎖的情形，說得相當清楚。經濟問題的嚴重性，也顯然受到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們的應有注意。

在同期略後，即在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寫給當時中共中央的報告，即題名為《井崗山的鬥爭》的那篇文章中，對於這一方面，還有更詳盡的描寫。其中有一段文字如下：

日常生活壓迫，影響中間階級反水：紅區白區對抗，成為兩個敵國。因為敵人的嚴密封鎖和我們對小資產階級的處理失當這兩個原因，兩區幾乎完全斷絕貿易，食鹽、布匹、藥材等項日常必需品的缺乏和昂貴，木材、茶、油等農產品不能輸出，農民斷絕進款，影響及於一般人民。貧農階級比較尚能忍受此苦痛，中等階級到忍不住時，就投降豪紳階級。中國豪紳軍閥的分裂和戰爭若不是繼續進行的，全國革命形勢若不是向前發展的，則小塊地區的紅色割據，在經濟上將受到極大的壓迫，割據的長期存在將成問題。因為這種經濟壓迫，不但中等階級忍不住，工人貧農和紅軍亦恐將有耐不住之時。永新、寧岡兩縣沒有鹽吃，布匹、藥材完全斷絕，其他更不必說。現在鹽已有賣，但極貴。布匹、藥材仍然沒有。寧岡及永新西部、遂川北部（以上均目前割據地）出產最多的木材和茶、油，仍然運不出去。

這是關於一般的經濟困難的。在同一文件中，另有一處提到軍隊中的經濟困難，寫得更加具體，文如下：

湖南省委要我們注意士兵的物質生活，至少要比普通工農的生活好些。現在則相反，除糧食外，每天每人只有5分大洋的油鹽柴菜錢，還是難乎為繼。僅僅發油鹽柴菜錢，每月也需現洋萬元以上，全靠打土豪供給。現在全軍5,000人的冬衣，有了棉花，還缺少布。這樣冷了，許多士兵還是穿兩層單衣。好在苦慣了。而且什麼人都是一樣苦，從軍長到伙伕，糧食外一律吃5分錢的伙食。發零用錢，2角即一律2角，4角即一律4角。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麼人。

作戰一次，就有一批傷兵。由於營養不足、受凍和其他原因，官兵病的很多。醫院設在山上，用中西兩法治療，醫生藥品均缺。現在醫院中共有八百多人。湖南省委答應辦藥，至今不見送到。仍祈中央和兩省委送幾個西醫和一些碘片來。（見《井岡山的鬥爭》）

從上引幾段文字裏，我們大體上看到了紅色區域初期的經濟困難情形，看到它在國民黨經濟封鎖下所遭受到的極度痛苦。這種困難和痛苦，誠如毛澤東所說：假使沒有適當的對策，「割據將要遇到很大的困難」；「割據的長期存在將成問題」。其實毛澤東這裏說的還是故意以輕鬆口吻出之的（或者，此地的文字在事後修改過的），事實上，照那時的情形看，毛澤東統領下的軍隊已經到了餓死、凍死和病死的邊沿，如果沒有適當的辦法來改善，那末國民黨不需軍隊進攻，都可以叫割據完蛋的。

當時毛澤東他們採取了什麼辦法來渡過難關呢？從毛氏的著作中，我們只能找到這樣的一些：第一，是收稅，主要是收土地稅。但一因游擊政權的流動性太大，無法建立長期而穩固的稅收制度；二因大部分割據區域「都是山地，農民太苦，不好收稅」。所以同時採用了第二個辦法，即綁架土豪。據毛澤東在《井岡山的鬥爭》中告訴我們，當時「政府和赤衛隊用費，靠向白色區域打土豪。至於紅軍給養，米暫可從寧岡土地稅取得，錢亦完全靠打土豪。10月在遂川游擊，籌得萬餘元，可用一時，用完再講。」

所謂「打土豪」，亦即「綁財神」這個辦法，自然是權宜的。如果用以為取得現金的主要的與長期的辦法，那末這個軍隊未有不徹底墮落，變為土匪，而終被消滅的。中共沒有因此而墮落而被消滅，並

且還成長壯大起來，它當然還靠了其他辦法，靠了一些經濟性質的乃至非經濟性質的辦法。這些辦法中的最重要的一個，從毛氏的敘述中看，不能不數那種軍隊內部的民主主義。在同一報告中，關於這方面有如下一段有趣描寫：

紅軍的物質生活如此菲薄，戰鬥如此頻繁，仍能維持不敝，除黨的作用外，就是靠實行軍隊內的民主主義。官長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開會說話的自由，廢除煩瑣的禮節，經濟公開。士兵管理伙食，仍能從每日5分的油鹽柴菜錢中節餘一點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1]約得六七十文。這些辦法，士兵很滿意。

以上是紅軍草創時期的經濟問題，以及領導人如何應付這些問題的辦法。這些辦法當然不是毛澤東個人的創造，但因當時他是主要的政軍領袖，他直接處理問題，所以其責任不能不歸於毛氏。這些辦法本身是簡單的，中外古今的一切起義英雄，不管他們結果是功成為王，或終敗為寇，在初期客觀形勢的驅使下，都曾經採用過這些類似方法。毛澤東在這裏並無什麼發明。對經濟學家毛澤東這個資格，也不能因此而有所增益。

不過從這些措施中，我們仍不能不指出毛澤東所藉以表現的一些特性和長處。第一，他不會也不曾被經濟困難所嚇倒；第二，他絕非受傳統法律和道德觀念束縛的書生。有此需要時，他不會在任何「罪惡」之前卻步的，能夠取法土匪，「綁架財神」；第三，能夠將「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梁山泊精神，和原始共產主義的絕對平等和民主作風聯繫起來，藉以維繫軍心，鼓勵士氣。這三點，自然與經濟學或經濟學家並無關涉，但作為解決經濟極度困難的辦法，特別是作為一支革

命隊伍處於封鎖包圍之下賴以克服經濟絕境的手段，那末，它們就非常值得重視了。毛澤東（當然在這個名字後面還代表着不少人的）如果沒有這些特點和長處，或只具備了其中的一點或兩點，那末紅區割據的局面絕對地搞不成，毛澤東的天下也無從打起了。

毛澤東的這三個特點，這三個特點的成功發揮，對於他往後的經濟思想乃至一般思想，都發生了極大影響。關於這些，我們將在以後談到。

現在我們要談毛澤東從事經濟行政工作的第二個時期了。那是所謂「十年內戰的後期」，即指起自1931年年底，迄於1934年年底的這個時期。這個時期，我們知道，正是毛澤東最失意的幾年。在1932年8月中共中央的寧都會議上，毛澤東被史大林直接派遣的王明系統逐出了黨的領導和軍事領導，罪名是「右傾機會主義者」和「狹隘的經驗主義者」。他受打擊後究竟被派擔任任何項工作，在迄今我們所能看到的中共黨史中，並無明白說明^[2]，不過從《毛選》所收該時期中的文字推測，說他被派去負責蘇區內部的經濟工作，大概是不會錯的。在1930年1月5日以後，1935年12月27日以前，在這五個年頭中，《毛選》中只收錄了四篇文章，其中除了〈怎樣分析農村階級〉那篇提綱之外，三篇都是純粹關於經濟工作的。

所謂經濟工作，在當時的「蘇區」中，顯然不受重視的。正如毛澤東在《必須注意經濟工作》這篇演說中告訴我們，那時「各地政府的國民經濟部的組織還不健全，有些連部長還沒有找到，或者也只拿工作能力較差的人去湊數。」毛澤東被派去指導這項工作，顯然是被當作「工作能力較差的人」了。

不過從《選集》所載的現有三篇文章看，我們不但可以看出毛澤東在經濟問題上所表現的「工作能力」並不差，而且還能認識到毛澤東在這些問題上的某些特殊見解和想法，還能看到這些見解和想法是怎樣發生，怎樣形成的。

1933年前後贛南「蘇區」的經濟情形，比1928年前後，毛澤東在《井岡山的鬥爭》中所描寫者，自然已有很大不同。割據的區域大得多了（當時估計人口為300萬），軍隊和黨政幹部的人數也多得多了^[3]。幾年來，經濟問題當已不能用原始的應急的方法來解決，它必須樹立方針，建立系統，憑常規的課稅制度來保證收入，以切實的計劃來恢復乃至發展生產，而且採取積極的步驟來對付國民黨的封鎖，藉以安定區內的經濟生活，或至少緩和經濟「圍剿」所造成的民生痛苦。不過從毛澤東在1933年8月對江西南部十七縣經濟建設工作會議所作的演說看，當時「蘇區」，至少在他擔負指導工作之前，經濟問題的解決卻並未做出多大成績。譬如他說：

鹽很貴，有時買不到。穀子秋冬便宜，春夏又貴得利害。……

……每年大約有300萬擔穀子出口，300萬群眾中每人平均輸出一擔穀交換必需品進來，不會是更少的吧。這筆生意是什麼人做的？全是商人在做，商人在這中間進行了殘酷的剝削。去年萬安、泰和兩縣的農民5角錢一擔穀賣給商人，而商人運到贛州賣4塊錢一擔，賺去了7倍。又看300萬群眾每年要吃差不多900萬塊錢的鹽、要穿差不多600萬塊錢的布。這1,500萬元鹽布的進口，過去不消說都是商人在那裏做的，我們沒有去管過。商

人在這中間的剝削真是大得很。比如商人到梅縣買鹽，一塊錢7斤，運到我區，一塊錢12兩。這不是嚇死人的剝削嗎？……

還有，江西南部的許多土特產，例如鎢砂，樟腦，紙張，煙葉，夏布，薄荷油等等，因為戰爭和封鎖，有的根本停止了生產，有的雖有生產而運不出去，於是也不生產了。這對於「蘇區」經濟和財政的開源方面，都是大有影響的。

當時「蘇區」政府面對着這些困難，已經採取而由毛澤東強調宣佈，並督促其認真實行的，主要有下述三個辦法：(1) 普遍設立糧食調劑局；(2) 發展合作社運動；(3) 擴大與加強對外貿易工作。糧食調劑局的工作是「一方面要使我們的糧食，在紅色區域內由有餘的地方流通到不足的地方，不使有的地方成了堆，有的地方買不到，有的地方價格過低，有的地方價格又過高；一方面要把我區多餘的糧食，有計劃地（不是無限制地）運輸出口，不受奸商的中間剝削，從白區購買必需品進來。」合作社的主要目的在恢復與發展「蘇區」的手工業與工礦業，其次是幫助農業，這方面有如「組織犁牛合作社，動員一切無牛人家自動地合股買牛，共同使用。」至於對外貿易局，主要當然是要一方面擺脫商人的過分剝削，另一方面又要能打破敵人的封鎖。它的任務要把「紅區」中多餘的糧食及其土特產運到「白區」，換來日用必需品——主要是鹽和布。

上述辦法，當然是當時當地所能採取的，也是必須採取的經濟政策。它們是割據政權生死攸關的一些對策。這是因客觀形勢要求而提出這些對策的。幾乎每一個人，只要其地位與見識能關顧到該區全局的，都會想到它們，提出它們。因此，它們的創議權不能歸之於任何

一個人，也不能歸之於毛澤東。不過這些對策幾乎每一個高級幹部都能想出是一回事，把這些對策在實際上執行出來，而且要執行得好，卻是另一回事。在當年「蘇區」的實際情形中，後一回事自然比前一回事難能得多，可貴得多。這些辦法，如果在某一人的指導之下實行得好，那末，這個領導人當然有功可居的。我們自然無法知道當時這些辦法在毛澤東的指導下實行得如何。究竟從此時（1933年8月）及稍前一直到長征開始（1934年秋），「蘇區」經濟情況是改善了還是惡化了，我們現在也無資料可資判斷。據毛澤東自己在「江西南部十七縣經濟建設工作會議」上宣佈這些辦法之後五個月，在「第二次全國工農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我們的經濟政策》）中說：「蘇區」政府用以「衝破敵人的經濟封鎖的毒計」的「步驟，現在已着着勝利了」。他說各方面都有了改善，特別在手工業和土特產的恢復和發展方面，他說：「兩年以來，特別是1933年上半年起，因為我們開始注意，因為群眾生產合作社的逐漸發展，許多手工業和個別的工業現在開始走向恢復。」關於對外貿易方面的措施，他說：「……這一工作，閩浙贛邊區方面實行得較早，中央區則開始實行於1933年的春季。由於對外貿易等機關的設立，已經得到初步的成績。」

毛澤東擔任經濟事務的主管工作，大概就是從1933年的春季或稍前日期開始的，所以他老是拿這個時間作為一個分界線，標誌着「蘇區」經濟之由惡劣走向改善，由無辦法走向有辦法。究竟事實是否像他所說的那樣，今天我們是難於加以證實或否認的。不過有一點似乎可以肯定，即當年紅軍之放棄「蘇區」，從事萬里長征，主要是軍事受挫的結果，其次才是經濟陷於絕境所致。從這裏，我們如果承認毛澤東在處理經濟行政上也有一手，並且說他在那個時期的經濟工作中積累了經驗，大概不會與事實太不相符吧。

當然，從毛澤東思想長成史的角度出發，重要的不是這些對策和實施對策的能力，重要的乃是在這個時期所表現出來的這一方面的思想，乃是一些有關於經濟建設的、比較基本的見解。這些思想和見解，對於日後，乃至今天，毛澤東在經濟問題上的方針，都具有決定力量的。換句話說，毛澤東之所以成為堅決而徹底的一國社會主義者，甚至成為堅決而徹底的一國共產主義者，在別的一些原因（例如他的根深蒂固的民族主義）之外，我們不能不回溯到此一時期與他後來在陝北時期，在此問題上所積累的經驗，並由那些經驗所歸納出來的理論。

在贛南閩西的割據時代，轄區僅有支離破碎的二十幾縣，人民才達 300 萬，地僻民窮，且又流動不居，這時候，毛澤東當然不可能提出「自力更生」口號，更難於作「割據社會主義」的夢想，但是我們若細細研究代表他該一時期思想的那三篇文章，我們卻不能不說，此時毛氏已經有建設「區域性社會主義」的思想了。在所有那些文字中，毛澤東始終和一種不指名的思想鬥爭着。那種思想，據毛氏說：「認為革命戰爭已經忙不了，哪裏還有閒工夫去做經濟建設工作，因此見到誰說經濟建設，就要罵為『右傾』。他們認為在革命戰爭環境中沒有進行經濟建設的可能，要等戰爭最後勝利了，有了和平的安靜的環境，才能進行經濟建設。」毛澤東指出「這些意思是不對的」，「是極端錯誤的」。反對着這個錯誤意見，毛氏提出了「立即開展經濟戰線上的運動，進行各項必要和可能的經濟建設事業」。為什麼要這樣做，他的理由如下：

現在我們的一切工作，都應當為着革命戰爭的勝利，首先是粉碎敵人第五次「圍剿」的戰爭的徹底的勝利；為着爭取物質上的條件去保障紅軍的給養和供給；為着改善人民群眾的生活，由

此更加激發人民群眾參加革命戰爭的積極性；為着在經濟戰線上把廣大人民群眾組織起來，並且教育他們，使戰爭得着新的群眾力量；為着從經濟建設去鞏固工人和農民的聯盟，去鞏固工農民主專政，去加強無產階級的領導。為着這一切，就需要進行經濟方面的建設工作。（見《必須注意經濟工作》。）

這些話當然全都對的。一支革命軍隊，當它佔據了某些地區，在那些地區裏且已組織了長久性的政權，此時的經濟財政問題毋須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對這方面的問題是否有足夠注意，對它們是否做出了正確的政策，這些政策是否切實執行與行之有效，——與那支革命軍隊的戰爭勝負，與那個革命政權的生死存亡，自有着最直接的關係。以為處在戰爭條件中，無法談經濟建設，甚至無法採取略為長期的經濟措施；以為革命戰爭和革命政權的經濟需要只能靠緊急應付，只好得過且過；以為任何經濟問題的解決都得推遲至革命全部勝利之後——這種看法，不用說，是極端錯誤的。如果「蘇區」當年確有這樣一派主張，而其主張也恰如毛澤東所述，那末毛氏對此提出異議，主張採取成套的，積極的經濟措置與政策，當然是正確的。

不過我們現在想要研究的不是問題的這一方面。我們感到興趣而想要研究的，乃是毛氏當年的經濟思想，亦即他生平第一次形成的有關「經濟建設」的思想，與他後來的思想，特別和他的一國社會主義理論，究竟有什麼關係。我們想要指出的，乃是在那一時期的思想中，究竟讓人看得出哪一些是一國社會主義的萌芽。問題的這一個方面，對於毛澤東經濟思想發展的史的研究，有極大意義。

毛澤東把當時「蘇區」的經濟工作與經濟政策，稱之為經濟建設。其實此項所謂「建設」的全部內容，如我們上面所見，只有 300 萬元

建設公債，其中 100 萬元是紅軍戰費；200 萬元用以發展下面三種機構：(1) 合作社；(2) 糧食調劑局；(3) 對外貿易局。這四項辦法，實際上只像毛澤東所說的：「是戰爭所迫切地要求的一些工作。這些工作每件都是為着戰爭，而不是離開戰爭的和平事業」。但是他一定要將它們稱之為「經濟建設」。這樣的稱呼表示了什麼？

有了內容上的明確規定，名稱原本是次要的，甚至完全不重要。所以毛澤東如果在這裏只是應用了一個不甚貼切的名詞，不值得我們注意，我們也不應該故作挑剔。我們現在要特別指出來，主要因為這個名詞確實代表了一個思想。它代表了毛澤東（當時尚在萌芽狀態）後來充分獲得發展的一個思想，那就是：不論在怎樣的環境中，不論在怎樣的經濟基礎上，也不論在多麼大的一個地區內，只要統治的政府想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便可以建設這個經濟。

這樣說，我們是否厚誣毛澤東，是否有意曲解他的意見呢？因為他在文章裏處處着重指出「經濟建設」的「必要和可能」這個限度；他還具體地說明：「我們並不說要修一條鐵路通龍岩」，「在現在的階段上」，毛澤東毫不含糊地說，「經濟建設必須是環繞着革命戰爭這個中心任務的」。那末，人們會反問：「你們究竟何所據，而說毛澤東即使在那時候有關經濟建設的意見中，就已含有若干區域社會主義的錯誤呢？」

我們不曾說毛澤東在那時候就已主張建設「割據的社會主義」。但很顯然，他那時的見解早已包含着一些萌芽，早已表示出某種趨向，它們在發展的形態中，必然會變成錯誤的一國社會主義，或區域性的社會主義。在他題為《我們的經濟政策》那篇報告裏，毛澤東在談到經濟政策的原則時說道：「我們的經濟政策的原則，是進行一切可能

的和必須的經濟方面的建設，集中經濟力量供給戰爭，同時極力改良民眾的生活，鞏固工農在經濟方面的聯合，保證無產階級對於農民的領導，爭取國營經濟對私人經濟的領導，造成將來發展到社會主義的前提。」在這段話裏，不是已表示出上述的所謂萌芽和趨向了嗎？什麼叫做「發展到社會主義的前提」呢？報告人是在什麼時候與怎樣的條件中預約了這個前提的呢？想想這些，問題便很清楚了。一個社會主義者，一個真誠的共產主義的革命者，自然隨時隨地都會想到社會主義的。無論他幹着什麼工作都不應該忘記社會主義的理想和目標。這是毋須說的，無可爭辯的。因為若不如此，那個社會主義者或共產主義者便是虛偽的，便是言行不符的。但是在另一方面，如果把每一個前進的步驟都叫做社會主義的革命，如果把革命中每一個設施都稱之為社會主義的建設，那末同樣是錯誤的。對於革命的利益說，同樣是有害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有個最基本的特點，那就是：以真名稱呼實物。名實必須相符。這不是為了什麼道德上的理由，而是為了革命利益，為了能給革命定出正確的戰略和策略。革命的過程首先是一個客觀存在的過程。主觀的因素能夠起重大作用、有時甚至起決定性的作用。但這裏必須遵守着一個條件，即這些主觀的謀劃是以正確地認識客觀規律為基礎的，是符合於因而是推進着這些規律的。否則，如果主觀思想違反於因而是逆轉着這些規律，或者，它們不符合於因而是阻撓着這些規律，那末，其結果在最好的情形中是完全不發生作用，革命循它自己的途徑前進；而在壞的情形中則是它使革命受到挫折，或竟致斷送掉革命。主觀的願望，如果脫離了現實，都是無補於事，或於事有害的。向右脫離如此，向「左」脫離也是如此。在行動上脫離固然有害，在名稱上脫離也不會有益，也可能帶來害處。這種情形，我們在馬克思和列寧的思想鬥爭中，是累見不一見的。列寧在這方面的一個最有意思的例子，可以說是他當初對俄國革命性質的命

名。他提出了「資產階級民主性質」這個名稱，不但讓好些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不滿，甚至讓某些並非馬克思主義者而自命為社會主義者的民粹派吃驚。這些反對者們所持理由頗不相同，他們對社會主義服膺的真誠程度更不一致；但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都以主觀的願望來代替客觀的真實。

1930年前後由中共領導的軍事鬥爭，幾乎在任何方面都以主觀願望來代替客觀真實的。他們稱自己的軍隊為「工農紅軍」，稱自己的政府為「蘇維埃」——本乎此，他們也稱這個地區內的經濟措置為「經濟建設」，稱之為「造成將來發展到社會主義前提」的「經濟建設」。為什麼會造成這樣的糊塗與混亂呢？原因有二：第一，由於莫斯科的官僚主義與左傾冒險主義。史大林為了要掩蓋他斷送中國革命的機會主義的罪惡，為了要配合他當時在世界範圍內所採取的所謂「第三時期」路線，於是在中國革命失敗之後，命令中國共產黨組織「蘇維埃」與成立紅軍；第二，由於中國共產黨領袖們對於十月革命歷史的無知，同時也因為他們對於蘇聯種種的景仰，他們一切「以俄為師」，以致不加考慮，隨隨便便地張冠李戴起來。這種錯誤的結果如何，我們已在其他章節裏詳論過了，此地不贅。總之，在事實的碰壁之下，失敗一個跟着一個而來，終於乘着抗日之機，取消了所有這一切不合實際的名稱和辦法，走向了另一個對國民黨幾乎完全妥協的極端。

毛澤東為了造成社會主義前提的經濟建設思想，事實上碰過怎樣的硬壁，我們無從查考。不過在非常與極端貧窮的困難境地中，任何超現實的誇大的幻想無法付之實行，甚至沒有可能作小規模的樣版式的實驗，因此我們可以說，在這個時期中，毛澤東雖有建設「割據社會主義」的萌芽想法，卻不曾實施的。但是正因為未曾在事實中試驗，這個思想種子愈發可以保存。

在經濟建設方面不顧客觀條件，一味強調主觀能動性，一味着重「人定勝天」的官僚唯心主義，應該說，就是從那一棵種子發長出來的。

毛澤東經濟思想發展的第三個時期，可以說是從1936年開始，直至中共的全國勝利。這是毛澤東思想的成熟與定形時期。當他較有系統地補習了馬克思主義，比較全面地閱讀了史大林著作，他便企圖將自己在政治與軍事方面的見解都弄出個系統來。這項工作當然也伸展到了經濟思想的領域。這個時期的毛澤東思想我們已在前面的有關地方詳細談過了，此地只談到他的經濟方面。不過即使在這方面，我們也不能作詳盡的介紹和批評。因為這樣做的話，許多地方難免要重複，而且會大大打破這本書所能給它的篇幅的比例。所以這裏我們只能指出毛氏在該一時期中有關經濟思想的兩個主要特點。第一，我們必須指出他在這個時期初期提出的「新民主主義」理論；第二，他在此一時期中期所提出的「自力更生」口號。

「新民主主義」這個名字，首次見於毛澤東與人合著的《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那個課本上。這個未完成的小冊子是在1939年冬季寫的。原計劃要寫三章，第一章「中國社會」，由別的人起稿，但經毛澤東修改的。第二章「中國革命」，乃毛氏所作，第三章「黨的建設」，據說「因擔任寫作的同志沒有完稿而停止」。在第二章的第五節，即在有關「中國革命性質」的那一節裏，毛澤東第一次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這個名稱。他是以這樣的方式提出來的：「現階段中國革命的性質，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而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但是，現時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已不是舊式的一般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這種革命已經過時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這種革命正在中國和一切殖民地國家發展起來，我們稱這種革命為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這種新民主主義的革命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

主義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堅決地反對帝國主義即國際資本主義的。它在政治上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於帝國主義者和漢奸反動派的專政，反對把中國社會造成資產階級專政的社會。它在經濟上是把帝國主義者和漢奸反動派的大資本大企業收歸國家經營，把地主階級的土地分配給農民所有，同時保存一般的私人資本主義的企業，並不廢除富農經濟。」

緊接着這篇文章，在1940年1月，毛澤東發表了〈新民主主義論〉，把上面的觀點更充分地發揮了。自來，至少在一個很長時期內，「新民主主義」曾經被宣傳為毛澤東的一大創造。因為新民主主義這個名稱，好像並未見於當時共產國際的文件上。那末事實上是否如此呢？這個理論的價值如何？特別是它的經濟理論，對一般的中國革命，對特殊的毛澤東思想，發生了怎樣的作用？

事實上「新民主主義」根本不是毛澤東的「創見」，也不是馬列主義在中國當時當地的具體條件中的「創造性的發展」。歸根結蒂，它不過是當時史大林在全世界提出的「人民陣線」理論，在中國的具體說明而已。所謂「新民主主義」，就理論的基本點上說，原不過是受到史大林曲解了的列寧關於俄國革命的舊立場，再由毛澤東做一番中國化和通俗化的手術罷了。在這次手術中，列寧那個早已過時而且早已被他本人送進歷史博物館去的「工農民主專政」的舊公式，不但換上了門雪維克「各革命階級大聯盟」的爛招牌，而且還替它與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之間，也劃上了一個荒唐的等號。這手術乃是毛澤東系統地研究了馬列主義（實則是史大林主義）的成績，實在是非常之不高明的。毛澤東在此略前時期，曾經把他的軍事見解與戰爭經驗系統化了，寫成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

持久戰〉等文字，其中確實含有大量為毛氏所獨有的東西，含有許多不愧為有創造性的見解。可是在新民主主義論中系統化了的毛澤東的政治思想，相形之下，未免差得太遠了。這裏沒有任何獨創，這裏更談不到什麼發揮，有之，只是他那種有時庸俗得出奇的通俗化本領。有之，只是他那種古今中外牽強附會的拉扯手法罷了。憑了這些本領和手法，他不但把一九〇五年時代的列寧立場和 1927 年的史大林路線視同一物，不但把列寧政策與馬爾丁諾夫政策搞到一起，而且還能將列寧當年的革命代數公式，硬套在孫中山幻想而反動的三民主義身上。

從〈新民主主義論〉表現出來的政治理論家的毛澤東，委實矮小得很。不過關於這一層，我們曾在有關的地方討論過，此地只想談談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學說。只想看看這學說對於毛澤東思想以及中國革命的往後發展，起了怎樣的作用。

新民主主義的經濟綱領，毛澤東自己說得非常坦白：其實也就是孫中山的民生主義，也就是「節制資本」與「平均地權」。它不過是小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的幻想，與大資產階級的國家資本主義兩相結合罷了。毛澤東提出這個理論，一半是策略性的，一半是原則性的。易言之，他一半是假信，另一半卻是真信這個理論。為什麼要來這麼一下策略呢？因為共產黨既然宣稱信仰三民主義，而事實上又不甘心這樣做，於是就運用詭辯，耍點手法，說共產黨所信仰的不是三民主義，卻是新三民主義，而所謂新三民主義，實質上即等於新民主主義。這樣一來，中共一方面洗刷了理論上投降國民黨之嫌，另一方面又可以防止黨內群眾認真地走向三民主義。這是一個極好的事例，可以拿來證明毛澤東思想中那種無原則的權變作風，可以拿來說明他時時以原則服從策略的特點。在這個意義上說，「新民主主義論」應該值

得我們特別注意；但是因為同樣理由，這個「理論」本身卻不值得對它作鄭重研究。因為理論的「發明人」自己就沒有看重它——他根本就不曾真正相信它。

但是，另外「真信」的那一半又怎樣呢？當毛澤東宣佈中國革命必須經過新民主主義這個歷史階段；當他宣佈在此階段裏必須讓「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資本主義生產發展，同時又宣佈這個歷史階段的時間是「相當地長，決不是一朝一夕」，為此，他以「新民主主義」的名義拚命攻擊「一次革命論」，竭力反對「托洛次基主義」，竭力反對「不斷革命論」——當這時候，毛澤東是否也在玩弄策略，是否也在說些自己都不相信的話呢？不是的，當他這樣說的時候，也是自以為是的，自以為這是既遵循了列寧主義，而又符合於中國國情的。那末這個信念，這一個基本思想，對於毛澤東的思想有什麼影響？我們是否應該予以充分注意與研究？它當然有很大影響，我們自然應該對它注意和研究。不過這個思想之本質上的錯誤，它在中國革命的實際發展中如何被證明為錯誤，因之，結果毛澤東不得不偷天換日地將「不斷革命論」來代替了「新民主主義論」——關於這些，我們已經在前面的章節裏，特別在談到「不斷革命論」的一章裏，很充分地講過，不必再在此多所辭費了。

這裏我們必須指出的一點是：毛澤東與所有經驗主義的實行家一樣，即使他所深信的「理論」，只要形勢略變，或與事實發生衝突時，他也很方便地可以放棄，還可以毫不加以說明地採取昨天被他所攻擊的理論；而當他這樣做的時候，他總是將此理論應用或解釋到荒謬地步，讓自己走到另一個、與昨天所犯的正相反對的錯誤。

毛澤東從新民主主義的階段論一下子跳到了「不斷革命論」；從整個歷史時期讓資本主義發展的理論一下子變成了在短期與一國之內就

要實現共產主義的想法，這一點，最清楚地表示出了毛澤東思想中一貫的原則性的缺乏，最明白地暴露了一個經驗主義的實行家是如何地不受理論的拘束。

不過，毛澤東並非不受任何思想或理論的拘束的。人總是受思想拘束的，問題只在於受哪一類思想的拘束。深刻與具有原則性思想的理論家，他的行為受着一貫的與系統的思想的指導；浮淺的與印象的實幹家們則受他們由某些經驗累積的個別思想所拘束。毛澤東不受拘束的是那些首尾一貫的「教條」，他受着牢牢拘束的則是他本人在實踐中所獲得的一些見解。毛澤東思想中的這一類成見是很多的，其中佔據着首位的，自是「槍桿子萬能」這一點，其次恐怕要算他經濟理論中的「自力更生」說了。「自力更生」這個思想與「新民主主義」的理論完全不同。它在毛澤東思想中屬於不變部分，它不受時間與地點的影響，它進入了毛澤東的下意識中，根本不需要經過分析性的思考的，因此，它成了他有意識思想的出發點，成了他那些思想的決定性的基數。

「自力更生」這個思想是道地的傳統貨。不管毛澤東是從「板倉先生」那裏繼承了朱熹的學說，還是一般地接受了佛家的口頭禪，這總是中國知識分子長期以來做人治學的老口號。毛澤東是從小就受了這個思想影響的，在中國革命初期，即在 1925-27 年那次革命的初期，因為「中國革命乃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思想太有力量，「必須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的口號叫得太響亮，這個「自力更生」想法無由抬頭。雖然從當時的種種事跡看，毛澤東顯然傾向於從國內找尋力量這個路線，而且也不太看得起處處寄託希望於莫斯科的那個作風，但無論在行動和言論上，他都不曾、也不敢以「自力」方向來和「他力」方向對抗。當紅軍困鬥於江西之時，軍事與經濟都必須藉自力以

圖存，事實上也確乎憑自力在掙扎之時，毛澤東也不曾叫出這個口號，其原因，主要自然在於形勢太明顯，光靠當時割據區內的這點力量是難有前途的。當時的紅軍雖然不可能從蘇聯直接獲得軍火或其他種類的物質援助，但是多多少少仍舊要靠「他力」的，例如，紅軍的指揮員需要莫斯科訓練出來的人來充當和補充，戰爭所必需的醫藥物品一定得從大城市購買，而這筆錢多數就是聯共黨來的^[4]……因此，不管毛澤東只依靠，甚至只相信自己看得見、觸得着、甚至握得住的力量，卻仍舊不曾，也不敢將「自力更生」加以理論化。

在〈新民主主義論〉（1939年1月）中，毛澤東還將恰好相反的理論，充分加以發揮了的。他在該文的第七節中，寫下了如下一些非常正確的話：「這個世界上，所有帝國主義都是我們的敵人，中國要獨立，決不能離開社會主義國家和國際無產階級的援助。這就是說，不能離開蘇聯的援助，不能離開日本和英、美、法、德、意各國無產階級在其本國進行反資本主義鬥爭的援助。雖然不能說，中國革命的勝利一定要在日本和英、美、法、德、意各國或其中一二國的革命勝利之後，但須加上它們的力量才能勝利，這是沒有疑義的。尤其是蘇聯的援助，是抗戰最後勝利決不可少的條件。拒絕蘇聯的援助，革命就要失敗。……」毛澤東這番言語雖然是用來反駁「資產階級專政」的，但很顯然，如果拿它來反駁「無產階級自力更生論」，非但合適，而且毋需掉換一個字。為什麼當時毛澤東會有這種正確主張？這首先當然表示出：在抗日戰爭初期，即當〈新民主主義論〉寫作的時期，毛澤東還存着獲得外援的希望，同時陝北政權的處境，照毛氏自己的話說，是「還有飯吃，有衣穿」的。環境還不曾迫着他們自己動手來解決最低限度的生活問題，因此，「自力更生」這個問題還不在客觀上以極其尖銳的形式提出來，在主觀上也就不需要鄭重考慮，更不需要加以理論化了。

毛澤東將「自力更生」的思想着重地提出來，加以理論化和系統化，將它當作革命地區經濟政策的指導方針，那是在1942年。這是當西北邊區在國民黨及日本帝國主義的雙重經濟封鎖之下，經濟情形愈來愈艱苦的條件中發生出來的。關於這個時期的客觀形勢，以及在此形勢下如何決定了這個方針，毛澤東自己有段話說得很明白：

五年以來，我們經過了幾個階段。最大的一次困難是在1940年和1941年，國民黨的兩次反共磨擦，都在這一時期。我們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國民黨用停發經費和經濟封鎖來對待我們，企圖把我們困死，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但是我們渡過了困難。這不但是由於邊區人民給了我們糧食吃，尤其是由於我們下決心自己動手，建立了自己的公營經濟。邊區政府辦了許多的自給工業，軍隊進行了大規模的生產運動，發展了以自給為目標的農工商業；幾萬機關學校人員，也發展了同樣的自給經濟。軍隊和機關學校所發展的這種自給經濟是目前這種特殊條件下的特殊產物，它在其他歷史條件下是不合理和不可理解的，但在目前卻是完全合理並且完全必要的。（見《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

這裏讓我們看得很清楚，中共的生產自給運動是1940年和1941年的國民黨「反共磨擦」迫出來的。因為這個辦法使中共渡過了難關，做出了成績，有了經驗，毛澤東對它更加重視，更有信心，因而將它理論化和系統化了。但雖如此，我們還必須看到，那時候毛澤東還不曾完全用它來代替那個「他力援助論」。緊接着對於「自給經濟」的高度估價之後，他立即指出「這種自給經濟是目前這種特殊條件下的特

殊產物，它在其他歷史條件下是不合理和不可理解的。」這表明出，毛氏在 1942 年還不曾是完全的「自力更生論」者。

公然將「自力更生」這個口號提出來，而且當作一條與「希望國際援助」根本不同的路線提出來，將它確定為今後中共解決經濟問題的唯一辦法的，那是在 1945 年。這也就是說，在提倡「工農商學兵」及政府機關全部實行「自給經濟」之後一兩年，站在這一兩年的新的經驗的基礎上，毛澤東才比較堅決，也比較根本地提出「自力更生」口號。1945 年 1 月，以《必須學會做經濟工作》為題，毛澤東給陝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和模範工作者會議講了話。在這篇講話裏，我們才第一次聽見他說：「我們是主張自力更生的。」

從此之後，中國人傳統的這一個有關興家創業的舊觀念，這一個一直潛伏在毛澤東心底裏的先入之見，就爬上了他的心頭，正式壓下了外來的關於國際援助與國際合作的新思想——這個思想他雖然一度信仰過，卻從來不曾真正服膺的。從此之後，自力更生這個觀念，基本上就成為經濟建設方面的「毛澤東思想」。

不過光就那篇講話的意見而論，當然，我們並不能馬上達到這個結論。因為在那裏，毛澤東說他主張自力更生的直接用意，在於反對國民黨的政策，在於反對他們「自己不動手專靠外國人，連棉布這樣的日用品也要依賴外國。」他說這句話的主要目的，在於表明中共雖也「希望有外援，但是我們不能依賴它，我們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體軍民的創造力。」所以在這裏，講話者顯然不是原則性地提出問題，顯然不是談論建設經濟的方針，更不是談論建設社會主義的方針。這裏的問題顯然是限於應急的，是屬於權宜性的辦法。

那末我們憑什麼理由說這個時期毛氏的經濟主張大大影響了、甚至基本規定了他今後一般的經濟建設思想？

這當然不是憑一篇文章的文字和論據，而是以他後來的行為和事實作根據的。自從毛澤東正式宣佈自力更生的主張以來，到現在已經有整整二十個年頭。在這中間，對此根本問題毛澤東表示過不同的態度，經歷過不少改變，但其基本傾向卻是一貫的，總是朝着一個方向走去的。這個方向便是自力更生。

我們現在不預備詳細敘述二十年來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變化，因為這樣做是需要太多的篇幅的，而且，為要了解毛澤東思想中這個根深蒂固的觀念，根本也不需要這樣的詳細敘述。所以我們在這裏只要指出下面這個事實就夠了，那就是：當他覺得有可能取得國外援助時，他就強調國際援助對於社會主義建設的必要；反之，當他無法取得這種援助時，他就高唱自力更生的「真理」。本來，社會主義建設是否可以依靠單獨一國的力量，是否可以在一國範圍之內達到成功，乃是一個極其基本的原則問題，是國際主義抑或民族主義的重要分界線；可是在毛澤東，這問題卻變成了可有可無的政策問題，變成為依可能性而轉移的辦法問題。毛澤東所以能有這樣態度，其中最主要的理由，在於他本質上是「一國社會主義者」，是民族主義的，是自力更生論者。因此，在他看來，自力更生是不變的原則，而國際援助、國際合作或國際分工，則不過是附從於原則的手段，是為實現原則所需要的，但不是絕對必需的手段。

認識了這個主要點，那末我們就不會迷惑於二十年來毛氏在此問題上的種種變化，就可以完全了解他在我們上述的所謂第四時期中，

即當中共全國勝利之後，毛氏對經濟建設問題所曾提出的忽而這樣、忽而那樣的主張。

在勝利前夜，毛澤東寫了那篇非常出名的論文：〈論人民民主專政〉。文章提出了「一邊倒」的口號，強調了「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各國人民共同奮鬥」的方針，並且着力地批判了「不要國際援助也可以勝利」的錯誤思想。他莊重地宣告：「在帝國主義存在的時代，任何國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沒有國際革命力量在各種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勝利了，要鞏固，也是不可能的。」

這毋須說是「自力更生說」的否定。所謂「勝利了，要鞏固，也是不可能的」，意思自是指革命勝利後有關國家諸方面的初步建設，其間特別指經濟方面的恢復、鞏固和初步建設。既然初步的經濟鞏固和建設，如果沒有國際援助都會是不可能的，那末長遠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之必然有賴於國際援助，它必然要在國際範圍內才能思議，自更不在話下。

為什麼毛澤東在踏上全盤勝利門檻的時候，忽然把他多年來大力提倡的「自力更生說」收了起來，換上了根本相反的主張？是否他從「第三時期」走上「第四時期」以後，關於經濟建設的意見根本改變了？我們得解釋這兩個問題。

我們不想說〈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所發揮的論點是虛偽的。當中共軍隊取得了意外的勝利，毛澤東幾乎在一夜之間變成為全中國主宰之時，他面對這個原本「一窮二白」，而且又遭受了長達半個世紀戰爭災難的大國，那是無法不有此想法的。這裏不需要精深的經濟學的知識，也不需要有關國際社會主義革命的正確理論，只要具備中國舊式

大家庭中一個負責的當家人的頭腦，就會發生毛澤東在當時的想法。要想從無中生有，要想於百廢之餘從事興建，至少在最初時期，總得略借外力，俾自力有所憑藉，得以發揮其更生的作用。所以這個時候，毛澤東之大喊「一邊倒」，大叫「國際援助」的必要，以及他之親赴莫斯科，親自去向史大林求教又求助，並沒有意味着他拋去了自力更生的主張，並沒有意味着他要在國際全局的觀點上來考慮中國當前與未來社會主義的革命與建設。恰恰相反，那是為了取得在一國之內恢復與建設經濟的初步條件，才不得不將國際援助用作手段。這樣的國際路線，恰恰是走向自力更生的。

那時候的蘇聯如果是列寧時代的蘇聯，它真能給革命勝利了的中國以無私援助，它真能不分彼此地考慮中蘇兩國的共同利益，那末，憑着事實與思想二者並進的教育，也許能將毛澤東（如果不是毛澤東，至少是中共領導的大部分）改變成真正的國際主義者吧。它也許能讓毛澤東具體地認識到社會主義革命這個國際任務，它也許能讓他切實地懂得社會主義建設必不可少的國際規模，因而讓他由衷地拋去那種狹隘的、實質上反動的「民族社會主義」吧。

不幸事實上並非如此。史大林的「一國社會主義」，他的俄羅斯大國沙文主義，他之急欲恢復與堅持沙俄時代的對華特權，他之赤裸裸的民族利己政策，使那個被一時革命形勢所促成的「國際主義者」毛澤東，以一次切身的經驗，證實了「國際主義」之僅屬理想，甚至是僅屬幌子，使他最後地完全相信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一樣，必須以民族國家作堅實基礎，必須靠自力單幹以謀國家富強。當然，他沒有立即把這個信念公開說出來。只要有必要與有可能取得蘇聯的「無私援助」，他是不會作這樣的公開聲明的。史大林死去後，赫魯曉夫上台。赫魯曉夫這個系統最初表現得比史大林慷慨得多，以此延長了毛

澤東的國際主義姿態。後來，隨着中蘇兩黨關係的逐漸惡化，「國際援助」的獲得愈來愈顯得不可能，毛澤東的自力更生理論便逐漸地叫得響亮起來。直至最後，到了1963年6月間，毛澤東將這個理論正式寫進到《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中去，這才公然而肯定地宣佈「實行自力更生為主的建設方針，就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具體表現」。它不但公然而肯定地宣佈中國共產黨實行這個方針，而且還當作一般的真理提出來，推薦給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它認為：「任何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事業，主要地應依靠自力更生。」

這時候，毛澤東才算最後地從一個割據區內自力更生的經濟行政家，發展成為一國之內自力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家了。

* * *

在進一步討論之前，我們先得弄清楚一個問題：自力更生這個名詞，究竟有什麼含義。據我們看，它可能包含兩個極不相同的意義。一個屬於行為道德方面，另一個屬於社會經濟方面。主張自力更生，或反對自力更生，不管着眼於理論，抑或着眼於實踐，都必須將這二者分清，絕不容許纏夾混淆。個人的自力更生已經如此，民族與國家的此一方針那就更不必說。所謂行為和道德方面的自力更生，無論個人或者國家，甚至不論其為何種人與何種國家，都是好的，應該的，合乎「道德」的。如果不肯定這個方面的自力更生，那就等於提倡懶惰、提倡依賴、提倡靠天吃飯、或提倡剝削他人、提倡坐地分贓。所以在這個意義上否定自力更生，在個人，其後果便是墮落腐化，在民族或國家則勢必趨於衰敗滅亡。毛澤東之強調自力更生，假使僅僅在這個意義上，當然完全正確。不但在贛南與陝北時期是正確的，就是在中共全國勝利之後，在經濟恢復與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也都是正確的，誰若在這個意義上反對毛澤東的自力更生，那他不是賣身投靠的

洋奴，便是徒託空言的懶蟲。不用說，真正馬列主義者，真正國際主義的不斷革命論者，絕對不會反對這一種自力更生；恰好相反，他們毋寧是竭力提倡這種獨立精神與勤奮精神的。

這個意義的自力更生論不可能成為爭論，也不曾引起過爭論。

在國際社會主義者中間成了爭論的，顯然是為了自力更生的另一個意義，即為了它的社會的與經濟的意義，特別是為了它與國際協力這個觀念適相反對，為了它肯定一國之內可以建設社會主義。

這個意義的自力更生，恰恰就是一國社會主義。

因此，要問「自力更生」是否正確，只要看「一國社會主義」是否正確好了。

也因此，我們不得不在這裏略跑野馬，談談一國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

資本主義的世界統治應該被推翻，以及它終將被完全推翻，這至少在所有真正的社會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中，是不成其為問題的了。舊世界被推翻以後，新世界行將實現世界一體的社會主義，這也不會引起爭論了，因為誰都知道（至少在表面上），而且誰都承認（至少在口頭上），社會主義總歸是和民族國家不相容，它必須在全世界規模中才能充分與徹底實現的。如今真正成為問題的，除了因如何全部推翻資本統治所引起的一系列問題之外，便是關於如何達成這個世界一體的社會主義（並進而走向共產主義）的道路問題。

這個問題是可以歸結為如下方式的：社會主義大同世界的到來，究竟將在很大限度內有賴於各國社會主義革命者、特別有賴於已經獲

得勝利的社會主義革命者，自始就着重於世界全局，經常堅持國際協作，由全球觀點來規劃和建設暫時分為各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呢，還是它將由每一個大小不等的民族社會主義國家，在它們逐一建設成功以後，再像七巧板似的拼湊到一起？

主張和堅持前一立場的是馬克思和列寧，這個立場是傳統的國際協力的共產主義；主張和實行後一立場的是史大林，這個立場叫做「一國社會主義」。

馬克思根據他對於資本主義的特性及其趨勢所作研究，根據他對資本主義社會中階級關係與政治發展所作分析，肯定了世界資本統治必須靠國際工人階級的共同努力來推翻；而推翻了資本統治之後，要想建設社會主義，則更非在國際範圍內進行不可。

列寧不但在理論上繼承了這個基本立場，並且在行動上實行了它。當俄國無產階級革命一經成功，建立了歷史上第一個工人國家之後，列寧就全面推行了這條國際主義的路線。他一方面向全世界工人階級與一切被壓迫者呼籲，號召他們起來革命，同時又以實際行動，幫助他們起來革命，務使俄國工人階級的革命政權，成為世界革命的起點和火種。在另一方面，他提出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這個公式，並且立即實行出來，務使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不成為單獨存在的國家，而成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的一個成員，成為不久便能實現的世界社會主義統一組織中的一個構成分子。

列寧所以要這樣辦，不是簡單為了他對共產主義的信仰，而更是為了客觀歷史的必然和必需。因為第一，他深信，這是俄國革命的

生死存亡問題。如果沒有各國工人階級與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支持，俄國工人階級的政權是難於長期存在的。第二，他深信，這是整個社會主義事業的前途問題。在世界革命進展的條件下，如果某幾個國家的工人階級先後奪取了政權，成立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那它們必須以「聯邦」形式結成極密切的聯盟，否則，它們便不能在帝國主義列強的包圍中保持自己的存在，它們便「不能實現被帝國主義所破壞的生產力的恢復和勞動者福利的保證」，而更根本的，它們便不能「趨向於建立一種統一的、依照總計劃由一切民族的無產階級所調節的整個世界經濟。」（以上引文見列寧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第八節。）

很清楚，列寧是從世界歷史現階段的理論分析中，從世界規模的階級鬥爭中，特別是從蘇維埃國家的實際經驗中，得出了這些結論的。這些結論歸結起來，那就是：只有世界革命才能徹底打敗與根本推翻資本帝國主義，只有「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再由此過渡到「各民族勞動者的完全統一」，才能建設成世界一體的社會主義。

這個結論自然與「一國社會主義」無絲毫共同之點。它是在史大林未曾發明「一國社會主義」之前，列寧提出來的最有力的反對論據。

但是有人也許會說，「一國社會主義」雖然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傳統立場，安知它不正是這個舊立場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正確應用？

我們不想在這裏詳細討論這個問題，怕的是離題太遠了。在這裏，我們只想略略敘述一下當年產生「一國社會主義」的情形，以及它實施以來讓我們看到的一些結果。因為知道了這些情形，看到了那些結果，我們上舉的問題就不解自答了。

二十年代初期的蘇聯，國內戰爭已經結束，外國武裝干涉的危險暫時已成過去了，跟着，長期間遭受了破壞的國民經濟，也穩步走向恢復了。等得到了1924年前後，關於蘇聯未來經濟建設的問題，已經從各方面提出來，迫切要求有一個決定。可是正在此時，列寧卻病死了，西歐的革命形勢又迭遭挫折——它們不能像俄國革命領袖們所期望那樣，及時地以革命支援俄國的革命，使之在聯合努力之下，共同解決有關革命之繼續前進與繼續擴大問題，以及共同解決社會主義建設的種種問題。

在這樣的情況下，關於蘇聯經濟建設的方針，蘇聯共產黨內部發生了兩派相反意見。

一派是以托洛次基為首的，他們認為：俄國工人階級既然奪得政權，並且保持了政權，那末不管國際革命的形勢如何不利，不管蘇聯是否在一時間或在較長時期內行將處於孤立地位，這個工人政權卻不但可以開始建設社會主義，而且應該去建設社會主義。因為不然的話，連政權本身都無法長期生存。不過在這樣的情形中開始建設社會主義，他們認為：該國的工人階級與一切革命者卻必須始終信守着社會主義的國際性的原則。因為他們肯定，在一個國家內開始建設社會主義是一回事，社會主義能否在一個國家內建設成功卻是另一回事。他們肯定了前者，卻否定了後者。因為他們深信，當資本主義已經不能限制在一國範圍之內的時代，社會主義是絕對不能在單獨一國中建設完成的。根據了社會主義建設國際性這個原則，他們又得出了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兩個基本態度：第一，必須把一國建設的利益從屬於世界革命的利益；第二，決不能把民族範圍內所已建設成功的東西叫做完成了的社會主義，更不能將它們當作共產主義，以免降底它的價值，醜化它的面貌，減損它的聲譽。

這一派的意見，顯然是列寧立場的繼續。

另一派以史大林為代表，他們認為：由於俄羅斯的地大物博，自然條件十分優越，所以只要沒有帝國主義者的戰爭干涉，俄國工人階級不但在蘇聯一國之內可以建設社會主義，而且可以建設到最後成功。根據這個認識，他們也採取了兩個基本態度：第一，世界革命的利益必須從屬於「社會主義祖國」的利益；全世界無產階級的中心任務歸結於「保衛蘇聯」。第二，當工業方面的生產工具與生產資料完成了國有制之後，只要再完成農業方面的集體所有制，社會上便已經取消了階級，社會主義制度便已經建設成功。

托史兩派的鬥爭，如所周知，主要因為蘇聯當年國內外的客觀因素有利於保守的民族立場，以致它在蘇聯共產黨中以斯勝托敗而告終。因此，自從二十年代中期以來，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就是依循着「一國社會主義」的路線而進行的了。

結果如何？

從第一個基本態度出發，史大林將共產國際變成為完全替蘇聯（實則替克里姆林宮官方）利益服務的一個機關，將世界革命變成為蘇聯與各帝國主義國家討價還價的籌碼。每當外國的一個革命局勢發生了，首先要看它是否與蘇聯利益有所衝突，如果衝突，即如果它妨礙了克里姆林宮與帝國主義的「和平共存」，史大林總是毫不猶豫地不加支持，或甚至幫同鎮壓那個革命。就這樣，一大串亞洲和歐洲的革命運動，在「保衛社會主義祖國」的名義之下被先後斷送了，以致在德國促成了法西斯的興起，使蘇聯認真地受到生死存亡的威脅。最後為了自保，竟不得不投入希特勒的懷抱，以此引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果讓蘇聯陷入瀕於覆滅的悲慘命運之中。

從第二個態度出發，史大林採用了極端蠻橫的官僚辦法，付出極高的生命代價，不顧極大的財富損失，去完成農業方面的初步集體化。完成了這一步之後，史大林就貿然宣佈蘇聯「在基本上已實現了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即社會主義」（見史大林對1936年11月舉行的第八次蘇維埃大會所作的《論蘇聯憲法草案》的報告。）。可是正在這個時候，蘇維埃和共產黨內的民主卻消失淨盡了，代表十月革命傳統的整代老布爾雪維克將被殺盡滅絕了，略有批評精神的年青一輩給摧殘鎮壓了，全體勞動者被置於資本家連想像都不敢想像的嚴厲管制之下了。警察特務的魔掌控制了一切，文化生活在任何方面都受到了窒息。這樣的社會制度，自然不是社會主義，不是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而是用蘇聯工農的血淚繪成的一幅對於人類理想制度的諷刺畫。

可是這樣的諷刺畫，卻正是「一國社會主義」所能繪成的唯一作品。

由此可見，「一國社會主義」決非馬列二氏的國際主義革命立場在歷史新條件下的應用；恰恰相反，這是人們在不利的歷史條件之下不能堅持馬列的基本原則，叛離了這些原則，才製作出來的一種理論，它在理論上根本背棄了國際主義，在行動上根本放棄了革命，在實際上根本彎曲了社會主義。

* * *

毛澤東的自力更生，和史大林的一國社會主義，無論就社會根源說，或就思想內容說，都是一類東西，都應該歸入民族社會主義之內。如果硬要在它們之間找出區別的話，只在於前者比較着重「主觀的能動性」，着重於「本國人民的辛勤勞動和智慧」；後者比較着重「客

觀的實現性」，着重於俄國所具備的為建設社會主義「所必需的一切物質條件」。不過二者的畸輕畸重，根本不曾發展到我們前面所論述的有關自力更生的不同含義，所以實質上它們是完全一樣的。

理論上對一國社會主義的所有批評，毫無例外地適用於自力更生論。

中俄兩國不同的民族環境，相距二十餘年的不同時代條件，是否能使這同屬民族社會主義的兩種理論，發生不同結果呢？我們以為不能，因為首先，中俄兩國的民族差異絲毫不影響二國相同的階級關係。其次，二十世紀的二十年代和二十世紀的五十年代雖然具有極不相同的時代特點，但這些特點不足以影響社會主義的國際性或民族性這個根本問題（如有影響，那也是更加突出了國際性的）。換句話說，不管是二十世紀的二十年代或二十世紀的五十年代，時代的最基本的特點始終是帝國主義的瘋狂掙扎和世界革命的不斷進展。這就是說，史大林和毛澤東在基本上是屬於同一時代的。

因此，史大林曾經以一國社會主義名義犯下的種種錯誤與罪惡，毛澤東在自力更生名義之下也一定要犯，有的已經犯下了，有的則遲早也會犯下的——只要這個方針繼續發展下去。

已經犯下的錯誤與罪惡，主要是在「三面紅旗」底下幹出來的。所謂三面紅旗，就是指 1956 年開始扯起的「總路線」；1957 年掛出來的「大躍進」，以及 1958 年高舉起來的「人民公社」。這三面旗幟是毛澤東自力更生思想的代表作。它們在中國人的政治經濟生活中掀起過空前巨大的波瀾，造成了非常深遠的影響，闖下了連續三年的「特大災害」。這個災害，比起一九三〇年代初期史大林「全面集體化」所造成的人為災荒來，縱未超過，也決不遜色的。

不過我們不想在這裏多事討論「三面紅旗」的錯誤。因為要詳盡地分析和評量這三件大事，需要巨大篇幅。做起來，將會大大超出我們本篇所定的範圍。我們在這裏所要研究的，畢竟只是經濟學家的毛澤東，只是想知道毛澤東對付經濟問題的態度，想知道他處理經濟問題的方法。經濟政策的結果，當然可以用來評量政策制訂者的地位，而且在某種情形下，也應該用這個標準來評量的。不過為了測驗和決定某一個政治家的思想家地位，那末，他制訂政策時所採取的態度和方法，卻具有更大意義的。當二十年代中葉，史大林初次提出他「一國社會主義」的理論時，史大林之所以為史大林，作為一個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家與世界革命戰略家的史大林，其地位與身量固已完全確定，根本不需要以後二三十年的事實證明了。同樣，毛澤東之所以為毛澤東，特別是作為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家的毛澤東，其地位與身量，也只要看他如何在思想上豎起這三面大旗就可以決定，不必更待它們造成的結果來證明的。

關於三面紅旗的本身，它們的經過和它們所造成的成績（如果有的話）和禍害，我們曾經在別的地方討論過。特別關於最後與影響最大的那面旗幟——人民公社，當它剛剛掛起來不久的時候，我們曾經做過相當詳盡的分析和批評，也曾對它的後果做過預測。這些預測，不幸都被往後的事實所證實的了。現在我們將該文不加修改，附錄在後面，請讀者們參考，同時也補足本文在這方面的省略。

這裏，我們將專談圍繞在三旗周圍的毛澤東思想。

「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這條總路線，是在1958年正式提出的。但在事實上，它在1956年就已經開始實行，而它在毛澤東的頭腦中最初形成，卻更在1955年年底。這條路線

如何闖進毛澤東的思想，是什麼客觀情勢使他想到了這條路線，毛澤東又是怎樣從客觀的經驗中做出他主觀的意見，——這些，實在是極典型的例子，足以讓我們憑此來認識毛澤東的思想方法。

1955年年底，就中共的「經濟戰線」說，那是：經濟的恢復階段（1950-52年）早已過去，第一個五年計劃也已執行了三年。因為有了蘇聯等兄弟國家的援助，因為有了蘇聯早期建國的正反經驗，再因為中國的工業落後，基礎低，起跑點近，恢復比較容易，所以無論是經濟恢復工作，或五年計劃最初三年的執行，都進行得相當順利，方法相當健全，成績是非常顯著突出的。

由於第一個五年計劃是以工業建設為中心的，在各項成績中，自然以工業為最突出，根據政府所發表的統計，五年計劃最初三年的工業生產，每年都超額完成了計劃。截至1955年為止，工業生產的總產值已經增長到65%；而照五年計劃規定，五年內要增長98.3%。這就是說，三年時間差不多已完成了四年的定額。又照五年計劃規定，五年內全國工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14.7%，而在前三年，每年卻平均增長了18%。

這種增長速度，不用說，在中國的歷史上是空前的，即使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中也是少見的。不特工業方面如此，其他部門，除了那從無到有的各項基本建設工程之外，例如交通運輸部門，手工業與商業部門等等，它們增長和擴大的速度也都是如此——雖然程度上不完全一樣。

可是在整個突飛猛進的背景上出現了一個例外，那就是農業。它非但沒有跟其他部門一樣去提前與超額完成計劃，卻一連兩年（1953與1954年）都沒有完成計劃。農業，按照第一個五年計劃，包含副業

在內的總產值，原本應該逐年增加 4.3%；可是，據說因為那兩年在許多地區發生春旱秋澇的自然災害，以致農業和副業的總產值非但不能按計劃增長，反而差點兒達不到 1953 年的水平。

為要配合基本建設及工業方面的飛快發展，使國民經濟其他部門可以跟上來，使各部門的發展能夠保持平衡，保持適當的比例，於是，中共在 1955 年的春天就計劃着，而且在秋天就發動了所謂「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他們企圖給前進了的生產力配上與之適應的前進的生產關係和生產組織，同時憑藉這樣的關係和組織，進一步地加速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的工商業的生產和運轉，其中自然特別要想促進農業的生產力，想補救它在過去兩年中無法完成計劃的缺點，更想藉以解決農業遠遠落後於工業的大問題。

這個運動，就其意圖說是正確的。處在當時情形中，從正確的馬列主義的立場出發，原本應該如此。可是結果卻大出乎意料之外：原本踏着相當堅實步子前進的中國經濟的各個單位，此時，一經努力「改造」，卻好像是幾匹競賽的馬，突然被瘋狂的騎師策進到一條完全沒有規則的，凹凸不平的斷頭跑道裏，以致混亂、衝撞、盲進、瞎退，發生了一場自相踐踏的大慘劇。它讓整個中國經濟蒙受了難以估計的損失，因而也使中共的政治聲譽受到了難以挽回的打擊。

怎麼會如此的呢？讓我們從頭講起。

1955 年 12 月，毛澤東寫了一篇具有深遠影響的文章，那就是他給《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所寫的〈序言〉。《高潮》是一本材料書。全是關於農村合作化運動的文章。中共中央所以要收集和編輯這些材料，目的就是要了解我們上面所指出的那個「農業、手工業和資

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運動」進行的成績。特別是要了解農業合作化工作的情形。這個收集編輯工作是毛澤東親自主持的。那是他從來愛好的「調查研究」工作的一次大規模的實施。這部書編輯了兩次，一次在9月，第二次便是12月。第一次材料裏所反映的農村情況，大多數是1955年上半年的，少數是1954年下半年的。這些材料發給1955年10月召開的中共七屆六全擴大會議的各省級以下幹部閱讀，會後，大多數省、市和自治區送來了補充材料，其中有不少反映了1955年下半年的情況。毛澤東於是將全部材料重編一次，同時又重寫了一篇序言。這篇序言雖然不長，但是非常重要，因為它不但告訴了我們中共怎樣從「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走向「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的總路線，而且讓我們很清楚地看見了毛澤東是怎樣做他們「調查研究」工作的，又是怎樣從「調查研究」中得出結論來的。

在那篇序言裏，毛澤東寫下了後來頗起作用，因而頗為出名的下面那段話：

問題還不是簡單地在材料方面。問題是在1955年的下半年，中國的情況起了一個根本的變化。中國的1億1,000萬農戶中，到現在——1955年12月下旬——已有60%以上的農戶，即七千多萬戶，響應中共中央的號召，加入了半社會主義的農業生產合作社。我在1955年7月31日所作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中，提到加入合作社的農戶數字是1,690萬戶，幾個月時間，就有五千幾百萬農戶加入了合作社。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這件事告訴我們，只需要1956年一個年頭，就可以基本上完成農業方面的半社會主義的合作化。再有三年到四年，即到1959年，或者1960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會主義到社會主

義的轉變。這件事告訴我們，中國的手工業和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改造，也應當爭取提早一些時候去完成，才能適應農業發展的需要。這件事告訴我們，中國的工業化的規模和速度，科學、文化、教育、衛生等項事業的發展的規模和速度，已經不能完全按照原來所想的那個樣子去做，這些都應當適當地擴大和加快。

毛澤東這篇文章，尤其是文章中的這段話，對中共往後的全盤政策起了什麼作用，劉少奇曾經給我們做過了系統說明。在1958年5月召開的中共中央向八屆全大會第二次會議所作的工作報告中，劉少奇說道：

事實上，到了1955年冬季，當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革命顯然將在很短的時間內開始出現的時候，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常規」就已經必須衝破了。毛澤東同志及時地提出了號召，要求以更高的速度來代替第一個五年計劃原來規定的速度。他在1955年12月所寫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序言中說：

毛澤東同志接着把「序言」中所闡述的這個思想概括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口號，並且指出了全黨的迫切任務，是要克服實際存在着的右傾保守思想……

根據毛澤東同志的倡議，黨在1956年1月向全國人民提出了《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這是一個多快好省地發展社會主義農業的綱領。它不但給全國農村工作指出了一個偉大的奮鬥目標，而且給整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指出了一個正確的發展方向。

毛澤東這篇〈序言〉與五年計劃的「衝破常規」有什麼關係，它跟以後「整個社會主義建設……發展方向」有什麼關係，劉少奇在這裏是說得很清楚的。顯然，〈序言〉代表着十餘年來中共經濟政策的一個重要關鍵，它標誌出這個政策之由比較穩健轉為狂妄，由比較注意客觀規律轉而為「衝破常規」，由各部分的較有協調轉而為推翻平衡，由比較的逐年增長轉而為大進大退，由比較地能考慮客觀的物質條件和真實可能性，轉而為唯心主義地一味強調主觀的能動性，最後，由比較重視國際協作態度，轉而為專靠本國人力物力的單幹立場。

這樣一個關鍵所繫的重要文件，我們自須好好加以研究。不過在這裏，我們只想從上引文字中提出三個問題來談談。

一、根本變化的實質。在幾個月時間之內，有五千幾百萬農戶加入了合作社，即中國 60% 以上的農民進入了半社會主義的生產組織。無疑，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但它是否在中國的情況中起了「一個根本的變化」，換句話說，這樣一件大事是否真正能改變中國農業的落後情況？它是否確實能醫治這個農業的落後病？那還得看其他條件的。

較為進步的生產組織當然意味着較高的生產能力。合作化的農業經營，當然會比獨戶單幹更有出息。可是歸根結蒂，生產力的提高是要靠技術改進的；而合作社要想比單幹戶真能多出糧食，還得看人們走進合作社是否自願。如果以合作方式經營的農業組織，並沒有與之適應的技術基礎；又若這種經營方式並非為最大多數參加者自願接受，那末，所謂「先進的生產組織」，非但不一定能提高生產力，有時還能降低生產力。

所以最健全的「先進的生產組織」，應該是生產力發展的自然結果。技術改良了，生產力提高了，舊有的生產方式與生產組織無法與之適應了，那時候便順理成章地，產生出較大的、從個體趨向集體的、比較先進的生產組織。

整個社會的變革如此，某一經濟部門的變革也是如此。

當然，這個程式不是固定不變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那種基礎和上層關係雖然不變，但是二者之相互作用與相互影響卻是可變的，而且是多變的。在比較落後的國家中，主要由於國內階級鬥爭的特殊情形，可以先發生先進的社會主義革命，然後再憑以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同樣，在某一個較為落後的經濟部門中，也可以先採用比較先進的生產組織，然後憑此組織去加速促進該部門之內的生產力。

但是先變上層後動基礎的辦法，無論行之於一國之內或行之於一個經濟部門之內，都必須時時記得二者應有的關係，務使二者不要脫離得太遠，務使基礎能隨即追上並適應那跑在前面的上層。因為不然的話，那個太離基礎的上層建築必然無法穩固，必然要倒坍下來。

毛澤東似乎懂得並且注意了這一點的，因為在指出這個「根本變化」的同時，他要求工業化的規模和速度，以及其他方面發展的規模和速度，「都應當適當地擴大和加快」，藉以「適應農業方面發展的需要」。這裏毛澤東的意思，彷彿正是說：現在，農業組織的先進架子是搭起來了，但技術基礎跟不上，遠遠地落在後面。為的要讓這副架子不致落空，為的要使它真能大大促進農業生產，工業必須以比前更大的規模，比前更快的速度，將新的技術來支援農業，給先進的組織及時提供先進的基礎。

毛澤東是否這樣想呢？並不。依照他的意思，合作化本身就已經是一個根本變化，其本身就已經是農業發展，其本身就已經是農業生產大躍進的足夠保證。所以毛澤東在這裏要求擴大和加快工業化的規模和速度，其用意顯然不在於使農業的技術基礎趕上它先進的組織形式，而在於使工農二業齊頭並進。

這是一大錯誤，也是中共自 1956 年以來經濟上一切倒行逆施的起始原因之一。本來，合作化的推進，為的要鞭策農業去追趕工業，可是突然間，發現農業中起了一個「根本變化」，於是倒轉頭來，要鞭策工業等等去追趕農業了。這樣的「你追我趕」，只因那個「根本變化」既非根本而又非真實之故，以致一着錯，全盤落索；那原已落後的農業竟因之而更落後，原本快速的工業卻因進得太快而傾跌了。

二、怎樣發生這件「了不起的大事」的？毛澤東把「根本變化」的表象當成了實質，主要的原因，除了上述之外，又由於他根本不查問一下，究竟這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是怎樣發生的。在〈序言〉裏，他提出過問題：「農業合作化的進度這樣快，是不是在一種健康的狀態中進行的呢？」這問題當然問得很好。如果他認真、冷靜而客觀地去尋找答案，那末，他當能看到那個根本變化的真相和實質，因而可能收回這個宣佈吧。不幸事實並非這樣。緊接着問題，他便自己斷然回答道：「完全是的」，理由呢？他舉出了兩個：第一，「一切地方的黨組織都全面地領導了這個運動」；第二，「群眾已經看見了自己的偉大的前途」。這兩個理由完全透露了一架全能主義官僚機器的最高領袖的可怕處境和他可憐的思想。同時，它們又暴露了毛澤東式「調查研究」的不濟事。一切事，只要是在黨組織的全面領導之下的，就已是足夠的保證，保證它們是「在健康的狀態中進行」的了。這種論斷，其實只是如下一種邏輯的應用，它就是：因為黨領袖的英明領導是永遠正

確的，所以在他領導之下的一切黨組織的領導也是永遠正確的。因為黨組織的一切領導是永遠正確的，所以在它們領導之下的任何工作也不可能沒有錯誤的。依據這個邏輯，黨領導成了正確或健康的同義詞，黨組織的本身就是正確與健康的本身。因此，當你要「調查研究」一件事進行得是否正確，只要問它是否在黨領導之下就得。至於黨領導之絕對正確與永遠正確，那是完全不成問題，而且根本不許成為問題。

這種態度是羅馬教會那個「教皇永不犯錯」，「教會永不犯錯」態度的翻版，是史大林官僚辦法的承襲，與馬克思列寧的科學的革命精神毫無相同之點。

當然，你也許會說，毛澤東這句話恐怕只是一時「語病」，因為事實上，他搜集、批閱和編訂了這樣一大批第一手資料，已經足夠證明他也在查究地方組織領導工作的是否健康了。對，他是在調查，不但調查，他還在不斷地清洗這些組織哩。可是問題不在於調不調查，問題更在於目前中共業已形成的那種制度和作風是否還能讓毛澤東調查出個什麼來。

由於瘋狂的個人崇拜，由於全能的官僚獨裁控制，毛澤東要想在他部下所寫的文章或報告中，看到一句半句他未曾說過或不準備說的話，那簡直比在沸湯裏找活魚還難。地方組織的所有文章報告，不是遵旨上奏，便是先意奉承。其中不會有一點異見，更不會有絲毫批評。它們只能把下面的實況砍之削之去湊合上級命令的框框，卻不敢把框框以外或不合框框的真情反映上去。領導上發給下級的命令，行得通固然拼命去行，以便爭取上級的表揚；如果行不通的話，幹部們也得不顧死活去行，或者裝模作樣去行，以此表示他們自己有辦法，有能耐，讓上面賞識；如果終於無法「克服困難」，行糟了，那他們就

來一個憂報喜，凶報吉，同樣「證實了」上級領導的永遠正確。在這樣的一個系統和這樣的一種風氣中，毛澤東縱使有萬分誠意，想從那些報告中調查研究自己政策的執行結果，試問又怎麼能夠？從那些報告中，他所看到的只是自己意見之較好或較壞的摹擬，以及自己愛憎之誇張的與虛偽的發揮。「上之所好，下必甚焉」，上之所憎，下亦必甚焉。毛澤東想從這些報告中看到自己政策的正確反映，實際只是聽到了擴大到可怕程度的自己說話的回聲罷了。

當毛澤東在湖南向「窮秀才，破產的商會會長，錢糧師爺與小獄吏」作調查研究時，他可能得到點真實知識的，因為那時候，他「給他們當小學生」。可是到了1955年，當毛澤東做了中國歷史上權勢空前的統治者之後，當全中國的黨政幹部與非黨幹部都必須依照「毛澤東思想」說話和辦事的時候，這樣的調查研究便絲毫科學性或客觀價值都沒有了。

因此，以黨組織領導來證明合作化運動的正確進展，是不能成為理由的。

毛澤東所舉的第二個理由也是不能成立的。他說：「農民是那樣熱情而又很有秩序地加入這個運動。他們的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最廣大的群眾第一次清楚地看見了自己的將來。」他們是從哪裏看見了「自己偉大的前途」的呢？據說是從五年計劃中。「在三個五年計劃完成的時候，即到1967年，糧食和許多其他農作物的產量，比較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的最高年產量，可能增加100%到200%。文盲可以在較短的時間內（例如七年至八年）加以掃除。許多危害人民最嚴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蟲病等等，過去人們認為沒有辦法對付的，現在也有辦法對付了。」

毛澤東的這番話無異在說：中國農民與全世界的農民根本不同。人家必須從長期痛苦的經驗中，必須從親自體驗的利害比較中，才能逐漸放棄小有產者的資本主義的偏見，才能接受半社會主義或社會主義的經營方法。中國農民卻只要看見中共擬訂的三個五年計劃的數字，只要聽到將來計劃完成後的美好光景，就能夠大徹大悟，心服情願地聽從黨組織的領導了。他們有熱情又有秩序地加入了這個運動，並且將自己的生產積極性提到空前高漲的程度。

如果毛澤東這個理由是符合實情而又正確的，那末，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便是錯誤的；恩格斯和列寧關於小農所說的一切話都是錯誤的。

英國人有句諺語：「你能夠趕馬入水，卻不能強迫馬兒喝水。」同樣，你能夠用命令（甚至像史大林當年用過的機關槍）在「幾個月時間」驅使五千幾百萬農戶走進合作社，卻不能用同一方法提高他們的生產積極性。

三、是科學家的鄭重先見呢，還是占星家的輕率預言？在〈序言〉中，我們還看到了毛澤東愛給重大事件開出期票的特點。他說：「只需要 1956 年一個年頭，就可以基本上完成農業方面的半社會主義的合作社。再有三年到四年，即到 1959 年，或者 1960 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會主義到全社會主義的轉變。」一個革命思想家，當然有權利預言。甚至可以說，革命理論家的最大力量恰恰在於他對事變發展能有所先見。在預先指出事變的發展時，大體用上幾個年份的數字，當然是允許的，有時也是必要的。但是這樣做的時候，首先要使這個確定的年月數字實在是分析了過去和當前種種條件的結果；其次，這個確定的數字，又必須是鄭重分析今後種種條件的結果。只有這樣的時間數字才是必要的，才對事變的推進有幫助，才對政策的實

現有好處。否則，時間預約變成不兌現的期票，非但於事無補，而且大大有害：因為預約者的喪失信用事小，全盤工作因時間表之錯誤安排而遭致嚴重損失則事大也。

毛澤東愛定時間，愛以明確的數字來規定時間。當他這樣做的時候，卻很少注意到我們上面所說的鄭重分析。他總是直覺地估定，隨隨便便出口，為了宣傳，為了好聽。這樣的時間數字，當然不會比《燒餅歌》上的預言有更大價值，但是有無可比擬的更大害處。

星相「哲學家」們給你談了流年終身，到時不靈，充其量不過讓你損失少數金錢；一國元首給國計民生訂定了計劃，預言「交運」，「旺財」之期，如果一再失誤，卻關係着幾億人民的休咎，關係着無數財富的得失。

毛澤東的「張鐵嘴」作風，便曾造成了莫大損失的。下面我們將約略談談「毛澤東思想」在這一方面的表現。

不過首先請讓我談幾句題外的話。中國舊文人對於數字的態度，不是玄妙的，便是文學的，卻從來不是科學的。他們從數字中看出來的意義，多的是神秘的象徵，少的是確切的關於量的概念。毛澤東雖然不迷信，卻是個詞人，他的數學又是「蹩腳得可怕的」（他的數學老師徐特立給下的評語，見《西行漫記》。），這就使他很自然與很出色地繼承了這個傳統。這個傳統，當他將外來的共產主義拿來中國化的時候，也曾起了不小作用的。譬如：「三大……」、「八項……」、「五反」、「四清」之類，不僅見之於通俗的口號標語，而且見之於鄭重的政策政綱。這類用語，在宣傳藝術上自有其不可否認的價值，因為它們易懂、易記、合乎中國人傳統的語法和想法。這是毛澤東在繼承了中國文人「數字傳統」的好的方面。

可是還有它壞的一方面，而且這方面為害之烈，其壞之甚，卻是大大超越了它的好處的。

當毛澤東以經濟政策與經濟建設的最高指導者資格出場時，他的那個詞人式的數學頭腦便闖其大禍了。無論什麼數字，不管它是關於時間年代的，也不管它是關於經濟資料的，或關於統計數值的，毛澤東都貫徹他那種詞人態度：粗枝大葉，不求精審，以意度之，稱心為尚。像「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之類的時限和數字，在詩詞裏固然不失為好的詞藻；但他以同樣態度，應用它們於經濟計劃之中，應用它們於有關此等計劃的指示之中，那又怎能不貽害無窮呢？

在〈序言〉中，毛澤東給農業方面半社會主義合作化的完成期定為一年，給半社會主義合作化到全社會主義合作化的轉變定為三年到四年。這個「一」、「三」、「四」的數字是怎樣定出來的？僅僅從一個事實推算出來，那便是：「幾個月時間，就有五千幾百萬農戶加入了合作社」。但是這裏的「幾個月」，究竟和「一、三、四」年之間有着怎樣事實上與邏輯上的關係？文章中完全沒有告訴我們。

也許毛澤東是考慮過這些關係的吧，不過事實證明；他即使考慮，也決非鄭重的。他定下了時限而毫不受其拘束；時限讓事實超越了，他從不加以交代；他時常以甲時限去代替乙時限，卻絕不給人以解釋。你們看，在〈序言〉中，毛澤東告訴我們：「只需要 1956 年一個年頭，就可以基本上完成農業方面的半社會主義的合作化」。但是事實上，這種合作化的完成，根本不再需要任何時間了。因為有了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號召之後，幹部們就再不耐煩去按部就班搞什麼「半社會主義的低級社」了。他們乾脆將未曾合作化的 40% 的農戶，和其他已經合作化的 60% 的農戶拉在一起，一同躍進到「全社會主義的高級

合作社」去了。因此，在〈序言〉中定下的另一時限：「再有三年到四年，即到 1959 年，或者 1960 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會主義到全社會主義的轉變」，也受到了影響：這個轉變不是在三四年內完成，而僅僅在 1956 年一年之內便完成了。

毛澤東如果對他自己走過的時期看得鄭重的話，對於這兩種合作化的提前實現，應該有個交代與解釋，以便對今後新時限的訂定能有所參考吧。然而不，他根本沒有再作任何檢查，甚至根本不再提起，乾脆把它們忘卻了。

1957 年 2 月，即在毛澤東寫作〈序言〉之後的一年零二個月，在他所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中，提到農業合作化的時候，關於合作化的迅速完成，關於「實際進展」遠遠超過了他 1955 年所定時間表這件大事，他不用一言半語來說明。他只是根據了新的「現實」，又給未來定下了一張新的時間表：「大概需要五年，或者還要多一點時間」，「合作社才能鞏固」。換句話說，那些提前了好多年辦起來的「全社會主義的高級合作社」，雖然成立，卻還不曾鞏固的。據毛澤東的估計，如果它們到了「第二個五年計劃期內」，即到 1962 年或再遲稍許的時候，「能得到鞏固，那就很好了。」

毛澤東這一次的時間表如果真是分析了當時的客觀情況定出來的；定出來之後，如果他又真能鄭重其事地依照這張時間表，切實加以執行的；那末，他不清楚交代舊時間表所以推翻之故，原不重要。因為問題畢竟不在於面子，而在於實質也。

不過事實證明，毛澤東 1957 年的時間表，比他的 1955 年時間表，制定得更加輕率，推翻得更加荒唐。

自從這張新時間表定下來，僅僅過了一年零六個月，即到了1958年8月，那時候，依照〈序言〉的舊表，由低級合作社到高級合作社的轉變尚未基本完成；若依《內部矛盾》報告中所定出的新時間表，則離開全社會主義的高級合作社的「鞏固」，至少還差三年或四五年；但是毛澤東通過那個震驚中外的《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告訴我們道：現在問題根本不再是關於合作社，不再是什麼鞏固或整頓，因為合作社「已不能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了。」現在的問題是：「大型的綜合性的人民公社不僅已經出現……而且……很可能不久就會在全國範圍內出現一個發展人民公社的高潮」……因此，代替着那張過時的時間表，提出一張最最新的時間表：「看來，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麼遙遠將來的事情了。」

同樣是1958年。但是在這一年內中國農村中將能與所能完成的大事，在毛澤東的頭腦中，在前後相距不出三年的時期內，卻能有三種極不相同的想法與估計：在1955年12月，毛氏以為在該一年內將可使大多數低級合作社變為高級社；在1957年2月，毛氏以為在該一年中將開始「鞏固」「全社會主義的高級合作社」；可是一旦正式踏進了這一年，毛氏卻說一切合作社均已過時，現在要辦人民公社，共產主義的實現已經不遠了！

這裏我們不談事情發展的實質，不談毛澤東在此期間一再改變看法是否正確，不談這些改變是否為客觀所需；我們僅僅從他預約確定時限與年數，並隨便改變時限與年數這一點看，也可以充分看出他是多麼的輕率，多麼的兒戲，多麼的信口開河！

不過，以上所述還不是有關此事的最典型的例子，更精彩的還在後頭。

在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中，毛澤東對於「建立社會主義」究竟需要多少年這個問題，給了我們很明確的答案：「有些地方可能較快，三四年內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長一些的時間。」到了那個時候，他說，「它的性質還是社會主義的，各盡所能，按勞取酬。」由這個制度發展到「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還需要一些時候。究竟需要多久？毛澤東沒有給過確定數字，他只是說「然後再經過多少年」。不過由於他接着聲明「不是什麼遙遠的將來」，這個「多少年」顯然不是指幾百年，甚至不是指幾十年。

說了這樣的話之後，又將近過了五年，即是說，到了1963年3月。那時，按照人民公社決議上所定的時間表，中國的社會主義，至少中國農村中的社會主義是已經「建成」了。那時就要準備在並非很久的將來進入共產主義了。可是，正在這個時候，毛澤東又提出了一張新的時間表，據他說：「現在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都還離開『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的高階段很遠很遠。因此，要消滅工人和農民的階級差別，還需要一個很長很長的時間的。」（見《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

這兩張時間表相差得太大了。第一張，對於革命成功才只九年、一窮二白的中國說，在「不是什麼遙遠將來」的「多少年」之後，就可以實現共產主義了。第二張，對於十月革命後已渡過了四十六年，經濟發展的水平比中國高出許多的蘇聯說，共產主義的實現卻還離得「很遠很遠」；它還「需要一個很長很長的時間」。如果將要在中國和蘇聯分別實現的共產主義本質上並無不同的話，那末毛澤東在前後五年內對它能約許了兩個如此不同的時限，實在是令人大惑不解的。

不過，令人大惑不解的還有更甚於此者。

自從毛澤東宣佈蘇聯離開「共產主義的高階段很遠很遠」之後一年，即是說，到了1964年7月，透過另一個基本文件（〈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毛澤東再提出了一張時間表。根據這張時間表，「在政治思想領域內，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鬥爭，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才能解決。幾十年內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幾百年的時間才能成功。」所以他宣佈「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

請大家注意，這回談的不是共產主義了，更不是「共產主義的高階段」，而只是社會主義。這個主義的完全實現，據說都「需要一百年到幾百年的時間。」

既然社會主義的完全實現都需要這麼長久的時間，不用說，共產主義的實現，更得在遙遠的未來了。可是，我們沒有忘記，僅僅在六年之前，毛澤東曾經莊嚴地宣告：「看來，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麼遙遠將來的事情了。」

這是怎麼回事呢？一會兒，說共產主義可以實現於不遠的將來；一會兒，卻又說連社會主義的實現都得在一百年到幾百年之後！如果前一個斷語是對的，那末後一個時限便錯了。反之亦然。但是毛澤東卻能兼包並容，彼此相安，或竟能前後兩忘，說過就算！

如此這般的確定時限與年數，那是多麼的輕率，多麼的任意與不負責任！

當然，輕率、任意與不負責任只是表象。在它後面隱藏着遠較嚴重的實質。透過這個表象，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對於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基本原則是多麼的無知或忽視；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對待重大的經濟問題是多麼的不嚴肅，不科學；我們又可以看出他在處理任何

重要問題時，是多麼的欠缺一貫性，多麼的陷於經驗主義和印象主義的泥淖而不能自拔！

如果聯繫着 1955 年以來中國所發生的實際情形，我們再來研究上舉的那些時限和數字，那就更加可以看出作為「理論家」的毛澤東的弱點。因為那時我們將會看到：毛澤東之宣佈它們，雖然輕率，卻非任意的。原來每一個時限和數字，都是以毛澤東在該一時期的經驗印象為基礎的。「形勢大好」了，共產主義在他「看來」便即將在中國實現；等到形勢一變，三面紅旗倒下來砸壞了他的腦袋了，他就宣佈社會主義的完全實現得在「幾百年之後」。一切都有根據，一切都有基礎——可惜根據的不是真實的客觀，而只是行情性的變化；它們的基礎，不是嚴肅的分析與一貫的認識，而只是毛澤東眼中以幻作真的印象。

* * *

上面，我們主要從毛澤東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角度，觀察了並且研究了他從 1955 年以來如何豎起那三面紅旗，如何對待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的基本問題。我們的研究是極不全面的，因為我們不想踰越給自己劃定的範圍，度量作為經濟理論家的毛澤東的身材。根據上面所說，大體上已經可以讓人看出這個身材高矮了。我們原可以不再詞費。只因人民公社是三旗之中最大最後的一面，毛澤東之提出這個辦法，據宣傳又是他對馬列主義在理論和實踐上所作的最偉大的貢獻之一。因此，毛澤東如何想到這個辦法，如何提出這個辦法，如何決定實行這個辦法，對於毛澤東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實在是一個具有非常重要性的問題。我們還得談一談。

前面我們敘述過：因為在 1955 年夏秋之間的短短幾個月中，中國農戶 60% 以上合作化了，毛澤東從這裏看出了中國情況的根本變化，主張在經濟文化建設的所有方面，都要突破常規，加快發展速度，以便和起了根本變化的新情況相配合。接着，他提出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他又號召了「全民煉鋼」，大興水利的「大躍進」運動。由龐大嚴密的黨機器帶頭，在更為龐大的各種群眾組織的輔助之下，一個「熱火朝天，氣吞山河」的生產建設運動發動起來了。結果，「捷報」像雪片傳來，「奇蹟」不分晝夜出現，弄得北京城裏的中共領袖們歡欣鼓舞，認為馬克思說過的「一天等於二十年」的預言正在實現中。於是，原本被他們認為能促成生產建設戰線上全面大躍進的那個農民生產合作社，現在卻倒轉來成為農業生產更大高潮的障礙物了。必須突破合作社這個小框框，於是「人民公社」這面紅旗就適應需要而升起了。

這是三面紅旗先後升起的程式，也是那幾年事實發展的表面經過。這個程式的推進是否由於客觀群眾的要求，那個表面的發展下面是否有真實基礎，我們已在別的地方討論過，此地不贅^[5]。此地我們只想提出一個問題來談談，所謂合作社妨礙農業生產的更大高潮，因而必須打破這個小框框，必須代之以人民公社這個大組織——這究竟何所據而云然？還有，毛澤東對於這樣一件大事，究竟做了怎樣的調查研究？

關於農業生產飛躍發展這個判斷，中共領袖們所根據的顯然是下級機關送來的「喜報」，甚至是領袖們自己幻想出來的「奇蹟」。不過二者相比，我們看見，「奇蹟」所起作用，還大大超過了「喜報」的。

農業的全盤合作化，最後完成於 1956 年初。這一年，據宣佈，乃是建設戰線上初現高潮的一年。這一年，據劉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

會議上報告，農業生產增長了「4.9%」。1956年又是所謂「右派猖狂進攻」之年。這一年，根據劉少奇的同一報告，因為「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竟然受到了某些人的懷疑。其結果是損害了群眾的積極性，影響了1957年生產建設戰線上特別是農業戰線上的進展。」這就是說，1957年的農業生產沒有增長，也許還減少了。究竟減少了多少，劉少奇沒有發表具體數字，在同一會議上作《農業發展綱要》說明的譚震林也不曾提及。按着便是「大躍進」的1958年了。這一年的農業生產，據譚震林在5月間對中共大會發表的樂觀估計，「如果今年不遇到大水大旱，……全國糧食增長的比例，將有可能達到百分之十幾到二十幾。」

這樣，我們看見了：自從農村中實行了全面合作化之後，一直到合作社被宣佈為「不適應形勢發展的要求」而必須轉變為人民公社，這中間，農業生產的增長率是1956年所曾實現的4.9%，以及1958年所預許的「百分之十幾到二十幾」。

可是，請讀者們注意讀一下同年8月，即在上引劉少奇和譚震林發表報告之後三個月，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特別請注意讀一下決議案的第一節，關於建立人民公社的客觀原因一段。它說：「在克服右傾保守思想，打破了農業技術措施的常規之後，出現了農業生產飛躍發展的形勢，農產品成倍、幾倍、十幾倍、幾十倍地增長。」（加重點是我加的——作者）

所謂「成倍」，即200%；「幾十倍」，即百分之幾千。然而僅僅三個月之前，農業主管人在正式代表大會上提出來當作理想年景的，到1958年的年底，才只希望增長百分之十幾到二十幾哩！

究竟哪一個文件對呢？究竟連百分之十幾的增長都尚待實現對呢？還是兩年來早已增長了百分之幾千對呢？根據那時以前和那時以

後的中共自己發表的文件，再核對一下客觀事實，當然，譚震林的數字是較為老實的——雖然也已經大大誇張了。

然則，毛澤東以及中共中央的委員們，怎麼能全無根據地，顯然與自己剛剛發表的數字完全不符地，甚至跟最起碼的常識都違反地，將「成倍、幾倍、十幾倍、幾十倍地增長」這樣荒唐的數字寫下來呢？要知道這根本不是什麼普通宣傳，不是群眾大會上的鼓動演說，而是中共中央的決議。它還不是中共中央的普通決議哩，而是在一次非常的中委會上關於一件非常大事所作的決議。這件大事與5億以上中國人民的生活有關。這件大事將要在數千年中國的歷史上完成一次空前的轉變。這件大事甚至要在整個人類史上創造一個「建成社會主義和逐步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最好的組織形式」。如此偉大的一件事情，為這件事所作的如此鄭重的決議，其中寫下來的客觀的物質的理由，怎麼可以如此的信口開河，如此的胡說霸道，如此的隨便到近於兒戲？

撇開客觀的需要不談，這裏主要是由於毛澤東那種輕率、大膽、冒險、浪漫與非科學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這種方法自然讓他做成過一些事情，但是也讓他搞壞了不少事情，而在這些搞壞了的事中最大的一件，大概要算這回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了。

在毛澤東決心制定人民公社辦法之前，中共曾經大事宣傳，詳盡地記錄了毛主席親自訪問各地農村的情形。這種宣傳的目的無非想告訴大家：毛澤東始終是實事求是的，走群眾路線的，事非調查研究是不肯輕易舉辦的；所以那些報告竭力報導了毛主席如何不恥下問，如何謙虛和藹，如何一邊學習又一邊教導。總之，這些報告一方面宣揚毛澤東處處落實的工作態度與思想方法，另一方面想證明人民公社首

先是「從群眾中來」的一個普遍要求，然後才是「向群眾中去」的一條指導路線。

事實上，這些報告能發生怎樣的影響，我們不去管它。不過我們卻應該感激它們的，因為正是從這些報告中，我們形象地，因而更真實地看見了毛澤東怎樣「到群眾中去」，他的所謂「調查研究」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下面是摘引自當時各報登載的一篇有名通訊。題為〈毛主席到了徐水〉。作者署名「康濯」【朱正按 康濯（1920-1991），本名毛季常，湖南湘陰人。曾經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學習。擔任過中國作家協會理事。他寫這篇通訊的時候是河北省文聯副主席兼中共徐水縣委副書記。】，日期是1958年8月4日。再過半個月，即到了同月29日，中共中央就要在北戴河召開的會議上，通過《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了。毛澤東在赴會之前，順道訪問了河北、河南、和山東的農村。顯然，這次調查研究，是要給人民公社制度尋找「客觀的事實」根據的。那時人民公社已開始在河南的一兩個地方建立，所以不能說，這次調查促發了毛澤東關於人民公社的思想；但是可以說，毛澤東已經起意的人民公社辦法，經過這次調查，鞏固下來了，堅決起來了，一定要把這制度推廣到全中國（不僅農村，當初連城市都包括在內的），因之寫下了那個北戴河會議的決議，並且轟轟烈烈地，如火如荼地，搞起了人民公社的運動。

現在請看他怎樣調查研究了徐水的。

下午四點半鐘，毛主席由河北省委書記處書記解學恭，河北省副省長張明河，……陪同，首先到了南梨園鄉的大寺各莊農業

社。毛主席精力充沛，滿臉紅光……主席在進門的時候，就已經認識了這個鄉的黨委書記詹登科，社裏的支書閻玉如和社主任李江生；現在，又讓寫了寫他們的名字，並且把每個名字都念了一遍。接着就抬起頭來問他們：

「今年的麥子收得好嗎？」

「很好！比哪一年都強。」李江生回答。

毛主席又問：「每畝平均多少斤？」

支書閻玉如答道：「754斤！」

毛主席笑着「啊」了一聲，讚歎地說道：「不少呀！」隨後又問大秋作物的預計產量；問了社裏的，又問全縣的。縣委書記張國忠告訴主席說：今年全縣夏秋兩季一共計劃要拿到12億斤糧食，平均每畝產2,000斤。張國忠又說，主要是山藥高產，全縣共種了春夏山藥35萬畝。毛主席聽過以後，不覺睜大了眼睛，笑嘻嘻地看了看屋裏的人，說道：

「要收那麼多糧食呀！」這時候，毛主席顯然是想起了張國忠在路上介紹的本縣情況，就伸出又厚又大的堅強的巴掌，算賬一般地說：「你們夏收才拿到九千多萬斤糧食呢！秋季要收11億呀！你們全縣31萬人口，怎麼能吃得完那麼多糧食啊？你們糧食多了怎麼辦啊？」

大家一時都被毛主席問住了。後來，張國忠答道：「我們糧食多了換機器。」

毛主席說：「又不光是你們糧食多，哪一個縣糧食都多，你換機器，人家不要你們的糧食呀！」

李江生說：「我們拿山藥造酒精。」

毛主席說：「那就得每一個縣都造酒精！哪裏用得了那麼多酒精啊！」

毛主席呵呵笑着，左右環顧地看看大家。大家不覺都笑了起來。張國忠也笑道：「我們只是光在考慮怎麼多打糧食！」

毛主席：「也要考慮怎樣吃糧食哩！」

很多人都在私下裏互相小聲說着：「毛主席看問題看得多遠，看得多周到啊！」

「其實糧食多了還是好」，毛主席又笑道，「多了，國家不要，誰也不要，農業社員們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頓也行嘛！」

毛主席親切而很有風趣地笑着，一邊就站起來，要到村子裏去看看。」

讀到這裏，我簡直疑心是在讀《紅樓夢》了。「老祖宗」遊花園，身邊圍繞着一大群夫人、姑娘、媳婦、丫環。她們像眾星拱月似的，簇擁着這位寧國府裏的最高權威，這裏看看，那裏坐坐，千方百計地奉承她，迎合她，逗得那個老太太心花怒放。老太太樂了，偶爾也說上幾句笑話兒，那時這些丫頭，媳婦們便互相小聲說着：「老太太看得多遠，看得多周到啊！」乖巧的王熙鳳，配上那個善體人意的劉姥姥，即席表演了一兩段胡鬧劇，老太太就笑她們小家子氣，說道：「誰教鳳丫頭這麼寒儉來着，像咱們這種人家，一天吃五頓也行嘛！」

璉奶奶就立刻打自己的小嘴巴，趁勢兒又大捧了一陣賈母。大夥兒自然又免不了齊聲頌讚一番。

寧國府裏的老祖宗不可能從這樣的遊玩中摸清楚這個封建大家庭的家境家底；同樣，中國共產黨的主席也不可能從這樣的遊玩中調查出農村合作社的實際情況。圍繞在這個「老祖宗」身邊的，雖然不是珠光寶氣、千嬌百媚的娘兒們；但是這些身穿中山裝的偉丈夫，這些書記、省長、主任和社長們的伶牙利齒，他們的刻意奉承，他們那窺伺顏色的本領，他們那「逗人開心」的能耐，卻決不在於王熙鳳，薛寶釵等人之下的。

不過，讓我們跟着這位現代賈母再遊一兩處風景吧：

從食堂出來，向地裏走去。場裏地裏的社員都鼓掌歡呼，毛主席又接連不斷地揮手點頭，同大家打招呼。毛主席大概是看到地裏做活的婦女很多，一邊又對陪同他的人說：「這裏婦女勞力解放得很徹底哩。」

保定地委書記李悅農告訴主席，說這裏的婦女都脫離了炕台、鍋台、磨台、碾台這四台。主席就說：「是呀！人人都吃食堂，社社都辦幼兒園。」

由於這樣的一問一答一肯定，我們看見，在那時以後的至少整整半年中，全中國農民家庭中的鍋台全給拆了，人們必須每天兩次，在炎日下，或寒風中，走上長短不等的路，上破廟或舊祠堂改成的「食堂」裏去吃那半生不熟的，或焦黃墨黑的公家飯。這辦法給5億農民帶來了莫大的不便和痛苦，卻原來是如此輕鬆地調查研究出來的。

讓我們再往下看吧。

毛主席又看了玉米和穀子，看了糞堆形的山藥……主席聽到那些山藥都是畝產 25 萬斤，有的竟計劃畝產 100 萬斤，不禁又笑問道：

「你們這糧食吃不完，怎麼辦呀？」又對鄉、社幹部說：「糧食多了，以後就少種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兒，另外半天搞文化，學科學，鬧文化娛樂，辦大學中學，你們看好嗎？」

大家都說好，都聽得很高興。有人告訴主席，說這社已經辦起了共產主義的紅專大學；主席又驚喜地「啊」了一聲，笑着直點頭。跟着就走上大道，同大寺各莊農業社告別。

這一段遊園的精彩描寫，讓我們看到了：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立即實現共產主義的可能性又是怎樣調查出來的。

最後——

毛主席到了縣委會，頭一句話就同省委解書記和張副省長說：「這裏的幹勁不小哩！」又對大家說：「世界上的事情是不辦就不辦，一辦就辦得很多！過去幾千年都是畝產一二百斤，你看，如今一下子就是幾千上萬！」

毛主席問了問河北省其他地區莊稼的情況，又了解了一下徐水去冬今春實現水利化和今年抗旱的情況。最後，指示徐水縣委要早抓明年的糧食規劃，要多種小麥，多種油料作物，種菜也要多品種，這樣來滿足人民的需要。又說，小麥地一定要深翻，翻到一尺以上；以後人民就主要吃小麥，玉米和山藥餵牲口，餵豬；豬餵多了，人民就多吃肉。最後說道：「下邊真好啊！出的東西真多啊！」又笑着對大家說：「北京就不出東西。你們說，北京出什麼呀？」

「北京出政治領導，」張國忠說，「出黨的總路線！」

毛主席又嘻嘻笑着，不斷點頭。

這些鳳奶奶們也算真的有能力，哄得老祖宗只好「嘻嘻笑着，不斷點頭」。不過老祖宗給哄糊塗了，充其量不過是叫丫頭打開私己的箱籠，拿出些絹帛珍寶來打賞打賞罷了。毛主席給哄糊塗了可完全不同的，他真的以為在他的英明領導之下，「過去幾千年的畝產一二百斤，如今一下子就是幾千上萬了。」他真的以此作為根據，在十幾天之後草擬的《關於人民公社的決議案》上，寫下了「農產品產量成倍、幾倍、十幾倍、幾十倍地增長」那樣的字句。他真的以為那時中國農業之所患已經不再是「寡」，而是「太多」，而是「大大地過剩了」，所以不但有足夠的物質基礎，讓人人多吃小麥，多吃豬肉，讓玉米和山藥餵牲口；而且有充分的基礎進入農村共產主義組織了。

七點半鐘，毛主席走了。毛主席臉上煥發的容光，把西邊地平線上黃金鮮豔的彩雲照得花團錦簇。……

黑夜，縣委召開了全縣電話會議。鄉鄉社社都在電話會議上向黨和毛主席宣誓，保證今年糧食畝產超過 2,000 斤。……

黑夜……早晨還是不可能辦到的事，十幾個鐘頭以後就不僅辦到，而且被超過。大寺各莊早已醞釀的公社，也在這天黑夜正式成立。樹木全部由集體，房屋也由公社統一分配，社員實行工資制……

我們真得感謝這位隨駕記者的精細描寫。它不但讓我們看到了在人民公社決議擬訂前夕毛澤東所做的調查研究工作（這裏充分表現了毛澤東一般的工作方法），而且讓我們看到了中共已經形成的那架官僚主

義的機器。這架機器性能不壞，效率很高，結構嚴密，行動迅捷。它是非常便於操縱的，而且是在毛澤東的絕對操縱之下。這是好的方面。如果毛澤東想對了主意，把正了方向，只要將電鈕一按，機器開動，行動和效果立見。但這架機器還有另一個方面，還有壞的一方面，那就是：它的嚴密結構靠下對上的完全服從來維持，它的高速的效率憑上對下的絕對控制來獲致；隨着機器的愈來愈龐大複雜，控制者的愈來愈驕縱自滿，紀律的服從或變成盲目的執行，或變成虛偽的做作；上級領導墮落成神化的膜拜，又輔之以最殘酷的鎮壓，以致這架機器的性能大成問題了。效率也許還是很高的，但因上驕下諂成了風氣，批評精神蕩然無存，在上者一味好大喜功，在下者只會推波助瀾，以致這種效率時常向相反方面表現！不是成就大功，而是闖下大禍。

對於尚未腐化的官僚主義的黨政機器言，只有自己行動造成的禍害，而且還得是非常顯著、絕對無法掩飾的大禍害，才能起若干批評作用。在沒有達到這一步之前，每一個動作都要去證明最高當局的「英明領導」，每一個報告都要歌頌上級決定的「完全正確」，每一個結果都要說成是總路線帶來的「偉大成就」。

在這樣情形中，最高領導者要想從下面執行者那裏獲知政策執行的實際結果，當然是不可能的。何況毛澤東方式的調查研究，原本算不得什麼科學方法的，它僅僅是新聞記者的訪問；可是等到後來，特別是當他成了一尊，充分神化之後，那末它的這一套調查研究方法，正如這一位新聞記者所記錄的徐水情形告訴我們的，簡直連新聞記者式的訪問價值都沒有了。我們不想懷疑毛澤東的動機，他仍舊是「實事求是」的，仍舊想先做調查而後取得發言權的，所以他雖已貴踰帝王，卻仍不辭炎熱之苦，不辭跋涉之勞，自行到鄉村去下放幾個小時。也許，他仍然懷着做小學生的心情，去向父老們學習研究的。可是那整

個的官僚機器不讓他這樣做了。眼見的都是逢迎的笑臉，耳聽的都是他最樂聞的答案。「聖意」是昭告過的，根本連揣摸都用不着，人人只要順着這個方向（即所謂總路線），添油添醬，推助渲染，以此去證實主席的遠見，以此去讓「老祖宗」既驚且喜，讓他覺得凡事都一如他之所料，而且還超過他之所料^[6]，因此樂得連連點頭，不斷歡笑。

擁有無上權勢的人也自有其不幸的。一道人為的牆，甚至許多道人為的牆，將他和周圍世界，和周圍的人，甚至和他最親密的人，都隔絕起來。不管他原本是多麼的聰明，一旦被隔離在這道權勢之牆的後面，總就會聽而不聞，視而不見的了。當然，這也是生活決定意識的絕好例子。就拿這篇〈徐水紀行〉中的情形來看吧，毛澤東在和下屬談話中所表現出來的天真、輕信與顛顛，簡直是令人萬分驚奇的。譬如，他聽了縣委書記的報告後說：「你們夏收才拿到九千多萬斤糧食呢！秋收要收 11 億呀！」按常理，亦即按普通人的思想方法，這兩句話接下去一定會問：「這樣大幅度的增加真的辦得到嗎？如果辦得到，那到底是怎樣辦到的？」因為這樣發問才能算作「調查」，這樣追尋才能稱得上「研究」。可是事實上，毛澤東並不這樣問。打上引的說話跟下來，接着他問道：「你們全縣三十一萬多人口，怎麼能吃得完那麼多糧食啊？你們糧食多了怎麼辦啊？」關於糧食收穫量之「成倍、幾倍，十幾倍、數十倍的增長」，關於這個自然界中未曾前見的奇蹟，毛澤東聽了連絲毫驚奇的感覺都沒有；相反，他竟把它當作當然之事，把它當作完全已經實現之事。所以問題不再是研究這個「奇蹟」，而是要以此一奇蹟作為前提，研究如何處置這個奇蹟，如何適應這個奇蹟，乃至使其他種種如何都去追上這個奇蹟了。人民公社及其有關的整套辦法與全部理想，便是以「過去幾千年都是畝產一二百斤，如今一下子就是幾千上萬」這個「科學」結論為前提的。人民公社這個「建成社

會主義和逐步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最好的組織形式」，恰恰因為出現了「農業飛躍發展」這個奇蹟，恰恰因為具備了這個「客觀物質基礎」，才「不得不」設計出來的「上層建築」，以便適應和追上這個奇蹟的！

以這樣的奇蹟為前提，以這樣的「物質條件」為基礎而設計出來的人民公社，焉有不倒裁觔斗，慘遭失敗之理？^[7]

人民公社的試驗給 6 億人民帶來了莫可名狀的痛苦，造成了無法估計的財富損失：而它唯一的好處，就是作為一個最集中與最徹底例子，讓我們看到了整個毛澤東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讓我們確定了作為一個經濟理論家的毛澤東的高度，並且讓我們看到了成為最高權威後毛澤東那種「調查研究」的無用而且有害。

上面，我們觀察了和討論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毛澤東的許多方面。已經夠詳細，而且近乎瑣碎了。現在得總起來說幾句，做個結束。在經濟問題上，跟他在其他問題上一樣，毛澤東始終以民族主義的一國社會主義為思想基礎，以經驗主義為思想方法。這樣的基礎和方法，也曾經在經濟事務和經濟建設方面，大有助於毛澤東這個高明的策略家之成功的。但是，一方面，由於中共官僚主義化的愈來愈嚴重，中共所控制的那架國家機器的愈來愈完備，毛澤東要想憑調查研究去獲得直接經驗的可能就愈來愈小，以致逐漸只能以被官僚機器可怕地加以誇大了的他主觀的意圖或幻想，當作「客觀經驗」，結果，他那策略家的特點再也起正的作用，而只能起負的作用了。另一方面，因為中共已不是某一割據地區的主人，它所面臨的經濟問題，不再是如何克服困難藉以謀取革命戰爭的勝利。它現在是全國的統治者，它的任務，用列寧的話說，不但要在帝國主義的軍事包圍中圖存，也不但要在被嚴重破壞了的窮白國土上從事經濟的恢復和建設；

而且要「趨向於建立一種統一的、依照總計劃由一切民族的無產階級所調節的世界經濟」。面對着這樣一個任務，毛澤東一向發揮作用的那個「自力更生」方針愈來愈不合適，他的一國社會主義的基本思想愈來愈顯出其反動性質，而戰略家毛澤東的弱點也就暴露無餘了。

中蘇兩個共產黨所以會發生嚴重分歧，原因固然甚多；不過其中一個非常根本的原因，卻在於蘇共方面「反」史大林的史大林主義者，和中共方面自命正統的史大林主義者，大家都堅持了和堅持着一國社會主義（或一國共產主義）。

注釋

1. 「日」字疑係「月」字之誤。
2. 據毛氏自己說：「從1932年10月起，直至長征西北的開始，我的時間幾乎全部貢獻於蘇維埃政府工作，將軍隊的指揮權讓給朱德及別的幾位。」（見斯諾《西行漫記》。）
3. 根據各種材料，當1934年10月，紅軍開始長征之時，共有士兵約85,000人，黨政幹部約15,000人，共約10萬。
4. 當中國革命失敗以後，直至紅軍長征以前，蘇聯究竟以怎樣方式援助了中共，至今還不大清楚。我個人只知道1929年至1930年時期，蘇聯每月有一筆款子（大約二三萬元）是經由美國的私人關係匯到上海的。此外，周恩來對當時留學莫斯科的中國學生透露過，聯共將列寧格勒一區所有黨費，按月贈送給中共作為經費。
5. 見本書附錄：《我們對人民公社的認識和態度》。

6. 為了支持和「證實」這個毛澤東調查出來的「農業飛躍」的大奇蹟，當時便四面八方傳來了更大的與特大的奇蹟。隨便舉個例，就像同年8月12日，即毛澤東視察了徐水大寺各莊農業社之後的第八天，中國新聞社從武漢發出來的一則報導說：「連放高產衛星的湖北省麻城縣，又出現了驚人記錄。這個縣的麻溪鄉建國第一農業社，在1.016畝播種『江西早』種籽的早稻田裏，創造了平均畝產乾穀36,956斤的高額豐產記錄。……麻城縣全七萬三千多畝早稻現已基本收割完畢，根據對實收情況的反覆核算，平均畝產達1,232斤，比去年猛增二倍以上。這個縣平均畝產3,000斤到5,000斤高額豐產田有4,900畝，5,000斤以上到7,000斤的有1,190畝，7,000斤以上到10,000斤以下的有530畝，10,000斤以上的有三十多畝。」

如果麻城縣1957年的平均畝產量為300斤，那末依照這個報導，一年之間的飛躍就有2倍，20倍，竟至123倍！中共中央關於人民公社決議上所說的「成倍、幾倍、十幾倍、幾十倍地增長」顯然是以這一類報導為根據，不過做了「謹慎的核實」罷了。

7. 1959年至1961年持續了三年半的「特大自然災害」，據中共說，乃是1960年以後爆發出來的中國農業經濟大恐慌的原因，而且是唯一原因。他們根本否認人民公社政策對此要負任何責任。他們說：幸虧有人民公社，才使這空前嚴重的自然災害不曾造成更嚴重的後果。

事實到底如何？究竟是人民公社這個錯誤政策大大傷害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因而造成了人為的災害，並加重了自然災害呢？還是真如中共所云，恐慌的唯一原因是自然災害，人民公社是幫助了農民去戰勝這些災害，因而減輕了恐慌的？

想用事實和數字來解答這個問題是很難的。這是一個專題，需要長時間的搜集材料，再做一番審核、對比和分析的工作才能有根據地、充分地與肯定地回答這個問題。我們現在不想這樣做。處於目前的環境，我們也無法這樣做。為此，我們只能簡單地指出下列幾點。

- (1) 根據中共官方發表的統計：1958年「遭受水旱災害影響的面積約有4億畝」。1959年「受災面積達6億5千萬畝，受旱災的就有五億多畝，佔播種面積的30%。」1960年「中國有9億畝農田受到程度不同的災害，佔總耕地面積一半以上。」這些數字告訴我們：從1958年起，中國農業就已遭受了大規模的自然災害的。1959年比上一年的受災畝數增加了三分之一點五；1960年比上一年則增加了三分之一不足。

可是從糧食的收成方面看卻是這樣的：1958年雖然有4億畝農田受災，而所收糧食之多，卻打破了中國有史以來的豐收紀錄，造成了農業上的奇蹟。1959年雖然災情大了三分之一點五，而收成卻非但不減，反而比1958年的空前豐收還多了8%。由此可見，自然災害與農業收成之間的關係，並不是絕對的，也不是按照比例大小而增減的。

中共既然高叫着「人定勝天」，拚命強調「主觀的能动性」，認為「人的因素決定一切」，那就更沒有理由將中國那一次經濟上恐慌的全部責任，統統歸之於「天」，統統賴在「自然災害」身上。

- (2) 1958年的「空前大豐收」催促了人民公社這個制度的誕生。並非有了人民公社這個制度才造成農業生產的「奇蹟」的。因此，人民公社不能將特大豐收的功勞攬到自己身上。它不但無功可居，而且還損害了那次豐收的。人民公社這個制度鹵莽滅裂地建立於1958年秋收之際，顯然是「秋季大豐收的勞動力安排不很好，割、打、收、藏的工作進行得有些粗糙」的主要原因（見1959年8月22日《修訂1958年農業統計數字的公報》）。
- (3) 召開於1961年1月的中共八屆九中全會，在公報中首次公開承認「由於在1959年的嚴重的自然災害之後，1960年又遭到更為嚴重的百年未有的自然災害，農業生產計劃沒有完成。」為了在1961年爭取農業生產的較好收成，公報指出了幾個辦法，其中最主要的是：「在農村中必須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貫徹執行關於人民公社和農村經濟的各項措施，切實安排好社員的生活……」以及「迅速採取措施，幫助……家庭副業和郊區農業的發展，增加各種日用品和副食品的生產……活躍農村初級市場」。

怎樣「鞏固」與怎樣「貫徹」呢？當時的農業部長廖魯言在一篇專文〈鼓足幹勁、力爭豐收〉（見《紅旗》1961年第三、四期合刊）中，作了詳細說明，要旨如下：

必須徹底廓清隨人民公社以俱來的那種共產主義的想法和做法。為要做到這一點，第一，必須讓大家來弄清楚「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區別，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與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的區別。」必須讓大家知道現階段農村人民公社所實行的是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其「具體

形式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第二，「吃飯不給錢」的供給制，「在分配給社員的消費的總額中所佔的比例不超過 30%，其餘的 70% 是工資，按各個社員所做勞動工分的多少，進行分配，多勞多得。」第三，「生產投資、管理費用、公共積累和農業稅收等支出的總和，在主要還是手工勞動的社隊，一般應控制在總收入的 35% 左右，而把總收入的 65% 左右分配給社員消費。」第四，「鼓勵公社社員不妨礙集體生產的條件下經營家庭副業，飼養家畜家禽。社員的自留地，除了一小部分作為公共食堂的菜地以外，其餘由社員家庭自己經營。有計劃有領導地組織農村的市集貿易。」第五，大約包括三、四十戶的「生產小隊是組織生產小隊的基層單位，安排農活的指揮權應該歸生產小隊……公社一般領導機關有權根據國家計劃向生產隊提出建議……但是不能不問實際情況，不聽生產隊、生產小隊和社員的意見，任意規定產量指標，機械地安排作物種植面積，硬性推行技術措施。」第六，「生產小隊的利益是社員群眾最直接關心的。堅持生產小隊這種小部分所有制，對於調動社員群眾和小隊幹部的積極性是十分必要的。」第七，「勞動力、土地、耕畜、農具必須堅決固定給生產小隊使用。凡是還沒有實行『四固定』的，必須在春耕以前把『四固定』落實到生產小隊，並且登記造冊，不許任何人隨便調用。生產小隊與生產小隊之間進行協作，必須……自願兩利，等價交換，以工換工，評工記分。」第八，「生產小隊要實行包產、包工、包成本和超產獎勵的制度。三包必須落實，獎罰必須兌現。」

以上八點，大致已從正面指出了，或是反面托出了人民公社在其兩年多存在期間所發生的種種毛病，及其補救之法。總的來說，所有毛病均由於「一大二公」，而所有補救（按照中共的官方說法：「鞏固」或「貫徹」）之法，都在於回復到「一小二私」。

既然文章的意思，亦即按照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決議的意思是：為了要和連續兩年的災荒作鬥爭，為了爭取 1961 年的農業豐收，必須從「一大二公」的原則落實到「一小二私」的方針，必須憑此方針去「進一步搞好人民公社的經營管理工作」，那末問題不是很清楚嗎？過去的農業災難，如果不是全部，至少是它的主要部分，應該由「不落實」的人民公社負責的。我們說 1960 年開始的，連續數年的中國農業經濟的大恐慌，證明了人民公社原來計劃的失敗，不是也很清楚嗎？

十一、歷史地位——論風流人物

我們從各方面研究了毛澤東思想。最後，我們還得談一談毛澤東這整個人物，談一談他事業的功過，談一談他在縱的歷史與橫的世界上的地位。

「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說？」——毛澤東自己在一首詞裏發泄過的感慨，這裏我們卻想來試做一個交代。

衡量人物，與衡量任何事物一樣，首先得選好一個標準，一個尺度。人物之所謂偉大或渺小，很難在絕對的意義上顯示，而只能在相對的與比較的意義上確定的。

用以衡量一個革命家的尺度，自然應該是革命家。人們不能拿袁世凱和孫中山比功業，更不能在俾斯麥與馬克思間論高下：類型不同，無從比起。

中國有句古話說：「擬人必於其倫」，就是這個道理。

同樣道理，又可以反過來看的：一個政治家拿歷史上的什麼人來和自己相比，總是毫不含糊地泄漏出他是屬於哪一類型的人物。孔夫子夢見周公，諸葛亮自比管樂，史大林從伊凡雷帝的鏡子裏欣賞自

己，蔣介石將「曾文正公」的家書當作他本人的手諭——這中間，不但透露出相同的性氣，而且表示出了相同的抱負，甚至相同的階級立場。

列寧認為：「馬克思的尺度乃是測量人類用的最巨大的尺度」（見托洛次基《自傳》：《列寧的死和政權移轉》一章）。所以他雖然「永不在歷史的鏡子裏照面，永想不到後人對他會懷着怎樣的感想……」（盧那查爾斯基語）但據列寧夫人告訴我們，當他死前不久，卻曾注意地，也許感動地，一再讀了托洛次基將他和馬克思相比的文章。

這是十分自然的，列寧只能以馬克思來自況，只能以馬克思來自勵。

人們也只能從馬克思這個「最巨大的尺度」，才能確定像列寧那樣偉大的身型與崇高的地位。至於俄羅斯歷史上那些「偉大的」沙皇們，在列寧的詞彙中，永遠與「劊子手」和「絞刑手」聯在一起的，他們與列寧屬於絕對相反的類型，又怎麼可以相比？又怎麼可以拿來測量？

然而，史大林和毛澤東的情形卻非常特別。他們一方面雖以馬列主義者自居，即是說，他們以今之馬克思或今之列寧自命；可是在另一方面，他們卻又自擬於古之君主，沾沾自喜地同各自的「偉大祖先們」較文采，比武功。

為什麼有這種不同呢？

因為：列寧所代表的是純粹與徹底的革命；而史大林與毛澤東所代表的卻是既革命而又反動的一個矛盾的混合體。因此，對於列寧，以及次於列寧但與列寧同屬一型的真純的社會主義革命家們，我們只

能用馬克思這個唯一的尺度去評價其意義，去確定其歷史地位；但是對於史大林、毛澤東以及他們的同類人物，都可以，而且也應該用雙重標準去測量的。我們必須一方面從馬克思列寧型的革命家角度去測量他們；另一方面從過去歷史上那些進步的與反動的大統治者的鏡子裏去觀察他們。

這裏我們自然不談史大林，只論毛澤東。

毛澤東如果站在馬克思和列寧這兩個巨人身旁，其高度縱然能高及膝頭，卻總不能升達他們的腰際。在這方面毛澤東似乎有自知之明的。從來毛澤東的言論與行動，都甚少想到從馬列二人的著作中去找根據。他之所以如此，一半由於語文上的限制，而更重要的一半卻由於他心智上的隔閡。關於政軍二方面的行動，他覺得中國土生土長的理論和經驗，已有足夠的智慧可以汲取。從國外輸入的，只要共產國際的若干決議，史大林的少數著作，已經夠他受用了。這些東西，在毛澤東的眼中，也不是了不起的，其主要作用，與其說是做他行動的理論指導，毋寧說是替他的獨自行動作辯護的幌子。毛澤東至少在他從事最近這次國際思想戰之前，根本不曾普遍與深入地研讀過馬、恩、列三人的基本著作。更不必談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另一些理論家們的作品。史大林的著作，如我們前面所述，他是讀過了，但也只限於《列寧主義問題》，以及另一些不收在該書中幾篇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文章。因此，若從社會主義的知識和理論的水平看，毛澤東不但對馬、恩、列三人是望塵莫及，便是與第二第三兩國際鼎盛時代的那些其他領袖，例如與未曾變節以前的考次基，與盧森堡、梅林，與普列哈諾夫、托洛次基、齊諾維也夫、布哈林等人，都有着很大距離。事實上，毛澤東所掌握到的共產主義或馬克思主義，僅僅是幾個大的方面，僅僅是幾條一般的原則，僅僅是有關組織和行動的一些方

法，而所有這些，特別是那些方法，又都是史大林工廠裏製造、冒名列寧的假貨色。所以毛澤東這個名字在世界共產主義革命理論家的譜系中，所能佔據的地位是很小的。倘就馬克思主義的創造性的發揮上看，那他甚至還根本沒有地位哩。

不談理論家，僅就馬克思列寧型的革命家標準看，毛澤東的地位是否會高得多呢？是的、會高得多的，但也決計高不到與那標準齊肩的地步。這裏最大的原因是：在馬克思與列寧那裏，永遠是原則決定問題，而毛澤東卻與史大林一樣，總是準備拿原則來交換一時政策上的便利。實例甚多，在本書適當的地方曾經講過了。

在馬克思與列寧的尺度前面，毛澤東顯得非常渺小的還有國際主義者這個身份。儘管他讀了《共產黨宣言》以後，毛澤東就知道了，也接受了共產黨人那個「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基本口號，但是實際上，這種國際主義精神卻完全不曾進入毛澤東的靈魂裏。中國以外的世界，在毛澤東只是觀念上存在的東西。那些地方的無產階級，跟這位成長在華中農業地區的知識分子既無生活上的接觸，亦無精神上的交流。他對他們是陌生的，不了解的。在中國革命的進展中，毛澤東從蘇聯所給與的物質援助與精神援助上，首次體會到了「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真義。但因蘇聯在史大林當權之後，那種援助在錯誤的乃至反動的政策之支配之下，結果卻促成了中國革命的失敗，以致毛澤東在這中間僅僅獲得了中國革命必須自力更生的教訓，鞏固了他的民族成見，鞏固了他的非國際主義的成見。等到中國革命成功了，以及成功後他所統治的中國和史大林統治的蘇聯之間所發生的關係，那就最後打消了毛澤東心中「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理想。今天，毛澤東雖然以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革命派領袖自命，可是實質上，正如我們在有關中蘇爭論的兩章【朱正按 指《毛澤東

思想與中蘇關係》一書。】中所指出，促成毛澤東出來扮演真正國際主義者這個角色的，主要是他所代表的中國的民族利益或國家利益，並不是什麼國際主義。這和列寧當年之完全站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革命立場上，完全站在馬克思主義的原則立場上，始終一貫地，不計成敗利鈍地，反對修正主義，根本不可同日而語。

站在馬克思與列寧這兩個偉大標準旁邊，毛澤東的身型顯得最為渺小的，乃是在領袖神化這個方面。馬克思與列寧都非常看重領導和權威的意義；但因他們是徹底唯物史觀的闡明者，是真正無產階級的領袖，所以他們最懂得偉人和天才在群眾的歷史運動中的適當地位。他們一方面是決不「妄自菲薄」，當仁不讓，另一方面卻更不「妄自尊大」，把自己的作用擴張到不相稱的、甚至荒唐的地步。他們是始終謙虛的。馬克思窮困一生，未嘗當權，所以他的謙遜還不曾有充分表現機會；列寧及身成功，當上了國家、黨乃至國際共產黨的領袖，可是他的謙虛平易作風，非但不曾因此稍有改變，而且因實際責任的重大，在這方面更加警惕了。例子是很多的，但是最清楚的要數1920年4月23日，他在俄共莫斯科委員會給他慶祝五十生辰大會上的表現。在那次大會上，他沒有公然斥責那些好心為他祝壽的同志們。他感謝他們——為的沒有叫他聽祝壽演說，沒有聽那些縱非無聊，卻屬多餘的恭維話。其次，他拿了一幅諷刺祝壽的漫畫給大家看，希望大家看了之後，「今後根本免去這種祝賀儀式」；接着，他引證了考次基還是傑出的社會主義者時候寫的一段文字，其中說到「轟轟烈烈的俄國革命運動，也許會成為有效的手段，足以剷除在我們隊伍中^[1]開始蔓延的萎靡不振的庸俗習氣和狹隘小氣的政客作風……」最後，他說，「這段話使我想起我們黨目前可能陷於十分危險的境地，即陷於驕傲自大的境地，這是十分愚蠢，可恥和可笑的。大家知道，一些政黨在它失

敗和衰落之前，往往會驕傲自大。……我希望我們無論如何不要使我們黨落到驕傲自大的黨的地步。」（見《列寧全集》中文版，第三十卷，484-486頁。）

這裏讓我們看到一位多麼樸素，多麼高超，多麼有遠慮與多麼徹底的大革命家！在這種並不鋪張的（沒有後來史大林時代同樣儀式萬分之一鋪張的），完全出於同志誠意的（其中絕無由上面安排的成分的）祝壽會上，列寧卻已經無法忍受了。列寧是絕對不會容許，也絕對不能容忍頌禱與諂諛的，哪怕是一點點的阿諛，哪怕是真實的稱頌，他都要提出反對，要提出警告。這樣做不單單為了謙虛的美德，更為了這種無聊習氣會使一個政黨墮落，會使它衰敗。

可是，列寧在二十年代初期諄諄告誡的事物，他所竭力反對的習氣和作風，等到十年以後，在他所締造的黨內和國家裏，不但一一出現，而且以最狂妄的方式出現，以一種比普通官僚國家中所習見者還要嚴重千百倍的方式存在着。等到列寧五十生日之後的第十九年，當史大林做他的六十大慶之時，那種列寧所憂慮的「驕傲自大」，那種無聊庸俗，在史大林神化手術中簡直達到了人類史上空前荒唐的程度。

光從大革命家鄙棄虛榮這個必不可少的特性看，列寧與史大林二人的身型高矮，也已經有天壤之殊了。

而毛澤東的身型，顯現在這個問題上，恰好與史大林看齊，因而無法望到列寧項背的。

毛澤東表面是謙遜的。人們還能指出，迄今為止，他還不曾大做生日呢。不但不做，而且還在黨的決議上規定，根本不許給在生的黨領袖們祝壽，也不許以他們的名字去「佔有」工廠和街道。這是事實，

但是這個事實，人人能夠看到，一點也不妨礙中共所推行的瘋狂的領袖崇拜，特別是毛澤東崇拜。

毛澤東的表面謙虛同他實質上的最不謙虛，應該怎樣解釋？它的原因何在呢？客觀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當然在於中國經濟文化的一般落後，在於中共與中國革命的深厚的農民基礎，它們無疑給了偽善、官僚習氣與領袖膜拜以適於生長的氣候和土壤。不過在主觀的、思想意識方面，我們還不能不從毛澤東的儒家思想中去尋找根源。儒家是講謙德的，而實際上卻是最不謙虛的。因為首先，儒家的謙，和他們的全部的所謂「禮」一樣，嚴格地受着階級與階層的限制，它與庶人與小人無緣。謙，只實行於「君子」之間。它是實行於封建貴族上層社會中的一種行為守則，因而不適用於對下的關係（「禮不下庶人」），更不適用於對一般勞動者的關係。其次，儒家的謙，還受天命說的決定。「生死有命，富貴在天」，構成了儒家階級學說的基礎。它抵消了某些儒者——例如孟軻——的一些改良主義成分，它窒息了任何民主主義的萌芽，給一切成功了專制暴君的存在作了護符。可是在同時，這個「天命所歸」或「天生德於予」的信心，有時也能使暴君謙虛起來，甚至會擴大到自己的階級之外。他們愈是相信自己的天命，愈是有恃無恐，就愈能「謙恭下士」，愈能「紆尊降貴」，去同小民們「同甘共苦」。這時候，我們便見到表面上的異常謙虛與實質上的最不謙虛聯在一起了。在這種人身上，最狂妄的優越感往往以最謙虛的形式表示出來。

毛澤東的外表謙虛與他內裏的最不謙虛，應作如是觀。

當然，限制了儒家謙德的那種階級觀念，在毛澤東身上換上不同性質。他不代表舊式地主貴族，但他代表着一種新式貴族，一種以共

產黨人為中心的官僚貴族。要明白這種貴族，我們就得看一看列寧與史大林關於共產黨的不同看法。

列寧的見解是這樣的：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這個先鋒隊有別於本階級的大軍，乃至有別於其他所有的勞動者，只在於前者的階級覺悟比較高，他們的政治認識比較清楚，並且其中大多擺脫了一般謀生的職業，傾其全力來從事社會主義的革命。因此，列寧雖然將先鋒隊（他自己是其中的一員）與非先鋒隊加以區別，但沒有將這二者劃成兩個等級、更不認為二者之間有什麼本質的與不可逾越的差別。

史大林修改了這個觀念，他提出了那個有名的說法，「布爾雪維克是用不同材料造成的」。根據這個認識，共產黨和無產階級以及一般的勞動群眾，不再僅僅是先鋒隊與後續大軍的關係，卻是兩種天生不同的人的關係了。前者用較高材料製成，後者用次等材料製成。因此，前者指揮，後者被指揮；前者役人，後者役於人；前者天賦特權，後者天生無權。從這個認識引申，共產黨中的領導者，當然用最上等的材料造成；而領袖中的領袖史大林，不用說，那是由造物主特選的無以上之的材料來製造的了。

史大林這個學說遠遠地向後倒退，退過了十七八世紀法國啟蒙運動諸大師的主張，回到了最反動的基督教的「上帝選民」與「先知」的謬論。

毛澤東完全接受史大林這一個謬論，並使這個外來的「真理」和他固有的儒家「天命」之說結合了起來。於是，中共變成了從上而降，從外而入的中國工農的「解放者」，而毛氏本人則成為「天命所歸」的「大救星」。

就這樣，史大林與毛澤東的「謙虛」一方面為新的「階級」，即為共產黨人的特權地位所限制，另一方面為最反動的神權說所決定，他們不管嘴上說得多麼謙虛，而實質上卻是最大的僭妄。這，和列寧之真正從工農大眾的民主出發，真正以勞動者的一分子自居，真正棄絕過去一切統治者們的庸俗與小氣，真正做到無產階級大革命者的樸素與謙虛，那是根本不同的兩回事。

由此可見，站在「測量人類用的最偉大的尺度」前面，毛澤東的身型確實矮得可憐；特別在個人崇拜與領袖神化這一點上，簡直顯得渺小而醜陋的。

然則，站在「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一直到孫中山」的尺度前面又如何？

那當然是不同的。如何不同？讓我們先看看這尺度本身。

如果馬克思列寧的尺度主要標誌出無產階級革命，國際主義與平民精神，那末，「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直到孫中山」這個尺度，主要代表的乃是漢民族的民族主義，專制一統的君主絕對主義，以及等級嚴明的官僚主義。

這個尺度也就是中國數千年來的所謂「道統」。它一方面以漢民族的崛起、鞏固、圖存與擴張的傳統為經，另一方面以儒家的綱常倫理為緯；二者互為因果，彼此影響，編織而成的。在整個中國的歷史上，它繩繩相繼^[2]，在各朝各代的偉大人物身上體現出來，而一切自命為聖賢之人，也都以此道統為自身努力的標準，並且拿它來作為評量他人成就大小的尺度。

久遠的且不談，就拿毛澤東所舉的四位「先進中國人」來說吧，他們「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找尋真理」；可是在本質上仍然受着這個道統支配的。洪秀全、康有為、嚴復三人當然如此，就是孫中山也是如此。

將孫中山排在這個道統之末，不能說單單由於戴季陶蔣介石們的別有用心，孫中山自己也確有此一抱負。在他提倡的三民主義中，雖然包含得有民主和民生，但歸根結蒂，這二者都還是為了民族。對於孫中山，正好像對於清末所有的志士一樣，復興民族是主，是目的；至於其他的主張則全都是輔，是手段。孫中山正為的要完成民族主義，所以他一方面要推翻那個統治了漢族達二百餘年的異族專制，另一方面，要將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甚至社會改良主義），拿來替換那個腐敗無能的君主絕對主義。他這是處在新的時代，站在新的階級基礎上，承繼着並且企圖更加發揚這個道統的。

不用說，這個樣子的承繼和發揚，在一定意義上已經在離開這個道統，已經在部分地否定了這個道統。但是總的說來，孫中山這個人物，在中國歷史的發展上所佔地位，恰恰要用這個尺度來評量，而且也只能用它來評量，才能顯出他應有的高大。

毛澤東比諸孫中山，自然離道統更遠，其所否定的部分，也比較的為大；但是無論如何，他總不曾遠到和大到不適於用此尺度來評量的程度。事情恰恰相反。要徹底了解毛澤東，要估定毛澤東的真正意義和地位，正如我們在前面章節中所述，倒是非用這個道統來做尺度不可哩。

從這個尺度望出去，我們便看見毛澤東利用俄國人所曾用過的方法，把以漢族為主的中國人提高到空前未有的高度。從這個尺度望出去，我們便看見在人民政府的形式下，毛澤東已經將集權一統的政制發展到了極致。從這個尺度望出去，我們便看見在處處組織與層層領導中，毛澤東已經把尊卑長幼的等級官僚主義完成到理想的程度。

總之，無論從個人角度看，或者從全體中國人的角度看，毛澤東站在「文武周公孔子」這個尺度前面統是非常合適的，而且非常巨大的。以個人論，他是英雄得意，「帝業」成就；對民族言，則不但使赤縣神州免於淪亡，而且讓炎黃子孫揚眉吐氣。這般功業，縱使尚未能超越成吉思汗，卻已邁過唐宗漢祖了。

自從人類的歷史進入到以世界為單一舞台之後，以漢民族為主的中國人，一直居於被奴役、被鄙視的地位，起着可憐與卑屈的作用。中國政治家，自從在清末被資本主義的風暴強拖進國際事務中去以來，一直扮演着被人揶揄，受人欺壓的小丑角色。透過這些「代表們」，中國人的臉是丟盡了，氣也是受盡了。結果是：小部分、主要是那些高高在上的中國人，便根本喪失了自信，在外國帝國主義面前徹底認輸，變成了十足的奴才；另外的最大部分中國人，在重重的恥辱和壓榨之下，深深感覺到民族自傲心的受到損傷，他們被激怒了，吼叫了，起來反抗，他們成了反對國外侵略者與反對國內洋奴的革命者。近百年來，中國發生了前後相繼的動亂和革命，無數中國人拋頭顱，灑鮮血。所以然的原因是很多的；但是其中有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民族自傲心的尋求滿足。這個具有數千年悠長文化歷史的漢民族，決不肯長期屈居人下，遭受欺凌的。他們要翻身，他們要不受鄙視和輕視，他們要在現代國家的行列中縱使不佔據主要地位，至少要佔據平等地位。

不過，為要實現這個願望，得通過頗為艱苦曲折的鬥爭，得經過很不短暫的時間。自從鴉片戰爭以來，從洪秀全的太平天國，中經維新變法，辛亥革命，以及1925年開始的革命的發展，一直到蔣介石領導的抗戰「勝利」——在此時間內，希望不斷出現，失敗卻很快跟來。中國人以血淚換來的代價，往往只是夢想的破滅。同時許多次「民族地位」的抬高，實際上卻是更加屈辱的嘲笑。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中國被捧為「四強」之一了，而其實呢，事事隨人擺佈，處處被人鄙視，「勝利」歸來的國民黨中國，無論在內政外交上，實比過去更明白地仰美國人的鼻息了的。

蔣介石國民黨之失盡人心，不小原因是由於它違反了這種民族自傲心的復興運動。

同樣，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的勝利，在不小程度內，也得歸功於他和他們對這個自傲心的尊重。

中共軍隊一進大城市，平素那些趾高氣揚不可一世的洋大人，忽然變得服服貼貼，老老實實了。

這是中國百年來的第一次。

中國派出去出席國際會議的代表們，或者受人尊重，或者遭人痛恨，卻再也不扮演讓人操縱的傀儡，或叫人取笑的小丑了。

這是中國百年來的第一次。

在國際政治舞台上，中國人對敵人敢於怒目相向，敢於以牙還牙：對「朋友」不肯奴顏婢膝，在「一面倒」中不肯放棄自己立場，於必要時還能說個「不」字。

這也是中國百年來未曾有過的事。

這些事，既然都是毛澤東領導下的黨和國家給中國人幹出來的，那末，他在「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這個尺度之前身長如何，也就不言自明的了。

當然，將中國國際政治地位大大提高了的，是中國工農大眾勝利的革命，決不能歸功於毛澤東個人，也不能歸功於他的民族主義。但是在一般人眼中卻最容易造成這樣的錯覺，而毛澤東正是利用這個錯覺，將所有這些都歸功於己，以此造成了個人膜拜制度。

不過我們這裏不想再來討論前面業已充分討論了的問題。在這裏，我們只想指出一點，即：毛澤東在自己「偉大祖先」面前愈顯得是好子孫，那他在馬克思列寧面前便愈顯得是壞學生。本來這兩個尺度並非絕對衝突的，也並非在任何意義上都是不相容的。問題第一在於你到底認哪些偉大人物作自己的祖先。第二在於你的「民族主義」在國際主義中佔着怎樣的地位，多麼大的比重；又在於當「民族主義」在革命過程中業已完成了它的進步作用，開始在發揮反動而有害的作用時，你是否能及時與堅決地遏止它，反對它，拋棄它。

關於第一點，我們又想借用列寧的文字了。在〈論大俄羅斯人的民族自傲心〉一文中，有一段與我們正在討論的問題極有關聯，文字如下：

我們大俄羅斯覺悟的無產者是不是歧視民族自傲心呢？當然是不歧視的！我們酷愛自己的語言和自己的祖國，我們最努力於把祖國的勞動群眾（即祖國十分之九的居民）提高到民主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覺悟生活的程度。我們因目睹皇朝創子手、貴族和

資本家對我們這個美妙祖國肆行橫暴、壓迫和侮辱而最感傷心。我們因這種暴行在我們人民中間受到反抗，因為這些人民中間產生了拉吉舍夫，十二月黨人，七十年代的平民知識分子革命家，因大俄羅斯工人階級在1905年造成了群眾的革命黨，大俄羅斯農夫在當時已開始成為民主主義者，開始推翻牧師和地主等等事實而自傲。（見《列寧文選》兩卷集，897頁。）

這段文字在我看來，已經很清楚地解決了我們所提出的問題。原來列寧以自傲的偉大的祖先，不是可怖的伊凡，不是彼得大帝，不是羅曼諾夫家族中任何一個「明君英主」——雖然站在歷史觀點上看，既然某幾個沙皇多少對大俄羅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對於俄國的西方化，盡過一點力，因而也可以說，是比較進步的。列寧也不曾把蘇伏洛夫與庫圖左夫一類傑出的將軍當作「民族的驕傲」——雖然他們的赫赫戰功，如果從大俄羅斯人的「愛國」立場看，確乎值得自傲的。列寧當然更不曾把東正教中的任何一位「聖潔的」主教當成民族自傲心的原因——雖然在寬廣的意義上說，東正教對於大俄羅斯人的民族文化，包括列寧所提及的語言在內，確實有過多少貢獻的。列寧是最懂得，並且最能應用辯證的歷史觀的。他當然會「歷史地與客觀地」給這些祖先們以應有的價值。但他首先是無產階級的積極革命者，所以當他對待民族的歷史問題時，他也決不會片刻忘記自己的階級立場，決不會片刻忘記自己的鬥爭任務，因此，他所引以自傲的大俄羅斯人的偉大祖先，是拉吉舍夫^[3]是十二月黨人，是七十年代的平民知識分子革命家。

列寧這樣認識大俄羅斯人的民族自傲心，這樣分清誰是自己真正偉大的祖先，真是給了一切（特別是落後國家）無產階級革命者以一個極好範例。它指示出應該如何去「酷愛」自己的祖國。它告訴人們

究竟是怎樣一種「民族自傲心」，才能無損於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而且還能鞏固和加強國際主義。

史大林在這個問題上與列寧背道而馳。毛澤東則與史大林殊途同歸。

誠然，毛澤東也是以中國歷史上的一切起義領袖自傲的。他也曾給中國的拉吉舍夫，中國的十二月黨人，中國的平民知識分子革命家以崇高的地位。但是在同時，甚至是更為經常地，他卻着眼於那些為「多嬌的江山」而「折腰」的英雄們，懷念那些為競爭帝業而終於獲勝的豪傑們。他以這些人自況，以這些人自傲。可是在列寧眼中，在俄羅斯，這些人卻是「對我們這個美妙祖國肆行橫暴、壓迫和侮辱」，因而使列寧「最感傷心的」。

在這裏，讓我們看到了毛澤東和列寧之間的最大不同點。

關於第二點，我們這裏就不用多所辭費了。前面我們不止一次地講到過它。在本節中也曾聯繫着毛澤東和列寧的對比，講到過它。總之一句話，在毛澤東思想中，國際主義始終從屬於民族主義的，前者是方法和手段，後者才是目標和目的。自然，人們可以從毛澤東的著作中，特別從中蘇發生思想爭論以後的中共言論中，找出無數例子來，證明毛澤東多麼地矢忠於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我們不想在這上面多所爭辯。因為有關中共起來反對修正主義的種種原因，本書在專門的章節中已經充分地討論過了，此地我們不怕多餘地想再提醒一下讀者的，只是下面這個顛撲不破的真理：

堅持一國社會主義學說，即認為在單獨一個國家之內，社會主義可以建設到徹底勝利，並且認為縱使在社會主義建設全面完成之後，

各個民族國家的政治經濟都得與都能成為獨立單位的——保持和堅持這種思想並切實加以實行的人，決不是、也決不可能是真正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者。不管他國際主義的旗幟舉得多高，不管他世界革命的口號叫得多響。

毛澤東目前已經是七十高齡的人了。不容說，他的思想不可能有什麼新的變化。不過，尚未「蓋棺」，即不能「論定」。而且我們知道，一個人，不論是多麼堅強的人，總要受事變影響的。現在，中共和蘇共正在爭論。在此爭論中，毛澤東是當上了國際主義與世界革命的旗手了。正如我們上面所說，毛澤東的這一個新角色是事態迫成的，是表面與實情不符的；但是由此我們難道可以斷定：今後在事變發展的客觀邏輯的作用下，這位迫上梁山的國際革命派的盟主，不會假戲真做，並且愈演愈真，因而使他縱使站在馬克思列寧的尺度前面，也具有偉大身型呢？在理論上，我們自不能否定這樣的前途。但是這裏必不可少地要有一個條件，那就是：在世界革命的進展中，要有一群真正國際主義的革命者產生，特別在中國，在中共內外，必須有這樣一派國際主義者形成，而且獲得能起作用的地位，這樣才能使毛澤東虛假的國際主義，在相應的程度中，在左邊的壓力下，由假變真，實行出來。這樣的條件，實際上多少已意味着中共及其國家經歷了政治性的革命。它將在黨和國家的民主化方面進行徹底的改革，而對此改革，毛澤東是不能適應，並且多半要成為改革矛頭所向的目標的。因為，毛澤東身上根深蒂固的英雄主義與帝王思想，他的民族道統與絕對主義，實在使他無法去適應（更不用說真心接納）無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與工人革命的國際主義了。

說到這裏，不期然而然地讓我想起了英國詩人雪萊的名句：

原來美德有一個永恆的仇敵，
更甚於暴力和欺詐的；
那便是古老的習慣……

雪萊的這首詩是為拿破崙而作的。為了他的稱帝，雪萊罵他為「最無大志的奴才」，說他「選擇了脆弱而血腥的輝煌」。這種輝煌是一種最古老的習慣，它不知毒害了古往今來多少「美德」的。

史大林受惑於「脆弱而血腥的輝煌」，變成了歷史上最野心卻「最無大志的奴才」。他成了那個「永恆仇敵」的犧牲者。

毛澤東具有史大林同樣大的野心，但迄今為止，卻表現得同樣地「無有大志」。是否將來在百年定論之時，毛澤東能終於證明出不做「古老習慣」的奴隸呢，能終於在行動上否定我們的看法呢？

這，主要將不是毛澤東個人的問題，而是世界共產主義者，特別是中國的國際主義革命者的鬥爭問題。在這個鬥爭中，毛澤東可能會有種種搖擺，但是無論如何，這搖擺決不會有如此大的幅度，以致使他不成為未來革命之首要目標的。

1964年8月寫完

注釋

1. 指德國社會民主黨中——王凡西。
2. 中國歷史上有過不少漢族受制於異民族的時代，特別是元清兩朝，異族統治曾經延長了數百年之久。這在表面上，似乎中斷過此一道統，其實不然。原因第一是：中國的社會性質始終無變，儒家的一套落到異民族統治者手裏的時候，完全不失其功用；第二、由儒家思想釀製而成的漢族民族主義是有彈性的，並不偏狹的（「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因此，「中夏聖人」的大道，有時反而能假「夷狄」之手而持續起來。
3. 拉吉舍夫（A. N. Radishchev, 1749-1802）——俄國最早的民主革命思想家，貴族出身，主張廢除農奴制，反對專制政體。1770年出版《從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葉卡捷琳娜二世認為他是「比普加喬夫更厲害的惡棍」，逮捕判死刑，後減為流放西伯利亞十年。1801年亞歷山大第一登位後，拉吉舍夫起草了一個國家改革方案，以自由及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為基礎。這方案被拒絕，且有再被充軍的危險，1802年，他在心身交瘁中服毒自殺。

附 錄

我們對於人民公社的認識與態度

「公社」這名詞，我們這裏常被應用得太輕易。凡是共產黨員或在他們參加下所創立的一切企業，往往一下子就宣佈為「公社」；人們往往忘記，如此光榮的名稱是要用長期頑強的勞動來爭得的，是要以真正共產主義建設中證實了的實際成效爭得的。（引自列寧《兩卷集》中文版卷二，601頁。）

一、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關於人民公社的決議案說：「人民公社發展的主要基礎是我國農業生產全面不斷的躍進和5億農民愈來愈高的政治覺悟。」三個半月以後，即在同年12月10日中共的八屆六中全會關於人民公社的決議，談到此一運動興起的客觀原因時，說：「它是我國經濟和政治發展的產物，是黨的社會主義運動、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和1958年社會主義大躍進的產物。」

這兩段關於人民公社興起的原因的說明，其實只是一套非常含糊抽象的官話，是虛偽空洞的黨八股的濫調，根本沒有解釋什麼。這些字句不但可以解釋人民公社的興起，而且可以解釋共產黨任何想做的事情。

關於這個問題，倒是毛澤東的一句話說得非常老實中肯：「還是辦人民公社好，它的好處是把工農商學兵合在一起，便於領導。」毛澤東的說話和文章的長處是能夠把洋氣十足的黨八股翻譯成人人能懂的口頭語。在這個問題的說明上，毛澤東也做了這個工作。從他的話裏，我們清清楚楚地聽懂了：辦人民公社的好處是便於共產黨政府對農民的「領導」。

我們反對史大林黨的集體化辦法，只因為「這些辦法的施行，並不是為着農民和工人的利益，而是為着官僚的利益。」（見第四國際《過渡綱領》中譯本，26頁。）從來還有人以為我們這種說法是過了分的，可是毛澤東今天恰恰替我們證明了：人民公社（超過史大林當年的集體化遠甚的）的「好處」是「便於領導」。這也就是說，人民公社的推行，首先是為了「領導者」的利益，而不是為了農民和工人的利益。毛澤東們只看到了人民公社制度對於領導者的方便，卻沒有顧到它對於那些被領導者的不方便。

這個首先從領導方便出發的立場，應該成為我們去認識人民公社時不可或忘的一點。因為它如果不是推行人民公社的全部動機，至少是最基本的動機。

二、當然，使得這個官僚願望能夠產生，而且能夠實現出來，自然得有客觀的原因與基礎。這些客觀條件，是否真如中共的官式決議所說，是：一方面的農業生產大躍進，另一方面5億農民的「共產主義的大覺悟」呢？當然不是，1958年中國農業的生產無論怎樣「躍進」，農民的「共產主義覺悟」無論怎樣提高，總不致於躍進到蘇聯農業的程度，提高到蘇聯農民的水平吧；可是在集體化基礎上業已進行了三十年操作的蘇聯農業和蘇聯農民，卻還沒有「成熟到」人民公社

的制度哩。由此可見，說 1958 年上半年的農業生產大躍進以及在躍進中中國農民的共產主義覺悟大大提高，在「客觀上」促成了人民公社之「不可阻擋的趨勢」是多麼荒謬的濫調。

中共的領導者對於我們的看法自然有現成的反駁：中國有中國的特殊條件，它應該依照自己的方式去進行社會主義建設，藉以更好與更早地進入共產主義。

我們原則上不反對這個說法，問題只是要弄清楚究竟什麼是中國的特殊條件，要研究根據這些條件來建設社會主義，人民公社是否是適當的辦法；在此時此地實行如此這般的人民公社，是否能建設社會主義，是否是更好與更早地進入共產主義。現在讓我們來研究這些問題。

三、舊中國的經濟，比之於帝俄以及其他的中東歐國家，其主要的特殊性乃在於更為落後。就農業方面說，這個落後性具體地表現於如下一些事實：(1) 沒有大規模的地主領地，土地所有權分散，農業經營主要進行於小塊土地上，因此生產率極低，農民的生活極苦；(2) 與帝國主義結合的商業資本主義力量控制了農村，資本主義的關係在鄉村中有了巨大勢力，但這個勢力非但沒有促進中國農業經營的資本主義化，反而破壞了整個的農業經營，中國農村非但不曾出現過機器，而且在很大區域內，根本還沒有力量利用耕畜，農村中主要的勞力始終是人力；(3) 中國農民除了在真正過不去時起而「造反」之外，根本不曾過過任何程度的政治生活，他們沒有絲毫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傳統，當然也沒有資本主義的個人主義的成見。

由於上述三個特點，中共勝利後進行其農業改造時，便發生了如下的三種情形：(1) 某種程度的較大規模經營（互助與合作），就能

使農業生產大大提高；(2) 以農民原有的最低生活為標準，要保證農民的「吃飯不要錢」比較容易辦到；(3) 中國農民比起東南歐的「人民民主國家」的兄弟來，對個體的執着沒有那麼厲害，對集體化沒有那麼抵觸，對於集中管理沒有那麼害怕，甚至對於官僚式的控制與指揮，都比較的能夠忍受。

上述三項，乃是便於中共實施農業中任何方式的集體經營的，在客觀上也正是它們使人民公社制度的施行得以成為可能，使人民公社這個「具有共產主義萌芽」的制度能夠早於「老大哥」的蘇聯及較先進的諸「人民民主」國家而實現的。

由此可見，使中共能夠首創出人民公社來的乃由於中國農業經濟與農民意識的落後，由於他們長時期來的「一窮二白」，決不是由於他們在 1958 年春夏間短短數月的「大躍進」與「大覺悟」。

既然是中國農民的「窮白」特點加快了中共農業集體化的速度，並讓它搭起了人民公社的架子，那末架子搭起之後，要認真實行那個「社會主義的」，甚至是「共產主義的」農業經營時，這個同樣的落後特點卻向那些只懂得「領導」和「架子」而昧於群眾和實際的人們提出了最無情的要求，提出了最難克服的困難了。因為在生產技術方面說，正如我們在上面所指出：中國農村裏非但還不曾有機器耕種，而且在很大區域裏甚至還不能利用畜力，主要是以最簡單原始的人力勞動的。

在原始簡單的人力勞動的基礎上，能否進行最大規模的集體農業經營？如果進行的話，是否能夠保證生產力的提高？受私人物質利益刺激的個體農民，在人民公社中變成「工人」以後，是否必然地會降低其積極性？這些公社社員，若不能因共產黨員的宣傳而提高其積極

性（事實上必不可能）時，是否必須在「領導」的高度強制下才能「完成任務」？強制加強，是否即能提高農民生產的幹勁？照歷史經驗，是否愈強制的勞動，其生產率愈低？

只要正確地提出這些問題，並老老實實地解答這些問題，就已足夠判斷中共目前實行人民公社制度的價值了。

四、不用說，我們是主張農業的集體經營的，因為不如此，便不能保證整個社會的社會主義的實現。但這不等於說，我們擁護在集體化名義下進行的任何官僚政策。在這個方面，我們持有一個不變的標準：凡有利於工農聯盟，有利於農業生產的提高，並有利於社會主義的信譽與實際之增進的那些農業化政策，我們都堅決地主張，堅決地擁護，反之，我們便要反對。在昨天的蘇聯如此，在今天的中國和其他的共產黨國家中也是如此。

農業的集體化政策，並非在任何時候，在任何條件中，也不管用怎樣手段實行出來，都能有利於工農聯盟，有利於生產力的提高，有利於社會主義事業的推進。絕對不是的。誰若作此想法，誰便不是馬列主義者，而是最愚蠢的史大林主義的官僚。

一個取得了政權的社會黨或共產黨，對農民及其經濟應該採取怎樣態度，恩格斯曾說過極有名的話。他說：

這在我們是很清楚的，如果我們取得了政權，我們不應該想到以武力去剝奪小農（賠償與否並不重要）。……我們對小農的態度，首先在於把他那小規模生產與私有經營引導上合作的途徑，不是憑藉暴力，而是靠做出榜樣給他們看，以及為此目的之故而予他們以公家的援助。當然，要給小農們看到轉變到合作化去的一切好處，我們是有大量方法的。……

我們堅決地站在小農一邊，我們要盡一切力量來使他們的命運變得好受些，如果他決定參加合作，我們要促成他的轉變。如果他還不能做出這個決定，那末我們可以讓他保有這點土地，要給他大量時間去考慮。（見恩格斯《德法農民問題》。）

恩格斯的這番話，一直被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奉為農民政策的最高指導。因為數十年來已經有過不少的正反教訓，證明它是至理名言。在1929年12月以前，連史大林都沒有提出異議的，甚至還過分地着重了它，藉以抵擋左派反對派對當時領導者的富農政策的批評。可是當1929年秋天，因自己錯誤政策所引起的嚴重的糧食危機，史大林被迫從極右跳到極左立場去，要以武力一下子消滅全體富農（包括恩格斯所說的「小農」），以官僚手段迅速完成集體化，那時，他便公開推翻恩格斯這個見解。他在12月間召開的農村工作黨幹大會上宣佈：恩格斯這種「過分的謹慎」適合於西歐條件，對俄羅斯不相宜（見史大林《列寧主義問題》英文本，301頁。）【朱正按 史大林批評恩格斯「過分的謹慎」的話，是他1929年12月27日在馬克思主義者土地問題專家代表會議上的演說《論蘇聯土地政策的幾個問題》中說的。見《史大林全集》第十二卷，中文版，136頁。】因之他就調動了大量紅軍，配合無數黨員幹部，向全體富裕農民進攻：剝奪他們的所有，將他們從居住地逐走，在一夜之間用命令將農民集體化了，並將那200萬個被剝奪的家庭排斥於集體農場之外，有的復被強迫流徙於僻遠之地，讓他們凍餒而死。結果便釀成了那次史無前例的所謂「史大林饑饉」，據估計，1932及1933這兩年內，因此搶劫政策而死亡的人，約為自400萬至1,000萬。關於財產的損失，據官方的正式統計：1929年，即未實行集體化之前，全俄共有馬3,400萬匹，1933年卻只剩下1,660萬匹了。有1,800萬匹馬已在集體化過程中被農民宰殺。牛本有

3千萬頭，1933年時減少了45%；羊被屠宰了三分之二，約共一萬萬頭。（見《列寧主義問題》英文本，480頁。）

農牧生產大大低落，而低落得最甚的則是共產黨在農民中間的信譽。這一層我們不必從反蘇或反史大林的文獻中引證，就是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裏也可以相當清楚地看出來，它說：

由於黨組織所犯的錯誤以及階級敵人直接挑撥搗亂的結果，所以在1930年2月的下半月，雖然集體化運動在全國範圍內已獲得顯然的成功，但在某些區域內卻暴露出農民嚴重不滿的危險徵兆。在個別地方，富農及其走狗甚至還煽起過一部分農民來進行直接反蘇維埃的發動。（見中譯本，378頁。）

這段話的措辭很委婉，但事情還是很清楚的，史大林的官僚命令的集體化運動，在俄國很大地區的，特別在烏克蘭與高加索，激起了「農民的嚴重不滿」，並非常普遍地爆發了反蘇維埃政府的「發動」——即暴動。

由此可見，違反了恩格斯那個「過分的謹慎」的教訓，史大林曾使蘇聯在財產，生命以及共產主義的事業上蒙受了多麼大的損失！

托洛次基乃是此一政策之最徹底的反對者。他在事先曾經提出辦法（逐步實現集體化的辦法）；當瘋狂集體化進行期間他提出警告，事後復得出教訓。他把教訓以如下文字歸結在第四國際的過渡綱領裏面：

制定土地國有化和農業集體化的綱領時，應把沒收小農財產以及強迫他們集體化的可能性根本除掉。農民將仍舊是他的一塊土地的所有主，只要他還相信是一件可能和必要的事。為了在農民眼中恢復社會主義綱領的令譽，必須毫不留情地暴露史大林派

底集體化的辦法，這些辦法的施行，並不是為着農民和工人的利益，而是為着官僚的利益。（見中譯本，26頁。）

托洛次基這個教訓只是重行肯定被宣佈為不合俄國國情的恩格斯見解罷了。不過在數百萬俄國農民付出了他們的生命及難以估計的財富作代價之後，恩格斯這個「過分的謹慎」更顯得正確，更有了生命，因而更值得維護了。

五、史大林以如此高昂的代價換得來的蘇聯農業的集體化，是否真的如他在1934年以及後來時時所宣佈的那樣：「集體農民正一天比一天改善自己的物質和文化狀況」，「莊員們普遍地富裕起來」，「農村中的貧窮困乏現象根本消滅了」，「社會主義的農業生產飛速發展」了呢？

從來，蘇聯每年發表的大批統計數字都證明了這一些斷語。可是等到史大林一死，蘇共黨內為了爭奪領導權，非直系的赫魯曉夫為了打擊史大林的直系馬林可夫與莫洛托夫，大批事實公開出來了。而此等事實中並非最不重要的一項，那就是：馬林可夫曾經浮報數字來掩飾農業生產的失敗。赫魯曉夫以不少演說與文章集中來透露一個秘密，那就是：蘇聯的集體化農業始終處在困難情況中。這裏且讓我們隨便從赫魯曉夫的一篇演說裏引證幾句吧。

最近幾年，黨十分注意發展我們的農業。你們知道，幾年以前我們的農業是處在怎樣困難的情況中。你們大概記得，當1953年中央委員會九月全會公開而直率地談到領導農業方面的缺點的時候，資本主義國家中的我們的敵人發出了怎樣的叫囂和喧嚷。敵人高喊：這是集體農莊的崩潰，是我們全部事業的崩潰。

……為什麼我們的農業在長時期內嚴重地落後呢？其所以如此，是因為在中央沒有誰想真正地了解一下地方的真實情況。大家知道，史大林哪裏也不去，既沒有徵求過農業工作者的意見，也沒有傾聽過地方工作者的呼聲，而受史大林委託來監督農業的中央的人們卻向史大林隱瞞了巨大的缺點，他們只是一味敷衍蒙混。集體農莊莊員，全體農業工作者在提高農業生產品方面的物質利益的原則，遭到了嚴重的破壞。（見赫魯曉夫的演說辭：〈文學藝術同人民生活保持密切的聯繫〉，《共產黨人》雜誌第十二期，1957年。）

赫魯曉夫的話非常清楚地告訴我們：蘇聯「農業長時期內嚴重地落後」，一直「處在困難的情況中」，所以會如此的原因，則在於「集體農莊莊員，全體農業工作者在提高農業生產品方面的物質利益的原則，遭到了嚴重的破壞。」於是在同一報告中，他接着說：「我們不得不改變這種狀況，定出一個恰當的價格標準從物質上鼓勵集體農民關心農業品的生產。在這件事情上，不從物質上鼓勵集體農民，那就不會有多大的進展。」

赫魯曉夫的這些話發表於1957年，這時離蘇聯農業之全盤集體化已有二十五年。換言之，蘇聯農民在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基礎上已進行了四分之一世紀的農業經營，可是根據赫魯曉夫的證言，蘇聯國民經濟的此一部門「在長時期內嚴重地落後」，並且說，為要改變這種困難情況，唯一的方法是對集體農民恢復「資產階級的法權」，要用物質利益（不是共產主義的教育！）來鼓勵集體農民的生產幹勁！

這是個促人深思的事實。我們不想說：它證明了「集體農莊的崩潰」，但我們必須承認：它說明了農業集體制並非是提高農業生產的萬

應靈藥；它不是在任何時候任何條件中都能促進生產的。它說明了：即使在蘇聯今天的工業化程度上，農業的生產技術已相當高了，高出於中國多少倍的，可是生產力的提高還不能依賴於農民的「共產主義覺悟」，還須主要地依賴於「物質利益的鼓勵」。由此，我們應該發問：生產技術異常低下的中國農業，怎麼能夠依靠於建立在「共產主義萌芽」原則之上的公社組織來提高生產力？

六、如果蘇聯的經驗尚嫌不足，那麼再聽一聽波蘭的故事。1956年6月震驚世界的波茲南事件，以及後來接着發生的一連串牽涉到波蘭黨政改變的大事，其重要的起因之一乃是錯誤的集體化政策。根據哥穆爾卡在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1956年10月20日）上的發言，我們知道，波蘭共黨發動了農業集體化運動六年之後（自1949年至1955年），農業生產有了這樣的一種結果：每一公頃土地產品總額的價值，由個體農戶耕種的為621.1茲羅提；農業合作社經營者為517.3茲羅提；國營農場經營的為393.7茲羅提。這就是說：在同一公頃土地上，以資本主義的個體私有制經營的農業產品價值，比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經營者多得16.7%，比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經營者多得37.2%。

這個統計表示了什麼？它表示出：（1）農業上的大生產與工業上的大生產不完全相同，並非無條件地優越於小生產；（2）必須在高度的技術基礎上，大規模的集體的農業生產才能顯出它對小規模個體生產的優越性；（3）大概在未進入物質生產極度豐富的共產主義社會之前，就大多數的農民說，在長時間而非短期內，鼓起他們幹勁的最可靠的方法，不是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教育，更不是政治或軍事的暴力，而是經濟的物質利益。

為了建設社會主義，必須把農業經營導入合作與集體的軌轍；但是一個共產主義政黨的責任並非在於不管一切地做成集體化就算，而在於同時能鞏固工農聯盟，能提高而非減少農業生產，能改善而非降低農民生活，在這樣的條件下，有步驟有計劃地做到集體化。

波蘭共產黨顯然不曾這樣做，結果是農民大大不滿，農業生產低落。終於釀成了波茲南事件前後全國惶惶不安的局面。

不過這裏我們還必須指出一點，犯了錯誤的波蘭共黨，若比之於當年蘇聯與今天中國農業集體化的情形，其實還算是遵守了恩格斯的教訓的。因為據發表，波蘭實行了六年集體化之後，農業合作社農戶才不過佔全體農戶 6% 罷了。哥穆爾卡一上台，解散了一些條件不成熟的合作社，現在的百分比當然更小了。

七、現在讓我們來看中國情形。中國農村合作社最初試辦於 1952 年，逐漸地緩慢地推廣，至 1955 年冬天中共發出號召，掀起「高潮」，於是在 1956 年一年之內，即在「基本上完成了農業方面的半社會主義的合作化」。這種合作社，據毛澤東在 1955 年 12 月間預言，將在 1959 年或者 1960 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由半社會主義到全社會主義的轉變。」但事實上自從 1957 年以來，全中國的農民早已被組織在七十四萬多個生產合作社中了。到了 1958 年夏季，因為毛澤東發出了「還是辦人民公社好」的「指示」，於是在短短的兩個月時間內，這許多合作社遂被改組成二萬六千多個人民公社了。

如此，中國農民在中共的號召之下，從資本主義經過社會主義達到初步的共產主義，僅僅需要兩年有半（自 1955 年算起），最多也只走了五六年（若從 1952 年的試辦合作社算起）。以如此速度進行着無比巨大的中國農村的改革，據說都在最大多數農民的熱烈要求之下實

行，因之沒有遇到農民方面積極的或消極的抵抗，沒有引起不滿，進行得圓滿順利，結果是在農業生產的任何方面都發生了大躍進。

看過了蘇聯和波蘭經驗之後，面對這個中國農業集體化的情形，無論如何要感到萬分驚奇的。恩格斯在上世紀中葉提出的「過分的謹慎」被證明為不適用於中國，倒還不算什麼稀奇；因為馬克思主義從來認為：真理是具體的，它可能隨時間與地點的改變而改變。最奇的是蘇聯農民至今還保持着那個看重物質利益的「小資產者的成見」，中國農民卻似乎完全沒有。中國農民真可算是共產主義的選民了。

還有奇怪的是，在蘇聯，波蘭以及其他地方屢經證明的，在落後技術的基礎上不宜於大規模耕作的經濟原則，在中國農民響應共產黨總路線而鼓起的幹勁之下，也完全被推翻了。總之，無論馬克思主義的命題，無論農民的「天性」，也無論經濟學的法則，在中共領導的合作社高潮與人民公社高潮之前，都被衝擊得無影無蹤，因之，中共在這方面也創造了一個史無前例的奇蹟。

但事實是否這樣呢？

當然在中共的宣傳中，一切都有圖為證，有詩為證，甚且有統計數字為證。但繞過這些精選的鏡頭，這些御製的「民謠」和魔術式的數字，我們卻不難看出事實並非這樣。首先我們知道，自從人民公社「高潮」化以來，副食品與日用品發生了嚴重恐慌。這一點，因為事實擺在每一個城市居民（包括港澳人在內）的面前，連中共的官方也不得不承認了。但他們的解釋是：「在國民經濟大踏步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這樣巨大的社會變革當中，經濟生活中發生某些暫時的困難是難以完全避免的。」（見李先念在第二屆人大會上的預算報告）他們將這恐慌解釋成經濟健全生長所帶來的困難，而非錯誤政策人為促成的可悲現

象。其實，1958年秋季開始的副食品與某些日用品的嚴重短缺，原因與1933年前後蘇聯的「人民饑饉」是一樣的。事情很簡單，這不過證明了：被中共宣佈為「政治覺悟愈來愈高的5億農民」，其實與蘇聯的農民兄弟一樣，仍以物質利益為第一義的。因之，在公社化的前夜，他們寧肯將牲畜屠宰，也不願以之無償歸公。僅僅這一個事實，已經足夠駁斥中共所謂農民以「不可阻擋之勢」，「自願地」要求公社化的說法；它又駁斥了公社化以後如何奇蹟地增加生產那個神話了。

看來，中國農民的私有天性，並不曾因中國的「特殊性」而被否定。那末這個「特殊性」是否否定了恩格斯的「過分的謹慎」，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關於大規模農業生產務須以農具高度機械化為基礎的法則呢？讓我們在後面再談。

八、關於人民公社的種種，中共曾經做了兩個正式決議。第一個寫於1958年8月29日，第二個通過於同年12月10日的八屆六中全會。兩個決議相距三個月零十日，比照之下，卻讓我們看到了許多有趣的與重要的東西。它們讓我們看到了中共領導層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素養；看到了中共領導的經驗主義與官僚主義的程度；看到了人民公社在短期實行中所帶來的混亂與狼狽；看到了這個制度發展的遠景：在此制度下農民內部階級分化的可能方式以及農民大眾和共黨統治之間矛盾的發展途徑；最後，讓我們看到了人民公社在大量的弱點中所包含着的一些強處，由此我們——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可以具體地規定對此制度所應採取的一系列態度。

茲先談談從兩個決議中所暴露出來的中共領導層對於馬克思主義素養的貧乏。史大林主義的特點之一，就是把社會主義建設，走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社會主義制度乃至共產主義這些概念混淆起

來。根據列寧主義的觀點，當某一國家的無產階級奪到了政權以後，它必須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一方面鎮壓和防止舊勢力復辟，另一方面在政治和經濟上進行社會主義的建設。當社會主義在某一國家內被如此建設之時，即當該國的社會經濟已經脫離了資本主義，但尚未到達社會主義之時，乃是過渡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延長多久？在單獨一個國家內，究竟它能否首先走完這個時期，而終於達到社會主義？對於這兩個問題，列寧以及全體老布爾雪維克在 1924 年以前有着一致的回答，即：過渡時期的長短無法事先決定的，因為它首先取決於世界革命到來的遲早及其進展的順利如何。為什麼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其久暫要看世界革命？則因在單獨一個國家內，不管領導者如何積極與正確地建設社會主義，總不可能達到最後完成，因為社會主義制度，其所需要的物質與精神的條件，只有在全世界的基礎上才能提供的。史大林原本接受這個觀點，但自 1924 年起，由於幾年來世界革命的不斷受挫，復因蘇聯內部保守勢力的抬頭，他修正了這個馬列主義的基本觀點，宣佈在單獨一個國家之內，社會主義建設可以達到最後勝利。由此立場，發生了不少實質上反動的關於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和政策，而其中之一，便是將社會主義制度的標準可怕地歪曲與降低了。1936 年，當蘇聯人民陷於經濟上十分貧乏與政治上空前專橫之時，史大林卻在第八次蘇維埃大會上宣佈：「蘇聯已進入新的發展時期，已在完成社會主義社會建設和逐漸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

就這樣，史大林的「一國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將我們上述的那些概念與實際混淆起來，顛倒過來。史大林以此混淆和顛倒來掩飾和辯護他的反動言行，並據以造成新的罪惡。

中共領導層在基本的理論上都是史大林主義者。而在此一混淆和顛倒中則更超越了史大林本人。中共的理論家們特別強調兩種所有制

的不同，一種是所謂集體所有制，另一種為全民所有制。他們把這兩種所有制代表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兩個階段。前者是初步的社會主義，後者為完成了的或高級的社會主義。依照此一標準，中共就以為中國的城市工業經營已經是後期的社會主義，而農業則進入初期社會主義。因此，在毛澤東們看來，不但在今天，其實是自從工商業改造及農業合作化完成（1956年）之後，中國便已經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今後的所謂社會主義建設，根本只有量的增加，並不需要質的改變。因此，他們從來不承認有所謂過渡時期的存在。（有之，不過是解放直後短短數年的經濟恢復時期罷了。）更因此，他們連做夢也不曾想到有中國一國能否建設社會主義至於最後勝利這個問題。在他們的直覺的思想中，別說社會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在中國一國範圍內亦能建設成功。正如那關於人民公社的決議案上所說：「看來，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麼遙遠將來的事情了。」

中共理論家們的主要錯誤，在於將財產所有制的形式和社會制度的全盤實質混淆在一起。財產所有制自然是重要的，每一次深刻的社會革命（特別是無產階級革命），都要改變這個所有制。某一種特定的所有制，乃是某一種社會制度得以存在和生長的基礎。但這並非說，某一種所有制即等於某一個社會制度。在某一種新的所有制的基礎上發展了生產力，構成了符合於此種生產力的生產關係，並由此生產關係形成出全般的文化精神生活，這才算是完成了某一新的社會制度。這一點認識，尤以在較先爆發無產階級革命的落後國家為最重要。因為在那些國家裏，就單獨一國說，社會主義革命的爆發並非由於在經濟上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已經過了時，而由於在政治上，為使這個國家能夠找到出路，無產階級必須爭取政權。無產階級一經取得政權，則無論就政治與經濟的原因說，都必須創立新的，非資本主義的，集體

的所有制，由此去提高國家的生產力，並在政治、社會、經濟以及文化的各方面建設社會主義。因此，在落後國家中，新的財產所有制的創立，首先是暴力革命「時來運會」的產物，並非為「經濟進化」的瓜熟蒂落的結果。這個所有制僅僅是建設新社會的起點，並非為新制度在舊制度母胎中住足十月的一個完整的嬰孩。從這個起點達到完成的新社會，在一個落後國家中，需有一個長長的過渡，而且密切地聯繫着世界革命的命運。因為此一時期的長短與過渡的成敗，首先是要看先進國家中無產階級的革命情形來決定的。

在中共的領導下，中國完成了生產工具、生產資料以及土地的國有化。中國的財產所有制基本上已經由私人所有變成為國家所有（或集體所有）^{[1][2]}。從資本主義性質的所有制，甚至前資本主義性質的所有制，轉變為社會主義性質的所有制，這個轉變當然具有巨大的革命意義。它給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開闢了廣闊的前途。但是很明顯，社會主義性質的所有制之確立，並不等於社會主義制度之成立，更不等於它的完成。這個理由原極淺顯，可是「一國社會主義」的史大林與「一國共產主義」的毛澤東卻「見不及此」（其實是不願見及此理），硬把一塊光禿禿的地基和上面草草搭起的架子說做是業已落成的大廈。其結果，豈但如他們的決議案所說：「大大降低共產主義在人民心目中的標準」而已哉！它們之「不利於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是多方面的，而其中最嚴重的一端則為：忽視了世界革命對落後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意義，同時放棄了推動世界革命的最高戰略。

落後國家的無產階級取得了國家政權之後，不得不努力在原始的技術水平與低下的生產基礎上推行集體的或「全民的」所有制，並非是一件輕鬆愉快的事。這毋寧說是歷史加在他們肩上的一个過重的負擔，對他們提出超過能力的任務，所有制的革命固然能在很大限度內

提高技術和增加生產；但落後的經濟情況（特別在農業方面）卻有其自然的壓力，要恢復私有制度。因此這件事的本身含有極大的內在矛盾，矛盾的解決得經過長時期的艱苦鬥爭。而中共的理論家卻把某種程度的集體所有制的建立，即當作某一階段的社會主義的實現，那是何等輕率的與主觀的妄斷，這種妄斷遺害無窮。

九、「全民所有制」，亦即中共所說的最高階段的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實現，他們甚至預言了明確的時限。第一個決議這樣說：「有些地方可能較快，三四年內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長一些的時間。」對於同一問題，第二個決議案則說：「從現有的經驗看來，在我國的具體條件下，全面地實現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的時間可能早一些，但也不會很早……從現在起，將需要經歷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時間。」

這兩段話很清楚地暴露了中共理論家們的輕率與荒謬。他們把建設社會主義的計劃性等同張鐵口們的「預言」了。三四年或五六年、十五年或二十年，二者相差不過十餘年耳。在漫長的、一個新社會制度締造的歷史中，這點先後本不算什麼一回事。但在中共「一日等於二十年的躍進」時間表上，十餘年應該是數世紀的時距了，可是他們能夠在兩個關於同一問題的決議中，以同樣肯定明確的字句，將同一制度的出現預約在那兩個相差很遠的年代。

作這樣的預言根本是不科學的。（不幸中共的所有「計劃」實際上就是諸如此類的預言。）因為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極其複雜，特別因為落後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必須被當作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來處理，故其時間因素無法確定。因為先進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何時爆發，成敗如何等等，那是不能以年月來規定的。

這裏，當然又觸及了史大林主義與正統馬列主義之間的那個根本歧見。在史大林主義者看來，一個國家要建設社會主義，完全不必顧及世界革命。在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的國家裏，本身具備了建設社會主義的足夠條件。如今毛澤東則比史大林更進一步，宣佈中國連單獨走向共產主義的條件都完全足夠的。根據他的理論，即使進入了共產主義時代，國家也還是存在的，只是「對內已經不起作用」罷了。共產主義時代的國家，據說「只為了對付外部敵人的侵略」而存在。彷彿：當世界的經濟組織還依了國家單位而受着分裂宰割，當大部分的國家還受着資本主義統治之時，蘇聯或者中國，就可以進入「共產主義時代」的！史大林主義者忘記了一個最基本的事實了：使得資本主義無法繼續發展下去的，第一因為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的私有制；第二因為民族國家的分立割裂了世界性的生產力。私有制之變為公有制，只是解決了資本主義生長到社會主義去的一個矛盾，它絕對不曾解決生產力的世界性與民族國家局限性的矛盾。相反，如果以國家為單位的公有制發展生產力，不設法破除國家限制，不把社會主義的計劃放在全世界的「一盤棋」上，那末比資本主義的國際危機更激烈的「社會主義」的國際危機，一定會爆發出來毀滅人類文明的。因為一個局限在國家框子裏的社會主義絕不能夠充分完成，而一國的社會主義為了謀得高度發展，一定會和另一國的社會主義發生衝突。

社會主義尚且如此，作為其更高發展的共產主義又怎能在一國基礎上發展和完成呢？只要國家存在一天，只要世界還分裂成各個民族國家，而這些國家仍被當作進行生產活動的基地，則共產主義便不能實現，甚至高度發展的社會主義都不能實現。因為大同世界與共產主義是一物之兩面，是互為條件的。

可是中共人民公社的整個概念，就是要循此道路，讓中國首先進入共產主義的時代。試問，這是多麼輕率，而實際上又是多麼錯誤與反動的思想！

據說毛澤東經過人民公社問題的內部爭論以後，決定擺脫一些事務工作，以便有較多時間鑽研馬列理論。如果這不是政爭中的一些舊式的藉口，倒是值得我們歡迎。首先我們希望他能讀一讀從馬克思到托洛次基的不斷革命論。因為這個理論與「一國社會主義」或「一國共產主義」是最不調和的。

十、人民公社的主要理論基礎，自是「一國共產主義」。但它為什麼發生於 1958 年度夏季？為什麼以此一方式而非以另一方式實行出來？這一類較為具體的問題，卻還得從別的方面去尋找解釋。我們知道，1958 年是中共第二個五年計劃開始的一年，也可以說，那是第一個五年計劃「決算」的一年。中共開始深切地感受到它自己「計劃經濟」的後果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結果如何呢？讓我們聽聽周恩來的報告吧。他說：自從 1952 年到 1957 年，「工業總產值……增長了 141%；手工業總產值……增長到 83%；農業總產值……增了 25%。」（見周恩來在第二屆人民代表大會上的報告）這就是說，工業與手工業總產值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中，比同期內的農業總產值，增長的速度大約快了九倍。這有什麼意義呢？它不但表示出農業生產的發展遠遠地落於工業生產之後，而且表示出工農業生產發展上的大大脫節，表示出工業的繼續發展無論在原料取給，外債償付與新資金的籌措方面，都將遭遇嚴重困難。如何解決這些困難呢？大大放緩工業化的速度嗎？這是倒退，無從考慮的。向「兄弟國家」多多尋找「無私援助」嗎？那也是緩不濟急，而且增加基本的工業建設，事實上是加強上述的矛盾。在此情形中，剩下來的唯一道路，就只有同時拼命提高農業生

產。可是在生產技術基礎不變的條件下，如何才能大大提高農業產值呢？唯一辦法是加緊鞭策。人民公社於是就應時產生了。

在沒有談到人民公社如何是鞭策農民的最好制度之前，讓我們先再看看中共在 1959 年想提高農業生產的指標，據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李富春對本屆人大的報告：1959 年「在工農業總產值中，工業和手工業產值……比 1958 年……增長 41%；農業總產值……比 1958 年……增長 39%。」我們得好好注意這兩個百分比。在 1959 年中，即在第二個五年計劃的第二年內，農業增產和手工業工業的總增產要做到幾乎相等——僅少 2%。可是在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整個期內，我們知道，二者相差達 9 倍之巨哩。

人民公社的主要作用與目的，就是要鞭策那隻農業的烏龜狂奔，使牠能趕上那同樣在躍進中的工業兔子。

能起這個作用嗎？能達到這個目的嗎？

中共的高官們告訴我們說：一定可以達到。為什麼？他們又說：因為第一，「政治（書記）掛了帥」，「政社合一」了；第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了；第三，實行「萌芽」式的共產主義，舉辦了「從生到死」的種種福利事業；第四，實行了農林牧副漁的全面發展，工農商學兵緊相結合。

究竟這幾項辦法是否能鼓起農民大眾的「沖天幹勁」？是否能奇蹟般地提高生產？讓我們來逐項研究一下。

十一、「政治掛帥」和「政社合一」這味最新的靈丹，其實是一種非常陳舊的古方。若譯成人人能懂的話，那就是：應用政治、軍事、警察等等的全部強制力量，直接干涉經濟事務，直接鞭策生產者。這

種辦法，在不同時代，不同國家與不同制度中都曾經以不同程度及不同方式試過的。可是結果和結論卻始終只有一個：縱能收效於一時，卻必失敗於長期。所謂月計之固有餘，年計之或不足，累年計之終必大虧者，就是這種事了。為什麼會如此呢？大概，這裏得觸及「人性」問題了。當人類的生產還不曾真正高度發達，體力勞動對全體人說還談不到是一種愉快的時候，即名符其實的共產主義社會尚未出現時，使生產者不斷與經常提高幹勁的主要的有效方法，總是物質利益的刺激，而非其他的任何力量。這當然不是說，無政府的、自由的放任經濟萬歲，打倒經濟方面的任何計劃。決不是的。資本主義的個別自由生產之無出路，已經盡情暴露出來，任何人和任何勢力都救不了它。我們說物質利益乃提高生產者幹勁之主要方法，意思只是：一個正確的與賢明的經濟計劃必須充分注意到這個「刺激」罷了。可是，在蘇聯的農業經濟中，如我們在上面引證的，這個注意要經過三十年的痛苦經驗才讓赫魯曉夫在政爭中提出來。而更可嘆的，當蘇聯農民付了如此巨大代價剛剛換來了這點教訓之時，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們卻用更荒唐的辦法來違背這個教訓。他們要中國農民與農業付出更慘重的代價，以便在親自的經驗中再取得這個同樣教訓。看見一個孩子玩火燒壞了指頭之後，只有最愚蠢的頑童才會把自己的指頭再伸進火去。可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們在此一問題上，恰好跟那個頑童一樣愚蠢。他們所需要的教訓毋須經過二三年然後獲得，很快就會獲得的，也許今天他們都已經燒壞指頭了。

依照官僚主義者的想法，「政治一掛帥」，「書記升了賬」，天下便沒有做不成的事，過不了的關；因為據他們說：黨是全知的，群眾是全能的。所以只要有書記把黨的「知」和群眾的「能」一接通，那就乾坤都能倒置於俄傾之間，還用說這區區的生產力的提高！問題在他

們於是就非常簡單，一切都有賴於幹部對群眾的鼓勵，宣傳和教育。彷彿這步工夫一做到，群眾思想一弄通，其餘便都不成問題了。

官僚主義者在此地恰恰忘掉了一個很小的道理，那就是：能受思想（或覺悟）指導，終身或長期間不顧其切身的物質利益，而能為較大較高的理想（這理想當然有終於能實現的客觀基礎）服務的人，迄今為止，總只能是人類中的極少數。他們是先知先覺，是大聖大賢，是進步的先驅，是一切進步階級的先鋒隊。（順便一提，列寧的黨的觀念完全建築在此一認識上的。）至於群眾中的最大多數，就算是最進步階級中的大多數，其行動在基本上卻不能不受切近的物質利益指導的。當然，一個真正的革命必定是群眾性的，而在大革命中顯出勇往直前、捨己為人的精神者，大多則是普通的群眾；但這並不能否定我們上面指出的情形，即要求全體或最大多數群眾「終身或長期間」不顧切身的物質利益，那就做不到了。

其實唯物史觀與唯心史觀的爭論早已闡明了這個「小小道理」，一切史大林主義者蔑視群眾的物質利益，賦宣傳教育以絕不能有的魔力，徒見其陷於無望的唯心主義的泥淖中吧了。

一切高貴的唯心論者在實際行動中都是最野蠻的「唯物論者」。中共的領袖們亦非例外。當 5 億農民「愈來愈高的共產主義覺悟」證明出不能替中共無限制地鼓起幹勁之時，他便只好用黨、政、軍、警的強制力量來「提高」農民的「思想」了。至於此種力量是否能收成效，我們前面已經說過，不必重複。

我們可以斷言：軍事化的組織與戰鬥化的行動，事實上必不能提高農業生產率；更無法做到中共的希望，把增產速度在本年內提高一倍。

十二、實行生活集體化，勞動力可以自由調度，大量婦女勞動力可從家務中解放出來。抽象與單獨來看，這自然是大好事。但此辦法是否真好，首先得看勞動力的增加，對中國的農業生產有什麼意義；其次要看在目前中國的條件中，是否有足夠的能力來實行生活集體化？目前勉強實行出來的集體化，對農民的物質生活說，是否比不集體的時候改善了，因而使農民，尤其農婦們，安心提高生產？

中國農業生產的低落，誰都知道，原因從來不在於勞動力的短缺。土改、合作化與集體化實行之後，中國農村情形自然大不同了，勞動的需要也隨之增大；但為了使中國農業現代化與集體化，為了生產力的提高，在諸般必需的條件或要求中，增加勞動力卻始終不是最迫切的。除了季節性的忙迫，緊急任務（如防災搶收之類）的執行，以及大規模水利工程的興修之類以外，中國農業經營上感到勞力缺乏的情形是很少的。有時有地，甚至還覺得過剩了的。因此勞動力不足絕對不會成為妨礙中國農業生產提高的主要原因，甚至不是重要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我們認為第一是耕作方法的科學化與機械化；第二是大量資金的投放。換句話說，這就是中共自己提出的：土、肥、水、種、密、保、管、工這個所謂「八字憲法」。如果切實把這部「憲法」實行出來，即是說，如果中國農業耕作法與管理法都能提高到現代農業科學所達到的水準，工具方面真能從單純的人力，改進到普遍的畜力，甚至機械力，同時水利工程如已大致完成了的話，那末生產力將無疑會奇蹟般的提高，而勞動力卻反而會覺得相當剩餘的。

為達此目的，國家自應投放大量資金，俾得購置設備等等。中共領導者當非見不及此，例如在本年度，據李先念的報告，已決定投資 10 億元。但因主要由於「一國共產主義」的立場，他們不得不首先在農村中從事「社會主義的原始累積」，必須叫中國農民「無中生

有」；其次因為中共的計劃從來沒有正確適當的比例，所以這個投資數目被定得非常不夠的。它僅僅佔了1959年度經濟建設支出總數中的三百七十分之一！

因此，中共雖然懂得改善農業的科技基礎乃是提高農業生產的主要方法；可是事實上仍不得不將此希望寄託於簡單勞動力的增加。其實，這樣增加起來，或解放出來的勞動力，在大多數情形中，不過是人力或人的浪費罷了。

目前中國農民所過着的集體化生活，是否能使那些被「解放」出來的勞動力安心與積極地從事生產？這問題很難簡短地用是或否來回答。因為中國各地農村的情形差別很大，在集體化以前的農民生活水準頗為不同，因此對「吃飯不要錢」等等的集體待遇所生的反應不會一樣。不過一般說，目前感到完全滿意的是少數，感到不慣，不便乃至厭惡的是大多數。中共的官方刊物上，曾經登載過不少調查統計，關於公社化後農戶們收入的增減比例。大致情形據說是：收入有所增加的佔多數，其次是無所增減的，有所減少的佔少數。換句話說，實行了公社之後，過去的赤貧戶沾了點光，普通貧農跟以前差不多，中農則被拉低了。所以就生活標準說，公社化運動是把全體農民拉平在原有貧農的高度上。這是典型的史大林主義的做法，其理論根據是：在「一般貧窮與農民財產減少的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要貫徹這個做法，當然得打擊中農。因為在目前情形下，尚擁有多少可稱之為財產的農民，就只有中農了。在中共中央的決議案上，也明白地指出了這一點：它說：「小社並大，轉為人民公社，是當前廣大群眾的共同要求，貧農，下中農是堅決擁護的，大部分上中農也是贊成的，我們要……克服另一部分上中農的動搖……」這個決議案裏的所謂「下中農」其實正是貧農，而所謂「大部分上中農也是贊成的」，顯然是官僚

們的事前武斷。至於被宣佈為須予克服的所謂「另一部分上中農」，應該是全體中農的。因此，無論官方的調查統計或中共最高機關的正式決議，都說明着和證明了公社化並不為廣大中農所贊成，因為在物質上打擊了他們的利益。一個自命為代表無產階級利益或工農利益的國家，為了建設社會主義的農業，對於中農應該採取怎樣態度？這問題並非新鮮。蘇聯當年曾經為這問題費了不少心，而且還是列寧親自解決了它。在他對俄國共產黨第八次大會上關於農村工作所作的有名報告中，主要就是討論了這個問題。列寧報告的根本思想是：「對於地主和資本家，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完全剝奪他們。但是對待中農，我們則不容許採取任何強力手段。」又說：「用強力對待中農是極有害的。」（加重號都是原有的）在同一報告中，列寧還更具體地指出：

我們應當和中農和平共處。只有當我們真正改造和改善中農生活的經濟條件時，中農在共產主義社會裏才站到我們這方面來。如果我們明天就能夠拿出10萬架頭等拖拉機，給以汽油，給以駕駛員（你們十分知道，這在目前還是一種幻想），那末中農會說：「我們贊成公社」（即贊成共產主義）。

列寧在同一報告中有另一段話，我覺得對中國目前的農村問題有更大的啟發性，它是這樣寫的：

說到這個問題，我們應當指出，我們是鼓勵建立公社，（按列寧此地所說的公社與目前中共創設的不同，它是比較寬泛地指那些集體化的農業經營而言。）但應把公社組織得盡善盡美，以便奪得農民的信任。在此以前，我們還是農民的學生，而不是農民的教師。誰對農業及其特點一竅不通，跑到鄉村中去，只是因為聽說公營農莊有益，因為疲於城市生活才想到鄉村去工作，而自

認為在各方面都是農民的教師，那他就是再蠢笨不過的了。誰想在中農經濟關係方面採用強力，那他就是再蠢笨不過的了。（加重號都是原有的。）

關於列寧這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中農政策，中共當然也有話可說。第一，他們會說：他們根本沒有使用任何強力叫中農入社，中農之加入公社或者是出於自願，或者是被「大鳴大放所克服」的。第二，他們會說，目前中國的實際情況根本不同於1922年新經濟政策時代的蘇聯，因此，在當時被列寧斥責的絕對不許強迫中農的政策，在今天的中國卻不妨應用。因為不以強力加諸中農這個態度並非由絕對的道德標準決定，而是由經濟的效果來決定。若談經濟效果，則今天之強迫中農入社是有利而無害的。

上述的第一個理由顯然不值一駁。決議案上的所謂「防止強迫命令」自是官僚們自己都不相信的具文。如果不採用強迫命令，怎麼能在短短二月期內，就能把全中國的中農以及一般農民的「動搖」克服？我們對這種官話可以不理。事實是：中共的公社化在最大多數地區都是強制實行的。他們根本沒有用任何方式徵求過廣大農民的意見，而只是「上動下不動」，官僚們奉命行事，不管一切地先行成立了公社，然後憑了行政的與其他強制方法，從上而下地實行出來。這種辦法當然就是列寧所指斥的「對中農的經濟關係採用了強力」，是「愚蠢不過」的罪行。

對中農施行了強力是否於農業生產有利而無害呢？請對看一下中共的兩次決議就可以明白了。

在1958年8月29日的決議上，關於農民（主要當然是中農）的產業作如下規定的處理：

人民公社建立時，對於自留地，零星果樹，股份基金等等問題，不必急於處理，也不必來一次明文規定。一般說，自留地可能在併社中變為集體經營，零星果樹暫時仍歸私有，過些時候再處理，股份基金等可以再拖一二年，隨着生產的發展、收入的增加和人們覺悟的提高，自然地變為公有。

由於這樣一個並不明確的明文規定，中國農村中便發生了一次空前的大混亂。自留地當然立即歸了公。農民的住宅也事實上充了公，因為在官僚們的任意命令之下，多數農民被強迫遷居換宅；大批家畜「入社」；隨以俱來的是暗中與公開的屠宰；無數果樹被斫去；農民的用具，特別是鍋鏟等等炊具都被集中；許多較富中農的生活用品也被「共了產」。在不少地方，此種毀滅，隱藏或浪費財物牧畜等事情竟是由合作社幹部帶頭的。

這次大混亂中全國究竟損失了多少財產，中共當然不會告訴我們。但從近半年來副食品供應的嚴重危機看，我們可以相信，那個數量是巨大得驚人的。這個大混亂延長了兩個月，情形來愈來愈嚴重，嚴重得連深居中南海裏的中共最高當局都感覺到事情不妥了，於是便來了人民公社問題的再檢討，做出了1958年12月10日八屆六中全會的新決議。關於上述問題，它是這樣寫的：

有些人以為公社化要把個人現有的消費財產拿來重分，這是一種誤解。應當向群眾宣佈：社員個人所有生活資料（包括房屋、衣被、傢俱等）和在銀行、信用合作社的存款，在公社化以後，仍然歸社員所有，而且永遠歸社員所有。社員多餘的房屋，公社在必要時可以徵得社員同意借用，但是所有權仍歸原主。社員可以保留宅旁的零星樹木、小農具、小工具、小家畜和家禽等；也

可以在不妨礙參加集體勞動的條件下，繼續經營一些家庭的小副業。

這裏所謂「有些人的……誤解」，其實是8月決議的「暫時私有」與「自然地變為公有」的忠實了解，也正是全國雷厲風行實施着的所謂「共產主義措置」。這種措置造成了全國農村的大混亂，引起了廣大農民的極度不滿，招致了財產物資上的慘巨損失；中共中央便照例把責任推在「有些人」身上，宣佈那些「共產辦法」是這些人「誤解」了中央「英明領導」的結果。於是在明文規定上，作了一些必要的，主要是對中農們的讓步。

中共中央在這方面的狼狽潰退，首先由於他們以強力拉平中農，也就是違背了列寧主義的中農政策，因而釀成了經濟損失的結果。

中國目前農村裏的所謂中農，與未曾土改時代的中農，甚至和合作化初期的中農是不相同的。他們不再是富農的小兄弟，並不是在舊農村關係中向上掙扎較為成功的那群人物。他們中間的大多數之所以比周圍的農民略為富裕，主要原因倒在於他們的勞動力比較強，做工比較能幹。若以一戶為單位計，則由於他們不生產的成員較少之故。他們本就參加在集體經營中，大多是團體中生產最積極的分子。可是公社化將他們「拉平」了，至甚在許多地方，還因為他們之「富裕」而受了歧視，他們的多餘的財物（實實在在是勞動果實呀！）被拿來重分，被無償入社。試問，這怎麼能鼓起生產積極性？這怎麼能不叫人寒心？怎麼能使原本勤快的農民不向赤貧的懶漢看齊？

事情一定要這樣發生的，事情也這樣發生了。碰破了頭的官僚們於是又裝出先知的面孔，在12月的決議上寫道：「要注意儘量不使勞

動力強而人口少的農戶，減少收入。」這個「注意」當然不過是事後的一句空口慰藉吧了。

看過了比較「富裕」的農民在公社化中所受待遇與所生反應，讓我們再看看「堅決擁護」公社的那些貧農和所謂「下中農」。

十三、就我所看到的中共統計數字中，各地農戶在公社化後收入增加了的，最低佔全體農戶的 32.2%（山西省太谷縣紅旗公社調查）；最高為 88% 強（廣東省虎門公社）。中共的數字照例是誇大了的，我們不能輕信；但照實際情形推想，若將供給物與工資二者合計起來，其收入在數字上比公社化之前略有增加或不相上下的農戶，比那些較為減少者為多，大概是事實。我們就承認這是事實吧。可是承認了這個事實，卻不等於承認中國農民大眾的生活一般地改善了。如果公社化使較大多數農民的最低限度生活（即不餓死）有了若干保障，那末因此保障農民在生活的其他方面被迫付出的代價卻是太高了。這代價抵消了那個保障，以致農民們頗有理由視此保障為釣魚之餌，視之為套住脖子的繩索。吃了那口「皇家飯」，農民便把整個身體，全時間賣給「領導」了。他們被編排在層層管制的組織中，被變成了一個單純的號碼，不分晝夜地，受着上級任意的與心血來潮式的調度，進行着浪費的、有時甚至是根本徒勞的「苦戰」！

（請順便讀一段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的報告吧：「根據虎門耕作區的調查，窩工浪費的現象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1）勞動力漏網多；（2）勞動力使用不合理；（3）勞動力調動太頻繁，無計劃，造成人工浪費嚴重。」）

以如此「苦戰」換得來的「皇家飯」簡直是「閻王飯」了。更何況這碗飯無論從量或質方面說，又都是既不夠飽，又不夠味呢！根據

種種可靠材料，公社伙食兩粥一飯，雜糧佔 70% 的情形是普遍的。這種待遇，如以較為富饒的江南與嶺南等地的農村標準看，對大多數農民說是普遍降低了，比土改前的生活更加不如。

生活集體化，在原則上，以一個共產主義者的立場說是無可非議的。問題在於這個集體了的生活是否比個別進行時美好些，方便些，或至少經濟些。如果不考慮這個問題，而僅僅從領導方面，行政方面，調動指揮方面來觀察，認為集體了便於領導的少數人（這正是毛澤東的最初出發點），絕不顧被領導的千千萬萬人的是否方便，甚至給他們造成無數的極不方便而不顧，那末至少是糟蹋了與污辱了生活集體化這個原則，至少使群眾因之而根本厭棄了共產主義。

給五億多人集體吃飯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它需要充分的準備條件。不但要有充足的經濟條件，而且要有技術條件。可是中共的領袖們竟以異常輕率的，簡直是兒戲的態度來處理了這個問題，真是荒謬極了。拿最小的、其實也是極基本的一事來說吧。根本還沒有一個可讓數百人吃飯的飯堂，還沒有煮數百人一餐飯的炊具和設備，還沒有煮大鍋飯經驗的起碼人才，可是決議通過了，訓令下來了，要集體吃飯了，各人家裏的炊具都被集中了，不准各別煮飯了。結果怎樣呢？許多人要走幾里路去吃飯，費去長長的時間等飯，在風吹雨打的破廟裏吃飯，吃着不是生的便是焦的像飯而其實不是飯的東西。想想看，這個「便利領導者」的辦法是如何的不便於被領導者呀！如此這般的集體生活，試問怎樣能提高那些「增加了收入」的農民們的生產熱情呢？

最好的原則給實現成最殘酷的諷刺。

總之，隨公社以俱來的整套生活集體辦法，因為（1）由於：物質條件根本遠未成熟；（2）技術上事前沒有作任何準備；（3）當局的命令和決議又故意含糊籠統（因為他們根本沒有根據「試點」經驗作縝密考慮）；（4）實行時完全沒有和群眾商量：因此，弄得有名無實，混亂狼狽，給群眾帶來了極大的不便和痛苦，把原本可以成為好事的某些辦法也做成了十足的壞事，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崇高理想作了最殘酷的諷刺，以致在群眾心中大大地損壞了共產主義的信譽和事業。

如此這般的集體生活當然不能提高農業生產力。

十四、愛好舊詩詞的毛澤東，給人民公社的基本方針做了這樣一副對聯：「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工農商學兵互相結合。」據決議說：這個方針，乃是「指導農民加速社會主義建設，提前建成社會主義並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所必須採取的。」這種說法空洞浮泛，毫不實事求是，與其說是一個政黨的指導，毋寧說是一個酸秀才的文字遊戲。可悲的是，這個遊戲恰恰成了一個最有威勢的政黨的指導，它要把5億人民的生命財產來作遊戲哩！毛澤東的這副對聯，於農業生產的激增當無幫助，不過它的確反映了一個思想，或者可以說，反映了一個幻想。那便是曾經流行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新村」運動。這種新農村的理想，實際上為一種純粹的烏托邦，它希望返璞歸真，在小國寡民的基礎上實行「共產主義」。毛澤東的理想自然不會如此幼稚，他是史大林的學生，他這個公社理想正是從史大林的「一國社會主義」演化出來的。史大林主義者的毛澤東在中國的條件中提出來了「一國共產主義」，而走向此一目標的道路，則為以一鄉或一縣為單位的「共產主義」，亦即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工農商學兵互相結合的人民公社。這樣的人民公社與武者小路實篤們【朱正按 武者小路實篤（1885-1976），一個熱心「新村」運動的日本作家。1918年11月在日

向的兒湯郡石河內買了一塊地，建立了第一新村。周作人對此有濃厚的興趣，曾經前往參觀。回國後在《新青年》、《新潮》、《晨報》等報刊上發表多篇介紹新村的文章：〈訪日本新村記〉、〈日本的新村〉、〈新村運動的解說〉、〈工學主義與新村的討論〉等等，一時頗引起人們的注意。當時毛澤東也是受到這些文章影響的一位讀者。為了這件事，他還到去訪問過周作人。在1919年12月出版的《湖南教育月刊》上他發表了〈學生的工作〉一文，提出了一個在長沙嶽麓山建設新村的想法，「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學校及旁的新社會連成一塊為根本理想。」】的新村自有天壤之別，但其為反動的幻想則是一樣。

前面詳細說過，目前人類的生產力受到了民族國家界限的束縛，只有在全世界規模的分工合作中，實行世界「一盤棋」，才能使生產力繼續發展。一方面的帝國主義世界戰爭，另方面的共產主義的世界革命，便是要從不同方面，——前者從反動方面，後者從進步方面，企圖解決這個主要矛盾。共產主義，乃是生產力更高於資本主義多的一種制度。因此，想在一國之內，建成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是幻想，是反動。在此前提下，在此情形中，設有人焉，欲將經濟生產的分工合作自限於一鄉一縣，以為如此可以提高生產，如此可以加速社會主義的建設，如此竟可以提前建成社會主義而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你說他這種主張是進步還是反動？是有事實根據的英明領導呢，還是符合於老莊理想的糊塗幻想？事理太顯，不必多言了。

事實上，人民公社把毛澤東那副對仗口號實行以後，這思想的反動後果早已很清楚顯示出來了。所謂本位主義，所謂城市供應脫節，等等，不過是它必然產生的第一批果實。中共當然看見了這些毒果，於是在第二個關於人民公社的決議上便立即指出「有些人……企圖過早地取消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但他們不知道，或不願知，這

個所謂「有些人的企圖」完全是毛澤東那付對聯口號的、亦即所謂人民公社「基本方針」的合乎邏輯的發展。既然人民公社是一切皆備於我的五臟俱全的小王國，當然要以本位的自足為先了。這個第二次決議一方面指斥「有些人的企圖」，號召公社要「盡可能廣泛地發展商品生產」，同時卻仍要公社「發展直接滿足本社需要的自給性生產」，而且仍舊主張所有的公社應五業「並舉」，五行「結合」。堅持着這樣的基本精神，那末任何「全國一盤棋」的叫喊都將是徒然，因為，三十二隻棋子都變成了清一色的卒或帥，事實上已不成其為棋，已無法對奕，已不能成局了。

中國因為幅員大，地形複雜，土質差異，氣候不同，所以很久以來，農業早已形成了相當的專業化。幾乎每省有每省的特產，甚至一縣有一縣的專工。針對着這個特點，計劃經濟自應使各地的農業經營更為多彩，同時在某種限度內，設法減少因專業而造成的過分片面。可是人民公社的基本精神，恰恰就是忽視了這個特點。根據毛澤東的對聯，地無分南北，鄉不問靠山近海，社的方針都是一律的「農林牧副漁五業並舉」。中共的決議當然會照例寫上「因地制宜」等類官話，但是只知道忠實執行的幹部，還有那些愚而自用的官僚，不會，同時也不敢擅自「制宜」；他們的全部本事，就是不管一切地貫徹決議，於是削足適履，捨長取短，棄有覓無的事情全都做出來了，為的是要做到決議上的「並舉」。在許多地方，這樣做了終於還是並舉不起來；有些地方，並舉是並舉了，可是硬舉起來的東西完全派不到用處。人們只是浪費了力氣，糟蹋了財富。唯一的積極結果，只不過讓社幹部「完成了任務」，讓更高的幹部大吹大擂而已。

由此可見，被吹噓為公社最大優點的「並舉」與「結合」，事實上也不能提高生產力，相反，倒是在許多情形中破壞了它。

十五、綜上所述，公社所實行的辦法與所取的方針，非但不能加速社會主義建設，更不能提早建成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而且還會破壞已有的增產速度，降低生產率。更嚴重的，它們破壞着與損壞了社會主義事業與共產主義的信譽。這種辦法得不償失，因此即使想實現中共所規定的 1959 年的增產計劃都是不可能的。

那末中共可能會怎樣辦呢？會做出怎樣的轉變？而人民公社本身，在現狀之下，又會有怎樣的變化？

中共會不會放棄人民公社？不會！史大林主義者與列寧主義者之間諸般不同之一，便是前者沒有後者那種老實負責態度。列寧時代的布爾雪維克精神是：大膽地幹，密切地注視成效，如果做錯了，那就真誠地認錯，勇敢地改過，不諉過於人，不攬功歸己；凡是已經認錯改過的人，不論為誰，又絕不作多餘的打擊，任其如舊繼續工作。列寧在一切事情上是領袖，在此一態度上更是表率。列寧在爭論中是最不妥協的，他常以最不容情的批評來對付錯誤與犯錯誤的同志。但當錯誤已被消除，犯錯誤的同志已經知錯之後，他決不去懲罰那個同志；如果爭論的結果證明出錯誤方面正是列寧，那他便公然認錯，老老實實地改變政策。這真是所謂「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其過也人皆見之，其更也人皆仰之。」可是這個偉大的（真正偉大的！雖然這個狀詞已被共黨文獻濫用得毫無意義，但此地我們必須應用它）列寧精神，一踏進史大林時代便消失於無形了。代之而興的是「領袖的永不犯錯誤論」。為要維持這個理論的施行，於是盛行了偷天換日的改錯方法，覓羊替罪的卑劣手段。領袖永遠正論，犯錯的只是「有些人」，而這些人一經被指為錯誤，便帶有殺身滅門之禍。蘇聯國家在史大林手中的可怕墮落，表現於此一態度上者，最為明顯。

中共的領導層在這個態度上，乃是十足十的史大林主義。他們既然仿照了史大林，完成了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完成了對共黨中央「永不犯錯」的迷信，他們自然不能在任何場合與條件中，實行公開認錯與坦白改過的老實態度。此事自來已然，今後將會尤甚。因此，人民公社的理論與實踐雖然被事實批駁得「體無完膚」，而中共絕對不會加以公然放棄，在無情的事實面前，他們自然不得不低頭，不得不轉彎；但他們絕對不肯承認自己曾經走錯了路。改變是必須的，而且半年來已經作了太多的改變；可是面子必須保全，大前提必須這樣確定：人民公社的辦法「完全正確」，實行中「愈來愈顯出其優越性」了，其所以要有這些與那些改變者，只因為「有些人誤解了中央與毛主席的英明與正確的指示」。

我們在前面已很充分地研究了「英明與正確的指示」，現在讓我們來約略看看那些因「有些人的誤解」而作的改變吧。

十個月來人民公社的變化，在整個的氣氛與一般的舉措上說，頗有點像「戰時共產主義」返回到「新經濟政策」的轉變。我們知道，在中共提出人民公社之前，這樣的雛形組織，事實上已有幾個存在，那是為了適應「全民煉鋼」，工農業群眾性「大躍進」等臨時性的苦戰任務，自然而然產生的。這種組織當然容易發生原始的共產主義情緒，在分配與消費上都受着平等主義的支配。因為如果沒有這種精神，僅憑幹部的動員與命令，那末即使最短時期的「群眾苦戰」都是弄不好的。那些「自發的公社」正因為多了這點精神，多了一些對群眾生活的照顧，所以其躍進成績也就比沒有「公社」組織的地區為好。毛澤東等正是因為巡視了河南、山東某幾個這樣的「自發公社」，才決定要把它成為制度，推行全國。也因為如此，所以在最初發起人民公

社的諸般動機中，雖以無限榨取的冷酷打算為主，卻多少混和着糊塗的、原始的、或者意存欺騙的共產主義願望在內。這情形非常清楚地表明在 8 月 29 日的中共決議案中，它輕浮樂觀地宣佈：「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麼遙遠將來的事情了」。它要求大家「不算細賬」，「不找平補齊」，「不斤斤計較」。它強調集體生活的諸種措置；它特別指出工農商學兵結合，與農林牧副漁並舉，它要把公社辦成「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單位」，因此，雖然沒有在那決議中規定，但在當時所有的中共領袖言論中，都屢次主張將公社在城市中也同樣地實行。受着此一精神的影響，全中國曾經颳了一陣左傾的平等主義的風。在當時的報章雜誌上，群眾集會上，抨擊資產階級法權的聲音叫得非常響亮，以致工廠裏的計件工資制紛紛「自請」取消，報酬優厚的其他工作者也競相「自動」減薪。這一時期的「共產主義精神的昂揚」，真可算得洋洋大觀了。

可是，群眾性的「忘我苦戰」是不能無限延長的，（即使冒用「不斷革命論」的名義也不行。）突擊過去，緊張鬆弛，經濟生活再度被放在較為平和與冷靜的軌轍內進行時（經濟生活主要得在這樣的軌轍中進行），那些原始平等主義與模糊共產主義的一套便不起作用了，而且有些還成了妨礙。因此，當公社被正式採用，推行全國，作為正規的農業生產活動的組織時，它那烏托邦式的或半欺騙式的共產主義的願望部分便迅速消失，它那冷酷榨取的計算部分便充分發展起來。人民公社內的「新經濟政策」飛速抬頭，代替了人民公社內的「戰時共產主義」。

自從去年 12 月中共八屆六中全會的決議公佈以後，發生於公社內的此長彼消的變化，大概有如下述：（1）宣佈「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

產主義是一個相當長相當複雜的發展過程」，反對「有些人企圖過早地『進入共產主義』」；(2) 雖然仍舊吹噓着什麼五臟俱全的「並舉」和「結合」，卻着重指出了企圖消滅商品生產與消滅交換的錯誤，主張大力發展商品生產；(3) 要「貫徹按勞分配的原則」，力言供給部分不宜太廣，強調「工資部分是主要的，並且要有較快的增長」；反對將收入較多者與較少者「拉平」，規定農民的工資要分成「六級至八級」，「最高工資可等於最低工資的四倍，或者倍數是更多一點」；(4) 舊有團體內外的債務，原本主張「不必斤斤計較」的，現在則改為一切債務，不論是個人相互間或公社和社員間，「一律不要廢除」；(5) 有不少生活資料，以及宅旁果木，小農具，家畜家禽等，原本採取「自然而然變為公有」的辦法（其實是不由你不歸公），現在則宣佈它們歸社員私有，而且還鼓勵私人搞副業，特別是號召私人養豬；(6) 實行「生產責任制」，層層包產制，嚴訂勞動紀律，對「違紀者」與曠工者採取最嚴厲辦法；(7) 城市辦公社的想法廓清了，人民公社由原來的所謂國家和社會的「基層單位」看法，不得不暫時以農業生產的一種組織為限了。

以上種種改變，整個方向是由「左」向右，由「幼稚」變為老成，由輕率瘋狂到冷靜殘酷，由全民突擊時的「浪漫主義」變成為踏實辦社的「現實主義」，從糊塗或意存欺蒙的「共產主義」回到清醒而赤裸的資產階級法權；從「拉平富戶」的辦法，轉變到「對富強者下注」。人民公社此一轉變方向，在整社的過程中業已完成，今後更要依此方向突進的。

十六、我們既然不贊成未改變前的人民公社，那末現在有了改變（它們在許多方面其實已偷偷放棄了人民公社的理想和實踐），是否表示贊成呢？對於這個問題，我們不能簡單答覆。在後面我們將詳列我們對公社的態度與主張，我們將在正面敘述中順帶答覆這個問題。

現在讓我們先再觀察一下，中共這些新改變，即人民公社的「新經濟政策」，在今後的中國農村中將會促成怎樣的化分？農民與共黨統治者之間將會產生怎樣的矛盾？

第一、「公社富農」行將崛起。我們說過，公社的拉平手術大大損害了中國農村中等於中農地位的那一層農民，因此，造成了財產上的大損失，妨礙了生產率的提高。這個事實，雖然不能使中共上層在理論上認識此一政策的錯誤與罪惡；但能迫他們經驗主義地改變政策，而且走到與原來相反的另一錯誤上去。這情形，我們現在就已經看見其端倪了。陶鑄在其虎門公社的調查報告中關於這一點說得很坦白，他說：「總的說來，工資等級差別最少不得少於八級。必要時還可以擴大一兩級，這是沒有什麼壞處的，恰恰相反，今天有些地方在工資等級上差別太少，倒影響了群眾的積極性。」這位廣東省中共的最高人物的話，一方面駁斥了前不久他們高唱入雲的所謂「共產主義教育」決定一切的胡說；另一方面表明了他們「對富強者下注」的新路向。在此路向下，較富的生產隊，乃至較富的個別農戶，將受到無微不至的表揚和獎勵，他們將在上面的鼓勵中發展，形成一個特殊階層，高高地超出於大多數貧苦農民之上。這群人我以為可名之為「公社富農」。他們當然與舊式的富農不同。在大環境不變的條件之下，他們不會走資本主義道路。他們和公社中的黨政軍幹部密切結合，成為共黨官僚政權在農村中的基本支柱，成為駕御廣大農民群眾的槓杆，成為公社今後推進中的主要動力。他們是農村中的勞動貴族，是鄉間的史達哈諾夫【朱正按 即斯達漢諾夫，當年蘇聯樹立為學習榜樣的勞動模範，發起了叫做「斯達漢諾夫運動」的勞動競賽。】主義者。

第二、「共產主義的萌芽」行將萎縮甚至凋謝。在貧富距離日益擴大的條件中，起碼的伙食供給勢必為一部分人所不感興趣。他們最初

是公飯私菜，其次是舉辦較富者的小灶，最後必然會回復私人煮飯。吃的方面如此，其他的生活方面亦然。因為貨幣的保有量在各農戶中大不相同，隨之而生的在公社中的地位不同，其影響必然會達到託兒所，醫療院等等機構。結果，我想，這些生活福利方面的機構，或者會名存實亡（雖然在大多數地方始終是有名無實），或者分成相應的等級。「公社富農」與一般幹部有他們較好的託兒所與醫療院等，貧苦大眾有他們「自己的」一些。

第三、農業生產的增加率將減低。根據中共的官方說法：「糧食不能大增產，主要取決於在新的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人們對大自然的主觀能動性有沒有充分發揮。」（見 1958 年 8 月 1 日《紅旗》上陶鑄的文章）因此他們提出了所謂「糧食增產無限論」。為要證明這個理論，這位廣東省中共的最高領袖於提出了許多「論據」之外，還舉出了一些「鐵的數字」。據說廣東省的農業生產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內，糧食增產平均每年為 6%。而在 1958 年，因為共黨的八屆二次會議通過了「社會主義的建設總路線」，以致僅僅在最初的六個半月內，春夏收作物的增產量為 65 億斤，比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全部增產數目還多 10 億斤，其增長率達到了 60%。以這一「事實」為根據，他們便宣佈了「增產速度將以更快的步伐前進」。

人民公社制度本來就被解釋為「農業生產全面不斷躍進」的結果，而這個制度的作用，則是要保證 1958 年上半年的增產速率今後繼續不變，甚至要更快更高。事實上會做到嗎？我們的想法是否定的。不錯，人定可以勝天。土地所有制的改變，勞動力的組織和應用起了變化，興修水利，採用耕植上的科學技術等等，無疑會大大解放農業生產力，會奇蹟般增加生產量。特別因為舊中國農業經營的異常落後，使革命後的農業增產更易完成，更為顯著。但是所有這些，並不等於

說農業增產簡單可以憑「主觀能動性的充分發揮」來決定，並不等於說不問客觀條件如何，只要我們念起「多、快、好、省」這四字真言，便可以向大自然任意索取多少糧食。糧食增產，和其他任何生產的增長一樣，是既有限而又無限的。就特定時間與特定條件說是有限的，就發展過程來說卻是無限的。今天中共宣傳的「無限論」的錯誤，恰恰在於它認為在特定的時地條件中，只要我們主觀努力，便不可能設定一個最大限度的增產率。依他們之見，農業生產的增加，只有主觀努力的緊張強度，才是唯一的界限。多一分努力，添一分緊張，便增一分生產。由此產生了他們的無限苦戰論，日夜不息論，以及他們莫名其妙的「不斷革命論」。這種幹的精神固然值得佩服，可惜它不是發生在真正馬列主義的基礎上的。如此這般硬鼓起來的幹勁，經過了短短一年，已明顯地表示再衰三竭之象了。原因很簡單，第一，由於過分落後這個特點所造成的飛速增長，差不多已利用至於極限，今後的增加將更多地依賴於新的積極因素的創立，而很少能依賴於舊的消極因素的革除；換句話說，今後的農業增產將愈加依賴於生產技術的機械化與電氣化，依賴於現代農業科學的全面採用，而不能寄託希望於勞動力之更緊張的編排或什麼落後的生產關係的排除。（其實今天最妨礙增產的倒是那官僚主義的新關係。）第二，在過去的「大躍進中」，「主觀的能動的」農民已被鞭策到一個人體的生理條件的最大限度，大多數地方還超過了這個限度，以致無法不發生反應，無法不鬆弛下來。

1959年不能作1958年同等的或更快的躍進，在目前差不多已經看得很清楚。最近的《紅旗》透露出一些有趣的消息：幹部憑主觀規定了躍進指標，群眾完全不感興趣。「你定你的，我幹我的」——這是農村公社中的一般反應。因此，領導上又開始在責備「有些人」的「主觀主義」和「不走群眾路線」了。他們提出了「包產一定要落實」的

口號。再過幾時，我想，也許那位大叫「增產無限論」的陶鑄都會被歸入「有些人」中去吧。

在中共目前的公社政策下，今後農業生產的增加率多半將會比1958年的減低：不增加反而減產的可能都不是沒有的。

第四、強制和懲罰的辦法將愈加嚴峻。當然，公社自始就是一種帶有很大強制性的勞動組織，所謂「軍事化」，「戰鬥化」與「集體化」就意味着高度的強制與伴以俱來的可能懲罰。不過這種性質在初期總還是相當緩和或隱藏的。「對於沒有完成任務的單位或個人」，像《河南日報》在本年1月間所主張：「給予適當批評，不給予物質懲罰」的說法，在大躍進及公社運動初期是更為流行的。借助精神壓力而避用物質壓迫，「批評從嚴，處罰從寬」，可說是那一時期較佔上風的一種政策。可是逐漸地，因為榨取剝奪的無限增加，官僚對群眾的說服就無法不讓位於壓服了。事情太傷害了大眾的物質利益，便不再是空口宣傳所能撫慰。

對中共榨取農民的程度如想有一清楚印象，可看下一事實：

1958年6月3日（即人民公社高潮前夕），毛澤東以主席名義堂皇公佈的農業稅條例，規定平均稅率為農產物總收入的15.5%。尚在最佳經濟情況的地區，稅率最高亦不得「超過常年產量的25%」。（見該條例第三章第十條與第十二條）但在人民公社中，「上交」比率卻一般地大大超過了這個最高比數。例如在河南省睢縣的紅星人民公社中，規定的上交數字便是「總收入的32%。」我們知道，當合作化未全部完成之時，中共對個別經營的富農徵稅額為總收入的30%。其目的據中共自己解釋，是要用經濟手段來限制和消滅富農。可是「拉平」在

貧農水準上的人民公社，現在卻要交出比當年富農更高更重的稅，可見中共對農民的奪取是如何的與日俱增！

上交如此之巨，而餘數又主要得投放為社內今後農、林、牧、副、漁的資金，要興辦工兵商學的種種事業，又因政社合一之故，還負擔全部政費。試問這樣七折八扣之後，一個公社還能剩得多少力量來照顧社員的生活？又有多少餘款發放工資？結果是工資拖欠成為常事，生活則一日三餐難以為繼。炊事員不能作無米之炊，鎖了食堂大門逃之夭夭者已有所聞了。廣東中山縣的公社裏盛行着一句「順口溜」：「有得做，冇得息，冇得睇，冇得食。」農民們日夜苦戰，到頭來只看見上好的糧食統被繳去，而自己則面對了難於下嚥的雜糧粥飯挨餓，這情形怎能不激起農民大眾的憤怒不滿？它們必將發泄於消極和積極的反抗中，而首先在消極怠工中表示出來。

面臨了此一局勢，官僚統治者那套強化和懲罰制度便發揮到了無所不至的地步。所謂「生產責任制」，以及形形色色的什麼幾「定」幾「獎」制，層出不窮，一個厲害過一個，目的只是要把因不滿而消極的農民緊緊地束縛在「勞動戰車」上，讓他們不能作絲毫動彈。略不就範，則處分隨之。自從春季「整社」以來，沒有完成「定額」者予以必要懲罰的論調，在中共報紙上幾乎每天可以見到了。具體的處分辦法雖迄今未見在公開的文獻中透露，不過從陶鑄的報告中我們看到了「曠工一日扣工資二日」的辦法；同時還獲悉了一個情形：原來各個公社的「領導」有權任意想出辦法來處罰農民。至於較曠工略為嚴重的「罪名」，那當然有現成的懲治反革命的法例可援，犯者自會很輕易地被送去勞改，受刑事的乃至「軍事的」處分。

第五、農民大眾與官僚統治層之間的衝突將愈加直接與激烈。壓力愈大反抗力亦愈大這個物理定律，如何在社會政治方面體現是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不過就目前中國的農民情形說，我們覺得，人民公社制度的本身已成為此種衝突的有力導因。在1958年9月8日的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曾經說了幾句很出名的話，他說：「中國領土台灣，黎巴嫩以及所有美國在外國的軍事基地，都是套在美帝國主義脖子上的絞索。不是別人而是美國人自己製造了這種絞索，並把它套在自己的脖子上，而把絞索的另一端交給了中國人民……」這幾句非常漂亮的話，若把「美國人」換成了「中共的官僚層」，把「基地」改成為「公社」，也同樣是適切的。中共將「公社」這條索子套住了全體農民的脖子，以為如此可「便於領導」，可是從另一方面看，這條索子也套住了領導者自己的脖子。試想想，既然把所有農民的生活問題七包八包地承擔了下來，終究不是說說就算，也不是想放下就放下的。不管好歹，總得拿點東西給人吃下肚，挨餓是不行的，有得吃了，還得看吃的是什麼，太壞了不行，煮得太不像樣也到底不行。吃的方面如此，生活的其他方面也莫不如此，只有50斤的力氣硬要（或假裝要）挑100斤的擔子，結果必然是摔壞了東西又跌壞了自己。一切生活問題，必然是迸發農民憤怒的不斷泉源。同時「政社」既然「合一」（實則是黨社合一），則農民的每一個不滿都必然要向黨發泄。黨再不能起「超然的第三者」的作用了。農民與共黨之間不再有什麼掩護物，不再有緩衝。矛盾一經爆發，便直接成了反官僚的鬥爭。

十七、上面，我們把十個月來人民公社的起因、面貌、作用、機能、發展、改變及其前途作了相當充分的認識，並給了必要的批評。我們不是消極的批評家，我們的批評不是僅僅為了批評之故。人左則右之，人右則左之，一切為了逞口舌或筆墨之快，絕非我們所願為。

我們有自己一貫的立場，有自己正面的（亦可說建設性的）看法。我們是共產主義的革命家。因此，正是為了共產主義革命的利益，正確些說，為了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及其建設的利益，我們才批評了中共有關人民公社的種種錯誤與罪惡。也正為此故，我們最後必須把我們關於此一問題的意見與辦法列敘出來：

- (1) 反對「一國社會主義」的反動理論——這是「一鄉共產主義」，即人民公社的理論基礎的出發點。我們認為：中國的社會主義（遑論共產主義）建設，尤其是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建設，必須視作世界革命總任務的一個部分，才可思議。我們自然要在已有的現實的條件中建設社會主義，但我們必須記住此項建設的世界性以及它在一國範圍內的暫時性與局限性。因此，我們必須把暫時被迫進行於一國之內的建設看成為促進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步驟或手段，而非自滿自足的目的。今天中共正因為把中國一國之內的社會主義建設看成為自滿自足的目的，而且荒謬地認為在「一窮二白」的基地上業已建成了社會主義，今後更可獨力從社會主義走向共產主義，結果便是以殘酷的手段榨取工農大眾的勞動果實，因而給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崇高事業繪出了一幅最無情的諷刺畫。這在國內是大大破壞了工農群眾對社會主義的信心，在國外則癱瘓了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起來掙脫鎖鏈的意志和決心。

不放棄「一國共產主義」這個根本錯誤的立場，人民公社制度無論如何不能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甚至不能對它作枝節的改善，使之有利於而非有害於農民生活與農業生產。

- (2) 中國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性的改造，首先要顧到工農聯盟的利益。應該把爭取農民對工人社會主義事業的信心視作頭等重要任務，其次才可以考慮到如何向農民要求更多的物質貢獻。即使真正為了社會主義的建設利益，也絕不允許對農民作掠奪性的飢餓徵集。農業的大規模經營與集體經營，大體上必須與工人階級（本國的與國際的）所能提供的機器化與電氣化的程度相適應。因為在原始的人力基礎上，除了從事某些公共工程之外，進行太大規模的集體經營，多數是無結果的浪費。當有可能進行集體化時，絕不允許對中農施行強暴。加入集體或合作團體必須遵循人人自願的原則。

以上是基本的原則立場，下列乃有關於人民公社改革的具體意見。

- (1) 政府應宣佈人民公社不再是強迫實行的、全國一致的制度。各公社社員有權用無記名秘密投票方式，決定各個公社的存廢。
- (2) 如多數贊成保存公社，公社當然繼續經營，唯個別社員有退出之權，退出者公社應指定相當土地由他使用，任他個別經營。
- (3) 如主張保有公社者佔少數，公社當然解散。各農戶應根據自願原則，從事合作社集體經營，少數願依原公社方法經營者，可助其成立公社。
- (4) 經過社員決定保存下來的公社（下同），其管理和經營必須認真民主化，一切領導幹部由選舉產生。公社的整個管理與組織工作應由全社選出的公社委員會掌握。政社必須分家，反對勞動組織軍事化。

- (5) 公社內成立職工會，這個職工會應屬於全國職工會系統，不等於公社內的福利委員會。
- (6) 公社的生活供給制度及其他的一切福利機構，應由公社委員會會同職工會通盤策劃。原則上，全年的總收入中，首先得保留作為此項之用的糧食，其次才是「上交任務」。糧食稅絕對不應超出糧食稅條例所訂定的 15%。改善農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應視作目前建設社會主義的頭等重要任務。
- (7) 反對不切實際的平等主義，更反對以造成農村新特權階層為目的的、「工資等級愈大愈好」的政策。
- (8) 國家應增加農業投資；在可能限度內，應辦理機器拖拉機站，藉以幫助有可能進行大規模耕種的公社或合作社農場。

* * *

我們應該為我們的主張作不懈的鼓動宣傳。因為誠如我們上面所述，人民公社勢必造成共黨統治與農民大眾之間愈來愈激烈的直接衝突，在此衝突中，只有我們的立場才能引導憤怒的農民走上正確的社會主義道路，而不為資本主義的反革命派所利用。同時我們相信，在今天一千多萬的中共黨員中以及更為廣大的先進工人中，一定有不少是誠實的共產主義者，他們在實際工作中，在與群眾的接觸中，在上層命令碰了壁而不斷進行的不光明的改變中，他們遲早會覺悟到史大林「一國社會主義」與毛澤東「一國共產主義」的謬誤，他們會認識到公社運動的基本錯誤何在，因而會有意或無意地找到我們的立場。

只要我們的思想和上述的群眾思想摸索會合到一起，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便可以脫出史大林主義的官僚控制。事情如果真是這樣

發展，那末公社問題倒成為中國社會主義被導上健全方向的一個機緣了。我們必須為此方向的實現而努力。

雙山，寫於 1959 年 5 月

注釋

1. 從來的馬克思主義者並不說國家所有為「全民所有」，社團所有為集體所有，有也不強調這二種所有制在程度上的高下深淺。
2. 鈔本傳閱後，承同志們指出，說我不應根本否認「全民所有」與「集體所有」這兩種制度間的差別。這個指出當然對的，因為無論在理論或實踐上，都可以確定這個差別。但列寧和托洛次基從來不着重或強調這個差別卻是事實。（他們根本就不喜歡像「全民」，「人民」那類名詞。）在他們二人的了解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國家支配着一切大生產資料，無產階級執掌着政權」，只要具備了這兩個大前提，則農民參加合作社，便是「為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而且足夠的一切了。」（順便提一提，列寧在《論合作制》中的這一段話，曾被史大林拿去作「一國社會主義」理論根據的。）因此，即使並非為「全民所有」的合作制，列寧卻認為「與社會主義企業沒有區別」，「合作制往往是與社會主義完全符合的。」（引文均見列寧《論合作制》）托洛次基在這方面的看法與列寧完全一樣，在他關於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一些文件裏，從不區別這兩種高度與初步的所有制。因為事情確然如此；既然國家支配着一切大生產資料，無產階級掌握了政權，那麼農民究竟以何種方式實行集體生產，以何種名義（工資抑非工資）分配其勞動果實，對於社會主義的發展來說，並不具有像今天中共理論家們所說的那種意義。對於農業經營組織方式的上述二種態度（列、托的與中共的）倘若只限於學院式的爭論，倒也罷了；可惜它對於農業政策是能發生重大影響的。依照前者：農民之經由合作化與集體化道路走向社會主義時享有很大自由，很大的伸縮性，有時甚至在對農民的私有傾向作或多或少的讓步；而依據中共的看法，既然「所有制的本身具有如此決定意義，那就得集中一切力量，以便在愈快愈好的時間內將「所有制」從較低的提高到高級的，從「集體的」提高到「全民的」。

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雙 山

信達出版社印行

第二部分 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出版說明

致友人書

——略論中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幾個方向
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出版說明

收集在這本小冊內的二篇文章，寫於文化大革命正在開始進行的時候，作者當時僅就運動動力，進行方式等等，推測它未來的歸趨。可是後來事變的真實發展，除了那異乎尋常的殘酷之外，基本上是證實了作者的事先分析的。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我們曾向作者提議，將此二文付印，再寫一篇新文章，給那次運動作一個總結。作者答應這樣做。可是他長期臥病，總結無法寫成。我們覺得這二篇文章不但有助於過去的了解，而且有助於目前批林批孔，乃至今後中共內部矛盾的了解，因此，決定先將二文單獨出版了。

第一篇係私人通訊性質，現在第一次發表。

第二篇曾陸續發表於《七〇年代》（未完），且曾譯成英文，在美國發表於兩本不同的雜誌。

1974年11月24日

編按：這一篇「出版說明」是信達出版社負責人樓國華所寫。另，第一篇書信與《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分別寫於1966年10月和1967年2月，1974年合編成小冊子。

致友人書

——略論中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幾個方向

親愛的朋友：

××兄告訴我，說你要我寫點關於最近發生在中國的事情，特別關於那轟動世界的所謂文化大革命。我很願意這樣做。

只因我精神不夠，無法寫鄭重其事的文章，只能和你在信上隨便談談。同時想談的，又只能限於這個問題的幾個方面。

我想把我預備談的歸結到如下三個問題：(1)「文化大革命」如何發生的？(2)為什麼在此時發生？(3)為什麼它要採取這樣的方式？

為什麼發生這個「革命」？原因當然很多。同時，從各個不同的視角，人們會找出各種不同的原因來。要全面地分析它們，那是需要很大篇幅的，我不能這樣做。

現在一般的觀察家們，最歡喜用「毛澤東的繼承人之爭」來解釋「革命」。這當然不夠，而且也不對。中共最高層中為了爭奪毛澤東的繼承人地位而發生鬥爭當是事實；而這個鬥爭，強烈地影響着「文化大革命」的進展，也是事實。但它卻不是「革命」的原因，而只是「革命」的表現之一，或者可以說是它的結果之一。為什麼會有這次「革

命」，為什麼在「革命」中發生繼承人之爭這個現象，那是要更深刻地
在政治、經濟和社會諸方面去尋找原因的。

因此，這封信裏我不想談到中共領導層中的鬥爭問題。

這裏我想談的是中共近幾年來的國際地位和國內局勢，與最近發
生的「文化革命」之間的因果關係。

茲先談國際方面。關於中共近年來的國際景況，你至少是和我
一樣清楚的。所以我不必在這上面浪費筆墨。總之，無論在一般的國
際相處中，或者在特殊的社會主義國家陣營中，更或者在國際共產主
義的行列中，中國和中共在過去幾年都日甚一日地陷於孤立了。為什
麼會發生這種情形？誰應該負主要責任呢？這樣的問題，可以說是自
動地從這個局勢中發生出來；而問題的解答也可以說是自動地提供了
的。問題如果從中國方面着眼，那末由毛澤東領導制定的外交路線與
反蘇路線，特別是近來很不得人心的那個反對以共同行動援助越南的
態度，顯然是促成了這個孤立。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共內部，包括它
的最高階層在內，有人對黨的既定政策表示了懷疑，那是不但可能，
還簡直是必然的了。如果我們假定以劉少奇、彭真為首的一群領袖，
曾經對上述的路線和態度提出過一些懷疑，要求過作不改變根本方向
的修正，或竟表示過某種程度的反對——都不會全無根據，都不會與
事實相去太遠。

有了這樣的懷疑，有了這樣的要求與反對，毛澤東和他的一些
無條件的追隨者們會怎樣呢？他或他們會虛心接受？或至少會加以容
忍嗎？當然不會。因為時至今日，毛澤東在這些方面作任何妥協與退
讓，都必然要牽涉到責任，要影響到威望，甚至要變動他的地位。他
當然絕對不肯負任何錯誤的責任，絕對不肯因承認錯誤而貶損其威

望，更絕對不願因變更路線而降低或喪失其地位的。那末怎麼辦呢？辦法只有一條，那就是運用高壓，用鬥爭來擊破黨內一切忠貞的與不忠貞的反對派。

現在讓我們談談國內問題。

談到國內問題，一切根源都得回溯到那所謂「三面紅旗」。你當然已經知道，為了要「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毛澤東提出了「總路線、大躍進與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其實，「總路線」——正像一位被整肅的文人【朱正按 鄧拓的《燕山夜話》。】所形容——只是一句「偉大的空話」；「大躍進」是一齣「偉大的鬧劇」，「人民公社」是一個「偉大的幻想」。只因這些空話、鬧劇和幻想，是讓一個「偉大」有力的政府拿來付諸實施的，所以很快就造成了悲慘的後果，很快就引起了中共黨內的鬥爭。

為了反對三面紅旗，你知道，中共黨內發生了它在取得全國政權後的第一個反對派（在這以前曾經發生過高崗、饒漱石的「反黨集團」，但它的所以形成，就我們迄今所知的材料來看，很少由於政見上的不同，而主要由於權力鬥爭，他們似乎想結托外力——蘇聯——以便先行成立「獨立王國」，然後攫取黨和國家的最高統治權）。這個反對派以當時的國防部長彭德懷為首，得到總參謀長黃克誠的支持，還可能獲得當時的計劃經濟首長陳雲的默許，結成了一個反對三面紅旗的「右派」。其結果，你當然也知道，在1959年8月召開的八屆八中全會上，毛澤東取得了中委會內部的絕對多數，壓倒了「右派」。

黨內鬥爭勝利以後，毛澤東在實施的方法上略加修改（例如：放棄了「吃飯不要錢」，停止實行城市也公社化等），繼續高舉和推行這三面紅旗。

結果，如所周知，大躍進以無可估計的財富損失而告終，人民公社造成了連續三年（1959–61年）的所謂「特大的自然災害」；多、快、好、省的「偉大空話」，終於被證明為破壞建設與妨礙建設的最有效的「總路線」。

不過關於「三面紅旗」的本身錯誤，我不想在此地談，它不在我想要討論的範圍之內。在這裏我想談的是：在那三年「自然大災害」期間，以及在這個時期前後，發生於中共黨內外的幾個值得注意的現象。

下面這兩個現象是最值得注意的：

一、在較高的領導層中，對於三面紅旗雖然不再有人敢公然批評，但隨着事態的愈來愈嚴重，錯誤的愈來愈明顯，表示疑慮和不滿的人卻愈來愈多了。這些人不久之前都曾經堅決擁護過毛澤東的，如今卻暗地裏對罷了官的「右派」【朱正按「右派」專門指1957年「反右派鬥爭」的打擊對象；1959年批評三面紅旗的被稱為右傾機會主義者。】表示同情了。他們有的是陽奉陰違，在事實上部分執行了「右派」所主張的路線；有的則明譏暗諷，對真正的當權者進行善意的或惡意的諍諫。這些人，就是今天被追稱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打着紅旗反紅旗的黑幫」。

二、在黨的，特別是在政府與工礦企業的中下級幹部中（自然也在高級幹部中），有為數極多的人，利用了那個時期的物資的極度缺乏與普遍的貧困，利用自己的部分職權，實行肆無忌憚的貪污。

對於這兩個現象，毛澤東及其「三紅」的死硬追隨者，當然是耳聞目擊的。對於這兩個現象，他們當然是深以為憂的，因為第一種情

形會損害毛氏在黨內的獨尊地位，甚至會損害他的領袖地位；第二種情形則將根本掘毀中共統治的整個基礎。

確實，這是有關乎毛和中共的生死問題。

他（或他們）一定要克服這兩個不利現象。「文化大革命」在很大範圍內正是從這個要求發生出來的。

但是，這個「革命」為什麼不爆發於三年「自然災害」期間，為什麼不發生於災害年月結束的前後？為什麼要再拖三年，直到1965年秋季才發動呢？

這是一個過程問題，要弄清楚這段過程，得稍稍敘述一點事實。

「自然災害」在1958年已見端倪，到1959年年尾已成「燎原」之勢。此後便迅速蔓延惡化，達到空前嚴重程度，威脅着全體人民的最低生活，威脅到整個社會的起碼治安，因而威脅到中共統治的存在基礎。危機是太過嚴重了，此時中共不得不把一切力量和注意集中到難關的過渡和克服上面，以致毛澤東及其死硬派不得不暫時容忍那些「動搖者」。他不能立即整他們，這是一。

還有，為了要渡過和克服難關，毛澤東不得不在這期間採取國民經濟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這在實質上，正是毛澤東自己也放棄了「三紅」的原有辦法和規模，暗中採納了「右派」的立場。既然他自己的行徑和那些「動搖者」的所作所為不過是五十步與六十步之差，他也就不必立即去整他們了，這是二。

中共執行了退卻政策的結果，我們知道，災害性的經濟局面從1962年起顯示了初步的好轉。

正是這個時候，以毛氏為首的真正當權派就開始喊鬥爭了，開始整人了。不過他們的攻擊不是同時對準上述的兩個現象，而只是打擊了其中的一個。

在 1962 年 9 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發出了號召，反對在災難年月中「幸災樂禍」的「國內沒有改造好的地主分子，富農分子，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以及殘餘的反革命分子」。他號召全黨，要「堅決地粉碎他們的陰謀」。

會議之後不久，毛澤東發動了那個有名的所謂「四清運動」，亦即所謂「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它的主要目的在於打擊黨內外災難年月中乘機貪污作弊的中下級幹部，而尤以人民公社及中小企業內的負責幹部作為清查對象。清查他們「政治、思想、組織與經濟」這四種關係。

因為貪污現象太過普遍，毛澤東對他手下的既存組織缺乏了信心，所以為了執行這個新的四清任務，他組織了一支特殊的「工作隊」。其中包括了許多青年，甚至有不少不屬於黨或青年團的青年。他們普通都是大專學校的畢業生，被調動去參加一個時期工作的。

這是毛澤東以在黨的與非黨的青年群眾來鬥爭黨內外腐敗幹部或「不聽話」幹部的初步嘗試。

這個嘗試，在毛氏直屬的當權派心中，顯然認為是成功的。事實上，打從 1962 年冬開始實行起，直至 1965 年秋（文化革命興起）大約二年多些的過程中，四清工作組的工作雖然發生過一些波折^[1]，但是就我們迄今所聽到的來說，這運動總體上是達到了毛氏所希求的目的的，它相當成功地清算和整頓了（主要在經濟方面）鄉村人民公社與

中小型企业中的幹部；在較小範圍內，它也整肅了下級黨政機關中的工作人員。

因此，我們可以說，如果中國的局勢，特別是它的國際局勢，不曾在 1965 年的夏秋之間發生相當大的變化，很可能，四清運動已經足夠為毛氏的「整風」目的服務了。

那末在 1965 年的那段時期內發生了什麼大變化呢？

一方面，國內的經濟危機很大部分得到了克服，尤其是農業方面，在所謂「連續三年的大豐收」之後，城鄉經濟確實顯出些興旺氣象；另一方面，國際形勢急轉直下，變得大不利於中國；特別是印尼共黨冒險慘敗；反修鬥爭愈來愈處下風……等等，使中共陷於空前孤立，它的聲望空前低落。

前一變化顯然於毛澤東有利，使他有了較為堅實的基地，可以比較放手鬥爭。但後一變化卻非常不利於他。正如我在前面講過，這使中共內部，甚至在最高級的領導層中，發生了一種「同情修正主義」的傾向。這就是說，發生了一種相當普遍的願望，要求毛澤東對蘇聯領導人的鬥爭採取比較妥協與容讓的態度，藉以一方面應付愈來愈大的帝國主義的壓迫，另一方面打破共產主義陣營中日甚一日的孤立。

這樣，毛澤東腳下有了可以進擊的穩固基地，而面前卻發現了必須鬥爭的迫切需要。怎麼辦呢？回答很簡單：對「黨內的當權派」，對那些「鑽進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資產階級代表」，對「修正主義的應聲蟲」實行進攻。

所謂「當權派」，所謂「資產階級代表」，所謂「修正主義者」，如果僅就黨的上層來說，我在前面也指出過，那就是在災難諸年中發過

怨言，表示過動搖或擁護得不力的這些同志。對於這些人，毛澤東在四清運動中高抬了貴手的。本來，他也許可以始終放他們「過關」，不算他們的舊賬的，因為事過情遷，而他們又恭順如前。

可是國際局勢一逆轉，這些「舊賬未清」的老同志們，都又欠下了「修正主義」的新賬。這下子就無怪要龍顏大怒了，非得將他們新舊二賬一起算，甚至要加倍清算不可了。

以「當權派」為主要目標的算賬運動，開始於1965年冬天。發動以後，它便逐漸深入，迅速擴大，終於到了1966年夏天，形成了氣勢浩大的「革命」，並且和原已進行了兩年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四清運動」合流起來。它把「四清工作組」的辦法無限擴大而為「紅衛兵」；把鬥爭的對象從人民公社與工礦企業的幹部延伸到「學術界的資產階級權威」，「修正主義的祖師爺」，「黨內的資產階級當權派」，並且擴大到黨內黨外乃至整個國民生活中一切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人和事、思想與行為。

我們上面的簡單敘述，大致說明了「文化大革命」何以在此時發生的原因。

現在來談第三個問題：「文化大革命」為什麼要採取「紅衛兵」這個近乎胡鬧的形式？

這個問題比較複雜，比較難於理解。

一般人對於這個問題的解釋是如下二者：

一、為了備戰，毛澤東、林彪們想給解放軍迅速培養出一大批後備軍。

二、因為黨政機構的腐敗墮落太嚴重，太普遍；同時毛氏的明暗（尤其是暗的）反對派力量相當大（中共一直宣稱「大革命」所反對的只有「一小撮當權派」，顯然是自相矛盾的），所以小手術不濟事，「四清工作組」不夠用，就造成了數以千萬計的「紅衛兵」，藉收抗毒與鎮壓之效。

這兩個說法自然都有理由，我們相信，它們都曾經是使毛澤東們設想出紅衛兵來的原因；不過，如果我們想較為深刻地探索問題，那末停留在這兩個解釋上還是不夠。

要尋找「紅衛兵」所以產生的遠較根本的原因，我認為：必須從中共治下的年青一代的精神狀態中，必須從毛澤東們爭取下一代的努力中，必須從他們力圖「剷除修正主義根源」的願望中，亦即從他們對蘇聯領導的鬥爭需要中去尋找。

中共統治中國已有十七年。當它初獲勝利時候那一輩的年青人，現在都已變成中年人了。這一輩青年，曾經以不同程度的熱忱迎接、擁護與參加了中共領導的革命，並因此有不小部分成了迅速膨脹的中共的黨員，成了它的中下級幹部。（根據劉少奇在中共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當時中共黨員總數為 1,073 萬。其中十分之九是 1945 年以後入黨，60% 是 1949 年革命勝利後入黨的。）這一輩人，一方面由於那隨權勢以俱來的腐蝕作用，另一方面由於 1957 年以來中共施政上的種種錯誤方針，其中有極大部分是幻滅了，或者腐化了；消極了，或者變得非常現實了，總之是對革命完全失去了熱忱與信心。

這一輩青年，今天有不少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對象之一。

另一輩青年是在「毛澤東時代」出世與長成的。他們今天的年齡是十四五歲至二十左右。他們的精神狀態是怎樣呢？按表面的推想，

他們似乎應該是「非常革命化」，「非常無產階級化」的了。可是我們如果略為深刻地觀察觀察，較多地接觸一些事實，卻發見真相竟是大出人們的意料之外的。

這輩青年的基本特點是：根本不談思想，完全沒有理想。他們對國家大事漠不關心，唯一操心的是自己的生活和出路。

中共那種溯及既往、禍延子孫的「階級路線」，對於青年人的心靈起着非常有毒的作用。他們口頭上雖然有時說：「出生不由己，好壞靠自身」；可是事實上，一個孩子出生在所謂「四類分子」（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與壞人）或「五類分子」（上述四類之外再加「右派」）的家庭裏，天然就低人一等。這些人的地位我想還遠不如美國黑人的孩子。他們不能進大學，甚至不能進中學，更甚至不能進國立的小學校讀書。他們不能進工廠工作，也難於進服務性的行業。至於參軍，那是更無資格了（順便談一句，解放軍是僅次於黨或團的一個特權組織。一個青年進了軍隊，不但他個人的出路有了希望，便是他的全家，也因他而成了「軍屬」，生活上相當得到照顧）。唯一生活之門對他開着的，就是下鄉去當最普通的農民。所以這些青年，除了怨望（怨父母，怨自己的命）之外，根本沒有思想，也不可能有思想；沒有理想，也不許你有理想。

另一個部分的「毛澤東時代青年」：工人的、貧下中農的以及職員們的子女。他們在「法理上」是有資格享受新社會提供給他們的一切機會的。但事實上國家目前所能提供的機會太少，遠不能滿足所有的要求者。同時官僚的控制太嚴，他們只願將機會給予合乎他們口味的要求者。因此這些青年便變得現實，變得勢利，變得非常虛偽，變得會逢迎拍馬，總之，竭力將自己做成上級所希望做成的類型，把自己

做成官僚所喜愛的候補官僚，以便在無數同輩中爭出頭，給自己找前途。這樣的青年當然不會有思想，也不會有理想。

還有一類青年，在廣義和狹義上都應該冠以「毛澤東時代」字樣的，那是中共統治下新特權階層的子孫們。他們的生活與出路憑他們享受着父母一輩的革命成果，他們毋須革命，因之也沒有革命的思想與理想。

總起來說，在「毛澤東時代」誕生和成長起來的青年們，因為中共「階級路線」的荒唐應用；因為窒息人心的思想控制；因為迅速墮落的官僚機器的壓迫；他們不敢或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因之失去了任何思想。他們對世界無知，對國家與政治淡漠，對一切理想不感興趣，對一切道德（不論舊的或新的）加以嘲笑。他們中間的一部分是苦悶的，絕望的，看不見任何前途的；其中最大多數是現實主義的，現實到犬儒主義的程度，他們日夜擔心的只是如何取得升學與工作的機會；只要能達到這個目的，他們是準備對「上級」的要求作任何遷就的。另一個小部分則自滿自足，自私自利；吃着革命的現成飯，卻昧於革命最起碼的道理。

這樣苦悶絕望與現實空虛，概括了目前中共統治下青年一代精神生活的面貌。

他們不談政治，甚至厭惡政治；但是這個「非政治」的態度，卻代表着一個反對中共的最可怕的政治力量，因為「個人的享樂主義」，「自由資本主義」，都可以在這個態度上找到最肥沃的土壤。

毛澤東與中共的其他領袖們不可能不看到這個現象，也不可能不覺察到現象後面隱藏着的危險。

8月10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前接見北京「革命群眾」時所說的那句話：「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這真是言簡意賅地透露了真相。

那麼怎麼辦呢？怎樣才能讓青年們關心國家大事呢？

他們從兩個方面着手：一、將毛澤東的偶像崇拜變成宗教；「毛澤東思想」變成教義，軟硬兼施地要讓這些青年人變成這個宗教的瘋狂信徒^[2]；二、給這些血氣方剛的青年人以一個欽賜造反的機會，讓他們的怨望、苦悶，有所發泄；讓他們的趨附與努力有所引導；讓他們的消極和淡漠能代之以積極活動和意氣風發。

毛澤東採取這兩種辦法，除了要「爭取下一代」之外，當然還另有目的的。他想以年青一代的「革命彩排」來掃除他下屬機關中的「牛鬼蛇神」。這就是指那些程度不同的反對者，不滿者以及腐化蛻變者。

毛澤東的這兩個目的能否達到呢？

我想，他的第一個目的是不能達到的。最多，只能在一個短暫時期內，將一小部分青年變成毛教主義的狂熱使徒吧了。等到熱鬧過去，幻想破滅，我們上面描述過的目前中國青年人那種思想情況與精神狀態，不但將立即回復，可能還要向更壞的方向發展。

事情很清楚，要想青年人意氣風發，要想他們自動而真誠地「關心國家大事」，絕非瘋狂而可笑地加強領袖神化所能辦到，也絕非實行領袖思想的教義化以及國民生活的全盤極權化所能達到。真正的道路應該是恰恰相反的。

他的另一個目的，想用青年聲勢浩大的「造反」來打倒「當權派」，想用青年學生的新鮮血液來給腐化的官僚消毒治病，是否可以達到呢？這是得分開來講的。

首先，如果問題真像中共的官方公報所說，文化革命是為的要打倒「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麼照目前中共最高層的內部勢力關係看，凡是以毛澤東為首的一派，要打倒敵對的一派，根本不需要「依靠群眾力量」，一次政治局會議，就可以解決了。而事實上今天也已經做了。林彪陶鑄一系不是已經不聲不響的代替了劉少奇彭真一系了嗎？如今「一小撮」既已打倒，而真正的當權派卻仍舊要再接再厲，繼續「造反」，可見成問題的，即對毛澤東的內外政策表示不滿態度的，決計不止「一小撮人」。他們不可能有成形的組織，也不會有明確的共同立場，但他們為數一定不小，影響一定相當大。正是針對着這批似無實有的反對派，毛林等才需要發動革命，而且還要推進「革命」。

那麼「文化大革命」是否能將這些人打倒或爭取過來呢？不可能。因為意見和思想上的反對者，特別是那些普遍存在的自發的反對者，只當你在行為上做到能令他們心悅誠服之時，他們才會停止反對的。群眾性的鎮壓能使他們懾服，能使他們沉默，卻不會從他們的心裏除去不滿和異見。

至於以群眾「造反」來醫治黨和國家機構的普遍腐化現象，情形是相當不同的。在相當程度與短暫時間內，我看它可以收到若干效果。

不過我們真正馬克思主義者當然知道，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在「一國共產主義」的總路線下，要想在長時間維持一個健全的工人政權根本不可能。要想這個政權因不斷的注射血清和不斷地施行大小手術而根本免於官僚主義的墮落，也是不可能的。

利用各種群眾運動來監督清洗黨和政府的官僚機關，不管它本身是多麼地重要，但畢竟不是真正有效的辦法。要徹底消滅貪污腐化，要根本剷除「修正主義」，要真正防止資本主義的復辟，唯一辦法是在

深廣二度上推進革命；而更重要的是要在實質上而非口頭上拋棄一國共產主義，要對外實行真正的國際主義，要對內實行真正的無產階級民主制，要使社會生活的任何方面都確實比資本主義國家中的遠較進步與合理，以此去影響資本主義國家中，特別是高度發展的帝國主義國家中的工人階級，使他們傾向共產主義，使他們在條件成熟時起來革命，推翻資本主義，成立社會主義國家，以便回過來幫助那些早已獲得勝利，但因經濟落後之故而陷於重重困難的「老社會主義國家」，使它們終於能完全擺脫官僚主義的危機，能健全地發展成世界社會主義體系中，乃至世界共產主義體系中的一個構成部分。

今天，中共「旨在防止修正主義」，旨在「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所用的一切方法恰恰是背道而馳的；瘋狂的個人崇拜；野蠻的思想統制，以及對於民主權利和人身保障的極端蔑視，這在實際上是替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敵人服了最最出色的務。它比資本帝國主義的任何宣傳與欺騙更有力量，將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工人階級和一切勞苦大眾推回到資本主義去。

因此，這些辦法縱能於一時間對中共目前黨、政、軍、文教等機關的中下級幹部稍稍起點消毒作用，可是從略為長遠的眼光看，他們卻正是在助長這些病毒的。

親愛的朋友們，我的信已寫得太長了，可是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文化方面，關於這個「革命」所提出的反動的與荒謬的文化觀點，這裏卻完全不曾談到。只好等有機會時再談了。

不過在最後，我得說說我們對「紅衛兵造反」運動應該採取的態度。照我個人的看法，我們影響之下的年青人應該參加進去造反，目的在於把假造反變作真造反。我們要把被反對的對象加以分別；對

那些懷有正確批評意見的反毛派應予以批判的贊助；對那些真正墮落與腐化的官僚派應予以打擊；而最主要的，我們應該將造反的主要矛頭，設法轉向着毛澤東的教主化，毛澤東思想的國教化，以及黨政文教機構的瘋狂極權化。這樣，如果運動繼續深入，如果它能脫離毛澤東們對它的絕對控制，我們也許能將它推上我們心目中的政治革命，我們以為可以使一個壞的工人國家走上健康道路的。

敬禮

1966年10月

注釋

1. 據中共自己的文件透露，這些四清工作小組曾經犯了「左的偏差」，即他們鬥官僚鬥到中共所能容許的限度之外了，因之在1964年中共制定了那個所謂「二十三條」，藉以「保證四清運動在正確的軌道上前進，避免走上邪路。」這個「二十三條」，目前雖然常見提及，但迄今未曾正式印行公佈。當初頒行時，只以「告示」形式貼在牆上，讓人閱覽，卻禁人抄錄。顯然，其中有許多「家醜」（主要是有關幹部貪污與墮落的實況）是不足為外人道的。毋須指明：這個「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四清）乃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工作組」是「紅衛兵」的雛形；「二十三條」則是「十六條」的初版。
2. 毋需說，這僅僅是神化毛澤東的理由之一，並非全部理由。

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一、中共黨內鬥爭的力量關係

中共內部在「文化大革命」前後所存在以及所形成的諸般力量間的相互關係，照毛澤東們自己說是這樣的：

- (1) 最高領導層中有「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是「極端反動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分子」；
- (2) 在幹部中，有四種人物：
 - 一、「好的。」
 - 二、「比較好的。」
 - 三、「有嚴重錯誤，但還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
 - 四、「少量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

這四類幹部派系分化的實際力量對比是否如此，我們自然不能用什麼「實況調查」或統計材料來加以證實或否定。不過，從這幾個月來「文化大革命」的真實過程看，我們卻有充分理由斷定：毛系這一個說法是不符真相的。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規模與聲勢，和它規定的目標之間就是大不相稱的：僅僅為了「打擊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竟得叫全中國數千萬大中小學生一律停課整年，竟得耗費無法估計的國帑，去運載、供養這些小將們串連全國；竟得將全中國的文藝乃至黨政機關攪得停頓紛亂，翻天覆地；竟不惜將中共內部完整統一的神話拆穿；竟不顧一方面美帝，另一方面蘇修的惡意稱快，大肆反華宣傳，竟……這是無法令人相信的。如果事實真如中共毛系所說，他們付出了如許代價而僅僅為了這麼小的一個目標，那麼，毛澤東這回不是在用牛刀殺雞，而簡直是在以原子彈轟炸舢舨船了。天下決無此理，因而也決無此事。

毛澤東們必須發動如此規模的「大革命」運動來打擊「當權派」，這個事實本身就說明了那個被打擊的對象決不是小的，決不是一小撮，而是大的，甚至是很大的，一大夥。

這個「一大夥」在中共的全部當權派中究竟佔有多大比重，在中共中央委員會中它佔多數還是少數，我們無法斷定。不過從種種跡象看，他們在實際上可能還是多數（毛派文件也時時透露他們自己居於少數），他們在八屆第十一次中全會上所以會屈居少數，多半是由於毛澤東們施加種種（政治的與非政治的）壓力才造成的。

幹部中，被毛派稱為「好的」與「比較好的」，其意即為從來絕對服從毛氏一切言行的人，據說是「大多數」，這是一定不足信的。因為我們知道，共產黨內部的人事安排調度，不論中外，從來都操於總書記之手。誰當總書記，誰的系統便佔據了黨組織中大多數的要職。當年史大林如此，後來的赫魯曉夫亦是如此。而所謂「黨主席」或擁有其他更高榮銜者，則雖功高位尊，名大信孚，可是在和廣大幹部的

聯繫上，卻總不及總書記的近便。就連列寧吧，特別是中風以後的列寧，都曾深深感到總書記史大林的掣肘與違拗；今天毛澤東也多少會有同感的。中共今天的反對黨既是劉少奇與鄧小平的聯盟，那麼，這兩個前後相繼，長期來握住了總書記大權的人，當然已將大多數與自己有密切關係的幹部位置於重要黨部中了。

中共內部以劉少奇、彭真、鄧小平等為首的反對派，是人數眾多（遠遠多過毛派）與影響頗大的一群；他們雖不能說有成形的組織（更確切些說，除了現成的黨團之外，他們沒有特殊組織），卻具有嚴密與深長的系統；這個系統主要與首先不是因思想的同一而形成，卻是因長期的工作關係與人事的緊密聯繫而結成的，他們基本上都是毛澤東思想者，他們對於「主席」的不滿，只是因為十年來毛澤東所倡議的內外政策給帶來了失敗的後果；只因這些痛苦的經驗給他們打開了眼睛，讓他們知道了毛澤東不是永不錯誤的神，而是也會犯錯誤的人，甚至是因為老而且病之故，常能陷於狂妄想法的，所以他們希望他能安於尊榮，少理黨國大事，逐漸成為名義上的領袖。

在中共的最高層與較高層的幹部中，作如上想法的人，我們相信佔頗大多數。

至於中下層遠較廣大的幹部中，由於他們沒有直接接觸毛氏的機會，沒有直接認識領袖的可能，他們自不會有上述想法，但是「三面紅旗」的痛苦經驗他們都是受到了的，而且比高級幹部們感受得更深更切。因此，毛澤東思想的「英明領導」，也必然在這些中間大大降低了信心。從來，在這些幹部的心目中，毛與黨中央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東西。在「三旗」之前，人們是無法叫這些幹部將毛與黨分開，更談不上二者的對立；可是「三旗」之後，如果代表黨中央的人出來

訴說毛的錯誤，他們就可能聽得進去，有可能站在黨的立場來反對主席。這是很大的一個區別，是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新現象，中共中下級幹部裏有了這個新現象，那也就是說，毛澤東的反對派即使不曾擁有固定的巨大群眾，卻總已有了潛在可能的龐大基礎。

此外，還有黨內那些真正「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投機、蛻變的官僚腐化分子。這些人的數量也許是更多的。他們自然不是毛澤東的反對派，也根本不會因原則或政策而成為反對派，不過為了他們的大小不等的「烏紗帽」，卻準備反對任何企圖反對他們的人，並且隨時準備擁護任何保護他們的人。這些人，如果毛澤東今天的「革命」矛頭對準了他們，他們將會堅決地站在「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一邊，相反，如果毛系願意暫時利用他們來「揭發」和「打擊」當權派，他們是更願意為「萬歲」效勞的。

以上，我相信是目前中共黨內反對派的較近真實的情形。

二、毛劉之間

關於中共最高層內各個領袖之間的分化離合，現在我們雖然看到了較多資料，卻仍舊難於作明確的敘述。有關這方面的真相，必須要在事後好多年，才能讓史家作出接近真實的記載來。我們不能這樣做，也毋需這樣做。我只想談談下面兩個問題：一、毛澤東與劉少奇的關係如何？二、林彪為什麼會代替劉少奇成為毛澤東的「親密的戰友」？

在許多方面，毛劉二人代表着不同典型。如果毛偏向於革命的「浪漫主義」，那麼劉偏向於革命的「現實主義」。毛的身上兼具有中國農民和中國舊讀書人的氣息，劉卻是接近工人的新式知識分子的代表；

毛的學養主要是中國的，而劉的中國舊學底子甚淺；毛是打下了部分天下之後才進修馬列主義的，劉卻在投身革命之前便已在國外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教育；毛雄才偉略，英雄主義十足，帝王思想深入靈魂，劉則謹小慎微，平民氣息較濃，民主精神略佔上風；毛敢作敢為，勇於創新，強調主觀能動性；劉冷靜審慎，循規蹈矩，常常考慮客觀條件；毛急於事功，為目的不擇手段，「教條」對他不起作用，劉卻穩步前進，目的與策略之間常帶關聯，原則對他有多少拘束力量；毛一生的工作在學生、農民與兵士之間，幾耗畢生精力於武力的培植；劉的工作重心則偏於工運和黨務，盡注其心血於機關的策劃和佈置……總之，這兩個人，無論在長處或短處方面，都不屬於同一類型，而是相反的。

然則在過去他們二人又怎能相輔相成，「合作無間」呢？

撇開別的不談，最最主要，我想是因為劉少奇曾經幫助毛澤東打敗了他的長期對手王明，曾經在理論上替毛澤東概括出「毛澤東思想」，並且使這個思想成為一尊，在 1945 年召開的中共第七次大會上正式寫進黨綱，使之成為中共唯一的與公認的指導路線。

主要是這個功勞，使劉少奇二十餘年來一直成為毛澤東的「最親密的戰友」，並且曾公然宣佈為毛氏的繼承人的。

劉少奇捧出「毛澤東思想」，因而使毛氏的思想成為「一尊」，使毛氏本人確立為最高的唯一領袖，是否出乎策略，即是否違背了本心，只為要取得毛氏的信任而這樣幹的呢？換句話說，是否劉少奇從來「反對毛澤東」，他之所以高捧這個思想，只是為的「打着紅旗反紅旗」？

我們認為不是。

多年來，有不少自以為是「中國通」的人，總愛說劉少奇是所謂「國際派」的領袖，是從來反毛的。最近看到了公開出來的毛劉之爭，他們便更以為是，以為他們從來的所信得到證實了。

其實這是違反事實的。

中共內部的所謂「國際派」，歷來是指那些在莫斯科受過教育，回國後不從實際工作中鍛煉，憑「留學生」資格竊據高位，並挾共產國際以自重者，他們一切聽命於莫斯科，自己無獨立主張，甚至一切依賴莫斯科，並不想自力圖強。此派人中自以王明為傑出代表，而劉少奇不與也。無論在王明以前，或王明以後，他都不曾扮演過這角色，因此他根本不是什麼「國際派」。劉氏從事共產主義活動數十年，前期搞工運，後期幹黨務，在工作態度上既以比較切實見稱，在黨內關係上亦從不聞有假外力以自植派系之事。故若中共黨內確實有了劉少奇派的話，那麼首先是在實際工作中形成，決不是依「國際路線」走出來的。

不過，如果我們將毛劉二人對照起來看，在一個確定的意義上，也未始不可以稱劉少奇為「國際派」的。正如我們前面所說，劉少奇與毛澤東相比，是偏向於革命現實主義的，是接近工人的新式知識分子的代表，是早年就在外國受過系統的馬列主義教育的，他當然更了解世界大勢，尤其是更了解國際工人運動與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及其現狀，更着重共產主義運動的國際性與國際關係。一句話，劉少奇比毛澤東具有較多的國際知識，具有較大的國際眼光，因此，在毛澤東的民族見地與「民族主義」的陪襯下，劉少奇確乎是國際主義的，確乎是國際派。

但是在過去，毛的「民族主義」與劉的「國際主義」非但沒有衝突，而且相得益彰；相輔相成。

原因：劉之所長恰恰可以補毛之所短。不論在一般的黨政工作中，或者在特殊的反「國際派」鬥爭中，毛之成功和勝利都和劉少奇的支持分不開。

沒有毛的「民族主義」，劉的「國際主義」不容易在中國落後的土壤上生根；可是沒有劉的「國際主義」，毛的「詩云、子曰」畢竟也無法去和王明們的「希臘、羅馬」鬥爭，並鬥爭而勝之。我們這樣說，雖然流於籠統抽象，但本質上和大體上卻不曾錯。

然則，毛劉這兩個相輔相成的對立者，到了什麼時候，為了什麼緣故，其矛盾的相斥性超過了相成性，以致成為中共內部鬥爭的二派首領呢？

根據種種跡象，我們可以推斷，毛劉矛盾開始的時間多半是在1957年以後^[1]而矛盾的原因，主要是以「三面紅旗」為主的對內政策以及因「反修」鬥爭而引起的對外政策。

在「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上，我們上舉的毛澤東性格上與思想上的種種特點，可以說發揮到了極致。其中有農民們天真的平等主義。有中國舊式士大夫的狂妄理想，有從孔夫子直到孫中山的「天下為公」的大同主義，又有從史大林那裏學來的卻由毛氏更加發展了的「一國共產主義」；同時這些政策的實施與推進，又在顯出了毛澤東的「磅礴氣概」，顯出了他的敢作敢為，顯出了他的勇於創新，以及在「打破一切框框」的口號之下，他之完全能否定馬恩列的科學「教條」，甚至也不看重史大林在這方面的失敗經驗。

當毛氏將自己的長處和短處如此淋漓盡致地發揮之時，在性格和思想上處處與之對立的劉少奇會無條件的擁護，一點都不表示反對嗎？不可能。

由於中共勝利以來毛所享有的巨大威望，劉可能在最初一個時期擁護這些政策的；但當這些政策在很短期內暴露出可怕的錯誤後果，以致連彭德懷等人都心知不妙，不得不出來反對之時，那個頭腦比較冷靜，思想比較清楚，理論較有根底的劉少奇，自然要表示異議了。

如何表示？如何為自己的不同看法鬥爭，它是否像最近在北京紅衛兵的大字報上所透露那樣，劉少奇在同志們的推動與簇擁之下，竟在1958年的中共六中全會上將毛迫下了人民政府主席之位？是否從此以後他和鄧小平等竟自作主張，對毛氏敬而遠之，一貫地管自己進行「資產階級與修正主義的路線」呢？我們不想加以推測和猜度。我們想要肯定，而且也可以肯定的是這個事實：為了以三面紅旗為代表的中共所採取的有關「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內政策，乃是毛劉由親密合作轉變為敵對衝突的主要原因。

毛劉因國內政策上的不同立場而發生異見，後來又因國外政策，特別是因對蘇政策的不同看法而加深異見。在這方面，毛劉二派究竟有什麼不同，今天我們所知道的，比他們在國內政策上的歧見更少。原則上，我相信毛劉是同樣堅決反對「蘇修」的，二人不同，多半是限於策略方面。毛澤東本來是非常高明的策略家，他最懂得為了自身利益，如何靈活而巧妙地，有時甚至不惜犧牲原則來遷就策略，藉以獲取一時之利。然則在這些年來的「反修」鬥爭中，他怎麼會扮演最死硬的「教條主義者」的角色，以致中國和中共，日益陷於孤立無助之境，日益失去全世界人士（包括國際無產階級革命派在內）的同情呢？主

要因為毛澤東個人命運與中蘇共的衝突結合得太密切了，任何重大讓步，即使是策略上的，都會影響到毛的威望，甚至影響到他的地位。自從「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派」出現以後，這使他更加警惕了，警惕到了過敏的程度，他要防止發生「沒有毛澤東的毛澤東派」。為此，他必須爭取全勝，甚至在細小策略上都不許退步，不許軟弱。

可是這個態度，對於整個中共，對於中國，乃至對於目前的國際反帝運動與革命運動，顯然都是有害的，至少是不智的。中共最大的敵人是美帝國主義，而中國要成功地與勝利地反對這個大敵，自非與蘇聯妥協不可。但毛澤東今天非但不此之圖，反而在相當程度內，在主動地促成美蘇合作。毛澤東一向譏笑王明派的戰略，說他要用「兩個拳頭打人」，可是今天，他自己卻猶有過之，簡直是以雙足雙手，同時要打倒所有敵人。外交部長陳毅的名言，邀請美蘇同時來打，愈早愈好云云，把毛氏的策略觀非常可笑地表示出來了。這種態度，別說是中共黨內那些有經驗的政治家和策略家們，就是普通工人，也都會覺得不切實際的。

劉少奇等當然會表示不同意見。

不過使毛劉二系的矛盾公然爆發的對外政策中，我認為最主要與最直接的原因有二：（1）對越援助的聯合行動問題；（2）印尼共產黨的政變及其慘敗問題。所謂聯合行動，無論在工人運動一般革命派的傳統中，或者在共產主義運動的傳統中，都是通行的。為了反對階級敵人的一個特殊的鬥爭需要，各派革命工人與政黨，可以而且應該不計及某些較大的原則問題上的不同，聯合起來一致行動。這種行動，完全可以、也完全應該運用於目前的援越問題上，可是中共卻對此提議採取了消極否定態度；這態度不但使「真聯美，假援越」的蘇共振

振有詞，而且使許多一向同情中共的日共與北朝鮮共黨，都逐漸離開了中共。中共採取這個態度自然是出於毛澤東的堅持，劉、鄧、彭真等一定對此極表不滿。真相如何我們雖無文件可稽，但光看這樣的事實：日共宮本顯治等於1966年初來華訪問，與彭真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們會談之後，彭真不再露面，而日共遂即開始轉向，這其間是透露了一點消息的。

印尼共的政變與中共的政策有多少關係，無法說，中共領導層中對於印尼共黨的方針有否發生過分歧，我們也無法推測，不過印尼共的政變企圖多少受着中共武裝革命路線的影響是顯然的；她的悲慘失敗促成了中國內部的權力鬥爭也是顯然的。印尼共的流產政變發生於1965年9月底，中共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個信號「海瑞批評」發射於11月，這個時間上的吻合，當非偶然。

印尼共的慘敗代表着中共在亞、非、拉美地區外交戰中一連串挫折的頂峰。達到這個頂峰，那末一向對於毛氏的對外政策懷有異見的人，很自然會借此時機，對「黨」，對毛發動猖狂進攻了。

三、為什麼林代替了劉少奇？

為什麼毛要將林彪代替劉少奇？這個問題，我以為比較簡單。

首先因為，軍隊比之於黨、團、工會等等組織，在人事系統上，一向就更直接地受着毛的控制。（所以會這樣，第一在於毛之重視槍桿子，他自來就特別注意軍隊幹部的選擇；第二，由於軍隊中的龐大群眾乃至低級幹部的定期更新，它是更易為最高領袖的威望所左右，較難為部隊首長的人事關係所束縛的。）

其次因為，「職業軍人」的林彪，對毛的無條件服從，一定遠遠超過了「自作主張」的劉少奇。自從他代替彭德懷擔任國防部長之後，他在解放軍內有系統地進行着（嚴格說是執行着）神化毛澤東以及將毛澤東思想宗教化的整套辦法，是很得了「偉大領袖」之心的。

一方面為的要依賴軍隊來整肅黨、團、工會等等組織，另一方面為的要酬答嘉獎林彪全力神化領袖之功，毛澤東遂決定拿他來代替劉少奇，作為「最親密的戰友」。

如果當年劉少奇坐上第二把交椅是因為他「聖化了毛澤東」，因為他奠定了毛澤東思想的一尊，那麼今天林彪之所以能取而代之，乃因他「神化了毛澤東」，因為他將毛澤東思想更高地捧成絕對的教條。

在兩個不同階段上的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需要有不同的人來抬舉，需要有不同的人來做祭司。

將毛思定為一尊，縱然荒唐，卻仍屬於理論和思想範圍的事，這工作需要理論家，或至少需要理論家型的政治家。

將毛思捧成為教條（甚至捧成為符咒），這已屬於感情方面和信仰方面的事，這工作需要狂熱的教徒或能裝成狂熱的陰謀家。

劉林交替，若從對毛的關係看，從毛澤東思想的發展看，主要應作如是觀。

至若從今天中共內部的權力鬥爭的實際過程看，林彪究竟怎樣成為毛澤東的大使徒，成為毛教的大祭司，這問題我們就難於推測了。因為這中間必須牽涉到無數人事關係。這種關係，不必說我們這些局外人，就是中共的內部人士，甚至它的最高階層中人，一時也未必弄

得清楚。因此我們無須去猜測，也不必去猜測。這種猜測乃是野史軼事的分內事，與嚴肅的、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分析根本無關。

我們可以談談的，只是如下幾個問題：

毛林合作，到底誰居主動地位？許多人，特別在林彪上升消息初被證實之時，都以為毛因病廢或老邁之故，實際上已成了林的傀儡。他們斷言林是「挾天子以令諸侯」，利用毛的威望，以軍隊為手段，藉以打擊劉少奇一系，篡奪黨政大權。這種推測，已被事實證明為不確。從一切跡象看，毛今天還是手握大權的。在「毛林公司」中，他顯然處於主動的與決定性的地位。

當然，這毫不排斥林在這個合作中所曾起的，乃至正在起着的主動的與重大的作用。要使自己的名次從第九（根據中共八大選舉中委的票數）躍居為第二，要使自己為「偉大領袖」特別垂青，寄以重望，決心排除種種困難，使之代替那業已當了許多年「繼承人」的劉少奇，不必說，林彪一定在趨奉、迎合方面做盡了一切工作，甚至做盡了一切詭計（包括走皇后內線在內），才能達到這個目的，復能獲得「最親密戰友」這個稱號。

另一個問題是：林彪突起，解放軍凌駕乎共黨之上，是否意味着中國式拿破崙專政的可能？這，我想至少在目前還看不出。在利用各種矛盾的力量，使它們相互衝突，相互箝制，相互平衡，以便穩保自己的統治地位。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從來是拿破崙——拿破崙第三——主義者。毛澤東是運用策略的高手。當他利用某一力量來對付另一力量時，這時他根本不看重原則。以黨治軍原是共產黨的原則，但由於實際鬥爭的需要，必須用槍桿子來敲破黨官們的腦殼時，毛並不受「教條」束縛；可是你若因此而以為今後毛將以軍代黨，那就錯

了；到了某種時候，當實際鬥爭的需要，當他腳下的諸般矛盾的衝突需要以黨制軍時，他便會高舉那條今天被他踩在腳下的原則，要用黨來肅軍了。（除非毛因病死而來不及如此做，或因國內和黨內諸力量關係發生根本變化，使他不能如此做。）

人們所以會強調軍事獨裁的可能，最最主要的原因，在於他們將傳統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政黨與軍隊的關係，來看中共和解放軍的關係。其實這是大錯的。中共和解放軍的關係，非但不能同資本主義國家的政軍關係比，甚至不能完全同蘇聯共黨和紅軍的關係比。紅軍是蘇維埃政權的產物。而中共政權卻是解放軍的產物。自從1927年以後，一般說來，中共和它的軍隊是分不開的，黨固然是軍隊的政治指導，是軍的靈魂，但在同時，軍卻常常是黨的組織者，宣傳者與推廣者。

因此，中共的黨和軍並非截然劃分，它們的關係並非對立的。

因此，我們不能因林彪的崛起而就此認為他將變成中國的拿破崙——拿破崙第一；我們也不能因為毛氏今天用軍隊來解放黨部，而便認為中國今後必將有一個軍事專政的時期。

還有一個問題：從「聖化」變為「神化」，從「一尊的思想」一變而成「獨斷的教義」，再變而為驅除「牛鬼蛇神」的「符咒」，到底表示了什麼？

毋需深究，這顯然是表示了毛澤東近七八年來無論在國內國外，無論在中共內部與民眾中間聲望的低落，它表示出人們對於毛澤東「英明領導」的失去信仰，它表示出中共內部反對毛澤東政策的種種意見的抬頭，它表示出因毛澤東錯誤領導所造成的中共內部鬥爭的激化，它表示出因此一錯誤領導所釀成的悲慘後果的嚴重——它們一方面加

深了工農群眾與迅速墮落的統治黨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面加深了中國社會中現有諸階級之間的矛盾。

總之，這絲毫不表示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威望的提高，而是恰恰相反：求神拜佛，符咒禳災，總只能是病況沉重的標誌。

四、紅衛兵與年青一代

病況沉重的另一個無誤的標誌是藥石亂投，而紅衛兵則是毛澤東亂投亂抓的藥石之一。

「紅衛兵」問題，乃是這次「文化大革命」中出現的種種迷人現象中的最迷人者。顯然，在中共現有的諸領袖中，毛仍然是最有力的。他對於黨、政、軍、警（公開的與秘密的）的控制力量，即使不比三十年代的史大林大些（我仍舊相信他大些），總不會比他小些。那麼當年史大林可以運用秘密警察這個武器來肅清他黨內與軍政機關中的一切敵對者，為什麼威望較高，力量較大，地位更穩的毛澤東反而不能以簡單的組織手段，行政命令，或秘密警察來對付劉鄧一系以及他們下面的黨羽呢？為什麼他必須發動廣大青年群眾，欽命他們造反，以致將全國的一切生活搞得大亂呢？

正是這樣的問題，使一切所謂中國通或中共通迷惑不解，因而稱紅衛兵運動為「文化革命」的謎中之謎。人們因為解不開這個謎，因而有人說毛澤東病了，患了腦筋軟化症，失去了判斷能力；有的人說他死了，天安門上站的是替身，其實一切荒唐主意都是江青和林彪出的；有的人則說他瘋了，患了癲癲症，對一切人猜疑，除了皇后、嬖幸和最親信的御林軍頭子。

其實，這些「聰敏人」的假設都是錯的。紅衛兵這種辦法不管怎樣離奇，卻還是可以解釋，而且是符合了毛澤東思想的。

我們曾經指出：紅衛兵運動所以成為可能，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客觀基礎，那就是目前中共治下年青一代的精神生活。這個生活是「苦悶、絕望、現實而空虛」的，它是中共官僚統治的當然結果，也是對於這個統治，特別是對於其荒謬的青年政策，所表現的那一種極度不滿的消極抗議。

毛澤東本人就是從學生運動起的家，他最了解青年情緒與青年特性，他又是策略高手，擅長無原則地利用各種力量之間的矛盾，故當他發現手下的黨政組織大半為他的對手所控制時，他便毫不猶豫地利用年青人，利用他們那種深刻的但是消極的不滿。發動他們，支持他們，使他們的消極不滿變為積極行動，矛頭指向他的對手，指向「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這樣一幹，在毛澤東的打算中，真是一石數鳥的，第一，原該首當青年人怒氣之衝的他，在青年人的眼光中，不但洗清了污點，脫盡了責任，而且成為反官僚、反貪污、反資本主義腐化的「偉大舵手」；第二，全面地打擊了劉鄧當權派，並進而徹底消滅一切反對派，藉以建立毛澤東個人與毛澤東思想的絕對統治；第三，以群眾運動方式，一邊「革命」，一邊「教育」，可以訓練成一大批絕對忠實於毛澤東思想的新幹部，代替那些不聽話的或腐敗的老幹部，同時可以預防下一代走上「修正主義」道路的危險。

懷着這樣的打算，毛澤東出來鼓動青年，真是無所不用其極，他什麼手段都要出來了，而其中最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宣佈「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那個行之已久的口號為「反動的血統論」；他宣佈這個歷來扼殺青年的所謂「階級路線」是「徹頭徹尾的歷史的

唯心主義」。(見〈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人民日報》1967年元旦社論。)

我們曾經把中國目前的青年分成三類：一類是工農子弟，人數最多；另一類是「不好家庭」出身的子弟，人數居次；第三類是「英雄、好漢」的兒女，人數最少。這些人中，怨氣最大的自是第二類人。他們最不滿意現狀，他們最願意亂。因為天下一亂，他們不但無所損失，卻還可能有所獲得的。過去他們苦悶絕望，只因為他們看見共產黨的絕對控制，看不見任何變亂之象。可是如今好了，毛主席出來主張公道了，出來替他們「平反」冤屈了，並且告訴他們說，這個冤屈是黨政機關裏的當權派造成的，所以號召他們起來「造反」，號召他們「奪權」，號召他們去打倒這「一小撮人」——這是多麼響亮的一個春雷，多麼巨大的一個推動；無怪乎青年人都瘋狂起來了，帶着「沖天的幹勁」出場了，他們要「誓死保衛毛主席」，要「誓死打倒那些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

當然，有資格入學讀書而又有資格當紅衛兵者，很少係屬於我們上面所說的「第二類」人，但是學生中，甚至紅衛兵之中，佔據大多數的畢竟不是屬於「英雄好漢們」的子女（他們還受了「中央文革」的歧視，被明令「勸告」不可當紅衛兵組織的領導者的），而是第一類，即工農及一般城市居民的孩子們，他們是不滿意現狀的，是反官僚的，他們的怨氣一半由於自己的感受，另一半則表達了他們父母的不滿。因此，他們也是能夠受毛澤東「反當權派」的蠱惑性的煽動的。

毛澤東的「紅衛兵」，使很多人想起了希特勒的「衝鋒隊」。這二者之間自然有許多根本性質的不同點，如果看不見這些根本不同，貿貿然在二者之間劃等號，那是荒唐的；不過有一點相同卻是事實，那

就是：「當權派」中的最當權的一部分，利用廣大年青群眾對於統治階級及其統治制度的深刻不滿，使用了一切「革命的」與好聽的口號，發動他們，組織他們，藉以打擊統治階級中的異己分子以及真正的革命分子。

希特勒利用青年人對於腐朽的資本主義的不滿，號召他們起來革命，藉以保存資本主義；同樣道理，毛澤東利用青年人對於共黨官僚統治的不滿，號召他們起來革命，藉以保存這個官僚統治。

「希特勒的革命」與毛澤東的「革命」，就階級性質說，當然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但是就他們利用青年群眾的理由與情形說，都是相同的。它們表示了統治階級或統治階層和人民之間，特別是和青年群眾之間，那種極其深刻的矛盾，也完全是相同的。

在最「正常的」資本主義國家裏，統治制度內發生了危機，那就通過議會鬥爭來解決。可是一到資本主義發展到「不正常」的階段，一到這個國家裏發生了「不正常」的危機的時候，議會鬥爭這個民主道路就行不通，於是就來了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以及諸如此類的「革命」辦法，以此來解決危機，以此來保存和延續資本制度。同樣，在共產黨和共產黨統治的國家中，在正常健全的條件下，一切問題（包括或大或小的矛盾在內）都應該循民主集中制的辦法來解決。黨內如此，政府（蘇維埃）之內亦是如此。列寧時代的蘇聯黨政機關中，不斷的發生矛盾和危機，也不斷地用這種方法來克服，來解決了的。可是等到黨和國家的情形愈來愈不正常了，也就是說，愈來愈墮落了，這時，那個傳統的解決矛盾方法便不再適用，卻產生了其他的非常的「緊急手段」，所謂緊急手段，截至目前為止，歷史主要地讓我們看到了兩種：一種是史大林的，他應用了秘密警察，應用了司法羅織，實

行了大規模的屠殺與謀殺；另一種是毛澤東的，便是以發動群眾運動為主，而以史大林的那一套為輔。前一種是少數人的陰謀，後一種是大多數人的「陽謀」。

史、毛兩人採取了不同的解決危機的手段，自然多少與二人的性格有關，不過更重要的，總在於他們二人不同的地位。毛在這件事上之所以不完全師事史大林^[2]，應該用他對自己的權力與威望有了充分自信（甚至是過分自信）來解釋的。毛相信，憑他擁有的權力和威望，要把他的敵對者（他們霸據着大多數黨、團、政以及其他機構的地位），用「組織手段」或其他的陰謀手段來排除，雖然也能辦到，但他覺得這樣幹不徹底，不充分，沒有「教育意義」，因此他要發動千千萬萬的群眾，要實行「大民主」，要進行「批、鬥、改」，以便一方面除去那些為他所不喜的敵對者，另一方面培養出一大批注射了「修正主義」免疫針的新幹部。他相信，這樣幹雖然會激起很大的反抗，會搞得天下大亂，但他仍以為事情能在他劃定的路線內進行，不會走到他所希望的反面去。

五、三個可能前途

事情的發展是否真如毛澤東所願呢？

先讓我們指出「文化大革命」的三個客觀上可能前途：

一、由武鬥引起內戰，大至造成長期內戰的局面；

二、「文化大革命」取得預期的勝利，在短期內（假定一兩年）完成任務；

三、由假造反變成真造反，革命群眾把所有的「皇帝」，特別是毛澤東這個大皇帝拉下了馬，於是讓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在無產階級民主的道路上大踏步地邁進。

先看第一個前途：

「文化大革命」由文鬥變為武鬥，已經是普遍的現象；這「武鬥」是否會變成小規模的內戰，甚至變成大規模的乃至長期性的內戰呢？這可能，照目前情形看，還是不大。劉鄧派（假定他們有決心進行武裝對抗的話）當然也可能在解放軍中找到忠於他們的若干隊伍，但若這個隊伍不是駐紮在與蘇聯為鄰的邊界省份，又若它得不到「蘇修」的或明或暗的支援，在現在條件下，要想認真與毛林為首的軍事力量為敵，要想長期抵抗，或甚至想在內戰中取勝，那是難於想像的。

因此，只要毛澤東不突然死亡（73歲的老人，死亡不應該算是意外），只要中蘇不發生嚴重的軍事衝突，那麼內戰可能，特別是長期與大規模內戰的可能，總是微乎其微，或竟可以說沒有。

沒有這個可能，同時也就意味着與決定着：劉鄧派不可能在這次黨內鬥爭中進行有效反擊，更不可能在鬥爭中取得勝利。因為毛林派既然以武器當作與反對派「辯論」的唯一「論據」，那麼反對派拿不起武器來，或根本沒有決心去拿起武器，也就無從進行「辯論」，更無法「辯論」以勝之了。

然則，「文化大革命」是否只能有上述的第二個前途？即是說，毛澤東是否一定能如願地完成其任務呢？這，我看也不盡然。

劉鄧派不能以武器對抗武器，不能以武器的批評來反對毛林強加於他們身上的武器批評，誠然是他們的致命弱點，但是，如果他們是

一個有原則的反對派，如果他們真有與毛林派根本不同的政綱，如果他們真有為貫徹自己正確路線的決心，並且真能為此而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那麼，縱然一時沒有武力，他們的鬥爭也未必輸定了的。就算一時佔了下風，或暫時輸了，也終於會在或長或短的時期內贏回來。

真理常會依循最曲折的道路走向自己的勝利，歷史上，乃至在工人運動的歷史上，曾經讓我們見過不少先例。

因為，正如毛林派自己常說：軍隊並非存在於真空中。它一樣受着階級鬥爭的影響，一樣受着政治鬥爭的影響。軍隊接受影響，比之於其他群眾集團，可能遲些；要這個影響發生結果，見之行動，也一定比較的難些。但是遲些難些，絕不等於不可能。軍隊一旦接受了影響，一旦採取了行動，卻會比其他的群眾集中得多，強烈得多，而且能起決定作用。

因此，一時沒有武力，並不等於始終沒有武力。武器是可以轉手的。問題只在於你是否有贏取武力的正確的政治立場，在於你是否有以正確綱領去贏取武力的決心。

可惜的是：劉鄧派完全不是上述那樣的一個具有原則性的反對派，他們不是一個堅持真理，為真理而鬥爭的反對派。他們也沒有為實現自己政綱，不惜將鬥爭進行到內戰的決心，他們（至少那些高級領袖們）基本上始終是毛澤東主義者，他們不僅為了策略之故，口頭上一直叫喊着「毛主席萬歲」與「毛澤東思想萬歲」，而且出乎本心地，在實質上他們也是「忠於萬歲」的。如果他們對毛有所不滿，對他的主張表示了異議的話，那只是「忠良之諫」，決不是存心犯上，更不是謀王篡位。其次，由於反毛派根本不是原則性的反對派，如此他們不可能有系統的綱領，不可能有堂堂正正的旗幟，更不可能作戰鬥性的

號召。他們只能作毛派的一個消極影子而出現，這就決定了他們鬥爭和「反撲」的性質和力量，決定了他們鬥爭的被動性，消極性與軟弱性。事實上，截至目前為止，反毛派的鬥爭手段讓我們見到的，確乎只有如下三種：一、「天皇聖明，臣罪當誅」（多半是最上層的）；二、發動「經濟主義」，「慷國家之慨」，藉以爭取人心（中級的）；三、「躺倒不『幹』，聽憑處置（下級的）」。這都是不足以成事的。

劉鄧派既然是這樣性質的反對派，他們所採取的又既然是這樣子的鬥爭手段，那麼，要想它去抵禦毛派的攻勢已嫌不足，更談不上什麼打敗毛派了。

在這個意義上說，毛澤東是能夠擊敗他的反對者的，也可以說，他是能夠完成「文化革命任務」的。

但是在另一個意義上說，毛派卻不能完成任務，至少是不能如其所願地完成任務的。

從一年來「文化大革命」的實際過程看，「當權派」的「反撲」雖然成事不足，卻屬敗事有餘。它顯然已經大大打亂了毛派的如意算盤。同時原本以為收放由他，操縱隨意的群眾運動，也顯然因為毛澤東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控制力量，竟致弄得尾大不掉，難於收拾。紅衛兵運動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革命造反團體」，原是自上而下地掀起來的，現在卻憑着他們自己發展的邏輯，多少在自下而上地發揮其獨立作用，他們已不能完全被限制在發動者所劃定的界限之內了。為了應付這些意外發展，毛派時時弄得舉棋不定，進退失據。朝令往往夕改，友敵每常於頃刻之間易位；更糟的，毛派常在不經意間發現自己失去了主攻地位，完全陷於被動，結果就不得不食言背信，扯開一切

偽裝，動用赤裸裸的武力來鎮壓反對者，以致失卻了任何信用，喪失了任何威望。

在這樣的情勢下，有兩種危機釀成了，第一，工農生產大癱瘓，財貿交通大停頓。由此可能造成再一次的「自然大災害」。第二，真正的革命危機，它可以危及整個中共統治的。第一個危機主要由「當權派」的消極反抗所促成；第二個危機則由中共內爭引起的群眾運動所造成。

面臨這兩個危機的威脅，毛派多半會（而且現在已經在這樣做）不為己甚，儘量縮小打擊面，同意與更多的「當權派」妥協，藉使「文化大革命」草草收場。

這樣的結局自然不能算是反毛派的勝利，但總也不能說是毛派「勝利地完成了任務」。

把上面所說的歸結起來，我們可以這樣說：如果問題只限於毛派和反毛派之間，又如果那個被召喚來參加鬥爭的群眾運動，在基本方向上始終沒有脫出「毛澤東思想」的框框，那麼在目前的種種條件下，毛派多半可以在奪權鬥爭中獲勝，多半不會被他們所欲清算者所清算；不過這個「勝利」不會如他們所預料者那樣的「乾淨徹底」，不會不是「腐敗」而妥協的。

但若問題不只限於毛派與反毛派之間，即是說，如果在鬥爭中，那個被發動起來的群眾大大超過了毛林當權派與劉鄧派所嚴格劃定的界線，如果在群眾中出現了真正代表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利益的一個流派，那麼在這時候，「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性質已經變了。它不再是官僚階層內部清算的鬥爭，而是官僚與反官僚的鬥爭，事情已經發展到第三個前途了。這時候，毛澤東為了要壓下那個被他召喚出來的「革

命魔鬼」，將視需要之大小，儘快與反對派作相應的妥協。這時候，毛澤東如果還是遭到了清算，那麼清算他的人決不是他所欲清算者，而是真正的革命派。

六、毛澤東的企圖能否實現？

不過我們暫且撇開第三個前途不談，先談談毛澤東發動紅衛兵的「主觀意圖」。讓我們看看，我們在上面提到過所謂的「一石三鳥」的企圖，究竟能否實現。

首先是那個轉移民間怨氣的打算。來了這下子紅衛兵運動之後，是否能夠將多年來人民大眾的怨氣，特別是最為敏感的青年學生對毛對中共所鬱積的怨氣，轉向「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發泄，同時又能藉此挽回並提高毛的聲望？

據我看，這個可能是沒有的，如果有，也只是曇花一現，現在早已過去了。當然，毛在這方面佔盡便宜，他始終處於指控人而不被人指控的地位。再若他打敗了他的對手，那更可以將一切罪狀加於人，一切責任推給人，拿失敗者當作獻給神的「替罪之羊」。但正如中共的那句術語所云，「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任何大獨裁者的手掌都不能掩盡天下耳目。至於勝利本身，它固然具有絕大的說服力量，但問題畢竟更在於怎樣取得勝利，在於是怎樣的勝利，如果毛憑以取得勝利的手段只限於槍桿子的高壓，只限於毫無原則的手腕與最無恥的欺騙；如果為了取得勝利，他不但對他的敵人，而且對他的擁護者都一樣應用這些手段；如果他所取得的勝利是極不光彩的，十分腐敗的，換湯不換藥的，甚至是似勝實敗的，那麼，從勝利中出來的毛澤東便

不可能找到他的替罪之羊；便不可能教「人民之神」接受這份致獻的犧牲。

如今毛澤東正是以這樣的手段與這樣的方式在贏取他的勝利，同時他在事實上也不可能得到不同於我們上述的勝利，因此，「勝利」的結果，只能給這位最大的舵手招來最大的怨氣，讓所有怨氣，特別是幻滅了的青年人的怨氣，集中於他一人之身罷了。

我們再看看另外兩個企圖。它們是：一、通過這次群眾運動，打倒黨內與國內的任何異己者，以此造成一個思想上為毛澤東主義所絕對統一，組織上為毛澤東個人所絕對控制的黨和國家。二、通過這次運動，訓練出一大批能免於「修正主義」與「官僚主義」的新幹部。

這些能夠達到嗎？

要回答第一點，先得弄清楚究竟是怎樣的「統一」程度與怎樣的「控制」程度。在某一程度上說來，中共二十年來早就思想上統一於毛澤東主義，組織上受控制於毛澤東個人。不過毛澤東並不滿意這個程度的統一，不滿意這個程度的控制，尤其是近幾年來，這個「統一」與「控制」受到嚴重挑戰之後，他更覺得不滿意，更要加強它們了。然則，要加強到怎樣程度的絕對統一與絕對控制，毛澤東才能滿意呢？顯然，他要在這方面遠遠超過史大林，甚至要遠遠超過希特勒，他要成為歐洲中世紀黑暗時代最專橫的教皇，他要成為摩罕默德式的獨尊的教主。他要將自己的片言隻語都全部變成「最高指示」，變成「絕對真理」；他要使《毛選》變成聖經，使語錄變成符籙，並且要使這本聖經與這些符籙，代替人類古往今來知識活動的全部成果，欽定為「無產階級文化」的萬有文庫。為要達到這個目的，他將其他一切著作冠以「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帽子而加以焚燒，將所有在

文、史、哲以及藝術等方而略有成就的知識分子統統加上「牛鬼蛇神」的惡名而加以迫害。

毛澤東在這方面的所作所為是絕對荒謬反動的，是完全違背馬列主義的，不過我們將在論文化問題的專文裏討論它，此地不再多談。在這裏，我們要問的是：這個樣子的思想統一與這個樣子的絕對控制，是否能夠做到？

不可能。

不管我們從哪一角度看，都不可能！從人類思想的一般本質看，服從權威與反抗權威這兩重性是始終同在的，從人類思想總進步的現階段看，那個新的集體主義總必須包含那被「揚棄」了的個人主義；從中國一國的文化發展看，一般民眾的文化水準畢竟提高了，知識分子都或多或少受過科學和民主的洗禮的了；從世界範圍內文化發展看，那麼不管有多麼強的阻力與多麼大的逆流，社會主義行將取代資本主義，民主化的共產主義行將取代警察化的共產主義，總已是確定的趨勢了。

因此，毛澤東那種超越秦始皇，蓋過史大林的萬丈雄心，結果總只能被歷史證明為枉費心機，只能被證明為時代錯誤的大笑柄。縱使他在表面上與短期內能夠做到這個局面，也只能以加倍的力量，加快的速度，促成了歷史對他個人與他所欲建立的制度予以應得的懲罰罷了。

第二個問題是：通過紅衛兵運動，能否訓練出一大批對「修正主義」與「官僚主義」等等完全免疫的新幹部？

我們的答覆是：新幹部正在訓練，而且終於會訓練成，但是如此訓練成功的新幹部，卻完全不能免於「修正主義」與「官僚主義」的墮落。

理由為何，我們早已在以前的文字裏說過了，不再詳述。總之，如果不是真正依照不斷革命的方針，不徹底拋棄「一國共產主義」的反動立場，如果不把中國勝利了的革命首先看作燃起世界其他部分（包括落後部分與資本主義高度發展部分）社會主義革命的火種，而將它看作建設「繁榮富強的社會主義祖國」的一個自足基地；如果不把中國初步的社會主義建設主要當作社會主義（即使在貧困國家中），可以優於資本主義的一種示範，以此吸引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工人階級以及一般勞苦大眾到社會主義方面來，以此促成他們在本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如果終於（在長時期內）沒有這些革命以及一切落後地區的革命前來支持，那麼，在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中，勝利了的社會主義革命的領袖們，要想反對與防止「修正主義」，要想自己的幹部永遠免於「官、暮、嬌、驕」四氣的渲染，不管你發明什麼方法，不管你施行怎樣的手段，結果終是徒勞。

在毛澤東主義的，亦即在史大林主義的「一國共產主義」總方針下，行將從今天紅衛兵中選拔出來的一大批幹部，因為是在革命彩排中「奪得了權力」的，因為是在免費串連中完成了「長征」的，因為他們是毛澤東「文化大革命」溫室裏人工助長的未成熟的接班人，他們少不更事，趾高氣揚，一定會比那些老幹部們（今天被他們「砸爛了狗頭」，其中卻不少是從長期真正戰鬥中出來的）會更加容易，也更加迅速地陷進那「官、暮、嬌、驕」的四氣之中。

七、假革命與真革命

因此，要使中國的革命政權免於變質，要使未來的革命幹部免於「修正主義」和「官僚主義」等等的墮落，人們必須為上述有關「文化大革命」的第三個可能前途而奮鬥，也就是說，必須為變假革命為真革命的前途而鬥爭。

先談這個前途的現實性。

在一年前，不，甚至在半年前，如果有誰能預言出中國目前的「造反」情形，那是沒有人會相信的，連毛澤東自己也不會相信。

不過現在，當我們看到了最近全國各階層動亂的情形，那麼誰若否認中共統治下有革命的可能與必要，這個人一定是政治上的色盲者。

「文化大革命」的一個大好處，就是它清楚地告訴了我們：十七年中共統治所積聚起來的「內部矛盾」與「外部矛盾」竟有這樣的多，竟是這樣的深！

這麼多與這樣深的矛盾是必須用革命——不是御用與欽賜的革命，而是要用真正革命來解決的！

這個客觀需要，預先決定了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必須發展成為真革命，也預先決定了它可能發展成為真革命。

然則這個潛在的與可能的現實性，將如何在客觀上實現出來？我們革命者又如何可以在主觀上使之實現出來？

客觀上，在半年多來，特別是近兩個月來的「造反」鬥爭中，其實有許多行動已經超出了官方給劃定的界限。這就是說，真革命的成

分早已包含在假革命之中了。毛林系統在歡呼由上海開始的「一月革命」的同時，就拚命號召解放軍介入革命，就狂呼一切「專政機關」行動起來鎮壓「反革命」。與此同時，《人民日報》又特別重登了毛澤東的那篇舊文章：〈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以此去反對存在於「革命群眾組織中的……本位主義、小團體主義、極端民主化、非組織觀點、主觀主義、個人主義等等」，這都顯明地表示出群眾運動已多少越出了官定的框框。又如《紅旗》雜誌1967年第三期的社論所說：

在當前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及其在黨內一小撮代理人決戰的階段，堅持反動立場的地主，富農和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壞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美蔣特務，都紛紛出籠。這批牛鬼蛇神，造謠惑眾、欺騙、拉攏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成立反革命組織，瘋狂地進行反革命活動。例如，所謂「中國工農紅旗」，所謂「榮復軍」、「聯合行動委員會」以及其他一些被修正主義分子組織起來的名為「革命派」，實是「保皇派」的組織，就是這種反動組織。這些組織中的多數群眾是受蒙蔽的，是應當爭取教育的。（見〈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鬥爭〉。）

這段話也生動地告訴我們，群眾確實是起來了。其中固然有「趁火打劫，妄想變天」的害人蟲，但是除此以外，即使陳伯達們也不得不承認還有多數「受蒙蔽」的普通工農。他們在十幾年的官僚專政之下受盡苦楚，現在看見了可以變革的機會，奮然而起，要同那些騎在他們頭上的老爺們算賬了。「經濟主義猖狂地氾濫」，迫得毛澤東窮於應付，這無論如何是一個無誤的標誌，表示出「文化大革命」已不再是完全欽定的了。假革命已開始變為真革命。

文化大革命在變、在發展，這是事實，它還要繼續變下去，繼續發展，這也是必然趨勢。但是它究竟將怎樣變與怎樣發展，我們是很難確切預言的。

我們可以預言的是這樣一件事，如果沒有一個具有明確綱領的先鋒隊加以領導，那麼，這個革命縱然發展得大大超過了毛派或劉派劃定的界限，也遲早會被再度控制了去，或者替目前爭鬥中的一派（多半是毛派）服務，或者為二派聯合的力量所鎮壓。如此，則一度表面化了的中共現統治下的社會矛盾，勢必不曾解決，暫時又潛伏下去，等待新的爆發。

因此，目前中國那個頗有可能發展成為真革命的「造反」局勢，需要國際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者對它作及時的與正確的認識，並進一步作革命的干涉，藉使目前蜂擁起來的真正革命的左派，能有所領導，能知所團聚，並能為確定的方向而鬥爭。

一句話，那是革命者主觀上如何使「文化大革命」發展的可能性在客觀上實現出來的問題。

要作革命的干涉，要予革命群眾以正確的領導，首先得在目前五花八門的所謂造反者與造反組織中，分別出誰是真革命者，誰是假革命者。因為今天出現在全中國的形形色色的造反團體，表面上，個個都打着擁毛旗幟，人人都喊着「毛主席萬歲」。而究竟什麼是所謂「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什麼是「資產階級修正主義路線」，根本不曾把具體的政綱宣佈出來，以致究竟誰真誰假，誰革命誰反革命，普通老百姓簡直無法分別。甚至誰真擁毛，誰假擁毛，也都是「撲朔迷離」，無從判斷。朝為文革要人，暮成反毛「黑幫」者，已屢見不鮮，而昨天讓人打成為反革命，今天得以光榮地「平反」者，更是比比皆是。又

因為並非所有「反毛派」的行動都是革命的，也並非所有「擁毛派」的行動都是假革命的，所以辨別真偽革命的標準更難確立，同時也更需要確立。

不確立這些標準，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者將不知道應該打倒什麼與擁護什麼，不知道應該聯合誰與打擊誰，不知道應該向哪裏走，不知道應該為什麼而鬥爭。

下面這幾個標準，據我看，乃是適用於目前中國的具體條件者。它們可憑以區別個人和團體的革命真假，也可以作為中國真正無產階級革命黨的一個初步的鬥爭綱領。它們是：

- (1) 是否反對神化大領袖；
- (2) 是否反對官僚特權與貪污墮落；
- (3) 是否真正贊成與真正實行「巴黎」公社的原則，即是說：是否實行以無記名投票方式來選舉工廠委員會，選舉貧下中農委員會以及各地方的「人民公社」，並以此種「公社」來代替各級「人民委員會」；
- (4) 是否不僅在口頭上，而且在事實上保證勞動人民的憲法權利（詳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章），保證言論、出版、結社、示威與罷工的自由，保證信仰自由，保證人身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等自由；
- (5) 是否反對以反「經濟主義」的名義，削減或甚至剝奪工人農民的福利享受和生活保證；
- (6) 是否主張並實行給政治上不同意見者以充分答辯的權利；

- (7) 是否主張並實行將新中國成立以來內政外交上的成就和失敗，進行充分的檢討；
- (8) 是否主張和實行在文藝創作及一般文化活動上，除了簡單明確的政治標準外，允許充分的自由；
- (9) 是否認為反對蘇聯的「修正主義」，並不妨礙我們與蘇聯結成聯合戰線，藉以反對主要敵人美帝國主義；
- (10) 是否在思想上與實行上都遵守以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利益服從於世界革命利益這個大原則。

凡是以「是」字來答覆上述問題的個人或團體，都是真革命的左派，不管他們掛的是什麼旗，保的是什麼皇；反之，凡是以「否」字來答覆這些問題的，都應該歸入假革命右派之列，不管他們是擁毛的，還是擁劉的。

我們反對一切假革命的右派，支援一切真革命的左派，並願意和他們聯合行動，號召一切革命者在這個政綱之下團結起來。

八、革命領導問題

第四國際的《過渡綱領》開宗明義說：「世界政治的整個形勢，其主要特點在於無產階級領導的一種歷史性的危機」，「人類歷史的危機還原為革命領導的危機。」

這一個歷史性的論斷，不但二十九年前的當時是正確的，到了今天也仍然是正確的，不但在發生社會主義革命的國家中是正確的，就是在已發生過此種革命的國家中也是正確的；它不但適用於世界的其

他國家，也適用於中國；而且，在一種特定的意義上說，它還最最適用於今天的中國哩。

因為今天毛澤東治下的中國，一次成功的爭無產階級民主的政治革命，其客觀的先決條件，即使不曾開始「霉爛」，至少是已經「成熟」了。「現在問題歸結到無產階級，主要的還是歸結到革命的先鋒隊。」

今天中國如果存在着，一個組織良好，人數相當眾多，而且具有正確馬列主義綱領的無產階級革命黨，那麼，這次由毛澤東自己挑動起來的假革命，一定會被轉變成反官僚爭民主的真革命，甚至已經被轉變成了。

不幸，事情並不如此。

中國共產主義者中的真正左派，第四國際的中國支部，由於主觀上和客觀上各種原因，今天在中共的統治之下並不存在——至少，他們不可能以有組織有聯繫的政治派別而存在。因此，他們不曾，也不可能目前的政治鬥爭中起任何作用。不過他們的思想還是存在的，至少在大城市的無產階級中是留得影響的。

譬如，在上海本年1月份出版的第十九期《紅衛戰報》上，就說到在「造反派內部」，「出現了一些托派分裂活動」。

當整個中國的政治氣候日益變得有利於真正馬列主義的滋長與繁殖之時，那些陳年的思想種子會發育，同時新生的種子也會到處冒頭來。

培育這些種子的條件是官僚極權統治下工農大眾爭取民主權利的渴望，是狹隘民族主義窒息下一切革命者對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要求。

毛澤東的政權愈發走向瘋狂的個人獨裁，愈發剝奪勞苦大眾的一切權利，愈發使國家變得孤立無助，眾叛親離；那麼這些造反種子就愈會自發地與野生地滋長起來。

這樣，毛澤東治下無產階級爭民主的政治革命的條件是成熟了的，問題只在於怎樣給他們以正確的領導。

說到領導，我們首先想到的自是中國第四國際黨在組織上的再建問題，以及它在思想上的加強和發展問題。

不用說，這是必須加以鄭重考慮並應認真付之實行的問題。因為第四國際綱領代表着四十餘年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最早，最全面與最徹底的反官僚主義墮落的旗幟；它代表着共產主義事業與理想被史大林主義所污損毒害後唯一堅持着的馬列主義的傳統。因此，我們相信，今後不論是資本主義國家中發生的社會主義革命也好，或者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發生的官僚的民主政治革命也好，要想他們成功，要想他們成功了而循着正確的方向前進，那麼忽視這個旗幟，背棄這個傳統，都是不行的。

但是從這個認識出發，我們能不能夠說：所有上述國家的革命，只有在各該國的第四國際黨的直接組織領導與思想領導之下，才談得到成功或成功後的正確發展呢？能不能夠說：如果不在第四國際黨派的直接領導和控制之下，這些革命便不能成功，甚至說它們算不得革命呢？

當然不能夠，這樣說與這樣想，將是最最無救的宗派主義者。

拿中國的情形來說，我們就應該認識到，在中國第四國際黨的組織未曾再建與發展之前，中國反官僚主義的政治革命會發生，可能會

不止一次地發生；而這些革命，多半是由官僚層中分裂出來的左派領袖領導的。這些領袖可能部分地解脫了史大林—毛澤東主義的拘束，可能在客觀上已經採取了第四國際中國黨的若干立場，但他們決不會自命為第四國際派，甚至會極力反對第四國際派。對於他們，我們該採取什麼態度？當然應該堅決擁護他們的革命，誠懇地批評他們的不足，勇敢地參加他們的戰鬥隊伍，以此達到部分的、或多或少的反官僚政治的目的。

總之：重要的在於實質，在於政綱的實施，並不在於用的什麼名義，打的什麼旗號，也不在於是否置於我們的直接控制之下。

事不由我，一概否定，不受控制，便加摧毀，這是史大林主義者在近代革命史上犯下的滔天罪行之一。如果我們採取了類似態度（只要極少的一點就夠了），那麼唯一的結果是：歷史將邁着大步，鄙夷地從我們緊閉的那所小門之前過去。

然則我們上述的擁護態度，是否可以應用之於目前中國鬥爭中的劉鄧派呢？

我以為不能，至少目前還不可以。

理由：一、根據目前所知道的材料來判斷，劉鄧派未曾發動過什麼革命，相反，他們是毛林派發動的「革命」的對象，因此，「擁護劉鄧派」這個光禿口號，首先就意味着保持現狀，反對「亂」，反對「奪權」。我們並不滿意現狀，不反對亂，也不反對奪權。我們反對「為毛主席而奪權」，卻堅決主張為工農大眾的利益而奪權。第二、不論就過去的事實看，或就今天的表現看，劉鄧等人根本不曾跨出史大林—毛澤東主義的圈子，甚至比毛林派更深更穩地立足於中共的統治層中。他們所主張的乃至所執行的所謂「修正主義路線」，主要是在於對毛

的過於冒險的政策加以阻遏，而基本上卻是「中派偏右」的。因此，劉鄧派當然不等於革命的左派，他們的勝利不可能等於革命左派的勝利；甚至我們相信，一旦真革命的左派認真得勢，劉鄧派會立即放棄其微弱與消極的抵抗，拜倒乞憐於毛派的腳下，藉以阻遏革命派的勝利，因此，我們不應該在群眾中造成一個幻覺——即劉鄧派等於革命派的幻覺。

不簡單地提出「擁護劉鄧派」這個口號，當然不妨礙我們在一些場合，在許多具體問題上，支持劉鄧派（特別是他們的群眾）的鬥爭，與他們（不僅群眾，而且領袖）聯合行動。因為我們主攻的矛頭顯然是毛澤東的個人獨裁；又因形勢所迫，劉鄧派是比較能夠（不管真情或假意）接近我們政綱的若干點的。

九、「文化大革命」為什麼階級利益服務

以上所談，主要是「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方面與事實方面。下面想研究一個比較深遠一點的理論問題。那就是：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究竟是為什麼階級利益服務的？

史大林的情形是很清楚的，他代表了蘇聯保守的官僚階層的利益，特別是代表了這個階層的中派立場。他縱橫捭闔，左右開弓，野蠻而頑強地保護了官僚階層的利益，同時也保衛了這個階層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國有化的財產制度。

毛澤東怎樣呢？當然他也代表着官僚集團的利益；不過，他所站的立場，似乎與史大林的情形不同。他所直接代表的彷彿是統治階層

中的左派，而「文化大革命」的矛頭所指，好像是略等於蘇聯當年的右派。事情是否真是如此？

不是。

中國共產黨自從在 1930 年前後完全與當時的左派反對派決裂之後，它的隊伍中（至少在它的領導層中）便不再有真正的左派。從那個時候起，所有發生於中共內部派系鬥爭，不論發生於毛澤東和王明之間，或者發生於毛澤東和張國燾之間，或者發生於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大多是由於策略性的分歧，甚至由於簡單的權力衝突，極少由於原則性的革命戰略的異見。如果問題牽涉到思想路線的話，那麼最多代表着這樣的兩個方面：史大林主義的左翼與史大林主義的右翼。而這裏的所謂左翼與右翼，如果用真正布爾雪維克主義的尺度，真正馬列主義的尺度來衡量，都是屬於中派的。史大林自己，在他獨自掌握蘇共命運的二三十年中，就是時而左傾，時而右傾，不斷在中派的圈子裏來回跳躍。

長時期內受史大林思想支配的中共，自然也受過這些跳躍的影響。每當一次跳躍，中共內部也總是會相應地出現一個轉變，而完成這個轉變時候，又常常會或大或小地起一次鬥爭；發生於新立場與舊立場之間的鬥爭，毛澤東在這些鬥爭中並非時時居於左翼，不過大體上偏左的居多，因為在以武力奪取政權這個問題上，毛不會退縮；而對於和資產階級聯合這個問題上，毛也不會劃地自限的。

因此，一般而論，毛澤東應該說是史大林主義的左翼傳人，他特別接受了三十年代以後的史大林主義，這裏面包括着經濟上與政治上的冒險主義，政治上狹隘的宗派主義（以極左的革命名詞來掩護的），個人極權的官僚主義，自居於階級矛盾之上的拿破崙主義。

史大林主義的左翼當然不等於馬列主義隊伍中的左派，這是「中派」裏面的一個左派。它之所以被稱為「左」，僅僅對它自己一派的右而言的。史大林主義對於資產階級與資本主義，從來只有兩個態度：一個是卑躬屈膝，作無原則的妥協，甚至作最無恥的投降；另一方面便是用冒險的、盲動的、宗派主義的與官僚主義的野蠻罪惡手段來反對他們。前一態度是右，後一態度便是所謂「左」了。它的右，當然根本背叛了馬列主義，可是它的這種「左」，也完全與馬列主義無共同之處。因為它或右或「左」，無論它擁抱資產階級或打擊資產階級，卻總是於無產階級無利，總是於社會主義無利，或至少是害多於利的。因此，我們千萬不可把史大林主義範圍內的左右翼，和馬列主義範圍內的左右翼混淆起來。這二者本質早已不同屬於一個範疇了。如果我們將二者等同，又若光就形式的激烈來看問題，那是會大上其當，會大錯特錯的。

譬如在蘇聯共產黨的內部鬥爭中，以托洛次基為代表的左派，在許多時期的許多問題上，例如1928年以後，中國革命中的國民會議問題，1930年左右蘇聯農村的集體化問題，1933年以後，德國與社會民主黨的聯合戰線問題，表面上，史大林的立場都比較「左」，可是實質上卻非常之右，因為它們或者推遲了革命，或者讓革命的前進付出了慘重異常的代價。或者乾脆破壞了革命，這些在客觀上都幫助了資產階級，所以實質上都是右的，甚至是極右的。

今天毛澤東及其一派的所謂左，基本上也應作如是觀。站在「右」邊的反毛派，其中（特別在那些一貫堅守史大林主義立場的領袖們中）固然有真正的右派，即主張長期與資產階級合作下去的路線者，可是此外另有一部分人，另有更大數目的一部分人，那些未曾受史大林主義束縛的廣大群眾（其中也可能有些上層分子），卻未必真正右的，他

們多半是表面右而其實左的，換句話說，他們的主張可能是更符合於中國乃至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利益的。毛澤東的立場，對於前一類的反毛派說是左的，對於後一類的反毛派說卻是右的。因此，和當年的史大林一樣，毛站的是官僚中派立場；他所推行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也和當年史大林的「反右」鬥爭一樣，縱然含有若干「反資」意義，卻絕不為無產階級的利益服務；它徘徊跳躍於二者之間，而以官僚階層中最特權，最有力的一群的利益為依歸。

「不過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不是正在動員成千成萬非官僚的群眾來向官僚們造反奪權嗎？這不是正在徹底打擊，甚至打毀官僚階層嗎？」

不錯，這情形我們在前面說過，確乎與史大林當年的不同。但我們也說過，這個不同僅僅屬於外表。二者形式不同，實質上卻都為了要保護官僚階層的利益。只是史大林之保衛官僚利益，是顯而易見的，毛澤東之保衛官僚利益，比較的為假像所蔽罷了。

不過同中似乎有異。他們二人各自代表的最有力的那個官僚層，就其傾向與性質說，似乎稍稍不同。史大林當年所代表的是官僚中比較保守的一派。它的對內政策在第一時期是一味對資產階級影響讓步，在後一時期則因自身地位的危急而作冒險與狼狽的反撲；於它的對外，那是始終屈服於帝國主義的壓力之下，以致最後完全放棄了世界革命的事業。毛澤東今天所代表的官僚層，比較地說，好像是更為激進的。無論在對內或對外政策上，他都表現得非常之左，非常的不妥協。在國內外的種種敵對勢力壓迫之下，毛澤東非但不願意屈服，反而更加強了戰意。這種不同的表現，是否意味着毛派至少代表了中共統治階層中的革命派呢？

我以為不能這樣說。因為任何中派都是跳躍的，它時左時右，可左可右。我們拿史大林的例子來說吧，從一九二〇年代的後半期起，一直到一九五〇年代之初，雖然其總的趨向是右的，是對國際帝國主義妥協的，是放棄甚至破壞了世界革命的；但中間卻不乏向左的盤旋，最著名的是所謂「第三時期」。在這個時期中（從1929年開始直到1933年），史大林派在國內用野蠻恐怖手段消滅了富農，在國外孤軍奮戰，不顧一切地實行盲動來反對帝國主義。結果處處碰壁，將希特勒捧上了台，在全世界範圍內造成反動局面，以致不得不激劇右轉，提出了所謂「人民陣線」的政策。

今天毛澤東們的內外政策，一般可以說，略等於史大林的「第三時期」。它是過去「人民民主主義」合作路線的反動，而在更多更大的打擊之後，它多半又將成為新的對國際帝國主義，特別是對美帝，屈服的前趨。他今天的極左路線，乃是他昨天的極右路線之果，因此，它又可以成為明天再一次極右路線之因。

如何才能打斷中派路線這一個綿延不絕的因果反覆呢？只有一條路，趁今天極左路線所造成的假革命機會，擴大而加深之，使之成為真革命；使無產階級的民主真正成為今天中國的統治精神。

十、簡短的餘論

從狹義的文化觀點來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原本有很多的話可以說，而且也應該說。只因毛澤東這一次的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積極方面實在與文化一無關係。誰都清楚，這不過是他隨手抓來的一個幌子，藉以掩蓋他清算異己的權力鬥爭罷了。而在消極方面，那麼他在「文化革命」中所表現出來的對於文化和文化人的態度

和行動，又是太過荒謬，太過明顯地違反了馬列等大師的遺教，以致我們暫且可以不必為它多費筆墨，留待以後再作總的批判了。

在這裏，我們只想摘引列寧的兩段「語錄」，讓大家先作一個比較：

(一)

舊時學校是崇尚書本的學校，它強迫學生去通曉一大堆無用的，累贅的，死板的知識，這種知識閉塞着青年的頭腦，並把它們變成一些依法炮製的官吏。但是，如果你們從此便想做出結論，說毋須通曉人類所積累起來的知識就能成為共產主義者，那你們便犯了極大的錯誤。如果以為無需領會共產主義本身所由產生的全部知識，而只要通曉共產主義口號，只要通曉共產主義的結論已經足夠了，這種想法也是錯誤的。（見《青年團的任務》中文本，《列寧文選》第二卷，842頁。）

(二)

無產階級文化不是從空中掉下來的，也不是那些自命為無產階級文化專家的人所臆想出來的，如果認為這樣，那就是胡說八道了。無產階級文化應當是人類在資本主義社會，地主社會，官僚社會壓迫下所創造出來的知識總匯發展的必然結果。（見同上文，803頁。）

看了列寧在四十七年前所說的這兩段「老話」，今天毛澤東「親自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不是他對馬列主義在文化方面的「最新發展」，那是不言自明的。

1967年2月

注釋

1. 最近我們看到未經證實的一篇所謂〈劉少奇的自我檢討〉，其中他把自己的錯誤，追溯到1964年2月，說他曾向黨中央提出書面意見，認為成立政治協商會，將保證中國進入「和平的新階段」，這可能是真的，因當時史大林正要求中共與蔣介石成立聯合政府。此外，劉還指出了幾個老錯誤。不過這些錯誤，大抵已經在事實的發展中解決了的。
2. 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與紅衛兵運動，曾經被蘇聯的一位評論家指為「師事托洛次基的」。這話當然荒唐，但亦非完全無因。為了說明馬克思主義革命家對於青年學生的正確態度起見，附帶講一講那個老故事也許是必要的。原來蘇聯在1923年時候，列寧病危，黨政大權操在史大林、齊諾維埃夫、加明尼夫三頭之手，黨迅速地陷於官僚化的危機。那時托洛次基認為，要克服這個危機，「要克服閉關的集團作風，克服官員們的等級精神，除了實現民主之外，別無他法。」（見《新路向》中譯本，11頁。）而要實現民主，據托洛次基看來，「問題首先是要在老幹部和十月革命後入黨的那些佔黨內大多數的黨員之間，建立比較健全的關係」，因為「黨以兩層分隔的建築形式而存在這一個事實，本身便含有許多危險。」（均見上引書，5頁。）為了這，托洛次基討論了老輩與年青人的關係問題，並且提出了青年學生們在為黨的民主化鬥爭中所能起的作用問題。在這方面，他寫道：

青年學生們，一如我們所曾看見的，以特別有力的方式起來反對官僚主義。列寧並非無所謂地提議過：要多多依靠學生和官僚主義作鬥爭。青年學生由於其社會成分及其接觸，反映着我們黨內的各個社會群以及他們的心理狀態。學生們以其青年氣及其敏感性，能使此一心理狀態迅速賦有積極形式。因為正在學習的青年，他們會努力去求解，並將現象概括化。這不是說，學生們的一切行為和心情都反映了健康傾向。……不過我們說青年人是我們的晴雨表，我們是把他們的政治表現看成非主要的，卻有徵兆價值的。晴雨表並不造成天氣，它只是記錄天氣……至於青年學生是從蘇維埃社會的各部分與各階層招收來的，在其變化無定的成分中，反映了我們所有的優點和缺點；我們如果不對他們的情緒予以最大注意，那是愚蠢的。……青年人是我們用以校正我們自己的工具，是我們將來的替代者，未來是屬於他們的。（見上引書，11-12頁。）

托洛次基如此正確地估計了青年人的作用，卻被史大林們指責為別有用心的蠱惑與煽動，說他想利用「無知」青年來反對老革命家和黨。結果，如我們

所知，因為一連串不利於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客觀原因，以托氏為首的左派反對派被摧毀了，蘇聯當時年青一輩的革命者，也受到了官僚們的殘酷摧殘，以此更加深了蘇聯官僚化的墮落。

蘇聯評論家指出這個史實，其用意顯然是說，毛澤東和托洛次基一樣，為了爭權奪利，竟不擇手段的利用青少年。

這樣的歷史類比，站不站得住呢？當然站不住。因為二者的情形雖有相同之處，卻有最基本的不同點。

二人相似之處是：1、他們都享有駕凌儕輩（這對托氏的情形說，垂危的列寧已不能列入儕輩之中了）的威望，但黨機關卻不在他們直接控制之下（托氏較毛更甚）；2、為了「奪權」，二人都很看重青年一輩的作用。

可是二人的相似僅此為止，二人的差異卻更為根本，而且更為巨大的。它們是：第一，托氏當年所以會在黨內居於少數，除了布爾雪維克黨的歷史原因外，主要卻因為托氏代表着反官僚的無產階級左派的革命立場，而史大林們則代表着官僚保守的對國內國外資產階級的妥協。後一立場，因為正逢上國內國外革命退潮的影響而受到較多群眾擁護，這就讓史大林們能夠霸佔黨政機關。毛澤東之所以失去他在黨內影響，最主要卻因為他在近十年來所主張的國內外（特別是國內）政策的倒行逆施，浪擲了他固有的巨大聲望。第二，托洛次基要依靠青年學生來和官僚主義鬥爭，絕不是想破壞黨，不是要用青年人來代替老一輩，他說：「將老一輩放進檔案庫該是瘋狂行動。」（見上引書，7頁。）可是毛澤東今天發動的「紅衛兵造反」運動，恰恰就是要將黨的老一輩「放進檔案庫」去，甚至要步史大林の後塵，要把這一輩斬盡殺絕。第三，托洛次基看重青年學生的力量，重視他們的作用，但絕不因此將他們抬到工人階級之上。在反官僚主義的鬥爭中，他始終將工廠支部的作用看得最最重要，並且將黨內危機的根本克服，寄託希望於「體力工人之經常進入黨內」。（見上引書，9頁。）毋須說，他更不會利用他在紅軍中所享有的無比威望與軍事委員會主席地位，用槍桿子去打破黨官僚們的「狗頭」。毛澤東在這方面的情形完全相反，他荒唐無聊地討好學生，以學生反對工人，以軍隊打擊黨部。第四、托洛次基的重視青年學生，那是真正把他們當作「黨的鏡子」，當作蘇維埃政權政治氣候的「晴雨表」，當作「用以校正我們自己的工具」，一句話，目的在於靠富於朝氣的與敏感的青年們的幫助，廓清黨內的官僚暮氣，以便恢復乃至發展黨內的真正民主，可是毛澤東的發動學生，其最大目的卻是要神化他個人，要徹底消滅中共內外原極有限的民

主。這一切，充分暴露出毛澤東的無原則的政治詭計，與托洛次基的立場和行為之間，無絲毫共通之處。

卷一 托派與中國
卷二 論毛澤東思想
卷三 晚年札記

王凡西的一生著譯甚勤，發表過的作品遍佈中外報刊。作為中國托派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其作品也是中國現代史、中共黨史、中國托派史的重要史料。《王凡西選集》共分三卷——《卷一：托派與中國》、《卷二：論毛澤東思想》、《卷三：晚年札記》，由內地著名學者朱正選編，並補充珍貴史料及注釋，是王凡西最重要的著譯作品首次結集出版。

毛澤東是中共建國史上至高無上的人物，受萬人仰望。然而，在反對派——托派人物眼中，毛澤東又是怎樣的人物？卷二收入《毛澤東思想論稿》及《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兩本著作，前者多角度地析述毛澤東思想的組成元素，以及其與所謂「毛澤東思想」的異同，也探討了毛澤東在軍事、文藝政策、「一國共產主義」以至「人民公社」方面的思想，對於了解「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場文化浩劫的來龍去脈，大有幫助。

第二部分聚焦於文化大革命。有別於坊間一些在事後依據大量史料作出分析的作品，此著作寫於文化大革命開始進行之際，作者環繞「運動動力，進行方式等等，推測它未來的歸趨」，可說是最接近歷史原始面貌的分析文字。

根叔一輩子是一個永遠忠於自己理想的革命家，儘管我們後來對世界的看法不一樣了，卻永遠不會影響我對他的敬重。

岑建勳

根叔的著作，為我們畫出多元多彩的中國共產革命，引領讀者往更寬闊的層面思考政治。

成令方 台灣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教授

我也希望，透過這套選集，中文世界年輕一輩的讀者能夠獨立地、批判地重估王凡西、中國托派、世界左翼運動的得失是非，並從中探索社會變革的動力。

萬毓澤 台灣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微信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ISBN 978-962-937-344-3



9 789629 373443

Published and Printed in Hong Kong

王凡西選集



卷三
晚年札記

朱正
編



CITYU HK
PRESS

王凡西選集

王凡西選集
卷三 晚年札記

朱正 編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編輯 陳明慧
實習編輯 關喜文（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四年級）
封面設計 蕭慧敏
版面設計 劉偉進  *Création*
城大創意製作
排版 蘇少嫻

©2018 香港城市大學

本書版權受香港及國際知識版權法例保護。除獲香港城市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媒介或網絡，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數碼化或轉載、播送本書文字或圖表。

國際統一書號：978-962-937-345-0

出版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香港九龍達之路
香港城市大學
網址：www.cityu.edu.hk/upress
電郵：upress@cityu.edu.hk

©2018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elected Works of WANG Fanxi
Volume 3: Final Thought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s)

ISBN: 978-962-937-345-0

Published by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Tat Chee Avenue
Kowloon, Hong Kong
Website: www.cityu.edu.hk/upress
E-mail: upress@cityu.edu.hk

Printed in Hong Kong

目 錄

卷三說明	vii
序一（岑建勳）	ix
序二（成令方）	xi
序三（萬毓澤）	xiii
編者序	xv
作者簡介	xix
編者簡介	xxi
王凡西部分著譯作品	xxiii

第一部分 文章及譯著選

1. 中國革命中的爭論問題 —— 托洛次基著《中國革命問題》中文本導言	5
2. 《帝王術》譯者序及譯後記	35
3. 托洛次基《文學與革命》中譯本出版小序與譯後記	71
4. 解嘲——《三齣小戲》（代序）	83
5. 伊·多伊徹《流亡的先知》與中國托洛次基主義運動 —— 我的意見和更正	87
6. 托洛次基主義與中國革命 —— 托洛次基著《中國革命問題》德文本導言	99
7. 《托洛次基檔案中致中國同志的信》譯者弁言	151
8. 致李福仁信	153
9. 致《十月評論》編輯部	159
10. 《謊言與真實》序	179
11. 推薦一本必讀書	203
12. 中越共運史的真实一頁 —— 胡志明與中、越托派	211

13. 略談《悲劇》及其作者——
托洛次基寫給伊羅生的九封信（1935–1938年）譯者序 | 231
14. 評《中國托派史》 | 235
15. 「走你的路，讓別人去說吧！」——
《陳獨秀最後論文與書信》英譯本前言 | 243
16. 陳獨秀散記 | 247
17. 記汪孟鄒先生 | 253
18. 悼念彭述之 | 263
19. 從魯迅的一封信，談到陳其昌這個人 | 269
20. 胡風遺著讀後感 | 309
21. 談王實味與「王實味問題」 | 329
22. 〈王實味與野百合花〉讀後感 | 355
23. 王實味冤案平反的餘波 | 361
24. 悼靜貞 | 363
25. 懷念宋雲彬與許志行 | 367
26. 悼李福仁 | 383
27. 悼念中國托洛次基主義者樓國華 | 387
28. 悼鄭超麟 | 391

第二部分 晚年札記

- 晚年札記（1989–1998） | 397

卷三說明

本卷選收作者專者以外的文章。一部分是關於書籍的，如書評、序跋之類；一部分是回憶往事、懷念故人的。

卷末的《晚年札記》沒有發表過。收入本書時，為尊重作者親屬的意見，於僅僅涉及家務事的地方稍有刪節。

兩部分都只改正了錯字，內容沒有改動。

在作者原注之外，編者加了少量注釋。

朱正

序一

岑建勳

應該是由於他其中的一個筆名「連根」的緣故吧，我們年輕一輩都親切地稱呼王凡西為根叔。這大概與他平易近人的性格很有關係，彭述之我們當面稱呼他彭先生或彭老，背後叫老彭，但就算是吳仲賢吧，也是根叔、根叔的稱呼王凡西，不曾叫過老王。

第一次聽到王凡西的名字，是在1972年秋冬，那個時候我和吳仲賢及其他幾個《70年代》雙週刊的成員經常去彭述之、陳碧蘭夫婦巴黎的家裏，請教彭老關於1925-27國共從合作到分家的歷史，這就不可避免地談到當時共產國際以至蘇聯內部史達林和托洛次基之間對於中國革命的分歧，以至中國托派的產生和以後發展的歷史了。自五十年代開始，中國托派組織在香港殘餘下來的人數很少，直至1973年之前也基本上沒有什麼活動，所以當彭老急不及待地述說中國托派內部於1941年由於太平洋戰爭爆發引起的「中日戰爭性質變化」的辯論以至不同派系的產生，我們是完全聽不懂亦無從分辨誰對誰錯的，王凡西代表了與彭不同的意見——而這個分歧顯然三十年之後仍然影響着彭對王的看法，對彭來說，王代表的是一種失敗主義的意見，而彭認為，是這種意見，讓中國托派被魯迅，以至中共打成為漢奸的主要根據。

直至今今天，我也不同意根叔當年關於中日戰爭由於太平洋戰爭爆發而性質上產生了變化的意見，但是無論現在還是當時，我也不曾認同過根叔在托派內部提出的這個討論，是中國托派被誤解為（或刻意地被歪曲為）漢奸的主要根據，我認為是陳其昌魯莽地給魯迅發信，

引致魯迅情緒化的公開回信才是讓中共抓到機會打擊托派的一個缺口（現在中國大陸的抗戰史研究已不再提中國托派是漢奸的說法），彭述之的指摘，是不符合事實和對王凡西不公道的。

73年中我回到香港之後，有一年多的時間我常到澳門與根叔及另外一位被流放到那裏的老同志見面，有陪同來自世界各地的托派同志去拜訪的，也有和一些新加入的年輕同志去徵求意見的，次數頻密到我也數不清了。根叔給我的印象永遠是從容和親切的長者，如果說彭述之的姿態是帶有家長式訓示的話，那麼和根叔的交談就像平輩之間的討論；由於身體的狀態不容許他持續交談太久，我們每次探訪都會限制不超過三數小時。根叔並沒有因為人家說我是「彭述之關門弟子」而心存芥蒂，對當時香港五十出頭的一些「彭門弟子」對他的戒心，他是坦然和不放在心上的，也從來不提過去與彭的紛爭或批評香港同志的消極和不作為，是一個典型的君子學者。

由於英國里茲大學（University of Leeds）中文系一位同志 Gregor Benton 的努力，75年秋根叔終於來了英國。我早一年已經因為厭倦了香港組織內部的派系紛爭脫離了組織生活移居倫敦，但是我們之間的關係並沒有因此而生疏或見外了，根叔欣然答應替我出版的《復醒》月刊寫創刊詞，而十多個圍繞着《復醒》的香港留學小伙子也跟着我根叔、根叔起來，一直到2003年後他離世前，這些長大了的忘年小友（根叔語）還都會有事沒事的老遠開車去 Leeds 探望他，敬愛如故。

根叔一輩子是一個永遠忠於自己理想的革命家，儘管我們後來對世界的看法不一樣了，卻永遠不會影響我對他的敬重，在我們的眼中，他或許表面上是度過了一個孤寂的一生，但我深信，他是活得很充實的。

序二

成令方

台灣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教授

當我 1976 年在英國里茲留學時，得班國瑞（Gregor Benton）的引介，結識當年已經 70 歲的根叔（香港左派年輕人對王凡西的親暱稱呼）。根叔平易近人，讓年輕人一見面就可以沒大沒小天南地北地聊開了。從此，就每星期定期拜訪，成為忘年之交。

在里茲大學圖書館，我閱讀了很多當年台灣的左派禁書和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歷史，後來閱讀了由香港朋友油印出版的《雙山回憶錄》，才開始理解中國共產革命發展過程中曾經出現過的「托洛次基少數派」，也才對這段歷史開始有非官方版的認識。

1949 年中國共產革命成功後，根叔的托派同志們若留在中國，都先後被捕入獄，他因被組織派到香港去工作，就倖免牢獄之災。不久後又被香港政府驅逐出境，轉到澳門在嶺南中學謀一份教職。他在劉醫師的家中租一間房間，一住 20 多年直到 1975 年移居英國里茲。這段期間根叔與立場反共的劉醫師夫婦成為莫逆之交，他們經常聊文學、戲曲、詩詞、電影，還有世界歷史等。但劉醫師夫婦卻不知這位好友竟然是共產黨的托派，而這位王老師每天勤勤肯肯在房間讀書寫作，竟然寫的是革命回憶錄，評論毛澤東思想和文化大革命，檢討中國與蘇聯的關係，討論托派的歷史爭辯與在香港的組織工作。現在要出版的三大冊巨著的前二冊，都是在這段「隱藏身份」「暢談文藝」的情誼中產生的。這讓我們除了敬佩根叔不斷書寫其對革命信念的執着

外，還增添一分他豐富柔情的日常生活的想像。1975年葡萄牙軍隊撤離澳門，劉醫師夫婦移居德國。之後，根叔寄送一本《雙山回憶錄》，他們才恍然大悟，這位老友의 複雜身份。對我而言，他們的關係真是人間奇談。

終其一生，根叔一直在思考討論托派革命的種種議題。這在《晚年札記》一冊中可以看到他思考的軌跡。連1989–1998年的生活日記也都可以看到他持續對話的對象是托派同志和左派知識分子。1995年3月8日，他寫道：「得梁耀忠從香港打來電話，知子春已於今晨逝世。子春死了，我也不會再寫札記了。」子春就是與他多年共度患難定居香港的樓國華（老樓）。自從1949年以來，根叔的作品都由他負責籌錢印刷傳播。住在英國的這20年，老樓則是根叔中文世界的訊息來源。他在香港與《十月評論》的同志經常聯絡，也經常引介年輕的左派到英國拜訪根叔，而根叔則將書寫的作品陸續寄給老樓，由他負責出版。在此要向老樓致敬感謝，謝謝他印出根叔的手稿，為如今根叔中文著作的再現奠下重要的根基。

面對當今全球新自由資本主義的橫行，很多人認為馬克思、恩格斯當年對資本主義的批判還是目前最有力的武器。同樣的，雖然托派思想有其時代的限制，但是托派對史大林官僚主義的批判，多年來還深受歐洲左派的擁抱。雖然中國共產黨在習近平的領導下，看似將成為世界強國，但根叔等托派同志對共產黨的官僚主義與黨內不民主的批判，至今仍然擲地有聲。他們為懷抱左派理想的我們，畫出了民主的共產世界藍圖，讓我們看到共產政黨與民主的必然關連，而根叔的著作，為我們畫出多元多彩的中國共產革命，引領讀者往更寬闊的層面思考政治。

序三

萬毓澤

台灣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對我這一輩一部分受左翼思潮洗禮的人而言，王凡西有不可取代的意義。由於左翼思想在台灣長期缺席，因此，當年許多關心台灣民主前途與社會改革的台灣人，很自然地受到殷海光等人代表的自由主義的影響。我自己也是循着這樣的知識軌跡成長的。但年歲漸長，參與不少社會運動之後，反倒越來越受左翼的思路吸引，並試着理解馬克思主義在台灣、在中國的發展歷程。然而，中共或蘇聯的官方意識形態與歷史書寫始終沒能真的說服我。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因緣際會接觸、瞭解了王凡西等人投入的中國「托派」運動，頓時覺得耳目一新。對當時的我而言，王凡西（乃至國際的整個「托派」傳統）的著作雖然是長期受到壓抑的「小敘事」，卻彷彿開啟了一扇窗，讓我能夠在令人窒息的「國共內戰」的夾縫中重新探索中國現代史、國際共運史，並由此思索台灣與中國、東亞的關係。後來，我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還曾在港台再版了王凡西的《毛澤東思想論稿》，算是為傳播他的思想盡了棉薄之力。

國際「托派」幾乎無窮盡的內部爭論與分裂往往使人喪氣，我也認為，是否堅持「托派」這個標籤，今天也許不再那麼重要了。然而，他們留下的思想遺產仍有豐富的現實意涵。以我目前的學術與政治關懷為例，我最關切的，是如何突破我所謂的「冷戰格局下的鏡像構造」

（表面上水火不容，實際上雙方都需要對方來證成自我，且雙方都接受了某些核心前提，如「社會主義」等同於一黨專政、國家主義和集中式的計畫經濟），而完成真正的「去冷戰」知識工程。這樣的「鏡像構造」並沒有隨着冷戰的終結而消失，而是不斷支配、形塑着許多人的認知架構，從而封閉了政治想像。對我而言，「托派」（或至少一部分托派）代表或參與的社會主義傳統，恰恰是冷戰結構下受壓抑的「由下而上的社會主義」（借用 Hal Draper 的說法）。這樣的社會主義不會不加批判地擁抱深陷民族主義敘事的「大國崛起」，而是始終對國家（主義）戒慎恐懼；它的核心價值不是由少數菁英或政黨來包辦革命事業，而是不忘馬克思強調的「工人階級的解放應該由工人階級自己去爭取」；不會試圖以革命為名強化官僚體制的權力，而是要建立普遍的自治，實現馬克思筆下的「自由人聯合體」。我一直認為，這樣的社會主義傳統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源，讓我們有可能突破僵固的冷戰結構，尋找多重的解放路徑。

Karl Korsch 曾說「社會主義，不論是其目的或手段，都是一場實現自由的鬥爭」。王凡西一生的言行著述都生動體現了這種精神。如今，我們終於見到了《王凡西選集》的問世，讓他的思想得以世世代代流傳下去。我也希望，透過這套選集，中文世界年輕一輩的讀者能夠獨立地、批判地重估王凡西、中國托派、世界左翼運動的得失是非，並從中探索社會變革的動力。是為序。

編者序

這是王凡西著作的第一次結集出版。

王凡西（1907–2002），本名王文元。浙江海寧人。1925年在北京大學求學的時候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他奉黨組織的派遣去蘇聯留學。在這裏他接受了托洛次基的觀點，成為莫斯科中山大學托派秘密組織的一員。1929年8月奉調回國工作。不久即因為托派問題被共產黨開除。1931年5月1日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托派）開統一大會，他被選為統一組織的中央常委，分管黨報工作。不久之後他第一次被捕了。就因為他一直不放棄托派的活動，以後還被捕兩次，直到抗日戰爭爆發，南京失守前夕他才出獄。1949年5月移居香港，不久再遷澳門。1975年3月定居英國，直到去世。

他一生著譯甚勤，稿費是他的生活來源。他留下了大量檔次很高的著譯。像《雙山回憶錄》，就是一本關於中國現代史、中共黨史、中國托派史的重要史料，東方出版社將它收入現代稀見史料書系之中，足見承認了它的價值。他的其他一些作品也都受到學術界的重視。按說，這是一位有資格編印全集的著作家。只是他早年出版的書籍、晚年在海外報刊上發表的文章（更不必說外文作品）都不易收集齊全，至於要收集歷年所寫的大量書信，更不知如何着手。我看要為他編一部嚴格意義的完整的全集是不可能的了。只能就現有的材料給他編一部選集。

要編這一部選集，我應該貢獻一點微力。我想，我也許是國內收藏王先生著譯較多的一人。我所收藏的這些書是哪裏來的？這就說來

話長了。1980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借調我去擔任《魯迅全集》第六卷的工作。孫用先生介紹我認識了樓適夷先生。樓適夷先生又介紹我認識了上海的鄭超麟先生和他的堂弟、香港的樓國華（字子春，筆名一丁）先生。子春先生很熱心，送了许多書給我，其中包括王凡西先生在香港出版的全部譯著。我還記得，為了能夠順利得到這些書籍，是李普先生托新華社香港分社楊奇先生幫我帶過來的。此外樓子春先生還把王先生在香港刊物上發表的好些文章複印寄給我。我挑選了他翻譯的一些作品編為一本小冊子《書信、日記及其他》，於1988年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他對這本小冊子是滿意的。因此他也就有了願意讓我來編輯他的著作的想法。

今年我知道了魏時煜博士在做「北大三人行·中國知識分子三部曲」，其中一人就是王凡西。我就向她建議：趁此機會同時出版他本人的著作。經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社長同意，我就來着手進行編選了。

大家都知道：王先生一直到死，都是一個堅定的托派分子。他對托洛次基的尊崇和信仰，可以說就像宗教信徒那樣的虔誠。我尊敬他的為人和學術成就，卻無法同意他所堅持的托派觀點。我以為在今天已經可以看得很明白：托洛次基主義和史大林主義都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流派，都屬於已經過去的那個時代的了。當年共產國際即史大林對於中國革命的錯誤指揮導致中國大革命的失敗，托洛次基指出史大林的這些錯誤，是有道理的。這也就是吸引陳獨秀等許多人成為托派的原因。六十多年之後，世界已經有了極大的變化，依然認為托洛次基主義是一種指導革命的有用的理論，未免太不切實際。而王先生就正是這樣一種見解。1989年蘇聯和東歐發生巨變，他認為這不但是史大林主義的失敗，而且還是托洛次基主義的勝利！他在這一年

除夕寫的札說：「在此局勢中最使我苦悶的一個現象是：為此變革準備了半個世紀的第四國際，卻未能在此巨變中起任何顯著的作用！我們是應該起很大作用，必須起領導作用的！但願 1990 年開始，第四國際的作用能再大大發揮出來。」他在 1991 年 2 月 13 日寫的札中說：「在史大林主義徹底與普遍崩潰的今天，如果沒有以第四國際為代表的那個思想體系，即是說，如果沒有以真正國際主義和徹底大眾民主相結合的不斷革命理論的思想與實踐，那末，我們真的要看到資本主義不僅在事實上，而且在思想上也全部與徹底地奏凱了。可以說，今後人類仍能對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保持信心，並終於會見到它們的實現者，全靠有第四國際所代表的思想在！」這年 12 月 27 日，也就是蘇聯解體兩天之後，他寫的札說：「史大林主義的制度是根本無法改良的。要代替它，只有兩條路：或者代之以真正工人民主的、國際主義的革命政權——也就是恢復列寧—托洛次基時代的革命政權；或者，恢復資本主義的統治，最後地與徹底地推翻由十月革命所造成的最後殘餘。」到了這個時候，他還在幻想「恢復列寧—托洛次基時代的革命政權」哩。不知道本書的讀者中有沒有一個兩個同意這個意見，反正我是完全不能同意這個意見的。

我注意到了：作者在 1990 年 4 月寫的《雙山回憶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版英譯普及本序》中表示：

今後的世界，無論目前正陷於分崩離析、彷徨覓路的原有的「社會主義」國家，或者表面繁榮而實則充滿矛盾的資本主義國家，要想找到真正出路，是否只有依照托派已有文件中定下的具體方案呢？我不這樣想：人事太複雜，「歷史老人」太狡黠，任何個人或任何團體制訂的方案，總得隨事變的發展而發展。

可見他完全懂得對於未來預測之難。我很欣賞這個見解。

所以我在選編本書的時候，作者寫的那許多討論第四國際綱領的文章，那些托派組織的工作計劃、工作方案之類的文章，就都不收入了。一些關於時事的評論，儘管當時看來寫得很有分量，畢竟時過境遷，也就不收入了。現在收入的都是他最重要的作品，必將傳世的作品。

作者有一部逐日寫成的《晚年札記》，生前沒有發表過。2004年香港新苗出版社少量印製，編號發放，作為紀念。我得到的是第二號這一本，即據以編在卷三第二部分。它真實地記錄了作者最後十幾年的生存狀態和心情，彌足珍貴。

出版社領導體諒我年老力衰，無力擔負許多具體的工作，特地安排了陳明慧小姐同我合作。許多工作（特別是校對）都是她做的。

2017年12月6日 朱正

作者簡介

王凡西 (1907-2002)，本名王文元，浙江海寧縣人，筆名雙山，後輩多稱為「根叔」。中國托派領袖之一，曾任中國國際主義工人黨書記。王凡西 14 歲小學畢業，開始受到五四運動的新思潮影響，決心追求學問，做大事。中學時養成對文學的熱烈愛好，也顯出了演說的才能。1925 年參加響應五卅運動，擔任杭州學生會宣傳部長。1925 年進北京大學後，參加了校內的共產黨組織。1927 年 6 月奉派武漢工作，7 月下旬去蘇聯留學。在蘇聯東方勞動大學期間接受托派思想影響，並秘密加入托派組織。1928 年秋，成為莫斯科中山大學托派秘密組織的領導人之一。1929 年 8 月回國，到上海後任中央組織部幹事，1930 年初，因托派身份被發現被開除出共產黨。



王凡西回國後，起初參加托派「我們的話」組織，後來屬於「十月」派。在四個托派組織商談統一時，王凡西開始和陳獨秀密切合作，

終於促成 1931 年的統一。王凡西當選為統一的托派組織中央委員，並擔任機關報編輯。

中國托派統一不滿一個月，大多數中委就被捕，其中包括王凡西。1931 年，王凡西被國民政府逮捕下獄。1934 年出獄，1935 年底參加新成立的托派中央臨委，創辦《鬥爭》及《火花》。1937 年 5 月再次被國民政府特務機關逮捕押去南京。抗戰開始後出獄，1937 年 12 月中旬到武漢。1938 年 2 月經香港回到上海，繼續參加托派工作。後與鄭超麟創建托派政黨中國國際主義工人黨，任該黨書記。

此後幾年間，王凡西做了大量文字工作，如擔任《動向》月刊編輯，翻譯第四國際的《過渡綱領》和《俄國革命史》等，在上海創辦《新旗》半月刊。他還把所有已經譯成中文的托洛次基論中國革命問題的文章集中起來，經過校訂，編成一冊出版。1949 年 5 月，王凡西由上海遷移到香港，幾個月後被香港政府逮捕並驅逐到澳門。

王凡西在澳門住了 25 年，繼續思考和寫作，著有《雙山回憶錄》和《毛澤東思想論稿》，譯作有《帝王術》、《詩與自傳》、《文學與革命》。1975 年 3 月移居英國，2002 年 12 月 30 日在英國里茲去世，終年 95 歲。

編者簡介

朱正，1931年生於長沙。1949年9月考入李銳先生擔任社長的新湖南報社工作。1956年在樓適夷先生擔任社長的作家出版社出版第一本書《魯迅傳略》。1957年被劃為右派，受到開除公職、勞動教養的處分。1962年解除勞動教養後以體力勞動維持生計，其間在馮雪峰、孫用兩位先生指導下寫有《魯迅回憶錄正誤》，在葉聖陶指導下寫有《魯迅手稿管窺》。1979年平反，1980年借調人民文學出版社參加新版《魯迅全集》的編注工作。其間經樓適夷先生介紹，與上海的鄭超麟和他在香港的堂弟樓子春交往，並從樓子春處得到王凡西的許多著譯。後來回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一度擔任總編輯。其間編輯出版了鄭超麟的詩集《玉尹殘集》、王凡西的翻譯小品集《書信、日記及其他》。1993年寫成一本研究反右派鬥爭的專著，1998年以《1957年的夏季》的書名在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後來用不同的書名幾次在海外出版。每一次都有一些增補和修改，最近的一版是2013年以《反右派鬥爭全史》的書名在台北秀威公司分上下冊出版。此外重要一點的學術著作，有去年在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當代學人精品·朱正卷》，討論此前



出版的《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並涉及《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以及《蘇聯歷史檔案選編》。

在編輯工作方面，為人民文學出版社做的，有1981年版《魯迅全集》第六卷的編輯，2005年版《魯迅全集》編委、第六卷編輯。《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一卷編輯。此外編有聶紺弩的詩集《散宜生詩》，並作注；還替聶紺弩編了回憶文集《腳印》、《高山仰止》，還為李銳編輯了《廬山會議實錄》。期刊方面，現在是《新文學史料》的編委。

王凡西部分著譯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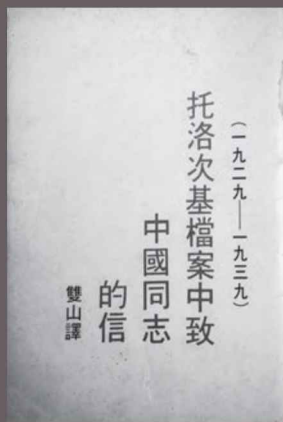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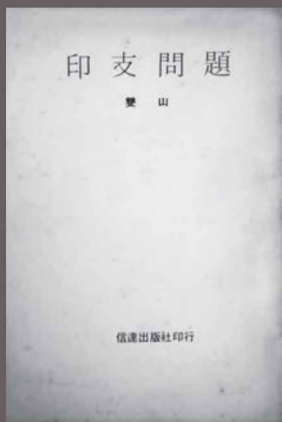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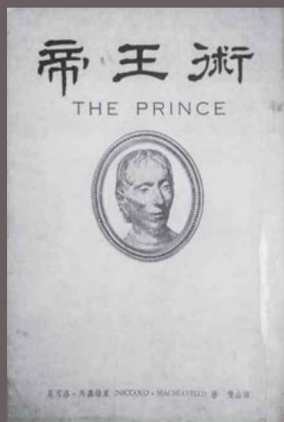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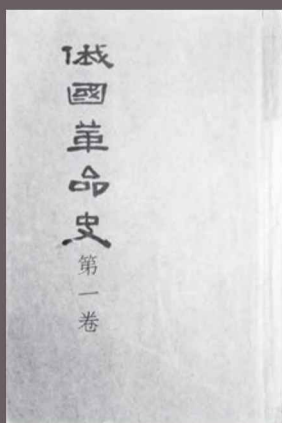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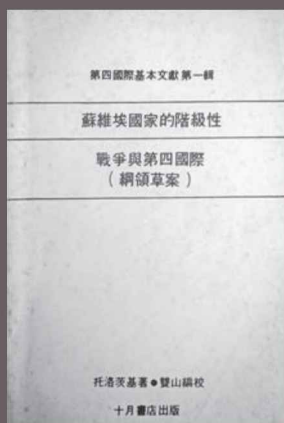
著作

書名	署名	出版者	出版年份
炮火中的世界動向	鳳崗	上海：華盛頓印刷出版 公司發行館	1939
電影漫談	雙山	香港：世界出版社	1956
《過渡綱領》二十年	王凡西	—	1958
思想問題	三山	香港	1962
三齣小戲	雙山	香港：周記行	1968
我們的意見	雙山、一丁合著	香港	1970
七零年代往何處去？第一、 四篇	耕莘	上海：春燕出版社	1972
毛澤東思想與中蘇關係	三原	香港：信達出版社	1972
論中國第三次革命中斯大林派 勝利與托派失敗的原因—— 兼答彭述之夫婦	王凡西	—	1973
毛澤東思想論稿	雙山	香港：信達出版社	1973
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雙山	香港：信達出版社	1974
雙山回憶錄	王凡西	香港：周記行	1977
印支問題	雙山	香港：信達出版社	1979
謊言與真實	王凡西、鄭超麟、 樓國華合著	香港：信達出版社	1984

譯作

書名	署名	出版者	出版年份
從唯心論到唯物論	王凡西譯 普列漢諾夫著	上海：亞東圖書館	1936
蘇聯黨獄之真相	張家駒編譯	上海：亞東圖書館	1937
恩格斯評傳	李書勳譯	上海：亞東圖書館	1940
兒子·戰士·朋友	李書勳譯 托洛茨基著	上海：亞東圖書館	1940
中國革命問題	克全編校 托洛次基著	上海：春燕出版社	1947
史大林與中國革命	雙山譯 托洛次基著	香港：國際出版社	1947
俄國革命史	王凡西、 鄭超麟合譯 托洛次基著	上海：春燕出版社	1964
帝王術	雙山譯 馬嘉維里著	香港：信達出版社	1969
詩與自傳	雙山譯 耶夫土欣可著	香港：信達出版社	1970
文學與革命	惠泉譯 托洛次基著	香港：信達出版社	1971
他們的道德與我們的道德	李書勳譯 托洛次基著	香港：信達出版社	1975
托洛次基致中國同志的信	雙山譯 托洛次基著	香港：信達出版社	1981
第四國際基本文獻新一輯 〈蘇維埃國家的階級性〉 及〈戰爭與第四國際 (綱領草案)〉	雙山編校 托洛次基著	十月書店	1983

卷三
晚年札記



第一部分 文章及譯著選

1. 中國革命中的爭論問題——托洛次基著《中國革命問題》中文本導言
2. 《帝王術》譯者序及譯後記
3. 托洛次基《文學與革命》中譯本出版小序與譯後記
4. 解嘲——《三齣小戲》（代序）
5. 伊·多伊徹《流亡的先知》與中國托洛次基主義運動——我的意見和更正
6. 托洛次基主義與中國革命——托洛次基著《中國革命問題》德文本導言
7. 《托洛次基檔案中致中國同志的信》譯者弁言
8. 致李福仁信
9. 致《十月評論》編輯部
10. 《謊言與真實》序
11. 推薦一本必讀書
12. 中越共運史的真實一頁——胡志明與中、越托派
13. 略談《悲劇》及其作者——托洛次基寫給伊羅生的九封信（1935-1938年）譯者序
14. 評《中國托派史》
15. 「走你的路，讓別人去說吧！」——《陳獨秀最後論文與書信》英譯本前言
16. 陳獨秀散記
17. 記汪孟鄒先生
18. 悼念彭述之
19. 從魯迅的一封信，談到陳其昌這個人
20. 胡風遺著讀後感
21. 談王實味與「王實味問題」
22. 〈王實味與野百合花〉讀後感
23. 王實味冤案平反的餘波
24. 悼靜貞
25. 懷念宋雲彬與許志行
26. 悼李福仁
27. 悼念中國托洛次基主義者樓國華
28. 悼鄭超麟

1. 中國革命中的爭論問題

托洛次基著《中國革命問題》中文本導言

中國革命與俄國共產主義者

所謂中國革命問題，主要乃是指 1925-1927 年中國革命過程中所發生過的問題，革命失敗後所曾發生的問題，以及關於中國革命性質及其前途的一些基本問題。大家知道，中國發生那次革命的時候，中國底工人階級與中國共產黨起了極大作用。而中國共產黨則是第三國際底一個支部，是受命於當時這個國際革命底總參謀部的。大家又知道，目前當權的國民黨，在那次革命之前，更正確些說，在民國十三年改組之前，是沒有力量的，只是一個上層官僚與政客底集團。它之擁有力量，以及它後來之霸佔政權，都全部或一部由於共產國際與蘇聯底幫助。因此，那次中國革命所發生的一切問題，差不多全與莫斯科底共產主義者有關，而為他們所討論。

共產國際與蘇聯之援助中國革命是應該的，是分內的。這是一個無產階級業已勝利的國家，對正在革命國家底無產階級之應盡的責任。除了帝國主義與反動的國家主義者外，沒有一個人會說此種革命援助便是「干涉」了中國內政。所以問題不在於這援助與「干涉」底

編按：本文原為 1947 年初版《中國革命問題》的「校譯者序言」，為使讀者容易了解當時史托之爭的癥結所在，印入《史大林與中國革命》小冊子時，改題今名。

本身，而在於如何援助與怎樣的援助。同時問題也不在於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之領導本身，而在於這領導是正確還是錯誤。

做了這點必要的聲明之後，我們可以進而談所爭論的問題了。

在那時候，蘇聯共產黨與共產國際內部，對於中國革命問題，隨着事變底進展與問題之提出分成了二派。一派以史大林為首，另一派則由托洛次基領導。史托二人當時都是蘇聯共產黨政治局委員兼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不過當1925年前後，因蘇聯內外局勢右傾結果，偏右的史大林派顯然佔了優勢，所以史大林一系關於中國問題的主張，便成為共產國際底正式路線，成為中國革命底指導方針了。托洛次基不同意這個意見，在許多重要問題上都提出了不同主張；但均以少數而被否決，不能見諸實行，甚至不能公諸報章。最後，中國革命被史大林底路線所斷送，事實反證了托洛次基底正確。照理說，主張正確的人應該可以勝利了；但實際階級鬥爭底行程卻是違反着理論思考的，中國革命底失敗加速了世界局勢底右傾，這右傾則幫助了史大林底右派，使它摧殘了托洛次基底左派反對派組織。托洛次基和他成千成萬的同志被開除，放逐，幽禁，槍殺，他的思想更被壓制與誣蔑了。

在中國革命完全失敗之後，托洛次基一派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見解才為中國底一些革命者所知道。根據着在中國實際從事革命的經驗，中國許多共產主義者，包括第二次革命底領袖人物陳獨秀在內，認識了這個理論，完全同意了它，並且在中國共產黨內形成了一個左派反對派，後來成為「中國共產主義同盟」。

究竟托洛次基底見解比之於史大林底路線有什麼不同，它的正確究竟在哪裏，那末現在事後研讀這些文章，是很容易判別出來的。不過現在我們印出這些文章來，重要的當然還不在於判別過去的是非，

而在於從這些是非中得出教訓，以便正確了解中國革命問題底本質，復由此了解以保證中國未來革命底勝利。

為了讀者較易把握文中所論的問題起見，我們在這裏按照時間先後，將各個重要問題先行敘述一下。

我們可以把問題分成三類：——（1）革命時期；（2）反革命時期；（3）關於革命性質與前途的。

革命時期底爭論問題

革命時期爭論的問題，主要有如下四個：

一、無產階級政黨底絕對獨立問題。這是最早發生的一個問題。這問題在中國發生時所採取的具體形式，便是共產黨是否應該加入國民黨。俄國共產主義者在 1923 年就開始爭論了這個問題。當時史大林一系贊成加入國民黨，理由是：國民黨是群眾組織，是各階級底聯盟，所以共產黨可以與應該加入進去，以便爭取群眾，爭取領導，同時與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共同進行國民革命。托洛次基堅決反對加入國民黨。他認為，國民黨不是一個普通的什麼群眾組織，而是一個資產階級政黨，共產黨在任何條件之下都不能加入一個資產階級政黨，更不能服從其紀律，信仰其主義。為了爭取群眾，為要保證對全體革命群眾的領導權，更為要保證革命勝利及其有利於社會主義方向的發展，則共產黨必須在組織上與思想上絕對獨立。

托洛次基這立場未能在 1923 年被採納，中國共產黨加入了國民黨。1925 年他提議退出，遭否決。1926 年 3 月 20 日蔣介石廣州政變後他再提議退出，仍遭否決。中經 1927 年 4 月 12 日上海屠殺，再經

武漢國民黨之屠殺工農與7月間之正式清共，事實上已經沒有任何一派國民黨可以讓共產黨「加入」了，而史大林還是不肯放棄青天白日旗。直到1927年12月廣州暴動之前不久，才算確定地認為加入國民黨已經不可能了。

在「聯合反對派」時期底文件中，托洛次基並不說加入國民黨是原則上的錯誤。他只是說，應該立即退出國民黨，因為那時的情勢已不容共產黨再在國民黨內了。此種說法是他對齊諾維也夫派的一個讓步。他事後承認，這一讓步曾是錯的。據他的本意，共產黨不管在什麼時候都不該加入其他階級領導的政黨。

二、帝國主義與資產階級問題。這問題是以如下方式提出來的：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壓迫究竟加緊了中國底階級鬥爭呢，還是消滅了它，或者至少緩和了它？據史林一系底見解，帝國主義底壓迫使中國內部的階級鬥爭減少到最小限度。因為從資產階級起一直到無產階級，都受着帝國主義底壓迫，所以為要反對這個壓迫，史大林以為中國底資產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農民與工人階級可以結成一個「四階級聯盟」，採取國民黨形式。由此，他更得到一個結論：中國資產階級除了一小部分與帝國主義直接勾結的買辦之外，乃是與帝國主義對立的民族資產階級，這個階級是革命的，而且能領導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北洋軍閥的革命的。

托洛次基猛烈地反對這個立場。他認為「以為帝國主義機械似地從外面焊合了中國底一切階級，那是大錯特錯。……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鬥爭，不會減弱，但會增強諸階級底政治分化。帝國主義是中國內部關係中一個很強的力量。這個力量底主要來源，……是外國資本

與本國資產階級間的經濟與政治的聯繫。」至於「民族」資產階級，則據托洛次基意見，與買辦資產階級之間「無鴻溝之隔」。他說：

「這兩部分資產階級之間，比資產階級與工農之間，要無比地更接近些。資產階級之參加民族戰爭，有如內部的制動機，他們以繼長增高的仇恨看待工農群眾，愈來愈準備和帝國主義者妥協了。」所以他特別提出列寧底話作為警告：「工人們必須叫民眾對資產階級政客底欺騙睜開眼睛，必須教他們不要信任空話，而只要信賴他們自己的力量，他們自己的組織，他們自己的團結，他們自己的武裝。」他特別反對史大林認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能夠領導革命的那種說法。

中國上次革命特別明顯地證出了這二種意見底誰是誰非，一連串的「民族」資產階級底屠殺工農打破了史大林底神話；可是史大林一黨直到今天還不曾由此獲得教訓，直到今天還以為「民族」資產階級是反帝國主義與反封建的，因此是革命的，甚至可以和工農聯合起來「領導」革命的！

第三、小資產階級與農民問題。這就是：無產階級政黨對於中國社會中數量最大分子最雜的中間階層，應該採取怎樣態度。史大林派以階級合作政策去迎合小資產階級底上層領袖，去聯絡鄉村中的上層分子，特別是拉攏一些知識分子。他們以對汪精衛、鄧演達、宋慶齡等人的勾搭，代替了爭取廣大中間階層的革命責任。托洛次基反對這個路線。他認為這問題「對於中國及東方各國有極重大的意義」，而史大林一系對此問題所採取的卻是門雪維克態度。他說：「我們反對派說無產階級應與小資產階級有革命的聯盟，我們所指的是被壓迫階級底幾千萬幾萬萬的城市的與農村的貧民。」要締結這樣的聯盟，那末當

然，不能通過階級合作，而必須是工人階級領導城市與鄉村的廣大貧民，從事最徹底的階級鬥爭與土地革命。

中國史大林派在這問題上也不曾學習到什麼，他今天施之於民主同盟的政策，也還是昨天施之於汪精衛「左派」國民黨的政策。

第四、蘇維埃問題。托洛次基派依據着俄國兩次革命底經驗，當1926年北伐軍進入湖南，引起了無疑的革命進潮之時，就提議在中國開始組織蘇維埃，藉以匯合蜂擁而分散的諸股革命力量，藉以統一下層的鬥爭群眾，更藉此以實現由無產階級領導的真正反帝國主義與反封建的統一戰線，由此防止軍人，「民族」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領袖們底反叛。史大林派竭力反對這個提議，理由是（1）蘇維埃將破壞對資產階級的聯合戰線；（2）將予帝國主義者及反動派以反對中國革命的新理由，說中國革命是俄國革命之「人工移植」；（3）蘇維埃只是暴動機關，只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底機關；（4）中國國民黨已經是實際上的蘇維埃。

這些理由之不足恃，為歷史事實或史大林自己的行為所駁斥了。沒有蘇維埃，資產階級仍舊一再地破壞了聯合戰線；沒有蘇維埃，帝國主義者一樣在說中國革命是從莫斯科輸入的；說蘇維埃只能在暴動前夕建立，那末1905和1917年底俄國蘇維埃，都是在革命進潮底初期就建立了的，只有經過相當時期的群眾鬥爭，蘇維埃業已在群眾中有了信仰，才能談得上領導暴動，廣州蘇維埃正因為是在「暴動前夕」建立起來的，所以不能保證暴動底勝利；至於說蘇維埃只能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底機關，那末當1927年12月11日廣州暴動以後，史大林在中國提出了蘇維埃，卻仍宣佈中國革命是民主性的，就已打了自己的嘴巴了。最後，究竟國民黨是否可以代替蘇維埃，則歷史已證

明得太清楚：一個由資產階級控制的政黨，和由被削階級全體選舉的因而反對資產階級的蘇維埃之間，是沒有共同之點的，結果也已經證明了這個不同作用了。

這四個爭論問題決定了中國上次革命底命運。現在，你們如果記起那時革命底實際發展，再如果你們因為年青，沒有經過當時的事變，那你們可以同時研究這一段時間的中國史，最好拿美國人伊羅生所著的《中國革命的悲劇》來參閱，那末你們就會清楚，史大林派表現在這四個問題上的見解，最有力地幫助了中國資產階級國民黨反動派底勝利，幫助了帝國主義統治底重趨穩定，幫助了中國共產黨之被摧殘與工農大眾之被屠殺。反之，托洛次基底意見，都是及時與先提出來的，如果能夠實行，那末即使不能保證勝利，則至少能防止如此悲劇之發生的！

托洛次基和史大林的爭論，雖然表現在這四個不同的具體問題上，而實際只是兩條路線底衝突。革命的階級鬥路線爭對抗着妥協的或投降的階級合作路線。無論在哪一個問題上，都不過是這兩個路線底表現罷了。為什麼階級合作底路線促成了革命底悲慘失敗呢？還原到最後來說，那是因為在階級社會中，尤其在資本主義關係的階級社會中，階級合作與實際的社會發展不相符，尤其與革命時期的階級關係不相符。誰主張階級合作，誰實行階級合作，誰就被階級鬥爭所碾倒，所壓碎。在資本主義關係佔優勢的社會裏，一切種類的階級合作政策，都只能有利於資產階級，幫助資產階級實行欺騙。

史大林底階級合作路線斷送了中國底一次革命，革命失敗卻沒有完結了史大林派底錯誤政策，它發展着，延長着，加深着，藉以準備斷送未來的中國革命。這時托洛次基根據了中國無產階級以無量數的

血換來的經驗，做出了總結，展望着前途，並且將這個不變的階級鬥爭底革命路線，靈活地應用到新的改變了的反革命局勢中。

反革命時期的爭論問題

反革命時期兩條路線又在好幾個具體問題上表現出來，這回主要是圍繞着下述幾個問題：

第一個爭論問題，是關於革命局勢的估量。如上所述，史大林主要表現於那四個問題上的錯誤路線，將那開始於1925年的有利的革命局勢逐一斷送，一直斷送到1927年秋天，由汪精衛領導的武漢政府也鎮壓與槍殺共產黨員與工人的時候。那時全國工人階級都陷於組織上潰散，政治上迷惘與精神上沮喪之境了。工人階級是革命底主力。主力如此，則革命之業已過去乃是一個既定事實。一個無產階級底革命黨應該全憑這一個事實來判斷局勢，由此得出適應於新局勢的正確政策。可是我們知道，史大林與當時布哈林底路線並非緊依於階級立場的。它是階級合作的，因而是超階級的。在他們看來，革命既不是以工人為主力，則工人階級之被擊潰，他們之退出政治舞台，並不能決定局勢之轉換。如果「四階級聯盟」中的資產階級確定地站在反革命方面，工人階級一時退出了戰鬥，那末只叫其中的農民還在戰鬥中，則革命並未過去，非但未曾過去，而且是轉入「更高階段」了。

托洛次基主要根據於中國工人階級全部被打敗這個事實，在1927年秋天就宣佈了中國第二次革命業已失敗，反革命已經奏凱，今後中國將經歷一個反革命時期。中國資產階級的反革命勝利，完全不等於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勝利。沒有一個民主任務是被解決了的。所以新革命不可避免。但這革命將在何時到來，當時還無法預言，當

前與以後的一個時間，將是反革命統治底形勢。托洛次基認為一個革命黨底「最大任務是要曉得如何及時地認識一個革命局勢，與如何徹底地利用它。但同樣重要的，是要懂得，什麼時候這個局勢完結了，以及就政治觀點看，變成了非革命的局勢了。」他說：「再沒有比打架完結之後拿出拳頭來更為沒出息的與無聯的了。」不過光是「沒出息與無聊」倒也罷了；在實際的階級鬥爭中，此種事後揮拳底政策，還要加深反革命，徹底毀滅革命後倖存的一切殘餘力量的。

史大林與布哈林底政策正是「事後揮拳」底勾當，而結果也確乎不但「無聊」而已。這二位戰略家將一次過去革命底尾巴當作了另一次新起革命底頭，由此確定了暴動路線，希望依靠在由革命餘波所激起的農民身上，單憑軍事行動，可以造成大革命，保證革命勝利。結果，果然又大量地流了中國革命者底血，延緩了第三次真實革命底到來。

究竟中國上次革命於何時完結？反革命得勢開始於哪一年頭？到現在已不再是爭論問題。歷史表明得太清楚了，連史大林派自己也不得不事後承認，革命確是在 1927 年完結的。但由此錯誤估量所發生的錯誤行動，其後果卻延長頗久，甚至直至今今。

第二個爭論問題與第一個有密切聯繫。這是對當時局勢所應提出的中心政治口號問題。史大林派認革命失敗為「革命底更高階段」，後來又說它處於「兩個浪濤之間」，根據這認識，決定了暴動路線，於是極自然地將蘇維埃口號作為主要的戰鬥口號。反之，托洛次基派，既然認定中國已處於「兩個革命底中間時期」，那當然談不到武裝暴動，也談不上蘇維埃，因為蘇維埃雖然不如史大林所說，只是「暴動機關」，但無論如何，它總是要在明顯的革命進潮時期，才能開始組織

的，並且組織之後，如果不能在相當時期以內走向暴動，也總是無法長期存在的。因此，據托洛次基意見，中國共產黨當時應該提「平等直接無記名普選的全權制憲會議」，亦即國民會議，作為我們在新局勢中從事鬥爭的中心口號。為什麼要提出這口號呢？他的理由是：（1）客觀的，未解決的民主任務，以及中國底階級矛盾，在反革命時期，勢必企圖從議會制的方式表現出來；（2）主觀的，共產黨只有在國民會議及其全部民主要求底基礎上，可以重新團結自己，與群眾重新接觸，吸引工人階級重上政治舞台，並使自己成為全國反國民黨軍事獨裁的諸般力量底領袖，由此可以重新走上革命之路。

史大林派罵托洛次基這一路線為「取消主義」。他們堅決拒絕了國民會議口號。他們為了要在任何條件之下實行武裝暴動奪取政權，寧可放棄一切與工人階級及城市其他部分民眾的接近機會，寧可放棄領導一切反國民黨的政治鬥爭的可能，愈深愈遠地跑進了鄉間，從事於「山上蘇維埃」與農民「紅軍」底建立。如此活動了有十年之久，結果是失敗了。「蘇維埃」運動失敗後的中共政策，不但如托洛次基在1931年所預言：「中國史大林主義者那時一定跟在這些小資產階級民主政黨之尾巴後面，將民主口號加以非革命的和妥協的解釋。」而且是索性跪在大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底腳跟前，將民主不是當作革命口號與要求，而是作為「共產黨」革命底目標與理想了。

第三個爭論問題，乃是關於農民底革命作用。這自然是從上面一貫接下來的。既認為工人階級之退出戰鬥並不等於革命局勢之消逝，而且相反，它表示了革命之「更加高漲」；同時，既然以反革命局勢為革命局勢，閉起眼睛從事武裝暴動，建立蘇維埃，那末，除了將農民當作革命主力之外，便沒有其他道路。

史大林派認為農民可以代替工人，並且可以代替無產階級去組織紅軍與建立蘇維埃，成為共產主義革命底主要實行者。托洛次基堅決反對這種意見。當史大林派說，中國業已組織了「紅軍」並建立了「蘇維埃」政府的時候，托洛次基說，「根本沒有這回事」。他說：「農民，甚至最革命的農民，是不能夠創立獨立的政府的。農民只能贊助別的階級，即統治城市的階級底政府。在一切緊要關頭，農民不是跟着資產階級走，便是跟着無產階級走。……蘇維埃乃是反對資產階級的工人階級之政權機關，這就是說，農民不能夠依靠自己力量來創立蘇維埃政府，對於軍隊也是如此。農民在中國俄國及其他國家曾經不止一次地創立了游擊隊，這些游擊隊作戰時候是異常勇敢而頑強的，但這只是游擊隊而已，只有定着於一部分而不能擔負大規模的集中戰略行動的，必須等到無產階級統治了國內諸重要的工業和政治中心，然後才有必要的前提以組織紅軍以及建立蘇維埃制度於鄉村裏面。」因此，托洛次基雖然在中國「紅軍」與「蘇維埃」運動中看出了中國農村問題底深刻，蘊藏於中國農民群眾中的偉大的革命力，他而且承認此種農民暴動底發展「無疑可以推動工業中心底政治鬥爭活躍起來」，但他還是堅決地告訴中國共產主義者說：「共產黨員底任務乃在於集中力量於工廠、作場、工人區域，向工人解釋鄉村事變底意義，提高疲累者和消沉者底精神，並在為經濟要求為民主口號並為土地革命而鬥爭將他們團結起來，唯有走上這條道路，即唯有經過工人底覺醒和團結，共產黨才能夠成為農民暴動底，即整個農民革命底領袖。」

史大林派底中國共產黨自然聽不進這種馬克思主義的忠言。他們將整個力量投進了農民暴動，脫離了城市，脫離了工人階級，以致自身角落成小資產階級農民意黨，同時它所領導的「紅軍」終於不得不

被改編成「八路軍」，「蘇維埃」招牌不得不拿下來，換成了三民主義的「邊區」，以及後來的「解放區」。

到今天，史大林派在再燃的內戰烽火中，實際上還是迷戀於「農民革命」底路線，甚至是愈迷愈深了。其實呢，單憑着農民力量——何況又是不堅決地依靠在貧農身上的——不僅無法革命，即使軍事勝利也是不能取得的。不在城市無產階級中尋找革命主力，繼續妄想藉農民之力實行多階級的「聯合政府」，這路線是命定着中國史大林派在政治與軍事上之毫無出路的。

第四個不同意見表現於對抗日戰爭的態度上。史大林派表面上似乎採取了最革命的階級鬥爭政策，而實則它是根本脫離了階級立場，即根本離開了工人階級及其鬥爭。這路線是沒有出路的，結果是確實被證明為沒有出路了。「長征」以後，在貧瘠與十分落後的陝北高原上，中國共產黨連在江西時代底土地革命政策也無法保持了，於是乘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略底機會，索性回復到它一貫的在革命時代執行過的公開的階級合作路上去。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底藉口之下，中國共產黨乾脆對國民黨政府投降了：信仰三民主義，擁護國民政府與蔣介石，取消「紅軍」名義，取消「蘇維埃」，完全放棄階級鬥爭，公開聲明「共產主義革命不適於目前中國」，共產黨聲明要為中國底「資本主義發展而鬥爭」。總之，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與全民聯合底理由之下，拋棄了一切使共產黨所以為共產黨的言與行，實行了比1925-27年史大林所曾實行過的更無恥的機會主義路線。托洛次基當然絕不同意這個路線。他說：「中國共產黨現在像在1924年至1925年一樣，又在猛烈地努力把中國工人階級運動在政治上交給蔣介石與國民黨。這是一件更可怕的罪惡，因為這是第二次犯這種罪惡。」據托洛次基底意見，中國底抗日戰爭，即使是在蔣介石底指揮之下進行，

但還是「正義的戰爭」。因為日本是帝國主義國家，中國則是殖民地，二者作戰的主要意義，乃是殖民地民眾之打擊帝國主義。所以他認為，中國底一切工人組織，乃至中國底托洛次基主義者，必須積極參加這個戰爭。但必須在一個嚴格的條件之下，即「不放棄自己的政綱和政治的獨立」。托洛次基底這一政策，後來更詳細地說明於《與李福仁談話》及《致里維拉的信》中，他在那裏說：

無產階級先鋒隊，在戰爭時期，與資產階級仍立於不可調和的對立地位。先鋒隊的任務在於：根據於戰爭經驗，將工人團集在革命先鋒隊周圍，將農民團集在工人周圍，以此準備真正的工農政府，即領導着數百萬農民的無產階級專政。

又說：

但是蔣介石能夠保障勝利嗎？我不信他能夠。但是他開始戰爭，今天又是他指揮戰爭。要能代替他，就必須在無產階級中和軍隊中獲得決定性的影響；要獲得這個影響，就不應當懸掛在空中，而應當置身於這個戰爭底基礎上。應當在抵抗外故侵略的軍事鬥爭和反對國內懦弱、衰頹及背叛的政治鬥爭中獲得影響和威望。到了我們不能預先確定的某一階段上，這個政治的反對可以而且應當轉變為武裝鬥爭，因為國內戰爭，與一般戰爭一樣，不是別的，正是政治底延長。

托洛次基對抗日戰爭的態度，在這兩段話裏說得很明白：參加戰爭，堅持政綱與政治獨立，繼續階級鬥爭，由此團集工人，兵士與農民，以便在「不能確定的某一階段上」進行革命，推翻國民黨政府，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此路線十分完全地規定於第四國際書記部對中日戰爭的決議中）這與史大林派底路線是完全不同的，因為後者底方向

是：國內和平，階級合作，以幫助國民黨爭取勝利為第一義。這誠如托洛次基所說，「又將中國共產黨置於蔣介石差遣之下，以此消滅了中國無產階級底革命創意力。」因之又誠如他所慨嘆：「這次戰爭將滿三個年頭了。倘若中國是以一個真正的人民戰爭來作戰，立足於土地革命之上，以其火焰燃燒着日本兵士，本可以造成日本一個真正大災禍而結束的。」但因為克里姆林宮與國民黨政府的合作，使托洛次基底革命政策無法實現，結果便成了今日中國底「慘勝」，乃至「慘勝」以來更慘的內戰與種種災難！

階級政策與戰爭

上面我們約略地，按照發生的時間次序，敘述了史大林派與托洛次基派在將近二十年中，對於中國革命問題所執持的兩種對立路線。自然我們描寫得極簡約，而且相當圖式化，不過我們不想寫得更多，因為我們的目的只是要使讀者在閱讀這本大書（按：指《中國革命問題》）之前，對中國革命問題先有一個簡單的輪廓，因此在研讀之際，能收事半功倍之效罷了。

我們說過，在這些具體問題上表現出來的爭論，看似五花八門，但歸根結蒂只是兩個思想底鬥爭，即階級鬥爭與階級合作這兩個思想在鬥爭。關於這一點，托洛次基自己說得最好，他說：

「布爾雪維克主義本質，乃是無產階級底階級政策，唯有這個政策能使十月間奪得政權。在其歷史底全過程中。布爾雪維克主義都是毫不妥協地反對那與資產階級合作政策的。布爾雪維克主義與門雪維克主義之根本衝突就在此處。而且，布爾雪維克主義和門雪維克主義未

曾產生以前，工人運動內部的鬥爭，最後分析起來，也是圍繞着這個中心問題的：與資產階級合作呢，還是不妥協的階級鬥爭？」

史大林派與托洛次基派在中國問題上的爭論，尤其是圍繞着這個中心問題。在革命時期的四個問題上，情形很清楚，史大林底機會主義路線徹底實行了階級合作。在反革命時期的前三個問題上，表面看，彷彿不然，因為史大林看見了「不斷的直接革命形勢」，「提出蘇維埃」，「領導土地革命」，「實行暴動」；這一些，彷彿都是極左的，極徹底的階級鬥爭，其實，正如我們在上面分析過的，這是脫離了無產階級底階級立場而採取的小資產階級底冒險政策。脫離無產階級階級立場的冒險主義，與叛離無產階級利益的機會主義，在本質上是一樣的，因為二者都違反着「無產階級底階級政策」。現在事實也證明得太清楚了，史大林派自1927年末期開始的盲動冒險主義，只不過繞了十年的彎曲道路，以便最後回返到更露骨的機會主義。抗戰問題結束了史大林派多年虛偽的激烈主義，這也不是偶然的。因為如歷史屢次所昭示，戰爭乃是每一政黨政策之無情的考驗。只有最堅定的革命者及其政黨才能經得起這個考驗。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完全暴露了它「資本主義」的本質，反之，中國托洛次基派，則藉此戰爭而更加表現了它的階級政策底堅定。

在史大林派與托洛次基派之間，這問題分歧至顯，是非甚明，無需我們多費筆墨。不過關於抗日戰爭的另一種爭論，形式上發生於托派內部，實質上仍關於史托之爭的，我們不得不略加提及，由此可以更充分明瞭托洛次基底階級政策。

爭論發生，由於對托洛次基立場的不同解釋。托洛次基底立場包含着兩個方面。一方面聲明戰爭是「正義的」，所以要參加戰爭，另一

方面斷定資產階級底領導不能保證勝利，故須在這戰爭中引起革命，推翻國民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托洛次基這個立場，在馬克思主義派底對戰爭態度上是全新的。過去，根據馬克思主義派底傳統見解，戰爭就其歷史意義，其目的及其作戰國家底政制等等不同，可分作進步的與反動的。我們擁護進步戰爭，反對反動戰爭。擁護乃助其勝利之意，反對則使其停止或促其失敗之謂。在進步戰爭中，工人政黨對於異階級領導者底失策，通常以「建設性」的批評為止；而對於反動戰爭則繼續進行階級鬥爭，甚至引起革命，以便推翻戰爭底領導者。革命政策從來不曾應用於進步戰爭之領導者的。列寧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首先提出了一個新的戰略，即欲乘統治者對外戰爭之機，變外戰為內戰，實行革命；這也是根據於帝國主義戰爭之普遍反動性這個前提。至於說革命者在進步的或正義的戰爭中，應該徹底繼續階級鬥爭，甚至在可能時候，變「政治的反對為武裝的鬥爭」，而變外戰為內戰，藉以推翻領導者，建立革命政權，則自托洛次基始。

托洛次基這立場是否違反了馬克思主義？即是否正確呢？我們認為是正確的，而且是馬克思主義對戰爭態度之邏輯的發展。托洛次基比列寧又前進了一步。他主張在進步的正義戰爭中也應該實行革命以推翻其統治者了。為什麼會前進這一步？這當然是由於客觀的原因。自從列寧逝世到現在，世界底帝國主義統治是更徹底了，更成熟也更腐敗了，同時，世界革命，尤其是落後國家底革命，其階級關係也十分清楚與確定了。二十餘年來的世界歷史，不管它是充滿了血與淚，不管它記下了多少次革命底失敗與悲劇，但至少有一點已三番四次地告訴了馬克思主義者：社會主義性的革命在全世界成熟了，至少，無產階級專政在全世界成熟了。先進國不必說，就是在落後國中，為要解決一些民族的與民主的任務，都必須靠無產階級專政了。這教訓

向全世界無產階級提出了要求：必須儘可能地為無產階級底政權而鬥爭。正是這個要求，使托洛次基在戰爭態度上，比早死的列寧前進了一步，實際是替列寧前進了一步。

托洛次基這個全新的對戰爭態度，實質上不過是列寧向反動戰爭所施用的政策，也應用之於進步戰爭吧了。但它之屬於全新的總是無疑。對於新的政策，正如對於新的事物一樣，有許多人是不易適應的。中國托派中有一部分人便不能把握住這一新的政策底特質。有一些人，認為：既然抗戰是「正義的」戰爭，那末擁護它就是了，而且要擁護到底。只教它進行一天，不管它怎樣進行的，我們就擁護它一天。革命者底整個責任在於：不使它中途停止。由此便發生了有名的「反妥協論」與「支持到底論」。

對於這些人，托洛次基底「變政治的反對為武裝的鬥爭」，「戰爭中打倒蔣介石」，「建立工農政府」這個思想，是一分鐘都不曾存在過的。誠然，這部分人有時也喊着「轉變應戰為革命的抗戰」，但此口號之意絕不是要以革命反對蔣介石，而是希望蔣介石能夠「發動」工農，使「捆縛壯丁」變成群眾「自願參戰」。這部分人完全不懂得托洛次基對中國抗日戰爭的態度是列寧對帝國主義戰爭態度的擴大與延長；他們只是抽象地憑戰爭之進步或反動的性質，而堅持着擁護或反對；他們絕不想想，這是托洛次基將列寧底「變外戰為內戰」路線在正義戰爭中之活的應用。

當然，托洛次基這一立場不等於列寧所說的「革命的失敗主義」。所以他不歡喜使用這個名詞，也反對人家使用這個名詞。因為在進步戰爭中，參加戰爭的革命者是決不能主觀希望戰爭之失敗的。而且革命底目的正為了戰爭之勝利，正為了領導者之不能保證勝利。所以托

洛次基從來不歡喜用列寧底舊名來稱呼他的政策。他的路線是要以革命爭取戰爭勝利。據他說，只有中國底工農在戰爭中興起，工人監督了生產，農民獲得了土地，才能使日本帝國主義底兵士因為感染革命而瓦解，因此使中國得到勝利。這說法，自然是千真萬確的。革命熱力乃是一個較弱國家底唯一武器，足以打敗軍力上較強的國家。可是此種革命的勝利主義，如想徹底地實行，則首先必須讓無產階級政黨底幹部分子，在列寧對戰爭政策底這一極端精神中，受一番教育。因為革命以及革命政權固然是保障民族解放的唯一辦法，但誰能否認，在革命過程中，客觀上有可能導致前線軍事之一時逆轉呢？只有事先能料到此種逆轉可能的人，才能有足夠的魄力去實行「革命的勝利主義」到底。否則，他會驚而卻步的。在此意義中（對中日戰爭言則僅僅在此意義中），列寧這一徹底說法實在是革命的勝利主義底一個條件。換句更加明白的話說，如果你的態度是：要在統治階級底對外戰爭中繼續階級鬥爭，繼續政治反對，並且在可能時機，要轉變此反對為革命，為武裝的鬥爭，以便改換戰爭底腐敗領導，建立工農政府，藉以保證民族解放戰爭底勝利，那末對於革命可能及於戰爭的影響，你心中必先明白認識兩種情形：一，正因為沒有革命，前線才不斷失敗，群眾底革命覺醒反而挽救了失敗，這是好的；二，如果一時不及挽救，或竟加深了它，則也沒有什麼關係，只教革命發展與成功，定能補償這點失敗。

托洛次基自己沒有把這話說完，但是問題很明白，托洛次基決不會將階級鬥爭與革命底利益從屬於軍事利益的。中國托派中的另一部分人，便是堅持了托洛次基底這一立場。

現在抗戰過去。托洛次基這個革命絡線沒有實現。革命沒有能在戰爭中起來，中國工農沒有能在戰爭中推翻資產階級與地主底統治而

建立自己的政權。結果，戰爭實際上是慘敗了。中國更被奴役了，民眾更悲慘了。為什麼會造成這結果呢？史大林派底階級合作路線自然是主因，而中國托派內部一些「支持到底論」者底立場，也不無相當促成之功。戰爭過去了，但教訓長。托洛次基在中日戰爭中所徹底發揮的階級路線，是值得我們鄭重研究與接受的。

為了充分起見，我們在這裏還要提起一個與中日戰爭相關的問題，曾經在中國的，乃至在國際的托洛次基主義者中爭論過的。當中日戰爭發生之初，問題很清楚，這是一個半殖民地國家抵抗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爭，因此，凡是接受列寧關於殖民地立場的馬克思主義者，都承認中國方面的戰爭是進步的，正義的。我們應該把同情與援助寄放在中國一邊。為了少數人不承認這點進步意義，托洛次基在《致里維拉的信》以及其他文字中曾加以斥責的。在這時候，誠如托洛次基所指出，我們進行階級政策的基礎與藉口，「絕不因為蔣介石進行戰爭，而是因為他進行戰爭得不好，沒有用充分精力，不信任民眾尤其工人。」可是到後來，中國方面的戰爭因史大林黨與蔣介石的妥協而未能轉變成革命，因而未能勝利，而帝國主義的世界大戰卻爆發了，並且蔓延到中國來了。這時候，無論在軍事與政治上說。中國方面的戰爭都主要地變成為帝國主義戰爭，即美帝國主義反對日帝國主義的戰爭之一部分了。這時候，有一部分托洛次基主義者（托洛次基本人不幸已經被史大林所派的兇手殺死了），認為中國底抗日戰爭已經變了質，已經由奴隸反對主人的鬥爭，變成為奴隸幫一個主人反對另一個主人的戰爭，因此已經由正義的變成不義的，進步的變成反動的了。從此以後，我們進行階級政策的基礎與藉口，應該是反對蔣介石進行幫兇戰爭，而不再是因為他「進行戰爭得不好了」。

另一些托洛次基主義者認為中國反日戰爭之進步性，「初不因它之被糾纏進帝國主義戰爭而有所改變」，據這些人說，只教中國是半殖民地一天，則不管它與美國帝國主義如何糾纏，如何勾結，而它之反日戰爭總是進步的，因此，始終值得我們擁護的。

這後一部分人底意見自然錯了。一個落後貧弱的殖民地國家底民族解放戰爭，合併進帝國主義戰爭之後，彷彿還能自由實現其戰爭目的的！事實上絕不可能。因此，在1914年，當塞爾維亞底對奧戰爭一與帝國主義戰爭相糾纏，列寧便不再說它進步。當1940年，一方面挪威底民主政府和另一方面挪威底納粹政府作戰時，因為各自結托於英國帝國主義與德國帝國主義底大戰，所以托洛次基便認為不能與西班牙底內戰相提並論。這些史例是太清楚了，它們很清楚地證明着：中國底抗日戰爭一旦與美國帝國主義底反日戰爭相結合，便不再是進步了。

現在，我們事後回顧這個爭論，那末連瞎子也會明白：國民黨以幫兇資格進行戰爭的結果，給中國招來的是災難而非幸福，是奴屬而非解放。脫離了無產階級底利益，甚至不顧一般大眾底實際利益，只是空洞地憑着什麼「殖民地地位」與「民眾族利益」而贊助資產階級底戰爭到底，結果只能是造成目前那樣的帝國主義猖狂與資產階級橫行底局面。我們從此也應該得出教訓來的。

革命底前途與性質問題

到此為止，我們還只是在某些具體問題上，介紹了托洛次基關於中國革命的見解。這些見解雖然有不變的階級政策作其共同基礎，但終究還是部分的與零碎的。若要把握托洛次基最根本的思想，則我們

必須研究他對中國底前途與性質所持有的見解，亦即研究他的基本思想——不斷革命論。

首先，我們要指出，托洛次基在中國革命性質問題上的見解，是經過了一個發展的，並非前後完全一致。在聯合反對派時期，他對中國革命底前途這樣說：

中國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在現在純然是或然性，全視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之發展如何以為斷……

他又說：

首先，必須讓中國無產階級先鋒隊弄明白：中國並無任何經濟上的前提條件足以獨立地轉變到社會主義，目前在國民黨領導之下開展着的是一個資產階級的民族革命；它的後果，即使在完全勝利底條件之下，也只能在資本主義底基礎上更進一步地發展生產力。

他又說：

中國革命若一任其自己力量發展，即是說，若無蘇聯勝利的無產階級底，及一切先進國工人階級底，直接幫助，結果只能為國家爭得資本主義發展底最廣大的可能，替工人運動獲取較有利的條件吧了。

由上面這三段引文，顯然可見托洛次基認為當時的中國革命是一種資產階級的民族革命或民主革命。「即使在完全勝利底條件之下」，也不足以獨立地生長成社會主義性的。這樣的認識，與史大林派彷彿沒有什麼不同。並且在表面上，托洛次基似乎還比史大林「右」些。

因為史大林很慷慨地允諾了中國革命之「非資本主義的前途」，而托洛次基則一再聲明此種發展，「無條件地與直接地有賴於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之總進程。」不過談到如何保證這「資產階級民族革命」底勝利，並如何從中國方面保證「非資本主義的前途」時，托洛次基與史大林之間的不同便明顯地暴露出來了。史大林說：為要保證「資產階級民族革命」底勝利，必須擁護資產階級，必須締結「四階級聯盟」，必須叫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必不可以組織蘇維埃。至於如何使中國底發展有「非資本主義的前途」，則史大林沒有說過一句具體的話，除了他說，經過國民黨這個「工農民主專政」。

托洛次基底意見完全不同，他說：

只叫無產階級在民族的民主革命中起着領導作用，則另一不同的發展道路（即非資本主義前途——校譯者）能開展出來的。但是為了這，一個首先的與最起碼的前提條件，便是共產黨底完全獨立，以及共產黨揭開旗幟，為工人階級底領導權與革命底領導權進行公開鬥爭。

他又說：

不管中國經濟如何落後，一部分也正因為這個落後性，中國革命完全能使那個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工農聯盟走上政權。這個政制，將是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相結合的政治上的一環。

說無產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可以而且必須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走上政權，這便是不斷革命論。這理論是當1905年俄國革命時，托洛次基切實研究了俄國社會底特點，其階級關係及其革命性質而提出

來的。我們在上面說過，一個落後國家在帝國主義時代發生其遲晏的民主革命，不能單單是先進國民革命底重演，因為同時，而且更重要的，它將是世界革命之一部分了。此二種性質底配合，使各該國底資產階級不再能起革命作用，尤其不能起領導作用。資產階級革命必須反對資產階級的。因為農村中的階級分化，特別因為無產階級之成長與政治覺醒，使得資產階級絕不敢與絕不能為自己的「歷史使命」而革命，只能迅速地與反動勢力（這裏首先是國際帝國主義與國內落後關係）相結托，回頭來反對以無產階級為首的工農革命了。托洛次基分析了此種關係，確認了它，於是得出了結論：落後俄國底民主革命，只有靠無產階級，會合了為土地而暴動的農民，走上政權，才能完成其任務。此外種種的階級結合，都只能斷送這個革命的。托洛次基這個理論完全為十月革命所證實，因而成為帝國主義時代民主民族革命底唯一方針了。中國革命發生，托洛次基便根據了這同一理論，規定出種種革命政策，即我們在上面所曾約略敘述了的。

不過當中國革命初期，即當聯合反對派時代，托洛次基底這個見解，多半為了對齊諾維也夫派的讓步之故，並未說得十分明確，首先，他並未公然肯定唯有中國無產階級領導農民實行專政，才能解決革命任務。他在有些地方，還支持着「工農民主專政」這個老舊公式，即支持這樣公式，它認為包括農村資產階級在內的農民全體，可能與工人階級共組政權，且能完成革命。其次，他認為：即使工農聯盟走上了政權，「在過渡期間，中國革命將具有真正民主的與工農的性質。在其經濟生活中，商品資本主義的關係將不可避免地佔着優勢。政治制度底方向將首先去為群眾獲取最大一份的生產發展底果實，同時，要為群眾爭得國家資源在其政治與文化的應用上的最大一份。」換句話說，工農政府成立之後，也還不就是革命之生長為社會主義性質。

在中國革命失敗之後，研究了教訓，更分析了廣州暴動底經驗，托洛次基才把自己的意見充分發揮了。第一次——他在致潑雷奧勃拉欣斯基的信中，列舉了廣州暴動及其政府所實行的事實之後，他說：

以上種種如果是資產階級革命用的方法，那麼中國底社會主義革命是怎樣呢？是什麼別的階級來做呢？用的又是什麼不同的手段呢？我們認為：在革命底這個真實發展之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公式，「工農革命」公式，應用於這個時期的中國，於中國發展底這個階段——已經證明是一個空洞的幻構，一種無價值的東西了。

托洛次基在此地第一次宣佈中國未來革命底性質是社會主義的。作此宣佈的理由，並非是中國底「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業已完成。不，國民黨底勝利不是資產階級底革命勝利，而是資產階級底反革命勝利。中國底民族民主任務，不但沒有因這反革命勝利而解決，反而因此勝利而更艱巨了。托洛次基完全沒有忽略這一點，甚至正因為看重了這一點，所以他要確定地說：中國必須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才能解決這些任務。因為反革命的資產階級掌握了政權，與帝國主義及落後勢力勾結着，反對民族任務與民主任務之任何革命方式的解決。無產階級為了解決這些任務，則首先就得反對這個資產階級底政權，推翻它，並建立自己的專政。既然未來革命中必須建立無產階級專政，那也就是說，中國未來的革命將與俄國底十月革命一樣，要在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順帶完成民主革命了。但是為什麼無產階級專政底必要就決定革命之社會主義性質呢？因為「無產階級專政手段一開始，就要不可避免地生長為社會主義手段的。」其實，無產階級專政本身，甚至為此專政而作的鬥爭，就已經是社會主義性的了。

因此，托洛次基對於中國未來革命性質問題的研究更進一步。他不僅從做革命的動力——即無產階級，從此動力之歸趨——即無產階級專政，斷定了它的社會主義性質，並且他又從中國社會底真實性質，中國第三次革命底社會政治的前提條件：城市與鄉村中的階級矛盾，不但斷定未來革命底社會主義性，並且斷定在「一開始」就將具有此種性質的。他說：

中國沒有與資產階級對立的封建地主階級，農村中的一般的最廣泛的而且極慘酷的剝削者就是富農和高利貸者，即城市銀行資本底經紀人；所以中國底土地革命具有反封建的同時亦是反資產階級的性質。……假如貧農委員會在俄國僅在十月革命之第二時期即 1918 年中葉發生，在中國則土地革命只要一復活，貧農委員會就要採取各種方式而出現。

他又說：

外國資本在中國工業中有非常大的作用與影響，加之在防衛其強盜式侵略中，帝國主義又真接依靠它自己本國的刺刀，此種情形使工人監督生產之政綱在中國甚至比在俄國尚少真實性。直接沒收外國資本家底因而及於本國資本家底企業的事實，由於鬥爭底進程成為勢所必至，多半將在暴動勝利之翌日舉行的。

再分析一些階級鬥爭底緊張情形，托洛次基於是得出結論說：

第三次革命……將不會有一個「民主」時期，甚至像俄國十月革命以後半年的「民主」時期也不會有 1917 年 11 月—1918 年 7 月，而將被迫於一開始時就要最堅決地動搖與取消城市及農村中資產階級的財產。

這裏很明白，托洛次基認為中國第三次革命一開始，就將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所謂「一開始」，此地當然指的是革命暴動一開始，甚至是革命政權一開始。因為嚴格與狹義地說來，革命通常是指革命暴動而言的。同時革命若要充分表現其性質，則必須在革命已掌握了政權之後，由此政權所實施的政策來判斷。誠然，革命並非一開始就能暴動的，從革命底明顯進潮逐漸高漲而達於頂點——暴動，中間或長或短有着一個時距。那末在時距中，中國未來革命底性質為何？托洛次基對此問題也有一個答覆：

在第三次中國革命底第一個時期中，是否得以大為縮短的和改變的形式重演過去了的諸階段，有如扮演某種新的「全民戰線」底滑稽戲呢？這是有可能的；然而這個第一時期，大概只將足夠使中國共產黨提出其「四月大綱」，即奪取政權的綱領與策略於民眾底面前。

這裏也同樣地說得很明白：在未來中國革命底進潮一開始，「中國共產黨」（這現在自然必須改成「中國底托洛次基黨」了），就必須提出其「四月大綱」，換言之，就必須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底策略，即進行奪取政權。至於在什麼具體口號上，站在純粹民族民主的口號或社會主義的口號上進行這個鬥爭，那是另一問題。這是不能改變奪取政權這個革命之成為社會主義性的。不過我們可以而且應該事事先承認：民族民主要求在未來革命中仍將起着巨大作用，但據上面所引的分析，中國底反帝國主義與土地鬥爭既然都具有「反資產階級性質」，那末民族民主鬥爭底本身，在中國亦必然帶有社會主義性的了。因此，我們知道，中國未來革命無論就任務內容，執行主力，以及政權性質說，都將是社會主義性的；不但在暴動之後，甚至在暴動之前，當革

命進潮一開始時，不論群眾實際鬥爭底客觀趨向（反資產階級），乃至領導者底主觀的政策（走向奪取政權），都將使革命帶有社會主義的性質。

史大林主義者完全忽略了中國革命所已經歷過的階段，完全抹煞中國多年來階級鬥爭底真實經驗，所以他們在共產國際底綱領上宣佈說：中國，「只有經過了許多準備階段之後，只是在一整個時代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生長到社會主義革命的結果，」才能「過渡到無產階級專政」。這意思是說，在未來中國革命中，只能由各階級組織民主政權，解決民主任務，再經過「一整個時代」的「生長」，然後才談得到打倒資產階級的經濟措置與政治手段。

他們始終看不到中國底「民主任務」只有反對資階級底政治與經濟的統治才能解決，因之只有建立「非民主的」無產階級專政才能解決。史大林派這種認識，誠如托洛次基在二十年前所指出，「又為國民黨政策開了一個新試驗之路。」此後事情果如所料地發生了，「國民黨政策」又被大規模地試驗了一次，而且試驗又慘敗了，但人們拿起了槍在作戰的時候，仍舊洞開着這條試驗之路！史大林派今天是以「聯合政府」及「發展資本主義」底名義在與國民黨作戰了。可憐這些一心一意幻想着「中國革命資產階級」的「共產主義者」！

至於那些承認第三次革命底社會主義，承認無產階級專政底歷史必要，但否認在革命一開始便是社會主義性的人，那末事實上他們會在那時反對中國底「四月提綱」，會屈服於民主與民族底成見之下，會像俄國底瑪律托夫與但等一樣，將以「民主階段」底名義去反對工農大眾之反資產階級鬥爭的。

因此中國托洛次基主義者必須在這問題上有個明確立場：第三次中國革命將是社會主義性的，一開始時就要為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別以為是玄學的或空洞的爭辯，不，絕對不，這是有關乎中國未來革命底生死的問題！

* * *

我們到此已盡了我們的介紹任務，深入的研究乃是讀者們自己的事了。托洛次基關於中國革命的全部意見，現在是十分完整地展開在你們之前。著者在《俄國革命史》中文版序文上曾表示過一個願望：「中國前進的革命者若從這部歷史裏學得階級政策底若干基本法則，那我是很欣幸的。」我們相信現在從這部書裏，中國前進革命者一定能副著者底願望，一定能學習到許多階級政策底基本法則。

不過臨了，關於剛才講過的第三次中國革命底社會主義性質問題，還有幾句重要的話必須補足，就是：托洛次基從最初一直到最後，都不變地認為：未來中國革命底一些「社會主義手段底總命運，以及整個專政底總命運，最後分析起來，還是由世界發展過程來決定的！」托洛次基最無情地反對一種荒謬見解，認為在一個國家之內，尤其像俄國與中國那樣的落後國家內，能有足夠的經濟的與文化的條件，足以建設社會主義至於勝利。托洛次基乃是反動的「一國社會主義論」底最堅決的反對者，他一貫地認為：「中國社會主義底勝利，和蘇聯社會主義底勝利一樣，只有在世界革命勝利之條件下，才可思議。」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一定要懂得把社會主義革命在一個國家之內的成熟，與社會主義在一國之內建設成功底可能，這兩件不同的事，明白地區分出來。一國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事實的，進步的；而一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成功卻是幻想的。中國底托洛次基主義者為社會主

義革命底到來與勝利而鬥爭的時候，必須懂得勝利後的革命命運是多半依賴於世界革命之總命運的。才能不墮入反動的幻想之中，有如目前的史大林派官僚一樣，在「一國社會主義」的名義下，斷送着蘇聯底利益，更斷送了世界革命底利益。

1947年4月27日

2. 《帝王術》譯者序及譯後記

譯者序

為了讓中譯本的讀者們較易與較好地了解《帝王術》起見，我想先介紹一下著者生平，以及他所生活的時代。

一、其人及其書

尼可洛·馬嘉維里以 1469 年 5 月 3 日生於意大利的佛洛倫斯。父親是一個律師，薄有產業，屬沒落的貴族階級。

1494 年，馬氏初入政界。當時佛洛倫斯人正逐走了梅迪奇家的統治者，在宗教改革家薩伏那羅拉的領導之下，實行共和制度。馬氏在政府的所謂「第二政務處」任職。1498 年，馬氏被任為第二政務處長兼書記。這個職務他一直幹了十四年，直至 1512 年佛洛倫斯共和國被推翻為止。第二政務處的主要工作在外交方面，所以當馬嘉維里在任之時，曾經多次出外旅行，去和他國與他邦的政府接觸，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在 1502 年，他被派去見契莎雷·鮑其亞。這次外交任務留給他非常強烈的印象，他對這位當時的暴君欽佩得五體投地。1512 年梅迪奇家族賴外力之助，復辟成功。馬氏下台，被逐出佛洛倫斯。但不久因參加陰謀嫌疑被捕，受酷刑，卒被判罪投獄。1513 年 3 月梅迪奇家的卓凡尼被舉為教皇，馬氏因此獲赦。此後他便退隱於卡裏諾附近的一個農莊上，在貧困中讀書寫作，以迄於死。

他逝世於 1527 年 6 月 20 日，遺有子女數人。

* * *

《帝王術》和其他的一些著作，都是馬氏退居農莊的十四年中寫成的。馬嘉維里以《帝王術》出名，但《帝王術》卻不是他的唯一著作。除此之外，他還寫了《關於里維所著前十冊羅馬史的論說集》（簡稱《論說集》），寫了《戰爭藝術》、《佛洛倫斯史》，以及《關於語言的對話》。他還寫過兩個戲劇：《孟特拉果拉》與《克麗齊亞》。此外還有一些較短的散文作品和詩作。

因此，馬嘉維里光是以作家而論，也早被譽為文藝復興時代的名家之一。不過馬嘉維里之所以成為馬嘉維里，他之所以會受盡世人的攻擊；他的名字所以會有一個「主義」跟他聯繫到一起，而且這個「主義」一直在發生着巨大影響，卻總是由於他的政治思想家的身份，由於《帝王術》那部書，由於那部書所代表的思想。

關於《帝王術》的產生經過，歷來有不同說法。一種比較公認的說法是：自從被迫退隱到鄉間以後，馬嘉維里潛心閱讀古代希臘羅馬諸名家的作品，特別是研讀羅馬歷史家鐵圖斯·里維（Titus Livy）的著作：《羅馬史》。他一邊閱讀研究，一邊將研究的心得寫下來，做他的讀史笥記，即後來成書的《論說集》（*The Discourses*）。不過正當他寫作之時，意大利的政治形勢卻有了新的變化，梅迪奇家的勢力，因為教皇利奧十世（即梅迪奇家的卓凡尼）的竭力扶植，不但在佛洛倫斯，而且在意大利的其他某些地方，都有所滲透或鞏固。這情形，使這位熱心政治並且對意大利命運深切關懷的馬嘉維里，大大地動了心；他在當時的佛洛倫斯統治者身上看到了一個可能的理想君王，他想借他來統一當時四分五裂、小國紛爭的意大利，他想把他苦讀深思

所得的稱霸為王之術，牧民禦眾之道，寫成小書，傳授給當時的佛洛倫斯公爵，藉此以邀得官家的新寵，藉此以「王者師」的地位來代替他屈辱悲慘的退隱生活。因此，他把《論說集》的寫作計劃停止下來，把同樣的思想，卻以精簡集中的方式，先寫了《帝王術》。《帝王術》據說開始寫作於1513年7月，完成於1514年之初。書成進獻，作者的滿腔熱望卻落了空。原來這位梅迪奇家的「偉大的洛倫佐」，對於這件禮物並不領情。這是個扶不起的阿斗，他根本不需要這個諸葛亮。結果，馬嘉維里此後便不得不專心從事著述了。

二、馬嘉維里的時代

馬嘉維里生當十五世紀後期與十六世紀之初。這是歐洲文藝復興最燦爛輝煌的時候。特別在意大利，那時候人才輩出，真說得上「百家爭鳴」；學術昌明，更顯得是「百花競豔」。別的不談，單單指出那人類藝術史上光芒萬丈的三個名字：達·文奇，米開朗其羅與拉斐爾，全都出現在這兩個世紀之交，這便足夠證明意大利的這一段歷史時間，是多麼地為「靈氣」所鍾了。

為什麼歷史和文藝的「女神們」要獨鍾於這個時候的意大利呢？

因為這個時候的意大利是新時代的曙光正在那裏吐露的地方，因為那時那地新舊兩種制度正上演着你死我活的鬥爭，因為這個鬥爭正在那個時候使意大利特別陷進了最最痛苦之境。

文藝是「苦悶的象徵」。在某一意義上，學術思想全都是「苦悶的象徵」。凡是受着新時代新希望所鼓舞的苦悶，大抵是能夠產生美麗而精微的象徵的，能夠產生優秀的文藝，也能夠產生精深的思想。

證以中外古今的歷史，這簡直可以說是一條「定律」。

有人說：《帝王術》這部書是馬嘉維里「個人悲劇與意大利民族悲劇的產品，不過是在希望的精神中創造出來的」，這句話說得相當扼要而恰當。

前面我們介紹過馬嘉維里的「個人悲劇」，現在讓我們看看意大利當時的「民族悲劇」。

自從日爾曼蠻族入侵，西羅馬帝國滅亡，意大利處在封建制度之下，到那時已快近千年。不過早在數百年前，特別是打從十字軍東征開始，東西貿易漸漸發達，意大利資本主義方式的工商業已經慢慢抬頭。成為政治與經濟中心的各個城市也在那裏發展和增長起來。等得到了馬嘉維里等人出世的十五世紀後半期，新興的資本主義勢力和陳舊的封建勢力之間的衝突，特別在意大利已愈來愈激烈地展開。這個衝突一方面以從事工商業的市民為代表，另一方面以維護封建利益的貴族為代表，它們進行得非常激烈，非常殘酷。而衝突所採取的形式，也是五花八門的。或者發生於同一城市之內，或者進行於兩個或數个城市之間。或者市民實行共和，或者貴族建立專政；或者市民捧出一個君王來抑制貴族，或者貴族擁戴某一君王以鎮壓市民；或者甲城勾結某一外強以滅乙城，或者乙丙諸城邀請另一外強來對抗甲城……總之是縱橫捭闔，變幻莫測，爭戰頻仍，而民生塗炭。

那時候的意大利頗像我國的春秋戰國時代。（這也是兩種社會制度的交替時代。）小國林立，難於計數；而其中最大的有「五霸」。它們是佛洛倫斯，威尼斯，米蘭，拿不勒斯與教皇領地。這五霸互爭雄長，一方面威脅其他小邦，使為己助，另一方面則與當時歐洲的兩大強國：法蘭西與西班牙，競相結托，倚以為重。這兩隻被引入室的

狼，當然是不懷好意的。它們一心想把各小邦逐一吞食，將整個意大利歸入自己的版圖。如此錯綜複雜的政治圖謀，產生了糾纏不清的變亂和戰爭。正當馬嘉維里從事政治活動的年代裏，意大利的此種動亂達到了最最悲劇的程度。1494年——這是馬嘉維里初入政界之年——米蘭的斯福爾紮公爵邀請法軍入意；1503年，西班牙軍隊攻入意境，佔領了拿不勒斯；1505年，第三隻狼——神聖羅馬皇帝統率的日爾曼兵，為了覬覦威尼斯，也破門入室了。從此以後，「蠻人」的鐵騎到處蹂躪，本國的虎俚們又和他們狼狽為奸，終於將意大利這大好河山，將這個文藝復興的發祥之地，變成為兵連禍結，慘遭姦淫殺戮的大修羅場。在內憂外患交相煎迫之下，一切有心腸有志氣的意大利人，呼吸着新時代的氣息，緬懷着古羅馬的榮光，「思逐蠻族於城外，俾建大一統於斯土」，原是十分自然的事。所以當時意大利的文人學士，大多抱有某種民族思想與愛國思想。詩人們將它表現在詩歌裏，藝術家們將它反映在繪畫、雕刻與建築上；歷史家們「借古以諷今」，寓希望於追憶；而像馬嘉維里那樣的政治家與思想家，則將一己的抱負和見解寫成了政論與史論，特別是將這個「民族的悲劇」寫進《帝王術》中。

* * *

《帝王術》這部書，據說是四百年來形成歐洲人思想的六部大著之一。我們不知道這個斷語正確到何等程度。不過，說它是古今中外最最引起爭論、遭到攻擊最多、被人誤解與曲解最甚的一部書，大致不會錯吧。攻擊它的人說，這部書是魔王撒旦借了馬嘉維里的手寫出來的；歡喜它的人說，這是「人類智慧在政治思想方面最精深的表現」。有些人說，這是大盜的手冊，民賊的教本，它誨盜誨虐，是一切為非作歹者的辯護狀；另有一些人卻說，這是「現實政治的文法」，是人類

歷史進向科學研究的鄭重的一步，又說它如果將歷史作了病理學的探索，卻決非歷史的致病之由，毋寧是治病之端。究竟誰的看法對呢？我們暫且不表示意見。見仁見智，請讀者們自己讀了原文去作判斷吧。

* * *

最後，關於翻譯，我還得說明幾句。我們這個譯本是從英譯本轉譯的。譯者不懂意大利文，以致不能從原文直接逐譯，這是憾事。雖然這部書是思想性的而非文藝性的作品。轉譯在意義上不會有多大影響，但至少「文采」上總會有所損失的。我着手翻譯時所根據的是牛津大學本（1960年修訂版），譯者 Luigi Ricci。翻譯中有時遇到了費解的字句，於是去找另外一個本子來：萬人叢書本（初版發行於1908年）譯者 W. K. Marriott。對比之下，發現兩種譯本文字上頗有出入。於是又去弄來了兩個本子：一是 Airmont 叢書本（1965年版），譯者 Christian E. Detmold，另一本是企鵝叢書本（1964年版），譯者 George Bull。這些本子在意義上有大出入的不多，但語氣和表現的分量卻大有輕重，文體上尤見差異；所以如此者，一由於各位英譯者所根據的意大利文版本不同；二由於對原文格調的保持，各人採取着不同態度。中譯本大體上是以牛津本為主，必要時參酌其他三本。至於格調和詞彙，那是在儘可能範圍內，避免了過分現代化的。

1967年9月 雙山序於香港。

譯後記

與讀者諸君談馬嘉維里主義

讀者諸君，如今你們讀完《帝王術》的全文了。關於這位作者的思想，各位已經有了完整印象，或已經有了確定意見。我們在前面序文臨了之時所提及的那幾個爭論，多半，你們也已經有了解答。這裏，我想談談我個人對這幾個爭論的看法。十分顯然，借了馬嘉維里的手寫出《帝王術》這本書來的，絕對不是「魔王撒旦」，而是「時代之神」。因此，《帝王術》中所發揮的見解，既非荒誕邪惡的「魔鬼語言」，亦非憤世嫉俗的「厚黑之學」。恰恰相反，它是有深刻根源的思想，是有真實基礎的學理。不管你反對或者贊成，都必須鄭重對待的。

馬嘉維里主義中最與「魔鬼」結不解緣的，乃是他對道德的態度。但即使在這個態度上，或竟可說正是在這個態度上，我們更清楚地看到了他身上的「時代之神」。

一、「非道德論」或「功利主義的道德觀」

說馬嘉維里主張「非道德論」，其實是不甚正確的。因為馬氏並不根本反對道德。當時所謂「五德」，即「仁慈、忠信、合乎人情、正直與虔信宗教」，馬嘉維里非但自己從不表示反對，而且還勸當時的君王們「儘可能地奉行」。如果實際上不可能奉行，最低限度要表面上裝成如此的。這個態度極其普通。馬嘉維里特別的地方，只在於他明白地說出：道德不是絕對的東西，人不能受它的束縛。人君只當道德對他有利，當道德無害而有助於他事業的成功之時，才應該奉行道德；否

則，他便應該毫不猶豫地拋棄道德，毫無顧忌地去幹一切違反道德的事——雖然，他以為當人君這樣違反道德之時，表面上還應該裝成「有道明君」的。馬嘉維里在這裏是把道德看作簡單的手段，看作達到事業成功的一個手段。因此，你可以說他拋棄道德，但你也可以說他非常看重道德。凡是有利於成功的道德他都擁護，主張力行；凡是妨礙成功的道德他都反對，主張違反。在這個意義上，馬氏可以稱之為「功利主義的道德論者」，卻不是「非道德論」者。「馬嘉維里主義」中的此一思想，——這個最為人所熟知的與最為人們所詬病的思想，完全是當時政治圈裏道德實踐的反映，決不是馬氏個人心思邪惡的表現。道德從來不是什麼「先天的範疇」。它乃是社會和時代的產物。在某一社會與某一時代中，人與人之間，階級與階級之間總是形成着某種特定的關係，而在此關係中統治地位的階級，又總是根據着自己的利益，規定了一些「行為準則」，強令一切人遵守。這些準則便是道德。所以這些準則是相對的，可變的。它隨社會中階級關係的改變而改變，隨時代性質的轉移而轉移。馬嘉維里是一個深刻而敏銳的歷史研究者。他非常精深地研究了希臘羅馬的歷史。在研究中，他不可能見不到各時代有各時代的道德，各階級有各階級的道德，以及道德時常在改變這個明顯的事實。同時，馬嘉維里又是十五、十六世紀之交歐洲政治軍事鬥爭史的觀察者與參加者。在人類歷史的該一時期，正如我們在前面序文所說，一切鬥爭，都進行得特別尖銳而激劇，表現得特別赤裸而殘酷。復因教會勢力強大之故，這些尖銳殘酷的鬥爭，卻又總是奉神聖道德之名以行的，以致道德的本質，道德的社會作用，讓最普通人的眼睛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了，又怎能瞞得過親與其事的馬氏的銳利目光呢？因此，馬氏的道德觀，原不過是當時道德實況的記錄罷了。不過我們仍然可以問：馬嘉維里為什麼要如此而不如彼地記錄當時的道德實況？為什麼他不像當時流行的人文主義者那樣談論道德

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自應在主觀因素中尋找答案，應該研究馬氏的治史方法，還應該研究他對整個歷史進程的看法。

二、現實主義與循環論

在《帝王術》第十五章中，我們看見過如下文章：

……不過我的用意是要給真能了解的人寫些有用的東西，在我看來，與其趨於幻想，不若進入事物之真實更為合適。許多人曾經幻想過一些共和國與王國，而這些國家在真實中卻從未見過，也從未存在過。因為在我們如何生活着與我們應該如何生活這二者之間，相去甚遠……

這幾句話很重要，因為它們很好地說明了馬嘉維里研究問題的態度，說明了他的治學方法。在一切學術領域中，特別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有兩種根本不同的態度和方法。一種是從客觀的確實如何出發，另一種則從主觀上以為那客觀應該如何出發。這兩個不同的出發點，決定了一切學術研究中的兩大派別。從「確實如何」出發，產生了程度不同的現實主義的、唯物論的與科學的流派。從「應該如何」出發，產生了形形色色的唯理主義的、唯心論的與非科學的學說。

拿社會主義為例吧。有烏托邦社會主義，有科學社會主義。二者的差異，當然有千條萬條；但若追本溯源，也只是這兩個出發點的不同罷了。烏托邦社會主義者老是幻想人們應該如何如何生活的一些理想社會，而這些社會，卻是「從未見過，也從未存在過」的。科學社會主義則「進入事物之真實」。它客觀地研究了人們是如何生活了的，如何生活着的，然後從中得出規律，指出方向，使人類真能走向比

較好的與比較理想的社會。在不從幻想與願望出發，但從真實與實際出發這一點上，馬嘉維里的研究方法與科學社會主義者正同。因此，在這一點上，我們還盡有理由說馬嘉維里是歷史唯物論的先驅者之一哩。「但是，」說到這裏，你們也許又會發生一個問題了，「馬嘉維里研究歷史的方法既然與科學社會主義派，亦即與馬克思的相同，那末由此發展出來的兩個主義，就各自的面貌和本質說，為什麼會如此不同呢？一個是無條件向現實屈膝投降，拼命為現實辯護，一切為了在現實中圖存求勝；而另一個則不妥協地向現實挑戰，拼命揭露與抨擊現實，一切為了要推翻這個現實而鬥爭。這是為什麼？」這個問題提得很合適。我們正需要研究它，不過如想全面地解答這個問題，就得談到二位馬氏的時代不同，他們各自所代表的階級不同，二人性格不同等等。這樣的研究，當然不適宜在這裏做，只好從略。在此地，我們只想談到一個方面，那就是：馬嘉維里對於人類整個歷史行程的看法，與馬克思（更正確些說，與馬克思時代的人）的看法，是大異其趣的。二人歷史觀的不同，在不小程度內，決定了二人整個思想的不同。馬嘉維里不是歷史的退化論者，但他也不是歷史的進化論者。（順便說一句，進化論的思想還要在馬氏死後三百多年後出現哩。）就他對於人類歷史演變的整個看法言，可以說他是歷史的循環複演論者。他的這個思想，在《帝王術》中沒有發揮，在他的《論說集》中卻很充分地闡明了的。他說：「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有其存在的限度」，都有「一個上天給規定了的過程」，但事物大多不可能走完這個過程，不可能享盡「天年」；因為事物一經產生，過了相當時間，一定要腐敗墮落的。所以要「走完上天給規定了的全程」，事物必須經常自我「更新」，即必須經常回復到當初事物憑以產生的「原始原則」去（見《論說集》卷一第一章）。根據這個理論：一切事物，包括他最所關心的各個宗教派別、共和國與王國，都是按照這樣的公式而存在的：首先是好的原

則（事物「憑以生長並取得名譽」的），然後是腐敗、更新、再腐敗、再更新……一再反覆，直至終其天年。等到這一整套的循環反覆完結之後，當然又由另一些「好的原則」產生出新的事物，這些事物又在不斷腐敗與不斷更新的反覆中完成其「上天給規定的期限」。如此周而復始，一個小循環連着一個小循環，一套大循環跟隨着一套大循環，以至於無窮。

這樣的歷史觀裏當然沒有進化觀念，沒有進步與發展的觀念。作為原始出發點的所謂「好的原則」，只是與「腐敗」相對待的某些不變的德性。它是循環的出發點，也是循環的回歸點。新循環開始的「好的原則」，與舊循環開始時的「好的原則」並無不同，前者並不表示比後者更為前進的一步。

如此觀察人類歷史，顯然不可能有偉大的理想目標，顯然不可能產生出為人類社會的進步和發展而鬥爭的努力。這樣的歷史觀，與現實主義的研究態度結合到一起，那末關於人們努力的最高目標，自只能是爭取個人和集團的成功，以及保持這個成功。成功本身就是一切，成功本身就是最高目的，它絕不是實現其他更高目的的手段。因此，人們可以而且應該以任何手段來取得成功，保持成功。從這樣的歷史觀出發，凡是出現在政治軍事戰場上的任何力量（個人，階級或國家），便沒有也不可能有真正進步的因而是正義的一方^[1]，因此沒有也不可能有好壞之分，是非之分。有的只是成敗之分，強弱之分。其結果，「成王敗寇」與「強權即公理」，便認為世事之正道了。

馬嘉維里說：「君王應以奪國和保國為其目的，而為此所用的手段，總會被人認為光明的，且為人所稱頌……」（見第十六章）。這裏說的就是這個意思。但是從另一個歷史觀出發，從科學社會主義派的

發展的歷史觀出發，整個看法便根本不同了。誠然，各個社會制度是各有一個或一些「原始原則」可尋，這些社會制度（或可稱為歷史階段）也確實有自己的「過程」，確實有其生長、衰敗與滅亡的過程；在這些過程中，也確實有而且必須有「日日新，又日新」的努力，才能保證其存在與生長；但是那些決定各個社會制度的「原始原則」，卻是不同的，而且是後勝於前，不斷進步的。這種進步為客觀的、社會內在矛盾的衝突與解決所決定，因而也是人們主觀努力的方向。從這個觀點出發，成功本身不可能就是目標，「奪國和保國」更不能是人們努力的最高目的了。有不同性質的成功，有不同性質的奪國和保國。同樣的成功，同樣的奪國和保國，卻可以有進步和反動之分，有好壞之分，有是非之分。凡符合於促進人類進步這個大方向者，一切成功都是好的、對的、正義的；反之，凡反對着或阻延着這個方向者，則縱然奪得了國家並保持着國家，卻仍然是反動的、壞的、非正義的。在整個人類努力的總方向上說來，這種成功，其實與失敗無異，甚至甚於失敗。在這裏，我們看見了同樣從現實主義治史方法出發的二位馬氏，怎樣發展出兩個完全不同的思想派別來了。

三、馬嘉維里主義是怎樣被曲解與利用的？

以上，我們是從馬嘉維里的學說本身，試行解釋了他歷來遭受攻擊的原因。不過，馬氏之所以被罵成「魔鬼」：卻由於另外更大的原因，即由於人們對他的主張故意作了曲解與誣衊。

人說：「左傳乃相斫書耳」。其實人類的全部歷史，幾時有不自相斫殺的？階級與階級之間，種族或民族之間，兩個朝代之間，集團或個人之間，經常在進行你死我活的鬥爭。一部政治史就是一部權力

鬥爭史，其間是無時不相斫的。尤其是陳腐的、那些應該退出歷史舞台而不肯退出的階級代表們，為了要奪回權力或保持權力，其歷史更必然十分血腥而充滿了罪惡。但是，歷史上的所謂英雄豪傑，雖然大多幹盡了壞事，卻說盡了好話。他們是絕口不談壞事的。他們非但自己不談，也不許別人。非但不許別人談，而且還要叫他們（那些歷史家們）用最好聽的好話，記載他們最不堪的壞事。因此，中外古今的歷史書，大多數是一派謊言；而大多數的史家與史論家，都有意無意地幹着為腐屍化裝的勾當。有誰如果不這樣辦，有誰如果用恰如其分的話去記錄或說明實際發生了的壞事，那他就有禍了。馬嘉維里將醜惡說成了醜惡，人們又怎能容忍他呢？儘管馬嘉維里這樣做不是為了攻擊和暴露，儘管他這樣做毋寧是為了辯護這些醜惡，儘管他把醜惡說成為合理的存在，是謀求成功的正當辦法；但揭開瘡疤總歸是痛的。用醜惡的確認來辯護醜惡，人們總是寧願以美妙的偽裝來掩飾醜惡的。因為世人讚揚偽君子，卻絕不寬容真小人。於是，那些用十分醜惡手段來奪得和保持成功的一些高貴老爺們，便集中火力向馬嘉維里進攻了。愈是靠偽善保持成功的人，對馬嘉維里的進攻愈是激烈。愈是無意或有意實行着馬氏權謀術數的統治者，愈是要把馬氏的「主義」批倒搞臭。因此，一部馬嘉維里主義的批判史，正是一部無比精彩的政治偽善史。可惜，我們不能在這裏描述這部歷史；但以其精彩故，我們雖不能講述整個故事，卻必須約略提及其中幾個片斷，以見一般。首先談教會。羅馬教廷於1557年正式將《帝王術》列為禁書，宣佈這本書是魔鬼附在馬嘉維里身上寫出來的。這事原不足怪，因為馬氏言論確實與教義相背。可怪的是它拿馬嘉維里主義這個罪名去反對當時風起雲湧的宗教改革運動（這是毫無根據的），同時卻以馬氏之道去迫害新教徒，進行了多次對新教徒的大屠殺。這個情形，使得新教徒們有較大理由地，也以馬嘉維里主義這個罪名去回敬羅馬的當權

派。這個故事告訴了我們兩件事。第一，馬嘉維里主義一出娘胎，就成為一個逐漸與其內容相脫離的罪名，成為一個眾惡所歸的簡單的罵人名詞。第二，人們儘可以行馬嘉維里主義之實，卻必須斥馬嘉維里主義之名，必須將這個罪名強加於他們的反對者身上。在後一方面，普魯士弗里特烈大王的故事具有典範意義。年青時候，這位未來大王讀了《帝王術》，並且寫過一本駁斥馬嘉維里主義的書。可是他後來當上了國王，一生行事，幾乎都是師法馬氏的。這是什麼回事呢？伏爾泰——這位當過大王師傅的法國名學者——在他晚年所寫的《回憶錄》中給我們解釋道：

如果馬嘉維里收過一位君王做弟子，他教弟子的第一件事，該是勸他寫一本書來反對馬嘉維里主義吧。

意味深長的俏皮話，不能簡單作「夫子自道」看也。莫索里尼，這個馬嘉維里的同鄉後輩，幹了一件與普魯士國王有異曲同工之妙的妙事。他給某一個新版本《帝王術》寫了一篇長序。這篇文章，曾經收入莫氏全集的第四卷中，可是後來，不知為了什麼緣故（多半是為了要提高大領袖的「道德」聲望吧），竟將這一卷書從國立圖書館中拿走了。《帝王術》恰好像一本赤裸裸描寫和討論性生活的書，這種書只可讓人在暗中偷偷欣賞，秘密摹仿，卻不足為外人道，更不可讓未成年的子女（可讀「天真的老百姓」）看到的。不過最有意思的一個故事乃是史大林的。史大林這個人的性格，有人說他是「三分之一馬嘉維里，三分之二猶大的混合品」。如今蓋棺論定，事實擺明，這個說法並不過分。他實在是一個策略高手，陰謀專家。可是，奇妙的是，他卻曾經用馬嘉維里主義這個罪名殺了他的異己者。這個受害人是加明尼夫，老布爾雪維克，理論家，列寧的老戰友。原來蘇維埃政府曾經出版馬嘉維里文選集，出版時，加明尼夫給它寫了一篇導論。可是事

隔數年，當加明尼夫以叛黨罪名被控之時，檢察長給他開列的具體罪狀中，卻赫然有「宣揚馬嘉維里主義」這一項。從這些故事裏我們可以看到，普通的所謂馬嘉維里主義，其實並不真正代表馬嘉維里的思想。它早已變成一件武器，變成一頂帽子，一頂最簡單、最能毀人的帽子。拿了這頂帽子，現實政治中的野心家們可以隨便套人，隨便入人於罪。因此，這頂帽子根本不需要有真實內容，只要將它拼命弄髒弄臭好了，因為帽子愈髒愈臭，坑起人來就愈是方便。

四、馬嘉維里的思想及其影響

可是馬嘉維里主義這頂骯髒帽子底下還有思想內容在。發揮於《帝王術》及《論說集》兩部書中的馬嘉維里的思想，有人曾經歸納成如下八點：

第一，民主共和國比其他任何一種政治形式都更為優越；第二，就算是專制與極權的政制，最後都有賴於群眾的同意；第三，國家的緊密一致、穩定與延續的生存，乃是首要的、絕對的政治要求；第四，為要做到國家的緊密團結與延續的生存，領導者（馬嘉維里稱之為「立法者」）當起很大作用；第五，為了確保存存，武力有絕對的必要，而且必須將武力置於群眾基礎上（馬氏以為戰爭是於國家健康有利的）；第六，宗教對於國家有用，國教的選擇不應以其超自然的效用為標準，而應視其以神話來統一群眾與鞏固群眾的力量如何而定義（馬氏不歡喜基督教的理由與尼采的相似，即以其崇尚屈辱、和平與軟弱的德性，挫折了國家的戰鬥精神）；第七，即使在民主國家的行為中，也必須有圖存的意志，因此，當必須採取無情措置之時，就必須採取這些措置來

代替那些軟弱辦法；第八，文明的興替是循環的，由於舊事物之衰敗腐化與新事物的重獲生意而發生循環，這思想與後來的維可（Vico）及目前的史本格勒（Spengler）所抱的見解正同。（引自麥克思·勒納教授為「現代叢書」本《帝王術》所寫的「導言」。）

以上八點，很顯然，非但不能算作骯髒，而且都頗有價值。非但本身有價值，而且還對於歐洲近代的政治學術思想，發生了深遠影響的。不過就影響說，這位教授在歸納上述論點時，卻遺漏了或者根本看不到我們在前面提過的更重要的兩點：第一，現實主義的歷史方法；第二，建立強大、集權與統一的民族國家的主張。這兩點，在名氣上雖然遠不及上述的第七點響，但就真實的影響說，它們卻遠遠超過了那冠以馬嘉維里之名的種種陰謀詭計的。關於這兩個見解的內容，我們在本文前節與卷首的序言裏已經講過，不贅述。這裏只想談談它們的影響。由於馬嘉維里不從「理性」或「道德」出發，但從客觀的真實出發去觀察歷史，因此，他在大體上總是從一國與一社會內部的各派人羣，從各派人羣的利益，從這些利益的衝突而引起的鬥爭，來解釋許多歷史現象。當然，這樣做，他還不曾充分了解階級鬥爭在人類歷史上所起的作用。但這是不足為馬嘉維里病的，因為要充分認識階級鬥爭這個事實，要充分了解這種鬥爭的意義，歷史還得再表演三百年。一直要到十九世紀之初，當階級鬥爭的規律以極清楚的形式在法國大革命中自行揭露之後，才能讓王政復古時期的幾個法國歷史家盡情發現了的。

可是我們仍舊可以說，也應該說，馬嘉維里當年已經相當看到了這個道理，並且向歷史唯物論邁進了一大步。整部《帝王術》是現實主義手法的體現，而特別在第四、第九、第十九諸章中，馬氏一貫從市民和貴族的衝突中去了解歷史，復從這個衝突中去說明君王的意義

和作用。他在這裏不但很好地說明了階級鬥爭這個事實，而且還預早三百多年就解釋了「波那帕脫主義」哩。現在我們來談馬氏思想在民族國家建立方面的影響。我們已經知道，馬嘉維里作《帝王術》，並將它奉獻給佛洛倫斯的洛倫佐，存着什麼希望。我們又講過，這個「偉大的」洛倫佐實在不是心懷大志的人，因而絲毫不曾受馬嘉維里的影響。種子是在岩石上了。結果，馬嘉維里等所反對的、意大利所遭受的屈辱的外族控制，非但不曾擺脫，反而變本加厲了。馬嘉維里死後不久，西班牙就統治了整個意大利。此後二百多年內，意大利終於處在西班牙、法國與奧地利的交相控制之下，馬嘉維里的理想始終沒有實現。但是這個理想也始終不曾消失，死灰裏藏着火種，它隨時會復燃。終於在兩個世紀以後，在以加富爾為首的貴族——資產階級的國家主義派的身上，它復燃起來了。加富爾和他的同志們把馬嘉維里從人們對他的曲解和誣衊中發掘出來，將他的理想作為他們自己的理想，並且依照了馬嘉維里未曾走通的舊路，去試試撒丁尼亞的小王。結果，如所周知，那個維多·愛麥虞爾二世終於做了「偉大」的洛倫佐所不曾做的事：一個統一的與獨立的意大利出現了。統一的意大利能夠在1861年出現，原因自然很多；不過我們還是可以說，馬嘉維里的思想也曾起了一點點作用。在較早時候，在德國，馬嘉維里也曾大為時興的。普魯士的弗立特烈大王和他的關係，我們在前面已經談過。哲學家斐希德更是馬嘉維里的崇拜者，在他所寫的《告德國國民書》，有一段就是研究馬嘉維里的。那時候，由於拿破崙戰爭的影響，德國的民族主義抬頭，學者紛紛傾向馬嘉維里，竟致形成了一種風尚。這些人大率主張由普魯士王出來做德國的「大救星」，把德意志民族統一起來。就好像二百年前馬嘉維里對佛洛倫斯的統治者所抱的希望一樣。我不知道俾斯麥是否熟讀《帝王術》，不過這不重要，因為不論從大的政略或小的策略去看，俾斯麥卻恰恰是一「行時走運」的馬

嘉維里，而威廉一世則是一個有作為，有大志和不負所望的洛倫佐。我們知道，近代國家要解決資產階級性的民主民族任務，特別是民族任務，不外乎走兩種道路，一種是由上而下的，又可稱之為普魯士道路，另一種是由下而上的，又可稱之為法蘭西道路。所謂普魯士道路，更確切些說，實在可稱之為「馬嘉維里道路」。故當德、意資產階級吸取了法國大革命的經驗，又感於本國工農的威脅，因而想和貴族妥協結托以完成民族任務之時，他們趨向於馬嘉維里，原是很自然的事。不過到了十九世紀末期與二十世紀初期，馬嘉維里卻變得非常的不時髦，非常的不合人的胃口了。一直要等到第一次大戰之後，到了三十年代，這個「佛洛倫斯的魔鬼」復再度發揮其「魔力」，《帝王術》才再度地為人重視，甚至變成為暢銷書之一。何以會發生近幾十年來馬氏影響的一落一起呢？本譯本後附的第二號附錄已給了很好解釋，此地不贅。【朱正按 本譯本後附的第二號附錄是托洛次基的《史大林評傳》的導言。《史大林評傳》是托洛次基最後一部著作，還沒有寫完定稿就遇刺身死。王凡西把這篇導言加上《論馬嘉維里主義》的標題作為本譯本後附的第二號附錄。作者署名L·大衛道維奇，這是托洛次基的名字和父稱。按照俄國的習慣，稱人的名字和父稱是表示尊敬，又迴避了過於刺激的托洛次基的名字。】下面我們要從馬嘉維里主義這面鏡子裏，看看一古一今兩個中國人的思想。

五、從馬嘉維里想到韓非

馬嘉維里不幸而不生在中國，使他蒙上了十惡不赦的壞名聲，如果他有幸而生於中國，有幸而生於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那末，他非但不會給畫上最醜惡的鬼臉，而且在我們的諸子百家中，還許能多上

一個「馬子」哩。因為馬嘉維里的學說，實在講來，並不出乎中國法家範圍之外。

謂予不信，請看韓非。

韓非是先秦法家中集大成的人。法家中，慎到主勢，商鞅主法，申不害主術，而韓非則兼三家之長。所以他是法家的代表。他的思想與馬嘉維里的非常相似。「韓非子」中所闡明的意思，不但在實質上與《帝王術》中所發揮者相同，甚至在字面上都十分近似的。

韓非，跟馬嘉維里一樣，生活在兩種社會制度^[2]正相更替的時代。因此，他也生活在一切社會鬥爭進行得異常激烈的時代。在那個時代裏，也是小國林立，戰爭頻仍，民生痛苦。因此，韓非和馬嘉維里一樣，也希望有一位「萬乘之君」，能出來「兼併天下」，而這位「萬乘之君」用「以為亡征之君風雨者」，用以「兼天下」的手段，也和馬嘉維里的主張相同，是要「服術行法」（見《亡征篇》）。

韓非的所謂「術」，就是馬嘉維里的《帝王術》，二者的內容是不謀而合的。不過在談術之前，讓我們先談幾個更加根本的相同點。首先，這二人都是從性惡論出發的。作為荀卿的弟子，韓非說：「夫民之性，喜其亂而不親其法。」又說：「夫民之性惡勞而樂逸」（均見《心度篇》）。這和馬嘉維里在《帝王術》第十八章中所說者正同。他說：「假使人都是善的，那末這個箴言便站不住，但因人（性）是惡的，他們不會對你守信，你也就沒有對他守信的責任。」——這裏二人所談的具體問題雖異，但基本精神卻屬一致：二人都以「性惡」為前提，都認為「善者偽也」；要想性惡的人民安分老實，改惡行善，他們都以為：唯有繩之以法，制之以術。因此，他們二人便不約而同地否定了

仁政。他們都推崇威力，排斥德義。這層意思，韓非在《顯學篇》中批評儒家主張時，說得最為透澈。他說：

故敵國之君王雖說（悅）吾義、吾弗使入貢而臣；關內之侯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是故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故明君務力。夫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

這一個重力輕德的思想，原本是《帝王術》貫穿全書的主題。此類文字，比比皆是，以致我們毋需加以徵引來作對比了。二人在這個想法上是極為一致的。不過大同中有小異。這個小異還表明出馬嘉維里比韓非較為高明呢。所以我們得指出來，馬嘉維里說：「永遠實行這些品德^[3]是有害的，可是表面上卻必須裝成具備它們」（見第十八章）。這就是說：過於赤裸裸的務力，一味的作威耀勢，亦非禁暴止亂的萬全之道。所以他主張於「務力」的同時，必須裝成有德，藉以服人之心。這個主張，恰恰就是漢朝學者鑑於嬴秦之失而對韓非學說所作的補充和修正，亦即一直成為此後中國歷朝統治者拳拳服膺的所謂「表儒裏法」之道。

既然重力輕義，那末對於人君到底應該為民所愛，還是應該為民所懼這個問題，差不多已經自動解決了的。因此在這個問題上，韓非與馬嘉維里之間的相同處，簡直達到文字上都十分近似的程度。

韓非說：「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顯學篇》）

又說：「父母積愛而令窮，吏用威嚴而民聽從……明主知之，故不養恩愛之心，而增威嚴之勢。」（《六反篇》）

馬嘉維里說：「人之愛君是依照他們的意志而行事，而人之懼君則依照君王的意志來行事的，一位聰明的君王應該對自己的地位建立在他本人所能控制的事物上，而不應該建立在為他人所控制的事物上。」（第十七章）

在這裏，二人以同樣理由，以同樣的方式，着重說明了人君對於人民的關係必須是主動的，必須立於控制地位，決不應該立於被控制地位。

如何控制人民？如何利用大臣呢？韓、馬二氏的回答又都是一樣的，那就是用術。

馬嘉維里對軍事最有興趣，於戰爭有頗深研究。所以他的看待政治，甚至可以說是「軍事的繼續」，他常是從戰爭觀點來看政爭的。在軍事學上，古今中外一致公認的有一條定律：「兵不厭詐」。馬嘉維里將這條定律翻譯到政治上，那便是「政不厭詐」。只要能帶來勝利，什麼詐術都是合理的。馬嘉維里因此將「術」的意義抬得特別高。他不但主張人君用術來牧民，用術來駕御大臣（韓非的術主要應用於君臣之間，所謂「君無術不足以知臣下之奸」），而且要他用術來對付別國的人君。當然，馬嘉維里也同樣看重，而且更加看重軍事的威力，他同樣看重，雖然略為看輕那齊民的法制；但他的興趣總是太集中於權謀術數了，太深究細研到「狐狸的狡智」了，以致讓人們覺得馬嘉維里主義的全部內容盡於「術」字。彷彿他是無所不用其「術」，天下事是一切取決於「術」的。

在這裏，也許就是馬氏之被貶為「魔」，韓非等法家之被尊為「子」的緣故吧。

其實並不，因為馬嘉維里並非是唯術論者，而韓非也不是不講究術的。在中國法家中，最講究術的是申不害，可惜「申子」不傳，使我們無法知道他所推重的術與馬嘉維里的術有多少相同之處。不過這不要緊，在「韓非子」中，這位並不偏重權術的法家，談到術的地方也盡夠多的了。而且不論關於「術」的原則性的說明，或關於「術」的具體的例解，「韓非主義」都未必比馬嘉維里主義較少「魔氣」。

韓非給「術」下了這樣一個定義：「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執實，操生殺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這話固然說得冠冕堂皇，正大光明；但一考其實，韓非所講的術，又何嘗是真的全無魔氣呢？在「韓非子」的另一個地方（《難三》）中說：「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眾端，而潛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是以明主……用術，則親愛近習莫之得聞也。」連親愛近習都不可得聞，必須藏之於胸中，暗中控制，可見是不光明的。而他具體說明「術」之內容時候所列舉的什麼「疑詔詭使」（即假傳命令以疑臣下，用欺詐手段來使用臣下），「挾知而問」（即假裝不知而故問）；「倒言反事」（即說反話，做反事以圖探察臣下的姦情）（以上見《七術》）等等法術，則與馬嘉維里所提出者比，縱未過之，卻非不及的。

由此可見，即使從最受人攻擊的用術一點上看，馬嘉維里也可被置於中國法家諸子之列而無愧。

韓、馬二人還有一點相同，那是反對泥古而主張合時。韓非反對「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主張「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要「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均見《五蠹》），這和馬嘉維里的見解也是相近的。隨便舉個例，譬如他說：「凡是能將自己的行為去適應時代精神的君王是幸運的，同樣，如果他的行動不符合時代，他就會倒楣。」（見

第二十五章) 這點共同精神，當然源於他們二人大致相同的歷史觀。他們的歷史觀是現實主義的，是反對退化論的，雖未達到進化論的地步，卻已模糊地在以一治一亂的循環論來表達他們對歷史前進的看法了。

以上所述，當然不是韓、馬思想的鄭重研究。我們所以要在這裏指出這幾個相同點者，目的非他，只是想拿中國思想史上的一個尺度來測量一下馬嘉維里，藉以證明馬氏確實可以和我們中國古代的管、申、商、韓諸子相提並論吧了。

不但可以相提並論，而且在某些方面，馬嘉維里的見解還在他們之上哩。譬如，對於人民的態度，馬氏就比較的進步，頗近乎以孟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了。

人民在中國法家的心目中沒有地位，不起作用。他們被視為牲畜，只能被治被牧，卻不能發生主動作用，也不許發生這種作用。所以韓非說：「民智不可用」。他認為：「為政而期適民，亂之端。」（見《顯學篇》）可是馬嘉維里卻非常看重人民。在他的《論說集》裏固然侈談「民主共和」，便是在專談帝王術數的《帝王術》中，他也處處強調人民的重要，強調取得民心的重要。有一個意見非常有趣，依他之見，為了要成功，即為了要達到奪國與保國的目的，君王可以而且應該施展一切手段，甚至可以幹出任何壞事，但是，這裏有一個極限，亦可以說，有一個唯一的條件，那就是：「不要因此為人所恨與為人所鄙」。他說：「要百姓們對他滿意這一層是必須做到的」。因為，他說：「君王所能擁有的最最好的保壘是：不要為人民所憎。」

還有，馬嘉維里不談宗教以外的思想，不曾看重君王們憑以統治的思想力量。因此他並不敵視知識分子，也未曾主張過思想統一。可

是在韓非，這個方面卻佔了他學說的重要部分。他反對「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他要把情況倒轉過來，要讓君王一個人動腦筋，讓千百萬人成為力行的機器；他最最痛恨「愚誣之學，雜反之辭」。他希望「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俾不致使「海內之士，言無定，行無常議。」（見《五蠹》及《顯學》）韓非這個統一思想與敵視思想異己的態度，大家知道，正是後來李斯教秦始皇焚書坑儒的理論根據。從這個角度看，那末韓非比「魔鬼」馬嘉維里不但有更多魔氣，而且含有更大毒素。

六、馬嘉維里主義與毛澤東思想

談馬嘉維里使我們談到了韓非。但當我們讀了《帝王術》之後，最自然地讓我們聯想起來的中國政治家，該是毛澤東吧。馬氏在《帝王術》中以無限欽仰的口氣敘述了契莎雷·鮑其亞，將他推崇為理想的君王；但若馬氏生當今世，看見了毛澤東的所言所行，我敢相信，他一定會將理想的目標轉移，一定會認毛澤東為他全部學說的最好體現者，一定會宣稱毛澤東為精通君王術的最高典範的。

毛澤東顯然不曾讀過《帝王術》。可是他的某些基本思想，卻與馬氏在《帝王術》中闡明者完全契合；同時他的做事手法，他的行政用術，也好像是深得馬氏三昧的。這裏的不謀而合，由於二人之主觀性格者少，由於現實政治之客觀規律者多。既然馬嘉維里主義是「現實政治的文法」，那末作為文章高手的毛澤東，以現實主義的態度從事寫作時，便不得不符合於這套「文法」的。

毛澤東思想中符合於「馬氏文法」者，多至不勝枚舉，不過歸根結蒂，亦可說只有兩點：一曰武力至上；二曰領袖膜拜。

毛澤東關於武力至上的論斷，已經因「語錄」之普遍宣傳而弄得家喻戶曉，用不着我們再加徵引。這裏且讓我們看看馬嘉維里在這方面的意見。

首先他認為：「一切國家的主要基礎是好的法律與好的武力。只因沒有好的武力便不能有好的法律」，所以他以為武力先於法律，武力決定一切。他說：「一個王國沒有它自己的軍隊，永遠都不可能安全；相反，它將完全為命運所擺佈」。因此，「一個聰明的君王，應該完全依靠他自己的軍隊」。「君王不應該有其他思想與其他目的，他只應該為戰爭藝術以及軍隊的組織及其紀律而操心」。「他永遠不可讓自己的思想離開軍事這個課題，在平時，他還應該比戰爭時更加注意武備」。至於不是君王而是庶人，不是普通的庶人而是先知的改革家與革命家們，那末他們的成功更有賴於武力的組織與發揮。他分析了古代和他當代的經驗後，得出了他那個有名的結論道：「一切武裝了的先知都能夠成功，而非武裝的先知則歸於失敗」。

馬嘉維里的這幾段文字，只要調換幾個字眼，將「王國」換成「國家」，將「君王」改成「人民」，就完全可以放進《毛氏語錄》裏去了，而事實上，《語錄》裏早已充滿了同樣思想的話語。「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槍桿子裏出政權」。「誰想奪取國家政權，並想保持它，誰就應有強大的軍隊」。這不都是符合「馬氏文法」的嗎？

毛澤東能有馬嘉維里的這一個同樣思想，並且能堅決實行這個思想，當然不是壞事而是好事，基本上，也不表示他的錯誤而表示他的正確。毛澤東會有今天，中國共產黨會有今天，在不小範圍內，都應該歸功於這個思想。這個思想，在馬嘉維里是從歷史的真實經驗中歸納出來，也是從他個人所目擊的政治活動，即薩伏那羅拉的改革運動

的失敗經驗中歸納出來；在毛澤東，則是從中國長期的歷史中，從近百年來的國恥中，特別是從幾個「反面教員」那裏學來的，用他自己的話說，那是「拿血換來的經驗」。

直至今今天為止，人類的歷史還受着「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諸般規律的支配；而且在基本的鬥爭上還受着野獸世界的規律的束縛，所以以往的人類歷史，在這個意義上，還只是獸的歷史的繼續。那裏「相斫」是必然現象，「獅子」的力仍然主宰着一切。因此，不管是誰，保守的也好，進步的也好，如果想使自己為之服務的事業成功，「蠢豬式的宋襄之仁」固然要不得，就是任何「重義輕力」的認真企圖都同樣地要歸於失敗。這是一個痛苦的真理，卻是一個不容參加現實鬥爭的人加以否定的真理。

毛澤東在認識和堅持這個真理方面成了馬嘉維里的最好「弟子」，不但無可非議，而且值得稱許。

不過，今天的時代與馬嘉維里的時代畢竟不同了。社會發展到了這個階段，使人們應把「為野蠻規律所支配的歷史變為由人的自由意志來支配的歷史」的那個願望，真正有現實的客觀基礎了。而毛氏一生所標榜與所參加的那個世界性的運動，正是以達成此一轉變為目標的。為達此目標，也就是說，為的要最後消滅人類歷史上的獸性殘遺，不用說，也仍得經過力的鬥爭，甚至要經過非常慘烈的鬥爭。但是，目的與手段是相互依存的，是互為因果的。因此，今天具有人類崇高目標的戰士們，在對武力抱有現實態度的同時，卻必須以更大的注意去培植道德的力量，培植符合於新時代新目標的道德力量，藉使那物質的武力可以「不戰而屈人之兵」，可以從「最內在的心裏」去攻取敵人。

在這一點上，依我們之見，毛氏是不夠的。在這方面停留於馬嘉維里主義，那就值得批評了。

不過，有人也許會這樣說，毛氏處處指出「政治第一」，他以全力提倡「毛澤東思想」，便是他不光是依靠槍桿子的證明，便是他更加看重「道德力量」的證明，也便是他在這方面超出了馬嘉維里主義的證明。

誰都會承認，毛氏非常非常地看重思想的力量，同時我們也應該懂得，目前那種史無前例的「毛澤東思想」的學習與宣傳運動，並不光是毛氏個人意圖的表現，而更有其客觀需要在此的。這個需要，便是要濟武力之所窮，要補槍桿子的不足。但是，如此這般的思想運動，據我看，非但不曾超出馬嘉維里主義，而恰恰就是馬嘉維里主義。何以見得？且聽我慢慢道來。在《帝王術》中，馬氏沒有涉及思想問題，也沒有談到宗教問題。在「教會王國」一章中，他對宗教問題採取了「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他說這是「崇高的事業，其高為人類的心智所不能及，所以我不將談到它們」。可是在《論說集》中，他還是談了，而且談得很出色。他將宗教絲毫不當作神秘的東西，完全置於人類心智所能及的範圍內，使它和法律與軍隊處於同等地位，作為世俗權力之一來加以研究。因為這個重要意見他在《帝王術》中略而不談，所以我必須從《論說集》中摘譯有關幾節，以便讀者參考：

羅馬的建造者是羅慕洛士，羅馬像是他的女兒，是從他那裏獲得生命與教養的，但雖如此，諸神還是認為這位君王的法律不足以治理羅馬這樣大的帝國，因此，諸神向羅馬的元老院顯靈，要他們選舉了努瑪·龐比列烏斯作為羅慕洛士的繼承者，以便他可以調整補足一切為羅慕洛士所忽略了的事情。努瑪主政後，覺得

人民很野蠻，希望採用一種和平藝術來使他們變得有禮而順從，他不得不藉助於宗教，將宗教視作任何文明社會之最必需的與最可靠的支援，他將宗教建立在這樣好的基礎上，以致在那時以後的好幾個世紀內，世上沒有一個地方比在羅馬共和國中更加畏神的。這個情形，使元老院或其偉大人物企圖進行的任何事業，都大為方便。（《論說集》卷一，第十一章：「論羅馬人的宗教」。）

……誰若用心地閱讀羅馬歷史，誰就會看到，宗教對於軍隊的指揮有多麼大的用處，對於統一人民，使他們行為良好，使壞人蒙受恥辱，有多麼大的用處。故若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來討論：羅馬受惠於羅慕洛士與努瑪者孰多，那末我相信，最高的功勞是應該歸於努瑪的；因為有宗教存在的地方，那裏便容易建立軍隊與實施紀律，但在僅有軍隊而沒有宗教的地方，卻是難於實施紀律的。……（引自同上書同上章節。）

實際上，任何民族中的任何一位出色的立法者，沒有不曾求助於神的權威的，因為不然的話，他就無法叫人民接受他的法律。（同上引書。）

在人民不畏神的地方，那個國家將會破滅，除非那裏有另外一種畏懼，即對於君王的畏懼來代替它。對於君王的畏懼是在短期內彌補宗教之缺如的。（同上引書。）

馬嘉維里在這裏是從正面肯定了宗教對於國家統治的重大作用。但在褫奪宗教的神聖性，在揭出隱藏在神的面具之下的人的本質，在暴露宗教超出政治，宗教超出階級鬥爭的謊言上，他恰恰說了馬克思派後來從反面否定宗教時所說的同樣的話，即：「宗教是人民的鴉

片」。這是佔據國家統治地位的集團和階級，當他們憑武力和法律尚不足以、或已不足使人民安分服從之時，拿出來催眠人民的一種靈藥。

還有，對我們說來更為有趣的是：他將畏神和畏君的關係給我們指明了出來。他的這一指明是頗為重要的。因為懂得了這二者之間的關係，我們這些現代歷史的研究者和觀察者們，便可以很方便地理解下面這個問題：

在目前的許多國家中，特別在像以前的蘇聯和目前的中國那樣的「社會主義」國家中，為什麼要實行與社會主義原則格格不入的「個人崇拜」？

關於當年盛行於蘇聯的個人崇拜，有不少歷史家與社會學家曾經企圖做過解答。答案很多，歸結起來，卻不外乎客觀的與主觀的兩個方面。在客觀方面，他們說，史大林所以能夠並且需要在蘇聯建立起駭人的「個人崇拜」，第一因為俄羅斯一般經濟文化上的落後；第二因為，由於蘇聯從二十年代後期起，國內外種種原因，使該國的階級鬥爭達到了異常尖銳的程度。國家落後給荒唐的崇拜制度提供了建立的可能；鬥爭尖銳則使統治階層覺得有建立最赤裸的集權於一人的需要。這是一方面。在另一方面，主觀方面，他們說：自來的領袖愈是自覺到精神生活貧乏低下，愈是在同儕中覺得自慚自卑，他就愈是要設法來抬高自己地位，愈是要設法使他人崇拜自己。史大林是這樣的一個領袖，所以他便竭盡一切力量來給自己建立起這樣一個制度。

這些解釋都是正確的。特別是所指出的客觀原因是基本的。但我總覺得還不很完全。因為聽到了這個解釋之後，我們仍舊可以問：為什麼國家落後就能夠建立個人崇拜制度？為什麼階級鬥爭趨於尖銳的時候便需要建立個人崇拜？對於這樣的問題，我以為，我們得從馬

嘉維里所指明的那個角度去觀察了。這也就是說，得從宗教的鴉片煙作用去看問題了。從這個角度和這個作用去尋找答覆，問題是很清楚的：在前一種國家裏的人民容易被催眠，而在後一種國家裏的人民則必須加以催眠。

可是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宗教是遭到排斥的，統治者本身標榜着無神論。從哪裏去獲取催眠人民的鴉片呢？

從對「偉大領袖的個人崇拜」中。

因為領袖膜拜是除了沒有超自然的神之外具備着宗教一切特性的一個宗教。它，這種人工造成的「對君王的畏懼」，按照馬嘉維里的說法，「是可以在短期內代替對神的畏懼，可以彌補宗教之缺如的。」

因此，愈是在無神論的國土裏，愈是要把大領袖變成為神或變成半神。

當年史大林所以要自我神化者以此，今天毛澤東所以要自比太陽者亦以此。這二人在這方面的行為，雖然不是有意奉行馬嘉維里的遺教，但在事實上，他們卻分別實行了與實行着這個遺教。所以在這一個意義上，我們說，史、毛二氏都不曾跳出馬嘉維里的手掌。

七、老百姓為什麼要學《帝王術》

讀者諸君，我們總算已經將馬嘉維里主義從許多方面談過了。最後，你們多半會有這樣一個問題吧：「將這部古典著作介紹給中國的讀者，你究竟希望他們從這部書裏學到些什麼知識？吸取些什麼教訓？」

這是應有之問。我就來回答這個假設的問題，藉以結束這篇冗長的譯後記。

《帝王術》為帝王而作。它教給帝王們以如何奪國與保國之術，以及如何治人和「牧民」之道。如今我們將它介紹到中國來，卻不是要獻給中國的帝王們，也不是要獻給想做帝王的野心家們，而是要將它奉獻給一般的讀者大眾。

可是一般被統治的人民大眾，為什麼要學習與研究這些統治人民的權術呢？為什麼要將這專供「御覽」與專備「御用」的權術介紹給他們呢？

無他，只為了它能幫助人們更好地理解歷史，更好地理解政治，更好地理解一切新舊有冕與無冕的帝王而已。

歷史誠然不限於帝王們的爭城奪國，政治也不限於帝王們的爭權奪利；不過這種爭奪，至少在人類過去的歷史中，確曾起了巨大作用。甚至在今天的政治中，我們也不能否認，它們還在起着不小作用。

《帝王術》是「政治的代數學」（一位大歷史家對它的評語）。其中的希臘羅馬名字，其實可作代數上的符號看的。你可以將異時異地的人名代進去，也可以用今天的新人新名代進去，都能很方便地求得你想尋找的未知數。因此，你若學到了這一門特殊「代數學」，一定能大大幫助你去理解過去的歷史和今天的政治。

我們能從《帝王術》中學到的智識，主要當在於此。

至於教訓，或者教益，我們能夠從《帝王術》中吸取的，當然很多，不過我這裏只想討論一點。

馬嘉維里是「成功至上」論者。雖然他偶爾也曾說過：「可以奪到政權，但是得不到光榮」那一類話，可是在基本上他畢竟是以成功為最高準則的。在他看來，凡是能使人成功的一切手段都屬正當的。反之，凡是給人帶來失敗的種種手段，都沒有價值。這種觀點，這種對世事與歷史的看法，自是最最勢利，最最庸俗的「成王敗寇」論。馬嘉維里，這一無論贊成或反對他的人都不以為他是庸俗的人，為什麼有如此庸俗的看法呢？

一部分，也許可以說，乃由於他太看重軍事，以致把政治看作軍事的繼續之故，在軍事上，在戰爭中，美國的麥克亞瑟將軍說過：「勝利無代替之物」。戰爭之目的在爭取勝利，凡能助成勝利的一切方法和手段都是正當的，凡是帶來了失敗的一切方法和手段都是不對的。在純粹軍事觀點上說來，勝利就是勝利，失敗就是失敗。沒有什麼勝利的失敗，也沒有什麼失敗的勝利。如果有的話，那只是阿Q式的勝利。

這種想法是否對呢？我看不完全對。不過我們不想從純軍事的觀點來討論它。我們這裏必須指出的是：「戰爭是政治的繼續」這個命題是完全正確的，但若倒轉過來，說「政治是戰爭的繼續」，那就偏頗了，本末倒置了，因而是有害了。

（這裏我們順便提一提，毛澤東思想在這個問題上也多少犯了同樣的偏頗病。）

戰爭，只能放在政治的平面上，只能當作政治的一個不同手段來處理，才能產生出最正確的戰略，才能獲致最輝煌與堅實的戰果。相反，如果政治始終從屬於軍事，政治始終為了戰爭；它為戰爭所支配，為戰爭所決定，那末，結果必然是政治上專橫墮落，戰略上短視淺見，以致戰起來未必勝，戰勝了也多半戰果不穩而後患無窮。

這一點，我想可以當作研究《帝王術》而得的一教訓記下來。

這當然不是最重要的教訓。最重要的教訓應該從馬氏的歷史觀和倫理觀中去吸取的。前面我們講過，馬嘉維里所以會有成功至上論的主張，若單從思想邏輯角度看問題，則一方面乃由於他的現實主義的歷史眼光，另一方面由於他的循環復演的歷史觀念。這是形成馬嘉維里主義的兩個因素：一個正確而相當進步，另一個卻錯誤而反動。讀《帝王術》，我們得善於區分這二者，從而吸取其一，擯斥其二。

不過無論正確的也罷，錯誤的也罷，這兩個因素到了今天，在思想上卻只有歷史性的興趣了。因為現實主義的歷史眼光現在已代之以科學的歷史唯物論與階級鬥爭的學說，而循環的歷史觀則早已在事實上和理論上都被人類社會的發展史觀所排斥了。根據這些現代的新的歷史科學與社會科學上的種種發現，我們已經清楚地了解了人類過去歷史發展的過程，了解了推動這個過程前進的諸般動力，同時有根據地預見到人類今後發展的趨向。

不管經過多少轉彎曲折，也不管遭受過多少倒流逆轉，人類的歷史，由於人類社會內部各個構成部分之間的對抗和鬥爭之故，一直是朝着較善與較好的大方向前進了的。今後，由於同樣理由，再加上人們更自覺的努力，這個前進的發展運動將更為加速，更為加大，直至達到人類社會的理想階段——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因而沒有敵對性抗爭的和諧的「大同世界」。

站在前進發展的歷史觀上，對於現實政治中的鬥爭成敗，必須有一完全不同於馬嘉維里的看法了。

這是我們今天讀《帝王術》最應該記住的一點，也可以說是從中應該取得的最大教訓，最大教益。

當人們投身於社會鬥爭時，愈來愈有意識地懷着人類較善與較高制度的實現這個目標，那末，一人一事的成功本身便不可能再是目的，而必須看它對更高與最高目標的實現，是否有所幫助，是否有所促進以為斷了。

在這個意義上說，普通人（其中包括馬嘉維里）的所謂成功，未必就是成功；他們的所謂失敗，也未必就是失敗。「成王敗寇」的老觀念必須作根本性的修正。因為在這個意義上論成敗，不是就單獨一次的鬥爭結果而言，而是就這個成功或失敗對於為實現人類較善與較高制度這個大鬥爭的關係而言，而是就它對這個鬥爭的影響而言的。

新的時代將新的理想主義（它是以現實主義作基礎的）和新的歷史觀結合起來了。這個新結合產生了一種新的成敗看法，一種新的道德標準。這個新看法容許有「偉大的失敗」，也容許有「可恥的成功」；這個新標準會頌讚「捨生取義」的道德，也會譴責「名遂利就」的尊榮。在這樣的看法和標準之下，那種近視的、狹隘的、不惜以任何卑鄙齷齪手段來取得暫時的與個人的成功，那種傳統意義的馬嘉維里主義的成功，該顯得多麼地渺小了啊！

1967年9月雙山記於香港。

注釋

1. 馬嘉維里有時也談正義，譬如在本書的最後一章中，他強調驅逐蠻族與統一意大利是「正義的事業」。有人因此指出他的「自相矛盾」；再有些「馬學」研究者，甚至說這最後一章和前面的獻詞，均出於後人偽造。我們無意於做這種考據工作；不過從馬嘉維里的整個思想看，我們覺得，他把意大利的統一和獨立說成是「正義事業」是非常自然與合理的，只是以其循環的而非發展的歷史觀故，這種「正義事業」只被他看作一套循環中的一次「更新」，因而其意義也就較小了。——譯者（編按：譯者是王凡西）
2. 不必說，中國在春秋戰國時代那兩種方生方死的社會制度，在性質上不同於意大利文藝復興時代正在更迭着的那兩種制度。——雙山
3. 即上面提到過的「五德」——雙山

3. 托洛次基《文學與革命》中譯本 出版小序與譯後記

中譯本出版小序

原著的《文學與革命》，是在 1923 年夏天寫成的。離開現在已快有半個世紀了。

時間有沒有將它的光彩消蝕？四五十年的事變有沒有將它的論點推翻？我們今天是否還有必要將它譯成中文出版？

對於這樣的問題，那位近代傑出的傳記作家，伊撒克·獨意奇，在他所著的《非武裝的先知》一書中，已替我們作了回答。他說：

……即使在現在，距離他的寫作時候已將近四十年（按獨氏此文約寫於 1858 年左右，故云——譯者），這本書仍舊是不可超越的，不僅就其對於俄國文學在其革命的狂飆時期所作的觀察而言，或就其對於史大林主義窒息藝術創造所作的事先的指責而言，都是不可超越的，而且就更為一般的馬克思主義的文學批評而言，也是無人能夠超過它的。寫作此書，著者對於藝術與文學具有親切的感情，他賦有獨特的洞察力，他發揮着迷人的神采與智慧，而在結尾的段落中，他更顯出一種想像力——提昇到詩之莊嚴的那種稀有高度的想像力。（見《非武裝的先知》，180 頁。）

不過，自從獨意奇氏寫下那幾句話以來，十幾年又過去了。在這十幾年中，是否已有在這方面的新書超越了它，或者，是否已有新的史實發生出來，使這本書成為過時與無價值的呢？

首先，就我們所知所見，並不會有什麼新書能蓋過《文學與革命》的。其次，遠為重要的，我們看見了一個新的事變，發生於此一時期中的，那就是由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這個新事變非但沒有在任何一方面「推翻」了《文學與革命》所代表的意見，而且，恰好相反，它以最標準的「反面教材」的資格，以無比明確的方式，反證出了《文學與革命》一書中所提出的一切論斷。

因此，《文學與革命》這本古典著作，現在比之以前，有更充足的理由，有更迫切的需要，要將它翻譯成為中文，以便供獻於剛剛從毛氏「文化大革命」的震駭中清醒過來的中國讀者們。

* * *

其實，我們這個譯本，早在十一年前就完成了的。同時，它也不是第一個中譯本。據我們所知，早在1928年，它就在魯迅的贊助之下，已經由李霽野譯出過並且出了版的。此外，從魯迅給李霽野的信中，我們又得知此書還曾由傅東華翻譯過，連續發表在報紙上。傅譯似乎不曾出過單行本，李譯則我們看見過，當時彷彿還相當暢銷；它對於中國二十年代後期的文學青年，曾經發生過一點影響的。魯迅本人關於革命與文學的見解，顯然曾受過此書影響。他於1927年4月8日在黃埔軍官學校所作題為《革命時代的文學》的那篇演講，其中論點，幾乎全部與托氏在《文學與革命》中所闡明者相吻合。

可惜的是，隨着蘇聯共產黨內左右兩派的鬥爭，接着左派的失敗，以致連托氏關於文學的書籍也被列為禁物。受着史大林一系所控

制的中共，以及圍繞中共左右的左傾的中國文藝愛好者們，對於托氏的文學見解，因而就不得不避之則吉了。魯迅，這個最有獨立思想，骨頭最硬的文人，也不得不把他一度介紹，一度接受的有關文學與革命的見解，放在一邊，或至少隱而不言了。

在這樣的情形中，《文學與革命》中譯本之從書籍市場上完全失蹤，乃是極為自然的事。

不過，李譯中文本的「失蹤」，若就譯文而論，倒也不是太可惜的；因為，當時的翻譯者，大多對俄羅斯革命及其文學流派的情形，知道得很不充分，所以翻譯起來常常遇到很大困難，無法克服，以致譯文弄得晦澀難解，甚至有不少錯誤。

很久以來，我們就想把這本古典著作再一次地譯成中文。這個願望，總算在 1960 年實現了。可是譯出之後，卻始終找不到任何一位出版家肯替它出版。一經擱置，轉眼已是十餘年。在此期間，我們目睹了本書不幸而言中的事一一發生，卻又眼見到著者的高瞻遠矚被深深隱沒，使人無由得見，我們此時所感受到的焦躁與無奈，真是難以用言語形容的。

不過現在好了，得到「信達出版社」主人的慨允，這本到處碰壁的譯稿終於能夠出版了。我於欣喜之餘，謹懷着這樣一個願望：當「文化大革命」將文學與革命的關係問題，以極其粗暴、極為具體而且極不含糊的方式向人們再度提出之時，希望我們這個譯本能受到廣大能思想的中國年青朋友們的注意和研究。

1971 年 6 月譯者序於香港

譯後記

如果不從神秘的與唯心的角度，但從根本上是唯物論的觀點出發，那末我們可以承認黑格爾派的一種看法。即即承認民族的歷史發展是有「氣運」的。在特定的一個歷史階段上時常有一個特定的民族來體現歷史的主流，充作全人類進化的先驅。

俄羅斯人的「氣運」，從世界史的眼光看，應該說開始於十九世紀初期。而這「氣運」首先表現於「文運」上面。由思想家倍林斯基及詩人普希金開頭，在後繼的一百年中，產生了一長串世界第一流的思想家與文學家。他們各自在成就上趕上了並且最後超過了英、法、德的先輩。

這方面的史實過於明顯，以致無須說明的。

這裏我要特別促請讀者注意的一個現象，那是：這一系列最傑出的俄羅斯思想家們，簡直沒有例外地，都一身兼具了三種主要資格：政論家，革命家與文藝批評家。從倍林斯基起，中經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洛留卜夫，比沙了夫，一直到普列哈諾夫，列寧與托洛次基，可以說都是如此。雖然因為歷史條件的限制，前幾位大師偏重於政論家與文藝批評者方面，後舉的幾位則較多表見為實行的革命家。可是這中間一脈相承的關係卻屬顯而易見。

因此，完成了俄國十月革命的列寧與托洛次基，就國際的思想說固然是馬克思，恩格斯的衣鉢傳人；但就俄羅斯思想發展史說，卻又是本國進步思想的繼承者，是十九世紀那批偉大的文藝批評家們的繼承者，是他們的發揚光大者。

在此一意義上，托洛次基這一本《文學與革命》代表了俄羅斯民族「百年文運」的頂點。它結束了這個偉大的傳統，將民族的傳統擴大成國際的傳統。這個擴大配合着史大林統治的興起，似已將此一「文運」終斷了。三十餘年來，我們不曾在蘇聯見過任何可以承接此一傳統的文藝批評。「氣運」已在移轉，此後「管領國際騷壇」的人物，多半要在其他「交運」的民族中得之，而且必然要以《文學與革命》為出發點的吧。

* * *

這本書的成書經過，著者自己有過一段說明如下：

關於文學的我的書籍，最初，有些人們或者還記得的吧，是用了論文的形式，在《真理》上發表的。這書是費了兩年工夫，我在兩回的休養期中寫好。（見《魯迅譯文全集》第五卷，82頁。《關於對文藝的黨的政策》中托洛次基的發言記錄。）

這裏我們還可以加一點補充：所談「兩回假期」，指的是1922年和1923年的兩次暑期休養。托氏在第一個假期中，最初着手來寫的，本不是一部書，而只是一篇序。因為那時候，國家出版局準備把托氏在革命以前有關文學所寫的文字，編成他全集的一。托氏答允給它寫一篇序文，談談革命以後的俄國文學。誰知一上手卻「不能自休」，在質和量兩方面都大大超出了預計。1922年的夏天沒有寫完，假期完結後又無法續寫，一直要等到次年的暑假，他才把全書寫成。書出版於1924年。在出版前，其中許多篇章曾經在《真理報》上先行發表過。

不過使我們感到興趣的倒不在此書如何寫成，而更在於它是在怎樣的年月中寫成，在怎樣一種環境中寫成，在著者幹着怎樣一些工作的同一時候寫成的。

我們知道，當俄國內戰時期，本書著者是蘇維埃政府的軍事委員會主席，是他組織了軍隊，也是他，直接與密切地指揮了戰爭的。1920年，內戰以紅軍的勝利而告結束，此後托洛次基便將全副精力投入了國家經濟的恢復工作中，特別從事於全國鐵路運輸的整頓。同時他還繼續擔任着軍事委員會主席之職，直到1925年1月。這期間，西歐革命正處於第一個浪潮消逝，與第二個浪潮興起之間，東方殖民地解放運動開始爆發，特別是中國革命日見壯大。在蘇聯內部，這期間發生了列寧的病和死，發生了大躍進後的初次反動：新舊資本主義分子在經濟上活躍，官僚主義分子在政治上抬頭，這兩個反動勢力結合起來，首先打擊着主張不斷革命的托洛次基。由於他在黨內和政府中所負的責任關係，他必須對發生於國內外的一切革命事變不但要密切注意與研究，而且還要作出指導和批評；又由於他代表着與堅持着布爾雪維克的革命傳統之故，他不得不向黨內外的反動勢力進攻，並從事於對抗反動進攻的防禦。這樣，托洛次基在那一時期的生活可以說是異常緊張的，其心情可以說是相當痛苦的；其緊張不稍遜於十月革命與內戰時期，而痛苦則更甚於他在黨內鬥爭確定失敗以後。可是就在那個時期，他卻忙裏偷閒地寫下了諸位剛剛讀完的這本著作：《文學與革命》。

這簡直是令人吃驚，甚至叫人無法相信的事！因為，你們讀過了那本書，自然知道，它和後來共黨世界中習見的那種黨官們八股式的「指示」根本不同——在量的方面，也更在質的方面。這位紅軍的最高長官對文學所發表的意見，非但不顯得「外行」，而且比「內行」的更內行。他那分析的精深微妙，見解的公允遠大，尤其對文學與革命二者之間關係的剖析與展望，竟是如此透徹，如此坦率，它道人之所不敢道，言人之所不能言——以致這樣的「指示」，莫說當時的內行中無

一人能作，便是直至今日，也還不曾見過哪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文學批評家能彷彿及之。

著者在書中批評了俄國當代的與過去的許多作家，可是沒有一個地方憑着印象，憑着臆斷，或僅憑耳食之言。著者讀了他所批評的所有的書，不論小說、詩歌、戲劇或者論文，他都仔細地讀了才下判斷的。批評家原該如此的吧？你也許會這樣想。可是，如果你知道流行於史大林主義者統治下的所謂「文學批評」，特別是有地位的高官們所做的「文學批評」，他們如何斷章取義，如何憑空亂說，如何的對人不對言，如何的張冠李戴，那末你就會覺得《文學與革命》著者那種審慎細緻，絕對不許粗暴的態度是如何可貴。再者，你得記住，著者是在怎樣緊張忙迫的環境中讀了這些「無聊」書的！想想這些，我們就無法不驚奇於著者精力的充沛，對待學問的真誠，興趣之廣博，用功之精勤，以及智慧之卓絕了。

* * *

托洛次基在那個時期從事「文學批評」，並非由於一時興會，也非為了緊張工作中的精神調劑。這和他所有別的文字工作一樣，是為了完成一樁客觀需要的任務。

任何一次具有深度的羣眾革命，都得牽涉到人類社會的所有方面。偉大的無產階級十月革命自然更加如此。舊的階級統治被推翻了，舊的文藝流派也大多同時完結了，甚至舊時代傳下來的優秀作品，也都顯得與新時代格格不入，當不得新一輩代人的精神糧食。新的制度期望有自己的文藝，而創造着新事的新人們，則要求自己或別人能把那新的激情與新的想像在新的文學與藝術中表達出來。這種期望和要求就必然要引起一種既深且廣的革故樹新的文化大運動。

文化運動總是發生於革命之前，沉寂於革命激戰之時，再發生於新政權穩固以後。俄國的情形亦是如此。當二十年代初期，蘇聯軍事底定，經濟略甦，文化建設問題就提到前面來了。圍繞着對舊文學與舊文人的態度，新文學應有的性質，以及無產階級政權對文藝的創造活動應否領導與如何領導等等問題，蘇共黨內乃至一般的文藝工作者中發生了種種意見，進行了激烈爭論。

《文學與革命》便是為了參加這場爭論，並提出著者積極的意見而寫的。

關於那場爭論進行的實際情形，我們在前面注釋裏只做了一點十分簡短的敘述，這裏也不擬詳細介紹。不過對於真有興趣的讀者，我們卻很希望他們能讀《魯迅譯文全集》第五卷中的《文藝政策》，其中包含有如下幾篇重要文字：一、我們在前面提到過的，1924年5月9日蘇共中央委員會召開的文藝政策討論會的發言紀錄；二、1925年1月第一次無產階級作家全聯邦大會的決議；三、1925年7月1日公佈的蘇共中央委員會關於文藝政策的決議；四、日人岡澤秀虎作的《以理論為中心的俄國無產階級文學發達史》。這些文字不但可以幫助我們更清楚了解托洛次基的文學思想，而且可以讓我們看到共產黨文藝政策的演變之跡。

那場爭論具有重大意義是毋須說的。它反映了當時俄國文藝界的真實情況；記錄了無產階級專政在歷史上第一次處理文化問題時的種種正確的以及幼稚而錯誤的想法；它首次鄭重地考慮了社會主義建設與文藝活動的關係；並且更重要的，它代表着一個原則性的、因而是普遍性的矛盾，即：由於主客觀原因必然要帶有甚大強制性的工農政府，如何才能正確對待那個本質上必須享有充分自由的文藝創造活

動。那場爭論是觸及了所有這些問題的，尤其是托洛次基的發言及其著作，更是基本正確地解釋了與解決了那些問題。今天，離開那場爭論已有三十六年了，無論在蘇聯或蘇聯以外的共產黨統治的國家裏，發生了多少次有關乎文藝政策與創作方針的爭論，發生了多少次對於作家的批判和鬥爭。可是無論在哪一次爭論或鬥爭中，我們卻再也看不見1924年前後那場爭論中顯露出來的活潑生氣與坦白真誠了。以後的歷次文藝思想的爭論，其實根本算不得爭論，而只是對某一失寵作家的公訴公審吧了。這裏一般地反映着蘇聯與共產黨官僚化墮落的深刻，特殊地也反證出共產黨如果採取了違反乎托洛次基在《文學與革命》中所確定的立場，則「無產階級的」或「社會主義的」文學會被弄成如何的醜惡。

因此，為了反對史大林主義的文藝政策，我們今天不但要研讀托洛次基那部巨著：《文學與革命》，而且還應該重讀當年討論的所有意見，以便知所取捨，知所警惕。在回顧中汲取教訓，藉以堅定我們今後的方針。

史大林黨官僚們大概是懂得這點事理的，所以他們不僅一筆抹煞了《文學與革命》，而且用盡力氣來醜詆那次文藝爭論。例如在蘇聯官定本的文學史上，對於參加那項爭論的人，不論是擁護托洛次基觀點的，或代表史大林借題發揮來打擊「托洛次基主義」的，都被宣佈為：「被推翻階級的代表」，「仇視蘇維埃政權的人」，「反革命分子」，「偽裝的人民公敵」與「暗害分子」。（請參閱蘇聯季莫菲耶夫著：《蘇聯文學史》中譯本卷上，239-241頁。）

這樣的《文學史》，讀者們如有興趣拿來和《文學與革命》及魯迅譯的《文藝政策》對比一下，倒真的是最好的反面教材哩。

* * *

不久以前，出版了托洛次基流亡法國時期的一些日記。在1935年3月9日的一則裏，他提到了小托爾斯泰的小說《彼得大帝》。日記中加以稱許，認為是一項成就。接着他又寫了如下文字。

不過在任何意義中都不能因阿·托爾斯泰的小說而說新時代已開了「花」。為什麼不能如此說，其理由我們已經說過了。被官方當作「無產階級藝術」（在完全取消了階級的時期中！）的那些小說，在藝術上還是完全的不足道。當然，這情形是一點也不會令人驚駭的。要使社會基礎，人的習狀與抱負完全倒轉過來，以便沿着新的軸心去產生藝術的結晶過程，那是需要一些時間的。需要多少時間？不能隨便答覆，不過時間總要很長。藝術總是運載在新時代的行李車中的，而偉大的藝術——小說——則是一件特別笨重的裝載物。迄今不曾有一件偉大的新藝術品產生出來，乃是非常自然的事。這正如我剛才所說，不應該與不可能叫人驚駭的。能叫人驚駭的倒是這些令人噁心的，奉官僚命令而作的對新藝術的模仿。目前「蘇維埃」邦那帕脫制度企圖對藝術加以無限的管制，而這個制度的不合適、虛偽與愚蠢；使任何藝術性的創造活動變作不可能了。因藝術創造的第一個條件是誠實。一位老技師多半能不情不願地製造一具渦輪，道架機器也許不會是頭等的，正因為這不是他心甘情願造成的，它總還可以當渦輪用，可是要人不情不願地寫出一首詩來卻辦不到。

阿萊克先·托爾斯泰把自己後退到十七世紀十八世紀之初去並非偶然的，為的可以獲得那為藝術家所必不可少的自由。（見英譯本，46頁。）

對於史大林主義的（亦即毛澤東主義的）文藝政策的荒謬反動之處，很難寫出比這段話更簡單扼要的批評了。因此不再需要我們多所辭費。

最後有一點還須聲明：這譯稿所根據的本子是 1957 年 9 月的英文再版本，紐約羅素書店出版。【朱正按 1992 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根據 1923 年蘇聯紅色處女地出版社出版的原本譯出，內容比這個底本完整。】

1960 年，7 月，惠泉記

4. 解 嘲

《三齣小戲》（代序）

南來十多年，看過港澳中學校學生們演出的幾次戲。我很佩服目前年青人，特別是那些女孩子們的表演才能。他們活潑大方，毫無忸怩之態。回想起我們自己讀中學時代，偶爾演戲時候那些同學們（尤其是女同學們）的拘謹，板滯，害臊得無所措手足的情形，真不可同日而語。

雖然如此，每次看了戲後，總還是有不滿之意。

原因是什麼？我想，大抵在於劇本不對頭。

譬如有一次，看了一齣「悲劇」，戲名已經忘卻，情節大致是這樣的：有兄弟二人，年歲相差無幾。哥哥新婚，恰巧碰上了戰爭。新郎從軍去，家中留下了年青的妻。

消息傳來，哥哥不幸陣亡，弟弟為了同情嫂嫂，撫慰有加，感情逐漸增進，結果竟超過了叔嫂之間的關係。父母看出了這個情形，非常難過，卻又無可如何，終於只好默認了。

編按：《三齣小戲》包括三個小戲《收音機畔》、《妙手回春》和《兄弟奇俠傳》。1968年12月在香港周記行初版，為「雜錦叢書」之一。

戰爭結束，這個原說已經陣亡的哥哥，卻證實只斷一足，這時又突然回家來了，於是形成了極不尋常的三角關係。

在萬分痛苦中，三人彷彿都曾準備自殺以謀解決，而結果卻誰都不曾這樣幹。最後好像是由母親或由父親出了主意，毒死了長子——這樣算是解開了難解的死結，並且造成了「悲劇的高潮」。

我不想批評這個戲的好壞。

我只覺得這樣一個戲，讓十五六歲的中學生來演，在學校的禮堂裏演，演給同樣年齡的乃至更小年齡的（該校有小學部）同學們看——實在一無是處。就演者言，他們是不知所云，光背台詞，甚且裝不懂以為懂，濫做表情，想以此造成劇作者和導演所要求的「悲劇氣氛」。就環境言，這演出活像是聖壇跳裸舞，壽堂辦喪事，硬是不調和，硬是不對勁。就觀眾言，那末大多數（同學們）是看了莫名其妙，不知悲從何來；而小部分人（家長們和教師們）則看得瞠目結舌，毛骨悚然。

這樣的戲劇活動，至少不能說是成功的。

後來，有一年，那間學校的學生忽然轉請我的一個朋友L醫生去當導演了。他接受了邀請，卻要我給他找找劇本。當時我就將我以前看戲的感想對他講，原來他是早有同感的。於是我們便決心要給學生們找一齣合適的戲。我們尋找的標準是：容易演，角色要能為中學生所了解者，有點教育意義，卻不要枯燥的說教；情節不宜繁重，佈景可以簡單者。換向話說，我們所要找的是一齣適於學生演，適於在學校演，並且適於為學生演的小戲——最好是獨幕。

懷着這樣的目標，我們找遍了圖書館，跑遍了書店，問遍了朋友，卻終於還是失了望。

並非獨幕劇難找，亦非好戲無有。恰恰相反，獨幕劇多得很，好的也有的是，我們之所以遍訪無着者，只因它們多數是太好了，不合我們之用耳。合了這個條件，便不合那個標準；合了那個標準，卻又不合這個條件。總之是：我們找不到一本戲，能完全適合我們的特殊願望的。

但是，戲必須演，這是學校的傳統，也是應屆畢業班同學們的「面子」——他們死纏住了L醫生。

醫生要我「幫忙」——剛巧我那時也正有「幫忙」的興趣，結果便寫了頭一個小戲《收音機畔》。

後來，在同樣情形中，又先後寫了《妙手回春》和《兄弟奇俠傳》。

這樣草率寫成的戲，為特殊的簡陋演出而寫作的戲，演出過後，幾個破破爛爛的油印本子，照例和其他同樣草率與簡陋的佈景和道具一起，給送進了垃圾箱。這，我相信，原是它們應該送去的地方。所以我從來不曾想把它們出版過。

可為什麼終於又印出來了呀？

也許領導或幫助學生演戲的人們中，有不少抱着我們同樣的感想吧，大概他們也曾像我們似的遍尋過合適的劇本而終歸失望的吧。因為，我們這幾個極不像樣的小戲，雖然每次演完都棄之如敝屣，卻差不多年年有人來「商借」，年年有學校拿去上演。甚至，有時非常出乎

我們意外的，竟演出在我們全不相識的人們中，演出在很遠的地方。譬如，《收音機畔》曾經在新加坡的南大演過；《妙手回春》曾經在緬甸的一兩間華僑學校裏上演。

為了同道們不必再來「商借」，也為了「商借」去後再毋需抄寫油印，我們索性將它們印出來了。

雙山 1968 年 3 月 1 日序於香港。

5. 伊·多伊徹《流亡的先知》與 中國托洛次基主義運動

我的意見和更正

周仁生譯

約在十年前，我讀了伊薩克·多伊徹的《托洛次基三部曲》。此書，文體流暢，內容翔實，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同時，我也在第三卷，即《流亡的先知》中，在談到中國托洛次基主義運動史及陳獨秀的作用時，發現若干值得更正的地方。我記下這些要點，並打算給作者寫信，告訴他書中的錯誤。然而，由於其他更迫切的任務，使我無法做到這一點，甚至直到這位傑出的傳記作者逝世時，我仍然沒有實現自己的願望。

現在，為了希望在《三部曲》的新版中，能改正這些錯誤，我給作者夫人，塔瑪拉·多伊徹寫了以下的意見：

I. 原文 32 頁（中譯本，35 頁）：「……1928 年，他們（指中國托洛次基主義者——凡西注）召開了中國反對派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其中某些人主張與毛澤東結盟；那時共產國際對毛澤東不滿，因為在 1925-27 年之間他的觀點往往與托洛次基不謀而合……。」

編按：王凡西這篇《我的意見和更正》和多伊徹夫人致王凡西的信，原計劃作為中譯本《先知三部曲》的附錄發表。後未採用。王凡西的更正只在中文本中用編者注的方式簡單地指出。

在這段文字中，有三點不實之處：

一、中國反對派首次全國代表大會，是在 1931 年召開的，而不是 1928 年。這次大會的全名是中國托派統一代表大會。1928 年召開的是一次代表會議，是「我們的話派」的代表會議。「我們的話派」是中國托派四個派別中最早成立的一派，稍後不久便統一到同一個組織中了。

二、根據我的記憶，中國托洛次基主義分子中，從來沒有人希望同毛澤東結成聯盟。在中國青年托洛次基主義分子與陳獨秀之間，曾就湘、贛等爆發農民起義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1927 年，當陳獨秀確定地轉向托洛次基主義之後一年，他寫了一篇論朱、毛領導「紅軍」問題的文章，而引起這場爭論的。陳獨秀在他的文章中，採取否定態度批判農民起義，並認為起義是毫無前途的。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青年托洛次基主義者採取較積極態度，表示在政治上支援農民戰爭，特別強調要保衛武裝起來的農民縱隊，反對國民黨的鎮壓措施。但是，這個立場決不能被解釋為希圖與毛澤東聯盟。

三、1925-27 年間，毛澤東的立場並非與托洛次基的立場一致。人們可以說，蘇維埃問題上，他們的立場是一致的，因為在 1927 年春天，甚至早在 1926 年年底，托氏已為中國革命提出了蘇維埃口號，而毛澤東只是在 1927 年秋天力圖提出同一口號，毛要在蘇維埃口號下發動秋收起義，但遭到了來自共產國際的反對（見愛德格·斯諾《紅星照亮中國》第一次修訂版、擴大版，165 頁。）。但是毛本人從來沒有對托洛次基的立場，甚至在蘇維埃問題上表示出同情或支持。誠然，共產國際通常對毛是不滿的，但這有另外的原因，特別因為毛過分地保持獨立思考，這跟他的立場偶而與托洛次基一致這個事實顯然是毫無共同之處的。

II. 原文 32 頁注釋（中譯本 35 頁）：「1929 年夏或秋，一個反對派分子林澤從莫斯科返回中國……」。

林澤，實際上是劉仁靜的化名，他於 1929 年夏，前往普林基普島拜訪托洛次基。1921 年 7 月，中國共產黨舉行建黨大會，劉仁靜是參加大會 12 名代表中的一名。1927 年當他還在莫斯科列寧學院學習時，他已成為托洛次基主義者。1929 年回到中國後，成為中國托洛次基主義運動的領導人之一，後來又幫助伊羅生收集有關中國問題一書的資料，此書寫成以後，題名為《中國革命的悲劇》。1934 年他被國民黨政府逮捕，此後便離開了托洛次基主義運動。

III. 原文 423 頁（中譯本 455-456 頁）：「……在中國，即使他反對史大林 1925-27 年間的政策曾產生過最強烈的印象，但第四國際在那裏也沒有能當得起『支部』這個稱號的組織。一些活動於地下、困於極度的貧窮並受到國民黨政府和史大林主義者圍剿的托洛次基派成員成立了一些小組，在上海有二十幾人，在香港有幾十人，還有分散在中部和東部的少數人，甚至在陳獨秀贊同托洛次基主義之後，他們也未能擺脫孤立。」

中國托派分子的人數，常有變動，而且變動幅度大。中國的托派分子是在 1928 年開始組織活動的，到了 1952 年就被毛主義者全數撲滅。在這段時期內，托派黨員確實有時降低到「上海只剩下二十多人」（這是在反動統治下最黑暗的時期，即從 1932 或 1933 年起直到 1937 年上半年止）。但也有人數較多的時期，例如 1932 年以前及 1945 年之後，這兩個時期的黨員人數上升到遠遠超過「數十個人」。統一大會召開時，中國有近 400 托派分子（「我們的話派」有 160 人，「無產者社」有 120 人，十月社有 70 人，戰鬥社有 40 人）。這個數字，還沒有把關

押在史大林監牢中備受折磨的大約 200 名中國托洛次基主義者包括在內。1945 年以後，特別是在 1946 年-1949 年這幾年內，中國托洛次基主義者已經分別參加了兩個各自獨立的黨，即國際主義工人黨與中國革命共產黨。最後，在 1952 年，當毛主義者對托派分子進行全國性大逮捕，單就被捕的托派分子來說，大約有 300 人^[1]。

IV. 原文 423 頁（中譯本 456 頁）：「……陳獨秀在監獄裏被關押了六年，出獄後，他被放逐到重慶附近一個偏僻的鄉村，被禁止參加政治生活，也不能出版自己的著作。他過着半飢半飽的日子，生活在恐懼之中，為 1927 年失敗承擔的罪責壓彎了他的腰。甚至托洛次基派成員也不信任他了。毛主義者對他大加指責。他被奸細包圍着，蔣介石的警察又以謀殺威脅着他，於 1934 年把他重又投入監獄，並暗殺了他。」

有關陳獨秀的這段文字，有許多失實之處。第一，陳獨秀不是被放逐到重慶。事實上，1937 年秋天，他從南京監獄釋放出來後，首先來到武漢（是出於他的自願的）。武漢是國民黨政府第一個臨時首都，那時武漢是中國主要政治中心。陳在武漢曾兩次發表公開演說，並廣泛地、多方面地與各種政治傾向的人士接觸，特別是同站在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小黨派人士進行接觸。1938 年秋，當武漢被日本帝國主義侵佔之前約一個月左右，陳獨秀前往四川省，在重慶附近的一個小城江津定居下來。

其次，陳獨秀再也沒有被國民黨政府逮捕或監禁過，也沒有遭受蔣介石特務警察的毒手。相反，他於 1942 年 5 月 27 日，因病死亡。

第三，陳獨秀定居江津時，生活極端艱苦、極端貧窮，並遭受特務分子的包圍、監視，這是完全確實的；但可以肯定地說，他決沒有

因對 1927 年大革命失敗的責任感，使他內心羞慚，終至精神崩潰。陳獨秀對 1925-27 年革命的失敗，願意承擔相應一部分的責任，但斷然拒絕充當史大林和布哈林的替罪羔羊。自從 1929 年他寫下《致中共中央的信》和《告全黨同志書》以來，陳一貫保持這個立場。諸如自責、遺憾、悔恨等情緒，同陳獨秀的個性是格格不入的。

第四，儘管陳獨秀與中國托洛次基主義者有過激烈的論爭，但他們，尤其是托洛次基本人，決不會不信任他。（如果不是這樣，那就無法解釋為什麼托洛次基那樣力盡一切地關心陳獨秀的命運。）他們之間的爭論無非是有關基本問題以及策略問題。爭論的內容，回頭我還要談到。

V. 原文 423 頁（中譯本 456 頁）：「1938-1939 年，托洛次基進行了一次徒勞的嘗試，想把他從中國救出來，指望『他能在第四國際起到與片山潛在第三國際同樣的作用……能給革命事業帶來更大利益。』但陳獨秀認輸了，陷入了極端的悲觀主義。」

為了更好地理解為什麼托洛次基寫信，力圖說服陳獨秀離開中國，以及陳對這幾封信的答覆究竟說了些什麼，我不妨對當時發生在兩人間通訊往來的國內外形勢，簡單地說幾句話。1938 年，正是莫斯科製造最後一次審判案的一年。那年 3 月 2-15 日，布哈林，李可夫及其他老布爾雪維克被帶上法庭受審，並被處決。早在一個月前，即 2 月 16 日，托洛次基的兒子，里昂·西道夫已被史大林派遣的格柏烏殺害了。作為國際反托洛次基主義運動的一部分，直接由史大林派往中國的頭號代理人王明，於同年 3 月 15 日，在武漢發動一場反對陳獨秀的誹謗運動。他們無恥地指控陳是為日本帝國主義效勞的間諜，每月向日本特務機關領取 300 元津貼。托洛次基在這方面是有高度警覺性

的。早在1937年，即當中日戰爭爆發時，他心中早已存在着如何保護陳獨秀以及中國托洛次基主義者免遭史大林分子迫害的問題。他並不確切地知道中共將如何羅織罪名，企圖陷害陳獨秀，但他根據自己的認識，自己的經驗，清楚地知道史大林如何對付反對派的辦法的。因此他堅信，史大林定會通過他在中國的代理人，採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來迫害中國托洛次基主義者，特別是陳獨秀本人。他甚至考慮到，中國史大林分子有可能採取暗殺的手段。這就是托洛次基力圖要陳離開中國的主要理由。他希望陳能在第四國際中起到片山潛在第三國際中所起的同樣作用，這也是真實可信的。但這顯然不是他的主要理由。

托洛次基寫給上海一個托派分子的兩封信（日期是1938年2月5日和6月25日），是由專門信使帶到四川的。陳在收到這兩封信時便作了答覆，也許為了安全，也或許因為信不是直接寄給他的，他的答覆不是以信的形式，而是以論文或聲明的形式發出的。注明的日期為1938年11月3日。《流亡的先知》的作者，正是從這「長篇論文」中，引證陳獨秀的觀點，作者把這觀點描述為「極端的悲觀主義」。實際上，陳在他論文中所表達的觀點，決不能認為是悲觀主義的，如果我們再深入到那個時期，他的基本論點，那就更不是悲觀主義了。如我們所知，1935年左右，當他仍在國民黨獄中時，深受莫斯科審判案以及蘇聯官僚層不斷蛻化墮落的影響下，陳獨秀開始重新考慮布爾雪維克關於資產階級民主的傳統立場。後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了，他把新的看法應用到民主概念上，他堅持認為，革命的社會主義者和共產黨人，決不應在民主帝國主義國家中採取革命失敗主義立場。最後，於1940年12月，他在稱為〈我的根本意見〉一文中，寫下他的觀點，現在我從他的十五點意見中譯出如下四點：

(八) 民主主義是從人類發生政治組織，以至政治消滅之間，各時代（希臘、羅馬、近代以至將來）多數階級的人民，反抗少數特權之旗幟。「無產階級民主」不是一個空洞名詞，其具體內容也和資產階級民主同樣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特別重要的是各反對黨派之自由，沒有這些，議會或蘇維埃同樣一文不值。

(九) 政治上的民主主義和經濟上的社會主義，是相成而非相反的東西。民主主義並非和資本主義及資產階級是不可分離的。無產階級政黨若因反對資產階級及資本主義，遂並民主主義而亦反對之，即令各國所謂「無產階級革命」出現了，而沒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劑，也只是世界上出現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權，殘暴、貪污、虛偽、欺騙、腐化、墮落，決不能創造什麼社會主義……。

(十) 此次世界大戰，自然是兩帝國主義的集團互爭全世界霸權的戰爭。所謂「為民主自由而戰」自然是一種外衣，然不能因此便否認英、美民主國家尚有若干民主自由之存在……「消滅希特勒的納粹黨徒」為各民族共同進攻之總目標，其他一切鬥爭，只有對於這一總目標有正的作用，而非負的作用，才有進步意義。

(十一) 在此次帝國主義大戰中，對民主國家方面採取失敗主義，採取以國內的革命戰爭代替國際的帝國主義戰爭的方略，無論口裏說得如何左，事實上只有幫助納粹取得勝利……。

顯然，陳獨秀此時關於民主和帝國主義戰爭的觀點，已經遠離了列寧和托洛次基，難怪所有的中國托洛次基主義者群起而反對之。但這決非意味着他的精神正在崩潰下去。直到臨終，他還始終為他的新

觀點作頑強的鬥爭，在他生命結束之前僅僅只有十四天了，他還寫了〈被壓迫民族之前途〉一文。

VI. 原文 423-424 頁（中譯本 456-457 頁）：「然而他仍不時地分析中國形勢，十分透徹地指出托洛次基主義在什麼地方和為什麼受挫。在第四國際宣佈成立兩個月後所寫的一份聲明裏，他直截了當地解釋說，為什麼要依靠農民，而不是（像早先托洛次基與他本人所認為的那樣）依靠城市工人。日本人破壞了中國一些最先進地區的工業；因而，『中國工人階級在數量上、物質上與精神上都被削弱了，倒退到三十至四十年前的條件下』。因此，將革命的重心放在城市的觀點是錯誤的。『如果我們今天不理解將來的政治形勢會向何處發展，不承認中國無產階級十分弱小以及其政黨所處的地位，那麼我們就等於是坐井觀天，由於自滿自大而痛失良機』。他繼續寫道，托洛次基派成員常因其宗派傲慢，對毛主義採取完全消極的態度以及無視抗日戰爭的需要，使自己脫離了現實政治生活。他擔心，第四國際的建立只會加強他們的『傲慢與孤立』，而這場冒險將以破產告終。」

這段文字引證了陳獨秀與中國其他托派分子的爭論，並且加以闡述，現在我要說的有三點意見：

一、「中國工人在數量上，在物質上，在精神上都退到三四十年以前的狀況」，陳獨秀在這段時期內已把這一事實，反覆強調多次，但從這一前提出發，陳獨秀並沒有得出結論說「中國革命運動必須依靠農民，而不是（像托洛次基和他本人所期望的）依靠城市工人。」陳獨秀從未懷疑或曾動搖過這樣的立場：即為了取得中國革命的勝利，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領導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有不同看法的話，那就是

過分強調了無產階級領導的重要性（強調到把真理變成了荒謬），當他把無產階級領導這個概念應用到國際範圍內時，竟把各主要的大國比作無產階級，而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比作農民，他說：「不能幻想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獨立戰爭，不和帝國主義國家的社會革命結合起來，會得到勝利。」（見陳獨秀《我的根本意見》中的第十五點）。因此，陳獨秀並沒有認為，中國農民能取代中國工人階級，成為中國革命的領導力量。當他認識到「中國無產階級的現實力量及其政黨的情況時」，陳獨秀僅僅把希望寄託在帝國主義國家爆發社會革命上；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可以把陳看作是悲觀主義的，因為他不相信，在帝國主義國家爆發社會革命之前，中國社會革命是能夠獲得勝利的。

二、然而，從另一個意義上來說，他並不是悲觀主義的。儘管他還有上述觀點，但他並不採取觀望態度，他也沒有躺下來，拋離一切希望。依他之見，中國革命者，包括中國托洛次基主義者在內，在他所設想的條件下，應當先盡一切力量去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積極參加抗戰，拿起武器，依靠農民，並同一切抗日的民主黨派聯合起來，共同行動，一方面反對國民黨，另一方面反對中國共產黨。只要通過這樣的努力，他堅信，如果社會革命能在一個或多個帝國主義國家裏爆發出來，我們就有可能在即將來到的中國革命中發揮領導作用，並把革命領導到勝利。（在此，我必須提到一件事，即1937年冬天，陳在武漢時，曾試圖在國民黨的軍隊中工作，但這個試圖沒有取得成功。）

正是根據這一積極而又有悲觀主義色彩的立場（這一立場是否正確或錯誤，那是另外一個問題了），陳在寫給托洛次基的那份聲明中，他才責備中國托派分子為「宗派主義的妄自尊大，清一色地以否定態度對待毛主義，而對於抗日戰爭的必要性，卻缺乏敏感性」。也正是從這個立場出發，他才認為中國托派分子要對「脫離政治現實」負責。

三、就我的記憶所及，陳獨秀在聲明中，抨擊中國托派分子的「自滿情緒和虛幻的錯覺」，並不是同第四國際的宣言聯繫起來的，他從未說過「這種冒險行為只能以破產告終」。然而在這一點上，我自己也並無把握，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對照 1938 年 11 月 3 日所寫的聲明原文加以核對，而此時這份聲明還保存在「密封的檔案」裏。

VII. 原文 424 頁（中譯本 457 頁）：「他本人傾向於時而同國民黨，時而同毛主義妥協，但既不能也不願同前者或後者結盟。在餘下的悲劇性的歲月裏，他一直是個垮掉了的人。」

考慮到陳獨秀在民主立場上的改變，人們很可能設想他或者定將與國民黨的舊式民主主義妥協，或者與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妥協。但是，作為陳獨秀的朋友之一，作為他晚年思想轉變的反對者，我應當說這是不符合事實的。事實是：直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刻，他仍然是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的不可調和的對立者，他支持由國民黨領導的抗日戰爭，但他從未對國民黨及其政權產生過任何幻想，因為他認定國民黨已經腐朽透頂，決不可能領導這次戰爭到最後勝利。自從他從監獄裏釋放出來後，國民黨領導人對他軟硬兼施：一方面使他處於受長期的監視之下，另一方面想方設法想把他收買過去。就我所知，至少有兩次這樣的時候，試圖誘使他下水。國民黨通過陳的老朋友（此時，這些老朋友已在國民黨政權中擔任要職），向他提供大量金錢（第一次在南京，第二次在重慶）。但兩次，陳獨秀都斷然拒絕了。正因此，陳獨秀一直在極端貧困中渡過他的餘生。當他去世時，他的身後喪事是由當地鄉紳為他辦理的，而他的遺孀後來是由他以前的學生贍養的。

至於同中共的關係，確實存在過這樣的試圖：即 1937 年秋天，毛主義者與中國托洛次基主義者之間有過謀求和解的事實。但是，這

個試圖是由中國托洛次基主義者在羅漢的倡議下提出的，而陳獨秀本人及中國托派組織並不知曉。羅漢是老共產黨員，同中共幾乎所有領導人都是老朋友，他見到了葉劍英，那時葉是八路軍駐南京代表，他們討論了中國共產黨人與中國托洛次基主義者之間在抗日戰爭中合作的可能性。葉劍英同意了羅漢的合作建議，並敦促他去西安。他在西安與西安八路軍代表林伯渠共同就這個建議討論了幾天。然後經由林伯渠，羅漢與毛澤東交換了幾封電報。毛的回答是：他表示歡迎陳獨秀回到黨內來，但條件是陳要公開譴責托洛次基主義，聲明他同托派組織脫離關係，並承認加入托派行列是錯誤的。當陳獨秀得悉羅漢的意圖以及毛澤東的答覆時，他非常氣憤，這不但因為毛的條件是荒謬的，而且因為羅漢試圖與中共達成妥協，是一種天真的幻想。此後幾個月內，王明便在武漢發動一場反陳獨秀的惡毒誹謗的運動。從那時以後，陳獨秀不可能有，也確實沒有任何餘地去幻想同毛主義者達成協議了。

自從國民黨（表面上聲稱是他的「朋友」）和毛主義者（是他的公開敵對者）一貫以來是用污泥濁水潑在陳獨秀的身上的。我希望，《流亡的先知》——經作者認真考慮後而撰寫的著作——應當把有關陳獨秀一生的幾處錯誤論述，最後能夠糾正過來。不管陳獨秀在他生命的餘年所懷有的思想觀點是對或是錯，陳獨秀仍然是一位偉大的革命家，一個反抗者，或一個對所有既定的權威的終身反對派（這是後來胡適博士稱呼他，而且陳本人也是樂意接受的）。

誠然，陳獨秀以悲劇性人物度過了他生命的最後幾年，但是把他描述為一個「心灰意冷」或「精神崩潰」的人，這是完全錯誤的。

1975年9月15日

附：塔瑪拉·多伊徹的覆信

1975年10月29日於倫敦

親愛的王先生：

十分感謝你能詳細地對《流亡的先知》一書提出你的看法。其中一些錯誤的改正，很快就會在新版書中見到。另外一些意見，我得到要用更多時間，並且盡可能地予以研究。但你提供的所有意見，都是十分可貴的，無疑地，我定將一一記下來，只要我的工作負擔稍有減輕的話，我會在一二個星期內將它們處理好。致最好的祝願和由衷的問候！

你的忠誠者塔瑪拉·多伊徹

注釋

1. 實際上被捕的托派分子遠不止300人，單以浙江省溫州、杭州、嘉興、金華四縣市的初步估計，已超過300人了，其中包括判刑及在學習班受訓者。——譯者注

6. 托洛次基主義與中國革命

托洛次基著《中國革命問題》德文本導言

I. 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

中國共產黨是俄國十月革命的產品之一。無論在思想上與物質上，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及其發展，都與勝利的俄國共產黨人的幫助分不開。沒有這個幫助，中國縱能在二十年代之初產生一個共產主義團體；它不可能如此迅速發展，更不可能在 1925-27 年的中國革命中發生如此強大作用。

但是，竟可說是歷史的諷刺，這個外來幫助雖然促成了中共與中國革命的興起與開展，卻又是使中共與中國革命遭受慘敗的一個重大原因。

編按：作者在 1991 年 1 月 7 日的札記裏談到這篇文章，說：「德友魯道夫來信說，我為德文本《托洛次基論中國》所寫的長序，有些論點已經過時。昨晨我回了他的信，關於『過時』這一層，我是這樣說的：『你說得對，《序言》中的某些說法好像已經過時了。這情形，我覺得是非常自然。這是十年前寫的文章。十年來，世界上，特別在所謂『社會主義』國家中發生了幾乎可以說是天翻地覆的變化。如果我今天來寫這篇序言，不用說，在許多論點上我會以不同方式來寫的。不過，我並不以為因此而使我這篇序言變得毫無用處。從整件看，我相信它對於讀者，特別對年輕一代的讀者，是有所幫助的。它給他們點明了托洛次基的各篇文章如何聯繫着中國革命發展中的各個時期，它給他們指出了究竟在哪裏，在什麼問題上，史大林及其一派是錯了，並且是怎樣搞錯的；托洛次基及其一派是對了，並且是怎樣對的。因此，讀者們不難從過去吸取教訓，去為未來的革命做好準備。』」

俄國共產主義者對中共與中國革命的援助，如何與何以發生這樣一種又是積極又是消極的作用？

這是問題之問題。在這篇導言裏我們就是要研究這個問題。

* * *

毛澤東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便給中國送來了馬列主義」。這句話，看成修辭學上的比喻是合適的，但與真實的歷史有所出入。1919年3月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一次大會也還不曾注意東方的被壓迫民族問題。當時蘇聯領導人的目光主要向着西方。他們一心期待歐洲各資本主義國家中的無產階級能發動革命並取得成功，藉以援助孤軍奮鬥中的蘇維埃俄羅斯。

1920年7-8月間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在這方面才來了一個明顯的轉變。它從西方擴展到東方，從「各國無產者聯合起來」這個傳統戰略，擴大為「各國無產者與全世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的全新方針。

完成這個戰略轉變與擴大的是列寧。在他向大會提出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上，不但給這個新的世界革命的戰略思想定下了原則，而且具體規定了實行這些原則時所應「特別注意之點」，其中與後來中國問題最有關係的，我以為是如下的一節：

第五，必須堅決反對把落後國家內的資產階級民主解放思潮塗上共產主義色彩；共產國際只是在這個條件下，即當一切落後國家中未來的無產階級政黨（不僅名義上是共產黨）的分子組織起來，並且認識到同本國資產階級民主運動作鬥爭這些特別任務的時候，才應當援助殖民地和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性的民族

運動；共產國際應當同殖民地和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的民主派結成臨時聯盟，但是不要同他們混為一體，甚至當無產階級運動還處在萌芽狀態時，也絕對要保持這一運動的獨立性。（見《列寧選集》第4卷，275頁。）

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接受列寧提出的這些意見，以此確定了共產黨人對資產階級性民權運動的態度和關係，因此也確定了中共對中國國民黨的態度和關係。所可惜的是：列寧本人最初因為病，接着離開了人間，他沒有機會把這些意見親自實行出來。而當時主持共產國際的俄國共產主義者，在實踐中卻一貫作出了與列寧上述意見恰恰相反的決定與指導，以致促成了中國革命的失敗，這是歷史的不幸。

不過歷史的不幸還有甚於此的。當俄共黨內以托洛次基為首的一派，在中國革命問題上堅持列寧路線，為此與共產國際和俄共中央的當權派（最初為齊諾維也夫與史大林，然後為史大林與布哈林）路線進行鬥爭之時，俄共與共產國際這兩個機構都日益走向官僚主義的墮落。自從1923年開始，黨和國家的一切機關都逐漸控制在史大林一派之手，以致這兩條路線在其提出與形成過程中，未能在俄國共黨內部，更不能在中共內部，進行公正與公開的廣泛討論。史大林一派憑藉其組織力量，壓制反對派，抹煞他們的意見，壟斷對中國革命的指導。等到這個指導造成了中國革命的悲劇，史大林一派更為了派系和利益，為了保持官僚權力，更加堅持和加深這些錯誤。他們竟用行政警察手段摧殘反對派。將充分為事實所證明的反對派正確意見加以嚴密封鎖，同時對這些意見進行荒唐的誣蔑。中國共產主義者和工農大眾用生命換來的寶貴經驗無法讓人知道，無法為後人利用，他們的血白流了。

因此，恢復有關 1925–27 年中國革命的理論鬥爭真相，搜集與出版當時左派反對派——主要是里昂·托洛次基的一切文件，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它不但是歷史家的工作，而且是革命家的責任。

中國與美國的革命者曾經先後出版過托洛次基論中國革命的文字（中國於 1929 年及 1947 年；美國於 1932 年與 1976 年）。現在德國朋友又決定用德文出版一本同樣的書，而且要比中文和英文的更為完備。這真是一件大喜事。我榮幸地被出版者邀請來為德文版寫一導言，願盡我所知，為讀者們將各個重要問題，依照時間先後，做一個約略介紹。

II. 革命時期的爭論問題

一、中國共產黨應否保持獨立？

這個有關中國革命的第一個也是最根本的問題，最初卻並非發生於俄共內部，亦非發生於共產國際領導人內部，卻發生於年青的中共領導與共產國際之間。

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於 1921 年 7 月。它的第一次大會實際上只是一種原則性的宣告。它宣告中國的共產主義者決心要走俄國先驅者的路，為此決心按照布爾雪維克黨的路線，建設一個中國共產黨。至於如何把共產主義目標與中國的實際乃至和中國當時的政治情況聯繫起來，大會不曾考慮，事實上也不可能作詳盡的考慮。

經過一整年的努力和鬥爭，到了中共第二次大會（1922 年 7 月 16 日–23 日）前後，它才鄭重、深入與具體地提出一些最迫切的革命政治工作問題。它首次確定了在中國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

策略，提出了它與中國國民黨的關係問題。在大會召開前一個多月（6月15日）中共發表的《第一次對時局宣言》中，它說：「無產階級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還應該聯絡民主派共同對封建式的軍閥革命，以達到軍閥覆滅能夠建設民主政治為止。」同時它又說：「在中國現存的各政黨，只有國民黨比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較是真的民主派。」

在大會上，通過了一個《關於「民主的聯合戰線」的決議案》，更闡明了共產黨對於「國民革命」的關係和態度。其中主要的有這樣的話：

在中國的政治經濟現狀之下，在中國的無產階級現狀之下，我們認定民主的革命固然是資產階級的利益，而於無產階級也是有利益的。因此我們共產黨應該出來聯合全國革新黨派，組織民主的聯合戰線……同時又須告訴他們，無產階級加入此種戰爭，不是為了民主派的利益，做他們的犧牲，乃是為了無產階級自己眼前所必須的自由而加入此種戰爭，所以無產階級在戰爭中不可忘了自己階級的獨立組織。（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冊，65-66頁。）

同時中共還批評了國民黨「動搖不定的政策」，「實有改變的必要」。這樣的立場顯然是中共領袖們研究與接受了列寧關於民族與殖民地問題提綱的結果，而且將它與中國當前的實際初步結合起來了。

可是當時的第三國際負責人卻不同意這樣的路線。在那個時候，主要為了打破蘇俄在遠東的外交孤立，共產國際與俄國政府接連直接派遣代表，去和國民黨的領袖孫中山進行中俄友好與國共合作的談判。最初與孫中山接觸的是魏金斯基（1920年秋），然後由第三國際代表馬林（1921年冬天），半年後（當第二次大會正在進行之際），又派

少共國際代表大林，先後向孫中山提議中共與國民黨組成聯合戰線。孫中山拒絕這個提議。他只允許中共與共青團的個別分子加入國民黨，不肯與中共作黨外聯合。

當時莫斯科的領袖們顯然對新生的中共所能發揮的力量看得很低，對國民黨所擁有的力量估得太高。他們願意對孫中山讓步，決定要中共接納孫中山的辦法加入國民黨。為了實行這個決定，馬林又奉命來華。此時中共第二次大會已經通過了上面引述過的決定。馬林於是要中共的中央委員會召開一次緊急會議來改變方針，接受國際指示。在會上，中共中央全體反對國際的決定，力主中共與國民黨在黨外合作。堅持共產黨在聯合戰線中保持政治與組織上的獨立。結果馬林拿出國際紀律來施加壓力，中共領導者在共產國際的巨大權威之下，屈服了。這可說是中共此後一切災難之源。因為在整個第二次革命時期，中國無產階級與勞苦大眾沒有自己的獨立政黨。

在共產國際與俄共內部，中共應否加入國民黨這個問題本是托派與斯派的爭論中心。托洛次基從 1923 年開始便堅決反對中共加入國民黨（見 1930 年他寫給夏克曼的信）。但因遷就左派反對派內部其他成員（主要是拉狄克）的意見，後來則為要和齊諾維也夫派結成聯盟，托洛次基曾經長期間在此問題上作出讓步（他後來承認這種讓步是錯的）。因此托斯二派關於國民黨問題的爭論，要到 1926 年，即在中共與國際為此發生爭論四年之後，才初次公開出來。那時爭論的口氣還是很緩和的。例如在《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1926 年 9 月 27 日）這篇文章中，托洛次基說：

當中共還是一個宣傳組織，它只在給自己準備未來獨立的政治活動，但同時也設法參加上漲中民族解放鬥爭時，中共加入國

民黨是完全正確的。(見英文本《托氏論中國》，114頁，加重號原有。)

到了1927年5月，在他的《中國革命與史大林同志的提綱》中，他才第一次(在正式文件上)直截了當地聲明：

要有權利談那為民主革命的布爾雪維克道路而鬥爭，必須有無產階級的主要工具：一個獨立的無產階級政黨，它在自己的旗幟之下鬥爭，永遠不許它的政策與組織消解在其他階級的政策與組織之中。(見中文本《中國革命問題》第二版，8頁。)

齊諾維也夫派在這個問題上一直動搖到武漢「左派」國民黨反共前夕。即是要到1927年7月2日，他們才在和托洛次基共同簽名的「中國革命的新階段」上，要求中國共產黨必須退出國民黨。可是這個時候已經太遲了。此時實際上已經不是什麼應否退出國民黨的問題，而是在國民黨的屠刀之下共產黨人如何圖存與如何繼續鬥爭的問題了。

史大林與布哈林則到了汪精衛屠殺共產黨人以後，仍不許他們放棄國民黨的青天白天旗，要他們繼續與國民黨合作。這齣打着國民黨旗幟反國民黨的滑稽悲劇，一直演出到1927年12月的廣州暴動才算收場。

托洛次基在國民黨問題上與史大林、布哈林(其中多少也包括齊諾維也夫和拉狄克)之間何以會有這個不同看法？主要由於雙方對國民黨性質的認識不同。依史大林們之見，國民黨是「無產階級，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聯盟」。(見1926年12月共產國際第七次全體會議決議。)史大林自己則最初(1925年)說國民黨是一個「工農黨」(見《史大林全集》，第七卷中文版，124頁。)，後來

(1927年5月)又說它「是由幾個被壓迫階級組成的聯盟的黨」。(同上書，第九卷，219頁，加重號原有)。因此中國共產黨參加這個「各階級聯盟的黨」，不但無損於自己的獨立，而且有助於爭取盟友。

托洛次基早從1924年春天起(根據公開發表的文件而言)便強調國民黨是一個資產階級的政黨(見他對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所作的演說)。針對人家對於「工農黨」與「諸階級聯盟」的說法，他認為「這個定義與馬克思主義無絲毫共同之點」(《中國革命與史大林同志的提綱》)。至於「把國民黨形容為一個不專為某一方面所用的無定形的組織，那是曲解了問題的本質。不管國民黨的外緣是怎樣沒有定形，但其中央機關卻牢牢地掌握在革命的獨裁者手中」(見《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英文本，202頁)。「究竟四個階級聯盟是什麼意思呢？你們在以往的馬克思主義的文獻中看見過這樣的說法嗎？如果資產階級將被壓迫民眾統率在資產階級旗幟之下，並藉此領導取得了政權，那末這不是聯盟，而只是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利用了被壓迫群眾。」托洛次基又說：「國民黨是一個政黨，而在革命時期，它只能被了解為一個政黨。在過去這個時期中，這個黨不曾體現為『四階級聯盟』，但已起了資產階級統率民眾——包括無產階級與共產黨在內的民眾——的作用。」(見《關於中國問題的第一次演說》，英文本，227頁。)

上述兩種對國民黨的認識究竟哪一種正確，毋須我們多言。事實勝於雄辯：1925-27年中國革命的真實過程已給了明確答覆了。

* * *

史托二派在國民黨問題上的爭論，始終不曾與中共領導的不同意見直接聯繫起來。中共根本不清楚蘇共反對派的主張；托洛次基等也不能明白中共領導的真實情形。中共中央自從被迫接受國際決定加入

國民黨以後，曾經積極在國民黨內工作。可是憑它的工作體會和所遭遇的困難，中共（至少其中一部分領導人）就曾多次發生過懷疑，甚至向國際建議，要求改變路線。第一次是1926年3月20日蔣介石在廣州實行反共政變之後。當時中共在共產國際壓力下對蔣介石步步退讓，讓至退無可退的地步。本來主張與國民黨只作黨外聯盟的中共總書記陳獨秀，曾用個人名義向國際提議退出國民黨。結果遭到國際拒絕，還挨了布哈林在《真理報》上的斥責（見陳獨秀《告同志書》）。

此後不久，在1926年7月^[1]中共中央四屆二次擴大會議上，通過了「中共與國民黨關係問題的決議案」。它雖然反對退出國民黨；但它提出五點具體辦法來保證共產黨的獨立行動，因此又遭到了國際的抨擊，要求中共即將召開的第五次大會徹底改正這些錯誤^[2]。

第三次，在1927年5月21日長沙事變之後，陳獨秀曾經兩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提議退出國民黨，卻均為中央的大多數與國際代表所反對（見《告同志書》）。

最後，到了7月上旬，武漢「左派」國民黨已經公開進行反共，屠刀早已架在共產黨人頭上，此時共產國際仍舊命令中共留在國民黨內，於是陳獨秀於7月15日提出辭職，說「國際一面要我們執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許我們退出國民黨，實在沒有出路，我實在不能繼續工作。」（見《告同志書》。）

兩年之後，陳獨秀和他接近的同志們於獲悉俄國左派反對派的主張後立即成為托洛次基的支持者，我相信其中一個主要原因，便是在中共對國民黨的態度上，陳獨秀與托洛次基的意見很久以來就幾乎相同之故。

二、帝國主義壓迫與革命的資產階級

史大林的國民黨政策以「四階級聯盟」作理論基礎，而「四階級聯盟」則以帝國主義壓迫作為辯解。依史大林之見，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壓迫縱使不曾消滅中國的階級鬥爭，卻總已緩和了這個鬥爭。它使中國「全民的統一戰線」成為可能與必要。因此，它又使作為「統一戰線」之政治表現的國民黨成為可能與必要。

為資產階級在「統一戰線」中的「合法」地位作辯護，史大林特別強調了中國資產階級中兩個截然對立的部分——民族資產階級與買辦資產階級，史大林認為前者反對帝國主義並創建了國民黨，後者擁護帝國主義而且「現在是，將來也仍會是國民黨死敵。」（見1927年5月13日史大林與莫斯科孫大學生的談話第三個問題）

史大林這個看法完全決定了共產國際對蔣介石、對汪精衛乃至對馮玉祥等人的態度，決定了他們要中共始終加入與服從國民黨的政策。

這是促成中國第二次革命失敗的一個主要的理論錯誤，而這個理論是十足違反列寧主義的。

早在1920年7月的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上，當列寧向民族和殖民地問題委員會提出報告時，就十分明白地說了如下的話：

剝削國家和殖民地國家的資產階級已經有相當親密的關係，所以被壓迫國家的資產階級往往甚至可以說在大多數場合下，都是一方面支持民族運動，一方面又同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妥協，也就是同他們一起來反對一切革命運動和革命階級。（見《列寧選集》第四卷，334頁。）

這是對史大林帝國主義壓迫下階級緩和論以及殖民地資產階級一分为二論的直接與預早的答覆。

托洛次基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與列寧完全一致。從 1925 年開始，他便不斷提出與上述列寧的同樣意見。在 1927 年 5 月批評史大林論中國問題的提綱中，他更作了系統與深刻的發揮。他指出史大林錯誤的「主要來源在於對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作用及其對中國階級關係的影響之錯誤觀念」。他認為：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壓迫決不是「機械式的」，以「同樣」方式屈服中國的「一切」階級的。「外國資本在中國生活中的有力作用，已使很有力的一部分資產階級，官僚及軍閥，和帝國主義共了命運。」接着，他把這層意思作了如下說明：

相信那所謂買辦資產階級，即外國資本在中國之經濟的與政治的代理人，與那所謂「民族」資產階級之間有鴻溝之隔，那是極其天真的。不，這兩部分資產階級之間，比資產階級與工農之間，要無比地更接近些。資產階級之參加民族戰爭，有如內部的制動機，他們以繼長增高的仇恨看待工農群眾，愈來愈準備和帝國主義妥協了。

處身於國民黨內並成為其領導者的民族資產階級，實質上是買辦與帝國主義的工具。它之所以能留在民族戰爭的營壘裏，只因為工農群眾無力，階級鬥爭不發展，中國共產黨缺乏獨立，以及國民黨之馴順地被操在資產階級手中。

以為帝國主義機械地從外面焊合了中國一切階級，那是大錯特錯。……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鬥爭不會減弱，但會增強諸階級的政治分化。帝國主義是中國內部關係中一個很強的力量。

這個力量的主要來源，不是揚子江中的兵艦——它們不過是輔助物——而是外國資本與本國資產階級間經濟的與政治的聯繫。正因為帝國主義的經濟力量和軍事力量，反帝鬥爭需要從中國人民很深處很有力地發揮出力量來。要真正喚起工農群眾來反對帝國主義，只有把他們基本的和最深刻的生活利益與民族解放的事業聯結起來，才有可能……（見英文本，160-161頁。中文本《中國革命問題》第二版，2頁。）

托洛次基在這裏說得酣暢淋漓，毋需我們再作任何詮釋。值得給讀者特別指出的只是：此文寫於1927年5月7日，即當「民族資產階級」的領袖蔣介石在上海「投降買辦資產階級」而屠殺工人之後二十五日。此時，史大林又把「民族資產階級」或「左派小資產階級」的名銜致送給汪精衛，希望他能夠反對「買辦資產階級」；可是僅僅過了兩月之後，這個「民族資產階級」頭子又投降了「買辦資產階級」，又屠殺工農了。

三、蘇維埃問題

關於中國革命的第三個重要爭論問題是：當北伐軍進展之時，沿路（特別在湖南湖北二省）農民與工人蜂起回應，此時共產黨應否提出蘇維埃口號，並組織工人、農民與兵士的蘇維埃？表面上這似乎只是一個策略性的組織問題，其實卻是與上述兩個帶有原則性的問題密切相關。若從爭論雙方的表面論據看，彷彿史大林等亦認為民族資產階級的反帝意志是軟弱的，它可能與帝國主義妥協的，因此共產黨必須組織與率領工農大眾起來，在國民黨內外，和資產階級爭奪對革命的領導權，防止和反擊他們叛變革命的企圖。但是在這裏，問題之問題乃在於：用什麼方法才能切實而有效地奪到領導權，才能切實而有

效地防止與打擊資產階級的背叛？依託洛次基之見，唯一可靠的方法是提出、宣傳並實際組織蘇維埃。自從 1926 年下半年^[3]起，蘇聯共黨的反對派便提議組織蘇維埃，史大林派則竭力反對這個提議。他們所持的理由是：（1）蘇維埃將破壞對資產階級的聯合戰線；（2）將予帝國主義者及反動派以反對中國革命的新藉口：說中國革命乃俄國革命之「人工移植」；（3）蘇維埃只能是暴動機關，而且只能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機關；（4）國民黨本身已經是實際上的蘇維埃。

可是史大林派這四個理由全部為歷史事實與史大林自己的作為所駁斥了。一，沒有蘇維埃，資產階級仍舊一再破壞了聯合戰線，而且正因沒有蘇維埃之故，他們能主動選取最有利的時機來破壞聯合戰線，予革命以慘重打擊。二，沒有蘇維埃，帝國主義者絕不會因此而不說中國革命是莫斯科輸入的。三，說蘇維埃只能在暴動前夕建立，說它只能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機關，那是根本忘記了俄國 1905 年與 1917 年兩次革命的經驗。它們都是在革命進潮初期就建立了的，而且只有經過相當時期的群眾鬥爭，等它們在群眾中建立了信仰，才能領導暴動。反之，廣州蘇維埃正因為在暴動前夕建立起來的，所以不能保證暴動勝利。至於說蘇維埃只能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機關，那末，當 1927 年 12 月 11 日廣州暴動以後，史大林提出了蘇維埃口號卻仍舊宣佈中國革命為民主性質，就已打自己的嘴巴了。最後，究竟國民黨是否可以代替蘇維埃；則歷史證明得快而清楚，早已給了答案。

總之，史大林派排斥蘇維埃的提出與組織，使他們一切所謂爭取國民革命領導，武裝工農，防止資產階級叛變等等的漂亮辭句，全部成了空話。結果使工農大眾在資產階級的一再反叛之前，變得束手無策。

中國共產黨在這個極端重要的爭論上，我們不曾見到任何值得重視的參加。雖然 1925 年至 1926 年的省港罷工委員會是一個事實上的、小規模的蘇維埃；雖然當北伐軍進展時期，湖南農民紛紛組織起來的農民協會，在某一程度的作用上已可說是農民蘇維埃；雖然在 1927 年 2 月 22 日上海工人武裝起義之後，工人們自己組織「蘇維埃」式的集會（如「揚樹浦工人區蘇維埃」（瞿秋白着《中國革命中的爭論問題》附錄一，見《瞿秋白文集》政理論編，第四卷，562 頁。），雖然當時中共中央的所謂左派領袖瞿秋白主張「立時命各廠各工會工人選舉代表，設法鼓動小商人群眾代表來參加此會：『臨時市民代表大會』（國民革命的蘇維埃），使成一共同討論罷工罷市一致武裝『自衛』以至於暴動的機關，換言之，即形成事實上之臨時革命政府……」（見同上引書，560-561 頁。）但中共領導始終不曾注意到這個問題。瞿秋白本人除了在 1927 年 2 月間作過曇花一現式的「蘇維埃」倡議之外，顯然知道了莫斯科當權派反對這個口號和這種組織，以後也就絕口不提了。

四、小資產階級與農民問題

托洛次基的論敵們從來指控他輕視農民或不要農民，攻擊他看不見小資產階級在革命中所能起的偉大作用。在俄國革命的爭論中如此，在中國革命爭論中更加如此。

其實，托洛次基在這個問題上與史大林們所不同的並不在於應否看重農民與城市小資產階級，而只在於：一、無產階級應該聯合的究竟是哪一些小資產階級？二、如何才能聯合他們？

對於第一個問題，他在為中國左派反對派起草的政綱（1929年6月）中，曾經給了一個扼要的回答：

我們反對派說無產階級應與小資產階級有革命的聯盟，我們所指的是被壓迫階級的幾千萬幾萬萬城市與農村裏的貧民。共產國際領導機關所謂小資產階級乃指小資產階級的上層分子，主要是知識分子，他們以民主政黨和團體的名義利用城市及鄉村貧民，在緊要關頭即將他們賣給大資產階級。我們所謂聯盟不是聯汪反蔣，而是聯合一切勞苦群眾，反對汪精衛和蔣介石。（見《中國革命問題》第二版，136頁。）

關於第二個問題，托洛次基從小資產階級（城市與鄉村的）之缺乏獨立性，從他們在革命中不跟隨無產階級便追蹤資產階級這一基本認識出發，他認為所謂工農聯盟或工人與小資產階級聯盟，一定要靠鬥爭來解決，絕非憑「階級地位」而自動決定的。

在這裏，托洛次基的「三個營壘」說，具有異常重要的意義。照當時史大林派和反對派中一些人的看法，中國當時的階級關係和政治矛盾表現成兩個營壘：一個營壘裏是帝國主義、軍閥與買辦資產階級；另一個營壘裏是：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學生、知識分子與民族資產階級。這兩股勢力一邊是反動聯盟，另一邊是革命陣線。二者壁壘森嚴，旗幟分明。前者由帝國主義操縱，後者則「天然」由工人階級領導。史大林派當時許多政策，可以說均以此一認識作為根據。

托洛次基認為這個看法不但機械，而且錯誤與危險。因為如果真的只有這兩個營壘，那就根本不存在什麼爭取城市與鄉村小資產階級問題。即使需要爭取的話，也不是和民族資產階級爭，而只是和帝國主義、軍閥與買辦資產階級去爭了。所以托洛次基說：

事實上中國存在着三個營壘：反動派、自由派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這三個勢力正在為爭取對下層小資產階級與農民的支配而鬥爭。（見《致阿爾斯基的信》，英文本，128頁。）

不論根據歷史經驗，或根據社會學的分析來看，廣大的城市與鄉村的小資產階級都不可能「天然」參加革命營壘，不可能「天然」（順便指出：當時中共的理論家中也有這樣的「天然」論者）跟定工人階級。事實正相反，他們，尤其是他們的上層，極容易受民族資產階級的欺騙與控制來反對工人階級。在最壞的情形中，他們還能受最右的反動派的欺騙。因此，托洛次基的中國革命政策，幾乎可以說都從這個三營壘的看法出發。也因此，他始終關心這樣一個問題：即工人階級的政黨如何才能將廣大的城鄉小資產階級爭取到自己的領導之下，使他們一起去反對帝國主義反動派，同時謹防暫時參加在革命隊伍中的資產階級反叛，並能在他們反叛之時加以勝利的反擊。

在這個意義上，不要農民與忘記小資產階級的，恰恰是史大林—布哈林，而非托洛次基。

五、社會性質與革命性質問題

史大林在前一個問題上指責托洛次基不懂得「封建殘餘乃中國種種壓迫的佔優的因素」（見《中國革命與第三國際任務》）。在後一個問題上則說他「企圖硬搬某些一般的公式，不理各國運動的具體情況。」（見《時事評論》）

但是從托洛次基先後發表的意見（從1924年4月到1928年3、4月）來看，這兩種指責全無根據。

對於中國的「封建殘餘」，托洛次基的看法既與反對派內部的拉狄克不同，也和史大林與布哈林各異。他不但不像拉狄克那樣否認其存在，而且說它很有勢力。可是既稱「殘餘」，便不可能「佔有優勢」。「殘餘」而竟佔「優勢」，簡單在邏輯上都說不過去。至於史大林們不但根據這個優勢來決定中國革命的資產階級性，並且以之決定資產階級的革命性，托洛次基更是力加反對。他說：「在中國，封建關係與資本主義關係極密切糾纏在一起。」「中國沒有與資產階級對立的封建地主階級。……所以中國的土地革命具有反封建同時亦反資產階級的性質。」（見《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中國革命問題》第二版，78頁。）

整個中國革命的過程，特別是土地革命的過程，充分證實了托洛次基的「糾纏」說，否定了史大林的「優勢」論。

至於對中國革命性質的認識，托洛次基正如他在給伊羅生着《中國革命的悲劇》一書所作的序文中所說，「不是從一個先天的定義或從歷史的模擬演繹出來，而是從中國社會的活生生的結構及其內部諸力量的機動中確定的。」他是在革命發展的真實過程中，以「逐漸接近」的方法去認識革命性質並決定革命的政權性質的。

他在這方面的思想演變，文字具在，有如下述：

1924年4月21日，托洛次基對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生發表的演說中，我們見到了他第一次談到中國革命的性質與前途，他說：

沒有疑問，如果中國國民黨能夠把中國統一於一個民族——民主的政制之下，則中國的資本主義發展將大踏步地前進。但這一切將準備動員起無數無產階級群眾，他們將立即突破史前時期的與半野蠻的狀態，他們將在工業的熔爐中，即在工廠中鑄造自己。（見《東方的遠景與任務》）

在 1925 與 1926 這兩年中，據我們所能見到的材料說，托洛次基並未直接談到中國革命與中國社會的性質問題。當時共產國際一方面堅決要中共留在國民黨內，要工人階級服從資產階級的領導，同時卻提出「非資本主義前途」來騙人騙己，使托洛次基特別感到氣憤。他認為中國革命的最迫切問題是中共立即退出國民黨，實現工人政黨的獨立。只有這樣才能保證革命勝利；至於勝利後中共是否能走上「非資本主義前途」，那是要靠國際的因素來決定的。

1927 年 3 月，在他寫給阿爾斯基的信中，我們又見到他談及中國革命的性質與前途：

只有那一類社會主義——反動的蠢材才會以為目前的中國，在它現有的技術與經濟基礎上，能憑其一己的努力可以跳過資本主義階段。（見英文本，129 頁。）

同年同月 21 日，他寫信給全蘇聯共黨中央政治局，提議在中國創建蘇維埃，同時又清楚指出：「中國正在發生着的是一次民族—民主的革命，不是社會主義革命。」（見英文本，135 頁。）

接着（1927 年 4 月 3 日），在《中國革命中的階級關係》裏，又作了更充分的發揮：

首先要使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明白：中國並無獨立轉入社會主義去的任何經濟條件；要他們明白：目前正在國民黨領導下展開的革命是一種資產階級的民族革命；這個革命，即使完全獲得勝利，其結果也只能是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的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但它又必然將問題的相反方面有力地展開在中國無產階級之前：晚起的資產階級民族革命卻是在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的衰敗

條件中開展着的。正有如俄國經驗與英國經驗相反，政治完全不是與經濟平等發展的。中國的未來發展一定要放在國際的遠景中觀察。不管中國經濟的落後，一部分也正因其落後，中國革命完全能夠使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工農聯盟走上政權。這樣的政權將是中國與世界革命之間的一個政治性的環節。（見英文本，142頁。）

在這裏，托洛次基在本質上顯然已達到不斷革命論亦適用於中國的結論了。但是在革命政權的性質，即由工農聯盟建立起來的政權將是工農民主專政還是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問題上，那時托洛次基卻還保持布爾雪維克在十月革命前的舊口號。一直要到1927年9月，當他看見了一年來那些「革命的」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領袖們如何相繼背叛革命，如何破壞「工農民主聯盟」之後，他才第一次說，在中國，「工農民主專政這個口號也在歷史上過時，今後它只能成為反動派手中用以反對工人階級的武器，我們必須提出無產階級專政口號了。」（見《中國革命的新機會、新任務與新錯誤》）等到是年12月，中國第二次革命以廣州暴動的悲劇告終，托洛次基總結以往教訓，分析未來中國革命的社會政治的前提條件，於是確定地說：這些條件「不僅證明民主專政已無可救藥失去了它的適用性，並且證明這第三次革命……將被迫於一開始就要最堅決地動搖與取消城市及農村中資產階級的財產。」（見〈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中國革命問題》第二版，79頁。）這就是說，未來中國革命一開始便將是社會主義性質了。

托洛次基達到這樣的結論是經過了一個時期的緊張研究與思考的。他在阿拉木圖——中亞細亞的流放地完成這項思想理論工作，並且記錄在他寫給潑雷奧勃拉順斯基（今譯：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三封信中。

我們上面的敘述極為簡略但已足以說明托洛次基決不是把俄國革命中的現成公式硬套到中國革命身上去的。至於後來的中國革命，即開始於抗戰結束，成功於 1949 年的那次革命，其實際經過究竟符合於哪一公式，我只要指出一個事實作為答覆：一直堅持「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公式與「人民民主專政」口號的中共領導者們，在真實事變的壓迫下，連毛澤東都不得不提出「不斷革命論」的說法（當然它是否與真正的不斷革命論相符乃另一問題）。劉少奇則宣佈「人民民主專政實質是無產階級專政」。

III. 革命失敗後的爭論問題

從 1927 年秋天到 1940 年秋天，亦即從革命失敗直到托洛次基被害為止，托斯二派在中國問題上，主要有過下面這三個不同意見：一、對於新局勢的估計與中共在新局勢中應該提出的中心政治口號；二、農民戰爭與新革命再起的關係；三、對於 1937 年開始的中國抗日戰爭的態度。

一、新局勢與新任務

中國第二次革命究竟在何時失敗而告終？這在事後回顧中彷彿根本不成問題。1927 年 7 月間武漢政府公然反共，全國工人在組織上陷於潰散，革命就已經失敗了。可是在當時當地，特別對於身處局中的人來說，這問題卻相當複雜而難於立即答覆。在當時，即使托洛次基也不曾立即做出這樣的決定^[4]。1927 年 9 月，當葉賀南征，湖南農民蜂擁而起的時候，托洛次基毋寧將它們看成「中國革命的新機會」。對

於當時形勢，他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它是一個短暫的尾聲，為歷史上一些大失敗後所共有的尾聲呢，抑或它是中國革命一個新的偉大篇章的自發的開端？」對此問題，他的回答是：「兩個可能都不能排除」。他認為問題不但要看客觀條件，而且要看主觀條件，亦即要看革命黨是否有正確的政策。

作為一個負責的與積極的大革命者，托洛次基正應該有這樣一個審慎與樂觀的看法。可是當他見到「南征」失敗，又看見廣州暴動失敗，由此而研究了當時全中國階級鬥爭的情勢之後，他便毅然決然，宣佈中國革命已經確定失敗。一個新的反革命的局勢早已開始了。

對於這個局勢，最初他是這樣說的：「中國正處於一個退潮時期……」（見〈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中國革命問題》第二版，84頁。）

四個月之後，在1928年10月，在《六大以後的中國問題》中，托洛次基以更加明確的口氣斷定說：「必須清楚地懂得，現在中國並無革命局勢。那裏代之而興的倒毋寧是一個反革命的局勢，它正在轉變成一個長短未定的兩個革命的中間時代。有誰如果對你說這是悲觀與缺乏信心，你就鄙棄他好了。對事實閉上眼睛，乃是缺乏信心的最醜陋的一種形式。」（見《中國革命問題》第二版，110頁。）

史大林一布哈林們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卻正是「最醜陋的一種」。它既不審慎，更不負責。首先為要掩蓋自己破產政策所造成的悲慘結果，他們非但硬不承認革命已經失敗，而且宣佈它「進入更高階段」。為要證實這個宣告，他們不顧一切地命令瀕於瓦解的中共全面發動武裝鬥爭。結果招致一次比一次更嚴重的失敗，直至廣州暴動的大流血。到了那時，史大林們雖然不得不稱它為「退兵時的一仗」，但同時

卻又說它是「蘇維埃革命新階段的開始」。究竟革命是否已經失敗，他們始終含糊其辭，模稜兩可。在 1928 年夏天召開的中國黨第六次大會上，史大林—布哈林們也還只說：「中國現在並無革命高潮」，而是處於「兩個浪潮之間」。

不同的局勢診斷，產生了不同的口號和政策。

托洛次基一經認清革命局勢已經為反革命局勢所代替，他便及時估計當時中國經濟與政治的可能發展，認為「中國革命失敗將給予中國和外國資產階級以或多或少克服目前可怕經濟危機的可能性」。（見〈總結與前瞻〉——《中國革命問題》第二版，84 頁。）稍後，在〈六大以後的中國問題〉中，他更加明白說：在此「非常畸形的穩定」時期，反革命勝利的資產階級會增長其階級意識。他們與自己的同盟者——帝國主義與軍閥——之間的矛盾在相當程度內會重新出現；小資產階級會要求民主；土地問題將重新提出——這一切必然要產生國民會議思想。因此，托洛次基認為「共產黨能夠與應該提出以平等、直接、無記名的普選為基礎的立憲會議的口號」，並全力為此口號及其政綱（八小時工作，沒收土地，中國民族完全獨立等）的實現而鬥爭。只有這樣，中共才能重新整頓與加強自己力量，才能再度與工人及一般群眾聯繫，才能從零星與防禦的戰爭轉變為全面進攻，最後才能在不可預知的有利條件下，再向國民黨反動政府發動奪取政權的革命。

也因此，托洛次基認為當時中國根本談不上以暴動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的可能，根本談不上組織蘇維埃。因為：「蘇維埃是革命進潮向心力之組織上的表現。……在革命退潮和群眾離心力發展的時期，蘇維埃將是教條的，無活力的，或者同樣不好的，是冒險主義的口號。」（見〈六大以後的中國問題〉——《中國革命問題》第二版，122 頁。）

史大林們根據「更高階段」與「兩個浪潮之間」的認識，指責托洛次基的整個看法為「取消主義」。他們竭力反對提出國民會議口號，而是將他們在過去兩年革命進潮時期拒絕採用的蘇維埃口號，此時突然提了出來。結果如所周知，中共在史大林「第三時期哲學」（認為全世界進入革命高潮）的配合下，前後經過瞿秋白的盲動時期，李立三的瘋狂冒險時期，以及王明的「極左革命路線」時期，以致到了1934年前後，中共在城市中的基礎「喪失了百分之百」（見中共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反革命給大大加深了。

二、「失去工人，得到了農民」

依照史大林「革命四階級聯盟」的理論，右派與「左派」國民黨的先後背叛革命，工人階級在此背叛中遭到摧殘，僅僅表示出四個革命階級中退出了三個，還留下一個農民。又因為再不需要顧慮到「統一戰線」，農民可以放手進行土地革命，所以革命在性質上是進入「更高階段」了。

這樣簡單以數學上的加減法來代替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便是當時共產國際以及中共部分新領導人，企圖以農民為唯一力量來進行全國（首先是四省）武裝鬥爭的理論根據。他們沒有坦白地把這個理論在正式的決議中寫下來，但是不管在言論或行為上，他們，特別是中共的新領導人，卻老是重複着這個調子：「失去幾萬工人沒有關係，我們獲得了幾百萬、幾千萬農民。」（這是後來當中共總書記的向忠發的名言）

托洛次基堅決反對這種意見。當他讀到了共產國際六大大會上中共代表團的某一成員（我相信這便是向忠發）神氣十足地指出廣州暴動失敗以後，黨員數目非但不曾減少，而且因為中共獲得數萬農民新

黨員反而增加了，此時托洛次基認為「在世界大會上提出這樣可驚的報告而未立即遇到憤怒的駁斥，乃是不可信的。」接着，他作了如下的說明：

當革命在城市中與工農運動最重要的中心地被擊敗以後，特別在中國那樣的龐大國家，時常會有一些新的區域——其所以會新，正因為它們落後——還包含着尚未竭盡的革命力量。在遼遠的邊遠區域，革命浪潮的頭還將在一個長時期內擴張開去。……革命在諸大城市遭到決定性的失敗以後，黨，在某個時期內，還能從正在覺醒的農民中吸收數萬新黨員，這個事實是重要的，可作為未來偉大可能性的一個預兆。不過在我們所要研究的時期中，它只是中共解體與消散的一個形式，因為失去了它的無產階級核心，它便不能符合於它的歷史目標了。（見〈六大以後的中國問題〉——《中國革命問題》第二版，104頁。）

也許你們會說：中國此後二十餘年間實際革命鬥爭的發展證明出農民代替工人的革命路線對了。是否這樣呢？下面詳談。

三、抗日戰爭與第二次國共合作

1925-27年中國革命失敗的一個直接後果，便是鼓勵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乃至完全征服中國的野心。自從1930年以來，日本帝國主義不斷對依賴英美帝國主義的蔣介石政府施加壓力，要它完全屈從日本，藉使中國成為它的完全殖民地。國民黨政府與工農為敵，執行着先安內後攘外的政策對日帝不斷退讓，以致激起了全中國民眾反對日帝與國民黨的鬥爭。蔣介石政府在民眾抗日要求的壓力下，同時也為了中國資產階級有限度的獨立自主，乃在美英及蘇聯的支持下，於

1937年7月後進行抵抗日帝步步入侵的戰爭。對於這個戰爭，中國的共產主義者應該採取什麼態度？中共與托派之間，亦即史大林與托洛次基之間發生了很大歧見。中共在共產國際的直接指示下，配合着史大林在世界範圍內由「第三時期」的極左路線轉向極右的「人民陣線」的變動，從1935年8月起，便向蔣介石呼籲，要求停止內戰，共同抗日。這件事幾經波折，幾經談判，終於在1937年9月達成協議：中共接受國民黨提出條件：改編紅軍，取消蘇維埃，放棄土地革命，信仰三民主義，擁護國民政府與蔣介石的領導。

這個做法，自然是1925年至27年革命時那條投降路線的再演。

托洛次基嚴厲斥責這條路線，說它是「一樁更可怕的罪惡，因為這是第二次犯這種罪惡。」對於當時的中日戰爭，托洛次基當然是完全站在中國方面的。因為它是一個半殖民地國家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爭。所以他說：「中國一切工人組織的責任在於積極參加，要在目前抗日戰爭的各條前線上參加作戰。」但因中國方面的戰爭是在反動派蔣介石領導之下，不可能取得真正勝利，因此在號召參加的同時，托洛次基又指出：這些工人組織「不可片刻放棄他們自己的政綱與獨立行動」（見英文本，567頁。）。他並且說：「無產階級先鋒隊在戰爭時期，與資產階級仍立於不可調和的對立地位。先鋒隊的任務在於：根據於戰爭經驗，將工人團集在革命先鋒隊周圍，將農民團集於工人周圍，以此準備真正的工農政府，即領導數百萬農民的無產階級專政。」（見英文本，565頁。）

托洛次基對於中日戰爭所採取的基本戰略方針，顯然也就是他對1925-27年中國革命所採取的方針。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那便是：「在為反對帝國主義的國內代理人（按即北洋軍閥——山）而作的內戰中，

亦猶如在反對外國帝國主義的民族戰爭中一樣，工人階級一方面留在軍事鬥爭的前線上，另一方面則準備在政治上推翻資產階級。」（見英文本，570頁，加重號原有。）

可是問題出來了：第二之次國共合作，亦即第二次史大林對國民黨採取的投降路線，結果非但不曾像第一次那樣造成共產黨方面的慘敗，反而讓中共於抗戰結束後走向革命勝利。這是什麼緣故？

這個問題，與我們在上面指出的有關中國農民戰爭的看法一樣，都彷彿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的一方被證明為錯誤了。究竟是否如此，讓我們在後面詳細研究。

IV. 從農民戰爭與中國第三次革命勝利的關係看 史托二派對農民戰爭的歧見

一、問題的發生及初期爭論

要弄清楚問題的性質，首先我必須指出一個事實：從1927年秋季開始，城市中深受迫害的革命者，為了自身安全，也為了繼續革命活動，紛紛離開城市與產業工人階級，奔向正在動亂的鄉村與農民——這個趨勢完全由客觀形勢所迫成，它絕非依照一個新的革命戰略，即絕非依照先農村後城市的路線。當時，無論史大林、布哈林這二位國際最高領導人，或後來成為這方面主要實行者的毛澤東，都不曾提出一套以農民戰爭代替工人革命的理論。恰好相反，他們都在正式的言論中反對這個趨勢。例如布哈林在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1928年7月）上所作的報告之中（《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人的任務》），就

斥責那種「離開無產階級、走向農民、想藉以給黨尋找另外一個革命階級作基礎的提議」（見報告第6節）。在報告中，他還專用一節（第9節）來說「加強大城市工作的必要」。他說：「沒有城市的支持，更確切些說，沒有城市的領導，整個農民暴動不可避免地要以失敗告終……」

中共第六次大會並不特別重視江西的紅軍與蘇維埃運動。對於它們的作用，決議上是這樣說的：

至於農民鬥爭則至今保存的蘇維埃政權的根據地（南方各省）及其少數工農革命軍，更要成為這一新高潮的重要成分。第六次大會同時認為：不可以過分估量上述這些現象。因為所有這些現象綜合起來也還不能形成真的高潮。參加這些鬥爭的群眾數量還不夠，城市工人階級還沒有能戰勝當前的挫折現象。（加重號是我加的——山）

毛澤東在1928年1月所寫的出名文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雖然全力為農村游擊戰爭辯護，但他還是說：「黨的無產階級基礎的建立，中心區域產支部的創造，是目前黨在組織方面的重要任務……所以，拋棄城市鬥爭是錯誤的……」（見《毛選》第一卷，1969年版，99頁。）

可見在1928年至1930年初這個期間，無論史大林、布哈林或者毛澤東，對於誰將是中國革命主力這個問題，大體上（或口頭上）都還承繼着馬克思主義的傳統，肯定城市領導鄉村，工人領導農民這一個基本方向。因此，他們和托洛次基之間，至少在表面上對此基本認識並無不同。當時史托二派在中國問題上的主要歧見，乃是：對正在

中國南方興起的農民鬥爭，中共應採取什麼態度，應提出什麼口號去領導它。

托洛次基既然認定中國當時的局勢已處於「兩個革命的中間期」，是反革命奏凱的時期，他便堅決主張用一個徹底民主的國民會議口號來領導這些散漫而零碎的農民暴動，藉使它們在政治上統一起來，使它們配合於城市的工人鬥爭，並且使它們與全國各被壓迫大眾爭民主與民族獨立的大鬥爭匯成一股洪流。只有這樣，托洛次基認為這些農民鬥爭才能繼續發展，才有前途，才能成為催促新革命到來並使之勝利的一個重要因素。

史大林們對當時中國局勢的看法，正如我們上面所說，根本不曾有過一貫主張。因此，他們口頭上雖然仍說要注意城市工人工作，事實上卻不得不一步步跟着農民鬥爭的步子走，他們帶着僥倖投機心理，像賭徒似的把賭注押在農民武裝上，希望由農民蘇維埃這條快捷方式，一步跳到革命高潮，甚至達到革命勝利。因此他們竭力反對進行民主鬥爭，更拼命反對國民會議這個口號，認為這是十足機會主義的口號。

對當時中國農民鬥爭曾經提出的這兩條策略路線，究竟誰正確誰錯誤呢？請聽聽毛澤東的證言。1928年11月在他寫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井崗山的鬥爭》中，他說：

我們一年來轉戰各地，深感全國革命潮流的低落。一方面有少數小塊地方的紅色政權，一方面全國人民還沒有普通的民權，工人農民以至民權派的資產階級，一概沒有言論集會的權利，加入共產黨是最大的犯罪。紅軍每到一地，群眾冷冷清清。經過宣

傳之後，才慢慢地起來。和故軍打仗，不論哪一軍都要硬打，沒有什麼故軍內部倒戈或暴動。馬日事變後招募「暴徒」最多的第六軍，也是這樣。我們深深感到寂寞，我們時刻盼望這種寂寞生活的終了。要轉入沸熱的全國高漲的革命中去，則包括城市小資產階級在內的政治的經濟的民權主義鬥爭的發動，是必經的道路。（見《毛選》第1卷，1969年版，76頁。）

話說得異常清楚，任何注釋都是多餘的。

二、爭論的發展與深入

從以什麼政治口號來領導農民鬥爭這樣政策性的爭論開始，隨着中國南方數省農民鬥爭的發展，托史二派有關此一問題的爭論也更向問題的本質深入了。農民能代替工人階級來充當革命的主力嗎？脫離城市與工人的共產主義者領導農民戰爭，是否等於工人階級領導農民？這些由共產黨人領導的農民武裝力量到底有什麼前途？中國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對於這支農民「紅軍」與農村「蘇維埃」究竟應取怎樣的態度？諸如此類的問題都由托洛次基提出來了，而且都給了明確的答案。

可惜的是：這個爭論的另一方，即史大林方面，始終不曾堂堂正正地提出過論據。他們始終不曾企圖給中國的農民戰爭做過任何嚴肅的理論說明或指示。事實上，卅年代以後，史大林不曾給中國革命規定過什麼路線。中共走向勝利的道路，主要是中國革命者於事變的壓力下在鬥爭中自己摸索出來的。（關於這一點我將在下面談到毛澤東主義時詳談。）

史大林對於中國的紅軍與蘇維埃運動，據我們所知，只於1930年6月在蘇聯共產黨第十六次大會上，說過如下的「五句名言」：

若以為帝國主義者的惡行就這樣過去而不受到懲罰那是可笑的。中國的工人與農民已經建立了蘇維埃與紅軍來回答他們。聽人說，中國已經建立了蘇維埃政府。我以為假使這是真的那麼這裏面沒有一點奇怪。毫無疑義，只有蘇維埃才能挽救中國免於完全的瓜分和衰亡。（見《真理報》，1930年6月29日。）

這五句話吞吐圓滑，模稜兩可。它絕對談不上給中國紅軍與蘇維埃運動作出什麼理論分析與指導。它只是「登峰造極的官腔」（見托洛次基的《史大林與中國革命》），是一個陰險惡毒的計謀，以便日後成則歸功於己，敗則諉過於人。

企圖給中國的農民鬥爭做點理論說明的是曼努伊爾斯基——當時史大林在共產國際中的代言人。在1930年11月7日《真理報》上，他寫道：

中國革命已經擁有一支紅軍，它據有廣大地區。目前正在這些地區裏建立一個工農蘇維埃政府，其中共產黨員佔大多數。而這個條件使得無產階級不但能對農民實行思想領導，而且實行國家領導。

這裏，曼努伊爾斯基其實沒有給史大林的官腔添加任何理論色彩。他只是把蘇聯黨內那時業已形成的官僚意識型態，亦即史大林五句官話的根源透露出來了。那便是：「朕即黨，黨即國家，幹部決定一切。」只要共產黨員「佔大多數」，那便有了足夠條件，保證無產階級對農民的領導了。中國革命如何能於慘敗後擁有一支「紅軍」？「工農

蘇維埃政府」究竟在怎樣的地區內建立？它如何建立？在蘇維埃政府中佔大多數的共產黨員與無產階級的關係如何？如果他們遠離了城市無產階級，又如何能對農民實行思想的與國家的領導？諸如此類的問題，每一個鄭重的馬克思主義者面臨中國當時的紅軍與蘇維埃運動都必須提出來研究的問題，卻根本不曾為曼努依爾斯基所觸及。因此，不管中國的紅軍與蘇維埃運動如何發展，均與史大林們的路線無關，因為他們在這裏根本不曾有什麼路線，證實或否定都無從談起。

托洛次基從 1930 年中期中國的紅軍與蘇維埃運動引起國際注意之時起，便鄭重地研究這個問題，提出他明確的路線。在他起草的《國際共產主義左派反對派告中國及全世界共產黨員書》中，他首先從農民的本質肯定他們是「不能夠創立獨立的政府的」。他說：「必須等到無產階級統治了國內諸重要的工業和政治中心，然後才有必要的前提以組織紅軍以及立蘇維埃制度於鄉村裏面。」（加重號原有）接着他說：

中國無產階級剛正開始從反革命的癱瘓中脫離出來。農民運動的展開，目前大部分是對工人階級獨立而依照本身特殊規律和本身特殊步驟去進行的。可是中國革命的整個任務乃在如何將無產階級暴動與農民暴動，政治上配合起並組織上聯繫起來。誰要說在工業省份消沉下去的時候，中國蘇維埃革命能在南方農業省份一省或數省勝利，誰就是不明瞭中國革命之二大問題：工農合作問題和此合作中工人領導權問題。（見《中國革命問題》第二版，167 頁。）

從這個基本態度出發，托洛次基認為中國共產黨員當前的任務「並不在於分散其力量於農民暴動之散漫火焰裏去……」，而在於「集中力量於工廠、作坊、工人區域，向工人解釋鄉村事變的意義，提高疲累

者和消沉者的精神，並在為經濟要求為民主口號並為土地革命而鬥爭中將他們團結起來。」（同上，168頁。）

對於史大林與曼努伊爾斯基們對此運動所作的輕率與官腔的論調，托洛次基是這樣駁斥的：

當國家政權並不操在無產階級手中，無產階級怎麼能實現它對農民的「國家領導」，令人百思莫解。一些單獨的共產主義者或幾群單獨的共產主義者在農民戰爭中所起的領導作用，解決不了政權問題，決定政權問題的是階級而非政黨。（見《狼狽的潰退》）

兩年之後，在寫給中國同志們的一封專論無產階級與農民戰爭的信中，把上述的意思又作了發揮，他說：

真正的共產黨是無階級先鋒隊的組織。我們不能忘記，中國工人階級在過去四年間，是在被壓迫的與不定形的狀態之下，只不過到最近才顯示復活的信號。共產黨堅固地依靠在城市無產階級的精華上，努力經過工人去領導農民戰爭是一回事。而幾千的革命者，或者是幾萬的革命者，他們或是真正的共產黨，或者只擔着這樣一個名義，沒有嚴格的從無產階級那裏來的擁護，只保持着農民戰爭的領導權，這完全是另一回事。（見〈論無產階級與農民戰爭〉——《中國革命問題》第二版，180頁。）

托洛次基這一整套看法，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對農民運動的一貫見解。它又是根據俄國革命的新經驗，並根據中國農民造反的舊教訓而形成的。

但是，中國第三次革命走向勝利的道路，顯然沒有符合這個看法，甚至違反這個看法。在這裏，歷史發展的本身顯然對馬克思主義的有關理論提出了某些「修正」或補充。

三、「修正」了什麼？補充了什麼？

可惜托洛次基再也不能替我們回答這個問題了。他於1940年被史大林派遣的兇手所謀殺，沒有機會看見中共「以農民打天下」的全部過程，沒有機會在新事實的印證下給傳統主張得出新的結論。因之，如何應用革命馬克思主義方法來研究中共勝利所反映出來的理論和實際之間的差距，落在後一輩托洛次基主義者的肩上了。

必須坦白承認：中國托洛次基主義者在中共的巨大勝利面前是感到迷惘的。為什麼我們從來認為不可能取得勝利的路線居然勝利了？當時這個問題幾乎困擾着每一個同志，思想和研究的空氣頗為熱烈，答案也提出不少。不過在這篇導言裏，我當然不能將它們一一介紹。

在這裏，我只想約略敘述一下我個人對此問題的看法。

首先我得指出：托洛次基在中國農民戰爭問題上提出的主張，與中國托洛次基主義者對於它的了解之間，不是完全相同的。至少在如何擁護農民鬥爭與如何認識從事農民戰爭以後的中共的階級性這兩點上，二者有甚大出入。

中國托派應如何去保衛與擁護中共領導的農民鬥爭，托洛次基在1931年1月8日寫給中國左派反對派的信中說得最為具體詳盡，他說：

我們在不放棄我們的方法和任務之下，應該堅決與勇敢地擁護這些武裝隊伍，反對國民黨的壓迫和資產階級的污蔑造謠，我們應該對工人解釋說：這些武裝隊伍有巨大象徵的意義。我們自然不可以拿我們自己的力量去作游擊戰爭，我們現在另有一個活動範圍，另有一些任務，但我們還是非常希望至少在「紅軍」若干最有力武裝隊伍中，有我們自己的人，反對派與這些武裝隊伍同生共死，密切觀察這些武裝隊和農民之間的聯繫，並使左派反對派的組織充分獲知情況。（見《中國革命問題》第二版，173頁，最後二句改譯。）

很清楚，根據托洛次基的意思，中國左派反對派不但要在宣傳上堅決擁護農民武裝隊伍，而且在行動上也要在可能範圍內實際參加進去，與他們同生共死。可是中國托派在其長期存在中卻未曾參加過農民鬥爭。當然，反革命的嚴厲鎮壓，使組織不斷遭到摧殘，以致始終無力及此，這是重大原因；但我們在主觀上根本無此決心，有些人甚至根本反對參加，把任何方式的參加都稱之為「軍事投機」而加以排斥，卻也是事實。

中國托派在這方面的錯誤，自不能要托洛次基負責。

關於中共進入農村以後的階級性是否改變問題亦然。自從中共離開城市，以農民作為鬥爭主力以後，托洛次基便不斷指出中共有墮落為小資產階級農民黨的危險，這些武裝有墮落而惹起貧農反對的危險。但他始終不曾說過中共已變成小資產階級的農民黨，也不曾說過這些武裝隊伍已反對貧農的利益。相反，正為了這種危險，他說，我們「必須保持這些武裝隊伍於我們注意之下，以便隨時隨刻都能站正確立場上。」（見〈給中國左派反對派的信〉——《中國革命問題》

第二版，173頁。）在〈再給中國左派反對派的信〉中，他更加詳盡地告訴他的中國同志們：「根據我們自己的觀察，根據各種報告及別的文件，我們必須極仔細地研究農民軍隊的生活過程和他們在割據區域所建立的制度。我們必須從活的事實中發現矛盾的階級傾向，並清楚地向工人指出，那種傾向我們是擁護的，那種傾向我們是反對的。」（同上，181頁。）

可是中國托派在此問題上完全不曾採取這樣仔細與踏實的態度。我們幾乎純粹從觀念出發，大約自從一九三〇年代中期起，先則說中共有墮落農民黨的危險，隨着索性斷定它已墮落成農民黨了。

這個斷語是中國托洛次基主義者面對中共勝利而感到迷惘的最大原因。因為根據不斷革命論的理論，農民黨是絕對不可能領導和完成中國第三次革命那樣革命的。

很顯然，中國托洛次基主義者在這個問題上的錯誤，也不該由托洛次基負責。

如果托洛次基能夠看見中共走向勝利的全部過程，憑他一貫堅持的「注意活的事實」的態度，我相信，他決不會像大多數中國托派那樣，對中共的勝利感到意外。

現在讓我們來談階級與政黨之間的關係問題。關於這個問題，列寧有過極精彩的說明。當他反對經濟主義的自發性，強調自覺的無產階級先鋒隊與革命職業家組織的重要性時，他說工人階級運動與社會主義本來不是一回事。他並且徵引考次基的話說：「社會主義和階級鬥爭是並排產生出來，不是一個從另一個產生出來，它們是在不相同的前提下產生出來的。」（見《做什麼？》）

根據列寧這個主張，我們應該說：革命的社會主義政黨與它所代表的工人階級之間的關係，並非像毛附着於皮那樣的簡單直接。二者在某一意義上不可分離，在另一意義上卻可以分離。不可分離，那是就無產階級政黨的發生與活動必須以無產階級的存在及其鬥爭為前提而言。可以分離，那是說，這個先鋒隊的存在與活動不一定時時刻刻都要與工人階級連在一起。在某種情況下，譬如這個先鋒隊受到反動統治的殘酷鎮壓，以致它的一部或大部分被迫離開城市與工人群眾，被迫依靠一些非現代無產階級的群眾來繼續鬥爭。這時候，這個先鋒隊並不一定會墮落成為非工人階級政黨的。如果這個先鋒隊（由一部分知識分子與一部分覺悟工人所組成），能在較長時期內堅持社會主義革命的政綱，能保持被剝削者反對剝削者的意識，能領導被踐踏者對一切踐踏者的鬥爭，能維持團結與嚴明的組織，那末它仍有可能與資格保持其為工人階級的政黨。

從這個認識出發，對於由城市移入鄉村的中共，我們絕不應該單單憑它之離開城市與工人這個事實來決定其性質。我們得首先從它的政綱政策，從它的實際措施，以及它的黨員成分等等來看它是否已經改變性質。

中共從1927年秋天開始進入農村，直至1949年打敗國民黨，回到大城市，前後長達二十二年。在此期間，不論政綱政策，黨員成分，都曾經歷了極大變化。究竟這些變化如何影響了中共的性質，或它們是否已經改變了它的性質。在過去，我們是考慮不足的。對於中共的所言所行，我們自然不斷注意。但我們往往忽視其所行，輕信其所言。因而斷定它已經不再是一個可以代表工人階級的政黨。殊不知它的所行，不管有時如何荒唐，卻始終不曾放棄階級路線。它的所

言，有時雖然更加離奇，卻大抵出於策略權術，並非旨在實施。它始終保持共產主義的目標，更重要的，它的黨員和兵士，無論在「十年內戰」與「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都始終依照階級路線（即限於貧僱農與手工業工人）來徵收的。黨內生活，雖然執行着史大林主義的集中制，但因客觀上鬥爭的需要，也保有多少革命的民主。由於這些緣故，這個黨雖然離開城市工人階級二十多年，存在活動於農民環境中，卻仍能基本上保持其為代表工人階級歷史利益的政黨。也由於這個緣故，憑藉非工人階級的其他勞苦群眾的力量，在長期內戰中打敗代表地主與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黨，不但完成民族民主任務，且能向社會主義革命前進。

為什麼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農民戰爭，能與中國歷史上數十次大規模的農民戰爭不同？為什麼它不會以失敗或建立新的封建王朝告終，卻獲得了目前這樣一個完全不同的結果呢？原因當然很多，而其中最為主要的卻總在於最近這次農民戰爭的領導者不是一群農民領袖，亦非農民政黨，而是一個以社會主義革命為目標，以代表工人階級利益自命的革命黨。為什麼這個工人政黨能不因其長期存在於農村而改變其性質呢？這主要得拿我們所生活的時代的特點來說明了。到了二十世紀的二三十年代，一方面由於國際資本主義的實際統治全世界及其臨終掙扎的危機，另一方面由於十月革命勝利與蘇聯的誕生和存在，以致單獨一個國家的工人政黨，不但以其本國工人階級的存在及其鬥爭為前提，而且以全世界工人階級的存在及其鬥爭為條件了。

托洛次基自然深知這些情形，所以他未曾說過：中共一入農村就會變質；但因中共之被迫轉戰於農村在革命史上尚屬創舉之故，他也始終不曾說過：在某種條件下，中共可以不改變其工人政黨的性質。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中共走過的特殊道路，顯然是對馬克思主義亦即對托洛次基主義在革命戰略方面的一個補充，也可以說是「修正」。

這是一個重要的補充。在中共之後，我們至今又看見了古巴，看見了越南、老撾與柬埔寨，又看見了尼加拉瓜。今後，在亞、非、拉美的一些落後國家中，我相信還可以見到別的國家的革命者走上這條「修正」道路。

然則，托洛次基關於農民戰爭的立場，是否有不被「修正」的部分呢？當然有。且讓我們從毛澤東思想的成敗來研究。

四、「毛澤東思想」的正數與負數

上面說過，中國第三次革命發展的特殊道路根本與史大林無關。當然也不是毛澤東個人的發明。它主要是千百萬中國革命者在實際鬥爭中摸索出來的。不過在摸索中做了比較系統說明的，則不能不推毛澤東。當中國的革命者為客觀形勢所迫，在農村裏奮鬥十年之後，毛澤東在1938年11月舉行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第一次全面地給中共從事農民戰爭的路線，作了理論的解釋。他說道：

基於這些特點，資本主義各國的無產階級政黨的任務，在於經過長期的合法鬥爭，教育工人，生息力量，準備最後地推翻資本主義。在那裏，是長期的合法鬥爭，是利用議會講台，是經濟的和政治的罷工，是組織工會和教育工人。那裏的組織形式是合法的，鬥爭形式是不流血的（非戰爭的）。……不到資產階級處於真正無能之時，不到無產階級的大多數有了武裝起義和進行戰

爭的決心之時，不到農民群眾已經自願援助無產階級之時，起義和戰爭是不應該舉行的。到了起義和戰爭時候，又是首先佔領城市，然後進攻鄉村，而不是相反……。

中國則不同。中國的特點是：不是一個獨立的民主的國家，而是一個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國家；在內部沒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壓迫；在外部沒有民族獨立，而受帝國主義壓迫。因此，無議會可以利用，無組織工人舉行罷工的合法權利。在這裏，共產黨的任務，基本地不是經過長期合法鬥爭以進入起義和鬥爭，也不是先佔城市後取鄉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見《毛選》第二卷，1969年版，507頁。）

毛澤東在這裏發揮了他以農民打天下，由鄉村包圍城市的特殊理論。他說出了中國共產黨應該採取不同於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所曾採取的路線的原因。但是他沒有說明，也從來不曾說明代表中國無產階級的共產黨長期脫離城市與工人階級，是否能夠或如何能夠保持其為工人政黨的性質。他沒有說明在工人階級消沉的情形下，共產黨要想領導農民戰爭而使之有利於工人鬥爭有什麼困難。他沒有說明這樣的農民戰爭，倘幸而與某些有利的客觀條件配合之後，取得了勝利，會與工人階級發生什麼衝突。如果它贏得了全國的勝利，會給勝利的革命及其政權帶來怎樣的困難與危險。總之，當他提出這條根本有別於馬克思主義傳統的戰略路線時，卻完全不曾思考到馬克思主義有關此一方面的基本問題，即：城鄉關係問題，工農利益矛盾問題，由農民的與軍事的方式所取得的勝利必將與社會主義的民主相衝突的問題。換言之，他在行動上實行着無產階級政黨與無產階級的分離；卻不曾考慮到這二者如何與為何可以分離，更不曾考慮到二者之不可分離。

唯其如此，所以毛澤東及其同道們雖然依循他們特殊道路獲得了中國第三次中國革命的勝利，卻帶來無數毛病與困難。正因為他們從未預見到這些困難，以致在它們面前手足無措，進退失據。

托洛次基卻早在一九三〇年代之初，當紅軍與蘇維埃運動崛起之初，便在理論上預見到它們，並且提出了警告與防止它們的積極建議。在1932年9月22日寫給中國左派反對派的信中，除了上面我們認為已被事實所「修正」的那個論點之外，充滿了為後來事變所證實的先見式的論斷。托洛次基在信裏充分闡明了「無產階級、農民與資產階級三者之間階級關係的活的辯證法。」他再三指出「共產主義者站在農民軍隊之首，並不能變更農民的社會性質。」他指出「中國紅軍的指揮層無疑已養成了自身的指揮者心理。沒有強固的政黨和無產階級的群眾組織，那末要控制那指揮層在事實上不可能。指揮官與委員在地位上既然威權高於一切，在佔領的城市中更要看不起工人」（見《中國革命問題》第二版，180頁。）托洛次基當時就預先考慮了這樣一個問題：「農民運動已經創造了自己的軍隊，奪到很多地域，並且有了它自己的制度。倘若遇到更大的成功，自然我們熱望着這一成功，這一運動將要和城市大工業中心聯繫起來，而經過這一個事實，它將面對工人階級。這個接觸將是怎樣呢？是不是一定和平而親密的呢？」（同上，178頁。）托氏的回答是並不一定——甚至，他還預見到在不同領導之下的這兩個階級竟有武裝衝突的可能。

托洛次基這些主要從理論出發，同時根據當時一些事實而作出的預見與警告，到了二十年之後，也就是到了中共奪到整個中國並建立了全國政權之後，雖然不是照字面那樣證實出來，卻基本上獲得證實了。中共領導的軍隊攻佔了大城市，以「解放者」或「大救星」的資格與它自以為代表的階級再度見面。重會以後，中共並不採取積極步

驟，使黨、政、軍等方面緊緊靠在工人階級身上，卻反而以征服者與仲裁者姿態來統治無產階級與所有勞動者。這個新政府非但不由工人階級及其他勞動者直接產生，而且它不讓他們有發言權，更不必說有監督權。那個由二十幾年農民武裝鬥爭所凝成的軍事官僚階層，頑固與專橫地統治這個國家，要想在中國這個落後國家的一國範圍之內建設社會主義，甚至想一步登天地實行共產主義。這是小資產階級農民的革命幻想與史大林官僚一國社會主義反動思想的奇異的結合。這個結合在過去的二三十年中，給中國的工人階級，廣大農民與城市小資產階級帶來了難以形容的苦難。

在這裏我不想也不可能細細分析中共勝利以來的痛苦經驗。我想指出的只是：如果毛澤東們真正懂得「無產階級、農民與資產階級三者之間階級關係的活的辯證法」，真正檢討過工人階級先鋒隊和工人階級之間可以分離同時又不可分離的理論，真能自覺到先鋒隊被迫與階級分離時的如何危險，真能看到決定政權的是階級而非政黨這個真理，那末毛澤東們在當時中國的客觀條件下不得已而採取了特殊的革命鬥爭路線，他們一定會於勝利前與勝利後戒慎戒懼，緊靠在一切勞動人民的身上，儘可能發揚民主，以便拿城市工人階級的先進意識與紀律，去沖淡、克服乃至代替那反映農民意識的散漫，自私與落後。如果這樣，則不僅武裝鬥爭的年代也許可以縮短（自然還得與國民會議鬥爭配合起來才有可能），痛苦的程度也許可以減輕；而更重要的，那種目前人人痛惡的所謂「封建法西斯專制」，多半可以避免，官僚主義的癌症不會如此嚴重了。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有充分權利說，中國第三次革命的勝利及其後果，恰恰證實了——自然是以反面經驗來證實的——托洛次基對中國農民戰爭所堅持的基本看法。

V. 中日戰爭與革命勝利

一、中共的「半條路線」

讓我們回到有關中日戰爭的問題上來：為什麼史大林派的第二次國共合作路線非但不曾帶來悲慘結果，而且似乎還促成了抗戰勝利，更於抗戰後促成了中共的革命勝利？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我們得弄清楚一個事實：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爭的失敗，主要是它在世界大戰中失敗的結果。對中國來說，勝利是「送上門來」的。因此，這個勝利固不能歸功於國民黨，亦不能歸功於中國共產黨。即不能歸功於史大林路線。

至於中共利用這個倘來的勝利而終於贏得了革命勝利，那末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恰恰在於中共——包括毛澤東在內的大多數——實質上否定了史大林給他們規定的路線。他們有自己的一套。他們有「半條路線」。

我們知道，關於如何執行與國民黨「第二次聯合」這個問題，中共內部曾經發生過很大分歧。直接代表蘇聯官僚的王明們，自然要切實與蔣介石合作。用毛澤東派轉述的話來說，那就是要「一切通過聯合戰線」。以毛澤東為首的「土共產黨員」則主張陽奉陰違，實際上保持獨立。這一部分人的希望和意見，相當清楚地表現在毛澤東於1935年12月召開的瓦窯堡會議上的講話中。那時毛澤東為了讓那些懷疑新政策的人們安心起見，他說道：

現時革命方面的特點是有了經過鍛煉的共產黨，又有了經過鍛煉的紅軍。這是一件極關重要的事。如果現時沒有經過鍛煉的共產黨和紅軍，那就將發生極大的困難。

共產黨人現在已經不是小孩子了，他們能夠善處自己，又能夠善處同盟者。日本帝國主義者和蔣介石能夠用縱橫捭闔的手段來對付革命隊伍，共產黨也能夠用縱橫捭闔的手段對付反革命隊伍。

毛澤東的這個態度自然與托洛次基的立場不同。它不是堂堂正正的階級革命路線，而是赤裸裸的槍桿子主義，加上爾詐我虞的權謀作風。在政治的大方向上它又是受制於史大林「人民陣線」的圈套。可是處於中國當時民眾普遍不滿、國民黨極度腐化、人人左傾的大壓力之下，毛澤東們這種策略性的，權謀性的獨立自主的實力做法，卻無論如何更接近於托洛次基的革命立場而事實上違背了史大林的投降政策。

在此一意義上，我們可以說：中共所以能夠從抗戰勝利走向中國第三次革命勝利，首先因為它能夠在抗戰中事實上保持獨立，能夠實行「半托洛次基主義」路線。

二、中國托派的內部爭論

「可是」，人們於此會問，「奉行全托洛次基路線的中國托洛次基主義者為什麼既不能在抗戰中，又不能在抗戰勝利後的革命中起重大作用呢？」這個問題應該回答（本人在別的文章中已經回答），但是我不能在這篇序文裏討論。在這裏我只想約略談談當時中國托派內部在抗戰問題上發生過的兩種不同態度，因為它和如何理解托洛次基在此重大問題上的意見有甚大關係。

如上所述，托洛次基對中國抗日戰爭的立場包含着兩個方面：一方面，肯定中國一邊的戰爭的進步性，因此堅決主張擁護並且參加由

蔣介石領導的抗戰。另一方面，他要中國共產主義者保持自己的政綱和政治的獨立，以便到了我們不能預先確定的某一階段上，可以而且應該轉變這個政治的反對為武裝鬥爭，藉以代替蔣介石的領導，使戰爭與革命取得勝利。（見《致里維拉的信》）

托洛次基這個態度，在馬克思主義者對戰爭的態度上，我認為是全新的。根據馬克思主義派的傳統見解，各種戰爭，就其歷史意義，其目的以及就作戰國家的政制不同，分作進步的與反動的兩種。我們擁護進步戰爭，反對反動戰爭。擁護乃助其勝利之意。反對則欲使之停止或促其失敗之謂。在進步戰爭中，工人政黨對於異階級領導的戰爭，通常以建設性的批評為限；而對於反動戰爭則全面繼續階級鬥爭，利用戰爭所造成的困難而引起革命，以便推翻戰爭的領導者。革命任務從來不曾在進步戰爭中提出過。列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提出革命任務，係根據帝國主義戰爭之普遍反動性這個前提。至於說革命者在進步的或正義的戰爭中，應該徹底繼續階級鬥爭，甚至在可能時候，變「政治的反對為軍事的鬥爭」，亦即在外戰中進行內戰，藉以推翻反動的領導者，建立工農政權，藉使戰爭勝利，革命成功——這個立場則自托洛次基始。

托洛次基這個立場是否違反馬列主義？我們認為並不。

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到中日戰爭，這二十多年中世界上發生的大事，極其清楚地暗示了全人類以一個痛苦的真理：「無產階級革命的客觀先決條件不僅已經『成熟』，而且已開始有點黴爛了。因為如果沒有一次社會主義的革命，如果不在下一個歷史時期就發生一次社會主義革命，則有一個大災難將威脅全部人類的文化。」（見《過渡綱領》中譯本，7頁。）

這個社會主義革命的客觀歷史要求不僅對帝國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提出，而且也對落後國家的工人階級與一切勞動者提出。因為1925-27年中國革命經驗證明：即使在落後國家中，為要解決民族與民主任務，也必須要靠無產階級專政，否則便歸於失敗。

正是社會主義與野蠻主義這個十分迫切的歷史抉擇，正是這個全世界，包括落後國家在內的無產階級革命成熟，以及無產階級專政的成熟，使托洛次基比列寧走前了一步。把革命任務也提出於參加客觀進步戰爭的工人階級與革命者之前了。他不但要變反動戰爭為革命，而且也要將客觀進步的戰爭引向革命。

毋須說，這個基本上都是要在戰爭中引發革命的政策，如何在根本反動的戰爭中以及在客觀進步的戰爭中實行出來，卻是大不相同的。倘若在反動戰爭中，革命的總路線可以概括為「革命的失敗主義」，那末在進步戰爭中，這個同樣的路線卻應該正確地稱之為「革命的勝利主義」。在後一情形中，「本國政府戰敗乃較小禍害」這個口號全不適用。革命者所以要在進步戰爭中繼續階級鬥爭，甚至要進行革命，其目的之一恰恰要保證戰爭勝利。正因為這條路線是全新的，所以實際應用起來會遇到極大困難，特別是此一政策內含的兩個構成部分：擁護戰爭與反對戰爭領導——如何在不同時間與不同條件中正確而生動地配合起來，以便既能為廣大群眾所接受，又能引導他們去反對專橫無能的戰爭領導者，乃是一種極其複雜艱難的政治藝術。光是將兩個方面同等與平面地提出來，那末最好也只是紙上談兵，決不利於實際鬥爭，甚至於鬥爭有害。在這一方面，托洛次基於1937年10月27日寫給當時國際書記處的信，具有極大啟發性。書記處通過的關於中日戰爭的決議案（1937年8日），正確地指出「中國無產階級的迫切的任務是要為動員和武裝廣大民眾而鬥爭，藉以進行抗日戰爭，使

日本戰敗，爆發革命，又使賣國而替帝國主義當走狗的國民黨失敗於無產階級之手。」（見《中國革命問題》第二版，205頁。）托洛次基見到這個文件，作了批評，其中有如下的話：

我不能反對你們文件的任何一個部分，甚至不能反對其中任何一句句子。每一個論據的本身都是正確的，但是各個不同部分之間的比例，我覺得不夠現實。（見英文本，574頁。）

試想當抗日戰爭熱火朝天地進行之際，倘有誰在群眾中同時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與「打倒國民黨」，會得出怎樣的結果？最客氣的將是一頓痛毆。這樣的鼓動當然太不現實。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在愛國主義高漲的壓力下，一味遷就現實，始終只是「無條件擁護戰爭」，其結果卻只能替蔣介石再當一次苦力。

中國托派在抗日戰爭態度問題上所發生的爭論，若僅就問題的實質而論，也就是對托洛次基這個全新立場的不同了解，以及對此立場內含的兩個不同部分之間所定的比例的比例的差異。簡言之，以彭述之為首的一部分人，特別着重中國一邊戰爭的正義性，因而強調擁護戰爭，全力反對妥協，提出「擁護抗戰到底」的口號。他們也提出要「轉變應戰為革命的抗戰」的口號，但這口號之意絕不是要以革命反對蔣介石，而是希望蔣介石能夠發動工農，使「捆縛壯丁」變成群眾的「自願參戰」。他們只是抽象地憑戰爭之進步或反動的性質而決定擁護或反對的態度。對於他們，托洛次基提出的「變政治的反對為武裝的鬥爭」，「戰爭中打倒蔣介石」，「建立工農政府」這一方面的思想，是從來不曾鄭重考慮，更不想去切實實行的。另外一部分人（本文作者乃其中之一）則更加着重托洛次基以革命爭取戰爭勝利這一方面。他們認為革命者積極擁護與參加抗日，不但因為它是正義的，而且因為由

此可以在工農大眾與軍隊中取得影響和威望，以便在「一個不能預先確定的某一階段上」，可以將對國民黨的政治的反對轉變為武裝鬥爭。如果發生了這個情形，他們深信中國的革命熱力會瓦解日本的侵略軍隊，會引發日本革命。如果不幸，中國的革命武裝鬥爭竟一時導致抗日前線的軍事失利，這個革命鬥爭也不應該停止。因為依他們之見，革命的勝利一定能補救前線軍事的暫時失利。

由於中國托派始終只是一個宣傳性的小組織，上述爭論從來不曾有機會從紙上辯駁進入實際行動。以致誰是誰非無從在事實上獲得證驗。雖然如此，我迄今仍以為後一立場更符合於托洛次基精神，因而是正確的。在此革命與戰爭不斷交織的時代裏，今後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還將不斷參加於「客觀進步的戰爭」中。他們還將一再遇到在這類戰爭中如何執行革命政策的問題。「先勝利而後革命」呢，還是「只有加深革命才能保證進步戰爭的勝利？」這個抉擇無疑將決定許多革命和戰爭命運。

IV. 結論

最後，我想拿兩個問題來結束這篇冗長的導言：一、托洛次基主義今後是否仍有益於中國革命的往前發展。換言之，中國托派是否仍有必要謀求在中國繼續存在與繼續活動？二、從共產國際與中共的關係中，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應該汲取怎樣的教訓。

在上面，我們肯定了史大林主義的戰略和策略曾經是中國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它又是中國工農與共產主義者在反革命年代遭受不必要苦難，延長這個苦難的主要原因；最後，中國革命的終能勝利，從

主觀方面說，一部分乃是中國共產主義者憑其親自鬥爭經驗，且在革命群眾的壓力之下，事實上擺脫了史大林主義的束縛而達成的。

我們又肯定：托洛次基主義在中國革命的上述三時期中，均曾被反證出它的正確性。

但是革命既已勝利，中國托派該為這筆「舊賬」而堅持其存在與活動嗎？我認為應該。理由如下：

中國共產黨於1949年取得全國政權，不管其本身具有何等重大的歷史意義：卻絕不等於中國革命之完成與徹底解決。就社會主義革命的推進與社會主義的建設而言，1949年的勝利僅僅是「革命長征」的一個新開始。無數新的問題與新的困難提出和發生於中國一切革命者之前。如要解決這些問題與克服這些困難，恰恰是史大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所不能勝任的。建國以來三十年的痛苦經驗，已經在這方面提供了足夠證據。因為社會主義革命首先在一個國家內尤其在像中國那樣的落後國家內，取得勝利，只有將它看作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部分，因而利用此一勝利去竭力幫助與推動世界革命，才談得上一國範圍內社會主義制度的鞏固；也只有配置在國際社會主義的遠景上，才能談得上社會主義建設的順利進行與最後成功。

徹底國際主義的革命立場，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的世界革命政綱，在中國，也和在目前世界的其他國家內一樣，只有托洛次基主義者在堅持，只有他們在努力為之奮鬥。因此想要把新中國從嚴重的危機與深遠的墮落中挽救出來，主要得靠托洛次基主義的發揚與實施，換言之，主要得看中國托洛次基主義運動能否發展強大，使之能領導一次或多次反官僚統治的政治革命而定了。

現在談第二個問題。

在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的關係方面，托洛次基說過一段極有意思的話：

洪（瑪爾勞小說《征服者》中的一個主要人物——無政府主義者——西）在工人的集會上成功地站出來發言，大聲反對那些「俄國人」，反對那些破壞革命的旗手。洪本人的道路是達不到目的的，但他之反對鮑羅廷卻是正確的。他問「太平軍的領袖們有俄國顧問嗎？義和拳有俄國顧問嗎？」假使1925-27年的中國革命一切任它自己發展，

（不受外來領導的干預），也許不會很快成功，但它也不會採取剖腹自裁的方法，它不會發生那些可恥的投降。它可能已經訓練出革命幹部了。

同樣意思，托洛次基也曾在其他地方表示過。這裏他實在說出了一個痛苦的真理：壞國際不如無國際，壞領導不如無領導。毋須說，托洛次基是最重視現時代各國革命的國際協力與國際領導的。處在帝國主義與世界革命的時代裏，不但建設社會主義是一個國際任務，便是某一國家無產階級革命的發生，發展與成功，也有賴於國際的協力與領導。托洛次基的一生事業，完成俄國革命與努力建立社會主義革命的國際，其重要性幾乎相等。在他生命的最後十幾年中，他把整個時間與精力都貢獻給第四國際的建立了。

然而他在中國革命的悲劇中看到了一個壞的國際領導所能起的破壞作用竟大大超過了建設作用，因而有上面援引的那種感慨。

我這裏不想談論共產國際從世界革命司令部墮落成蘇聯官僚的御用工具的經過。也不想於上面已經敘述的之外，再詳細分辨出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哪些援助與領導符合於世界革命利益，哪些援助與領導僅僅為了蘇聯官僚利益，並且有害於中國革命。在這裏，我只想就共產國際內部實行過的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問題說幾句話。為要糾正第二國際晚年的鬆散無力，以及各所屬政黨各行其是的作風，第三國際實行了嚴格的民主集中制，使全世界的共產黨在基本問題上思想一致，行動一致——這自然是一大進步。尤其當這個最高決策部掌握在誠實與正確的人們手中之時。可是等到蘇聯發生嚴重的官僚主義墮落，共產國際的領導愈來愈為一些專橫無能的官僚所控制之後，這個同樣的「民主集中制」卻一變而為破壞各國革命的有力工具。

年青的中國共產黨在紀律的壓迫下，不止一次被迫放棄了原本比較正確的立場，屈從了遠方發來的錯誤指示和決定，這實在是使1925-27年中國革命慘敗的一個重大原因。而中國第三次革命之終於勝利，在不小限度內，我們承認：得歸功於中國革命者多少能憑自己的思想與實踐，將「中國的真實和馬克思主義結合起來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其他一些國家革命的成功，例如南斯拉夫，古巴與越南，都不是在某一總部的集中指導下獲致的。這種反面與正面經驗，值得一切國際主義的革命者深思。

當然，這個經驗絕不能用以否定各國革命需要有一個國際的正確領導，亦不能用以否定革命國際必須有一個民主集中制，有一套維護民主集中制的內部紀律。

問題在於如何才能保證一個正確的與革命的國際領導。要想用一個簡單的方案來解決這個問題當然是天真而可笑的。因為它得由許多

客觀的因素來決定。它得由內部與外部的不斷鬥爭來「保證」。不過在主觀的努力中，我想，為使內部討論與鬥爭能依循健康與有益的道路發展起見，組織上給予各國支部以較大的民主與自主是重要的。一個正確的革命國際不可能僅僅從上而下來建立，它得先在各國支部奠基。一個有生命的國際必須在民族的土壤中生根。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必須建立在互相信任與互相了解的基礎上。而這樣的信任與了解，只有通過一個有較大民主的集中制才能獲致。

目前的第四國際，不管它的力量還很微弱；但從它的基本政綱與極為民主的組織路線來看，我認為符合於我們所期望的要求，它是能成為一個好的國際領導的。

1980年8月

注釋

1. 這個擴大會議的決議案送給第三國際，遲遲不見反應。一直拖到第二年（1927年）3月18日，國際才在第11期《共產國際》雜誌上用社論方式對該決議作猛烈抨擊。社論題目為〈中共五大與國民黨〉。它的主要意思是號召行將召開的中共第五次大會把去年7月擴大會議的錯誤決定完全改正過來。社論作者誤把7月稱為6月。其實中共中央根本不曾在1926年6月舉行過全體會議。托洛次基的文章〈中國革命中的階級關係〉係針對《共產國際》的社論而寫，所以也稱中共的那次會議為「六月擴大會議」。托洛次基顯然只根據社論作者不很確實的轉述，並未根據原文作出評估，故說它是「無條件正確，應該予以贊成」。其實托洛次基早已見過七月擴大會議的各個決議（包括那個論國共關係的在內）而且對它批評過了。在1926年9月27日寫的〈中共與國民黨〉一文中，他說：「這個決議連同其他幾個決議，證明出中共極端矛盾的政策，也證明了從這裏發生出來的危險。」（見英文本，115頁。）

2. 據彭述之在其為英文版《托洛次基論中國》所寫的導言中說：「托洛次基提及的中共中央六月全會的決議，便是陳獨秀與彭述之二人的決議，它又向七月全會提出，全會同意提交共產國際考慮。」（見該書 55 頁）但我們無法在任何材料中找出中共中央曾於 1926 年 6 月開過全會的證據。一切史料告訴我們：中共的四屆中央第一次全會召開於 1925 年 10 月，1926 年 7 月召開的是第二次全會，故在這兩個日期之間，不可能有另一次全會。
3. 在現有托洛次基的文字中，最先提到蘇維埃口號的是 1927 年 3 月 29 日致阿爾斯基的信。那是省港罷工委員會順帶地提及的。正式而廣泛地討論這個問題，則在 1927 年 4 月 16 日寫的《中國革命中的蘇維埃問題》。因此有些現代史家傾向於將托洛次基提出蘇維埃口號的日子定為 1927 年春。但在〈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中，托洛次基說：「在中國事件爭論中，反對派被罵為有如下的所謂大矛盾：在 1926 年初，反對派給中國提出組織蘇維埃的口號……」（見英文本第 32 頁。中文本《中國革命問題》第二版第 88 頁）
4. 在沒有見到托洛次基的《中國革命的新機會、新任務與新錯誤》（1976 年才首次譯成英文公佈）之前，我們以為托洛次基在 1927 年 7 月後即宣佈革命已確定失敗。

7. 《托洛次基檔案中致中國同志的信》

譯者弁言

托洛次基寫給中國托派的信，迄今為止，我們見到與收集到的共有 22 封，現在將他們編成一集出版。其中 5 封（1929 年 12 月 22 日〈答中國反對派〉，1930 年 4 月 2 日〈論國民會議口號〉，1931 年 1 月 8 日〈給中國左派反對派的信〉，1932 年 9 月 22 日〈論無產階級與農民戰爭〉，以及 1932 年 10 月 3 日〈要行動的戰略不要揣測〉），因為性質上都是鄭重的理論分析與政治指導，當時都登載在《反對派公報》上，同時差不多都立即譯成各種主要文字，在各國反對派機關報上登載了的。在中國，除當時將它們譯出、抄印與傳觀外，後來又都曾收入《中國革命問題》與《托洛次基給中國托派的信》這兩本書^[1]。

其餘 17 封，絕大多數是寫給中國的個別托派同志的，多少帶點「私人」性質。內容也與上述五長函略有不同：它們差不多全是關於組織和「事務」方面的。這些信，在寫作當時發信人都不曾將它們公開發表。在受信人方面，由於性質關係，也不曾將每一封信都譯出付印。其中一些重要的雖曾譯載在當時反對派各派的刊物上，但因國民黨的嚴厲鎮壓，中國托派不斷遭受破壞，以致這些刊物得以流傳的絕無僅有，而托洛次基寄來的信札原件更是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近年來，我們首先見到了收入英文《托洛次基論中國》一書中的兩封舊信：1930 年 8 月 22 日致劉仁靜與同年 9 月 1 日致十月派的。它們是從一本倖存下來的〈無產者〉（1930 年 10 月 30 日，第四期）的中

譯文轉譯成英文的。稍後，我們又見到了收入英文《托洛次基著作補篇》中的一封（1935年8月10日致李福仁^[2]）舊信。

去年（1980年）1月，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保管的托洛次基檔案中的「密封部分」，依照當年所訂條件開封了。我們請人代為尋找並影印有關中國的文件，結果得到了14封彌足珍貴的舊信。

這14封信可分作兩部分。前面7封（從1929年11月到1932年9月）是中國早期托派運動的第一手史料。它們反映了中國左派反對派當時的組織實況，同時也充分流露出托洛次基對中國革命運動的關懷。正是這幾封信，連同上述1930年8月22日與9月1日的二信，以及1931年1月8日的長信，直接促成了當時分別成立於中國的四個托派組織的統一。

後來寫給李福仁的7封（連同前已發表的則共為8封），主要談的是陳獨秀問題。在那裏，我們看到了這位世界革命的巨人對於他的中國老同志如何表示了無微不至的關切與愛護。

為使讀者能充分了解這些信的內容起見，我就我所知道的當時事實，在每封信的後面加添一些必要注釋。

1981年5月21日雙山

注釋

1. 收在本書裏的這五封信都是舊譯，編者只作了一些必要的修改。
2. 李福仁不是中國人，但他是中國托派的成員。

8. 致李福仁信

福仁兄：

你多半已經聽說，彭述之最近在法國出版了他的第一冊回憶錄（從他的童年說到1925），書名《中國共產主義的發軔》。我得到了一本，約略翻看了它的一些重要章節，覺得他的作風依舊，內容也是老的一套：拼命吹捧自己。為要造成他在中共與中國托派中唯一正確與一貫正確的領袖形象，竟還不惜虛構大量故事。

虛構故事中最突出的一例，是說他在中共第四次全國大會（1925年1月）前後，曾經憑他個人的努力使中共從門雪維克路線轉變成布爾雪維克路線。言外之意，他曾經起了列寧在1917年4月間起過的作用：重新武裝了黨的思想。

這樣僭妄的說法是完全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首先我們知道，中共和其他各國的共產黨一樣，由它的誕生時候起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就中共的情況說，至少直至一九四〇年代中期以後），他們的基本路線，無論向左或者向右，都是由莫斯科決定的；初期由第三國際決定，後來則由蘇聯政府來決定。此種決定之所以能夠實行，初期由於十月革命的威望，也由於列寧等布爾雪維克黨諸領袖的威望；後來，即當共產國際完全墮落成蘇聯史大林政權的附屬工具之後，則主要依靠物質的力量，甚至依靠軍事乃是特務的力量，這兩種決定（領導）在性質上自然完全不同；但其為自上而下的

控制則是一樣的。因此，如果 1923 年 6 月召開的中共第三次大會上，依照共產國際的決定而採取了向右的門雪維克路線，又如果直到 1925 年前後國際仍舊維持這條路線，那末中共內部的任何一個領袖都不可能憑他個人的努力，在黨的第四次大會上，使全黨轉變到「布爾雪維克」路線的。如果他真的要這樣硬幹的話，那末結果只能是受到批判或竟被開除出黨。

彭述之宣稱他當時並不秉承國際的任何指示，完全根據他個人對馬列主義研究的心得，首先提出無產階級在中國革命中應佔領導地位的理論，以此重新武裝了中共的思想，這是為共產國際在任何時期對任何一個共產黨的態度所不能容許的。因此它不可能發生，事實上也不曾如此發生。

首先，據我所知，無產階級應通過自己的政黨在中國的民族革命中佔取領導權這一個說法，並非要到 1925 年前後才有的。早在 1923 年 5 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共的指示中便明白提出過了。該項指示的第五條一開頭就說：「毫無疑問，領導權應當歸於工人階級的政黨。」（見中譯《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第一輯，79 頁。）

其次，據當時在莫斯科與彭述之一起學習的人所作證言，大約在 1924 年夏天，共產國際東方部提出了一種關於中國革命的所謂「國民革命」的理論（這個理論強調革命中無產階級應起的領導作用）。莫斯科東方大學的中國學生（即中共的旅莫支部）討論了並且接受了這個理論，決定拿回中國去實行。彭述之和其他一些學生於那一年的 8、9 月間先後回國。彭述之參加中共中央的宣傳工作，他於同年 12 月在《新青年》上發表的〈誰是中國革命的領導者？〉這篇文章，便是發揮大家在莫斯科接受的「國民革命論」。

1925年1月召開的中共第四次大會，確實以正式決議規定了這樣的立場：「中國的民族革命運動必須有最革命的無產階級有力的參加，並且取得領導地位，才能夠得到勝利。」這次大會也確實有彭述之的參加（他代表莫斯科的中共支部）。但是這個「布爾雪維克主義的」的政治決議案卻非彭述之的作品，而是由國際代表伍廷康起草，再由瞿秋白從俄文譯成中文的，因此彭述之絕對沒有理由把無產階級領導革命的理論說成為他個人的創見！也絕對沒有權利把中共四大通過關於無產階級革命領導權的決議算是他對中國革命的一大貢獻！其實提出無產階級應取得革命領導權還只是觸及了問題的一半，另外一半，也許是更加重要的一半，在於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如何才能取得這個領導權，以及如何去實行這個領導權。問題的這個一半，對當時中國的情形來說，那就是中共對國民黨的關係問題，前者對後者的態度問題。易言之，也就是中共應否加入國民黨的問題。

如果一方面主張無產階級必須取得國民革命的領導權，另一方面卻贊成加入國民黨，贊成接受其領導，服從其紀律，那末一切關於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漂亮言論終於成為一句空話，甚至比空話更壞；因為在實踐中，它會發生麻醉與欺騙作用，會使無產階級大眾陶醉於其天然獲得的領導權，喪失其對無產階級的警覺與鬥志。

彭述之對中共加入國民黨的態度是怎樣的呢？據他自己說是始終反對的。在那本回憶錄中，他說在莫斯科，當他回國之前，留俄全體學生召集過一次大會，會上依據他的報告，決定回國後大家都不以任何方式加入國民黨。但是據當時與彭述之同在莫斯科的鄭超麟同志說，根本不曾有過這樣決定。事實正相反，在1923年10月10日之後，東大的旅莫支部曾經決定讓羅亦農（書記）與彭述之（宣傳部長）二人加入國民黨。

彭述之又說他同陳獨秀一起曾經兩次要求國際，讓中共退出國民黨。一次在1926年3月20日蔣介石政變之後，另一次在同年7月的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上。但是他的這個說法完全找不到人證或者物證。相反，從陳獨秀的著名文件〈告全黨同志書〉中，我們倒可以找出反面證據，證明彭述之從來不曾與陳獨秀聯名提出過中共退出國民黨的任何建議。在〈告同志書〉中，陳獨秀明白地說，無論是向國際建議退出國民黨，或者在中央提議退出國民黨，他都是用個人名義，並且（在後一情形中）他曾遭到全體中委（彭述之是其中之一）們的一致反對。

彭述之在轉向托派之前，在中共加入國民黨問題上是始終擁護齊諾維也夫一史大林一布哈林路線的。下面這個事實可以作為最有力的證據。彭述之在1927年6月間寫了他有名的小冊子《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此時離開蔣介石的流血反共已有二月，而武漢汪精衛政府行將於1月之後屠殺共產黨的形勢亦已非常明顯；可是彭述之在這本小書中，卻仍將國民黨說成是「中國四個革命階級的聯盟」，說蔣介石等離開革命反而使國民黨「更加民主」了，因而希望這個「進步了的」國民黨政府能夠實行土地革命，藉以平息湖南農民那種「平產主義」的過火行動。

國民黨反動到了這個地步，彭述之對它尚且戀戀不捨，對它寄以厚望，人們又怎能相信他的所謂一貫反對加入，而且兩次要求退出呢？

一個革命者，特別像我們這些生長在落後環境中、未受深刻馬克思主義教育的中國初期革命者，犯些思想上與政治上的錯誤，原是不可避免的。它與革命者的榮辱完全無關。錯了就說錯了，那就「善莫

大焉」。最無出息與最為有害的，是犯了錯誤百般掩飾，甚且諉過於人，歸功於己，從而妄圖建立起永遠正確的形象的那些人。這是最壞的史大林作風，是史大林主義中極為有毒的一個方面。

非常可惜，我們的這位老朋友似乎很喜歡這種作風，感染了這個毒害。

目前，彭述之香港的幾位朋友正在替他出版《選集》。選擇標準就是要顯示出他一貫正確。凡是有損於此一形象的作品，例如上述他在1927年寫的重要作品《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就落了選。而像陳碧蘭寫於1970年的那篇長文章，即當它在《洲際通訊》上發表時你和我曾指出它許多虛構，並希望她能據以改正的那篇〈回顧我和彭述之的歲月〉，卻一字不易地收入第一卷中，作為《選集》的代序。

彭選現只出版了第一、第三兩卷。第一卷所收的是他從1924年到1927年內所寫的文字。第三卷收入的是他在1951年到1980年期間所寫的文章與談話錄。為什麼未出第二卷而先出第三卷呢？不清楚。選擇不易，可能是原因之一，而更大的原因，我想多半是他非常迫切地想告訴公眾：他的理論現已進而領導整個第四國際了，而在第四國際中，也正如過去在中共與中托運動中一樣，他是唯一正確的領導者。

中國的托派運動開始到現在，已經有半個多世紀。儘管中國的托洛次基主義者盡了他們的最大努力，做出了極大犧牲，卻終不免於失敗和消滅。回想起來，這在許多方面來說，幾乎是一場無可避免的悲劇。不過我們從來不曾對它的復興絕望過。現在，（更正確些說是從一九六〇年代後期起）無論在中國國內或國外，都可以看到我們這個運動再起的機運。這是值得我們萬分高興的事。在這時機，我們這些少數倖存者應該怎麼辦？應該如何去幫助新起一代的革命馬克思主義

者去完成我們未能完成的工作，去避免新的失敗而走向最後勝利呢？依我之見，唯一辦法，也是我們的唯一任務是要老老實實地把我們的過去，把我們過去的言論和實踐，無論正確與錯誤（其中錯誤的應比正確的為多），告訴我們的年輕同志們，使他們從我們的錯誤或不足中尋取教訓，避免重犯。同時要他們繼承中國托派那種不屈不撓精神，刻苦耐勞作風，繼續為國際主義的與反官僚主義的社會主義在中國與全世界的實現而鬥爭。

如果不此之圖，反其道而行之，應用種種手法（例如虛構史實，竄改文字等）來塑造一具領袖偶像，造成個人崇拜；想拿彭述之打扮成中國托派中的史大林與毛澤東，想教今後的托派統一於「彭述之思想」，那就決不能幫助中國革命馬克思主義者的復興，而只能戕賊其生機於萌芽之際。

從 1941 年起我和彭述之早已不同屬於一個組織，但是我始終把他當成自己人的。在總的方向上，我一直希望他和我們能走在同一條路上。不過近來我愈來愈看到：這個原該成為中國托派與第四國際之一項巨大財富的老革命家卻可能變成我們運動的一項負債，一個負數。

信寫得太長了，雖然意猶未盡。希望你終於能耐下性子，讀完這封乏味而令人喪氣的信。

問好！

雙山 1983 年 10 月 22 日

9. 致《十月評論》編輯部

諸位編輯：

《十評》總第八十期上的〈簡評雙山的悼念彭述之〉一文，讀過了。

作者氣勢洶洶，要我拿出證據來，否則將坐我以誣告之罪。

為要證明我並未妄構罪名，誣陷逝者，只好力疾作答，給你們寫此長信。

一、

彭述之為了製造個人崇拜而虛構的不少故事，其中最大與最荒唐的一樁，是說他個人創造了「無產階級領導中國國民革命」的理論，並且以此理論，在中共第四次大會前後，重新武裝了中共的思想。這一個自編的故事，最初見於他 1975 年為英文《托氏論中國》所寫的長序，後來記入他口授的法文《回憶錄》中，最後又寫進他的長文，〈對鄭超麟虛構故事的揭露〉。

我自始不相信這個故事。在未曾找出人證物證之前，我就斷定它是胡說八道。理由很簡單：誰只要略為知道彭述之所謂的「共產國際處理其支部的重大政治的程式」，又稍稍具有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知識，誰都可以斷定彭述之那個故事的虛偽。試問，一條已由共產國

際執委會正式通過、且已為中共領導接納與正在實行的「門雪維克路線」，僅憑莫斯科黨校剛派回國的一個學生的「如花妙筆」，寫了二篇文章，竟能使「機會主義路線」和平地，變成了「布爾雪維克路線」——這簡直是奇蹟中的奇蹟。天下哪有這樣的便宜事？！

現在，我不必單憑推理來指責彭述之這個故事的虛妄了。有二位當年參加中共第四次全國大會的人給我們提出了真憑實據。一位是鄭超麟，另一個是李維漢。他們告訴我們：中共四大所通過的、首次正式提出無產階級領導的政治決議案是國際代表維金斯基代為起草，並由瞿秋白從俄文譯成中文的。因此，這個理論的發明權根本不屬於彭述之。

鄭超麟的〈彭述之閉眼瞎說〉一文還舉出了有關這個方面的許多證據，我都認為充分成立。它們完全證實了彭述之的虛構故事。鄭文寫成於1982年2月8日，彭述之生前當已見到。可是在鄭文寫成與彭氏逝世之間的二十一個月中，受如此嚴重指責的人卻沒有一聲回答。

鄭文除了這個「領導權」問題外，它同樣還列舉了人證物證，揭露出彭述之在中國托派的創建問題上與國共關係問題上的虛構。他拿出來的真憑實據，我亦都認為充分成立。彭述之對之亦只好啞口無言。

可是，〈簡評〉作者是有責任來替他回答的。如果他能用人證物證證明彭述之自我宣稱的有關種種全係真實，那末彭述之自然算得上「第二次中國革命的戰略理論家」這頭銜（見彭氏法文《回憶錄》的出版人語），而我對他的指責成為誣陷。反之，如果他不能以人證物證駁斥我所提出的指責，不能駁斥鄭超麟所提供的證言和證據，那他就得承認彭述之確曾虛構事實，藉以建立個人崇拜。

二、

彭述之虛報功績或歪曲史實，以此造成一己威望並建立一貫正確的假象，例子是舉不勝舉的。在這封不準備寫得太長的信裏，我只能給你們再舉下面三個較為具體的例子。

(1) 誰創辦《鬥爭》報？你們當然知道，在中國托派的秘密存在期間，辦得最久，影響最大的一個刊物，便是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的政治機關報《鬥爭》。它是誰創辦的，是在哪年哪月創辦的呢？據陳碧蘭告訴我們：它是彭述之1937年8月從南京監獄出來以後出版的（見陳碧蘭：〈回顧我和彭述之的歲月〉）。最近看見你們「資料室」所編的《彭述之年譜》，也跟着說彭述之1938年「秘密出版機關報《鬥爭》」。事實是這樣的嗎？根本不是。我在1971年4月見到陳碧蘭那篇祝壽文的英文稿，發見了太多的不盡不實之處（有關《鬥爭》不過是其中一端），於是寫信給三十年代曾經積極參加中國托派工作的李福仁，指出陳文中的一些明顯的錯誤，請他轉告當時與彭氏夫婦比較接近的韓生，再由韓生轉知彭、陳，要他們把誤記的事實改正（請參閱《有關中國托派部分歷史真相的通信》）。可是十三年來，我們始終得不到他們夫婦的答覆。最近見到《彭選》與你們編製的《年譜》，才知道他們完全不理我們所提的忠告，堅持謊話到底。而你們呢，寧願相信自己領袖的謊言，不相信李福仁與我這兩個人證。

如果你們以為證言不足信，那就請看物證。從哈佛圖書館開封出來的托洛次基檔案中，有一個文件叫做：〈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布爾雪維克、列寧派）臨時委員會會議記錄。改組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會議時間為：1935年12月3日，星期二晚間。這是中國托派歷史上相當重要的一個文件。它是我們組織迭遭破壞，在十分艱難的條件下，

起來重新振作的一次積極分子代表會議的記錄。這次會議到會代表 7 人，決議了有關組織與宣傳的各項工作。我這裏不必詳細敘述記錄內容，相信你們的資料室一定已擁有這個文件，如果沒有，我可以複印給你們。我只請你們注意讀一下這個文件的第六與第七兩頁，那裏記載了如何於繼續出版《火花》之外，再出版一種政治性的週報。這個機關報有人提名為《工人生活》，最後決定名為《鬥爭》。陳其昌被推為《鬥爭》編輯。

《鬥爭》的第一期何時出版，憑記憶，我曾說是「1936 年春天」。現由托洛次基檔案文獻中另一個文件（1936 年 4 月 1 日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寫給國際書記部的信）證實，它確是 1936 年 1 月份開始出版的。因為書記部於 2 月 15 日來信說收到我們由海郵寄去的《火花》與《鬥爭》。

在這個物證前面，你們是否還「堅持」彭述之於 1938 年 8 月以後（即在《鬥爭》實際創刊兩年半以後）才受權出版《鬥爭》的呢？請〈簡評〉作者明以告我！

（2）關於中國托派書籍的出版工作《彭述之年譜》根據陳碧蘭的文章，在 1939 年一條下面，繫以如下事蹟：

彭氏等在上海繼續出版《動向》雜誌。同時出版《莫斯科審判案》，以及托洛次基著的《俄國革命史》、《被背叛了的革命》的中譯本。

這是根本不符事實的。

從 1936 年（不是你們隨便劃定的 1939 年）起，直至 1941 年止，中國托洛次基主義者確曾做了較大規模與較有系統的書刊出版工作。

這期間，除了出版《動向》、《破曉》、《西流》以及托著的《被背叛的革命》與《俄國革命史》外，我們通過亞東圖書館大約還出版了14種小冊子。其中我記得只有兩種：關於奧國革命問題與西班牙內戰的，出於彭述之之手，其餘書籍的著者或譯者乃是陳其昌，鄭超麟與我。（《新的世界大戰之前》的譯者則為劉仁靜）^[1]。彭述之在這項工作中所付出的勞動僅佔極小部分，你們的《年譜》編者卻十分技巧地在彭述之的大名下面加一「等」字，便把所有的勞績輕輕歸之於「偉大的領袖」了！

其實上述書籍並未全部消失。大多數還保存着，有的還曾在香港重印。作者或譯者為誰，上面都寫得清清楚楚，有名有姓，你們為什麼不肯參考這些現成資料，偏偏要相信二位領袖的自我吹噓呢？

(3) 彭述之與陳碧蘭為了創造彭述之事事有先見之明的神話，你們知道，曾經在兩篇專向外國同志宣傳的文章（彭：英文〈托論中國的導言〉；陳：〈代序〉）中摘引了彭的九大段舊作，胡亂加上着重號，並特別聲明「“Emphasis in original”（加重號原有）」。在某一二段的引文中，還竄改了文字。這種雞鳴狗盜的作偽手法，我在1983年10月15日寫的〈與陳碧蘭彭述之談幾個歷史真相問題〉中把它揭穿了。當時你們中間的一位負責人，可能就是〈簡評〉的作者吧，對谷和同志說，那些加重號確非原有，中文本出版時當予改正。現在我們見到，《彭選》的二篇大文，所有「加重號原有」的字樣均已改為「着重點為引者所加」。同時引自《目前革命右傾的危機》的那段文字，英文本上由彭氏事後加添的三行字，也都刪去了。知錯就改，從善如流，這是好的。但是我不贊成這樣偷偷地改。如果《彭選》的編輯者真是一個「具有科學良心」，着重「寫作道德」的革命者，他必須來一個公開交代，他必須聲明彭述之不曾忠實地引用與處理自己的舊文。他應

該通知原來發表彭、陳文字的英文出版者與英譯者，要他們把偽竄之處改正過來。如果把此偽竄行為企圖推給譯者，說是翻譯上的錯誤，那他就成為彭述之作偽的同謀者。

三、

要建立「一貫正確」的神話，從來有兩條途徑。一條是給自己發明一些「正確」的故事與見解；另一條是設法隱藏自己做過的不光彩事，或消滅自己寫過的不正確的話。史、毛曾經這樣幹，彭述之也跟着學步。彭述之在這方面的記錄，鄭超麟的〈閉眼瞎說〉中也給我們提了一些，例如彭在中共第四次大會上如何幫助國際代表通過譴責托洛次基的決議之類。這裏我只請你們再注意二件事。

(1) 托洛次基在世時出版的《中國革命問題》(1932年紐約先驅出版社出版)，後面附有三個重要附錄。此書後來在其他國家重印，無論英文本或別種文字的譯本，都同樣保留這三個附錄。可是1975年美國新出的《中國革命問題》，即《里昂·托洛次基論中國》，都把原有的附錄割捨了。

這個改變顯然是受了為此書作序的彭述之的影響。為什麼要取消托洛次基本人認為極有價值的材料呢？最主要的原因，據我看，在於附錄之一的《上海來信》刺痛了彭述之。那三個從少共國際派來的代表，報導上海中共中央的情況時說了些對彭述之頗為不利的話，有如：

中央委員彭述之同志當討論選派學生到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去讀書問題時，曾有最好的說明。依照決定，本應該選派175個工人與100個農民。彭述之同志對我們解釋道，中央決定派知識分子與學生。決定的理由如下：

一、工人都不能讀書，不能寫字，不能說話，不能理解。叫我們到哪裏去找 175 個工人進學校？

二、工農假使有機會到俄國去進專修班，生活過得舒服了。結果會使他們腐化，將來他們回到中國便不願革命了。

學生呢，依彭同志之見，那是相反的，沒有這個毛病。……」（見中譯《中國革命問題》港版，61 頁。）

最後，這個報告說：

中央委員會本身，現在實際是由三個人組成的，彭述之代表右派，瞿秋白代表左派，「老頭」（即陳獨秀——山）代表中派（見同上引書，68 頁。）

彭述之從來不曾否認過這封信中所引述的他的見解，也不曾用事實與證據駁斥此信作者們將他劃作中共中央右派領袖的說法。他唯一的辦法，也是他唯一的希望是把這個礙眼的歷史文件從托洛次基的書中刪掉。

（2）「彭述之思想」的代表作，即在 1927 年相當出名的小書《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沒有收入《彭選》。據陳碧蘭在《代序》中介紹，彭述之寫這本書的目的，是為了「替所謂工農『過火』行為解釋和辯護。」果真如此，那就該比其他較「不根本」的文字更先收入《彭選》才對，為什麼將它割捨了！事實很清楚，彭述之在此小冊子中所發揮的思想，大大妨礙了「永遠正確」神話的建立。原書太長，我不能在此摘引，它已由中共收入《六大以前》書內，你們可以找來一讀，我相信你們讀了會大為驚奇的。因為與彭述之夫人的推薦詞恰恰相反，這本書以全力反對湖南農民的所謂「過火」行為（書中稱之為「平產

主義」)！尤其使彭述之不願此書重見天日的，乃是當蔣介石早已大開殺戒、汪精衛也正在大磨屠刀的時候(1927年5月)，這位中共的領袖(剛剛卸任的宣傳部長)竟看見了「國民黨的進步」(見《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1928年印行本，157頁，《六大以前》，795頁)，對國民黨仍然充滿希望。他幻想在「新的歷史時期」，國民黨的「資產階級性應該終止了，代表資產階級的使命應該完結了。」(見同上引書，同頁)為了實現他的幻想，彭述之認為「國民黨須有一番大的整理，一番大的改造。」為此他對汪精衛的國民黨提出了兩點建議：「第一、構成分子的改造，國民黨應該建築在工人農民和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的基礎上，國民黨應該成為『真正的工農小資產階級的政治聯盟』……」「第二、整頓黨的政治紀律。……」(以上見同上引書，157-158頁。)

你們看，這樣的議論，比當時史大林—布哈林所決定的對國民黨態度更右的議論，怎麼能和彭述之近年來向外國同志一再宣傳的神話，即他曾經與陳獨秀一起，幾次向國際建議退出國民黨的話調和起來？唯一辦法，只有將此書隱瞞，消滅物證。

可惜，他還不曾擁有史大林、毛澤東所擁有的那架國家機器。他想消滅是辦不到的——何況這樣的修改歷史事實，連史、毛都不曾辦到呢。

以上，我從積極的偽造方面，又從消極的抵賴方面，給你們提供了彭述之企圖建立「一貫正確」的例子。

試問〈簡評〉作者，這些事實，是否已足夠對彭述之這個人物作出恰當的評價？

四、

〈簡評〉作者最得意的一招是從《彭選》中找出一些字眼，反駁我對彭述之妄求「永遠正確」的指責。不是彭門弟子，我確未把研讀《彭選》當作任務來完成。不過〈簡評〉作者所提出的、關於彭述之認錯的五項例證，我都早就知道的，尤其是其中我認為最為重要的一項，即彭述之曾於1951年在第四國際大會上自己「承認政治錯誤」的段落，早在1972年我就已在〈論中國第三次革命中斯派勝利與托派失敗的原因〉一文中，詳細分析與批判過了。可惜的是，我這篇「兼答彭氏夫婦」的文字，十三年來始終見不到他們二位的答辯。

這裏我自不必重談那篇文章的內容，因為〈簡評〉作者與我所爭的不是彭述之對於中共勝利所發表的意見之是否正確，而是彭述之可曾真的承認了自己的錯誤。

在這個革命勝負的根本問題上，彭述之到底是怎樣「承認自己錯誤」的？請看下面的雄文，他的四段論法：

第一段——

事實上，我們的黨在過去的長期鬥爭中，都堅持了托洛次基主義的傳統路線……在兩次巨大的事變中——中日戰爭與中國抗戰轉入世界大戰中，以及在兩次事變內反陳獨秀機會主義與意因所領導的極左教派主義（少數派）的鬥爭中，都充分證明我們黨所堅持的路線是正確的。在國內戰爭中我黨所採取的基本路線，對中共的基本態度，也是正確的。並且與國際決議對中國內戰所採取的基本態度完全一致。

第二段——

但我並非說，我們在過去……沒犯過錯誤……我們對中共之勝利地奪取政權，是完全沒有估計到的。由於對這個事變估計上的根本錯誤，便派生出了對事變發展進程一連串估計上的錯誤

第三段——

但如我在前面所說過的，我們的錯誤並非原則性的，而只是對事變估計上的，因而是容易改正的。

第四段——

我們還得了解，最好的馬克思主義者（連馬、恩、列、托在內），可能保持原則上或方法不犯錯誤，但卻不能保證對任何事變發展的估計完全正確。所以馬、恩、列、托對事變發展的估計犯過錯誤。（以上引文見《彭選》第三卷，63、64、65頁。）

你們看，這兒的起，承，轉，合，多麼的煞有介事！彭述之真不愧是八股高手，濫調名家。當他一貫宣佈中共不會勝利、而且不願勝利、可是人家拿勝利事實擺在他面前，迫他非做自我檢討不可之時，他老夫子便搖頭擺尾，詩曰子云了一通，這就應付過去了。八股文的妙處就在這裏：空無一物，卻顯得冠冕堂皇；理屈詞窮，偏說得天花亂墜。從來君子自効，總以聖人為則。今之君子卻更有進焉：不錯則已，一經認錯，便「立地成聖」——一變而為馬、恩、列、托了！如此「承認錯誤」，真是何樂而不為？又誰不願意呢？

〈簡評〉作者神氣十足地給我指出來的其他四項彭述之認錯事例，完全是同一性質。用的是同一手法，為的是同樣目的：以退為進，棄

卒保帥；拿「策略上」或「估計上」的小錢，博取「戰略上」與「原則上」的「大利」，彭述之的此種認錯方式，恰好是他永不認錯，妄求「一貫正確」的最出色的證據。

五、

現在來談彭述之的「列寧主義」和組織觀念。

第二次中國革命時期的中共領袖們，可說全都是不自覺的史大林主義者。他們接受與執行莫斯科所決定的政治路線，相信他們都是列寧主義的。他們不清楚其實這是經過了齊諾維也夫—布哈林—史大林偽裝與曲解了的列寧主義。這方面有兩個略為不同的例外，是彭述之與瞿秋白。由於他們都在莫斯科學習過，都受過俄國同志的親炙，都與當時共產國際的某些幹部有較為密切的聯繫，他們是多少知道俄共內部情形的。因之他們都從二十年代中期開始，便在史托二派之間有所取捨。尤其是當時擔任旅莫支部領導職務的彭述之，早於1924年便同情斯派（見他的《回憶錄》，348頁。）。在1925年1月召開的中共四大上，他贊助國際代表維金斯基的反托決議，成為中共最先反托的人。

因此，我們有十足的理由說，彭述之是中共當時自覺地接受史大林偽裝過的列寧主義的二位領袖之一。但因彭述之是特別受命回國宣揚這個主義的，坐在中共宣傳部長的位子上，他曾經比瞿秋白更賣力地宣揚了這套史記「列寧主義」。

〈簡評〉作者一定會告訴我，彭述之寫過〈列寧主義是否不適合於中國的所謂「國情」？〉文中又提出了「永續革命」的根本原則，

難道這還不夠證明彭述之是真正的列寧主義者，而且又是托洛次基主義者嗎？告訴〈簡評〉作者：彭述之那篇不斷自吹自捧的文章，實質上只是史大林《列寧主義概論》的抄襲與引申。（請翻翻他的原作吧。作者一再摘引史大林的文字，並稱讚它們是「非常之對的，是很科學的」——見《彭選》第一集，219頁。）那末「永續革命論」呢？難道史大林會主張「永續革命」論的嗎？告訴責問者：不但史大林，還有齊諾維也夫與布哈林等，在某一個意義上，都曾主張過「永續革命論」的。只是他們很少應用這個名詞吧了。對中國，當時他們提出的口號是所謂「非資本主義前途」。他們認為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一定要繼續前進，不能限於幾個資產階級革命任務的完成，而應該一直推向前去，為「非資本主義的發展」而鬥爭。

托洛次基當時是反對這樣的「永續革命」的！他認為中國將來是否能走上並保證非資本主義的發展，要靠國內和國際的不少因素來決定。在當前，為了保證革命的發展和勝利，最迫切與最重要的是要確立無產階級先鋒隊在政治上與組織上的獨立。沒有這個獨立，一切都是空話。因此他認為史大林一方面命令中共加入國民黨，驅使中國無產階級做中國資產階級的政治上的苦力；另一方面宣佈「非資本主義前途」來自我陶醉，來安慰中國無產階級，那是欺騙！

彭述之文章裏的「永續革命論」便是不折不扣的這個樣子的自我陶醉與欺騙。只要翻開一下他的《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就很清楚了。當汪精衛們的屠刀業已架在中國共產黨人頸上的時候，這位中共頭號理論家還一方面稱讚國民黨為「中國各種被壓迫階級的革命聯合戰線之具體表現，是各種被壓迫階級的『政治聯盟』」。另一方面卻以「非資本主義發展」的遠景來自欺欺人。

這是彭述之「永續革命」的真實意義。它是百分之百的史大林主義，與托洛次基的不斷革命論無絲毫關係！

那末自從彭述之自覺地接受了托洛次基思想，公開與史大林主義決裂之後，他是否還保存着，不自覺地保存着「被史大林偽裝過的列寧主義」呢？

當然保存着。

在字面上，彭述之自能鸚鵡學舌似的抄錄托洛次基的著作；但是在實質的了解上，他卻始終在原地踏步，未曾從史大林——布哈林的革命階段論前進到托洛次基的不斷革命論。

有證據嗎？當然有。不過毋需多引，光指出他在這方面的一個代表作，即彭述之寫於1948年的「黨綱草案」，就非常足夠了。針對這個文件（它後來由「中革共」的建黨大會正式通過的），我曾經寫了一篇批判，題為〈中國第四國際黨的綱領問題〉，發表在第二十期的《新旗》上。我的批判，即我如何剝下彭述之身上披着的那件「不斷革命論」的外衣，也不必在此多引。

下面是「批判」中二段對照的文字：

犀照的（即彭述之的——雙山）：不肯定資本主義關係在中國的社會經濟中佔統治地位。認為由異族壓迫與封建剝削所引出的反帝與土地鬥爭這二個任務是完全民主性的，所以中國將來發生的將是一次民主革命。在此革命中，只因資產階級不能徹底行動，所以必須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反對帝國主義與封建，然後生長到社會主義革命，推翻資本主義。

我們的（即「旗」派的——雙山）：明白肯定中國的社會經濟受着資本主義關係，甚至是金融獨佔資本關係的統治。認為由帝國主義壓迫與落後關係作祟所引出的反帝與土地鬥爭這二個民主任務，帶有反資本主義的性質，更因為這二個阻礙中國發展的勢力，均由資產階級的政權加以保障，故中國未來的革命將一開始便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在此革命中，無產階級所率領的革命力量將直接與正面地反對以資產階級為首的反革命力量。革命必須首先推倒資產階級統治，奪取政權，才能完成民主主義任務。（見1948年10月14日出版的第二十期《新旗》。）

中國第三次革命的實際發展究竟證實了上面二個立場中哪一個？或者，哪一個立場在後來的真實革命發展中被證明為比較正確的？請你們自己決定吧。

如果我們說，變成托派以後的彭述之在革命的基本思想上仍未脫離史大林主義，那末在革命黨的組織觀念上，彭述之自始至終都是史大林的信徒。他如何把史大林那套組織觀念與組織辦法帶回到中國來，請看當時與彭同事的兩個人的證言。

第一個張國燾——

但在發展的過程中，中共也產生了內部的困難。當時，中共內部政見的分歧雖然縮小了。但在組織問題上，卻滋長了紛擾。彭述之等要求繼續擴大中央權力，主張中央集權。他們缺乏實際工作的經驗……指責一般實際工作者忽視組織原則，保持着一种落後「手工業式」的工作方法。

不同意彭述之這種見解的，則是黨內大多數實際工作者，他們不贊成中央過分的集權；主張黨員在中央決定的原則之下，應

有較多的活動自由。……他們指斥彭述之等是不懂實況的書生。只會背誦馬列主義的教條，專拿「中央指示」的大帽子來嚇唬人。

……

在當時幼齡的中共，一切都是為了急赴事功，因而這種歧見未致演成嚴重的爭執；但後來中共內部的一切糾紛，卻多少與最早的這種分歧有關。……後來米夫派的王明、秦邦憲等，也多少繼承着彭述之的衣鉢（引自張國燾《我的回憶》，408、410頁。）

張國燾這裏的回憶錄，依我本人的經驗及其他一些同志的證言，倒是說得甚為忠實的。如果你們以人廢言，認為叛離者的言語根本不能相信，那就請看蔡和森的話吧，他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烈士。

在他所著的《機會主義史》中，蔡說了如下的話：

說到組織問題：黨內群眾的政治討論素來是沒有的，所以雖然有最革命的工農階級，和最精華的工農革命群眾，他們的趨向和意見從未在黨內起作用。質言之，他們在中國革命上起了很偉大的作用，而在領導革命的自己的黨內反沒有起絲毫作用。這便是過去機會主義之組織方面的來源。所以組織問題，是現在最重要的問題。

我們本是民主集中制。然八年以來，只有從上至下的集中，而沒有從下至上的民主。……

群眾的黨內生活全未形成，既無黨的討論，又無選舉制度……下級黨部及群眾對於上級機關如果發生不同的意見或批評時，上級機關便要認為大逆不道採取高壓。……鐵的紀律成了威壓黨員的刑具，而上級指導人卻有超越此鐵的組織和紀律之一切

自由，最後這一現象在直隸是特別明顯的。這便形成了組織上的系統的機遇主義。彭述之同志不能不算是這一機遇主義的代表。（見蔡和森著《機遇主義史》——國民黨出版的《共匪禍國史料彙編》，604至605頁。）

蔡和森這裏沒有造彭述之的謠，我完全可以在他這些批評下面簽字。唯一需要添加的只有幾個字：在引文的最後一句話中，「機遇主義」後面還應加上「與官僚主義」五個字。

彭述之做了托派以後又如何呢？長話短說，我只想指出如下事實。

從1931年中國托派統一起，直到1942年托派再分裂之前，由於彭述之只是領導者之一，或因他被捕而根本不參加領導，他的組織路線與組織辦法未有機會發揮。到了1941年前後，中國托派因政見爭執而發生組織危機時，彭述之這才乘機而起，拿出他當年在旅莫支部學到手、後來在中共內部大起敗壞作用的組織辦法（硬湊少數代表，召開所謂「全國第二次大會」，以純組織手段來解決政治問題），以此促成了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的分裂。這個分裂讓彭述之吐了他十多年來鬱鬱不得志的怨氣，讓他從集體領導中脫穎而出，當上小團體中獨一無二的「偉大領袖」，讓他可以放手行事，把他屬下的托派組織徹底「布爾雪維克」化了。

彭述之的獨資小店（更準確些說是夫妻商店）一經開成，便急不及待地要樹立「領袖權威」，反對所謂「小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與無政府主義傾向」。在自稱為「第二把提琴手」的劉家良與彭夫人一吹一捧之下，一種為中國托派運動前所未有的作風很快形成了：對上層，尤其對最高領袖，提倡個人崇拜；對下層，對一般同志，實行「鐵的紀

律」。而所有這些，都是假「民主集中」制之名以行的。其中理論具見於你們「建黨大會」通過的「組織決議」中，其實踐，你們該比我更加清楚。此地不必多言。這裏只想憑我的親身經驗，給你們提一件事：當年組織分裂後，彭、劉二位首長曾經給「多數派」的同志定下了這樣一條紀律：凡想與「少數派」同志見面或談話的，事先須得「上面」同意，事後要向組織彙報。即此一例，可概其餘了。

六、

目前香港「中華共黨」的殘餘組織，是否繼承着彭述之那一套作風和辦法呢？我本來不敢斷定。不過看了〈簡評〉作者的態度和聽了他的口氣，我相信你們中間還是奉行着，或者，正想樹立起，彭述之從史大林那裏接收過來的官僚集中主義與領袖崇拜作風。

最明顯的例子是〈簡評〉作者對我所作的訓斥：

這種指斥，不但影響彭述之個人的聲譽，尤其必然嚴重影響整個托派運動的聲譽；但作為托派一分子的雙山，卻在嚴重指責一個公認的托派領袖的時候，完全沒有考慮如何保衛他所屬運動的聲譽——不受他的指責的影響。

在史大林被他的弟子們「嚴重指責」以後二十八年，毛澤東被他繼承人公開批判以後五、六年，我們在一張托派刊物上竟能讀到這樣的大文，不能不說是一樁奇事。它哪裏有半點馬克思主義與托洛次基主義的氣味呢？這段「首長訓詞」是三種發臭思想的混合體。首先是我們的國粹——家醜不可外揚論。其次是源自莫京的領袖絕對正確論。最後是「公認領袖」的聲譽與革命運動聲譽合一論。

死抱着這個發臭觀念的中革共「凡是派」卻還居然大談其邏輯與原則哩。他煞有介事地責問道：

悼文一方面聲言「在恢復中國革命歷史真相的鬥爭」，「也從來與彭述之們站於同一戰線」，另一方面又指責自己的「戰友」「歪曲某些歷史事實，甚至虛構」，那不是很矛盾和沒有原則（與這樣的人「同一戰線」）嗎？

說得淺顯易解一點，他的意思是假使你和彭述之一起反對過史、毛對中國革命歷史真相的歪曲，你便不能指責彭述之也歪曲某些歷史事實。否則，你便是自相矛盾，你便是沒有原則！

說這種話的人不但暴露出他昧於過去革命組織內部分合與傾向鬥爭的全部歷史，而且根本不懂得什麼叫做矛盾，什麼叫做原則。我沒有精力和他講歷史，談邏輯，這裏只想給他提出幾個簡單問題：

請問〈簡評〉作者：凡是與彭述之一起反對過史、毛罪惡的人，是否便不能指責彭述之也犯了同樣或類似的毛病？請問：如果彭述之曾經與我們一起反對史、毛的個人崇拜，是否因此便保證他本人決不會搞同樣的崇拜？請問：如果我們發現彭述之確曾歪曲一些事實，確在虛構某些故事，藉以造成史、毛式的個人崇拜，是否為了「同一戰線」之故，我們應該加以掩飾與包容？請問：為了真誠與有效地反對史、毛的種種罪惡，我們是否必先（或者同時）在自己內部反對同樣的壞現象？最後請問：如果有了真憑實據證明我們的「公認領袖」犯了與托派運動的原則確相背反的錯誤，我們應該如何對待，才能保衛整個運動的利益與聲譽？是竭力替這位領袖文過飾非，「隱惡揚善」呢，還是明白揭露，以便公開改正呢？

〈簡評〉作者的「凡是病」已無可救藥，他不會平心靜氣考慮並回答我提出的問題。希望你們能採取不同態度，能好好思考一下上列的問題。只要毫不含糊地回答了它們，我相信，你們就能看出〈簡評〉作者心目中的邏輯是什麼東西。它是完全喪失了原則的、一種從「領袖永遠正確」論演繹出來的官僚邏輯。

彭述之本人當然也只有這樣的邏輯，但運用的技巧總要高明得多，師父畢竟是師父。因此，我於彭述之逝世，仍然不能不感到「寂寞」。

這封長信，請在《十評》發表。倘以篇幅或其他理由拒登，則務請在同志們中間廣為傳觀。致托洛次基主義的敬禮

雙山

1984年3月10日寫畢

注釋

1. 文章寫成後，見到汪原放作的《回憶亞東圖書館》。這本書的後面附有一張「出版物目錄」表，頗能補我記憶的不足。根據這張表，在從1936到1940年這個期間，托派成員或與托派有關的人給亞東翻譯或寫作的書，竟多達二十餘種。作者與譯者，除我在文中舉出的數人之外，還有陳獨秀、高語罕、郭和、陳碧雲、劉少嚴諸人。至於彭述之（歐伯）則始終只有那兩本小書：《奧國是怎樣失敗的》與《西班牙內戰與國際局勢前途》。

10. 《謊言與真實》序

這兒是一筆舊賬的清算，是關於中共與中國托派運動史實的一些爭論。

不少年輕的革命者對它可能覺得無聊：陳年冷飯，何必重炒？世界在前進，中國在前進，現實的政治向我們提出了新的問題，新的挑戰。我們應該把精力放到新的問題上，應該接受新的挑戰。總之，我們應該把眼光注視着今天和明天，絕不該讓過去拖住了腿，斤斤於二、三十年前，甚至半個世紀以前在某事或某某問題上的誰是誰非。

這樣的論調其實是錯誤的。錯在哪裏？「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這是一。其次，更加重要的，因為這種論調的提倡者忽視了目前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中一個萬分重要的問題，他們看不見史大林及其追隨者毒害共產主義運動所曾使用、並且仍在使用的——一個主要武器，便是竄改歷史；便是為了製造個人崇拜而虛構歷史。

編按：《謊言與真實》一書的副標題是「對於歷史事實的兩種態度——評彭述之」，1984年香港信達出版社印行，王凡西作序（署名雙山）。書中並有他的〈致李福仁信〉、〈悼念彭述之〉和〈致《十月評論》編輯部〉。現在，這三篇文章和《序》都已經收入本卷。此外，書中還收有鄭超麟的六篇文章，即：〈致雙山信〉、〈彭述之閉眼說瞎說〉、〈一本給自己塗脂抹粉的回憶錄〉、〈論彭述之的認錯〉、〈補評彭述之的回憶錄〉和〈不夠格的辯護士〉。書中還附錄了彭述之的〈對鄭超麟虛構故事的揭露〉等文。

因為寫了《一九八四》一書而今年大大走紅的英國社會主義者——作家喬治·奧威爾，通過他書中人物的口，曾經三番四次地說了如下的話：

誰控制過去，他就控制未來，而誰控制現在，他也就控制過去。

這個「公式」，真是言簡意賅地指出了史大林主義政制及其同類型制度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罪惡現象，並且說明了它何以如此的原因。一個極權統治者必須建立起「永不犯錯」的領袖崇拜制；可是任何人都不可避免地犯過一些錯誤，或將犯一些錯誤。怎樣解決這個矛盾呢？那就是憑藉眼前抓在手裏的權勢去「控制過去」，同時去「控制未來」。

同樣意思，托洛次基很久以前就說過了。例如他於1940年為《俄國革命史》中文版所寫的自序中，非常沉痛地說過這樣的話：

世界各國，連中國在內，現時青年一代人底不幸就在於：世上有個大規模的工廠，貼着馬克思主義商標，專門偽造歷史，偽造理論，偽造其他種種。這個工廠名字就叫做「共產國際」。極權制度，即一切生活部門都須受官僚指揮的制度——不可避免地也要擴張其統治權於過去時代。歷史變成了原料，隨統治的極權黨派之需要而構造一切。（見中文版《俄國革命史》第一冊，1頁。）

既然偽造歷史乃是史大林式極權制度的一個重要的構成成分，那末反對偽造歷史，提倡「以真名稱呼實物」，重視歷史真相，主張寫歷史必須完全出於「良心」，即一切記述都須「有原本史料可以證驗」，「其中沒有一件事實曾經為了某種先定的理論原故而竄改過或歪曲過，更加沒有為了個人聲望原故而竄改過或歪曲過。」（均見托著同上引

文)——這樣的努力與要求，也就必然成為反史大林主義鬥爭的一個非常主要的部分。

反對史大林的「控制過去」，恰恰就是反對他們之「控制現在」和「控制未來」。

因此，我們這裏的幾個「老傢伙吵架」，絕對不是無聊，絕對不是「炒冷飯」，絕對不是「迷戀過去而忽視現在與未來」。這是一場反史大林主義與史大林作風的最鄭重的鬥爭。這兒代表着史大林主義與托洛次基主義對待歷史（亦即對待目前與未來）兩種截然相反的傾向。

年輕一代的革命者，特別是年輕一代的中國托洛次基主義者們，必須注意這場鬥爭，必須仔細考驗辯論雙方的論據，從而採取明確態度，更從而確立一種如何對待歷史（其實不僅歷史）的、真正革命者的而非官僚的立場。

1984年5月5日

附錄一：鄭超麟致雙山信

雙山兄：

關於老二^[1]的六個^[2]問題，我不能作使你滿意的回答。我主要地同你說明如下的一點。1924年秋，我們一批「莫斯科派」回國在中共歷史上是一件大事，但談黨史的人都不提起此事。我們這批人一回國就佔據「要津」。老二做了中央宣傳部長，延年做了南方區委書記，世炎實際上做了北方區委書記，尹寬做了山東省委書記，汪澤楷也在安源佔了重要地位，等等。這一批幹部回國掌權，是在莫斯科預定的，而且帶了相應的理論回來的。這個理論叫做「國民革命論」，其具體表現就是強調無產階級在國民革命中的領導權。1924年12月出版的《新青年》季刊第四期是「國民革命號」，第一篇文章就是老二寫的〈誰是國民革命的領導者？〉。一個月之後開四大，伍廷康起草的政治決議案也寫入了無產階級領導權的話。這自然比過去奉行的理論進步，但基本原則還是二段革命論，先完成民主革命，再開始社會主義革命。這一點就葬送了那次革命。

老二無恥之處，就在於他現在把這個理論記在他自己的名下，好像無產階級領導國民革命論是他發明的。其實不是這回事。1924年上半年共產國際東方部那些「中國通」就提出了這個理論，形式上則要造成東方部和旅莫支部共同提出的樣子，因此召集了羅亦農、彭述之二人同東方部「中國通」開了幾次會，正式通過這個理論。我們這批人回國之前都學習了這個理論，那時老二領導這個學習，卻不敢說是他提出來的，因為我們知道是東方部和旅莫支部共同提出來的。東方部的背後還站着季諾維埃夫和史大林。

老二誇耀他的〈誰是國民革命的領導者？〉文章，無異於王明誇耀他的〈為中共的布爾雪維克化而奮鬥〉的文章。所以我說過，王明以前中共就有「王明主義」了。

拒絕孫大炮檢查國際決議的要求，對國民黨採取批評態度，讓同時回國的幹部掌握黨要實權，排斥國民黨在工人群眾中活動，等等，——乃是「國民革命論」的必要之義。老二比我早到上海約一個月，這些事情也許我未到前就做好了，我不能證實，但也無法否定。以後的事情：中山艦事件後中央究竟派張國燾，還是派老二去廣州，我可能知道，但現在忘記了，也許是二人同時派去的；五大會議我以只有發言權的代表身份參加，親自聽秋白和老二在台上的發言，當時印象認為二人所說的話就是他們的小冊子的內容。老二如果把蔣介石的第一次政變（中山艦事件）和第二次政變（四一二屠殺）聯繫起來說，那也是當時每個人都能說的，有什麼「馬克思主義」可言。我當時對老二的發言的印象並不好。我認為他一面拒絕秋白的批評，一面竭力表白自己擁護五大的新路線。當時大會的空氣是擁瞿而反彭的。

從1924年到1929年這五年之間，老二有什麼可誇耀的？他帶回來的那個「國民革命論」根本不是他自己的創造（四大政治決議案也寫入「無產階級領導權」字句，但那是伍廷康俄文起草的，瞿秋白翻譯的）。這個理論以兩段革命論為基礎，也是反托的。在四大上老二自己也作了反托的表演：伍廷康假借大會名義提出一個譴責老托的決議案，大會代表莫名其妙，無人說話，於是老二站起來說幾句托洛茨基如何錯誤，如何應當譴責的話，這個決議案就付表決而通過了。

超 1981.6.8

附錄二：彭述之閉眼睛說

我與友人通信中曾以幾行字表示我對於彭述之這個人的評價，不知道怎樣，這幾行評價的文字竟落入彭述之眼中了，惹得他大發雷霆，特意寫了一篇洋洋萬言的文章來攻擊我，文章的題目就叫做〈對鄭超麟虛構故事的揭露〉。他既然打上門來同我較量，我只好應戰了。

我對他的評價是根據事實的。他既然指我所根據的事實為「虛構」，那麼好得很，我們首先就來辯明一些那些事實究竟是不是「虛構」的。

一、史大林的偽造學派

彭述之為了培養對於他自己的個人崇拜，幾十年來偽造事實，說1924年秋起中國共產黨提出的中國無產階級領導國民革命的理論是他個人提出的。我揭穿這個偽造。我引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大會通過的決議案為證，其中說中國的國民革命必須由無產階級領導才能勝利，而這個決議案是出席四大的國際代表伍廷康用俄文起草，瞿秋白譯成中文的。

這個「故事」剝了彭述之的畫皮，說明他在大會之前一個月《新青年》季刊第四期上發表的文章，所提理論乃是共產國際的理論，而非他個人發明的。

這個「故事」究竟是真實的還是虛構的？彭述之說是「虛構」的。現在，問題的關鍵在於：如果我能證明四大這個決議案，確實是伍廷康起草的，彭述之就應該承認那個理論不是他個人發明的了。試看——

彭述之說：「伍廷康根本沒有出席四大，因為1921年大會（即中共成立）有馬林和伍廷康參加，引起了法租界警探的特別注意，搜查了會所，帶走了李漢俊和陳公博，因無文件證據被釋放，但大會已不能在上海繼續進行，只好移到嘉興南湖船上去結束。根據這次的教訓，不但以後的大會不讓國際代表去參加，就是中共執委會也避免請國際代表出席。所以第二次大會便沒有國際代表參加。只有第三次大會，因為要通過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決議，馬林必須參加，只好移到廣州去舉行。四大是在上海舉行的，為了安全，沒有請伍廷康出席，更不用說要他起草決議案了。」

這裏，彭述之武斷說伍廷康沒有出席四大，更沒有替四大起草決議案。不僅武斷而已，而且偽造一個規律，說「為了安全」中共在北洋政府統治區域都不讓國際代表參加大會。

真是閉眼瞎說！

我不拿自己的回憶同這個慣於武斷和偽造的人爭論。我要拿物證。這就是1981年9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革命與蘇聯顧問》一書，其中收入俄國人格魯寧寫的〈維經斯基——赴上海的秘使〉一文，文中說：

他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1925年1月）和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1927年4-5月），特別是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1924年5月，1925年10月，和1926年7月的幾次擴大會議，曾多次出席過中央委員會的臨時會議。

請看伍廷康出席四大的「故事」是不是鄭超麟「虛構」的？反之彭述之說伍廷康參加一大倒是純粹出於「虛構」。伍廷康不僅參加了中共的大會，而且參加了中央擴大會議和臨時會議，如此彭述之所偽造的那個規律也就破產了。

彭述之又說：「四大召開時瞿秋白還在廣州，因為他以國民黨候補中委參加了1924年8月舉行的國民黨中委會全會，在會議上瞿同意孫中山提出共產國際給中共的決議和訓令須交國民黨中委審查，後為中共中央拒絕，瞿對此感到十分難堪，不願回上海，留在廣州，替鮑羅廷作翻譯，怎麼能說秋白替伍廷康俄文起草的決議案作翻譯呢？」

又是閉眼睛說！

瞿秋白早於9月間從廣州回到上海，在上海大學上課，參加上海大學和民國日報館的兩派鬥爭，與英文系主任何世楨一同脫離上海大學，11月間與楊之華結婚，次年1月間以三屆中委身份參加四大。

要物證麼？俯拾即是！1924年11月《嚮導》紀念十月革命七周年，秋白發表了〈十月革命與弱小民族〉一文。彭述之也許會說瞿秋白是從廣州寫好文章寄到上海來發表的。那麼差不多在同一時候，瞿秋白、楊之華、沈劍龍三個人在上海民國日報館廣告欄登載啟事說：沈楊二人脫離夫妻關係，瞿楊二人結合夫妻關係，沈瞿二人結合朋友關係，——這三個啟事現在也找出來了。難道新郎在廣州，新娘在上海可以結婚麼？落實到四大，周永祥編著的《瞿秋白年譜》在1925年1月項下有如下一段話：

在上海北四川路橫濱橋北境中國地界和租界交界處一幢房子裏，中國共產黨舉行了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瞿秋白參加了大會

的領導工作，並擔任大會政治決議草案審查小組組長。他在大會上作了長篇發言，對代表們提出的對政治決議案中若干重要問題作了理論性的闡釋，深得代表們擁護。

請看瞿秋白參加了四大的「故事」，是不是鄭超麟「虛構」的？

彭述之否認四大決議案是伍廷康起草瞿秋白翻譯的，他的理由只是說：伍廷康和瞿秋白都未參加四大。現在我拿事實證明了伍廷康和瞿秋白都參加了四大，彭述之還有什麼話可說呢？他還能否認四大的政治決議案是伍廷康起草瞿秋白翻譯的麼？我至今還記得，瞿秋白把他的譯文帶到大會會場來，大家圍着看，也有人提出意見。我只記得一條意見，即認為原稿分一、二、三、四……各節，僅第二節有小題目，其他幾節都沒有小題目，不合格式。這個意見，伍廷康大概接受了。因為我現在看見的政治決議案（題為《關於民族革命運動之決議案》），共分五節，每節都有小題目。

如果以上說的只是我個人的回憶，不能說服彭述之，那麼我還可以引用大會代表李維漢的回憶。1979年11月，他回答訪問者說：

大會政治決議起草小組組長瞿秋白，我為成員之一，但決議草稿是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伍廷康即維經斯基起草的。

請看伍廷康俄文起草瞿秋白中文翻譯四大政治決議案的「故事」，是不是鄭超麟「虛構」的？

彭述之又說：「鄭超麟既非代表，也不能以旁聽者的資格出席（因為安全計限制旁觀者），僅僅要滿足他的朋友向他所提出的六個問題，便任意捏造些故事以資應付。所以他的故事漏洞百出，一經揭穿便原形畢露了。」

又是閉眼瞎說！

鄭超麟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從第一天起到末一天止。不是以代表身份出席，也不是以旁聽者身份列席，但自始至終參加了大會，一次也不缺席。我不是伍廷康，也不是瞿秋白，沒有人給我寫傳，編年譜，但我之參加四大是能夠證明的，今天還是能夠證明的。沒有物證，但有人證。今天世界上還有一個人能夠證明我自始至終參加了四大。這個人就是——彭述之。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大會的秘書長彭述之指定鄭超麟為大會的記錄，鄭超麟也履行了這個職務。

一個人，他五十七年前任命另一個人履行一種職務，今天他否認了這個任命。這不是正直的人應當做的事情！

總之，鄭超麟沒有「虛構」了他參加四大的「故事」。

彭述之又說：「至於鄭超麟說：『伍廷康借大會名義提出譴責老托的決議案，大會代表莫名其妙，無人說話。於是老二站起來說幾句托洛次基如何錯誤，如何應當譴責的話，這決議案就付表決而通過了。』這個最無恥而又最惡毒的污蔑，須要多說幾句來暴露它。

A、上面已經證實過，伍廷康不曾出席第四次大會，說「伍廷康借四大名義提出一個譴責老托的決議案」，就等於說「伍廷康俄文起草政治決議案」是同樣的荒唐。

B、在中共所有的大會上，甚至它的執行委員上，從來沒有國際代表提出過「譴責老托的決議案」。因為史大林反托的策略是封鎖托洛次基的意見，絕對不讓共產國際各支部的幹部和黨員知道，更不用說在支部大會上「提出譴責老托的決議案」了。因

為把「譴責老托的決議案」提出於共產國際支部的大會上就必須說明「譴責」的理由，即指出托的錯誤在什麼地方，並須指出有關托的錯誤的事實和文件。這樣一來勢必引起討論和批評，包括對提案本身的批評。這是史大林所最害怕的。所以「譴責老托的決議案」在1927年革命失敗以前從來沒有在中共的大會上或它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上出現過。何況在四大時關於中國的革命問題還沒有在托洛次基和史大林之間發生嚴重分歧。即使在五大（1927年4月末至5月初）中國問題已成為托和斯之間的爭論焦點，史大林也沒有命令出席大會的國際代表提出「譴責老托的決議案」呢！

C、……

彭述之這個「揭露」寫得特別長，提出A項理由，B項理由之後又提出C項理由。恕我不再抄他的C項理由了，因為那裏只說了一些丑表功的話而遠離問題本質。

我找到了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譴責托洛次基的決議案，好在原文不長，全部抄錄如下：

對於同志托洛次基態度之決議案

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大會，看着歐美反動潮流對於世界無產階級非常危險，認為托洛次基最近言論上的態度，反對俄國共產黨之布爾雪維克的中央委員會及第三國際的領袖，實際上可以受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之仇敵所利用。

中國共產黨大會對於俄國共產黨領袖所解釋之托洛次基主義亦為投機主義一派，完全同意；並且希望托洛次基同志改正自己

的錯誤而完全承受列寧主義，以後不再繼續其 1917 年以前與布爾雪維克主義相異之理論的宣傳，對於列寧主義為修正之嘗試。

中國共產黨大會恭賀共產國際及列寧派的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怎麼一回事呢？哪裏冒出來這樣一個不應存在的決議案呢？是你鄭超麟偽造出來的吧？

不是。我是從一本大書名叫《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三冊抄出來的，原文在書內第 180 頁。書無版權頁注明出版日期，封面標明「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編」。彭述之揭露我的虛構故事，在這個「故事」上，他說的話最多，可是我答辯的話最少。我拿出物證來就夠了。至於這件客觀存在的物證為什麼不符合於彭述之的武斷和偽造，那只好讓彭述之自己去說明了。

鄭超麟並沒有虛構四大在彭述之作了解說之後終於通過了伍廷康提出的譴責托洛次基的決議案這個故事。

以上我證明了彭述之所「揭露」的四件「故事」，都不是虛構的。彭述之還「揭露」了什麼事實，我忘記回答了麼？沒有。至於他那些與事實無關的想當然的話，則恕我不回答了。

現在輪到我來「揭露」彭述之的虛構故事。

彭述之在他的文章中說：

1929 年春，我得到一個機會，和莫斯科回來的幾個學生作了一次長談，從他們知道了托洛次基領導左派反對派和史大林派門

爭的情形，以及托對中國革命問題的意見，並從他們得到托洛次基論中國革命的兩個文件：〈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和〈六次大會後的中國問題〉。我閱讀了這兩個文件後，驚異地感到托對過去革命失敗的機會主義路線的批評，對革命失敗後盲動主義的指責，和我們親身經歷的痛苦事實完全符合；至於他提出以防禦政策代替當時中共領導所執行的盲動主義路線，正是我們深深地感到有此需要，但不能具體提出來的方針。因此，我完全同意托的思想。

接着，他說明了他如何拿托的思想去影響陳獨秀。

彭述之說的這個「故事」完全是虛構的，真實的故事是：1929年5月間，在上海賦閒的尹寬遇見莫斯科歸國的學生王平一。1924年至1925年五卅運動後，尹寬在山東省作省委書記，認識王平一。此時王平一屬於莫斯科回國的托派組織，負有任務在黨內活動，散佈宣傳品，擴大反對派思想影響。尹寬接受了王平一的影響，拿到了油印文件，給我看，同時也給彭述之看，然後彭述之再拿給陳獨秀看，因為當時陳獨秀住家只有彭述之一人知道。我們這些陳獨秀派不僅都接受了托洛次基的思想。我們當時看到的托洛次基文章都是短文章，後來陳獨秀出錢把這些短文章集合鉛印成書，名曰《中國革命問題》。王平一和他的朋友負校對責任，他們沒有經驗，錯字很多，但發生影響很大，好多人都是讀了這幾篇文章就變成托派的。這年9月間，我們都是托派了，不需要別人再來說服我們了。此時劉仁靜回到上海，陳獨秀和我們都以托派身份接待他。劉仁靜帶回來的，除了托洛次基起草的《綱領草案》外，尚有托洛次基二篇系統的長文章：〈中國革命的回顧與前瞻〉和〈六大以後的中國問題〉。我和劉仁靜立即翻譯，他譯第

一篇，我譯第二篇，譯完立即付鉛印。此次就是我負責校對責任了，所以錯字少些。這本書名為《中國革命問題第二集》，以別於以前出版的。這二本書，後來北京也有翻印，今天還可以找到原版或翻印版。

就是這個真實的故事，被彭述之別有用心地變為他的虛構故事。他把尹寬做的事情輕輕地記在他自己的功勞簿上，把有名、有姓、有來歷可考的王平一化為無名無姓的「莫斯科回來的幾個學生」，彭述之說得出他們的姓名麼？把幾篇托洛次基短文章變成那二篇系統的長文章。他以此作為他對於中國革命的一項「貢獻」。

你說這話有沒有證據？當然有證據，否則我不來「揭露」彭述之這個「虛構」了。證據就在1929年出版的二本《中國革命問題》上。彭述之所說的托洛次基那二篇系統的長文章，〈中國革命的回顧與前瞻〉和〈六大以來的中國問題〉，是作為《中國革命問題第二集》出版的，出版時間也在另一集之後。如果彭述之所說，他先拿到的是那二篇長文章，那麼為什麼先拿到的文章後印，後拿到的文章先印呢？何況譯文上也可以看出前篇屬於劉仁靜的風格，後篇屬於鄭超麟的風格。

* * *

我現在的心情好像一個圍棋家，閒坐無事，忽然有個客人上門來，自稱國手，要求較量一盤。來吧！可是只下了幾個子，就看出來客是個「屎棋」，不到中盤就把來客殺得片甲不留了！

二、丑表功

我致友人信中對於彭述之又作了如下的評價。我說：「從1925年到1929年這五年之間，老二有什麼可誇耀的？」這句話又刺痛了彭述

之。他跳起來，說我這句話是說他在第二次革命的準備時期、革命時期和革命失敗時期這五年之間對於革命沒有值得一提的貢獻。於是他長篇大論列出了他的「貢獻」。大要如下：

——他回國「對革命第一個貢獻」是堅決主張中共中央拒絕孫中山的要求（要求共產國際給中共的決議和訓令須交國民黨中央審查）。

——他的「第二個貢獻」是主張恢復工人運動和加強黨的地方組織。

——他的「第三個貢獻」是從思想上重新武裝黨，即提出「無產階級領導國民革命的理論」。（以上是在革命準備時期）

——在革命時期，他的貢獻，第一、他主張上海工人階級學習彼得格拉工人階級的榜樣，實行武裝暴動。

——第二、3月20日事變後，他奉中央命令去廣州同鮑羅廷商量反蔣和中共退出國民黨，但被鮑羅廷拒絕。

——第三、他在1926年7月中共中央擴大會上，與陳獨秀一起正式建議共產黨退出國民黨，「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委多數，不敢接受我們的建議，但同意把它呈交共產國際去考慮。」

——第四、1927年頭三個月，他在《嚮導》上發表文章反對蔣介石。

——在革命失敗時期，他奉派去北方工作，主張在北方「採取防禦政策」，抵制了中央的「暴動命令」，被中央撤職。

——他在上海賦閒時，對中央政策採取了批評態度，險被史大林調去蘇聯。

——1929年他首先會見莫斯科回國的學生，知道了托派主張，拿到了托洛次基的二個文件（〈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和〈六次大會後的中國問題〉），轉給陳獨秀看，並把他與回國學生談話內容轉告陳獨秀，以此轉變了陳獨秀的思想，八十一人宣言就是他和陳獨秀、尹寬共同起草的。

好傢伙！彭述之一口氣列出了他對於中國革命的十大「貢獻」！

我在第一節中已經用真憑實據指出他的第十項「貢獻」是撒謊了。在第一節中，我又證明了他把「無產階級領導國民革命的理論」歸功於他自己，是無恥。這裏，我只要指出他的第五項「貢獻」和第六項「貢獻」也是偽造的，就夠了。我沒有興趣，也沒有必要去議論他的其他六項「貢獻」。

彭述之果真在三月二十事變主張共產黨退出國民黨麼？他又曾於同年7月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上與陳獨秀一起正式建議退出國民黨麼？除了彭述之自說自話之外，我們沒有證據。

彭述之在這篇文章中援引陳獨秀為他作證。三月二十事變後中央（陳獨秀）派他去廣州向鮑羅廷商議退出國民黨，同年7月中央會議上他與陳獨秀共同正式建議退出國民黨。我們試看，彭述之所援引的這個證人陳獨秀，對這二件事情是怎樣說的。

1929年12月10日，陳獨秀在他的有名的〈告同志書〉中說：

1925年10月在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上，我在政治決議案委員會提議：戴季陶的小冊子不是他個人的偶然的事，乃是資產階級

企圖鞏固自己階級的勢力，以控制無產階級，而走向反動的表現，我們應該即時準備退出國民黨而獨立，始能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領導群眾，而不為國民黨的政策所牽制。當時的國際代表和中共中央負責同志們一致嚴厲地反對我的提議，說這是暗示中共黨員群眾走向反對國民黨的道路。主張不堅決的我，遂以尊重國際紀律和中央多數意見，而未能堅持我的提議。

次年（1926年），蔣介石的三月二十日政變，正是執行了戴季陶的主張，……同時，我們主張準備獨立的軍事勢力和蔣介石對抗，特派彭述之同志代表中央到廣州和國際代表面商計劃，……我在三月二十事變後對國際報告中陳述我個人的意見，主張由黨內合作改為黨外聯盟，否則其勢不能執行自己的獨立政策，獲得群眾的信任。國際見了我的報告，一面在《真理報》上發表布哈林的論文，一面派遣遠東部長伍廷康到中國來矯正中共退出國民黨的傾向。那時，我又以尊重國際紀律和中央多數意見，而未能堅持我的提議。

看哪，陳獨秀的證言到此為止，他提到彭述之，只說派彭述之去廣州組織反蔣的軍事行動，他一個字也沒有證明彭述之主張退出國民黨。恰好相反。從上引的話可以看出彭述之是反對退出國民黨的。在1925年10月中央會議上「中共中央負責同志們一致反對我的提議」，這些「負責同志們」當然包含彭述之在內；1926年三月二十事變以後，陳獨秀對國際報告中只陳述他「一個人的」意見，不包含彭述之在內；陳獨秀派彭述之去廣州只付給他反蔣的軍事行動任務，並沒有付給他向鮑羅廷建議退出國民黨的任務。

彭述之會詭辯說，他和陳獨秀正式建議是在1926年7月中央會議上，不是在1925年10月中央會議上。

但陳獨秀〈告同志書〉沒有提到1926年7月的中央會議。這不是說1926年7月沒有開中央會議，這只是說在此次會議上陳獨秀沒有提出退出國民黨的建議。無論如何，彭述之堅持他1926年7月與陳獨秀一起建議退出國民黨，完全是偽造的。

1926年7月正是伍廷康銜命來中國「矯正」中共退出國民黨的傾向的時候，誰敢在中央會議上提出退出國民黨的建議？彭述之說，在此次會議上他和陳獨秀的退出國民黨的建議，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委多數不敢接受，「但同意把它呈交共產國際去考慮」。這完全是瞎說！共產國際已經派代表來矯正這個「退出國民黨」的傾向，誰還敢「同意」重提「它」給共產國際考慮呢？我手頭恰好有這次中央會議的決議案，其中說：

如果有些同志認為共產黨應當與國民黨完全脫離組織上的關係，現在就要消滅這一各階級聯盟的政黨，以為共產黨已經就能獨自領着無產階級，使其他被壓迫民眾跟着他來完成資產階級的民權革命，那麼這種觀點是完全不對的，完全看錯了中國民族解放革命的遠景。

試問彭述之：在此決議下，「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委多數」還能夠「同意」把你的（陳獨秀不會同你聯名的）退出國民黨建議，「呈交共產國際去考慮」麼？你完全是瞎說！

陳獨秀〈告同志書〉完全足夠證明你兩次主張退出國民黨，都是瞎說！我們不需要其他的什麼文件了。因為陳獨秀〈告同志書〉不是

在他同你感情破裂之後寫的，而是在他同你親密合作的時期寫的。他起草後還先給你看過，讓你提意見。如果他記載不實，你盡可以要他修改。例如，你盡可以要他改寫為：在中央會議上是你和他二人聯名建議退出國民黨的，而三月二十事變以後是你和他二人聯名向共產國際建議退出國民黨的。你當時為什麼不這樣做呢？陳獨秀死後你再說那樣的話，便沒有人相信了。

陳獨秀〈告同志書〉沒有證實彭述之曾於1926年兩次建議退出國民黨，這決不是偶然的，決不是由於陳獨秀一時的疏忽或誤記。彭述之在接觸到左派反對派文件以前決不會主張中國共產黨退出國民黨。這是必然的，合乎邏輯的。

自始就反對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當作服從紀律而勉強接受之後，又時常要求退出，——這樣的人主張無產階級領導國民革命，是順理成章的（反之，他不得已接受了那個機會主義路線而主張資產階級領導國民革命，也不奇怪）。但彭述之是積極擁護那個機會主義路線的。

1923年秋天，孫文派了一個以蔣介石為首的四人代表團來到莫斯科。四人中有一個是張太雷。張太雷向旅莫支部的領導同志報告了不久之前在廣州舉行的中共第三次大會，特別是這次大會上的鬥爭。幾天之後，旅莫支部便發動一個討論第三次大會，特別是討論「國共合作」政策（即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政策）的運動。支部宣傳部長彭述之作報告。他把這個運動變成「反李漢俊的運動」。他說，李漢俊在大會上為首反對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政策，大會後因鬥爭失敗，便表示消極，漸漸要退出共產黨，等等。彭述之要求支部內的黨員和團員討論這個政策，各自表態。我自然表示擁護這個政策。現在，大會

已經通過了，反對它有什麼用呢？1922年我在法國，討論這個政策的小組會議上卻曾表示反對的。1925年1月間，準備開第四次大會，周恩來從廣東來「晉謁」新任宣傳部長（大會尚未選出的）彭述之。我在彭述之的房間內聽到彭述之問周恩來關於旅歐支部討論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政策的情況。周恩來善於言辭，他說，我們大家都贊成你（指彭述之）當時的立場。我看見彭述之聽了這幾句話後洋洋得意。

所以，在第二次革命時代，慣常抱着「老先生」大腿的彭述之，到了「老先生」主張共產黨退出國民黨時就不跟着老先生走了。

這裏，我始終有個疑問，不能解答。我最近看了一些材料，知道在第三次大會上為首反對加入國民黨政策的是張國燾，並非李漢俊，回憶的人連李漢俊姓名都不提，為什麼當時旅莫支部說是李漢俊呢？自然，彭述之如果願意，他會解答我這個蓄了將近六十年的疑問。

在第三次大會上積極擁護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政策的，是瞿秋白和張太雷；在旅莫支部討論大會此項決議時，積極擁護這個政策的，是彭述之。

所以，我在本文的第一節中否定彭述之在無產階級領導國民革命的理論上的發明權（那是為了真理），但在這裏第二節中我就不去否定他的發明權了（那是為了讓步）。我不妨承認他發明了這個理論，然後以此理論「重新武裝」了陳獨秀，又進一步「重新武裝」了第二次革命。

但如此一來就暴露了彭述之如此誇耀的所謂「無產階級領導國民革命的理論」究竟是什麼貨色！積極擁護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政策的彭述之，在退出國民黨的建議上不肯跟着陳獨秀前進的彭述之，那麼出自他的口中或筆下的「無產階級領導國民革命的理論」，究竟會有什麼

意義！中國無產階級推出自己的先鋒隊（共產黨），而共產黨一頭鑽進資產階級政黨（國民黨）內去，受國民黨紀律所束縛，——在此情形下大談特談「無產階級領導國民革命」有什麼意義呢？不是廢話，便是欺騙！

共產國際的機會主義領導（包括東方部的那些「中國通」在內）就是用此「理論」來欺騙中國無產階級，來安慰中國無產階級對於共產國際強迫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怨恨。讓彭述之去誇耀他對於這個理論的獨創權罷，那時，他就應當負擔全部的欺騙責任了。

三、閉門為王

試分析一下，彭述之何以如此不堪一擊。

彭述之本來沒有同別人較量的本事，1927年五大以前，他同瞿秋白較量，結果被瞿秋白打敗了；五大以後，他同蔡和森較量，結果被蔡和森打敗了；托派四組織統一時候，他同陳獨秀較量，結果被陳獨秀打敗了，等等。此次，他找上門來同我較量，我可沒有瞿秋白、蔡和森、陳獨秀的本事。但較量結果怎樣呢？首先，他要「揭露」我虛構故事。他列出了四項故事：（1）他斷言伍廷康沒有參加四大，而我虛構了伍廷康參加四大的故事；（2）他斷言四大開會時瞿秋白尚在廣州，而我虛構了瞿秋白參加四大的故事；（3）他斷言鄭超麟既非代表又不能旁聽，而我虛構了鄭超麟參加四大的故事；（4）他斷言四大決無通過反托議案之事，而我虛構了四大通過一個譴責托洛次基的決議案。結果，證明這四項故事都不是我「虛構」的，而他的四項斷言反成為「武斷」的。其次，他自以為他對中國革命有很多貢獻，而我居然否定了他的貢獻，於是他一口氣列出他的十項貢獻給我看看。結

果，這十項貢獻裏面就有三項被我拆穿為偽造的，另有一項被我證明為不是貢獻而是欺騙。其他六項是不是貢獻，也需要審查了。

武斷和偽造是史大林作風的組成部分。

同史大林比較起來，彭述之是渺小的，但他全身毛孔都散發史大林作風的臭氣。他同史大林一樣培養個人崇拜。但史大林叫別人吹捧他自己，彭述之則自己吹捧自己。史大林著作中可未曾開列出他對俄國革命有多少項貢獻，《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還是別人寫的。

正因為個人崇拜必須靠自己培養，所以不能像史大林那樣開門為主，而只能閉門為王，在門內的小房間自己吹捧或互相吹捧。久而久之便忘記門外還有一個大世界了。以為我門內是王，出門也是王，不知道那裏存在着事實的世界，非虛構的故事。

列寧 1917 年 4 月回國後以其《四月提綱》重新武裝了布爾雪維克黨，我，彭述之，1924 年 8 月回國，也在我獨創的「無產階級領導國民革命的理論」重新武裝了中國共產黨。誰敢向我挑戰！鄭超麟是個什麼東西！他說，這個理論不是我彭述之獨創的，而是共產國際東方部那些「中國通」提出的，隨後又由共產國際代表伍廷康寫進四大決議案內的。豈有此理！五卅運動以前共產國際哪裏有什麼「中國通」！（其實，伍廷康就是一個「中國通」。）東方部是一個附屬機構怎能改變共產國際已定的路線（我彭述之一個附屬黨員卻可以改變共產國際已定的路線）！反駁鄭超麟很容易。否定，就夠了。否定國際代表伍廷康參加大會，否定瞿秋白當時在上海，否定鄭超麟本人與聞四大會議。鄭超麟又說四大曾通過一個反托決議案，而我彭述之在通過此決議案前還說了幾句反托的話。這是「最無恥而又最惡毒的污蔑！」如此一來，我彭述之豈不就成為中國共產黨內第一個反托分子麼？更非

否定不可！只要否定四大未曾通過任何反托決議案就夠了。無此決議案，則我作為中國第一次反托分子的醜行便不能成立了。試看彭述之同人較量，只能使用這種否定法，即同駝鳥一樣只要把頭埋進沙裏，敵方便不會存在了。彭述之比駝鳥更高明一點的，便是：他否定了客觀存在的事實以後還能說出一大篇這些事實所以不能存在的理由。如此有恃無恐，他就可以放膽丑表功了，就可以關起門來過皇帝癮了。

此次，他「揭露」我的那篇文章，不正是這樣的麼？

最後，我要奉勸彭述之幾句話：把門打開罷，放點新鮮空氣進你的「深宮大院」去，自己跑出門外來看看真實的世界，那裏有山、有水，公路上還有汽車，不要否定這些現實的事物，以免碰得頭破血流！

鄭超麟 1982.2.8

注釋

1. 羅亦農給彭述之起的綽號：「孔夫子」，意即「書呆子」。彭述之不歡喜這綽號，但已在黨內流行了。老二即「孔二」。
2. 1981年5月16日寫給鄭超麟的信我沒有留底，這兒無法發表原函。不過那封信中提出的六個問題，我卻記得。當時我正讀了彭述之為美國摩納印書館出版的《托洛基論中國》所寫的冗長導言，發見作者對中共早年歷史的敘述，有太多的明顯錯誤與十分可疑之處，因此提出某些疑點，寫信去請問與彭述之同時代、同輩分而且長期共同工作過的鄭超麟。這些問題大致如下：
 - 一、據彭述之說，他於1924年8月從莫斯科回到上海，聽蔡和森說孫中山要求中共把共產國際的一切決議和指示交給國民黨審查，而中共中央當時對此要求未能決定如何答覆，只因彭述之堅決主張拒絕，陳獨秀聽了他的話，去電廣州的瞿秋白，這才拒絕了孫中山的要求，事情經過是否如此？

- 二、此事發生之後不久，彭述之說，他以黨員資格向中央提出了三項議案。
(1) 應對國民黨採取批評態度；(2) 應恢復各地的組織，應分派從莫斯科東大會回來的同志擔任各個黨組織與工人運動的領導工作；(3) 應建立工人運動委員會。這三項議案，據他說，中共中央全部接受，並立即實行，這是事實嗎？
- 三、在 1925 年 1 月中共四大之前，彭述之寫了〈誰是國民革命的領導者〉一文，陳獨秀讀後改正了他自己的右傾意見。在四大上，他的無產階級領導革命論寫成政治決議，黨因此走上了正確的布爾雪維克路線。事實經過是這樣嗎？無產階級領導中國革命的見解，真是彭述之的發明嗎？
- 四、據彭述之說，在中共的第五次大會上，他作了演說，大會休息時，國際代表魯易對他說道：「你對事件的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你參加五大嗎？如參加你對他演說有何印象？
- 五、彭述之說，他曾兩次與陳獨秀一起提議退出國民黨。但從陳獨秀的所有文字中，找不到任何能證實此事的證據。我也不曾見過任何資料能證實他的說法。你對此事的看法如何？
- 六、「三月二十日」事變後，從上海派到廣州去解決問題的，張國燾說是他，彭述之說是他，到底是誰，你記得嗎？1984 年 5 月 7 日追記

11. 推薦一本必讀書

最近重讀了托洛次基的《被背叛的革命》。真所謂溫故而知新，它給了我許多新的認識與新的啟發。

這本書寫成於1936年。中譯本出版於1939年。翻譯工作是二位被囚禁在國民黨監獄裏的托派同志做的。當時我讀了譯稿，還給它寫過一篇短短的《出版者序》。序中說了如下的話，作為我的印象：

他拿了馬克思主義這把冷酷無情的刀，像醫生似的，平心靜氣地，檢驗與解剖着整個蘇聯的機體。舉凡經濟、政治、軍事、外交、文化，甚至家庭等方面，他都毫不含糊地指點出它的強處或弱點，不攙雜絲毫感情，不混和半點意氣，他讓你看到蘇聯的真面目；但決不是它的假面具。

現在，離開這本書的出版已將近半個世紀。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照着新中國三十五年來的經驗，特別是看到了毛澤東死後，鄧小平當權以來的種種措施，我再讀此書，所得的印象和感想，不僅僅是上述的一些了。

我驚奇於著者先知似的預言和論斷。科學的馬克思主義方法，操在一位真正高明的理論家手裏，簡直可以「未卜先知」的。托洛次基

編按：本文原載香港《先驅》雜誌第39期，1996年8月。

在半世紀前對蘇聯所說的話，作了必要的修正，完全能應用到目前的中國。

歷史在某種意義內確實在重演。類似的客觀條件，常使政治家被動地重複類似的舉措。明智的政治家能從歷史學到教訓，以便在大致相同的情勢中採取過去政治家們執行過的正確對策，又可藉以避免重犯前人的錯誤。

用句中國的老話來說，這就叫做「以史為鑑」。

可惜的是：真能以史為鑑，並真能以史為戒的人，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實在太少。同時，真正可以拿來「為鑑與為戒」的信史和良史，在古今中外也實在不多。

托洛次基這本書，只要你不存黨派偏見，總不能不承認它是關於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一部信史與良史。它在記述史實上的信，和它分析政策方面的良，早已為全世界一切有科學良心的史家和社會科學家所公認了。

歷史的不幸是：第二次大戰以來，從革命中產生的十多個所謂人民民主國家，在它們「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竟沒有一個國家的領導者曾以托洛次基這本史書為鏡，以致無一能夠避免蘇聯當年犯過，早已為托洛次基在此書中指出並分析過的諸般錯誤。這些重犯的錯誤給國際社會主義革命事業帶來了莫大損失；讓世界革命運動經受了、而且繼續經歷着深刻的危機。

這些錯誤中最為突出與轟動的一項，便是那所謂「小資產階級的狂熱病」。它見於毛澤東主演的「三面紅旗」，見於他企圖由「人民公

社」這條快捷方式一下子達到「共產主義」。同樣狂熱而更為荒唐的則有柬埔寨的波爾布特政權之以「消滅城市」，「消滅貨幣」等等來立即「實行共產主義」。

這種「共產主義」釀成了怎樣的大災大難，它們造成了多麼慘重的生命與財富的損失，它們如何敗壞了共產主義乃至社會主義的名譽，因而給資本制度、甚至給帝國主義如何幫了大忙，這些，大家的記憶猶新，我不必多言。這裏我想談的是：如果毛澤東與波爾布特們曾經仔細學習和研究過蘇聯當年的建設經驗，更如果他們能學習和研究托洛次基寫在這本書裏的，關於這些經驗的敘述與分析，那末，他們的狂熱病多半會獲得「免疫預防」，即使發作，多半會輕微得多的。

原來在蘇聯建國之初，布爾雪維克黨人，包括列寧和托洛次基在內，也曾曾在某種程度內犯了這種「左傾幼稚病」。那就是所謂「軍事共產主義」。

它是怎樣發生的呢？托洛次基告訴我們說：

革命後最初三年，是一個公開而殘酷的內戰時期。那時的經濟生活，完全服從於前線的需要。……這就是所謂軍事共產主義時期（1918至1921年）……在那幾年當中，蘇維埃政府的經濟問題，最主要的便是支持軍事工業，並利用從過去接受下來的貧乏資源，以供軍事的目的是維持城中人口使不至於餓死。軍事共產主義，在本質上，就是在被圍困的要塞之內，一種消費品的有計劃的管制。（見中譯本，22頁。）

在這個意義上，俄國當年的「軍事共產主義」，頗似中共江西時代的「蘇維埃體制」，它們主要是為激烈的軍事衝突所促成，因而可以說

是不可避免，不得不然的。從一個革命政權力圖生存的觀點來看，這辦法本是正確的。

「但是」，托洛次基接着說，「必須承認，軍事共產主義的原來觀念卻是要追求更廣大的目標。蘇維埃政府曾經希望並且力圖使這些嚴密管制方法能直接發展成為分配與生產方面的一種計劃經濟制度。換句話說，它曾經希望軍事共產主義會逐漸地、毋須毀損這個制度地，進入真正的共產主義。1919年3月通過的布爾雪維克黨的黨綱上寫道：「分配方面，蘇維埃政府的當前任務是毫不动摇地在全國範圍內，有計劃有組織地繼續拿生產品的分配去代替商業。」（見同上引書中譯本，22至23頁。字句上曾依英譯本略作改動——凡西。）

布爾雪維克黨人這樣的想法與做法，顯然在不同程度上，犯上後來毛澤東與波爾布特們所犯的同樣毛病。不過當時的列寧與托洛次基在客觀事變的無情打擊下，很快就看出了這個毛病，並且立即採取對策：用「新經濟政策」來代替「軍事共產主義」。

更加可貴的是：當布爾雪維克的領袖們發見了毛病，並決定實行政策改變時，絕不像一般政客那樣偷偷摸摸地暗自轉變；也不像那些無恥官僚似的強辯死賴，硬是要人承認他們的「永遠正確」。他們公開與深刻地檢討過去的政策，明辨其是非，從而確定今後的新路線。這樣，他們讓自己獲得了經驗，給別人提供了教訓。

列寧在這方面所做的深刻的理論工作，主要記載在《論糧食稅》及其他的一些文件中。在《論糧食稅》一書綱要中，列寧寫下了這樣的一條綱目：

餘糧收集制（按此乃軍事共產主義制的最重要的一項措置——凡西）不是「理想」，而是一種痛苦的和可悲的需要。相反的看法是危險的錯誤。（見中譯《列寧全集》第一版，32卷，311頁。）

這真是典型列寧式的、一針見血、抓住要點的論斷。誰若以為「軍事共產主義」是一種「理想」，並非為痛苦的現實所迫而採取的可悲的措置，那是危險的錯誤！

「法律永遠不能高過於經濟的結構，也不能高過於由此結構所決定的社會文化發展水準」，馬克思關於上層建築與下層經濟基礎的這一個見解，布爾雪維克黨的領袖們即使在為非常的客觀條件所迫而不得不採取暫時有背於此一立場的措置時，也仍舊牢牢把握住的。托洛次基由於更多的機會與當時的社會下層接觸，他比列寧更早體會到「戰時共產主義」有讓位於「新經濟政策」的必要。故當列寧提出這項改變的時候，托洛次基便立即與堅決地表示支持，而且和列寧一樣，聯繫着蘇聯建設中的種種問題，將他自己從來對俄國革命所採取的戰略路線，作了深刻與充分的理論檢討。

在新問題與新經驗的光照下，托洛次基的根本思想，粗略地可以歸結為如下二層：

一、在帝國主義時代，一個經濟上比較落後的國家，由於其國內外所造成的一些特殊的階級關係和特殊的社會矛盾，那個佔總人口少數的無產階級，領導了人數眾多的貧苦農民，卻可以，而且應該利用有利的革命危機，比先進國家的工人階級更早地起來奪取政權，建立革命專政，以此解決這個國家尚未解決的民主任務，進行社會主義革

命，並從事社會主義的建設。這個見解，托洛次基早在 1905 年便依據馬克思的不斷革命意見而形成的，在俄國十月革命中得到了證實。

二、俄國革命勝利後最初幾年的經驗，即「軍事共產主義」與「新經濟政策」的經驗，卻又證實了馬克思主義另外一個基本命題，即落後國家中勝利了的工人政權不可能在落後經濟基礎上，立即實行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因為「法律永遠不能高於經濟結構，也不能高於由此結構所決定的社會的文化發展水準」。這個工人國家應該着手建設社會主義，但其領導者必須清楚認識到，社會主義的建設，不可能在一國範圍內成功，它只有在國際範圍內才可思議。

上述見解，乃是托洛次基當年用以理解布爾雪維克何以會犯「左傾幼稚病」的理論根據。同時，正是這次「幼稚病」的經驗，使托洛次基原有的不斷革命論見解，獲得了更明確與更具體的內容。

因此，只有掌握了這個理論根據，人們才能真正從一方面的「左傾幼稚病」、另一方面從「向右轉」的新經濟政策取得教訓，避免重犯錯誤。

史大林便是因為不懂得這個不斷革命論，而且拚命排斥這個理論，以致無論在指導其他國家的革命上，或者在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上，他都一錯再錯，經常跳躍於「極左」與「極右」的兩端，以此給蘇聯與全世界的社會主義革命事業造成了莫大禍害。

別的不說，這裏只略談與「戰時共產主義」和「新經濟政策」有關的問題。

史大林既不認識「戰時共產主義」被迫放棄的主要理由，又不曾從基本理論上去把握「新經濟政策」何以要代替的理由。因此，當蘇

聯經濟藉「新經濟政策」與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刺激而得以復興之時，史大林又來試行第二次的「軍事共產主義」了。

第二次「軍事共產主義」試行於並無戰爭的時期。它的出現較少地由於客觀的形勢，而較多地由於政府一連串錯誤政策的結果。因此第二次比之以第一次，積極的作用更少，而消極的效果則更大而且更多。為要克服由「軍事共產主義」所造成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的種種矛盾，付出了大得無可比擬的代價。

無可估計的諸般代價中最大的一宗，便是整整一輩的老布爾雪維克黨人的橫遭殺害！

究竟史大林治下的蘇聯當年如何積累起這些矛盾？為什麼當時官方在宣佈「社會主義最後完成」的同時施行了極端野蠻的恐怖統治？這裏有着複雜的原因。艱難的客觀條件與史大林們錯誤的主觀政策是互為因果，交織在在一起的。不過無論如何，史大林未能從第一次「軍事共產主義」的實行中吸取教訓，未能從那次「試驗」中確認到馬克思關於「法律永遠不能高於經濟結構」的原則，以致再犯了「左傾幼稚病」，總不失為最重要的一個主觀原因。

在《被背叛的革命》中，托洛次基不僅把史大林們那個「扶得東來西又倒」的情形作了詳盡敘述，而且客觀地與深刻地將蘇聯在其十餘年的社會主義建設中所遭遇的一切困難，即一切促成史大林醜惡統治的客觀因素，都作了深刻分析，並指出所有主客因素相互交織，互為因果的來龍去脈。

對於後來的共產主義的革命家，對於那些在革命中幸而獲得勝利並得以從事社會主義建設的政治家，它實在提供了一面最有價值的鏡

子。可惜，截至現在為止，沒有一個這樣的革命政治家能夠利用這面「寶鏡」。

不過我們這些未能成功或尚未成功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都可以並且必須拿起這面鏡子，善自利用這面鏡子，以便一方面去批評那些「社會主義國家」中所有當權者的或「左」或右的舉措，去預先指出這些舉措的發展趨勢與可能結果，另一方面以此教育我們自己，以便有朝獲得勝利，並掌握社會主義建設的權力之時，不致於迷失方向，不致於犯別人犯過的錯誤。

文已太長，我卻仍未能把中共三十餘年來建設社會主義的正反經驗，聯繫到托洛次基這本書的有關論述，加以研究和發揮。希望有心的讀者於仔細研讀這本著作之後，自己會聯繫到中國的情形來加以考慮，加以判斷。中國目前的情形和蘇聯當年的情形，相同或相似的地方太多了。有些情節簡直像是舊有劇本的重新排練。譬如說：「努力致富」的口號，布哈林早在1925年就提出過了。「承包制」的辦法也大致在那個時候由史大林提出並實行過夠。究竟這一類口號和辦法如今由鄧小平和趙紫陽在中國重提重行，是否會產生它們以前在蘇聯曾經產生的結果，如何才能希望它們只造成好的影響而避免壞的後果……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鄭重思考的，希望大家一齊來解決它們。

我個人，如果體力允許，願意再草一文，談談從蘇聯經驗看中共最近的「改革」。

1984年8月

12. 中越共運史的真實一頁

胡志明與中、越托派

胡志明，許多人稱之為越南的毛澤東，但就其地位與作用來說，他還彷彿是把中國的陳獨秀與毛澤東集於一身的。同時，他生既「逢辰」，死又「得時」；正在他事業的頂峰上長逝——不曾像毛澤東那樣為自己的成功所腐蝕，暴露出狂妄驕橫來。因此，無論在越南或者國外，他在人們的記憶中都留下了一個最完美的革命領袖的形象。

稱「伯伯」而不名，胡志明與史大林這個「太陽」與毛澤東這位「大救星」似乎有天壤之別。

可是，你若得知胡志明對於越南托派的態度，尤其是，你若見到了他在1939年春天從廣西桂林寫給他越南同志的有關中國托派的三封信，那你便會覺得這位「慈祥與明智」的長者在其對待革命隊伍中不同意見者的態度上，在其對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左派的認識上，與史、毛二人其實是毫無差別的。

歷史家當然要肯定胡志明對越南革命作出的巨大貢獻，同時卻必須指出他在國際共運的派系鬥爭中曾經屬於最壞的史大林一系，並且有意識地執行了史大林誣陷與殘殺真正革命者那種罪惡政策的。

編按：本文原載香港《10月評論》雜誌1987年7、8月號

指出並確定這個事實，不但為了歷史的真實與公平，而且還大有助於對胡志明的繼承人，即對越南現當局的正確了解。

胡志明與藉秋收

越南的共產主義運動，和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一樣，很早（雖然比較遲些）就分成了史、托二派。大約在三十年代末期或四十年代早期，一些在法國留學或做工的共產主義者，接受了托洛次基派的主張，成立越南的托派組織。這些人中最出名的是藉秋收（在外文書報上，我們時常看到 Ta Thu Thau 這個名字，這是藉秋收三個漢字的越南話音譯）。這個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回到越南，在西貢積極工作，成為西貢工人的領袖。大戰時期他被捕入獄。日本投降後，他與所有的政治犯一起被釋放。他再度投入戰鬥，發展革命組織，同時從事公開的政治活動，被選為西貢市的市議會議員。1946年，他在西貢突然失蹤，同時失蹤者另有五、六名越南著名的托派領袖。

藉秋收等人究竟如何失蹤，為什麼人所拘捕，他們的命運到底如何，當時無從確知。不過，事後經種種跡象證明，他們是被當時活躍於南越的越盟（越共在南越的政軍組織）所誘捕，並且秘密殺害了的。對於此事，越共方面卻從來不作任何的肯定或否定。

藉秋收這個人在國外，特別在法國相當出名。他在法國的左派學者與政治活動家中有不少熟人。他們關心藉的失蹤，決心要把這件神秘案子查個明白。

1946年夏天，胡志明為了與法國政府談判越南的未來地位，來到巴黎。法國的藉秋收友人便趁此機會，向胡志明提出詢問，想弄清楚

藉秋收的命運。這幾次會見經過，最近發表於巴黎出版的雜誌《越南紀事》上。它們泄露了這件案子的一些案情；而更重要的，它們讓我們看到胡志明對托派與藉秋收個人的態度。

第一個訪問胡志明的是但尼爾·格林（Daniel Guérin），那位寫過《法西斯與大實業》（*Fascism and Big Business*）這部名著的歷史學家。他是藉秋收的老朋友。在他的那本名叫《為殖民地人民服務》的書中，記述了那次會見經過：

1946年當他在巴黎的時候，我和胡志明曾經有過一次長談。我愉快地和他一起慶祝越南的解放；不過我們的歡樂上面卻蒙了一個陰影，這不僅為了我們之間思想上的不同，而且為了藉秋收的問題。胡志明身邊一些過分熱心的史大林主義者，那時正把藉秋收——這位西貢市的前任市議員，為了他的「托洛次基主義」之故——謀殺了。

胡志明說：「他是一個愛國志士，為了他的死，我們曾經哭泣了的。」這樣說的時候，胡志明真是動了感情的，可是他立刻補充說：「不過凡是不依循我定下的路線行事的人，我得把他們粉碎。」

第二個曾與胡志明談藉秋收的人是法國的一位前輩托派，羅道爾夫·普拉格（Rudolf Prager）。據他最近所追憶的當年談話情形，大致如下：

1946年7月，胡志明在他居住的巴黎旅館裏舉行一次記者招待會，他在會上提出他欲將印度支那併入法蘭西聯盟的政策。我在招待會大廳的出口處等着他，請他和我談談。我自我介紹我是國際主義共產黨書記處的一個成員，我以我們這個運動的名義，

請他透露一點藉秋收死亡的情形，因為他的死去使我們深感不安。他回答道：他「對藉秋收的失蹤深感遺憾」，因為藉秋收是一個「無可譴責的革命者」。至於他是怎樣死的，胡志明說他毫不知情，因為當時國內情形混亂而無法控制的。

第三個去和胡志明談這個問題的是一位越南革命者黃同青（Hoang Don Tri），他是1945年當過越盟臨時政府勞工部長的黃同文（Hoang Don Van）的兄弟。關於那次會談，他作了這樣的憶述：

1946年，胡志明主席來到法國，我以我的同志們的名義，請求他和我作一次談話。

首先，我們談論了幾個不同的問題，然後，我突然向他提出我這次去訪問他的主要問題。我說：「主席先生，我是藉秋收過去的學生，他是我生平認識的一個最好的人，他熱愛越南人民，特別熱愛越南的貧窮與受剝削的階級。可是他為什麼被殺死了？到底是誰殺死他的？」

胡志明一時顯得有點驚奇，因為沒有一個越南人會提出這個問題的。他拿起了一枝香煙，點了火，然後回答道：「藉秋收？（不知什麼原故，他把秋——Thu這個字念成Thuc）是的，他是個好人。他是給錯殺了的。可是你為什麼要提這個問題呢？在這個動亂的時候，成千上萬的人在死去，你為什麼要單獨提出他來？為什麼要在我們這個正在奮戰着的人民內部引起不和與分裂呢？」

「主席先生，藉秋收卻不是普通的一個啊。他代表一個政治派別，代表為成千上萬人所關心的、有利於人民生活與行動的一種看法。他不明不白地死去，在人民心中播下了猜疑的種子。如

果你的政府與藉秋收悲慘的死毫無關係，那末把真相公佈出來，對各方面都會有利。這會使你的政府增加聲望，人民會更加緊密地團結起來，去為爭取自由而戰鬥。蒙混含糊，只能讓人紛紛猜測，莫衷一是。」

胡主席一向受慣奉承讚美，聽到我這樣一種「冒犯無禮」的言語，顯然覺得很不舒服。他猛抽了幾口煙，然後說，「你年紀輕輕，有派別成見」。

「不，主席先生，我們沒有派別成見，我們1944年在法國發起成立越南總代表團，包括住在法國的越南人，這便是我們並無教派成見的證據。我們要求在您的政府的支持下，成立一個調查委員會，來調查藉秋收及其同志們的死因究竟該由誰負責，我相信會有利於所有的越南人的。」

胡主席沒有給我一個直截答覆，對於我提出的公佈真相或成立調查委員會的要求，他都不會給以承諾，他只給了我一個大大的蘋果。

大蘋果堵塞得住人們之口嗎？當然不能。

藉秋收及其同志們當時為何失蹤，和他一起失蹤的人究竟有多少個，他們為哪一機關捕去，他們如何被害，以及此事到底與越共中央、與胡志明本人有怎樣的關係——這些問題，到目前為止，我們還不能作最後確定。有關此事的唯一來源，只是從越南逃到法國的一些托派成員的口述，以及河內當局1960年出版的《八月革命》中的一段。這本書裏談到這件事情時，與越南逃法的托派的報告相符，都說1946年曾經在越南的好幾個省份中同時消滅了一些托派。

關於越南托派遭到「消滅」的技術方面，有待人們的繼續調查，方能大白於天下；不過這個問題的政治方面，即胡志明對於藉秋收等之慘遭殺害應否負起政治上的責任，那是確定地解決了的，胡志明是殺害越南托派的最高指使人。證據何在？便是他在1939年給越共領導人寫了三封信。

胡志明的三封中國來信

第一封信

親愛的同志們：

過去，在我與許多同志們的眼中，托洛次基主義似乎是中國共產黨內部派別鬥爭的一個問題。因此，我們並不給以多大注意。但是當戰爭爆發之前不久，更確切些說，從1936年年底起，特別在戰爭期間，托派所作的罪惡宣傳卻打開了我們的眼睛。從此以後，我們就着手研究這個問題。我們的研究已得出如下幾個結論：

第一，托洛次基主義問題不是中共內部派別之間的一種鬥爭。因為，在共產主義者與托洛次基主義者之間並無共同之處，絕對沒有共同之處。這是牽涉到全體人民的一個問題：（托派的鬥爭）是反對祖國的鬥爭。

第二，日本與其他外國的法西斯主義者知道這一點，正因為如此，他們就設法製造一些不同意見，以便欺騙輿論，打擊共產黨人的名譽，讓人相信共產黨人與托派屬於同一個營壘。

第三，中國托派與其他國家的托派一樣，並不是一個政治派別，更談不上是什麼政黨。他們僅僅是一批專幹壞事的棍徒，僅僅是一批供日本法西斯派以及國際法西斯派驅使的走狗。

第四，所有國家的托派都給自己取了個好聽的名字，為的可以掩護這批匪徒的齷齪勾當。例如，在西班牙，他們自稱「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POUM)。你們知道嗎，正是這個黨，成為馬德里、巴塞龍那以及其他地方替佛郎可效勞的偵探機關？正是他們，組織了那個有名的「第五縱隊」，那個為意大利與德國法西斯軍隊做偵探工作的機關。在日本，托派自稱為「馬、恩、列同盟」(MEL)。日本托派吸收一些青年到組織中來，然後將他們出賣給警察。他們想方設法打入日本共產黨，目的是要從內部去破壞日共。據我看，目前圍繞於「無產階級革命」派周圍的法國托洛次基主義者，其目的就是要破壞人民陣線。在這個問題上，我想，你們所得的消息，會比我得到的更加可靠。在我們中國，托洛次基分子分屬於如下這些組織：「鬥爭」，「抗日」，「文化與紅旗」。

你們大概已經讀過蘇聯審訊托派的控訴狀，如果尚未讀過，我請你們把這些控訴狀拿來讀一下，還要讓朋友們都讀一讀。讀這些文件是非常有用的。它會幫助你們看到托洛次基主義與托派分子醜惡的真面目。這裏，讓我們摘引一些直接與中國有關的段落給你看。

托派分子拉可夫斯基在法庭上宣誓後供稱，1934年當他以蘇聯紅十字會代表來到東京時，一位日本政府的高級官員曾經對他說：「我們正期待托派作出一項戰略轉變。我這裏不詳細說明，我只想對你說，我們期待托派方面有所行動，有利於我們去干涉中國事件。」

據拉可夫斯基回答那個日本人說：「我會把這件事寫信告訴托洛次基。」1935年12月，托洛次基給他的中國信徒發出一些訓令，多次強調這句話：「不要給日本人對中國的侵略製造障礙。」

就是這樣地，俄國的托派分子，既曾願意將他們祖國的一部分——西伯利亞與濱海諸省——出賣給日本，他們現在又要把我們的祖國，中國，出賣給日本人！

中國托派分子到底幹些什麼勾當？你們不是急於想知道嗎？

不過，親愛的朋友們，我只能在下一封信裏回答你們了，你們不是要我把信寫得短一點嗎？

希望不久再談。

P. C. 林

1939年5月10日於桂林

第二封信

親愛的同志們：

在告訴你們有關中國托派的活動之前，先讓我介紹他們的六名領袖，六名以第四國際名義活動的公認叛徒。他們是陳獨秀、彭述之、羅漢、葉青、張慕陶、黃公度。

依時間先後，我把他們所幹的事情，敘述如下：

1931年9月，日本開始侵略滿洲。但從那時起，日本的保安機關便與上述前三人接觸。雙方簽訂協定：托派方面不進行任何反日宣

傳；日本保安機關方面則每月付給對方 300 元，以後再視「服務的成績」而增加津貼。

此後陳獨秀及一夥拿了日本人的津貼，辦起了幾份雜誌，出版一些冷嘲熱罵的小冊子，說什麼「日本人佔領滿洲之後，願意迅速解決各個有爭論的懸案，他們並無佔領全中國的意圖。」

可是當陳獨秀的這些見解，剛剛在他們的刊物上散佈時，日本軍隊卻於 1932 年 1 月向上海進攻了。

這時候的托派說些什麼呢？他們是否承認自己受了欺騙呢？他們停止與佔領者合作嗎？絕對不是！當十九路軍浴血奮戰，保衛祖國之時，這些托派卻無論在言論上或行動上，繼續幹他們一樁又一樁的罪行。一方面，他們寫道：「上海的戰爭根本與人民無關。它不是革命的民族戰爭。它是一場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另一方面，他們散佈虛偽的謠言，提出失敗主義性質的口號，洩漏國防秘密，等等。

他們幹的事還不止此哩。像 Hoa Van Khoi 與 Cung Van Thu（譯者按：音譯為華文蓋、龔文秋，以下同）那樣的托派分子，和警察與日本主子們秘密聯繫，混入上海的罷工鬥爭中，用盡一切方法來破壞罷工運動。他們甚至使罷工運動中最有能力的領袖們遭到逮捕。

1937 年，馮玉祥大將軍與共產黨人吉鴻昌將軍一起在張家口組織了一支抗日軍隊，此時中共處於秘密狀態，中央與華北之間的聯繫發生困難。托派張慕陶便利用了這個情況，自稱「共黨代表」，提出「與日本人共同行動，為反對蔣介石而戰」的口號，企圖變抗日戰爭為內戰。後來，張慕陶的騙局被揭穿，吉鴻昌逐走了張慕陶。不久之後，當吉將軍前往天津時，在旅途中讓張慕陶的同黨給謀殺了。

下一封信，我將告訴你們托派如何在中國進行叛賣祖國的勾當。

兄弟般的敬禮！

P. C. 林^[1]

第三封信

親愛的同志們：

在前兩封信中，我給你們講了托派如何接受日本人付給他們的薪水，他們如何設法破壞我們在上海的英勇戰鬥，以及他們如何設法破壞我們張家口的愛國運動。今天我將告訴你們以他們那些罪行的後果。

十九路軍從上海撤退到福建，他們反覆戰鬥。他們和中國紅軍簽訂了一項協議，在福建成立人民抗日政府，並進行成立聯合戰線的宣傳。不久以前，十九路軍是最反共的軍隊之一。但當國家面臨危機之際，他們願意忘卻過去爭執與仇恨，去追尋唯一的目的：為反抗侵略者而戰。

遵守日本人給他們的命令，這些托派便立即進入行動：一方面，他們在民間煽起地域性的偏見——因為十九路軍來自廣東——反對新政府，另一方面，他們想方設法減弱紅軍的力量。他們是以如下方式來完成這個雙重任務的：他們以革命戰士身份要求加入紅軍，起初，為了取得信任，他們工作得很積極。一旦取得了多少重要的職位後，他們便開始幹那些罪惡勾當了。我這兒給你們舉幾個例子：戰鬥中，需要後退時，他們發出前進的命令。到了應該進攻的時候，他們卻下令後撤。他們把援兵與武器護送到根本不需要的地方，對於那些需要

後援與彈藥的地方，他們偏偏不給護送。他們在戰士們受傷的部分塗上有毒的顏料，特別對那些受傷的軍隊的幹部們如此，其用意是要使他們的臂和腿等等部分非鋸掉不可。這項罪行幸虧及時發現，對那些共產黨人來說，那是多麼幸運啊！

1935年以後，共產黨發起一種運動，要擴大抗日的民族陣線。人民，特別是工人與農民，都積極擁護這個政綱。在國民黨內部，民族陣線的想法也日見進展。這時候，我們看見托派玩弄兩面手法；污蔑與分解同時進行。他們對群眾說：「你們看，共產黨出賣給資產階級了。國民黨是不抗日的！」對於國民黨，他們卻說：「民族陣線，這不過是共產黨的騙術。如要跟日本人作戰，必須消滅共產黨！」

1936年年底，因西安事變的結果，聯合抗日的政策獲得成功。見到他們的內戰政策面臨失敗，托派分子張慕陶與謝維烈（Ta Duy Liet）決定要暗殺王如雪（Vuong Di Trbet），這是一位接受了民族陣線政策的人。

現在我來給你們講1937年。這是戰爭直前的一個時期。全世界的人，除了托派，都團結起來，為反日而鬥爭。這批叛徒秘密聯合起來，還通過了「決議」，下面是這個決議一些引文：「我們對抗日戰爭的立場是明確的；那些既要戰爭而又對國民黨抱有幻想的人，實在已經出賣了戰爭。共產黨與國民黨的聯合不過是一種明知故犯的叛變」。決議此外還寫了些類似的無恥語言。

當戰爭來臨時，日本實現了他們對托派所作的諾言。上海托派每月收到10萬大元，充作他們在華中與華南的活動經費。天津與北京的托派則每月領取5萬大元，以便他們在華北地區從事反八路軍與其他愛國組織的活動。

到了1937年中期，「特區」（譯者按：當指八路軍統治地區）中的托派給發現並被逮捕了。據董義海（Ton Nghia Hai）的招供，他們活動的目標如下：1、破壞八路軍；2、妨礙民族陣線的發展；3、充當間諜；4、策劃暗殺「共軍」領導人物。

在一次「地區」人民法庭上，托派黃發喜（Hoano Phat Hi）作供，其中有這樣的話，在他第四次和張慕陶見面時，張曾給他提了如下意見：「你得用心研究紅軍的組織系統。然後，你要組織青年中心，讓他們一定能擔起破壞與怠工的任務。我們的目標是要在紅軍內部挑撥起亂子，以及消滅軍隊的領導人物。」張慕陶又說：「我們要說服一部分下層幹部跟隨我們，要激起他們的鄉思，供給他們一點錢，讓他們開小差逃亡。這是瓦解那支軍隊的辦法之一。」

托派分子郭文敬（Quack Van Kink）已經招承他受董義海的委託，在戰爭中進行失敗主義宣傳，對他們說「中國不能勝利」，因為「即使我們趕跑了日本人，美國人與英國人又會來壓迫我們。」「如果我們繼續抗戰，非但得不到勝利，而且會使我們的國家毀滅。」又說「中國太弱，不能同時反對日、美、英的。」張慕陶用如下的話來結束他的指示：「必須利用民族陣線這個政策來誹謗共產黨，要說他們出賣了工人階級。我們的目標是要在戰士中煽動他們的不滿情緒。」托派分子藉口教育戰士，把軍隊中的最落後分子組成一些小組，然後，利用軍隊中的最艱苦生活，鼓勵他們攜帶武器逃亡。他們和這些逃亡的隊伍聯絡，在那正在前線作戰的八路軍後方，作亂鬧事。

這便是托派如何與八路軍作對的情形。在下一封信中，我將告訴你們這些叛徒如何應用卑劣手段來破壞抗日的其他軍隊^[2]。（譯者按：上面這三封信，現均收入越南河內出版的《胡志明全集》第三卷。我

們是從法文雜誌《越南紀事》(*Chroniques Vietnamiennes*) 1986年11月出版的創刊號轉譯的。)

三封信的意義——它們的歷史價值

首先，這三封信是胡志明教唆殺人的自我招認。有了這項證據，歷史法庭可以正式宣佈：1945年越南托派藉秋收等人之慘遭殺害，原只是1939年胡志明下達的反托指示的貫徹執行。在思想上與政治上，胡志明必須為藉秋收等的被害負擔全部責任。不管多少「鱷魚之淚」也絕對洗不掉這個責任的。

其次，這三封信又讓我們弄清楚兩件以前不甚明顯的歷史事實。

第一，是胡志明與史大林主義的關係。這位越共領袖之屬於史大林派是人所共知的；但他對史大林一系究竟親密到什麼程度，他對史大林的言行到底盲從到什麼程度，我們以前不曾確切知道，這三封信告訴了我們：至少在如何對待蘇聯與中國的托派問題上，胡志明是一個百分之百的、遠比毛澤東們更為徹底的史大林主義者。他全盤接受當時正在莫斯科舉行的連串審判。這些審判的結果殺盡了整整一代的革命元勳，而胡志明對審判卻完全擁護，還積極地把這些坑害革命者的冤獄介紹給他的越南同志，要他們閱讀研究，藉以看到「托洛次基主義與托派分子的醜惡面目」。

歷次莫斯科審判對革命者，特別對托派所提出的種種罪名是如此荒謬，如此與人所共知的史實不符，甚至如此的違反乎最普通的常識，以致國際間一切公正有識之士，一開始便絕對不相信它們，一開

始就以個人的或團體的名義對它們提出大量的駁斥與指責。1938年4月間，由以美國哲學家杜威博士為首的調查委員會將莫斯科審判中提出的一切罪名，對托洛次基本人作了十三次詳盡的盤問與研究，結果宣佈托洛次基父子無罪，宣佈莫斯科審判純粹是一種羅織。從此不論是革命者或非革命者，每一個有正義感的人都不擁護這些冤獄的了。可是胡志明遲至1939年5月，竟還把這些空前冤獄當作正義的伸張，並竭力推薦給自己的信徒們，要他們接納、奉行、去「政治上消滅」一切托洛次基主義者！

胡志明如此效忠於史大林，在各國史大林主義的黨魁中，是非常突出的。

第二，是他和中共領導層之間的關係。人所共知，胡志明曾經和中共有過長期密切的關係。同樣為人所共知，越共走向勝利的路線，曾經從中共的戰略中得到啟發和經驗。可是有一個事實，從來為人忽視，作者本人也未曾充分注意到的，那就是：胡志明等與中共內部的所謂國際派，即與直屬於史大林一系的王明派，比他們與毛澤東所代表的「土共派」之間，有着深刻得多、與密切得多的關係。

這種微妙的關係並非不重要，掌握了這個關係，我們不但能更好地明白過去中越二黨間「同志加兄弟」的歷史真相，又能更好地了解目前中越交惡的原因。

不過這裏我們自然只能從反托這個問題來觀察這個關係。

胡志明信中對中國托派提出的「罪行指控」，據他說，是他本人「從1936年年底起」，「研究了中國托派問題所得到的結論」。事實真是這樣嗎？完全不是。他只是簡單執行當時共產國際執委會對此問題

所作的決議；而且更糟糕的，他只是一字不易地照抄王明和康生所作的反托文章。

其間的關係與經過約略如下：

1937年10月10日，莫斯科的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通過了一個中國問題決議。決議的第七節作了這樣的指示：

今後敵人將加緊活動來破壞中共內部，要企圖敗壞它的士氣，進行挑釁、偵探、怠工以及從事恐怖。我們必須把革命的警惕性提高到最大限度，必須有系統地控制幹部，控制黨部周圍的人員，必須把黨與紅軍中所有可疑的與不大可靠的分子清除出去。這是目前最緊急的任務。在這方面，黨絕未做了它所應做的事，把托派黨當作一個政黨或政派，像去年中央所發表的聲明那樣，竟提出托派有可能被包括在全民抗日的統一陣線之內的意見，那是絕對不許可的。我們必須用盡一切手段來加強反對托派的鬥爭，來反對這一夥日本軍閥的代理人。

我們知道，這個決議主要是由於王明為首的中共代表團起草的，其矛頭一方面針對毛澤東，另一方面刺向托派。它定下了如何用盡一切手段來消滅中國托派的基調。

1937年12月，王明、康生一行以史大林的欽差資格從天空飛回到延安。第一件幹的大事就是實施共產國際的這個決議：他們怒斥毛澤東與周恩來等對陳獨秀等托派分子抱有幻想，並由康生動手，寫了那篇後來非常出名的文章《剷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托洛次基匪徒》。文章的主要內容是用一些所謂「事實」來證明中國的托派確是「日本軍閥的代理人」。「事實」最大的一宗是說——

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駐上海的日本特務人員曾經與陳獨秀、彭述之、羅漢等人組成的托派中央進行談判。談判結果，日本人答允每月由當時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的一位高級官員唐有壬經手，付給陳獨秀300大元。而實際上收款的則是羅漢。

這篇文章於1938年1月發表於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同年3月，又由王明把它轉載於武漢出版的《新華日報》。

一年之後，即從1939年5月份起，當時居住在廣西桂林的胡志明，把康生文章的內容，連串寫了我們上面翻譯的三封信，傳達給他在印度支那活動的同志們。這個事實說明了胡志明對莫斯科路線的盲目執行，又充分說明了他在中共內部派系鬥爭中，完全站在王明一邊。

最近，我們從英國《衛報》記者關於越共六次大會的一篇通訊中知道，正當「文化大革命」鬧得「熱火朝天」之時，越南曾經翻譯王明批評文革的那本書，在黨內廣泛流傳，規定為幹部必讀書之一。這更是胡志明與王明派結合的直接證據。

胡志明與越共這一種徹頭徹尾的「國際主義」（即一切唯莫斯科當權派之命是從）以及由此產生的胡志明與王明的特殊關係，雖然不足以解釋中越二黨二國之間何以會凶終隙末這個事實；它卻充分解釋了另一個事實，即在對待黨的不同意見者，特別在對待托派問題上，何以越共會比毛澤東殘酷得多。不錯，毛派對托派也絕不「客氣」。基本上，他們也是按照史大林定下的調子來歌唱的。他們也曾利用托派罪名迫害黨內持有不同意見的同志。他們也曾殺害落入他們手中的真正托派。但從長達數十年的毛派與中托之間的整個關係來看，我仍不能不說，毛澤東一系比之於史大林及其代理人王明與胡志明輩，對托派總算採取了略為不同態度。毛澤東統治全國後，「縱容」了中托二年有

半。他於 1952 年冬天把托派全體拘捕起來，長期囚禁；但他不曾像史大林那樣將他們於羅織之餘，悉數槍決。他也不曾像胡志明那樣，將他們秘密逮捕，暗中消滅，表面上卻一灑「同情之淚」。

毛澤東死後，中共的新領導人還終將囚禁廿七年幸而未死的老托派放出監獄。雖然至今沒有給他們作出公正平反，但總已恢復了他們的自由，並且部分與非公開撤銷了過去胡亂加在他們身上的罪名。在胡志明的繼承人所統治的越南，我們卻看不到同樣情形。不錯，目前越南也在變。以號稱「小戈巴契夫」的阮文靈為首的所謂改革派上台以後，類乎中國早已推行、蘇聯正預備推行的「現代化」措施，也開始在越南嚷嚷。這種因感染而生的改革運動究將如何發展，會發展到如何程度，我這裏不想也不能加以猜測。但我現在便可以肯定的是：要越共對黨內外的不同意見者採取多少容忍的態度，要他們承認屠殺越南托派的事實，甚至要他們宣佈胡志明信中所說的中托罪行無事實根據，都還渺茫得很哩。

略談「罪行」本身

胡志明信中列舉的有關中國托派的情況和「罪行」，亦即王明——康生一派所提供的種種「事實」，對於中國讀者來說，本來不必批駁，也不值得一談的。因為他們的虛偽與誣妄太過明顯。只要略知中國現代史的人，誰都不會相信像陳獨秀這樣的人（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中國共產黨的創造人，中國共產黨連續五次當選的總書記，曾經領導了 1925 年至 1927 年中國革命的人物），竟會接受日本軍閥每月 300 元而出賣自己，出賣民族國家，充當日本帝國主義的走卒！不過對於完全昧於中國史實的外國讀者，略略加以說明和解答卻是必要的。

因此有些朋友要我詳盡地用事實與文件來駁斥胡志明所作的種種指責。這工作原不難辦，只要引證 1938 年以來，陳獨秀與羅漢等人的自辯，以及中國社會上一切具有正義感的知名人士當時為反對王明康生的誣衊而發表的文件就夠了。可惜我手頭沒有文件。這裏我只能指出幾個更大事實，藉以辯明胡志明信中的諸般胡說。

一、關於中國托派的「六名領袖」問題。胡志明所舉的前面三人，陳獨秀、彭述之、羅漢，當然都是托派，而且都是以此身份終其一生的。可是後舉三人（葉青、張慕陶、黃公度）則根本不是托派。葉青、原名任卓宣，是早期的共產黨員，後在湖南工作時被國黨所捕，並被處死刑。槍斃後卻未死去，遇救，再次被捕，他投降了國民黨。此後他一直做國民黨的「理論家」，反對共產黨。他與托派既無組織關係，亦無思想共鳴。張慕陶是山西老軍閥閻錫山手下的一名政客，曾替閻錫山策劃反共活動，但他與中國托派從無絲毫瓜葛。中托方面也從不曾對他有過絲毫幻想。在抗戰爆發前，我甚至從不曾聽到過張慕陶這個名字。黃公度於二十年代中期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學讀書，回國後一直是廣西政壇上的紅人；但他從來不曾參加中共，更談不上變成托派。他認識幾個過去的托派並曾經把其中一人（張特，後易名威遐）引作私人黨羽，但他本人始終與托派無關。他後來為李宗仁以托派名義處死，純粹是廣西軍閥內爭時強加的罪名。

二、關於陳獨秀等每月接受日本軍閥 300 大元津貼的問題，此事大概胡志明當時便已覺得「離譜」太甚，難以令人相信，所以在他的第三封信中，就自動漲價。（也許王明康生另有文章，把銀數作了改動，此則我尚未查考），把「300 大元」暴漲成「5 萬」（華北區）與「10 萬」（上海區）了！可是數目雖然漲達 500 倍，卻仍幫不了胡志明、王明與康生的忙，因為他說收受這項鉅款是在「戰爭來臨時」，即 1937

年夏秋之際。可是這個時候，誰都知道，陳獨秀以及其他托派領袖都被蔣介石囚禁在南京的監獄裏！

最近見到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教授王洪模寫的一篇文章：〈關於陳獨秀一生活動的評價〉，其中有一節談到這件事情：

康生於1938年1月在延安《解放》周刊發表〈剷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托洛次基匪徒〉一文，給陳獨秀加上「日寇漢奸，每月領取日本人三百元津貼」的毫無根據的罪名，斷然排除了黨繼續爭取陳獨秀的任何可能性。（見1985年第五期《中國社會科學》，21頁。）

「毫無根據的罪名」！這個斷語終於由一位中共的官方史家說出來，太好了。

三、關於「托派」張慕陶的同黨謀殺抗日將軍吉鴻昌的問題。要證明或否定這一條控罪，只要查明吉鴻昌如何被害就夠了。1979年中國出版的《新辭海》中，收得有吉鴻昌一條，它說到了這位將軍是怎樣死去的：

吉鴻昌（1895年—1934年）……1932年一二八事變後回國，加入中共。1933年5月，聯合馮玉祥、方振武等在張家口組成察綏民眾抗日同盟軍，任該軍第二軍軍長兼北段前敵總指揮。同盟軍在日偽軍和國民黨軍的夾擊下，於9月失敗後，他到平津等地繼續從事抗日活動。1934年11月9日，在津被捕，24日在北平英勇就義。（見《辭海》，1183頁。）

這裏說得清清楚楚，吉鴻昌是國民黨政府殺害的，它不但與托派無關，甚至與那硬被派作托派的張慕陶都扯不上一點關係。

胡志明信上的其他指控，比之以上三例，更是空洞浮泛，不值得為它浪費筆墨了。只是有一件事，我覺得應該在此一提的，那就是胡志明及其弟子們的反托言行，還得為一位中國托派的喪生負直接責任。劉家良，中國托派的領導人之一，伊羅生著的《中國革命的悲劇》的中譯者，於1950年某月在西貢附近某地參加越南同志的一次會議時，被越盟特務誘捕以去，從此不知所終。

現在，國際上一些關心越南革命命運的人，特別是法國一些革命者以及流亡法國的越南社會主義者（其中包括托派），正努力弄清楚藉秋收等大量越南托派被迫害真相。他們要求越南當局作出交待，要求他們調查經過，公開結果，並給所有含冤死去的革命者作出名譽上與實質上的平反。

在那張理該昭雪的名單中，自應有中國的劉家良在內。

1987年2月9日寫畢

注釋

1. 這封信沒有填寫發信地點和日期。發表此信的法文《我們之聲》雜誌出版於1939年7月7日。
2. 這封信是連續登載在1939年7月7日和同年8月11日的法文《我們之聲》上的，信上也不曾填寫發信的地點和日期

13. 略談《悲劇》及其作者

托洛次基寫給伊羅生的九封信（1935–1938年）譯者序

伊羅生（Harold R. Isaacs）著的《中國革命的悲劇》，現已普遍認為是一部「經典之作」（Classic）。凡是研究中國革命的人，特別是那些研究 1925–27 年中國革命歷史的學者們，對它都非常重視。

當他寫作這部書的時候，伊羅生是里昂·托洛次基的一個追隨者。初稿完成後，他還特地到挪威去訪問托洛次基，和他討論問題，請他讀原稿，提意見。托洛次基很賞識這個年輕美國人（當時他才 25 歲）的才能，仔細讀了稿子，認認真真提了不少意見，最後還給這本書寫了一為很長很有分量的序。

托洛次基所提的意見，都寫在他給伊羅生的九封信裏。這些信我們是從哈佛大學圖書館保存的托洛次基文件中找到的，現在譯出來介紹給中國讀者們。

從這九封信裏，我們不僅可以見到這部名著的成書經過，見到托洛次基如何獎掖一位青年作家，而且，更重要的，我們還可以得到不少有關於中國革命與中共歷史的寶貴材料，可以看到一些很有價值的理論分析。

各項意見中最值得注意的，我個人覺得有三，它們是：（1）如何應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和觀點來寫作？（見第三封信。）（2）當初中共

是如何決定加入國民黨的？（見第六封信。）（3）什麼是中國歷史發展的特點？（見第五封信。）

這些問題及其答案，也許不會讓一般讀者感到興趣，但對於研究中國歷史與中共歷史的學人們，它們卻具有非常大的重要性，有極大的啟發性，甚至還有現實性哩。

譬如拿中國歷史發展的特點這個問題來說吧。為要解答中國為什麼不能從自己的生產關係中生長出資本主義來，人們曾經提出過不少答案：有的將它歸咎於中國的地理條件（海岸線相對的平直），有的歸罪於儒家思想（保守自足），有的——目前相當時見的——則要讓老是給中國人造成災難的幾條大河——特別是黃河來負責。

其實，這些答案不是隔靴搔癢，便是捨本逐末。真正抓住了這個特點的，不能不數托洛次基在第五封信裏所指出的——實質上也正是馬克思曾經指出而未曾充分闡明的那種「亞細亞生產模式」。

* * *

《悲劇》出版於1938年，由倫敦一家書店承印。出版後不久便發生第二次世界大戰。《悲劇》遭到了它自己的悲劇：書未廣泛流通，便讓納粹的轟炸機連書店一起給炸毀了。

連書店一起給炸毀了。

大戰結束，《悲劇》於1951年由美國斯丹福大學出版社重新出版。這是第一次的修訂版。再過十年，1961年，又出了第二次修訂版。此後，流通漸廣，銷數大增，從1980年起每年重印一次，成了歷史科學這類嚴肅書籍中的一本暢銷書。它還有了許多種文字的翻譯本。

不過這本書的內容，隨着著者的思想改變，已有了不少改變。兩次修訂，就為的要記錄這些改變。

伊羅生的思想改變過程，我不想、也不能在這篇短文裏詳細介紹。簡單說，開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夜，完成於大戰發生之後的《悲劇》著者的觀念（他自己愛把它稱作「偏見」）變化，可歸結成一句話：從「布爾雪維克—列寧主義者」變成為「民主的社會主義者」。（見他的第一次修訂版序言。）

這樣的轉變，在那個時期，並不限於伊羅生一人。在當時，正如在目前一樣，這是發生在大批左傾知識分子中間的時髦現象，伊羅生和其他許多時髦人物不同的，只在於他不曾以今日之「是」全盤否定昨日之「非」。特別對於一向崇敬的托洛次基，他仍舊保持着崇高敬意。為什麼要這樣呢？他自己作了以下解釋：

在圖書目錄中，我這本書從來總是被歸入「托派」書籍一類的。現在，人們也許會很合適地問道：如今（經過修訂）它是否還配得上這個標記。「托派」這一個給人亂使濫用的名詞，在今天很難知道它有什麼意義。當 1925—27 年中國革命進行時，托洛次基抗拒着史大林派的墮落，他是一位一貫的國際主義者。對於當時所發生的事情，他比俄國其他任何一個領袖看得更加清楚。對於每一次的事件轉折，他都能以驚人的精確程度作出預言。他對官方路線所作的分析與批評，一再為文件所證實——這些文件，在我這部書裏是第一次加以考核的。這是個事實，而這樣一個事實，不會因時間的流逝而有所改變，或者因作者觀點的改變而有所改變。不過，這部著作雖然證實了托洛次基當時的分析，它卻已不再接受他的結論，因而再不能稱之為托派書籍了。

我雖然拋棄了布爾雪維克主義，——托洛次基是這個主義的具有權威的發言人——但是我對於托洛次基有關社會主義革命的某些概念，到底社會主義革命是什麼回事的某些概念，我仍舊懷有很大敬意。托洛次基本人雖然為某些布爾雪維克主義的前提所囿，（這些前提是滋養了獨裁制的）但正是托洛次基，正是他，終於站出來反對全能主義的官僚制度，成為那殘存着的革命道德的一個象徵，它高高超出於當權的史大林派的陰謀詭計之上，超出於權力機構，誣蔑中傷與血腥鎮壓之上。要敬仰托洛次基那是絕對不必在意見上相同於他的。（見第一次修訂本序。）

伊羅生確曾以這個態度修訂了他的書。所以修訂本基本上保存着原來面目。最大的改動是後而新添了一章《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國革命的痕蹟》，在那一章裏作者充分發揮了他對中國革命，對俄國革命，以及對托洛次基思想等等的新的看法。此外他刪掉了托洛次基給他寫的那篇長序，代之以英國十九世紀那位詩人，美術家兼社會主義者威廉·摩理斯的一段《語錄》。【朱正按 摩理斯的文字：「人們鬥爭，鬥爭失敗；鬥爭雖然失敗，人們為之鬥爭的事物卻還是來了。只是來的並不是人們原來想要的；於是別的一些人在別的名義下，得再來鬥爭——為了他們所想要的東西。」】

經過這樣一番修訂，自不免有前後矛盾之弊。這也就是說，整部書的敘述與分析和它最後的思想結論之間，必然會發生矛盾。不過，據我看，恰好因為這個矛盾，才使這部書仍不失其為「經典之作」的。

王凡西 1991年8月

14. 評《中國托派史》

五個月前，一位朋友寄給我一本《中國托派史》，並囑我讀後寫點書評。全書讀完已有兩個多月，可是我一直無法應命。寫不出，並非因為無話可說。恰恰相反，倒是由於想說的話太多，我沒有力氣把它們寫出來。試過幾次都歸失敗，暫時只好放棄。希望不久將來，精力能夠恢復一點，到那時再寫像樣的東西。在這之前，我想寫幾篇不甚有系統的，長短不等的「隨筆」，談談我對這本書的看法，同時和讀者與其他朋友交換點意見。

看過這本書的幾位朋友，給我來信說：這是一本壞書。鄭超麟說：它是「康生和王明從莫斯科帶回來的、『反托運動』的餘波」；是「站在勝利者立場對失敗者所作的輕佻嘲笑。」我完全同意這個批評。

不過同時，我又知道，著者唐寶林研究中托歷史有年，特別對陳獨秀的生平與思想有較深研究。而且，從他近年來的研究動態看，他確實在對陳和托的研究上，走了一些比較正確步子。可是，為什麼仍會推出這樣一部壞書來？為什麼不能如他在序中所說，「力圖公正客觀、實事求是地評價中國托派興亡的全過程」呢？

這裏的主要原因，我以為，在於著者對有關中俄二國革命的一些基本問題——主要發生於托洛次基和史大林之間的爭論問題，特別是中國托派和毛派之間的爭論問題——他迄今還完全站在後者一邊。同時，對某些爭論內容，他或者了解得很淺，或者了解得很錯。

此書出版後，著者曾給我來信，說：「立場觀點，總是不會同意的，但可討論；事實上有不正確的地方，務必指出，以備重印時改正。」這個態度是坦誠的；但也表示出他沒有充分認識「立場」和「事實」之間的密切關係。歷史家從千頭萬緒的歷史中選取典型的事實，必須通過他那副有色眼鏡的。這副眼鏡便是他的立場觀點。因此，要指出書中的事實錯誤，先得指出著者對某些基本立場觀點的錯誤。

粗粗歸結一下，我認為值得指出和討論的立場觀點，可有下列一些問題。

- (1) 對不斷革命論的認識；
- (2) 托、史二派對中國革命的爭論。它是「悲喜劇」，甚至是「一場鬧劇」嗎？當時的中國革命可是命定要失敗的？
- (3) 「聯合戰線」與共同行動的區別；
- (4) 對中國托派基本政綱的抨擊；
- (5) 中托對抗戰的態度；他們對國共內戰的態度；談談所謂「失敗主義」；
- (6) 陳獨秀「誤入歧途」？他的晚年思想是「迷途知返」？
- (7) 托派的「漢奸」問題；對「迫供信」的二重標準；
- (8) 托派和魯迅。

這裏只想略談第一個問題：《中托史》作者是怎樣了解和介紹「不斷革命論」的。

先請看第 38 頁上如下的一段有關文字：

托洛次基……創立的以「不斷革命論」為核心的「托洛次基主義」的主要思想之一，是強調一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的關係，應以後者為中心，認為十月革命勝利後的蘇聯，不應以主要力量搞國內的社會主義建設，因為在帝國主義的包圍下，靠本國落後的經濟技術力量，不可能建成社會主義，所以他主張把蘇聯建成反對資本主義世界的「革命戰爭的橋頭堡」，「世界革命的基地」，不僅一般地支持各國革命，還應直接輸出革命。認為只有在世界革命的勝利中，蘇聯一國的無產階級政權才能鞏固；社會主義建設，也能在其他革命成功了的社會主義國家先進的經濟與技術的支援、交流與合作中，取得成功。為此，他在 1919 年，曾建議派 3 萬至 4 萬名騎兵到印度去「直接推動被壓迫群眾的起義」；在 1923 年，他又堅決主張派遣紅軍正規軍去德國，以此「在歐洲點燃無產階級革命之火」，並表示他自己願意親自率領紅軍前往。

如此介紹「不斷革命論」（即使只想介紹它的「主要思想之一」），也是既膚淺而又荒謬的。膚淺，因為它只是不甚正確地指出一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的密切關係，卻不曾觸及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相互關係。換句話說，他只說到了不斷革命論的橫的一面，卻不曾說到不斷革命論的縱的一面。至於荒謬，則在於著者把「橫的」不斷革命論簡單歸結到革命戰爭，歸結到「主張即把蘇聯建成反對資本主義世界的革命戰爭的橋頭堡」，並且舉出實例，用以證明托洛次基不僅有此主張，而且還企圖實行的。

著者在上引文字中，加了幾個引號，卻不曾說明引文來源。從我閱讀過的托洛次基的著作中，卻始終不曾見過這樣的「建議」和「主

張」。恰恰相反，我卻可以舉出托洛次基反對這種「不斷革命論」的許多文字。下面只是其中之一：

在今天開展着的巨大的階級鬥爭中，外來軍事干涉的作用，只能具有一種輔助的、補充的與翼贊的意義。外來的軍事干涉能夠加速革命勝利達到頂點。但是要起這樣的作用，除非（這個國家）的革命在社會關係方面業已成熟——而且，即使具備了這個條件，還得看那（革命的）政治意識方面，是否成熟。外來的軍事干涉好像是產科醫生的那把箝子，使用得當，可以減輕生產陣痛，但若過早地使用它，卻會造成小產。（見《托洛次基軍事著作集》英文本，53頁。）

和列寧一樣，托洛次基是德國大軍事學家克勞瑞維次的信奉者，他們深信「戰爭乃政治的繼續」。革命戰爭更是革命政治的繼續。離開革命政治便沒有革命戰爭。革命戰爭是必須服從革命政治的。然則，托洛次基又怎能單單為了「輸出革命」，提議派兵到印度和德國去，而且還自請擔任總司令呢？

這個說法的無稽與荒唐，再看看當年俄國的實際情形，便更加清楚了。

1919年是怎樣的一個年頭呢？它是俄國內戰最艱苦與最危急的一年。1918年2月蘇維埃政府被迫接受了德國的和約建議，她立即遭到協約國策動並支持的舊俄反動派的軍事進攻。革命政府一度縮小到彼德格拉與莫斯科地區；新政權的命運危若累卵。為了保衛革命，蘇維埃政府於這一年3月任命托洛次基為海陸軍人民委員，復於9月6日成立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由托洛次基擔任主席。當時舊俄軍隊已徹底解體：最反動的一部分成了白軍骨幹。革命政府除了數量不大的

工人赤衛隊與極少的革命兵士外，沒有任何軍隊。那時最迫切的任務是要立即建立起一支革命軍隊。靠了托洛次基的努力，才能像列寧後來對高爾基所說的，「在一年之內，建成了一支幾乎是模範的軍隊，甚至贏得了軍事專家們的尊敬……」（見英文本《我的生平》，360頁。）同時我們知道，正是在1919這一年內，托洛次基還指揮着這一支倉皇建立起來的紅軍，於4月間擊敗了東戰線上高爾察克的叛亂。7月間他馳赴南線，打敗了鄧尼金的進攻，然後在10月間，他又擊潰北方戰線上尤登尼奇將軍對彼得格拉的進犯，以此獲得國內戰爭的決定性勝利。

試問，在如此緊張與艱苦的這一年中，托洛次基怎麼能「建議派（當時並不存在的）3萬至4萬名騎兵到印度去直接推動被壓迫群眾的起義」？！如何能抽身到印度去「親自指揮」？稍有歷史知識的人都不會相信這樣的神話。

再從印度方面來看，1919年雖已開始了以甘地為首的「不合作運動」，但它離開真正的革命運動還很遙遠，任何軍事援助更無從談起。在此情形中，別說精通革命政治與軍事戰略的托洛次基絕不會存此怪想，便是最普通的政治家與軍事家，也不會提此「建議」。

說1923年托洛次基「堅決主張派紅軍正規軍去德國點燃無產階級革命之火」，其無稽與荒唐雖與出兵印度說略有差別，但其不符事實則完全相同。戰敗後的德國，確有極大可能爆發無產階級革命。列寧以下的所有俄國革命領袖，確曾以最大希望寄託於德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為此，他們確曾想盡辦法去幫助德國革命。但他們從來不曾想派紅軍到德國去「點燃無產階級革命之火」！理由很簡單：事實上不可能，理論上不允許。他們對德國革命的主要幫助是在思想上，是政治性的。當時的德國革命的主要幫助是在思想上，是政治性的。當時的

德國無產階級，客觀上既有取得政權的可能，主觀上也有徹底革命的決心。唯一欠缺的，只是一個領導他們奪取政權的革命黨。德國的社會民主黨是徹底墮落了。它非但不能領導勞動者去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反而與資產階級聯盟、充當鎮壓革命的急先鋒。斯巴達團起義失敗，盧森堡與李卜克內西被謀殺，這個傳統的工人政黨都要負連帶責任。因此，1919年以後德國無產階級的最迫切需要，乃是儘快建立一個像俄國布爾雪維克黨似的革命黨，並且要儘快使它植根在廣大的群眾之中，以便到形勢更有利於革命之時，能夠不失時機地，以正確的策略和戰略去完成德國的「十月」。

在這個基本態度上，俄國共產黨諸領袖之間並無重大分歧。沒有一人主張派遣軍隊到德國去。連當時極左派的領袖布哈林都不曾有此主張；雖然他堅決反對簽訂勃來斯脫和約，提出他獨特的「不斷革命論」：主張不作任何妥協，力主不斷進攻，以此開展世界革命！至於托洛次基，兩年前才主張對波蘭的反擊戰爭應適可而止，此時又竭力要爭取和平來醫治三年內戰的創傷，更不會提議出師遠征了。

關於1923年的德國革命局勢，俄共領袖中間確曾有過不同看法，有過爭論。爭論主要發生於當年的第三國際主席齊諾維也夫與托洛次基之間。只因那場爭論根本不涉及「革命戰爭」問題，我不必在此介紹了。

可是《中托史》的作者憑什麼舉出這兩個例子來說明托洛次基的「不斷革命論」呢？是他憑空捏造的嗎？那也不會的。我想，這多半是著者透過他那副反托的有色眼鏡，以致在形形色色的「史料」中，無法辨別真偽，因而有意無意地以假作真了。想當年，俄國革命像晴天霹靂似的震撼了全世界，真的嚇壞了所有資本主義國家的當權者。為

了反對「過激黨」，為了消滅「赤禍」，他們什麼武器都用上了。槍炮之外，他們又乞靈於宣傳。宣傳攻勢的對象首先集中於十月革命的二十大領袖列寧和托洛次基。在某一時期，後者甚至比前者更成為眾矢之的，因為托洛次基擔任着外交和軍事的重任，似乎更加可怕些。為了醜化與歪曲托洛次基的形象，任何荒唐無稽的話都說過了。例如，一邊說托洛次基原本是紐約勃龍克斯區的猶太裁縫，同時卻又說他是花花公子；說他是 Mephistopheles 型的惡魔，又說他是野心沖天、窮兵黷武的軍閥……

類乎此的荒唐攻訐，《中托史》的作者當然不會相信；但通過史大林的「偽造工廠」，經過一番「改進和修飾」的工序，至少對托洛次基那項「極左盲動」與「軍事冒險」的指控，卻曾經為不少較為正直的史家所接受的。非常可惜，《中托史》的作者竟也成了此類史家之一。

1995年6月

15. 「走你的路，讓別人去說吧！」

《陳獨秀最後論文與書信》英譯本前言

《陳獨秀最後論文與書信》的英譯稿，將由荷蘭阿姆斯特丹的「國際社會史學院」出版。編譯者班國瑞博士要我寫一點簡單介紹，把此書介紹給西方讀者。作為陳獨秀的一個追隨者——有時又是批評者——的我，這原是義不容辭的。但一來因為我年邁多病，無力寫較為鄭重的文章；二來，更重要的，因為編譯者已特別為西方讀者寫了一篇精彩與詳盡的導言。它對陳獨秀的其人、其事及其思想，對他在中國近代史上起過的巨大作用，以及中共政府對他所作的前後不同的評價，等等，已作了充分說明。此外，他又詳加注釋，介紹書中涉及的人和事。最後又有一個附錄。評介了別人寫的幾篇與陳獨秀的生活和思想有關文章，讓讀者能對照、參考。如此，編譯者留給我來介紹的，其實已經沒有了。

不過我還是要借這個難得機會，給讀者們說幾句話。約略談談陳獨秀在文學上以及思想的特點。

陳獨秀的第一本《文存》是在1922年出版的。其中收集了他於1915年至1922年間所寫的幾十篇論文以及大量隨感錄與書信，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陳獨秀給它寫了一篇非常簡短的自序。其中主要部分如下：

我這幾十篇文章，不但不是文學的作品，而且沒有系統的論證，不過直述我的種種直覺罷了；但都是我的直覺，把我心裏

要說的話痛痛快快地说出來，不曾抄襲人家的說話，也沒有無病呻吟的說話，在這一點上，或者有出版的價值。在這幾十篇文章中，有許多不同的論旨，就此可以看出文學是社會思想變遷的產物。在這一點上，也或者有出版的價值。

作者用了短短幾句話，把自己的文格和性格非常真實地告訴了讀者。首先，他告訴我們，他寫文章只是直述自己的直覺，不抄襲人家，不無病呻吟。其次，他指出文學——這應該理解為廣義的文章——是社會思想變遷的產物。因此，他所寫的文章前後有不同的論旨。

這兩個特點，不但能概括地指出陳獨秀早期著作的價值，而且指出了他一生所有著作、包括他的晚年著作的價值。因此，陳獨秀為他《最早論文與書信》所寫的自序，完全可以移作他《最後論文與書信》的自序。

不錯，這兩批文章前後相隔二十多年，在這中間時期，陳獨秀在中國近代史上扮演了一個主要角色，同時他的學識——特別是馬克思主義方面的學識——和經驗，都有了很大長進；可是他的性格——無論在思想和行動上，卻始終如一。他依然憑直覺行事，依然想到就說，說了就幹，依然不人云亦云，依然不無病呻吟，依然特立獨行。

這態度，正如馬克思當年在《資本論》序言所引的但丁的詩句：

「走你的路，讓別人去說吧！」

這個特立獨行的性格，確實是每一位偉大人物所必具，也是他們所共有的。不過，這個性格如果沒有另一個性格來補足，如果不能「見善思遷」，如果一旦見自己的直覺與客觀情況不再符合而不能有所改

變，那些人終於會成為頑固不化、為時代所遺棄的反動傢伙。這一類「晚節不保」的大人物，古今中外的歷史上是很多的。但陳獨秀不屬於這一類人。這就得歸功於他自序中所指出的第二個特點了，即由於他的文章是「社會思想變遷的產物」，是隨社會思想的變遷而變遷的。

正是根據上述對陳獨秀性格的了解，我曾經在我的回憶錄中說：陳獨秀在《最後論文與書信》中所表達的思想不能算是最後的……。說它最後，就他的生命而言；倘就他的思想而言它卻決不可能是最後的。在新的世界與新的中國的環境中，陳獨秀的思想、見解一定還會改變。至於如何改變，卻是一個頗有研究價值的課題。我個人始終認為，在基本上，他將回到列寧和托洛次基的立場來。

1998年2月

16. 陳獨秀散記

關於陳獨秀，迄今不曾有過一本值得注意的傳記。如果以他的一生做一條線索，貫穿着，寫一部中國的近代史，該是最有意義的著作了。他自己在南京監獄時，曾替《宇宙風》寫了一章自傳，談他的家庭，他的母教，以及他在南京進考場的情形。相當有趣。才完一章，他出了獄。別的事情吸引了他，再沒有工夫讓他回憶。到了江津，他又過着像獄中那樣的孤寂生活，多的是時間。有人曾經請他續寫自傳，可是他沒有興趣。他那時正傾全力在完成一部文學的書——《小學識字課本》。他認為這本書才是有價值的。不過他原想完成了那書以後接寫自傳，可惜天不假年。

聽說他的一位學生正在做這項工作，希望能早日與世人相見。

* * *

因為沒有一本嚴肅的考證詳實的傳，以致人們談起陳獨秀的事蹟，許多是不實的，捕風捉影的，甚至是虛空捏造的。隨便舉個例，我們就拿香港某晚報最近在一篇關於毛澤東氏的軼裏提到他的地方來看吧。那篇文章，大體不壞，可是事實錯得很多。例如：一、說他是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這是不對的，陳獨秀於1917年開始，由湯爾和介紹，經蔡元培先生再請而就的，是文科學長，不是系主任。其地位與理法二科的學長相等，次於校長，而在各系主任之上。二、說他去過法日二國，對「法日文都能運用自如」，那尤其不對了。陳獨秀

生平從沒有到過法國，他不懂法文，去過法國的是他的兩個兒子——延年與喬年。日本他是去了兩次的，第一次是留學，時間在辛亥革命前，第二次是亡命，辛亥革命失敗後。日文他懂的，此外他還能閱讀英文。在那同一篇連載文章的另一個地方，作者又說到陳獨秀之被中共開除，說此事是在1927年8月7日的會議上決定的。這也是錯了。

陳獨秀之被開除黨籍，並非因為他在領導工作上犯了「錯誤」，而是因為他參加了托派，組織托派。此事發生在1929年，不是1927年。「八七」會議實際上是國際代表羅明那次領導的，在那次會議上，決定解除陳獨秀的總書記職務，並推瞿秋白出來負責。那時候，革命失敗，國際把一切錯誤的責任都推在他的身上。錯誤中最大的，則是「遷就國民黨」「壓制湖南農民運動」等等。仲甫很氣憤，他不能承認這些是他的錯誤。因為那時候，到處有俄國顧問與國際代表，一切重要決策，每日都由莫斯科規定了用電報指示的。他不過是負責的執行者，而且在執行時，他還不斷抗議了的；所以他說：如果他錯，只錯在執行了國際錯誤的路線，錯在沒有作最堅決的反抗。

仲甫不是綿羊，他不能馴服地為人替罪。

事實上，當時中共的基本政策確實取決於莫斯科，總書記的責任確實只以奉行為主；所以陳仲甫雖然採取了如此倔強的態度，國際並不曾開除他。幾次要他去莫斯科，都遭他拒絕了。他寧願留在上海，在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下面，進行秘密工作。

1928年是陳仲甫思想上最苦悶，因之也是最用功的一年。在中國工農們流不盡的血海中，他苦思着失敗的教訓，他鄭重研究了一切有關的文獻，也重溫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這使他最後走到了一個新的結論，同意了當年國際中的左派，即托洛次基派的主張。他聯合

了近百個革命中的老幹部，寫了他有名的〈告同志書〉，宣佈了他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各個流派的態度。

陳獨秀這個人物太有名，他的歸向托派，對於國際上的史達林派將是一大打擊，因此國際曾在他未正式聲明以前，最後一次派人勸他考慮，勸他去莫斯科工作。他最後一次拒絕了。這時候，中共才決定開除他的黨籍。

因為陳獨秀在社會上的原來地位高，加以共產黨的其他領袖，大多是他的學生，年紀都比他小上十多歲，所以他在黨內的地位與威望，當時可說是絕對的。同志們在背後談到他，往往稱「老頭子」而不名。黨中開會，他的意見除了國際的之外，常能起決定作用。會議上。很少人敢和他爭論的。他的脾氣又壞，動輒光火罵人。當其時，大家都能容忍，革命失敗後，「家長制」便成了他的一個罪名。

仲甫個性當然強，他決定了的事情很難改變。要成大事，這性格大概是不可缺的，可是和他相處稍久的人都能覺得，他絕不是不受他人影響的。在沒有最後決定之前，他很虛心，很肯聽別人意見。有時甚至彷彿聽得太多了些。假使你在感情上先獲得了他的信任，他的「耳朵可說是軟的」。許多人指出他這個缺點。

* * *

陳獨秀雖是才子，但無感傷氣味。他極能控制感情。在這方面他也是強者。他的較大的兩個兒子（他有四子一女），延年和喬年，都是中共烈士。延年死在上海（殺他的人，現在居然是「民主人士」），喬年死在北京。死得都慘；也都極可惜。尤其是陳延年，曾經是廣東中共的負責人，幹練誠篤之至，為最可貴的革命家。他被捕後，吳稚暉

曾打電為國民黨致賀，因為除去了心腹之患。他死了，革命方面人人惋惜，陳獨秀當然也難過，可是他絲毫沒有表示出來。

只有一次，陳獨秀表示出了他的「兒女心腸」。那是在1936年，一個十分忠勇的女革命者在上海吐血死了。陳獨秀身繫獄中，得知了消息，他寫信給外面的朋友說：「這消息很使我很悲愴，我老了！」

* * *

陳獨秀的學問是多方面的，著述也是多方面的。早期作品大多收人亞東圖書館出版的「文存」，轉入共產主義以後的文字，迄今沒有彙集付印。他死後，聽說親友們曾經組織了一個遺著編輯委員會，業已編成全集，由上海某大書局承印。現在人民政府成立，這個共產黨奠基人的遺著的印行，想來是無問題的。

陳獨秀在多種多樣的學術興趣中，只有一種始終不變，就是語言文字學。早年，他寫過一本《字類疑義舉例》，亞東出版，時間該是在五四以前；在獄中，他給商務的《東方雜誌》寫了《實庵字說》；最後，他寫了那本巨著《小學識字課本》。

筆者於此道太外行，對這方面的成就如何，真的是不能贊一辭。偶爾和朋友談起，評價頗不一致。有人很看不起他，說他的「字說」簡直是「波者水之皮」一類的笑話；可是另一些人，大多是專家，例如編著《辭通》的朱起鳳老先生，魏建功先生，就對他推崇備至。

仲甫少自負，獨於此道是例外；依情度理，具有如此超越頭腦的人，在各方面都有過大成就，諒不致在他最歡喜的一門學問中反而鬧笑話的。

* * *

仲甫在思想上打倒「孔家店」；在氣質與做人態度上，和理學先生們也隔得很遠。他雖沒有曼殊和尚那樣風流，卻也鬧過不少「韻事」。和女詩人高君曼姊妹的一段是最有名的，不說了，這裏且談他最後一次的「羅漫史」。

革命失敗後，他來到上海，秘密住在滬東工人區。他那時早已是光身了。不久，他結識了一個姓潘的紗廠女工，很快就同居起來。因為環境太壞，國民黨緝捕他得很緊，他當然不敢吐露真姓名，對於新夫人，他也胡亂說了一個姓字，並且說是在青年會做事的。這樣過了幾年，老夫少妻相當恩愛，可是這位潘女士始終不曉得她自己是陳獨秀太太。1932年，獨秀忽然被捕，第二天各報用大字揭載了新聞，說所捕的正是某人。潘女士這才知道「死老頭子瞞了我，壞東西！」這位夫人一直守着，等到老頭子出獄，做了獨秀先生晚年的唯一伴侶。先生死後，一無所遺，夫人於勝利後回上海，曾再進工廠做了一時期的工，生活大半是獨秀的學生維持的。她去年病歿於上海，無所出。

17. 記汪孟鄒先生

「人生七十古來稀」。汪孟鄒先生以七十高齡離開了這個世界，應該算是應分地安息了。然而，他的噩耗還是引起了他朋友們深深的哀悼。汪先生不曾退休養老，亡故在他服務的崗位上是一個原因；他始終走在時代之前，永遠與年青人為伍，以致讓人覺得他迄未老去，乃是另一個，也是更大的一個原因。

這位永不言老的老人，這位中國新書業的先鋒，這位被茅盾稱之為「始終站在時代前面」的「書賈」，實在是值得識與不識的青年人追念與矜式的。

為公為私，我這個曾有機緣與先生交遊了二十年的後死者，不得不用拙劣的文字，為他留下一些印象。

認識孟鄒先生是在 1935 年。那時我從蘇州的牢獄出來未及一年，住在上海靜安寺路一間小衙堂的亭子間裏，生活困頓之極。有天早上，鄭超麟夫人來看我，她剛從南京探望了獨秀先生回來，給我送來了兩封信。一封是獨秀給我的，一封是要我送給亞東圖書館主人汪孟鄒的，是封介紹信。那時候，全國的抗日情緒是愈來愈高了。雜誌報章，新出書刊，幾無一不以禦侮及提高民族意識為中心題材。亞東書店也就想出版這一類書。孟鄒先生擬請當時被關在南京獄裏的陳先生主編一部叢書，獨秀那時正忙着寫他的文字學，同時也因為環境關係，不能擔任，就介紹了我，因此我認識了汪先生。

亞東圖書館的門市部，當時新從五馬路的兩開間搬到四馬路的單間門面，我是在那間新店面的閣樓上第一次會見了汪先生的。一見面，他給了我一個特別的印象：異常清癯，根本不生鬚鬚，面帶病容，然而語音高亢，笑聲爽朗，顯出了他精神和身體上的健康；衣服十分樸素，然而整潔非常，閣樓極小，僅僅容得一張寫字台和兩把椅子。寫字台周圍又堆滿了書刊，但是被他處理得十分整齊乾淨，讓人一眼就看出來，沒有一件東西是隨便亂放了的；桌子給揩抹得纖塵不染，上面有一個算盤，一隻煙灰碟，一支削得尖尖的鉛筆，被安置在它們應放的地方……

汪先生坐在書桌面前的椅子裏，我坐在書桌橫頭。他看了介紹信。仲甫先生在信上寫着我是他的學生（其實嚴格說並不是，我進北大時，陳先生早已走了）。又說，他能做的我都能做（這對我實在是意外的榮寵，仲甫先生的意思原只想在汪先生的心中造成一點好印象，因為是老朋友了，他深知道汪先生的怪脾氣：對人是「迷信」的，尤其對獨秀；當他信託一個人時，決不相信第二人；為使「老闆」能接受他的代表起見，所以不得不將代表人說得過分一點）。固然，這封介紹信造成了很深印象，他非常歡迎我的合作。我們談了幾個鐘頭的話，談到中午，他便邀我到書店隔壁的一家徽州館去吃了一餐不算儉嗇的飯。

那次談話有了結果，他要我主編一部名為「民族英雄故事」的小叢書，每冊一二萬字，計劃把中外古今於民族獨立有過貢獻的名人，都包含在內，每人一冊。他要我先寫一個計劃，拿給仲甫先生和陶行知先生看看。

這部書沒有出成功，經過是這樣的：我寫了計劃，將應寫的「民族英雄」擬了一張名單。為了生意經，一時也因為沒有立下明確的「英

雄」標準，以致在外國部分中，把法國的拿破崙和日本的伊藤博文放在裏面。汪先生很贊成這名單，他拿給陶先生和高語罕先生看了，亦無異議；於是寄給仲甫先生，回信卻出乎意外，他火氣騰騰地將我這個草擬者罵了一頓，原因就為了上述那兩個外國「英雄」的名字。他認為：斯二人均係民賊而決不是民族英雄，他主張以羅伯斯比爾代替拿破崙，以西鄉隆盛代替佐藤。仲甫先生是罵得對的，——至少站在不是純粹的民族立場而站在社會革命立場應作如是觀。我同意陳先生的修改。

叢書原可以出版了；但因為陶先生邀請的一些作家沒有工夫寫，後來陶先生本人又離了上海，這計劃就此流了產。書沒有出成，可是我和汪先生的關係卻繼續下去，而且日益接近了。

正在那時候，國際上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那就是蘇聯由史大林主持的一連串清黨。自從1934年12月基洛夫被刺以後，愈來愈叫人驚異的審判和槍殺，前後相繼地在蘇聯發生。1935年1月齊諾維也夫與加明尼夫等19名黨政要人被以「恢復資本主義」的罪名審訊服刑，接着是加明尼夫等二次受審；1936年夏天高爾基被毒死，8月間齊諾維也夫等16人再經審判後，全體報告遭到槍決；1937年1月間，拉迪克等17人受審，13人被處決。這些大事的轟動程度，在具有國際知識的人士中，是比日本的逐漸侵略中國更加巨大的，而汪先生則是此種人士之一。

人所共知，孟鄒先生是不問政治的。他始終以一個「書賈」自居，而且也實實在在能固守着這個商人的界線（這些事我們在後面將要談及）。然而，我們也有理由說，他是頂頂關心政治的。他以最高興趣注視着國內外每日發生的大事件，加以思考，研究，分析，且與朋友們作不倦的探討。他這種對時事的興趣是絕對無私的，因為他於本行之

外從不兼營「副業」，即使在敵偽及抗日勝利之初，上海的投機事業達到空前猖狂的程度，他也不屑一顧，所以他的研究時事決不是為了預測行情的漲落，像普通商人一樣，其興趣是純粹出於一個人民或世界公民的立場，出於他對全人類情況的關切，出於他對現社會中所進行的善惡鬥爭的留心，而在下意識裏與他的內心深處，則是由於他的深厚的悲憫，由於他非常強烈的正義感。

莫斯科審判案對於汪先生恰如晴天霹靂。和全世界一切進步人士一樣，他以惶惑、震驚、痛苦來接受了這一個「突發」事件。汪先生實在是一個蘇聯之友，自從這個新型國家出現在歷史上的第一天起，他就以很大希望和同情嚮往了她的。對於創造此一國家的那些人，自列寧托洛次基以下的全體布爾雪維克領袖，他是虔誠崇拜的。可是今天，莫斯科傳來了消息，說那些列寧的戰友和學生，那些為他一向最尊敬的偉大人們，竟是存心「恢復資本主義」「與希特勒及日皇聯盟」的「暗殺兇手」和「法西斯間諜」，這在孟鄒先生看來是比《封神榜》裏的故事更難相信的；但是，消息繼續傳來，說這些荒唐罪名，竟被他素所崇敬的人物親自在大庭廣眾間承認了，認罪了，而且以「懺悔和感激心情」接受了極刑的判決，因而「從容」死去了。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他懷疑，他痛苦，他急需要了解，他和所有的朋友去討論這件事情的密秘。結果，在一些朋友的幫助之下，他老先生終於明白了事情的真相，白熱的憤怒代替了初期疑惑，他決定要盡點微力，要把這個真相，藉着他小規模的出版機構，用文字來告訴中國的讀者。

他決定要寫兩本小書，一本是《莫斯科審判的國際輿論》，另一本是《莫斯科審判的真相》。我自然是樂於接受這個委託的。在1937年之初，我從外國的進步報刊上搜集了一二十篇關於此案的文字，加以編譯。交了稿，正預備着手寫第二本的時候，不幸我又被國民黨政府

捕了去。不過後來《莫斯科審判案的真相》還是出了版，那是由我的朋友陳其昌寫成的。其昌接着還翻譯了托洛次基為此案而寫的一篇文章：〈我賭我的生命〉，也由汪先生拿來出版。

再見汪先生是在1938年春天。1937年12月，在日本侵略軍的炮火下我被放出了南京的國民黨監獄，搭了末班的難民車，在津浦、隴海、京漢鐵路上繞了個大圈子，在武昌找到了獨秀先生，作了他家裏的短期住客，就取道香港回到日軍包圍的「孤島」上海。從此便開始了我和汪先生的第二期來往。發生了他與我之間更密切的合作，因而使我對這位老人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與更大的敬意。

回到了上海，為生活，我立刻替一家小書店翻譯法國瑪律勞所著的小說《征服者》。妻子那時是和大群親戚逃難來滬的，大小15人，擁塞在一間陰暗的廂房裏，我便是以第十六名住客的資格加入了這個難民群，也就在這環境裏進行着翻譯工作。汪先生看見了這個情形，邀我到他在西藏路的編輯所去寫作。（那時他在四馬路的門市部已經結束了。）過後不久，又見我來往辛苦，就索性叫我住食在他那裏。晚間無事，我們總是古今中外地亂談一陣，這日子大約延長了半年餘。那長時期的閒聊讓我觀察了汪先生很有趣味的私生活，也讓我更多知道了這位閱盡新書業滄桑的老人的生平。

現在，就讓我們來拉雜地記記這些事。

孟鄒先生字耕野，安徽績溪人。以1876年生於一個擁有小量土地的書香家庭。父母早故。兄希賢，曾肄業於南京水師學堂。與柏烈武及章士釗等人為友。但他不曾做得多少事業，去世相當早。先生十幾歲時，家庭情況已頗見敗落，而當時國內形勢則愈來愈激蕩，清廷腐敗，外侮日急，所以他完全無意於舉業。戊戌變法前夜的空氣，早

已達到了皖南山鄉。在那時的年輕人的腦子裏，科學救國思想是頗為流行的。汪先生當然受了它的影響。不過他沒有他大哥的幸運，讀了幾年私塾之後，卻無法進入任何新式學校去讓自己學習科學。家庭負擔過早地落在他的肩上，一個未曾充分成長的人就被迫為自己與家人的生活打算了。皖南人是善商出名的，茶、米，飲食諸業中出了不少鉅子，經營典當更是他們的專長。可是汪先生對這些生意完全不感興趣。他要把思想抱負和生活之道聯合起來。幾經思考，他便決定開小書店。家裏還剩得有一點田地，他拿來抵押給本鄉一個財主，借了50塊銀元，另外再拼拼湊湊居然在蕪湖開成了一家小書店，取名「科學圖書館」。這是孟鄒先生從事出版事業的起點。開店的年代曾經聽他說過，可惜忘了，大概總是在十九世紀臨完的數年中吧。「科學圖」（蕪湖人一直是這樣稱呼那書店的）自己並不出什麼書，主要是代售上海新出版的書冊。不過不久之後，它就具有了更大的作用：成了安徽革命黨人的聚會之所。繼且變成新思想運動的中心了。經營書業，很自然地會跟文化人發生關係，去世的希賢先生又交遊頗廣，此時都和孟鄒先生來往了。汪先生和陳獨秀先生締交，也是在那時候開始的。這家新書鋪如何成為當時皖省新人物的活動之所，我不能詳述，也不想瑣敘。有二件事我覺得頗具典型性的。第一，想往日本去讀書的年輕人，如果是激進一點的，大多先到這裏來住幾天，打聽點必要的事情，熟悉些為放洋所必需的知識。這些人的辮子，也大多在書店裏偷偷剪去，再請人做了假辮子佩戴；第二，在1904年，即在辛亥革命之前七年，五四運動之前十五年，這家書店竟出版了《安徽俗話報》，鼓吹科學，破除迷信，主編的恰好就是陳獨秀。

記汪孟鄒先生（另一稿）

知道汪孟鄒這個名字的人大概不多，但知道亞東圖書館的可能還不太少。汪孟鄒便是「亞東」主人。亞東這家小書店從來不曾發達過，可存在的時局很長（前後大約四十多年），對新文化新思想運動的貢獻也着實不小。

亞東最容易叫人聯想起來的是它出版的標點本古典小說。這工作是汪孟鄒的侄子汪原放幹的，其成績曾得過魯迅的稱讚，確實做得謹慎細緻。其次，亞東之所以出名，因為五四運動中幾個主要人物的著作是由它出版的。其中最著名的有陳獨秀，胡適之，陶孟和等人的《文存》，以及俞平伯，汪靜之等人的新詩。《新青年》雜誌名義上係群益書局出版，實則是汪孟鄒請群益代出的，印校工作大半由亞東同人擔任，所以後來《新青年》的合訂本主權還是屬於亞東的。

亞東和五四運動有密切關係，直接原因是汪孟鄒和陳胡二人有交情。陳獨秀是他自小好友，胡適之則是他的小同鄉（績溪）。當胡氏在滬上讀書時，曾受過汪孟鄒的照拂，陳胡相識，還是他作的介紹人。但若因此我們說，汪孟鄒所以把亞東奉獻給新文化運動完全因為這點私人關係，那是不公平的。憑着孟鄒先生的見解和氣質，他都有做文化戰士的資格和趨向。在書店同業中他以「怪」見稱，鄭振鐸說他是「市廛之俠」，茅盾在一篇文章裏曾談到汪孟鄒的「永遠跑在時代前頭」。……這些印象和評語，不管是全部出於好意或略帶譏刺，卻都指出了汪孟鄒與普通書賈不同的個性。

無論新舊學問，汪先生都沒有什麼了不起的造詣，但他真說得上好學不倦，尤其是「不恥下問」。書店裏經常坐滿了高等文化人，他

向他們衷心求教；他生活上不斷接觸到一些「市井小人」，譬如徽州幫館子裏的廚師堂倌之類，也一樣和他們談得津津有味，有時竟虛心請益哩。汪先生還有一種難能可貴處，便是他非常認真地看待他的知識學問，把學到的東西吸收進血液去，在生活中實行出來。這和許多大有學問的人卻把學問當作裝飾，或當作欺世盜名的手段，真不可同年而語了。舉個小例，他是完全沒有學過科學的，但他的科學精神比一般留學外洋的科學專家不知要虔誠和嚴肅到多少倍。他眼見許多科學家相信扶乩，相信鬼神，相信風水，就深以為怪。他自己真是徹底破除了迷信的，對所有這些他都不信。為此他還做過一件怪事。大約在1936年頃，他把書店交給侄子和同事，自己退休還鄉。可是他不能寂寞，要有所作為，乃將書店的部分餘資，在皖南鄉下辦了一座公墓。他認為這一來可以破除風水迷信了。結果卻敵不過鄉下人古老的成見，沒有人肯把亡故的家屬送進公墓去，最後只好將墓地改成公園，他的前進在鄉人中傳為笑話。

汪孟鄒一生不曾捲入過政治，但由於他強烈的正義感，他始終同情進步的政治思想。數十年來每一個處於被壓迫狀態中的革命黨派，差不多都和他發生過關係。戊戌政變後他同情康梁，他在蕪湖開設的科學圖書公司便是安徽省新思想新人物的大本營。五四前後他替新文學運動服了務。孫中山見逐於陳炯明，到上海刊行《建國雜誌》，沒有一家書店肯替他出版，結果是汪先生擔任了下來。北伐革命時，亞東出版了大量的社會科學書籍。革命失敗後，他和潛居上海的許多文化人合作，印出了不少左傾書籍。對於被迫害的革命文化人，他是盡其可能來幫助的，例如蔣光赤的病和死就是由汪先生一手料理。他和共產黨人常有往來，陳延年和陳喬年不必說，瞿秋白跟老人也有極深交誼。秋白全集的原稿，一直在汪先生手裏，到了解放後他才拿出來交

給了人民政府。汪孟鄒先生病逝於 1954 年。他總算已經儘量好地利用他的一生了。

每次想起孟鄒先生，我總記起德國詩人海涅為他的亡友摩西·摩塞所說的話：「他不僅在早年就已很有學問（這句話對汪先生不甚適切），而且也懷有對人類的熱烈憐憫。不但此也，他還企圖有所作為，來醫治好人類的疾苦。他永遠不倦地幫助別人，他不炫耀自己，而是把他受的學說靜靜地付之實行。世人聽不到他辛勤的工作；他的姓名不為人知。可是，我們這一輩代的人所以不曾像我們所想像的那麼卑鄙，就只因為它產生了這樣的無名烈士。」

18. 悼念彭述之

彭述之死了，一個老革命家逝世了。他是中國第一代共產主義者之一，在中國第二次革命（1925年至27年）時期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之一；革命失敗後，他接受蘇聯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的見解，轉向了托派，因而成為中國托派運動的領袖之一；1949年中共取得全國政權，他流亡海外，繼續托派活動，參加第四國際工作，直至於死。

這樣一位始終不變，為一個政治主張而鬥爭終生的革命者，不管他的所信正確或者錯誤，也不管他的事業成功或者失敗，他之值得人們悼念，值得後來者的研究，那是完全應該的。

自然，各式各樣的人，由於立場不同，或由於對逝者的關係不同，各人為此而發生的感想也必然有所不同。

就本人來說，彭述之的逝世是既喪失了一個共同戰鬥過的同志，又失去了一個長期與之爭論的對手。這個情感可說是惋惜而又寂寞的。

不過，我首先要談中共領導層對於彭述之逝世可能採取的態度，以及他們對他歷來所作的評價。

中共多半會，甚至一定會以沉默來對待彭的逝世。跟所有的史大林主義者一樣，他們對於政治上的不同意見者，無論在其生前或死後，從來總是想盡辦法來抹殺其存在的。這是對待異己的一種最為簡捷的方法，也是一切暴虐的統治者進入思想的窮巷後必然採取的態度。不過在過去，追隨莫斯科官方路線的中共領袖們，從瞿秋白直至

毛澤東，卻都曾給過彭述之（大多被當作陳獨秀的影子或替身）以如下方式的評價：

他在1927年以前是中共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一個宣導者與執行者；革命失敗後，他墮落成為反革命的中國托洛次基派的一個領袖。

這樣的評價自屬荒謬之極。

在從1925到1927年的中國革命中，彭述之既是中共中央的一個重要領袖，自須分擔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執行者的若干責任。但是，正如一切歷史文獻所已證明的，那個時期的路線制訂者卻絕對不是陳獨秀，更非包括彭述之在內的其他中共領袖們。他們不是，而且由於第三國際的制度使然，他們也不可能是中共基本路線的制訂者或宣導者。

因此我們保衛陳獨秀，我們也保衛彭述之，反對史大林、瞿秋白、王明與毛澤東等將中國第二次革命失敗的主要責任推卸在他的身上。

至於彭述之與陳獨秀等老共產黨人之轉向托派，那我們必須再一次鄭重聲明：這不但不表示出他們的什麼「墮落」，恰好相反，它表示出他們的進步，他們的光榮，他們對中國革命馬克思主義運動所作的巨大貢獻。

在根本的大是大非上，即在革命馬克思主義派與史大林—毛澤東主義派之間的對立上，我們（即屬於前中國國際主義工人黨的人）從來與彭述之們站於同一戰線。在實際鬥爭中如此，在恢復中國革命歷史真相的鬥爭中也是如此。

不過無論關於前一種鬥爭或後一種鬥爭，我們與彭述之之間並非沒有分歧的。事實正相反，我們與他所爭論的某些政治問題還具有頗為深刻與嚴重的性質。例如對於革命黨內民主集中制的了解，關於民族鬥爭中無產階級革命黨的戰略方針，以及對於中國第三次革命勝利的原因等等。不過這些爭論，顯然不適於在此悼念文中重提。何況，一般來說，一個革命者的不同意見，未必有損於作為一個革命家的品格。與一個革命家的品格有直接影響的，除了他對敵鬥爭中的是否忠貞之外，毋寧是他對人對事（現在的乃至歷史的）的態度，在於他是否能忠實地衡量別人與自己在革命活動中所曾幹出來的功和過；在於他是否能公正地確認自己與別人在許多問題上所發生了的是與非。

我現在想要談談的只是彭述之在這方面的態度。

非常可惜，我無法在這個方面讚美我們的老朋友。

陳獨秀是一位大革命家。他光明磊落，明辨是非。當他認為自己的主張正確之時，他勇往直前，固執堅持。但當他發覺自己犯了錯誤之後，他總是毫無顧慮，坦白承認，堅決改正。這個優良品格，最完美地表現在他的〈告全黨同志書〉中。在那裏，他公開指出自己的缺點，承擔錯誤的責任，並歡迎別人對他批評。這不但無損於作為一個大革命家的陳獨秀，反而增加了他的革命家的形象，同時最有力地指控了史大林—布哈林們斷送中國革命的罪行。

托洛次基是一位更大的革命家。他所以能成為這樣一個人物，與他的嚴格對待自己是分不開的。他把自己的錯誤——主要是他和列寧之間長期爭論中所犯的錯誤——進行公開與詳盡的分析，使自己與他人都能從中汲取有益的教訓。例子很多，不勝枚舉，下例是其中之一：

在 1924 年 11 月間寫成的《我們的分歧》中，托洛次基說道：「我過去曾經犯過一些政治錯誤，但其中沒有一個錯誤使我的革命家的榮譽蒙受絲毫污點。」（見英文本，《左派反對派的挑戰（一九二三至一九二五）》，267 頁。）

可惜彭述之在這上面既不能追隨陳獨秀，更不能師事托洛次基。他要求一個人間根本不可能有的「永遠正確」。

最明顯的例子是他在中國第二次革命失敗的責任問題所採取的態度。他不承認自己是機會主義路線的制訂人之一，那是完全對的，是符合歷史事實的；但他不承認自己曾是這條路線的重要執行者之一，卻是不對了；至於像他最近在《回憶錄》及回答一位老同志的一篇文章中所說，他一貫反對國際在中國推行門雪維克路線，且曾在中共的第四次大會上憑其一己之力，改正了中共的機會主義路線為布爾雪維克路線，那就非常不對了。因為這種說法根本沒有事實根據。

「永遠正確」原是羅馬教皇的特權，也是近世史大林式專制獨夫們的標記。它與真正革命者的品德絕不相容。一個革命組織的領袖如果想方設法來製造這一種「正確」，藉以造成「個人崇拜」，其結果只能一方面僵化自己，另一方面毒化組織；萬一這個組織仍能因其他有利因素之助而使革命取得勝利的話，它也只會使革命迅速墮落而歸於失敗。

對於彭述之的評價，我在 1957 年寫作的回憶錄中曾經說過如下的話：

他自然是一個革命者，而且具有不少革命者的優點，譬如說，他的穩定和謹慎……不過在我的認識中，覺得他有一個最大

毛病，那就是接受了被史大林偽造過的「列寧主義」，特別是……那個組織觀念。

現在事隔二十六年，當他與我們永別之時，我毋需改動這個評價。只有一點應該添加的，那就是：由於他的穩定性格（更確切些說是頑固性格）的病態發展，產生了「永遠正確」的要求；為要體現這個要求，他竟不得不彎曲某些歷史事實，甚或虛構一些故事，這是大有損於一個革命家身份的。

年輕一輩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如果能夠從這位老人身上學到一點東西的話，首先必須以其「永遠正確」的非分要求為戒。

1983年12月21日

19. 從魯迅的一封信，談到陳其昌這個人

一、

在數量巨大的魯迅書簡中，他的《答托洛次基派的信》非常出名。它一發表（1936年6月9日），便在文藝政治兩個圈子中激起波瀾。往後更發生了深遠影響。可是就信論信。不管從文藝角度或思想角度來看，最客氣，都只能說是魯迅的一篇「失準」之作。它既不能給人「美的享受」。更談不到予人以「真的啟示」。因為是病中口述，文字失掉了魯迅體常見的光彩，它讓我們看到的，只是筆錄者馮雪峰那種拖泥帶水的「硬譯筆法」。講到內容，那簡直令人驚奇——驚奇於作者對俄國革命歷史知識之如此貧乏，更驚奇於他使用論據時的不加選擇。說托洛次基在革命前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的時候，「怕連送一片麪包的人也沒有」，可見他根本不知道托洛次基曾經兩次流放又兩次逃脫的事實。因為，誰要想從冰天雪地，交通困難，人煙稀少而憲警處處的西伯利亞逃脫成功：豈止要有肯「送一片麪包的人」，還必須有普遍的同情與大眾的援助。至於說如今某人「不得不」用敵人的金錢，這只能使我深深為這位具有良知的文豪悲哀：一旦醬在黨派的糾紛中，連平素痛惡的「盧布」武器竟也「不得不」拿來使用了。這，實在是魯門之玷。

但雖如此，這封信不但出名，而且讓人捧上了天。從毛澤東開始，中共的政論家和文藝史家們曾經一再稱道和引證這封信。這是為什麼呢？理由很簡單，只因它恰好投合了中共領導者的要求，特別是

投合了那個來自莫斯科的要求。這個要求是：必須以任何手段抹黑托洛次基的形象，必須不顧一切地敗壞中國托派的聲譽。

魯迅這封信的此一意義值得詳細討論。不過我不想在此地討論，有關這方面的種種問題近年來已經有不少人說過，而且說得很好。例如一丁著的《魯迅：其人，其事及其時代》。在我的回憶錄中也曾比較詳細地說過它們。

這裏，我想說的是當年給魯迅寫這封信的人。

二、

到底是誰給魯迅寫這封信的？這在當時，而且在後來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成了人們猜測的一個謎。因為與魯迅覆信一同發表出來的原函，署名「陳××」，不少人便猜度投書人竟是當時被國民黨監禁着的陳獨秀。見首不見尾的神秘感，無意中給覆信增添若干分量，也引起了更多人的注意和興趣。解放前出版的《且介亭雜文末編》和《魯迅三十年集》中收入這封信，對這個「陳××」不作任何注解。解放後，魯迅著作大量出版，魯迅的這封反托信更是廣泛流傳，甚至編入中學生的語文課本。但將投書人的真實姓名公佈出來，據我所曾見到的來說，開始於196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魯迅全集》。在有關的一條注釋中編者說：「來信的陳××，原署名陳仲山」。

至於陳仲山是怎樣的一個人，他可是陳獨秀的化名，並無一言提及。因此，對讀者大眾來說，這個謎仍然未曾解透。

馮雪峰曾經做過考證：「據說陳仲山是神州國光社的一個小編輯。」（見《魯迅研究資料》第一輯，51頁。）

1981年新版的《魯迅全集》注釋者對於「陳xx」做了較多說明，他說：「來信的陳xx，原署名陳仲山，本名陳其昌。據一些托派分子的回憶錄，他是當時一個托派組織臨時中央委員會的委員。」

這裏明白告訴讀者：陳仲山不是陳獨秀，他是陳其昌。陳其昌不是某家書店的小編輯，而是當時中國托派組織的一個領導人。這比以前的報導充分得多了。不過，陳其昌究竟是怎樣的一個托派，究竟他與魯迅信中明譏暗諷的那些骯髒行徑可有多少相干或相似之處，則注釋者仍無一言道及。他寧願，或只能，讓讀者自己去猜，自己去作出歡喜的結論。

把陳其昌這個人企圖作完整與全面介紹，我只在最近一期《新文學史料》（1985年第3期）的一篇文章中第一次見到，文章題為〈陳其昌其人其事〉，作者：史明。文不長。對事情的看法依舊，但不失為一個具有重大意義並且值得歡迎的企圖。因為無論如何，作者是想比較詳盡與客觀地敘述陳其昌的生平的。在以往，把魯迅斥責的「陳xx」劃為「民族敗類」，已成為中共千百件無可推翻的鐵案之一。想把此案稍稍改動，或以任何方式來減輕「民族敗類」的形象，都是觸犯黨禁的。可是史明君的文章不但報導了陳其昌的生平，而且宣佈了他的「結局」，這不能不說是中共史家在此禁區中所作的一個空前突破。究竟他如何與過去的所說不同，請看如下的幾個段落：

陳其昌，又名陳清晨，河南洛陽人。北京大學畢業。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大革命失敗後他住在上海。1929年他參加陳獨秀、彭述之、鄭超麟等人所組織的「無產者社」，並與以陳獨秀為首的61人曾簽名向黨中央提出過意見書，因此被開除黨籍。他一家三口，以賣文為生，經常向北新書局出版的《學生界》投稿。他的妻子有時為人幫傭，生活相當艱苦。

1931年5月，當時四個托派小組組織……聯合組成「中國共產主義者同盟」，同年8月和次年10月，陳獨秀……等先後遭到國民黨逮捕……陳其昌在那個時候是倖免於難的一個。在1932年10月陳獨秀等人被捕後，他先後找到趙濟和蔣振東……想設法找到那些未被捕的人……形成一個臨時組織來維持殘局，徐圖發展，但是他們的願望一直未能實現。不過他還是進行一些個別活動，如「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在抗日的熱潮中，上海出現了各界抗日救國的民眾組織，其中之一是「上海著作者抗日協會」，陳其昌和趙濟都參加過這個「協會」，進行過抗日工作。1936年春，……陳其昌窺測出魯迅先生與「左聯」一些領導人之間有矛盾，便想乘機寫信給魯迅先生，宣傳他們的「政治主張」。……這就引出魯迅先生寫出上述那封義正辭嚴的回信。……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發生。日本帝國主義佔領整個上海後，即大肆搜捕，陳其昌慘遭殺害。這就是陳其昌的最後結局。

史明君這裏首先告訴大家，陳其昌原來是1925年入黨的老共產主義者，他一向擁護陳獨秀，後來隨陳獨秀轉向中共的左派反對派（托派），被開除黨籍。文章又說他生活艱苦，卻竭力維持托派組織，參加抗日工作。這些話，過去的中共史家是不曾報導也不肯報導的。至於陳其昌的「最後結局」，即他被上海的日本帝國主義者捕去殺害，那更是中共史家所諱言的。因為，這是陳其昌對魯迅的指責，最後亦是最有力的答覆——「我以我血薦軒轅」。

史明君的文章竟敢把這個足以「美化」托派的歷史真實公佈出來，實在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從這裏，我希望反映出來的不單單是作者

個人的「科學良心」，而更是國內人們近年來努力爭取，必須還歷史以真實的那個巨大的鬥爭。

我熱烈贊成這個鬥爭，我衷心歡迎每一個尋求真實的企圖。這不但為了陳其昌個人的緣故，不但為了他清白身世得以恢復；而且為了中國整個革命事業的緣故。因為任意抹殺或顛倒歷史真實，隨便給政治上的不同意見者加上罪名，乃是任何一個革命組織在政治上與思想上墮落的標誌，也是它們墮落的一個原因。中共想從「信任危機」中真正解脫出來，首先，我以為必須在歷史求真方面容許人們繼續努力。

三、

陳其昌是我的老同學。自從 1926 年締交開始，直到他於 1942 年被日帝殺害為止，他與我在許多年中朝夕相處，甘苦共嘗的。對於他的生平，他的思想和性格，我自信知道得比較清楚，了解得比較深刻，把它們如實地寫出來，是我這個後死者的責任。

史明君寫這篇簡傳所站的基本立場，顯然還是中共的正統。不過同樣明顯，他沒有為要維護這個立場而故意歪曲或捏造事實。不錯，文章裏有許多與事實不符的敘述，但它們顯係由於作者根據不甚可靠的史料之故。這些錯誤，我將在我的敘述中順便指出。

陳其昌年長我七歲，在大學裏高我三級。但他與我相識，卻不是因為同學而是由於同志關係。他加入中共比我早，我在 1925 年年底或 1926 年年初參加組織時，他已經是北京大學黨支部的一個領導人——支部幹事。當李大釗等被捕與被殺的時候，他正擔任着中共北京東城區區委（當時不叫區委，叫部委。），因為年齡、班級以及工作崗位上

的差別，當時我和其昌雖然相識，但彼此間的關係和了解，卻不及我和王實味之間的那麼親切。他和我成為朋友，即從普通的同志進而為知己朋友，那是在四年之後，在上海一起幹中共左派反對派活動時候開始的。

在反革命高奏凱歌，力圖鞏固其統治的頭幾年（1927年下半年至1930年）中，大批共產黨員退出了黨，又有大批黨員成了烈士。陳其昌與我既不曾走上懦弱或屈辱的路子，又有幸逃過不少驚險，尚未丟掉性命。

我們都留在黨內繼續鬥爭。只因為工作的地方不同，部門不同，彼此不相問聞。他與我重新聚首，是我們不約而同的成為中共內部反對派以後的事。陳獨秀起草了一個《政治意見書》，贊成蘇聯共黨內反對派的主張。有81名（不是史文所說的「61名」）中共老幹部在那上面簽名。陳其昌是其中之一。結果，他與其他所有的「陳獨秀派」一起給中央開除了。我在一年前早已是反對派，此時因拒絕放棄托派主張，也被逐於中央。當時上海有四個反對派組織，其昌與我不屬一派。在四派協商統一時期，我和他才再次見面。

記得那是1930年冬天，其昌特地來找我，約我與陳獨秀會面。同時他告訴我他的家眷也在上海，約我去他家吃飯，會會他的家人，敘敘別後種種。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在他家作客；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和他作「社交式」的往來。為了工作，其昌一人在租界裏賃了一個亭子間，我後來和他的全部接觸，都是在那個亭子間進行的。他把家人安頓在閘北郊外，每星期大概回去看他們一、二次。他一家數口（那時他好像已有一個或兩個孩子。其昌後來有二子一女，史文說「一家三口」，不確。），住的是一間普通農舍。室內的佈置十

分簡陋，收拾得卻非常潔淨。一望而知，他們的生活是極其清苦的，但是你看不到一點淒涼景象。短暫相處，來客便感覺到主人家「貧而樂」的氣氛，讓你留着舒服。夫人與其昌同鄉同里，是傳統式的結合。她樸實誠摯，給我的印象極好。當時我和主人說了些什麼，事隔半個世紀有餘，幾乎完全記不起了。留在記憶中的，只有二事比較清晰：一、款待客人的菜肴中有南瓜韭菜；二、他說他在1927年秋天離開北京，在山東工作了一個時期，便來到上海，一直在江蘇省委系統下面做工人運動。

此飯之後數月，1931年5月初，中國的托派組織統一了，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史文稱之為「中國共產主義同盟」，不確。這個名稱是1935年才採用的）。本來，其昌與我可以一起做事了。可是非常不幸，新組織產生後不到一個月，我和另一些領導同志便讓國民黨捕去，一去四年。直到1934年冬天出獄回滬，我才能和這位老友再度合作。此後七年，其昌和我是密切地工作在一起的。

陳其昌在這個期間，乃至他在中國托派的整個運動中，究竟前後做了些什麼工作，擔任過什麼職位，我不想在此縷舉，也不值得細說。真正的革命者決不計較或着眼於世俗的權位——不管在地下的小組織內或掌權的大政黨內——其昌正是抱有這樣的權位觀的。我若歷數其「官職」「官銜」以顯其重要，對老友將是莫大侮辱。

這裏，我只想從我的《回憶錄》中摘取如下的幾句話：

在1931年至1937年蔣介石白色恐怖最猖狂的時期，中國托派的組織一次接着一次地被破壞，而在每次破壞後作慘澹的重建工作，使組織得有一線存續者，總是我們這位「大哥」。

這樣的工作輕而易舉、微不足道嗎？當然不是。恰恰相反，對於一個奮鬥於極端反動政權之下，從事秘密工作的革命黨來說，這是最為難能可貴的。要做好這項工作，非具有幾項最崇高的品質不可。而陳其昌乃是充分具有這個品質的少數人之一。

四、

陳其昌在大學裏學的是教育，後來改攻經濟。對於古典經濟學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他都有心得的。他不搞文學，文章卻寫得很好。非常尊敬學有專長的學者，也很崇拜妙筆生花的作家（從來特別敬佩魯迅）；但他自己卻從不以什麼家自命或自許。他短短一生的最多時間與最大精力，都傾注在革命組織的建立、鞏固與發展上了。他最討厭那些徒事空談的革命者。實幹的他的一切。陳獨秀非常賞識這一方面的陳其昌，曾經一再稱讚他能積極工作，能在群眾中活動，所以能抓住現實，能不為教條所囿。（見陳獨秀 1937 年 11 月 21 日致上海幾位朋友的信）

簡括地說，陳其昌是列寧所提倡的「職業革命家」的一個典型人物。這種人物曾經造成了俄國的十月革命。也是這種人物促成了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中國托派的革命運動雖然以失敗告終，但陳其昌這個典型人物卻絕不因此而減損其意義或光彩。

當一個革命大黨的「職業家」比較容易。因為黨有充足經費，可以保證那些以全部時間與全部精力從事革命的黨員們的生活，至少可以保證他們最低限度的生活。弱小的革命政黨有如中國托派者，其情形卻大不相同，它既無國際援助，又無大筆黨費。「職業家」們不但無

薪資可領，還得設法籌措組織之所需。他們得尋找一些「兼職」，得從事一點「副業」。藉以維持本人及其家人的生活，同時提供組織活動的經費。在政治反動與經濟衰落的环境裏，革命者能夠找到怎樣的「兼職」與「副業」呢？除了賣文之外，幾乎別無門路。

確如史明君的文章所說，陳其昌是「以賣文為生」的。不過他經常投稿的雜誌我記得不叫《學生界》，而叫《青年界》。他大概每個月用「陳清晨」筆名給這本雜誌寫一二篇文章，固定地可以拿 20 塊錢（這個數目，在當時大約略低於一個小學教師的收入）。這關係記得是張友松替他跟北新書局接上的。當時，北大出身的各同學已有不少當了南京政府的高官，但其昌跟他們絕無來往。張友松似乎也是北大出來的，又是與李大釗同遇難的張挹蘭之弟。張友松翻譯過托洛次基的《英國往何處去？》，但他不是托派成員，根本不曾加入過共產黨，與其昌有深厚的私交。

此外，其昌還給一份小報（記得是《社會日報》）寫一點經濟分析的文章，每月所得也是 20 元左右。一家五口，就是靠這麼一點收入來維持的。不僅藉此養活自己和妻兒，在某些時候，他還要幫助比他更無辦法的朋友。譬如，對於王實味，他就經常幫些小忙。當王實味和劉瑩生下第二個女孩時，一錢莫名，他曾經將全家所有的「貴重衣物」送進當舖，把錢拿去讓這對老同學渡過難關。

這一方面的陳其昌，我曾經在我的《回憶錄》中做過如下的「總結」：

吃苦安貧，從不懂圖生活的享受；疾惡如仇；對一切被踐踏與被欺侮者懷有無上悲憫；最不喜歡架子；他不但沒有領導分子

的裝腔作勢，而且永遠把自己安置在危險的最前列；他身上混和着新式的同志愛和舊式的義氣；對一般同志的安全和生活照顧得無微不至；所以他是以「大哥」這個綽號聞名的。

陳其昌的另一特點，亦即他所以能成一個出色的「職業革命家」，能先後在中共和中托內成爲一個出色的秘密工作組織家的另一品格，乃是他的機警、大膽與堅貞。為了省力起見，我這裏只想再從我的舊作裏摘引幾句有關的話：

他疾惡如仇；對一切被踐踏與被欺侮者懷有無上悲憫；最不喜歡架子；他不但沒有領導分子的裝腔作勢，而且永遠把自己安置在危險的最前列；……其昌在秘密工作中非常機警，他的警惕性是永不鬆弛的。所以不止一次可能發生的組織大破壞，曾因他的事前覺察而勇敢地加以挽救了的。最著名的一次便是他在寒君家的門口被特務追逐，他用盡方法，使自己既脫於難而又把寒君救了出來。

「職業革命家」成千上萬。機警而大膽的大有人在，但又具堅貞者卻比較的少見。不少冒險家型的「職業革命家」們，往往機警大膽有餘，思想與認識的堅定不足。一旦出事，落入虎穴，這些人極易改變「職業」，由「獵虎人」變作「虎狼」。陳其昌則是三者俱備，所以他的命運亦自不同。

國民黨統治時代，它的特務幾乎把中國托派的重要分子全部捉去。陳其昌長期間成爲他們的緝捕對象，但他始終不曾落網。這，一部分固然由於幸運，而不小部分卻由於他的機警與勇敢。在日軍鐵蹄下，他積極抗日，其工作絕不限於史文所論的「加入上海著作者協

會」，他不但利用筆桿，而且更見之於行動。但文字上，他給組織的地下刊物——《鬥爭》——按期寫作有關日偽經濟困難的文章。給亞東圖書館編寫小冊子，還曾參加我們的「合法」刊物《動向》的編輯。在實際活動方面，他不但在學生界，而且在上海的部分工人中（主要的法租界的電車工人與紡織工人中），進行了不懈的工作。

如此工作，不管他如何機警，如何勇敢，遲早總會讓敵人覺察、追緝而逮住的。真所謂「上得山多終遇虎」，其昌終於在 1942 年春天（確切日期我現在已想不起來）給日本憲兵捉去了。這是他的第一次被捕，也是最後一次被捕。在獄中受盡酷刑，他堅不泄露組織秘密，終為日帝殺害，享年 42 歲。

其昌那種堅貞性格，未經試煉就早已為同志和朋友們所賞識。他一經被捕，大家便都覺得他無生還之望。因為大家都深信他決不會臨危變志，決不肯賣友求生的。當時有一件事，我記得非常清楚，值得在此一提。其昌曾經給亞東圖書館寫過三本書：(1)《真理在前進中》（署名江維亮）；(2)《人口西遷與中國之前途》；(3)《海南島與太平洋》（以上二書均署名陳清晨），與亞東主人汪孟鄒先生有相當深的交情，陳出事後，有些人便要汪老先生做點準備，以便可以應付日本憲兵的到來，汪老先生卻處之坦然，說：「我相信大哥一定不會連累別人，決無問題，決無問題。」

事實證明，正是如此。

附錄一

1936年6月3日陳其昌給魯迅的信

魯迅先生：

1927年革命失敗後，中國康繆尼斯脫不採取退兵政策以預備再起，而乃轉向軍事投機。他們放棄了城市工作，命令黨員在革命退潮後到處暴動，想在農民基礎上製造 Reds 以打平天下。七八年來，幾十萬勇敢有為的青年，被這種政策所犧牲掉，使現在民族運動高漲之時，城市民眾失掉革命的領袖，並把下次革命推遠到難期的將來。

現在 Reds 打天下的運動失敗了。中國康繆尼斯脫又盲目地接受了莫斯科官僚的命令，轉向所謂「新政策」。他們一反過去的行為，放棄階級的立場，改換面目，發宣言，派代表交涉，要求與官僚，政客，軍閥，甚而與民眾的劊子手「聯合戰線」。藏匿了自己的旗幟，模糊了民眾的認識，使民眾認為官僚，政客，劊子手，都是民族革命者，都能抗日，其結果必然是把革命民眾送交劊子手們，使再遭一次屠殺。史大林黨的這種無恥背叛行為，使中國革命者都感到羞恥。

現在上海的一般自由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上層分子無不歡迎史大林黨的這「新政策」。這是無足怪的。莫斯科的傳統威信，中國 Reds 的流血史蹟與現存力量——還有比這更值得利用的東西嗎？可是史大林黨的「新政策」愈受歡迎，中國革命便愈遭毒害。

我們這個團體，自1930年後，在百般困苦的環境中，為我們的主張作不懈的鬥爭。大革命失敗後我們即反對史大林派的盲動政策，而提出「革命的民主鬥爭」的道路。我們認為大革命既然失敗了，一切

只有再從頭做起。我們不斷地團結革命幹部，研究革命理論，接受失敗的教訓，教育革命工人，期望在這反革命的艱苦時期，為下次革命打下堅固的基礎。幾年來的各種事變證明我們的政治路線與工作方法是正確的。我們反對史大林黨的機會主義，盲動主義的政策與官僚黨制，現在我們又堅決打擊這叛背的「新政策」。但恰因為此，我們現在受到各投機分子與黨官僚們的嫉視。這是幸呢，還是不幸？

先生的學識文章與品格，是我十餘年來所景仰的，在許多有思想的人都沉溺到個人主義的坑中時，先生獨能本自己的見解奮鬥不息！我們的政治意見，如能得到先生的批評，私心將引為光榮。現在送上近期刊物數份，敬乞收閱。如蒙賜覆，請留存 x 處，三日之內當來領取。順頌

健康！

陳仲山 6 月 3 日

附錄二

1936年6月9日馮雪峰為魯迅代筆答覆陳其昌的信

陳先生：

先生的來信及惠寄的《鬥爭》《火花》等刊物，我都收到了。總括先生來信的意思，大概有兩點，一是罵史大林先生們是官僚，再一是斥毛澤東先生們的「各派聯合一致抗日」的主張為出賣革命。

這很使我「糊塗」起來了，因為史大林先生們的蘇維埃俄羅斯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在世界上的任何方面的成功，不就說明了托洛次基先生的被逐，飄泊，潦倒，以致「不得不」用敵人金錢的晚景的可憐麼？現在的流浪，當與革命前西伯利亞的當年風味不同，因為那時怕連送一片麪包的人也沒有；但心境又當不同，這卻因了現在蘇聯的成功。事實勝於雄辯，竟不料現在就來了如此無情面的諷刺的。其次，你們的「理論」確比毛澤東先生們高超得多，豈但得多，簡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無奈這高超又恰恰為日本侵略者所歡迎，則這高超仍不免要從天上掉下來，掉到地上最不乾淨的地方去。因為你們高超的理論為日本所歡迎，我看了你們印出的很整齊的刊物，就不禁為你們捏一把汗，在大眾面前，倘若有人造一個攻擊你們的謠，說日本人出錢叫你們辦報，你們能夠洗刷得很清楚麼？這決不是因為從前你們中曾有人跟着別人罵過我拿盧布，現在就來這一手以報復。不是的，我還不至於這樣下流，因為我不相信你們會下作到拿日本人錢來出報攻擊毛澤東先生們的一致抗日論。你們決不會的。我只要敬告你們一聲，你們的高超的理論，將不受中國大眾

所歡迎，你們的所為有背於中國人現在為人的道德。我要對你們講的話，就僅僅這一點。

最後，我倒感到一點不舒服，就是你們忽然寄信寄書給我，不是沒有原因的。那就因為我的某幾個「戰友」曾指我是什麼什麼的原故。但我，即使怎樣不行，自覺和你們總是相離很遠的罷。那切切實實，足踏在地上，為着現在中國人的生存而流血奮鬥者，我得引為同志，是自以為光榮的。要請你原諒，因為三日之期已過，你未必會再到那裏去取，這信就公開作答了。即頌大安。

魯迅。6月9日

(這信由先生口授，o.v. 筆寫。)

附錄三

1936年7月4日陳其昌給魯迅的信

魯迅先生：

看到了你公開答覆我的信。我很懷疑，你是否看了一下我寄你的各種刊物的內容。

我得向你說明，我寄信寄書給你的本意，是因為看見了你對「聯合戰線」問題的意見，想供給你一些研究這問題的材料，所以我的信中所說到的只是這一點，並非因誰曾指你是什麼什麼，寄信書的是我個人，並非你回信中指名「誣衊」的「中國的托洛次基派」。其次，革命是大事，明白的有責任心的人都應該虛心的坦白的研究革命的戰術與戰略。我平素認為你無論如何總還是明白的有「道德」的人，所以我寫信向你談政治問題，但不幸你的覆信的全篇避開政治問題不談，而卻因為從前誰罵過你拿盧布的乘機在我，甚而不止在我的身上發泄積恨。誰罵過你，我不知道，在我看來，如果有這事，如果是簡單的罵，這種罵是無意識的，因為倘若是為了革命，則世界工人階級首先勝利的國家應該供給物質的幫助，而我國革命者也應該接受這種幫助。但這終究是從前的個人小事，在民族危亡之眼前，有「道德」的人不應拋棄這小嫌而看遠些嗎？？然竟不然！你拿辱罵與誣衊代替了

編按：本文據《魯迅研究資料》第4輯，1980年，天津人民出版社版，169-175頁。

政治問題的討論，而這恰是史大林黨官僚們的一脈相傳的法寶。你的回信的態度是「中國現代文豪」之思想與行為的最最無情的諷刺！

你似乎深惡痛恨於中國布爾雪維克列寧派對史大林黨的「聯合戰線」政策的攻擊。你對這一點儘量展佈了你那辱罵誣衊與恐嚇的本領。我希望一切明白的人都了解，布列派之所以反對史大林的聯合政策，絕不是對個人，而是由於忠實於中國工人階級，不忍再見一次「四一二」的屠殺。你可詳細知道上次中國大革命是在怎樣與誰的政策之下失敗的？1933年德國無產階級之不戰而潰與1934年奧國革命運動之被壓碎是什麼政策造成的？世界革命的連續失敗把人類的痛苦延長了幾多年？你應該從這裏來觀察問題，來認識革命者的鬥爭之出於不得已，而非什麼「道德」不「道德」了。

中國史大林黨遵奉第三國際的命令，認為一切階級可在日本壓迫之下聯合反抗，因而他們打通電、派代表，到寧×、粵×、香港向劊子手軍閥官僚們去接洽，並高喊不分階級不分黨派的聯合戰線。抗日是目前中國民族的生死問題，如果各階級各黨派真能聯合起來挽救了民族的危亡，那自然是當歡迎的。然無奈這是一種幻想，事實上，尤其在目前的中國辦不到，即使變相的辦到，其中還含有最可怖的前途。中國的主要階級，如各派資產階級與工農勞動階級，後者與前者是死敵，對於抗日問題，則根本說來，這兩階級是背道而馳的——資產階級以不抗日為生，而工農勞動階級以抗日為生。詳言之，中國資產階級的經濟基礎是與帝國主義在華勢力相依而存的，所以根本上它不會抗日。在事變發展中，尤其在受到工農大眾的威脅時，它只有降日。它與帝國主義固然有利益的衝突，但它們之間的這種衝突比之它們與工農大眾的利益衝突，小得不算什麼。所以在工農未起來時，資產階

級在口頭上甚而在行動上會表示抗日，但當工農起來而威脅到它的生存線時，它與帝國主義間的衝突將降到近於零，它們會聯合起來對工農來一次大屠殺。這就是我們親身經過的「四一二」。這是馬克思主義者對中國各階級關係的根本認識。而且中國目前的階級關係又與別國別時期的不同；現在的統治政權就是在「四一二」的屠殺上建立起來的，因而它更害怕民眾起來，更依賴帝國主義；寧坐看華北喪失而不敢放鬆它對「紅軍」對抗日民眾的壓迫。革命政黨的戰術必須建在這種對階級關係的根本認識上，才能應付萬化千變的形勢。本此，中國布列派指出了「必須打倒資產階級國×民×黨×才能達到抗日勝利」之大道。

那麼是否可以就因此而認為資產階級各派絕無抗日作用了呢？只有蠢才才會這樣想。資產階級可以因時因勢而常向「左」搖擺；在它們真有抗日行動時，無產政黨應該和它們共同行動，但即在這樣作時，我們在戰略上決不應該離開我們的基本認識，在策略上也不能離開太遠。我們必須設立堡壘以預防「四一二」之猝然到來；這即是說，無產政黨必須時刻揭明自己的旗幟不使與資產階級的混淆，時刻指示給工人資產階級的動搖性與叛變性，使他們時刻提防同路人，時時團結並擴大本身的力量。這樣，倉猝遇到「四一二」屠殺時他們才不至於措手不及，致認不清敵人和自己人。這就是中國布爾雪維克列寧派的抗日運動的道路之大略。而中國史大林黨的聯合戰爭政策恰和他相反：他們認為在日本壓迫下國內階級衝突會消滅；其實則不但不會消滅，反而更尖銳；他們離開階級的立場，放棄自己的旗幟而使工農大眾相信資產階級是革命的，如使相信北伐前的蔣×介×石×與汪×精×衛×是革命的一樣，他們完全重走使上次革命的「四個階級的聯盟」的道路。其結果必使工農再遭一次「四一二」的屠殺，而抗日運動也

不能勝利。對於這樣危險的毒害工農亦毒害民族的聯合政策，革命者怎樣坐視而不反對呢？有「道德」的人怎能盲目瞎叫而不研究呢？

魯迅先生，你看，這兩條中國民族抗日的路線：布列派的是腳踏實地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分析的結論，是本於階級對立的實際；史大林黨的不分階級不分黨派的聯合主張，是根據於幻想，絕不能實現（或在工農被屠殺之結果下能變象的實現）——這兩條路線到底哪個是在天上？那個是在地下？假如布列派的主張打倒帝國主義代理人國×民×黨×來進行抗日是日本人所歡迎的，那麼，你們派代表向南×京×的帝國主義代理人即漢奸交涉合作，不更受日本人歡迎嗎？

你躲躲藏藏的造謠，說日本人拿錢叫我們辦報等等。真虧你會誣衊得這樣曲折周到！布列派的《鬥爭》與《火花》是同志們節衣縮食並悶在亭子間閣樓上揮汗勞動的產品，正因財力不給，《鬥爭》已從周刊變為半月刊，聽說又快要降為月刊了。假如布列派能從日本人拿錢辦報，那它一定要像你們那樣，公開的一本本一種種的出書出雜誌，並公開擺在四馬路出賣，即不然，也仍可以交給日本人書店在玻璃窗內張廣告出賣，而決不須這樣自印自散了。

你說「你們的行動有背於中國人現在為人的道德」，這確有點使我「糊塗」起來。中國人中有階級、各階級中有漢奸，有小資產階級勢利之徒，有被壓迫的工農大眾，你所謂中國人的道德，是殷汝耕的道德？是國×民×黨×的道德？是魯迅的道德？還是這幾種人混合的即所謂不分階級不分黨派的道德？如果你指的是後者，那就要請你再來一篇〈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的神話給我說明它到底是一種怎樣奇怪的東西；如果你指的是資產階級……的道德，那大概是關於「新生活」「勞資合作」的吧？這是革命者時刻要推翻的；如果是勞苦民眾

的道德，那我們革命者始終是切切實實為這階級的利益而鬥爭的，此外，我們不知什麼叫道德。布列派的理論「將不受中國大眾所歡迎」嗎？你這裏所謂大眾，不知是中國哪個階級的大眾。如果是國×民×黨×的大眾，那當然不歡迎；如果是魯迅手下的大眾，那或許不歡迎，但如果是工農勞動大眾，那他們因遭受屠殺遭受壓迫的記憶比你的要親切而新鮮得多，是天然的會深惡痛絕於階級混合的背叛政策而歡迎布列派的政策。

最後，說一說你對蘇聯那種讚美的態度。工人國家受到中國小資產階級之讚美，以保護蘇聯為責任的我們是很歡喜的，但革命者向來是眼看實際口說實話的，決不為別人對蘇聯的空讚美所眩惑。你稱讚「史大林先生們的蘇聯在世界上任何方面的成功」，我不知你指的是哪幾方面。事實表示，蘇聯十餘年來的成功是經濟建設，此外，無論在國內國外都着着失敗。中國上次大革命失敗後幾十萬青年之被殘酷的監禁與槍殺，這是史大林先生的蘇聯的成功？放棄了世界革命的領導把頭縮進一國社會主義的殼子裏而與帝國主義聯盟，這是史大林先生的蘇聯的成功？各國共產黨已無不拿愛國主義代替共產主義，這是史大林先生的成功？魯迅先生對這些世界大事何以太茫茫然！假如十餘年來蘇聯是處在列寧或托洛斯基的領導下，那它在國內的成功要比現在高幾倍，而中國與德國革命的勝利或早已把世界資本主義摧毀大半了。假如這樣，現在中國小資產階級勢利之徒必然只會讚頌，絕不會誣衊托洛次基同志了。說到蘇聯工業建設的成功，我介紹你知道這幾點史實：1927年聯共左派反對派最先提出了工業建設計劃，當時被史大林斥作「超工業計劃」不加採行；同年第一個年計劃實行後，行不通，於是1928年放棄了原來計劃而採用了反對派的計劃數字，這才有了後來的成就；然當反對派的計劃被採用而獲得了部分成功時，創造

計劃與為這計劃的實行而奮鬥者，卻被史大林流放到西伯利亞或驅逐到國外。再，你知道蘇聯五年計劃成功的基礎是什麼嗎？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生產國有。而創造這種國有制度的，是10月當時的革命者。但這些革命者凡生存的全遭史大林的迫害。舉例說，那時的七個政治局委員中除列寧已死外，有五個都被史大林流放監禁驅逐或加以別處分了，剩下的一個就是史大林。知道這些史實，你就知道五年計劃之成功之中滲透着被放逐者的血和汗，你就懂得只有小資產階級勢利之徒才會認為這成功，使托洛次基的被逐晚境成為「可憐的」對比；這樣，你或者就不會盲目的跟着別人，對畢生獻身革命的偉大的老革命托洛斯基那樣的誣讒了吧。魯迅先生，告訴你，像你那樣的誣讒辱罵，國際布列派聽得多，見得多，受得多了。什麼勾結帝國主義圖謀傾覆蘇聯，什麼陰謀暗殺誰誰，等等。史大林官僚及其徒子徒孫們，政治上破了產，不敢面對政治的攻戰，而卻在私人生活造謠誣讒，而這武器現在被魯迅先生拾了起來。托洛次基在歐洲貧病交加，靠版稅維持生活，因出版他的著作的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書店，造謠者就指着說，他「用敵人的金錢」。魯迅先生，你拿版稅稿費的地方，是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假如有人向我說，魯迅先生躲在上海租界裏，借日本人的庇護，並拿日本人的雜誌的稿費來宣傳民族文學，是受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指使，那你可放心，我必定要為你痛罵這個造謠者的不「道德」與無恥！

你不得到我的同意就把我的信與你的答覆故意以那樣的標題公開發表，並且還不僅發表在一個雜誌上。而你那公開回信的內容，又不談我向你誠懇提出的政治問題，而只是由我而誣辱到中國布爾雪維克列寧派，並誣讒到托洛次基，你是講「道德」的人，你既然這樣作了，我就不得不再誠懇的請求你把我這封信公佈在曾登過你的回信的雜誌

上。標題用《托洛次基一分子對魯迅先生的答覆》，這裏，我在熱烈的企待着魯迅先生的雅量，革命者向來不回避堂堂正正的論戰，你如願意再答，就請擺開明顯的陣勢，不要再躲躲藏藏的造謠誣衊。你的話在中國人中是有吸引力的，如出言不慎，那必將貽害青年，必損傷你的盛名，並有害革命。

順祝
進步！

陳仲山
(1936年) 7月4日

信中旁邊畫有 xx 號的名詞，發表時請用 xx 號代替。仲山又及

附錄四

從中共的歷史發展證驗托派致魯迅的信

背景：四個爭論問題

魯迅致托派的信，向來為反托人士所引用，但從來沒有人在歷史的光照之下，檢討這個托派陳仲山給魯迅的信，是否言之成理，是否符合客觀的歷史發展，現在距離當時已有三十八年，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已有二十五年，應該更有可能作一次深入的研究，證明陳仲山所說的是錯誤還是正確。為要理解托派陳仲山致魯迅信的時代背景，我們首先必須從歷史的回顧裏提一下當時蘇聯黨內對中國革命的爭論，爭論主要圍繞下列四個問題進行：

一、無產階級政黨底絕對獨立問題 這爭論開始於 1923 年，史大林一系贊成加入國民黨，認為國民黨是群眾組織，是各階級底聯盟，共產黨應該加入進去，以便爭取群眾，爭取領導，與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共同進行國民革命。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在史大林一系領導之下，決定與國民黨合作，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托洛次基認為國民黨不是什麼群眾組織，而是一個資產階級政黨，共產黨在任何條件之下都不可加入資產階級政黨，更不可服從其紀律，信仰其主義。為了爭取群眾，為要保證對全體革命群眾的領導權，更為要保證革命勝利及有利於向社會主義的發展，共產黨必須保持組織上與思想上的絕對獨立。

托洛次基的反對沒有用，1925 年他提議中共退出國民黨，遭否決；1926 年 3 月 20 日因中山艦案蔣介石發動一次政變，他再提議退

出，仍被否決。1927年4月12日及7月15日國民黨兩次清共後，已沒有國民黨可供加入了，但南昌暴動仍在青天白日旗下舉行，直到廣州暴動，這面旗幟才被人撕破了，改舉紅旗。

二、帝國主義與資產階級問題 這問題是以如下方式提出來的，即：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壓迫，是否使中國的階級鬥爭緩和了，還是加緊了？史大林一系認為這壓迫可使中國內部的階級鬥爭減少到最小限度，所以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工人及農民可以結成四個階級聯盟，採取國民黨形式。

托洛次基猛烈地反對這個立場，他認為以為帝國主義機械似地從外面焊合了中國底一切階級，那是大錯特錯。……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鬥爭，不會減弱，但會增強諸階級底政治分化。帝國主義是中圓內部關係中一個很強的力量，這個力量底主要來源，……是外國資本與本國資產階級間的經濟與政治的聯繫。托洛次基認為民族資產階級與買辦資產階級並無鴻溝之隔，這兩部分資產階級之間，比資產階級與工農之間，要無比地更接近些，資產階級之參加民族戰學，有如內部的制動機，它們以繼長增高的仇恨看待工農群眾，愈來愈準備和帝國主義者妥協。所以他特別提出列寧的話作為警告：工人們必須叫民眾對資產階級政客底欺騙睜開眼睛，必須教他們不要信任空話，而只要信任他們自己的力量，他們自己的組織，他們自己的團結，他們自己的武裝。

（中國資產階級一連串屠殺工農的事實，打破了史大林四個階級聯盟的神話，但信奉史大林主義的毛澤東並未從這裏得出教訓，萬隆會議的五項原則，驅使印尼無產階級重受資產階級的屠殺；他們更進一步以

武器幫助巴基斯坦的資產階級地主軍人的專制政權，去屠殺東巴的工農群眾，第三世界的理論，就是殖民地四個階級聯盟理論的翻版。）

三、小資產階級與農民問題 這就是：無產階級政黨對於中國社會中數量最大成分最雜的中間階層，應該採取什麼態度？史大林一系以階級合作政策去迎合小資產階級上層領袖，去聯絡鄉村中的上層分子，特別是拉攏一些知識分子。他們勾搭汪精衛、鄧演達、宋慶齡，代替了爭取中間層的革命責任；托洛次基認為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指的是被壓迫階級底幾千萬或幾萬屬城市與鄉村的廣大貧民。這個聯盟不能通過階級合作，必須工人階級領導城市與鄉村的廣大貧民，從事最徹底的階級鬥爭與土地革命。

四、組織蘇維埃問題 當 1926 年北伐軍進入湖南，引起了無疑的革命進潮之時，托洛次基提議在中國開始組織蘇維埃，藉以匯合蜂擁而分散的諸股革命力量，藉以統一下層的鬥爭群眾，實現由無產階級領導的真正反帝國主義與反封建的統一戰線，由此防止軍事領袖，民族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領袖們底叛變。史大林們竭力反對，理由為：(1) 蘇維埃將破壞對資產階級的聯合戰線；(2) 將予帝國主義者及反動派反對革命的口實；(3) 蘇維埃是暴動機關，只適用於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時期；(4) 中國國民黨已經是實際上的蘇維埃。

但是，革命失敗之後，在退兵時的一戰的廣州暴動中，卻組織了蘇維埃，而且以後一直進行蘇維埃政府的組織，直到 1937 年再次投降國民黨為止。

明白了蘇聯黨內的爭論之後，我們才可以把陳仲山的信與毛選中的文章對照，主要是 1945 年 4 月 20 日中共《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

議》，這決議在 1969 年版的毛選中已被刪除。【朱正按 1991 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二版又將這決議恢復了。】

瞿秋白的盲動主義

陳仲山的信寫於 1936 年 6 月 3 日，信的第一段如下：

1927 年革命失敗後，中國康繆尼斯脫不採取退兵政策以預備再起，而乃轉向軍事投機。他們放棄了城市工作，命令黨員在革命退潮後到處暴動，想在農民基礎上製造 Reds 以打平天下。七八年來，幾十萬勇敢有為的青年，被這種政策所犧牲掉，使現在民族運動高漲之時，城市民眾失掉革命的領袖，並把下次革命推遠到難期的將來。

這段文字包括的時間，起自 1927 年 8 月，迄 1935 年 1 月遵義會議，其間又可分為瞿秋白領導的盲動主義時期，立三路線時期，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時期。我們且把當初的歷史大事簡列如下：

1927 年 4 月 12 日，蔣介石在上海清共；

7 月 15 日，武漢政府汪精衛正式清共；

8 月 1 日，南昌暴動，葉賀南征，旋即失敗 8 月 7 日，中共在共產國際領導之下，在武漢召開會議，瞿秋白上台。

可是這個由國際決定的八七會議領導人瞿秋白，一開頭就犯了盲動主義的錯誤。

關於瞿秋白領導的盲動主義政策，中共在《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有如下論斷：

……「八七會議」在反對右傾錯誤的時候，卻為「左」傾錯誤開闢了道路。它在政治上不認識當時應當根據各地不同情況，組織正確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卻，藉以有計劃地保存革命陣地和收集革命力量，反而容許了和助長了冒險主義和命令主義（特別是強迫工人罷工）的傾向。它在組織上開始了宗派主義的過火的黨內鬥爭，過分地或不適當地強調了領導幹部的單純的工人成分的意義，並造成了黨內相當嚴重的極端民主化狀態。這種「左」傾情緒在「八七會議」後繼續生長，到了1927年11月黨中央的擴大會議，就形成為「左」傾的盲動主義（即冒險主義）路線，並使「左」傾路線第一次在黨中央的領導機關內取得了統治地位。這時的盲動主義者認為：中國革命的性質是所謂「不斷革命」（混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中國革命的形勢是所謂「不斷高漲」（否認1927年革命的失敗），因而它仍然不但不去組織有秩序的退卻，反而不顧敵人的強大和革命失敗後的群眾情況，命令少數黨員和少數群眾在全國組織毫無勝利希望的地方起義。

瞿秋白的盲動主義路線，據官式記載，1928年初已經停止，到4月就在全國範圍內結束了，那麼何以有立三路線和王明路線不斷繼起呢？這是中共及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設下的陷阱，使他們一個接着一個跌下去的。

中共六次代表大會後的立三路線

1928年7月，中共在莫斯科召開第六次代表大會，這次大會是由布哈林指導的，決議案斷定中國當時的局勢是在兩個革命高潮之間，它批評了右的機會主義和左的盲動主義，但並不指出兩個高潮之間應該提出什麼策略，以從事革命鬥爭。

第三國際的第六次代表大會也於同時舉行，通過了布哈林起草的綱領，此時史大林與布哈林的鬥爭已顯蹟象，史大林提出的第三時期理論，決定了全世界共產黨未來的路線，影響到中國的就是立三路線。

第三時期理論宣佈資本主義危機的極端尖銳化，在全世界範圍內，革命正走向高潮。中國共產黨在盲動主義之後，正徬徨無所適從，史大林既已排斥了托洛次基提出的國民會議口號及民主革命政綱，六大又為事實所迫，不得不將蘇維埃改為宣傳口號，從議事日程上取消了武裝暴動，於是遂使中共陷於進退失據境地。正在此時，聯共十六次代表大會於1929年4月開會，宣佈中國革命的「高潮」快要到來，就此鼓勵比瞿秋白時代更大規模的盲動，造成了更悲慘的後果。

「高潮」二字，引起中共當時領導人不少迷茫，要到如何程度才算是「高潮」，這是猜謎式的問題。據一位在上海參加領導工作的托派王凡西後來回憶《雙山回憶》說：

在最初，中共多數對這個指示傾向於較消極的接受，因為剛不久才讓「滾牛奶燙壞了嘴」，如果將新高潮的快要到來作了左的解釋，又怕要碰破頭顱，周恩來和我們研究這個文件時候，就顯出非常謹慎，甚至有幾分為難。我們曾反反覆覆地研究了「高潮」二字的意義，查究了它的原文。這二字本是俄文的翻譯，含有「高潮」和「高漲」兩層意思，它有點等於英文中的Rise，所以周恩來最後說，中譯文應確定為「高漲」，他怕的是「高潮」會被了解成「最高潮」，因而重犯盲動的錯誤。至於「快要」二字，據我的記憶，我們在討論中的解釋，也傾向於較遠前途的。不過過不多久，由於國際第三時期的作風愈演愈烈，史大林主義在全世界範圍內的激烈左轉，再加上中國好些同志的附和，尤其是江西方面

的意見，中央便日益從「左」的角度去解釋「高潮」與「快要」了。其結果便是所謂「立三路線」。

所謂江西方面的意見，就是毛澤東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的意見。據現在的說法，這篇文章是毛澤東給林彪的信，批評他的悲觀思想的，我們引用他對「高潮」的解釋如下：

在對於時局的估量和伴隨而來的我們的行動問題上，我們黨內有一部分同志還缺少正確的認識。他們雖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來，卻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來的可能。……

所謂革命高潮快要到來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釋，這點是許多同志的共同的問題。馬克思主義者不是算命先生，未來的發展和變化，只應該也只能說出個大的方向，不應該也不可能機械地規定時日。但我所說的中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決不是如有些人所謂「有到來之可能」那樣完全沒有行動意義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種空的東西。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根據毛澤東的說法，快要到來的「高潮」，已是出現眼前的事，10月懷胎快要分娩了，他後來雖然批評立三路線，其實他是立三路線的擁護者、促成者，他應該分擔它的責任，他寫這篇文章時，已在江西成立蘇維埃政府，脫離了井岡山時代的侷促局面，所以從歷史上說來，像《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說，毛澤東同志在這個時期內，不但在實踐上發展了第六次大會路線的正確方面，並正確地解決了許多為這次大會所不曾解決或不曾正確地解決的問題，這實在是一種神話。可是從歷史問題決議案看來，毛澤東與李立三之間是有分歧的，

雖然7月27日紅軍的進攻長沙，佔領三日，仍是立三路線的最高表現。決議說：

在1929年下半年至1930年上半年間，還在黨記憶體在着的若干「左」傾思想和「左」傾政策，又有了某些發展。……黨中央政治局由李立三同志領導，在6月11日通過了「左」傾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決議案，使「左」傾路線第二次統治了中央的領導機關。

關於毛澤東與李立三的分歧，只有單方面的敘述，說李立三污蔑毛澤東同志在長期中用主要力量去創造農村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以根據地來推動全國革命高潮的思想，是所謂「極端錯誤的」「農民意識的地方觀念與保守觀念」，……決議是1945年4月20日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接着開的是七次代表大會，毛澤東思想寫入黨綱，他已是黨內永遠不犯錯誤的「神」，李立三指摘他的話，我們只能從決議案的引用中見到，所以無從判斷他們二人之間的分歧點是否如毛澤東事後所說，因而也無從判斷他們之間的分歧點誰是誰非。

立三路線的可笑可悲，作者是身受的，那時上海的工作，便是佔領馬路，起初是大馬路，即是英租界的南京路，凡可調動的工人和一般同志，三三兩兩地散立在馬路兩側，時間一到，就散傳單，喊口號，演說，過不多時，人高馬大的大批巡捕坐車到來了，動手捉人，最積極最勇敢的人最先被捉，一個英國三道頭（這裏叫幫辦）用手又住了我的後頸，我跌倒在地，幾個工人同志從後襲擊他，等我爬起，他們已打到幾丈遠。年青女工最勇敢，那時都留着髮辮，被捕時給包打探（這裏叫雜差）一手拉住兩條辮子，兩手四個，捉進捕房去，大多判六個月監禁。示威次數愈多，參加人數愈少，地點也逐漸改變，

最後只在北四川路短短一段路面舉行，只要有一個人被捉，其他就悄然散去，那時接觸的省委區委時時換人，他們大都已關在監獄裏，所以領導也愈來愈薄弱，等於把革命者送給敵人去監禁。

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

立三路線的時期並不長，據決議所說，不到四個月時間，1930年9月黨的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及其後的中央，停止了立三路線。但這次會議對立三路線採取「調和」態度，如說它的錯誤只是「策略略上」的，不是路線上的，實際在國際的「第三時期」哲學下面，誰敢反對這個路線？所以接着來的，在1931年1月召開的四中全會，就以一種比立三路線更強烈的宗派主義立場……在新的形態下，繼續、恢復或發展立三路線和其他「左」傾思想「左」傾政策的新的政治綱領。就不是奇怪的事了。

陳紹禹（按：即王明）同志領導的「左」傾路線雖然也批評了立三路線的「左」傾錯誤和六屆三中全會的調和錯誤，但是它的特點，是它主要地反而批評了立三路線的「右」，……在革命形勢和黨的任務問題上，它繼續強調全國性的「革命高潮」和黨在全國範圍的「進攻路線」，認為所謂「直接革命形勢」很快地即將包括一個或幾個有中心城市在內的主要省份。它並從「左」的觀點污蔑中國當時還沒有「真正的」紅軍和工農兵代表會議政府，特別強調地宣稱當時黨內的主要危險是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實際工作中的機會主義」和「富農路線」。

決議案指出王明路線的錯誤，是在反對所謂目前黨內主要危險的右傾，和改造充實各級領導機關。這兩句話表示王明和其他共產黨領

導人的衝突，和王明依仗史大林的撐腰，在黨內篡奪黨權的事實，雖然毛澤東不敢正面指斥史大林。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始於1931年9月，止於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據劉少奇在八屆代表會議上說，在王明路線下城市工作損失百分之百，30萬紅軍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到達陝北時只剩下25,000人。

反革命局勢下的革命民主運動

以上的敘述，主要根據共產黨及毛澤東的文獻，但完全和托派陳仲山致魯迅信所述的符合，現在還應該談一個問題：在反革命局勢之下，革命政黨應該採取何種策略從事革命工作？

六大決議說中國局勢處在兩個高潮之間，那麼在新的浪潮未起之前，共產黨是否應該不斷暴動，不斷起義，以促成這新高潮的到來？毛澤東取得絕對勝利之後，作出歷史問題的決議，但除了批評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之外，對這點也是不置一詞的。因為他的主要工作，從井岡山起，到延安止，始終從事蘇維埃政權及紅軍的建立，直到1935年7月共產國際七次大會放棄第三時期理論，在全世界採取人民陣線路線後，才一轉走到「右」傾機會主義。

1927年革命形勢大好時，史大林拒絕成立蘇維埃，到革命失敗，他又拒絕革命的民主運動及國民會議口號。

托洛次基認為一個革命黨底最大任務是要曉得如何及時地認識一個革命局勢，與如何徹底地利用它。但同樣重要的，是要懂得，什麼時候這個局勢完結了，以及就政治觀點看，變成了非革命的局勢了。在反革命局勢下面組織蘇維埃，托洛次基比之為事後揮拳的勾當，史

大林與布哈林將一次革命底尾巴當作了另一次革命的頭，由此確定了暴動路線，希望依靠在由革命餘波所激起的農民身上，單憑軍事行動，造成大革命，並保證其勝利。結果，大量流了中國革命者底血，又延緩了第三次真正革命的到來。

我們知道了毛澤東對於「革命高潮」的解釋，如果以1946年算做中國新革命真正到來的時候，那麼他所謂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竟逾時十六年方始誕生。

托派陳仲山的信中，並沒有正面提出在「兩個高潮之間」，托派主張的「革命民主鬥爭」的策略，這策略之符合現實的政治形勢，在共產黨中，至少是毛澤東本人，確有同樣的認識，而且他正式向中共中央提出過。

他在〈井岡山的鬥爭〉一文中說：

我們完全同意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中國現時確實還是處在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階段。中國徹底的民權主義革命的綱領，包括對外推翻帝國主義，求得徹底的民族解放；對內肅清買辦階級的在城市的勢力，完成土地革命，消滅鄉村的封建關係，推翻軍閥政府。必定要經過這樣的民權主義革命，方能造成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真正基礎。

……要轉入到沸熱的全國高漲的革命中去，則包括城市小資產階級在內的政治的經濟的民權主義鬥爭的發動，是必經的道路。

中央要我們發佈一個包括小資產階級利益的政綱，我們則提議請中央制訂一個整個民權革命的政綱，包括工人利益、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使各地有所遵循。

不消說，毛澤東這個要求是落空的，民權革命的政綱早已為史大林所排斥（他指托洛次基提出民主口號為取消派）但四個階級聯盟的理論仍為史大林所保持，亦為毛澤東所信奉，所以托洛次基於1928年6月在阿拉木圖充軍地預言過：

中國資產階級在他的將來，還有不少的盤旋，傾向於左的政策。對於那些喜歡「民族聯合戰線」的人們將來還有許多引誘的機會。如果今天告訴中國共產黨員說：1924-27年，你們與資產階級的聯合完全是正確的，但現在他已經確定地跑到反革命營壘中去了，所以這聯合現在不適用了，這種說法，是於將來客觀環境發生轉變及資產階級必然左傾時，要第二次解除共產黨之武裝。

這預言在1935年7月25日的國際七次大會中應驗了。

共產國際的世界性的策略改變

七次大會提出了聯合戰線策略，以代替第三時期，基於這個改變，王明發表了八一宣言，毛澤東作了瓦窩堡報告，開始了第二次向資產階級投降的政策。

我們現在引用托派陳仲山致魯迅信的第二段如下：

現在 Reds 打天下的運動失敗了。中國康繆尼斯脫又盲目地接受了莫斯科官僚的命令，轉向所謂「新政策」。他們一反過去的行為，放棄階級的立場，改換面目，發宣言，派代表交涉，要求與官僚，政客，軍閥，甚而與民眾的劊子手「聯合戰線」。藏匿了自己的旗幟，模糊了民眾的認識，使民眾認為官僚，政客，劊子手，都是民族革命者，都能抗日，其結果必然是把革命民眾送交

劊子手們，使再遭一次屠殺。史大林黨的這種無恥背叛行為，使中國革命者都感到羞恥。

為要證實這段話，我們仍須從舊文獻中找出真憑實據，首先是王明在莫斯科假借中國蘇維埃政府和中國共產黨名義發表的八一宣言，它提出：

無論各黨各派間在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政見和利害的不同，無論各界同胞間有任何意見上或利益上的差異，無論各軍隊間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敵對行動，大家都應該有「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的真正覺悟，首先大家都應該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人力、物力、財力、武力等）去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特一再鄭重宣言：只要國民黨軍隊停止進攻蘇區行動，只要任何部隊實行對日抗戰，不管過去和現在他們與紅軍有任何舊仇宿怨，不管他們與紅軍之間在對內問題上有任何分歧，紅軍不僅立刻對之停止敵對行為，而且願意與之親密攜手，共同救國。

為此，宣言號召組織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和組織全中國的抗日聯軍。

毛澤東在延安立刻表示擁護八一宣言，他在 1935 年 12 月 27 日瓦窯堡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報告，對資產階級有如下的分析：

民族資產階級有沒有發生變化的可能性呢？我們認為是有這種可能性的。這是因為民族資產階級同地主階級、買辦階級不是同一的東西，他們之間是有分別的。民族資產階級沒有地主階級那樣多的封建性，沒有買辦階級那樣多的買辦性。民族資產階級

內部有同外國資本和本國土地關係較多的一部分人，這一部分人是民族資產階級的右翼……

可是什麼人代表了資產階級的「左」翼呢？據毛澤東的說法，那是蔡廷鍇等人領導的十九路軍，他們是代表着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小資產階級、鄉村的富農和小地主。真是奇妙的階級分析，可是後來全面抗戰時，毛澤東又轉而大喊蔣委員長萬歲！

毛澤東對於資產階級的說法，正是模糊了民眾的認識，不管他用正面反面的說法，總是美化了資產階級的本質，為了安慰資產階級起見，他又鄭重作出如下的保證：

人民共和國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時代並不廢除非帝國主義的、非封建主義的私有財產，並不沒收民族資產階級的工商業，而且還鼓勵這些工商業的發展。任何民族資本家，只要他不贊助帝國主義和中國賣國賊，我們就要保護他。在民主革命階段，勞資間的鬥爭是有限度的。人民共和國的勞動法保護工人的利益，卻並不反對民族資本家發財，並不反對民族工商業的發展……

毛澤東和史大林王明不同的地方，在乎遵義會議以後他在黨內所佔的地位，以及經過相當時期的休養生息之後，黨和軍隊業已恢復的自信，所以另一方面他對黨內反對聯合戰線的左翼分子說：

現時革命方面的特點，是有了經過鍛煉的共產黨，又有了經過鍛煉的紅軍。這是一件極關重要的事。如果現時還沒有經過鍛煉的共產黨和紅軍，那就將發生極大的困難。

共產黨人現在已經不是小孩子了，他們能夠善處自己，又能夠善處同盟者。日本帝國主義者和蔣介石能夠用縱橫捭闔的手

段來對付革命隊伍，共產黨也能夠用縱橫捭闔的手段對付反革命隊伍。

毛澤東的「獨立自主」道路

經過八年抗戰四年內戰之後，毛澤東不僅戰勝了蔣介石，而且也戰勝了王明和史大林，因為他走的是獨立自主道路，他以第二次革命中國共合作的前事為鑑，不讓史大林再次出賣中國革命，他確實是懂得用縱橫捭闔的手段去對付他心目中的一切敵人。

但這是後話，在1936年，王明和毛澤東對於統一戰線並無歧見，即使有，毛澤東也陽奉陰違。

最有教訓的一回事，毛澤東採用了托派革命民主鬥爭的策略略和國民會議的口號，他在〈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一文中說：

全國人民及各黨派的愛國分子，必須拋棄過去對於國民大會和制定憲法問題的冷淡，而集中力量於這一具體的帶着國防意義的國民大會運動和憲法運動，嚴厲地批判當權的國民黨，推動和督促國民黨放棄其一黨派一階級的獨裁，而執行人民的意見。今年的幾個月內，全國必須發起一個廣大的民主運動，這運動的當前目標，應當放在國民大會和憲法的民主化的完成上。第二方面，是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自由。

可是毛澤東不管如何採用了托派的策略略，他總是一貫地反對托派的，他在瓦窩堡會議中，為了杜塞托派及共產黨中來自左翼的批評，特別說：

中國革命的現時階段依然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這是十分明顯的。只有反革命的托洛次基分子，才瞎說中國已經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再要革命就只是社會主義的革命了。

革命的轉變，那是將來的事。在將來，民主主義的革命必然要轉變為社會主義的革命。何時轉變，應以是否具備了轉變的條件為標準，時間會要相當地長。不到具備了政治上經濟上一切應有的條件之時，不到轉變對於全國最大多數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時，不應當輕易談轉變。懷疑這一點而希望在很短的時間內去轉變，如像過去某些同志所謂民主革命在重要省份開始勝利之日，就是革命開始轉變之時，是不對的。

毛澤東說托派分子瞎說中國已經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這才是「瞎說」，1927年以後，托派說資產階級已完成了反革命，但沒有解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由此提出革命的民主鬥爭與國民會議口號，反對資產階級的軍事獨裁。中共在三重冒險政策之下進行蘇維埃運動，到後來反而政治上投降了資產階級，如果毛澤東不違反史大林的意旨，「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當然只能重蹈第一次國共合作的覆轍，聽憑資產階級的再次屠殺，新四軍事件就是顯著的例子。

托派陳仲山致魯迅的信所指出的就是這個前途，事後證明毛澤東扭轉這個失敗的前途，王明成了「右」傾的機會主義者，歷史的諷刺是，毛澤東後來不得不承認他是個「不斷革命論者」。

關於轉變論，1956年9月中共第八次代表大會的報告中有另一種說法，基本上也是符合托派戰略的：

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已經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一種形式。這就使我國的資產階級民主性質的革命有可能經通和平的道路直接地轉變為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誌着我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的基本結束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開始，標誌着我國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開始。

劉少奇宣佈：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長時期來就是用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按：指不斷革命論）來指導革命的，確是坦白而誠實的承認。

魯迅回答托派的信，並沒有正面回答陳仲山提出的論斷，只是用中共慣常的誣讒罵托派是「漢奸」，而且用勢利眼光奚落托洛次基的被逐，這都不合魯迅平素論人論事的準則。這封信雖然至今仍為中共所利用，但如果我們認真研究魯迅的言行，以他文學家的敏感，他確已見到托派陳仲山所指出的是事實，而且又以有病之身力加反對的。

1927年10月魯迅曾說：革命文學家風起雲湧的所在，其實是沒有革命的。這是國民黨的反革命取得勝利的時期，也就是瞿秋白進行盲動主義的時期。

1936年他死前說：用筆和舌，將淪為奴隸之苦告訴大家，當然是不錯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出這樣的結論：「那麼，到底還不如我們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隸好。」

「聯合戰線」之說一出，先前投敵的一批「革命作家」，就以「聯合」的先覺自居，漸漸出現了。納款，通敵的鬼蜮行為，一到現在，就好像都是「前進」的光明事業。

這種話，幾乎都可替托派陳仲山的信作注解的。

* * *

反托專家石中英先生雖說研讀魯迅致托派的信已有十餘次之多，但我認為他仍是一無所得的，因為他不從活的歷史事變去對證托派所指出的共產黨的錯誤，這錯誤經過毛澤東一系的勝利，已經被用「決議」的方式，批准了托派致魯迅的信所提出的指斥，是鐵一般無可改變的歷史事實了。

一丁（樓國華）

1974，10，4。

（據《魯迅：其人，其事，及其時代》）

20. 胡風遺著讀後感

最近有機會讀到胡風的兩篇遺作：〈關於三十年代前期和魯迅有關的二十二條提問〉與〈魯迅先生〉。覺得很重要，很有價值。這是中國三十年代初、中期有關左派文藝運動的、具有權威性的第一手史料。從這裏，人們不但可以看到當時發生在魯迅周圍的中國文壇的分合和恩怨；可以見到中共取得政權後一些思想鬥爭的淵源；而且，還可以看出史大林毛澤東的文藝政策為何會產生災難性的後果。

不過這些材料和這些問題，自有合格的中國近代文學史家去利用、研究，而且我相信，他們早已在利用和研究了。我不想在這方面多費饒舌。這裏我想簡單一談的，只是由那兩篇文章透露出來的、胡風本人的文藝見解。具體一點說，就是想談談胡風是怎樣解決文學與革命的關係這個問題的。

作為托洛次基派的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我在胡風文章中感覺到最直接興趣的，自是他源源本本，老老實實地敘述了魯迅那封《給托洛次基派的信》的製作經過。因為胡風的這項證言不但替中國托派再一次地洗雪掉莫須有的罪名，而且也替魯迅終於解脫了誣陷他人的責任。這件事本來值得詳談，只因我的二位老友：樓子春與鄭超麟早已為此寫了文章。他們很好很充分地討論過這件「公案」，我已沒有其他的話可講了。

唯一想補充一點的，是陳獨秀由此引起的對魯迅的評價問題。

在我的《回憶錄》中，關於此事有過如下一段記載：

其昌做這件事時我在香港，事前他也沒有和其他同志商量，故事後頗受同志們的指責，尤其是南京監獄中的陳獨秀，知道了大發脾氣，問我們為什麼會對魯迅發生幻想。他認為，魯迅之於共產黨，無異吳稚暉之於國民黨。受捧之餘，感恩圖報，不能再有不計利害的是非心了。

這段回憶曾經引起國內一些黨史研究者的反應。他們認為陳獨秀不能以公平冷靜的態度來對待魯迅。其實，這種表面客觀的所謂持平之論，倒是絕不公平的。當時陳獨秀正以托派身份被蔣介石關在監獄裏，突然間看到他的一位舊同事與老朋友，竟將最不堪的罪狀橫加在以他為首的那一派同志的身上，怎能使這位性似烈火的革命者按捺住心頭怒火呢？「唾面自乾」不是任何革命者的品格，更不是陳獨秀這位革命者的品格。

可惜陳獨秀未能生前見到胡風的這一項證言；不然的話，他一定會像現在的我們一樣，會撤回他將魯迅比之以「白色老狗」吳稚暉的憤慨語。

雖然如此，陳獨秀對魯迅的整個評價，始終不曾因此誣陷而有所改變。1937年12月，在他寫的〈我對魯迅之認識〉一文中，我們見到了如下的話：

在民國十六七年，他還沒有接近政黨以前，黨中一些無知妄人，把他罵得一文不值，那時我曾為他大抱不平。後來，他接近了政黨，同是那一班無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層天以上，彷彿魯迅先生從前是一隻狗，後來是一個神……

這是非常公正與持平的評價。其實魯迅本人對陳獨秀的態度也始終是公正與持平的。別的不說，只要指出陳獨秀已經在黨內失勢，當魯迅提到他如何寫起小說來的時候，卻毫不掩飾地歸功於陳獨秀的鼓勵。

這一層，胡風的文章也給了我們證據，他說：

他對《新青年》的編輯同人、五四文學革命領導者之一的陳獨秀，始終表示敬重的態度……

談胡風的文藝思想，當然要以胡風著作為根據；但首先我得承認：以前我從未讀過胡風的任何文章。主要原因是我與文學無緣。年輕時候雖然也愛好過文藝，但從我投入共產主義運動之後，由於興趣轉移，也由於精力與時間常感不足，便極少再接觸到文藝作品。因而與中國的文壇，無論右派或左派隔離得非常之遠了。

解放後胡風那篇 30 萬字的意見書，因它而促發了一場大批判的，當然引起過我的興趣；但始終找不到胡風的原文。後來在反胡風大運動中，雖然一批又一批地公佈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黑材料」，我卻全無閱讀興趣。我深知那種從莫斯科抄來的、將異己者妄加罪名的所謂批鬥，其中絕對見不到被批者的真正意見。

因此，我得預先聲明：這裏要談的胡風的文藝觀，只能以從此二文中所能見到的為限。這無疑是極不全面、很膚淺，甚至還可能是解錯誤的。

1926 年，經他（魯迅）的手介紹的蘇聯作品中使我受到影響最大的是 A·勃洛克的長詩《十二個》。它反映了十月革命掀動了全社會生活的風景似的旋律，把我也捲進了那裏面。他的《後記》

幫助我讀懂了詩，也幫助我多少懂得了革命，多少懂得了革命會怎樣影響作家和文學。這以前，我讀過他譯的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徵》，那加強了我對創作過程中的庸俗社會學的肅清。但是我知道，廚川的出發點是唯心論的，現在《後記》說明我加強了這個認識。（見《新文學史料》，1993年第一期，5頁。）

要說明這段話的重要，先得介紹這首長詩的譯本內容。我也讀過這個譯本，也受到過很大影響。可是那影響並非直接來自詩的本身，而是來自印在詩後面的那篇附錄，以及魯迅本人從那附錄得來的、而且是完全同意的關於這首長詩的一些意見。

模糊地記得，長詩的譯者名叫胡教（？）。譯文我相信是忠實的。魯迅如此鄭重地給它介紹與出版，事先一定經過仔細校對（也許對照日文譯本——如果已有日譯本的話）。但是我們知道譯詩難，譯像勃洛克那種詩更難。這位象徵主義詩人的詩，以其特有的節奏、韻法和曲調出名；和俄文這種語言有機地結合着。它本來就不易領會，何況又經過翻譯。譯成其他文字，最好也只能保留它那些具象的內容罷了，可是這首詩的具象內容，剝去了它所以成為好詩的所有抽象成分，實在已所剩無幾。人們讀了某些外國詩人的名詩的譯作，常會覺得不知它好在哪裏，或者，竟覺得如讀天書，不知所云。主要緣故就在於此。這時候，就需要真有見地、真懂得詩的文藝批評家了。他們的「詮詁」會幫助我們了解這些詩（尤其是翻譯來的外國詩）之所以是好詩或是壞詩的理由。魯迅在《十二個》後面加添的附錄和他自己寫的《後記》，便是起了這個可貴作用的。

那末「附錄」的作者是誰呢？巧得很，他便是本文前面所談的托派領袖托洛次基。這篇附錄本來是托洛次基著作的《文學與革命》的第三章：《亞歷山大·勃洛克》。

我手頭沒有《十二個》的中譯本。也沒有收入此書《後記》的魯迅的書。因而無法知道魯迅為什麼要將托洛次基的文字用作《附錄》，更不記得他如何介紹這位作者及其意見。幸而我案頭有一丁著的《魯迅》，其中有從魯迅《後記》摘引來的文字。關於托洛次基這個人，他是這樣說的：

中國人的心目中，大概還以為托洛次基是個聲名叱吒的革命家與武人，但看他這篇，便知他也是一個深解文藝的批評者……

從一丁的文章，我又知道托洛次基的這篇〈勃洛克論〉，還可能是魯迅專為介紹這位詩人及其長詩，特地從日譯本《文學與革命》一書中轉譯來的。由此可見，魯迅當時是如何欣賞托洛次基的評介，並如何同意他的見解了。在1926年3月12日發表的〈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這篇文章裏，魯迅更把他所同意的見解具體地說了出來：

托洛次基曾經說明過什麼是革命藝術。（它）是：即使主題不談革命，而有從革命所發生的新事物藏在裏面的意識一貫着者是；否則，即使以革命為題，也不是革命藝術。（以上二段均引自一丁著《魯迅：其人，其事，及其時代》，284頁。）

魯迅的這幾句話，當然不曾全面轉述托洛次基有關勃洛克的見解，更不曾說出托洛次基關於文學與革命的關係，以及共產黨與工農政府對文藝應取何種態度的種種見解。（這些見解，托洛次基是闡明在《文學與革命》的其他章節中的。）可是魯迅這裏所說的三言兩語，卻簡單明白地傳達了托洛次基反對「庸俗社會學」關於革命文藝的看法，並且毫不含糊地表明他對此看法的共鳴。

胡風把他這方面所受的影響，和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徵》給他的影響聯繫起來，是頗有意思的。把二者聯繫之後，胡風從而得到了

一個認識；或者可以說，因此「加強」了他原來已有的認識。這個認識，依我看來，竟決定了胡風此後對文藝創作，以及對文藝創作和革命的關係這個問題的基本態度。

什麼基本態度呢？那便是反對以庸俗社會學觀點理解文藝的創作過程；反對從庸俗社會學的立場出發去指導或干預文學家和藝術家的創作活動。

我這樣說，也許有人會說我曲解胡風的意思，那就讓我們仔細研究一下他的原文。

彷彿在給徐懋庸的信中，魯迅曾經善意地提到過胡風的幾個小毛病。其中之一，記得是說他寫文章不肯大眾化。這次讀了他的文章，我多少也有同感。胡風自是文章高手，只因他的文句有時過於濃縮，含義難免有點晦澀。要充分理解乃至欣賞他的文章，讀者有時得費力想一想的。

上引文字的前半截，他說俄國詩人勃洛克的長詩《十二個》給了他極大影響。又說他之所以讀懂這首詩，從而多少懂得一點革命，多少懂得一點革命影響作家和文學，那是靠了魯迅那篇後記的幫助。這都清楚明白，不需要任何解釋。

接下來，他提到魯迅翻譯的日本文藝批評家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徵》。他說這本書也給過他甚大影響：「加強了我對創作過程中的庸俗社會學的肅清。」接着他又說：「但是我知道，廚川的出發點是唯心論，現在《後記》說明我加強了這個認識。」

這個後半截卻有點費解了，因為他沒有告訴我們為什麼讀了《苦悶的象徵》之後讓他進一步肅清了庸俗社會學的文藝觀。他沒有告訴

我們廚川從唯心論出發這個事實與他的「肅清庸俗社會學」觀點究竟有什麼關係。他沒有告訴我們魯迅的《後記》如何說明他加強了認識，以及這個認識究竟指的是什麼：指的是廚川的唯心論呢，還是指庸俗社會學的肅清。

想充分明白胡風的意思，這裏就得加以若干「詮釋」，就得把這半截文字的思想脈絡尋找出來。據我個人的了解，他的思路走向是這樣的：

讀《苦悶的象徵》，胡風顯然為著者對文藝創作過程所作的剖析所吸引。著者從精神與心理方面追尋文藝創造的原因和動力，竟比某些自命為社會學家對文藝的看法高明得多。以前胡風早就對這些社會學家的看法感到不滿。讀了廚川的書以後，加強了這點不滿。但同時，他知道廚川的看法是從唯心論出發的。為什麼唯心論的美學家反而比那些從唯物論出發的批評家更高明？在這裏他發現了矛盾。

現在，讀了魯迅的《後記》，他恍然大悟了：原來真正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與他一向所知道的庸俗社會學不同。前者從辯證的唯物論出發，卻不但比庸俗的社會學家能夠更正確地了解 and 說明文藝的創作過程，而且比那些從唯心論出發的美學家們更能精微地剖析文藝的創作活動。這麼一來，胡風的矛盾解決了，同時最後肅清了他心中殘存的庸俗社會學家的美學認識。

我這樣解釋胡風的文句，不敢說恰恰符合作者原意；但是我相信，只有這樣了解，才能讀通這些文句，才能把握它們的真正含義。

如此了解這段文句之後，餘下來的便只有如下的一個問題了：到底魯迅的《後記》怎樣幫助胡風解決了這個矛盾？怎樣幫助他進一步

加強對庸俗社會學的肅清？我手頭沒有魯迅的《後記》，無法指出究竟是魯迅的哪幾句話起了這個幫助作用。不過，我相信，魯迅《後記》中的議論是導源於那篇《附錄》的。我們可以在《附錄》中把答案找出來。

《附錄》作者對詩人勃洛克的整個評價，以及對《十二個》這首詩的看法，粗略地，可以歸結成如下三個要點：

- (1) 「勃洛克完全屬於十月革命以前時期的文學。勃洛克的種種感情激動，不管是傾向於狂暴的神秘主義或傾向於革命，都不是從虛無的空間發生的，而是發生於舊俄文化的，亦即舊俄地主與知識分子的最濃厚的大氣之中。」
- (2) 革命發生了，「可怕事件所組成的音樂感動了勃洛克。……他用了最極端的形象來表示他對革命的接受……他在革命的最醜陋的形式中，例如妓女罷工，一個赤衛隊員謀殺了妓女嘉脫卡，在資產階級的一個家裏搶劫——接受了革命，他說：我接受這個，並且他又挑釁地用基督的祝福使所有這些都聖潔化了；」
- (3) 《十二個》是這個「被時代所捲走的詩人，」將時代翻譯成他內心的語言「而寫成的。這首詩無疑是勃洛克的最高成就」。「他雖然不是我們的人，但他是向我們走來的。正是這樣走來的時候他倒下去了。可是他那感情激動底結果卻是我們這時代的一個最重要的作品。他的詩，《十二個》，是會永遠存在的。」（以上引號內文句，引自惠泉譯的中譯本《文學與革命》，107至115頁。）

魯迅在〈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文中提到的托洛次基的革命文藝觀，顯然從上面這些話歸納出來。這個介紹並不錯；但不曾概括上引的三層意思。（也許在《後記》中有較多徵引，我不知道。）假若僅僅憑了如上的簡短轉述，不可能幫助胡風「肅清」他心中殘存的「庸俗社會學」；不可能幫助他解決這個矛盾：何以廚川從唯心論出發，反而比那些自命為唯物論者的庸俗社會學家們更能剖析文藝的創作過程！

胡風那個矛盾的解決，只能是讀了那篇「附錄」，並且理解了上面所引的三層意思的結果。

「附錄」作者首先指出：勃洛克這個象徵主義詩人，表面上好像是超時代與超現實的，其實，他只是，而且只能是「產生在舊俄羅斯文化的、亦即舊俄地主與知識分子的最濃厚的大氣之中。」他「屬於十月革命之前的文學。」

這是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論社會學從事文藝批評的基本立場，是他們了解和欣賞文藝的出發點。

然後，「附錄」作者以兩種身份，從兩個方面，來看待詩人和他的特定作品——他的一首詩。首先以革命者身份，從革命方面，指出詩人以奇怪的方式接受革命。說他用「最極端與最醜惡的形式來表示他的革命的接受」，甚至搬出他喜愛的耶穌基督來為革命祝福，給革命以「聖潔化」。另一方面，「附錄」作者以文藝批評者與鑑賞者的身份，指出：由於革命將詩人固有的「個人主義的柔和的、蚊子叫似的音調淹沒在咆哮的、洶湧澎湃的毀滅音樂」之中，使詩人寫出了《十二個》，寫出了「無疑是勃洛克最高成就」的詩，寫出了「我們這時代的一個最重要的作品」。這首詩是「會永遠存在的」。

從「庸俗社會學」的觀點看，上述二層意思是矛盾的。何以一個從革命角度看是極壞的作品，從藝術角度看卻能稱是「不朽之作」呢？這個矛盾，比胡風讀了《苦悶的象徵》之後所感到的更加根本，也更加顯著。

《文學與革命》的作者是怎樣解決（或解釋）這個矛盾的呢？

在「附錄」，亦即在專論勃洛克的一章裏，他不曾有意針對地解答這個問題。他只是簡單與順帶地說：「詩人將時代翻譯成他內心的語言」了。這句話，我覺得，如果我們能正確地了解，那是已經言簡意賅地解決了上述矛盾。什麼叫做「將時代翻譯成他內心的語言」？一句話，它就是文藝的整個創造過程。一個真正的藝術家，當他感受到外界影響，要想把這些影響用文學，或其他藝術形式，表現出來，必須先把這些外在的種種「翻譯成他的內心語言」。這個「翻譯」過程絕對不是直接的與機械的，絕對不能受命於人的，必須絕對真誠與自發的；否則，任何真正具有若干藝術價值的作品都產生不出來。

社會學——我們指的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絕非庸俗的社會學，更不是官僚御用的社會學——可以而且應該指點出一個文藝創造品的時代背景，能夠分析何以會產生的客觀條件；但是，它絕對不可能規定文藝的創造過程，或指導創作方法。因為，《附錄》作者在《文學與革命》的其他地方反覆地說過：馬克思主義方法並非就是文藝創作與文藝鑑賞的方法。譬如在第五章〈論形式主義的詩派與馬克思主義〉中，就說過如下一段的精闢見解：

說我們不能老是奉了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去決定排拒或接受一件藝術品，這是很對的說法。一件藝術品首先應該依它自己的法則來批判，即用藝術的法則來批判。但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解釋

某一藝術派別為何與如何發生於某一歷史時期；換句話說，即解釋誰提出了對於這一種而非另一種藝術形式的要求，以及為什麼要提出它。（同上引書，165頁。）

由於上述理由，《附錄》作者一方面指出勃洛克以極端古怪的方式來接受革命；另一方面又稱讚他的詩是一項重大成就，便毫無矛盾之處了。

胡風當年因為讀了《十二個》與魯迅的《後記》而肅清了他心中某些「庸俗社會學」的影響，當然有他自己的思考方式，經歷了他自己的思考過程。我不想說，他的方式與過程，與我在上面所論述者多少相同。但是有一點我卻可以肯定：胡風的文藝思想，特別是關於文藝創造與社會學關係的認識，確曾經過魯迅的仲介，間接地受了《文學與革命》著者的影響，亦即受過托洛次基的影響。

非常遺憾，我至今不曾見到胡風那篇意見書，他那有名的所謂「五把刀子」，不知究竟指的什麼。「顧名思義」，我相信主要是希望執政者不要以「庸俗社會學」的立場，去干擾文學家與其他藝術家們的創作活動吧。

一個藝術家，一切從事心智創造活動的人，當他把外在世界的諸因素，翻譯成他自己的內心語言時候，必須享有充分自由，充分獨立，並且必須真誠，必須自願才能創造此可以永存的藝術品來。否則，任憑他賦有多大才能，總是搞不出任何真有價值的作品。

至於這些「庸俗社會學」在掌握大權之後，實行他們的文藝政策，因而造成了無數血淚悲劇，已經由數十年來蘇聯和中國的真實歷史提供了無數實例。毋需我在此喋喋不休。

然則，一個代表工農利益的政黨，當它取得政權以後，對文藝活動應該採取絕對放任政策嗎？這是一個長期爭論的問題。雖然歷史已經給我們提供正反兩面的大量證據；但在社會主義者中間始終還是眾說紛紜。說到這裏，不能自己地我還想徵引一段《文學與革命》——不是在〈論勃洛克〉這一章中的，而是在第五章中的一段話：

我們馬克思主義者關於藝術之客觀依存及其功效的想法，一旦翻譯成政治語言，絕不意味着我們想用法令與命令來統治藝術。說我們只把那談到工人的藝術才稱為新的與革命的，那是不確的；說我們要求詩人只應當描寫工廠煙囪或反對資本的暴動，那是無稽之談！自然，新藝術不能不將無產階級的鬥爭置於注意中心。但藝術的鋤頭不會限於翻耕有數的幾片土塊。相反，它一定要翻各方面的全部土地。最小規模的個人的抒情詩，在新藝術中有其存在的絕對權利。而且，沒有新的抒情詩，也就不能形成新的人。（見同上引書，157-158頁。）

這是著者在1923年發表的意見，也可以說是蘇聯共產黨人最早發表的有關革命政府與文藝活動的權威立場。可惜這個立場，隨着蘇聯與蘇共其他方面的變化而變化，終於走到這個立場的正相反對的一面。被托洛次基指作「不確」與「無稽」的種種，不但——見諸實行，而且變本加厲，將一切文藝創作變成僅僅限於歌頌「偉大領袖」的讚美詩。那些一貫反對政府用法律與命令來統制藝術，主張新藝術一定要耕耘各方面的全部土地的人們，則無一例外地遭受到與胡風所遭受的同樣悲慘的或更為悲慘的命運！（未完）

附錄

讀胡風《魯迅先生》長文有感

不記得是哪一位西方哲人的名言：著作家有二重生命，他死後，他的著作還能在社會上發生作用。

歷史上不乏先例。

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在社會上發生了巨大的作用，死後，他們的著作又能指導 1917 年的俄國走上了世界革命的道路，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

同馬克思和恩格斯相比，胡風自然是小而又小的著作家。我被國民黨逮捕以前還不知道胡風（張光人）的姓名，出獄後才知道他是魯迅的一個學生，同魯迅關係密切；但我在解放後被捕以前從未讀過胡風的一篇文章。就是這樣一個著作家也能證驗上引的「名言」：他死前，1984 年，寫的這篇〈魯迅先生〉長文，在他死後若干年，1993 年，初次公開發表時（見《新文學史料》1993 年第一期）也能在中國社會上發生了重要的作用，即解決了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政治鬥爭史上一件公案——魯迅《答托洛次基派的信》的公案。

1936 年，魯迅去世前不久，我的老朋友陳其昌，化名陳仲山，寫信給魯迅，並寄了一批托派出版物給魯迅。魯迅回答了這封信。信中暗指中國托派為日本特務機關收買的漢奸。當時我關押在國民黨的監

編按：本文據《鄭超麟晚年文選：史事與回憶》第二卷，481-486 頁。

獄中。那裏看不到日報，但書和雜誌是可以送來的。我在一位「難友」家屬送來的一本雜誌中看見魯迅這封答信。

我當然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我當然不贊成陳仲山寫信並寄出版物給魯迅，但對於魯迅這封答信特別反感。魯迅不是說過「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的麼？他不是一向反對國民黨御用報刊上常常出現的「盧布說」麼？他為什麼自己用「日圓說」來辱罵人呢？他有什麼證據呢？信中唯一的證據就是說：托派寄給他的是「很整齊的刊物」。一個地下活動的黨派，難道非接受外國間諜機關收買就不能出版印刷「很整齊的」宣傳品麼？（何況當時寄給魯迅的刊物都不「整齊」。我有當時主持印刷工作的林華同志死前寫的一篇專講印刷工作的回憶文章，必要時可以發表。）

魯迅這封答信貶低了他在我心目中以前的地位。我想，中國文人對於更強大的敵人用的是一種論調，對於更弱小的敵人用的又是另一種論調，由此不必過於苛求魯迅。

我出獄後，知道陳其昌同志寫這封致魯迅信時，別的同志都不贊成。我又知道有些同志對於魯迅特別反感，我曾勸告這些同志不必如此。

解放後，魯迅這封《答托洛次基派的信》被編入高中語文教科書了。因此全國凡受過高中教育的人都把「托派漢奸」深刻在心靈中。

我的老朋友樓子春，本是文學青年，崇拜魯迅的。他解放後定居香港，出版了一本論魯迅的書，又發表了多篇有關魯迅的文章。他特別注意魯迅這封信後附注的「O.V. 筆寫」，他又從知情人那裏知道O.V. 就是馮雪峰，又知道「筆寫」二字並非常人所理解的「魯迅口述，

雪峰筆錄」之意，而簡直就是雪峰代替魯迅擬的這封信，在病榻前念給已經不能執筆的魯迅聽，魯迅點頭，就作為魯迅的信發表了。

我並不重視這個細節上的區別。這封信即使不是魯迅親筆寫的，即使馮雪峰以自己的意思代擬的，點了頭，對於此信，魯迅就應當負全責。

孫文 1925 年在病榻上，自己不能執筆，汪精衛以己意替他代擬遺囑，念給他聽，他點了頭，於是就成為《總理遺囑》。國民黨統治下，不是每次開會以前都念《總理遺囑》麼？即使汪精衛做了漢奸，《總理遺囑》仍照念不誤。

可是，胡風這篇長文也有一節專寫魯迅這封《答托洛次基派的信》是怎樣出台的。

原來，魯迅聽了馮雪峰事先替他代擬的《答托洛次基派的信》和《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他雖然點了頭，但只表示基本同意而已。

試看胡風是怎樣說的：

口號問題發生後，國防文學派集全力進攻。馮雪峰有些着慌了，想把攻勢壓一壓。當時魯迅在重病中，無力起坐，也無力說話，連和他商量一下都不可能。恰好愚蠢的托派相信謠言，竟以為這是可乘之機，就給魯迅寫了一封「拉攏」的信。魯迅看了很生氣，馮雪峰拿去看了後就擬了這封回信。「國防文學」派出流言，說「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是托派的口號。馮雪峰擬的回信就是為了解消這一栽誣的。他約我一道拿着擬稿去看魯迅，把擬稿念給他聽了。魯迅閉着眼睛聽了，沒有說什麼，只簡單點了點頭，表示了同意。

馮雪峰回去後，覺得對口號問題本身也得提出點理論根據來。於是又擬了《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又約我一道去念給魯迅聽了。魯迅顯得比昨晚更衰弱一些，更沒有力氣說什麼，只是點了點頭，表示了同意，但略略現出了一點不耐煩的神色。

由此可見，這一封信和這一篇文章，說的是同一個問題，是分不開的。這信和文章，據胡風這裏所說，不僅不是魯迅的口述、雪峰筆錄；也不是魯迅起意寫的，而是雪峰自己要寫，寫好再用魯迅名義發表的。

馮雪峰念那封信給魯迅聽後，魯迅沒有說什麼，只簡單點了點頭表示了同意。雪峰念那文章給魯迅聽後，魯迅照樣點了點頭表示同意，「但略略現出了一點不耐煩的神色。」

最可注意的，是胡風接下去說的話：

一道出來後，雪峰馬上對我說：魯迅還是不行，不如高爾基；高爾基那些政論，都是黨派給他的秘書寫的，他只是簽一個名。……

他的聲音驚醒了我，覺得有點意外。

現在我們知道這封有名的魯迅《答托洛次基派的信》是怎樣出台的了。原來，1936年，魯迅在病榻上已經無力起坐，也無力說話，連和他商量一下都不可能；恰值此時陳仲山的信寄來了，魯迅看了生氣，馮雪峰便拿去看，並不是魯迅授意之下，代擬這封信，同時又代擬了一篇與此相關的文章，念給魯迅聽。魯迅聽了都不說話，只點了點頭，還略略現出不耐煩的神色。隨後就以魯迅口述，O.V筆錄的形式發表了。

魯迅點了點頭，是否表示同意呢？他基本上是表示同意的，但並不全部表示同意。

魯迅此時需要同托派劃清界限。他正在被人戴上「托派」帽子，而他並非托派，他有必要同托派劃清界限。為了表示自己也反對托派，是否非「以辱罵當戰鬥」不可呢？是否非採用「日圓說」為武器不可呢？

胡風說：「魯迅在思想問題上是非常嚴正的，要他對沒有經過深思熟慮（這時候絕不可能深思熟慮）的思想觀點擔負責任，那一定要引起他精神上的不安。」

由此可見，在馮雪峰代擬的《答托洛次基派的信》中，用辱罵代替戰鬥，用「日圓說」代替「盧布說」，這二方面，魯迅本人實在不能負責。

可是，半個多世紀以來，馮雪峰代擬的這封信，被人利用來作反托的宣傳，其着重點恰好不是放在魯迅必須同托派劃清界限上面，而是在「辱罵」和「日圓說」上面。

馮雪峰代擬了那封信和那篇文章之後，魯迅的病情漸漸好轉了，能夠說話，也能夠同別人商量問題。在這個時候，胡風就問他：「雪峰模仿周先生的語氣倒很像？」魯迅淡淡的笑了笑，說：「我看一點也不像。」原來，魯迅所謂「語氣」是包含文字形式和思想內容說的。

陳仲山的「愚蠢」就在於文學上崇拜魯迅，而不理解魯迅的政治思想。魯迅不會明白中國大革命的爭論是非，以及國際共產主義戰略思想爭論的是非。這樣的人是無法「拉攏」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有幾位歷史家著文辯明陳獨秀並未領取日本間諜機關的每

月 300 元津貼了。於是馮雪峰代擬的魯迅這封信便失去了根據。此時有一部分人為了保衛魯迅，便提一種說法，即說：魯迅此信並未實指托派是漢奸，不過在信中警告托派：你們這樣滑下去總有一天會墮落為漢奸的。

這樣「保衛」魯迅，是無濟於事的。難道魯迅這封信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宣傳，以至於編入高中語文教科書中，只為的「警告」托派不做漢奸麼？何況毛澤東本人曾經明白說：魯迅先生說過了中國托派是漢奸（見解放初年胡風在湖北辦的一個刊物上轉載的一篇毛澤東文章）。【朱正按 毛澤東在延安陝北公學紀念魯迅逝世周年大會上的講話〈論魯迅〉，後來經過修改整理收入《毛澤東文集》第二卷，這一段是這樣的：「魯迅先生的第一個特點，是他的政治的遠見。他用望遠鏡和顯微鏡觀察社會，所以看得遠，看得真。他在 1936 年就大膽地指出托派匪徒的危險傾向，現在的事實完全證明了他的見解是那樣的準確，那樣的清楚。」雖然含糊了一些，可是還是肯定了這封信所說的「托派匪徒的危險傾向」（第 43 頁）。】

今天，不僅大家都知道陳獨秀領取日本間諜機關的津貼，是謊言；而且從《毛選》第二版第二卷第 516 頁的一條新注知道，所謂「托派漢奸」只是出於共產國際的一個「錯誤論斷」了。但魯迅這封《答托洛茨基派的信》為什麼會暗指托派是漢奸呢？如果說是警告，托派並沒有理會魯迅警告，而按照自己的方向走去，結果並沒有成為漢奸呢？大家還無法解決；幸虧胡風死後若干年初次發表的這篇著作，才替我們解決了這個疑問。胡風死後還能以他的著作解決了五十多以來的歷史公案。原來，暗示托派為漢奸的話，並非魯迅自己的意思。魯迅如經過深思熟慮的話，是否可以同意馮雪峰代擬的那些違反魯迅自己原則的暗示的話呢？我們還沒有證據。

讀了胡風這篇〈魯迅先生〉長文，頓使魯迅在我心目中的形象高大起來，回到了我在國民黨監獄中看到這封有名的信以前的地位。

馮雪峰告訴胡風說：「魯迅還是不行，不如高爾基；高爾基那些政論，都是黨派給他的秘書寫的，他只是簽一個名。」胡風說，他聽後感到「有點意外」。我則認為馮雪峰這些話不是貶低魯迅，而是在我心目中提高了魯迅的地位，知道了我們中國的高爾基畢竟高出於俄國的高爾基。我的殘餘的愛國主義將會引此以自豪的。

鄭超麟

1993年8月23日

21. 談王實味與「王實味問題」

近年來，研究中共黨史的中外學者與一般關心中國民主運動的人，愈來愈對王實味發生興趣。這是容易理解的。因為王實味是中共歷史上第一次文字大獄的被害人；他是史大林—毛澤東文藝政策施之於中國的第一個犧牲者；他又是中共內部第一個挺身而出、反對高幹特權、尋求內部民主的知識分子。

具有這樣的身分，儘管王實味在黨內從未擔任過顯要職位，儘管他遺留下來僅有幾篇雜文；可是他在在中共思想發展與黨制定型的歷史上，卻確實扮過很重要的角色。以他為象徵的那種思想和作風，當然值得人們注意和研究的。

不過我現在對王實味發生興趣，現在來談他的種種往事，卻出於一種較為狹隘的目的：我要以王實味的一個老同學，老同志與老朋友的資格，用事實來說明他與我個人乃至與中國托派之間的關係。

這個關係似乎已成為王實味能否平反的關鍵了。

一、

王實味原名思禕，實味是他投稿《現代評論》時開始用的筆名，後來就索性改用這個名字了。他是河南人。他和我於1925年秋季同

編按：本文原載香港《九十年代》月刊1985年7月號。

時考入北京大學，同被編入文科的預科一年級，又同被編在一個小班（全班約二十餘人，其中還有後來以「胡風」名字出名的張光人）裏上課，因此生活比較接近。對於文學，特別對於西方文學，他和我有同樣興趣。我們都受到當時北京文藝空氣的影響，都喜歡向各種報刊投點稿。在三·一八慘案前後，我們又都從布希米亞式小文人變成為革命的共產主義者。這一些愛好上與思想發展上的共同點，很自然地使他與我之間形成了比較親近的友誼。

我在1925年冬天加入中國共產黨。王實味入黨大概遲我幾個月。他的入黨介紹人記得是陳其昌，他們二人是同鄉。而其昌入黨比我早，他當時已經是北大黨支部的一名幹事。

成為黨員之後，大家忙於緊張的革命工作，王實味與我之間的私人來往反而少了，有時甚至相隔很久才見一次面。從1926年春天到1927年春天這個時期內，有關王實味的，深刻地留在我記憶中的，只有他的一件戀愛故事。這個故事多少能透露出王實味的性格，多少和他後來在延安所鬧的事情有點關聯。

當時的北大支部中有兩個新入黨的女同志：李芬與劉瑩。她們來自湖南，都是可敬可愛的人。兩個人中，李芬似乎更成熟些，工作能力也更強。因之，一般同學與特殊的黨員同學，對李芬有普遍的好感，而王實味竟愛上了她。為了表達愛意，他給李芬寫了信。可是受信人並無意思。在當時北京的革命黨人中，清教徒式的作風是相當有力的。同志中談情說愛，縱非有背黨紀，至少被看作消極行為，甚至被看作資產階級的浪漫行為。李芬是否受着這種風氣影響，不得而知。總之她沒有理睬，沒有回信；但是王實味卻不肯甘休，再接再厲。一連給對方據說五六封信。這使得李芬非常不快或不安了，終於

把這件事向組織公開。北大支部書記段某，也是湖南人，而且據許多人說，他對李芬也有意思。王實味苦苦的片面追求，既然要他來處理，他便小題大做起來。這是1927年春天，李大釗等已遭逮捕，卻尚未遇害。白色恐怖籠罩了北京，我們的工作進行得非常謹慎和隱秘。可是，這位書記要解決「王思禕事件」，卻在北京爛漫胡同的湖南會館召集了一次北京東城部委和北大支幹會的聯席會議，出席與列席者達十餘人之多，會議幾乎開了一個整天。

事隔五十八年，我已記不起會議的詳情。我只記得那位段書記（順便說一下，此人大約在一年後脫黨，加入了國民黨。後來聽說做過山東某縣的縣長）氣勢洶洶的發言。他強調王實味之所以入黨，只為了更方便地追求李芬，根本不是來參加革命的。又說在此白色恐怖極端嚴重的時候，在此黨的領導人遭遇大難，鬥爭萬分緊張與異常困難之際，身為黨員的王實味非但不化悲憤為力量，以行動答覆鎮壓，卻拼命追求女同志，幹些無恥勾當，實在荒唐之至。他主張會議通過決定，給王實味以嚴厲的黨紀處分，縱然不開除黨籍，也該「留黨察看」。其他到會的人都發了言。大家都批評王實味，其中尤以陳其昌的批評最為厲害。他完全以「大哥」身份來責備這位「小弟弟」，說他不該為此胡鬧。但是誰都不支持段書記的「卑鄙動機論」，沒有一個人主張把王實味開除或給以嚴重警告。我的發言大意是這樣的：男同志給女同志談戀愛，不能算是錯誤；但當一方不願接受而另一方仍不斷追求，那就不好了。現在只要王實味答應不再寫信，事情就算完結。我不主張把主要屬於私人性質的事情，提高到黨和革命的平面來考慮。段書記頗不以我們的「自由主義」的看法為然，但他居於一人的少數，只好服從多數意見。結果給了王實味一個正式批評，要他不再給李芬寫信。

列席會議的王實味（記得李芬沒有來）始終不曾說一句話，靜聽大家對他的批評。等到批評做出了結論，他表示接受，「案子」便告結束，「自我檢討，徹底認罪」的那套辦法，當時是連蘇聯共黨內部都不曾實行呢。

當晚王實味跑到我的寓所來看我，情緒非常激動，說他沒法不愛李芬，不過他會克制自己，不會再給她寫信。同時非常憤怒，極端不滿段書記的見解與作風。他認為段對戀愛的看法是封建的，處理這件事情的態度是官僚的。

「事件」發生後不久，我和王實味便分別了。我去了武漢，他留在北京。隨之而來是革命的大失敗，全國革命者遭到可怕的迫害。彼此在艱難的條件中鬥爭，甚至為最起碼的生活而掙扎。我與王實味不問不聞者達數年之久，一直到1930年春天，才與這位老同學再度搭上關係。那時我已因贊成蘇聯共產黨左派（即所謂托派）的政見而被黨開除，王實味則與黨失去了聯絡，正在尋找回歸組織的路子。

二、

我被開除黨籍後，為了生活，翻譯了普列漢諾夫的一本哲學小冊子：《從唯心論到唯物論》，上海滬濱書店出版。王實味見到這本書，立即寫信給書店，請他們將一封附有他住址的信轉交給我。

得信當晚我就去看他。他住在靠近華界的、法租界菜市路的一條小弄堂裏。弄堂很髒，房子很舊，他那個亭子間尤其破敗湫隘。四壁空空，一燈如豆，充分顯出房主人的淒涼光景。我意外地發現他已有愛人，而這位愛人非他，正是李芬的好友，我們北大黨支部裏的另一位女同志劉瑩。她當時正在產後，躺在牀上——孩子呢？因為生下來

無法撫養，死掉了！他們讓我坐在一隻破舊衣箱上（這是除了那張破牀之外的唯一傢俱），開始了三個老同學一夕談。大動亂中三年離別後的重敘，真有「相對如夢寐」的滋味。

我們自然提起李芬，但談得不多。她此時一定尚未在湖南遇難，或已經遇難而未為他們所知，因為我搜索記憶，李芬壯烈成仁的事，還是後來在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中首次得悉的。他那時最最關心的二件事：第一，急於想弄清楚黨內分成二派的政治歧見；第二，怎樣解決當前瀕於絕境的生活。我費了很多時間給他說明史大林派與托洛次基派對於中國革命的不同看法。我對他講了過去革命中的兩條路線，講了二派對當前局勢的不同估計，特別講了黨中央盲動政策的錯誤，以及托派主張以革命民主政綱來重新團結革命力量，以此再度走向新革命的理由。王實味聽了我的說明是有印象的，但他沒在二派之間作左右袒。他自認在這方面注意不夠，知道得太少，今後要多多留心研究。他告訴我，他和劉瑩此時都失去了與黨的聯繫，正想重行歸隊。不過在重新參加組織之前，他要弄清楚黨內二派的誰是誰非，以便決定向哪一派去申請加入。

談到生活，他告訴我正在找徐志摩幫忙，可能給一家大書店譯點稿子。這件事我曾在1951年寫的一篇短文中作過比較詳細的記述，下面是有關的一節：

正在這個時候，徐志摩在編一譯文叢書。王實味與徐志摩原不相識，不知是誰介紹，又彷彿是他自薦的，總之，他跟徐志摩約好了會面的日子。到了日期，他準時來到了徐志摩的家，也記不得為什麼，徐志摩竟爽了約。第二天，王實味再去拜訪，這回卻早了一點，他不知道徐志摩起身晏。一進門，娘姨對他說：「大少爺還不曾起身」，請他稍等一下。王實味無名火起三千丈，掉頭

就走。回得家來，結結實實寫了一封信，將這位「大少爺」罵了個狗血噴頭。徐志摩接讀來信，自知理虧，當即摸到王實味的地方去，着實道了歉。最後總算講好了，請王實味「幫忙」，翻譯哈代的《土人還鄉》。

這一件頗能代表王實味風格的趣事，發生於我們那一晚長談之後不久。

譯書「公事」談妥了，王實味卻連買書的本錢都沒有。當時我也過着「家無隔宿糧」的日子，但比之於王實味，我在上海終究多點社會關係。是我，想辦法給他買了本《湯麥士》，哈代的那本原文書的。

三、

王實味與我在上海來往了大約一個整年——從1930春天到1931年春天。他為譯書忙，我為左派反對派的組織忙，彼此見面次數很少，我相信不可能多達十次。除我之外，王實味當時與之來往的，據我所知，只有陳其昌，即延安整風時多次提到的陳清晨（順便說明一下，此人亦即後來給魯迅寫信的陳仲山）。陳其昌當時也因贊成反對派而被開除，他屬於陳獨秀派。不過王實味卻從未加入托派，既不曾參加我所屬的「十月」派，也不曾參加陳其昌所屬的「無產者」社。

政治上他是較多同意托派主張的。特別對於當時中國局勢的估計：是直接革命的形勢呢，還是革命業已失敗，他認為反對派的看法比較正確。但他懷疑反對派另起爐灶，重建新黨來領導革命是否可能。他希望大家始終留在黨內，即使被開除也不要企圖自立門戶。他的這個想法，我相信是他後來設法回到黨內，並前赴延安的主要原因。

不過這些並不是他與我偶爾會面時談論的主題。我們每見必談，每談必爭的一個問題是他後來因之出名的「人性論」。他深深相信：不論一般的政治也好，或特殊的革命政治也好，人性都起着很大作用。他認為馬克思主義者太強調客觀，太看重物質，以為改變了客觀的物質條件，人性就能夠變好。他認為未必。依他之見，改變人性這項工作是獨立的，如果說它不比改變社會的物質環境更重要，至少是同樣重要，要同時進行。王實味這套理論，往往伴以大量感慨和牢騷。革命失敗了，得勝的新朝權貴們露出來的「人性」竟比北洋老軍閥的更醜更惡，這使他悲憤；而更使他痛心疾首的，則因他眼見為數不少的「老朋友們」，一見氣候轉變，立即改轍易轍，甚至認賊作父，賣友求榮。每當他談到這些「軟骨頭的無恥之徒」時，總是要情緒激動地問你：「如果這次革命不是失敗而是成功，這些傢伙不也成了新政權裏的領袖或幹部了嗎？有了這些官兒，革命政府即使有最好制度，還能不變質墮落嗎？」

對於他這套「改革社會必須改革人性」論，初時我是與他認真爭辯的。我說馬克思主義者並不否認人的個性不同，他們承認各個人的性格有好有壞。革命黨並不輕視對革命者的教育，也不放棄對每個黨員的品格的注意。我還說了馬克思主義有關客觀與主觀二者關係的較為抽象與根本的一些原理。可是這些話都是白費。毋須我講，王實味自己早就知道。知道了並且領會到這些事實與道理，卻絲毫不妨礙他繼續堅持這個有關「人性」的見解。因此，在後來的談天中，我再不跟他鄭重其事地辯論了。其實他自己也未曾將見解徹底發揮，更不曾付之實行的。如果真正貫徹他的理論，他應該改行去當牧師，至少始終幹他的教師行當，不應再幹革命，可是他至死還是個革命者。

那時我正約集幾位朋友一起翻譯托洛次基的《自傳》。王實味英文程度好，我請他幫忙譯一點，他答應了，譯了兩章：「紐約」與「集中營內」。這件事，據後來延安文件上說，王實味曾經自動向黨組織報告了的。又說他曾替托派譯了列寧的遺囑，此事我卻不知，可能是經由陳其昌的關係，發表在王獨清編輯的公開雜誌上的。

王實味和我，以及和托派的往來，據我所知所憶，盡於此矣。1931年5月我被國民黨拘捕，最後割斷了我與他之間的來往。1932年春天，我已被判刑而囚禁在上海漕河涇的監獄裏，一天下午，獄吏把一包食物和兩本書交給我，說是有人來探監，沒有允許接見，留下了這些東西給我。兩本書都是英文的，一本便是我給王實味購買的《還鄉記》，另一本是法國福樓拜的名著《薩蘭波》。從書，我猜出了前來探監的人。他那時已經將書翻譯完畢，特意送來給老朋友在獄中消愁解悶。

從此以後，一直到抗日戰爭勝利，我才再聽到王實味的消息，那是從趙超構寫的《延安一月》得知的。

四、

新民報記者趙超構寫的《延安一月》，讓我於久違之後，再獲得這位元老友的消息。原來他去了延安，而且在那裏闖了大禍。「一個臉呈死灰色的青年，讓丁玲帶着，出來背書似地向記者們痛罵自己。」為什麼呢？為了他寫了一篇「反黨」文章：〈野百合花〉。

王實味何時去延安，我至今不曾查考出來。根據我所見到的一些有關文獻來推測，他大概是在抗戰開始後，特別是在京滬淪陷後，當全國大批知識青年奔向延安之際進入陝北的。他何時離開上海，我也

不清楚。1934年冬天，我被釋放出獄，重回上海時，他早已不在那裏了。陳其昌曾經同我談起過我被囚期間王實味的生活。但是一直留在我記憶中的只有這樣一件事：他和劉瑩生了第二個孩子——一個女孩。孩子落地時，他們又是一貧如洗。此時，幸得其昌將全家可當的東西統統送進當舖，得洋20元，拿去給他們應急，這才保存了那條小生命。當時李芬已在湖南遇難，為了紀念他們共同懷念的親人，給孩子取名「念芬」。

在他們離滬去延安之間的兩三年中，王實味究竟在何處工作，幹什麼工作，我只記得陳其昌說他是去山東教書的。他們二人之間的關係此時也斷了。因為1935-36年我都在上海，與陳其昌一起，經常見面，卻從不曾聽他談起這位元老同學的消息。據延安整黨文獻上的記載，「王實味直到1936年還與托派分子陳清晨通信」，如果這是真實的話，也不過最普通的問候吧了，否則我不可能不知道的。

共產黨贏得內戰勝利，一切的機關從鄉村遷入城市，中央由延安最後搬到了北京。這時候，「冠蓋滿京華」而「斯人」獨不見。我猜王實味始終不曾把自己「改造好」，未能重新獲得上面信任。不過我還是希望，有朝一日，我會在中共的報刊上忽然見到他的名字，我不希望他能有「一官半職」，只希望藉此可以證明他尚在人間。可是空等了幾年，我這個起碼希望卻終於讓毛澤東出來給打破了。

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最後提到王實味，文如下：

還有個王實味，是個暗藏的國民黨探子，在延安的時候，他寫過一篇文章，題名〈野百合花〉，攻擊革命，誣蔑共產黨。後來

把他抓起來，殺掉了。那是保安機關在行軍中間，自己殺的，不是中央的決定。對於這件事情，我們總是提出批評，認為不應當殺。他當特務，寫文章罵我們，又死不肯改，那就放在那裏吧，讓他勞動去吧，殺了不好。（見1969年原文復刊《毛澤東思想萬歲》，421頁。）

毛澤東給王實味發的這個「訃聞」自然使我悲憤。一個真摯、熱情、坦率的文人，一個懷有純潔高尚的理想主義的革命者，一個為中國共產主義的事業艱苦奮鬥了幾達二十年之久的老黨員，竟為了對黨提出忠告與批評的小文章，給加上「國民黨探子」的罪名處死了！但是我並不感到震驚，因為自從二十年代末期以來，史大林以及全世界史大林主義者對待政治上與思想上異己者的野蠻和荒唐的作風，我已見慣不怪了。

我只是期待着看到更詳細、更客觀的有關乎王實味案的文獻。

五、

最近在海外一間大學的圖書館裏見到了中共出版的一本《黨史通訊》（1984年8期），其中有一篇專談「王實味問題」的文章（作者宋金壽）。它滿足了我多年的期望，它讓我知道王實味當年在延安如何闖禍，他發表了一些怎樣的意見，結果得到怎樣的處置，他何時與如何被殺，以及中共的新領導者對王實味這個人採取怎樣的態度。

根據這篇文章提供的材料，我想給海外的讀者們，特別給對於王實味其人及其思想懷有興趣的朋友們，介紹一下我這位亡友因以遇難的見解。同時，我要以一個被牽涉在內的證人資格，向國內對此案有權審議的人們，提出我的要求和申訴。

先談王實味到底犯了什麼錯誤，後來又背了怎樣的罪名。

王實味的錯誤，在那篇文章裏給概括成三大項：

一、「站在資產階級立場，混淆革命與反革命的界限」；

二、「以青年人的代表自居，挑撥青年與黨的關係；鼓吹極端自由主義與絕對平均主義的思想」；

三、「主張和宣揚資產階級的文藝觀」。

這三大錯誤，主要表現在王實味從 1942 年 2 月至 3 月期間所發表的四篇文章裏（〈政治家、藝術家〉、〈野百合花〉、〈我對羅邁同志在整風檢工動員大會上發言的批評〉、〈硬骨頭與軟骨頭〉）。

這四篇文章，我見過的只有〈野百合花〉。它的文字與內容，今天留在我記憶中的也只有一些模糊的印象了。其他三篇，彷彿彷彿都不曾以「反面教材」在任何文件和報刊上重載。尤其發表在延安中央研究院牆報《矢與的》上面的〈硬骨頭與軟骨頭〉以及由王實味寫作的另外幾篇雜文，據說「今天已無法看到」，只能「從延安《解放日報》上刊登的反駁王實味的文章的引述中見到一些。」（見《甘肅師大學報》1980 年 4 月號，杜哲文寫的《關於王實味的一篇文章的題目》。）

不過這次《黨史通訊》上的文章把這幾項錯誤介紹得還算詳細。從它顯然偏頗的敘述中，我們多少仍能看到王實味的真正意見。

「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是〈野百合花〉文中的名句。作者用以形容當時延安業已形成的「升平氣象」，用以反襯「李芬烈士和抗日前線戰士們的犧牲」。作者認為這些「黑暗」點不應該諱而不言，應該揭發出來，讓大家改正。可是不少首長認為上層幹部們的及時行樂

是理當的，最多也只是小毛病、「小事情」、「算不得什麼」、「天塌不下來」——這在王實味看來，是非常危險的，是官僚腐化的開端，因而大聲疾呼，要整頓這股「不正之風」。

這個態度，我無論如何看不出是「十分明顯的資產階級立場」。恰恰相反，我覺得它是反對資產階級立場的，是反對資產階級對革命根據地的腐蝕作用的。

說王實味挑撥青年，鼓吹絕對平均主義，證據也是見於〈野百合花〉，在那裏，作者說了如下的話：

青年之可貴，在於他們純潔，敏感，熱情，勇敢，他們充滿了生命底新銳的力。別人沒有感覺到的黑暗，他們先感覺；別人沒有看到的骯髒，他們先看到；別人不願說不敢說的話，他們大膽地說。因此，他們意見多一些，但不見得就是「牢騷」；他們的話或許說得不夠四平八穩，但也不見得是「叫嚷」。我們應該從這些所謂「牢騷」、「叫嚷」和「不安」的現象中，去探求那產生這些現象的問題的本質。

這哪能說是「挑撥」呢？古今中外的任何改革與進步，若就改革者方面的動力來說，主要都得歸結到王實味文中所指出的青年人那些可貴的德性。別的不說，就拿中共本身的歷史來說吧，當年如果沒有《新青年》「挑撥」起中國一批青年的「純潔、敏感、熱情、勇敢與充滿了生命的新銳的力」，「挑撥」他們起來大聲疾呼，反對舊中國的「黑暗」與「骯髒」，哪裏來的中國共產黨？哪裏來的中國革命？延安當局那時要出來反對並壓制這種「挑撥」，只能證明在割據區域內做了十幾

年執政黨的中共，此時已染上濃重的官僚主義的色彩，已部分喪失其革命的青春氣了吧。

至於所謂「鼓吹絕對的平均主義」，指的是〈野百合花〉中如下的句子：

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卻實在不見得必要與合理——尤其是在衣服問題上一切應依合理與必要的原則來解決。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麪湯，青年學生一天只得到兩餐稀粥，另一方面有些頗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面對上面感覺到他們是異類，對他們不惟沒有愛，而且——這是叫人想來不能不有些「不安」的……動不動，就說人家小資產階級平均主義；他自己倒真有點特殊主義。事情都只顧自己特殊化，對下面同志，身體好也罷壞也罷，病也罷，死也罷，差不多漠不關心。

王實味在這裏明明說「一切應依合理與必要的原則來解決」；他分明不曾主張不論衣食或其他待遇，應一律平等，一切平均。主張在任何情況下的人人平等與物物平均，自是不符實際的幻想。硬要如此主張，甚至硬要如此實行，在客觀上會起反動作用。所以馬克思主義者反對這種小資產階級的平均主義。但這絕對不是說，馬克思主義者主張等級分化，鼓吹一部分人的特殊享受，另一部分人的無權受苦。馬克思主義者時時刻刻要在「必要與合理的原則」下，去消滅特權，使人人能逐漸趨於平等，使種種享用趨於平均的。

中共的某些（我不想說所有）領導者是否躲在「反小資產階級平均主義」的盾牌後面，心安理得地度其「特權」生活呢？經過「文革」

與「反四人幫」二次鬥爭的大量揭露，我只能說王實味實在有「先見之明」。我們只能佩服他言人所未言的大無畏精神。

王實味被扣上的第三頂帽子是「主張和宣揚資產階級的文藝觀」。關於這，宋金壽的文章裏說了並引了如下的話：

在文藝思想上，王實味割裂了文藝工作與整個革命工作的關係，鼓吹文藝工作的任務就是要「暴露黑暗」。在〈政治家、藝術家〉一文中，王實味把藝術家同政治家對立起來，要藝術家去「揭露」政治家心靈的「黑暗」。王實味要一切文藝工作者把文藝作為「揭露」我們自己「弱點」的手段，他說：「大膽地但適當地揭破一切骯髒與黑暗，清洗他們，這與歌頌光明同樣重要，甚至更重要」。在文章的最後，王實味向藝術家發出號召：「謹以真摯的赤忱和熱望，敬向藝術家同志們發出一個微弱的呼聲：更好地肩負起改造靈魂的偉大任務罷，首先針對着我們自己和我們底陣營進行工作。」

我不知道這裏一再轉引的王實味的文句是否經過竄改；但即使字字真實，我也看不出〈政治家、藝術家〉一文作者的立場是「資產階級的」，「割裂了文藝工作與整個革命工作的關係」。證以最近三十年來中共的文藝政策及其所造成的結果，特別看到了所謂「文化大革命」中文藝之如何受到摧殘，一般文化人與特殊的藝術家之如何遭到糟塌，我們只能說王實味確曾提出過及時的警告，他確有真知灼見。經過「十年浩劫」之後，今天竟尚有人主張文藝工作者必須是「歌德派」，必須為黨的領導者隱惡揚善，必不可揭發「不正之風」，必不可對「自己的陣營」提出批評；否則便是「敵我不分」，便是「站錯立場」——這，至少是讓人驚奇的。

王實味在 1942 年春天寫作的這幾篇雜文，其中所透露的思想與感情，比之以三十四年後，即 1976 年 4 月 5 日北京十萬群眾在天安門廣場以詩歌表達出來的抗議，雖然無此激昂，卻更為系統與深刻。

更有意思的是，宋文第一次告訴了我們王實味這幾篇文章在延安所造成的巨大影響。它說：

《矢與的》（按：這是延安中央研究院的壁報——西）正式出版於（1942 年）3 月 23 日。在壁報的發刊詞中說，「以民主之矢，射歪風之的」，並提出壁報主張「徹底民主」、「絕對民主」，又說，「誰阻礙民主，誰就會在民主前碰出血來」。在這種宗旨之下，壁報上除了連續發表了王實味的文章以外，還有不少鼓吹極端自由主義和絕對平均主義……《矢與的》壁報出版以後，看壁報的人川流不息。有幾期壁報貼在布上掛延安南門外，看壁報的人像趕廟會一樣多。當時，王震去看過《矢與的》壁報，對壁報上的文章表示很不滿意。毛澤東在一個晚上去看了《矢與的》壁報，毛澤東說，「思想鬥爭有了目標了。」（加重號並非原有——西）

上一段文字裏顯然有故意歪曲與捏造壁報原作字句的地方。例如，加上引號的徹底民主與絕對民主，凡稍有共產主義運動常識的人都知道，那是決不可能寫在延安中央研究院的壁報上，作為正式主張的。但雖如此，這段文字卻非常出色地給我們描寫了王實味這幾篇小文章如何在當時造成了大哄動、大影響。它又形象地告訴我們毛澤東著名的《文藝講話》與王實味的思想發難之間的密切關係。

延安南門外張貼的壁報，無論在形式上與內容上，都與三十多年後天安門前與西單牆上的詩歌與文章，前後一致，相互呼應的。

六、

王實味讓延安當局如此痛恨，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文章之外，又由於他爭取民主的行動。關於這一重要方面，《黨史通訊》裏的文章有如此記述：

1942年3月18日，中央研究院召開全院大會，動員整風並檢查工作。副院長范文瀾向全體同志作了關於整頓三風和檢查本院工作的動員報告。會上，就成立院整風檢查工作委員會的人選和出版壁報的問題發生了爭論。關於院整風檢查工作委員會人選問題，院務委員會的決定是各研究室主任以上的領導同志為當然委員……同時，在群眾中推選一部分同志，共同組成。但王實味率先提出，院整風檢查工作委員必須由群眾直接選舉產生，各研究室主任，即使是院長，同樣必須經過選舉才能成為院整風檢查工作委員會的成員，才有領導整風檢查工作的資格。於是，贊成院務委員會的決定和贊成王實味意見的同志之間發生了一場激烈的爭論。結果，贊成王實味意見的佔多數。最後決定院整風檢查工作委員會的成員由群眾直接選舉產生，並進行了選舉。在出版壁報問題上……王實味則提議，為了保障投稿人的民主權利，壁報上的文章可以不署真名或用匿名。一部分人反對王實味的提議，認為整風檢查工作是黨中央、毛澤東的號召，幫助院領導檢查工作，光明正大，不應匿名。同樣，這個問題也發生了激烈的爭論。最後，認為可以匿名的也佔了上風。於是，一些同志高唱，這是「民主」的勝利。（加重號並非原有——西）

王實味的此一鬥爭，我是從宋金壽的轉述中首次知道的。列寧的民主集中制，本來與後來史大林的官僚集中制有本質上的不同，最主

要的分別是前者必須先有自下而上的選舉，然後自上而下的集中；後者則只有上面的「領導」，只有上面的指派，而群眾則只有絕對服從的義務，絕無選擇領導與監督領導的權制：這裏只有集中而無民主。至於匿名，亦即無記名投票或無記名發表意見這個極為重要的民主措施，那是被當作「陰謀」而絕對排斥的。

早期中共有健全的民主制。後來經過一再「布爾雪維克化」，終於讓王明與康生一夥將全套「蘇共模式」介紹並應用到中共裏了。1942年的延安，王明雖然在政治上已居下風；但在那棄王投毛的康生主持下，中共組織，尤其是它的特務體制，卻已將近完成其「布化」手術了。

王實味那次民主鬥爭，正代表着中共黨制徹底走向史大林主義化的一個里程碑。在中共的思想以及黨制的變遷史上，它是重要的一頁。人們只有熟悉了這一頁，才能充分理解中共於全國勝利後的那些「運動」，特別是那些針對知識分子的「改造」運動。

七、

針對王實味要求「絕對民主」的發難，延安最高當局如何反攻，《黨史通訊》這篇文章裏有比較詳細的敘述。只因不想讓我這篇文字過於冗長，不再逐一轉錄，這裏只摘述其大致的經過如下：

一、1942年3月31日，即在王實味發表他〈政治家、藝術家〉的一個星期之後，毛澤東在延安《解放日報》的改版座談會上，不指名地批評了王實味的錯誤。

二、同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傳部作出《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其目的在於「糾正王實味帶頭刮起的小資產階級歪風。」

三、4月6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高級學習組發言，指出「在整風發動階段中存在着三個問題」。毛說：「批判王實味，解決一部分青年知識分子的問題，需要做兩方面的工作：一是思想上的，二是物質上的。」

四、同時，胡喬木根據毛澤東多次講話的精神，兩次找王實味談話，還寫過兩封信，希望王實味改變錯誤立場。

五、4月7日，中央宣傳部約集中央研究院的負責幹部和積極分子開座談會。會上指出王實味的有系統的錯誤與一部分同志的「自發性偏向」之間，應加區別。從此，中央研究院開始了對王實味的思想批判。

六、同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了中央研究院整肅的文章〈讀《野百合花》有感〉。自此開始了對王實味的公開點名批判，唯仍以同志相稱。

七、5月2日至23日，召開由毛澤東與凱豐主持的「延安文藝座談會」，批評了「王實味的資產階級文藝觀，把對王實味的思想批判提到了新的高度。」

八、同年「4月底5月初」，康生在中央社會部的一次會議上說：「王實味的〈野百合花〉4月在香港的報紙上發表了。」康生此時已把王實味當成敵人。稍後，康生更具體地說王實味是「托派分子，也是復興社分子，是兼差特務。」

九、5月27日起，中央研究院召開「黨的民主與紀律」座談會，討論王實味錯誤的程度。一部分人認為這不過是自己人間的意見差異，另一部分人則認為王實味在「組織上雖仍是同志，但是思想上已成了敵人。」

十、6月1日，座談會上有人提出王實味與托派的關係問題，會上討論從此便一變而為對王實味的批判與攻擊。

十一、6月4日，王實味奉命出席會議。聽取人們對他「平時散佈托派言論」的揭發，並對他提出了許多質問。「王實味承認了自己同托派王文元（王凡西）等的關係，以及同志們對他的揭發。」

座談會開到6月11日結束。中央研究院的黨領導做了結論：「支配着王實味的思想是托洛次基分子的思想。」「王實味是個托洛次基分子。」

十二、王實味被定為托派以後，又牽連到中央研究院潘芳與宗錚，以及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的成全與擔任中央婦委的王里。自7月起直至10月，這5個人被批鬥了72天。結果被打成「五人反黨集團」。

十三、10月，王實味被正式開除黨籍。

十四、1943年4月1日，康生下令，於一夜間在延安逮捕了二百多名「特務」、「漢奸」、「叛徒」、「托派分子」。王實味在被捕之列，被關押在棗園後溝的西北公學內。

十五、1947年3月，「胡宗南進攻延安，黨中央和邊區各級機關以及人員，全部撤離延安。王實味同時被押撤離。過黃河到晉西北根

據地以後，在未經黨中央批准的情況下，由中央社會部的幾個人決定，下令槍殺了王實味。」

八、

我這裏真得感謝《黨史通訊》這篇文章的作者，他告訴了我關於王實味闖禍、挨鬥與被殺的詳細情形。更加使我感激的是，他讓我知道了中央新的領導人對於王實味問題的看法。文章作者「查閱了一些歷史材料，同時走訪了部分曾經接觸或受理過王實味問題的老同志，了解了他們當時的認識，以及現在對於王實味問題的基本觀點……，歸納起來有以下幾個要點：

「一、對王實味的思想批判是完全應該的，也是必要的。王實味有嚴重的錯誤，不僅有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的立場和觀點（包括資產階級文藝思想）的錯誤，而且也有托派思想」。

「二、『五人反黨集團』是不存在的，應給予平反。事實上，除王實味外，其餘4人（成全、王里、潘芳與宗錚）已於1982年2月2日由中共中央組織部作出決定，正式給予平反，撤銷對他們的處分，並恢復名譽——雖然這四個人早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了。」

「三、王實味到底是不是托派分子？多數同志認為，有關部門應該進行重新審查，如果是錯案，即使人死了也應該給予平反。」

「四、槍殺王實味是不對的。許多老同志認為，即使王實味是托派分子也不應該槍殺。」

關於王實味的思想問題，我不想於上面的略談過的一些之外再說什麼。他對民主、特權以及文藝創作的見解，至少還有他的幾篇短文在。究竟它們是否代表「資產階級立場」，今後有心的讀者，會憑此作出自己的判斷的。

歷史是最公平的裁判，雖然它需要比較長的時間。我相信它終於會宣佈在這些問題上，到底正確的是誰。是王實味呢，還是將他殺害的那些掌權者？其實，通過「十年浩劫」的慘痛經驗，歷史已經為我們作出它的初步判決了。

作為長文的結束，我這裏只想就王實味的托派關係再說幾句話。

中共的新領導者對於托派、乃至對於王實味的態度，顯然與毛澤東—康生的態度有很大的不同，特別與信口亂吠的康生不同。毛澤東說過王實味「不應當殺」，但他還是一口咬定那個被害人是個「暗藏的國民黨探子」。殺了人，還隨便加人以荒唐的罪名，這種做法，我相信目前的中共領導人已在逐漸改正了。他們自己在「文革」中吃過這種苦頭，現在似乎認真想把中國推上法治的軌道。對於這，我們當然是擁護、贊成的。中國的托派，即早年由中共分裂出來的左派共產主義者，於1952年12月間全體被捕，一直給加上反革命的罪名囚禁在監獄裏。1979年6月，中共的新領導人決定將他們全部釋放——這件事，當然也值得歡迎。這是當權者「撥亂反正」，他們要以「法治」來代替「人治」的證據。不過，直至目前為止，據我所知，中共新領導人對於國際托派與中國托派的評價，基本上仍受着史大林—王明—康生的影響，仍舊停留在這一幫人所劃定的框子裏。他們既無決心、又無興趣去弄清楚六十年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史大林派與托洛次基派所爭論的問題誰是誰非。他們也沒有決心與興趣去弄明白這兩派在

中國問題上的是非曲直。今天他們顯然已否定了康生從莫斯科帶來的一套對中國托派的誣讒，即已不再把陳獨秀及其他的托派說成為「漢奸」、「特務」與「復興社分子」；但他們仍不肯把中國托派以革命陣營中的一派相待，仍不肯給他們作政治上的「平反」，仍不肯恢復他們應有的名譽。這，不但對歷史說是不公正，而且對實際的政治說是大大地有害。因為，我們若只就社會主義建設一點來說吧，蘇共當年左派反對派的政綱（先反對史大林的極端右傾，後反對史大林的「極左」冒險主義），對於今天中國所面臨的問題，也仍具有無上參考價值。

中共的新領導人認真要找到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他們應該詳細徹底地研究二十年代中、後期與三十年代初期發生於蘇共的內部的各派（主要以托洛次基、布哈林、史大林為代表的）關於建設社會主義的不同意見。而要真正進行這種研究，首先得取消史大林為了保證一己勝利而強加在敵對派系頭上的種種荒唐罪名。必須首先為那些被史大林陷害致死的人「平反」，為他們「恢復名譽」。

這是我由王實味問題而引起的對中共領導的最佳期望。

不過我又願意退後一步，願意在中共對托派的現有看法之下，出來為王實味說幾句話。我要以「被告」的證人資格，向可能「重新審查王實味一案」的那些主持人，提出以下的陳述：

在我的回憶錄中有這樣一句話：

在中共統治區內，一些自動前去參加工作的托派（例如王實味等），遭到了無情鬥爭，並最後被殺害了。

這裏我應該指出，這句話說得不甚確切。正如我在上面所憶述的，王實味雖與陳其昌和我有過長期較密切的關係，雖然他思想上受過托洛次基某些意見（特別是文學方面的見解）的影響，但他始終不曾參加過中國托派的任何組織。

我們可以說王實味曾經是托派的一個同情者，卻不能說他是托派分子。

必須聲明的第二點是，王實味大約從 1929 年至 1934 年這個期間與黨失去聯繫，為想重新參加組織，他那時確曾徘徊於「中央派」與反對派之間。但最後他參加前者而不參加後者，而這完全是出於他獨自的決定。當他決定重新加入中共組織之後，便斷絕了與托派朋友的來往。

這裏絕不可能存在什麼「派遣」問題；絕對談不上什麼「滲透」用意。

希望我這兩項證言能多少有助於王實味最後一關的平反，更希望王實味的平反又能有助於他今天多半還存活着的妻女的遭遇。

王實味前往延安時，妻子劉瑩與女兒念芬一定不曾同去。因為我不曾見有任何文件提到過她們。我猜，當時她們是回湖南老家去的。在後來戰爭和革命的艱苦歲月裏，特別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她們是怎樣度過來的呢？或者她們根本不曾挨過來嗎？

但願她們一向無恙；更願她們終能因丈夫與父親的沉冤得白而免受不該受的歧視。

1985 年 2 月 10 日寫畢

後記

文章寫完，重看一遍，發覺意猶未盡。由於寫作的目的使然，我側重事實方面憶述了我的這位老朋友，卻不曾在性格與才能方面介紹他——至少是介紹得很不夠。翻翻我三十三年前以「潤土」筆名發表在香港《星島晚報》上的那篇舊文：〈記野百合花作者王實味〉，其中有幾段文字似可補些此文的不足。因此摘錄在下面，作為本文後記。

就作家論，王實味卻是有才氣的。他的文字漂亮，口語寫得生動。和張天翼是同學，二人感情好，竟致寫的東西有時可以混淆。

只因他生活窘，每月的柴米油鹽等着他筆頭上寫下，所以大多時間，不得不花費在譯作上。……

王實味不是恃才傲物的人，尤其不會故作倨傲。他宅心善良，性子耿直。要說毛病，也許是暴躁一點，太易激動。一不合意，他便會臉色變青。對朋友，不分新舊，他一樣會任性使氣。胡風跟他，一度曾經是同班同學，胡風也是出名的拗性子，可是相形之下，這位曾被魯迅先生稱為不懂世故的批評家，竟可說是頗為圓通的。

在普通朋友中，王實味這種性格最多是吃不開；和相處久了，很多人還會了解他，喜歡他，因為他實在是真實得可愛。因此王實味的朋友雖然不多，所往來的卻都說得上是性氣之交。可是在較大的圈子中，在政黨的同志中，王實味的脾氣就難於叫人諒解了。

他加入中共很早，約在 1927 年春天，他之入黨，與其說是由於思想，毋寧說是由於感情。對於他，任何種類的壓迫都是難於容忍的。舉凡政治、經濟、思想等領域內既成的與陳舊的東西，他幾乎都反對。說得抽象些，大概他的血液裏天賦有反叛的氣質，正是這個氣質，使他走進了一個站在最左邊的革命黨。不是馬克思主義使他成為共產黨員的。關於馬克思主義，他不但讀過，而且還譯過一些書，可是始終不能算已精通，這是說，馬克思主義始終不曾進入他的靈魂深處。不管他讀過多少本歷史唯物論的著作，他卻牢牢地保持着一個見解，那就是「人性改革論」。根據歷史唯物論，社會制度改變，人性才會跟着逐漸地改變；根據王實味的見解，若不同時（或者首先）改革人性，則社會制度也終於改不好的。至於如何改變，則他就想到教育、藝術、甚至道德說教方面。

為了這個「人性」，王實味和的朋友不知面紅耳赤地吵過多少嘴。吵多了，後來朋友們多半當他說瘋話，或者和和的調，隨他去。可是在紀律嚴明、思想劃一的政黨裏，這可闖下大禍了。這回在〈野百合花〉案中，「人性論」構成了王實味的諸大罪狀之一。

* * *

社會科學中的思想命題，跑進文學家藝術家的頭腦中去時，多半要改變面貌的。文藝家彷彿有一種特權，他們可以，而且一定要用自己的方式來表現這些思想。在嚴格的社會科學家的眼中，這些方式或者可笑，或者荒誕，或者幼稚。但若拋開那些可笑、荒誕與幼稚的思想方式，直接與百分之百地，依照社會科學

的方式來從事文學或藝術的創造活動，結果一定不行，他們的努力一定失敗。正是為了這個緣故，一些真正高明的革命導師們，不會把思想尺度與藝術尺度混為一談。他們對於某些文學家或藝術家的偏差見解，常能採取寬容態度。當年馬克思對於海涅與佛拉烈格拉脫，列寧對於高爾基，以及高爾基本人之對於詩人布羅克，便都是這樣的。

王實味的「人性論」，乃至他的「自由主義」，如果與布羅克的「人文主義」及其「反教化主義」相比較，倒是正常得多的。布羅克的思想，有好些地方簡直是標準的瘋話。可是這些瘋話並不曾構成過什麼「案件」。

把政策性拿來作為一切文藝活動的標準且視對此標準的違背為一種刑事案件，這在蘇聯是史大林獨攬大權以後才有的事。

22. 〈王實味與野百合花〉讀後感

香港朋友寄給我《明報月刊》上戴晴女士的長文〈王實味與野百合花〉，讀後頗多感觸。它不但勾引起我對亡友的思念，它又讓我聯想到與此一悲劇有關的一些重大問題。不過我首先得感謝戴晴女士的，是她這篇文章讓我知道王實味夫人劉瑩及其兒女們的遭遇。原來她們與我一向的最壞猜測相反——雖然受盡苦難，卻還健在。而且，「她們現在已不止母子三人，王實味已經有了女婿，有了兒媳，還有孫子和外孫」了。

故人有後，這，照我們中國人傳統的感情來說，當然是一大安慰。但是無論對王實味的親人，或者對像我這樣的老朋友，或者對中國的民主化與法制化，或者對中共的自我批判與自我改正來說，意義無限重要的，卻是要堂堂正正、明明白白地把那頂妄加在王實味頭上的誣陷罪名拿掉，要給王實味徹底平反。

為了這個目的，三年前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談王實味與「王實味問題」〉（見1985年5月號香港《九十年代》月刊）。那時我想以我這個老托派身分，列舉一些事實，證明王實味過去雖然與托派分子有過朋友關係，雖然同情過托派的以及托洛次基的某些主張，而且還替

編按：本文原載香港《明報月刊》1988年9月號。

托派翻譯過一些文章，卻從來不曾參加托派組織。在那篇文章裏，我還鄭重指出：後來王實味之前往延安，完全出於他本人的決定，和他任何一個托派朋友無關，並且，從此之後，他便斷絕了與過去托派朋友的關係。

我原本希望，這樣的證言，已足夠使重新審定他一案的人拿來當作證據，去最後並正式平反王實味了。

可是事隔三年，王實味的平反都仍渺無消息。戴女士這次的文章搜集與羅列了大量事實和證據，敘述了王實味一案的詳細經過，我想，總該引起中共現當局的注意了吧。為了做到「有冤必伸」，「有錯必改」的言行一致，我希望他們終於能完全為王實味翻案，正式宣佈他是蒙冤屈死，正式恢復他作為一個共產主義革命者的榮譽，並且，對於受害人的遺屬，應作出應有的賠償。

不過，這還不夠。正如戴女士的文章所說：「歷史在前進。」「將『托派分子』作為王實味的罪名，也應完成它的歷史使命吧。」換句話說，托派這頂帽子，已根本不能用來入人以罪了。

戴晴女士在這裏舉出了鄭超麟的例子。她說：

中國共產黨的「左派反對派」——托派組織全部成員自1952年一攬子捕盡之後，又於1979年全部釋放（倘使還活着）。當時的領袖如鄭超麟先生，如今已作了上海市政協委員，並且不斷有著作問世。更值得一提的是，這釋放與人事安排都是在他鄭重聲明不改變自己的觀點與行為準則情況下作出的。

既然真正的托派都已經釋放，既然聲明不願放棄自己主張的托派領袖都同樣釋放，而且還給安排了工作，那末，僅僅沾着點托派邊兒的王實味，自然不該再為此罪名而繼續蒙冤了。

戴晴女士的話說得很婉轉，但是說得很好。在有關中國托派與王實味這個問題上，我彷彿還是第一次見到中國歷史家與政論家們發表這樣的獨到見解。

其實，王實味問題絕對不該停留在他曾否參加托派組織這一點上。人們（包括處理或審查王實味一案的中共幹部在內）現在必須無限地放大眼光，必須從史大林與托洛次基之間的大鬥爭來看這個問題。必須徹底研究從來史大林與史大林派強加在托洛次基與托派頭上的各種罪名是否成立。如果這樣的觀察與研究的結果證明前者有罪而後者無事，那末，作為成千上萬的史大林罪惡路線受害人之一的王實味，也就自然而然地平反了。

歷史確實是在前進的。它在史托問題上的進度，比戴女士所指出的情形又已大大不同。目前究竟已前進到什麼地步呢？請看下面這段報導：

前來（莫斯科）參加下月召開的聯共黨的非常大會的一位代表，那位激烈反對史大林主義的歷史家，尤里·阿法那西耶夫博士，昨天公開號召為托洛次基恢復名譽，並出版他的著作。這樣的號召，在蘇聯還是第一次。

他在莫斯科舉行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說：「我們絕不能將平反與司法覆查的過程停止在任何一個階段上，也不能把任何人排除在外。我們必須站在法律公道的立場上，把所有受壓迫和誣捏的

人統統加以平反。在這一點上，托洛次基與其他所有受史大林迫害的人應受到同樣待遇。

托洛次基在政治上的平反問題，我想，將是這一方面的一項突破。不過要做到這一點，還有賴於當前改革運動在歷史科學方面的深入，也將視乎目前正在我們進行中的內部政治鬥爭。

自從本年初布哈林得到平反，最近加明尼夫與季諾維也夫也得到平反，1917年革命的諸著名人物中，只有托洛次基迄今仍被定為罪人，仍被稱作蘇維埃人民的敵人。所以阿法那西耶夫博士說：

我相信托洛次基的著作，和史大林與赫魯曉夫的著作一樣，應該出版，應該讓所有的人，不論是教員，學生或一般公民，都可以讀到。

現在那些教授們與教員們企圖批評托洛次基，但他們從來不曾讀過托洛次基著作的一個字——這情形是很奇怪的。他們之批評布哈林、加明尼夫與季諾維也夫，情形也是如此奇怪。

我們應該在最近將來見到這樣的情形：這幾位的著作會和其他現代史料一起放在書店與圖書館裏，讓一切想讀的人都可以讀到。

阿法那西耶夫博士原本不曾被選為這次非常大會的代表，只是由戈巴卓夫授權，由黨的上級出來干涉，才被莫斯科的市黨部在最後一次會議上選作代表。

阿法那西耶夫博士現任國家檔案人才學院院長（筆者按：據另一些報導，他是國家檔案局局長，不知哪一名稱較為正確，待查）。在過去十八個月中，這個學院成了研究史大林恐怖的一個

中心。他是改革運動的最著名、最敢言與最激烈的一位擁護者。（1988年6月18日英國《衛報》駐莫斯科記者 Martin Walker 的通訊。）

這雖是一則短短消息，卻讓我們見到了不但「歷史在前進」，而且「真理也在前進」。

蘇共黨的緊急大會現已閉幕。大會沒有對托洛次基作出任何決定；但是一定要把史大林造成的所有冤案弄個水落石出的決心卻是極為明顯的。大會決定要為一切受史大林迫害致死的人建立一座紀念碑，這便反映出蘇聯大眾必欲根絕史大林恐怖的決心。我相信，那個恢復歷史真相的運動今後一定加速前進。遲些早些，我深信蘇聯人民一定會把過去半世紀來史大林堆在托洛次基身上的全部污泥洗刷乾淨，恢復托洛次基以及所有托派的應有名譽。

中共的領袖們過去在政治上是受史大林與史大林主義影響的，但他們不曾參與史大林所實行的恐怖。史大林犯過的罪惡，他們無須分擔責任。至於康生一夥從莫斯科直接輸入的反托反陳（獨秀）活動，雖然熱鬧過一個時期，卻不曾造成太大災害。王實味案可說是他們最「傑出的」表演了。（文革中的所有冤案，都不是或者極少是利用托派帽子的。）

中共的現領導人是戈巴卓夫以前的戈巴卓夫。他們是共黨改革運動正負二面的先行者。對托派言，他們是早在1979年便已不聲不響地事實上改變了態度——將所有拘禁了廿七年的尚存托派釋放了，並加以生活安排。

然則，政治上完全平反托洛次基與托派——即承認他們過去的主張與活動不是反革命，並恢復他們應有的歷史地位——中共領袖是否

也能走在戈巴卓夫的前面呢？希望他們能夠做到；一切期待中國民主化與法制化的人們，必須努力使這樣的情況早日到來。

到了那個時候，王實味這個人，不管他生前與托派有過怎樣關係，也就不平反卻自平反了。

7月14日寫於英國

23. 王實味冤案平反的餘波

翻閱前些時子春剪寄來的一篇文章：〈生命的光華與暗影——王實味傳〉（黃昌勇作，見1994年第一期《新文學史料》雜誌）文章寫得不壞，態度極公正。其中引用我寫的〈王實味與「王實味問題」〉一文的好些段落，引用得也很信實。此文對王實味冤案的徹底平反；對毛澤東、史大林罪惡的文藝政策的充分揭露，都大有好處。只是作者摘引王實味夫人劉瑩於1985年7月向中共有關方面提出的《申訴材料》，其中提及王實味與陳其昌和我的來往情況，卻使我感到很大的失望與痛苦。在《申訴》中，劉瑩把其昌和我都說成說謊者。說為了「別有用心地達到他托派宣傳的一絲目的」，我「完全對王實味撒謊」，隱瞞自己的托派身份。同時又說我為了籌措一筆錢來給妻子生產，需要王實味幫忙翻譯托傳，卻不告訴王實味托洛次基是什麼樣的人，直到王實味譯「二章」之後，劉瑩才知道譯的是托洛次基自傳，此時她才勸王實味不要再譯。對陳其昌，劉瑩說他隱瞞托派身份，而且連自己的地址都不告訴他們，因此引起了他們的懷疑，不久搬家，「從此與一般同學和熟人斷絕了來往」。

這樣的《申訴》，目的顯然要說明王實味和兩個托派朋友有過的一點點關係，是完全受了欺蒙，是不自覺的。等到知道了那二位老同學的托派身份，便立即主動與那二人割斷一切關係。為了給丈夫洗冤，為了爭取他的徹底平反，王實味夫人作了如此《申訴》。她的這份苦衷，我能夠了解，也多少能夠原諒。只是，把王實味的，同時也是她

自己的二位老同學，形容得如此不堪，怎能與王實味當年在延安所作聲明，即在他遭到批鬥前後，仍然說那二人的「人性是好的」這個事實相調和呢？

說王實味譯完了托傳二章之後，仍然不知道托洛次基的政治立場，必須等到夫人給他提醒，他才知道托洛次基是什麼樣人——這，未免把王實味的政治知識與認識說得太糟糕了。劉瑩所說的一些「事實」，完全與事實不符。也許除了上面所說的「苦衷」外，還因年份隔得太久，記憶失真吧。本想給《新文學史料》的編者寫一封信，糾正那些不確之點。轉念一想，算了。更正信人家未必會登，如果註銷來必然讓這位受夠了痛苦的老婦人心中再添若干隱痛。

「身後是非誰管得」，隨它去吧！

24. 悼靜貞

(1979年10月30日)

劉靜貞同志於本月15日在上海逝世，離開她最後遷出勞改工廠，僅僅三個月零十天。她原本是在1952年12月間被捕的，同時被捕的有她的愛人鄭超麟同志，還有數百名別的中國托洛次基主義者。她在獄五年，於1957年獲釋。出獄之時，她就已患上嚴重的風濕症，不良於行了。同時她和親友們失去了聯絡，無處可以投奔。若非她以前的房東加以援手，給了她一席棲身之地；又若無海外二三朋友寄給她小量接濟，她多半早已在當時流落街頭，凍餒而死了。

可是這樣的孤苦生活，她也無法長期繼續下去。等到六十年代中期，「文革」興起之後，新的苦難又降臨到她的身上了。由於她是一名定過罪、服過刑的「反革命犯」，她丈夫又是「反革命頭頭」，她不斷遭到了自覺的史——毛主義者與不自覺的紅衛兵們的殘酷「批鬥」。當時的靜貞同志不但兩腿癱瘓，而且雙目都將近失明；可是這批中共的「英雄」們對她卻絕不「手軟」：時時將她從樓上硬拖下來，拖上街頭，加以侮辱，甚至毆打。據某些目擊者事後見告，這位病廢的年老婦人，每次挨鬥之後，總是由鄰居的一個大孩子將她背負上樓去將息的。這個孩子從小受了靜貞的教育，從心底裏相信「婆婆」是一個好人，是一個革命者而非「反革命犯」。

這樣的生活挨到了1972年，那時「文革」事實上已近尾聲。鄭超麟等獲准從正式監獄移禁於上海浦東的一家勞改工廠。此時不知是由

於她自己的申請，還是由於官方安排，靜貞也被送進了那個勞改營，與超麟同住。

一住七年。到了今年6月5日，超麟與其他11名托派同志被恢復公民權利，並准許居住在上海市郊的一座民房裏，靜貞這才算是多少脫離了苦海。她至少已獲准和朋友通信，可以和親戚接觸了。我們正希望這位長年淒苦的革命者能在晚年稍稍補享一點人間的普通溫暖；可又誰知「命運」多舛，她竟連這點起碼的幸福都讓突然的死亡給剝奪了呢？

作為靜貞同志多年戰友的我們，於此感到無限悲痛；對於靜貞的平生知己，即對於超麟同志，我們寄以無限同情，寄以難於言傳的弔唁之意。

不過更有重於悲悼的，我們得將靜貞高潔的一生，約略介紹給青年朋友們。

靜貞同志大約於1926年或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武漢，她參加了當時蓬勃發展的革命運動，並且在工作中與超麟結成了夫婦。革命失敗後，她潛赴上海，從事黨的秘密工作。1930年中共發生左右派分裂。靜貞參加了左派（即托洛次基派）。1931年，她首次與超麟等一起被國民黨所捕，渡過了短短的牢獄生活。出獄之後，她便以托派共產主義者身份，一貫從事教育工作，特別是婦女與勞工子弟的教育工作，直至1952年中共的特警將她捕去為止。

統觀靜貞同志的一生，作為一個革命者也許可說是「平凡的」。既不曾有赫赫之事功，亦無皇皇巨著。無論在共產黨內或在反對派內，無論在內部工作或外部工作中，她都不曾擁有任何足以誇躍的官銜，

也不曾佔有過什麼發號司令的機關。雖然她是確有領導才能的，因此朋友們時常半開玩笑半正經地稱她為「校長」而不名。只因極其看不起革命隊伍中某些人的爭權奪利，深惡那種只肯當領袖不肯做群眾的不正派作風；她數十年如一日，寧願以一個普通列兵身份，默默地守着她的崗位，忠誠地完成她的任務。她並不顯得發揚蹈厲，也從不表現出慷慨激昂。可是這位異常溫和的婦人，卻賦有同樣異常的堅毅勇猛。一經認清了鬥爭方向，確定了人生道路，她便不顧一切地走向前去，排除任何艱難險阻地走向前去。在我與她相識的半個世紀（我是在1929年初次認識她的）中，我沒有看見她有過一個時期的動搖，也不曾見她有片刻的追悔。她一直在自己選定的道路上走着，走着，直至走到她精疲力竭，走到生命的盡頭。

這是多麼地不平凡，多麼地難能可貴的精神啊！

靜貞同志這一份始終不渝的精神，不但貫徹在她對革命的獻身上，而且表現在她的私人生活上。（這二者，在靜貞的一生中，其實是合二為一的。）她原本出生於雲南的一個大富之家。這就是說，在個人生活方面，她大有退路的。1929年中國革命失敗後，有多少個革過命的男女青年，做了「回頭的浪子」，回去與不革命或反革命的父兄妥協，就此改渡其不革命或反革命的生活了呢？可是靜貞不肯這樣幹。她寧願到上海去，在蔣介石的白色恐怖下，冒着生命危險，繼續其「浪女」生涯。1931年之後，中國的左派共產黨人備受摧殘，同志們的生活極端困難，此時靜貞若為一己打算，當超麟被處長期監禁後，她似更應返回老家，在兄長（靜貞的父親早故）的蔭蔽下，過些逍遙自在的日子。可是她還是不幹。她寧願單獨留在上海，為陷獄的愛人及其他同志服務，同時在教育方面，繼續她的革命活動。最後，當中國托派於1952年尾全體為中共所鎮壓，在她本人被捕期間以及後來刑滿出

獄之後，如果她為個人打算，亦盡可以奉命離婚，與「反革命丈夫」劃清界線，設法與老家和解，如此則至少可以少受些痛苦，安渡她的殘年。可是她仍舊不幹。她逆來順受，打落牙齒往肚裏吞，一心一意堅持着她認為正確的事業，守候着她深愛的親人——直至她咽下最後一口氣。

像這樣一位革命者的逝去，怎能不在她同志們的心中引起最深切的悼念？作為她終身伴侶的超麟同志，在此損失中會受到怎樣的打擊，我們簡直是不敢想像的。但願這個從無盡苦難中含笑歸來的大勇之人，能一似既往，勇敢而豁達地接受這一個就其私生活說該是最沉重的打擊。

老一輩的中國托洛次基主義者沒有能給青年同志們留下什麼值得驕傲的「遺產」。有之，那只有一個相當普遍的傳統，即是由劉靜貞同志充分體現出來的那一份始終如一，不屈不撓，安於窮困，安於普通一兵的革命精神，這份精神是值得保持，也值得年青同志學習與發揚的。它是革命馬克思主義者終於能夠勝利，終於能夠在中國乃至全世界勝利的幾個可靠保證之一。我謹藉悼唁靜貞同志之機，願將此傳統奉獻給年青一輩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

25. 懷念宋雲彬與許志行

一、

大約兩年半前，我偶然讀到徐鑄成先生寫的一篇短文：〈三扇門〉。那是關於宋雲彬的故事的。宋雲彬是我的一個鄉前輩，也是我的一個老朋友，當讀到他在文革中的遭遇以及他臨死時的情形，引起我無限感慨，也勾起我無數往事的回憶。很想把這些感慨與回憶記下一點來，卻因為年老力衰，幾次提筆又幾次放下。

最近承蒙一位朋友遠道寄來一篇許傑先生的文章，關於我另一位鄉前輩許志行的。它報導了許志行的死訊，談了他早年和毛澤東的關係，還談了近年來志行的不少情況：這又引起我的深切懷念。老朋友的影子重現在我的心眼裏，往事歷歷，不將他們記下一點是無法安靜的了。

「那時候的杭州，真正的赤色思想原已存在……我的幾個鄉前輩在杭州搞國民黨（實則共產黨）。S.Y 也有了，第一師範裏有一點組織，我的自小朋友 H 就是那個組織的負責人。」（見《雙山回憶錄》，8 頁。）
【朱正按 這一段引文據香港周記行的初版本；在 1994 年出版的增訂本中的將「H」寫明為「許志行」的。】

這裏所說的「幾個」，宋雲彬是其中之一，而第一師範裏負責 S.Y 的「H」，指的就是許志行。

當時我沒有說出他們的真實姓名，並非故弄玄虛，而是為了他們兩人的安全。我寫這本回憶錄是在1957年，那時宋雲彬正因響應鳴放的號召，說了真話而遭受打擊。我不願讓他「罪上加罪」。——於「右派」之外再被扣上「親近過托匪」的帽子。許志行當時音訊隔絕，我當然也不願給他添加麻煩。

二、

雲彬當時（1925年前後）在杭州充當新聞記者，同時彷彿還在一家人壽保險公司做點事。因為年齡差距相當大（他好像大我十四歲），我跟他的生活並不接近。雖然認識，但是談不上有什麼交情。從他署名「無我」，發表在當地報紙（是《之江日報》還是別的日報，我已記不清了）的文章中，我知道他是左的，同情革命的。此外便不清楚了。

許志行當時跟我的關係比較密切，卻也算不得深交。那時他正努力寫小說。後來結集為《孤憤》而出版的那幾篇小說，就是他在那個時候，躲在第一師範的藏書樓中創作出來的。我和他不同校，見面機會不多。在不經常的星期日見面中，我知道他傾向革命，信仰共產主義。那時我正在熱衷於為讀書而讀書，對志行的不上課而專事寫作，不讀書而高談革命，有點不以為然。他對我有什麼看法，我不知道。後來也從未談起，不過他無法歡喜我這個自以為專心讀書的人，也是可想而知的。

志行和我突然親熱起來，那是在五卅事件發生以後。我被動地當上了杭州學聯會的宣傳部長，非常熱衷於反帝運動——他和我的思想與行動逐漸走到一起了。不過這一個時期不長：差不多只有兩個月的共同工作，我和他便都離開杭州。我到北京升學，他到廣州去革命。

一年以後，即在 1926 年秋天，卻不但和志行，而且和雲彬也重新聚首了。那是在廣州。當時我已在北京加入共產黨，到廣州乃是為了更直接地參加革命。雲彬擔任黃埔軍校的日刊編輯，志行則是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的機要秘書。同鄉、老友又兼同志，此時我們三人的關係比杭州時期親密得多。

我和志行同住，又常去黃埔找雲彬聊天。當時的雲彬給了我一個非常有趣的印象。從來穿長袍、踱方步的「雲少爺」（茅盾送給他的稱呼），忽然換上了軍裝。皮帶束腰、綁布纏腿，卻仍是一派斯文，絕無赳赳之氣，我會戲稱他有了「儒將風度」。當時同在黃埔的張秋人與蕭楚女等，也常拿他的「文武不擋」來開玩笑。

廣州之會也很短，才一個多月我又回北方去。數月後國民政府遷到武漢，志行仍舊幹他的機要秘書，雲彬則卸下軍裝，當了漢口《民國日報》的編輯。

1927 年夏天，我又在武漢和他們重聚。我仍與志行同住，與雲彬不多見面。這時候中國的革命運動正陷進危機。蔣介石叛變了，我們把希望轉至「左派」汪精衛身上，可是這時候汪精衛也日益反動，對共產黨採取着愈來愈敵對的態度。作為國民黨中央常委會的機要秘書，志行的消息最靈通，因此他也最悲觀、最擔心。開會後他時常與我商量，如何應對這眼見即將來臨的大災難。我們當時對自己黨內的情況非常隔膜，對共產國際的政策更完全不知。革命失敗，對我們這些普通「幹部」來說好像是一種天然災難，他無可預防，亦無法解釋。

7 月 15 日「左派」國民黨正式反共之後，我被派赴蘇聯學習，志行和雲彬則潛回上海。此時革命是完全失敗了。共產黨思想上陷於混亂，組織上瀕於瓦解。個別的共產黨員，特別是知識分子的共產黨員，則正

如茅盾在他的回憶錄所說：「感覺到迷茫」、「痛心」和「悲觀」。其中淺薄浮誇的一層是變節、投降，與國民黨妥協了；較為深刻厚實者則「需要時間來思索、觀察與分析」。他們要問問「革命究竟往何處去？」

宋雲彬是和茅盾一起離開武漢到牯嶺，然後獨自先回上海的。他當時的心情與想法如何，我不得而知，但從他後來的許多來看，他和茅盾一模一樣。因為他的共產主義的思想根底比茅盾淺，他於失敗後會更加感到「迷茫」。但由於他性格上那種強烈的反抗性與正義感，他決不會去和破壞革命與屠殺革命者的國民黨政權妥協。又由於他從來豁達的氣質，我相信他當時雖然也一定「痛心」，當不會像茅盾似的「悲觀」。

志行比之於雲彬，思想根底的不深雖然相同，而性格上的敦厚則尤有過之。又因出身貧賤，他對被踐踏者與被欺壓者的同情是至堅至深的。這就更無法使他去和國民黨的統治者妥協了。

他們不願跟國民黨妥協，但他們也和茅盾一樣，不能夠「緊緊跟上」共產黨。當時國內的整個政治形勢急劇轉變，共產黨採取盲動的武鬥路線，國民黨實行空前的白色恐怖。在這樣的條件下，這些幾年來習慣於公開合法的革命工作的知識分子，大部分都不得掉隊了。掉下隊來幹什麼好呢？路子是非常少的。除了教書賣文這兩條逼仄小徑之外，可以說別無退路了。志行選擇了前者；雲彬走的是後者。

本來，為了生活，雲彬不一定非賣文不可。（茅盾在其回憶錄中說雲彬：家裏很有錢，「宋家有『宋半城』之稱」，那是不確切的。宋家在我們鎮上雖算富有，卻絕非豪富。比他家更有錢的多得很，而巨富如徐志摩的老家，也沒有稱作「半城」的資格。）他的拿起筆來，無論在他參加革命以前或者以後，都不是為了生活，而為了對寫作與

文史有深厚的興趣。他進正式的學校時間不長，在本鄉的高小畢業之後，便再不升學，他對讀書的興趣卻始終如一，讀書成了他生活的主要部分。他的舊學根底很深，於史書的研讀頗勤。五四以後，他受到新思想的影響，很快激進化了，變成我們鄉下的「過激黨」。到杭州不久，他便加入了共產黨。此後大約有三年之久，他以共產黨人資格參加革命，做的都是文字工作。因此 1927 年秋冬，當他和黨失去聯繫後重理舊業，繼續執筆協作，實在是順理成章的事。

三、

我不清楚他回到上海後寫了些什麼東西，我和他再次見面是在 1930 年，那時我已因托派關係而被中共開除。他住在上海閘北區青雲路的一個統廂房樓中，正在為商務印書館標點《資治通鑑》。

記不起在那次久別重敘中我們談了些什麼，留在記憶裏的他對那些不改初衷，於革命失敗後堅持奮鬥，甚至為此獻出了生命的一些故人，表示無限景仰。這情感不是用言語明白地說出來，而是見之於細微的動作和溫婉的語氣中的，對黨內的分派和他們之間的鬥爭，他已略有所聞，但不甚清楚，因而無從偏袒。

不久前，我讓國民黨捉去了。雲彬對我的家人表示了極大同情和聲援。我的大哥是一個本分商人，從來不問政治。對於我的被捕下獄，他認為縱非恥辱，也總是家門不幸，因此在人前怕提這件事，隱之瞞之唯恐不深。雲彬對此大大不以為然。利用一個社交宴飲場合，雲彬故意向我大哥大聲詢問獄中人的近況，並揚言如此入獄，乃是大有光彩的事——弄得我大哥狼狽萬分。

這個小故事是我於 1935 年從監獄出來，雲彬在特別為我「洗塵」的一次家宴上講給我聽的。那時候，他住在狄思威路麥加里，在開明書店編輯部工作，寫過不少文史小品。四五年不見，我這位老朋友一切如舊，還是那樣斯文瀟灑，還是那樣義憤填膺，還是那樣牌酒風流，只有一樣略微不同了，那就是他受了一些與中共較為密切的周邊分子的影響，對中共中央與托派之間的爭執已有了比較明確的看法：他親史大林而反托洛次基。但儘管如此，對於我這個托派分子卻仍無絲毫敵意。為要幫助我解決生活困難，他給我介紹了當時陳望道編的《太白》、黃源編的《譯文》、鄭振鐸與王統照編的《文學》。最後他幫我與鄭振鐸講妥，讓我替鄭主編的《世界文庫》編譯一本名叫《十九世紀俄國十大批評家》的書。這些賣文賣稿計劃，有的根本未曾實現，有的部分實現（俄國批評家的論文編譯好後，告知大部分在商務印書館編輯部，大火中給焚毀了，結果只將殘稿交給生活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培林斯基論文集》，並在《文學》上發表了沙了夫的《普希金論》），可是雲彬那種「人饑我饑」的積極援手態度，無論當時或事後，都使我由衷感激。

排斥異己，甚而至於欲使政見不同者陷入生活絕境的那種做法在雲彬簡直是無法想像的事。

四、

當時日帝侵華的形勢愈來愈緊，國民黨「安內攘外」的反動政策日益使得廣大民眾不滿，知識分子急劇左傾，雲彬也終於從故紙堆中走出來了。他何時積極參加民主派的救亡運動，我不清楚。一則因為我們政見不同，二則因為在 1937 年初。我又讓國民黨特務給「請」進去了。

抗戰爆發，滬寧淪陷，我幸而從國民黨的牢獄中生還出來。那時雲彬舉家逃難到湖南衡山，我則輾轉流浪到了武漢。不記得雲彬是怎樣得知我的消息的，他竟要他的女婿到武漢來看我，問我是否有可能到衡山去住幾時。我那時真想繞道香港回到已成孤島的上海去。於是就先到衡山，和雲彬的家人共度了近半個月的愉快日子。

我在宋家的輩分很特殊。和雲彬原係朋友，但跟他的女婿伯甯卻是同學。因此，給雲彬寫信，有時稱兄、有時稱叔。雲彬的女兒蘊莊是我眼見她成長的，習慣稱我為伯，可她生的兒女對我也只好以伯相稱，否則將置伯甯以何地？如此「尊卑難分」的關係，也許是我和他們全家始終保持親密感情的另一個原因。

衡山半月，生活過的並不寬裕，但精神上，至少在我這方面，是萬分歡喜的。雲彬和我談得不少，主要談的是關於抗戰的政策和前途。關於中共對國民黨的態度，他與我的分歧很大：我認為它太右，很可能重蹈第二次革命中的覆轍。雲彬則完全擁護中共的新路線，對延安與毛懷有無上敬意。他當時是否已經參加民主黨派的組織，我不問，他也不說。不過他積極再度投入政治鬥爭的決心，那時表示得非常明確。

五、

我從湘江畔回到了黃浦江邊，雲彬一家則隨着日軍侵略的深入，輾轉流徙。終於在桂林定居下來。此後我和他再無機會見面，甚至音訊都不通，從共同的朋友們的信上和口中，直到他在桂林主持「文化供應社」，在西南的大後方做着擁護抗戰、反對國民黨的思想運動。抗

戰勝利後，他和許多左傾分子一起來到香港，直到國民黨在內戰中潰敗，平津解放前後，雲彬才又和那些黨外人士一同潛赴華北，參加政協。全國解放後他回到本省工作，當上了浙江省文教廳廳長，還被選為人大代表。這時候我相信他心情最為舒暢。雲並不是一個官迷心竅的人。在舊式中國讀書人中，他該算是閒適放達的一派。對官職，看不大起，於權勢亦並不熱中。但他當時一定是以萬分興奮的心情和最大的滿足接受了這些職位的。多少年來迫切期待的規模，他本人也曾為之出過一點力氣的革命，終於成功了。他要為這個革命作更多的事。

我在他離開香港之後來到香港，見到他的家人而未見他本人。對於我的出國，他知道了很不滿意。經過我留在國內的家人，他曾經轉致了一個勸告：「不要在外邊流浪，應該回來。」在《人民日報》上我偶然見到一幀人大開會後的照片，雲彬剛好站在坐着的毛澤東的後面。他微笑地望着毛澤東，這神情充分透露出他充滿幸福與愉快的心情。

我沒有聽從老朋友的勸告，一直留在海外。大概在1957年春夏間吧（時間記不確切了），有一天，我照例打開收音機來收聽北京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新聞廣播，使我大吃一驚。宋雲彬被點名指斥，變成「對黨惡毒攻擊的大右派」了。此後他的遭遇如何，我一無所知，其實也可想而知：日子是不好過的。不過究竟怎樣不好過，都要到兩年半前讀到徐鑄成先生那篇短文章後才算清楚。他最初還能幹點編輯工作。1969年被流放到湖北咸寧，70年9月因病重讓家屬接回北京，79年4月逝世。「彌留之際」，據他的女兒蘊莊在信中所寫，他「不斷地說：『我胸口有三扇門緊閉着』。」

六、

在衡山相處的日子裏，記得他約略問過我史、托二派立場的差別。我彷彿還對他講過社會主義建設的國際性，講過像中國那樣的落後國家，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即使勝利了，如果把社會主義建設局限於一國之內，也是不可能最後成功的。史大林派的一國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必須要遭到許多困難，並且使一個革命政權墮落，變為反動。我的這種意見，對於科學社會主義本無興趣，對延安懷有無限信心的雲彬，當然是逆耳之言。他不會相信王明們當時污蔑托派的那些荒唐罪名，但他深信托派的理論是不切實際的空談。

七、

許志行彌留時心中是否也有緊閉的門，我不敢亂猜。憑我對他的了解，他心中縱有鬱結，也多半是與雲彬的有所不同。他們有各自的相同處，但不同的地方卻更多。

與雲彬的少爺身份相反，志行原是一個窮孩子。他本來不姓許，也不是浙江海寧人。他姓潘，出生於颱風裏邊的洞庭山。父親在浙江海甯袁花鎮上的一家許姓開設的小店裏打工。因為妻子死了，孩子沒人照顧，便把許志行帶到袁花來。孩子聰明，店主東想把他招贅為婿，因而志行改姓了許。在鎮上小學裏讀了幾年書，這個十二、三歲的孩子便送給鄰近的鎮上同樣性質的小商店去「學生意」。中國舊式小商店裏的學徒，事實上是一種童奴。他們生活的痛苦，地位的卑賤，今天無論生長在中國內地或香港的年輕人，都是無法想像的。志行所寫的一篇較為有名的小說《師弟》，便是這種悲慘無告生活的忠實描寫。

富有反抗性的他，又多少嗅到了五四運動前中國那種個人覺醒的新空氣，當然無法忍受這樣的生活。做不下去怎麼辦呢？關於志行生活的這一段遭遇，許傑先生的文章有如下描寫：

他一面受不起這學徒生活的苦楚，但在另一方面，卻由於他遠大的理想和堅決的意志，他竟然一個人從這家商店走了出來。這一次的出去，便造成了他一生傳奇般的遭遇。他從浙江出去以後，中間不知經過怎樣的輾轉周折，到了湖南長沙。他在長沙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一籌莫展。一天傍晚，他一個人正坐在鐵軌旁邊發愁，碰到了毛主席。那個時候毛主席在長沙湖南第一師範教書，問清了他的情況，就介紹他到湖南一師去讀書。（見〈憶志行〉，《上海新民晚報》，1998年1月4日）

許傑先生這裏的敘述基本上不錯。不過細節上有許多不對。志行出走不止一次。他給推薦出去好幾次，照我們鄉下的說法，他成了「回湯豆腐乾」，這使得他的家人非常頭痛，終於想出一條讓這孩子無法逃回來的妙計：將他薦到數千里外的武漢去。家人原以為這一下志行總可以做長了，誰知結果還是一樣，他還是逃出來。可是哪一條是回家的路，要怎樣才能走回家去，他卻是一點主意也沒有。身上帶着少數幾個錢，一直沿着南去的鐵路線走。走呀走的，終於讓他走到了長沙。此時他真是凍餓交加，坐在路旁為難發愁。而正在這個時候，他遇見了毛澤東這個「大救星」。毛澤東那時是長沙一師附小的主任，所以讓志行在附小讀書。

毛澤東如何發現這個流浪兒，二人如何交談，毛為什麼決定把他送進一師附小讀書，我曾經問過志行，他不願提起這些往事，我也不再追問。

在一師附小大約讀了兩年書，他的一切都是毛澤東照顧的。學校放假志行無家可歸，他總是與毛生活在一起。他曾經在韶山過新年，事實上他成了毛的一家人。

小學畢業，此時毛已去廣州，志行得毛的同意回到杭州，考進了浙江第一師範。五卅事件發生後，志行好像尚未畢業，便到廣州去參加革命。他之獲得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機要秘書這份工作，我相信（他自己從未說過）也是出於毛澤東的安排。

1927年在武漢，志行與毛家的關係還是很密切。他不常見到毛但經常與楊開慧有往來。7月間汪精衛公開反共，毛去湖南，志行潛回上海，從此消息斷絕，直到抗戰勝利之後，毛來重慶與蔣介石談判之時。毛從重慶的友人那裏打聽到志行多年來的經過。知道他曾在上海開明書店編輯部工作，據說很高興，還給志行帶來了問候的口信。這使當時開明書店的同事們大為興奮，而志行卻大感狼狽。

為什麼會狼狽呢？許傑先生的文章裏有一點相當好的說明：

凡是熟悉志行同志的朋友，都在志行同志的背後，傳誦着志行傳奇般幸遇毛主席的故事。但志行同志自己卻是守口如瓶，總是把話避開，不加渲染與誇張。（見同上引文）

志行這種態度，有人用謹慎來解釋，其實不然。革命失敗後，志行主要幹的是教育工作：最初在河北定縣推廣「平民教育」，後來在溫州與上海等地當中學教員。在國民黨瘋狂反共的年代裏，志行與「匪首」之間的親密關係，非但無補於他的工作，反而於其工作大大有害。（在溫州教書時，他曾因言論「反動」被捕，幸未發現他過去與中共和毛的特殊關係而獲釋。）那時候他竭力避免談起這種關係，自然可以

說是出之於小心謹慎，但當中共獲得全國勝利，毛澤東成為今日中國「秦皇漢武」之後，志行還是保持這個態度，卻必須從別的方面，即必須從志行這個人的性格和思想方面去看問題了。

志行絕對不是當代的嚴子陵。他不自鳴清高，不傲物驕人。相反，他十分謙卑，非常隨和。外表上他是土頭土腦，木訥拘謹的。內心裏他有時熱情如火，容易爆炸，有時則「柔情似水」，過度的悲天憫人。他與一切無告的弱小者認同，同時卻對任何權勢「疏離」，對諸般欺壓反抗。從廣州直到武漢這些日子裏，他周旋於黨國的最高階層中，逐日和蔣介石、汪精衛這類人開會接頭。1927年以後他側身於高級知識分子中，得與「士大夫遊」。但是據我觀察，他既不與這些達官、貴人，也不曾與那些名流、學者在感情上融匯到一起。他是一個平民，無論生活上與精神上都是一個十足的平民。一切「精粹人物」，即西文中的所謂 ELITE，不管是政、經、軍界中的，或是思想、學術圈中的，志行和他們都格格不入。被迫處在這些人中間，他總似乎無法適應，局促不安。可是一旦進入另一類人中，譬如來自鄉下的窮親友，前來探訪老師的年輕人，鄰近鋪子裏的小店員，工廠作坊裏的做工人，乃至像他一樣的中小學教員或並不出名的作家……我常常發現他變成了很不相同的人了：有說有笑，舒舒坦坦，很有點像魚兒得水。

志行時常說自己是一個庸俗人。俗，或者有一點，而庸則絕對談不上。一個不屈服於勢利，甚至根本不知勢利為何物的人，怎麼能夠庸俗呢？只有天賦以最不庸俗的性格的人，才能真心實意地，出乎本能地，並非自覺地，視富貴似浮雲，把權勢當糞土。

對於革命理論，志行和雲彬一樣，也可以說是「不求甚解」的。他們之參加革命，加入共產黨，「掉隊」之後依舊追隨共產黨，依舊反

對國民黨，與其說由於思想，由於理性的認識，不如說由於感情，由於感情的反抗和同情。因此，二人雖都不是深刻的共產主義者，卻也都沒有犯上教條主義或宗派主義的毛病。

志行知道我是托派，又知道我因此而被黨開除之後，從不想弄清楚史、托二派的異同所在。偶爾見面，談話時，如果涉及到這一個方面，他總只是搖頭嘆氣，表示一些「和事老」的願望。

八、

1938年春天，王明、康生發動了一次反中國托派，特別反對陳獨秀的大運動，硬說陳獨秀等接受日本帝國主義的金錢，幫助日帝侵華。這時候志行與我正好都在上海，他在開明書店工作，我則「隱居」在孤島上譯書。這個運動從延安發展到武漢，再從武漢波及到上海時，志行這次卻頗為激動了。他相信共產黨，相信毛澤東，但他和我這個托派以及和因我而認識的其他托派來往得相當親密。憑他的直接接觸，他無論如何不能相信托派為漢奸。他親自看見我們這些托派的生活比他的日子還要艱難，絕對不可能像拿日本人金錢的。他絕不相信王明們的謠言與誣陷，繼續與我們來往。1941年冬天或1942年春天，志行決心離開上海，到內地教書去。那時他除了開明工作之外，還擔任着滬中一家夜校的語文教員。因為時間正在學期之中，他不能一走了之，必須請人接替，於是請了陳其昌去代課。

陳其昌就是幾年前寫信給魯迅，向他闡述托派主張，因而引起魯迅「回應」的那位「陳仲山」。魯迅說陳仲山與其他托派「有背乎一個中國人的道德」，這頂帽子顯然未能取得志行的同意。他相信這個托派，把遺留下來的教育責任交給他呢。

陳其昌不久為日本憲兵捕去。由於他這條公開職業的線索，夜校的校長也讓日本憲兵給「請」去了。在憲兵司令部裏，那位校長看見一個周身受傷，滿頭包着白布（只留出一雙眼睛）的人，被憲兵攙扶出來。人家問他這位校長可是同黨。「白頭人」拼命搖頭，校長給釋放了，陳其昌本人則後來給秘密處死。

這些消息是抗戰勝利之後，志行回到上海，夜校校長告訴他，再由他講給我聽的。

九、

全國解放後我與志行完全失去了聯繫，有關他的情況，只偶而從國內親友的書信中得知一二，許傑的文章也給我們說了一些，他說：

解放以後，他寫信給毛主席，毛主席要他去過一次北京，知道他這多少年來一直埋頭教學，啟發學生走上正確的道路，毛主席也就囑咐他安心做好本職工作，培養青年一代的新人。他從北京回來之後，更加興奮地依舊從事他的語文教學事業。（見同上引文）

不過從我國內親友的來信得知，解放後毛澤東邀這位「貧賤之交」去見他的，是兩次而不是一次。一次在北京做客。另一次陪毛到北戴河避暑。這第二次二人相處較久，臨別時據說毛還從自己的「版稅」中撥出 500 元來贈給老朋友哩。

志行給我的最後一個訊息正在他「避暑」歸來之時。他託人轉告我的家人，要她們設法寫信告訴我：「回來吧，回來沒有問題的。」

這句話真是傳神極了，讀起來如聞其聲，如見其人。

不用說，我是深深體會到他的好意的；但正像我在較早時沒有聽從雲彬的勸告一樣，這回我也沒有接受志行的勸告。我依然在海外流浪。

1984年4月28日寫畢
(感謝張曼平教授協助整理文章)

26. 悼李福仁

3月21日，格萊斯 Frank Glass（在托派運動中以其中文名字李福仁 Li Fu-jen 著稱）在洛杉磯病逝。

李福仁是真誠的國際主義者和革命共產主義者。他一生中的不同階段在不同國家（南非、中國、美國）和整個第四國際起了重要的作用。

李福仁出生於英國伯明罕，童年在倫敦度過，十多歲時隨父母遷到南非。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曾短時間服役於英軍，當時受到俄國革命的影響。

回到南非後，他加入了「社會民主聯盟」，不久與一些同志脫離，成立「工業社會主義聯盟」。1921年，他與許多個第三國際的支持者一起，成立「南非共產黨」。

1923年，南非共產黨第二次大會上，他被選為黨的組織部負責人。1924年12月，在第三次大會上，他領導一個反對派，反對黨內的機會主義右翼。之後，他大部分時間及精力放在領導「南非僱員組織聯會」（日後改名「南非工會大會」）之上。他早已支持蘇聯的左派反對派，並在1928年成為南非的首批托洛次基主義者。

1929或30年，李福仁到美國，會見了加農、夏克曼及其他美國托派的早期領導人。接着他起程赴遠東，被拒入日本，約在1931年在上海定居。

李福仁並未立即接觸中國的托洛次基主義者。當時，中國托派剛達成統一，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31年5月1-3日）；在國民黨鎮壓下，中國托派受到非常嚴重的打擊，領導人接連被捕，運動處於困境。李福仁在上海當記者，並獨立地進行革命活動，爭取西方知識分子支持中國革命。他成功地影響了一些人接受托洛次基主義，其中的伊羅生（他後來寫作了《中國革命的悲劇》）和布殊曼（他約十年後在墨西哥為托洛次基擔當警衛工作）。

1933年，李福仁開始直接參與中國托派運動，在恢復和維持我們的地下組織方面，起了一個相當重要的作用；1935年冬天，在一次上海同志的代表會議上，他被選入臨時中央委員會，擔任秘書/財政的職責。

在國民黨鎮壓的情況下，一個外國人對運動所起的作用更受局限。在經濟上，李福仁夫婦為我們的印刷工作提供了差不多所有的物質條件，並維持兩名負責印刷工作的同志的生活費。

在政治上，我們通過李福仁與托洛次基（初時在挪威，後來在墨西哥）和巴黎的世界運動中心保持聯繫。

1937年5月，李福仁到墨西哥與托洛次基會面，討論中日戰爭前夕的中國局勢。他帶了一份由我起草、由臨時中央委員會通過的決議案，在這份決議案和李福仁所作報告的基礎上，托洛次基和李福仁在1937年8月11日進行了一次重要的長談。（會議記錄見《托洛次基論中國》）

在紐約逗留數月後，李在1938年夏天返回中國。當時他的主要任務是設法實現托氏的想法，將陳獨秀安全轉移出中國（當時中央共對

陳進行污蔑運動)。托氏希望陳獨秀能為第四國際起着日本社會主義領袖片山潛為第三國際所起的同樣作用。由於種種原因，這個「拯救陳獨秀」的行動失敗了。

日本侵襲珍珠港前夕，李離開中國，以後幾年在紐約度過。我相信他協助處理第四個際的事務，因為由於納粹佔領法國，第四國際總部由歐洲遷至美國。李也寫很多文章，特別是關於中國的文章。

1945年日本投降後，李很想返回中國，與舊朋友會面，但這個夢想始終無法實現。他繼續關注中國革命的發展，但更多留意菲律賓的問題。有一段長時期，他編輯出版一份菲律賓刊物。

中共勝利、托派被清洗迫害後，我與李恢復聯繫，我們對中共每一個路線的轉變都交換意見，在大部分問題上我們意見相同，在一些問題上則有不同。我們維持很好的同志和朋友關係。

李福仁作為共產主義國際主義者和革命者的許多美德中，最主要的是他沒有任何個人野心。他對自己的信念也很認真，對每一個主要的政治問題有他自己的意見。

每當他有了一個意見後，就執着地、真誠地、光明磊落地保衛他的意見。他永遠針對事而不針對人。在內部爭論中，他勝利時是忠厚的，失敗時是有風度的。

李福仁最後的願望是見到托洛次基在蘇聯恢復名譽。可惜這點還未實現。但是，遲早，不僅托洛次基而且所有托洛次基主義者都會恢復名譽，在蘇聯、在中國，在所有托派被迫害的「社會主義」國家。

(詩風譯自《國際觀點》1988年5月16日)

27. 悼念中國托洛次基主義者樓國華

樓國華（1906–1995），別名子春、一丁、少垣、則誠等，於 95 年 3 月 8 日去世。他在 1927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9 年接受了托洛次基主義，並於同年參加了中國的第一個托派組織「我們的話」。

1931 年中共左派反對派舉行成立大會，樓是代表之一。會後，蔣介石的政治警察將樓及幾乎所有新當選的執委逮捕。樓被判監六年。

1935 年出獄後，他繼續從事托派的革命活動。1949 年，在毛澤東的軍隊抵達上海前夜，他被迫離滬前往香港，在那裏繼續工作，直至去世。

五十年代早期，香港政府驅逐了一批托洛次基主義者出境，並禁止托派刊物。幸未遭到驅逐的樓，從五十年代中期起便試圖恢復托派在香港的活動，他成立了「信達出版社」，先後出版了十多本托派和有關托派的書。

在七十年代，一批原先傾向無政府主義的香港年青人（他們是由《70 年代》這份刊物團聚起來的），主要因為和樓國華接觸因而受到影響而接受了托派思想。後來成立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盟，樓是領導人之一。

編按：本文原載 1995 年 4 月 8 日英國 *Socialist Outlook*。嵐山譯。

樓一生是職業的革命者，但他卻是一個有一份全職工作的革命家。這並非表示他是業餘或兼職的革命者。這只表示在他投身革命事業的同時，有另一份工作吧了。

所有貧窮國家中真正的革命組織，尤其是舊中國的托派組織，在經濟上都面對很大的困難。這是發達國家的同志，甚至連今天香港的年青同志也難以想像的——沒有贈款、沒有會費、沒有捐獻、什麼都沒有，樓國華幾乎成了中國托派的單人匹馬的籌款者。他主要從事會計。他非常節儉，將收入省下來幫助其他同志。例如在1936年冬黎彩蓮同志去世時，就是樓獨力辦妥了她的殮葬事宜的。幾乎所有早一輩同志都多少獲得過他的幫助。

樓國華不但是托派刊物的出版家，而且他本人又是一位出色的作家。他是著名的魯迅研究專家，著作包括《魯迅：其人、其事及其時代》及其他很多文章。在這些著作中，樓揭露了中國毛派官方如何吹捧魯迅，藉以掩蓋1915–1921新文化運動的奠基者陳獨秀所曾起的重要角色。魯迅雖然是現代中國最有名的散文家及作家，但他在新文化運動中只擔當了輔助的角色；而陳獨秀才是這次運動的「總指揮」。

陳獨秀是1921年創立中國共產黨的主要角色，但自1931年起，因為他接受了托洛次基主義，他在中國近代史與共產主義運動史中應該佔有的崇高地位，被中共完全抹煞了。為了上述目的，中共於是製造出魯迅在新文化運動中的主角的神話。樓著的《魯迅》一書旁徵博引地舉出了很多證據以此揭破了捏造的歷史。

另外，毛派在1938年誣陷陳獨秀為日本的特務（這是與史大林中傷托洛次基為希特拉的特務一事相配合的），樓亦揭露了這些陰謀；歷來被中共大力宣傳的那封魯迅在1936年寫給托派的信，其中指托派陳

其昌及他的同志收受日本人金錢。樓也提出大量證據與理由，斷定此信並非真正出自魯迅，而是史大林派馮雪峰所為。

今天，大陸新出版的資料，例如在胡風死後才發表的文章，完全證實了樓國華上述兩項論點。（胡風是魯迅的大弟子，並是1949年後毛派文藝政策下的第一個犧牲者。）

樓國華去世前兩年，身體已每況愈下。他先失去聽覺，然後失去說話能力，最後失去視覺，可是在病中，他始終還是關心他一生獻身的事業。他遺下妻子、一女、三子。

樓國華堪稱為中國托派的出版家及「善長仁翁」。他是至死不渝的托洛次基主義者及第四國際的支持者。他死了，受到了香港年青一輩激進分子的愛戴和敬重，那是完全應該的。

28. 悼鄭超麟

鄭超麟死了。他是中共的元老之一，又是中國托派的元老之一。

他把一生貢獻給中國工農大眾的解放事業。但他畢生的貢獻並不限於革命。他賦有多方面的才能，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他同時又是作家，是詩人，是歷史家，是語言學家，又是翻譯家。他所投入的方面不但多，而且精。無論在哪一方面，他都不是「票友」式的涉獵，而是專精深入，辛勤鑽研的。

當然，他首先是一位堅貞不渝的革命家。他在其他方面的努力和成就，基本上是以他的革命思想作為基調，貫穿着他的革命家精神的。因此，我這裏只想約略介紹他的革命家生平。

他於 1901 年出生在福建省漳平縣，自幼接受中國的傳統教育。

1919 年去法國「勤工儉學」，受到西方思潮影響，特別受到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他逐漸放棄了原先的孔孟的乃至老莊的學說，轉而接受陳獨秀等所提倡的民主與科學的主張。稍後，又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不久更由思想進入行動。1922 年 6 月，當中國旅歐的年輕馬克思主義者在巴黎開會，成立「少年共產黨」，鄭超麟是 18 名代表之一，其中有周恩來、趙世炎與尹寬等人。1923 年他被選派到俄國留學，在「東方勞動者大學」研究馬列主義。1924 年 7 月，因中國革命形勢開展，中共急需工作人員，他與陳延年等被派回國。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編輯黨報，草擬共產黨內部教育與黨外宣傳的文件，翻譯布哈

林著的《共產主義ABC》，同時擔任黨校上海大學的教員。在1925年至1926年中國革命進展期間，他參加有名的「五卅運動」，參加第二、第三次的上海工人起義。1927年4月，蔣介石實行反革命的流血政變，中共中央遷到武漢，他參加了中共第五屆大會。會後任湖北省委宣傳部部長。革命全面失敗後，參加中共黨史上有名的「八七會議」。會後隨新中央秘密回到上海，擔任新黨報《布爾雪維克》的主編。1928年，赴福建整頓黨務。1929年與同志劉靜貞結婚。不久，初次為國民黨的特務所捕。幸未查出他的真實身份，羈獄四十餘日即被營救出獄。

1929至30年，開始接觸到托洛次基有關中國革命的文件，結果與陳獨秀等八十餘名老幹部一齊轉向托派。1931年5月，他代表《無產者》派與陳獨秀一起參加中國四派托洛次基組織的統一大會，被舉為中國托派統一組織的中委，兼宣傳部主任。不久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判刑十五年。因中日戰爭發生而提前獲釋，實際在獄七年。出獄後與妻子在安徽鄉間養息，校改和續譯了托洛次基的《被背叛的革命》。1940年回上海，參加中國托派組織的領導機關——《鬥爭報》編輯部。同時翻譯托洛次基的大著《俄國革命史》（第二、三兩卷）。自從1939年新的世界大戰在西歐開始後，中國托派的領導人中發生了意見分歧。主要關於中國的抗日戰爭被捲入世界大戰後我們——中國托派——對中國抗日戰爭的態度問題。爭論延長，又由政治問題牽涉到組織問題。結果，中國的托派組織終於在1942年重新分裂了。鄭超麟是後來命名為「中國國際主義工人黨」的那一派的一位領導人。

1941年12月7日，日軍佔領上海的外國租界，一切抗日的革命活動異常艱難。從那時起直至1945年8月日本戰敗為止的幾年中，超麟的主要努力放在寫作方面。除了編輯托派的地下刊物《國際主義者》

外，他寫了《回憶錄》，寫了《三人行》——一部對話體的政論集。又寫了《不斷革命 ABC》與未完成的《陳獨秀評傳》。為了生活，還翻譯了意大利作家西龍尼的《豐丹瑪拉》等書。

1945年8月至1949年5月，即從日軍投降，中經國共內戰，直到中共勝利這個期間，他寫了大量文章，登載在公開出版的雜誌《新旗》上。對於新中國的性質，他作了系統的研究，結果寫了一本書《國家資本主義論》。

在中共軍隊來到上海前夕，他所屬的一派改組成為「中國國際主義工人黨」。超麟是新黨七名領導者之一。在往後二年多內，「國共黨」在中共治下進行活動，影響有所擴大，結果，於1952年12月22日，全體黨員，所有中國的托派，連同他們的同情者，被中共特務一網打盡。

這本是意料中事。為了預防，以彭述之為首的另一個托派組織，早已把領導機關遷移到香港。超麟所屬的一派也主張派人去香港，去建立一個聯絡站。但超麟本人卻不願出走，明知危險而決定留在上海。

他的這種「聖彼得」精神雖不曾使他為殉道而喪生，卻換來了長達二十七年的牢獄禁錮，換來身體與思想的摧殘和迫害。

1979年6月，終因中共領導層的變動以及海內外關心人士的呼籲（他是1979年「國際特赦組織」列為「良心囚犯」（prisoner of conscience）之一），他和其他11名幸未瘐死獄中的同志被恢復了自由。

如此，他在國民黨監獄與中共監獄中一共渡過三十四年，相等於法國著名革命家勃浪基的羈獄記錄！

從 1979 年 6 月出獄到 1998 年 8 月逝世的十九年中，超麟的身體雖因長期受到摧殘而局部殘廢，但他過的卻不是一般老年人的退休生活，而是十分緊張的思索與寫作生活。這時期內他在三個方面做出了成績。一、協助一些歷史家編寫中國革命與中共（包括托派）的信史，糾正過去官方歷史家在這方面所作的有意與無意的歪曲，特別是糾正過去中共對於陳獨秀的誣讒與歪曲。二、對中國與世界革命的基本問題作系統的與獨立的思考，並且寫下了思考的過程和結果。三、不斷向中共的歷次大會提出平反托派的要求，要他們正式宣佈托派（中國的與世界的）不是反革命，要求他們承認過去對中國托派的鎮壓是錯誤的。

他的這三方面的努力，記錄在將近百萬字的文稿裏。可惜迄今只有小部分能獲得出版機會。因為他雖然從 1979 年起已得到人身自由，而且還被指派為上海市政協委員會的委員，但他仍然戴着「反革命」帽子，仍然遭到歧視。近幾年來他所著的回憶錄雖曾獲准以「內部發行」方式印行了兩次，他翻譯的一本小說《諸神復活》（俄國作家梅列希考夫斯基 D. Merezhkovski 所作）得以重新出版；但他主要的作品，涉及思想與政治問題的大量文字，不論是他在獄中所作或出獄之後所作，一律不准付印出版。因他一直堅持着他反對史大林主義與毛澤東主義的立場，被認為是「反革命」的。

他的大量著作中，只有《回憶錄》曾被班國瑞教授（Prof. G. Benton）譯成英語；由美國「人文出版社」（Humanities Press）出版。德國的魯道爾夫·西格爾（Rudolf Segall）又由此書的英譯稿譯成德語，由德國法朗克福的 LSP-Verlag 書店出版。以此讓海外朋友能多少見到中國這位非凡的馬克思——托洛次基主義者的生平。

妻子劉靜貞於 1979 年 6 月與超麟一起離開勞改營，不足半年後逝世。他們的兒子弗來（Frei），生於 1938 年，夭折於 1945 年。超麟晚年的日常生活是由他的侄孫女照顧的。

1998 年 8 月 5 日

第二部分 晚年札記



1989—1998

1989年

2月23日

讀完《河殤》。從思想的主題着眼，其中有二段話最值得注意：

1. 「……在十月革命前，普列漢諾夫就同列寧發生了一場激烈爭論。

這位被稱為『俄國馬克思主義之父』的普列漢諾夫，堅持馬克思關於歷史不能跳越其必要發展階段的思想，不主張過早奪取政權，認為對社會主義的急於求成，會使經濟遭到最慘重的失敗。

「普列漢諾夫的懷疑，雖然被十月革命的勝利打得粉碎；然而，他向列寧的挑戰，卻並沒有被歷史所淹沒。經濟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能不能跳越商品經濟發展階段而獲得成功，這個普列漢諾夫提出的巨大問題，半個多世紀以來，始終纏繞着社會主義陣營」。（見《河殤》，59頁。）

2. 「……不過，歷史卻給中國人造成了一個十分獨特的群體——知識分子。……

「然而摧毀愚昧和迷信的武器操在他們手裏！能夠與海洋文明以直接對話的是他們；把科學與民主的蔚藍色的甘泉灑在黃土上的是他們！……

「比他們更有現實力量的，也許是這些相貌平平、談吐也不驚人的新型企業家們。甚至這些小商店的老闆們中間，在這些急急忙忙趕路的生意人中間，在這些離開土地，四處攬活的農民中間，正在積聚的新的社會能量和衝動，都不可低估。」

第一段話沒有公開說歷史證明普列漢諾夫的正確與列寧的錯誤，但意思是清楚的。這個問題，有了俄國、中國以及其他東歐國家等社會主義革命與隨之而來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痛苦經驗，確實應該再度提出，重新考慮。這是整個社會民主黨人與不斷革命論者之間應該討論的一個最根本問題。事實上，現在已經有不少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以及托洛次基主義者考慮了這個問題，並且其中的某些人已經做出了結論；即列寧與托洛次基等當年在落後的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首先以工人階級名義奪取政權，實行工農專政是錯誤的，是違反馬克思的革命歷史觀的，因而是後來史大林主義一切罪惡的泉源。

把這個結論應用到中國來，這些人以為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當年憑暴力奪取政權是根本錯誤的。他們原應該以國民黨的反對派自居，與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共同完成國民革命，發展資本主義，提高國民生產力。如此，據他們說，不但可以避免近五六十年來中國所經歷的一切苦難，而且中國今天多半已成為一個既富且強的大國了。

這些一廂情願的事後諸葛亮們的最大毛病是把中國近百年來的歷史抽象化了。彷彿中國真是像毛澤東所說的一張「一窮二白的白紙」，人們可以自由自在在它上面寫作或繪畫的。他們抽去了中國近百年來的國際關係，完全無視中國社會中複雜錯綜的階級關係。這是「三座大山」——套用中共的一個術語——強迫中國近百年來的志士們一步一步地走了如實經過的道路的。當然，參加每一步前進或後退的那些主要人物，對於當時歷史的造成要負或大或小的責任——這裏包括了功與過——但是從更根本的觀點來看他們的功或過，卻不是起着決定作用的。

第二段，《河殤》的作者舉了各式各樣的人作為未來中國希望的寄託者，卻獨獨不舉大工業的工人階級。這不是忽略，而是由於他們的基本看法：中國的真正得救與進步要經過資本主義的復辟。要全面實行資本主義復辟得靠「企業家」，「小商人」與「離開土地，四處攬活的農民」了。

3月16日

最近讀完了一本盧森堡的新傳記。作者也是波蘭人，伊爾士別也塔·伊丁格（Elzbieta Ettinger）。她偏重於盧森堡的私人生活，與從來所見的她的傳記不同。讀起來令人有較多的親切感，對這位偉大的女人有更多的了解。

3月28日

搭上午10時45分鐘車赴格拉斯哥。卡拉爾換車，抵埗已下午三時許矣。未換車則乘客很多有站立在過道中的。我幸預定座位，安坐抵卡拉爾。換車後乘客稀少，一車廂僅十餘人。在中央車站落車，坐的士至辛克來家。三年不見，相聚頗歡。他大病出院，在家療養，看模樣尚好，唯右目失明，讀和寫都很艱難了。

3月29日

陪辛克來在附近馬路散步。這是我第三次來此。上次是1980年4月尾，距今已九年。此地情景依舊，只是我的記憶已模糊了。在附近

小鋪購些食物後，辛先回，我繼續散步，刷新記憶。下午聽錄音帶，漫談幾位已故與尚在的老友，遲暮二老，「相濡以沫」，想來有點悲涼。

3月30日

搭上午10時50分車回家，仍在卡拉爾換車。回程的情形與來時相反，前段擠而後段鬆。由卡拉爾動身後，我一人佔四位，可躺可坐，因而有可能觀賞沿途風景。這是英國火車旅程中最有名的一段，車經湖區與派拿因山區（Pennine ridge），景物別致，非其他地段可比。5時抵家。倦極。

5月19日

借了追悼胡耀邦這個題目而發動的北京學生運動，從4月15日開始，一直繼續到現在。規模愈來愈大，內容愈來愈深，看來已達到革命的程度。見到這樣的大好形勢，感到萬分興奮；但我老病交困，竟無力寫一點小小之文章！愈想寫，愈是寫不出。奈何奈何！

鄧派的十年改革竟造成了這麼大、這麼深的民憤，出乎我最大膽的想像！

昨晚的電視上看到了北京工人高舉毛周遺像遊行。這是頗能發人深思的。學生們原來所提的主要要求是：1、民主，2、反貪污。

許多人最初的猜想是：學生們走的是一味傾向美式民主的路。但從這幾天的運動表象看，好像在一般群眾中，特別在工人群眾中，還有不少人在懷念毛周時代那種有苦同吃，並無貪污的好日子。

這現象看來有點難解，其實是不難理解的。

不管毛澤東當年如何胡搞亂搞，有二點他是相當堅持的：討好勞動者，不讓下面貪污橫行。面對目前那種一切向錢看，上下競貪污的現實，大多數工人懷念起毛周來，原是極其自然的。

今天我想竟還會有人在回憶中追認當年毛之反對走資派是正確與應該的吧。

5月20日

北京與其他十幾個大城的學生和工人繼續鬥爭。鄧派官僚終於宣佈戒嚴，要用軍隊來對付學生了。就形勢論，中國正在進行另一次革命。我們從來期望的「政治革命」，到來得比我們預料的更早，更大，更好。

5月22日

政府調動的軍隊停留在北京城外，戒嚴令無法執行。政府的威信全失。整個北京民眾起來反對政府，這是真正的革命形勢。可惜沒有一個革命黨起來領導群眾。客觀上，「蘇維埃口號」已經提出來了。學生，工人，一般市民，教員，以及兵士。應該團聚在一個獨立選舉的代表議會，藉以和現政權對抗。

昨天香港有100萬人示威。這情形使英美這些當政者尷尬。他們願意看見中國民主化，願意看見中國由此可以完全恢復資本主義，但他們更怕這個群眾運動變成革命，變成反帝的革命。

5月28日

幾日來國內的形勢多變，可惜我病得無法執筆，甚至無法思想。不少人想來「訪問」，婉拒了。助格雷寫了二篇短文。略略表達了我的一點看法。中國今後確實處於這樣的一種局面，如果覺醒起來的廣大工人和其他群眾不能把官僚腐朽與專橫的統治推翻而使中國走上社會主義的民主道路，中國將在美帝及其中國的「自由派」的策劃下，完全恢復資本主義，使中國成為新型的主要由經濟控制的殖民地。

早幾天給雄仔與越之分別寫了信，希望他們在客觀形勢的驅迫下，能完成初步的共同工作。數十人開了「三月小店」，什麼事都做不出來的。

聽今天的消息看來學生運動是快近尾聲了。暫時，那些頑固、無用的毛氏後人是勝利了；但正如許多人所說：Thing will never be the same again!

6月3日

北京當權派終於用武力來鎮壓學生了。據初步消息，已死了數十人。血洗天安門，這該是中共政權完蛋的信號。

6月17日

讀完美國大西洋雜誌有關方勵之的文章。方確實是目前中國知識分子思想的體現者。日內擬讀另一代表人物嚴家祺的文章。希望精力能好轉，讓我有氣親寫一篇評論二人思想的文字。

6月9日（補記）

上午泰力·阿里來，要我為電視錄影，發表對北京慘案的意見。怕上鏡頭，又怕思想不能集中，問答中說話可能出錯。決定由我擬一聲明，由別的同學在里茲大學中國學生抗議會上宣讀。電視節目於11日晚第四線播出。尚滿意。

7月9日

讀完嚴家祺作的《我的思想自傳》。此人大概讀過我翻譯的馬嘉維里的《帝王術》，頗受此書的影響。嚴從馬克思退回到馬嘉維里，退回到伏爾泰與盧騷。馬氏的《帝王術》是政治哲學上從唯心史觀走向唯物史觀的前進一步。

嚴的《首腦論》卻是從唯物主義回向唯心主義的後退一步。他的「人的不完美性」，二千多年的荀子早已發揮在他「性惡論」裏了。中國資本主義復辟的重要理論家，其實貧乏得很。

嚴把他的《首腦論》最初獻給趙紫陽，後來又獻給列根，這也是效法馬嘉維里的——他獻給洛倫佐。馬嘉維里的呈獻是希望洛倫佐出來統一意大利，這是進步，而嚴家祺的呈獻的目的卻是要借那二人之力把中國完全拉回到資本主義——這是反動。

7月22日

讀完老超最近寫來的論文〈中國的六月革命〉。我不同意他的許多看法；可惜沒有力氣把我的看法寫出來和他討論。

8月3日

今天終於將二年前寫給比艾·羅舍的長信譯成了中文。這項譯事斷斷續續進行了幾個月。人到我這個年紀真是毫無用處了。譯完後重讀一下，實在覺得不滿意，說理固然極不充分，文字也很拙劣。有時連寫一句通順的句子都困難。不過無論為何，這封信裏多少記錄了我對這些基本問題的看法，對於那些能夠思想的青年，多少會起一點促發作用。日內擬複印數份，寄給香港與國內朋友。

近來對古典作品愈來愈感興趣。經過漫長的時間淘汰的作品畢竟是不同的。早幾天讀Pascal的《思維》，今天起讀摩亞的《烏托邦》。可惜白內障和神經衰弱作祟；一天讀不到幾頁。讀後的印象也留不長。

昨天讀了孟台爾的書評，評勃魯《托傳》的。評得很公平，擬複印寄超參考。

8月13日

北京的大屠殺引起全世界的反應，這是必然的，也是應分的。但同時促成了11個全世界的反共神聖同盟，一直以來最反動的政客和作家，都紛紛以「民主戰士」與「人權衛護者」的資格出現，這卻令人非常噁心。一二月來先後成立了十多個「保衛民主」的組織，其中在我看只有極少數幾個會於中國的民主前途有利。

8月23日

這幾天的波蘭變化很有意思。看來團結工會中的右派是急不及待地與官僚們妥協了。這當然是一個過渡性的局面。兩方面都有自己的

盤算。官方想借團結工會的威望來實行一直為工人大眾所反對的「緊縮政策」；工會右派則想憑這點威望所取得的地位，再借美國及整個西方資產階級的力量，逐漸從經濟開始，全面恢復資本主義在波蘭的統治。

真正希望在於團結工會的左派方面。要工人們暫時放棄罷工權來推行緊縮政策，只有政經權力真正操在工人階級手裏才是可能的，才是真正走向社會主義的。

連日讀 Austin Coates 作的 *Macao and the British*，此書有點文不對題，談澳門的極少，談英人早期活動的甚多，原以為讀這本書可以滿足我的「鄉思」，結果卻只增加了一些英人方面如何看待鴉片戰爭的知識。

9月5日

班今晨離此起赴倫敦，將作蒙中三周遊。他已完成十分之九超書的翻譯。預計明春一定可以弄完，接德譯者騫格爾函，頗讚超寫作時態度的誠實，比揚可曾讚超「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態度，可見說老實話並不吃虧，好書自有人賞也。彭述之一味自我吹噓，事實上騙不了人，鄙棄他的人是愈來愈多了。

9月11日

阿九來，他是參加了 TUC 大會來看我的。和他談了關於「經濟制裁」問題。很想就此一問題，聯同「非暴力」問題寫一專文，但力氣耗竭，腦子終日昏昏然。這篇文章實看來終究寫不出來的了。

連日校改班譯老超回憶的稿子很是疲勞。

青年學人馮崇義送來他所著《農民意識與中國》；昨天讀了幾頁，覺得很不錯。他從來不知道蘇聯共黨左派反對派對中國革命的意見，最多只曾從史毛派的著作中窺見一二，因之他無法全面與正確地了解並解決這個問題。

前天得家信，三月來第一次，知家人安好。

得辛克來函，他開題就說：

“It seems there is nothing one can do against old age and its attacks on the human frame. Nothing except acceptance ...” 信然。

9月21日

校改評稿告一段落，倦極。令方來電，她明天赴愛丁堡參加一個會議，會後將來看我。白克曼贈我一年雜誌《抗流》，美國式的《新左評論》。燦來信，談他父親的病狀：既不能像樣活下去，又無法痛痛快快死掉，這情形真正可悲，但願我不要跟他一樣。

9月25日

昨天巴黎成立了一個「中國民主運動聯盟」，主席嚴家祺，副主席吾爾開希，總書記萬潤南。嚴是趙紫陽的顧問，萬是趙做「官倒」的代理人。由此人選，可以看出這個組織的背景。我一有力氣，當首先寫一篇文章批評嚴家祺的《思想自傳》。

班將結婚，這消息使我又喜又悲。寄了一點錢去。一二年後，多半我要做曾祖父了。

9月26日

紹銘寄來了《工人自由》雜誌。這個雜誌的主編利用我十五年前被日本朋友訪問的一篇錯誤報導，作為我長序的引言，使我大大不快。決心寫信去要求更正。今後應更加小心，不要跟那些小派別英雄們再打什麼交道。

班已回家，令方未至。

9月29日

令方來，為我清掃室內積垢，可感也。

10月5日

昨日找到了1976年《國際雜誌》上的《回憶》勘誤表，寄紹銘，盼能發表。晚觀電視節目《里昂·托洛次基》，甚好。它是法國布魯耶主持，由白克曼等人供給材料的。這張片子比過去同一性質的任何片子為佳，倘能在中國或蘇聯放映，必然會發生巨大影響。若能在香港映出也是好的。日內當設法與岑聯繫，不知他能幫忙否。

今晨精神較好，寫了致《工人自由》雜誌的編者信。收到超的詞集並《毛論》平裝本書三冊。寄《毛論》給令方，由他轉寄劉賓雁。

10月13日

一個星期沒有動筆。校改超回憶的譯文外，沒有力氣再寫一個字。可是這個星期裏值得寫寫的事情是太多了。東德和匈牙利的官僚政權發生了非常嚴重的危機。一般趨勢，可以概括為：從史大林主義走向傳統的西歐社會民主主義。這趨勢是要在那些國家全面恢復資本主義的。但很顯然，促成這些改變的諸般力量中，除了資產階級的民主派之外，還有廣大的勞動群眾中自覺與不自覺的為爭取真正社會主義的實現的那種力量。不但東德與匈牙利的情形如此，整個「社會主義陣營」裏所有國家的發展都是如此。史大林主義是死定了；可是代之而起的是什麼制度呢？是資本制度還是民主、健全與國際主義的社會主義制度？這是問題之問題。

10月17日

連日讀《胡適來往書信選》，看到許多熟人的信，有如見故人之感。吳世昌與何子瑜的幾封信特別引起我的興趣。一向對這二位老友不懷很多好感，讀了這些信，印象改善了些。二人都相當熱中，都喜歡「附驥尾」；但從這些遺書看來，他們的熱中還算有限度，驥尾附得也不太失自己的尊嚴。如果有力氣，頗想寫一小文來紀念世昌。對資深，我也將勸老超寫點東西來紀念他。

10月26日

《胡適來往書信選》中有數封我頗感興趣。世昌於1935年11月18日及同月27日二次致信胡適，斥責他的「等待五十年」的謬論，好

極。資深給胡適的信保存了5封，都是為獨秀遺著的出版事。1948年11月5日一信是談到《俄國革命史》的。信中所說例如再版300部一節，我完全記不得了。當時售價為每部150萬元【朱正按 當時內戰激烈，國民黨統治區通貨膨脹，法幣貶值，蔣介石於1948年8月19日宣佈幣制改革，發行金圓券，以金圓券1元收兌法幣300萬元，而一塊銀元可以兌換2元金圓券。所以150萬元法幣，不過金圓券區區5角錢而已，不過2角5分銀元而已。】，現在讀着彷彿是聽到天方夜譚。極好史料也。今接超信，知托氏生平一片已於10月9日在蘇俄放映，可喜的事。

10月30日

得慧雅信及照片。報告說他的第四個孩子將出世。無怪，人顯得老了。但熱情如故，可喜也。

前天又得水務局的最後警告，13日得付費通知，我竟完全忘記了這件事，健忘如此，實在糟糕。前天校改完超回憶的《進潮與退潮》一章，吃力之極，但願這件工作發生在廿年前！

燦來信，說他非常欣賞超的獄中詞。「曲高和寡」，總算得到一個真正的知音。

11月8日

連日校閱超回憶譯文，再無餘力寫日記。可是這幾天的變化實在大。東德的形勢簡直像溶化的雪人，這個被目為東歐最堅強的史大林主義的堡壘一下子暴露了它全部脆弱點。

昨天是十月革命的第七十二年紀念。蘇聯發生了第一次紀念十月革命的對抗遊行（自然 1927 年的反對派已舉行過一次對抗，但是規模與性質很不相同）。人們公然叫出反對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口號了。葉爾青被捧成偶像。前幾天《衛報》的記者 Martin Walker 說葉爾青可能成為蘇聯的莫索里尼這個預言值得重視。

前一晚第四電視台的新聞報導中有一段極令人興奮的消息，說蘇聯的歷史家竭力在恢復托洛次基的真實的歷史地位。有一位將軍說托洛次基是一個 Most Devoted Revolutionary。

歷史的進程真是複雜多變的。不過總的說來，我始終相信她是進兩步退一步。從長遠的觀點看，人類（中國亦然）的歷史是向前進的。社會主義一定會代替資本主義。

11 月 10 日

昨天兩項消息：東柏林的城牆開放；鄧小平辭軍委主席職。前一消息意外，後一消息卻是意中事。「蘇維埃帝國」乃是史大林主義的產物，它是主要靠武力與陰謀造成、維持的。它和當年的「大不列顛帝國」不同。後者雖然也是靠武力與陰謀造成；但它確實代表了一個經濟文化諸方面都佔了極大優勢的國家與階級，去統治遠較落後的國家和民族。在客觀上，至少在一個時間內它還起了點「歷史的進步作用」。可是「蘇維埃帝國」的主體俄羅斯，特別對中東歐國家言，在好多方面卻是較為落後的。原來進步的社會主義制度，又早被史大林主義所醜化與叛賣。它之控制一些中東歐國家，完全靠了軍事力量與其他補充的力量（如特務等），這樣造成的「帝國」，其基礎之脆弱，作用之反動，是非常顯然的。它始終得不到那些國家中民眾之衷心擁

護，原是十分自然。這個「帝國」能夠維持到四十幾年，已經不短了。隨着蘇聯本國史大林主義的重重困難，並由這些困難中被迫產生出戈巴喬夫的改革，這些附屬國家中硬生生建立起來的所謂「新史大林制度」之垮台，原是必然的，問題只在遲早而已。幾個月來波蘭、匈牙利與東德的突變，給人多少驚奇的感覺，只在它們（特別是東德）變得太快吧了。

「蘇維埃帝國」或更確切些稱它為「史大林主義帝國」之分崩離析是已成的事實。今後的主要問題是：從這個變化中會產生出比較健康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制度呢，還是它們將完全同化於資本主義？這個問題主要得看未來各該國的階級鬥爭來決定。我不相信史大林主義，或稍稍修正的史大林主義的官僚制度，還能有一個比較長期延續的可能。

孟特爾似乎認為有此可能，這是錯的。

天安門屠殺是此一趨勢的逆轉，但不過是暫時的逆轉。不管中國的史一毛制度比之於中東歐各國的制度有比較深厚的基礎，也不管中國事實上已不隸屬於「蘇維埃帝國」，但它是無法自外於這個總趨勢的。不管鄧小平們如何想法抵抗，如何想儘量保持原有的、或略事粉飾的官僚統治，終於會證明是枉費心機。

「蘇維埃帝國」的解體，「社會主義陣營」的普遍危機，在理論上證實了一點，即官僚們絕對不是一個新的階級，他們是革命政權墮落後，發生在某些國家中的寄生階層，他們決不能開啟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他們的地位是不穩定的；其作用是過渡性的：不前進（在革命勞工階級的壓力與打擊下）而讓位於真正的社會主義，便是後退至地道的資本主義，沒有第三條道路。

在這個基本問題上托洛次基是正確的。雖然「墮落的工人國家」這個名詞並不好。我覺得：過渡性的國家也許更符合實際些。

11月11日

格雷^[1]離英，超回憶的翻譯將暫停。本想趁此機會到倫敦去住幾天，腿上的靜脈腫脹惡化，舉步困難，決定作罷。

12月22日

東德之後，捷克也跟着發生了爭民主的群眾運動。這些中東歐衛星國的解體，原因自是深遠的；但從較近的推動力看，以戈巴喬夫為首的蘇聯的「改革派」顯然起了很大作用。它縱然不曾積極干預，卻是消極地表示了贊助——贊助「民主派」起來造「保守派」的反。戈巴喬夫主義究竟是怎樣的一種貨色，過去注意得不夠，今後得比較詳細地研究它一下。

11月24日

觀7時電視廣播，捷共全體領導人引退，杜勃契克回到不拉格^[2]。這一陣民主改革風真是席捲中東歐了。為什麼這些國家的史大林主義的官僚們，在群眾的壓力下表現得如此脆弱呢？為什麼他們比中共的官僚們更經不起群眾的壓力呢？一個最大的原因，我想，乃是中東歐國家的「社會主義政權」並不是「勞動大眾革命的產物，而是蘇聯紅軍與史大林官僚從外面強加在他們身上的一種東西。」它們在各該國的群眾中是沒有深厚基礎的。另一方面，像中共，越共以及古巴的

政權，卻不可否認是一場革命與革命戰爭的產物。它們雖然很快墮落——甚至一開始就在專橫的官僚們的控制之下，但不可否認，他們曾經在不同程度內，在各自國家與民族的範圍內，進行過革命，解決了若干民族的與社會的矛盾。因之，它們不是外國人移植進來的傀儡政府，他們在自己的民眾中擁有比較廣、深的支持。

當然，這個差別只是相對的。史大林制度之必然完結是注定了的。浪擲着過去一點革命威望來鎮壓覺醒起來的反官僚的民眾，遲早要失敗。天安門屠殺的所收「安定」作用，遲早會過去。

12月3日

戈巴喬夫去朝拜羅馬教皇，這是一件非常有象徵意義的大事。從這件事，也很可以讓我們看到蘇聯當權者在意識形態上走得多遠。史大林的宗教政策是完全錯誤的。革命的工農政權絕對應該容許宗教的信仰自由。但戈巴喬夫們的改正卻並不意味着在宗教問題上回到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它代表着這個政權與舊事物完全妥協的一個大步驟。

讀最近《國際觀點》上有關東德事件的文章，相當失望。他們似乎根本看不到，或者故意看不見資本主義勢力的猖狂。把一切說成是工人階級的鬥爭成果，這多少是自我欺騙，自我陶醉。

史大林主義在過去數十年中的所作所為，把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名譽是損壞得太大了。光憑理論，光靠宣傳，要讓一般人相信除了在蘇聯、中國及其他的所謂社會主義國家中所見到的社會主義之外，還有什麼真正的民主的與健全的社會主義，人們是決不會相信的。今天，特別是受了「社會主義政權」的壓迫與迫害的人們，

只一味地傾向資本主義。只有讓他們實際經受一下資本主義的禍害之後，讓他們或者嘗一嘗徹底市場經濟的「無政府」派混亂的痛苦，或者竟又嘗到了由此產生的壟斷資本的法西斯統治之後，他們才能回頭去追求真正的社會主義。

史大林主義的崩潰，決不是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終結。這一點，連英國的大主教都見到了。但是，非常可能，從史大林主義的崩潰，到真正社會主義的再興，恐怕要經過「民主的資本主義」的「興旺」時期。

看不見這個可能的社會主義者會在事變之前一再失望的。

昨天東德共黨的整個中央委員與政治局辭職。這是在共黨自己下層幹部的壓力下辭職的。這就不是「走資派」的壓力或國內資本主義勢力所施的壓力了。所以更有意義。是否在東德，能夠從史大林主義的倒塌中產生出健全的與民主的社會主義來呢？我們的希望在這裏。

12月6日

東德的克倫次與捷克的阿達美次先後下台，這兩個國家的革命繼續進展。很想多看些消息，多知道些內幕，可惜我又病了，病得連讀報紙的力氣都沒有。

班已回來，譯書又要進行，可是我真是有心無力了。但願早日病癒，把超的回憶錄譯完，了卻我此生最後的一個心願。

又得忙耶誕的無聊應酬，做人真苦。

候家書不至。

12月14日

見到11月5日的《莫斯科新聞》，上面有蘇聯一些歷史學家研究1917年革命的三篇簡單報告。大致不差，多少是符合戈巴喬夫觀點的。第二篇談列托二人的關係。它一方面談，托一向有「極左」觀點，說他早在1905年之前就要「跳過民主革命」，另一方面卻說1917年4月以後的俄國革命恰恰是托的預見發展的。不管為何，這總多少反映出蘇聯的歷史研究在這個問題上的進步。此報複印寄超。

12月15日

詹納爾突然來訪。代贈超的《玉尹》給他，也許他將來會把此書譯成英文。談到中國與東歐的近事，透露出這位「過去的毛派」對政治與革命史的淺見。對中國，他說「中國只有過去，沒有未來」。對俄國革命，他認為「由二月革命發展成十月革命是歷史的不幸」。言外之意，這個不幸是應該由列寧與托洛次基負責的。最後他說，史大林主義就是列寧主義。這個看法可以代表西方那些民主自由主義者的普遍見解。明知他與我之間的思想距離愈來愈大，我還是說明了我的不同看法。

非常可惜，我現在沒有力氣把這個爭論系統地寫出來。

巧巧書到，即覆。

12月23日

好多天沒有力氣寫日記，今天卻不能不寫幾個字了。下午聽廣播，羅馬尼亞的獨裁者齊奧塞斯科終於在群眾壓力下倒下來了。這個東歐史大林主義的最後堡壘倒下得比人們想像的更容易，也更可恥。

晚間電視消息，羅馬尼亞的獨裁者坐飛機逃亡出國外，去向不明，逃往何處呢？中國嗎？

今晚看完湯瑪斯·摩亞的《烏托邦》。這是四百七十年前一位思想家與政治家夢想中的共產主義。聯繫到目前「共產主義」的實況來思考、研究一番，該是極有意義極有教益的吧。摩亞與馬嘉維里是同時代的人，生活在兩個不同的環境中，對政治「哲學」都作出了非凡的貢獻；但二人的想法卻如此的不同。一個是空想家從醜惡的現實中虛構出一個理想世界；另一個是現實主義者，從醜惡的現實中尋找出一些規律來。基本上二人都是文藝復興晚期歐洲社會的反映。

我譯過馬嘉維里的《帝王術》，寫過有關馬氏思想的文章。倘有力氣，也想以同樣態度寫一篇有關摩亞思想的文章。

簡單說，摩亞的思想的基本方式是：從“*What it is*”到“*What it should be.*”馬嘉維里的思想方式是：“*Why is it?*” and “*How it had been achieved. How can it be consolidated; or how can it be impressed.*”我想，前者，近於中國的儒家，而後者近於中國的法家——特別與韓非見解有頗多不謀而合之處。前者是靜態的，是唯心的，後者是動態的，趨於唯物主義的。

12月24

晚與班的家人共飯。

12月25日

這是來英後渡過的第十五個耶誕節。匆匆十五年，不知不覺地過去了，時光過得真快。今晚與班家及瑪麗·斯汀生等共飯，談得太多，倦極，回家後聽了一下收音機，知道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柯夫婦已被反正的軍隊處死。感想頗多，只是疲倦之極，思路紛亂，更談不到將它們寫一點下來了。總之，兩個月短短的時間，由史大林奠定下來的蘇維埃帝國一下子像紙匣子那樣傾倒下來了。這是一樁歷史性的大事，無論從政治，經濟，乃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想與實踐看呢，都必須把它們作一番徹底研究的。

12月26日

倦極，臥牀不起，終日睡。

12月31日

連日困倦。儘管思緒萬千，卻一個字也寫不出。1989年真是太平凡的一個年頭。西方的一些政論家稱它為 *Annus mirabilis*（拉丁語：充滿奇蹟之年）。無疑，這個數字將非常突出地留在人類漫長的歷史上，有如 1789，1917 等等。這一年「奇蹟」從 5 月間中國開始，中經

波蘭、匈牙利，保加利亞，東德與捷克，終於輪到羅馬尼亞。這是數十年來史大林主義的制度所累積起來的矛盾與危機的總爆發。結果一直來貌似強大的政權，竟像紙糊匣子般傾倒下來了。（中國的專權派迄今未倒；但今後的日子是不好過的。）

在全世界所有的政論家，政治家乃至一般的社會學家中，預見到這種變化，因之不把它們看作「奇蹟」的，只有我們。根據不斷革命論的認識，根據國際主義的精神，根據我們堅持的沒有民主便不會有社會主義的見解，我們早就肯定這些醜惡的史大林主義體制是絕對建立不起社會主義來的。這些體制如果沒有新的政治革命起來徹底改革它們，便將退回到資本主義，乃至退回到野蠻主義去。

現在是臨到緊急關頭了。

在此局勢中最使我苦悶的一個現象是：為此變革準備了半個世紀的第四國際，卻未能在此巨變中起任何顯著的作用！我們是應該起很大作用，必須起領導作用的！

但願 1990 年開始，第四國際的作用能在大大發揮出來。

我們能比別人看得遠，見得早；但每當局勢依照我們的預見發展出來時，我們總發見自己被棄置在事變發展的進程之外了。

這是什麼緣故呢？老托當年苦心草擬的《過渡綱領》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的。可惜，我們這些「不肖門徒」卻無法因此改變了事態。

做一個「失敗的先知」並不可恥；但永遠做這樣的「先知」卻決非所宜。甚至是可笑與可鄙的。

我們的能事絕不在於（像彭述之那樣地）吹噓自己的一貫正確與永遠正確，而在於如何為正確的立場去取得勝利。對戰爭說，「勝利無代替之物」；對革命言亦然。

注釋

1. 即前面提到的「班」或「班頓」。
2. 布拉格。

1990年

1月1日

宗教改革家約翰·韋思理在他1785年這一天的日記上寫道：「不管今年是否為我生最後的一年，我希望它是我一生中最好的一年。」我有同樣感想，也有同樣願望。

1月5日

好多天沒有寫一個字，雖然想寫與可寫的事物極多。眼睛突然壞了：白內障惡化得很快。看書看報都幾乎不可能。這個樣子的生，實在不如死的好。我應該修改元旦摘引的韋思理的願望：但願今年是我生命的最後一年。

超把曼特爾介紹布魯耶《托傳》的文章譯成了中文。今天收到他的譯稿。九十高齡，作此工作，真是難能可貴。

1月13日

前天北京撤銷了戒嚴令。東歐的新發展，給於北京的教訓只是「對付動亂，唯一辦法是嚴厲鎮壓」。他們覺得（雖然不曾公然說出來），這幾個月來東歐的變化，只反證了天安門大屠殺是對的，是對付民眾要求民主的唯一辦法。看來中國的唯一前途是重演羅馬尼亞的故事了。

羅馬尼亞的「救國陣線政府」昨天宣佈羅馬尼亞共產黨為非法組織。政權很可能會慢慢轉入軍人之手。一個新的拿破崙，甚至一個羅馬尼亞的平諾顯，好似隱約出現在羅馬尼亞的政治地平線上了。

史大林政制的一種最壞的取代者。中國會出現同樣的情景嗎？

得布克曼信，說《回憶》的平裝本可能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承印。

1 月 15 日

又得布克曼信。邀我參加本年 8 月間將在墨西哥舉行的老托遇害的五十周年紀念會。時間過得真快。彷彿還是不久之前發生的事情，一轉眼竟是半個世紀了。布克曼慷慨熱情，願意負擔我前去參加的全部費用。不過我還是決定不去。衰頹至此，去了即使不會病倒或者死去，總也是疲憊萬分，什麼事都不能做了。決定給未來的紀念會寫一封信去，談談我這個老兵半世紀來的感想以及今後的希望。

對社會主義前途我仍舊是充滿信心的。雖然究竟怎樣才能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今後得好好研究。

1 月 16 日

得老超回憶錄「戀愛與政治」一章。來得及譯成英文，喜事也。

1 月 27 日

今天是農曆庚午年元旦。照習慣演算法，我是 84 歲了。不與家人一起渡歲已有四十一年，節日的感受已完全沒有。

昨天讀了美國哈佛大學退休教授 J. K. Galbraith 的文章：〈為什麼左（原稿似為右字？）派搞錯了？〉覺得很有見地。他解釋何以史大林主義完蛋，何以這又不表示資本主義的「翻生」，說得都相當好。對

於目前的新形勢，我們確該有較深的認識；光是背誦老書是不行的。為的讓人相信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仍然是人類唯一的出路，我們得提出新的解釋與新的論據。光是說眼前倒下去的是史大林主義，它不是社會主義，它不是共產主義——是不夠的。

現在許多人宣佈：由十月革命開始的整個歷史時期結束了。今後人類的歷史將朝着別的方向前進。這個看法對嗎？我以為：就近期看它是對的；但就長期看它是錯的。十月革命開啟了人類走向社會主義去的門，照當時人們的想法，全世界統統由社會主義制度代替資本主義制度，並非久遠的事，縱非幾年間事，卻決不會是百年以上的事。歷史的進展是比任何人的設想更為複雜多變，現在證明當時的樂觀的想法並未實現；可是新近的，乃至近數十年間的歷史是否證明十月革命所代表的理想也仍然是一種烏托邦；它是否證明資本主義制度將永續不變，資產階級的統治將永遠存在呢？絕對不是。長些，短些，十月革命所開啟的時代仍然繼續，它所揭櫫的目標和理想，一定會實現出來。這是我們社會主義者的唯心的願望嗎？不是的。只要階級存在，貧富存在，貴賤存在……那末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理想與鬥爭決不能消失。要消滅階級，貧富、貴賤之差，除了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卻別無他途可循。

喬治·奧威爾不僅是一個相當出色的文學家，我以為他是一個更為出色的社會主義思想家。他反對史大林主義，他比任何一個反共作家更有力地反對史大林主義；但他並不因此擁護資本主義，他十分堅定地相信社會主義是人類唯一的前途。他在1938年9月22日寫的佛朗次·包克腦所著《共產國際》一書的書評中，寫過以下的話：

包克腦博士（Dr. Franz Borkenau）以為共產國際政策之所以諸多錯誤，其根本原因在於這個事實，即馬克思與列寧所預言的

革命，並且在俄羅斯多少發生過的那種革命，對於先進的西方國家來說，至少在目前是不可思議的。這一層我相信他是對了。但當他說：西方的民主國家今後只能在一方面法西斯主義與另一方面通過各階級合作而完成的有秩序的改造這二者之間作一選擇，我和他的見解便分歧了。我不相信有第二種可能，因為我不相信一個每年收入5萬鎊的人；同一個每周收入15先令的人，能夠願意合作的。他們之間那種關係的性質十分簡單，那就是其中一人在搶劫另一人；我們沒有理由相信那個搶劫者會「改過自新」，因此，如果西方資本主義的那些問題真要得到解決，看來只有經過一條第三種途徑，經過一次真正的革命的運動，亦即經過一次這樣的革命，它能實行各種激烈的改革，如屬必要它又能應用暴力來實行這些改革的；但在同時，它卻並不像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對待民主的方式，它是能夠保持民主政治的基本價值的。這樣的事情決非不可想像。在許多國家中早已存在着這種運動的萌芽，而這些萌芽是會生長的。無論如何，如果它們不能生長的話，那末我們正在其中生息的那個豬圈是沒有出路的了。（見 *New English Weekly*）

在基本上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當然，他文章裏的「共產主義」應改為「史大林主義」。

2月3日

連日有客來，多談了些話，非常非常疲勞。來客中有一位波蘭來的女革命家，是「團結工會」一個分部的發言人。按理，我原該多聽她講點波蘭工人鬥爭的經驗；可是結果還是我誇誇其談。說了我的，沒聽她的。我這個老毛病真是無可救藥的了。

2月5日

得劉賓雁來信。在目前所有的民運頭頭中，我對此人的感覺最好。今後得跟他好好交換些意見。也許他可能成為我們的一個真正朋友的。同日得令方信。

蘇共中央委員會今天召開全體會議，戈巴喬夫提議自動終止共產黨壟斷政權。無論怎樣看待它，它總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舉措。至少，它應該與當年亞歷山大二世的「解放農奴」相比。這是一次上面發動的革命，是上面的統治者——其中比較敏感的一部分——感覺到客觀的需要，感覺到下面的壓力而作出的讓步。它和當年的解放農奴一樣，是為了保存舊制度，為了給舊制度尋求繼續存在的出路。它決不是統治階級或階層的自殺。蘇聯的官僚層和一切統治階級一樣，是不會自殺的。

但它一定會和歷史上一切被迫自我改革的統治者一樣，戈巴喬夫的改革也決不會是史大林主義官僚制度的否定。它多半會像亞歷山大的改革一樣，不是導成真正的革命，便將開啟一個時期更反動的局面。有人說，戈巴喬夫是一個 Great Facilitator。看來有點像。

2月11日

給劉賓雁寫了回信，想引起他對獨秀思想的注意。從他的信來看，他的最大注意與最大興趣是「揭露中共對異己者的暴行」。此人是新聞記者，不是深邃的思想家。這個局限看來是打不破的。但雖如此，他的正義感確很可貴。能否把此人從一般的「反共義士」立場拉到民主的社會主義者的立場呢？看來不易，但值得一試。

2月13日

黃紫紅把老超寫於1942年的一篇文章譯成英文，寄來要我校改。無法改，原樣寄回給她，同時給她寄一本老托給中國同志的信，請她讀一下獨秀最後寫給老托的信。近來頗覺得教條主義者——不管是極左或極右的——真是不可救藥的。

2月16日

天氣好，大自然向我招手。三個月來第一次去Otley。回家來非常疲倦；但神經鬆了一下，病眼似乎也舒適得多。

2月18日

阿來克西來電話，說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願意出版《回憶》的廉價本。他年餘努力總算有了結果。

2月23日

得劉賓雁自傳。連日腹瀉，不能吃東西，疲倦得很。待精神較好後當仔細讀劉傳。略翻一過，覺得材料很可貴，都是第一手的。我不曾在中共統治下生活過一天。過去中共與毛的批評，都從理論出發，依據的材料，全是從報章雜誌來的。劉的敘述很誠實，他筆下的官僚主義事實，可補我材料方面的不足。

2月24日

得燦雲信，知他相依為命的母親死了。他不信宗教，卻說「息勞歸主」！有時候，虛幻的信仰也能讓人多少減輕一些悲哀的。

2月27日

今年的今天恰好是農曆二月初三日。我的生日。我從來不看重這個日子，從來不記得親友們的生日。很難了解，為什麼許多人把這個日子看得這樣重。毛姆的《七十自壽》寫得極好。比他那本《札記》裏的任何一則都好。毛姆的人生哲學，他的種種見解，和我相去很遠，但他對生日的態度確使我歡喜。要不然我不會把它翻譯出來的。

連日大風大雨，今日毫無好轉蹟象。看來，今天只好一人在家悶坐了。昨天尼加拉瓜的山特尼斯特政府在「選舉」中失敗。美帝繼巴拿馬侵略後的又一侵略，又一「傑作」。

3月1日

十五年前的今天到英國。回想起來，一切都好像是昨天事。在這漫長的年月中，我到底做了些什麼。除了把回憶譯成外文出版外，可說一事無成。68歲來到此地，精力已經衰竭了。做不出什麼成績來，彷彿是理所當然的。

前天，戈巴喬夫被賦予總統的全權。這個人，將來究竟會成為當年解放農奴而終於被刺的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呢，還是成為拿破崙一世？難說；不過他決不是能成為使俄國革命復興的列寧或托洛次基，卻是可以斷定的。

3月7日

天氣暖，今晨出門去，看見水仙花已經盛開，路旁櫻花樹也有開放的了。牛津答應將版權給還我，喜事。廉價的美國版可能出得來。

3月13日

讀鄭學稼作《陳獨秀傳》。態度比中共的御用作家們，特別比唐寶林好得多。材料搜羅得不少，有許多是我未曾前見的。但絕對不是佳作。作者無「史識」，亦無史筆。最討人厭的是他謬托知己的態度。

鄭學稼讓我對獨秀的晚年生活知道得更清楚些。為了應付環境，竟不得不同薛農山、任卓宣、張國燾等等周旋，實在太可哀的。

劉賓雁的自傳還只看了一半。白內障日益嚴重，一天只能讀幾頁書。劉書給我的主要印象是：他能哭也能笑，但不能理解。這是一位有文學天分的新聞記者，不是純粹的文學家，更不是深刻的理論家。但是這樣的新聞記者還是非常可貴的。前天先給他回了一封短信，說他「筆頭帶感情，敘事有良心」。

3月18日

今天珣珣結婚。有什麼感想嗎？太多，無從說起。竟可說毫無感想了。「債多不愁」，「虱多不癢」？

3月22日

前日得白克曼信知哥大事尚未定局。但我還是準備重印的本子，外文版中被刪掉的「在寂寞中思索」預備在美國版中放進去，譯稿不理想，決定改譯後半段。

上星期五天氣好，坐車去綺爾克麗一遊，回來後疲倦極了。一連躺了幾天，什麼事都不能做。忘記自己的年齡是應該的；但是記得自己的年齡卻一樣重要。「忘記」是精神的勝利；「記得」卻是生理的、亦即物質的需要。這裏也有一種「辯證關係」。

格雷寫了一篇中托史，要我看。我雖然沒有餘力校閱朋友們寫的東西，但此篇卻非校閱不可的。超《回憶》中的「戀愛」一章已補譯完畢，得校讀一遍。

郵差送來 Baruch Hirson 作的一章《李福仁傳》，要我校讀。這個人很真誠，無法拒絕他的要求。慢慢來吧。

希望收到的信卻不見來。

3 月 23 日

赫遜文章裏摘引了 1934 年 1 月 29 日托洛次基覆李福仁的信，談到有關李和易洛生在《中國論壇》工作的問題，這封信我以前不曾見過。赫遜的文章讓我知道不少關於李易二人在上海時期的工作與生活情形。

給 Y^[1] 寫了一封信，兩星期得不到回覆，不知何故。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有時確實很微妙，這中間硬是有點「緣」，「緣」一盡，任憑怎麼挽救都是無效的。希望我和他之間的友誼不至於就此完結。

收到 L 君舊作的選集。不知什麼原故，我全無興趣讀他的作品。論才他是有的，論人品也不算差，但我無法喜歡這個人，也無法對他的東西發生興趣。

3月26日

得白克曼信，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決定接受《回憶》。決定給它寫一篇短序。

4月2日

意外得傅XX函，很高興。幾年不通音訊，時常想念。我不喜歡精明能幹的女人，當然也不喜歡精明能幹的男人。「精明能幹」往往只是庸俗不堪的同義詞。

4月3日

得白克曼函，說同時寄出合同，但未收到。哥大事算是確定了。可惜我身體不爭氣，想寫一篇短序，竟屢試不成。今天想再努力一下。

4月5日

得裕生、巧巧信，知志勤已於上月10日去世。年63歲。諸侄女中，她最聰明，書也讀得最好。最能了解我的也是她。才女多薄命嗎？去年10月寄給她的字典^[2]，她竟始終不曾見到。

4月10日

得宇平寄來珽珽婚後照片。簽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合同。試寫美國版回憶錄序，仍不成，實在是老邁無用了。白克曼來信，云稿子必須於6月1日前繳清，今夜希望好睡，明晨或可寫點東西。

4月15日

決定不寫美國版的長序。試了將近半個月：第一天勉強寫了一些，第二天總覺得不滿意，放進了字紙籠。實在是年老力衰，無法振作了。決定改寫幾百字的一篇小序，並將舊文〈從陳獨秀的最後意見談起〉作為附錄。如此一來，只是譯者的工作加重了，不知班兄願意否。

4月18日

長序寫不出，短序也寫不成，真老了。今晨原想好好地試一下；可是樓下的神經音樂愛好者又跟我搗蛋：照例絕早5時就奏樂。給他吵醒了，再也睡不好。7時起牀，原想等他9點鐘左右停止音樂後，試寫序文，誰知此公的音樂一直不停。忍無可忍，大聲蹬了幾下樓板，這下可壞了，音樂非但不停，而且音量大增。八四老翁怎能和二十多歲的瘋子鬥呢？只好認輸，離家避難，先去中區，消磨不多時間。好在天氣不壞，乘車去 Otley。在 Curlew 喝了杯茶，賞了一陣櫻花，1點鐘回家，原以為風波已過，哪曉得音樂之聲仍達戶外，而此公卻早已出門了。留着音樂專給我欣賞！「嗚呼！」該怎麼辦呢！！

4月23日

終於寫成了一篇短序，吃力萬分。幾年前就聲明擱筆，可有時還得破戒，做人真不自由。寫好序，心裏沒了壓力，精神也似乎好些，再休息幾天，得回復一些積下來的信件。

5月1日

得大哥、福全及王佐信。王佐是志勤的兒子。二人我都未曾見過，他們告訴我志勤的死訊。佐函是他母親病故前十天寫的，要他告訴我字典早已收到了。

5月3日

今天《衛報》上登載英國幾個大公司頭頭的薪水，很有趣。把它剪下來貼在此地。

五十二年前奧威爾舉英國人中每年收入最高的是5萬鎊（見1月27日日記引文），現在是153萬鎊。這樣巨大的增加，一方面固然反映出英鎊所值的差異，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在Thatcher政府下富人愈富的真相。據《衛報》記者的演算法這些大經理們二周所得，等於一位普通職員全年的收入。如果與普通工人的工資相比，差距當更加大了。

為此「人民資本主義」能夠萬壽無疆嗎？又：這群高級經理們的薪水每年增加33%，而工人的工資增加卻只許7%或8%！

The £500,000 club		
Hanson	Lord Hanson	£1,530,000
Lorrho	Tiny Rowland	£1,310,000
BOC	Dick Giordano	£937,000
Burton	Sir Ralph Halpern	£899,000
Midland	Highest Paid	£725,844
BP	Sir Peter Walters	£708,722
Kingfisher	Geoff Mulcahy	£701,000
Ladbroke	Cyril Stein	£603,000
Glaxo	Sir Paul Girolami	£598,081
ICI	Sir Denys Henderson	£514,000
Grand Met	Allen Sheppard	£506,438

Biggest 5-year increases	
Company	% rise**
Kingfisher	515
Midland Bank	505
Ladbroke	464
Hanson	408
British Airports	356
Carlton Communications	346
Royal Bank of Scotland	343
Glaxo	268
Allied-Lyons	254
Lorrho	234

Source: Company annual reports.

5月8日

Baruch Hirson 來訪。他是南非社會主義者，正在寫李福仁的大型傳記。提的問題不少，主要是關於三十年代初期李福仁與易洛生與劉仁靜聯繫後，前二人受劉的影響而反對陳獨秀的情形。此人與李並不認識，卻如此熱心地要給他南非的前輩留點紀念。很難得。

5月9日

Baruch Hirson 再來訪，談了三個鐘頭，都是關於李福仁的。贈我三書，可惜我實在無力看鄭重的書了。對於南非，我一無所知，不敢妄發意見。作為一個國際主義者，對目前世界政治中如此重要的一個地區完全無知，應該引以為恥的，但是「補課」怕已經太遲了。二次長談，只覺得這個人很好，可以成為好朋友的。

5月16日

得白克曼寄贈的 Van Heijenoort 的《與流亡中的托洛次基在一起》（編者按：大陸上海三聯版書名為《托洛次基流亡生涯》）。此書我幾年前早已在圖書館裏讀過。又得超寫的《九十自述》。超真是人瑞。如此高齡、還有如此充沛的精力。他能活到百歲是十分可能的。

寄春信，附《一封新發現的舊信》。老托當年給李福仁的忠告：「為了延生命而以付出生命的意義為代價，這在政治上是不聰明的」。說得極好。

5月19日

班駕車失事，幸受輕傷。昨天去探望他，走多了路，今天倦極。

5月21日

回憶錄的全部新加文字：一篇序，最後一章法文版序，正誤表以及班兄改寫的導言今日寄給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總算又完成了一件工作。最近自覺健康情況比去年此時好。路能走得有些，頭腦也比較能集中些。大前天譯了老托寄李福仁的一封信，寄去香港。或者我還能做點事，寫點東西。

5月22日

羅馬尼亞選舉結束，過渡政府的「救國陣線」獲得大勝。這個結果，美國的統治者非常不滿。我不很清楚這個「救國陣線」中起重大作用的過去的共產主義者究竟是怎樣的一批人物。不清楚他們過去反對齊奧塞斯科政權所採取的是什麼立場。但據「陣線」的一位顧問 Silviu Brucan 的話（「羅馬尼亞的革命不反對共產主義」）來推斷，再從美國竟於事先撤回大使這件事來看，「救國陣線」裏仍有一部分人要走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路，他們至少不曾照華盛頓的意思行事，不肯照他們代為規定的日程來恢復資本主義，是可以肯定的。

5月23日

連日校閱超回憶錄譯文的注釋，倦極。頭腦又完全不能用了。

6月1日

子春【朱正按 樓子春即樓國華，本卷中作者有一篇專門紀念他的文章。】寄來二幀照片，是兒孫們為他祝賀生日的。這多少引起了我一些感慨。我一生不曾為子女盡過心，他們對我冷淡是應該的。記得法國的一位女影星說過一句話：「我不曾把我的孩子當兒子，他當然也沒有理由把我當母親。」（大意为此）。

讀了子春寄來的戴晴文：〈我的入獄〉。此人的態度似乎比嚴家祺等好些。文中描寫的監獄生活，如果不是特殊待遇，那末比之於我們當年所過的監獄生活，確實好得多，這也證明中國確實已有若干進步了。

6月2日

戈巴喬夫說：蘇聯現在好像是一艘失掉了錨的船。拋棄史大林主義，連帶也拋棄了馬克思主義，同時因囿於傳統，又阻於下層勞動大眾的反抗，不敢飛速地恢復資本主義。這是戈巴喬夫一切困難的原因。葉爾青可能代替戈巴喬夫，他可能會步莫索里尼的路。

6月4日

天安門事件一周年。香港有較大規模示威。北京大學有點表示。與許多人的預料相反；中共統治沒有像東諸國那樣戲劇性倒下來。這當然不是由於中共統治本身比其他的史大林統治好些，或者強些。主要，我想由於中國與東歐諸國有個重要不同：前者的反對勢力沒有找到一個中心來團聚。在東歐，這個中心是教會。特別在波蘭那樣的天主教國家，教會、教堂、教士在民眾反抗共黨官僚壓迫的鬥爭中，曾

經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中國的宗教團體是起不了這個作用的。在所有的貶中共勢力中，最有力量的是國民黨；但這個政黨的糟糕政績，在人們的記憶中實在太新鮮了，要想裝成民主鬥爭的先鋒與領袖，畢竟是很難的——雖然它正在竭力利用中國的新局勢。其他的民主黨派，例如「民革」，「民盟」之類，能起這個作用嗎？我看極少可能。沒有一個反共的政治勢力可以起來團聚一切反共的勢力，這，按我看，乃是華盛頓討好北京當局的主要原因。

沒有一個力量能起來取代中共統治，並不等於說，沒有一些力量，在複雜的國際援助下，不能推翻中共的統治，或使這個統治破碎。換句話說，如果沒有一個力量能把中共統治完整地接收過來，在國內危機的加深中，能使目前這個統一的中共政權，變成四分五裂的好幾個互相對抗的割據的政權，這是大有可能的。

這個形勢，至少從美國、甚至日本那些有意投資中國的大資本集團看來是害大於利的。懂得這一點，那末，美國一方面表同情於民運，另一方面卻拼命跟北京政府維持正常關係，並延長「最惠貿易國」待遇，就很容易明白了。

一個堅持社會主義前途的政派，如果能影響並團聚不小部分中共內部的反史大林主義的革命者，以廣大的工人階級為基礎，以此作為反對中共現存反動政制鬥爭的團聚中心——這該是一切真為中國前途而奮鬥的唯一目標。

6月17日

8號開始的世界盃足球賽累得我疲倦不堪。一天看一場，有時甚至看兩場，實在吃力，結果連寫一點簡單的日記都沒有力氣了。

6月18日

今天的《衛報》上有一篇關於葉爾青的長文，作者 Jonathan Steele 值得注意。以前有些人說他可能成為蘇聯的莫索里尼，讀了這篇文章，又覺得這個可能性不很大。

6月19日

一位蘇聯的國會代表，莫斯科大學世界文化講座教授，全蘇聯外國文學圖書館主任，不列顛皇家學院的通信院士 Vyacheslav Ivanov 教授今天寫信給《衛報》，

呼籲英國人民採取一切可能步驟來援助蘇聯解救蘇聯人民面臨的饑荒。蘇聯的危機是暴露無遺了！在十月革命之後的七十年，蘇聯竟會陷入這樣嚴重的經濟和糧食危機，究竟該怎樣解釋呢？現成的答案是史大林主義的制度使

然。但是這樣的解釋至少是過於籠統的。據我看使蘇聯以及中國弄到這個地步的一個非常直接的重大原因是用盡一切力量來和美國從事軍備上的競爭。結果，在軍備上變成「超級大國」，但人民卻給弄得連起碼的飯都吃不上了。當年陳毅的一句名言：「寧要原子，不要褲子」，現在是見到報應了。軍備競爭帶來了許多後果，富甲天下的美國，竟

Restoring the food chain to the Soviet supermarkets ;9/6/90

THE food supply in large cities and industrial areas of the USSR is worsening all the time. I don't think there is only one reason to explain it and only one person or group of people to be blamed for it. We see the results of a breakdown (or collapse) of a whole economic and social system that should be substituted by another one as soon as possible, but the reforms would take some time to get immediate help to the people.

Meanwhile, the absence of necessary produce in Moscow, Leningrad and other key centres may lead not only to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health of children, ill and old people, but

also to grav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They may influence badly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side the USSR and in Europe. For humanitarian and political reasons it seems to me that it is extraordinarily important to help the population that suffers from the situation of impending hunger.

All of us will be grateful to the people of Britain for their possible steps in this direction. (Prof) Vyacheslav Vs. Ivanov. USSR People's Deputy, Chair of World Culture, Moscow University, Director of All Union Library of Foreign Literature, Corresponding Fellow of the British Academy.

會因此而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財富上遠遠不及美國的蘇聯，在借貸不易的情況下，只好造成災荒了。第二次大戰後不准重整軍備的西德與日本，想不到竟會因禍得福，變成為西方與東方的二大經濟霸主，這也是歷史老人給人們開的一個極大玩笑。（注）^[3]

6月23日

超寄來了一篇文章：〈革命死了，革命萬歲〉。他認為過去一次世界革命的潮浪始於1917年的俄國十月革命，終止於1927年的廣州暴動。此後，新的潮浪不曾再起，直到現在還在低落。這看法我以為站不住，太簡單化了。

得白克曼信，知辛克來又患病入院。

6月29日

連日倦極，今天終於決心去看醫生。做了檢驗，據說身體一般正常，囑多休息。

上面的好鄰居遷出了，樓下的音樂狂人則「巋然不動」，原想更上一層樓，較遠噪音，只奈年輕朋友星散，無人幫忙搬家，只好算了。忍住吧！

不少信待覆，希望明天起精神好些，還點信債。

前晚意外地接到令方從台北打來的電話。

7月7日

一直不舒服，什麼事都不能做。從2日起蘇聯共產黨召開第廿八次大會。這是一次重要會議，它的決定對今後的蘇聯局勢，甚至對世界局勢都會有大影響。每天的報導很多，可惜我沒有力氣仔細閱讀。

班給我送來了VP但尼洛夫的一篇文章：“We are starting to learn about Trotsky”，很好，立即覆印轉寄。托洛次基讓人誤解為「革命的惡魔」；他的主張讓人了解為「一味激烈」「一味靠左」。這篇文章大有助於此形象的打破。當托洛次基的真正主張和行為為一般的蘇聯人所知道之後，我想情形會很不同的。

前日得劉賓雁信，詢問春的地址。對於這個人，我還存有若干希望的。

晚得查理·文·格爾頓電話，知魯易·辛克來逝世。雖是說「生死慣見渾無淚」；但眼見真正的朋友相繼離去，這感覺實在難受。

7月12日

得春函，知超患病入院。但願一二天內能收到病癒出院的好消息。

得陳獨秀書信集。水如編，新華出版社出版，內部發行。

讀伏爾泰的《戀弟德》，很感興趣，可惜頭痛眼花，讀書太辛苦，一天才讀得四、五頁。讓時間淘汰下來的古典舊作，畢竟不同。不管它們有什麼毛病，（沒有毛病的書，正如沒有缺點的人一樣，世間根本不可能有）卻總含有特別可貴的東西。

7月14日

蘇共第二十八屆大會昨天閉幕，以 Yeltsin 為首的所謂激進派聲明退黨。蘇聯的官僚階層公然分裂。不管怎樣，這是一件行將發生深遠影響的大事。

這次大會標誌出一個明確的趨勢：蘇聯這個從來既可前進至真正的社會主義，又可後退至資本主義的「過渡性」的制度，今後多半將循後一可能加速前進了。蘇聯將成為一個十足資本主義國家——除非在今後的「改造」過程中引起新的、以工人階級為主力，並由具有真正社會主義的政派領導的一次或數次革命，才能改變這個趨勢。

目前存在於蘇聯的三個主要政治派別，所謂「激進派」，「中間派」與「保守派」，無論哪一派掌權，都只能完成這個資本主義復辟過程。其間差別，只在快慢而已。

7月19日

得文·格爾頓信後其所寫的辛克來追悼文。辛克來追思會將於9月28日在格拉斯哥大學舉行，預備寫一追思文寄去。

7月21日

白克曼來，迎於車站。五十一年後重逢，真的有如隔世。

7月22日

整天與白克曼談天，主要是懷舊。這個人太重感情，太容易激動，每逢談到一些「可歌可泣」的往事，他總是淚盈於眶。和格拉斯

比，正好兩個極端，一個太冷靜，一個太熱情。他明晨5時就要離此返美，不能送他。此生大概不會與他再會了。

7月23日

晨得超麟信，是本月11日發出的。說病情不嚴重。他又說仔細看了我為《回憶》美國版所寫的序，完全同意，這使我高興。

11時，魯道夫·西格爾到。

7月28日

連日與訪客談天，還得弄兩頓簡單的食物。勉強應付，苦不堪言。走路略多，兩腿幾乎無法站立。幸虧西格爾與班的關係有所好轉，超的德文回憶至少可以順利出版。

今天是宇平來英探我的二周年。得裕生信。

7月29日

今晨西格爾離此赴曼徹斯脫。倦不能舉步，沒有送他的行。下星期三有幾位倫敦朋友要來看我。

訪客絕蹟是淒涼的，太多卻又無力應付，這是無法解決的矛盾。

8月1日

懷耀、榮佳來訪。休息了三天，精神略好。歡談半天，客人怕我太疲倦，即日回倫敦。今天樓上的新鄰居來了，一進門就開電唱機，

大播搖滾樂，其吵鬧比樓下那位製造的更甚。無法想，只好兩耳塞滿棉花，逃入後房避囂。

這種所謂音樂的音樂，如此可怕，而年輕人嗜之若命，不可解。有人說，那得怪我們這一輩的落伍，沒跟上時代。是這樣的嗎？要適應環境，簡單為了與鄰居們和平共處，我得努力去理解和欣賞那些音樂。可是這樣的適應，至少對我來說是肯定地辦不到的了。真希望早些離開這個世界。

昨天得德友平安返里的電話，今覆一信，問白克曼安好。

8月5日

五天前得慧雅寄來的她第四個孩子的照片，要我給孩子取一個中文名。今天才有力氣寫回信，我一生不曾給孩子們取過名字，連自己的兒女的名字都是別人給取的。慧雅的四個孩子真是一個例外，名字全都是我取的，可以說是「緣分」。

8月7日

今晨醒來聽到消息：巴基斯坦的布托女總理被總統免職。由於兩天來伊拉克侵佔庫威德的消息佔據了頭版新聞，巴基斯坦的消息幾乎不甚引人注意。其實，這是很有意義的事變。它和數月前緬甸選舉中反對黨獲勝卻軍人政權不肯讓位的新聞，有同樣的重要性。它們告訴我們，英美式的資產階級民主議會制度，也不是任憑哪一個國家可以照抄的。中國近百年來的歷史就是一部想照抄英美民主而未能成功的歷史。落後的中國必須「以俄為師」是對的，可惜中共所師的是史大

林的俄國；而不是列托的俄國。今天的民主派想根本否定「法俄」，而想一模一樣地「法英美」，他們應該從緬甸，巴基斯坦最近演出的「民主悲喜劇」抽取一些教訓的。

8月9日

《衛報》上見到 Ralph Miliband 寫的泰瑪拉·獨伊徹多夫人的訃聞。她是7日逝世的。十幾天前，白克曼在她家裏拍攝電視片段，預備在托洛次基被害的五十周年放映的。我們向白克曼問了泰瑪拉的近況，據告她身體還好；哪知道突然去世了，上一個月7日，辛克來逝世。我到英國後結識的幾位好友，1月之內失去了兩位，實在難過。他們二人都比我年輕，健康情形都比我好，可是先我而去了。翻翻十多年來泰瑪拉寫給我的信，真摯的感情，清麗的文字，加上深遠透徹的思想，讓我更加痛感到她的逝去是一個太大的損失。

是她，把我的回憶介紹給牛津出版社的。但願我的精力能夠回復一些，讓我把十五年來她與我的來往寫一點出來。

連日焦待白克曼的信：怕他來去太匆忙，旅途辛苦，病倒了。

8月10日

得白克曼信，知道他歸程中一切平安，大慰。

8月17日

有機會重讀愛因斯坦四十一年前寫的文章：〈為什麼你應該成為社會主義者〉。對於他文章末段論計劃經濟的話感到特別興趣。他批評資

本主義的話是很深刻與正確的，特別是談到科技進步對勞動大眾的消極影響時，更顯得這位大科學家的精闢見解。不過，愛因斯坦的這些見解，在當時，能夠說出來的人並不少。不但馬克思主義者，便是一般的略為左傾的學者或政治家，都能說出類似的話。而且，他們還都能告訴你私有資本制度必將讓位，它必將讓位於有計劃生產的財產公有制度。愛因斯坦比這一些進步的、左傾的五十年代的學者們不同的，在於他不僅贊成以公有制來代替私有制，而且他能預先指出那種公有的計劃經濟制度，並不是無條件比生產工具私有的資本主義制度進步。它的是否進步，還得看許多條件來決定。它可能、而且應該比典型的資本主義制度好，但也可能比資本制度還要壞。下面是他的文字：

我相信要消滅這些重大罪惡（指他在文章前段列舉的資本主義制度的罪惡——西）的唯一方法就是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同時還要建立一個以趨向社會目標的教育制度。在這樣的經濟中，生產工具為社會所擁有，而且要以計劃方式來利用這些工具。一種有計劃的經濟，將生產適應社會需要的經濟制度，會把應做的工作分配給所有有能力工作的人，而且保證每一個男人，女人與孩子的生活。對每個人所施的教育，除了提高他本人原有的能力之外，還要試行培養他具有一種對別人的責任感，要用這種責任感去代替我們目前社會中那種對權力與成功的歌頌。

不過，必須記住：計劃經濟還不是社會主義。光是計劃經濟，也許隨之而來的，是個人的完全受到奴役。要使社會主義成功，必須解決一些極其困難的社會政治問題（Socio-Political Problems）；鑑於政治與經濟的權力的高度集中，如何才能使官僚們不致成為全權與專斷？如何才能使個人的權利得到保障，從而確保有一種民主的力量來對抗官僚的權力？

同樣意思，托洛次基曾經不止一次地說過。例如在《被背叛的革命》中，他說過如下的話：

要把私有財產變成為社會所有的財產，必不可免地要經過一個國有階段，這好像一條毛蟲要變成蝴蝶，必須先經過一個蛹的階段一樣。無量數的蛹曾經在成蛹的階段上死去而未能變成蝴蝶。國有財產要變成「全民財產」只有到了這樣程度的時候，即社會特權與社會分化已經消失，因而國家已不再是必要的時候。換句話說：國家財產之轉變為社會主義的財產，其過程是與國有財產不再是國有財產這個過程成比例的。反之亦然。蘇維埃國家愈是高踞在人民的頭上，它愈是以財產守護人的資格和那被當作財產浪費者資格的人民處於對立地位，則它愈是明顯地注明出這樣的國有財產是與社會主義性質相反的。（見《被背叛的革命》，英譯本，237頁。）

這段話是1936年寫的，比愛恩斯坦的話早出十三年。卻是何等地相似！從來有些社會主義者，甚至包括不少的托洛次基主義者在內，一提到國有財產，便無條件地賦與它以「進步意義」。他們應該把上引的二段意見體會的。

今天，我們親眼看見不少國有財產的「蛹」未能變成蝴蝶就死去了！

8月29日

晚觀電視第四台有關老托遇害五十周年的影片。片分二部分，第一部分是老托生前在墨西哥流亡中的生活片段，這是白克曼當年拍攝

的。經過一些剪接，效果很好。它讓人看到這位大革命家的溫情的一面。這裏面沒有談政治，沒有談思想，但我以為它比談政治與思想的電影更有利於老托這個真實形象的恢復。第二部分是在泰瑪拉家的書齋裏拍的，主要是談話，參加者有泰瑪拉，泰力·阿里，白克曼，老托之孫伏爾可夫以及伏爾可夫的女兒蒙妮嘉。泰瑪拉發言最多，話也說得最好。誰能料到：此會之後不到二十天，這位傑出的女作家竟會死了！

9月3日

寫了一篇憶念辛克來的發言稿，寄給文·格爾登，請他在本月下旬舉行的辛克來追思會上宣讀。

《衛報》上有長篇關於葉爾青的報導，從報導看，此人將來很有可能變成俄國的莫索里尼或賓諾顯。我最初對他的看法比較合乎事實，戈巴喬夫是半推半就地擁抱資本主義，葉爾青卻是大模大樣地走向資本主義。無論向左或向右，無論革命或反革命，徹底的與堅決的一派一定會更易得到群眾的支持。

9月6日

一月來一直為樓上鄰居的噪音所困擾，不得好好休息和睡眠，苦惱之極。跟那位女士談了一次話，又寫過一張字條，請她夜間不要開電唱機，白天如果開的話，請她儘量開低些。她滿口答允，連說 Sorry，事實上卻依然不改。上星期給房東寫了信，請求調換一個房間。房東寄來了請求調屋的申請書；但我還是決不定到底要不要申

請。搬家，對於我目前的處境來說，簡直是天大難事。年輕的朋友都走了，我自己卻是連舉手投足都日感困難；怎麼能搬動那麼多的書籍與雜物呢？看來，只好再忍下去。希望那位女士能在房東的勸告下，稍稍檢點些。

我的房東是一種不謀利的、半民辦半公助的組織，主持人比較前進，他們首先要為那些比較困難與比較貧苦的人解決居住問題，這本是好事。可是從我九年來的鄰居的情況看，確也看得出英國下層社會中一些嚴重的問題。

與我同時遷入一位在我樓上的是一個單身的中年婦女。遷入的第一天就來了警察，說她偷了同居的人們一個皮包。幾個月後，警察又來半夜裏叩門。揪錯了電鈴，把我給弄醒了，問明來由，說是為了我的鄰居拐帶了她朋友的一個孩子。……這個婦人其實有神經病，有時人很好，和和氣氣，有時卻莫名其妙地大發雷霆，無端端打上電門來。此人認不得幾個字，不懂得拼音，把我的姓讀成 KAN。這位「芳鄰」如此這般地與我在同一幢房子住了五年，最後因積欠房租，不繳電費，斷了水電，搬了。

樓下的房客變化很大。最初是一對老夫婦。裝了電話，隔壁的一位黑人鄰居常來借打。老人讓他利用；可是那個黑鄰居卻得寸進尺：他把這個號碼告訴自己朋友，讓他們打進來，要那老人「傳呼」。老人最初忍住氣，傳呼了幾次。後來不勝其煩，不轉達了。那位流氓竟因此大發脾氣，打上門去。老夫婦就此嚇跑了。接着來的是一對年輕人，住不到兩個月，我根本不曾認清過他們的面貌。二月作鄰，只留給我兩個深刻印象：1、深夜，大雪，忽然讓一陣猛烈的拍門（樓下

的門)聲和大哭大嚷聲所驚醒。那對年輕人中的女的給轟出門外,不讓進屋。大約吵嚷了一個鐘頭,女的在大雪中哭着走了。2、此事發生後不久,也是在深更半夜裏,我從夢中醒來,只聽得下面不斷傳來的器物擊捶聲,木板破裂聲,玻璃破爛聲。起身查看,只見後面的空地上停着一輛搬運車,有人在往車上搬東西。次日起身下樓,只見門窗已盡被破壞,住客在半夜裏溜走了——後來聽收租人說,此人根本不曾給過房租。第三個樓下鄰居又是一位退休的老工人,寡身,養着一條狗。人很和氣,跟附近的一些小孩們弄得很好。一天,孩子們照例去拍門,門不開,一位男孩子爬上窗櫺去探望,只見老人撲倒在地,旁邊蹲着那一條狗。孩子們叫喊,地上的人不動,於是報告 caretaker。他破門進去,發見那人已氣絕身死。我是那個瘋婆子給我報訊的。最初我不信,因為不多一會前我從後窗裏還看見他帶着狗散步回來的。此事由 caretaker 報告了房東,房東設法通知了死者的親人——住在鄰市的兄長。黃昏時,開來了一輛長長的黑色車子,運走了屍體。那條狗讓死者的兄長牽走了。

這之後,樓下在很短期間住過一對埃及夫婦。他們與人來不往。見面微笑打個招呼。每天清晨傳來的如唱非唱,如哭非哭的大聲祈禱,總會把我吵醒。除此之外,卻是毫無令人討厭之處的。接着埃及人來住的便是我現在的鄰居——那位撞車傷腦,清晨三、四點鐘便大開其電唱機的青年。三年多來,不曾看見他幹過任何工作。不知他靠什麼生活的。

這個人的自私與不近人情,使我恨極,憤極,生平似乎從來不曾這樣恨過人,也似乎從來不曾有人使我生這麼大的氣,可是有了樓上新來的女人,相形之下,竟使那個最討厭的傢伙都不那麼討厭了。

9月9日

新秋天氣，「雲淡風輕」，陽光溫柔而嬌豔。下午去公園散步，第一次躺在草地曬太陽。直望天空，側看地面，頓覺與平時見慣的完全不同。這真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視角不同，所見有異。這對景物如此，對事理說亦然。偏觀偏聽，實在是妨礙進步的。

9月13日

鄂嫩君將去日本一年，特來辭行。昨天盧葦打來電話，說越之胃出血進了醫院。香港的年輕一輩中，此人確是最有希望的，可是身體不好。給他寫了封問候的信，同時告訴他，我身後的書籍中，有關內部生活的那些英文小冊子統統留給他們。

9月20日

瑪丁妮來，照例煮一碗素齋招待。她吃得津津有味。她這次來，也是辭行性質。下星期回法渡假三月，假後繼續教書，等這個學年終了，她將辭職不幹，回法另找事做。她在英國已呆了九年，厭了，說：到頭來還是故鄉好。

今天《衛報》上登載了艾力克·赫法的致捷克總統哈佛爾的一封公開信，寫得不壞。英國的左派議員中確實要數他最好，最不忘本，最有骨頭。

前幾天在 *Sunday Organizer* (第459期) 看到一節轉載自9月2日《星期日電訊報》(*The Sunday Telegraph*) 的文章，極有意思，值得

一記。作者名叫 Janet Daley，文章題目叫做〈別讓托派來挽救社會主義〉。文章中節引的一段如下：

共產主義失敗，未能同時伴以馬克思主義影響在英國知識分子中的立即消失，主要是由於托洛次基主義的廣泛影響。讓英國左派中人奉為大英雄的，畢竟是托洛次基。

這幾句簡單的話，說出了比這位作者自己所能想到的更多的東西。它們也暴露出她對她所深惡痛疾的共產主義與托洛次基主義了解得如何淺薄。

跟所有的反共作家一樣，她把史大林主義的失敗稱之為共產主義的失敗。在他們의思想和文字中。總是說，不管是馬列主義也罷，托洛次基主義也罷，歸根結蒂，都只能是史大林主義，因此他們硬是要說，最近在東歐與蘇聯所發生的不是史大林主義的失敗，而是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的失敗。至於托洛次基主義，據這些人的看法，不但就是史大林主義，而且比史大林主義更壞，因為它比史大林主義更左，更激烈，更主張專權，更反對民主。托洛次基之所以反對史大林，依他們之見，完全是個人權力之爭。在鬥爭中托洛次基偶爾發表一些比較開明或民主的話：那只是一種手段，是策略，不是他真正為之鬥爭的原則。所以，他們以為，如果當年蘇共黨內鬥爭獲勝的是托洛次基而不是史大林，過去半個多世紀的蘇聯，東歐乃至整個世界其他地區的歷史可能不同，但這個不同只能表現得更壞，更糟——更不人道，更不民主……

托洛次基身後留下來的數量文獻，大量著作，足以充分駁斥那種看法，它們充分證明了托洛次基不是在事後，而是在事前或在事件正當發生期間，便提出了與史大林們所主張的根本不同的見解。而這

些見解，特別在今天史大林主義徹底失敗的光照之下，顯得多麼地正確。姑且舉幾個最明顯的例子：一個國家不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文學或無產級文化不可能產生；無產階級的專政下也得實行多黨制……諸如此類的先見、遠見，現在是連一個最普通的工人都見到了。

可見，Janet Daley 一類的「民主派」想把托洛次基主義的思想影響從英國左派知識分子中驅除出去，只是一種妄想罷了。

我確信，今後整個人類的命運，社會主義的前途，在很大限度內，正有賴於托洛次基主義的存在，正有賴於這個「嫡傳的」馬克思主義不但在知識分子中，而且在所有的勞動人民中不斷地擴大它的影響。

假使不曾有托洛次基主義作為史大林主義的思想與實踐的對立面而存在，今後社會主義的命運會更加艱苦的。

9 月 21 日

最近讀了伏爾泰的《戇第德》。昨天又買了一冊歌德的《意大利遊記》。

得白克曼信，知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終於決定不接受老超的回憶錄。意中事，但仍然多少感到失望。不接受的理由是「作者無名」，這顯然是藉口。其實，西方人的眼中，「有名」的中國人除了孔夫子之外，大概只有毛澤東了。

幸而《雙山》的重印計劃沒有變卦。

9月24日

昨天阿九偕同幾個朋友和他新結識的女友來訪。這位女友至少是他第五個結合的對象了。

晚得格雷電話，他從中國回來了。又知令方延期來英。晨發致李懷回信，請他幫忙秀如女婿的簽證事。

9月25日

昨晚7時開始，樓上的「音樂」一直繼續到今晨8時，破紀錄的長，整夜不得安眠，頭痛之極，想不出任何對付的辦法。今天政府的「環境部」發表白皮書，其中據說有專門對付 Noise Pollution 的條文。它能解決我目前的問題嗎？昨晚收音機中聽到本屆愛丁堡藝術節中一位中國年輕作曲家譚盾的作品，名叫 Orchestral（管弦樂的）Theatre。它把中國京戲的味道與情調，（特別是像三叉口等的武打戲）用現代新派音樂的手法表達出來，非常成功。我覺得它比「梁祝協奏曲」更成功。我從來無法接受新派音樂，可是譚盾的嘗試似乎給新潮音樂開出一條新路——它也抽象，但至少對像我這樣多少能欣賞京戲的人來說，卻很「具體」——非常形象的。聽着、聽着，心眼上彷彿看見一齣精彩的京劇正在演出。

「梁祝協奏曲」還只是中國戲曲與西洋音樂的混合品，「管弦樂劇場」卻已是二者的化合物了。

9月28日

樓適夷給老超的回憶錄寫了書名，昨天收到，今天寄給魯道夫。字寫得很好。

今天辛克來的朋友們在格拉斯哥大學的亞當·斯密館開追思會，我事先被邀參加，路遙，體乏，無法去，我的悼文將由查理·文格爾頓在會上宣讀。

上星期日阿九與阿T來，談話時曾經涉及如何在朋友中間處理不同意見的問題。這段談話似乎值得追記一下。阿九在我書架上發見有老彭的選集，大奇！問我為什麼要珍藏那個仇敵的書。這問題使我覺得比他更為奇怪，問他為什麼不能閱讀，乃至保存與自己懷有不同意見的人的著作。把不同意見的人說成「仇敵」，這是大錯特錯，是史大林主義、乃至一切專制學派與專制體制的一個重大特徵。彭述之和我之間有許多不同意見，但不能、也不曾成為「仇敵」。也許彭早已把我看成仇敵，但我卻從來不曾有過這樣的看法。他生前如此，他死後我還是如此。在我給他寫的悼文裏，我還是承認他是一個革命家。不同意我的一些見解與行為，便是我的仇敵，因之必須無情打擊甚至必須徹底消滅！這是史大林主義的最大病症，最大罪惡。一個真正革命家，真正的馬、列主義者與真正的托洛次基主義者，必須引以為戒，必須堅決反對，必須徹底擺脫這種作風。

不錯，在爭辯中，特別是關於理論與實踐的一些重大問題，如果有不同意見，雙方都須明白提出來，必須不講情面，為各自的見解力爭。在劇烈的爭辯中，不可否認，會影響到爭辯者之間的關係和感情。但是在思想上持有不同意見的雙方，必須具有「我不同意你的意見，卻完全同意你有權利保持不同意見」的那種態度。列寧在思想上

與政治上是最最嚴格的，他絕不容許有其他因素來影響他對問題的看法和堅持；但是他從來不把不同意見者當作仇敵。例子太多，我只想舉出他和托洛次基與布哈林之間的關係，與前者，十多年的爭辯不妨礙他於革命到來時與之作親密的合作。對後者，他不曾因為布哈林曾經要將他逮捕起來而給他歧視。始終視之為「黨內最可寶愛的同志」之一。

從彭述之我們又談到陳獨秀與老超，談到他們與我之間的關係。我說老陳是我最尊敬與最崇拜的一位前輩；老超是我最親近的一位戰友和朋友；但這並不是說，我和他們之間沒有不同意見。相反，我們有過不少不同意見。為了這些不同意見，我們不但在口頭上，而且在文字也爭辯過。但是這些爭辯絕不曾減少我對他們的敬愛，我相信他們也決不曾把我當作「仇敵」。

當然，這裏除了我們在有關革命的基本看法有共同點外，在一般的「做人」態度上亦有共同之處的緣故。

總之，我對阿九他們說，無論談社會主義革命也罷，或者談民主鬥爭也罷，把異己者看成仇敵，必欲殺之而後快，那是最大罪惡。

我不贊成耶穌教的「愛仇敵」；但我完全擁護孔老夫子的「和而不同」。

10月1日

看到 Bill Jenner 的一篇文章，轉載在一本名叫《匹夫有責》的英文刊物上的。文章題目為〈中國的黑暗面〉。這是一篇很糟糕的文章。一位文字好，知識富豐的學者，未必有高明的判斷力，於此文得一證。

「中國不亡，是無天理」——這種憤激說法拿來刺激一下自己和別人是好的；但若有誰以之作為「理論根據」，從而得出結論，那就太糟了。持此論調的中國人終於會變成漢奸、洋奴；持此論調的洋人則只能為帝國主義者提供理論根據。

10月3日

中秋，白天陰雨，夜間皓月當空。從窗子裏看了一會兒月亮，忽然記起蘇東坡的《水調歌頭》來。這首詞還是六十多年前在蘇州監獄裏讀的，觸景生情，居然還記得起幾句。

可惜樓上的「音樂會」吵了一夜，使我不得安睡。牙痛、頭痛，苦極。

今天是東西德國統一的日子。

10月18日

從14日開始，不斷有客人來。星期日招待了一位丹麥友人。星期一歐焰綠與耀佳二人來訪。晚8時離去。半夜後夢中為拍門聲驚醒，原以為是樓上交際花的朋友給我搗亂，起來開門，誰知是香港四五行動的梅君偕其女友從巴黎來訪。次晨與訪客討論許多問題，疲倦得要命。星期三客人離此赴倫敦。

經常有這樣的情形：客人不來則已，一來便接二連三。住澳門時如此，來英國後還是這樣。

星期二晚得令方電話，她已回來了。下星期可以和她見面。

今天給房東又寫了一信，為了「芳鄰」的吵鬧。

10月20日

春將我的「美國版小序」送給香港的一家雜誌，登出來了。聽梅說，這是一份親台灣的雜誌。

前天得秀如女婿信，知道他已找到朋友擔保。

連日雨，今日大霧，寒冷。下午到公園散步。落葉滿地。一派深秋景象了。

10月24日

中午令方來。一年不見，還是那個老樣子。她帶來許多可口食物，物不輕，人情更重。

10月25日

興致很好，與令方同遊 Otley。本想看看深秋紅葉，誰知連日風雨，落葉全已着地，失望。中午飯於 Curlew Cafe，頗可口。飯後在小市場一帶漫步，到 Chippendale 銅像前攝影，再緩步到河邊。下午3時才回家。走得太多了，倦極。

10月25日

頭暈、腿痛，終日睡。今晚本應赴 Dora 之約，到她家去吃飯。結果只好不去。Islay 來，十二年不見，她依然健美。

10月28日

昨晚令方去迪莉亞家裏。今晨起來，覺頭暈更甚，腿亦疼痛。致電班，不去珍寶聚餐。

11月1日

令方回來，將於明日返倫敦。晚9時許，虎頭突然從巴黎來。

11月3日

晨令方離去，虎頭將在此住一些日子。故人的孩子，八、九年不見，各方面好像成長得多了。

11月6日

得超函及其所擬的《論陳獨秀》一書目錄。書中未論及獨秀的晚年思想，這是一大缺憾。我們得保衛這個真正傑出的大革命家，但也不應採取為親者諱的態度。陳獨秀的晚年思想當然離開了列托們的立場，那是無法為他辯護的。說獨秀關於民主的說法全是一些「憤激之言」，是「過頭話」，不是他的真正意見，這不但不足於服人，甚至獨秀「泉下有知」也會出來否認的。

11月18日

有客在家，影響了我的正常生活，好多天沒有寫札記。本月7號是十月革命的第七十五周年紀念日，發生在莫斯科的種種，引起了我無限感慨。本來有許多話想說，只因生活打亂了，頭暈腦脹，什麼都不能做。我曾經把戈巴喬夫比作俄皇亞歷山大二世，把他的改革比作當年那位沙皇的解放農奴。從最近蘇聯的情形看，這個比擬好像是可以成立的。如果紅場上那天發射的子彈打中了戈巴喬夫，那末這個歷史模擬竟連細節都相同了。

戈巴喬夫的改革竟促成了蘇聯的解體，促成了俄羅斯與各小民族狹隘民族主義的勃興，甚至引出了復活俄羅斯帝制的一切「牛鬼蛇神」，這非但出乎戈巴喬夫們的意料之外，而且是為任何史大林主義者的反對者們所無法見到的。

近幾日讀了方勵之的書。感想甚多，可惜沒有力氣把它們記下來。總的印象是：這是一個真誠的人，與其他許多政客型的民主派有所不同。人家把他稱作「中國的沙哈洛夫」，是有道理的。和沙哈洛夫一樣，他從「共產主義」一下子跳到了英美式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和所有經歷了和他一樣的生活與思想過程的人一樣，主要的毛病是把史大林主義與毛澤東主義和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等同起來。在他們以及他們同類人看來，除了「真正存在過的社會主義」（即史、毛主義及其政制）外，不可能有另一方式的社會主義。

不過方勵之似乎比沙哈洛夫，特別比紹興尼春好一些，他推重瑞典、意大利與英國資本主義制度所含有的社會主義成分。

方勵之不懂得的是：這些比「社會主義」更加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不是靠某些高明的知識分子設計出來，更不是資本主義自我成

長的結果，而是那些國家中在第二次大戰後內部階級鬥爭所取得的成果。這些成果，隨着各該國經濟與政治的演變，特別是受着近年來世界資本主義體制所經歷的危機影響，正受到來自資本階級的攻擊。它們不僅有減小的危險，而且有被取消的可能。最清楚的例子是英國：Thatcherism（撒撒爾主義）出現與當令的主要原因，就是英國的資產階級無法容忍資本主義制度中的社會主義成分。

他們要回復亞當·斯密所闡明與讚揚的絕對自由的（即資產者有據搶劫的絕對自由，勞動者有忍飢受凍的絕對自由）的「純料」資本主義。

方勵之說馬克思主義過時了。但他所歡欣讚歎的瑞典、意大利與英國式的社會主義，只有從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才能了解它們的產生、現狀及其可能前途的。

毋需說，馬克思主義中有許多看法與論點是過了時的。不承認這一點便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是，馬克思主義中（其實亦在比馬克思主義更早的一些學說中）那個認為人類的歷史主要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卻不曾過時的。

所謂階級調和，其實只是階級鬥爭的方式之一罷了。

方勵之 and 所有民主運動的領袖們一樣，特別強調知識分子的重要性，特別指責史、毛制度下知識分子遭到歧視、輕視乃至虐待的情形。他說的許多話都是對的。他的不對的地方是認定知識分子是一個獨立的力量，彷彿他們生活於階級社會之外，超於階級，不代表任何階級利益。其實知識分子只能為某一階級服務，這是無法否定的真理。

過去史、毛主義者把無產階級美化、神化。當然是錯的。馬克思與列寧着重指出無產階級的作用，着重指出他們的歷史地位、以及他們在

社會主義革命中可能起、乃至必須起的領導作用，絕對不曾把工人階級美化，更不曾把個別的工人美化與神秘化，彷彿一經當了工人，便與眾不同。彷彿工人階級不是由普通的勞動者組成，而是由一些特選的、與眾不同的人組成的。他們更不曾、不會把工人階級因其被剝削與被壓迫地位而形成的知識上的相對落後，說成爲一種美德，因而將工人和工人階級有時表現出來的落後行爲，也說成是先進的範例。

工人階級在現代社會中的先進地位與革命作用，不是從肯定他們的現狀這方面發生出來，相反，而是從必須否定其現狀（必須掙脫他們身上的鎖鏈）這一個必要上發生出來的。因此，當工人階級——由其所支持的政黨領導——的革命鬥爭獲得勝利後，一個對工人階級說來最爲重要的任務，就是要教育自己，要加速提高自己的知識水平，要把工人提高到知識分子的水平。絕對不是要把知識分子降低到一般工人的知識水平。

史、毛在這方面所採取的政策，完全是過去一些最反動暴君們的愚民政策。它與馬克思、列寧、托洛次基等所強調的工人階級領導學說並無絲毫共同之點。

March to the revolution... Soviet Army cadets march in Red Square during the celebrations to mark the 72nd anniversary of 1917

Past failings 'do not eclipse' values of 1917

March to Moscow

The following are extracts from a speech made by President Gorbachev in Red Square yesterday to mark the 72nd anniversary of the 1917 Bolshevik revolution which brought the Communists to power.

OUR October revolution was the greatest revolution in the scope and impact it had on peoples' destinies. The values which this Socialist revolution carried the people are everlasting.

We remember with gratitude all those who with a clear conscience joined the revolution and courageously bore its banner.

We also remember those innocent people who were do-

prived of honour, dignity and life itself. Let this terrible lesson be a warning to us. Righteous goals cannot be achieved by unfair means but we cannot allow ourselves to insult our predecessors by forgetting them.

The past generations are not to blame for the fact that the goals they dreamed of were not achieved or that the ideals which inspired people to assault the old system were seriously distorted.

However stringently everything connected with Stalinism and the distortion of the idea of socialism is judged, this cannot and should not eclipse what has been accomplished by the people over the past three-quarters of a century.

Our attitude in the past has not just been expressed in words. We have resolutely bro-

ken away from ties and injustices. It is with good reason that we refer to perestroika as a new revolution, the purpose of which is to liberate the human being, overcome his alienation from property, power and culture and to assert the value of human life.

This [perestroika] is the revival of the values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Perestroika has dealt a crushing blow against the totalitarian command and bureaucratic system that constrained society and restrained peoples' initiative.

But the renewal process turned out to be more painful and dramatic than could have been expected. Today we are all seriously alarmed at the shortages, the queues, high prices, weakening of law and order. We are hurt by the social conflict. But we should not panic,

or even less call for the turning back of the clock.

We are on the threshold of concluding a new union treaty that will be of immense importance for transforming the Soviet multi-ethnic state. We visualise the revival of all Soviet republics along the lines of friendship, co-operation and mutual assistance, and not along the lines of isolation and alienation.

We have all the essentials to achieve success by proceeding along the charted road. Our country has inexhaustible natural resources. We now have a well thought out programme to stabilise the economy and move to a market system.

We shall succeed in attaining the goals if we rise above discord and implement the projected measures in the economy and in politics through joint

efforts and dedicated work, and restore respect for law.

At this hour of trial, every true patriot must discard everything petty and unimportant and come to realise his or her responsibility for the destiny of the motherland. Let today's holiday serve as a reminder of those lofty goals for the sake of which our grandfathers and fathers launched the assault on the Winter Palace.

We all now stand a real chance to transform our society into a normal, healthy, just and ultim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through the second great revolution. This was actually the idea which inspired Vladimir Ilyich Lenin.

To achieve success we need firmness in the face of any external schemes, and the hundred co-operation of all genuine supporters of perestroika.

11月21日

令方今日離英，明年她再來時可能我已不在人間。

11月22日

晨10時，得格雷來電，告我M·Thatcher（即瑪·撒撒爾）終於辭職。大消息。

11月23日

報紙上滿是對辭職的T夫人的評述。真個是「琳琅滿目，美不勝收」。可是我以為T夫人最突出的一點，卻沒有人提到，那個特點是：她是馬克思主義的死敵，但是在一個意義上，她卻是最忠實的馬克思主義者：她和馬克思一樣，清醒地認識到我們這個社會是由不同的、利益衝突的諸階級所構成；而政治則主要是體現了階級鬥爭的。在這一點上，她確實比所有形形色色的其他政治家們要高出幾頭。

真能打中Thatcherism要害的，只能是馬克思主義。不用說，將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學說漫畫化了的、荒唐地歪曲了的史、毛主義，那只能助長Thatcherism。東歐、蘇聯及至中國的「改革」情況，便是最好證據。

12月4日

收到德文《托洛次基論中國》上下冊，非常高興。1979年秋天，已故的比艾·法朗克介紹我給德國朋友，讓我給他們準備翻譯和出版托

洛次基生前所寫有關中國革命的著作寫一篇序。我以三、四個月的時間寫成一篇長序、80年寄去德國，離開此書的出版已足足十個年頭了。

12月8日

初雪。連日翻閱方勵之的自選集。讀了將接近半個多月，還唯讀了十分之七、八。我讀書從來慢，上了年紀，更加慢得要命。不過就我所讀的方勵之的作品（其中大多數是演說）來說，我覺得上月18日我對方氏思想所作的初步批評，並不需要修改。他基本上走的路子與當年胡適所走的大體相同。所不同的是一位生活在共產黨未曾勝利之前，另一位生活在中共取得政權並充分暴露其史大林主義罪惡之後。二人都主張全盤西化，二人都認為西方諸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美國——的進入中國，主要起的是開明與進步的作用，並無剝削與壓迫的性質。二人都否認有什麼帝國主義。

不用說，這是錯的。胡適與方勵之們的看法如果徹底發揮起來，應該說本世紀內一切落後民族及被壓迫民族的反帝、反殖民主義運動不但沒有進步性質，而且是反動的。對中國言，不但中共的反帝鬥爭是反動的，而且連孫中山的民族主義都違反着壓迫歷史的進步。倒是一切買辦、洋奴與漢奸才符合中國歷史進步的利益了！不必說，胡適沒有走得這樣遠，方勵之也沒有得出這個結論。但若他們只看見資本先進國家對殖民地落後國家所起的進步作用，完全看不見在這方面的反動與壓迫的作用，那末至少在思想上必然要達到那個結論的。

列寧不曾否認帝國主義國家對落後民族與落後國家所曾起與所能起的進步作用；但他更着重地指出了帝國主義對落後國家的剝削與壓迫作用。

不管近幾年來因史、毛主義的荒唐歪曲與罪惡應用而使列寧的殖民地反帝政策蒙受了污損，但是從長遠的歷史看，它的正確性是無疑的。它在過去起了巨大的革命作用，將來亦必繼續起這樣的作用。

由於「命運的安排」，方勵之今後多半要在西方民主國家中生活一個長時期。長期的生活經驗可能改變他過去短期出國所獲的對於西方的一味讚美的看法。方勵之在他的本業中追隨愛恩斯坦，或許，在對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看法上面，也能略同於他心儀的大師嗎？希望他能夠如此。

12月14日

近來發覺自己愈來愈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緒：一反過去，容易發怒，一發怒，全身顫抖，心跳加劇，頭暈欲倒，這怕是我生命將告完結的徵兆。為了鄰居的胡鬧，我發過多次脾氣，結果總是食欲全失，終夜不眠。需要好多天才能把精神恢復過來。昨天晨間10時，虎頭出外，說是到附近走走，直到下午四、五點鐘都不見她返來。到了6點鐘，我們平時吃晚飯時候，仍不見她的影子。7點，8點，毫無消息，我心急如焚，坐立不安。深怕她遭到了什麼意外。八時半，才接到她從諾丁漢打來電話，說和新認識的朋友到那邊遊玩，行將回來，要我等門。我平時9時上牀，昨晚等到11時。她回來後我立即返房就寢，卻因心緒惡劣，無法睡得着。今晨不能起牀，她進房來向我道歉，我脾氣發作，將她狠狠地教訓了一下。結果弄得非常不快。

12月21日

昨天蘇聯外交部長希凡那次突然在人代大會的會議上宣佈辭職，這消息轟動世界。他說：「獨裁制正在進迫」。這句話透露了不少消息。十月革命後的過程曾經重複了法國革命後的過程，它讓我們看到了「特米多」……是否也要重演拿破崙的稱帝，乃至皇朝的復辟呢？有一件事似乎可以預先肯定：戈巴喬夫這個走中間路線的改良派，多半只能起過渡作用。他遲早要讓位給左邊或右邊來的激進派的。或者成為任何一派的俘虜，充當這派或那派的傀儡。

12月22日

收到慧雅的聖誕禮。照片與美好的函書。同日見到哥大出版社寄來的《回憶》校樣。

12月26日

慣於大放厥詞的未來英王，22日晚在法國電台的訪問節目中發表了一篇談話，節譯如下：

談到柏林圍牆拆毀的周年紀念時，親王說，這是從未見過的一樁最了不起的事。他希望他的孩子們將來會記得他們是後生見到的。不過他不以為這件事代表着一個意識形態的倒塌，也不表示共產主義的死亡與資本主義的勝利。

「事情並不如此簡單」他說，「事情本質還要深刻得多。我們一定要再一次地設想出一種方式來，將我們對生活的想法加以發展，使這二種制度之間能夠得到平衡。

我們需要資本主義，但它也許需要更合乎人道的面貌。我們需要這樣一種制度：其中的大資本會對各個地方性的社團，對外國的社團以及對各個發展中國家，表示更大的興趣。」（見24日《衛報》。）

查爾士的這段言論，自然不會比他對建築學的批評高明多少，但是比之於 Thatcher 之流的狂妄的反共壯士，比之於對馬克思主義「幻滅」的過去的史大林主義者們，卻確實深刻得多。

「別笑得太早。別笑得太快！」一些比較有遠見的資產階級的學者們，早就向他們近視的同道們提出警告了。可是他們提出的所謂「馬克思與市場之間的平衡」，所謂「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匯合（Convergence）」，真能消除未來社會主義的世界革命嗎？不能。

翻閱白克曼寄贈的托洛次基畫傳，由獨依奇夫人寫序的。很好。

12月30日

校閱完哥大出版社寄來的《回憶》校樣。

12月31日

回顧行將過去的一年內的事故，在我個人方面，死掉了二位好友：路易·辛克來與泰瑪拉·獨依奇夫人。又死掉了比較了解我的侄女

志勤。寫作確實已經停止，一年內可以說只寫了一篇哥大新版《回憶》的短序。此外，比較有點意義的，就是幫忙格雷譯完超的《回憶錄》。這方面的一無成績，我不覺得有什麼遺憾。我早已深深體察到自己的力竭「才盡」，原已經決定「擱筆」了。毛姆的《七十自壽》多少給了我一點影響；但主要還是由於我的自知之明。

大事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我以為是：波斯灣戰爭危機與英國撒撒爾夫人的下台。撒撒爾夫人自以為她隻手促成了蘇聯的變化與東歐「社會主義」制度的崩潰。這個說法當然是狂妄與荒唐的；但蘇聯與東歐大量的所謂「激進派」與「改革派」卻確實相信撒撒爾主義是使他們從史大林主義中解救出來的最佳辦法。現在，撒撒爾主義在它誕生的國家內宣佈完蛋——不管這完蛋的真相如何——總該讓那些天真地相信撒撒爾式資本主義萬歲的人們動動腦筋，甚至有所醒悟了吧。

撒撒爾夫人說過一句頗為傳誦的話：民主國家不要戰爭，也不會發動戰爭。這個說法，竟使自命進步的《衛報》評論員都相信了。可是發生在本世紀內的多次大小戰爭歷史給我們證明：發動與進行這些戰爭的大多是資產階級民主政府。以布殊總統為首的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民主政府，在短短幾年內，不是已經發動並進行了對格蘭那達的戰爭，對尼加拉瓜的戰爭，對巴拿馬的戰爭，以及目前正行將爆發的海灣戰爭嗎？

注釋

1. 這裏原稿塗了的，好像是「紹銘」二字。
2. 字典是指《雙山回憶錄》。

3. 注：重看二年前寫的這一節日記，覺得它只指出了問題的一半；即它只指出了軍備競賽給各國——特別給美蘇二國——的經濟帶來的災難影響。它沒有談到因冷戰引起的軍備競賽給世界資本主義帶來的另一種影響，即不曾談到它促使科技進步與隨之而生的一般生產力的提高。二次世界大戰後科技的日新月異，資本主義的異常繁榮，絕對不是因為消費市場的擴大，不是因為一般人的購買力空前提高；它的主要的與直接的原因是冷戰雙方——特別是美國方面——為要在冷戰中勝過對方而必須創製出愈來愈新奇的殺人武器。因此，一旦冷戰結束，瘋狂的軍備競賽失去了存續的理由，就勢必爆發資本主義大危機。二年來發生的所有資本主義國家的愈來愈嚴重的所謂的「經濟衰退」，主要應該從這個角度來看，才能懂得正確，看得明白。

贏得了冷戰慘勝（Pyrrhic Victory）的美國，為了應付與克服這個危機，必須把整個經濟的重點逐漸從軍用工業移轉到民用工業方面去。同時，必須給多年積存下來的殺人利器，多少找到一點用武之地。由此產生了布希政府陸續採取的一系列對內對外政策。對內，實行對勞工階級的更兇惡的榨取；對外，利用聯合國機構，以創建「世界新秩序」名義，一再挑起小規模的戰爭。

美國是否能因此渡過並克服這個危機，說起來話長，不談了。

這裏我只想再指出一點的是：蘇聯因為它經濟力量遠較薄弱之故。在冷戰的軍備競賽中僅僅得到了它的壞結果，即「有了核子，沒有褲子」，有了45,000顆核子彈頭，有了太空站，有了核子潛艇，卻完全不見了最普通的民間日用品，沒有了牛奶，甚至沒有了麪包，至於將最先進的科技發明如何應用於民用工業，使生產力急速提高這個有利因素，因為史大林主義官僚制度對工業經營之愚蠢的控制和「計劃」，完全不曾起過什麼積極作用。（1992年8月20日補記）

1991年

1月1日

1990年不曾成為我生命的最後一年，也不是我一生中最好的一年。今年，會是我生命的最後一年嗎？我不巴望它是，也不希望它不是。失去了戰鬥能力的生命是不值得留戀的；嘗盡了生活甘苦的老人，對死亡確實已不存有什麼恐懼感了。但只要我的繼續存活不變成對別人的巨大負擔，只要我的體力還能料理自己的生活，我還不想採取「安樂死」的辦法。在這世界上，似乎還有少數幾個不願我立即死去、甚至需要我活下去的人呢。

1月7日

新的一年已過了一周，無論個人方面或世事方面，都有不少感想，可是沒有力氣把它們記一點下來。昨夜下雪，今天的天氣似乎變得明朗爽快了，精神也覺得好。德友魯道夫來信說，我為德文本《托洛次基論中國》所寫的長序，有些論點已經過時。昨晨我回了他的信，關於「過時」這一層，我是這樣說的：

你說得對，《序言》中的某些說法好像已經過時了。這情形，我覺得是非常自然。這是十年前寫的文章。十年來，世界上，特別在所謂「社會主義」國家中發生了幾乎可以說是天翻地覆的變化。如果我今天來寫這篇序言，不用說，在許多論點上我會以不同方式來寫的。不過，我並不以為因此而使我這篇序言變得毫無用處。從整件看，我相信它對於讀者，特別對年輕一代的讀者，是有所幫助的。它給他們點明了托洛次基的各篇文章如何聯繫着

中國革命發展中的各個時期，它給他們指出了究竟在哪裏，在什麼問題上，史大林及其一派是錯了，並且是怎樣搞錯的；托洛次基及其一派是對了，並且是怎樣對的。因此，讀者們不難從過去吸取教訓，去為未來的革命做好準備。

1月17日

清晨聽收音機，知道海灣戰爭已經發動了。昨夜午夜前，美英駐沙地阿拉伯的空軍出動轟炸伊拉克。

1月29日

海灣戰爭已經進行了十三天。有太多的感想，太多的意見，可是正因為太多，我連一個字都寫不出。這些感想和意見是需要寫長篇大論的。

住在這個民主的、輿論較為自由的國家，又趕上了傳播媒介的高度發達，這個時代，對於這次戰爭的觀察，比我過去對所經歷的各次戰爭，有了無比的便利。從電視上看國會中有關戰爭的「辯論」，真是精彩極了。明明是帝國主義國家為控制中東石油的戰爭，這些政治家們——不管是保守黨的或是工黨的——卻能一臉正氣地、義正辭嚴地，把它說成是為正義，為人權，為民主，為一切崇高的道德而戰！在這項偽善競賽中，反對派工黨領袖們的表演竟還勝過保守黨的袞袞諸公。更有意思的是：一臉慈悲的坎特勃利大主教也加入了這個合唱隊，聲明這場海灣戰爭是「正義之戰」！

有人說，這次海灣戰爭是美英諸國「騎劫了」聯合國而進行的。又有人說，這次戰爭產生了一個新的現象：美英二國充當了二十世紀末頁的新式「僱傭兵」。讓所有能享受到中東廉價石油的國家——特別是日本與德國——拿出錢來，幫助美英二國進行戰爭——讓這二國的勞工子弟們去送命。

這些被指出來的現象都是很有意思的。蘇聯與中國這二個常任理事國做了「騎劫」的幫兇，也很有意思。這二個所謂「社會主義」國家早已不是帝國主義的敵對者，它們是帝國主義的幫兇，甚至在某些場合，它們自己就實行了帝國主義式的（大國沙文主義的）政策，那是早已為所有被壓迫的民族，被壓迫的國家所見到了。有了這次夥同「騎劫」聯合國的新的「業績」，多半會使全世界的人民與被壓迫民族更認清它們的本質吧。

人們常把伊拉克的抗美戰爭比之以越南的抗美戰爭。這是不正確的。胡志明政府是一次深刻的社會革命的產物；薩達姆·侯賽因政府卻是伊拉克反革命的結果，它不同於胡志明政權，卻有點類似中國的蔣介石政權。

然則，國際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對侯賽因的抗美戰爭採取什麼態度呢？

不管戰爭發生的直接原因是如何的不同，促成戰爭的形勢是如何的不同；但是有一點，卻是為當年的中日戰爭與目前的海灣戰爭所共通的，那就是：基本上，它們都是一個帝國主義國家想完全控制一個比較落後的半殖民地國家而進行的，其目的在於——

2月6日

頭暈無法寫字與思想。上一則日記沒有告一個段落就寫不下去了。一停又是許多天。戰爭還在進行。美國某些政軍首腦們想僅憑空中的絕對優勢，把伊拉克炸回到石器時代，從而迅速地結束戰爭，已經證明是妄想；但在完全孤立之下，伊拉克要想像越南那樣把戰爭儘量拖長，拖長到美國不勝負擔，因此在未取得決定勝利前草草收兵，也是不可能的。伊拉克不像當年的越南，它背後沒有蘇聯與中國的支援。大約最多再拖幾個月，伊拉克的軍事力量便會給全部摧毀的。

人們現在就早已在為戰後中東局勢的如何安排與解決而忙碌了。他們真能為中東設想出一個公平的與持久和平的戰後辦法來嗎？絕對不能。由美國為首的「戰勝國」設計出來的任何辦法，都只能為下一次的「海灣危機」作準備。

兩次世界大戰結束了大不列顛的世界霸業。史大林主義的崩潰正在造成美帝獨霸的世界的「新秩序」。可是這個新秩序卻一定會在它未能完全建立之前就走向沒落的。德、日兩個新興的經濟大國已經與美國分庭抗禮。由第三次「工業革命」所促成的戰後資本主義的繁榮，正在大踏步走向危機。這些資本大國為要解決這些危機，必須對內加重剝削勞動民眾，對外加緊控制第三世界的政經生活。結果當然會讓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蓬勃發生的、只因史大林主義的毒害而趨於衰落的社會主義的世界革命重新興起，會使第三世界的各民族起來反抗，使它們由民主、民族的鬥爭進而與先進國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各個徘徊、動搖於資本主義全面復辟與向社會主義大步躍進之間的各個所謂「社會主義」國家的鬥爭匯合起來，使人類走上真正大同與幸福的境界。

昨天（2月5日）《衛報》上登載了一位埃及記者 Mohamed Sidahmed 的文章“Blinding storm in an oilfield”（油田裏刮起的一陣令人目盲的風暴），它讓我這個平素不熟悉中東情形的人，獲得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消息，例如他說：

至少有一件事，薩達姆·侯賽因是做得成功的，那就是他提醒了阿拉伯人，在這個新的世界競技中，他們的處境是多麼地脆弱——雖然這項競技會一直吹噓着什麼法律，道德與平等。海灣戰爭強調出兩項基本事實；就全世界論，那個二極世界並不曾為多極世界所代替，而是產生了以美國為首的單極世界；就（中東）這個地區論，那是石油，並非阿拉伯與以色列的衝突，構成為中東政治的決定因素。

愈來愈多的阿拉伯人，以及歐洲和美國的一個重要部分的輿論界，如今都看到了：布殊政府之所以堅持伊拉克從庫威特撤退，其動機首先在於石油利益，而不是熱心實行安理會的那些決議。

伊拉克的統治者一直企圖說服西方國家，說他進行了八年戰爭來反對霍美尼的伊朗，只是為了保衛西方國家的石油利益。他又要他們相信他是最合格的人，可以代替波斯王來充當波斯灣的警察。當二伊戰爭爆發的時候，伊拉克擁有30億美元的庫存；等到戰爭完畢，它的國庫赤字達到100億美元。因為他的戰爭犧牲沒有獲得應有的補償，薩達姆攫取了庫威特。

對庫威特的侵略加劇了各個阿拉伯國家之間的緊張關係，其緊張程度竟使阿拉伯國家和其他方面（包括以色列在內）的分歧給掩蓋了。

老毛愛說「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這句話正可以用來形容華盛頓那些領袖們的戰略。巴拿馬的諾里雅加，伊拉克的薩達姆·侯賽因，都是他們搬起來的石頭。

2月9日

一連三天大雪，足不出戶，連報紙都不曾買。郵差不送信，我的生活完全停頓了。

閱讀班寫的長文——〈從野百合花到燎原之火〉的導言，頭痛，讀得極慢。

2月10日

還是大雪，嚴寒。大門和門外石級都給雪蓋住了。拿了鐵鏟想清出一條可以踏腳的路來，試了幾下，氣喘，骨痛，頭昏欲倒，立即回進屋內躺臥，休息了將近一小時才回復正常。

幸虧倫敦來的小朋友們給我備足了乾糧，可以長期抵抗大雪的圍困。

勉強讀完了班兄的長文，提點意見，供他參考。

下午 Janet Frankland 來，為我鏟去門前積雪，可感也！

2月13日

前些時發現陳獨秀的一封舊信（1934年5月15日從南京監獄寄給左派反對派國際書記處的），熱情洋溢，充滿革命的樂觀主義與國際主

義精神，亟為譯出，寄給春兄。他抄了幾份，分贈友好。我相信這封信對於時下一些陳獨秀研究者會大有幫助的。

陳獨秀寫這封信的時候，劉仁靜正蒙住了二位外國朋友（格拉斯與伊洛生），在上海搞他的小山頭，反對「陳獨秀主義」。這封信，原是當作「反面教材」而譯成英文並寄去國際的。我不甚清楚劉仁靜所稱的陳獨秀主義指的是什麼。從劉在當時所寫的一個報告（關於中國局勢的）看，也許是指陳對當時中共所採取的「教派主義」，因為劉在報告中顯然對當時中共的紅軍存有若干幻想。（如果精神好，想把劉的報告也譯出來。）

寫到這裏，不禁想起杜甫的名句：「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這幾天，第四國際正在開第十三次代表大會。有人問我：「你過去參加過幾次大會？這次為什麼不去參加？」

我的回答是：「我從未參加過。」「為什麼？」「因為，過去，在1949年以前，我們中國托派，無論在什麼方面，都不夠條件派人去歐洲出席國際會議。1949年以後，中國托派組織上已被消滅，少數幾個流亡海外的托派，我以為只能代表個人，他們已無團體可以代表。他們與國外托派（無論國際書記處也好，各國支部也好）發生關係，只能以中國托派分子的個人資格，不能以中國支部的代表人資格。彭述之來到歐洲，主要目的是要以第四國際中國支部的代表名義參加國際領導組織。這個企圖和行為，我以為是僭妄的，主要因為他自稱代表的所謂『中國革命共產黨』事實上已不存在。因此我於1975年來到歐洲後，就立即向書記處表明我的身份——一個個別的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我想起的作用是要將比較好地建立起國際與中國殘存托派之間

的關係。我從不要求當什麼代表——代表不復存在的組織固然滑稽，代表港澳地區少數一時團聚起來的幾個托派則為時太早。我寧願以個人資格擁護第四國際，不願以代表資格參加國際，其理由主要是『以真名稱呼事物』。這一點，我認為是要做一個革命馬克思主義者的起碼條件。非常可惜，不重視這個起碼條件的，除了彭述之之外，好像在我們的年輕一代中也大有人在。」

伊撒克·獨伊奇與托洛次基和托派分手的主要原因是他不贊成托洛次基當年發起組織第四國際。他的反對理由不是不應該組織，而是以為像當時托洛次基所倡議和進行的那一套，事實上建立不起一個國際來。半個多世紀來第四國際的歷史似乎證實了獨伊奇的看法是對的。因為，不管我們怎樣努力，而事實上第四國際始終不曾成長為一個真能影響國際工人運動，真能干預國際政治的一個力量。

我沒有見過獨伊奇反對托洛次基發起第四國際的文章。也沒有見過托洛次基反對獨伊奇意見的文章。記憶中唯一與此問題有關的文字是托洛次基為他的《自傳》節本所寫的跋中的最後幾句話：

這便是第四國際準備工作底歷史意義，讓懷疑論者先生們去冷譏熱潮罷！歷史不是懷疑論做成的。這本書不是為懷疑論者寫的。

這裏的所謂「懷疑論者」，當然指獨伊奇以及和他意見相同的人。

與獨伊奇夫人相識十多年，可是不知為什麼，我始終不曾和她談起過這個爭論問題。現在想來，實在可惜。不過不管怎樣，我跟一些

懷疑論者或悲觀主義者的看法不同，我始終認為半個世紀來的歷史並不證明托洛次基發起和建立第四國際的努力是徒勞，是幻想。相反，它們證明出老托和他的同志們的這項努力其實是必需的。就個人說，成敗固然不能據以論英雄；就思想說，一時的成敗更不是正確或謬誤的標準。

在史大林主義徹底與普遍崩潰的今天，如果沒有以第四國際為代表的那個思想體系，即是說，如果沒有以真正國際主義和徹底大眾民主相結合的不斷革命理論的思想與實踐，那末，我們真的要看到資本主義不僅在事實上，而且在思想上也全部與徹底地奏凱了。

可以說，今後人類仍能對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保持信心，並終於會見到它們的實現者，全靠有第四國際所代表的思想在！

這當然不是說，如此這般存在着的第四國際——組織上分裂與思想上停滯——能起這樣的作用。但只要大方針不要失掉，也就是說只要堅持革命的國際主義，與勞動大眾的民主這二大方針，那末我深信在新的事變的推動下，一個有力的、能擔當起歷史任務的第四國際一定會建立成功。歸根結蒂，一個徹底革命的國際組織，只能在國際革命的進潮時期才能建立完成的。在此以前，都只能算是準備時期。

2月15日

今天是辛未年元旦。聞大哥病劇，給侄兒福全寫了信。虎頭離去已一月零二天，迄無信來。

2月21日

海灣戰爭第三十六天，由蘇聯發動的和平解決方案，讓薩達姆·侯賽因的一篇談說給打消了。

中午接葦電話，知小林已到英，不日來里茲。

2月22日

今晨消息。原來侯賽因昨天下午的廣播，是為了他接受戈巴喬夫的建議而事，先給他的兵士、民眾、朋友與敵人作心理準備的。實際上伊拉克已接受蘇聯的方案。針對這個蘇聯方案，華盛頓提出了最後通牒。美國目前的作戰目的很顯然要徹底摧毀伊拉克的武力，建立一個完全順從美國的伊拉克新政權，並從而保持美國在海灣地區乃至整個中東的絕對控制。這是走向美國稱霸世界（Pax Americana）的重要一步，不列顛稱霸世界（Pax Britanica）延長一百年。美國的稱霸能建立到如何程度；能延續多少年？難說，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它不會延長到一百年，甚至它根本不能樹立到像不列顛霸權的那麼鞏固。

2月24日

昨晚美英聯軍對伊拉克軍隊實行了全面的地面進攻。伊拉克能支持多久呢？幾天？或幾個星期？無論如何像越南那樣作長期抵抗，那是絕不可能的。不僅客觀上沒有這些條件，主觀上，即由於侯賽因政權的歷史成因與社會性質，更沒有越南胡志明政權所具備的條件。

為了宣傳，美國一直把侯賽因政權所建立的強大武力，說成為目前世界上位居第四。（第一當然是美國，第二是蘇聯，但不知第三暗指

哪一個國家。)其實，這顯然是危言聳聽，他們的目的是為了突出伊拉克的危險性，為了激起美國國內的軍國主義，為了更多地拉攏其他國家，特別是中東與伊拉克有直接利益衝突的阿拉伯國家，來參加這個反伊的神聖同盟。

另一方面，竟有這麼多國家聯合起來，一起反對並進攻這個「世界上的第四強國」，只能證明中東，特別是海灣區的石油生產，與太多國家的利益有關。

我於此竟聯想到了當年八國聯軍共同進攻腐敗衰弱的中國的故事。

為什麼要聯合八個國家的力量來進攻呢？因為當時清朝擁有的大武力嗎？當然非也。八國之所以力爭參加這個聯合軍者，只因看見肥美的弱肉在前，誰都想事先爭取到一份分肥的保證罷了！

2月28日

連日有客人來，倦極。今午最後一位客人離去，頭痛得報紙都不曾看。晚間聽收音機，才知道海灣戰爭已結束了。伊拉克的軍隊被擊潰，「聯合國軍」「解放」了庫威德，並佔領了南部伊拉克，伊拉克接受全部「聯合國」決議，布希總統宣佈停戰。

海灣戰爭延長了四十二天。

感想甚多，最先想到的是：把伊拉克武力說成「世界第四」，原來是有意誇大的。其用意在於為自己的用武找到藉口。為了同一理由，他們把侯賽因這個小暴君說成為「希特勒第二」。把一隻狼故意形容成獅子，美國就拉攏合了三十個國家，拼湊了數十萬大軍，動用了前所

未有的海陸空的兵力，他們配備着最高級與最新式的科技，把伊拉克這個屬於「第三世界」的小國，特別它的二個最大城市，巴格達與巴士拉，真地轟炸到「石器時代」。最後，把侯賽因的主力——「共和國衛隊」簡直燒成焦炭，炸成肉醬。在整個戰爭中，「聯合國軍」的喪亡才得百人左右，而伊拉克兵的死喪數目至少要達到十幾萬！

這不是戰爭，這是最殘忍的狩獵，是歷史上稀有的一面倒的大屠殺！

可是這場殘酷的狩獵和最兇狠的大屠殺卻是在「聯合國」旗幟下進行的！在「民主自由與正義」的口號下進行的！

好話與壞事之間的對照實在太強烈了，勝利者的偽善很快會被暫時受騙的民眾識穿的。

這次大屠殺讓我想到的第二件事情是：以古蘭經為指導意識的阿拉伯國家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是沒有真正前途的。它對本國的勞苦大眾只能實行殘暴的鎮壓，對帝國主義的反抗則無大力量。這些國家的民族與民主任務，只能在由各該國工人階級領導下的社會主義革命才能得到初步的，但是真實的解決。

另一個感想是：今後用最先進的科技來作戰，只能有兩個結果：1、若雙方的配備不等，那是強者對弱者的絕滅性的屠宰；2、若雙方的配備相等，兩敗俱傷，最甚者竟可以毀滅整個人類。

從這裏，我愈加相信「不是社會主義便是野蠻主義」這個真理。

3月1日

十六年前的今天我抵達英國。在過去的漫長時間裏我到底幹了些什麼呢？簡直一無足述，愧愧！

3月3日

翻看一下大前天的那則筆記，覺得關於未來戰爭結局所說的話，有一點必須補充。我所說的那兩種可能結局，主要是指交戰雙方是屬於、或大體上屬於同樣性質的國家或群體，任何一方的戰爭都不是革命的，或至少都不是大為進步的。如果交戰的一邊是革命而另一邊是反革命，那末不管這戰爭是進行於一國之內的二個（或數個）階級之間，或進行於兩個國家之間，其中武裝較弱的一方未必便是被擊敗或被消滅的一邊。因為操縱武器的畢竟是人，而那些人是會受革命影響的。

不錯，隨着武器的變化，執掌武器的人的階級成分也會跟着變化：科學家，工程師以及一般的技術人員，會在很大程度內代替過去的勞動大眾。但是整架龐大的戰爭機器卻決不可能讓那少數的「精粹分子」來承擔、來運轉的。其中起着「配件」與「螺絲釘」作用的，還得是普通的勞動大眾，而他們在數量上仍舊要佔據最大比例的。他們會受着革命影響；何況，即使那些操縱武器的科學家和技術人員們，遇上真正的革命形勢，也極可能掉轉方向，轉而為革命服務。

某些人以為科技的空前革新已在消滅工人階級的存在。同樣理由，他們會說將來的任何戰爭都不可能引發革命。我相信歷史一定會證明出這些先知們的斷言沒有根據。

3月5日

休息了數天，除腰痛外，別的病痛似乎好多了。晨間出外散步，見公園草地上的迎春花已探出頭來了。

3月8日

還不曾從極度疲倦中恢復過來。完全不能用腦。來信未覆的很多，想給白克曼寫一覆信，一個字都寫不出。明天 Baruch Hirson 要（來），會帶來由白克曼交給他的一些東西，且等他來過後再寫吧。

讀 Igor Cornelisen 寫的一篇紀念辛克來的文章，極感興趣。

3月9日

Hirson 君來。他問了我一些三十年代李福仁在上海的活動情形。談到最近與海灣戰爭有關的問題，他的看法與我的有很多相同。他認為目前的西歐托洛次基主義者不曾從中日戰爭中學到一點東西，以致有些人竟無形中擁護伊拉克的蔣介石（薩達姆·侯賽因）。這看法與我們中日戰爭所取態度很接近。他最近讀了我為德文《托論中國》一書所寫序言，他說他同意我的好多論點。

昨天 Eileen 來電，要我為一份民主派辦的刊物寫文。無力構思與寫作，婉拒了。今天班赴遠東。

3月10日

勉強給白克曼寫了回信。

3月18日

今天是夏曆辛未年二月初三日。我是丁未年是日出生的。查過萬年曆，丁未年二月初三日乃是1907年的3月16日。羊年的第七個「來復」【朱正按 星期日的意思】，陰陽二曆的日子只差了兩天。我對生日從來沒有特別感情，原因我想在於我家一向對家人的生日極不重視之故吧。我們鄉下的風俗，家人中只當家長上了年紀，特別當他或她的年紀正逢上60或70那樣的整數時，家人或親友們才想到給他或她做壽的。小輩生日，至少在我所出生的那種貧賤人家，從來不當一回事。西方人重視生日，不分老少男女，一到生日，都受到家人與親友們的重視。都要慶祝一番；而所謂慶祝，大抵只是略贈禮物，吃點蛋糕，並不鋪張浪費。這風氣很好，很有意思，有時甚至覺得很美。反觀我們中國，官僚巨富們借此機會來炫耀權勢，黑社會流氓們則視乘機勒索，大打「秋風」，實在太壞了，我一向不歡喜慶祝生日，主要是對此種陋習所生的反感。加以後來見到史大林派官僚們的大做生日，把它當作建立個人崇拜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項目，於是對生日慶祝深惡痛疾了。在這方面，超麟比我通達。他能排斥此一節目的醜惡方面，卻能保持它的具有人情的的一面。

不過，積習難返，放棄成見不易，要我根本改變對生日的態度，怕是不可能的了。如何度我85歲（照中國演算法）的這個生日呢？如果天不下雨，也許獨自到依爾克利去喝杯茶，吃一塊上好的蛋糕。

早晨果然獨自去了一趟依爾克利。最初天氣很好，有陽光，半路上天氣變了，像要下雨。依爾克利比市區冷，我少穿了衣服。在熟識的幾條路上轉了個圈，買了二枚平時愛吃的西餅，便坐車回家。這樣「慶祝」了我85歲的「誕辰」。（下午記）

3月22日

半夜突然嘔吐、發燒，打呃。二年前的舊病又發作了。

3月26日

病了幾天，不能進食，呃逆不止，狼狽萬分。昨天下午呃逆停止。胃能接受食物。進細麩一小碗。安穩地睡了一夜，今晨頓覺精神好轉。去郵局寄信，給並未的大哥寄一點錢。

樓上的新鄰居遷入已二日，未有機會交談。從窗子裏見到的樣子判斷，此人好像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失業青年。夜間睡得極晚，白天起身很遲。有音樂聲傳來，但不很噪耳，希望往後不會變壞。現在的青年可以沒有書籍，衣物，卻不能不備一具 HI-FI 裝置。這是時代風氣。

3月27日

昨夜10時開始，新鄰居的樂聲大作，並粗暴地移動傢具，簡直成了那位女士第二。無法睡，由寢室移入前廳也無法遠離噪音。怎麼辦呢？無力選擇自己住所的人實在可悲！

3月31日

很艱難地讀完了第四國際聯合書記部向第四國際第十三屆大會提出的《國際局勢決議草案》，相當失望。它完全沒有針對目前世界局勢的主要特點提出明確與堅定的答案，而只是零碎地，浮面地對一些現象作了一些解釋，列舉某些應付這些現象的辦法。

草案第一部分的第四節，全文如下：

四、史大林主義不是發生在預定的歷史道路上的一次簡單迂回；也不是一段即將結束的插話。它的諸般荒唐怪誕會像磨盤石一般懸宕在人們的頭上，它的鬼怪將於今天時時出現。社會主義解放的計劃因為史大林主義的抵押而添加了重負——因為對於絕大多數的工人來說，社會主義解放計劃上所說的言語，不再像本世紀初期那樣所具有的意義和許諾了。那些紛紛起來鄙棄史大林主義的人民，他們行動起來，不是單單為了反對全能主義的獨裁，也不僅為了民主自由，他們又表示出他們僅僅透過資本主義在各個主要帝國主義中心運作的那面三棱鏡中見到了資本主義，並從而體會到（史大林主義制度）下的經濟與社會二方面的失敗。我們還不曾給史大林主義付清代價。記憶與希望必須重新建立。

這段話構成了整個決議的基調，它代表着草案作者對目前整個局勢，即對於史大林主義全面崩潰後所形成的世界局勢的看法。無疑，它抓住了我們現局勢的基本特點；它強調了史大林主義崩潰的嚴重性、它不隨波逐流地一味嚷着「民主革命的大好形勢」，這是對的，非常正確的。但同時它卻無一言指出這個局勢正是我們數十年來不斷警告，不斷預言了的。沒有強調它正是我們一貫反對的「一國社會主義」的結果。沒有指出在過去半個多世紀來，我們曾經和它作不斷鬥爭，曾經提出不同的主張，憑以建設非全能主義的、符合於大眾民主的、以國際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的道路。它沒有指出，史大林主義的崩潰，只是從反面證明了不斷革命與國際主義綱領的正確。草案作者沒有這樣做，而只是說，我們得給史大林主義的過失與罪惡付出代價，並重新開頭來建立「回憶與希望」。這是太消極了。我們絕無理由採取這個消極態度的！我們當前的首要任務是幫助工人大眾弄清楚史大

林主義決非我們所期望的社會主義，說明廣大人民認識到史大林主義絕非歷史的必然，即如果採取不同政策，如果採取蘇聯左派反對派從二十年代初期便已提出的主張，今天的人類縱使不曾像十月革命直後所期望的那樣已經實現了社會主義的理想社會，卻決不會如此灰暗：竟致讓資本帝國主義全面奏凱，讓一切被壓迫與被剝削的人民對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理想普遍失望。

為了恢復人們（首先是恢復全世界勞動人民）對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信心，從我們的主觀努力方面着眼，最重要的，也可以說是唯一的辦法就是讓人們知道過去七十年間史大林主義與托洛次基主義這兩條路線的對立。讓他們弄明白「一國社會主義」與一國不能建成社會主義這兩個立場的理論和實踐。

只有依靠這一場真實的而非空口說白話的理論與政治鬥爭；只有把這場攸關人類歷史命運的大鬥爭的經過內容及其結局普遍地宣揚出來，讓人們清楚地見到蘇聯以及其他「社會主義」制度如何與為何走到像目前那樣的結局；只有讓人們見到當時如果實行了托洛次基的而非史大林主義的主張，情況會大大不同……總之，只有重新建立了這個「記憶」，才能讓人們恢復對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希望」。

因此，我們不一定要為史大林主義的崩潰而「付出代價」；相反，我們正應該利用史大林主義的徹底破產，盡最大努力來把真正的、民主的、國際主義的社會主義綱領介紹給大家，因此收回我們過去受史大林派誣讒與迫害而付出的代價。

不用說，今後我們的能事決不在於僅僅反覆背誦托洛次基的言論，證引第四國際的綱領、文件。新的局勢需要有新的對策。半個多世紀的史大林主義的悲痛經驗也必須作鄭重與精細的分析。當作社會

主義建設的反面教材，史大林主義（也包括毛澤東主義）的全部歷史對於未來人類的命運，特別對於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理論與實踐，那是具有絕大價值的。

在堅持國際主義與勞動大眾民主的基礎上；在不斷革命的戰略指引下，我們必須參照史大林主義的「社會主義」實驗，重新考慮許多過去認為絕無問題的問題。譬如：1、國有財產是否無條件有利於社會主義？2、計劃經濟是否與市場經濟絕對不相容？3、公有制與私有制在某種程度內的並存是否於社會主義的建設有利而無害？4、無產階級專政應該怎樣與勞動大眾的民主；與一般的人權與民權並行不悖？5、無產階級專政是否應有嚴格的時限？即是說，當革命政權趨於穩定與鞏固之時，當那國革命而引起的內戰業已平息之後，是否應立即着手使專政放寬？以及諸如此類的問題。

當然，這些多半要在新的綱領上規定的；但目前還未考慮起草新綱領，它們便應該在政治決議上提及。

4月7日

一個多星期來，《衛報》上連續登載了5篇關於「世界新秩序」的文章。這五位作者是：Denis Healey（英國工黨元老），Noam Chomsky（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語言學教授），J. K. Galbraith（哈佛大學榮譽退休的經濟學教授），Abdul Rahman Munif（沙地阿拉伯出生的一位作家），以及 Eduard Shevardnadze（不久前辭職的蘇聯外長）。

這幾位作者，除了那位阿拉伯作家比較陌生，其他四人是頗為熟悉的。他們對「新秩序」的看法大致都在我的意料之中。Healey對海

灣戰爭與美國的政策採取了比他多年來（特別是比他當權時）所表現的較「左」的立場。當然這不是真正的左，不是代表勞動人民的左。和 Edward Heath 一樣，他只是反映英國資產階級中，願意與歐洲各國接近，不願像 Thatcher 夫人一樣，整個兒衝入美國大老闆的懷中的願望罷了。Chomsky 是比較真正反對華盛頓政策的，可惜此人的文章寫得太不通暢，許多問題都說不清楚。Galbraith 不愧是當今頭腦最清楚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這次的文章和他一年多來所寫的有關冷戰過後的東西關係的幾篇文章，都沒有「共產主義完蛋，資本主義萬歲」那種淺薄論調。這個人的見解，我覺得非常值我們這些對社會主義保持信心而又認為今後如何實現社會主義須得好好研究的人給以注意的。那位阿拉伯作家的文章無甚新意，它只是透露出一般阿拉伯人對西方勢力：政治、經濟、宗教、軍事各方面壓迫的反抗。

引起我最大興趣，使我最感到驚訝的，乃是蘇聯前任外長 Shevardnadze 的大作。這個人是戈巴喬夫的親密戰友，是他們二人一起，策劃了六年來蘇聯的改革的。見過他的傳記，原來此人曾經當過喬治亞共和國的共黨書記，一個有悠長歷史、並且擁有很大權勢的共產黨員。論理，他總該多多少少還是一個共產主義者，或社會主義者吧。然而，他在這篇文章裏竟是這樣形容了蘇聯的經歷的：

我想，提到「世界新秩序」這個名稱時，我們得非常小心。不管是好是壞，我總是這樣一個國家的代表，它曾經想實現這樣一種野心而失敗了的；它曾經做過多次設想欠佳的企圖，企圖創造「新人」創造一個「新社會」，創造一種「新的生活方式」，而且實質上，企圖至少在它的勢力範圍內創造一種事物的新秩序。這些試驗的最後結果如何，現在是眾所周知的，我想不需要我在此地作更多的闡明。

他讓我看到了蘇聯官僚們的真實的意識形態，讓我看到了他們由史大林主義向資本主義轉化中已走得有多深多遠。

4月10日

得吳文祺的死訊。他好像死在美國，很覺意外。我對他的感情沒有對宋雲彬那麼深厚。他欠缺雲彬的天真，豪爽。

今天又得到樓適夷寫的《記郭肇唐》，很好。這一類文章的好壞主要得看作者是否有真情實意，技巧還在其次。適夷是性情中人，技巧當然也是好的，他寫的幾篇紀念故人的文章，幾乎無一不是上乘之作。

郭肇唐是無數史大林制度下受害的革命者之一。若就較狹小的意義說，他是遭受王明毒手的數千（或數萬）中國革命者之一。郭顯然不是托派；但他所得的罪名，或幾個罪名者之一，一定是「托派」。

4月12日

昨天給春寫了一封長信，告訴他英國托派的一些情形。今晨本想繼續寫「報告」，談談英托（希利派等）如何與「四哥」弄翻以及法、美諸國的托運情況。拿起筆，頭暈欲倒，只好作罷，過幾天再寫。

4月15日

本日《衛報》的莫斯科通訊（作者 Jonathan Steele）有一個極有意思的消息。它說，自從戈巴喬夫提倡「Glasnost」（中文好像譯作「公開」）以來，回憶文學在蘇聯大為流行。以前，政治性的回憶文學是完

全沒有的。這篇通訊裏提到了幾本著名政治家的回憶錄，例如已故外長格魯米柯，以及由戈巴喬夫的主要對手李加喬夫所寫的回憶。不過在他所介紹的幾本回憶錄中，我最感到興趣的是尼古拉·加曼寧的私人日記。下面是通訊中有關的一段：

最好的幾本回憶錄是屬於較早一批的。作者們寫作它們時，根本不曾料到它們能夠出版。這些作者並非最高層的官員，但他們是內幕中人，他們能夠說出這個不牢靠機構的某些事情——對於這個機構他們卻是貢獻了自己的生命的。這些人中的一位是尼古拉·加曼寧，他是太空人訓練中心的第一位主任。對於蘇聯的太空計劃，他比誰都知道得更多。在他的私人日記中，辛辣地記載了一方面花費幾百萬盧布去探察宇宙，另一方面讓全國人民過着可悲生活——這樣一種不相稱的情況。這種情況，從最近幾天內各報慶祝第一位太空人尤利·加加林勝利升空三十周年再度顯露出來。對於這件奇怪的、幾乎是虛偽的事情，大多數俄國人無動於衷，因為人人知道，那次具有歷史意義的人類首次繞地球飛行，給消費者們根本不曾帶來什麼好處。十二年前加曼寧對他的一位朋友說，他不相信他的日記在一個世紀內可以面世。「Glasnost」卻證明他的想法錯了，《真理報》剛才把日記中最使他苦惱的一部分登載出來了。……

他批評赫魯曉夫，說他跟史大林一樣製造個人崇拜。他譏笑政治局的人，說他們花費更多時間去研究人們對個別太空人提出的申訴，卻不甚討論長期的太空計劃。

貫穿着這部日記的是掩蓋這個輝煌計劃後面的有關人們起居的不斷操心。事實是：即使在那衛星的主要發射中心，有數十位

工作人員得長期住在宿舍中，什麼要住在帳幕中；他們還得在五年之久的時間內和妻子與家屬分開。1962年11月21日，正當赫魯曉夫想誇耀蘇聯武力，將核子火箭送往古巴時，加曼寧寫道：「剛剛接到妻子電話」她說她排了二小時隊想買一瓶牛奶。沒有買到手。

這是「寧要原子，不要褲子」的蘇聯版。「社會主義」國家中經濟所以會弄得如此糟糕，不自量力地和美國作原子與核子武器的競賽，不能不說是一個主要原因。

4月17日

一則消息：KGB要把它過去的活動，包括當年暗殺托洛次基一事在內，公佈出來。等着瞧吧。

4月21日

很費力地讀完了Finan Jensen所記有關第四國際第十三次大會經過的詳細報告。一般印象不壞，它多少讓我知道在所謂「馬克思主義」大危機之後，世界上還有不少年輕人相信社會主義，還準備在第四國際旗幟之下，為人類的未來幸福而奮鬥。

第十一次大會上提出了所謂「轉向產業」的口號。那是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新領導Jack Barnes派提出的。這路線表面上要求托洛次基主義者從宣傳家變成行動家，希望全世界的托派從宣傳組織變成一個能夠行動的革命組織；可是結果，很快便讓我們看到，這轉向只是拋去了我們的革命綱領，跟在史大林主義者後面曲解並誣衊托洛

次基，終於在組織與思想上都脫離了不斷革命的綱領，脫離了第四國際，終於拜倒在北朝鮮金日成那樣的獨裁者腳下。

第十二次大會的主題是所謂「再化合」。換言之，就是要求托派不要變頑固不化的教條主義者，不要以為世界上只有托洛次基者才是革命者，托派彷彿享有革命的「專利權」或「壟斷權」，絕對不願跟其他的革命者與革命組織接近或聯繫。這個意圖與方向自是正確的。不過也得防備由此可能發生的另一種危險，即：完全放棄自己的根本原則立場，與任何自命為革命的流派去做無原則的勾搭或聯合。

這次大會最使我不滿的是它完全不曾企圖對我們的《過渡綱領》作一個全面的審查、檢討，以便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不違反舊綱領的基本立場，寫出一個新的政綱來。

當然，這項工作是艱巨的，但決不是絕對不能做到的。至少，大會應該選出一個專門委員會，在新領導的指導下，在某一時距內，完成這項工作。

4 月 23 日

魯道夫給寄來了托洛次基當年寫給易洛生的九封信。這都是與《中國革命悲劇》一書的寫作有關的。老托所提的許多意見十分重要，十分寶貴。決心將它們譯成中文，在香港出版，作為《托致中國同志的信》的補篇。

4 月 26 日

今天《雙山回憶錄》的哥倫比亞大學版正式出版。

5月1日

昨天開始翻譯老托寫給易洛生的九封信。最先譯的是第五封。信中提到一個極重要的理論問題：為什麼中國的歷史停滯不前？托的意見是中國不曾有一個對農村獨立的，由工匠們控制的生產性的城鎮。這意見和馬克思當年論中國農民家庭中的手工業的作用很接近。二者可以互相發明。四年前（1987年3月），我給比艾·羅舍寫過一封長信，其中談到中國歷史何以長期停滯問題，那時我就引了馬克思1859年11月所寫論〈對華貿易〉這篇文章的見解。馬克思認為「小農業與家庭工業的結合」是英國打開了中國的大門而無法迅速促進對華貿易的主要原因。同時，我覺得也正是中國社會長期停滯不進的主要原因。

馬克思關於亞細亞生產模式的看法，他本人始終不曾充分發揮。它的具體內容也沒有明確規定。歷來蘇聯與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對此問題因而不曾有一致的答案，托洛次基在信中說：「這類事情的本身就是不很清楚的」意蓋指此。不過中國，乃至印度，歷史上不曾產生工匠們以及市民們為主的強有力的城鎮，不能與封建貴族的農業鄉村對立起來，這無疑是「亞細亞生產模式」的一個重要內容。

5月3日

波蘭總統瓦文沙最近來英作國事訪問，受到英國統治階級極隆重的招待。4月26日《衛報》上有一則報導這次訪問的新聞，頗有意思，摘譯如下：

「目前不是標準的時代，我不是標準的總統。」他如此回答人們給他提出的問題：「你是怎樣當這個國家元首的？」

當他留英的最後四天中觀察了英女王的結果，他明顯地表示了嫉妒。見到英國王室這個古代與現代的混合品，這位波蘭總統既妒且羨地說，國家是需要一個母親的。女王是一個母親，可惜波蘭沒有一個母親。

他在溫莎堡裏睡了幾夜，幾乎通夜醒着，無法入睡，為了他在此地所見到的一切。「牀大到這樣子，我無法摸到我的太太了。」

造船廠的一個電工，平步青雲，成了一國元首，他的得意忘形，我看還超過了劉邦和朱元璋。

工人的進步性與革命性是就整個階級而言的；是為工人階級在現代社會結構中所佔的地位決定的。個別工人以及個別工人領袖之是否進步或是不革命，完全是另一問題。工人領袖睡進了龍牀，只能發皇帝夢了。

5月18日

得宇平信，知大哥已於本月3日逝世。此事早在意料中，但是得此噩耗，仍不免情緒激動。死，對於老邁無用的人來說是仁慈的，是一種解脫；但對於後死與未死的親人，卻仍然是可悲的。弘一法師，一代高僧，病危時給夏丏尊寫個短信，其中有「華枝春滿，天心月圓」的名句；但從他臨終前留下的絕筆：「悲歡交集」來看，似乎他對於死還不是完全看破的；否則，「悲」從何來？

姊死於1982年9月，她小大哥三歲，卻早亡九年。他們二人的身體都比我健壯得多，生活也比我正常安定，想不到都在我之前離開人間。

我也真該走了。

6月2日

連日客來，疲於接待，身體幾乎全垮了；可是今天還得應付三位客人。做人實在苦。

昨天見到第四國際的《宣言》，內容空洞漂茫，立場糊模不清，令人大失所望。

瑪丁妮今天來話別。她留英十年，厭了，辭了職，決定回法長住。送了她和芬《回憶》各一冊，留個紀念。

6月6日

美國維琴民亞大學的歷史教授 Woodford McClellan 偕其俄籍夫人來訪。來訪目的是想問問當年莫斯科東方大學與孫中山大學的情形。他正在寫一本關於中國留俄學生的史書。交談之下，我發覺教授和我之間存在着極深極廣的鴻溝。教授太太送一份禮物給我：一套俄國東正教會的圖片。她得意洋洋地說：她是東正教徒，希望我能欣賞這套圖片。她又說：她的母親至今還是一個「史大林主義者」，罵她叛徒。她嫁給這位教授已有十年，但一直到 1986 年蘇聯政府才允許她出國團圓。此女現在已充分美國化，也許比土生的美國女子更美國化。

6月14日

二位香港客人於五天前離此赴倫敦。今天我還是疲倦萬分。下星期一又有一位客人要來！

俄羅斯的總統選舉葉爾春獲大捷，同時列寧格拉的市民投票結果，決定將這個都市改名為聖·彼得堡。

歷史的逆流正在湧向它的最高潮。

6月15日

春寄來消息一則：王實味終於「平反」了。想就此事寫一點感想。拿起筆來，卻覺得頭暈腦脹，一個字都寫不出。放下筆，拿起今天的《衛報》來看。在有人悼念昨天逝世的，被譽為這世紀英國最偉大的女伶 Peggy Ashcroft 的文章中，這位可尊敬的女藝人的一句話深深引起了我的共鳴。她說：old age is a bugger。誠然！

她與我同年；但還小我半歲。

7月1日

半個月來沒有寫一天日記。不斷接待客人，煩極，厭極，真想搬一次家，搬到客人無法來到的極遠極僻的地方；但這顯然不過是一個幻想。

因為不斷來客的阻撓，想寫的有關王實味平反的文章沒有寫成，擬譯的老托寫給伊羅生的九封信也無法完成。等精神略略好轉後，那後一項計劃是必須完成的。

剛剛讀完了老托 1925 年所寫的小冊子《俄國往何處去？》這本書以前讀過，印象不深。重讀，跟目前的國際與蘇聯的新局勢聯繫起來，得到不少新的啟發。

這本小冊子沒有提出一國不能建成社會主義的理論。但着重地提出了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與世界資本主義之間無法避免的依存關係。它提出了世界資本主義市場對蘇聯經濟建設所能起的正面與反面的作用；它可能幫助蘇聯提高生產力而走向社會主義，也可能促成蘇聯的經濟體制完全採取資本主義。

許多話，今天讀着，簡直是預言：不是「先知」們的預言而是真正馬克思主義者的預言。

書的結尾處有一段話，今天看來特別重要，全文如下：

我的整篇文章完全限於討論經濟過程以及這個過程的所謂邏輯性的發展。因此我有意將一切不但能影響經濟發展的其他一切因素排除在外，而且把那些能夠使這個發展改變一下方向的因素，也避開不談。這樣一種片面的從經濟方面來研究問題，從方法論來看，那是正確的與不得不然的——如果你要談的是未來許多年中一個複雜過程的未來估計。要實際解決當前的問題，每一次都必須把所有因素在當時呈現出來的方面加以可能的估計。不過當問題是要研究未來整個時期的經濟發展的遠景時，我們卻不得不將我們的注意從「上層建築」移轉開去，這就是說，將我們的注意首先從政治因素移轉開去。例如，一次戰爭可能對我們的發展起決定性的影響。使它趨於某一個方向；而一次勝利的歐洲革命卻可以使它趨於另一個方向。這還不僅僅對於外在的事件可以適用。內在的經濟過程造成它本身複雜的政治路線，這也可能成為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農村地區的經濟分解成各種不同的成分，正如我們曾經指出過的，並不給我們造成任何經濟上的危險，這是說，它不會使資本主義諸傾向迅速生長，以此妨礙社會

主義性的傾向。不過，在某些情況下，它卻能產生敵視社會主義發展的一些政治傾向。

國內與國際的政治局勢，產生了由許多問題形成的一個複雜體。其中每一個問題都要求我們去做個別的分析，但它們和經濟是緊相聯繫的。這種分析不在我們所研究的範圍之內。不過，指出經濟基礎發展中的那些根本傾向，並不會給政治的上層結構的一切變化提供一把現成的鎖匙，因為政治的上層結構也有其自己的內在真理，有它自己的問題，自己的困難。對經濟發展的遠景定出一個方向，不會妨礙我們對政治也定出一個方向；前者只能使後者更易做到。

因此，在我們的分析過程中，我們曾經有意將資本主義制度會延續多久這樣的問題放開不談，這個制度將如何變化？它將向哪一個方向發展？這裏我們可以指出幾個不同的可能。不過在這幾行作為結論的文字裏，我們不預備去研究它們。只要舉出這幾種可能就夠了。將來，在某些別的機會我們也許會回頭來研究它們。

社會主義勝利問題的最簡單的解決，就是假定在未來幾年內，歐洲會發生一次無產階級的革命。這樣一種「變局」決非最小可能的。從社會主義性的預斷的觀點來看，這便解決了問題。顯然，如果將蘇維埃聯邦的經濟和蘇維埃歐洲的經濟聯合到一起，那末社會主義生產與資本主義生產之間的比較系數就可以勝利地解決了，雖然從美洲方面還會作出某種抗拒。而這個抗拒是否能延長很久，那是很可懷疑的。

如果我們有條件地假定那個包圍我們的資本主義制度將會繼續存在數十年，那末問題就會變得複雜得多。不過這樣的假定，

如果不用另一些假定使它顯得更為真實些，那末這個假定的本身便沒有意義。如果資本主義制度真的會再存在數十年，那末歐洲的無產階級變成怎樣？美國的無產階級又會變成怎樣？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將變成怎樣？如果為我們有條件地承認可能發生的數十年資本主義的繼續存在時期，是進潮與退潮的數十年，其中發生着殘酷的內戰，經濟上始終是一個僵局，甚至是經濟上完全崩潰，也就是說，那個數十年只不過是社會主義誕生時發生的一個長期痛苦的過程，那末很顯然，在這個過渡時期內，我們的經濟將取得優勢的比重，因為我們的社會化了的經濟基礎具有無可比較的更大的穩定性。

不過，如果我們假定，在未來數十年內，世界市場會形成一種新的經濟平衡，會形成一種好像從 1871 年到 1914 年生產擴張時期那樣的平衡，那末，整個問題將以不同方式提出來了。這樣一種平衡，得以生產力的新的成長為條件的。因為在大戰（按指 1914-18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西）之前十年內那種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比較「和平的心態」。以及社會民主黨與職工會的機會主義的轉變，都是由於工業的巨大成長。因此，如果不可能的變成可能的，如果不大有成功的事變成大有可能成功的事，如果以歐洲資本主義為首的世界資本主義，不僅在其不穩定的政府組成方面，而且在其生產力方面，都發現了新的動態平衡；如果在未來幾年內與未來的數十年內，開始另一個巨大成長的時期，那末，這將意味着我們，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國家，雖然準備，而且已經在準備把自己從一列慢馳的貨車改變成較快的客車，卻還得使它更快些，藉以趕上那列特快客車。把話說得簡單些，這將意味着我們在對於歷史的基本估計上犯了一個錯誤。這將意味着資本主義還不曾竭盡其歷史「使命」，而目前的帝國主義階段還不

是資本主義的一個衰落階段，不是它的最後痙攣，而是它的新繁榮的開端。在這樣的條件之下，即在歐洲與世界其他地區的資本主義將有一個新的與長期復興的條件之下，落後國家的社會主義會遭遇到大困難。是怎樣的一種困難呢？是一次新的戰爭嗎？「被欺騙的」歐洲無產階級又不能阻止一次新的戰爭，以致讓敵人以優越的技術來反對我們的一次新的戰爭嗎？或者，資本主義的貨物，比我們新生產的無比廉美的貨物會湧進來，它會衝破我們的外貿壟斷，然後又摧毀我們社會主義式經濟的其他基礎嗎？實際上這個問題在目前還是次要的。不過對於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很顯然，如果資本主義在諸先進國家中，不僅還能有機會滋長，而且還能使它的生產力進入一個發展的長時期，那末一個落後國家裏的社會主義一定要受到很嚴重的壓力。

不過我們現在沒有合理的根據去假定這樣一種的變化。先給資本主義世界設想出一個出奇樂觀的前途，然後絞盡腦汁來試求找出一條從此解救之道，那是沒有意思的。歐洲與世界的經濟制度，目前正呈現出一些不和諧，它們不是有助於向前發展，而是每一步都是在掘毀這個制度的，因此在未來的幾年中，歷史將給我們造成足夠機會，去贏取經濟競爭——如果我們能適當地利用我們自己的與世界經濟的資源的話。我們是決心要這樣幹的。到了那個時候，歐洲的發展和變化又會把政治力量的「系數」變得有利於革命的無產階級一邊，不管這個局勢的到來許會延遲，又會遭到挫折。整個地說，我們可以假定，歷史的天平會終於傾向於我們這一邊的。

在上引文字寫成後六十七年的今天，要想挑剔其中的錯誤與「輕率的樂觀」非常容易。正像當年共產黨宣言的作者們一樣，托洛次基

在文章裏把資本主義的壽命估計得太短了，把它的壽限說得太肯定了。但是，也正像 1871 年到 1914 年期間，資本主義制度違反了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預斷而出現了生產擴張，卻不能避免更大與更激烈的危機，因而產生俄國革命及其他國家的革命；同樣，從 1925 年開始，特別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世界資本主義違反了托洛次基的預斷而表現出來的新的成長（我們且不分析這種成長的真實原因），雖然最後傾覆了由十月革命所造成的國家，卻終於在未能確定的一個時期之後，新的「十月革命」，新的世界革命也一定會起來推翻資本主義的這個新的世界秩序的。

醫生對於病人的死亡日期很難作出預斷；有時作了預斷也常常會被病症的變化所推翻；但是無法肯定地預言死亡日期，完全不等於這個病人將長生不死。更不證明生理學與醫療科學的破產。

馬克思主義者對資本主義制度所作的生理分析與病理診斷，應作如是觀。

8 月 4 日

一個多月沒有寫一點札記。上月內譯完托洛次基寫給伊羅生的九封信，然後寫「譯者序」，弄得一點精力都沒有了。可是，「譯者序」還只寫了一半，其餘部分不知什麼時候能夠寫出來。

8 月 9 日

收到魯道夫寄來超麟回憶錄的三冊德譯本。書印得很精美，可喜之至。希望不久能找到英譯稿的出版者。超麟這本書，至少在有關中

共早期與中國第二次革命的史料方面，是極有價值的。比我寫的回憶有價值得多。

8月18日

最後弄完了《九封信》的譯者序。原先想寫一篇相當長的，談談信中提及的三個重要問題：1、如何應用馬克思主義方法寫書；2、陳獨秀與馬林二人在決定加入國民黨問題上發生爭執的誰是誰非；3、中國歷史發展的特點問題。寫得很吃力；但是寫得很不行。春來信表示不滿，我自己更不滿，決定放棄，把已經寫好的二段半文字，放入這本札記裏。另外寫了一篇短短的「代譯者序」，寫好看看，實在還是不行；但我已盡了全力，在我目前的健康情形下，無法寫得較為像樣的了。明天寄港，讓春去處理。這次努力，應該是我的最後一次教訓了！應該認老，應該放棄一切寫作企圖。「安享晚年」，靜靜地等待「上帝的寵召」！可是，我能做到這樣的克制嗎？才下「擱筆」的決心，一個新題目已在我的頭腦中「出現了」：「中國托派裏面的兩個外國人：李福仁與伊羅生」。這篇文章該寫，我自信有條件把它寫出來；但是力氣呢？

格雷前天回來，在上海他見着了老超。這引起了我的感觸：如果我也能在石泉村的屋子裏與老友促膝談心，該多麼好！

我這三則寫了未用的《譯後記》應列在這一天的札記項下。原想寫在譯者序裏的、伊羅生用來替代老托序言的、威廉·摩理斯的那段「語錄」，該把它譯出，寫在此地：

人們鬥爭；鬥爭失敗；
 鬥爭雖然失敗，人們為之鬥爭的事物卻還是來了。
 只是來了的並非人們原本所想要的；
 於是別的一些人，在別的名義之下，得再來鬥爭，
 為了人們所想要的東西。

這一段詩一般的散文，不知伊羅生引自摩理斯的哪一個作品。不過不理上下文而孤立地來看，來了解這段文字，我覺得摩理斯不但很好地抓住了人類為較善世界而鬥爭的一般規律——進而後退，退而後進的規律，並且還充滿了樂觀精神的。

8月19日

戈巴喬夫給免了總統之職——一則原在意中的大新聞。他會成為亞歷山大第二？成為趙紫陽？成為赫魯曉夫？……

紅場將重演天安門廣場的悲劇，早在許多人的意料中，時間僅僅相差兩年多一點。兩者的內部矛盾是相同的，只是上下對抗的力量，二者並不一樣。蘇聯的「保守勢力」遠不及中國當權派的齊一與有力。天安門鎮壓之後會來一個相當安定的局面，紅場「動亂」之後，怕不會有穩定時期的。

8月21日

「政變」只延續三天，在蘇聯的內外壓力之下完結了。但這是一種暫時妥協，不是解決。戲劇性的變化將層出不窮。客觀上需要有一個

拿破崙：從「民主派」或「保守派」中都可能產生出這樣一個人來。葉爾春好像具有這個資格，「保守派」的拿破崙候選人怕得從年輕的校級軍官中推出來。無論是誰當權，結果都是要全盤恢復資本主義。新的社會主義革命看來非從先進國家中開始不可了。

就個人的作用說，戈巴喬夫這個起觸發作用的人，多半只能成為影子或傀儡了。

8月24日

一連幾日頭暈，對發生在蘇聯的重大變化，不但不能把我的看法記下一點來，甚至連報上的消息都無力仔細閱讀。剛才看了晚間的電視新聞，知道戈巴喬夫辭蘇共總書記職，同時決定解散共黨組織，下令沒收共黨的一切財物。極其重大的變化！

本月9日後未曾收到子春來信，想必是病重了。此事對我個人來說，簡直比那些世界大事更着急。

8月28日

得子春信，知他平安無事，大慰。

蘇聯的巨變，她今後的趨向，現在已明朗化與明確多了。我原先以為「政變」的失敗是一種「妥協」，這幾天的事實證明它並非如此。這是黨、政、軍三者聯合的既成勢力的慘敗。不過我說它不是「解決」，說「今後戲劇性的變化將層出不窮」則是對的。蘇聯現在幾乎是土崩瓦解了。史大林主義及其制度完蛋，這是好的；但是馬克思主

義，列寧主義，以及一切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十月革命有聯繫的東西，做了史大林主義及其制度的陪葬品，卻是非常壞的。

9月12日

病和客人來訪，又中斷了我將近半個月的筆記。這可是一個極重大的歷史轉變時期。半個月來發生在蘇聯的一切，總括地可以說：由1917年十月革命所開啟的那個時代，經過七十多年的前進與後退，希望與失望，成功與失敗之後，現在終於是結束了，至少是告一段落了。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資本主義會在許多地區復辟，社會主義，特別是共產主義的思想會受人輕視與鄙棄，整個世界將是「西風壓倒東風」。

史大林主義及其制度的必然會全倒下去，對於我們托洛次基主義者來說，原來意料中事。因此，我們比之以一般人，特別比之以那些真誠的史大林主義者，在二年來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倒台前，最近蘇聯的戲劇性的瓦解前面，是並不驚異的。但是，由於我們中間對於史大林主義的本質，對於蘇聯國家性質的認識上的差異，在我們的隊伍中，還是引起了或大或小的迷惘和分歧。簡單說，可以分「樂觀」與「悲觀」二派。前者覺得史大林主義及其制度既已應了我們的預言而崩潰，那末人們一定會樂意地、或很快地接受我們的立場。真正的社會主義的前途自會順利地開展。後者則以為史大林主義派數十年來借社會主義之名而幹的一切罪惡，在一般人中，特別在勞動人民中，極度敗壞了共產主義、馬列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名譽，以致在客觀上，至少在一個時期內，一切真正的社會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要為史大林主義的罪惡及其崩潰付出若干代價——即是說，要為廣大群眾所疏離。這二種不同態度，較小部分由於受客觀形勢的影響，較大部分由於他們對史大林主義統治下蘇聯這個國家的性質所持的不同看法。

11月26日

日記中斷了兩個多月。不斷小病是中斷一個原因，但最主要還是因為想寫完那篇有關《悲劇》的長文章。精力實在不許我再搞什麼寫作了。幾年前我就已有此覺悟，必須絕對退休；但有時遇到某一個問題，極感興趣，似乎非把自己的意見寫出來不可，又往往違反這個覺悟後的決心。一上手，頭腦可真不聽話，就是拒絕工作：經常好幾天寫不出一個字。愈想寫愈是寫不出；愈是寫不出愈是心煩。這樣一來，體力更加不行了。一共三萬多字的文章，前後竟拖了半年多！今天總算把文章的最後一段寄給春兄，真的有「如釋重負」之感，今後再也不能犯這個錯誤了。

12月1日

重讀11月22和23日有關英共大會的消息。這是英國共產黨的第四十三次大會，距離它在1920年7月31日的第一次大會有七十年了。這是英共的最後一次大會。大會依照原來計劃進行：通過拋棄原有的黨綱、黨章；把組織名稱改為「民主左派」，放棄馬列主義……這些提案表決的票數是：135票贊成，73票反對。一切都在意中，這消息引不起我任何感想。讓我感到興趣的只有一些零星事兒。1、原來鮑羅廷是最初被派來英國幫助組黨的。他當時化名喬治·勃朗。很快被發現，給驅逐出境。2、大會上，當年擔任英共副總書記的喬治·馬秀士對寫了《匈牙利悲劇》的彼得·弗萊雅道歉。當匈牙利於1956年發生革命時，弗萊雅擔任《每日工人報》駐布達佩斯記者，寄來了同情革命的報導，而馬秀士拒絕登載。3、這位現年74歲的馬秀士在大會上又說了如下的話：

如果你讀列寧的著作，就可以看出：他所寫的每一件事幾乎都是俄國當時特殊局勢的反應。……我仍舊相信馬克思主義是有所貢獻的，因此我不要把嬰兒和髒水一起倒掉。可惜的是髒髒的洗澡水太多，而那嬰孩則是太小了。

始終沒能分清楚一方面革命的列寧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和另一方面反動的史大林主義，這位退休的英共老領袖，以及和他同樣想法的某些英共的忠實同志是不可救藥的。

12月12日

領來了一具助聽器，據醫生說，這可能對我的頭暈有好處。試用了幾小時，覺得不便，不舒服。希望慢慢能習慣。

令方7日來，9日回倫敦。暢談兩天，很高興。過後卻頗疲倦。老年人只能過靜如止水的日子，生活上任何一點微小的變化都好像難以經受了。

12月13日

俄諺：「房子蓋好了，木匠得滾蛋」。戈巴喬夫的作用已盡，看來日內就得下台。跟着來的多半是葉爾春。

我曾經把戈巴喬夫比作俄皇亞歷山大二世。在不得不變的情勢中實行半吊子的改革，結果會兩面不討好。現在證明這個比擬是對的；雖然戈巴喬夫沒有（或者是「還沒有」）為他的改革而喪命。

無論在歷史的進潮或退潮中，更為堅決，更為徹底的領袖們，一定要在事變的進展中，起來代替那些比較不堅決的，比較留戀於過去

的領袖們。不同的只是：在進潮中，後來居上的那些領袖們總是更忠實的，更有原則的，更加光明磊落的，更有理想的，更有崇高道德的人物；反之，在退潮中，更番接替的往往是更為卑鄙、更無原則，更無理想、而更為「實際」與無恥的傢伙。

葉爾春這個看似粗魯而其實頗有手腕的人，無論哪一方面都似乎比戈巴喬夫更為卑劣的。

現在已經有人在談及葉爾春的接替人了。這該是一個多麼可鄙的人呢？

蘇聯（不，過去的蘇聯）的局勢，迫着要產生一個莫索里尼。誰來扮這個角色？葉爾春自然有資格；但也有可能出現更有可能的人。這個人至少得和葉爾春一樣的卑鄙，但多半要外表裝得「斯文」些，更易為白宮與其他的西方「文明」政府所能接受的。

12月25日

戈巴喬夫終於正式宣佈辭職了。辭去那不再存在的蘇聯的總統之職。電視上看見那面曾經代表過工農革命的紅旗最後一次從克里姆林宮的旗杆降下來，多少動了點感情的。當然，許多年以來，這面旗子早已不象徵和代表工農革命，不代表布爾雪維克主義，不代表人類未來的希望。相反，它早已被利用來掩飾十月革命叛徒們的罪行，早已被史大林以下的一切所謂「共產主義者」所糟蹋、所姦污的了。但正像一個忠貞美麗的女子被暴徒姦污，不能負那被姦污的罪責一樣，數十年來讓史大林主義者強姦了的紅旗與共產主義的真正綱領和理想，絕不能為史大林主義的任何罪惡負責的。現在，世界上不少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史大林主義者，在史大林主義的制度前後相繼倒崩下來的時

候，搖身一變，自命為一般的民主主義者，同時把紅旗收起，將共產主義的名字摘下，甚至竭力攻擊與誣讟紅旗和共產主義。這不但是無恥（那些過去的積極的史大林主義者），同時也是無知（那些受了史大林主義欺騙的群眾）。

工農革命的傳統必定會繼續，它必定會再起。同時，我相信它們必定仍舊會在紅旗和共產主義的真正綱領之下再起與取得成功。

12月27日

戈巴喬夫以1985年3月12日被選為聯共黨總書記，1991年12月25日宣佈辭去總統之職。一共當了六年零九個月的蘇聯首腦。在歷史上，他將以怎樣的人物記下來呢？有人說，他是共產主義的叛徒，是蘇維埃制度的清算人。這種說法不確切。因為，第一、他雖然是長期以來的共產黨員，是共產黨的官僚，而且是這架官僚機器的頭頭；但他從來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第二、他的領導導致了蘇聯與蘇維埃制度的崩潰；但這個結果不是他所預期的。他原想挽救這個制度，改良這個制度；結果卻事與願違，他的挽救倒是加速了它的崩潰——挽救無意中變成了清算。

戈巴喬夫無疑是一個悲劇人物。性格，環境與時代，造成了他的悲劇。無論幹什麼事，他都像我們中國的老話所說：「匪不有初，鮮克有終。」他有足夠的明智看到蘇聯這個史大林主義的制度走進了斷頭巷。繼續前進是不可能的。一定要來點改革。但是得怎樣改革呢？六年來他老是旅進旅退，舉棋不定，以致他原先獲得的聲望迅速失去，最後弄到為所有階層的人所厭惡，不得不冷冷清清，孤孤單單地下台。這一切，許多人歸咎於他的性格：優柔寡斷，舉棋不定，其實，

這個解釋是淺薄的。戈巴喬夫所以會有這樣的表現，由於其本人的性格者少些，由於他所處的環境，由於他對史大林主義制度所取的立場者多些。

史大林主義的制度是根本無法改良的。要代替它，只有兩條路：或者代之以真正工人民主的、國際主義的革命政權——也就是恢復列寧——托洛次基時代的革命政權；或者，恢復資本主義的統治，最後地與徹底地推翻由十月革命所造成的最後殘餘。

戈巴喬夫想在二者之間找出一條中間道路來，對史大林主義將取半吊子立場，這是他失敗的根本原因。葉爾春堅決地主張走後一道路，他不但要乾脆拋掉史大林主義，而且棄絕真正的社會主義，他就成功了。當然，後者的成功究能有多大與多久，目前是無法預言的。

12月31日

二十世紀內不平常的一年過去了。應該怎樣來概括這一年中不平凡的歷史呢？我的回答是：

1. 它們終於證明出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理論的虛妄；
2. 它們證明出史大林主義的制度無法改良；它只能被推翻——不是由左邊來的社會主義勢力來推翻，便是由右邊來的資本主義的勢力來推翻。

從這二項概括中得出來的推論是：我們托派歷來的基本看法是對的。1991年那些令人沮喪的歷史事實，恰恰從反面來證實了它。可惜，這是反面證實。什麼時候能從正面來證實我們正確的立場？！

1992年

1月1日

新年開始，頭痛欲裂。電視上看了半場足球賽。疲倦得無法支持。很早上牀，多半這是我活着的最後一年了。

1月2日

得兒子來信，知大孫女將於2月下旬生孩子。我快當上曾祖父了。

今天俄羅斯與烏克蘭實行物價的「震盪療法」，日用品平均漲了三倍，甚至有漲到十倍的。早一天在電視上看到莫斯科市民們爭購食物的鏡頭。又在《衛報》上看到一位不滿的路人說，「這會造成少數幾個百萬富翁，同時造成幾百萬個窮人」。這想法應該是非常普遍的。葉爾春決心實行這個「療法」，他相信幾個月之後情形會由壞變好的。飢餓憤怒的群眾會容忍得這麼久嗎？人們普遍相信，這療法會產生「社會動盪」。如何對付這動盪呢？用鐵腕來高壓。這就給一個新的莫索里尼或賓諾顯造成上台的條件。

1992年的舊蘇聯內部會發生層出不窮的事變。會出現各式各樣的人物：「鐵腕」軍人和軟骨政客（愈來愈露骨地為西方帝國主義者充當買辦），多半將輪替出現，或相繼出現。直至有一個真正夠格的拿破崙出現為止。戈巴喬夫復出也不是絕無可能；帝制復辟看來卻是絕少機會。我們所希望的是在諸般力量的分合與抗爭中，真正代表十月革命傳統的、目前還處於極端弱小地位的「布爾雪維克—列寧派」，會迅速地成長起來。

這是「教徒式」的祈禱嗎？不是的，遲些早些，我相信歷史會證實這個願望，實現這個「祈禱」。

1月5日

蘇聯瓦解過程，終於證實了托洛次基關於蘇聯國家性質的看法。

還是在五十六年之前，在《被背叛的革命》中，托洛次基對史大林統治下的蘇聯性質說過如下的話，下了一個長長的定義：

若將蘇維埃制度說成是過渡的或中間的制度，那就是表示拋棄那些既成的社會範疇，如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在內）和社會主義這樣的說法，除了本身極不充分外，還會發生錯誤的觀念，以為現在的蘇維埃制度只有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一種可能性。其實它向後倒退到資本主義是完全可能的。要下一個更完備的定義，那必然是一個複雜的與冗長的定義。

蘇聯乃是一個介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中間的一個矛盾的社會；在這個社會裏，第一，生產力還太低，不足以給國有財產以社會主義的性質；第二，由貧乏造成的原始積累傾向，經過計劃經濟的無數孔隙而洩露出來；第三，保存着資產階級性質的分配準則，是新的社會化分的基礎；第四，經濟的發展，一面緩慢地改善了勞動者的地位，一面卻推進了特權階層之迅速形成；第五，一個官僚集團，利用社會的衝突，已經把它自己轉變為一種不受監督的等級而與社會主義相背馳；第六，被統治的黨所背叛的社會革命，仍然存在於財產關係上和勞動群眾的意識中；第七，日益增長的社會矛盾，其繼續的發展，可以向前走到社會主

義，也可以後退到資本主義；第八，在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上，反革命必須打破工人的抵抗才行；第九，在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工人必須打倒官僚制度才行。最後分析起來，問題要決定於國內的以及國際的舞台之活的社會勢力的鬥爭。（引自中譯《被背叛的革命》，222頁。譯文間有不妥處，參照英譯本改正。）

寫下了上引這一段文字之後，托洛次基又生存了四年。在此期間，由於史大林主義制度的醜惡更多暴露，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日益臨近，托洛次基和他的同志與非同志們更充分地研究與討論了蘇聯的國家性質問題。托洛次基在這個問題上採取的基本立場，完全根據並堅持上引的九點。唯一增加的只是明確地指出，蘇聯如果想從現狀前進到社會主義，必須通過一次政治革命去推翻官僚統治。

反對托洛次基見解的，主要有兩種意見：1、將蘇聯國家看成為一種歷史上新的現象，它將開始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它既非資本主義，又非社會主義，而是官僚集產主義。這個主義不是代表着人類歷史從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去的一段彎路；而可能構成一個獨立與漫長的歷史時期。2、便是把蘇聯以及後來出現的同類國家的制度，統統稱之為國家資本主義。

現在，蘇聯與東歐諸國的崩潰、瓦解，終於證明出這種制度確實是介乎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一種矛盾的社會。它既不曾、不能造成一個相當長的、獨立的歷史階段；也不曾、不能與世界資本主義制度和平與自然地溶合到一起。

官僚集產主義的主張者現在已經不多了；但國家資本主義論者還是不少。他們如何解釋史大林主義制度的崩潰呢？很簡單：這是獨裁的國家資本主義讓位給民主的自由的資本主義！事情如果真的如此

簡單，那又怎能解釋在此讓位過程中，與一些群眾性的爭民主反專制的運動同時，我們又看見全世界的一切反動勢力：從歐美帝國主義國家的領袖到第三世界的一些小獨裁者，從羅馬教皇到東正教的大僧，正從羅曼諾夫家族的遠房後人到東歐一些國家的流亡王子們……都出來齊聲歡呼，這個「民主與自由」的「讓位」？

難道這些當前的與過去的統治者們，這些一貫在物質上與精神上奴役勞苦大眾的老爺們，都突然變成民主、自由與人權的衛士了？顯然不是的。

史大林主義制度崩潰之所以會引起「普天同慶」，主要原因，我以為，在於蘇聯以及同類國家的性質，直至它們傾倒之前，基本上還是托洛次基當年所指出的九點所代表的那個充滿矛盾的集體。其中含有可憑以前進至社會主義的因素，又含有可憑以退回到資本主義的因素。

一切反動派之所以歡欣鼓舞，因為他們看到了前一類因素的最後消失，看到了後一類因素的全面勝利。

如果蘇聯的崩潰僅僅表示甲類資本主義轉變到乙類資本主義，那是絕對引不起全世界反動派的如此同情的。同時，也無法解釋，何以國家資本主義蛻化為私人資本主義，會使現時代一切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思想與運動，遭遇到巨大的挫折與衰退。

（這一則札記由1月5日開始寫，經過多次中斷，直到1月26日，才補寫完成）

1月8日

Baruch Hirson 寄來托洛次基於 1934 年 1 月 29 日寫給李福仁的信稿。這是有關當年伊羅生與上海史大林派合辦《中國論壇》所引起的策略問題的。為了刊物的存在，有必要對合作者作出一些讓步。但是讓步得有個限度。這個限度該怎樣決定呢？在這封信中，托洛次基給規定一個原則性的標準。他說：

一個遠離現場的人，雖然很難對實際工作問題表示意見，但我還是覺得你的做法是對的。那就是盡可能長地設法把《中國論壇》辦下去。但在與人妥協這一方面我們要走得多遠呢？這是一個很微妙的問題。如果你真有希望建立起你自己的基礎，那末，我覺得，為了不把重要的地盤過早地讓給人家，即使對史大林派作一些較大的讓步也是允許的。但若你沒有希望能在那裏建立自己的基礎，而史大林派又愈來愈固執，一再提出他們的要求，那末為了保存生命而付出生命的意義作為代價，這在政治上說是不智的。在這樣情形中，讓它光榮地死去倒比較好些，那就是，索性以左派反對派精神出版戰鬥性的最後一期。

1月20日

得劉山青信，有點意外，但很高興，他在廣州的監獄裏坐了足足十年，始終不屈，極可貴。信中有這樣幾句話：

我和王希哲同在一個特殊監獄。大聲喊話還是可以的。他託我向你問好。他說他很尊重托派，又說影響他最大的書是你寫的《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這當然使我很高興。那是「無心插柳」的一個小小例子。

1月23日

給劉山青寫了一封回信。附去我於1989年6月9日在第四電視台播出那個聲明。

2月8日

受嚴寒影響，病倒了。半個月來沒有力氣寫一個字。2月1日曾得劉的第二封信，使我憂喜參半。喜的是他說他不曾對香港的傳媒隱瞞自己的主張：他擁護托洛次基，憂的是他對吳仲賢認識不清，有幻想，說要與他合寫一本書。等他回答我上次去信之後，擬再給他寫一封信，談談政治思想問題。

《十評》登載了老托寫給伊羅生的九封信。錯字很多。

得羅舍信，說他將把他寫的有關二冊中革問題的講義印成正式的書，希望我給他提點意見。擬將托給伊羅生的信寄給他。至少有二個問題：1、獨秀與馬林在加入國民黨問題上的意見分歧；2、中國傳統社會的結構——這本書可供他參考。

《國際通訊》要我寫一篇關於劉山青出獄的文章。有心無力，轉託班兄。

本月4日是農曆年初一。遙想家人過節情形，頗多感想。

前天起天氣轉暖，氣管炎似已消退。但精神仍差。頭暈無法看報、寫字。

助聽器試用了一個多月，漸漸慣了。

上月29日得曼台爾致超的信，當即轉去。

2月11日

昨天上午去洗衣店洗衣，晚上看了半場莫札特的歌劇 *Don Giovanni*，今天疲倦得無法起牀。

翻閱前天的《衛報》，發見一篇論當前私有化風氣的文章寫得甚好。它開頭說：

私有化席捲全球，有似森林大火的蔓延。從外蒙古到南美洲，一切原屬政府所有的東西都拿出來讓私人搶奪。如何私有，方法上無人提出問題。在舊蘇聯，政府準備將巨額的國有財富以最低價錢賣給原有的官僚與新生的黑手黨分子，他們誤信私有化即使在騙子們的手裏也會變成萬應靈丹，這情形正在變成一顆定時炸彈。

這些實行家中極少人注意到不列顛，這個地方十二年來實行了私有化，其結果是微觀的經濟成功的例子是很含渾的，而宏觀的經濟後果則陷於慘敗的邊沿了。

接着他舉出了不少盲目私有化，瘋狂追求利潤，讓自由市場充分發揮其搶奪騙取的真實例子。

作者維多·凱根，是《衛報》上，也許是全英國，少數幾個頭腦比較清醒的經濟學家之一，自從東歐的「社會主義」制度崩潰，蘇聯解體以來，他發表過不少警告式的文章，警告西方世界的領袖們，特別警告西方資本主義的經濟學家們：別「笑得太早」，資本主義的私有化並非萬應靈丹，「戴卓爾主義」危機重重。

目前遍及資本主義世界的所謂「經濟衰退」，多半會讓近幾年來大叫私有化萬歲，公有化退位的人們頭腦清醒一點了。

蘇聯與其他一切「社會主義」國家在經濟方面的經驗，至少告訴我們一點，公有化（或國有化）與私有化二者的本身並不能解決全部問題。重要的還得看是怎樣的公有？是落在誰的掌握中的公有？是靠什麼階級與怎樣的人來操作的公有？至於私有制，在由資本主義制度轉變到社會主義去的過渡時期內，特別在經濟比較落後的國家內，是不可能廢除或禁止的——在某些部門與某些時候，甚至還得加以提倡呢。但必須清楚地認識到：第一、私有化終究是輔助性質的；第二、它必須在社會與國家的監視之下，只能讓它起有利作用，不能投機倒把，欺騙盜竊，為非作歹。

2月19日

《衛報》記者 Jonathan Steele 一篇介紹俄國新起政客齊林諾夫斯基（Vladimir Zhirinovskiy）的專文，甚好。無論在哪一方面，此人都極有資格作未來俄羅斯的獨裁者，我曾經說，葉爾春可能成為俄國的莫索里尼；但照目前情形看，讓齊林諾夫斯基那樣的人來扮演希特勒，也許有更大可能。

2月22日

班將獨秀的《最後論文與書信》譯出來了。送來讓我校對，這是義不容辭的工作；只是身體仍太差，一時拿不起這項工作來。

昨天勉強翻譯了曼台爾寫給老超的信。又為子春翻譯了我於1989年6月9日在里茲大學聲討天安門屠殺大會上的發言稿。一起寄去香港。來到英國後，曾經先後用英文寫了不少篇或長或短的文章，始終

不曾譯成中文。我有一個毛病（也許可以說是「優點」），對於自己寫的東西，從來不看重。對於我的寫作態度，曾經想到過一個相當合適的譬喻，有如便急，非立即排泄不可；但一經排出，便掉頭不顧，隨它去了。這當然是毛病，顯然對自己的見解與感想不夠重視，不夠負責。明知不好，可是我無法改，此生也決不能夠改的了。

曼台爾給超的信寫得很好，正如他十年前讀了我的回憶後寫給我的信一樣，熱情洋溢，令人鼓舞。但若將他和比哀·法朗克相比，我還更歡喜後者些。法朗克沒有曼台爾的學養文采，但他更厚道，更切實。拿他當年對我這本回憶的態度來看吧，幾句評語，幾句讚許，都非常中肯，十分妥切。其中沒有絲毫客套，也沒有任何宣傳意味。曼台爾的信卻大有對自己人也進行宣傳之嫌。

一周來，深感小便困難，也許我也患上前列腺炎了。

2月23日

俄羅斯於2月3日實行「震盪療法」，解除物價管制。預料中的社會不安還不曾見大規模爆發。有組織的抗議行動，首次發生於2月9日，星期天。組織者是「俄羅斯共產主義工人黨」。據鮑里斯·卡加立次基（俄國工黨的領袖之一）的報導，這個新黨是由過去蘇聯共產黨中產生的二個堅持傳統史大林主義的流派之一所組成的。這次示威提出了「打倒政府」與「回復無產階級的專政」這二個口號。示威參加者，據各家資產階級報紙的報導，都說相當多：記者們的各個估定數字，自數千至萬餘不等。同時，擁護現政府的人也組織了示威，但據所有同情現政府的記者報導，參加者遠不及反政府遊行之多。而且，還據說，許多參加者甚至不知道為什麼要參加這個示威。

俄國「工黨」對反政府的示威實行抵制。事後開會檢討，發覺抵制是錯的，他們原本應該參加進去，提出自己獨立的口號。

從這件事看，我深深覺得我們對史大林主義政黨的態度不夠正確。不錯，史大林主義黨的上層竟可以說是百分之百的官僚，他們從來靠這個組織做官，發財，謀取特權，作威作福。他們對社會主義的理想，對馬、列主義的原則早已置之度外，他們全都是十月革命的叛徒。所以一到冷戰失敗，「改革」絕望，這些人便爭先恐後離開這隻沉舟，爭先恐後地向資本主義投靠，特別向西方帝國主義的領袖美國投靠。對於這些昨天才擲去黨證的所謂共產主義者，當然不能存任何希望——絕對不能希望他們能從破產的史大林主義走向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走向真正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但是我們絕不能，也絕不該把成千上萬的下層共產黨員也都看作同樣的官僚。如果這樣辦，結果只能使那為數極多的下層共產黨員，於短期迷惘之後，或在追隨一陣「民主、自由派」而感到失望之後，會極度向右去贊助大俄羅斯的法西斯主義，或者會回頭去懷念史大林統治的「安定強大」，因而再度去擁護史大林主義。

如何將成千上萬的過去的與現有的共產黨的普通黨員，特別是那些工人黨員，從錯誤與反動的史大林主義爭取到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之下來，乃是我們今後最重要的課題之一。

俄國工黨這次經驗告訴我們：首先要在群眾鬥爭的場合和他們走在一起，同時提出我們的特殊要求和口號。

2月26日

得〈王實味冤案平反紀實〉。此文發表於1992年2月（或1月）北京出版的第四期《炎黃春秋》。作者溫濟澤。他是當年（1942年）鬥爭王實味的幹部之一。是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化思想研究室的學術秘書和研究員。一九八〇年代，他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主持研究生工作。

很想就此文寫一篇專文：「從王實味的正式平反談起」。

2月27日

得超回答曼台爾的信。

2月28日

報紙上讀到前德國社會黨領袖威廉·勃朗特說的幾句話，值得抄下來。他對《鏡報》的記者說：

許多人——不過我不是其中其中之一——相信，1989年以後，我們將很簡單進入一種世界新秩序。事實上與此相反，我們已進入一種新的世界混亂。

3月3日

把老超回答曼台爾的信寄出了。本來想寫一封較長的信，把超寫給我的信中所說的意見寫上，再加一些我自己的意見，一併寄給曼台

爾。只因精力太差，無法寫長信。把一些必要的話告訴班，讓他給我代筆。對第四國際十三屆世界大會的宣言，據超信上說，上海的朋友都不滿意。他們認為這個文件「沒有明確地分析現時形勢和指示前進方向。」接着，超又說：

「文件用了許多篇幅在保護環境和提高女權，尚可說，在革命低潮時代，群眾只能進行這種低姿態的活動，我們也參加這種活動；但文中幾處提到男女的同性戀愛，又應當怎樣說呢？男女同性戀愛同革命運動，同一般政治運動，又有什麼關係呢？我活了九十多歲，看了不少革命組織發表的文件，此次所見是唯一提到同性戀愛的。」

這個批評基本上我完全同意。關於同性戀問題的不同看法，很有趣地暴露出文件寫作人的「歐洲中心主義」。這些文件的寫作者（大多是卅幾歲的年輕歐洲人），當他（或他們）把反對歧視同性戀的要求寫進這個世界革命組織的主要文件中去時，根本不曾想到，在像中國那樣的國家中，亦即在第三世界的最大多數國家中，首先，男女同性戀根本不是一個普遍現象；相反，它是一個極稀有的現象；其次，同性戀既然只是少數私人之間的事，並不構成社會問題。沒有所謂歧視，亦無所謂反歧視。再則，如果一個革命組織在此情形中提倡同性戀，縱使不會使它在群眾中喪失信仰，至少不會因此而獲得任何力量。

第四國際的新一輩領導人，似乎忘記了，或者根本看不起《過渡綱領》。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過渡綱領起草於1937年年底，經過討論、修訂，正式通過於1938年9月在法國舉行的國際會議。綱領總結了「布爾雪維克—列寧派」，即蘇聯共產黨內左派反對派的思想 and 政治

鬥爭的經驗，作為一切真正馬克思主義者此後鬥爭的基礎。半個多世紀來第四國際的活動，都是遵循這個基本文件的。誠然，我們的鬥爭沒有在世界的任何地方獲勝，而半個多世紀來的世界革命與反革命的實際情況，又在不少地方證明了「綱領」的「錯誤」。最大的「錯誤」，是把世界資本主義說成是處於「垂死掙扎的痛苦」中。如今「社會主義陣營」崩潰，「共產主義」的蘇聯瓦解，證明出資本主義不但不曾處於「垂死掙扎的痛苦」中，相反，它正處於「欣欣向榮的」狀態中了。既然大前提已經站不住，從這個前提引伸出來的戰略、策略也就站不住了。

問題是否如此呢？決不是。

給資本主義的壽限定錯了日期，不自托洛次基與托派始，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犯的。這個「錯誤」，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的一次新版所作的序言上就承認過，並且解釋過了。最高明的醫生也不能明確無誤預言某一病人的斷氣時刻；但這決不妨礙他憑病人生理上的種種症候，預斷病人終將死去。

正像共產黨宣言之於一般的共產主義運動一樣，《過渡綱領》還變成為今後全世界革命馬克思主義者的基本文獻。當然，它必須在近數十年來革命的成敗經驗的參照之下，作完全必要的檢討與修訂的。

3月9日

得宇平函，知玨玨已於上月26日產一女。開始校對獨秀最後論文、書信的英譯稿。劉已抵英、並將於後日來里茲。

3月11日

劉山青來，談了半天，相當失望。他成了「民運」機構有心製造的「英雄」之一。人還是老實，但無深度。他的前途：或者於一度喧囂之下，像肥皂泡一般地消失，或者，終於被造成一個香港馬路政客。前一可能大，後一可能較小，因他並不具有馬路政客的必需條件也。

不過，在幾小時的談話中，我還是說了我應該說的話。主要是給他潑了一盆冷水。臨別贈言是：人不怕罵，只怕捧；當你周圍只聽到一片讚捧之聲的時候，應該特別警惕的。

這是進入聾人耳朵的聲音吧！

3月12日

昨天一緊張，今天整個人垮掉了。整天躺着休息，準備明天接待另二位客人。

3月16日

今天是我85（依西曆）的生日，沒有告訴任何一個人，也不給自己作任何紀念。中午吃麩包，晚間吃粥，跟其他日子沒半點不同。

劉山青前天來信，今天答覆，由懷耀轉交。明知是白費力氣，但我還是盡了人事。「一跤跌在青雲裏」的人，只當他從青雲摔到地上的時候，才會清醒——如果不曾跌死的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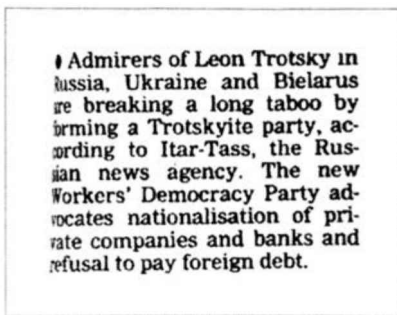
3月21日

道拉生日。他們全家赴倫敦祝壽，我送了他三本畫冊。晨起，精神很差，勉強給費立民君寫了一封回信。並由班轉寄他一本《毛論》。此人中文程度不壞，也許能讀這本書。

劉山青已於前日離英赴美。臨行前他回了我給他的信。大意說他不會給人家捧昏，但願如此。

今天《衛報》上有一則消息，全文如下：

據俄羅斯通訊社——
ITAR-TASS 的報導，俄羅斯，烏克蘭與白俄羅斯三共和國內的里昂·托洛次基的崇拜者，正在打破長期以來的一項禁忌——他們正在組織一個名為工人民主黨的政黨。這個新的工人民主黨主張把私有的公司與銀行國有化以及拒絕償還外國債款。



3月28日

得3月17日曼台爾寫給格雷的信。這是答覆老超給他的信和我託格雷轉述的意見的。

4月2日

幾天猶豫之後，終於決心把曼台爾寄來的宣言修訂稿仔細讀一遍，寫一批評。另一份宣言寄去香港，希望老超也能寫一點批評。

4月9日

生平第一次投選舉票。選工黨。

4月10日

大選結果，工黨空歡喜了一場。保守黨第四次連續執政。在整個世界向右轉的時候。英國的政治氣候自不會例外的。

勉強寫了一封答曼台爾的信。支氣管炎又發作了。

4月16日

寄出給曼台爾的信。預備寄一份給香港朋友，將信譯成了中文：

親愛的曼台爾同志：

你3月17日寫給班同志的信，見到了。從他那裏又收到了你要他轉交給我的二冊宣言草案。一冊已郵寄給鄭同志。他讀後如有什麼意見，得知後即當奉告。

我很仔細讀完了那個修改後的宣言草稿。原本很想依你所提議的那樣：對草案作一些具體與詳細的評述。只是我目前的健康情況太壞，無法這樣辦，實在是一宗憾事。

下面提出的，還只是幾項一般性的建議，希望它們對這個文件的改善能有多少幫助。

1. 因為這個文件基本上是在一年多以前寫成的，那時離開莫斯科的政變還有半年多，蘇聯更不曾解體。如今把這個宣言正式發表，有許多地方自須配合目前實情來加以改作。

2. 文件提及的各個問題，廣泛地涉及目前世界情勢的各個重要問題；我幾乎全部可以同意，但我覺得這個文件缺少一個明顯的中心：它沒有回答一些最迫切與最重要的問題——這些問題是從「社會主義陣營」的崩潰與解體以來每一個能思想的人都會提出、而且已經提出來的。其中有如：A、為什麼會發生這種變化？它們是怎樣發生的？B、這是否證明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都不過是烏托邦？C、一個國家，七十年來一直都自以為在建設社會主義、而且已成為世界上二大超級強國之一了的，怎麼會突然間成為一個向人求乞的國家？以及諸如此類。

我們必須解答這些問題，同時我們絕對有資格來答覆這些問題：只要把我們，即把托洛次基及其全世界的同志們，從1923年以來的所說與所行，扼要地指給他們看就行了。近年來發生於東歐，發生於前蘇聯以及中國的事情幾乎一一都曾為我們所預見，而且都預先提出過警告的。對於他們的每一個舉措，我們又都曾提出了不同的與正確的辦法。

宣言草案十九節中寫着：「面對史大林的反革命，只有我們這一派保持着共產主義的榮譽，保證了共產主義的持續不斷」。這樣說是絕對正確與完全有理的。但是，除非我們能具體地指出我們在過去將近七十年來所主張的是一條怎樣不同的戰略路線，那末上面的聲明便難於讓人信服。

不錯，宣言曾經在這裏那裏提到了我們的一些立場。但是說得不夠得很。我們應該把這一點作為文件的中心，作為宣言的主題來處理。

3. 參照史大林主義者「建設社會主義」的負面經驗，我們必須弄清楚某一些見解，這些見解我們自己（至少我們中間的某一些人）還認識得並不足夠與確切的。例如：A、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市場是否要起點作用？它可以與應該起點怎樣的作用？B、工業國有化與產業的公有制，是否無條件地具有進步性質（即使是在一個腐敗的官僚制度的控制之下）？

非常抱憾，我沒有力氣對這些問題表示更多的意見了。

不過在結束之前，我想說清楚我上次託班同志轉達的給你那項建議。我的原意並非要求以過渡綱領為根據，另外起草一個宣言，來代替目前的宣言草案。我的意思是：當我們起草一個新的綱領性的宣言時，必不可以忘記或忽視過渡綱領，必不可以忘記或忽視這個五十年來曾經作為我們這個國際運動之理論基礎與政治基礎的重要綱領。因此，我希望，當下月中的將此草案作最後定稿時，應該多多注意這個歷史文件。

我的建議還帶有這樣一層意思：1872年，當《共產黨宣言》發表的第二十四年時，馬克思與恩格斯檢討了他們二人合作的這一歷史文件。1937年，即當《宣言》九十周年時，托洛次基也檢討了這個文件；於肯定《宣言》的基本立場同時，指出了為歷史事實證明為不再適用因而必須改正的某一些看法與論點。現在，當《過渡綱領》寫作並通過的五十四年後，我們應該以同樣精神，

即參照過去經驗與目前大為不同的世界形勢，檢討這個文件，藉以做出總結，並吸取必要教訓。我希望你，或者在國際執委會下面成立一個專門委員會來擔任這項工作。

1958年，在《過渡綱領》二十周年之時，我曾經為此寫過一篇文章。這篇文章後來編入我寫的《思想問題》小冊子中。

最後，我還想說的一件事：在關於蘇聯、中國以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問題上，我從來不曾贊成過國家資本主義說。
致

同志的敬禮

具名

1992年4月10日

5月16日

由於頭暈、頭痛，加上一些生活上的瑣事，整整一個月沒有寫一個字札記。其實一個月來的感想並不少。報章雜誌上的妙文（正面意義與負面意義的「妙」）也有好多篇，它們是足以觸發我的「文思」的。可惜有心無力，沒法作比較系統的思考，沒法把零碎的感想記下來。

「妙文」中我覺得最妙的一篇是《衛報》上譯載的〈醒來吧，俄羅斯兄弟〉。作者N·耶可夫了夫；前蘇聯的著名歷史學家，戈巴喬夫的親密顧問，官做到蘇共的政治局委員。他這篇文章的妙，兼有正負兩面意義。他抨擊俄國人的落後性格是精采的；他對二月革命的民主何以會轉變成十月革命的獨裁與專制則淺薄得令人難以相信。

把二月革命與十月革命的差別，說成為「明智與蠻橫，負責與虛矯，真實成功與暈眩的陶醉。真正的勇氣與虛張聲勢，冷靜的判斷與浮誇的即興」之間的差別。這樣的議論發自一位大院士之口，由這位直至共黨倒台之時還是它的最高領導人之一寫出來——實在令人難以相信，其議論確不能以一妙字來形容的。

他把目前的俄國情勢比之以 1917 年的 2 月，並且力言其趨勢會來一個新的獨裁，一個新的 10 月。這看法只對了一半。如果一直依循葉爾春的路線走下去，俄國將會產生她自己的莫索里尼，卻不能產生新的列寧。

俄國當前急需要一個新的列寧與新的托洛次基。藉以避免產生一個新的莫索里尼。

5 月 19 日

守堅與其婦馬麗安突然來訪，即日去。

5 月 31 日

午，芬·楊生、費立民偕其女友李容容來，共膳，縱談數小時，倦極。晚 7 時李懷國到，預備遊湖區及蘇格蘭。日招待二批客人，實在疲勞。迎賓災難，不料到八六之年尚無法避免，可悲也。

6 月 1 日

懷國去湖區。我終日悶睡，頭腦昏昏然，離牀，在室內小步，人欲倒。這疲勞不知尚需幾天才能恢復。

6月3日

得曼台爾覆信。中譯如下：

親愛的王同志：

收到你1992年4月10日的來信。謝謝。此信已交給編訂委員會——它正在為我們的綱領宣言的最後定稿而工作。在那最後確定的稿子中，你會見到你的某些見解已經給容納進去了。同樣見解，別的同志也已經提出過。在未看到你的意見以前，我就竭力主張（我們的新的綱領性宣言）要直接與過渡綱領聯繫，並應用它的方法。這一點，在文件的最後一稿中已經做到。同樣，關於在過渡時期採用（有限度的）市場機構這一點，也寫進去了。這個立場，自從1930年以來，一直為托洛次基、拉可夫斯基以及左派反對派的多數人所採取的。

順便提及一點：我們運動的這個重要文件是「老人」被謀殺以來第一次（在它制定之時），從舊蘇聯內部獲得一些重要建議的。

同志的敬禮

埃內斯脫·曼台爾

1992年5月23日

這個答覆比我預料的為好。

6月4日

今天是天安門屠殺的第三周年。懷國返自湖區，即日去倫敦。一星期內接待了三批客人，累得半死了。

6月8日

把多年來的信件與筆記稍加整理，無意中發現了初來英國時在圖書館翻閱唐史時的一段抄文。值得轉抄在這裏，那是關於所謂「武三思主義」的。

37年年尾在武漢，寄宿在陳獨秀家，主客晨夕一起，無語不談。談話中多次聽到他提及武三思主義。我不懂，問他這個主義的含義，他說：「對我好者為好人，對我壞者為壞人」，這便是武三思主義。

這個「主義」引起我的興趣，一直想找找它的來源——它的出典，它的原來文字；可是一直沒有機會。來到英國後，不但有了閒暇，而且有了方便——里茲大學圖書館裏收藏有大量的中文書籍。我終於從新舊唐書裏找到它的出處：

一、新唐書卷二百零六，武三思條，有如下的話：「我不知何等名善人，唯與我者殆是哉。」

二、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三，武三思條，文如下：「不知何人名作好人，唯有向我者是好人耳。」

原文大概是史家忠實於武三思的口吻而寫下來的，很傳神，雖然文字不漂亮，獨秀則將它翻譯成現代口語了。

這個「主義」，其實不應該由武三思專利的。所有的人，尤其是所有的政治家，無一不有意無意地信奉着與實行着這個主義；不同者，只是程度之差耳。

再想深一層，武三思主義只是人的自為本能的表現。自為，在某一意義上說，也就是自私。俗話說：「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這種十足犬儒主義的論調，實際上卻是符合實情的。

問題變得複雜，那是要到個體的自為發展到群體的自為之時。由利益相同的個人組成了一個利益相同的群體，由個人的自為擴大到群體的自為，由小我擴大到我，當二者之間發生了某種矛盾，以致必須犧牲小我利益去完成大我利益之時，那時候的個體自為，才成為要不得的武三思主義，才是要不得的行為，才是不道德的。

6月13日

《衛報》上有一則極有意義的莫斯科通訊。摘譯如下：

維多·格立興 (Viktor Grishin)，前蘇共黨政治局委員之一，前天在莫斯科社會安全局暈倒並且死去了。當時他是前去申請將他的養老金從每月900盧布（約合5個英鎊）增加到1,800盧布的。這件小事，多少證明出解體前蘇聯共產黨及其官員們在國外銀行裏存有秘密基金的那種輕率故事，是不足信的。

格立興曾經做了十八年之久的莫斯科的黨部頭頭。當前任共黨總書記契爾寧可逝世後，政治局選舉新的黨魁時，與戈巴喬夫競爭的對手便是格立興。戈巴喬夫當時是以微小的多數僅勝的。

INTERVIEW

Breaking with the Soviet past, for breaking's sake alone



World view

A 64-year-old ex-Soviet nuclear energy officer who was a useful asset when secret funds in foreign bank accounts, allegedly used by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and its officials.

Viktor Grishin, a former Politburo member, collapsed and died while applying for his pension in his hometown of 1,200 residents. Grishin had been a member of the Communist Party for 18 years, but was not a member of the party.

He was not a member of the party, but he was a useful asset when secret funds in foreign bank accounts, allegedly used by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and its officials.

Grishin was said to have used his power to get his pension raised to 1,800 rubles, and it is very likely he did this because he was a useful asset when secret funds in foreign bank accounts, allegedly used by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and its officials.

...which they set down that a handful of Soviet states only did.

The other aspect of the matter about Soviet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in the so-called Western countries have their assets, and how? It is not clear if the party was to maintain itself as a political party in the West.

...which they set down that a handful of Soviet states only did.

The other aspect of the matter about Soviet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in the so-called Western countries have their assets, and how? It is not clear if the party was to maintain itself as a political party in the West.

...which they set down that a handful of Soviet states only did.

The other aspect of the matter about Soviet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in the so-called Western countries have their assets, and how? It is not clear if the party was to maintain itself as a political party in the West.

假使當時獲勝的是格立興而非戈巴喬夫。那末世界情勢可能會大不相同吧。我們不會見到戈巴喬夫的「改建」政策，也不會有葉爾春の崛起。

格立興倒斃的情形，讓我們感到興趣的是：共黨要人一旦失去職位後會陷於怎樣的貧困。在蘇聯，不像在西方，他們的特權是與權力聯繫，不是和財產聯繫的。

當格立興做莫斯科的統治者時，據說他曾濫用權力，事實上也可能是如此的。但他一旦失去了職位，同時也失掉了一切。他顯然沒有外國銀行裏的存款。也沒有大量美金秘密放在外邊。我相信，只有極少數的蘇聯共產黨人曾經這樣幹的。

這段消息，讓我想起了：即使腐敗專橫的史大林主義的共產黨人，在積累私人財產方面，還多少與資本主義國家中資產階級的政客們有所不同。這也是一個小小論據，足以駁斥某些人想把史大林主義制度完全等同於希特勒主義制度的企圖。

7月10日

答覆了G向我提出來的11個問題，關於唐寶林著的《陳獨秀傳》的。這本書的作者在目前中國算是研究托派與陳獨秀的專家之一。史大林主義的偏見很深。

G譯了《陳獨秀的最後論文和書信》，要我寫一篇序。預備寫一篇短文，簡單介紹此書當年由何資深（之瑜）編輯和我們為他付印的經過。對陳的意見本身，不作任何評論。見仁見智，讓今後的讀者們自己去評論吧。

可惜我體力實在愈來愈差。短序試作幾次，都不成功。令方月初來看我，定於後天返台。

7月15日

看醫生，驗出白內障已相當嚴重，介紹到醫院去作進一步檢查。乾草熱，頗不適，拿了些藥丸回來。一年一度的健康檢查，結果滿意。

志勤的兒子王佐介紹他的朋友張堯寫信來，想在里茲大學找事做。我無能為力，覆一信。

7月16日

法人比哀·特·柯培當（Pierre De Coubertin 1863-1937），是將古代希臘人的奧林匹克運動會恢復起來的人。對奧林匹克運動會的意義說過如下的話：

奧林匹克運動會的最重大意義，不在於競賽獲勝，而在於參加競賽，這正好像我們生活中最重要的不在於勝利，而在於鬥爭一樣。最重要的事情並非在於你爭取到了什麼，而在於你很公正地奮鬥了的。

這是他在1908年倫敦舉行的奧林匹克運動會的閉幕會上說的話。話說得很好。可惜後來那些辦理奧運會的政客們以及參加競技的運動員們，愈來愈和這個精神背道而馳了。

政治化，商業化，運動員的職業化，把奧運會原來的相當崇高的理想完全毀壞了。

7月17日

服了醫乾草熱的藥丸，沉沉地睡了13個小時，人十分疲倦，什麼事都不能做。此藥對乾草熱似乎確有好處，但副作用太大，決定停止服用。

7月21日

亞歷山大·潘佐夫來。他帶來了保存在第三國際的有關莫斯科中國托派檔案全部的抄件，我的一份是周恩來做的。所寫履歷大致不錯。只是說我曾經在黃埔軍校當教員，未免錯得太大了。1926年在廣州時期，去過幾次黃埔，與宋雲彬、蕭楚女及張秋人吃過幾次飯。那時惲代英尚在黃埔，周恩來好像已經離開了，不知怎樣會把我也劃成「教官」的。

匆匆看了一下，知道安福是被處決了的，范錦標卻曾於流放西伯利亞多年之後，被准許返回中國，可是一無消息，多半是回來不久便去世了。

7月25日

得老超寫的紀念龔自珍誕生二百周年文，極好。文長一萬餘字，見解是道人所未道，文章則神完氣足，絕對不像是九二老人的作品，人瑞也。

潘佐夫來談，問了我幾個問題。俄語已六十三年不講，荒疏了，勉強應付，十分辛苦。他英語不差，華語說得比我的俄語好，今後當以英語與他交談。

8月5日

收到守堅寄來的相片和他一家人寫給我的信。開心之極。幾個月來心裏的鬱結，一下子消失了。立即寫了回信。5月尾他們突然來看我，事情來得太突然，我年老懵懂，竟弄得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招待。和守堅夫婦不知所云地談了一會，竟讓他們走了，當日趕赴約克。事後覺得非常不安。十年不見，他們特地來看我，理應留他們在這裏停留一二日，敘敘舊，指點他們去看看風景。可是我竟想不到這些，人只覺得迷惘困倦，只覺得窮於應付。他們走了，我甚至感覺到如釋重負。這真是老而無用了。他們走後才想起他們的車子已走了一天，絕對要在我這裏休息了，而我卻讓他們在傍晚離去，到陌生的約克去泊車過夜。如此無知，事後想到時非常不安。今天收到他們的照片和信，絲毫沒有怪責我的意思，令我既愧且喜。

梁耀忠偕其夫人黎紹珍來。次日離此赴倫敦。

8月10日

困擾我長達五年的樓下鄰居今天搬走了。很高興。即日搬入來的是一對年輕男女。入屋未及2小時，樂聲大作。嗚呼！

8月20日

昨夜樓下的新鄰居開了整夜音樂，無法入眠，煩極。好像是房東方面有意跟我搗亂似的：明知我受不了這種煩囂，偏偏接二連三地把年輕的POP音樂的玩家們送來做我的鄰居。前天班給我打了電話投訴，我自己又寫了信，要求房東想個補救辦法。如果情況不能改善，只好設法搬家；只是搬家這件事談談容易而實行難！

前幾天收到老超最近寫的一個《提綱》，其中有些看法我不同意。想寫文與他商榷；氣力全無，只好算了。有關問題，不少曾經在我的札記裏談到過，擬將有關的一些段落，複印寄給他，請他參考。

潘佐夫來過五次，詢問我有關當年東大、孫大的一些問題，我雖疲勞，卻極願給他以詳細解答。這是一位很有科學良心的年輕歷史家。

8月21日

莫斯科新聞周刊的最近一次民意測驗，結果是：47%的被詢問者認為政變一年來國家的危機是更嚴重了；24%認為一次民族的災難正在來臨。只有17%認為俄羅斯現在正走上了復興之路。（見8月20日《衛報》，John Rettie 莫斯科通訊。）

8月29日

終於將札記中論及舊蘇聯國家性質，戰後資本主義何以有了空前發展等等問題的段落複印寄春，請他轉寄給老超。老超提綱中還有兩項意見；我們對民族問題以及對宗教問題的態度，將來也想和他討論一下。我以為我們必須反對反動的民族主義；但並不因此忽視民族問題的複雜性。重視民族問題，與贊成民族主義完全是兩碼事。把二者看成一碼事，或簡單否認民族問題的存在，那是不對的。這態度非但不能解決客觀存在的民族糾紛，而且更糟的，它恰恰會在客觀上幫助最反動與較強大的那些民族去壓迫較為弱小的民族。在這個問題上，列寧立場確實比盧森堡立場正確得多。過去的歷史證明了這一點，目前正在展開於前蘇聯與前南斯拉夫的可悲情況，更會從正反兩方面去證明這一點。

對宗教的態度亦然。簡單提出「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口號去反對一切宗教糾紛，行動上採取打倒一切宗教，以為這樣便能解決種種因宗教差別而引起的一切政治和社會矛盾，那是非常天真的。文革中紅衛兵們的反宗教鬥爭如何取得了極壞的反效果，至少告訴了我們簡單叫喊反宗教的口號是反對不了宗教的，它只能取得反效果；大大加強一切反動與愚昧的宗教勢力。

反對宗教是一個漫長的鬥爭。宗教絕對不能用政治與軍事的手段來反對。它必須在文化和經濟的普遍提高中，逐漸地減消其影響，乃至最後使它自行歸於消滅。在這個極長的歷史過程中，任何一個進步的政黨或政權，一定要嚴格保證信仰自由。不然的話，只能助長宗教的存續時間，至少幫助它發揮更大的反動作用。

9月3日

美國「國防工業」在美國政治經濟局勢中，乃至它在國際政治經濟局勢中，所起與能起的巨大作用，從布希總統昨天宣佈的一項決定中，很充分地透露出來。布希宣佈說，美國決定把 150 架 F·十六型戰鬥機賣給台灣。這個決定，顯然違反了 1982 年中美兩國簽訂的軍火公報，因而一定會引起北京方面的強烈抗議。然則，這位以「中國通」自命的布希為什麼要做出這項決定呢？一般的解答是為了競選連任。為了討好投資在「國防工業」的大財團，以便取得作為軍事工業基地的某幾個州，特別是德克薩斯州的選票。但這不過是近因之一。更基本的卻是為了解決目前美國經濟的嚴重危機，美國的當權者在諸般對策中，必須對付兩個最迫切的問題：1、如何為這些多年累積的大量殺人武器找到出路；2、如何把冷戰以來重點投資的國防工業減輕其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使全國經濟能取得若干程度的平衡。

為了第一個目的，美國必須大量出售武器。事實上，她已經成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軍火出口國家。據《衛報》本月3日的一篇通訊說，美國的武器出口現已佔對外貿易總額的10%。

為了第二個目的，五角大廈不得不開始取消一些新穎武器的訂單，例如原本決定製造的V-22 Osprey 直升運輸機和改良M1型戰鬥坦克，曾經宣佈不再進行。這次為要騙取那些大軍火製造廠的參與人員（從投資者到工人）的選票，布希雖然又宣佈照原議進行；但這顯然只能是競選的一項手法。如果最近將來世界上沒有大規模的冷戰或熱戰爆發——照目前情形看，這是極少可能的——那末美國「國防工業」和民用消費工業之間的關係，絕對非大加調整不可的。

Bush steps up arms sales

Martin Walker in Washington

PRESIDENT Bush has embarked on a new drive for arms sales abroad and intensified arms purchases at home, determined in the last weeks of his re-election campaign to save jobs in the shrinking defence industry.

Mr Bush's announcement yesterday of a \$4 billion (£2 billion) deal to sell 150 F-16 fighters to Taiwan reflects the degree to which domestic economic considerations have overtaken the wider interests of US diplomacy.

The F-16 decision throws into question whether China will continue to refrain from using its veto against US and other Western initiatives at the United Nations.

At the same time, American Jewish leaders claim to have been informed that Mr Bush intends to proceed with selling 72 F-15 fighter-bombers to Saudi Arabia, worth some \$5 billion. The deal will require congressional approval, but the pressure to save defence industry jobs will make it difficult for the pro-Israel lobby to mount its traditional campaign against sales of advanced weaponry to the Saudi monarchy.

The Saudi government has made clear that it will buy British Tornado warplanes if the US deal is stalled again. And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also aware that the White House is vulnerable to commercial pressure in an election year, publicised their parallel talks to the French Dassault company, manufacturer of the Mirage 2000-5 fighter.

In the wake of the Gulf war, the US secretary of state, James Baker, announced a new policy of gett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o reduce arms flow into an area that is already over-militarised". That year, 1991, the United States sold a record \$41 billion in arms, of which \$16 billion worth went to the Middle East. Arms now account for about 10 per cent of US exports.

At home, President Bush has reversed his earlier attempts to

cut weap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s like the V-22 Osprey vertical take-off transport, and the upgraded M1 main battle tank. The Osprey is manufactured in Texas and Pennsylvania, and the M1 tank in Ohio and Michigan. These are all seen as important swing states in this year's election.

President Bush announced the F-16 sale to Taiwan at the General Dynamics factory which produces the warplanes, during a campaign tour in Texas. General Dynamics had warned in July that it would have to lay off 5,000 of its 20,000 employees at Fort Worth because of a lack of F-16 orders.

The Taiwanese order may put at risk some US commercial aircraft sales to China. The Boeing Corporation has orders for more than \$4 billion, and McDonnell-Douglas for \$1 billion, to Chinese airlines whose purchasing decisions are controlled by the Beijing government.

China, which has been building up its own air force, has consistently sought to enforce a 1982 agreement with the US — originally negotiated in part by Mr Bush — which promised to limit American arms sales to Taiwan. Beijing also has in the past retaliated against countries which sold arms to Taiwan by reducing diplomatic links and trade.

A senior Texan Democrat, Senator Lloyd Bentsen, predicted yesterday that China initially would protest at the sale to Taiwan, but might be mollified because the F-16s in question are less attack-oriented than newer generations of the fighter.

In another election-year decision, President Bush also announced yesterday that he was invoking a formal emergency to break the 1991 budget agreement and spend another \$1 billion to subsidise US grain exports. A number of countries — including Poland, South Africa, India, Yemen and Brazil — have been added to the list of those allowed to buy surplus American grain at subsidised prices.

當然，這也是一個不易解決的矛盾；不調整將嚴重加深美國的經濟危機：實行調整則勢必引起深刻的社會動盪——由大量失業而促發的社會不安。

9月6日

今天班兄赴華。他將在南京作半年研究。

新鄰居仍然吵鬧，頭痛之極。想搬家，甚至想搬到倫敦去；但這談何容易！昨天收到《十評》，登完了我的〈九信說明〉。此文一共登了三期，前後相隔8個月。這樣辦，怎能讓讀者得到一個完整的印象？！

得比哀·羅舍長函。引起我不少感想。他是1968年法國學生運動的領袖，相等於1989年中國學生運動裏的吾爾開希或王丹。但他（和他們的朋友們）所走的思想道路，卻和「天安門」小將們所走的剛好相反。羅舍們的道路是從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終於走到了托洛次基主義；天安門小將們的道路，就其中主要的代表人物說，乃是由於受到史毛主義的苦難，將史毛主義與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等同起來，因而憧憬並趨向了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

羅舍和他的戰友克里文，自從參加國際托派運動之後，做了不少有益工作——克里文在法國的托派組織內，羅舍在第四國際中。過去的十年，羅舍負責荷蘭阿姆斯特丹那個「黨校」，培育幹部，研討理論，成績是很顯著的。因為工作太緊張，他患了神經衰弱症，因此最近決定辭掉這份工作，今後除參與法國托派工作外，將研究菲律賓的過去與未來。這個決定我能理解，也很贊成；但是他信中說，這項研究的目的是要在巴黎第七大學裏取得博士學位，這想法卻令人奇怪：是否

近三年來的世界反動形勢，使平素看不起資產階級學術界裏那些「勞什子」的反叛者們，終於又覺得有和這類「勞什子」妥協的必要呢？

9月14日

把《九信》和我的《說明》校勘完畢，寄港。得香港劉榮錦寄贈的書《「紅」色的轉折》。我沒有力氣讀，翻了一下書後面列舉的參考書目，其中沒有托洛次基的任何著作。談蘇聯與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轉折」而不牽涉到托洛次基，這好像談唐詩的興衰而不提李杜；或像研究中共的歷史而避開陳獨秀一樣。光憑這一點，我就犯不上化費有限的精力去閱讀這本書了。

9月20日

房東出來干涉，樓下鄰居的吵鬧好多了。連日我都能安眠；但願能如此繼續下去。

四年不曾離開過里茲一步，加以居處的環境惡劣，心情愈來愈壞。有時竟發生厭世念頭，朋友們勸我生活上來點小變化，譬如到倫敦去住幾天、看看朋友。這主意值得考慮。如果腰痛好轉，真想去走一趟。

連日腰痛，坐立不安。這是老毛病，幾年前去看過醫生。醫生給了藥，服後胃出血。從此不再就醫，讓它自來自去。每次發作，總得持續一二星期。

10月5日

1893年2月間，恩格斯針對德國帝國國會中進行的「軍事法草案」的辯論，給柏林的《前進報》寫了一系列論裁軍問題的文章。當這幾篇文章印成小冊子時，恩格斯給它寫了一篇序言，其中有這樣一段話：

我的這些文章是以下面這個日益獲得普遍承認的前提為出發點的：常備軍制度在整個歐洲已發展到極端，只要常備軍不及時改組為以普遍武裝人民為基礎的民兵，那末，不是這種制度使各國人民負擔不起軍費重擔而在經濟上破產，就是它必然導致一場毀滅性的大戰。（見中文馬恩全集，第22卷，435頁。）

恩格斯這幾篇文章的內容是主張以真正的民軍來代替常備軍；其着眼點是要以民眾自己的武力來取代一貫作為政府壓迫工具的常備軍。由於文章是為當時的國會辯論而寫的，作者着重了維持常備軍的經濟方面的危險，不曾指責這個制度的反動的政治作用。

馬克思與恩格斯對於常備軍的政治方面的看法，在別的有關著作中，特別在論及巴黎公社的著作中，詳細地討論過。列寧則在《國家與革命》中提到過。後來，在十月革命之後，布爾雪維克派的領袖們更加在實際上試行過以民軍代替常備軍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見解。這個試驗如何進行，如何由赤衛隊逐漸變成正規的紅軍；紅軍又如何隨着蘇維埃政權的官僚墮落而變質——從工農的軍隊逐漸變成維護官僚獨裁、鎮壓民眾的武力——這是值得一切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家全面研究的一個問題。

不過現在我不想談這個問題。這裏我感到興趣的是恩格斯序言中指出的那個前提，特別是他指出的因軍費大增而導致的那兩個前途：「不是各國人民因負擔不起軍費重擔而在經濟上破產，就是它必然導致一場毀滅性的大戰。」

一八九〇年代歐洲各國建立與維持一支常備軍，其所需費用，和今天各國的所謂「國防經費」，簡直是無法比較的。以步兵、騎兵為戰鬥主力的軍隊，其所需要的武器配備，和今天的充分現代化的海陸空軍的武器配備之間，技術上的差別何止天壤。二者所需費用的差距，也必須用天文學數字來代表了。

可是在 1893 年，恩格斯已經認為當時各國大增軍費的結果，「不是使各國人民負擔不起軍費負擔而在經濟上破產，便是它必然導致一場毀滅性的大戰。」現在，各國人民所負擔的軍費既然千百倍於十九世紀之末，又怎能避免走上恩格斯所指出的那兩個前途呢？

恩格斯的預斷，已經兩次世界大戰給證實了。可是人們也許會提出這樣的反問：各國的軍備競爭固然導致了幾次戰爭，但戰爭的結果，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非但不曾使各國經濟破產，而且相反，跟着第二次大戰，冷戰開始以後，特別在資本主義各國中，不但沒有經濟破產，而且在生產力方面，特別在生產技術方面，讓人見到了飛躍的進步。這是推翻了恩格斯的前提的。

是否真的如此呢？不是的，恰好相反，我覺得近數十年來「持久的軍火生產」和資本主義的繁榮與危機之間所表現出來的微妙關係，恰恰是更進一步地證實了恩格斯的兩個前提。

10月14日

過去三個早晨，都耗在給老超寫的一封長信上了。信中所述，基本上與恩格斯指出的那兩個前提有關。因此把長信留了一個底稿，算是今天的一則札記。

方兄：

收到你8月20日信。《札記》尚未收到。郭和兄說《札記》寄到香港也須複印幾份，然後寄給我。你死以前焚去，是錯誤的。這是思想記錄，是非讓後人去判斷，既然複印，你也無法焚去。

我並不健康，所謂得天獨厚，也不過到此為止。即使明日猝死，也不奇怪，發現心臟病十幾年，不知心絞痛是什麼味道。去年秋天才嘗到這個味道，今年上半年又嘗幾次。最近更時時光顧，自然有急救藥，轉危為安，但總有一天，急救藥無效。

我從此不能寫長文章了，論頭腦，還是有能力組織一篇長文章，但眼睛不行，素材需要自己的眼睛去閱讀。

從今我也只能寫「札記」，即寫出思考的結論，不能寫出導致此理論的斷想。這也是種文體，如法國的Pascal，但難免這些「斷想」相互間有出入，甚至有矛盾。

這是在多活幾年的前提下說的，照實際的情況，這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有條件給白內障開刀，更有條件裝一副假牙，但不久就要死去，又何必受此痛苦找麻煩呢？

當今經濟的發展，有一句簡單的話表示，即說，最近四十年，人類生產增加了40倍。這是人類歷史上突出的事實，這個事實是不可否認的，但奇怪的是沒有人為此作出解釋。資本主義經濟學家認為：這是當然的，用不着解釋，曼兄在《後期》中也沒有解釋，除非說長波論就是解釋，但這個突出的事實，不給予解釋是不行的。我給予了解釋，但不滿意（這個事實總有不同的解釋，不過孤陋寡聞，不知道罷了。）

「二冷」不是解釋，「冷戰不過是旺盛的生產力找到部分的出在晚期的資本主義」（而且不僅在「晚期」），決定經濟發展的，不是生產，而是銷售，生產再多，不過將商品堆滿倉庫而已，倉庫沒有商品堆積，那時生產自會發展，跟着，科學技術就會發明起來而應用於生產者，包含那些為冷戰而發明的科學技術在內。

但冷戰在此次蘇聯亡國中確實發生了重大的作用，蘇聯集團和美國集團相對峙，希想吞掉對方；因之都要備戰。但蘇聯集團的經濟實力落後於美國集團很遠，但不負擔又不能相距太多，於是美國集團的人為冷戰而挑起擔子了，蘇聯的人民則被擔子壓得喘不過氣來，在這個時候，冷戰又不能冒險變為熱戰。於是蘇聯集團就瓦解了，蘇聯本身也就滅亡了。

試想蘇聯多少勞力，物資、金錢、製造了幾千幾萬顆原子彈氫彈。這些都是蘇聯勞動者的血汗，是蘇聯人降低生活水平製造出來的，這些如今成了一堆廢物！

在經濟突然繁榮以前，蘇聯人民的負擔本來已經重於美國集團的人民，在突然繁榮以後，更加重了若干倍，最後導致了亡國，這是冷戰的影響，但歸根究底還是突然繁榮的影響。

現在醞釀着一個大危機，游資無處投放，大量湧入中國，照此情況，再過幾年，中國生活也會大發展，美國有個經濟學家說：那時中國生產要超過歐美的總和。我想這話誇大了，果真如此，商品賣給誰呢？那時天下大亂世界革命二次浪潮就到了。可惜，我看不見。

不能再寫下去了。

弟超

1990年9月2日

超兄：

9月2日的信，收到很久，不曾早覆，因為原信放在那裏忘記了，遍找不獲。老人健忘，我似乎更甚。昨天，這封信終於自己從亂書堆中跑了出來。重讀一下，覺得有很多話要同你談。幾天前又看到你的近作：《嚮導七十周年》，神完氣足。決不像是個九二老人寫出來的。由此我深信你還會多活幾年。Pascal的*Pensées*是我的牀頭書之一；但我的寫札記並不是它引出來的。實在因為再無力氣寫長文，而腦子裏的思索卻不肯停，想到寫出，有如便急時的上廁所，排泄之後，一身輕鬆，而如何處理這不潔之物，就完全不在我的考慮之內了。札記預備死前燒掉，原因即在於此。

在《晚期資本主義》裏，曼台爾把馬克思的再生產計劃加以改變，我覺得很對。他說：

馬克思的再生產計劃分為兩個部分：第一大類包括生產手段；第二大類包括消費品。我們現在把這種計劃改變成三個部

分。在這兩大部分之外，增加一大部類，即第三大部類：生產破壞手段。我們作出這樣的區別是對的，因為第三大部類不像第一大部類和第二大部類那樣，它生產出來的商品並不進入生產物質因素的再生產過程（取代並擴大生產手段和已使用的勞動力）……（見《晚期資本主義》中譯本，323頁。）生產破壞手段的工業是自古以來就有的，但它在國民經濟中佔着如此巨大與如此重要的地位，卻是從第一次大戰後，特別是在第二次大戰期間，以及在冷戰時期確定的。它至少在一九四〇年代以後，就成為世界幾個主要國家（資本主義的與「社會主義的」）經濟中一個獨立的「部類」了。這個部類的生產與再生產的一個主要特點，就是它不是為市場而生產的，不是為了滿足消費者的需要；而是為了勝過事實上或假想中的對手，為了如何可以更有效與更大規模地破壞對方的人力與物力。因此破壞手段部門的生產和再生產，並不受消費市場的限制。正如盧森堡在第一次大戰後所預言：「武器經濟是一個代用的市場」（此語為曼台爾一篇文章中所引述，不知他引自盧森堡的什麼著作），它本身就是市場。因此，這個部門裏的技術革新，完全不受消費市場的影響。過去，資本家為了銷售已有的存貨，為了充分利用業已投放的固定資本，寧願把新的技術發明購買下來，秘而不用；這種情形，當武器生產成了獨立的一大部類之後，便完全沒有的了。為了克敵制勝，敵對雙方（最初在德國與美英之間，然後在蘇聯與美國之間），應用了所能動用的全部力量，去進行破壞手段製造的技術改進。這方面的改進，不要說曾經在四十年內增長了40倍，甚至可以說前進了400倍乃至4,000倍的。一顆核子彈的破壞力，比原先最大的常規炮彈的殺傷力，相差又何止40倍呢？破壞手段生產部門的日新月異的技術革

命，當然要影響到生產手段生產與日用消費品生產。事實也正是如此。第二次大戰結束以來，我們看見的無間斷的生產技術大變革，實際上只是軍備競賽與冷戰的副產品。從原子能釋放開始，中經自動控制，電腦，縮影技術以及鐳射等等，無一不是首先在軍事領域得到應用，然後以「副產品」的身份進入另外二大部類生產中去的。原先是市場需要促進技術革新；現在倒過來，由不斷的技术革新促成生產力的飛速生長。不斷增大的生產品需要不斷擴大的市場。怎麼辦呢？除了用傳統方法去爭取新市場之外，便是用盡一切辦法來人為地創造市場。曾經流行於戰後的凱恩斯經濟學說，我覺得，便是為了此一需要而發生的。我沒有研究過凱恩斯學說。（其實我也沒有能力去作詳盡研究。我不但是一個「科盲」，而且「經盲」。）但就我所得的印象來說，凱恩斯學說主要是提倡「寅吃卯糧」，不怕「打腫臉孔充胖子」。他勸人超前消費；主張無論個人與國家都不要害怕借債，應該儘量利用信貸以便個人提高生活享受，國家則放手投資，以便繁榮經濟，解決失業危機，藉保社會安定，國家富強。

如此造成的虛假的繁榮與景氣，當然無法持久。其敗象在七十年代，就充分暴露出來了。無論政府與個人都是債台高築，「前吃後空」，發出了第二次大戰及國際資本主義大危機到來的信號。於是在思想上，所謂「貨幣主義」的學派出來代替凱恩斯主義，它要想醫治凱恩斯主義所釀成的禍害：首先是要對付國家預算的天文學數字的赤字，要收緊通貨，要向工人階級的收入進攻，要削減四十年代以來所實行的巨額福利支出……所謂「列根哲學」，「戴卓爾主義」，便是要推行這些政策而出現的。結果如何，現在已經很明顯了：徒然加深了這個世界資本主義的大衰退。

蘇聯集團在冷戰壓力下的大崩潰，曾經給西方資本主義等國打了氣。彷彿資本主義國家的危機不但會很快過去，而且資本主義會本身萬壽無疆。但這正如美國的經濟學家 J. K. Galbraith 當時所警告：「別笑得太早了」。剛剛笑過蘇聯集團的土崩瓦解，自己家裏的危機很快達到了災難程度。那個破壞手段生產的重擔，也幾乎要把美英等國的經濟壓倒了。

今後將如何，那是另一問題，談起來很長。上面所說只是浮面地談了一下：1、為什麼戰後資本主義會造成生產力空前大增長的秘密？2、為什麼冷戰全勝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會陷於如此嚴重的危機？

回答上述問題，曼台爾曾經把上述意見與馬克思的周期性危機說，特別與康特拉系也夫加以擴充了的所謂長短波理論，聯繫起來談，這當然對的；但若光談長短波的理論，不着重指出最近半個世紀以來，「破壞手段生產」部類在國民經濟中所起的特殊作用，那是不對的，至少是不圓滿的——不足以回答上面提出的問題。

還有不少話想同你談，可惜我實在沒有力氣寫。上面這些不成品的東西，竟斷斷續續地寫了三個早晨。看看班兄和你合拍的照片，令我「既羨且妒」——假使我也能像他那樣，要來就來，要去就去，能在分離半世紀之後，和你重聚一室，促膝談心，該多麼好！班兄又在旅行中，目前大概在日本，不久去大陸，如到上海，一定再去看你。

今得春兄信，知你心臟病已愈，大慰。春兄對你的不肯戒酒，極不滿；但我的想法不盡同，黃酒三杯不致影響心臟；何況人生太艱辛，多少該找點樂趣。好像李白說過：「身後名，不及生

前三杯酒。」這實在是不錯的，可惜我不會飲酒，失掉了生活中一大樂趣。祝

好

弟方上

92年10月14日

10月20日

全身神經痛好了；但頭痛依舊，眼睛又壞了。白內障似乎增加了程度。讀報只能看幾個大標題，寫字超過一張稿紙，便什麼都看不清楚。給家人寫一封長信，3頁，前後寫了3天，吃力之極。外孫將於明年讀完大學。受了時下國內留學風氣的影響，畢業後也想出國深造。家人一再來信，要我設法，想明年一畢業就出來。她們完全不清楚外面情形，也不清楚我的生活情況。盲目崇洋，可悲也。

10月21日

中共剛剛開完第十四屆全國代表大會。

10月25日

倫敦20萬人大遊行，支持礦工，反對政府的經濟政策。一般的政治風向在轉，轉得有利於左派。湯尼·培恩說：他等待了十年的時機似乎到了。也許，至少，比之於1989年以來因史大林制度的土崩瓦解而引起的勞動群眾中的迷惘、頹唐情緒，那種認為資本主義制度將「萬壽無疆」的想法，正開始消散和轉變了。

11月3日

將近十天來無法寫一個字。身體不算很壞。能睡能吃，就是什麼事都不能做，感想也很多，例如德國綠黨創建人與女領袖比德拉·凱利的離奇的死，香港新總督彭定康的「民主」投機，英國保守黨政府的新危機，以及美國的總統選舉，都引起我的興趣，多少有些話想說；但是一提筆，頭痛欲裂。勉強集中，努力想把所思所想的記錄一點下來，人便昏昏然，好像整個人要倒下來，只好作罷。可是這樣活屍一般的生存，有什麼意義？倫敦的年輕朋友認為我應該稍稍來一點生活上的變化，到倫敦小住幾天。換個環境，暫時改變一下死板生活，可能對我目前那種活屍狀態有好處。他們的想法也許對。四整年沒有離開過里茲，確實悶極；但是真想旅行，問題又不少。等着瞧吧。也許，過幾天，我的精神狀態，我的低沉的情緒會好起來。

今天給阿忠寫信，要他暫時停止重印《雙山》的談判。

11月4日

克林頓當選美國下屆總統，這件事多少具有象徵意義，它標誌出列根—戴卓爾時代的一個終結。這個時代是二次大戰以來英美大資產階級向其他階級——特別是向工人階級利益進行反攻與進攻的最反動的時代。在這期間，戰後工人階級所爭得的一些權利和福利，都幾乎給取消光了。結果，大資產者，尤其是其中的金融資產階級肆無忌憚地掠取財富，勞動階級則日趨貧窮。貧富懸殊，結果，一方面生產品大量過剩，另一方面，消費者卻無力購買。加上隨冷戰結束而來的種種後果，資本主義世界發生了嚴重的所謂「衰退」。為要應付這個局面，資產階級不

得不換馬了。英國戴卓爾夫人被迫下了台。她的公然進行階級鬥爭的政策，代之以所謂「無階級社會」的馬卓安「主義」。在美國，列根「哲學」也就以同一理由代之以克林頓的所謂兼顧「全民利益」的新自由主義。二者目的相同，都是為了挽救目前陷入深刻危機中去的資本統治。

這樣的轉換，當然無助於勞動人民的真正解放；但至少，我想，會有利於一切傾向社會主義鬥爭的復興。

11月7日

十月革命七十五周年。莫斯科紅場禁人進入。據報導，約有2萬被禁止的共產黨人與國家主義者集會。

11月10日

葉爾春來英作為時2天的國事訪問。昨天簽訂了一個名為英俄「同盟」的文件，今天向英國的上下二院發表演說，然後由英女王在白金漢宮中「賜宴」。這待遇，戈巴喬夫未曾受過，葉爾春可以感到滿足了。其實，當戈巴喬夫幾次來英時，他還是二個超級大國之一的代表；葉爾春的這次訪問，卻是在俄國的政治與經濟地位都已一落千丈，他是以求乞的姿態前來的。何以英國的統治階級對戈巴喬夫的接待會遠不及對葉爾春的隆重呢？主要理由：前者對社會主義還藕斷絲連，而後者則成為十十足的「反共義士」了。

其實說「隆重」也帶着諷刺口氣的。英國的報紙根本沒有把它當作重要新聞來處理。葉爾春的演說，據《衛報》擇要轉述，有如下一些比較值得注意的話：

在為時 40 分鐘的演說中，他一再提到俄羅斯和不列顛在長達數十年的對抗之後，現在締結的友好聯繫。他說：「冰山正在飛速融解消失。」「千百萬俄羅斯人經歷了漫長的瘋狂年月之後，正在恢復過來。」

「不過現在還不曾痊癒。我們必須直截了當地承認，在我們的國家裏，還存在一些勢力，它們要實行一個復仇性的政變。他指出這些陰謀政變的是「以前共產黨的餘孽，以及那些國家精英，好鬥的國家主義者，傳統的共產黨管經濟的那些經理們，再加上政治的冒險家們。」

葉爾春說，這些分子正在利用俄羅斯（目前）的經濟困難。不過他堅決保證，「這些計劃是命定着要失敗的。」

接着，他提出了警告：「如果必要，我會應用人民交託給我的權力。」這話的意思是說：為了保證俄羅斯能夠轉變到自由市場的民主制度，他準備運用那些緊急處置的權力。（見《衛報》1992 年 11 月 11 日 Hella Pick 的文章。）

其實，葉爾春未曾應用他的緊急權力，非不為也，是不能也。今天的俄羅斯，從各方面的對抗力量來看，葉爾春是否能做成俄羅斯的莫索里尼，還得經過漫長，錯綜的幾場鬥爭來決定的。

有人說，一年前，即當 8 月政變直後，葉爾春要想掌握緊急權力，比目前容易得多。這話有幾分理由。主要因為：一年前，俄羅斯的人民大眾還只看見史大林主義統治的罪惡，還一味憧憬着西方世界的自由民主。一年來俄國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中所發生的種種，卻讓廣大的俄羅斯人嘗到了自由市場的味道，又見到了西方的危機和動

盪。人們的情緒和思想都大大不同了。失勢的史大林主義的官僚們自然要利用這個民眾的情緒轉變，企圖恢復往日的權勢，而一般的勞動大眾，多半會對資本主義的復辟發生愈來愈多的顧慮，反感，因而會發生反對葉爾春們肆無忌憚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復辟了。在立陶宛，在保加利亞以及在俄羅斯，這種舊共產黨人（包括過去史大林派的官僚與不自覺的誤信史大林主義為真正社會主義的以前共黨的群眾）的「復仇運動」，已見到端倪。

如何把後一類群眾和以前的官僚領袖們區別開來，使前者能走上既反史大林主義、又反資本主義的革命道路，是我們托派的首要任務。把過去所有的共產黨人，不分領袖與群眾，不分自覺的史大林主義官僚與不自覺的（即不自覺其為史大林主義者的）普通黨員，一概加以反對和排斥，那只能一方面的對史大林主義，另一方面對資本主義幫倒忙。

……

葉爾春於「御宴」之後，對記者們說：「在宴會席上，我（和女王）像多年老朋友似的談天」，女王不但接受了訪問俄羅斯的邀請，她甚至還告訴我們，對於她的來訪，我們毋須等待很久的。（見同上引文章。）

葉爾春應該感到遺憾的是：他不曾像波蘭的瓦文沙總統一樣，被邀請在王宮中的龍牀上過夜！

沒有睡進龍牀，葉爾春夫婦住了二夜最近美國女歌星麥唐納睡過的海德公園旅館的套房，房價每夜 1,762 鎊！用目前盧布的匯價計算，這筆房金該達到天文數字了。

11月18日

香港問題又引起了人們的注意。要英國放棄大英帝國皇冠上僅存的一粒寶珠，實在是千萬分的不願意。從「三個條約有效論」退讓到84年簽訂的中英協議，在英國的傳統的統治者看來，實在是一種「恥辱」。總覺得退讓得太多了。有些人，一直認為當時的政府負責人（當然戴卓爾夫人除外），把共黨統治的中國力量估計得太高，覺得他們犯了「恐華病」。特別是那些與香港有關的英國職業外交家，受到這一類的指責。

天安門屠殺是一個關鍵，使那些原本主張對華強硬的一派抬起頭來；跟着發生於東歐和蘇聯的戲劇性的變化，更大大加強了這一派的信念。他們覺得縱使不能全部推翻84年的中英協議，至少要想辦法來保證97年後英國在香港能保持更大的政治影響與經濟利益。把保守黨的原主席彭定康去替換職業外交家衛奕信，主要就是要實行這個計劃。

這個計劃，簡單的可以稱之為圖謀把97後的香港成為另一個新加坡。彭定康走馬上任時一切戲劇性的舉動，都表示出英國的這一企圖。顯然，他們想把李柱銘變成香港的李光耀，想使歸還主權給中國以後的香港，能在事實上，即使不在名義上，成為大英聯邦的一個小夥伴。

香港的「民主派」當然十分願意配合英國這個新計劃，十分願意扮演李光耀這個角色。

北京在英國的此一新攻勢之前顯得非常狼狽。四十多年中共倒行逆施的官僚統治失盡人心，使不小一部分的中國人發生了「時日曷喪」的感情。甚至發生了「甯做洋奴，不做共奴」的想法。這使得中共再

想求助於民族主義的法寶而不靈了。在「民主」，「人權」的攻勢下，「民族尊嚴」與「國恥的歷史」等等都顯得蒼白無力：更何況中共目前實行的開放政策，已完全沒有反帝意味的了。

這當然也不是說，英國目前採取的香港計劃將會如願實現。相反，一定是枉費心機的。

無論從什麼角度看，香港不等於新加坡；中國不等於馬來西亞。而且，當澳大利亞與加拿大這些國家都想脫離英聯邦的時候，如何能促使這個終究不是由恩格魯·薩克森人組成的「島國」香港保留為英聯之一呢？

我在香港的朋友們在這個問題上似乎有點落入彭定康的圈套，這是應該警惕的。我們要求民主，不但在香港，而且在整個中國；同時卻必須步步揭穿港英當局的「民主」把戲，把他們隱藏在這個口號下面的禍心揭露出來。也要把寄託希望於港英的，希望建立新加坡式的「獨立與民主」局面的香港民主派的企圖揭露出來。

……

今天收到了白克曼寄來的一本破爛書——1939年我們在上海「盜印」的伊羅生的《中國革命的悲劇》。白克曼是從一位托派同情者購得的。這位同情者名叫塞爾頓·奧斯朋，當年是柯立芝總統郵船上的一個水手，航行到上海，經過美國托派組織的介紹，會見了當時正在上海的李福仁（弗朗克·格拉斯）。李福仁交給他一本剛出版的《悲劇》，要他拿到美國去。他回國後，將書交給一個同志，自己卻給船公司「炒了魷魚」。因為他在李福仁的公寓裏住了一夜，次晨遲了一些時候才回到船上。當時我記得會過這個人，談了一些話。談些什麼，事隔半個多世紀，已經記不得了。

《悲劇》的上海「盜版」書，記得一共只印了 100 部，是我託汪孟鄒先生介紹，由群益書局代印的。這是未經作者修改的本子，其中有老托的長序。這個第一版目前已經少見，它的「盜印」本更是絕無僅有了。其中一本，經過五十四年的轉輾流傳，竟又轉到我這個經手「盜印」的人的手中，不能不說是奇緣。

11 月 22 日

讀《列寧全集》，無意中翻到了第 22 卷中的一篇文章：〈論尤尼烏斯的小冊子〉。尤尼烏斯是盧森堡的筆名，小冊子是《社會民主黨的危機》。列寧十分稱讚這本小書，說它是「一部優秀的馬克思主義著作」；但「為了進行馬克思主義者不可缺少的自我批評」，他指出了小冊子中兩個錯誤。第一個錯誤，作者沒有提到社會沙文主義同機會主義的聯繫；第二個錯誤，在於作者認為在帝國主義的環境中，民族戰爭已不可能或不可能終於貫徹的。

列寧批判了這兩個缺點。在所有提出的反駁論據中，最讓我感到興趣的是下面這些話。

大家知道，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基本原理是：自然界與社會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條件的和可變動的，沒有任何一種現象不能在一定條件下轉化為自己的對立面。民族戰爭可以轉化為帝國主義戰爭，而帝國主義戰爭也可以轉化為民族戰爭。例如，法國大革命的戰爭起初是民族戰爭，而且也確實是這樣的戰爭。這些戰爭是革命的：保衛偉大的革命，反對反革命君主國的聯盟。但是，當拿破崙建立了法蘭西帝國，奴役歐洲許多早已形成的、有

生存能力的民族大國的時候，法蘭西的民族戰爭便成了帝國主義戰爭，而這種帝國主義戰爭又產生了反對拿破崙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戰爭。

只有詭辯家才會根據一種戰爭可以轉化為他種戰爭的理由，來抹煞帝國主義戰爭和民族戰爭之間的差別。辯證法曾不止一次地作過——在希臘哲學史上就有過這種情形——通向詭辯法的橋樑。但是，我們始終是辯證論者，我們同詭辯論們鬥爭時，所使用的手段不是根本否認任何轉化的可能性，而是對某一事物及其環境和發展進行具體的分析。（見《列寧全集》22卷，302-303頁。）

當1940年我提出「抗戰變質」的意見時，根本不曾見過列寧這篇文章。由民族戰爭轉化為帝國主義戰爭的一部分這個事實我是從當時的具體情況中看出來的。可從來不曾想到過帝國主義戰爭也可以轉化為民族戰爭。列寧的這一見解值得深思。

11月24日

路透社發自喬其亞首都的一則新聞：過去曾任蘇聯外長、戈巴喬夫的老搭檔、長期擔任喬其亞共黨領袖，目前擔任喬其亞議會議長的謝瓦那次，宣佈改信基督教。在喬其亞的電台上他宣佈：最近在教堂受了浸禮，放棄他信仰了數十年的無神論。他說他的辦公室裏現在供了聖母瑪利亞的神像。代替過去牆上掛的史大林相片。

「哈里路亞！」

11月25日

《衛報》上一段小新聞：「一架屬於華南航空公司的波音七三七號噴氣機昨天由廣州起飛，在桂林附近失事。機上乘客141人，恐已全部死亡」。這消息讓我十分不安。前幾天得芬·楊生的南京來信，說他將於本月23日飛桂林。但願他不在這架機內！

11月28日

給老超寫的長信中我說我是「科盲」，又是「經盲」，有的朋友見了說我「謙虛」。非也。這是實情。我一見數字就頭痛，拿起一本經濟學書來會睡覺。自己深知這個毛病，幾次立志糾正它；但因這習慣（或者可以說「趣味」）孩子時代養成，「積習難返」了。不懂得科學，不懂得經濟學，根本就不能成為紮實的馬克思主義者。我深深知道這一點，但不能做到這一點。這該是我的一生憾事之一，是最大的憾事之一。

可是，倘若有人因此而說我根本不配做一個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者，那我決不能接受這個非難。馬克思主義是多方面的。很少幾位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者能夠在所有方面都具有足夠的馬克思主義的知識。馬克思主義有似一座巍然聳立的高山，有通往絕頂的，乃至登上半山許多途徑。人們可以循着各條途徑，憑各人具有的力量和決心登上某一高度，成為某一程度的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者。一百多年來真正稱得上全面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少而又少。大多數是幾分之幾的——甚至有更多的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者，都只是「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罷了。然而沒有這一大批的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者，社會主義的與共產主義的革命是絕對不能成功的。

我究竟是幾分之幾的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者，究竟我是循着哪一條山徑爬上這座高山，很難說。首先我想是由於我所生息的時代和環境，又由於我從來看慣人間不平的性格吧。至於知識方面，我覺得，在政治分析與觀察上，在思想的辯證應用上，似乎最容易理解和體會馬、恩、列、托幾位大師的著作。

12月1日

晨起，頭腦比較清新，讀隔日《衛報》，又是維多·基根的「經濟學札記」引起了我的興趣。他說：「幾乎恰好在戴卓爾夫人當權的那幾年間，真正的經濟奇蹟不曾發生在聯合王國，而是發生在東亞孔夫子（思想統治）的那些經濟圈裏。」他說，「從外匯儲備方面說，台灣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又說，「在以高技術奠定經濟基礎方面，新加坡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領先」。跟着他說：「當日本的經濟增長正在放慢之時，中國的實際國民生產總值在過去的十四年裏每年增加了14%。」他跟着問道：「正當舊蘇聯的經濟幾乎全部在快速縮小的時候，中國怎麼會以更大的速度來擴張她的經濟呢？」終於他告訴我們說：「在某種程度內，中國已經是世界上第三位的經濟大國（當然不能把她的龐大人口計算進去，即不能以每人平均的所得來算了。）」

基根的計算容有不確處。其中頗有「危言聳聽」的成分，他想拿來刺激，或鼓勵西方世界，特別是英國的政治家和企業家的。他的目的之一，可能是想給英國的緊縮政策，福利削減政策提供一點理論基礎。最近英國《經濟學人》雜誌不斷寫文章來吹噓中國經濟的起飛，其中理由之一，我想多少含有那種以「黃禍」來刺激西方的用意。美國的當選總統克林頓，我想也會在這方面大做文章。蘇聯崩潰，冷戰

結束，中國這隻棋子在國際力量的重新結合的過程中究竟將放在什麼位置，確是最近將來國際政治中的一個大問題——是值得充分研究的大問題。不過目前，我更想考慮的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現狀和前景。關於這個問題，說來話長，今天沒有力氣寫了，留待日後。

12月6日

芬·楊生漫遊歸來，帶了許多相片和一卷老超的錄音帶來看我。聽了睽違四十多年的老友的聲音。看了大量圖片，感慨很多：又說了兩個多鐘頭的話，疲倦極了。

12月18日

轉錄了老超的錄音講話，接着又錄了一段我給老超說的話。錄音帶郵寄給老樓，讓他在後面也錄幾句話，然後寄回給老超。這是四十三年來，歷盡種種艱難後，三個老朋友舉行的一次隔洋談話。

12月23日

讀完班著的《中托史試探》，有些意見與補充，預備與他當面討論。大體上很不錯，對中托的評估是從大處着眼的。但彭門子弟讀了一定會大吠，因為他對老二並不像這些子弟們那樣吹捧。

這幾天正在思考一個問題；不斷革命斷了，怎麼辦？現在沒有力氣寫。過幾天，等我身體好些，得把我的大體想法記錄一點下來。

又是耶穌誕，災難！

12月31日

1992年除夕。我又偷生了一年。回顧過去的一年中，簡直什麼事都不曾做。長壽實在不是幸福，於人於己都不好：於人是給他們增加負擔、於己是延長疾苦。「人生七十古來稀」，這是感嘆還是讚美，我不能確定；就我個人的體會說，未及七十而逝，應該是一種幸福。

1993 年

1 月 1 日

元旦照例寫幾句感想；可我似乎已經感覺麻木，好像已達到「忘言」的地步。

幾天來的天氣一直不好，今晨卻陽光燦爛，可能預示着新的一年不再像過去一年那樣的「可怕」（英女王的話）了吧。

1 月 3 日

前天起，開始校閱班兄翻譯並注釋的《獨秀最後的書信與論文》。

昨晚得懷耀電，說 Y 君已來英，將於下星期三來看我。

1 月 8 日

陳清華於 4 日來辭行；今日離此返倫敦，將於 19 日飛回香港去。此人於政治方面所知不多，但品性不差。肯讀書，對於我們將來的事業也許有多少幫助。

6 日 Y 君來，依然老樣子。他表示對陳獨秀有興趣，大概將奉陳作他本人的榜樣，為時下的民主派張目吧。座談了三個鐘頭，「言不及義」。臨行前要了超的回憶與我的譯文小冊去。

最近二日又為樓上樓下的音樂所擾，日夜不安。他們二人從事「音響戰」，我夾在中間，作為此戰的受害者。二人都不可理喻，無力與他們爭鬥，煩極，想請求房東調屋。

1月15日

房東派人來談話，結果很好，答允為我設法遷居。不過真的搬家，問題不少。自己沒有力氣，事事得靠人幫忙。

春寄來戴晴等在美國召開的「王實味研討會」的報導。文中所記的一些教授與學者們發表的議論，莫名其妙。國外研究王實味最早與最切實的學者應推班國瑞；但他未在邀請者之列。捧王實味而排拒托派。這些所謂民主派的學者們根本就失去了斥責史、毛派殺害王實味的道義上的資格。

1月20日

美國第四十二任總統克林頓就職。在過去二周中，行將退位的美國布殊總統發動了對伊拉克的轟炸。理由是伊拉克沒有遵守聯合國的諸項決議。布殊此項行動的動機為何，評論家諸多猜測。有歸因於布殊的個人心術的，有解釋為薩達·胡賽因乘機搗亂的結果的……我覺得，這件事告訴世人以一項最重要的慘痛真理的，是：今後在一個或長或短的時間內，這個以最新技術武裝到牙齒的美帝國主義者，行將在自由、民主、人道以及市場經濟的旗幟之下，利用聯合國名義，扮演國際警察的角色，在世界範圍內鎮壓一切對所謂「世界新秩序」的反抗運動——不管這運動是革命的，改良的，甚至是「反動」的。

克林頓必然要繼續這條路線。

1月23日

今天是癸酉年元旦，得滬宅家書，見豐豐學習的成績很好，非常高興。窮苦困頓人家的孩子總比較肯努力。外祖母與他母親的一番苦心，總算沒有白費。

讀前天《衛報》上的一篇香港通信。談到李光耀的議論，很感興趣。

這個二次大戰後東南亞最狡猾因而最成功的政客，對於如何實行民主的看法，似乎比時下一些無論偏左或偏右的所謂民主人士，都更加「高明」。目前實行在歐美一些先進工業國家的民主制度，決不是憑空發生的，它不是按照某一思想家定下的民主方案而實施的。相反，它是歐洲十六、七世紀以來，新興的資產階級以及跟在他們後面的勞動民眾，經過許多次鬥爭、革命而逐漸實行出來的。它們是各國具體的社會結構演進的產物，是各國具體的階級鬥爭的結果，因此，——

2月1日

上面這段話突然讓房東允許我換屋的事情所打斷了。心一亂，什麼都寫不出來，只好等搬家的事情解決後再續下去。81年4月搬到現在住的地方，沒想到會一住十二年，更沒想到住了這麼久之後還得搬遷。我一向怕動，如今年老力竭，什麼事都得靠人，更加害怕變動。誰知那些吵鬧的鄰居竟迫得我非搬不可！

令方偕其男友傅大為來訪。歡喜之極，我又犯了老毛病，只管搶話講，結果大概使客人討厭，我自己倦極。積習難返，真是無法可想。傅君給我的印象較預料的好得多，為令方慶幸。

2月13日

連日準備搬家，精疲力竭。全靠道拉幫助，大致已無問題。前晚懷耀來電，云本星期日（即明日）午後將來此協助，有他在場，大概可以順利完成了。昨夜睡得不好，今晨頭暈腰痛。

2月14日

得道拉、倪小姐、佛蘭克蘭之助，復得懷耀偕其內弟阿剛由倫敦前來協助，一切順利進行。下午1時開始，約歷2小時，全部書籍與家具已移入新居。6時就寢，頭痛且暈，卻無法入眠，夜10時許雙腿抽筋，痛極。午夜後昏昏睡去。

2月21日

遷入新居已滿一周，我還是疲倦之至。今晨勉強寫了二信。頭痛得無法支撐。天寒，開了暖氣仍覺難耐。對新居已逐漸習慣。

2月23日

知人難，知人而能有所警惕更難。我常覺自己有知人之明，但往往因感情作祟，未能始終一秉此一明察而與人交往。

讀《實庵自傳》，最欣賞老陳的那一點自剖：

有人稱讚我疾惡如仇，有人批評我性情暴躁，其實我性情暴躁則有之，疾惡如仇則不盡然。在這方面，我和我的母親同樣缺

乏嚴肅堅決的態度，有時簡直是優容奸惡，因此誤過多少大事，上過多少惡當，至今雖然深知之，還未必痛改之……

我性情不暴躁，但對奸惡卻同樣缺乏嚴肅態度。性情溫和而不能疾惡如仇，其結果就更不堪設想了。

3月1日

是十八年前的今天來到英倫的。閉眼一想，情景宛然。

翻閱前天的報紙，發現《衛報》上轉載戈巴喬夫發表在意大利 *La Stampa* 報上的一篇文章，紀念將於下周來到的史大林逝世四十周年。文章並無深意，只是有幾句話引起了我的興趣。他說：

1987年在我為紀念十月革命七十周年而作的演說中，我說：「史大林知道這些（鎮壓），他不但知道，他還直接參與這些鎮壓的。他的罪孽無可爭辯，也無可饒恕。」但是我又說史大林保衛了列寧主義。今天我的看法相反，我相信：史大林是背叛了列寧主義。（見1993年2月27日《衛報》。）

T AND ANALYSIS

The legacy of a monster that refuses to die

Stalin died forty years ago next week. **MICHAEL FORBACHEV** remembers him

When I was a young boy, I remember seeing the first of the victims of the repression of the 1930s. It was my maternal grandfather, and great, I suppose under several other names, but he was killed. He speaks about it only once, when I was eight years old. The author writes: "When I was 12, if I hadn't done it, I would have been under suspicion. The step taken by Khrushchev was later to be seen as the only one that showed it would have been impossible to imagine everything that was to take place in the future. It was a mistake, but at the time it was even more difficult than for me, many years later. The country was still in the throes of Stalinism. It was the only way to kill the monster."

Stalin died forty years ago next week. I remember seeing the first of the victims of the repression of the 1930s. It was my maternal grandfather, and great, I suppose under several other names, but he was killed. He speaks about it only once, when I was eight years old. The author writes: "When I was 12, if I hadn't done it, I would have been under suspicion. The step taken by Khrushchev was later to be seen as the only one that showed it would have been impossible to imagine everything that was to take place in the future. It was a mistake, but at the time it was even more difficult than for me, many years later. The country was still in the throes of Stalinism. It was the only way to kill the monster."

戈巴喬夫在文章中說，「一個人的成熟是逐漸完成的」。再過一些時候，戈巴喬夫的思想是否會成熟到這個程度：宣佈在史托二人的鬥爭中，是托洛次基保衛了與繼承着列寧主義呢？絕不可能！

3月14日

俄羅斯的危機又在總統和國會之間的鬥爭中爆發。史大林主義的統治崩潰後，這個國家的政治和經濟危機一直在擴大和加深，看不見有任何轉機徵兆。反觀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天安門屠殺以後，三年多來政治上顯得穩定，經濟上有巨大增長。中俄二國近況在相比之下，人們會得什麼教訓呢？

老牌的史大林主義者多半會告訴我們：要統治像俄羅斯和中國那樣的國家，那裏一般地沒有民主傳統，那裏原有的經濟基礎比較薄弱，要想使政局安定，經濟發展，除了用極權、專斷的統治之外，別無其他辦法。

戈巴喬夫也許在後悔當初不曾順從那些8月政變的軍政領袖們的計劃，出來捉回那些被他從瓶子裏放出來的「民主」精靈們，實行一次蘇聯式的、流血或不流血的天安門事變吧。

葉爾春和國會裏的各派頭頭們，事實上已各自在準備建立自己的獨裁制，藉以實施各自的「民主改革」了。

過去是用個人獨裁來建設「社會主義」；現在要用個人獨裁來建立資本主義。這是歷史的嘲諷，是人類——特別是那些落後國家的人們今天所遇到的似乎無可避免的悲慘命運。……

3月22日

上面這段話，因為頭痛，沒有寫下去。一擱數天。今天讀早報，知道葉爾春和國會之間的爭權已有了新發展。葉爾春決心要做拿破崙第二。我很早在他身上看出莫索里尼的影子。今後在各美、英、法等幾個「民主」國家的幫助下，他是否能做成 Il Duce 呢？等着瞧吧。

3月23日

來了個不速之客，什麼工作都給打斷了。

4月15日

那位客人終於昨天走了。待客期間，什麼事都不能做。連報紙都無法讀。和這位客人是第一次接觸，過去彼此知道，思想上似乎也接近。去年秋天曾來小住二天，給我的印象不壞。可是這回住久了，發見我與此人之間不但有無法逾越的「代溝」，而且屬於大不相同的性格。在不小程度內，他是青年中多少帶有反抗性的一群的代表。他們完全不曾受到中國舊道德的薰陶，卻也沒有西方倫理規範的束縛。他們不曾繼承二者的優良傳統，卻充分沾染了西方資本主義的不良習氣，同時保留着中國一些落後的成見和習慣。

不過我還是對他存有希望的。他資質好，愛讀書。也許將來還能給我們的共同事業作些少貢獻。

寫完行將出版的《雙山》新版的序。這是用子春名義，以他的立場來寫的。寄港盼他能接受。

4 月 20 日

將子春為新版中文《雙山》寫的「序言」改寫了一下。前三天寄出，希望他看了能夠同意。

連日又續譯《雙山》書評。

心情逐漸恢復平靜；可是得德友信，他將於本月 28 日來訪！做人實在辛苦。送往迎來，毫無意思。

4 月 24 日

得子春短簡，知他於本月 17 日中風入院，不能言語。看來，我們這一輩人是真的走到盡頭了。十年來，我早有這樣的心理準備；但一旦真的來到，仍不免有甚大感觸。子春與我的交誼，太長太深，「萬言」難盡；最近代他草擬的序言，多少是表達了一些的；只不知他病後是否能讀，讀了又作何感想。

代擬的序言附在這裏。

4 月 26 日

據報導，俄國的「全民投票」結果；葉爾春獲勝。莫索里尼的道路又走近了一步。

4 月 28 日

魯道夫·賽加爾偕夫人來。這是他第四次來里茲。第一次來談德文《老托論中國》一書的長篇導言。這篇導言是由比艾爾·佛朗克推

薦、讓我來寫的。第二次來是為了想譯我的回憶。第三次來談超麟回憶錄的德文翻譯。這次來，主要是同夫人來渡假，乘便又談了獨秀最後書信及論文的譯事。魯道夫是我來歐後相識的最可親近的同志之一。格雷之外，他是最密切的文字合作者。我們是屬於同一輩的托洛次基主義者。彼此身上都可以發現很多共同點。這種「前輩風範」，不知能在我們的後輩同志們中保持一些否！

5月1日

美國《紐約時報》前駐莫斯科記者 David Shipler 寫了一篇論俄國前途的文章。他預言了四個可能前途：1、變成「獨裁性的國家」；2、俄羅斯聯邦解體，發生戰爭；3、民主與市場經濟；4、得過且過，一團糟，全無出路。此外，他認為別無前途。他完全排斥共產黨復辟的可能。

這位記者和其他所有的俄國專家們一樣，把史大林主義制度完全等同於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

其實，依我之見，在某種獨裁制之下全盤恢復資本主義（即該文所說的第一與第三這兩個前途的合併），自是今後俄羅斯最大的可能出現的前途。但也不能完全排斥史大林主義制度在某一形式中復活；更不能排斥在長期痛苦的「改革」過程中，配合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政、經危機的加深，俄國勞動大眾有重新發生追求真正的、亦即民主的，反特權的社會主義的願望，從而造成俄羅斯的第二次十月革命。

這個前途顯然不可能很快實現；但絕對不應該完全排除於諸般前途之外。俄羅斯的真正出路，恰恰只有這個前途。

從俄羅斯前途的推測來看今天的中國，來看她現正處於怎樣的狀態中，推測它最可能的實現是什麼前途，倒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問題。

5月18日

這幾天讀了第四國際為準備明年召開第十四次大會而起草的一個文件：*Building the International Today*。相當失望。教派態度當然要不得，但是完全放棄自己傳統，企圖在一些非常起碼的政治要求上統一起來——至少把自命為托派的所有派別統一起來，非但不可能實現，即使實現了也不一定是好事。這是我初讀文件的一個印象，希望不久能再仔細讀一遍，也許它沒有我初讀時所得印象的那麼壞。如有力氣，希望能把再讀時所得的意見寫下來，跟朋友們討論。

5月28日

友人借給我一本曼台爾的新著，《權力與金錢》。才讀了那篇導言，覺得很好。準備慢慢把全書讀完。我從來讀書慢：人家一目十行，我卻是十目一行，尤其近年來，腦子不能集中，記憶力大大衰退。讀過的書留不住一點印象。這次預備隨讀隨記，希望多少能從這本書裏得到點新的知識。

曼台爾自是一位會寫文章的人；但我每次讀他的文章，總覺得不夠暢達，不夠通俗，有時嫌他太愛「掉書袋」。和列、托相比，在這方面曼台爾確實差得多。列、托的文章，很少從別人的文章出發，而總是從直接分析或批判事物出發。因之他們的文章有力，易懂，其中可以說句句有用，無一廢話。曼台爾似乎帶上太多的學究氣與書生氣。

在這一點上，陳獨秀與毛澤東都比他高明得多。

5月29日

得瑪丁娜寄來咭片，上面有曼台爾的問候：「最佳祝願：祝您長壽，長壽！」感情可感；但是長壽而不能工作，長又有何用，徒然苦了自己，累了別人。

6月8日

多半是身體愈來愈差之故，這札記簡直是無法繼續了。書報還是多少讀一點，看了也還是有點感想；但總是無力把它們寫下來。原本打算把第四國際的討論大綱仔仔細細重讀一遍，只因呼吸困難，無力寫。看來，此事只好算了。

白克曼寄來了一本大書：《國際托洛次基主義》。全書共1,123頁，著者 Robert J Alexander，美國 Rutgers 大學的退休教授。內容是記敘 1929 年至 1985 年全世界各國托派活動的歷史。以一人之力，寫了這麼一本「百科全書式」的大書，確不容易。

翻閱了一下中國部分，這卻使我非常失望。他完全依靠一個名叫米勒的彭述之的美國朋友所提供的材料，將中國托派歷史簡單寫成為彭氏夫婦倆的「豐功偉績」。陳碧蘭那篇一派胡說的文章：〈回顧與彭述之相處的二十年〉，成了他寫中國托派運動史的主要根據。「吾不欲觀之矣！」

班要我寫一篇文章來批評，我不能，也不願。把十分有限的力氣去批評如此糟糕的作品，不值得。陳碧蘭的狗屁文章，我早已批駁過了。

6月10日

赴醫院檢查眼疾，結果很好：白內障並不嚴重，今後只要一年檢查一次就行了。

最近二星期來為乾草熱所苦。鼻子大成問題：一會兒清水直流，一會兒此路不通，尤其在夜裏，鼻腔根本無法呼吸。以口代鼻，辛苦之極。我懷疑這不是什麼乾草熱，而是鼻腔害了比較嚴重的毛病。明天想去看醫生。只是一來一往，實在吃力，有時覺得得不償失。

晚聽收音機，聽到一位著名諧星在談笑中死去。羨慕得很。

7月1日

乾草熱一直害苦了我，夜不能眠，白天就什麼事都不能做。不看報，不回信，更不能讀書，迷迷糊糊地過日子，活着有什麼意義呢？

7月9日

今天身體似乎好一點，兩條腿能比較輕鬆地走幾步路。腦子卻仍舊一片混沌。前幾天得老超寫的一篇近作：〈記謝澹如〉，甚好。他真是「人瑞」。簡單給他寫了一封回信，其中有這樣的話：「歌德說，一般人都只有一個青春期，而少數人卻有第二個青春期，你該是這少數人中的一個」。又說：「讀着你的文章，決不相信作者的年齡是九十有三，應該是三十有九。」其實，老超20、30歲時，寫的文章遠不及他八九十歲時寫的。理由：《嚮導》和《布爾雪維克》上的文字是奉命而作；而近年來寫的卻打從自己心中出來。文字，特別是文學性的文字，實在不能遵循任何路線的，不管這條路線是進步或者反動。

7月11日

翻閱舊書報，翻出了1958年8月間記的一些札記，其中有幾則還有點意思，轉錄於此：

一

午後讀惠德曼詩，發見有一節頗好，意譯如下：

勝利是偉大的嗎？
是的——但我如今卻以為，
到了無可奈何時候；失敗是偉大的，
死與悲苦是偉大的。
(《草葉集》，310頁)

世間事，確有「偉大的失敗」，正好如有「渺小的勝利」一樣。拿長久的歷史尺度來衡量，許多真正的傑出人物，都可說是短暫的失敗者，是長遠的勝利者。

二

白鴿巢花園裏有葡國詩人賈梅士的衣冠塚，墓碑上有這樣一句話：

希望這些塵土裏含有我們偉大詩人的微粒。

從來有不少藝術家和詩人都是不知葬身之地的。最著名的有如莫笏德和白萊克。

可為什麼一定要有葬身之地呢？

三

意大利著名的歌劇作者凡爾第寫過這樣的話：

I am extremely frank, decided, sometimes irascible, even savage if you like, but never touchy as precious. I have been working constantly now for years and I have never sought publicity, nor begged a friend, never courted rich people to achieve success. Never, absolutely never! I do my operas as well as I can, for the rest, I let things take their course without ever trying to influence public opinion in the slightest degree.

If the artist has strength to stand up against the current of opinion and keep straight ahead on his own way, he will be safe ... he will not fail if he is armed with heavy, shield of indifference and conviction.

沒有特立獨行的精神，沒有我行我素的勇氣，任何事情都做不成的，更不必談偉大的創作了。

四

有一張自 1949 年至 1953 年我寫電影劇本所得的稿費賬單，可惜殘缺了。但多少記載了我在那幾年中的生活來源。

1949 年

沈家莊得稿酬 2,000 元（法幣）

火煉 3,000 元，末路英雄未得稿酬

1950 年

三人行 1,500 元（以下均為港幣）

1951 年

朱老師 3,500 元

1952 年

同林鳥 3,100 元

1953 年

補收末路英雄稿費 600 元。

自從 1949 年因數春進入文華電影公司關係，我開始試寫電影劇本來維持生活。從上海到香港，最後到澳門，這期間，我一共寫了十多個劇本。最可惜的是因為種種關係，除了一個《南北和》之外，沒有一個拍成電影。其中最可惜的是《母女倆》這個劇本。一切拍攝的準備都弄齊了，卻因為導演費穆死去而停拍。

現在這些劇本都已不知去向。精力全部浪費。

7 月 14 日

子春寄來了一張我自來著或譯的書籍單子，預備作為附錄，放在新版回憶錄後面。這個書目當然不完全。我憑記憶，給他擬的書目補充了一些，一共竟有大小不一的三十多種。我反對把這樣的書單用作回憶的附錄。理由很簡單：一、這些書大多是譯作，譯的目的又主要為的是錢（因此我時常署名「惠泉」）；二、我從心底裏反對無聊的自我吹噓。

本年 4 月份取消人頭稅，改行「市政局稅」。四個月來，我收到了 3 份繳稅的通知，第一份要我每月繳 35 鎊；第二份，31 鎊；第三份，前天收到，要繳 57 鎊。如果這裏沒有弄錯的話，新稅比舊稅高出 10

倍！這是不可思議的，因為人們反對人頭稅，為了它太不近情理。代之以「市政局稅」，為了平息民憤，據說它比舊稅合理得多；可是從我的情形來看，它卻壞了 10 倍。我曾一再去信抗議，請求審核，卻均無結果。今天班兄給我去電查問，據說因為電腦壞了，此事擺了烏龍。按新稅規定，原來我根本不需要繳一文錢的市政稅。

新技術給人類帶來大量好處，但它也給帶來了不可想像的害處。

8 月 4 日

二十多天沒有寫筆記。精力真的是愈來愈衰竭了。小毛小病是經常有的，只是過去遇到頭暈腰痛時，多少還能寫幾個字，這回腰痛，並不比往常更嚴重；但是什麼都不能做……

終於收到耀忠寄來的回憶打字稿。略略看了一下，錯得很多。這樣的校樣無法請人幫忙，只好自己來。

9 月 3 日

耗了將近一個月時間，校改了回憶的全部稿件。今天寄出最後一份「書目」。過去一月內竟無力寫一個字札記。一月來每天早晨勉強集中腦子，校改若干頁，人便昏昏欲倒。有時覺得天旋地轉，立即躺下，準備更壞的現象出現。還算好，每次發生這種情形，只要閉眼睡幾分鐘，昏眩就過去了。看來，我還得活幾年。

今晨得超信，他祝我能活到他的歲數，也就是說，我還得捱六年。可是我實在已感到萬分疲勞。希望能早些休息。

9月7日

湯姆生（E. P. Thompson）死了，報紙上的反應遠遠不及一個普通電視演員之死所引起的。英國是出人才的國家；但這裏的上層社會對人才的重視卻不會比中國好許多。特別是對於那些左派的人才。

很遺憾，湯姆生的大作《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我拿起放下地讀了好幾年，卻始終不曾讀完。這是我一生所犯的最壞毛病：不能把喜愛的作品一口氣從頭至尾地讀完。他的死又讓我記起這本書來，想認真地再讀一遍。可是精力愈來愈差，這個心願多半只是我無數同樣的無法實行的心願之一吧了。

湯姆生是一個有創見的歷史家；又是一個具有詩人氣質的革命家。除了那部研究和敘述英國工人為何從一個「自在」的階級成長為一個「自為」的階級的巨著之外，他主要還寫了英國的二位革命詩人的傳記：維廉·摩利斯和維廉·勃來克。他寫這二位詩人的傳記，研究他們的生平和思想，主要目的是要證實他的一個想法：英國工人階級之階級意識，特別是其中趨向於社會主義的流派，是從兩個傳統來的，一個是經濟的與政治的；另一個是文史與宗教的。湯姆生本人之同情工人階級，擁護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乃至反對核武危害，首先也是由於後一傳統。

馬克思主義者中間流行着一種想法：自從馬克思寫了資本論，確立了科學的社會主義之後，一切空想的社會主義，一切從感情出發的、反對資本與其他壓迫的社會理想，都無益於工人階級覺悟的提高，而只能替一切剝削者與壓迫者起麻醉作用。這種說法，其實是偏頗的。發展到極端，甚至有害。

不但在完整的馬克思主義體系出現之前有各式各樣的社會主義，便是在它出現並在工人運動中起了決定性影響之後，也還有這一類的非科學的社會主義思想。懷有這些思想的人，大多最初是從感情出發來接受社會主義，然後在理智上來了解社會主義，以此接受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當馬克思主義不僅在思想上戰勝了一切僅從感情出發的社會主義派別，而且在實踐上組織了工人階級，爭取到廣大的勞動群眾，而且還在一些國家中，首先在俄羅斯進行社會主義的革命，並進而企圖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以後，人們之走向社會主義與接受社會主義，也還有不少是從感情出發的，這些感情的社會主義者，在實際鬥爭與繼續的理論思考中，很多能進一步成為全面的馬克思主義者：可是仍有不少一部分人，始終停留在感情階段。這些感情的社會主義者，歷史證明，對社會主義的革命曾經起過，而且將來也還能起着相當大的作用。

9月13日

巴勒斯坦解放組織與以色列政府今天在華盛頓簽了和平協議。如何看待這個協議，不但在巴勒斯坦人中間，而且在以色列內部；不但在一般的國際輿論上，而且在全世界的社會主義者隊伍中，都發生了相反的看法。從社會主義者的觀點看，「Zionism（猶太復國主義）」是一種使歷史倒退的運動，本質上是反動的。二次大戰之後英帝國主義者扶植起以色列這個新國家，顯然是為了反對中東阿拉伯民族的反帝鬥爭，為了繼續維護它在這一地區的利益，因而在這個地區強行安下一枚忠於英美帝國主義利益的棋子。這個作用事實上是發揮了的。首

先在英國的，接着在美國的積極扶助下，由 300 萬左右的猶太人組成的國家，居然對抗了中東地區所有阿拉伯人的聯合進攻，居然阻止了蘇聯在這方面的勢力進展。

全世界一切進步力量反對以色列的為虎作倀，反對它特別對於原居民——巴勒斯坦人——的殘暴壓迫，那是理所當然的。

可是半個世紀過去了。中東形勢，乃至整個世界的形勢發生了極大變化。首先，原來支持巴勒斯坦人的其他阿拉伯國家，先後離開了這個反以陣線，紛紛同以色列的撐腰者，特別同美國和解了。其次，以色列這個國家逐漸成了一個不能否認的事實。最後，從來即使不是從革命社會主義的利益出發，而只是從謀世界均勢的立場出發，曾經多少給過反以色列鬥爭以若干援助的東歐與蘇聯集團，也不但不再支持，而且自己和以色列謀取妥協了。終於其自身土崩瓦解了，到了這個地步，怎麼能使勢單力薄的巴勒斯坦人繼續作不妥協的鬥爭呢？

形勢所迫，「巴解」是非改變態度不可的。

光是大叫抗爭到底，絕不妥協，顯然在情在理都已不符實際的了。

我想全世界革命社會主義者今後的任務，應該支持巴勒斯坦人取得真正的獨立自主，反對以色列統治者的擴張和壓迫巴勒斯坦人；同時鼓吹以色列勞動階級與巴勒斯坦的勞動者聯合起來，實行社會主義的革命，實現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聯合的社會主義共和國，以此作為中東未來社會主義聯邦的一部分。

9月15日

謝山寄贈一詩，錄如下：

生死論交日，幾人獨至今，
屢經風火劫，不變歲寒心，
懷舊情仍熱，傷時感更深，
白頭俱老矣，萬里尚相尋。

1993年8月

9月16日

英國紳士們提倡 fair play；但在行動上表示出來；特別是那些體育記者們卻絕對不是 good loser（心平氣和的失敗者）。他們於本國運動員獲勝後，趾高氣揚，見到他們失敗則百般醜詆對方。這，我以為是沒落中的大英帝國沙文主義的醜惡表現。

9月22日

昨晚，葉爾春發佈命令，封閉俄羅斯國會，今後將以總統命令處理一切國事，直至本年12月中旬選出新國會為止。這是葉爾春走向個人獨裁的更進一步。西方的所有民主國家，都急不及待地支持葉爾春這一項根本違反民主的措置。

當年莫索里尼和希特勒上台，都曾經取得民主國家的支持的！歷史似乎又在重複這個「錯誤」了。

9月30日

據《衛報》消息：幹了廿一年之久的法共總書記喬治·馬顯，從醫院裏寫信給法共中央委員會，說在明年1月25日召開的法共第廿八屆大會上，他將辭去總書記之職。在信中，他提了幾項建議，其中之一是今後要放棄「集中的民主」，即放棄民主集中制。他說：

「大家知道，我不喜歡這個制度。

我並不把這個觀念和史大林主義混淆起來，我是指它的本有意義而言的。這個原則好像只是與一種革命戰鬥相符合，而革命戰鬥卻已遠遠地落在我們後面了。

我們得把更多的權力交給我們的成員。現在是須把我們的黨加以改建的時候了。還得給我們的領導機構取一些別的名稱。」

馬顯本是頑固的史大林主義者。在過去廿一年中，他就是用史大林式的「民主集中」來行使他的領導權的。史大林主義的統治相繼倒台後，馬顯是西歐史大林主義頭頭中堅持得最久，最頑強的一位。可是今天，在他73歲的退休信中，作出了這樣的聲明。這是垂死的哀鳴呢，還是真正反思的結果？抑或是索性由官僚主義的時左時右，終將一去不復返地和社會民主黨擁抱的宣告呢？

等着瞧吧。

不過一切能自己思想的馬克思主義者，從馬顯的話裏也多少可以悟出一些道理來。第一、本義的民主集中制，即列寧所提倡的民主集中制，當然不等於史大林主義的獨夫黨制。第二、列寧當年着重地提出民主集中制這個建黨原則，本是針對着當時流行於俄國社會民主

義黨人的「手工業作風」，以及這個作風在沙俄的警探恐怖下面的不相宜。他並非要把它當作一個革命黨在任何時候與任何政治環境中都必须嚴格執行的制度。隨着客觀政治條件的變化，這個黨制的二個成分：集中與民主，必須作及時與適當的調整的。

史大林主義的諸般罪惡中，最大的一項便是將列寧的這個思想絕對化，片面化，乃至施行絕對集中——集一切權力於「總書記」一人之手的毒化。

馬顯拋棄了史大林主義的「集中民主」，更要進一步根本拋棄列寧所設想的機動的民主集中制，多半，據我看，只不過是他徹底轉變到社會民主黨去，實質也只是轉變到資產階級民主去的一個步驟罷了。

10月3日

莫斯科爆發了「新的十月革命」。迫葉爾春的賭博固然導成了「內戰」。其實這個「內戰」，是葉爾春蓄意造成的，他的目的就是要完成他的個人獨裁。

10月4日

「新的十月革命」果然依照挑起這「革命」的葉爾春的意圖給血腥地鎮壓下去了。至少在不短的未來，俄羅斯的莫索里尼政權會存在的了。

克林頓與馬卓安之擁護「民主的」葉爾春是不足為奇的。奇怪的乃是一些從來自命為社會主義者的人，特別是那位一向崇拜托洛次基

的英國名演員 Vanessa Redgrave 竟也全心擁護葉爾春——為了反對「史大林主義」！

10月5日

湯尼·朋在今天的《衛報》上發表了一封信，極好。全文如下：

Russia's classic coup

I AM writing to express my concern at the way in which the crisis in Russia is being reported in the British media. Almost every organ of opinion, notably the BBC, speaks of "hard-line rebels" standing in the way of democratic reform, and argues that Boris Yeltsin is struggling to bring democracy to Russia.

Billions of dollars and pounds and marks have been invested in Yeltsin's rush to introduce a market economy and clearly the protection of that money is a major factor in influencing financial and business opinion.

But the democratic issue should also be brought out — namely that Yeltsin has violated the constitution to which he swore allegiance when he was elected president last year.

The parliament he has suppressed is the same parliament that he purported to defend against a coup two years ago. It is a parliament elected

after a choice of candidates had been on the ballot paper and it is the parliament that elected him chairman. In that capacity Boris Yeltsin signed the parliamentary decree that set up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that he has also now dissolved. In defiance of all these constitutional safeguards he has dissolved the parliament and the court, taken full control of the media and for this has received the full backing of President Clinton and John Major.

It is true that there are some former communists in the parliament. But Boris Yeltsin was for 29 years a member of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in that capacity as an apparatchik was Secretary of the Moscow Communist Party. So that the term "former communist" cannot be applied solely to those who oppose him.

This is a classic coup, and contrasts so markedly with the situation in say Poland, or Czechoslovakia, where eco-

nomical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ir constitutions.

This analysis is never properly reflected in the British media although there are many democrats in Britain who always opposed Stalin and now oppose Yeltsin for the same reasons.

A market economy is not the same as democracy, as we know from Franco's Spain, and apartheid South Africa, which were capitalist but denied human rights and a popular vote. In 1920, Western troops were sent to Russia to crush the revolution. If the present press campaign in the West continues, I wonder how long it will be before we are told that a military intervention may be necessary to impose a military form of capitalism there as occurred in General Pinochet's Chile.

Tony Benn MP.
(Lab. Chesterfield),
House of Commons,
London SW1.

Yeltsin should have given up radical reform and ahead for economic stability before holding early elections for both the president and parliament. This would have been a peaceful evolutionary approach to reforming society. The second option was to remove his political opponents, an option which is associated with bloodshed and violence, the path towards a coup d'état. Unfortunately he has gone for the latter.

The outcome of the traffic events in Moscow is already clear: hundreds dead, thousands wounded. Both sides, who were unable to reach a compromise, must share the blame. Not all those who defended the White House and stormed Ostankino, the state TV station, were peaceful supporters of parliamentarianism. But neither the rebels Alexander Rutskoi or Ruslan Khasbulatov were able to dissociate themselves from the extreme anti-Yeltsin camp which included fascists, Stalinists and armed bandits without any political convictions whatsoever.

There are few who doubt that if General Albert Makashov or Viktor Anpilov, leader of Trudovaya Rossiya (Workers Russia), had gained the upper hand then the fate of democracy in Russia would have been even more terrible and the number of casualties would have been even higher. The responsibility of power was enough to at least to a small degree to hold back President Yeltsin. Among the radical opposition there were no such limitations.

Yet those in power are the ones who must accept the real guilt for the schism in society. The real cause for the recent bloody conflict was their decision to dismiss parliament.

Both in Russian and in the West, Yeltsin's supporters propagated the myth that a conservative, pro-communist parliament was opposing a progressive president who had destroyed a totalitarian communist system.

Yet this point of view does not stand up. In 1990 free democratic elections were held in Russia for parliament and old restrictions were removed. Many of the Russian deputies were elected precisely because they had spoken out in support of Yeltsin and against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It was the Russian parliament which elected Yeltsin first as its chairman then passed, in support of Yeltsin, the law about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post of President of Russia. It was the Russian parliament itself which supported Yeltsin in August 1991 and then granted him special extraordinary powers and allowed him to form a government which was practically outside their control.

Of course, among the deputies there were many former members of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But Yeltsin himself and those closest to him were not merely former memb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they had also held high posts in the party hierarchy.

The second myth was that Yeltsin was fighting for economic reform and that the conservative deputies opposed the market economy. Yeltsin was fighting not for reform but for his own personal power. The collapse of the economy and the impoverishment of the people, so painfully visible in Russia today, would be difficult to call reform. The Russian parliament, the same one in which until recently the majority of the deputies supported Yeltsin, spoke out only after a great delay against the destruction of the country'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olicy.

Conflicts between the legislative and executive are natural in a democratic state. One of the slogans with which Yeltsin and his circle came to power was: "For the creation of a democratic and law-abiding state".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Russian constitution, the highest organ of state power is the congress of people's deputies and the president is only the head of executive power.

The dismissal of parliament by the president was inadmissible under the law. In Russia neither a law-abiding state nor a democratic society has yet been created; the process toward their creation has only just begun. In this situation the "battle for democracy" by unlawful means can lead only to a new form of totalitarianism.

Any democratic system has a division of the legislative executive and judicial powers and a free mass media. In Russia today there is no parliament. After the forced resignation of Valery Zorkin, Chairman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judicial power is virtually paralysed. Opposition newspapers have been closed (although some have

reopened), and the monopoly of television, in the absence of any private companies, belongs to the president.

Ahead of us lies a hard winter and an ever deepening economic crisis. In such circumstances elections to the new parliament are unlikely to be truly free. It is as though the regime wants to surprise the world with a new experiment to create, in a country growing poorer before its eyes, “democracy” without freedom.

11月10日

忙於寫有關胡風遺著的一篇文章，札記竟停寫了一個月。精力實在愈來愈差了。放下一切來寫文章，文章卻迄未寫成。斷斷續續寫了一個多月，還只了寫了22張稿子。昨天返看一遍，覺得實在不成東西。預備扔了，但子春來信說要看看。今天將前面的十五頁寄給他了。

今晨接黎紹珍寄來《回憶》校樣。二月餘音訊全無，原以為此事吹了。略看一過，似覺成績不差。準備一星期內看完，寄回去。

11月24日

《回憶錄》校樣已於上星期二寄回香港。接着續寫有關胡風文，昨天寫完，共得二十六頁，寄給春。

11月28日

幾乎半年不得家書，昨得裕生長函，頗善。近來頗思家，這該是我生命快近終點的徵象。

12月12日

今日俄國舉行對葉爾春憲草的全民投票，同時要選舉新國會，代替那於10月間被葉爾春用坦克解散的舊國會。

12月13日

俄羅斯全民投票與國會選舉的結果，多少有點出人意外。葉爾春的憲草是「通過」了，有50%以上的人投了贊成票。可是國會選舉的結果卻出人意外：公然主張法西斯路線的「自由民主黨」，據初期統計，已得票24%；擁葉爾春的政府黨「俄羅斯的選擇」得票14%；共產黨得票11%；農業黨得票9%，「俄羅斯婦人黨」得票9%。

看情形，葉爾春是否能當上俄羅斯的莫索里尼，還不是確定的事。可能成功，亦可能步戈巴喬夫的後塵，為更為堅決的反動家——席林諾夫斯基所取代。如果席林諾夫斯基真的取代了葉爾春，那末葉爾春留在歷史上的作用，怕將是一個使俄羅斯向右急進中的新的克倫斯基罷了。總之，俄國的政治離一個暫時穩定局面尚遠。未來的變化還很多。唯一令人悲觀的是始終看不見一個像1917年時候的布爾雪維克黨。

左邊不是完全沒有力量的，有好幾個自稱不同於過去共產黨的共產主義政派。但是迄今為止，我們還看不見一個認真對過去史大林主義制度作出徹底與正確批判的、同時又堅持真正馬、列、托路線的左派團體。

俄國的第四國際的人我以為應該加入一些較好的由過去共產黨下層組成的新政黨中去，以便從內部，同時又從外部宣揚我們的主張，以便在俄羅斯往後的政治發展中，起較大的，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

12月14日

俄國的情形近來時常為一些政論家拿來和中國的情形相比。十天之前，《衛報》上登載了勞平·勃來克朋寫的一篇文章：〈從馬克思主義的樂隊車轉上了超級市場的手推車〉。文章主要是談蘇聯原有的領袖們如何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他們如何從馬克思主義的「宣講師」一變而成為資本主義的歌頌者。他拿亞歷山大·雅可夫列夫作例，借對他新出的書所作的批評來發表一些議論，然後拿俄國的現狀和中國的情況相比，企圖得出一些教訓來。勃來克朋文章的前一半很有趣，它讓我們看到了那些史大林主義的「思想權威」是如何的淺薄與虛偽；後一半，即他比較了中俄二國「改革」而提出的結論，卻極不高明。

亞歷山大·雅可夫列夫是怎樣的一位人物呢？勃來克朋的文章裏是這樣介紹的：「大學一畢業，他便當上了蘇聯共產黨的一個全職的官員。1969年（那時他才45歲左右），被委任為蘇共中央委員會宣傳部部長。後來一直擔任黨要職，其中包括蘇聯駐加拿大大使，莫斯科世界經濟學院院長，黨中央委員會書記，直至最後，在1987年，躍而成為黨的政治局委員。」

此人最初擁護戈巴喬夫的改革，成為 perestroika（改革）與 glasnost（開放）的主要宣傳家，等到戈巴喬夫一失勢，他改投葉爾春陣營。思想上，跟着從共產主義（史大林主義）的改革家逐漸變成為

公開與徹底的反馬克思主義者。他在美國耶魯大學出版的書：《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命運》，記錄了他對馬克思主義的徹底叛離。據勃來克朋的引述，書的主旨如下：

亞歷山大·雅可夫列夫於深思熟慮之後，認為馬克思主義是不可能提供真正的關於經濟實況的知識的，因為它和這樣一個觀念深相結合着，即它肯定資本主義是命定着要陷於停滯的。他又認為，馬克思主義要人接受這樣一個事實，即佔統治地位的政黨必須壟斷政治生活，它又否定個人的任何價值。……

如此膚淺的馬克思主義批判，出之於長期間扮着「馬克思主義」最高權威角色的人之口，真正難以令人相信。要批駁這種謬論當然非常容易。勃來克朋自然很容易把他駁倒了。可是接下來，勃來克朋想拿中國的改革來和俄國改革相比，從而指出任何以前者成功與後者慘敗的原因，卻顯得非常不濟。我們這裏撇開中共的改革是否成功，以及成功到何種程度這類問題不談。從中共改革確已成功的前提出發，勃來克朋所指出的成功理由是站不住的。他所列舉的幾個理由中，最站不住的是說：「一部分由於數年前發生的文化大革命期間，那個統治的官僚制及其控制的經濟已經分崩瓦解了……」這完全不符事實。

何以中共的「開放」、「改革」會比俄國的 *perestroika*（改革）與 *glasnost*（開放）獲得不同結果，至少截止目前為止，前者多少可以稱作成功，而後者弄得一敗塗地——這分別應如何解釋，已經成為國際政治家、經濟學家、社會主義者以及共產主義者熱烈討論的問題。

我們，中國的少數殘存托洛次基主義者，迄今為止，似乎不承認有這個問題的存在。原因，主要是根本否認中共的改革已取得任何成績。第四國際的領導者方面則完全不曾注意到這個問題。

這當然不是真正馬克思主義者所應採取的態度。我們應該鄭重地注意這個問題，首先我們必須研究下面這個問題：

中共十多年來的所謂「開放」與「改革」。從經濟和政治的角度來看，究竟代表着怎樣的一種發展。是從社會主義經濟轉變為資本主義制度呢，還是從一種獨裁的資本主義，從一種帶着濃重封建色彩的前資本主義，逐漸進步為民主的與自由的本義資本主義？從這二種不同的認識，應該得出兩個完全相反的看法。依據前者，那些改革代表着反動與反革命；依據後者，它們卻是十足的進步乃至革命了。

問題的前提還是國際托派中一直爭論的那個老問題：究竟史大林的蘇聯與毛澤東的中國代表着什麼性質的一種國家？

依照托洛次基一貫堅持的立場，史、毛二人主持下的蘇聯與中國，既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也不是「特種」（國家的，或封建的或官僚的）資本主義國家。它們是一種由一次徹底的革命所造成的，並且由各該國與國際的種種條件所決定的、一個過渡性的國家：它們由革命所造成的財產所有制的變革，可以繼續前進而創造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亦可以向後倒而完全恢復資本主義。

1994–1998 年

1994 年 2 月 10 日

今天是農曆甲戌年元旦。1994 年已過了一個月零十天，可是我的札記不曾記下一個字。上面一則是去年 12 月 14 日寫的（沒有寫完就停筆了），離開現在已快兩個月。這中間我到底幹了些什麼。不能算病，能吃能睡，也能作短短的散步。可就是無法動腦筋：一用腦就頭痛頭暈，昏昏欲倒。結果是終日呆坐，有時看點最無聊的電視。如此下去，真的成了活屍。生活太無意義了。今年的最大希望：讓它成為我在世的最後一年。

2 月 14 日

遷居一周年。奇寒。讀唐寶林編的陳獨秀年譜，為的改正班編的陳氏生平大事表。頭痛，無法工作。

4 月 28 日

好久未得子春來信，甚念。今天終於收到了他的一個短簡。原來他不舒服，又因瑋春於本月 23 日逝世了。瑋春是子春的胞弟，對政治無大興趣，但為人方面，卻與子春不相上下，有正義感，對朋友肯援手。在我心中，他一直是和汪孟鄒先生並列的。

5月1日

翻閱前些時子春剪寄來的一篇文章：〈生命的光華與暗影——王實味傳〉（黃昌勇作，見1994年第一期《新文學史料》雜誌）。文章寫得不壞，態度極公正。其中引用我寫的〈王實味與「王實味問題」〉一文的好些段落，引用得也很信實。此文對王實味冤案的徹底平反；對毛澤東、史大林罪惡的文藝政策的充分揭露，都大有好處。只是作者摘引王實味夫人劉瑩於1985年7月向中共有關方面提出的「申訴材料」，其中提及王實味與陳其昌和我的來往情況，卻使我感到很大失望與痛苦。在「申訴」中，劉瑩把其昌和我都說成說謊者。說為了「別有用心地達到他托派宣傳的一絲目的」，我「完全對王實味撒謊」，隱瞞自己的托派身份。同時又說我為了籌措一筆錢來給妻子生產，要王實味幫忙翻譯托傳，卻不告訴王實味托洛次基是什麼樣的人，直到王實味譯完「二章」之後，劉瑩才知道譯的是托洛次基自傳，此時她才勸王實味不要再譯。對陳其昌，劉瑩說他隱瞞托派身份，而且連自己的地址都不告訴他們，因此引起了他們的懷疑，不久搬家，「從此與一般同學和熟人斷絕了來往」。

這樣的「申訴」，目的顯然為要說明王實味和兩個托派朋友有過的一點點關係，是完全受了欺蒙，是不自覺的。等到知道了那二位老同學的托派身份，便立即主動地與那二人割斷一切關係。

為了給丈夫洗冤，為了爭取他的徹底平反，王實味夫人作了如此「申訴」。她的這份苦衷，我能夠了解，也多少能夠原諒。只是，把王實味的，同時也是她自己的二位老同學，形容得如此不堪，怎能與王實味當年在延安所作聲明，即在他遭到批鬥前後，仍然說那二人的「人性是好的」，這個事實相調和呢？

說王實味譯完了托傳二章之後，仍然不知道托洛次基的政治立場；必須等到夫人給他提醒，他才知道托洛次基是什麼樣人——這，未免把王實味的政治知識與認識說得太糟糕了。

劉瑩所說的一些「事實」，完全與事實不符。這也許除了上面所說的「苦衷」之外，還因年份隔得太久，記憶失真吧。本想給《新文學史料》的編者寫一封信，糾正那些不確之點。轉念一想，算了。更正信人家未必會登；如果登出來，徒然讓這位受夠了痛苦的老婦人心中再添若干隱痛。

「身後是非誰管得」，隨它去吧！

5月8日

最近南非的巨變是值得注意的。可惜我對南非的種種知道得太少，「沒有發言權」。我只能籠統地，從列寧主義的眼光看問題。把南非的ANC比之以中國的國民黨，比之以印度的國大黨，大概不致於大錯吧。三者都是代表殖民地新興資產階級利益的。同中之異是：前二者中的急進一翼主要是舉起了反民族壓迫的旗子。而後者則把那反民族壓迫的鬥爭表現為反種族壓迫的鬥爭了。

6月7日

收到香港所印的4本《回憶錄》，成績比我預料的較好。

1995年3月8日

得梁耀忠從香港打來電話，知子春已於今晨逝世。子春死了，我也不會再寫札記了。

THE GUARDIAN
Monday January 30 1995

PDS ditches Stain for democracy

Katerina von Walderssee
in Berlin

GERMANY'S reformed communist yesterday made a clean break with Stalinism in a move to set themselves on the road to political respectability in the country.

After a stormy debate, delegates at a congress in Berlin of the Party of Democratic Socialism voted to adopt a five-point policy paper which defined the PDS as a leftwing democratic party.

The paper also dropped references to anti-communists being barred from membership. Reformists beat back a challenge by a hardline member who threatened to lead a "silent majority" within the party against the reformists. The three-day congress culminated late last night, mastering a two-thirds majority against Sabra Wagenknecht, spokeswoman for a Stalinist faction whose bid for re-election to the 17-member PDS executive had split the party.

But the party's chairman, Lothar Bisky, and its parliamentary leader, Gregor Gysi, failed to persuade delegates to accept an unimpeachable Stefan

Andrie Birtz, the main reformist strategist in the PDS, which emerged in late 1989 from the ruins of the hardline Socialist Unity Party that dominated East Germany for 40 years, admitted last year he had spied for the Stasi security police for 19 years.

Party leaders, who have been fighting an uphill battle against communist hardliners to clean up the PDS's image, hope the weekend's reforms will make the party palatable to mainstream German parties, especially the Social Democrats (SPD) and the Greens, and to voters in the west.

The PDS has only about 2,000 members in west Germany, far fewer than its 121,000 members in the east, its political base.

"For us socialism is the way, the orientation and aim. This socialism includes the highest measure of democracy and liberalism," said Mr Bisky, a modernist who was overwhelmingly re-elected for a second two-year term as chairman.

Mr Bisky, a former film

school director, aged 55, told delegates that the contents of the paper would form the basis for his work during the next two years.

He said the PDS was in a phase of intense internal confrontation but that this was unavoidable as the party searched for a new image.

"Let us be aware of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PDS experiment," he said.

It remains to be seen how the SPD or the Greens will respond to his overtures. Both have rejected working with the PDS in the past because they feared their image could be damaged by a party linked with East Berlin's former communist rulers.

The German chancellor, Helmut Kohl, has lost no opportunity in lambasting the party as "red painted fascists" who were overthrown in 1989.

The rejection of Stalinism and the defeat of Ms Wagenknecht were a victory for Mr Bisky and Mr Gysi, who had threatened to quit unless the congress approved the reforms. Mr Gysi, a lawyer who defended several dissidents under the communist regime, is the PDS's best known politician and is favoured in west Germany.

Speaking before the vote for party executive candidates, Ms Wagenknecht denounced Birtz's crimes but pleaded for more understanding for his policies.

Pledging her loyalty to classical communism, she said the PDS had to organise anti-capitalist agitation outside of parliament if it wanted to achieve socialism.

"Socialism cannot be introduced just by voting in parliament," she told the 260 delegates.

The PDS's trendy image was boosted by the election of Angela Marquardt, a red and green-haired punk, aged 35, as vice-chair of the party.

The German authorities are worried that a new leftwing terrorist group, Anti-Imperialist Cells, might be planning a wave of violence and are considering stepped-up security for political and business leaders. The Bild am Sonntag newspaper said yesterday it quoted from a confidential report by the country's domestic intelligence agency. The AIZ is believed to be a splinter from the Red Army Faction.

(一則王凡西 1995 年的剪報。)

1997年8月28日

不寫札記已有兩年半，最近卻又有了寫的衝動，那是由重溫列寧和老托的著作引發的。關於革命與戰爭的關係。特別關於革命者對於不同性質的戰爭所應採取的不同態度，這二位大師所作的分析與論斷，真是精闢、深刻，每讀一次，總有新的領會。今天翻閱老托的《戰爭與第四國際》（寫於1934年6月），對我多年來所思考的問題大有啟發作用——特別是其中關於「『失敗主義』與帝國主義戰爭」那一節。這個文件當年可曾翻譯成中文出版，記不清了。

「失敗主義」與帝國主義戰爭

58. 當問題在於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衝突時，那末其中無論哪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都得堅決拒絕為資產階級的軍事勝利而犧牲他們的歷史利益。這些歷史利益，最後分析起來，是和民族和人類的利益相符的。列寧提出的公式：「失敗是較小的禍害」，意思並非說本國的失敗比敵國的失敗是較小禍害；而是說：由於革命運動高漲而促成的本國在軍事上失敗，比那由於實行「國內和平」而獲致的軍事勝利，對於無產階級與全體人民說來，都是極度地更為有利。卡爾·李蔔克內西曾經給戰爭時期的無產階級政策定下一個不能更好的公式：「人民的主要敵人在國內」。勝利的無產階級革命不但會補救好因戰敗而產生的種種禍患，而且能創造出使未來戰爭與失敗不再發生的最後保證。對於戰爭所採取的此一辯證態度，是革命教育的最重要的因素，因而又是反戰鬥爭的最重要的因素。

59. 將帝國主義戰爭轉變為國內戰爭，這是一個普遍的戰略任務，一個無產階級政黨的全部工作應該從屬於這個任務。1870年

到 1871 年的普法戰爭以及 1914 年至 1918 年的帝國主義的大屠殺所帶來的後果（巴黎公社，俄羅斯的 2 月革命與十月革命，德國與奧匈二國的革命以及許多交戰國家內發生的起義），都無可否認地證明了發生於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近代戰爭，同時帶來了每一國家內部的階級戰爭，又證明了一個革命黨的任務在於準備在階級戰爭中使無階級獲得勝利。

60. 1914 年到 1918 年的經驗，同時又表明出和平口號與「失敗主義」的戰略公式絕無衝突。相反，這個口號能發生巨大的革命力量，特別在戰爭延長的情況中。和平口號之所以會具有和平主義的性質，即帶有欺騙的、愚弄人的、使人萎靡的性質，只有在民主派的與其他政客們玩弄這個口號的時候；只有當牧師們為謀求最快地停止大屠殺而作祈禱的時候；只有當那些「人道的愛好者們」——其中也有社會愛國家——涕淚交流地祈求各個政府「以公道為基礎」而儘快達成和平的時候，才是如此的。可是當和平口號從工人階級地區叫喊出來，從戰壕中叫出來，當它與交戰軍隊的兵士聯歡這個呼聲聯在一起，又和被壓迫者反對壓迫者這個呼聲聯在一起時，和平口號便與和平主義無任何共同之點了。爭取和平的革命鬥爭如果規模愈廣，它採取的方式愈勇敢，它便成為轉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的最可靠的手段。

1998 年

上面這段譯文是去年 8 月間搞的。原本想從這段文字……

王凡西的一生著譯甚勤，發表過的作品遍佈中外報刊。作為中國托派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其作品也是中國現代史、中共黨史、中國托派史的重要史料。《王凡西選集》共分三卷——《卷一：托派與中國》、《卷二：論毛澤東思想》、《卷三：晚年札記》，由內地著名學者朱正選編，並補充珍貴史料及注釋，是王凡西最重要的著譯作品首次結集出版。

本卷第一部分選收了王凡西專著以外的文章，包括書評、序跋，以及一些回憶往事、懷念故人之作。在書評、序跋一類選文中，不乏關於托洛次基及托派思想書籍的文章，足見作者「對托洛次基的尊崇和信仰」。而在回憶往事、懷念故人的文章中，多寫早年一起共同從事革命活動的同志，如陳獨秀、鄭超麟、陳其昌、李福仁等，可說是卷一的補充和註腳，讓讀者能更全面地掌握中國托派活動的全貌。

第二部分的《晚年札記》以日記形式寫成，為首次發表。它真實地記錄了作者在人生最後階段那十數年的生活實況和心境，向讀者展現了堅定的政治信念，彌足珍貴。

根叔一輩子是一個永遠忠於自己理想的革命家，儘管我們後來對世界的看法不一樣了，卻永遠不會影響我對他的敬重。

岑建勳

根叔的著作，為我們畫出多元多彩的中國共產革命，引領讀者往更寬闊的層面思考政治。

成令方 台灣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教授

我也希望，透過這套選集，中文世界年輕一輩的讀者能夠獨立地、批判地重估王凡西、中國托派、世界左翼運動的得失是非，並從中探索社會變革的動力。

萬毓澤 台灣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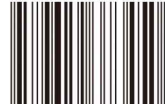
微信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ISBN 978-962-937-345-0



9 789629 373450